

桑兵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作品集

(套装 5 册)

以史料重现史实
近代中国研究系列
近代史大家桑兵教授



桑兵 著

桑兵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作品集 (套装5册)

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i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名：桑兵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作品集（套装5册）

作者：桑兵

版权方：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CONTENTS

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
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历史的原声

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

桑兵 著

说共和，孰为共和？锄汉奸，谁是汉奸？
是当时攻驳的需要，还是后世叙事的取舍，
抑或学术诠释的结果？

回归史料，倾听历史的原声
从罗生门式的言人人殊走近鲜活真实的历史现场

只有听，才能懂，不听则永远不可能懂。
如果听不懂，应该提升能力，而不是因噎废食，放弃倾听。

梁启超与共和观念之初兴
革命论战与共和观念的演进
帝制与共和的缠绕
清季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
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桑兵 著

历史的原声

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桑兵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

ISBN 978-7-5598-2735-7

I. ①历… II. ①桑…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后期—文集 IV. ①B249.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5435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黄轩庄

责任编辑：罗丹妮

装帧设计：彭振威

内文制作：李丹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1270mm×960mm 1/16

印张：23.5 字数：240千字

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

- 一 史与论
- 二 史料与史观之分
- 三 文白与史论
- 四 倾听历史的原声
- 五 重现历史以把握概念

共和篇

引言

第一章 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

- 第一节 古今中外的共和
- 第二节 《新民丛报》与共和观念初兴
- 第三节 告别共和

第二章 转向孙中山：共和先驱易位

- 第一节 共和学校
- 第二节 学界呼应
- 第三节 新的共和先驱

第三章 革保论战与共和观念的演进

- 第一节 众说纷纭的选择
- 第二节 大论战的前哨战
- 第三节 民权立宪政体
- 第四节 胜负分明的结局

第四章 国体政体的争辩

- 第一节 《国家论》《国法学》与国体政体之分
- 第二节 共和立宪之选与国体政体之论
- 第三节 开国会重启国体政体之争
- 第四节 共和与国体政体之辨

第五章 帝制与共和的缠绕

- 第一节 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
- 第二节 梁启超的尴尬

- 第三节 虚君共和的反响
- 第四节 虚君共和与国体政体
- 第五节 结语

汉奸篇

引言

第六章 清季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

- 第一节 “汉奸”新义
- 第二节 “汉奸辨”
- 第三节 驱满酋与杀汉奸
- 第四节 锄奸及其泛化

第七章 首义之区的汉奸问题

- 第一节 以间谍为汉奸
- 第二节 第一、第二汉奸辨
- 第三节 汉奸的指认与处置

第八章 光复各省的防奸锄奸——以沪军都督府为中心

- 第一节 严厉打击
- 第二节 慎重甄别
- 第三节 汉奸指称的泛用
- 第四节 “城头变幻大王旗”

第九章 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 第一节 锄汉奸的舆论
- 第二节 缉凶与北伐
- 第三节 追究与释嫌

后记

征引文献

- 报刊
- 书籍论文

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

“共和”与“汉奸”，是学界坊间耳熟能详却言人人殊的两个指称，因为难以定论，或者以为应该首先明确定义，以免内涵外延含混不清，所指能指不明，令人无所适从。然而，如果真的照此办理，结果可能更加混乱，因为无论如何定义，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事实，而被定义涵盖的人事，有的很可能不应被包裹在内，反而会引起新的歧义。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共和”与“汉奸”，不是按照后来的定义发生和演化出来的，作为实际存在过的事实，无论如何有违今人的认识，都不能被排除在历史研究的对象之外。而后来的约定俗成，往往会牺牲或扭曲部分的事实。反之，无论今人的定义如何科学，只要涵盖了历史上不在其列的物事，都属于不适用的架构，只能存在于今人的玄想之中。

类似的自相矛盾，说到底，都与治史处理材料与理论的关系紧密关联。在史论分别、文白不一的情况下，治史如何把握求真与讲理、如何协调叙事与论述的关系，已经成为一大难题。有鉴于此，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一聚讼纷纭的悬案发生衍化的渊源流变，进而探寻近乎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为来者提供有效的取径和做法。

一 史与论

“文革”前十七年的史学界，出现过相当多引起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的学术争鸣，其中之一，便是史与论的关系。在所有学科都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的认定下，史学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在学理上，史与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实践中，又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却是聚讼纷纭，相当棘手。由于意见不一，无所适从，于是展开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这场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中间虽经“文革”停顿，可是“文革”结束后再度接续，前后时断时续进行了三十余年。讨论由“以论带史”引发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成为史论关系认识的三种基本取向，围绕这三种取向，在相互批评和争辩中，还出现“以论代史”等延伸的变相。^[1]

讨论莫衷一是，后来只能不了了之，相关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直至今日，史论关系仍然困扰不少新进乃至成名学人。可是，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一般而言，历史论著有无理论，俨然已经成为衡量水准高下、程度深浅的标尺。所争主要在于以什么为理论，或者说什么是正确、恰当、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治史当然不能有论而无史，否则就不成其为史学，但如果被认为有史而无论，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也有失公允。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史论关系没有定论，尽管人们对于以什么为论后来实际上取法各异，言人人殊，却不仅大都并不否认论的重要，而且相对于史，似乎还显得更加重要。虽然人们习惯性地声称事实胜于雄辩，可是在最应看重事实的史学领域，其实却是以雄辩为高明，事实只是基础初步。相较于史事不清、史料不足，没有理论或理论不足，更受诟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倾向，是因为历史论著的主要功能无形中已经由叙事转向说理。本来治史首要求真，可是误解“一切历史都是自己心中的当代史”的说法，以为真相不在、不可求，或是碍于材料太多，头绪纷繁，剪不断理还乱，干脆宣布无法还原。尽管名义上还没有放弃求出真相，实际上却认为真相不会自动显现，只有符合一定之理的事实才是真。结果类似于字还没有识完微言大义已出的情形日渐普遍，事实不详而认识层出不穷，在史学领域似乎已成常态。不要说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多半向虚，所说大都自己心中自以为是的历

史，即使研究人、事、机构等实而又实的题目，也将评判、认为放在澄清、还原之上，往往是发表了一大通“我认为”的说理，实情究竟如何，还是让读者一头雾水。越来越多的历史认识变得众说纷纭，于是悬而未决的史论关系再度浮现，即使不再专门讨论，具体研究和写作时，还是会面临如何处理的棘手难题。

民国以来，治史尤其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往往好将材料与论述分别，引文单纯作为证据，支持引号之外作者表述的论点，从而形成一种普遍定式，引号中的征引文字多数情况下无形中成为单纯的史料，引号外的表述才是正论，代表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更有甚者，即使所征引的材料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用自己的话概述一遍。有一种说法叫做夹叙夹议，这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史论结合比较好的体现形式。这与傅斯年等人将材料整理好以呈现史事的主张明显有别。

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习惯，阅读时史与论是分离的，引号外的“议”即论，更加受到重视，而引文部分则是必须有却不大看，至少是不大留意，除非对议的部分有所疑虑，才会认真审视一下史料是否吻合论点或能否提供充足的支撑。可是，严格说来，议论不过是后人的认识，并不等于当时的事实。在传统史书里，间中也会出现“议”，如《史记》的“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只是《太史公书》本来未必是专门史书，《资治通鉴》也是写给治国平天下的君臣看。况且，他们的“议”与“论”、从史出的论看似相近，却与后来的论主要所指的理论，基本不是一回事。尤其是两位司马的“曰”毫无疑问是个人的议论，关乎对史的认识，却不会与史实本身相混淆。

近代以来的史论结合，反映了史论分离的状况，也会进一步加剧史论分离的趋向，使得历史本来的叙事功能大幅度下降。作为历史原声的史料，沦落到次要和从属的地位。人们往往关注论著的主要观点，而不大注意支撑这些观点的史料是否已经过各种必不可少的复杂验证，更加不关注可否用这些史料准确重现历史的本事。所写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在谈作者个人对历史的认识，而又将五花八门的认识美其名曰见仁见智。至于所认识的历史究竟如何，反而变得相当模糊。

诚然，史家不妨对历史表达意见，不过前提应该是将史事述说清楚。而要将史事述说清楚，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认识或意见，恰好要想方设法抑制自己的主观，以免任意驰骋，脱离

事实约束。其主观能动作用体现于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是最大限度地限制自己一定存在的主观不至于过度放任，而不是在表述的过程中频频走到前台亮相。正如文学形象是由其生动典型的言行塑造，因而呼之欲出，如果作者不时加注或旁白，就很煞风景了。

其实，史论关系问题，并非20世纪50年代才突然出现。它与清季以来中国史学革新变动所产生的新问题紧密关联。20世纪开篇，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就石破天惊地提出“中国无史论”，不仅无史，就是想从中搜求材料，“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2]即使像《资治通鉴》这样“最称精善”的史书，“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3]以“今日”和“西史”的眼光看出来的中国无史，当时已经引起争议，却并不妨碍中国古代只有史料没有史书的看法日趋普遍。

既然传统史书只是史料而非“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有“史”。当时提倡的重要取径之一，就是需要用社会学的观念，研究撰写民众的历史。梁启超认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4]也就是说，单纯记载事实，还不能称之为“史”，必须进而说明事实之间的关系及其因果，才有可能成为史。据此提出的创新史学的界说，就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而社会进化观念、人类群体中心以及用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为参照，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凭借。^[5]

同时代的章太炎此时同样举目西望，与梁启超心心相通，不谋而合，高度赞同梁启超的见解主张。章太炎早有修“中国通史”的志向，他受各种西方社会学书的启发，并且购求日本人译著的《史学原论》及亚洲、印度等史，“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欲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熔于一炉，进而宣称：“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6]

这时梁启超与章太炎关注史学的目的，首先都在政治，都想借此发明社会进化的公理公例。说得直白些，就是用中国的材料和史事，

证明社会进化的一般性原理的普遍适用。其中关于史事因果联系的说法，后来梁启超基本放弃，承认历史事实并无因果关系。章太炎更是整体上回复中国固有的学问之道。但史料与史学从此渐趋分离，最后导致民国时期学术界意见纷纭的史料与史观之争，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即由此演化而来。有鉴于此，要认识史论关系的来龙去脉，有必要重新检讨清季以来史料与史观分别的渊源流变，尤其是民国学术界关于史料与史观的各方意见。

[1] 参见肖宏发：《对“史与论关系”争论问题的逻辑考察与反思》，《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第65—69页。

[2] 梁启超：《中国无史论》，《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3日。

[3]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页。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5] 参见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6] 1902年7月《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7—168页。

二 史料与史观之分

中国史学发达甚早，经典史籍不胜枚举。虽然在取材与著史方面，也有所分别，一般却不会出现史料与史观的对立。历代间有好讲史法之人，一则所谓史法其实是编纂体例，并非后世的理论，二则有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好的风评。因此，史料与史学，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事。据清华国学院毕业的陈寅恪记：陈寅恪“师于史之见解，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1]。这一观念，一定程度上与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之说契合或近似。整理史料何以便能成为“史”，是因为所谓整理，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比较整理的目的有二，一是近真，二是得其头绪。二者相辅相成，可以由整理史料不断接近史事本相，并据以叙事，进而揭示背后的联系，也就是发现历史的规律。

这样的讲法胡适也有所领悟，他说：“我从前曾说：‘文胜质则史’，史是‘说故事’，如《国语》《左传》所根据的一些演史的故事，如晋公子重耳出亡一类的故事。‘史之阙文’也应当如此说。孔子说，他还及见没有添枝加叶的记事史。”从《仪礼·聘礼》的“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胡适判断郑玄所注“史谓策祝”是妄说，“合上三条看来，可知‘史’是演义式的讲史”。并进而引申希腊文historia、拉丁文historia、古法文estorire、英文history即历史一词，与故事story一词都是出于同一来源^[2]，重视史与生俱来的叙事功能。

据此，历史本来的主要功能就是记事与叙事，后者与前者的分别在于文胜质，但是否演义，值得斟酌，至少与后世演义的小说家言本质不同，不能虚构或故意夸饰、掩盖、增减事实，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不过，陈寅恪关于史学不止一种说法，谈及民国学人的文化史研究，他曾说：“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

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3]

照此说法，单纯整理材料而不得法，也很难“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若以经学为参照，则谨愿者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夸诞者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诂，二者均偏于一端，不足取法。惟有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才能达到“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4]。

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迫于条件所限，不得已转而用常见材料研究中古制度的渊源流变，却大获好评，识者推许为“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将对陈著的推举与其他几种常见的治史流弊相区分，所标举的重要原则就是陈寅恪所说既要具有统系又须不涉傅会，这也是整理史料与研究史学相一致的关键。^[5]

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相辅相成，可见在陈寅恪眼中，史料与方法并无轩轻。其应用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以及比较史学等欧洲研究文史之学的正统取径方法，又与中国固有的合本子注、长编考异诸法相融会贯通，很少称引西说而尽得所谓西学的精妙。这也是王国维主张学不分中西新旧的旨意。不过，这样的理念未必所有人都接受，尤其是那些受了其他学科的观念影响，欲将中国历史推倒重来的学人，总想找一个现成的架构，可以方便地将材料放进去且看起来井井有条，头头是道。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成功先例，就是借用西式系统组装中国固有材料的典范。

思想史之外，社会学的影响更加广泛。清季用社会学治史的取向，两位倡导者梁启超、章太炎并没有身体力行，而且后来还分别做了明确的修正。不过这样的取向，到民国时期一直延续。1926年初，针对顾颉刚、钱玄同、柳诒徵等人关于古史的争论，魏建功撰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接续梁启超的理念，重提民史建树的方向。他说：

我的结论：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新历史的系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历史的长度要依史料真实的年限决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长的君主的朝代起讫；历史材料要把传说、神话、记载、实物，……一切东西审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结果，客观的叙述出来。如此，我们倒不必斤斤的在这个旧心理磅礴的人群里为新史料的整理伴他们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顿了！^[6]

与民史建树的角度相辅相成，社会学的取向备受重视。只不过那一时代的所谓社会学，更加接近广义社会科学的意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开始就认为是社会学的法则。他将史学分为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部，前者的目的是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后者则是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这是科学的工作。另有历史哲学，从系统上讲，宜放置哲学分类之下。^[7]过去的史书，在李大钊看来也只是资料而非历史，“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绝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其真确的证据，二是理解事实，寻出其进步的真理。^[8]历史理论也就是史观，记录的事实是不变动的，但是解释史实的史观却是随时变化的。^[9]

李大钊的贡献主要是在引进介绍理论学说方面，所说社会学的法则主要适用于社会发展史，随后继起者则逐渐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其时胡适等人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陈钟凡就认为，治学要工具齐备且先进，搜集材料、排比、评判，这种方法清人早已做过了。用杜威的论理学五段法治古书很可得到新见解，可是于社会学上的贡献尚少。“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乃是用科学研究事物得到确证，评判出那时社会状态和思想，而得到公理公例。如只以甲乙相较得丙，丙丁相较得戊，求同求异，同异交得辨证，终不切于事实的。但在思想史上自有他不可忽视的价值。”相比之下，郭沫若的《古代社会之研究》，将上古史划分出阶段，为社会学上莫大的成功。^[10]明显将郭沫若的学术贡献置于胡适之上。

不过，这样的看法显然不能为胡适、傅斯年等人所认同。他们对于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认字及解说的部分予以承认，但是对其过度

用来解释古代社会形态，如《古代社会之研究》，则多有保留。^[11]对于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造成史观的流行，傅斯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2]在《〈殷历谱〉序》中又说：“今固不乏以综合自许者，不触类而引申，凭主观以遐想，考其实在，类书耳，教条耳。类书昔无持论之词，今有之矣。教条家苟工夫深邃，亦可有艺术文学之妙，若圣奥古斯丁及其弟子之论史是也。而今之教条家初于其辨证教条并未熟习，而强读古史原料以为通论通史，一似《镜花缘》中君子国之学究，读‘求之与抑与之与’竟成‘永之兴柳兴之兴’。是亦可以哗众取宠于无知之人，亦正为学术进步之障耳。”^[13]

李大钊也认为历史哲学应当归于哲学而非历史，问题是具体如何把握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分际，恐怕至今仍是不小的难题。冯友兰觉得释古派使用材料先入为主，谈理论太多，不用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以事实迁就理论。钱穆更将革新派史学分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三期，对于后一派尤其不满。周予同虽然认为其说过虑，指出释古派也有进步，而且追求的目的在于把握全史的动态并深究动因，与钱穆所主张的“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没有根本的冲突，还是批评“国内自命为释古派的学人，每每热情过于理智，政治趣味过于学术修养，偏于社会学的一般性而忽略历史学的特殊性，致结果流于比附、武断”。^[14]也就是说，历史学的见异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求同发生严重冲突，难以协调。

由谭其骧撰写、顾颉刚修改的《禹贡·发刊词》则认为，治史须通舆地，本来是一般准则，后来却无人讲求，以至于学人很容易开口便错。“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要“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不能但凭一二冷僻怪书，便大发议论。”^[15]这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当时的史学界，能够置身事外的恐怕为数不多。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相继进行了社会性质和社会史两场大论战，这两场论战的本意，并不是讨论历史，而是要弄清楚中国革命的

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以便正确决策。因此卷入其中者开始大都不是史家。可是随着论战的深入，一些学人相继加入战阵，以专业性的史学论著试图回答解决相关问题。而且论战的社会影响巨大，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间，据陶希圣回忆，到1930年代初，“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16]。史观与史学的分歧，在特定背景语境下，居然造成了受众的社会性分离。

史学界认识的多样化以及取径做法的大异其趣，成为周予同关于新史学派系划分的依据，他在1936年的《治经与治史》一文中写道：“放眼中国现代的史学界，大致可分为二大派：一可称为‘史料派’，注意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可称为‘史观派’，根据旧的或新的史料，对于中国史的全部或某一部门加以考证、编纂与解释。”在他看来，“史料派学者工作的本身是烦琐的、畸零的，而他的成绩是可感谢的，因为新的历史的著作需要新的史料作它的柱石呢！不过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国现代社会所企求于史学界的是新的史学的建立与新的史籍的产生，而决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零碎的获得”。并且特别指出左翼史学不以搜集、考证、编排史料为尽了史学的职责，进而要尝试解释史实。

五年后的1941年，周予同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虽然环境迥异，基本还是延续了上述分析，他说：“所谓转变期的新史学，可分为两类：一是偏重‘史观’及‘史法’方面的，一是专究‘史料’方面的。史法每原于史观，或与史观有密切的关系；为行文简便起见，前者可称为‘史观派’，后者可称为‘史料派’。换言之，中国现代的新史学家可归纳为两类，即‘史观派’与‘史料派’。”这种本来为图行文简便的派分，并未得到所指称的双方学人的普遍认可，却深深影响了后来学人的思维与眼界。尽管陆续提出过种种批评或修正，也有不少学人根本反对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近代史学和史家，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学人接受或基本认可这样的划分。^[17]尤其在史学史论著中，有的坚持用史料派与史观派的消长沉浮构成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观点作为基本叙事线索。^[18]

也有学人不以派分的此疆彼界为然。1940年6月，《史学季刊》创刊，顾颉刚所作《发刊词》为战前分歧争议甚大的史料与史观作一辩证协调，认为两者在史学研究中相辅相成，“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

不过虚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惑众愚，以造成不幸之局而已”^[19]。此说或有调和之意，也指出考据与史观二者不可偏废。后来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词中，大体延续了这样的主旨，为民国时期的学术概括总结。不过，在史料整理得好的学人那里，二者本来就是一体，也就无须协调。通过整理比较，近真且得其头绪，可以叙事写史，无须预设史观，更不能用后出外来的史观驾驭裁剪史料。否则，就很难避免牵强附会的梳理，重蹈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越远的覆辙。

[1]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1928年1月5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2页。

[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1951年12月7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152页，

[3]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6页。

[4]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0页。

[5]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

[6]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1926年1月27日。

[7]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182页。

[8] 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3页。

[9]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史学论集》，第70—71页。

[10] 陈钟凡：《求学与读书》，《读书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1日。

[11] 牟润孙说：“郭沫若尝引莫尔甘之说治钟鼎款识甲骨文，讨论古史问题，颇多新奇可喜之说。顾其立论好穿凿附会，往往陷于武断。”（《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二），

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7页。）这可以部分反映主流学人的一般看法。

[12]《考古学的新方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1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43页。

[14]《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8—559页。

[15]《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关于谭其骧与禹贡学会，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6页；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173页。

[16]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17]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杜维运、陈景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517—524页。

[18]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9]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99—200页。

三 文白与史论

史料与史观的分争，主要是受中西学乾坤颠倒的时代环境影响，西式分科架构成为强制中学附从的预设，因而必然要以外来的系统学说条理解释中国的材料，只有调理后的史料才有可能变成史学。可是，尽管史观不少来自其他学科，无论史料还是史观，仍然是历史。史论关系说则将历史与理论并列相对，其中的理论，不仅限于历史领域，不但包括史学理论，还扩展及于历史哲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

史与论的并列使得历史的叙事功能被显著压缩，说理功能则大幅度膨胀，并逐渐演变成用过去的事情讲自己心中的话。而书面语改文言为白话，则导致史与论的进一步分离并更加凸显论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文字文体数千年大体上一以贯之，历代修史，以记事叙事为主，无论征引官书档案，还是私家著述，一般不须标识注明，因而能够与著史的文字浑然一体，阅读者也以一体视之，不必刻意分辨。史书虽然取材多源，却文气一贯，天衣无缝，有助于春秋笔法、比兴之类的特有间架方便施展。即使俗谚野语，也会予以雅化。好事者予以指证，实在是多此一举，所谓佛头着粪而已。

白话改文言，破坏了书面语的古今一致，大多数情况下，所征引的材料与作者的自述在文体形式上差异甚大，使得全篇的文气不能贯通，即使没有阅读障碍，也不易习惯在两种文体之间频繁转换。固有的史书被当成史料，历史论著的文白分别成了史与论的载体，在同文异体的情况下，受白话文教育成长起来的新进，自然会偏重于自幼习惯的语体文。文言改白话的重要理据之一，就是文言不利于说理。与史论关系的畸轻畸重相互作用，用白话说理的论更加受到重视，文言呈现的史则相形见绌。随着时势的变化，史观史论越来越被看重，又进一步加强了作为主要载体的白话部分的重要性。

古人著书，大都述而不作，隔膜者不知就里，以为抄袭。实则凡是圣贤所言，皆为天下公理，取入书籍，意在传道。官书正史，也是正统观念认定的要事至理。若是一家之言，仅此一说，何必征引，更无须注明。因此书写习惯，原无须分别，即使合本子注，也容易混入正文。在西学的强势作用下，出现所谓著作权问题，国人面临两难选

择。一方面，晚清以来，官方长期不肯加入版权同盟，以防输入新知遭遇障碍，作茧自缚；另一方面，大量以翻译为著述，引起各种抄袭说的坊间传闻，导致征引注释的不断规范化。由于制定与套用规范为不同语系，时至今日，任何一统江湖的努力仍然是揪着脖领想把自己提向天空的徒劳无功。

海通以后，中西学如何兼容并蓄，一直困扰着国人。纳科举于学堂，等于容中学于西学。而学堂已经西式分科教学，中学要见容于学堂，只能屈从于西学，中体西用事实上演变成西体中用。不仅如此，由于留学大热，回国后各方争相迎聘，掌握话语权，在用人办事时，凸现留学生的作用。风气流被，傅斯年说修史必须留学生，胡适则作势同情未出国门的苦学者，让未留学者或背负保守的骂名，或勉强谈西学而授人以柄。只有陈寅恪敢于指群趋东邻修国史为神州士夫羞欲死之事，且将官派留美学生与北洋军阀练兵并列为两大误国之一。

在当时不通西学即不知学问的趋势下，历史论著的体例随之改变，由传统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转向西式的章节体。章节体的广泛应用，与写史必须征引注释相互作用，造成引文与行文相分离。这种情况在西文关于中国的著述中本来并不普遍，因为将文言对译成西文，比较困难，所以多采取概括转述方式，而东文著述中则相当常见。近代中国的章节体史书，主要是受日本关于中国著述的影响。清季民初那些译著参半甚至以译为主的教科书或一般通史，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基本体例和架构。

此外，史论关系意见分歧各方对于史料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恰恰是这种共通性使得史在与论的比对中处于下风。在形形色色的史观派看来，史料不是史学，只有将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史学。而能够将史料系统化的，主要就是史观。傅斯年对于用史观看历史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史观属于历史哲学，与历史关系不大，而且欧洲的史观过于受基督教一元化观念的影响。他坚称史学就是史料学，整理史料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可是他与史观派同样将所有传统史书视为史料，而且认为材料越生越好，凡是经过加工，就掺入了主观。这等于将所有材料都当作无意识的客观记述，完全忽视材料记录者尤其是史书撰写者的本意，也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傅斯年的本意，或许在于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应力求防止掺入主观，结果却导致史料在历史叙述中作为阅读元素的价值大幅度降低。

在史论结合的形式下，史料往往是被从原有时空联系中抽离出来作为支撑论点的论据，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导致史料的本意被断章取义或穿凿附会。即使用于叙事，如果处置不当，经过名为整理实则主观取舍一过的史料可能非但无助于重现史事，而且导致盲人摸象甚至看朱成碧。更有甚者，既然原来所有史书只是原始材料，必须在理论的条理解释或方法的梳理条贯之下才能升华为史学，则论不仅包含史，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史，是由史料提升为史学的体现。照此逻辑，看重论而轻视史，当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尽管提倡新文学者认定文言不宜于说理，近代主张整理材料以重现史事的学人还是好用文言，陈寅恪一生著文坚持不用白话，学术论著更是全用文言；主张白话的新青年傅斯年虽然觉得文言会有辞不达意的局限，特别是说理的部分，其史学论著还是多用文言。除了习惯使然，征引与自述的一贯，当是重要考量。尤其是比较整理材料以叙事，需要呈现材料之中各自的意思，并将各人的表述按照原有时空位置及联系予以呈现，而不是综合判断后简单地变成自己的认识，并将这样的认识用史论参半、夹叙夹议的方式加以表达。

普遍而言，在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情况下，史与论分离的情形进一步加剧，白话作为论的主要载体，所展示的今人意见在相当程度上被当成历史的事实。久而久之，治史者将关注重心由“前人说什么”转向“我认为前人说什么”，“事实如何”也相应地变为“我认为事实如何”。日积月累，本事与认识二者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重合度则日渐削弱。今人所知的历史，尤其是教科书和一般通史，其实相当多的是后来对历史的认识，而不是历史本身。要想知道前事本相和前人本意，还须认真倾听历史的原声。这就要求阅史者改变原有的阅读习惯，将文白史论视为一体。

四 倾听历史的原声

学术界每每有些类似围城的悖反现象，譬如专业治史者觉得史学无用，不能影响社会，总想逃离，而出身本行不是研究历史的反而好讲历史，巧舌如簧，大受欢迎。前者喜欢说理，又并不擅长，引新知借别科，越说越不在理；后者专讲故事，不免添油加醋，杜撰太多，形同演义，已非历史，却栩栩如生。坊间喜其生动，无所谓真伪，一般而言也无伤大雅。或者痛心疾首，以为天塌地陷，实则《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并驾齐驱的情形由来已久，各司其职，无须划一，也无法统一。奢望大众用《三国志》讲三国，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否则了无生趣。只要学界不以《三国演义》来讲三国，就无大问题。作为专业人士，倒是应该反省一味说理的流弊匪浅，事实说不清，道理讲不明，历史著述读来味同嚼蜡，坊间毫无兴趣，业内也不以为然。

相比求真的史学日益看重雄辩，新闻从业者则极力标榜让事实说话，唯恐别人认为主观。其实新闻能够披露出来的信息至多不过百分之一，无论貌似多么客观，取舍过滤仍是主观。只要不过于偏宕，倒也无伤大雅。而本应以叙事为基本的史家，却总是觉得材料和事实苍白无力，以为材料太多，说法各异，无由取信，无所适从，甚至误信域外浅学的谰言，以为事实不存在，不可求，反而觉得灰色的理论最有力量。历史哲学属于哲学的范畴，对史学或有借鉴作用，但不能替代史学方法，更无法指导处理材料。而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应该应用于研究过程，不是通常所见出现在表述阶段装潢门面。况且一般史书所讲道理，多为别家的常识、陈言或套话，不见精彩，不合实情。除了方便新进或懒人延续教科书式的解读历史，越是高明，越少烙印痕迹。

有的近代史著述喜欢自说自话，或代古人立言，至于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往往隐藏甚至湮没在众说纷纭的讲理之中。治古代史的学人对于近现代史著述征引文献的方式每每有所诟病，认为摘引只言片语，容易断章取义，而概括称引，又不免任意取舍，误会曲解，说是引述前人，实则强古人以就我。其言虽然逆耳，的确切中要害。近代文献，文辞看似浅近，因为涉及古今中外的方方面面，加之数量庞

杂，又未经前人整理注疏，研究者限于学识，只能预设架构，将能够读懂的部分抽取出来，作为论据，其余则弃而不论。对读书须掌握全篇本意的应有之义毫不讲究，更不要说对比参照所有相连相关的文本，前后左右通语境。姑不论舍去的其余或许更加重要，单就举证部分而论，抽离本来的时空位置，所指能指势必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异。

诚然，近代文献繁多，若是详细而全面举证，往往不胜其烦，编辑无法容纳，读者难以卒读。此事令以处理史料见长的史学二陈也颇为头痛。简单的排比罗列，形同堆砌材料，既不能深入问题，又影响文气贯通和意境呈现，的确不足取。可是，如果因噎废食，等于鼓励随意取证，纳入各种后出外来的观念系统之中，而美其名曰史论结合。久而久之，有违情理变成天经地义，不仅自行其是，而且裁量他人，俨然已成行规。但凡看见征引较多，即视为不加分析，没有理论，完全无视引文与行文是否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史学首重纪实与叙事，纪实的功能触碰公私各方的隐私，后来受到多方面制约，希望有所超越，于是有文不能必录，导致两方面趋向，一是还原史实成为修史的前提，二是材料的应用不再局限于纪实。叙事必须依据材料，史料的应用，在史论的架构中，往往流于陪衬，片断摘引只是作为论点的论据，而在叙事的框架下，应当比较近真及得其头绪，并作为历史叙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呈现。由此可以还原包括思想在内的历史本相及其发展演化的具体进程。史家不是以旁白甚至直接登台的形式告诉观众历史是什么，而是用引述的方式使过往的人事重新鲜活动起来，像戏剧一样生动地重现于历史舞台之上，让观众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因此，修史首先应当尽可能复原历史的原声原貌，前提是尽可能多地保留史料的原汁原味，并以经过比较验证的史料构成史学的要素。

作为阅读者，应当积极调整阅读习惯，学会倾听历史的原声，不要把后来的认识与历史的事实相混淆，仔细体察领会文本传递出来的前人本意，进而看出由史家拼合连缀而成的历史图像是否适得其所。不能迁就阅读习惯而跳过引文只看行文，因为这很可能是跳过事实依据去看认识结论。所谓本意，应该是全面的，不能盲人摸象，断章取义；应该是准确的，不能望文生义，凿空逞臆。摘取片断的征引往往是部分的意思，之所以被征引，未必是在文本史事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只不过是征引者在自己预设的架构里想问题才觉得重要。望文生义的结果是误读错解，符合征引者的认识却常常有违事实。完整地倾

听历史的原声，才能防止任意取舍史料以形成观点，防止别有用心地隐讳、移位或曲解。心术不正的欺世盗名之徒滥用史论形式，混淆视听，易于得逞。理顺史论关系，让所有的材料与事实适得其所地回归时空原位，即使用于防闲，也有积极意义。

前人的文本都有各自独特的意涵，即使在记事的部分添枝加叶，添加的行为本身也是历史事实的组成部分。追究所记录的事实之时，所添加的枝叶或可比较而剔除，但是如果追究其如何添加、为何添加，不仅也是近真的必须，而且对于解读所记录的事实也颇有帮助。倾听当事人亲历者述说他们各自的经历，从罗生门式的言人人殊可以逐渐走进历史的现场，进而将对历史的认识通过叙事自然呈现，而不是用主观色彩很强的议论强加给读者。

治史如老吏断狱，法官断案，先要详细听取两造的陈述、辩词及取证，了解案情，才能依据法理和律令进行审判。若是先入为主，想当然地据理援例，不知会造成多少冤屈。同理，治史首先要竭泽而渔地网罗证据，透过表象的蛛丝马迹，揭示背后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而究明事实本相及涉事各人的本意。所有分析的理论模式，旨在梳理证据，还原案情，不能削足适履地照搬套用，将证据案情作为法理的注脚。况且治史较审案对还原度要求更高，所谓铁案如山，后者只要关键证据过硬，前者必须全体水落石出。

由此可知，叙事并非不讲理，只是应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再讲道理，或是考史叙事的过程中呈现出理之所在。而且所讲道理应源自事实，而不是简单地将事实当作别人所讲道理的注脚，甚至套用别人的道理来讲事实。今人模仿域外研究，不顾其模型学理并非生成于中国，也未必适用于中国，一概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照搬套用，削足适履，以牺牲中国的历史为代价，所论不过证明其道理的普遍适用。一般而言，如果复杂的历史事实真的梳理清楚，所蕴含的道理大都已在其中，不言自明。况且将思想还原为历史，究事实的同时也是在讲道理。这一切，都有赖于耐住性子倾听历史的原声，只有听，才能懂，不听则永远不可能懂。如果听不懂，应该提升能力，而不是因噎废食，放弃倾听。

史学的叙事与说理，应以前者为基本。史事的本相不会改变，却不能自动呈现，要借由史料才能重现，而关于同一史事的不同史料记述各异，必须比较而近真。对材料与史事的取舍、解读、认识各异，由此便出现同一历史的不同叙述，影响及于后来历史的著述。前后几

件史事彼此联系，也必须比较才能得其头绪。既然史事由整理材料而呈现，比较不同的史料就成为叙事的凭借和重要环节，不能将史料与史学分离，更不宜将史学理解为说理，将论置于史之上。且看包括会议和时段、专门领域的各种学术综述，乃至学位论文和专题著作所称引的先行研究，每每只是罗列各家的观点，却没有深入探究所说的依据是否经得起材料和事实的验证，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其实是缺乏学术判断力和鉴赏力，越是等而下之，越是不胫而走。那些林林总总的老生常谈和奇谈怪论，往往披着论的华服。

治史要有理论且突显论的重要性，不无将说理置于史学功能的首位之嫌。此说缘于将研究历史的目的定位为发现历史规律，又误以为历史规律是求同而来，将史学混同于社会发展史。所谓规律，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历史上的所有人事均为单体，不可能完全重复，所以不能用一般科学原理来求，尤其不宜于用逻辑的归纳法。历史规律是单体人事前后左右无限延伸的普遍联系，这与史学首重叙事正好高度吻合，也是历史研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所在。

认真倾听历史，放弃后来者自以为是的评判，不带成见，约束主观，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并尽可能完整恰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历史爱好者尤其是读书种子和专业人士，应调整改变固有的阅读习惯，将引文行文视为一体，了解所陈述的史事并欣赏所释放的原音。虽然引文行文仍有文白不一的驳杂，可是若统统改由转述，文体看似一贯，文字却难免繁琐，且容易变形走样。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保持原态，以免发生二次错误。从这一角度理解傅斯年材料越生越好的说法，不无可取之处。

倾听历史的原声，当然有不同的主题，因而也会有所取舍，并非完全随波逐流，堆砌罗列，既不能跟着前人讲言人人殊的故事，也不能无视历史意见侈谈自己的认识。近二十年来，以集众的形式进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同时展开近代中国史事编年系列的编撰，其间认真揣摩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的相辅相成，并尝试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取径与做法的重要基础。按照历史本来的顺序，在整体脉络之中展现各自在相应时空位置之上的相关言行，成为努力的方向。

史论关系的紊乱，间接造成的另一副作用，就是学术评判尺度准则的失范失准。评价学术，须对前人研究、相关材料以及问题本身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缺一不可。不读书而直接进入专题研究，放大了

举证立论的随意性，使得学术研究的“聚讼”越来越多。加上近年来学术小圈子化日趋普遍，各说各话，导致学术判断力与鉴别力严重下降，不能分辨妙笔生花与头头是道是否经得起材料及事实的验证。学问的高下本来就有从者众寡的分别，普遍而言，越是等而下之，越是容易引起广泛共鸣。撰写书评，论著的水准与获得的评价常常适成反比，佳作未必能得到即时反应，劣品却有时好评如潮。更有甚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研究已经进到“习相远”，自己却还在“人之初”盘旋，且不知其陋，无知无畏，放言妄论，信口雌黄，吠影吠声，甚至居心叵测，深文周纳，恣意攻诋，混淆视听，欺世盗名。尽管天下人不可尽欺，但因为学术鉴别力判断力的普遍缺失，不能恰当判断包括本专业乃至本专题在内的学术高下，心术不正者也每每能够得逞于一时。

学术的评判者或主导者若是缺乏学术判断力和鉴别力，势必给相关学术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严重影响一代学术的标高。由于鉴别力和判断力严重不足，分辨不出高下良莠，获取信息的过程往往发生负筛选，以疮毒红肿为灿若桃花，个人的学问固然难以长进，附和与提倡也难免倒行逆施，以至于潜心向学者举步维艰，投机钻营者反倒畅行无阻。长此以往，无知无畏的门外文谈和认认真真的表面文章大行其道，乱象横生，学将不学，学问很难获得提升进步的空间。有鉴于此，手握学术评判权者，不但要独具慧眼，目光如炬，且务必慎之又慎，高度自觉自律，千万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须知学术评鉴不仅考验被评判者，更重要的是考验评判者的学识与人格，评议须恰如其分，否则无论捧与棒，都是力不胜任的表现。如果眼力不济，还只是学识有限，不过自曝其陋，如果居心不良，就未免学行有亏。而任何评价的言辞及其相关的过程，都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将由无尽的来者反复检讨衡量，今日的随心所欲或人云亦云，都可能成为后来居上者眼底口中的笑料笑柄，难免自取其辱。

五 重现历史以把握概念

在思想学术文化史的研究中，有意无意间会陷入协调向虚与坐实关系的困局，尤其是人文上的物事。用概念勾联历史与重现历史以把握概念，便是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取法。前者的联系是由人为认定，抽去时空关联，直面文本，强作解人，将二千年集于一线，名词虽然相同，意涵及其所指能指全凭作者的心中是；后者则尽可能以事实联系为凭借，一方面是不同时期概念之间的关联，更重要则是在具体时空关系下前后左右重现相关史事以把握同一词汇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傅斯年谈及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的困难，主要是区分物质与人文。深一步追究，关于人文的物事即使是同时的概念而无古今新旧的分别，也有从言人人殊到约定俗成的复杂过程。“共和”与“汉奸”，便是或古已有之其实主要应用于晚近、虽有实指却各不相同的典型案例。二者前人论述已多，却是令各路高手也备感头痛的棘手难题。因为理不清头绪，甚至愈治愈纷，触及者大都只能束之高阁。尤其是前者，已经长期多人反复论证，可是其中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始终无法破解，典型之一，就是关于国体政体的讨论。后来源自理论的权威定义，并非由梳理历史事实而来，无法厘清历史上各说各话的本意，无法解读历史上的言人人殊。以定义条理之前的文本观念史事，无异于削足适履，强人就我，势必捉襟见肘，以时代意见强求历史意见，反而无论如何弄不清楚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若是按照今日的国体政体分别来考察清季民元的国体政体及其论争，将所有相关问题的论述一概用“共和”来认定并据以讨论，显然与之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各说各话不相吻合，也就很难理解前人为何而争，所争何意，因而始终不得要领。革保论战同样还有不少未尽之意，如孙中山关于民主政治形式的经典表述不是共和而是民权立宪政体，就一直被忽视。后人用以认识的架构与当日人们所具有的观念格格不入或形同实异，是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不愿耐心倾听历史的原声，也是后人自以为是的表现。

相比之下，康梁等人的声音更被忽视。当年民主共和乃至自由，远没有今日一些人所以为的具有所谓普世价值，严复翻译“自由”一

词，不得不用不同的汉字区分固有之自由与外来之自由。梁启超、孙中山都曾说中国的自由太多太滥，前者因此而梦俄罗斯，一步退到开明专制；后者则主张由军政、训政到宪政。康有为还坚持必须帝制，不行也要虚君。或以为应该回到康有为，而不知当时其虚君共和的主张遭到中外各方批评，连梁启超也觉得没有可行性。民初政局的乱象让康有为既幸灾乐祸又痛心疾首，《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所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大难题，不无重新思考的价值，但是回到辛亥民元，恐怕还是会被弃如敝屣。倾听这些曾经的失语者当时究竟如何说法，对于认识近代历史乃至把握未来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汉奸的问题同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以为汉奸的指称是古已有之，直到近十几年，认真分别他指和后认，系统梳理材料，才大体了解来龙去脉。即便如此，可以进一步检讨的史事仍然所在多有，已有的汉奸史叙述中，还存在不少误读错解。而汉奸的概念层层递进，深入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进程，目前所知仍然表浅。清季民元的汉奸指称及其作用，在近代汉奸史上虽然别具一格，却具有汉奸概念进入汉——中华民族意识的指标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探寻汉奸的渊源固然重要，但把握汉奸的流变同样值得重视。即使理解了辛亥时期的因人而异的汉奸概念，也不能用以解读后来汉奸的所指能指。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战前）的汉奸，在沦陷区、游击区及大后方乃至国共双方，既有各地坊间民众的泛称，并无可以一概而论的观念和人事，又有国民政府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认定。在这方面，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制订了不少法规政令，刊行了数量繁多的宣传品，惟有系统搜集和梳理所有材料，将相关历史按照本来的时空联系详细呈现，才有可能通过历史来把握概念，否则，任何先行定义的做法，都无法涵盖所有文本和人事，难免陷入见仁见智而徒劳无功。关于抗日战争前后的汉奸问题，另以专书详细探究。

鉴于今日汉奸指称的滥用，或以为要想恰当理解近代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应当首先明确定义，以免各自任意，莫衷一是。实际上，好从定义出发研究概念认定事实，而不是还原历史以把握概念的所指能指，正是混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的典型表现。须知集合概念往往后出，而且经过约定俗成的演化。研究抗战时期的汉奸，并非指认今日的汉奸，后来的定义虽有助于当下避免滥用（包括现时和历史两方面），却无论如何不可能涵盖历史上所有的文本和事实。即使当时的概念，有此一说也不见得均如此说，除非详细论证，

否则以偏概全的认定非但无助于解读材料史事，而且会妨碍准确地重现历史。没有现成框架就不知如何解读史料，没有先入为主的定义就无法认识事实，岂非本末倒置？遗憾的是，这样的本末倒置恐怕正是时下相当普遍的现实。长此以往，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之间势必越来越隔膜。如果不加分辨地将历史认识当作历史事实，将是非常危险的事。

倾听历史的原声，方知原来自以为熟悉的声音很可能经过变声处理，回到真实自然的音响世界便显得很协调。而选取一些异调拼合而成故意立异的所谓新说，弄不好也是妄人妄语。历史的原声，并没有那么多尘封已久的秘辛和匪夷所思的离奇，也并非都是精心设计的阴谋论和不可告人的见光死。凡此种种，反映了持论者的少见多怪。抛去那些稀奇古怪的翻案钩沉，刻板呆滞的说理套话，历史势将更加丰富多彩。无数的好材料，都是由于厨艺不佳而索然无味。品尝者与其因此而丢掉食材，不如舍去以为增加含金量实则蹩脚拙劣的加工，直接品尝原汁原味的无穷精彩。

学会倾听历史的原声，学人和读者应当共勉。

本书的取材，得到门下在读的博士生赵建民、邓华莹（现为中山大学副研究员）等人的帮助，核对引文则主要由余露（现为岳麓书院助理教授）承担。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共和篇

引言

通常的历史叙述中，辛亥革命毫无疑义就是民主共和的历史。由于认定革命党人一开始就持有共和主张并且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共和已经成为革命党政治宗旨的专属性标签。除非涉及分歧，否则所有的思想和行为都当然地与共和相关联。以至于有学人认为，共和一词是近代历史中最无分歧争议的概念。其实，众口一词之下，不言而喻，往往是各说各话。或以为应当名实相符，循名求实。此说假定翻译可以完全对应且正确，姑不论这一前提是否存在，即便成立，所谓名实不符的种种说法，无疑也是历史事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若能够恰当地呈现其本相本义，亦为完整重现历史所不可或缺。反之，如果先入为主地判定是非正误，则等于以其心中之是为历史之实。

研治名词或概念史，时下的做法大体有三，其一，用名词概念勾勒历史；其二，抽取某些文本史事定义概念；其三，重现所有相关文本和史事以把握词意。三种取径和做法看似相同，实则大相径庭。前两种虽然详略高下有别，都难免主观成见。名词概念的变化，古已有之，只是不如清季普遍和集中。尤其是古代汉语为独立语，以字为单位，专门名物以外抽象的专有词汇并不多见。那种按照今义检索古籍的做法，无视语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差别，脱离文本语境，忽略同词异义和多词同义的情形，强作连接，绝不可取。

清季民国时期，由于新名词大量涌入以及由文言改白话，汉语性质发生变异，名词取代单字成为关键之一。而名词涉及西、东、中学的不同语境，不宜将不同语言文字系统中的对应名词一视同仁。两种

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完全准确，所谓跨文化传通，相当程度上是误解。相应地，不同语言文字的词汇很难完全准确互译，因而存在同一中文词汇对应若干西文名词的现象，如国家、自由、民族，意思容易混淆，也有不同中文词汇对应同一西文名词的情况，如世界、万国。有时甚至中西文均有数个词汇相互牵混，如民主。同时，西文也有因民族、国家、文化等因素存在差异的情形，如科学在英文和德文当中的所指能指相去甚远。同处所谓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使用相同的汉字名词，意涵却常常大相径庭。梁启超对于经济一词就感到相当困扰，先后用过资生、生计等作为替代，以免与类似近代政治的固有经济一词相混淆。

以上还只是就词义而言，若论及相关史事，则更为复杂。共和一词即相当典型。戊戌至辛亥，是近代意义的“共和”从发端到全盛的重要时期。武昌起事后各地纷纷响应，本来很不情愿中国实行共和且不好看其前景的列强，也不得不承认共和确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过，仔细倾听举国上下异口同声的“共和”呼唤，便不难察觉，各人心中的“共和”，景象各异，走向共和的同声相应之下，夹杂着五花八门的音调。如果这些共和异调被排除于所谓“共和”正声之外，相关的历史认识和论述显然是不完整、有缺失的。

近年来，学界开始注意到，今人呈现的共和历史和历史上的共和之间，并非全然一致，其联系与分别，相当复杂，这不仅是当时各种相关争议产生的根源，也是后人认识各自不同的因缘。于是，从名词概念的意涵发生的历史渊源出发，一些学人以文本为凭借，依照时空顺序，梳理探究“共和”及其相关名词输入演化的历史，所取得的进展和得出的结论，丰富了原有的认识，也提出不少挑战。

关于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崔隽的硕士论文《想象“共和”—republic在近代的汉译定名历程》，依时序大体梳理了高明凯、马西尼、刘禾、狭间直树、冯天瑜、方维规、金观涛、刘青峰等人的代表性论著，提示了各自分别的贡献和研究的整体状况。只是对于2005年以后相关研究的显著进展，完全没有涉及。^[1]此后直接探讨该问题且有不同程度和方面贡献的主要有陈力卫《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以“民主”与“共和”为例》（《东亚观念史集刊》创刊号，2011年；《日语研究》第九辑，2014年）、潘光哲《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创发与建设（1845—1895）》（《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

识传播（1600—1949）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研院”近代史所，2011年）、谢放《“戊戌”前后国人对“民权”、“民主”的认识》（《二十一世纪》第65期，2011年）、狭間直樹《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共和”思想の形成》（辛亥革命百週年紀念論集編集員會編：《綜合研究：辛亥革命》，岩波書店发行，2012年9月）以及《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共和”国の誕生》（《孙文研究》第51号，2012年11月）、李恭忠《晚清的“共和”表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此外，川尻文彦《“民主”与democracy—中日之间的“概念”关联与中国近代思想》（《新史学》第二卷，2008年）、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史学集刊》第5期，2009年9月）、徐宗立《共和的法理——一项历史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从不同层面或学科视角对此有所论列。

从先行研究可知：1、共和一词的意涵古今有别，后者始于幕末日本人对译republic。2、中国最早使用今义共和一词，为1879年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2]。3、在中日近代语境当中，民主与共和均有从混合到分离的过程，其语义及对应的西文词汇，变化相当复杂。如民主既可能指republic，也可能包涵democracy，同时还可能指民之主即大统领。大体而言，日本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的肇因。4、辛亥到民初，共和成为中国思想政治的关键概念。

在海内外学人的持续努力下，关于共和在近代中国演进的认识有了大幅度进展，相关的问题大体触及，有的部分已经相当深入。不过，相较于文本的繁复和史事的驳杂，仍然留有不小的空间余地。总体而言，已有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调整改进视角和方法。但凡历史学与语言学相辅相成的研究，必须注意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概念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相关思想历来之变。^[3]具体而言，则有以下数端：

其一，不以名词概念勾连历史，而要全面观照历史进而把握概念，以免傅斯年所说将二千年集于一线之嫌。同时，如时贤断言，纯以关键词研究历史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事。历史上谈共和的人士及相关文本因人因时而异，应该更加全面地理解所有文本的全篇本义以及特定文本在作者思想整体中的位置和作用。若是一味以后来的观念断章取义，其中的丰富内涵及其千变万化，就难以完全解读出来。完整恰当地重现文本史事是治史的基本，应当尽可能仔细倾听当事各方的述

说，不要仅仅挑选只言片语作为举证的材料，避免脱离文本史事、套用各种后出外来系统的判定。因为诸如此类的雄辩往往只是各自的认识而非历史的实情。如果习惯于仅仅依据片断的材料作大胆的推测，对于历史人物的特定言行在梳理前后左右的联系之前急于盖棺论定，则不过是说出先验的看法，而无助于历史认识的深化。

其二，应当严格区分自称、他指与后认，不能将后认带入历史的现场，否则呈现出来的不过是自己心中的思想史。如将关于美利坚、法兰西的介绍一概视为共和观念体制的事实，就显然有违当时人尚未统一使用这一指称的实情。应当特别注意分别文本所指、所署、所著及所出的时间，不能混为一谈，否则相关研究很可能变得毫无意义。

其三，跨文化传通之所以往往伴随误会，是因为时势变迁和文化转换，越是准确对应原典，越难以通行。能够引领时代风潮的梁启超一生都挣扎于经济学概念的翻译，最终也不能得偿所愿。要在不同语言之间寻找完全对应，作为语言学和翻译学可以持续努力，作为历史研究则很可能是舍本逐末。研究此类概念，必须严格分别所据文本的语言文字，不可用翻译概念指代原文，在中、东、西文之间随意互换。所要探究的对象，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所指能指及其因缘。其间是非正误在于今人对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的把握是否如实。无论对错，如实就是正确，反之则误。如果在不同语言文字间判定名实的相符与否，形同以后来的是非认定过往的习惯，只能彰显后人习以为常的自以为是。

其四，追究发源之外，更要关注流变。而流变不仅是语义内涵的变化，更有因应时势、言说对象和地缘因素产生的差异。这些千差万别，或许不合法理、逻辑，却是历史实际的存在，若是因为不能容纳于今人的认识而予以舍弃，等于用后来的主观阉割历史。尤为重要的是，无论发源还是流变，都必须严格按照时空人原来的天然联系。但凡错乱时空位置来安放文本史事，或是选择性地跳跃论理，就很容易偏向求自己的心中之是。

由此重新审视既有研究和文本史事，希望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层。

[1] 2004年武汉大学陈金英的硕士论文《走向共和——论1903—1917共和思想在中国的确立》，只是提到本文第一段的研究状况，对于后一种趋势，虽然正文

引述了冯天瑜的论文，在叙述先行研究的引言中则完全没有提及。而2007年吉林大学王娇娇的硕士论文《“共和”的简释——近代中国人是如何接受“共和”观念的》，则只是重点介绍了陈金英的论文，而不及狭間直樹等人的研究。

[2] 陈力卫据潘光哲文指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早于黄遵宪使用今义“共和”，实则潘文明确《重订法国志略》刊行于1890年，所据为1878年冈本監輔的《萬国史記》。

[3] 《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8页。

第一章 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

自1879年今义的“共和”进入汉语世界，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中国人“共和”的观念只是零星和片断的，所指能指因人而异。与通常认为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认识相反，今义“共和”学说以及相关观念的引进，共和思潮的初步涌现并产生广泛影响，正是由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不顾康有为的高压，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依托，进行坚持不懈的宣传。可是，正当共和思潮勃发之际，中国新党和海外华人内斗的现实、美洲共和制各国的弊病、列强争霸的大势以及重新解读相关学理等因素交相作用，从新大陆东归的梁启超却宣布告别共和，一步退至开明专制。虽然失去共和先驱的历史地位，对于青年的鼓动激励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第一节 古今中外的共和

先行研究查明，今义的共和一词，最迟于1870年代已经入华。仔细检讨相关文献，可知直到20世纪初年，主要用于指他者即外国之事，几乎与己无关。所谓他者之事，一是外国的历史，二是外国的现况，三是外国的思想学说、尤其是法理政治学说。

黄遵宪1879年《日本杂事诗》中的“共和党”和1890年《日本国志》中日本主张开国会者的共和，所说均为日本之时事。前述李恭忠论文引述1882年12月22日至1889年《申报》的五则报道中提到的法国附近之共和国、共和政治、法国共和党、瑞西共和国、南美共和国等，以及1890年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所说“各国人民苟有背政府、倡共和新政、排击旧宪者，法国当出援兵”，讲的都是欧美各国的历史或现状。

至于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引述严复的话：“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希罗两史，班班可稽。”^[1]此言后来各方转述甚多，可是严复始终不赞成用共和一词，此处经人转述，不知究竟出自严复之口还是据其大意重述，而且主要是指历史上的贵族共和，而国民为政才是民主制。

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中的“共和”，不仅均为他者之事，主观上还多持排拒态度。1898年1月13日出版的《实学报》第14册刊载沈毓桂的《民主之说流弊论》，引述一种改革意见道：“使以合众联邦共和为治，各子其子，各民其民，邾莒僻小，亦能自保，虎狼强国，遂息兼并。”这表明当时已经有人在私下议论时提及用合众联邦共和的办法达到自治强国的目的，只不过对于这样的主张，沈毓桂的反应是：“噫！是说也，乃搥提伦纪，绝灭纲常，举其利而忘其害，吾无取也。”^[2]从根本上予以否定。

最早引入“共和”新义的黄遵宪，对中国古代的共和十分向往。他在湖南南学会演讲时说：“诸君诸君，能任此事，则官民上下，同

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生于其乡，无不相习、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3]此处的共和，主要仍是中国的古典本义。

古典原义之外，共和还有其他意思。狭间直树指日本明治中期共和曾经作为君主立宪的主要表述，也就是说将君民共主称为共和。这样的指称也影响到中国人，康有为在鼓动清帝变法时便提出：“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统一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其中“英德宪法”，在《光绪政要》《光绪朝东华录》《皇朝蓄艾文编》以及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都写作“英德共和”^[4]。其共和之意正是君主立宪制的君民共主上下共和，而民政才是指民主共和。

这一用法在梁启超绝非孤立偶然的个案，他亡走日本后撰写的《戊戌政变记》，其中第五篇《政变后论》第三章《日英政策旁观论》谈到日本、俄国、英国等国的竞争态势，也说：“若夫英人之兵力，固足以敌俄人而有余矣，亦相持而不发者何也。凡君权专制之国，其用兵甚易，共和政体之国，其用兵最难，英之持盈保泰，真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概，故英人持平和主义，政体使然也。”^[5]此处的共和，虽然不排除其他民主政体，但确指英国的君主立宪。

尽管学人继起踵接的努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例证，显示“共和”已经进入晚清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仍然不能改变甚至进一步明确了这样的事实，即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中国人今义的“共和”观念只是零星和片断的，非但尚未成为关键概念，而且很少得到运用，具体使用者的所指能指则因人而异。与原来通常认为梁启超等人反对“共和”的认识相反，今义“共和”思潮的初步涌现并且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正是由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的宣传。

李恭忠已经注意梁启超在近代共和学说传播以及与republic对应的共和概念流行中的作用，并且引述了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一系列重要相关著述。相比于此前中国人的共和言说，这一时期今义的共和虽然仍旧主要是指他者之事，可是重心明显

转到一般学理方面。在公理天演的一元化进化观主导下，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不能自外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他者与自我开始进入混一的状态，或是朝着这一方向快速发展。

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从1899年4月10日第11册起，开始刊登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第一卷，直到1899年10月25日第31册，陆续刊载了一半左右的内容。虽然是汉译本，可是翻译者并非梁启超或该报同人，而是东京善鄰譯書館的吾妻兵治。只是后者的《国家学》正式出版于1899年12月13日，反而在《清议报》之后。狭間直樹认为梁启超等人依据的是吾妻兵治的原稿、清样或抄本，后来中止，很可能是因为吾妻兵治的书将出，要求其不再续刊。^[6]从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预告即将出版的《国家论》为“本局同人译”判断^[7]，梁启超等人也有可能参与过该书的汉译或后来的改译。而郑匡民指吾妻兵治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不是伯伦知理的原著，而是伯伦知理的学生平田東助与平塚定二郎合译的日文版《国家论》。^[8]

无论实情如何周折复杂，《国家论》的连载使得今义“共和”概念伴随着系统的国家学说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不再只是零星的片断知识。如关于欧洲的国家学说，“今举政学家之著名者略述之，第十六世纪，弗鲁连则有麻季维利（今译马基雅维利），法国则有暮担（今译蒙田）。第十七世纪，荷兰则有夫卧特具洛（今译格劳秀斯），英国则有密耳敦（今译弥尔顿）、胡北土（今译霍布斯）及洛苦（今译洛克）等诸人。所论分为共和、专制、立宪三种，各不相同也”^[9]。而国体政体与共和的关系问题也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引起关注，“又有共和政治，而类君主政治者”。“国体有名异而实相类者，有名同而实相反者。今一据希腊人之原则，唯就主宰官判别国体，倘遇其变体，将如何裁之？夫今日立宪君主政治，与代议共和政治，均以自由权付国民，其名虽异，而其行政施設，有太相似者。”^[10]

《国家论》还进一步辨析各种国体政体：“盖立宪君主政治所以甚类代议共和政治者，由两者俱属第四种变体，而所以异于无限专制君主政治者，以其属第一种变体故也。”“方今开明之民，芟除古来错杂政体，而仅存二种，曰代议君主政治，曰代议共和政治，前者多行于欧洲，后者多行于美洲。”就历史而言，“古罗马人殊重国民之自由，国民之共同心极盛，则称其国用例波白律苦之语，以对照国王世袭私权之国。由是观之，称代议君主政曰例波白律苦，亦无不可。

然例波白律苦之语，于今人所用之意义，与君主政治正相对比，然则今人每称共和政体（即例波白律苦），而代议共和与代议君政将何由别？”共和制与君主制两种政体分别的关键，即在于国家元首与民众的关系，“要之，主治者、被治者之间不设藩篱，互保平等均一之地，是共和政之本旨也。离隔君主与臣民之间，使上下分明，毫不可犯，是君主政之本旨也”^[11]。

照搬拿来之外，梁启超还借由日本学习西方，以求简易快捷，按照他所鼓吹的和文汉读法，阅读日文书籍数月即可见效。果然，《国家论》刊出不久，从1899年4月20日《清议报》第12册起，梁启超就推出了声称是自己的译作《各国宪法异同论》，开篇即概括道：“宪法者，欧语称为孔士九嵩，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官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虽然，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故今之所论述，亦从其狭义。惟就立宪政体之各国，取其宪法之异同，而比较之云尔。”

这段文字，李恭忠依据阎小波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判断括号中的话为梁启超所加，并进而引申为“以往政体分类的关注点在于谁做主，而梁氏分类的关注点则落在宪法的有无上”^[12]。此说稍显急切，阎小波并未言及文本的问题，在比较底本与译文之前，显然还存在其他可能性。即使括号中的话为梁启超所加（这种可能性的确很高，因为几种旧译，为此前王韬的说法，但也不排除借自日本人的可能），可是政体与国体究竟如何区别，当时还相当纠结混淆，遑论清晰的政体分类重点何在。除非引言部分均为梁启超的手笔，否则很难断言是其本人思想的直接表述。因为仅就这篇译文的言说而论，就已经不尽然，所以接下去该文论道：

“政体之种类，昔人虽分为多种，然按之今日之各国，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两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但就其名而言之，则共和国不与立宪国同类，就其实而言之，则今日之共和国，皆有议院之国也，故通称之为立宪政体，无不可也。故此书所述，专就立宪君主国与共和国论之，而专制君主国不与焉。”英国是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的始祖，七百年前，英人已由专制政体渐变为立宪政体。“上院之制，随各国之

国体而异，既已详之，至下院之制，则不然，无论君主国共和国，虽国体大异，其制皆如出一辙，皆由人民之公举，为人民之代表。”

《清议报》第13册续刊该文，又说：“君主者，立宪政体之国世袭继统者也。……共和国之大统领，必由公举，定期更任，而其选举之法，法国、瑞士则由国会，英国则特开选举统领会以举之。”照此论述，共和国有时与立宪君主国相对，有时又涵盖立宪君主国而与君主国相对。

借由日本汉译和直接取材东文，梁启超能够学以致用，立竿见影。1899年9月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26册发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开始运用刚刚学到的知识对中西政治进行分析比较，他说：“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欧洲人所谓少数共和政体，谓之寡人政体者是也。其政府（即贵族）之权力甚重，过于国君，国君之废立，出于其手，国君之行为，能掣其肘。”在他看来，中国的国体与欧洲有几点大异：其一，“中国自秦汉至今日，可直谓为一统时代”。其二，“中国可谓之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其三，“欧洲自希腊、罗马以来，即有民选代议之政体，而我中国绝无闻焉，此又其最异之点而绝奇之事也”。

不仅如此，对于欧洲的政治学说，梁启超尽可能既参酌各种说法，又表达个人见解，他在1899年12月13日刊行的《清议报》第32册发表《蒙的斯鸠之学说》：“蒙氏又分各国之政体为三大类，曰专制政体，曰立君政体，曰共和政体，而于共和政体中，复分两种，一曰贵族政体，二曰平民政体，后世谈政体者，多祖述其说。”“蒙的斯鸠曰：万国政体，可以三大别概括之，一曰专制政体，二曰立君政体，三曰共和政体。凡邦国之初立也，人民皆慑伏于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权，是谓专制政体。及民智大开，不复置尊立君，惟相与议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谓共和政体。此二者其体裁正相反，立于其间者，则有立君政体，有君以莅于民上，然其威权受法律之节制，非无限之权是也。”其说与他翻译的《各国宪法异同论》的分法有所不同，所以梁启超专门加了一段“任案：蒙氏所谓立君政体者，颇近于中国二千年来之政体，其实亦与专制者相去一间耳，若英国之君民共治不与此同科也。窝的儿尝评之曰：蒙氏所论专制立君二者，其性质实相同，特其手段稍异耳”。

梁启超转向民权，引起一些质疑，在回答问者“子不以尊皇为宗旨乎？今以民权号召天下，将置皇上于何地矣”时，他清楚表明了对于今义共和的态度：

夫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英国者，民权发达最早，而民政体段最完备者也，欧美诸国皆师而效之。而其今女皇，安富尊荣，为天下第一有福人。其登极五十年也，英人祝贺之盛，六洲五洋，炮声相闻，旗影相望。日本东方民权之先进国也，国会开设以来，巩自治之基，厉政党之风，进步改良，蹶迹欧米。而国民于其天皇，戴之如天，奉之如神，宪法中定为神圣不可犯之条，传于无穷。然则兴民权为君主之利乎？为君主之害乎？法王路易，务防其民，自尊无限，卒激成革命战栗时代，去袞冕之位，伏尸市曹，法民莫怜。俄皇亚历山尼古刺，坚持专制政体，不许开设议院，卒至父子相继，陷于匕首，或忧忡以至死亡。然则压制民权，又为君主之利乎？为君主之害乎？彼英国当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之际，民间议论喧腾，举动踔厉，革命大祸，悬于眉睫。日本当明治七八年乃至十四五年之间，共和政体之论，遍满于国中，气焰熏天，殆将爆裂。向使彼两国者，非深观大势，开放民权，持之稍蹙，吾恐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惨剧，将再演于海东西之两岛国矣。今惟以民权之故，而国基之巩固，君位之尊荣，视前此加数倍焉。然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而彼愚而自用之辈，混民权与民主为一途，因视之为蜂蛰，为毒蛇，以荧惑君相之听，以窒天赋人权之利益，而斫丧国家之元气，使不可复救，吾不能不切齿痛恨于胡广冯道之流，不知西法而自命维新者也。

在梁启超看来，兴民权正是为了防止民主，避免法国式的革命惨剧和俄国式的暗杀风潮重演，导致民主式共和政体。与之相应，英国、日本式的民权民政才是皇权永固的政治保障。所以他霸气十足地斥责道：“子言何其狂悖之甚。子未尝一读西国之书，一审西国之事，并名义而不知之，盍速缄尔口矣。”^[13]

[1]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1897年10月6日，第3页。

[2] 沈毓桂：《民主之说流弊论》，《实学报》第14册，1898年1月3日，第27页，“实学报馆文编”。

[3] 《黄公度廉访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湘报》第5号，1898年3月11日，第18页。

[4] 参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2、213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2页。

[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丁酉重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79页。

[6] 狭間直樹：《梁启超研究与“日本”》，“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1997年9月，第5页。部分意思为信函告知。

[7] 《广智书局已译待印书目》，《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第2页。

[8]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234页。

[9] 伯伦知理：《国家论》，《清议报》第11册，1899年4月10日，第3页，“政治学谭”。

[10] 伯伦知理：《国家论》，《清议报》第25册，1899年8月26日，第4页，“政治学谭”。

[11] 伯伦知理：《国家论》，《清议报》第26册，1899年9月5日，第6页，“政治学谭”。

[12] 李恭忠：《晚清的“共和”表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页。

[13] 哀时客：《爱国论三·论民权》，《清议报》第22册，1899年7月28日，第3—4页，“本馆论说”。

第二节 《新民丛报》与共和观念初兴

梁启超对共和学说及制度产生兴趣，因缘于变法失败后如何继续改革事业的反省和探索。亡走海外，仰仗皇帝进行变法的旧途径已然失效，必须改弦易辙。虽然康有为定下了勤王的基调，坚持保皇，可是梁启超等人心中却认为此路不通，不以为然。戊戌前，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教书育人，并不讳言革命，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的梁启超等人也有一定的革命倾向，只是后来康门师徒得到光绪皇帝的破格重用，觉得依靠皇权的万钧之力，可以破坏小而见效快，于是改为自上而下的变法。政变后康有为主张保皇，消极的一面是要保住光绪的性命，防止慈禧太后加害，积极的一面则是设法使光绪复辟，重新执掌权力，再开新政。而勤王意在从外部施加压力，争取实现其政治主张。

一些日本人士如宫崎寅藏、池边吉太郎等则认为，在中国进行改革比革命更难，建言中国的革新势力联合起来，实行推翻清朝的革命。梁启超等人碍于康有为的态度，以及革命意涵的转换，没有直接响应日本人士的呼吁，但也逐渐主张自立、革政，并且在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后，公开为“革命”正名，指为由野蛮而进文明的必由之路。既然美利坚、法兰西的革命成为万国通例，与之相应，扫除专制君主的共和制开始成为他们正面赞同的政治选项。署名“无涯生”的欧榘甲在1899年10月25日《清议报》第31册上发表《中国历代革命说略》，为“革命”正名的同时，也为“共和”呐喊，他说：

然孔子之欲我中夏首开民主，致太平，以风靡全球为一统，易之群龙无首，书之尧舜，前不必有其事，后宜以立之法，故假之为偶像也。虽然，尧舜者，虽非与今世完全之民主国相同，亦当时之大圣，有公天下之心者也。或谓中国无民主种子，革命后不能为共和之治者，皆大谬误，不知孔子之大义者也。

由此反观梁启超翻译并连载日本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固然包含前人已经指出的其他方面的考虑，但绝非如此简单，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

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1]

原作者对于书中所述各国“共和”的历史多持否定态度，而梁启超则并无贬意，相反，他不仅借此传播“共和”的观念思想，而且身体力行，采纳并贯彻书中的共和民政主张。正如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唱道，“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目的就是“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2]。

尽管康门弟子的言革倾向遭到康有为的强力干预压制，《清议报》又因火灾重新改组，梁启超等人并未放弃“言革”。只是碍于康有为“深恶痛绝民主政体”，于政治方针“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梁启超在与孙中山等人协商联合时，才提出改“倒满洲以兴民政”为“借勤王以兴民政”，事成可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3]所谓兴民政，其实就是共和体制。《佳人奇遇》中，多处将共和与民政相并提，如“时学士书生，有别说自立自由之利，唱道民政共和者。其抱才郁屈，及苦于贫困而思乱者，皆相和而煽动人心，势如满岸之涨，一时溃堤，不可收拾，欲壅塞之而反动激烈也”。“盖以共和而建民政，文物灿然，富强駸駸而可证者，其惟北美合众国而已，此诸君所目击也。抑北美之人民，本生长于自主自由之俗，沐浴于明教礼义之邦，舍私心，执公议，不泥虚理而务实业，是所以能建民政，而冠于宇内也。而我民则不然，泥虚理，不务实业，轻佻锐进，忽于挫折，此其所以衰颓也。墨西哥国者，与米国接壤，同时所建共和民政之国也，然朋党相忌，首领相仇，尔来五十三年，一帝一摄政，已更统领五十三人。其政府朝迭暮更，其人民托生斯土者，又安能寻进路于文明，求生路于自由之乡耶？”^[4]这些都是说史心声，不可仅以小说家言视之。

虽然原书对于共和民政不无微词，仔细揣摩，并非指政体不好，而是民情不宜。而梁启超必须考虑万一皇上不保，帝制绝无存在的必要，不能不以民政善后。他与孙中山的异见，主要在于满人是否当排，所以即使光绪犹在，也可以举为总统，而不必非要延续帝制。

在孙中山的西文世界中，至迟从1895年起，已经不断对外宣称所主张的政体是republic，包括与日本驻香港领事的会晤以及和印支法国人士的接触。其间偶尔也会告诉特定对象可能允许汉人称帝，但这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权宜策略，如庚子对李鸿章、刘学询。质疑其政治主张是否民主共和，遇到的史事障碍远比承认要多。不过，孙中山在1903年以前，所用来表达republic的汉语词汇并非共和，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建立民国，一是民权，二是合众，三是扫除帝制，以稍后使用的共和来衡量，有其实无其名而已。

庚子勤王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梁启超等人的反清情绪，在保皇会主办的各种报刊上，反满的激进言论集中涌现。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表面声言“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实际上不断发出激越之声。他甚至不惜直接顶撞康有为，表示不能不讲民族主义和讨满、自立，并且声称同门中大都赞同其主张。

梁启超代同门立言，绝非虚张声势。《清议报》后期，同门在一片仆满言革声中，对于共和的赞美和向往日益表露。麦孟华鼓吹创生中国国民：“搏搏大地之中，界有国土，厘其风俗，异其语言，萃民人共同之团体，划然而自建为国，其国体虽有共和立君之异，其等族虽有贵族平民之殊，其执业虽有士农工商之别，其族民聚合，虽有人种宗教之不同，而凡衣食生殖于其国土之中者，即无不有国民之公权，即无不有国家之义务，总而名之曰国民”^[5]。共和国体虽然不是唯一选择，却已是正面表述。而树立山人“尊革命”，共和政体就成为无限向往的目标，“今倘易中国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变而为共和政体，使中国之名，有若大公司之号，皇帝之权限，不过总办之尊称。如此则中国于革命之事，亦已登峰造极矣”^[6]。

《新民丛报》开办，梁启超一面声言平和渐进，一面却高歌共和，开篇第一号，他就刊出了两年前写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将当年碍于康有为不便坦言的共和向往公之于世。3月刊行的第4号，刊发了梁启超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指：“孟氏学说，最为政治学家所祖尚者，其政体论是也。政体种类之区别，起于阿里士多德，而孟氏剖之更详。其言以为万国政体，可以三大别概括之，一曰专制政体，二曰立君政体，三曰共和政体。凡邦国之初立也，人民皆慑服于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权，谓之专制政体。及民智大开，不复统于一人，惟相与议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谓共和政体。此

二者其体裁正相反，而介于其间者，则有立君政体，有君以莅于民上，然其威权受法律之节制，非无限之权是也。”

之前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2册发表的《蒙的斯鸠之学说》，未能终卷，此文当为改译并完篇。关于“立君政体之国”，梁启超的看法是：“苟欲不速灭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荣与国家之光荣视为一体。如是则必将希合民心，勉强行道，而其国亦得以小康。虽然，君主好名之极，而世臣巨室，或不能限制其威权，则君主必自视如鬼神，而一无所顾忌。此孟氏论立君政体之大略也。约而言之，则强暴之威力与一定之规则相混合而已。然则此政体者，亦专制共和两政间之过渡时代也。”如此定位君主立宪政体，显然与保皇会的主张大异其趣。虽然康有为也承认君宪为过渡阶段，共和为终极目标，可是他认为中国不适宜共和制，而皇上甚至清廷可以行改革。梁启超则认为光绪很难保救，即使生存，也不易有所作为，清廷更是根本不能指望。既然不得不革命破坏，与其争取过渡，不如直达目的。

接下来梁启超详细介绍了之前未及的孟德斯鸠“论共和民主之政”。孟氏以为，“民政未立以前，必有一种半君半民之政，以介其间，若是者，谓之贵族政治。盖以国中若干人独掌政柄，实君主之余习也。若夫共和政治，则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于人者。盖各以己意投票选举以议行一国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选定之司法官，则谨遵其令而莫或违，故曰人人皆治于人”。从进化的观念看，处于政体发展最后阶段的共和无疑是极则，所以梁启超称：“孟氏论三种政体之元气，其说有特精者，即专制国尚力，立君国尚名，共和国尚德是也。而其所谓德者，非如道学家之所恒言，非如宗教家之所劝化，亦曰爱国家尚平等之公德而已。孟氏以为专制立君等国，其国人无须乎廉洁正直。何以故？彼立君之国，以君主之威，助以法律之力，足以统摄群下而有余。专制之国，倚刑戮之权更可以威胁臣庶而无不足。若共和国则不然，人人据自由权，非有公德以自戒飭，而国将无以立也。”^[7]显然，在梁启超心中，共和已然是无限美好的愿景。

发表于1902年10月《新民丛报》第17、18号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梁启超不仅向世人传达了传主的临终名言：“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更彰显了这位心醉共和，“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的传奇女子的丰功伟绩，“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

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虽然法国大革命的惨烈让梁启超心有余悸，但是所描绘的罗兰夫人等为实现“共和主义”、“共和理想”、“共和政治”而奋斗牺牲的事迹，却令无数青年心驰神往，实际上奏响了一曲共和革命的赞歌。文章最后梁启超忠告各方：

有读罗兰夫人传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义者，当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偷安苟且，弥缝掩饰，朘削无已，箝制屡行，则必有如法国一日中刑贵族王党千余人，断尸遍野，惨血塞渠，乃至欲求为一田舍翁而不可得。……其在下位者，持进取主义者，当念民气之既动而难静，民德之易涣而难结也如此。苟无所以养之于平日，一旦为时势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国于孤注一掷，则必有法国当日互相屠杀，今日同志，明日仇讎，争趋私利，变成无政府之现象。虽有一二志芳行洁忧国忘身之士，而狂澜又安能挽也。呜呼，破坏之难免也如彼，破坏之可惧也又如此，人人不惧破坏，而破坏遂终不能免矣。何也，上不惧破坏，则惟愚民焉，压民焉，自以为得计，而因以胎孕破坏。下不惧破坏，则以谈破坏为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养实力，而因以胎孕破坏。然则欲免破坏，舍上下交相惧其奚术哉。

这段话看似立论持中，实则当时梁启超认定勤王保皇无望，革命必不可免，担心民智不开，一旦爆发，将陷入破坏不已的局面，希望有罗兰夫人式的先觉者起而传播民主思想。

为此，梁启超坐言起行，大声疾呼，《论教育当定宗旨》认为两种或数种不同的宗旨可以对抗并行，“世界之进化也，恒由保守、进取两大势力冲突调和而后成。有冲突必有调和，或先冲突后调和，或即冲突即调和。譬若甲之见以为专制政体适于中国者，则用全力以造专制之国民可也。乙之见以为立宪政体、丙之见以为共和政体适于中国者，则用全力以造立宪、共和之国民可也。但使其出于公心，出于热诚，不背乎前所谓普天下文明国共通之宗旨，则虽为斯巴达可也，虽为俄罗斯可也，虽为美利坚、法兰西可也。而必须有贯彻数十年之眼力，擎举全国民之气概，而不可如动物野蛮之受外界刺激，而为无意识之动。教育云，教育云，如是如是”^[8]。其说看上去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在康有为的高压下努力为实行共和开辟空间。

介绍《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梁启超也提及柏拉图（Plato）“尝著一书，名曰《共和国》（Republic），虚构一大同理想之国家”。十六世纪最著名政治家为法国的詹钵敦（Jean Bodin），“其所著《共和政治论》（Dela Republic），论以生计学理组织国家之法。”格黎哥里（Gregory）“著《共和论》一书，纲罗当时生计学之思想”^[9]。

小说《十五小豪杰》第一回开篇的“调寄摸鱼儿”就唱道：“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辟新土，赫赫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天不负，看马角乌头奏凯同归去。我非妄语，劝年少同胞，听鸡起舞，休把此生误。”^[10]这既是赞颂书中的十五位童子，更是激励中国少年奋起仿效。

杂剧《新罗马传奇》歌颂意大利烧炭党的男女首领，并借其口宣称：“兄弟们，咱们这个烧炭党，就奥大利政府的奴才视之，叫做一个私党。就意大利同胞的国民视之，叫做一个公党。我们的宗旨啊，不管他上等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九流三教，但使有爱国的热血，只管前来。不论那一人政体、寡人政体、多人政体，立宪共和，但能除专制的魔王，何妨试办。叫他是哥老会、三合会、大刀会、小刀会，些些不同，但起得革命军、勤王军、独立军、国民军，件件皆可。”^[11]这番话，简直就是梁启超自己内心的直白。

《新中国未来记》毒骂了一众满奴洋奴，批驳了各种不当论调，声称：“今日做革命或者不能，讲革命也是必要的。哥哥，你看现世各国君主立宪政体，那一国不是当革命议论最猖狂的时候，才能成就起来。这也有个缘故，因为君主立宪，是个折中调和的政策。凡天下事必须有两边反对党，旗鼓相当，争到激烈尽头，这才能折中调和。若是这边有绝大的威权，那边无丝毫的力量，这调和的话，还说得上进去吗。所以兄弟以为我们将来的目的，不管他在共和还是在立宪，总之革命议论革命思想，在现时国中，是万不可少的。”^[12]借助文学作品进行宣传鼓动之外，梁启超这一时期思想学理方面的用心之作是《新民说》，《新民丛报》第16号刊载的“论合群”一节，专门讨论共和、立宪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并且批驳了中国今日不可言共和的论调：

吾闻孟德斯鸠之论政也，曰：“专制之国，其元气在威力；立宪之国，其元气在名誉；共和之国，其元气在道德。”夫道德者，无所

往而可以弁髦者也。然在前此之中国，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其所以为群者，在强制而不在公意。则虽稍腐败，稍涣散，而犹足以存其鞫以迄今日。若今之君子，既明知此等现象，不足以战胜于天择，而别思所以易之，则非有完全之道德，其奚可哉？其奚可哉？吾闻彼顽固者流，既聒有辞矣，曰：“今日之中国，必不可以言共和，必不可以言议院，必不可以言自治。以是畀之，徒使混杂纷扰，倾轧残杀，以犹太我中华。不如因仍数千年专制之治，长此束缚焉，驰骤焉，犹可以免滔天之祸。”吾恶其言！虽然，吾且悲其言！吾且惭其言！呜呼！吾党其犹不自省、不自戒乎？彼辈不幸言中，犹小焉者也。而坐是之故，以致自由、平等、权利、独立、进取等最美善高尚之主义，将永为天下万世所诟病。天下万世相以谈虎色变曰：“当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所谓有新思想、新知识、新学术之人，如是如是，亡中国之罪，皆在彼辈焉！”呜呼！呜呼！则吾侪虽万死，其何能赎也！^[13]

在接下来的《论政治能力》中，梁启超详细论证了共和革命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现实政治选项的理据：

天下事固有极相反而适相成者，若君主专制与共和革命，两极端也。而共和革命，每成就于君主专制极点之时。专制者种种积威，种种阴谋，皆不啻为革命者作预备之资料，此泰西史上所习闻也。而况乎立宪、革命之争，乃与此异。（立宪、革命本不能为对待之名词，立宪者虽君统依然，已不得不谓之革命，革命者虽绝君统，然结局亦不过求立宪。故以对举，实论理学所不许也。今云云者，从普通称谓耳。）其事本非相反，其效乃真相成。我而诚欲革命也，……夫使所立之宪而能副国民之愿望也，则吾复何求，吾之革命主义，直抛弃焉可耳。（或持极端之排满主义，谓今之皇室，虽使其宪政之完备能如英如日，然以民族之恶感情，终不认之，宁以无秩序之汉而亡，不以有能力之满而存。此自是意气之言，真爱国真言革命者必所不取。）使其不能也，则经此一度之立宪，而民间之表同情于革命者，

将益如传染病，弥漫而不可制，可断言也。

民间同情革命，缘于清廷的作为，“朝廷一纸伪改革之诏书，以视民党数十万言之著书，数十百次之演说，其效力往往过之”。所以，“轻言革命，譬犹黠武，黠武非计也。以主立宪故而仇革命，譬犹弛兵，弛兵尤非计也”。数年来政府所以屡有伪改革之举，其动机不过“以民愚可畏，姑为一二以塞其望也”。可惜人民的战斗力不足以生政府之严惮，否则可以不战而屈之。“比例以推，知革命主义进一步，则立宪主义必进一步。我而真信立宪论之可以救国也，则正宜

日夕祷祀，薪革命论之发达，以为我助力，而其不得不相仇之理由果又何在也。”

共和革命与君主立宪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面对清政府的高压，必须同舟共济，才能人多势众。为此，他呼吁同道者齐心协力，抗拒强敌，而不要相互争斗，内耗能力，并且声明：

吾之为此言，非谓欲使言立宪者舍己之所信以从革命，或使言革命者舍己之所信以从立宪也，更非为模棱之言，与彼两主义作调人也。吾见夫天地甚大，前途甚宽，实有容此两主义并行不悖之余地，各发表其所研究，各预备其所实行，不相菲薄不相师，而岂必为冷嘲热骂以快意，为阴谋倾轧以求胜也。……今日之中国，宜合全国上下以对列强者也。藉曰未能，则亦宜合全国民以对政府。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政府方以千钧之力相临，而所谓立宪者革命者，皆如方抽之萌蘖，势之强弱，与彼公敌固相万也。……吾实见夫数年来民党能力之所以不进，其被压抑于政府者不过十之一，其被摧夷于异党者乃十之九也，是真可为长

恟者也。一言蔽之，则亦未明消极的协助之义而已。^[14]

梁启超的呼吁，在当时的革命党和后来的研究者看来，颇有些居心叵测。其实，在排满革命与保皇立宪之间，梁启超并非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他知道时势非讨满不可，既然不能不革命，君主立宪显然难于民主立宪。梁启超撰写《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用意同样是为了中国改革各派能够携手共进，鼓动民主革命风潮。他说：

意大利既以立宪成，则其性质宜于立宪明矣。而玛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为无识乎，不为多事乎？曰：恶！是何言！无革命之论，则立宪终不可成。通观今世界之立宪君主国，何一非生于革命风潮最高点之时代也（英国宪法号称自然发生者，然非长期国会之革命，则其宪法亦废弃久矣）？且立宪国有两事最不可缺，其一，则君主不敢任意蹂躏宪法。其二，则国民知宪法之可宝贵是也。凡已有特权者，谁乐分之以与人？故民间无革命思想，则君主断不能以完全之宪法与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则视之不重，视之不重者，则守之不牢。故民间苟非以千血万泪易得宪法，则虽君主三揖三让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无论欲革命者当言革命，即欲立宪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已不欲言，亦不可不望有他人焉言之。^[15]

因此，他并不认为革保双方如冰炭水火，互不相容，而是目标相同，可以携手并进。他推崇意大利三杰，正是要显示在爱国道路上宗旨可以不同，收效却能一致。

欧洲近数百年，其建国之历史，可歌可泣可记载者，不一而足。其爱国之豪杰，为吾生平所思所梦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国前之情状，与吾中国今日如一辙者，莫如意大利。求其爱国者之所志所事，可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杰。之三杰者，其他[地]位各不同，其怀抱各不同，其才略各不同，其事业各不同，其结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为今日之意大利者，则无不同。无三杰则无意大利，三杰缺一，犹无意大利。三杰以意大利为父母为性命，意大利亦以三杰为父母为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国，其乌可无如三杰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国，夫安所得有如三杰其人者。吾寤而叹之，吾寐而言之，我国民其犹知爱国乎，虽其地位相万，其怀抱相万，其才略相万，而万其言，而万其途，而万其策，而万其业。其上焉者，亮无不可以为三杰之一。其次焉者，亮无不可以为三杰之一之一体。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体，则吾中国之杰出焉矣，则吾中国立焉矣。^[16]

如果国人都能学习意大利有名之三杰，使得无名之杰遍布国中，则“中国遂为中国人之中国焉矣”^[17]。

梁启超还从中国专制政治的进化史探讨了政体的种类及各国政体变迁之大势。他认为，进化为天下公例，中国却是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数千年的思想、风俗、文字、器物，一仍其旧，不见进化痕迹。惟有“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万事不进，而惟于专制政治进焉，国民之程度可想矣”。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中国人脑识中没有政体分类之说。以理论分别政体种类者，起于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因主权者之人数而区分为三种，每种又包括正变二体。君主政体以Monarchy为正体，变体为暴君政体（Tyranny）；贵族政体以Aristocracy为正体，变体为寡人政体（Oligarchy）；民主政体以Democracy为正体，变体为暴民政体（Demogogy or Othlocracy）。此外还有混合政体（Mixed State），即和合君主、贵族、民主三者为一。

到了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将政体分类变为：主权者以名誉主义，谓之君主政体；主权者以道德主义，谓之民主政体；主权

者以温和为主义，谓之贵族政体；主权者以胁迫为主义，谓之专制政体。

此外，近儒奥斯陈的分类为：一人政体（主权在一人者），数人政体（主权在二人以上者）。后者又分为少数政体同质（寡人政体）和异质（少数共和政体），多数政体同质（民主政体）和异质（君民共主政体）。

日本博士一木喜德郎的分类为：一、独任政体。包括独任君主政体：专制独任君主政体（中国、俄国）和立宪独任君主政体（英国、日本、普国）；独任共和政体（法国、美国）。二、合议政体。包括合议君主政体：专制合议君主政体（无）和立宪合议君主政体（德意志帝国）；合议共和政体（瑞士、德意志联邦内之三共和国）。此分类就近世国家而言，所以贵族政体不另列为一种。

至于历史上政体的分类，则有法国博士喇京所著政治学的划分，古代有族制政体、神权政体、市府政体和封建政体，近世则有专制君主政体、立宪君主政体、代议共和政体以及联邦政体。^[18]

这些五花八门的政体分类，使得共和政体的含义有些模糊混淆，古今通看，共和未必与民主有着必然联系，单就近代而言，共和又只能涵盖部分民主政体。^[19]

林林总总的政体分辨如此纷繁多歧，令梁启超多少有些无所适从，这就为更加简明扼要的论说乘虚而入留下了空间。

^[1]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第1页。

^[2]任公：《诗界潮音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第1页，“文苑”。

^[3]详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364页。

^[4]柴四郎：《佳人奇遇》（续），《清议报》第2册，1899年12月23日，第5—7页，“政治小说”。

[5] 伤心人：《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清议报》第67册，1900年12月22日，第1页，“本馆论说”。

[6] 树立山人：《尊革命》，《清议报》第94册，1901年10月12日，第17页，“来稿杂文”。

[7] 中国之新民：《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第4、7—8页，“学说”。

[8] 中国之新民：《论教育当定宗旨》（续第1号），《新民丛报》第2号，1902年2月22日，第7—8页，“教育”。

[9] 中国之新民：《生计学（即平准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民丛报》第7号，1902年5月8日，第11页；中国之新民：《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6日，第2页，均“学说”。

[10] 法国焦士威尔奴原著，少年中国之少年重译：《论教育当定宗旨》，《新民丛报》第2号，1902年2月22日，第1页，“小说”。

[11] 饮冰室主人：《新罗马传奇》，《新民丛报》第11号，1902年7月5日，第1页，“小说”。

[12] 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2号，1902年12月14日，第75页，“政治小说”。

[13] 中国之新民：《新民说十四·第十三节论合群》，《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9月16日，第7页，“论说”。

[14] 中国之新民：《论政治能力》（续第49号），《新民丛报》第3年第14号（原第62号），1905年2月4日，第7—10页，“论说”。

[15] 中国之新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续第14号），《新民丛报》第15号，1902年9月2日，第2—3页，“传记”。

[16] 中国之新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6日，第2—3页，“传记”。

[17] 中国之新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完），《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第16页，“传记”。

[18] 中国之新民：《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新民丛报》第8号，1902年5月22日，第1—5页，“政治”。

[19] 关于国体政体的分别及其争论，其实主要起于日本明治后政治体制。详情参见另文《辛亥时期国体政体的争辩》。

第三节 告别共和

1903年初梁启超赴美的初衷，是以民主取决方式逼劝康有为改弦易辙，实行革命。他离开日本后，《新民丛报》的言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从原来看似介绍各种不同的政体，实际上鼓吹共和，转而倾向于君主立宪。

例如《服从释义》一文，从进化的角度阐释服从，进而论及代议制和共和政体，“不可服从强权，而不可不服从公理。人群之进化也，始为酋长政治，继为专制政治，洎乎文化渐进，然后代议共和政体乃兴”。此说看似延续梁启超的内心主张，如从学理上辨析“夫专制不可行于今日，而共和亦不能行于蛮世者何哉？”是因为野蛮人知有私不知有公，知有欲不知有理，相互争斗，恃力逞强。可是一旦涉及当下实际，论调却陡转：“今吾国之改革者，莫不曰代议共和矣，然吾闻共和政体以道德为元气者也”，无道德则革命反而会导致专制。^[1]这与主张君主立宪反对躐等跃进者的逻辑完全一致。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年底东还时梁启超却突然宣称：“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尽管他明知“昔之与吾同友共和者，其将唾余”，却毅然决然，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2]。

关于梁启超这一突变的因缘，前人讨论已多，除了老师和同门的压力、在美国实地考察尤其是耳闻目睹华人社会的情形感到震惊、以及阅读反省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著述之外，重要原因，是与之关系极深的上海革党连续经历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分家，以及《苏报》案吴稚晖与章太炎等人的冲突，对新党内部的腐败纷乱痛心疾首，因而断言“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3]。

关于实地考察共和政体之祖国的实情，令梁启超触动极深的有两方面，一是共和政体本身的弊病，二是华人素质与共和政体的差异，两方面相互作用，使得梁启超幡然回头。从发表及写作的时间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在前，《新大陆游记》在后，至少完

稿的时间如此。可是，两者相较，让梁启超对共和发生动摇以至于完全丧失信心的，主要还是美洲实地考察的冲击。

美国为移民社会，“外来者以无智无学无德之故，实不能享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以一国主权，授诸此辈之手，或驯至堕落暴民政治，而国本以危”。由于中国侨民为数尚少，占主体的欧洲移民才是心腹之忧。令美国政治家自傲者为“彼有选举权而我无之”。“虽然，以媚众取宠之故，而置最大问题于不顾，则与专制国讳言朝廷阙失者何择焉。此亦共和政体一大缺点也欤。”此外，由于大总统任期四年，“故其所兢兢研究之问题，曰将由何道而使本党之选举获胜利而已”，为了争取选票，不顾国家百年大计，只为一党目前利害。“此大总统所以不得人才，而共和政体之所以有流弊也。”

与之相较，“英国党派之胜败，于选举议员时决之。美国党派之胜败，于选举大总统时决之。英国但求党员在议院中占多数耳，既占多数，则其党魁自得为大宰相而莫与争，故所争者非在宰相其人也。美国反是，胜败之机，专在一着，夫安得不于此兢兢也。夫美国争总统之弊，岂直此而已，其他种种黑暗情状，不可枚举。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若夫中美南美诸国，每当选举时，必杀人流血以相从事者，更自邻无讥矣”。加之美国人对于兵备之猜忌，其旧时谬见至今未泯。“伯伦知理谓共和政体不适于今后之竞争，信然信然。”

至于中国人，缺点之一，为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美国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实全恃此村落思想为之原。村落思想，固未可尽非也。虽然，其发达太过度，又为建国一大阻力。此中之度量分界，非最精确之权量，不足以衡之。而我中国则正发达过度者也。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虽然所谓“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的说法“实为狗万物之言”，无奈实情如此，不能掩饰。在梁启超看来，“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其原因恰在自由。内地华人性质，未必优于金山。但在内地，有长官管治，父兄约束。南洋华人则因英、荷、法殖民当局对待更加严苛，禁止聚众集会，剥夺一切自由，也只能俯首帖耳。只有旅居美洲、澳洲之人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则旧金山其称首也，而其现象乃若彼。”

旧金山华人社会，“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即如中华会馆者，其犹全市之总政府也，而每次议事，其所谓各会馆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废弛，莫之或问。或以小小意见，而各会馆抗不纳中华会馆之经费，中华无如何也。至其议事，则更有可笑者。吾尝见海外中华会馆之议事者数十处，其现象不外两端：（其一）则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其二）则所谓上流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

让梁启超深受刺激的情形，“此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连主张共和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也不能实行共和，梁启超的失望可以说达于极点。

更加令梁启超感到绝望的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一般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更观其选举，益有令人失惊者。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各会馆多合同数县者），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

内地人的文明程度。尚远在旧金山华人之下，“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

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梁启超后退这一大步，非但告别共和，连君主立宪也抛在脑后，希望有强势权威出而实行专制，并且长时间坚持中国只能开明专制。

民情之外，还有国势。“法儒卢梭言欲行民主之制，非众小邦相联结不可。德儒波伦哈克亦言共和政体之要素有数端，而其最要者曰国境甚狭。吾观于美国，而知其信然矣。”美国不仅有四十四个小共和国，各小共和国之中，又有更小的组织存在。“自十六世纪殖民以来，即已星星点点，为许多之有机体，立法行法司法之制度具备焉，纯然为一政府之形。故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其国，而成于组织一国之诸省。又非成于其省，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中国地广人众而天下一统，由地方自治逐级结成全国共和，绝无可能。在这一问题上，梁启超的看法与孙中山截然相反，后者肯定中国早有地方自治传统，其革命程序的关键，就在于因势利导，由基层自治逐级上升，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民主共和。

此外，梁启超了解到，共和制本身存在无数弊端，即使成效最著的美 国，也是问题成堆。四年一度的选举制和政党分肥，导致美国的贪黷为地球万国之最，官员庸碌，效率低下。而政党轮替，则任用官吏犹如拍卖场。“专制国之求官者则谄其上，自由国之求官者则谄其下，专制国则媚兹一人，自由国则媚兹庶人，谄等耳，媚等耳，而其结果自不得不少异。”按照共和政治的原理，官职应不断更迭，而“官职屡屡更迭之不利于国家，近今政治学者如伯伦知理、波伦哈克辈言之详矣。夫一国中重要诸职，屡屡更迭，犹且不利，而况于各种之实务乎。官如传舍，坐席不暖，人人有五旦京兆之心，事之所以多凝滞也。英国每次更易政府，其所变置之职位，仅五十员内外耳（大率皆中央政府各部重要之地位，日本诸国亦然），而美国乃至举全体而悉易之。此实共和政治之最大缺点也”^[4]。

在此之前，梁启超的共和宣传虽然也有所保留，内心却以共和为现实的最佳选择，如今则反是，尽管道理上尚未否定共和政体，却只是作为乌托邦似的理想，现实中不但中国不可行，即使在世界各国，甚至包括作为共和始祖的美国，也只是历史使然，而非高效贤良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梁启超告别共和，绝不仅是暂时性的，他不但从根本上否定了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共和的必要与可能，甚至放弃了共和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政治制度的看法。

如果说《新大陆游记》着重于事实的考察，由对共和产生畏惧到充满厌恶，《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则着重于学理的反省。梁启超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介绍，一开始甚至是他进入共和精神世界的通道，可是原来他借着伯伦知理，传播的却是卢梭的思想。而现在正是从卢梭与伯伦知理的关系，梁启超解释了他何以重新详细介绍伯伦知理学说的动机。他说：

日日而言政治学，人人而言政治学，则国其遂有救乎？曰：嘻！仅矣。言而不能行，犹无价值之言也。虽然，理想者实事之母，而言论又理想之所表著者也，则取前哲学说之密切于真理而适应于时势者，一一介绍之，亦安得已。卢梭学说，于百年前政界变动最有力者也。而伯伦知理学说，则卢梭学说之反对也。二者孰切真理，曰：卢氏之言药也，伯氏之言粟也。痼疾既深，固非恃粟之所得瘳。然药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药证相反，则旧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药不可不慎也。五年以来，卢氏学说，稍输入我祖国。彼达识之士，其孳孳尽瘁以期输入之者，非不知其说在欧洲之已成陈言也，以为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国之废疾，而欲假之以作过渡也。顾其说之大受欢迎于我社会之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谓达识之士，其希望目的，未睹其因此而得达于万一，而因缘相生之病，则已渐萌芽渐弥漫一国中。现在未来不可思议之险象，已隐现出没，致识微者慨焉忧之。噫！岂此药果不适于此病耶，抑徒药不足以善其后耶？

伯伦知理驳斥卢梭的《民约论》，首先直指其国家起原论的立足点，“民约论之徒，不知国民与社会之别，故直认国民为社会。其弊也，使法国国础不固，变动无常，祸乱亘百数十年而未有已。德国反是，故国一立而基大定焉。夫国民与社会，非一物也。国民者，一定不动之全体，社会则变动不居之集合体而已。国民为法律上之一人格，社会则无有也。故号之曰国民，则始终与国相待而不可须臾离。号之曰社会，则不过多数私人之结集。其必要国家与否，在论外也。此伯氏推论民约说之结果而穷极其流弊也”。

根据伯伦知理的学说，梁启超对中国的情形是否适合卢梭学说进行了一番分析，他说：

中国号称有国，而国之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爱国之士，眈眈然忧之。其研究学说也，实欲乞灵前哲，而求所以立国之道也。法国革命，开百年来欧洲政界之新幕，而其种子实卢梭播之。卢氏之药，足以已病，无疑义矣。近则病既去而药已为筌蹄，其缺点率见是正于

后人。谬想与真理所判，亦昭昭不足为讳也。独吾党今日欲救吾国，其必经谬想而后入真理。以卢氏学说为过渡时代必不可避之一阶级乎？抑无须尔尔，迳向于国家之正鹄而进行乎？此一大问题也。卢氏之说，其有功于天下者固多，其误天下者抑亦不少。今吾中国采之，将利余于弊乎，抑弊余于利乎？能以药已病，而为立国之过渡乎？抑且以药生病，而反失立国之目的乎？此又一大问题也。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承希腊罗马政治之团结，经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异。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如伯氏言，则民约论者适于社会而不适于国家，苟弗善用之，则将散国民复为部民，而非能铸部民使成国民也。故以此论，药欧洲当时干涉过度之积病，固见其效，而移植之于散无友纪之中国，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相偿否也。夫醉生梦死之旧学辈，吾无望矣，他日建国之大业，其责任不可不属于青年之有新思想者。今新思想方始萌芽耳，顾已往往滥用自由平等之语，思想过度，而能力不足以副之，芸芸志士，曾不能组织一巩固之团体，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诚有如近人所谓“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者。以此资格，而欲创造一国家，以立于此物竞最剧之世界，能耶否耶？此其恶因，虽种之薰之在数千年，不能以为一二人之咎，尤不能以为一学说之罪。顾所最可惧者，既受彼遗传之恶因，而复有不健全之思想，以盾其后而傅之翼也，故人人各以己意进退，而无复法权之统属，无复公众之制裁，乃至并所谓服从多数之义务而亦弁髦之。凡伯氏所指卢氏学说之缺点，今我新思想界之人人皆具备之矣。夫以今日之中国，固未有所谓统属，未有所谓制裁，未有所谓多数，则吾国民之踟躅焉凌乱焉而靡所于从，夫亦安可深责。顾所贵乎新思想者，欲藉其感化力以造出一新世界，使之自无而之有云尔。若徒恃此不健全之新思想，果能达此目的否耶，是不可以不审也。吾非敢袒伯氏而薄卢氏，顾以为此有力反对之一大学说，为有志建国者所宜三复也。

由此可见，梁启超将不能共和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新学志士也不能结成巩固的团体党派，遑论其他社会成员。

梁启超特意注明“此论与革命论非革命论无涉。盖无论革命不革命，无论革命前革命后，皆必以统一秩序组成有机团体为立国之基础。伯氏之反对卢氏，非反对其鼓吹破坏，谓其于建设之道，有所未愜云尔。建设云者，则兼破坏之建设与平和之建设而两言之者也”。

可是共和与革命在当时几乎有着必然的联系，梁启超否定共和的合理性可行性，对于革命可谓釜底抽薪。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以“伯氏博论政体，而归宿于以君主立宪为最良，谓其能集合政治上种种之势力种种之主义而调和之”，专门介绍伯氏的论共和政体之说，而参以己见，进一步论述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价值。伯伦知理以主治权与奉行权相分离为共和政体的特色，其长在于主治权（多数选举者）与奉行权（少数被选举者）牵制得宜，故无滥用国权之弊，其短则国权或因此渐即微弱，国基固以不固。除非国民的共和诸德圆满，不惜牺牲财、力，以应国家之用，且受普及完备的教育，否则未睹其利，先受其害，甚至变为亚里士多德所谓暴民政治，导致国家灭亡。

伯伦知理还讨论了美国、法国、瑞士三国共和政体的沿革成败，在他看来，美国的共和政体，非出现于独立之后，而发源于殖民之时各地已经实行的自治自助。瑞士也有自治和宪法传统。而法国人当人权论出世之时，政治思想始大发达。其国民爱平等，尊自由，心醉共和主义。可是其国民的性情，却与共和主义最不相容。自治为共和政治最切要的条件，而法国人无所练习，凡事皆仰赖于政府。其治国之道，常以中央集权制度相贯彻，因此共和与帝制轮番出现，往往共和其名，君主其实。

伯伦知理承认，理论上共和国体有五点优于其他国体：一是养成国民自觉心，使人自知其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二是使人民知人道的可贵，互相尊重人格。三是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材得到高等地位，从而奖励公民的竞争心。四是有才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力于国家。五是利导人生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不过，连最适于共和的美国，也有种族歧视和反对精英两种相反相成的不良倾向。“故共和政体者，最适于养中等之人物，齐国民之程度而为一者也。”因为平庸，共和政体为国民谋普通利益（如设学校、治道路、奖慈善）则有余，谋高尚幸福（如文学、哲学、美术）则不足。其最大缺点是，政府运作重制衡而低效率。不过梁启超注意到，此点近年来已有明显改善。

尽管梁启超认为伯伦知理所论共和政体的价值，可谓博深切明，可是犹有未尽者。他又读了三个月前出版的比较法制派巨子、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波伦哈克（Conrad Bornhak）所著《国家论》的日译本，觉得有足以相表里者。波伦哈克认为，国家为用平衡正义调和社会上

各种利害冲突的大团体，而共和国的统治主体即国家与其统治客体即国民同为一物，本体内的冲突无法由本体调节。因而共和国大都革命不断，君主则超然利害之外，可以调和冲突。只有同一宗教，同一民族，且国境狭小，才能实行共和制并可以持久。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而且后者很容易导致民主专制，徒有民主形式：“故民主专制政体之议院，实伴食之议院也。其议院之自由，则猫口之鼠之自由也。”其结果只能导致不断革命。

在介绍了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共和论述后，梁启超发了一大通痛心疾首的感慨，他以译者的身份说：

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国中爱国蹉跎之士之一部分，其与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体者亦既有年。乃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能逃难耶？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吾乃自解曰：牺牲现在以利方来，社会进化之大经也。吾尽吾对于吾子孙之义务，吾今之苦痛，能无忍焉。而彼历史与理论之两巨灵，又从而难余，曰：南美诸邦人之子孙，藏其自由铁券于数十层僵石之下，谁敢定其出世之当在何日也？曰：法兰西自一七九三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一八七〇年始获飨焉，而所飨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以后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呜呼！共和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祖国吾自由其终不能由他途以回复也，则天也。吾祖国吾自由而断送于汝之手也，则人也。呜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点汝之美名，使后之论政体者，复添一左证焉以诅咒汝，吾与汝长别矣。

告别共和的梁启超，并未回到君主立宪的旧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

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同友共和者，其将唾余。虽然，若语于实际上预备，则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梦俄罗斯者，即主张开明专制之谓也。

平心而论，梁启超之前醉心共和，的确发自真心，所以虽然遭到康有为的反复痛斥亦不为所动。如今告别共和，同样出于实意，因为他已经失去所有原来崇信共和的理据。他人指责其“流质善变”，而他本人则自诩是审时度势。梁启超虽已享有大名，毕竟是刚刚而立的青年，时势将其推上潮头，他也能的确能够引领潮流。他可以很快接受新事物新理论，自然也就容易改变认识。责其虚伪，是不了解其尴尬的境遇和内心的痛楚，用言行不一的表象抹杀了他表里如一的真诚。只是梁启超这一步退得太远太快，不仅告别共和，连君主立宪也退了过去。这不啻有与天下趋新人士为敌之嫌。在文章的最后，梁启超宣称：

天道循环，岂不然哉！无论为生计，为政治，其胚胎时代，必极放任，其前进时代，必极干涉，其育成时代，又极放任。由放任而后为干涉，再由干涉而复为放任，若螺旋焉，若波纹然。若此者，不知几何次矣。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翰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伦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5]

在列强争霸的大势、中国新党和海外华人的内斗、实行共和制各国的弊病以及学理变迁等各方面负面信息的交逼之下，梁启超的逆流而动得到一些旧日同道的赞同。皮锡瑞看了《新大陆游记》，1904年5月22日于日记中记到：“作者尝以美为文明，今言其官吏之贪及待华人之酷，乃悟共和政体多缺点，且不如专制。此非亲见者不能悉，亦非言新学者所能知也。引华盛顿之言，曰‘恶政府犹愈于无政府’，足为欲倾政府者下一针砭。美国如是，足见世界大同之期尚早。”^[6]

与梁启超有过同样心路历程的黄遵宪则来函表示同情：“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

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仆自愧无公之才之识之文笔耳，如有之，以当时政见宣布于人间，亦必如公今日之悔矣。仆前者于立宪之说且缄闭而不敢妄言，然于他人之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谓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仆所最不谓然者，于学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气之所，自上海某社主张其说，徒使反动之力，破坏一切，至于新学之输入，童稚之上进，亦大受其阻力，其影响及于各学堂各书坊，有何益矣。若章、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公之所唱，未为不善，然往往逞口舌之锋，造极端之论，使一时风靡而不可收拾，此则公聪明太高，才名太盛之误也。东西诸国，距离太远，所造因不同，而分枝滋蔓，递相沿袭者，益因而歧异，乃欲以依样葫芦，收其效果，此必不可能之事。”^[7]皮锡瑞和黄遵宪都承认共和为理想，只是不适宜于当日的中国，尤其反对以暴力革命相争。几年后，恽毓鼎与人谈王道霸术，认为“自三代至今，合乎人情，协乎伦纪处，便是王道。至其制度法令，所以行之者，无非霸术也。有爱民之心，行利民之政，虽霸而仍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佚道使民，以神道设教，虽王而亦霸。周孔之心，管商之政，其盛治一也”。由此根本反对“新学家美共和，恶专制”，“吾谓共和断不能久治天下。虽家庭商贾之事，亦须定于一尊，号令归一，始能行之，何况治天下。欧洲唯法兰西、美利坚为民主之政（此外，小国民主尚多，只是中国一省一郡耳），然其势已不能久，必归于专制而后已。梁任公素持共和之说，迨游新大陆归，一变而为开明专制之说，盖阅历而知其弊也。第尚不愿骤反前旨，姑以‘开明’二字斡旋之，其实志在专制矣。将来中国必有大强大盛之日，亦必成一大强大盛之世界。余所见确能前知，特记于此，以待后验”^[8]。指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其实志在专制，确有洞见，当然前提是必须行“王道”的“霸术”。

1912年10月22日，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此文当年成为《庸言》的代发刊词，而该刊是梁启超宣传进步党政见的主要阵地。这篇文章相当于梁启超回国后的宣言书，同时也是关于自己过去政见变换的辩解书，从中可见梁启超视角下其共和心路历程的跌宕起伏，也相当程度反映了辛亥时期中国共和发展演化的轨迹。梁启超这样表达他的意思：

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而世论或以鄙人曾主张君主立宪，在今共和政体之下，不应有发言权，即欲有言，亦当先自引咎，以求恕于畴昔之革命党。甚或捏造谰言，谓其不嫌于共和希图破坏者。即侪辈中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张，与今日时势不相应，舍己从人，近于贬节，因噤嚅而不敢尽言者。吾以为此皆警词也。无论前此吾党所尽力于共和主义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张，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此志固可皎然与天下共见。

近代中国许多政见各异的名人回忆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物，几乎异口同声指向梁启超。而后来的历史认识往往将这种现象说成是种瓜得豆。其实，梁启超当年的确是种豆，只是即将收获之际，才鬼使神差地改为种瓜。从此，梁启超的历史形象大幅度变形，与共和形同陌路，成为革命党口诛笔伐的对象。在稍后与《民报》的论战中，梁启超“变”的方法和理据，是纯由逻辑推理进行论辩，无法绕过清廷不愿开明革新的现实，故而遭受重创，导致惨败。不过，梁启超对于民主共和的质疑以及国情是否适宜的保留，在民国成立后的确长期困扰着国人，这使得他那些看似翻云覆雨的真心实意，仍未变成历史的陈迹，而且不断被后人反复思索，进而探求根本解决之道。

[1]《服从释义》，《新民丛报》第32号，1903年5月25日，第4—5页，“论说”。

[2]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1903年10月4日，第30—31页，“学说”。该期实际出版日期较晚。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癸卯年分《新民丛报》临时增刊，第191页。

[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癸卯年分《新民丛报》临时增刊，第48—49、98—100、119、187—191、207—208、216—219页。

[5]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1903年10月4日，第1—6、16—31、35页，“学说”。

[6]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7] “光绪三十年七月四日黄公度《与饮冰主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上海某社即爱国学社。

[8]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

第二章 转向孙中山：共和先驱易位

与通行的认识有别，清季共和观念的引进和思想的勃兴，梁启超实有开创之功。正是由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不顾康有为的高压，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依托，进行坚持不懈的宣传，才使得共和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并造成共和思潮初盛的局面。许多亲历者回忆早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物，不约而同都会提到梁启超。而且梁不仅发挥了启蒙的作用，导致了“种瓜得豆”，更是正面倡导鼓吹共和观念的先行者。只是当共和思想开始发酵蔓延之时，从新大陆东归的梁启超却告别共和，退到开明专制。这一大幅度的倒退之举，使得热血青年和激进人士纷纷弃之而去，转而拥护坚持反清革命的孙中山，使得梁启超失去共和先驱的历史地位。而后者适时趁势采用原来因为容易引发歧义而不以为然的汉语共和概念，很快就化身成为中国共和革命的旗帜北辰。

第一节 共和学校

《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密集的介绍宣传，使得“共和”的观念越来越普遍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1901年4月19日，杭州方言学社开学，蔡元培演说道：“吾闻学校之事，与国宪之变迁有关系。国宪三变：曰专制，于春秋为据乱世；曰立宪，为升平世；曰共和，为太平世。学校亦然。专制体为学堂，为初学导门径者也。其总理谙于学问之事，管理之法，延访教习，进退学生，皆符公理则效，否则脂聿敷衍，为学官、书院之附庸而已。共和体为学会，为成学结团体者也。其会友皆有确实坚忍之气，相借相长，以求进步则效，否则剽窃时论，苟以哗众榜名，则亦征逐嬉游之变相而已。若乃立宪体，则以学会之体，举学堂之实，议事取公论，治事有专责，既不阙自由之权，又不为无法之形，舍短取长，殆无遗憾。论者谓今世界政体，惟立宪最宜，吾于学校亦云。”^[1]三世说与近代政治相关联，与康梁师徒不无关系。蔡元培此说虽与政体相联，却未必是为君主立宪政体张本，而是从教育的角度说明学堂以仿立宪体制协调各方为宜。至于共和体，则适用于学会团体的层面，而且必须成员已经具备相应素质，否则有害无益。

是年6、7月间，孙宝瑄仔细阅读了吾妻兵治翻译的伯伦知理《国家学》，觉得“共和国纵令制度得其宜，要之须使政府势威，足以立万民之上，大权足以制御国民”。他显然赞成君主立宪，认为“君治世袭之国，不可不扶民权。共和政体之国，不可不重君权”，批评“世多谓立宪共和政体，其君可以拱手无为，谬也。《国家学》曰：无为素餐，非人君之道。忘山居士曰：君岂可无为，立宪政体特存世袭君位，以杜觊觎争位之乱，其实徒有君之名耳。国中之事，举听命于相，故君可以无为，君之实已移于相，是故立宪国惟以相为真君。若共和国，则不立相，君即相也，相即君也。观于立宪国之相，共和国之君，皆不能无为，则知能无为者实非君也”。所说共和政体，正是上下共和的君主立宪，而共和国虽然无君，却将不同政体的实际权力之所在一概视为君，所重视的还是威权。

孙宝瑄原来“惟知君权之专制，及读《国家学》，乃知复有民权之专制。何谓民权专制？即乱民之横暴，荡坏宪法，恣行无忌弹也”

[2]。由此悟到，无论君权、民权，都应该分权并有所限制，以防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专制。1902年10月，他又比较中西政体的异同，以为“西人以立法、司法、行法三部，组织而成国家，使互相牵制。此与我国设官，外使总督、巡抚、布政使及将军等互相牵制，内使军机大臣、六部满汉尚书侍郎等互相牵制，用意正同，皆所以杜人之擅权也。然而我国则因不能擅权者，遂不能行权。西国则虽不能擅权，而可以行权。立宪之国，共和与专制同时而并用，立法用共和，行法用专制。共和，民权也。专制，君权也。留一尊严不可犯之君，使为一国之代表，而阴削其权，归之于相，故相负责任，而君不负责任也”。次月又进而论道：“专制，君权也。共和，民权也。余每主君民二权兼用者，盖立法须用共和，行法须用专制，万古不易之理。今人于二权之界不能划清，于是主民权者，并行法亦欲用共和，主君权者，并立法亦欲用专制。此大悖也。”[3]这样的领悟，既抓住了中西体制迥异的根本，又指出了误解新制的关键。

蔡元培和孙宝瑄，都是趋新的知识人，关注新思想、新学说，自在情理之中。有趣的是，政体问题还成为科举考试的题目。1902年，湖北乡试的策论题为《俄主专制、英主立宪、美主共和，政策之宗旨不同，国民之感动顿异，试抉其利病得失之政策》。获得头名的考卷破题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何，政体之范围是也。”并以俄、英、美三者为代表，说明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各自的利弊。[4]该省乡试的论题及考生答卷表现出来的倾向，引起一些争议。

《申报》刊载《君权民权释义》，指湖北士子受君民平等之邪说的影响，并批驳共和弊政。[5]考试的举子未必真的相信新知，而是科举改革，增加策论，依据各种选编时论的科场书，临时抱佛脚，将一二新词敷衍成文。尽管如此，科考对士子的强大泛吸引力，促进了大范围的政治学说传播，普及速成的效果相当显著。

“共和”观念及其学说的快速蔓延，引起当局的警觉，盛宣怀因而奏请推广译书，理由之一，是要在林林总总的思想学说中“审流别而定宗旨”。他认为：“泰西政俗流别不同，有君主专制之政治，有君主宪法之政治，有民权共和之政治，有民权专制之政治。美民主而共和，法民主而专制，其法律议论，判然与中夏殊风。英之宪法略近尊严，顾国体亦与我不同。惟德意志自毕士马以来，尊崇帝国，裁抑民权，划然有整齐严肃之风。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后之政绩。俄虽号君主专制之国，其法律多效自法人，制度与国体参差，故邦本杌隉而世有内乱，不若日、德之巩固也。较量国体，惟日、德与

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适宜而可用。”^[6]如此具体明确地规定政治导向，预示了清廷预备立宪的蓝图和目标。

在整个社会中，青年学生是“共和”观念的信奉者，同时也是共和制度的谋求者。1902年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最能体现“共和”观念在大都市的学界深入人心的情形。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源于个别班级反抗教员和校方的专制，而全体学生齐心协力，一律退学。为了善后，避免出现此前其他学堂风潮虎头蛇尾、牺牲过大的问题，同学林洲髓、项炜臣提出对策。在他们看来：“一致退学者，消极的而非积极的也，破坏主义而非建设主义也，脱专制之扼而未由共和之途也。”他们为同学诸君所陈建设之策：“拟名之以苦学界，而分之为共和学校、共和营业之两部。共和学校：一、定章程立学课延教员皆公议，以多数决之。一、立自治制以全共和学校学生之资格。一、揭公学退学始末记及张园影相公启告白等种种有关系之稿于会堂，以防他日渐趋专制之弊。共和营业：一、共有资本，有财者出财，无财者延长劳动若干时以当之。一、协同劳动，若干岁以上每人每日劳动皆若干时，能著作者能译述者能编辑者能词章者能书画者，为书为报为美术品设肆售之。一、旁求赞助。……一、公配利润，以若干分为学校费，若干分为保险费，其有赢，均分于各人，以为赘泽，若储蓄之需。”

这样的共和学校及共和营业，显然不仅仅限于民权即政治平等的范畴，更深入到经济平等的层面，所以善后策明确指出：“呜呼！我同学诸君果能以此主义贯彻始终，吾同学诸君者，实学生社会之中心，而社会主义之现象也。”政治平等为资本主义，经济平等为社会主义，如此清晰地分界，显示学生的学理把握相当准确。

南洋公学退学生的要求得到中国教育会的积极响应，为此，教育会在张园召开特别会，会上发表演说，说明：“今日所以特别会之故，以南洋公学学生不受无礼之压制，全学告退，欲组织一共和学校，陈意见于我本会请协助。……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决非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世界之事，有主因而助因，理想在共和，而办事稍带专制气味，其结果便不能纯粹。本会办事所以纯用共和法也。但欲办共和的事，必要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曰独立自主之气节，一曰舍己为群之公法。前

者谓之权利，后者谓之义务。”南洋公学退学生“为一二人受压制而全学争之，牺牲个人之利益于同学，是真舍己为群之风，所以诸君真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与本会会员理想相合无间。本会如不协助，是自杀其主义，今日便当解散此会矣”。

会前学生事先向中国教育会提出意见书，要求设共和学校，开共和报，派游学。限于实力，中国教育会当场认可协助建设共和学校事宜，其余则须后续再议。^[7]

严格说来，南洋公学风潮不过是学生与教员及校方的冲突，可是退学生乃至中国教育会却视为专制与共和的对抗，并且在后来的叙述中，不断凸显风潮的反专制求共和的性质。1903年，南洋公学退学生编辑出版了《教育界之风潮》，详细叙述风潮的渊源、过程、结局和反响，除了与风潮相关的历史文本如学生团体的历次演讲外，还有后来附加的评述性文字，在这部分中，学生追求自由共和、反对专制的理念和形象明显较前清晰。该书称：

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时代也，民族主义普行之时代也，专制帝国昔也以为常，今也以为奇，专制政体昔也治民易，今也治民难。法君主也，今民主矣；日本专制也，今立宪矣；俄君主也，全国之风涛已震动矣。……专制一物，诚二十世纪全世界所屏斥者矣。空气自由，天日自由，观听自由，所遇皆自由，而强欲其不自由，人孰有不起而争者。……学生者，爱自由最盛者也，彼爱之而公等恨之，何哉？学生者，谈共和最广者也，彼谈之而公等禁之，何哉？学生非能别创一见，故与旧说相抗也。风潮激之，见闻动之，游于共和之乡，达于共和之地，优游焉，梦寐焉，思想于是而大变，天道循环，物极必返，专制弊不以共和继之，逆天也。吾闻之，逆天者亡，万物皆贱，惟道独尊。人欲共和而我独专制，谓之失道。……公等当顺天，当求得道，则顺天者共和也，非专制也，得道者共和也，非专制也，惟共

和能久存于世界，惟共和能深得夫人心。^[8]

与之相对，个别教职员和校方则被描绘成专制的化身，沈曾植首当其冲，“二十世纪，举世皆共和，不共和则为鄙夫；举世谈公理，废公理则为野蛮；举世尚新学，仇新学则为群贼。有一人焉，不识共和，不知公理，不喜新学，而甘为鄙夫、野蛮、群贼，沈曾植也”

^[9]。其实沈曾植虽然在固有学术文化方面主张守成，政治上却并非纯

然守旧。此类戊戌时的老维新派到新世纪开端即被视为保守，正是社会求变之心日趋激进的体现。

专制与共和在校园和学界里的冲突，毕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随着风潮的蔓延，局部的矛盾很快便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所以《教育界之风潮》的编者“爱国青年”论道：“专制之弊也久矣，大清律法何人所定耶？亦曾商诸人民耶？以不公之法，强民以必从，且科以重罪，俾四万万人群居天罗地网中，为风中之烛、涧底之鱼，岌岌无以自存。令彼立宪共和诸国以议院组织政体者，群嗤其愚。且非特不广采舆论，以诏风俗而全人情也，变本加厉，夷灭平民，鱼肉贫苦之苍生，剥削四方之膏血，无事之时，强人以必从，有事之际，又制人使不得不从，使居其下者，侧目而视，裹足不前。凡政府诸人之守法律者，皆为其仇敌，众怒难犯，发逆之蔓延，匪徒之恣肆，皆以此耳。且天下如其大，四海如其广，宁可以一人之私见成事乎。”由此看来，学校专制其实是由国家专制所决定和支配。

与专制之国形成鲜明对照：“彼共和诸邦法律，经上议院认定，而未宣告于议院，犹不可著为定法，而况臆定法律。为国家谋权利，而于民之利害损益，绝不一措意，欲人民不与为难，不为徇规越矩之事，犹掣其肘而使之行，钳其口而使之谏也，可乎哉。”^[10]专制政治的不合理使得反专制言行如影随形，理所当然。

国家政治的问题，关乎每一位国民：“君主之利害，皆在臣下之手，专制政体推行之久暂，皆悬于臣下之举动，臣下而好共和，君主即酷好专制，而终则共和，臣下而喜专制，君主即意欲共和，亦必流于专制，势为之也。”^[11]也就是说，专制还是共和，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而非君主。

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与共和学校（即爱国学社）的创建，引起舆论的积极反应，无形中形成一次共和观念的宣传攻势。《苏报》对于“南洋公学学生一朝而同心退学者二百人”的壮举表示肯定，欢呼“今南洋公学退学诸君子，激发公愤，解脱羁绊，排斥专制，创立共和，五日之间，涣然成一维新学校”^[12]。《新民丛报》的报道评论“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对共和学校寄予希望，同时又有所担忧：“今诸君之以共和名新校也，不知共和其教育之主义欤？抑共和其教育之法式欤？共和其教育之结果欤？抑共和其教育之现象欤？由前之说，吾为新校之前途贺，由后之说，吾为新校之前途吊。且岂惟

吊新校而已，吾中国教育之事业，且于此生顿挫，吾中国少年之性质，且于此生影响。”对此，《教育界之风潮》的编者回应道：“共和学校诸君，皆有大志，知统纪，闻其定联法，举议长、司法，求实际，无少年骚扰之气，令人望之生畏生慕生敬。青年竟能若是，谅饮冰子亦当欣然一笑矣。”^[13]

也有人对学生的言行举动不以为然，说三道四。日系的《日日新闻》发表评论意见，批评学生动辄“不比美利坚，便比法兰西，不曰共和政，便曰革命党，譬诸人尚未能举步，而已恨不能急起疾追，断断无此理也”。作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错解了专制与共和的关系，“彼之羨共和者，盖恶专制也，意谓共和乃专制之对待，误矣。鄙见所及，天下政治，一以专制对待者，即为无政府。如恶一人专制为专制，则立宪数十人专制也，共和数百人专制也。故有立宪渐流而为共和，亦有立宪渐流而为专制。立宪难保永久，共和岂为极端。易言专制，彼必未思夫文明专制与黑暗专制固自不同，遂谓专制乃至浅之阶级，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不明此义，好高务远，意惟野蛮，固执不化，乃为专制，宜其一启口便言共和已成，今日学生之通病。进化阶级果可一蹴，凡民性格勿论悬殊，恐讲共和未辍，即将舍而讲无政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诸学生既讲共和而争平权自由，此唱彼和，以为分内所应得。予亦曰：分内所应得，特是平权消息，视夫学界，国学既兴，民权自平，谓是不然，试先设一议院，其有不日日争斗咆哮于议事厅者，吾未之信”^[14]。讲共和当然需要相应的素质，但以专制相对于无政府，而指立宪、共和为程度不同的专制，未免混淆视听。

出于对明治政体稳定性的担忧，除少数民权派人士，日本对于中国的共和呼声始终高度警惕，唯恐波及日本，引起社会震荡。而其指中国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固然是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差异及国民发达程度的局限所造成的一大困境，但是放眼世界，从各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来考量，却并非实行共和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效果的良否，仍然不能根本摆脱制约而已。

^[1] 《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1901年4月19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页。

[2]孙宝瑄著：《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361页。

[3]孙宝瑄著：《忘山庐日记》（上），第579—580、593页。

[4]湖北乡试第一名汪岁鸾：《俄主专制、英主立宪、美主共和，政策之宗旨不同，国民之感动顿异，试抉其利病得失之政策》，《湖南官报》第211号，第28页，“论说”。

[5]《君权民权释义》，《申报》1902年11月17日，第1版。

[6]《盛宫保推广译书敬陈纲要奏》，《经济丛编》第16册，1902年10月30日，第126页，“廷议”。

[7]《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记》（录《苏报》十月廿一、二、三日五则），《时事采新汇选》光绪壬寅年十一月，第2卷，1902年12月6日，第4—8页。

[8]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三第3章，上海，1903年印，第11—12页。

[9]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二第2章，第33页。

[10]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二第2章，第6—7页。

[11]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三第3章，第1页。

[12]《南洋公学学生一朝而同心退学者二百人》（录自《苏报》），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十一第11章，第8页。

[13]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卷十一第11章，第3页。

[14]《南洋公学学生罢学意见平论》（录十一月八日《日日新闻》），《时事采新汇选》光绪壬寅年十一月，第3卷，1902年12月14日，第3—4页。

第二节 学界呼应

学界风潮鼓荡起来的共和轰鸣，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也招致不少非议，一时间议论共和的声浪陡然高涨。

《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力辩中国并非专制政体：“夫各国之政治，其大别本区为三：曰立宪，曰共和，曰专制。专制者，一人独揽大权，事无巨细，悉秉命焉。此专制之谓也。若立宪则制定一国之宪法，而上下依之矣。共和则又举一国主权分任于民举总统，以董其成耳。”“夫专制者，所谓一国政治悉由君主一人之专擅者是也。”而中国依律照章，重大情事，集六部九卿会议，君主不能专擅。由此可见，中国之坏，在于例吏利夫。^[1]

《大公报》的另一篇文章《说公》，也以专制、共和的对立为枢纽，检讨公私与政体的关系，并以公德公理作为国民素质的基准。

“查国之政体，分三大类，曰专制，曰立宪，曰共和。极公者为共和之政，极不公者为专制之政。我中国一王代嬗，由来已久，几忘公私之大别。国民之不满于朝廷政府者，动诋曰专制专制，于是欲图改良政体，奔走而狂呼曰：共和共和。夫共和之政体，固属极公，若国民之程度低浅，则一经改立共和之政，则极公可变为极私。试以美法两国而易以我中国之人，不旋踵而国基必坏矣。故居今日而图改良中国之政体，以求化其私而合乎公，则惟有立宪乎？盖宪法一立，则有所范围，共相遵守，君不得自私而朝廷公，官不得自私而政府公，上无不讲公德之事，下无不讲公理之人，国民亦自不敢不公。”^[2]其说看似有理，只是如何才能使朝廷、政府化私为公，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有人认为：“有人民而后有国家，有国家而后有政体，欧洲自十六世纪以后，君主之专制一变而为民主之共和，虽间有酌两用中，治法立宪，然风潮所迫，圣智无功。一国之主权，率在于多数人民之手，为君者不过承行画诺，有若赘疣。”由于君上压制与民众反抗，“二者聚讼，各不相下，今其影响且及于中国，以致朝野水火，新旧交哄。不有以折衷而论定之，非徒无以化今日门户之鬻争，亦且不能收他日改良政体之效果”。强调必须谨慎考察压制、释放二者之利弊

及应该采用的治国措施。压制与释放各自之利弊，要视乎国民之程度而定。《大公报》虽然刊载此文，态度却有所保留，特意加上“本馆附志”：“国民之程度由野蛮而递进至文明为高点，一国之政体由专制而递进至共和为极则，进化之阶级，宜层累而上，躐等则颠。国政之改革，当因时制宜，躐等则弊。故就国民之程度而言，固以文明为高点，然我国民尚难一蹴而跻；就一国之政体而言，固以共和为极则，然我中国尚难一变而至。”^[3]

有人甚至辩解道：“专制之国，君主之，共和之国，民主之，立宪之国，君民共主之，此泰西之通义也。国以专制而君权尊，国以共和而民权重，国以立宪而君民之权适相平，此泰西国制之不同也。……专制、共和、立宪三者迥乎不同，而各有所宜，实各有其弊，惟我中国合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而一之，斯斟酌得中，行之万世而不坏。”时人动辄指中国为数千年专制之国，可是只有暴悍如桀、纣，昏庸如幽、厉，残虐如秦政、隋炀，才能谓之专制。中国历代，“唐尧之求言也，辟四门询四岳；周武之访范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孟子之告齐宣也，左右、诸大夫、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左右、诸大夫、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去之，谓非共和之意乎？……周秦以下，非循例之事，台谏得以力争，必下内外臣工会议，有不合之举，大臣得将诏书封还，台谏得直言极谏，务使君臣上下同为法制所拘限而不能任意妄行，则立宪之意也”。也就是说，中国历代制度，兼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者之利而无其弊。

至于清朝，“体天出治，未尝有专制之号，而一人端拱，万姓风从，涣汗之颁，如纶如綍，则君主之规制崇隆也。未尝有共和之号，而凡百政令，务顺民情，朝廷举措更张，必下六部九卿会议，即下至一郡一邑，遇有兴作，亦必谘询绅耆士庶，而后施行，则诚暗合于民主国之制度也。凡百兵刑礼乐、吉凶嘉宾，载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六部则例、皇朝通典诸书者，自天子以至王公、卿大夫、庶民，罔不恪恭遵守，无敢或逾，虽以九五之尊，亦为法令所维持，无或有任情喜怒者，则君民共主之政，中国固未尝不相符也”。

如此说来，清制既有共和立宪之意，又有民主之制和君民共主之政，在作者眼中，中国的皇权体制堪称完全美备，无与伦比。可是“今者少年无识之徒，辄心醉平权自由诸邪说，诿诿然欲斥君主、改民主，一若天下国政之美无有逾于美洲者，殊不知势宜民主则民主为佳，势宜君主则君主为善，势宜君民共主则君民共主为得中。使以俄

而效美之共和，则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必至无君党中人益将揭竿而起；使以美而效俄之专制，则华盛顿之成规顿废而暴君肆虐，民必陡绝生机；使以俄、美而共效英、德诸国之以立宪为邦，则必政教参差，开上下争权之渐，而太平之局且不能保全。则何若我中国之不共和而共和，不专制而专制，不立宪而立宪，庶君主行法，民皆奉法，熙熙皞皞同游于光天化日之中，而非泰西所能望其项背哉。彼病专制而欲以立宪民权为国者，乌足以知之”^[4]。国体政体固然要与国情相适合，可是断言清朝体制已经如此完美，超越万国，恐怕难以取信于人，遑论所举符合共和立宪之意、民主之制和君民共主之政的史事，不过似是而非的比附而已。

官府对于各地此起彼伏的学界风潮尤感不安，署湖广总督端方、湖南巡抚赵尔巽分别告诫所管各该省学生：“世有不学之徒，浮薄忘本，张自由之狂谈，慕共和之治体”^[5]，民权自由之说在过往为名言，在今日为陈言。欧西十六七世纪暴君污吏累世相继，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华盛顿崛起于美洲，一变而为共和政体，国延民康，于是革命之风遍于欧洲，民权自由之说因而兴起。近数十年来，大政治家咸谓保一人之自由不如保一国之自由，授劣等民族以权力不如授优等民族以权力，平权自由之言转瞬而易为强权，帝国主义遂高出民族主义一等。这也是进化之秩序，天演之公理。且不建设不能言破坏，今日应利用专制广行教化，以开民智，使人人有忠君爱国之心，必忠君爱国然后才能自立。^[6]官方的针对性辩词，确实也道出了欧美政治学说的另一面。

随着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渐起，翻译介绍日本法政学说之事仍在继续，如马毓福等编译的葛冈信虎讲义《法制大意》，指“政体者，依主权作用之形式而异，主权独在于君，行其一切强迫之手段者，谓之专制政体；当主权运用时，设有特定之机关，付以特定之权限者，谓之立宪政体（内分君主、共和二者）”^[7]。

有人进而讨论共和与立宪方方面面的异同，“夫共和之与立宪，其异点在民主与君民共主，既曰共主，则民参其政，君综其成，各有权利，各负义务。各国宪法上制定之权限，虽互有差异，其大归旨则莫不同一。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皆主分立，立法之权授之于民（即民间选出代议士，议政于下议院是也），立法部议定之法律，经元首裁可，然后下诸所司之行政官（即内阁臣），使遵行之；行政官

若欲有所兴作，则陈其意见于立法部，必得其决议而后可；司法之权则别委之于裁判部，元后则依宪法之所定而综揽一切统治之权”^[8]。

尽管有的国体政体之分将立宪制一视同仁，实际上“民主立宪之与君主立宪，其性质异，其仪式异，其各种机关之组织亦异，其不能相同也明甚。虽然，其不相同而适相同者，则皆主国家主权说是也”。英国法律家蛮痕（Maine）所著《民主政治》（Popular Government）称：“近世国家之政体，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共和，皆不过外形之差别，其主权实皆操之国民也。”“自二说观之，益信国家主权之说非误。盖主权不当付之自然人，而当付之法人，学者共认之原则也。国家者，具有法人资格者也，彼君主与大统领，不过为国家法人之代表耳。”^[9]

古今“共和”的能指所指完全不同，可是有时古代的共和也被用来证明中国可以改行共和制，或是具有实行共和的文化传统，引发论者以近代政治理论为据的驳难。有人说：“中国政体发展之顺序，分为三期。由黄帝至帝啻为‘神主政体’，一变而为尧舜之‘共和政体’，夏禹嗣兴，而‘君主政体’发见焉。”^[10]这样的附会遭到非议：“难者曰，观支那之历史，孰[孰]能证其有共和政府之事实乎？以为主权在百姓，君主仅为统治机关之说，未见支那之有行之者也。孟子所谓民为贵、君为轻者，不过形容之辞而已，其意但欲息君主之暴行，而以仁义之道施之于民也。至于为王侯者，仍有神圣不可侵之大权，安得谓之机关。况曰贵曰轻之语，本非所以表示主权（即统治权之主体）及机关之意也。故以孟子为主张民主主权论者，是徒饰辞之自娱而已。”

孟子的民本说与近代民主思想的关系，无论赞成与否，说者用以裁量的都是欧洲的尺度。面对上述质疑，署名“中季子”的作者辨道：“孟子平日所称为模仿、号为典型者，非尧、舜、禹、汤、文、武之侔乎？”这些古代的圣贤明君均“以民之志而行者也”。“孟子之所以采为政治之龟鉴者，实有见于民望之重而已。质而言之，治者之权与位乃国人与之者也。是故以民为权力之渊源与主权发动之处，固其所也。所谓民为贵、君为轻者，岂啻一形容辞而已哉。谓君主为民生之统治机关，吾未见尚有疑义也。历史上明明有其事实，孟子亦不过述历史而已。”^[11]由此证明中国确有实行民权的历史文化基因。

在普遍被视为专制对立物的背景下，共和思想的弥漫，直接推动了反对帝制和一切专制的社会风潮。由浙江中学堂退学生创办的《新世界学报》将中西人物进行比较，其中之一，是以尧、舜比拟华盛顿，指“华盛顿当八年血战之后，脱英人势力范围之轭，定美洲共和民主之局，联合十三州，制定宪法，于是民政之基础日渐巩固，迄今组织益密，遂为世界第一完全无缺之共和国”。本来是大地诸强国中最后进的美国，土地新辟不过数百年，国家新建不过二百年，其政治组织与法律制度皆新创造而无成例旧轨可循，“然而立宪法建共和政体，使欧西诸国闻风震动，争起而蹶其后。……彼华盛顿者，亦世界之骄子也”。将美国后来居上完全归功于华盛顿创建共和新制。中国的尧舜与美洲华盛顿的时代不同，“立今日共和民主之世界，而上溯贵族君主混合之政体，其点质之不相融合，虽入一炉以冶之，而不能溶”。尽管如此，“尧、舜者，帝政初发达之时代之最要素之人物也，华盛顿者，民政初发达之时代之最要素之人物也。中国无尧、舜，帝政必不能确立，美洲无华盛顿，民政必不能开辟。必祖尧、舜而黜华盛顿者，是谓旧学之奴隶，必翹华盛顿而抑尧、舜者，是谓新学之奴隶，必附会尧、舜与华盛顿者，是谓奴隶之奴隶”^[12]。虽然时代有别，制度各异，但以华盛顿比中国理想时代的圣明君主，已是对共和民主的高度推崇。

1903年初，梁启超离开日本赴美洲考察，《新民丛报》的激进倾向有所减弱。不过有人仍然坚持言革，继续鼓吹共和。马君武以“法国人那盖（Naquet）著《共和原理》，以鼓吹共和主义，中多明白痛快之论，截译其论秩序者一节”，刊于报端，借由译文明白宣布：

“天下最危险之国，莫若专制国者，天下最安宁之国，莫若共和国者。共和国既有天然之秩序，其国民各以己意择职业，国中之行政者，皆代行民意者也。故共和国之根基最完固，不可破坏，不可动摇。而专制之国，常借兵力以维其人为之秩序，一旦力绌，则人民得起而覆之，异族可入而服之，故世界上最危险之政府，莫专制国之政府若，世界上最危险之人民，莫专制国之人民若。”有鉴于此，“吾敢决一言于此曰：天然之秩序者，惟国民有主权之共和国乃有之，而断非专制君主国之所能有也。共和国之政府由民意立，共和国之法律由民意出，其兵力以保卫人民而非以防制人民也。专制之国反是。然原夫专制政体之所由生，则因其国民之至愚，故国民一日不愚，则专制之政一日不能存”。“共和国之国民，必须受普通之公教育。玛志尼曰：吾侪以重造意大利国为天职，以建立共和国为目的，以革命为手段，以破坏为宗旨。虽然，吾侪不可不谨记一言曰：教育与破坏并

行，无教育之破坏，乃野蛮之破坏，而非文明之破坏也。若是，则吾侪建立共和国之目的，将永世而不可达。”^[13] 这些话语虽然译自西书，却是马君武本人的心声流露。

像马君武这样正面鼓吹共和的文字，此时在《新民丛报》上已不多见，可是各省留日学界的报刊陆续创刊，接续了梁启超等人共和革命的理念和宣传，并开始探讨共和制的利弊得失，看法也有类似梁启超之处。如《江苏》载文论政体进化，指“政体之种类，可大别之为二，曰少数政体，曰多数政体。前者之政权，或在一君，或在贵族，或君与民共之。幸福所被，至为隘狭者也。后者之政权，或在民，或君与民共之，幸福之范围亦广被多数人者也。孰优孰劣，虽因时而异，世运既进之后，则自以后者为优。何也？后者能发达多数人之智识、道德及活动力而利用之也”。

所谓多数政体，不论是民主还是君民共主，民皆有参政权。作为多数政体之一的民主政体，包括共和政体（如法、美）和民主专制政体。后者“委一人为大统领，界[畀]以权力，使治国家，而不以议会为代表国民主权之主要机关者也。立共和政体而民智民德有所不足者，每易变而为此。何也？专制之国，国家与社会分，国权在君主，其弊在以贵凌贱。共和之国，国家与社会合，国权公诸人民，社会各级因利冲突，无策调和，惟以人数众寡决胜负，而议会中占多数者常在贱民，故其弊又在以贱凌贵。……理之曲直，[初]不得以人数多寡颠倒之。……当下流人民刻剥中流以上人民之利益，或恃众要求，欲行所谓共产主义国家劳动主义之时，中流以上之民必早夜协谋，求有以变之，而下流人民虽多数，亦不能保持纯粹之共和政”，贵贱相凌，各有偏蔽。

专制、共和之外，还有立君共和政体。“以民意立君主，使议会监督之而行政者也。共和其精神也，立君其形式也。共和国民之意也，立君外界之势使之不得不然也。”比利时即为此种政体。^[14] 立君共和政体的概念，使得与帝制对立的共和可以与君主共存，成为辛亥之际试图调和帝制与共和的学理凭借。

尽管作者对于共和政体的弊端有所指摘，却并非倾向于君主立宪政体，他在专门论述立宪君主政体时明确宣称：“就世界之政体以言，惟民主政体庶几平等之旨，若立宪君主政体，虽较专制政体超胜万倍，方之平等之旨，则相去犹甚远也。……故立宪君主政体之存乎

今日，亦不过一时小康之现象，未必能长与终古也。”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英、德、日三国当中，英与民主国无异，德次之，日又次之，因此，国人不应崇拜日本政体。

在第四节“论民主政体与立宪君主政体之差异”中，作者详细列举对比了两种政体的优劣：一、国家与宪法之关系。民主国以革命扫除君权，由人民主权定宪法，宪法以外无国家。立宪君主国仍延续君权于主权之中。二、权力之所在。立宪君主国宪法以外权力归君主，民主国全由民意。三、统治权之分合。立宪君主国国家权力仍属君主，其委任机关不过施行之事务，统治权绝不分离。民主国统治权分属数机关，间有统治权委之一人者。四、宪法之改正。立宪君主国君主有改动及采用与否的全权。民主国全由民意，即使立有君主，亦不敢是非之。五、议会之地位。立宪君主国议会为从属机关，是被统治者，民主国为统治者。六、意思之自由。民主国以民意立国，议会代表国民，议会之意思即国家之意思。立宪君主国则相反。逐条对比之下，得出的结论是：“统观以上各条，则民主政体与立宪君主政体之优劣，可以想见。世之君子欲改革政体者，其亦当知所适从矣。”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在第五节总结道：“吾望吾国之政体，不十年一跃而列于吾上所罗列之诸类，吾又望其一跃而至诸类中之最胜者。诸类虽同为多数政体，君权民权犹有强弱大小之不齐也。”具体而言，“幸哉吾国！吾国实有由专制而变为民主之大希望者也。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一）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二）专制之毒受之独久，反动力当独强，以物理论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三）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也。要之，具此三因，旧染之污必去之净尽，而新国既立，人皆平等，更无人敢出而独揽大权。二十世纪中，必现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并且大声疾呼：“呜呼，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15]这样的呼声，与邹容的《革命军》形成相互激荡呼应之势。

有的文章以答疑的方式阐述破除专制与建设共和的关系：“或者曰：组织民族的国家，建设新政府，为强立中国之基础，为保存汉种之本根，是固然矣。然凡一国之内，同时不能并立两政府，专制政体之下必无共和政体出，旧政府之下必无新政府立。故东西爱国之士，欲开共和政体，必先破专制政体，欲立新政府，必先倒旧政府，是不

得不然之阶级也。今吾国专制政体未破而遽嚶嚶然言共和政体，旧政府未倒而骤皇皇然言新政府，无乃太早计为。”其答案是：“非我先有共和政体之精神，何能破专制政体；非我先有新政府之摸[模]范，何能倒旧政府。故吾扬共和政体之精神，即为破坏专制政体之先声；我树新政府之模范，即为倾倒旧政府之根基。”新政府应为国民政府，“一、政府必由全国国民所组织，而以全国国民为政府之实体；一、政府必为全国国民之机关，而以全国公共事务为政府之职掌；一、政府必以全国国民为范围，而专谋全社会幸福为目的。具此三义始得合政府之性质。故一国家一民族所有之政府，实行此三义者，其国家必强，其民族必荣。苟缺其一二，或竟非其国家其民族之所有，则虽有政府不如其无之之为愈。国之蠹也，民之敌也，国民否认之可也，改革之可也。盖背此三定义之政府，非我国家民族所有之政府，固不得认为国民全体之政府”^[16]。

《湖北学生界》载文承认共和与立宪本质无异：“立宪国可与共和国较优劣，专制国决不可与立宪国角胜败，何则？立宪国与共和国之国民同，专制国与立宪国之国民异也。今之时代，共和立宪几遍全球，专制国之国民触之立败，盖亦天然之真理维持主宰于无形。……然则欲不为今时代之立宪国与共和国之国民所支配所宰割，其必自为立宪或共和而后可。”话虽如此，中国仍然没有立宪的可能，原因就在于“满清政府不可与言立宪也，以彼抱宁送邻邦断不肯落家奴手之宗旨，其尚能与我国民一时安耶？呜呼，我国民宜速持定主义，破坏倒灭满清之政府，而自建政府，毋待今时代之立宪国与共和国之支配之宰割纷纷而来乃始悟也”^[17]。所以《国民日报》认为：“政治之进化也，由专制以进于立宪，由立宪以进于共和，则是共和者，专制之对敌乎？吾为之说曰：专制者，共和之母也。”^[18]

[1] 伯泉来稿：《论中国非专制政体》，《大公报》1903年9月7日，第1—2版，“论说”。

[2] 《说公》，《大公报》1903年10月8日，第1—2版，“论说”。

[3] 豫章吴煥稿：《压制释放利弊论》，《大公报》1904年1月14日，第2版，“论说”。

[4] 《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得失利弊论》，《申报》1903年11月29日，第1版。

[5] 《告诫学生》，《申报》1903年9月25日，第2版。

[6] 《湖南巡抚赵大中丞劝诫高等学堂肄业生文》，《申报》1903年7月27日，第2—3版。

[7] [日]葛冈信虎讲义，马毓福等编次：《法制大意》，湖北游学日本师范生编：《师范讲义》第3册，湖北教育部1901年初版，1903年发行，第3页。

[8] 耐轩：《立宪论》，《政法学报》癸卯年第一期，1903年4月27日，第32—33页，“学术·政治”。

[9] 耐轩：《立宪论》（续第一章），《政法学报》癸卯年第二期，1903年8月13日，第5页，“学术·政治”。

[10] 《湖北哲学》，《汉声》六月分（即《湖北学生界》第六期），1903年7月24日，第7页，“学说”。

[11] 中季子：《孟子之政治主义》，《政法学报》癸卯年第一期，1903年4月27日，第100—101页，“杂纂·他山集”。

[12] 黄式苏：《中西人物比较·尧舜华盛顿》（续第四期），《新世界学报》壬寅第六期，1902年11月14日，第6—7、11—12页，“史学”。

[13] 马君武：《欧学之片影·天然之秩序与人为之秩序》，《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27日，第2、4—5页，“丛录门·谈丛”。

[14] 竞鑫：《政体进化论》，《江苏》第1期，1903年4月27日，“学说·政法”，第29—37页。

[15] 竞鑫：《政体进化论》，《江苏》第3期，1903年6月25日，“学说·政法”，第39—53页。

[16]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第5—6页；第6期，1903年9月21日，第9页，均“学说·政法”。

[17] 《日俄之战争如何·日俄两国之政体及国民如何》，《汉声》七、八月分合册（即《湖北学生界》第7、8期），1903年9月21日，第23—24页，“外事”。

[18]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国民日报汇编》第3集，第31页，“社说”。该文初发表于1903年10月21日。

第三节 新的共和先驱

王学庄和李恭忠先后注意到，共和概念从思想到政纲，成为辛亥时期反清革命政治诉求的经典口号，邹容的《革命军》起到关键作用。《革命军》借资取材于梁启超等人的著述甚多，通篇的重点在于鼓吹革命，只是结尾处提出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变更政体，建中央政府，各省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州县府举议员若干。新政府的国家“一、定名中华共和国。一、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一、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一、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一、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并且高呼口号：“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1]

《革命军》大声疾呼的“中华共和国”，排除所有关于共和的学理歧义，简捷明快地提出了适合民众运动的最大公约化口号，同时解决了革命的正当性及其目标的鲜明性两大难题，美国式的共和理想蓝图成为革命天经地义的精神支柱和制度支撑。正是在《革命军》迅速传播的背景下，孙中山于1903年12月13日在檀香山的两次演说中，将共和与民国联系起来，宣称：“我们必要倾覆满州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2]

在此之前，孙中山的中文概念从来不用共和来表达其政治制度的追求。李恭忠进而推论，甲午前后有关孙中山“共和”表述的记载，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当时日文“共和政治”一词既可对应英文republic，也可对应federal government，孙中山的理解，可能更偏重于“联邦主义（Federalism）”、联邦建国，而不是“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民权宪政。戊戌之后的几年里，随着抨击君主专制、力倡民权共和思潮的兴起，孙中山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对“共和”的理解乃逐渐偏重于“民权”方面。

孙中山的republic无疑包含着联邦主义^[3]，创立合众政府的说法就是明证。此前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的笔谈，也有类似思想。其时他与日本、英国、法国驻亚洲外交官及殖民当局接洽，均表示要在南方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再联合十八省为一大联邦共和国。可是因此怀疑孙中山缺少民权思想，却依据不足。严复就以合众作为国民为政的同义表述，其对应的西文词汇并不是republic，而是“德谟格拉时”。孙中山不使用汉语的“共和”，恰好是因为汉语“共和”存在较多的歧义，不能充分准确地表达其民权观念。熟悉西文和西书的孙中山，更加不必受梁启超等人转自东文的宣传，才接受民权思想。

依照时间顺序全面梳理孙中山早期的民权思想，并非难事。其合众政府明确反对专制，伦敦蒙难后的一系列表态又强调学习欧美文明，主张自治，建立贤能政府，都不可能没有民权仅仅是恢复汉人政权就能够实现。重返日本后，他与宫崎寅藏等人的谈话表示“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并且批评“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说法为“不谅情势之言”，认为“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其主要依据，就是中国多自治自议自理之民。

这段话原意出自1902年出版的白浪庵滔天（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の夢》，中文则系黄中黄（章士钊）翻译的《孙逸仙》（1903年《荡虏丛书》），与目前留存的在此期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人笔谈的手稿相比较，找不到直接相关的内容（笔谈稿可能是残稿），因而仍有时间、语境变化，以及能否准确还原的问题。不过，从前后相关言行看，其意思的确与孙中山的思想一脉相承。

1900年孙中山致书港督卜力，提出平治章程，要求各省成立自治政府，由省议会公举本省官员。1901年春与美国《展望》（The Outlook）杂志记者林奇（G. Lynch）会谈，后者确切了解到：“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这是孙逸仙的愿望。”^[4]同年发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关于如何筹划东亚治安之策的问题，虽然以秘密婉拒回答，仍坚决表示：“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5]1902年8月为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の夢》作序，对于后者“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的义举大加赞赏。^[6]

除联邦主义的意涵外，孙中山的共和，归根结底还是与民权相关。他的联邦论其实包括两方面考虑，其一，破解欧洲列强联手制我，万一不幸如此，“必先分立各省为自主之国，各请欧洲一国为保护，以散其盟；彼盟一散，然后我从而复合之。……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7]。其二，革命之际各地自立，要防止豪强割据称雄，陷入长期战乱。因此，中国革命必须迅雷不及掩耳，同时以联邦共和的中央政府驾驭各地英雄，避免野蛮割据的纷扰不已。这也就是革命程序论的初步设想。后人论及革命程序论，受后来时势变化的影响，着重于批评训政的非民主，殊不知孙中山的初衷，恰好是要解决由军政过渡到民政，防止趁乱而起的豪强怀抱帝王思想，割据称雄，帝制自为。早在1902年，他就对留日学生戢元丞等人谈及：

□□之政府易覆，外人之干涉不惧，所可虑者，吾中国人具帝王之资格，即人怀帝王之思想，同党操戈，外族窥衅，亡吾祖国之先兆也。吾细思数年，厥有一法：夫拿破仑非不欲为民主也，其势不能不为皇帝，使华盛顿处之亦皇帝矣。华盛顿非必欲为民主也，其势不能不为民主，使拿破仑当之亦民主矣。中国数十行省之大，欲囊括而恢复之，必有数统帅，各将大军数十百万，各据战地，鸣叱往来。即使诸统帅慕共和之治，让权于民，为其旧部者，人人推戴新皇，各建伟业，咸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陈桥之变所由来也。欲救其弊，莫若于军法地方自治法间，绾以约法。军法者，军政府之法也。军事初起，所过境界人民，必以军法部署，积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远战地，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约以五年，还地方完全自治，废军政府干涉。所约如地方应设学校、警察、道路诸政如何，每县出兵前敌若干，饷项若干。五年程度不及者，军政府再干涉之，如约则解。此军政府约地方自治者也。地方出兵若干，饷若干，每县连环会议，约于军政府，有战事则各出兵饷赴前敌，战毕除留屯外，退兵各地方。军帅有异志，则撤其兵饷，地方有不出兵饷者，军政府可会和各地方以惩之。此地方自治约军政府者也。军政府所过，地方自治即成，而以约法为过渡绾合之用，虽有抱帝王政策者，谅亦无所施其计矣。^[8]

孙中山这段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其联邦主义的主要考量，正是中国如何通过革命达到民权。

在汉语表述中不使用“共和”概念，并非因为孙中山缺少民权思想，恰恰相反，是由于孙中山觉得“共和”受古代贵族共和以及共和

专制的牵扯，不能准确表达民权民主的观念。他在《驳保皇报书》中反驳该报主笔“立宪者，过渡之时代也；共和者，最后之结果也”的说辞，“推彼之意，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今彼以君主立宪为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于民主之域也”^[9]。孙中山反对阶段论，主张一劳永逸，为众所熟知；而他用民主立宪代替共和的表述，尤具深意，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后来革保双方论战，汪精卫等人对此有所说明，他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中就“民权立宪”的概念特意解释道：“所以不云共和立宪者，以共和一语，有广狭二义，其广义则贵族政治，亦包含在内，故不用之。”^[10]论战中凡是涉及学理的部分，汪精卫等人坚持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作为“共和”的正式表达，当源自孙中山的认识。

正因为孙中山的思想与今义的共和一脉相通，尽管其政治主张的表述概念开始并非共和，还是被鼓吹共和的国人视为共和的先驱。柳亚子编撰《中国灭亡小史》，其第四章《民族主义之风潮》丁《孙佚仙》，依据《三十三年之梦》叙述孙中山的生平事迹，称：“人虐天饕，英才尽矣，独佚仙热心共和，舍身民族，虽遭蹉跌，志不稍懈，十年磨剑，树独立之旌旗：九世复仇，理不平于种族。他日驱除异类，光复旧疆，扬自由革命之潮流，为东大陆之华、拿，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11]

具有上海中国教育会机关报性质的《警钟日报》，在1904年12月连续刊出一批“共和”志士呼应孙中山思想和推崇孙中山本人的文章。8日至10日，该报连载署名“共和复汉生”的《论中国民族主义》，12月20日，又刊登“共和”来稿《〈孙逸仙〉书后》，其中说：

今天下救时之彦，爱国之儒，万喙一辞，众声同应，莫不曰民族主义哉！民权主义哉！奔走呼号，歔歔太息。独立之谈，喧阗于学校，共和之议，哄动于市朝，宜若可以挫异族之凶锋，倒专制之弊政矣。……夫逸仙，粤党之魁杰，西学之巨擘，固夙倡导民权自由之说，而最富民族思想者也，生平执持民族主义，欲挈两广为根据，以光复祖国，建设共和政府，以与世界列强相竞争。……夫中国民族精神之销亡久矣，甲午乙未之变，文恬武嬉，举世熙熙皞皞，歌舞太平，狗苟蝇营，以奔竞富贵禄利之私，偃息于异族专制羁勒之下。而孙君观察世变，独抱殷忧，倡革命于举世不言之中，不惜其头颅性

命，以救国民而图自立。事虽不成，而其识量之大，气魄之雄，固已迈绝等伦矣。……夫士当热心任事时，志大气锐，视天下无不可为，及一旦失败，则乃心灰气沮，嗒然而丧其所守者，往往有之。而能奋进不止，力自振起，以前奔者盖鲜。逸仙虽暂屈伏，所志未就，然方如行星初出，其成败尚不可测，而其志趣实力则固方驾华、拿，并驱加、玛，而非常人所能及矣。噫乎某氏有云：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而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

有鉴于此，作者无限期待“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人物，超越前古，而必悬孙以为之的。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使得“皇皇汉族，庶有复兴之一日”^[12]。

24日，该报再刊登“新中国主人”的《论共和政体》，又说：

共和政体者，专制政体之反动力也，有专制政体，而后有共和政体，未闻有共和政体而后能生专制政体也。故夫共和者，由专制而发达，专制者，由共和而消灭者也。盖专制者，人群所必经之阶级，若无此专制之压力以激起其反动力，则民情不奋，民情不奋，则共和政体亦无由而生。猛虎之择肉而食，人人所惧者也，久之，则人类皆为其所灭矣。于是计无所出，不得不出死力以斗之。究其极也，猛虎卒退避于山林，而人类乃发达于世界。此其故何也，彼众人确知猛虎之势既炽，而吾辈无数之性命必无辜也，故不如群策群力以御外侮，以购他日无量数之幸福。所谓人者能群之动物也。此共和政体之所以成立也。

呜呼，吾念及此，吾不得不为专制政体之可危，又不得不为共和政体之可恃，且国民既尚共和，则爱国之热血厚，而团结之力量足，故彼二国（按即法美两国）之民，皆能自治其地方，自强其国家。盖彼以为国家者，我之国家也，非他人之国家也，既为我之国家，则我宜保护之而勿使之亡，爱国之热血由此而日以厚，国民者，我之国民也，非他人之国民也，既为我之国民，则我宜爱怜之而勿使之散，团结之力量由此而日以足，国势赳赳乎日上，立于竞争之场，莫之敢侮。呜呼，非共和政体之功，效不至此。

中国国民深受独夫民贼、贵族、官吏以及至秽至贱之官侍宫妾的压制。“然未尝有一共和政体之组织者，何也，一则以中国民气衰弱，比之法英等国相去远甚，故其受压制而不知不觉，蠕蠕然度数十载寒暑而已。若语之以共和政体，则彼非特骇然惊异，且目之为大逆

不道矣。一则无共和政体之资格，故虽有影响而不能组织。”其时国人分为立宪主义和共和主义两派，前者以共和政体难免流血惨祸，后者以君主、贵族梗阻其间，国民不能进化。中国君不能分权与民，民欲得立宪政体，仍须演革命惨剧。既然土地、金钱都为国民所有，应当自治自理，不必让与民贼。民贼的根据地本在满洲，与中国无涉。此三百年中之所以受其荼毒，不过因当时一二之卖国奸贼贪利媚外，与夫民之不勇而已。如今强邻环伺，民贼无力保中国，且非中国人，不爱吾中国，黄帝子孙不能任由民贼奉之外人，必须革命，实行共和政体，结大团体，养成共和国民资格。^[13]

一面推崇孙中山为共和先驱，一面以共和为政治极则，二者相辅相成，一般不大使用“共和”一词的孙中山，很快就被拥戴为中国共和革命的北斗旗帜。

[1] 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1—364页。

[2] 《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227页。

[3] 参见桑兵《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台北：“国史馆”编辑出版：《近代国家的型塑：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2013年6月，第83—106页。作者2011至2012年在海峡两岸分别召开的相关研讨会上的发言及提交的论文，已分别提请注意孙中山共和观的联邦色彩。

[4] 《附：与林奇谈话的报道》（1901年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1页。

[5] 孙文逸仙稿：《支那分割保全合论》，《东邦协会会报》第82号，1901年12月20日。

[6] 《〈三十三年之梦〉序》（1902年8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6页。

[7]《与宫崎寅藏等笔谈》（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1—182页。

[8]《孙文之言》，《大陆报》第2年第9号，1904年10月28日，第55—56页，“谭丛·如是我闻”。

[9]《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6页。

[10]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1906年5月1日，第1—37页。

[11]中国少年之少年编：《中国灭亡小史·第四章之续》，《复报》第8期，1907年1月30日，第17页，“历史”。

[12]共和来稿：《〈孙逸仙〉书后》，《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0日，“征文”。

[13]新中国主人：《论共和政体》，《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4日，“外论”。

第三章 革保论战与共和观念的演进

清季革命党与康梁一派的论战，历来是辛亥革命研究的要项重点，已有成果甚多，以至于一般不再被视为可以进一步探究的对象。不过，仔细梳理相关材料，斟酌论战各方各种文本的完整意涵，至少在以下两方面仍然存在空间：其一，摘取片断材料形成的论据，未必契合前人的本意，以及支撑后认的论点，以偏概全甚至误读错解之处所在多有。其二，由于相关学理准备不够，对于双方争执不下的关键问题如共和的历史意见有些隔膜，从特定立场出发的时代意见进行是非正误的判断，存在简单化现象。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当为认真倾听当事各方的主张和道理，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以求认识更上层楼。

第一节 众说纷纭的选择

就汉字概念而言，梁启超应是倡导传播“共和”观念的前驱，孙中山则担心与中国固有“共和”相牵混，更多使用“合众”。不过，梁启超无奈告别共和与孙中山顺势高揭“共和”在时间点上几乎重合，这使前者得到国内士绅的赞同，却失去青年学生的拥护，而后者则成为中国革新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共和先驱。与此同时，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尤其是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无情事实，有意采取君主立宪政体，派员赴各国考察。尽管梁启超否认自己是要转而主张君主立宪，但在革命党乃至一般趋新者看来，其转向则不无为清廷的预备立宪鸣锣开道之嫌，从而坐实了孙中山此前对梁启超的揭露批判。

伴随着立宪呼声的日渐高涨，国内各报纷纷响应，竞相鼓吹。《大公报》举办了“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的征文活动，其中采用何种政体的问题成为议论的焦点。所评选出来列为一等的文章，署名“史彬”者称：宪法为全国之法典和利益之所在，君民共享其成，无偏无倚。“全球政体，不外三种，曰专制，曰共和，曰立宪。专制者君权过尊而民情不免壅塞，共和者民权太重而政柄未免下移，独以君主之国，而行立宪之法，则有利无弊，推诸万世而可行。”

署名“效灵”者则说：“世界之政体有三，大别曰君主专制政体，曰君主立宪政体，曰民主立宪政体（即共和政体）。今世之强国十数，除俄罗斯为专制政体，美、法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然则君主立宪者，政体之完全无缺者也。中国不幸而为专制政体，自十余年前志士即以变政倡言于下，无如执政者以为不利于己，必多方遏之。自癸卯、甲辰间执政者知专制之不可终其位也，于是立宪之机始渐露于上矣。终狃于俄强之故，遂渐以息。今自日俄交战以来，日屡胜俄屡北，且内乱迭兴，是胜负之数，实寓于政体之中，虽结果不可逆料，然俄必至一蹶而不起。殆至俄蹶，而我政府始翻然改计，不亦晚乎。今为政府告曰：今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嬗代之时代也。征之列国，知世界必同归于立宪而后已。”^[1]应征者大体掌握了政体的基本原理，明确反对专制，也不以共和为然，而主张立宪，名为各抒己见，其实显然反映了《大公报》的立场态度。

与君主立宪大张旗鼓地造势相对，共和的潜流在学界却是暗潮汹涌。各地学界风潮风起云涌，令人慨叹：“小孩能知共和主义，可畏哉！”^[2]有人趁机对坊间理想化共和的情形进行针砭：“近来误解共和意义者，以为共和国人人对于职权上立于对等地位，此最足以误事。究之共和国之总统，其范围内之行政权力，绝对不受束缚，不过执行之次序，后议院一步而已。”^[3]模糊共和与专制的差异，以降低共和追求的热度。

也有人附和梁启超的主张，对于以共和、君宪为救世良方均不以为然，“吾中国之政教，可以一语蔽之曰：寡人专制。近今以来，国势日绌，欧美文明，递相输灌。魁垒之士，率以激切之言辞，昌言于众，辄曰谋多数治安，立共和政体。等而下之，则曰共和之制，去中国过远，宜降格以求之，取彼开明，破吾积习，则莫如立宪。于是嚶嚶之声，遍于草野，莫不曰，定国是！定国是！立宪而后中国可兴也。……吾虑其说之必不能行，即行矣，亦必不能奏效”。进而提出：“吾欲以一言易之，谓中国兴而后立宪。兴之奈何？则莫如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其最初之术，则以专制之力，行强迫教育之制，其次若工业，若路矿，若官制，若服色，其不适于生存者，一以专制之力划绝之，其有合于强国者，一以专制之力提倡之。至若民风习俗，万不能以专制政令易之者，则以专制之教间接而行之。方针划然，操之自我，自上而下，雷厉风行，不出十年，中国其庶乎可立宪矣。”^[4]也就是说，立宪可以作为理想的目标，而不宜作为即时的现策。利用专制之力进行改革，可以事半功倍。问题是，专制若能主动改革，则立宪变得可有可无，而专制又何必进行于己不利的改革。这正是稍后革命党和保皇派论战的焦点之一。

1905年，清廷派员到与中国有约之国考察政治，载泽与戴鸿慈赴英、俄、日、意、奥、比、荷兰、瑞典、西班牙、土耳其、丹麦、葡萄牙等国，徐世昌与端方赴法、美、德、瑞士、墨西哥、巴西、秘鲁等国，“凡属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之政，皆一一考查，以为实行立宪地步”^[5]。此举意味着清廷有意变政，但是具体依照哪种蓝本，选取何种政体，尚无定论。这使得关注朝廷动向的各方争相发表意见，试图对决策取舍施加影响。

在朝野上下热议立宪的时趋之下，关于共和、立宪、专制以及国体政体的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热点。反对立宪者，一般而言更加反对共和，所据与告别共和的梁启超有所关联。其主要理据就是无论何

种国体政体，总以适合本国国情为宜。附和政体无所谓好坏唯以适合与否为准之说者不在少数，指各种国体政体虽有不同，却各有利弊，中国历史上“当闭关之世，不知国家之政体，有所谓专制、立宪、共和种种之分也，但以己国所行者为不二之理，非此即不能合群立国而已”^[6]。

从国体政体的角度考察，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对立远不像政治宣传中专制与共和那样优劣分明，因为“君权国之权力自君主一人握之，虽名为一人，实则有数人以干涉之、辅助之，而法律上执权之名词，则惟国君一人而已。君权与共和之别，即别之于握国权者之人数，君权国以少数人握国权，无论直接、间接皆然，而共和民权国以总数人民握国权，无论直接、间接皆然。所谓总数、少数，皆本体之一部分，非国家之主体，不过为国家之机关而已”。颇有罪恶感的君主专制，与共和不过是程度有别，而非根本有异。

世界上国家的种类“有共和者，有君权者，如美之合众国，纯粹之共和，德之联邦，含有君主共和两国体”。而历史上名义与实质未必始终一致。“拿破仑既即位之三年，变成终身大统领制度，又三年，其国体则为共和民权国，其政体则为共和君权国。自法理言之，以拿破仑一人专制之手段代表共和国，自事实上言之，拿破仑实为开明专制君主。”^[7]由此反观中国“开国数千年，唐虞三代时虽集权于中央，而主圣臣贤，无不以国民为重。有庠序之制，则民知教育，有井田之制，则民知急公，有悬书读法之制，则民知奉法。至于国有大政，则谋及庶人，选举人才，则始于乡里。即曰统治于一君之下，实俨然如宪政共和之政体也”^[8]。

围绕立宪与否以及采取何种立宪体制的争议，暴露出国人政治学说的浅薄，有人慨叹：“交通亘数十年，而国人犹茫然于若者为共和，若者为立宪，若者为专制政治，若者为立宪政治也。”^[9]于是新一波的政治学常识普及就此展开，之前已经反复论道的新学理重新被刊诸报端，告诉人们：“泰西国体，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君主为政之制，即今之专制而无宪法，若土若俄是也；曰德谟格拉时者（一名公产，又名合众），民主为政之制，即今之共和而立宪法，若法若美是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君民共主为政之制，即今之君主而立宪法，若德若英若义若美是也。然专制之政体，下情或壅于上闻，而共和之政体，上轻而不免于下重，均不能有利无弊。”^[10]虽然是旧

调重弹，但从前大都是非法宣传，如今是合法鼓吹，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作用当然不同往昔。

更为重要的是，之前无论保皇派还是革命党，传输学理或隐或显都有改造国家甚至反清的意向，因而偏重于倾覆清廷的共和，如今则多少有些奉旨行事的意味，取舍也要顾及朝廷的旨意，国体政体的选项需要平衡君与民的利害。“国于地球上者以百数计，苟其具独立之资格、有平等之权力者，则必有一定之国体，或为君主，或为共和。因其国体之不同，遂有政体之区别，政体在统治之权力动作于形式上者是也。统治权之所在各异，故其政体亦异，约分之，有三种焉。统治权之在于人民全体者谓之共和政体，在于数人者谓之寡人政体，在于一人者谓之君主政体。”而君主立宪政体最适于中国。^[11]这不仅因为适合中国的情势，也符合世界的潮流。载泽等人考察法国的结果，就发现“而后知之其立国之体虽有共和之称，其统治之权实具帝国之制，其条规则整齐画一，其精神则固结流通，遗其粗而撷其精，其可以甄采之处良非鲜少”^[12]。以共和媲美帝国，则帝国本身更具优势。

有人对比中西政治，认为“今日中国，虽为纯然专制君主国，历代主权者，均以绝对专制政治施于人民，自有史以来，未曾一行共和政治，又未曾一立宪法以限制君权，数千年之历史，不啻为人民服从君主之日记。……然又由一方观之，如西洋诸国，于某时代社会上特种阶级占势力，专权纵恣，压抑人民，则亦中国之所未睹”^[13]。此说指出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意在模糊与西洋的差别。

有人进而认为，中国古代未必没有共和、立宪的历史基因，“中国一专制国也，然夷考其初，固未尝以专制始。唐虞之世，人君出自选举，则俨然一共和之时代。夏商之世，询谋及于刍尧，则俨然一立宪时代，特其时尚未著有共和、立宪诸名称耳。嬴秦暴兴，古制尽废，汉唐以来，文纲日密，而君民上下之分遂判若霄壤，而专制政体乃日严而日备，举古昔所有共和、立宪之美意荡然无复少存”^[14]。

还有人鉴于“今日谈革命者主张共和，削夺君权，既偏宕而不切事情，而研究立宪者又拘之于君权之不可旁落，驯至阻遏其宪政，此中消息，关系甚巨”，专门著文讨论古代中国并无重君权之大义，力图化解双方的执拗。^[15]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人“就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二大义为我国人解释如左：（甲）君主立宪，开国会，予国人参政权，举议员，定法律，监督行政，而主权仍属之君主；（乙）民主立宪，国人公议，建设共和政府，举大统领为代表，而主权全属于国人”。并进而据学理为宣言，“更敬告我国人曰：中国之立宪为完全无缺之君主立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6]。也有人在欢呼中国之立宪“蓬勃哉”、“容易哉”的同时，意识到“立宪者，专制与共和之调和政体也。君主立宪者，迫于时势之风潮，不得不出于此，以为乱党之盾也”。动机已经可议，加上“国体不同，政术亦异”^[17]，实现起来不可能轻而易举。

凡此种种，都使得专制、立宪与共和的政体选择，成为朝野各方视线聚集的重大问题。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亟待从学理和情势各层面辨析清楚。

[1] 史彬：《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效灵：《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大公报》千号增刊，1905年4月13日，第3、4版。

[2]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6册）1905年3月28日，第33—34页。

[3] 佛苏：《论主张竞争者当知法制》，《新民丛报》第72号，1906年1月9日，第8页，“论说”。

[4] 谷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本社撰稿），《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1905年5月28日，第80—81页，“社说”。

[5] 《考查政治分途纪实》，《大公报》1905年7月30日，第3版，“时事要闻”。

[6] 《论日胜为宪政之兆》，《中外日报》，1905年5月21日，第1版，“论说”。

[7] 罗杰编辑：《国法学》，《法政粹编》第2种，东京并木活版所，1905年，第64、77、114页。

[8] 《论国民宜攻究政法》（录自《顺天时报》），《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乙巳年十一月，第4卷，1905年12月12日，第1页。

[9] 卢弼：《译宪法篇自叙》，《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8期，1906年6月6日，第1页，“别录”。

[10] 《论君主立宪政体之性质》（录丙午第一期《北洋学报》），《东方杂志》第3年第4期，1906年5月18日，第81页，“内务”。

[11] 《新编立宪纲要》，《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丙午年九月，第4卷，1906年11月2日，第6—8页。

[12] 《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泽公等奏陈在法考察大概情形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8期，1906年9月13日，第181页，“内务”。

[13] 《中国与立宪政治》，《大陆》第3年第22号，1906年1月4日，第1页，“社说”。

[14] 《论中国人民宜为立宪预备》（录自《顺天时报》），《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丙午年六月，第6卷，1906年8月18日，第7页。

[15] 《述古无重君权之大义》，《申报》1906年8月26日，第2版。

[16] 《以报辟报》，《大公报》1906年9月28日，第5版，“时事·本埠”。

[17] 《万国无和平之立宪论》（来稿），《申报》1906年11月6日，第2版。

第二节 大论战的前哨战

正是在舆论不言共和甚至非议立宪的背景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一发行，就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梁启超。汪兆铭的《民族的国民》指梁启超前后反复，“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义，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读波伦哈克之《国家论》，即颤声长号曰：‘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并大声宣言：中国“欲颠覆二百六十年来之贵族政治，当建民族主义；欲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当建国民主义”。国民是构成国家之分子，以自由平等博爱相结合，并本此精神，以为国法。“法者，国民之总意也。政府者，国法所委托者也。故曰‘法治国’，故曰‘立宪政体’。”立宪政体有君权立宪、民权立宪二种，君权立宪为政府与人民相调和。“立宪君权国之宪法，其中根据事实而不合法理之污点，皆国民所未尝以血涤而去之者也。我民族而持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以向于吾国之前途也，则其结果，必为民权立宪政体，可预决也。”而君权民权转移的关键，按照孙逸仙所说，在于实施约法。^[1]

汪兆铭用民权立宪政体作为共和的理论表述概念，当源自孙中山的认识。后者觉得“共和”容易与中外古代的贵族共和以及民权专制相牵混，所以相当长的时期里汉语表述不使用“共和”一词。在《驳保皇报书》中，他反驳该报“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的意思，主张跳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代，不必二次破坏，直达民主立宪的最终目的。^[2]与此相应，他用“民主立宪”代替“共和”的表述，旨在强调既然立宪，不必非经君主不可的道理，尤具深意。可惜这一重要表述迄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革保论战之际，汪精卫、胡汉民等坚持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作为“共和”的正式表达，在后续的论述和论战中，还有进一步阐释，并且成为具有严格意义的正式概念。

同样在《民报》第一号刊出的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方面断言：“幕不倾则日本不能有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也。中国舍改民主之外，其亦更有良策以自立乎？”另一方面却声称：“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

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3]此言颇为费解，不仅让梁启超以为抓到把柄，也令汪兆铭等人相当困惑。然而，尽管陈天华没有详细阐明其开明专制究竟何所指，从他所说以倒满为前提，民主为目标看，由革命而行的开明专制，与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军法阶段不无相似，而与梁启超主张的要求清朝施行开明专制完全不同。

《民报》第二号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着重反驳了“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的两大苦心，即“怵杀人流血之惨”和“惧列强之干预”。他认为，中国命悬旦夕，拯救之道，舍革命无由，“而革命与立宪，要非绝对的名词也。夫立宪为专制改良的政体，而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体之具也。求共和立宪以革命，求君主立宪亦以革命”。主张立宪论者声称，自下而上的改革会激发暴力革命，而自上而下的改革则能免于杀人流血之暴祸。中国要避免杀人流血之惨，“毋宁以其改革之权，奉之于上。而所以持极端的革命论，谓必并满人而斥之者，为卜其必非真爱国者之论也”。其实各国立宪，皆成于革命，连白种之间争自由独立立宪，也必须战争，黄种同此道理。满人不可能推诚布公地进行改革，改革之权，必操之于下。革命之际，列强一起而攫之，一必走而挠之，只有革命，才能免于瓜分之祸。况且列强不愿中国改革，无论立宪革命，都会予以反对。^[4]

《民报》第三号，胡汉民撰文阐释《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二条即“建设共和政体”。他认为，清政府为异族所有，固当倾覆，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亦必同时改造，而后可以保种而竞存。二十世纪要创设新政体，必思彻底涤除专制。中国前此屡起革命，无大良果，均以政体不能改造。与君主专制相反者为共和，“共和政体，广义有三：曰贵族政体，曰民权政体，曰民权立宪政体。兹之所云，盖指民权立宪之政，非独不同于贵族，亦与民权专制者亦大有别也”。各国立宪之难，在于须以平民战胜君主、贵族两阶级。而中国的贵族阶级自秦汉以来已经绝灭。最新法学者称立宪之前，必有开明专制，君主以植民权为目的，训练其民有立宪国民资格。中国汉唐即为开明专制，所以容易共和立宪。而革命后立宪，应求至公至良之政体，无须留改革遗憾。君主立宪有等差，易生阶级，排满立国，不可保留治人治于人的阶级分别。至于革命之际兵权与民权的转换，则由约法。^[5]此时梁启超仍然继续其俄罗斯之梦，从1906年1月至3月，他在《新民丛报》连载长文《开明专制论》，其第八章“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着重论述了中国何以既不能共和也不能立宪，而要开明专制。

“本章论纲凡三，一曰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之理由，二曰中

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之理由，三曰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前二排妄，后一显真。”

关于第一点，梁启超说：“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此其理，德人波伦哈克之说，最能为确实的证明。”波伦哈克的理论，梁启超前此已经详细叙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不避骈枝，再度引述。其主要观点，就是共和国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的国权者，所以调和各种利害的责任，只能由人民自己。如果没有自治习惯和团体公益心，势必内部纷争不已。在上无调节平衡力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民主专制政体。结论是：“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

这时梁启超对于波伦哈克的学说极为崇信，在他看来，“波氏之说，就论理的方面观之，其壁垒之森严也如此，就历史的方面观之，其左证之确凿也如彼，虽有苏张之舌，吾信其决不能难也。故持革命论者，如其毋假共和立宪之美名以为护符，简易直捷以号于众曰：吾欲为刘邦，吾欲为朱元璋。则吾犹壮其志服其胆，而嘉其主义之可以一贯也。而必曰共和焉共和焉，苟非欺人，必其未尝学问者也”。为刘邦、朱元璋，还可能缘此而得纯良的开明专制。否则“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梁启超的这番辩辞，如今听来颇有些强词夺理，似乎无论如何，中国都难逃专制的宿命。可是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只有易姓的革命，则其所说又并非强辩那样简单。对于孙中山试图解决专制循环的革命程序论设想，梁启超极不以为然，认为其言虽辩，无奈发动革命者及其佐命者，不可能有此优美高尚的人格。首难以后，万一群雄中有人破坏约法，则军政府的信用坠落，很难以道德责任加以约束。“发难以来陶冶成共和国民资格”一语，梁启超尤为反对，认定必须先有资格，才能建设共和政府，而中国人不可能先行具备共和国民资格。

何谓共和国民的资格，梁启超的解释是：“共和立宪国既终必归于议院政治，吾于是得一前提焉，曰凡国民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即其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而议院政治的要件第一是大多数人具有批判政治得失的常识，第二是有发达完备的政党。中国若采法国制，则浹旬之间，内阁可以更迭十次。若采美国制，则政策歧出，令大总统无所适从，否则相持而一事不能办，一律不能颁。如此，“吾不知政府复成何政府，而国家复成何国家也。吾于是复得一

前提曰：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也。吾于是敢毅然下一断案曰：故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今日中国政治非可采用共和立宪制者也”。用如此简单的逻辑推理判断复杂的政治情事，难怪梁启超的说理越来越难以令青年学生信服。

此外，梁启超还反驳陈天华所称中国国民事实上已有为共和国民之能力的论断，又指“吾国今日所谓地方自治，其性质及其方法，与当世法治国所谓地方自治者，截然殊科也。抑尤当知地方自治与中央共和，其性质又自有不同。盖中央共和，最高主权在国民（最高主权在国家，而国民即代国家行使主权者，故亦可谓之在国民），此外并无他机关焉，超然于国民自身之上者，则调和其利害冲突也甚难。地方自治，则别有掌握最高主权之中央政府以临其上，则调和其利害冲突也较易。故能为中央共和者，必能为地方自治，而能为地方自治者，未必能为中央共和”。说来说去，又回到起点：“一言蔽之，则其已能行议院多数政治者，其已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而吾国民前此未尝能行议院多数政治，故吾认吾国民前此实未尝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既未有焉，则今所研究者，为能否发生之问题，而非能否回复之问题也。”要想养成国民的共和资格，“以日本为例，则益知开明专制者，最良之速成教法也”。

对于《民报》所刊各文论点的相互矛盾之处，梁启超相当敏感，在他看来，陈天华主张由革命而开明专制再实行共和，与汪兆铭引述孙中山的军法、约法、宪法三程序论，“即其极矛盾者也。一谓军事倥偬中，即可以养成共和国民资格，一谓须经一度开明专制然后养成，其矛盾一也。一谓倒中央政府后即解兵柄，一谓建设后仍行军政，其矛盾二也”。并且语带讥讽地挑畔道：“两说者皆脆而易破之论理。今持乙说者，其人既已辞此世间矣，彼继续主持某报之人，能并代彼赐答辩否耶？”

显然，梁启超不无自得地以为抓住了革命党的破绽和软肋，于是敢于挑战同盟会的政纲，反对《民报》论者及其所戴首领乃至其党派人士“并张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三帆”，认为同盟会将社会革命与普通革命并提，目的是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其必无成而徒荼毒一方”。所以他“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万人共诛之可

也。”种族革命旨在复仇，与政治革命相冲突：“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6]紧接着，梁启超又发表了《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的长文，借陈天华之死及解读其遗书内容的机会，指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彼此不相啻衲，种族革命只能以君主专制为目的，而政治革命则以立宪、共和为目的。

梁启超如此推论，道理在于：“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而“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盖苟非诉于武力，而欲得种族上之政权嬗代，则必其现掌政权者，三揖三让以致诸我然后可。然此必无之事也”。共和立宪必须本于国民总意，其统治形式必须三权分立，而实际上很难形成国民总意，变成国民多数说。即使三权分立，真正自由意志的多数，也不易形成。尤其在中国，如1905年东京留学界罢课退学，本来没有多数之实，却能造成多数之形，原因就在于发表公意的机关及方法，未尝公平自由，而是加以有形的干涉，使得众人完全失去意志之自由，随波逐流。此事可以视为中国实行政治革命的表征，显示结果与共和的初衷相悖。种族革命之后实行共和，如有不同意见，势必以共和专制相加。因此新政府最终只能体现少数人的意志。

梁启超认为，历史上久困于君主专制的国家，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唯有继续实行专制，并且要加倍专制，才能安定国本。三权分立，为最高主权在国民的政治。久困专制骤获自由之民，革命后新建共和政府之时，要么不能长期坚持此政体而消亡，要么返于共和专制或君主专制。

在该文的附言部分，梁启超又将矛头指向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并对《民报》的六大主义逐条批驳，放言关于第二条建设共和政体“则吾此文及开明专制论第八章，已令彼之此主义无复立锥地”。还进一步讨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主张满洲于我，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更将其所说立宪与朝野流行的立宪加以分别：

吾之言立宪，非犹夫流俗人之言立宪也。流俗人之言立宪，则欲其动机发自君主，而国民为受动者。吾之言立宪，则欲其动机发国民，而君主为受动者。流俗人之言立宪，则但求得一钦定宪法，而遂以自安，其宪法之内容若何，不及问也。吾之言立宪，虽不妨为钦定宪法，而发布之时，万不能如日本之单纯的钦定之形式。若其宪法之内容若何，则在所必争也。故流俗人之言立宪，见夫朝廷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则欣然色喜，谓中国立宪，将在此役。吾之言立宪，则认此等举动，与立宪前途，殆无关系，即有之，而殊不足以充吾辈之希望，或且反于吾辈之希望。而所谓真正之立宪政治，非俟吾民之要求，不能得之。故流俗人之言立宪，欲今日言之，明日行焉。吾之言立宪，则以立宪为究竟目的，而此目的之达，期诸十年二十年以后。质而言之，则如流俗人所言，立宪不立宪之权操诸人，我惟祷祀以求而已。如吾所言，则立宪不立宪之权操诸我，我苟抱定此目的，终可操券而获也。

梁启超自信其关键断语滴水不漏，一以贯之，而革命党的意见破绽百出，前后反复。为此，他不惜现身说法，自认也是“一多血多泪之人，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血湔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其奈此二者决不能相容，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故两者比较，吾宁含垢忍痛，而必不愿为亡祖国之罪人也”。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坦言自己曾经是排满共和的鼓动者：“若谓倡此论者为有功也，则鄙人不能谓无微劳，若谓倡此论者为有罪也，则鄙人不得不负重戾。盖鄙人于数年前实此派中之一人，且其关系甚不薄也，鄙人宁不欲护其前说。其奈今所研究，确见其与救国之义不相容。吾将爱吾国耶？吾将爱吾前说耶？吾良知于此两者之间，必知所择矣，故决然舍旃而无复留恋也。”

文末梁启超“更缀数言”，希望当世有识者对其文有所教诲：“盖真理以辨而始明，况吾之浅识，岂敢谓所言之必当也。”不过，他同时声明：“有赐教者，苟依正当之论理，则鄙人深愿更相攻错。而或于其根本大端，不能箴膏肓起废疾，而惟摭拾一二词句间之讹缪以相诋讟，则考据家之碎义逃难耳。甚或为嬉笑怒骂之言，深文周纳以相责，则村姬之角口耳，酷吏之舞文耳，凡此皆无相与攻错之价

值，则恕其不报焉可也。”^[7]这不啻为公开向同盟会下挑战书，而且划下道来，使《民报》不能不起而应战。

[1]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第30页；第2号，1905年11月26日，第18—22页。《民报》第2号出版的时间，据影印本封面，与第1号相同；而据《宋教仁日记》（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124页），实际出刊应在1906年1月22日前后。

[2]《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6页。

[3]思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第49页。

[4]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第2号，第1—6页。

[5]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日，第9—11页。

[6]饮冰：《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1906年2月23日，第1—48页，“论著一”。

[7]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1906年3月9日，第6—73页，“论著一”。

第三节 民权立宪政体

1906年3月,《新民丛报》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单行本,进一步加强攻势。《民报》迅速做出反应,“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期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并拟定辩驳的十二条纲领,作为《民报》第三号的号外刊发,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共和与专制的对垒,成为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论纲的其余各条,均围绕这一核心逐级展开,如第二条“《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第三条“《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第四条“《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第十一条“《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1]大论战的帷幕就此正式拉开。

关于论战的详情,前人讨论已多,但是如以共和的概念及其解释应用为枢纽,仍有未尽之意。汪兆铭的《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直指《开明专制论》第八章论纲,针对所谓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的论点逻辑,首先要破波伦哈克革命不得共和反得专制之妄,其次须破中国革命不得共和反得专制之妄。梁启超指《民报》的《论中国宜改创共和政体》和《民族的国民》两文相互矛盾,且由美洲归来而梦俄罗斯者,皆由于波伦哈克。而波氏立说根据在于“共和国者,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之国权者也,故调和各种利害之责任,不得不还求之于人民自己之中”。自力不能调和,则势必酿成民主专制。波氏的国家论,以君主为国家统治之主体,以领土臣民为客体。人民利益相争,君主超乎其上,所以能以平衡的正义,调和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冲突。而共和政体为人民之集合体,与国家自体为同一,人民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自我调和。所以共和政治较君主制调节困难,会导致不断革命。

关于第一点，汪兆铭全面探究国家学说的各种观点，指出，国家学说关于国家性质，有客体说、人格说两种，前者又分为二，一以领土臣民为国家，君主为权利主体，国家为其客体。一即波氏所倡，以领土臣民为国家之客体，君主即国家。二说均以君主为统治权主体，国家为客体。人格说则相反，以国家为人格者，自为统治权之主体。客体说源于欧洲中世纪家长国思想，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抛弃，因为君主非即国家，只是发动国家意力的最高总揽机关。君位继承，前后人格不同。国民为权利义务主体，非国家统治权之目的物。国会无论是否国民代表，均足以调和人民的利益竞争。

关于第二点，汪兆铭认为，立宪必经政治革命、种族革命，革命为建立宪制的唯一手段。革命后已无异族政府，只有一般国民，所以必为民权立宪。在此问题上，梁启超混淆了国法学与政治学，以中国国民必不能具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由是而非难革命，并且希望政府开明专制。若国民能力不足以革命，而独可立宪，意即立宪时一人圣明于上，天下皆生番野蛮。他也不赞成陈天华所说革命后先以开明专制，尤其反对以清政府为开明专制，因为异族政府只会与国民为敌。

“故吾不以改革之事望诸政府，而专望之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值得注意的是，汪兆铭于“民权立宪”特意解释道：“所以不云共和立宪者，以共和一语，有广狭二义，其广义则贵族政治，亦包含在内，故不用之。”并结论道：“吾之目的，欲我民族的国民，创立民权立宪政体（普通谓之民主立宪政体）者也。故非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不能达其目的（各国革命，有至君主立宪而止者，而我国今日为异族专制，故必不能望君主立宪）。惟有民权乃能革命，惟革命乃能民权立宪，而我国民之能力，若葆有精进，则实足以举之。”^[2]也就是说，虽然《民报》六大主义以及论战的十二纲领都采用了通行的共和与专制对立的说法，但在学理论辩的层面，还是尽可能严谨，不随意从俗。用民权立宪政体取代共和、民主，就是重要体现。

接下来，双方进入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攻防战。梁启超看到《民报》号外和十二纲领，觉得“虽其词意之牵强者甚多，然以为彼既敢于强辩，则必能将本报重要之论点，难倒一二，殷殷然引领愿听。而不意见彼报第四号，乃使我大失望也。何也？彼文皆毛举细故，或枝蔓于论点之外，而本报所以难彼说者，于根本上无一能解答也”。所谓第四号，主要即指汪兆铭的《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

论》，梁启超于是撰写了《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的长文，重申：

本报论文最要之点，曰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欲论共和国民之有无，则必先取“共和国民资格”之标准而确定之，然后按诸中国现象，视其与此标准相应或不相应，则其已有此资格与否，较然易见。共和国民之资格不一端，或非吾之学所能悉知，或非吾之文所能悉举，然吾彙括言之，吾所认为最重要者，则曰“有能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斯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

梁启超进而声称：如果论者要辩难上述说法，必须首先对其所定标准表示承认与否，若承认，则要指出中国现象与此是否相应，不合则梁说破。若不承认，则只要说明其标准不正确之理由，其说亦破。若能另行定出标准，检验是否具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并以中国现象进行验证，则其说益破。可是《民报》的论者完全回避梁启超的前提标准，“惟悍然下一断案曰：‘吾之意以为中国国民，必能有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推其意，似不承认吾之此前提者也，而不能说明所以不承认之理由”。梁启超因而断言论者殆极不欲承认，却又不得所以不承认之方法；声称中国国民有能为共和国民之资格，却不能指出共和资格之概念及要件，“于是不得不支离焉遁而之他，毛举一二小节以混耳目”。

梁启超反复强调：“吾说最重之根据，则一曰未有共和资格之国民，不能行共和立宪；二曰今日中国国民，实未有共和资格；三曰共和资格非可以短期之岁月养成；四曰革命军倥偬骚扰时代，必不适于养成共和资格。此四者，皆非凭假定以立论，而事实上必有必至之符者也。”纯就学理而言，梁启超所说并非毫无道理，可是其办法和标准，却很难令人信服。例如他主张通过开明专制养成国民资格，无论如何长篇大论，总觉得有些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他不仅认为中国国民没有共和资格，就连大革命时期甚至今日的法国国民，也不具备共和资格，则共和制几乎没有现实性可言。他断言中国国民数十年内不能养成共和资格，即使数十年后养成，也须在开明专制或君主立宪时代，可是如何才能实现开明专制或君主立宪，本身就成为难以逾越障碍。加之他根本否认革命可以养成共和资格，一口咬定革命反而导致专制，则共和制在中国只能束之高阁。

不仅如此，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同样需要相应的国民资格，按照梁启超的逻辑，大概惟有君主专制适合中国的国民程度。然而，既然连梁启超本人也在讨论变革，则中国国民并不满意于君主专制，希望改成其他政体，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至于指责汪兆铭避而不谈共和国民资格的标准，也有曲解的故意。汪兆铭认为，国民既然能改革，就可以实行民权立宪，否则假定前提是只有君主愿意改革，这恰恰严重背离事实。

不过，接下来梁启超的说理就非但不是毫无道理，而且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切中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

共和之真精神，在自治秩序而富于公益心（所以能行议院政治者专恃此）。国民心理而能如是者，则共和不期成而自成，美国是也。或且无共和之名而有其实，英国是也。苟不能如是，而惟嚣嚣然求自由求平等，是未形成国家以前原始社会之心理，而决不可谓为今世共和国民之心理也（自由平等固共和精神之一部分，然必与自治心公益心相和合，乃成完全之共和心理。苟为离自治心公益心而独立之自由平等，则正共和精神之反对也）。而乐自由爱平等之心理可以煽动力而骤致之，重秩序尊公益之心理，非养之以岁月而万难成就。

在梁启超看来，《民报》所谓今方滔滔汨汨而进行者，为乐自由爱平等之心理。至于重秩序尊公益之心理，则反而退步，所以更加断言其与共和之心理适成反比，万不能相容。《民报》论者自命为忠于共和主义，所认为的共和心理却不适于共和，其余闻共和而好之的附和者，但求共和能给予自由平等，不问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旦实行共和而索其代价，则与彼心理大相拂戾。实则中国缺少与共和相适应的自治心公益心，是文化差异而非国民程度有别所致，更不可能由专制养成。

国家有各种机关，其上还有最高机关。“此最高机关，其在君主立宪国，当然属于君主，其在共和立宪国，当然属于国民。故国民全体为一国最高机关，实一般共和国共通之原则也。然近世之共和国有三种，一曰国民直接的共和国，二曰代议制度的共和国，三曰直接代议参用的共和国。……夫既以国民全体为最高机关，其在实行合议制度之共和国，此机关于法律上有万能力无论矣，即在行代议制度之共和国，其政治上之趋势，所谓被作成之代表机关，亦往往仰此原始的最高机关之鼻息，又势之不可避者也。”以缺乏共和真精神的国民心理，而行之于共和制的国家机关，非但不能有效，而且难免变质。

有鉴于此，梁启超认为：“我国民对于现政府所当行者，本有两大方针，一曰劝告，二曰要求。……所劝告者在开明专制，而所要求者在立宪。”劝告是因为自己“确信共和立宪之万不能行，行之则必至于亡国，而又信君主立宪之未能遽行，行之则弊余于利，而徒渎宪政之神圣。然则为今日计，舍开明专制外，更有何途之从”。照他的判断，君主立宪乃至革命共和，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不能实行。当此欲立宪而未能立宪欲革命而未能革命之时，一国之主权如须行动，“则政府之现象，无论如何，而必出于专制，此事实之不可争者也”。所以他坚称：“劝告现政府之开明专制，实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并引述日本法政学者箕克彦的话作为论据：“开明专制，以发达人民为目的者也。”即使以共和为最终理想，而共和必须普选，“一日不行开明专制，一日不行政治革命，则教育一日不普及，而人民一日不能得共和之程度”。

重点答复完毕，梁启超还总结式地将《民报》失败的八个方面列表显示，作为这一回合彼此胜负的战果报告，声称，只要将《民报》《新民丛报》两报论辩的原文合读，“则禹鼎铸奸，无复遁形矣”^[3]。

看到1906年7月25日《民报》第6号汪兆铭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梁启超觉得“其言若甚辩，而不知实自隐其缺点，以自欺而欺人也”。于是撰写了《暴动与外国干涉》，强调“所以认暴动主义为足以亡中国而深忧之者，全以其破坏之后，必不能建设。吾所以断其必不能建设者，以其所倡者为共和政体。而共和政体，则吾绝对的认为不可行于今日之中国者也。共和政体，为历史上之产物，必其人民具若干种之资格，乃能实行。而不然者，强欲效颦，徒增扰乱。此征诸法国及中美南美诸共和国，覆辙相寻，皆历历可为殷鉴者。而吾中国今日之国民程度，决无以远优于彼等。加以我幅员之辽阔，各省之利害不相一致，故实行共和，视彼等尤为困难”。

不仅如此，“无论今代古代之共和政体，其所以能发生成立者，恒由小国”。美国实由四十余小国结合而成，而百年前法国革命共和，酿成惨剧。至于中南美诸国，或历代大统领难得善终，或独立仅四十年，而大小革命五十余次。每当总统选举，辄杀人盈野，流血成河。“盖每三年或四五年，必起一度革命以为恒。凡此皆不适于共和而强行共和之所致也。”

前车可鉴，梁启超进而为中国的共和革命前景描绘了一幅黑暗末世图，“我国若于暴动后贸然欲建设此政体，则由攘夺政权所生之惨剧，必至不可思议”。军人与人民争，劳动者与上流社会争，党与党争，省与省争，纠纷错杂，随时生乱。由于国民未惯法治，诤争之结果，必诉诸武力以求解决。“大统领为一国最高政权所在，苟大统领以四年改选者，则每四年全国当起一次大革命。苟以三年或五年改选者，则每三年或五年当起一次大革命。不宁惟是，以我国幅员之辽阔，我之一省，足当人一国，故省之总督，其政权亦庞大而可为争夺之媒。苟总督而由民选者，则每当改选之时，其省之起革命也亦如之，又不惟于大统领及总督改选时为然耳。即在平日，任一事件之发生，而皆可以促政权之更迭，酿全国之骚扰，抢抢攘攘，国无宁时。”

上述还是仅就建设后而言，而最危险的时刻，是新破坏而未建设之际，“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如乱麻。而各省新经兵燹之后，人民生计憔悴，加以乱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之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而政府所有有限之军队，不能遍镇压此无垠之广土，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之干涉乃起”。开始一二国欲趁机独占非常利益，“他国嫉之，谋所以相牵掣。相嫉相掣之结果，不得已而出于协商。协商奈何，则惟有拥旧王统以为傀儡，而共监督之”。从此，傀儡政权的废置“一惟外国人之意，而中国遂永成埃及矣”。革命本欲革满洲王统，结果却不过易为傀儡王统而已。^[4]

梁启超详细罗列《民报》失败之点后，自认为已经大获全胜，可以就此结束论争，而《民报》方面却继续火力全开。汪兆铭又连载长文《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指国民由专制变为立宪，系乎能力，专制国与立宪国人民的能力固有不同，但是“既能由专制而变为立宪矣，则其为君主立宪，抑为民主立宪，视其事实而已，非谓民主立宪国之人民，其能力必当较君主立宪国之人民为优也”。《新民丛报》“信满人不信汉人，信政府不信国民”，所以认为君主立宪以政府开明专制致之，民主立宪则以国民革命致之。

《新民丛报》的重要论点之一，是君主立宪人民只要能为监督补助机关即可，而共和立宪则人民须为指挥主动机关，二者程度深浅不一，难易有别。但君主立宪国为指挥主动机关者亦国民之一人，没有一人可胜任，二人以上反而不能胜任之理。“夫在君主立宪国，其当

指挥主动机关之任者，君主也，若民主立宪国，则惟议会。前者曰单独制，后者曰合议制。单独制之利为敏活，而其弊为偏倚；合议制之利为周详，而其弊为迟复。然此言制度得失耳，非能力所由判也。若夫语能力，则君主之能力必不如议院之能力，明甚。”因为君主为世袭，议员由民选，前者的智力、人品、作为，只能听之任之，后者则受制于选民。所以君主可为，议会不可为之说，绝不成立。其他如选举制，无论普通、制限和等级，只是制限的宽窄程度有别，并非共和制的要求必须高于君宪制。

《新民丛报》断言中国国民无共和国民之资格，主要理由是没有议院政治之能力。而议院政治实行于共和政体建设之后，此前是否有能力，应视有无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新民丛报》以自由平等必与自治心、公益心相合，才是完全的共和心理，否则与共和精神正相反对。实则自治心、公益心与自由平等为同一物。

汪兆铭的反驳，旨在破除国人对于国体政体进化的一大误解，即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视为程度不同的三个阶段，而共和的资质要求明显高于立宪，因此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实则君主专制与民主立宪的资质要求确有差别，但是君权立宪与民权立宪的国民资格却没有根本不同。孙中山说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是就后者保留专制遗留君主而言，并非指国民程度及制度难易有别而论。所以汪兆铭最后“一语以括之曰：当负政治革命之责任者，惟我国民，有负此责任之能力者，亦惟我国民。所谓政治革命者，颠覆专制，而为立宪之谓也。若能以国民之力，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则民主立宪政体，必可终获”^[5]。《民报》一开始就用民权立宪取代共和，除了历史上的共和以及共和专制未必民主之外，就是要明确君权立宪与民权立宪并无程度之别阶段之分，共和不仅为理想远景，更具备现实可行性。

不久，汪兆铭又写了《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以革命论者的建设目的为民族的国家、民主立宪政体和国家民生主义，“斯三者，其共同之精神，曰自由、平等、博爱而已。”《新民丛报》认为共和政体绝对不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也有人谓满洲政府不可不除，但革命后宜建君主立宪政体。汪兆铭则认为，中国革命之后，万不可更奉君主，否则历史上群雄相争之事将重现。民主立宪政体三权分立，与民主专制政体不同，不会由一机关专断，且实行代议制，并非全国人民

均直接干预政事。民主政体的机关组织，与君主立宪政体相较，并无难行之处。^[6]

[1] 《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民报》第3号，号外。

[2] 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1906年5月1日，第1—37页。

[3] 饮冰：《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附录某报原文）》，《新民丛报》第79号，1906年4月24日，第1—71页，“批评”。

[4] 饮冰：《暴动与外国干涉》，《新民丛报》第82号，1906年7月6日（实际发刊在《民报》第6号之后），第1—9页，“论著二”。

[5]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第7号，1906年9月5日，第21—29页。

[6]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15日，第9—14页。

第四节 胜负分明的结局

接下来事情出现了戏剧性变化。《新民丛报》第83号刊登了徐佛苏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作者的“旨趣说明”坦言自己为主张立宪之人，不敢同情于《民报》，也不能对《民报》置喙，只能劝告《新民丛报》休战，使《民报》失去论战对象。概括其分述各点，之所以出面调停，无非两方面原因，其一，双方论文已累计数百万言，足以发明各自目的，唤起他人研求，即使极力推演，也不能多构新义。而且《民报》的驳文，多逸出常轨之外，进行人身攻击，导致感情轰裂，彼此没有调和的机会。其二，革命论之所以盛行，是由于政府过于腐败，倘政治上今后有圆满改革，革命论者自然气折，可以正常竞争。同时现在立宪大有动机，当群其精力于立法事业，虽反对者或亦渐可引为臂助。倘犹党见纷歧，恐宪法上反多遗恨。说白了，就是不要让论战干扰影响了立宪大业。

徐佛苏虽然自称中立，作为立宪派一员，自然不会赞同《民报》的论点。但是，作为旁观者，他高度肯定论争将各自的学说推阐尽致，“足以开我国数千年政治学案上之一新纪元”，使得新学新党甚至粗解法政学理者，读之“如身入宝山，光彩夺睛，而不知其蕴玉含珠之真穴”。若中国五六十年前有此学说，可执世界牛耳，二三十年前有此学说，亦可称霸东亚。而且尽管立场偏向梁启超，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新民丛报》以监督政府、维持政府为主要论点，革命党以倾覆政府、改造政府为主要论点，“而现政府之腐败，则实无受监督维持之资格，而将有受倾覆改造之趋势”，与《新民丛报》的期待正相反对。“现政府被倾覆改造之后，我国民之程度，实不能组织新政府使之绝续旧政府之主权，又适与贵报本来救国之目的，立于正反对之地位者也。呜呼，贵报所主张之政论狼狈如此，既不能扶助他党以扑灭政府，复不能扶助政府以扑灭他党，更不能任彼此之两败俱伤。试问将何所挟持，何所援据，以挽救此呼吸存亡朝夕变幻之国运耶？”^[1]

关于这场论战，虽然曾经一面倒地判定革命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其实革保双方事后各自宣称大获全胜，研究者感到莫衷一是，难做结论，只能说当事双方认识不一。^[2]但如果按照徐佛苏的看法，梁启超

和《新民丛报》可谓惨败。来自同道同党的评判，对于颇为自信的梁启超不啻为当头棒喝。《新民丛报》很快就退出战阵，与其说是听从劝告而鸣金收兵，不如说是看了宣判而偃旗息鼓。徐佛苏的确触到了梁启超的痛点甚至死穴，关键不在于梁启超混淆了国法学与政治学，而是混淆了政治与政治学，他与《民报》的论战，完全是书生式的纸上谈兵。所依据的学理和事实，几乎全都照搬西洋，再削足适履地裁量中国的实情。无论道理多么深奥，逻辑多么严密，无奈与实际不符，论战起来势必大败亏输。好在梁启超毕竟聪明，一旦千虑一失被一语道破，就知道没有必要垂死挣扎，继续缠斗下去。

徐佛苏只是单方面劝告《新民丛报》休战，他自知以立宪派的身份无法向《民报》进言，而后者也不可能买他的账。看到这份意见书，汪兆铭写了一封私信给徐佛苏，指责其言行表里不一。因为此前彼此通函，徐佛苏曾经表示抱持民族主义和国民主义，如今又公然声称主张立宪，相信可以由立宪消融种族不平等，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如若不行，才转而赞成革命。可是立宪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以国民事实上之权力为要素，二是政府能否共事，能则君主立宪，不能则民主立宪。满清政府绝无真心立宪的可能，所以只能通过革命实现民主立宪。因为事关《民报》的宗旨，而且新近来稿中不乏与佛公观点类似之人，所以编辑将汪兆铭的私函刊发，以代答辞。^[3]不但如此，《民报》还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弹佛”的《驳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从署名到标题，都有几分得理得势的咄咄逼人。该书驳斥佛公貌似中立，实则为新民同党，所谓息两党之争，不过是模糊是非，帮《新民丛报》的忙。论战应该继续，直到分清是非，决出胜负。^[4]

此后论战并未停止，却转移了主题中心，梁启超有意避开于己不利的论题，《民报》也不再穷追猛打，论战实际上已近尾声。至于海外各地，除南洋外，交锋较为零星，很难说构成论战。既往研究或指论战历时两年，并将杨度和《中国新报》的加入当成新一波论战的内容。其实，杨度等人提出以开国会为验证，正是为了检验双方的理据是否成立，尤其是梁启超指望清廷开明是否具有现实性。结果尽管立宪派再三隐忍，清廷仍然拒绝立开国会，只好抛弃立宪转而革命，接受共和。在同盟会与国内立宪派之间，并没有发生针锋相对的论战。就此而言，虽然《民报》拒绝休战，无奈对方已经偃旗息鼓，以共和为主题的论战告一段落。

以“共和”为中心考查清季《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可以进一步把握当时的学理以及双方论争的意涵。在清廷有意变政和朝野关于国体政体选择莫衷一是的情势下，《民报》旗帜鲜明地主张民权立宪政体，不仅与古代的共和相区分，而且避免与共和专制相牵混，防止造成立宪与共和为政体演进不同阶段的假象。而从鼓吹共和一步退到开明专制的梁启超，依据波伦哈克的理论，根本否认中国国民具备共和资格，希望由开明专制养成。其纯由逻辑推理论辩，无法绕过清廷不愿开明革新的现实，不战而败。

[1]佛公：《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新民丛报》第83号，1906年7月21日（实际出版应在1907年1月），第1—10页，“杂录”。

[2]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左松涛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5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3]精卫：《与佛公书》，《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15日，第1—5页，“附录”。

[4]弹佛：《驳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20日，第1—10页，“来稿”。

第四章 国体政体的争辩

清季以来，关于国体政体的分别与联系一直是困扰国人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在朝野不约而同地谋求政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取法仿效东西各国的何种政治体制，成为各界各方必须认真面对的迫切现实问题。而国体政体之说，直接关系到所选择政治体制的优劣高下，以及究竟何种体制适合中国国情的的问题。虽然后来关于国体政体有了权威定义，可是如果直接套用于清季民元的思想界，则与当时众说纷纭的观念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不免削足适履之嫌。迄今为止，试图解开中国近代国体政体概念纠结缠绕的努力，从定义出发则捉襟见肘，以事实为据则无所适从，其症结已成顽疾，令高明也望而生畏。由于今人习惯于先分清概念再解读材料，而当时各说各话，还没有约定俗成，即便回到历史现场，拿出直接证据，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有鉴于此，必须另辟蹊径，通过呈现历史以把握概念的方式，才有可能贯通厘清。因为要梳理清楚历史上的国体政体，恰好是呈现因时因人而异的言人人殊，而不能拿后出外来的概念生搬硬套。国体政体学说的历史发展与国人引进接受国体政体学说的顺序不相一致，以后者为据而兼顾前者，可以大体了解近代中国的国体政体观念演进史。

第一节 《国家论》《国法学》与国体政体之分

国体政体观念在清季随着欧洲国家学说的引进传入中国，国家学说的理论不一，国体政体的辨析因而有所不同。如果说《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前期，国体政体之说主要是围绕《国家论》展开，接下来则转到以《国法学》为主轴。

呼应梁启超等人的办报和宣传，一批中文报刊也从不同角度介绍各国国体政体的类型异同，其中日本的影响同样至为关键。

庚子事变前，《台湾协会会报》刊载日本人写的《一国之政体》，指政体因国体有别而自有异同：“既有国君亲裁万机者，又有常谋国民然后行政治者，或有不设国君，国民合同相谋以治一国者，是因国体易其政者也。而国君独裁者，名称君主专制政体；君民相议施政者，名称君民同治政体；设无国君，人民合议选出主裁者而治国者，名称民主政体。”俄国、清国、土耳其等，均为君主自裁政体。后来国君治国不再一人专政，而是广采民意，进化为立宪政体。“又有民主政体，一名共和政体，即无君主，国民相互选择名望学识之人，约定年限，总裁国政，名称大统领（即民主国），美国、法国，均为民主国。而有益国家，有福人民之国政，是为立宪政体（君民同治）。”^[1]

留日学生的《译书汇编》介绍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与梁启超异曲同工，也将“万国政府之形质”概括为“共和政治”“立君政治”“专制政治”三大别，具体分别则侧重不同：“举人民之全部，或人民之一部，而掌握政权者，共和政治也。置一君而立有一定之宪法以限制之，立君政治也。以一人之喜怒，裁决政务，不受法律之节制，而唯所欲为者，专制政治也。”共和政治又有二类：“举人民之全部，而掌握政权，共议政务者，民主政治也。举人民之一部，而执其政权者，贵族政治也。民主政治，其国民有身为君主以治人者有之，或身为臣民以治于人者有之。”“凡民主之国，皆分其人民而定其品级族类，分之得其道，则立法者垂令名于不朽，而共和之祚以长，分之不得其道则反是，诚不可以不慎也。”共和政治的流弊隐患在于，“若有一人崛起而掌握无限之大权者，则其势必一转而为立君

政治，其变之极，且酿成暴虐政治。盖立君政治，犹有一定宪法，或有适合于国体之法，且其政体之元气，足以抑制君主之专横，而使之不能逞”^[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由译书汇编社出版的岸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的《国法学》，作为《政法丛书》第1编的重头戏，该书将此前相当混淆的国体政体概念清晰划界，并据以区分各种类型的国体政体。据此，国体分类法主要有二：一是“国体分为三种，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君民同治国体是也。主权在君，名曰君主国体；主权在民，名曰民主国体；主权在君与民，名曰君民同治国体”；二是“分为二种，曰君主国体、共和国体是也。所谓共和国体者，指主权之全部或一部存乎人民，合民主与君民同治而为一类者也”。《国法学》以第二种分类法立说，国体为国家组织之名，“国家之如何组织，此国家成立之时，基于国民之观念沿革上之问题也”。政体则为统治方法之名，“与国体不相关系，而自然区别者也”。

按照这样的标准，“今之欧洲国家，皆由部落国家而发达者，本乎主权在团体而君主治团体之观念组织而成者也，故其国体皆共和国体，即有称王称帝者，不过政治上之尊号而已，就法理上而言，其地位与称大统领无以异也”。而“日本国体异是，国家组织之法基于家族制度，同国人种，统一于同一始祖威力之下。据历史所载，皇统为国民先祖之代表，故皇位之于国民，代祖先而统治之也。皇位与统治权合为一体，此日本国体之特质也。故同曰君主，全与欧洲不同，君主者，非机关之谓，而统治之主体也。欧洲诸国及其他各国，皆共和国体，纯然之君主国体，地球上惟日本一国也”。译者于此特加按语：“此说不过一家之言，日本学者反对者甚多，读者不可执一而论也。”

尽管如此，清季国体政体之分的确因此而起，日本皇统的特殊性对于国体政体的分别问题可谓大有关系。“欧洲诸学者不言国体之区别者，单就欧洲国家之组织而言。盖欧洲各国，君主与大统领均为国家团体之一机关，其主权常在团体，而国家为统治之主体，故其国体皆共和国体也。虽然，国法学者，非以欧洲为限，世界各国通行之国法学也。欧洲国体之外，别有所谓君主国体者，于是国体之区别与政体之区别，不得不分言之矣。”照此说法，原来欧洲的国家学说并不强调国体政体的分别，区分国体与政体，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国体与政

体相分离，与欧洲各国的国体政体基本一致的情形全然不同，导致国体政体必须加以区分。

政体由于统治方法不一，本来已经有所分别。而统治方法的区别，是因为标准各异，所以种类甚多。如格立司的分类法，以国家元首之组织及其地位为标准，“国家之元首者何也，统辖国家施政之机关也。国家之生活，无一日可息，又其利害得失，随宜以处，不可无执中调和之人，是以国家常置首长，曰帝，曰王，曰大统领，曰联邦参议院，皆是也。由其组织地位，统治之方法异，政体之区别亦随之而异焉”。

据此标准区分政体，“由元首一人而成者曰独任政体，由数人合议而成者曰合议政体。二政体中又别为二，元首无责任者曰君主政体，元首有责任者曰共和政体。更细别之，则为立宪、专制二种。立宪政体者，元首与其他国家机关分其权限而统治者也，其权限不分者，专制政体也”。

至于政体与国体的联系及分别，大体为：“政体区别之名目，往往与国体相符合，然国体自国体，政体自政体，二者各有独立之观念也。故有同一政体而国体异者，有同一国体而政体异者，此皆事实之所有，而与理论不相妨者也。”例如日本、英国、普鲁士，均是立宪独任君主政体：“其为君主，日本与其他二国均无以异也。英、普之王，均是国家之元首，以元首一人为主，故曰君主政体，统治之主体在国家，故曰共和国体，所谓共和国体而君主政体也。反之，日本之天皇，为国家之元首，又为统治之主体，以元首一人为主，故曰君主政体，而统治之主体亦在君主，故曰君主国体，所谓君主国体而君主政体也。由是观之，国体、政体观念之区别，可以知之矣。”由于各国政治的实情有别，“欧洲国法学者，言政体而不及国体者，由彼等所见国家之组织，同为共和国体故也。故辨国体之异同者，自日本始”。

国体政体的分别因缘明治日本国体与政体相分离，对于解开长期困扰国人的纠结至关重要。即使如此，清季的国体政体仍然依据各自的学理不一而分别各异，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无论何种国体，统治主体无以一身统治之理。譬如君主国体，无论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君主以一身行其政治，此事实上之所不能，故必设机关以行之。其设备机关，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固无以异也，且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亦未始不同，惟其宪法上之精神，则随政体而异

而已。专制政体，苟为君主之意，无论其由机关与否，终有效力，其事实上必由机关者，不过为便利计而已。立宪政体反是，一定之统治权，必由一定之统治机关以行之，此为宪法上之要款，非仅事实上便利计也。”

就君主制而论，“君主有二义，其名则一，其实则二。同一君主国，有君主国体与君主政体国之别，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相对待，不以人民之集合体为统治权之所在，而以唯一之君主为统治之主权者是也。此种国体，所谓君主者，即国家也，亦即统治权也，君主与统治权合为一体者也。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相对，不以元首为法律上之责任，而以元首为在无责任之地位者也。此种政体，所谓君主者，谓政府之首长也，君主非主权者，而为行使主权之一机关是也”。由此而论，日本为君主国体，欧洲各国则是君主政体。

基于是理，《国法学》论国家机关之组织，“所谓君主者，专指君主政体国之政府首长而言也”。在这样的君主制之下，“其君主与其他君主国同为国家之元首，而于国会不过有主权之一部，故所谓主权者，并存于君主、国会者也。概而言之，主权者，存乎国会而已。此特别国会之地位，自上古部落国家以国民会为主权者之观念沿袭而来者也。主权在国民集合之国会，故其国体称之为共和国体，亦无不可。然分析言之，君主于国会，亦有主权之一部，故称之为君民同治国体，最为适当。君民同治国体者，共和国体之一种也。欲知英国国体与其他共和国不同之所以，不可不明其特别国会之地位也”^[3]。也就是说，国体不仅要看其名，还要看君主与国会实际的地位及权力。

《国法学》的这一套概念理论，详尽而系统，对于迫切希望了解认识国体政体问题的国人很有吸引力，自1902年3月初版，7月即脱销再版。虽然引起不少争议，却影响近代中国的国体政体观念相当深远。当时全社会政治势力几乎都在思考选择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适宜形式，这一套国体政体理论，为各自带来各取所需的理据以及不小的解释空间，因而取向各异甚至相对的朝野革保各方，差不多都依据这一理论，做出了有利于己的申说，并据以制订出变革的蓝图。

^[1] 《一国之政体》，《台湾协会会报》第20号，1900年5月20日，第79页，“政治法律谈”。

[2] [法] 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卷之二·论诸法以政府之形质而异》，《译书汇编》第1期，1900年12月6日，第41、44、49页。

[3] 章宗祥译：《国法学》，译书汇编社，1902年版，第23—26、52、57—58、99页。

第二节 共和立宪之选与国体政体之论

这一时期的各种译文期刊上，日本法政学者的相关论著占了较大比重。尽管说法不一，大体不出上述范围。如《翻译世界》刊登永井惟直的《政治泛论》，将政治组织“大别为三种：（一）君主政治，主权在一人。（二）贵族政治，主权在少数之贵族。（三）民主政治（即共和政治），则为多数之合议制，设民选议院，国家政令，一依于多数国民之意志。自社会进化之理观察之，民主国盖为政治之极端主义。然近世国家之趋势，多统治于一主权者”^[1]。而《政学原论》将近代国家组织分为王政主义、贵族制主义、民政主义，王政主义有君主专制、立宪王政、统领共和政三种。^[2]

熊谷直太的《法律泛论》则称：“主权所属，则各因其团体而异，辄以国家之起原发达之历史释之。（一）君主独裁之国，主权专属于君主。（二）君民同治之国，君主与人民共有主权。（三）共和国，主权在于人民之全体。是三者之外，或谓人民相互之契约，其物为主权，而非出于君与民者也；或谓国家为有机体，以独立之目的而生存，故有人格，以为主权；或谓国家为一法人，譬如社会，其权利之主体，不在社会之各员，而在于物，当以国家自身为主权者。盖国体不同，而主权所在亦异，固其理也。如德国上古部落会议，凡决议关于部落之大事，其会员虽有多少之制限，皆由一般之人民而成，君主不过其会议之役员之进化者，往往取此以为主权在于人民之总意。然一校之日本国体，则大相背反，盖主权存于万世一系之天皇也。”^[3]所谓天皇万世一系，其实是后来建构出来的一套世系，日本法政学者刻意分别国体政体的原理，不过是为了让编造的神话显得合理。

《译书汇编》也刊登了一系列日本人士的论著，从各自国体政体的观念进行概括解释。《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断言：“盖不知政体者，不足以语政治组织之故也。盖立宪、共和、专制，皆因政体而别，此法制之外形也。而政治之组织，每因历史之异，国情之不同，而等差也。各国皆有特别之历史，故有名同而实异者，或实同而名异者。”又指“法兰西纯然一共和国体，主权全存于民权间，大统领仅总括行政之机关，未尝握尺寸之主权”^[4]。

日系《顺天时报》刊登的清朝官员说帖，据吾妻兵治译《国家学》，“于专制即君权、共和即民权、立宪即君民共权三种政体殷殷申论，而归重于立宪政体，凡君权之专制、民权之共和均不以为然”。《顺天时报》谓为公而不偏，正而不激，“洵属知言”。进而推阐强权进化之理，“谓专制政体为过渡时代不可缺之点，至由野蛮而半教，由半教而文明，而宪法于是成立。盖环球万国之中，有立宪而不共和者，无共和而不立宪者。民主也，君民共主也，皆统乎一宪法之轭下者也，皆民权自由之理大昌，而乃有此一日也”^[5]。

《经济丛编》的《各国宪法异同论》，沿袭了“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立宪政体（旧译为君官共主之国），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的说法，而指今日各国政体“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两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但就其名而言之，则共和国不与立宪国同类，就其实而言之，则今日之共和国皆有议院之国也，通称之为立宪政体无不可也”^[6]。

《游学译编》根据政治学史和理学沿革史介绍历史上的政治学说，称希腊的阿里斯多德（Aristotle）分政体为三，“观其最高之权力存于一人、存于少数、存于多数而别之。真正之政体，无论为一人为少数者为多数者，皆所以谋公共之利益。若专谋私利，则政体之堕落者也。故政体有正与不正之别，合之可为六种。一王政或君主制，此一人为公共利益之政体也。二贵族政，治者在一人以上，然非国之多数也。贵族制之治者，皆含善良之人之意，皆为国家及市民谋幸福者也。三共和制，多数之人主政，谋公共之利益者也。多数之人民之中，或有秀于一德者，德之种类甚多，故人民不得而兼之”。至于不正者，“一僭主制（君主政之堕落者），专图君主一人之利益。二寡头制（贵族制之堕落者），专谋富者之利益。三僭民制（共和制之堕落者），市民中最贫困之多数者为政，专图贫民之利益”^[7]。

通过上述译介，国人获得的知识信息是，国体政体的分合异同，因缘各国政治的实情，学理则是依据各式各样的实情做出各不相同的解释；欧洲各国的国体政体虽然各异，但一国之内国体政体大概一致，一般不必加以区分；决定国体政体的差异，大体依据最高权力之所在，具体解读则五花八门；日本的天皇制使得国体政体相分离，因此之故，区分不同的国体政体以及分别不同的国体政体关系，变得异常复杂。

引进吸收，成为国人认识国体政体问题的凭借，翻译介绍之外，国人开始对国体政体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发表意见，主要有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其一，国体政体的一般原理能否恰当说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其二，中国变革应取何种国体政体为适宜。既然国体政体的分辨缘于国家学说的一般原理并不适用于日本，因而必须加以调整补充，那么中日虽然同文同种，也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如《支那化成论》辨析清朝皇权道：“所谓帝皇者，名为专制君主，而其实则非，彼之不能行其权也，与立宪之君主，共和之总统，亦复何择？盖帝皇高拱九重，不过日俟大臣所奏，而为之判决可否而已。如发号施令，权固在君，而行之不力，帝亦无可何者也。且军国大事，不得不与内阁及军机处相商，是亦以官制要君已也。……由是言之，支那之国体，将谓之君主政体乎，则有民主之制存焉，谓之共和政体乎，则疆臣黜陟，唯帝皇之爱憎是从，求之泰西政体，又未见其所当也。”^[8]

正因为基于泰西各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国体政体理论不符合中国实情的判断，导致选择何种体制适合中国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身份地位不同，态度理据各异，观念大相径庭。《选报》刊载的论说，大体沿袭梁启超的思路：

吾闻今名于地球者八十余国，其政体二，其分权三。所谓政体二者，一曰君主，一曰民主，共和尚矣（共和，民主之称）。君主之政体亦有二，一曰立宪，一曰专制。今地球上共和者某某国，立宪者某某国，若专制则只亚洲之俄与中韩三国而已。俄国已立议院，韩则垂亡，中且濒灭，今并专制亦只徒有其名耳。所谓分权三者，立法、行政、司法三者而已。大抵共和政体，君由民举，法由民立，君非世及，数年一任，任满再举，如美、法诸国是也。立宪政体，君虽世及，而法由民立，君民共守之，如英、德及日本等国是也。故立宪政体，又谓之为君民共主者。专制政体，法由君立，君权无限，君虽世及，而革命易姓之事，多则数百年，少则数十年，置君如弈棋，而生灵为之涂炭矣。……统地球八十余国观之，盖专制时代已过矣，宪政党亦可谓之革政党，革政所以挽革命，政不能革，命必革之，我不革之，而人亦必革之，革于我而我可自立，革于人而我瓜分，而我亡矣。^[9]

创办《国粹学报》的邓实等人，一面鼓吹国学，一面以《政艺通报》传播西学。邓实的《政治通论》，肯定“今而泰西立宪共和政体主义之潮流渐警动，吾君民上下之耳目之脑筋，乃始现光明之一线”。他将世界上的君主国分为君主权盛、君主权次盛、君主权衰、

君主权分、君主权附属五等，将民主国分为民主权盛、民主权次盛、民主权次衰、民主权衰四等，又将君民共主国分为共主帝国、共主王国、共主权弱、共主存政和共主殖民五等^[10]，认为“就世界现状征之，则所谓君主一人之专制政体已如风卷败箨，销声匿迹于大地，而所谓民主多数之共和政体，亦烟销云过，仅留残影。然则今日最适存于二十世纪世界者，立宪政体而已。夫立宪政体之所以良者，以其集合皇室、贵族、平民而成一团体之法人，以共组织一完全之政治，无专制一人滥用政权之害，无共和多数紊乱秩序之虞，其政体于地球上诚有鸿益而无小弊者也。呜呼，十九世纪之上半，专制仆而共和兴，当十九世纪之下半，立宪兴而共和又将仆”。他还以法、美为共和典型，而两国内部仍不如立宪，且法国经历流血惨剧为据，以示共和不如立宪的旨意。^[11]

《大公报》举办了“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的征文活动，其中采用何种政体的问题成为议论的焦点。所评选出来列为一等的文章，署名“史彬”者称：“且夫宪法者，全国之法典之所在，即全国之利益所在，君与民实共享其成而无偏无倚者也。况乎全球政体，不外三种，曰专制，曰共和，曰立宪。专制者君权过尊而民情不免壅塞，共和者民权太重而政柄未免下移，独以君主之国，而行立宪之法，则有利无弊，推诸万世而可行。”署名“效灵”的则说：“世界之政体有三，大别曰君主专制政体，曰君主立宪政体，曰民主立宪政体（即共和政体）。今世之强国十数，除俄罗斯为专制政体，美、法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然则君主立宪者，政体之完全无缺者也。中国不幸而为专制政体，自十余年前志士即以变政倡言于下，无如执政者以为不利于己，必多方遏之。自癸卯、甲辰间执政者知专制之不可终其位也，于是立宪之机始渐露于上矣。终狃于俄强之故，遂渐以息。今自日俄交战以来，日屡胜俄屡北，且内乱迭兴，是胜负之数，实寓于政体之中，虽结果不可逆料，然俄必至一蹶而不起。殆至俄蹶，而我政府始翻然改计，不亦晚乎。今为政府告曰：今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嬗代之时代也。征之列国，知世界必同归于立宪而后已。”^[12]应征者大体掌握了政体的相关原理，明确反对专制，也不以共和为然，而主张立宪，名为各抒己见，其实基本反映了《大公报》的立场态度。

在朝野上下鼓动立宪的时趋之下，关于共和、立宪、专制以及国体政体的问题，开始了新一轮讨论。反对立宪者，一般而言更加反对共和，其主要理据与告别共和的梁启超相似，就是无论何种国体政

体，总以适合本国国情为宜。有人认为，应该分别本末，提纲挈领，追根寻源，一般人指“方今之大病而不可救药者，不过一言以蔽之曰专制，欲药专制，莫如为共和与立宪。吾中国即不能为法、美之共和，而固能为英、日之立宪。共和也，立宪也，诚吾中国生死肉骨之良剂也”。然而，“中国或能终有共和与立宪之一日，吾不敢言，若以今日之中国而论，则吾有以决其必不能也”。因为共和、立宪必开议院，必树政党，必推行商会与学会，而这些都未必可行。知而不能言，言而不能行，则不如勿知勿言。“吾是以虽言专制，而其实专制而非专制，虽不言共和与立宪，而其实非共和而共和，非立宪而立宪。”就算世人罪其为伪维新，亦不敢辞，希望当轴诸公能如其所言。^[13]

附和政体无所谓好坏唯以适合与否为准之说者不在少数，认为各种国体政体不同，各有利弊，中国历史上“当闭关之世，不知国家之政体有所谓专制、立宪、共和种种之分也，但以己国所行者为不二之理，非此即不能合群立国而已”^[14]。从不同的国体政体角度考察，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对立远不像政治宣传中专制与共和那样优劣分明，因为“君权国之权力自君主一人握之，虽名为一人，实则有数人以干涉之、辅助之，而法律上执权之名词，则惟国君一人而已。君权与共和之别，即别之于握国权者之人数，君权国以少数人握国权，无论直接、间接皆然，而共和民权国以总数人民握国权，无论直接、间接皆然。所谓总数、少数，皆本体之一部分，非国家之主体，不过为国家之机关而已”。颇有罪恶感的君主专制，与共和也不过是程度有别，而非根本有异。

就时空两面而论，世界上国家的种类“有共和者，有君权者，如美之合众国，纯粹之共和，德之联邦，含有君主共和两国体”。而历史上名义与实质因时而变，“拿破仑既即位之三年，变成终身大统领制度，又三年，其国体则为共和民权国，其政体则为共和君权国。自法理言之，以拿破仑一人专制之手段代表共和国，自事实上言之，拿破仑实为开明专制君主”^[15]。由此反观中国，“开国数千年，唐虞三代时虽集权于中央，而主圣臣贤，无不以国民为重。有庠序之制，则民知教育，有井田之制，则民知急公，有悬书读法之制，则民知奉法。至于国有大政，则谋及庶人，选举人才，则始于乡里。即曰统治于一君之下，实俨然如宪政共和之政体也”^[16]。

围绕立宪与否以及采取何种立宪体制的争议，暴露出国人对于政治学说的浅薄无知，有人慨叹：“交通亘数十年，而国人犹茫然于若者为共和，若者为立宪，若者为专制政治，若者为立宪政治也。”

[17]于是新一波的政治学常识普及就此展开，“泰西国体，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君主为政之制，即今之专制而无宪法，若土若俄是也；曰德谟格拉时者（一名公产，又名合众），民主为政之制，即今之共和而立宪法，若法若美是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君民共主为政之制，即今之君主而立宪法，若德若英若义若美是也。然专制之政体，下情或壅于上闻，而共和之政体，上轻而不免于下重，均不能有利无弊”[18]。虽然学理的部分是旧调重弹，但从前大都是非法宣传，如今是合法鼓吹，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作用当然有所不同。只是国体政体依然缠绕，令专门家以外的一般人难以捉摸。

更为重要的是，之前无论保皇派还是革命党，传输学理或隐或显都有改造国家甚至反清的意向，因而偏重于倾覆清廷的共和，如今则多少有些奉旨行事的意味，取舍也要顾及朝廷的旨意，国体政体的选项需要平衡君与民的利害。“国于地球上者以百数计，苟其具独立之资格、有平等之权力者，则必有一定之国体，或为君主，或为共和。因其国体之不同，遂有政体之区别，政体在统治之权力动作于形式上者是也。统治权之所在各异，故其政体亦异，约分之，有三种焉。统治权之在于人民全体者谓之共和政体，在于数人者谓之寡人政体，在于一人者谓之君主政体。”而君主立宪政体最适于中国。[19]这不仅因为适合中国的情势，也符合世界的时趋。载泽等人考察法国的结果，就发现“而后知其立国之体虽有共和之称，其统治之权实具帝国之制，其条规则整齐画一，其精神则固结流通，遗其粗而撷其精，其可以甄采之处良非鲜少”[20]。

[1][日]永井惟直：《政治泛论》，《翻译世界》第1期，1902年11月30日，第2—3页，“政治”。

[2]《政学原论》（续），《翻译世界》第4期，1903年2月27日，第30—36页，“政治”。

[3][日]熊谷直太：《法律泛论》，《翻译世界》第1期，1902年11月30日，第14页，“法律”。

[4] 《欧美日本政体通览》，《译书汇编》第2年第5期，1902年7月25日，第1页；第2年第6期，1902年7月31日，第66页。

[5] 《尹彦铄说帖书后》（录自《顺天时报》），《选报》第17期，1902年5月28日，第10—11页，“论说”。

[6] 《各国宪法异同论》，《经济丛编》第2册，1902年4月7日，第1页，“法律”；第3册，1902年4月22日，第5页，“法律”。

[7] 《政治学说》（参据政治学史及理学沿革史）（续前），《游学译编》第6册，1903年4月12日，第12—13页，“学说”。

[8] 立法学士解说：《支那化成论》，《译书汇编》第2年第5期，1902年7月25日，第6—7页。

[9] 《延陵君家书》，《选报》第20期，1902年6月26日，第2—4页，“论说”。

[10] 邓实：《政治通论》外篇卷一，《政艺通报》壬寅第3期，1902年4月8日。

[11] 邓实译著：《政治学述》（续），《政艺通报》壬寅第14期，1902年9月16日，第7—8页，“政学文编”。

[12] 史彬：《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大公报》千号增刊，1905年4月13日，第3版；效灵：《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大公报》千号增刊，1905年4月13日，第4版。

[13] 杞忧子：《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大公报》，1905年4月26日。

[14] 《论日胜为宪政之兆》（录乙巳四月十八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2年第6期，1905年7月27日，第115页，“社说”。

[15] 罗杰编辑：《国法学》，《法政粹编》第2种，东京并木活版所，1905年，第64、77、114页。

[16] 《论国民宜攻究政法》（录《顺天时报》），《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乙巳年十一月，第4卷，1905年12月12日，第1页。

[17] 卢弼：《译宪法篇自叙》，《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8期，1906年6月6日，第1页，“别录”。

[18] 《论君主立宪政体之性质》（录丙午第一期《北洋学报》，《东方杂志》第3年第4期，1906年5月18日，第81页，“内务”。

[19] 《新编立宪纲要》，《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丙午年九月，第4卷，1906年11月2日，第6—8页。

[20] 《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泽公等奏陈在法考察大概情形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8期，1906年9月13日，第181页，“内务”。

第三节 开国会重启国体政体之争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虽然双方各自认为全胜，实际上坚持开明专制的梁启超无法解决清廷是否愿意开明的问题。徐佛苏为梁启超摆脱困境所献计策，是预备实力，以赞助立宪政治，只要促使清政府按照国民公意实行立宪，革命排满就会不攻自破。鉴于“此次立宪结果之美恶，即国家存亡、满汉和战、党派分合之一绝大关键”，《新民丛报》应当停止驳论，蓄其精力于事实上之进行，否则徒增彼此恶感，扰乱民心，阻碍改革进步，影响救亡大业。^[1]也就是说，只要清廷愿意立宪，革保论战便胜负立见。

随着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及革保论战的白热化，关于国体政体问题的研究讨论持续升温。为了进一步弄清楚相关问题，首先还是加大学理输入的力度，译介海外尤其是日本的国家学著述，再次成为重点。而认识各种立宪的异同，尤其是作为君主立宪政体的比较，共和政体也以参照物而受到关注。末冈精一著，周珍译述的《国宪泛论》称：“共和国之国家全权，虽亦由一人之元首，或以数人组成之会议体统一总揽之，然其国家元首之所以能掌握此权者，由于国民或国民中之占有特别地位者之委任，非纯粹立宪君主国之君主自能掌握此权，以遂其完全自由之总揽统一者比也，此共和国与立宪君主国差异之要点也。”^[2]

在引进学理方面，拥有众多中国门生的日本国法学权威笈克彦的著作最受关注，汪兆铭与梁启超的笔战，双方都不时引述其学说作为自己论点的理论支撑。笈克彦讲述，陈时夏编辑的《国法学》说：

“君权国者，以一人为国权之代表，掌握国权者也。……若夫共和国即不同，共和国可分贵族、民权两种。民权国者，乃其国民全体掌握国权，其各个人仍臣民也。贵族国，全体掌握国权，其各个贵族亦仍臣民也。君主国不然，君主一人掌握国权，其余全国民皆臣民也，惟君主非臣民也，故曰其人格不可分也。”^[3]

按照笈克彦的说法，共和立宪制本来不设君主，可是共和国不仅民权立宪，所以共和国又与君主制扯上关系。“君权国者，其国权掌于一人，而有数人以干涉之辅助之，惟法律上之名词，则惟国君一人

而已。君权国与共和国之别，即别于掌国权者之人数。且共和国之君主，有二人格，其为国君时为一人格，期满则复为人民，而又一人格。君权国之君主，只一人格，非有灭亡，终其身为国君。又共和国之国君，于法律上有负责任者，有不负责任者；君权国之国君，于法律上全不负责任，惟于道德上负责任耳。”^[4]这样的说法，为君主与共和相互容纳留下空间，成为后来虚君共和、帝制共和等奇说的凭借。

一般学理之外，各国国体政体的实情也是关注的重要方面。继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后，清廷又陆续派员分赴世界各国进行考察，尤其是着重考察君主立宪政体。“寡头国体，近世罕有闻，东西洋之国体，大概分为君主国体及民主国体，如中国、日本、俄罗斯、德意志、义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兰、比利时、瑞典、挪威、奥大利、匈牙利、土耳其、丹马、暹罗、韩国，是皆君主国体也，如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瑞士、墨西哥、智利、秘鲁、亚尔然丁，及其他共和国，是皆民主政体也。”^[5]而“世界各国国体确守帝国立宪制者，除奥匈以外，惟日、英、德三国，政府欲以帝国君主制改为立宪制，其势自不能采用共和制与王国立宪制，而主张采用帝国立宪制，采用帝国立宪制舍日、英、德将何取法焉”^[6]。

三国的政体形似而实不同，“德意志联邦中之多数国为君主国之宪法，而德意志则实为共和国之宪法也”。“英国则不然，不独立法须得议会之协赞，即法律之公布亦必以君主与议会之名共同行之，实含共和国之意义。即此立法一项，已足见英君主之权之狭，而日本君主之权之广矣。”^[7]由此可见，清廷变政，优先考虑的并非立宪，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甚至强化君权。考察各国的重点不在宪制的优劣，而在君权的大小广狭。这样的取向，令立宪派官绅大失所望，也坐实了革命党的揭露与抨击。

从特定视角看，清廷派员考察各国可以说是一场目的性极强的政治秀，既然不得不立宪，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皇权的绝对权威，就成为其权衡取舍的主要砝码。“顾立宪国之中，实分二种，一君主立宪国，一共和立宪国，而君主立宪国之中，又分二种，一君权重之立宪国，一民权重之立宪国。是之差别，各依其本国历史而不同，未易议其优劣。而日本则君主立宪中，又偏重君权之立宪国也。”^[8]洞察当道的用心，有人揭示到：“中国与日本，既系同文同种，于风俗习惯上，尤多相近者，仿效日本以存君主之大权，今日政府所注意者，或

在于是，但取法日本不如取法英、德，固天下人之公言也。”^[9]仅就政体仿效对象国的选择而言，清廷与包括立宪派官绅在内的天下人就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对立。

借鉴模仿的目的在于本国选择国体政体，“国于环球上者以百数计，苟其具独立之资格，有平等之权力者，则必有一定之国体，或为君主，或为共和。因其国体之不同，遂有政体之区别。政体者，统治之权力动作于形式上者是也，统治权之所在各异，故其政体亦异。约分之有三种焉，统治权之在于人民全体者谓之共和政体，在于数人者谓之寡人政体，在于一人者谓之君主政体”^[10]。“政体者，自政治运用之体式以为之别者也。通例别为三：曰专制，则以一人而总揽一国之政权，立法、司法、行政，皆握自一君主者之手，所谓独裁国者是也；曰君主立宪，戴一君以为治，更为之立宪法焉以限制之，俾不得专恣一己之意以从事，欧洲诸立宪国是也；曰共和立宪，不置君主，专依宪法以为之，如美法诸共和国是也。”^[11]政体各异，却无所谓好坏，惟有视所对待者之何物，而审所宜出。

“国家自治，广义则不论国体如何，皆为自治，狭义则只有共和国可以当之。”^[12]虽然主张立宪的中外人士不断强调：“若夫立宪国与共和国之分，在一有君主之名，一无君主之名，其实际无殊也。全国之政治在两议院之掌握，而两议院又为人民所公举公选者，此亦何必无君主名而后为佳乎？矧有宪法则人民之权利证书必自明定而使完全无缺，无共和、立宪之分别则有利人民者，此矣。”^[13]可是具体而言，并非如此简单，政体的差异不仅分别显著，而且至关重要，“君主国体之宪法不可以行之君民共主之国体，君民共主之宪法亦不可行之民主共和之国家，而共和之宪法虽至高，亦不可遽行于上二种国体之内。匪特此也，即同一君主、同一君民共主、同一民主共和，国体同而宪法亦不能尽强使同”^[14]。

国体决定于国权，“国权者何？一国最高权力之谓也。据最高之机关，行使其最高之权力，故虽有他机关与之分峙对立，而国家活动之中心点，仍掌握于最高机关之自然人，而他之机关不可不受其权力之支配，是可谓之国权统一也。大抵君主立宪国之最高机关，其统一之权多属君主，共和立宪国之最高机关，其统一之权多在议会，故政体之区别根于国体之区别而生。观于近世文明国家，殆无不然，此殆一般国权统一之趋势也”^[15]。

有鉴于此，虽然有人对于急激之士“不审时势，空言公理，心醉共和”的言行不甚谓然^[16]，却也无法否认清廷的选择未必合乎公意。“夫立宪之政体有三，有民主，有君主，有共和，欲知何者为合宜于中国，要当视国民之程度若何，原有之政体若何，历代之沿革若何。……即以君主立宪之制言之，德国政体，于政治上观之，殆如立宪君主国，而其实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尽在于联邦参议院，立法则有该定之权，有发例令之权，议案经国会议后，则送之参议院，以俟其裁决，俨然一共和之制也。”总括数说：“既曰立宪，则君权必不能无限，而吾国所最宝贵、最注重者，惟此无限之君权，则其欲以立宪为名，而以巩固君权其实，势有必至，理有固然。故无论倡民权共和之说者谓之谬说，谓之歧途，谓之淆乱国是，即倡实行立宪，建责任内阁，开上下议院，亦恐大拂政府之本心也。”^[17]就此而论，自上而下的改革，选择何种政体仿效哪一国家的关键，取决于清廷，而清廷以巩固君权为目的，必然与国民的选择相歧相悖。主张君主立宪者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面临难以逾越的极大障碍。

梁启超后来将杨度等人列为论战的同党，以显示自己对于《民报》的压倒性优势。其实，论战时梁启超持开明专制论，连君主立宪也认为不能实行。而杨度虽然主张君主立宪，不以民主共和为然，理据却与梁启超以及其他立宪派有所不同。

杨度认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主义的理由，是汉人不能独立，满蒙回藏不能与汉分离，否则为内部瓜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结果。梁启超称这不如说是中国不能言民族主义的理由，而中国不能为民主立宪，仍在人民程度与历史事实问题，满蒙回藏程度不足，也是中国国民程度不足的一部分。杨度同意民族主义不可行以五族不能分为据，“惟余之论民主主义不可行，亦即以此为惟一之原因，而不别立理由者，盖余实不承认今日汉人有所谓民族主义”。民主立宪党不过取此为一手段，“其所以必取民族主义为其手段者，实由其以民主主义为其目的之故。欲行共和政治共同选举之法，则不能不取蒙回藏之人而去之”。而去君主与民族主义无关，可以行君主立宪，即可行民主立宪。欧洲各君宪制国家的国民程度或高于民宪制国家的国民程度，政治体制并不因此而改变，因其国民认为不必改，而非不可改。

至于中国的蒙回藏人，无论民宪君宪，皆程度未足，汉满则皆无不足之虑。他日立宪后，蒙回藏实行特别制度，促其程度增高，使与汉满同等，而收蒙回同化之效。但合满汉人民成一共和国，仅有事势

上之不可，而无程度上之不能。因事势不可，所以反对民宪，主张君宪，并非由于共和国民程度足否。梁启超未尝明言中国国民是否已有君主立宪程度，既然主张君宪，反对民宪，实认为前者已足，后者未足。如果国民程度已足君主立宪，则问题已经解决，应进而谋所以成君宪之方法。杨度进而提出，君主立宪成否，应自要求开国会始，不仅具体明了，且可以测试政府是否有心立宪，成则宪政可期，不成则政府无所遁形。^[18]

于是，开国会很快就成为立宪派的政治纲领和号召，《中国新报》提出：今日中国的救亡之道，首在改革政体。欲谋政体改革，不可不从根本上着手。根本解决，枝节问题即迎刃而解。“夫所谓根本上之着手者何也？亦曰使政府之负责任焉耳。而责任政府之所以能产生者，实由有民选议院之故。故吾人所宜奔走号呼，与吾国民相将致力者，惟在开设国会而已。”^[19]

无论徐佛苏还是杨度乃至梁启超，都没有根本否认共和制，而是将开国会作为测试清廷是否愿意立宪的衡鉴。一旦结果否定，主张君主立宪者就失去了所有固执己见的论据，道理上和事实上就只能走向共和，或者说舍民主共和之外别无他途。

杨度一派自称主张国民的立宪，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及其他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有所不同，所谓“国民的立宪，乃就国体立言，非就政体立言也。中国国家欲存在于现世界，必变为民权国体乃能立国，决非君权国体之所能济。若就政体而论，则中国今日以对外问题，有不必要行民主立宪之趋势，以蒙、回、藏畔立问题，有不可行民主立宪之理由，则中国政体，宜为君主立宪也无疑。盖余固谋中国政治之改良也，君主之贤愚非所过问。故属望于国民者，欲其群起而争参政权也，非欲其群起而争君主；欲其群起而谋国家之幸福，因以增长个人之幸福也，非欲其群起而谋个人之富贵，以危及国家”。

国民参政，就要组织国会，“何谓国会，即国民参政权荟萃之中心点也。国会之意思，即为国民意思；国会之行为，即为国民行为。今国民欲解决政治上之问题，则当从国会着手，庶不致蹈枝枝节节而为之弊矣”。既然主张国民的立宪，所以注意力当集中于召开国会。“利用国民多数之中立，而因以便其私图，此反对派与怀疑派之所由成立也。反对派为谁？现政府与革命党是也。夫与国会有实际利害之冲突者，莫若现政府与革命党。何也？现政府所持者为放任主义，而

国会则决不令其放任；革命党所持者为改易君主主义，而国会则专重改造政府而不重改易君主。是故与现政府谋开国会，犹之与狐谋皮，与革命党言开国会，犹之与虎狼言博爱，实大愚大惑之事也。”

在杨度一派看来，“盖专制与共和，无论如何之大法律家，不得谓其非一种政体，则国家何必不专制、何必不共和？然试起中国汉、满、蒙、回、藏、苗之四百兆大国民而问之，彼果谓专制政体及共和政体果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也，则余将从此不言”^[20]。也就是说，选择民权国体和君主立宪政体，恰是中国各族国民的共同愿望，而非一己私见。

将国体政体问题牵入专制、君宪、共和的讨论，在学理和事实方面都增加了新的变数。有人据以论道：“欧洲之国法上及其历史上所称为皇帝，未必即为法理上之主权者，在彼土之文字中，皇帝之意与主权之意，各不相同，彼土之所谓皇帝者，不过如共和国大统领，代国民而行国家之权力已耳。然而共和国之主权，在乎国民，非在乎大统领也。”欧洲的君主“其发达自中世之诸侯而来，故其名虽曰君主，而其实古代之民主精神，犹未艾也。若法、若美、若瑞西者，共和民主之义，皆表白于天下，固无论已，即所谓立宪君主国者，大半以民主主义为其宪法之精神。比利时者，立宪君主也，彼州人士，所称赞为宪法模范之邦者也，而主权在民之一语，大书特书于宪法之中。大英帝国，宪法之母也，若但自外貌以观之，则君位之尊严，与东方或无稍异。若自法理以论之，则其国权之主体亦不在君而在民。无他，彼土之历史，与东洋之历史之不同使然耳。然则彼之所谓君主国体，名而已矣，其实则与民主国体大同小异者也。而吾之所谓君主国体者，别有说在。……或者不察，有谓立宪政体为实行民主主义之政体者。噫！其昧于事实而疏于法理，莫甚于此。古代之日耳曼，共和国也，古代之罗马，亦共和国也，共和国之见诸历史也，岂止一二，然未闻有称古代之共和国为立宪政体者。日本之国体固纯粹之君主主义，而日本之政体，则采用立宪主义，岂可因其政体为立宪主义，而亦谓日本之国体为民主主义耶？据是则立宪政体之特色非为民主主义，不待辨而知其然者也”^[21]。所以，单就立宪与否而论，并不能直接认定国体政体是否民主。

有人进一步探究：“以事实观之，行使国家之权力者，无论为君主为大统领，皆自然人也，此自然人所行使之权力，非自然人之所有，实国家之所有。故行使此权力者有变更（如君主大统领易位），

而国家不变更，因行使此权力而施之政体有变更（如专制变共和，或共和变专制），而国家不变更。以例言之，佛兰西当十八九世之间，由共和变专制，由专制变共和，风诡云幻，变迁极矣，而国家不为中断。”

今世学者，知原有分类不当，“乃又分为君主政、共和政之二种，而以共和政统括一切之贵族政、民主政”。“君主政与共和政之别，由学者之言曰，个人掌握国权者为君主政，多数人挡〔掌〕握国权者为共和政。此亦不正当之论也。何则？君主专制国，固可认国家之权力，挡〔掌〕握于个人，而不可概之立宪君主国。……今之立宪君主国皆非以个人掌握国权者，即宜皆谓之共和政矣，此不可通者也。”

那么君主政与共和政究竟如何区别？“曰是宜以国家机关之组织为前提，而以最高机关区别之。最高机关者，非国权之全部掌握于一机关之谓，乃国家之活动统一于一机关之谓也。国家之全权，不能合掌于一机关，国家之活动，不可不统一于一机关，此统一之机关，为国家机关活动之本源。……以个人组织此最高机关者为君主政，以多数人组织此最高机关者为共和政。”^[22]这些探幽索隐的辨析，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国家学知识，另一方面，也使得许多人对于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学理感到多少有些无所适从。

1907年9月，清廷设立资政院，梁启超等人仿佛看到了实现君主立宪的希望，组织成立政闻社，在梁启超撰写的《政闻社宣言书》中，借着形势的变化，再度将各派政见的分别抬上桌面，声称中国内乱外患，都因政府造成，必须改造政府，才能将恶根拔去，恶果消除。现政府不能自行改造，要改变为责任政府，主动力为君主和国民。而二者相较，国民为有力一方。因为所谓责任，是对国民负责任，而非对君主负责任。“故立宪政治，必以君主无责任为原则，君主纯超然于政府之外，然后政府乃无复可逃责任之余地。”有一派认为，现在政府腐败，实由君主卵翼导致，欲改造政府，必须先颠覆君统。其中又分为二小派，其一绝对不承认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其他则以种族问题搀入其间，谓在现君主统治之下，决无术以得良政府。前者以英、德、日本之现状反诘之，则其说立破。后者君主虽然欲保皇位，也希望得到良政府，但如果不是国民运动达到极盛，断不肯毅然改造政府。

梁启超将君主与政府分别，而将国民作为改造政府的主动力，所以政闻社所持主义有四纲，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为具文。吾党主张立宪政体，同时主张君主国体。”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并以第一条为根本主义。也就是说，其完整的政治表述是君主国体和立宪政体。

有人问道：政闻社俨然为政治团体，中国素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举手之劳耳。且国中贤才，虽与政闻社有同一之政见者，其毋亦有所惮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梁启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所咸认为国民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诏，悍然敢为此种反背立宪之行为，则非惟对于国民而不负责任，抑先已对于君主而不负责任。若兹之政府，更岂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国家”^[23]。可惜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仅仅一年，政闻社就遭到封禁，所有的自信，都不幸成了谏语。

政闻社被查禁，并没有浇灭立宪派的希望与热情，他们继续将目标锁定在争取开国会之上。因为只有开国会，才能改专制为立宪政体，救亡图强，同时避免革命的惨剧和实行共和的纷争。有人考查世界立宪各国，只有美利坚本无君主，自然创为共和政体，“而欧洲各国则皆固有君主，而其君主又皆手握大权，专制之体裁，且甚于泰东诸国。乃何以自十七世纪之末，法兰西首发其难，而其影响遂遍于全欧，其君民愈争而愈剧，其世局愈演而愈奇。其政府具有深识远虑，善为操纵者，则因势利导，改革其政体，转以收群策群力之功，所谓君主立宪是也；其不善为操纵，则国体亦因之动摇矣”^[24]。这与其说是在讲述欧洲的历史，不如说是在警告摇摆不定的清廷。

为了说明立宪的必要，先要分清不同的国体。“国体既因主权之所在而分，而主权所在之异，乃根据于历史。故就历史上最显著之事例观之，则有二种区别，曰君主国体，曰共和团[国]体。……共和团[国]体者，即以二人以上之自然人而组织一合议体，以为统治权之总揽者也。共和团[国]体更分二种，一曰贵族国体，即基于以国民中之

一部，属于优族少数之人，而为统治权之总揽者之思想也，又谓之寡人国体。此等国体，今日无其实例。二曰民主国体，即以人民之全体为统治权之总揽者也。此国体又分为直接民主国及代议民主国二种。” [25]

当然，也有人从国权不能统一的角度，断言国体政体不宜分离：“共和国以多数人掌握国权，未尝另立君主，专制国以个人掌握国权，未尝别立议会。倘使议会之旁复有君主，则议会之权不能统一，君主之旁复有议会，则君主之权亦不能统一。国权不可不统一，以此见立宪君权国之非美利也。” [26] 此说无异于看低混合政体的价值。

由于“君主国与共和国之区别，学说纷纷，莫衷一是，虽在今日，尚存疑问，而未得一定之标准”，有人进而讨论君主国的性质及种类，“盖同一君主国，而君主之地位随国情而各有不同，即在同一之国家，亦且与时代而相为变迁焉。试略言之，有以国权之全体悉属于君主一人者，有君主仅拥虚位而政权旁落者，有世袭之君主，有选举之君主，有君主负责任者，有君主绝不负责任者。甚矣，君主之地位有如是之种种不同也。于此而欲求共通之标准，岂非困难之事哉”。尽管如此，君主国也有共同的特质，即“在于君主为国家最高意思之源泉而已矣。国权之发动也，其原动力由君主与之，国家之活动，要惟以君主一人之意思为依归。此君主国与共和国区别之要点也”。“君主之实权，其范围虽极狭小，然要无停止之一日。苟其不然，以君主而停止其实权之施行，则国家将失其活动力而陷于无政府之状态矣。纵不至是，君主之为君主，既并其范围至狭之实权而亦失之，虽君主之尊号犹存，自法律上之意义言之，则其国家因早已非君主国而为共和国矣。” [27]

立宪政体，首先就要制宪。“试观列国成例，无论其国体之为君主、民主，政体之为共和、联邦，莫不有宪法为治理之标准。即我国现今之哓哓者，盖亦知时之不可以已也。有诘之者曰：立宪文明之事，以国民为政治之本体者也，共和、联邦之国有之固其宜矣，至于专制之国，吾未闻其有宪法也。” [28] 而国体不同，原动力各异，首先就表现在制宪的主动权有别。“制定宪法之权，在有国之主权者操之。然各国为主权者不同，故宪法制定权之所在亦异，君主国以君主为主权者，故君主制定宪法，共和国以国民为主权者，故议院制定宪法。” [29]

革命党对于借由开国会否定共和的时流感到愤慨，坚决予以反击，以维护共和革命的正当性。他们驳斥《政闻社宣言书》所谓革命党的共和国体可以发生良政府的主张以英、德、日之现状反诘则立破的说法，指其“未能解决种族问题而欲解决君主与共和问题，已属放饭流啜而问无齿决矣，况英、德二国，君民皆经几许冲突而后相安。至日本则政权向在幕府，君主不过备位而已，故覆幕即与覆君统无异”^[30]。

关于国体变迁，历来政治学者罕有发明，日本万世一系，国体惟一君主制，美国则合众共和，国体惟一民主制。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以君主国与共和国对立，遂为后来国体二分说之前驱。“而于共和国体中又分贵族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变迁之范围无论君主变为贵族，贵族变为民主，皆必限于本国人之自相禅让征诛。若被他国他种之兼并、占据、侵入、夺取，则为国家之灭亡，非仅属于国体之变迁也。……然环球万国，自古及今，其国体之变迁，不必尽顺此次第。有君主变为贵族，贵族变为君主，而君主即变为民主共和，共和复变为君主者，如英国是也。”^[31]国体变迁无常，国体演进的顺序说及不可躐等说便不攻自破。

有人直指问题的核心：现今之政体何种最宜？贵族政体不必论；君主专制一味压抑民权，被人唾弃；民主专制国家效果不良，未见其善；故而“今日之所亟欲研究者，惟君权民权之立宪而已。吾因得而断之曰：将来之中国当为民权立宪，不当为君权立宪。何则？破坏之后，则现在之君主既归于消灭，是他日之政体自当为民主，而不当为君主。然或有碍于时机，迫于事势，或竟因仍现在君主之旧，或另立他族之君，世袭相承，以保其位。然不过国家之一机关，又岂能再付以大权而重施今日之专制，以成为非平民之政府乎？况乎君权立宪必君主善良而后能行立宪之实，今之君主固非善良，他日之君主又岂能保其又善良乎？故将来中国，君权立宪既万不可行，如或行焉，亦与专制无以异耳”^[32]。

与梁启超、杨度以及立宪派官绅的态度迥异，“今日之顽固老朽，与此世界将离别者也可无论，其少年有志之士，无不以共和政治为世界最完全之政治，盖神游梦想者久矣”。有人质疑道：“共和政治既为最美善之政体，何以君主国反多于民主？岂世界各国人之见识，皆出中国革命党之下乎？曰否否。凡事物由粗而精，由野蛮而文明，此自然之理也。数百年前，欧美各国无所谓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也，唯人类进化，公理日明，遂由革命而进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夫共和政治，固现世最完全美备之政体，而喜高务远之士，犹以为未足，乃倡社会革命之说。”^[33]虽然革命党追求民主共和，但也深知共和制决不是政治的终极形式，提倡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正是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有人从议会的性质地位论证国民与国会的关系，揭露要求开国会者居心不良：“近世各文明国之政治，无论君权立宪国、民权立宪国，皆议会政治也。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惟民权立宪国之国会，为国民全体代表之机关；君权立宪国之国会，为各阶级代表之机关。……若国法上国会之性质，则均为国民全体代表之机关。凡国民利害之调和，权义之平均，国会皆负其责。故国会与国民前途之关系最密切，而最重大者也。”据此，则“今日之提倡立宪、要求国会者，皆欲利用国民者也，非代表国民者也”。由恶政府实行立宪，较君主独裁更加专制，“专制之时代，中央则君主独裁之政治也，地方则暴官污吏之政治也。将来立宪之时代，中央则君主暨贵族专制之政治也，地方则官吏与劣绅土豪之政治也。故吾人谓：君主专制政体，只一重之专制，而今之立宪政体，反加数重之专制。世之崇拜国会论、迷信国会论者，其亦知所返耶！”^[34]。此说似乎预示了民初政局乱象的根源，尤其是科举制刚刚停罢，即预见官更加土豪劣绅的地方政治，可谓卓识。

在批评开国会之时，主持《民报》的章太炎甚至连代议制也予以否定。议会被普遍认为是民权的代表，否定议会，不禁令人质疑其此前主张共和政体，是否自相矛盾。章太炎的答复是：“昔者，吾党以为革命既成，必不容大君世胄，惟建置大总统为无害，而又慕说美利坚人哀思窈窕，为我好仇，故联想及于共和政体。不悟置大总统则公，举代议士则戾，且未尝推校丁口，与他国相稽也。”中国地广人众，不分联州，议员多选少选均不宜；分为联州，则彼此争斗，导致彼此分离。章氏甚至公然宣称：“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故以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恢廓民权，限制元首，有多种办法，“如上所述，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35]。

[1]佛公：《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新民丛报》第4年第11号（原第83号），1906年7月21日，第15—19页，“杂录”。

[2][日]末冈精一著，周珍译述：《国宪泛论》，《新译界》第3号，1907年1月14日，第5页，“政法”。

[3][日]笈克彦讲述，陈时夏编辑：《国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第85页。

[4][日]笈克彦讲，吴兴让译：《国法学（续）》，《北洋法政学报》第27册第50页、第28册第51页，1907年6月。

[5][日]葛冈信虎讲述，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笔记：《法制学讲义》，《直隶教育杂志》第1年第5期，1905年4月19日，第45—46页，“学术”。

[6]还：《论新简日英德考察宪政大臣》，《申报》1907年9月11日，第3版，“论说”。

[7]沙：《再论达、于、汪三使分赴日、英、德考察宪政》（续），《申报》1907年9月15日，第2版，“论说”。

[8]《日本宪法疏证提要》，《政治官报》第1号，1907年10月26日，第19—20页，“外事类·译书类提要”。

[9]沙：《再论达、于、汪三使分赴日、英、德考察宪政》（续），《申报》1907年9月15日，第2版，“论说”。

[10]《立宪纲要·述政体》（续），《北洋法政学报》第31册，1907年7月，第11页，“编辑类”。

[11]胡茂如：《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中国新报》第1年第3号，1907年3月20日，第13—14、19页，“论说二”。

[12]齐树楷：《自治制》，《北洋法政学报》第19册，1907年3月，第1—2页。

[13][美]林乐知著，范祎述：《立宪为中国安危存亡之本》，《万国公报》第217册，1907年2月，第7页，“社说”。

[14]梁积樟：《论中国宪法应如何制定》（录自《顺天时报》），《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丙午年十一月，第5卷，1907年1月8日，第2页。

[15]《论近日国权统一之趋势》（录丁未三月十一日《时报》），《东方杂志》第4年第5期，1907年7月5日，第183页，“内务”。

[16]胡炳熊：《原政》，《东方杂志》第4年第8期，1907年10月2日，第400页，“内务”。

[17]塞：《念三日上谕谨注》（其二），《申报》1907年10月3日，第2—3版，“论说”。

[18]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中国新报》第1年第4号，1907年4月19日，第1—7页，“杂著”。

[19]熊范舆：《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新报》第1年第5号，1907年5月20日，第1页，“论说四”。

[20]李庆芳：《中国国会议》，《中国新报》第1年第9号，1908年1月12日，第16—22页，“论说四”。

[21]陈治安：《国体与政体之区别》，《学海》（甲编）第1年第1号，1908年2月29日，第5、9、14—15页，“法律学界”。

[22]刘鸿翔：《比较宪法学》，《北洋法政学报》第59册，1908年4月，第7—10页，“编辑类”。

[23]宪民：《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1号，1907年10月7日，第1—17页。

[24]《度支部郎中刘次源主张三年召集国会呈请都察院代奏书》，《申报》1908年7月21日，第1张第3版，“代论”。

[25]贞民：《论创设简字学校之关系》（再续），《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4月29日，第1版，“论说”。

[26]《国法学》（续），《四川教育官报》戊申第七册，1908年8月，第46页，“教材”。

[27]钟赓言：《君主国之性质及种类》，《学海》（甲编）第1年第3号，1908年4月28日，第12—13、15页，“法律学界”。

[28]高朔来稿：《读日本宪法感言》，《大公报》1908年9月25日，第3版，“言论”。

[29]穗積八束解答，唐宝锷质问：《宪法访问录》，《北洋法政学报》第68册，1908年7月，第18页，“附录”。

[30]龙腾：《驳〈政闻社宣言书〉》（四续），《中兴日报》1907年12月6日，第2版，“论说”。

[31]侠少：《国民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142页。

[32]鸿飞（张锺瑞）：《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河南》第4期，1908年5月4日，第22—23页，“论著”。个别文字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校订。

[33]卢信：《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6页。

[34]侠少（吕志伊）：《国会问题之真相》，《云南》第16期，1909年1月。

[35]太炎：《代议然否论》，《民报》第24期，1908年10月10日，第8—10、18页。

第四节 共和与国体政体之辨

革命党的反对和批判，并不能阻止立宪派要求开国会的强烈意愿，而随着要求行动的逐步升级，相关问题的探讨也逐层深入，并且由于清廷取向的掺入，产生了诸多变数。在学理和事实上，主要集中于此前已经发端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国体变迁，二是国会性质，三是立宪依据。三者均涉及国家主体与国权统一的根本。

关于国体变迁，主要是历史上各种国体兴替的历程。“古今东西，立国甚多，欲求一变化无极之国体，如近世之法国者，罕见其匹。夫专政王制，立宪王制，各种之共和制，拿破仑一世之帝制，旧王统之复古的立宪王制，新王统之中级民的立宪王制，第二共和制，拿破仑三世之帝制，第三共和制等，非皆十八世纪末叶以降法国国体之变迁乎？”^[1]国体变迁的多样性，牵扯出来的就是国体政体组合的多变性和复杂化，这对于判断和确定国家主体及国会等机关的性质地位至关重要。当时通行的国法学就认为：“因国体、政体配合之差异，国家有四种，如左：一、君主专制政体；二、民主专制政体；三、君主立宪政体；四、民主立宪政体（共和国）。学说上分四种政体，事实上不止此数。君民共主之国谓之贵族政体，如英吉利是。”^[2]

关于国会的性质，此前论战各方虽然意见分歧甚至截然对立，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大都承认国会为国民国家的主体，议会为国家主权的代表。正因为此，立宪派才会全力要求开国会，并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可是，在此过程中，国会的性质却出现不同的说法，认为依国体政体的不同，国会的性质也有根本的差异。有人指国会为立法权之主体说不当，“然在君主立宪国之国会，非共和立宪国之国会所可同论，故此说断不能援用于君主立宪。盖在君主立宪国之国会，非有为立法权主体之资格，不过有参与立法之权限而已矣”^[3]。如果此说成立，则国会的地位大幅度降低，召开国会的作用和意义也会相应减少。

关于制宪依据，清廷早就倾向于仿效日本，自达寿考察回国后，即派李家驹着重就近考察日本政治。李家驹回京奉召奏对，对摄政王

说：“按日本宪法与各国宪法不同，日本天皇之权甚尊，宪法所载，凡臣民皆不可侵犯。而各国宪法或官主政体，或共和政体，皇上权力甚少。日本能采取各国所长合成宪法，较君主共和政体尽善尽美，所有军国大政，悉由君上自裁，中国立宪犹宜采取”。摄政王闻言“甚为嘉悦”^[4]。从此前围绕国体政体的政治学理的引进传播看，此说即便不是刻意逢迎，除了当朝执政，也很难得到普遍认同。

世界各国虽然采取君主立宪的不在少数，可是欧洲各君主立宪国与民主立宪国并无本质不同，所以可用专制与立宪加以区分。但是，日本的君主立宪与之有绝大差别，皇权占据绝对权力，议会只有辅助资格。正因为日本式君主立宪的存在，使得原来专制与立宪的划分变得复杂，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的差异乃至对立大幅度增加。君主立宪向着专制的方向倾斜，民主与专制的冲突变成共和与帝制的对立，而君主立宪也是帝制的一种形式。

这样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学理和事实认知，尤其是在国家主体与国权统一的问题上，君主的地位与作用被大幅度提升。有人说：“近世文明诸国皆作宪法之成典，彰统治权之本体，其本体之动机，分立法、行政、司法三作用，其名实皆以表彰立宪政治之主旨，故有立宪政体、专制政体、君主国体、共和国体之分，不但其名异，而其实亦殊。此惟因主权之所在与主权之运用如何而为区别者。至主权之本体与国家统治权之本质，本无区别存于其间。彼主权者，以其意思，加限制于其无限之权力，而誓率由宪法之规条者，非加变更于统治权之本质，不过加制限于统治权行使之方法而已。”^[5]有人将如此复杂的辨析概括得简单清晰：“现今各国之政体与国体皆不尽同，然大抵君主立宪国之最高机关，其统一之权多属之君主，共和立宪国之最高机关，其统一之权多在议会，故政体之区别根于国体之区别而生。观于近世立宪国家，殆无不然，此国权统一一般之趋势也。”

“其第一义，必先定国权之统一也。凡无论君主共和国，莫不有一国最高之机关为国家活动之原动力，现世君主立宪国之最高机关在君主，即以君主为统一机关。”^[6]这与之前将立宪与共和大概一视同仁出现明显差异。而将君主立宪制下君主的权力地位抬高，显然与欧洲各国的情形不相吻合。

国家主体说的学理变化，显然与清廷的预备立宪相互呼应，受到清廷集中选取日本官方色彩显著的学说的影响。“国家机关说只可用以解释共和国大统领之地位，以共和国无一系相传之大统领，且大统

领不过被选举以执行其国权之若干部分，非得总揽国权之全体也。”
“以共和国家成立之要素为人民、土地、权力是也，而君主为国家成立之要素，以君主立宪国家成立之要素为人民、土地与国权主体是也。” [7]

国家主体的复杂化，使得原来许多简单明了的问题变得模糊起来，从而增加了清廷和立宪派的论据或解释空间：“既惟君主为有此权，则必惟君主有主权而国家无有也，信如是也，则无君主之国，其主权又将安丽？既认君主国之主权在君主，则亦不得不言共和国之主权在全体人民（非在人民之个人，而在其全体）。如彼之说，惟有主权者能提出改正案，则共和国不将非得人民全体之同意不能提出耶？” [8]

其实，诸如此类的新说即使在日本乃至国际学界也是各执一词，没有统一定论。美濃部達吉称：“夫国家主体说者，盖立宪与非立宪之标准也。向于此点者，正确之国家也，背于此点者，不正确之国家也。何则？苟实行国家主体说，则虽无成文之宪法，而国家之精神亦必得之，否则，非绝对的共和国，则无限的专制国也，非今日之所谓国家也。”纵观世界政治史，“彼简单的家族制之专制国，及一时的组合制之共和国，其不能永久成立者无论已，苟欲以国家的人格而列于国际，国体则不可不先自成为人格的国家，欲成为人格的国家，则不可不以国家为主体。有主体，而后宪法发生焉。盖宪法者，一面所以自治其人格，一面亦即以所自治之国家人格，而表现于世界。”

所谓国体，“就国家机关之组织，而称国家之种类也。自亚里斯多德以来，通常分国体为君主政治国、贵族政治国及民主政治国之三种。近则由马楷倍利氏说之影响，而易此三种为‘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种，其常例矣。盖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之区别，全国民为国家之最高机关，与国民中有特权之少数者为其最高机关两事，虽可以为标准，而其实民主政治之国，得与闻政治者，仅国民中之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君主国与共和国之区别，非如旧时学者之思想，因统治权主体之如何而为区别也。夫统治权之主体，常属国家，不问国体之如何也。就君主国言，以君主为统治权之主体者，误也，而就共和国言，以国民为统治权之主体者，亦误也。何则？君主国也，共和国也，非本乎统治权之总揽者而得区别也。虽今日学者有谓君主国者，一人总揽统治权之国也，共和国者，多数人总揽统治权之国也，其实非也。立宪君主国，不可认为君主一人总揽统治权，其理

已如前述矣。盖国体之区别，惟视乎国家最高机关之如何而已。最高机关以一人之自然人而成者，君主国也，其一人总揽统治权之全部乎？或受他机关之制限，而与他机关共行统治权乎？非所问也，皆君主国也。若夫最高机关以多数自然人之集合而成者，则其团[国]体必为共和国矣”^[9]。

河上肇对东西方历来的各种国体政体说做了总结式的梳理和批评，他将政体分为专制国与共和国，而不赞成将君主国作为共和国的相对物，因为君主国的国权为“一个自然人之固有”，共和国的国权为“多数人之固有”的观点，误解了国权是多数人意思结合的结果，不可能“属于一个自然人之固有”，不过“偶然籍自然人之意思而发表之”。按照国权的归属来定义君主国与共和国，则全部国家都是共和国。专制国也不是相对于立宪国而言，所谓“国家机关之行动，悉依于宪法者，谓之立宪国，国家机关之行动，不依于宪法而出于专断者，谓之专制国”，关键不但是有无宪法，还要看宪法是否“国权维持者意思发表之方法，又规定机关之根本法也”，以及能否“依国权维持者意思发表之结果，而得以更迭其国权行使之最高机关之人”。以此为准，同为君主立宪的英国实质是共和国，而日本却是专制国。以自由国与专制国相对亦不当，一方面自由难以界定，另一方面自由国的真义即可“依国民之意思，而有更迭其国家最高机关之制度”，还是等同于共和国。

此外，河上肇对于依据亚里士多德分别君主国、贵族国、民主国的理论而将国家分为君主国和民主国的看法也不以为然，“以一人为国权之总揽者，君主国也，二人以上为国权之总揽者，民主国也”，虽有法学界定，却是以统治者人数为标准，与现今的政情并不吻合。因为国家政治实际上是多数人集合参与，同时国家也可以以特定的个人掌握大部分国权，如美国的大总统就比英、德皇帝更有实权。

在全面总结批判的基础上，河上肇根据学理和时势，提出新的分类标准，将国家分为“个人各自行使国权一部分”的个人政治国和“个人相集而组织会议体，依多数决而行政治”的集会政治国。

由于欧西各国都属于同一国体，学者讨论国家的分类时，不以国体而以政体为标准。虽然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先后提出国体政体问题，但实际上，国体政体的纠结不已，说到底是一个日本式的问题，所以河上肇也承认，要厘清并说明国体、政体问

题，应从日本开始。可是，日本学者对此意见并不一致。穗積八束博士定义国体“由主权所在而定”，政体“由主权行动之形式而分”。小野塚喜平次博士认为国体“由于最高机关之组织而区别”，政体“由其活动之形式而区别”。上杉慎吉博士认为“君主国体者，以一人构成国家在法律上之人格，而为统治权之总揽者，反是则为共和国体”。河上肇则认为国体是“依政治之目的而定”，政体是“依政治之方法而定”。各国的政治目的不同，或在国家主义，或在个人主义，前者是国主国，后者是民主国，所以民主国并不是共和国，与民主国相对的也不是君主国，而是国主国。除日本为国主国外，西洋各国都是民主国。^[10]由此可见，国体政体之辨，其实是由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形式上立宪，实际上专制，使得国体与政体相分离所导致。清廷欲仿效日本式君主立宪，国体政体的纷争旨在掩饰其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以达到坚持帝制的目的。

国体政体之说，在国人中造成相当大的困扰，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说辞，说到底，都是为了彰显君主权力的广泛性和正当性。有人说：“议会与内阁，对峙独立，不相统属，君主对于议会，无命令之权之说，多为学者所倡道。但是以鄙意度之，君主对于议会之议案无命令可决、否决之权则可，如某某议案，君主命令议会，谓此案汝等可决，此案汝等否决，君主实无此权，因为议案交议会议决，所为察民人的意向，若是由君主命令可否，岂不与察民意向的大旨反背么？至于君主命令议会，凡不关议案之事，皆可命令之，如命令开会、停会、展会、休会，皆由君主命令。君主对于议案，虽无命令之权，则有裁可之权。君主若无裁可权，则与共和国大总统无异。议会若听君主命令否决，则为君主之顾问机关，不成为宪法上独立机关。凡讲宪学法的，于此点不可不知。”^[11]此说意在防弊于未然，立宪之下，既要防止君主滥权，也要避免议会擅权。

也有人察觉到日本国家学说的异样另类，告诫国人勿为所惑：

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故当以国家为主体。自日本以君权无限之国，采用立宪政体，学者清水澄辈，始主张国家无人格，遂谓共和国家，其宪法之主体为人民，君主国家，其宪法之主体为君主。而君主机关之论，遂腾于人口，其致误微而为弊深矣。我国立宪在迩，国俗人情，多与日近，将必袭用其说，以定宪法之宗旨乎？吾恐效颦难似，徒以滋弊耳。古人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以为民也，而天生民非为王也。传有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

母。此中儒评论君主地位之说也。德儒哈特巴氏云：立宪国之君主，即世袭之大统领，共和国之大统领，即有期之君主。德儒倍鲁拉溪克氏云：统治国家之职，君主得以固有之权利就之。以统治国家为君主之职，非机关而何。虽中外情形有异，不可一概而论，然以世界之公理衡之，君主之地位可知矣。然君主主体说固行之日本而无弊焉，何也？曰此一时事实上结果，非法理上明验。使国家而皆能明良共济，若明治君臣然，则不独立宪强，即不立宪亦未必不强，又何论乎宪法主体之用何主义乎。然而此固几几不可必得之数也。使一旦继承君位者不能复如明治，为弊必难胜言。国家根本法律，宜为永久计，不宜为一时计。故我国今日之立宪，当取泰西各立宪君主国之宪法为标准，不当取日本之宪法为标准。泰西各国，无论君主共和，其宪法皆以国家为主体。盖积家成国，分国即家。国家者，统上下一体之词。人生不能无群，群不能无争，安内御外，莫如国家。此国家存在论之根本理由也。自个人的方面言之，国家之目的，在教养人民而谋其利益。自社会的方面言之，国家之目的，在捍卫本群而绝其妨害。为达此种种目的之故，而强制组织生焉，而治者被治者之关系出焉。被治者何，人民是也。治者何，君主、大统领及其一切官吏皆是也。宪法为定此组织之根本法，则谓宪法之主体非国家，其安可得。谓君主人民之关系，非为国家之生存而生，又安可得。况国家之在法律上既得有公法人资格，则谓国家无人格，不足为宪法主体，其误自不待辩矣。

至于有人认为“以君主为机关，则与其他司法立法行政各机关无异，似伤君主之尊严”，又有人说“君主若非主体，即不得为国家之主权所在，是世界国体分类中，止有共和国，并无君主国”。这些质疑其实都不对。“君主为统治机关，本世界各国所同认，即爱宜涅克所谓国家直接机关是也。其他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即爱氏所谓间接机关，实可谓之分治机关，统治分治安可相提并论？无论何种国家，皆不能不有统治机关。其在君主国为君主，其在共和国为大统领，又或为国民总会，皆所以总握一国之主权。如必以君主为一国主权所在，遂谓宪法之主体不在国家而在君主，则于共和国之主权在大统领及国民总会者，将谓宪法之主体又不在国家而在大统领抑国民总会乎？总握主权者，固不必即为宪法之主体，而君主统治全国，自有其尊严，亦不以为宪法之主体与否而有所损益。国体分类既以主权所在而别，则主权在君主者，即为君主国，亦与为宪法之主体与否无涉，又何得以宪法主体在国家之故，遂谓国体分类中无君主国乎？”

历史上君主地位其实为国民所委托，“如昔日耳曼部落政治，凡有争战之事，始推选将军一人为领袖。后以战事频繁，将军遂为常职，是为王制之滥觞，则其为人民所付托国家之机关最为显著。他国君主之制，其起源虽不可考，要必为利国家者安，害国家者危，可以断言，谓不立于国家之客位不可得也。即各国宪法之规定论之，无论何国宪法，必明定君主及臣民之权利义务，君主臣民对待而言，同受宪法之支配，则其不得为宪法之主体尤明”。不仅法理如此，就实际而言，“以国家为主体，则三权不能丝毫混，欲为议院政治易，欲为政党内阁易，欲使君主不负责任以安固其地位亦易。以君主为主体，则三权之作用均不能不干涉以大权，其结果必至使内阁议院皆对君主负责任，而不能收互相监督之效，势不至置君主于至危之地不止，欲收立宪之效，不亦难乎？今国家立宪在即，不独政府所当注意，即国民之真心爱国者尤当注意”^[12]。

有人专论皇统与皇权问题，针对举国上下仿效日本的潮流倾向，痛切指陈：“此等思想，万无可以移植于中国之理，此等宪法，亦万无可以抄袭之理。此犹巨人不适侏儒之衣，海国不适垦牧之美，钟吕不适下里之音，不待论也。以中国共和思想自治思想之发达，而又富于尊君爱国之精神，正宜发皇光大，取真正立宪主义。奈何欲涂附假面，而植立于崇信无鬼论者之前也。”“欲辨中日国体之不同，此一言可定，但问中国是否有万世一系之事实足矣。欲问中国是否共和思想夙已发达，一言可定，但知吾中国相传古语，有所谓民为贵社稷为轻及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云云者足矣。”^[13]日本的万世一系为后来制造，中国的民贵君轻与民主思想也相去甚远，如此说法，旨在强调中国更适合真正立宪主义，反对用日式的虚假立宪进行粉饰。

对于当政者选择性的预备立宪，连转向立宪的梁启超也相当不满，他痛斥“我国朝野上下，竞言宪政，亦既有年，而国中大多数人，实全不解宪政为何物者。其在官吏社会，盖梦梦更甚”。鉴于“多人之怀彼理想者，虽强半出于怀禄之私，而其坐不解宪政之真相以生迷惑者，亦未始无之。夫今日之立宪，开数千年未有之创局，稽诸经典，则仅有其意而无其法。征诸史乘，则非直乏其例，而且阙其名。而今者遍国中号称谋新之士，或未治国闻故，虽有他技，而不足以语于治道。即有妙解斯义者，亦未尝思所以广宣之，以喻诸庸众，则民听易惑，固其所也”。所以梁启超举宪政最重要之特质，且为国人最易生迷执者，概要敷陈，以正告天下。他说：

学者言宪政之所以示别于非宪政者有三，民选议院其一也，责任内阁其二也，司法独立其三也。然司法之事，与政治别为系统，其关系于政体变迁者非甚密切。故语宪政之特色，实惟前二义。而议院与内阁，又必相倚而始为用，二义实一义也。夫宪政有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之异，共和立宪，非我国所宜效，不必论矣。所谓君主立宪之异乎君主专制者，其在专制之国，则立宪与行政两大权，皆由君主独断而躬行之。立宪国不尔，立法权则君主待议院协赞而行之，行政权则君主命大臣负责任而行之。质言之，则专制国之君权，无限制者也；立宪国之君权，有限制者也。立宪之与专制，所争只此一点。而我国人士所最苦于索解者，亦即在此一点。盖我国数千年来之视君权应无限制，几若天经地义，故一闻限制君权之说，即疑与侵犯君权同义，此最不可不辩也。^[14]

真立宪其实就是要限制君权，一旦做到这一层，立宪就是民主，与共和大同小异。所以有人说：“夫以国体言，或为君主，或为共和，岂不有间。然民权骏骥之势，则无往而不同也，是亦可以英国证之。夫英国法律上之形式，伊古以来，宁得谓非君主国，至于政治上之意义，则久矣。夫主权在民，若更离却法律，单言政治，即谓英国为纯粹之民主国，亦无不可。”^[15]民主若能兼容君主，则共和与君主也可以相安无事。辛亥鼎革之际出现虚君共和、帝制共和，确有其学理渊源。

国体政体之辨影响帝制共和之争，一直持续到洪宪时期。“持帝制之说者曰：国体未定，民心未固，改帝制，所以定国体也。持反对之说者曰：吾之国体既为共和，所宜争者，立宪政体耳，复兴帝制，是直将根本之国体而摧毁之，又何言乎定国体哉？”李剑农不知双方的国体之义究竟何所指，对此正反二说，无从表示赞否，遂借此话题阐述国体政体分别的理据。据其所忆，“浮田博士于早稻田大学讲演政治学有曰：国体言国家主权之所在，政体言主权行使之方法。日本诸学者之说，大都类是。谓日本帝国主权在天皇，故为君主国体，其他诸国，主权不在君主一人者，为共和国体”。而欧洲大陆的学者如孟德斯鸠并未辨析国体政体，“但分政府为三种，曰共和，曰君主，曰专制”。

由于“此多数学者虽不以政府为国家，而不为国体、政体各别之分类，言某国为何种国体，即言某国之政府为何种体制。有就其最高权能所托之机关而分类者，有仅即其元首之或为选举，或为世袭而分类者。元首世袭者称为君主国，选举者称为共和国，皆仅就其政府一

机关之形体言之，与真正国家盾乎宪法之后者无关。盖国若达乎立宪，则选举元首之共和，与世袭元首之君主，实际无大差别，所差者仅权能行使、分配之程度耳”。帝制也好，共和也罢，目的“在于政治良、党争调、真立宪，而君主、共和皆不得为政治良、党争调、真立宪之条件。反之，三者实为君主、共和共通必要之条件。然则予辈求不乱而免于亡，亦惟求政治良、党争调、真立宪耳”^[16]。若果如此，则不仅国体政体之辨只是形式，就是帝制共和之争，亦也不过条件，根本须依存于政治是否清明、党争消弭、立宪纯粹，方有价值可言。

[1]徐家驹译：《欧洲现代立宪政况》（续），《北洋法政学报》第101册，1909年5月，第28页，“译汇”。

[2]熊元翰编辑：《国法学》（上），《法律丛书》第3期，安徽法学社1911年初版，第44页。

[3]惠：《论国会之性质》，《南洋总汇新报》1910年1月20日，第2版，“论说”。

[4]《李钦使尊重君权之奏对》，《广益丛报》第7年第23号（原第215号），1909年10月23日，第1—2页，“纪闻·中国部·京师”。

[5]唐宝锷：《司法访问录》，《北洋法政学报》第143册，1910年7月，第7—8页，“编辑类”。

[6]韬庵：《论国权统一与三权分立》，《南洋总汇新报》，1910年2月3、18日，第2版，“论说”。

[7]保廷梁：《大清宪法论·国权主体》，上海，模范书局、江左书林1910年版，第60—61页。

[8]沧江：《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续），《国风报》第1年第19号，1910年8月15日，第12页，“著译”。

[9][日]美濃部達吉著、金泯澜编译：《国法学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2—3、105—107页。

[10] [日]河上肇著、王嘉渠译：《政体与国体》，《法政杂志》（上海）第1年第2期，1911年4月23日，第45—59页，“资料”。

[11] 《宪法·国体与政体之种别》，《法政浅说报》第5期，1911年6月7日，第24页。

[12] 张树声：《论立宪当先知宪法之主体》，《申报》1911年1月22日，第1张第2—3版，“论说”。

[13] 选：《皇统与皇权》，《申报》1911年6月6日、6月8日，第1张第3—4版、第1张第3版，“论说”。

[14] 沧江：《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国风报》第2年第1号，1911年2月9日，第1—3页，“论说”。

[15] 明水：《最近欧美各国立宪政治之趋势》，《国风报》第2年第10号，1911年5月9日，第9页，“著译”。

[16] 剑农：《国体与政治》（篇上），《新中华》第1卷第4号，1916年1月，第1—6、11页，“社说”。

第五章 帝制与共和的缠绕

在后来的历史认识中，帝制与共和是专制与民主的相应体现，二者如同冰炭水火，根本对立，绝不相容。然而，在国体政体的复杂辨析之下，共和与民主并不一定相等，而共和与君主却出现兼容并存的可能。受此影响，各省光复之际，眼看共和一路高歌猛进，一些拥清人士试图调和帝制与共和的紧张，以保留君位。其重要理据是担忧共和制导致内部纷争和外部干预，使得国家分崩离析。即使未必一定保得住大清，也要力求保留君位以凌驾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缓冲调节，同时有助于羁縻藩部。于是君主与共和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让袁世凯得以上下其手，居间取利。

第一节 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

武昌的枪声响起，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争很快就由事实做出了结论。尽管清廷被迫应允英国式的宪政，可是已经人心尽失，被彻底排除于一切政治安排之外。南北和谈的前提，就是废除帝制，实行共和。虽然谈判进程中双方一度同意由国民大会来取决国体政体，实际上彼此都心知肚明，清王朝已经失去实质性存在的任何可能，沦为他人讨价还价的砝码。列强当然并不希望中国实行共和，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国民素质远远不够，可是一方面被留学生和华侨高涨的共和热情所震撼，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肯对清廷和民党冲突的政治抉择表示任何倾向性意见或态度，而主张交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只有日本出于担心影响本国民权运动等等的考量，总想出手干涉，而碍于英国的反对，也不敢单独行动。

立宪派在皇族内阁出台后，对清廷彻底绝望，一旦局势风云突变，他们纷纷顺势转而推动各地独立，并表态支持共和，只不过他们口中心里的共和，与革命党的理想总有些差别。11月19日，张謇致电清内阁，力辞江苏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并最后进言忠告：“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 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1]共和成了避免革命接二连三的主要选项。张謇还表示，君主立宪最宜于国小而血统纯一之民族如日本，民主共和最宜于国土辽阔，种族不一，风俗各殊之民族，如瑞士、美国。^[2]言下之意，地广人众的中国反而更加适宜共和。只是其共和的指向，主要是五族共和与联邦主义。

大势所趋之下，一时间举国竞相言说的共和，无形中失去了共同的认定，甚至坚持帝制者，也试图在皇权与共和之间搭建桥梁，想方设法使之共存。可以说，在异口同声之下的共和主张实则五花八门，众口一词的共和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认同危机。如果说此前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共和是否可行，那么现在则是共和的外延究竟可以拉伸到何种程度仍然保持其内涵的基本要素，而不至于全然变味。

武昌枪响刚刚一月，战事正酣之际，康有为就致函黎元洪、黄兴、汤化龙等，一方面声称自己早在《大同书》中就专门发明共和之

义，只是因为时尚未至，所以先言立宪，一方面则说共和有古义六（周召共和、人皇九头、希腊雅典贤人议会、斯巴达二王并立、罗马三头之治及世袭总统），今义四（瑞士、葡萄牙的议长共和，不设总统；美、法及美洲各国的总统共和，总统权力大小不一；加拿大、澳洲、波兰、匈牙利的虚属共和，国会完全自治，英皇、奥皇虚领；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挪威的君主共和，权在国会，君主无实权），共有十体，关键在于如何取舍从违。“夫各国政体，各有其历史风俗，各不相师。强而合之，必有乖谬，则足以致败者矣。”自清廷颁布十九信条，“君主虚位，同于让皇，满洲已亡”。中国包括满、汉、蒙、回、藏，否则不全。而满、蒙、回、藏地方比内地多三倍，如果断弃旧朝，则蒙、回、藏不可收，中国不能保。

在康有为看来，君主共和国与虚属共和国，国会实有全权，“故欧人言法理者，以英为共和王国，实为万国宪政之祖，而政体之至善者也”。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只有采用虚君共和政体，“尚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为法良意美者乎？天佑中国，事变最后，乃忽得此奇妙之政体，岂非厚幸耶”。其具体做法是，去君主纪年而用黄帝纪年，以清为朝号而改中华为国号，君主只留虚位，如同木偶，实权在国会及其所举之人（名义未定）。如此，则可以息内争，保疆域，避外患。而虚君的人选，一是清朝旧主，一是孔子后人。相较而言，尤其是考虑到保疆域的问题，留旧主更加有利。

康有为的设想，如今大部分国人听来颇有几分异想天开，但他当时却是郑重其事的，所留下来的多份函稿，显示他千方百计试图说服万里之外的武汉民党：“总统共和与君主共和之制，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名位虽殊，皆代君主者也。……夫立总统，不过为国民之代理而已，乃为一代理而死国民无算，其害大矣。则反不如有虚君而不乱之为良法也。”在他看来，十九条颁布后，一切国权，皆在国会，内阁、上议院员皆举自国会，君主绝无用人、行政、立法权；国会限制内兵，君主并无兵权；提议改正宪法律令，皆由国会议定，而君主奉行之，不能解散否决。“故九月十三日后之中国，可谓之虚君之共和国。夫虚君之共和国者，虽异于瑞士、美、法，而与加拿大、澳洲、波国、匈牙利无异。彼大国之君主，且在远有威；吾国虚君主，在近更无威权也。日本人亦谓吾今为共和国，盖法理实然，可谓共和之新制矣。”

康有为此说，颇有混淆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之嫌，等于说当时清朝的体制已经与虚君共和并无二致。如此，则所谓改行虚君共和，不过一套说辞而已。而且康梁一派此前的政治选项，并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当此关键时刻提出虚君共和说，显然意在阻止革命，保留清帝。

康有为声称：革命党人所求者革命，“今则专制之君主与立宪之君主皆革矣，是数千年之大革命，不止一朝之革命，则革命亦告成功矣。公等所欲者共和也，今虚君之衔，实同无君，共和又已告成功矣。公等所力持者民族，今满人将改姓，实同归化，大臣皆易汉人，虽有达寿，亦不任藩部，其地又非汉人故物也。今高丽、安南亡后，归化者犹且容之，况满、蒙乎？普大地万国，未有不纳异族归化者也。然则君等之民族主义，又已成功矣。公等举兵一月，所求皆得，所欲皆应，亦又何求？此后求中国之完全，求民生之治安，乃方今之急务。若尚不止，进而过求，则召乱矣，召干涉矣”。既然革命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还要继续革命不已，就是过分要求，只会召乱，引发外国干涉。

总而言之，“为今中国大势计，莫善于行虚君共和策，因旧朝而共和之，以安全中国，上策也；尊奉衍圣公以收中国，中策也；不得已而行议长共和，下策。若行总统共和以召乱，是谓无策。公等图之”^[3]。翻来覆去，无非是想说保留清帝即为虚君共和的上上之选。

与此同时，康有为又遍发致党内公启，声称宪法十九信条颁布，则旧朝君权已经禅让。“考各国政体，国权出于国会者，谓之共和。……故日本人谓今之中国已变为共和帝国，今名之为虚君共和国。吾辈日夜期望之君主立宪国，今已进行至君主共和国矣。君主虽有而如无，则革无可革；满洲已改归汉籍，亦革无可革。夫宪政有三，有君主宪政，有民主宪政，亦有虚君宪政。吾党专以言宪政为目的者也，无论如何，变法实为吾党宗旨，无论实君虚君，皆为帝国，英国称共和国是也，仍含吾党之名义。今国内纷乱，争议虚君共和与总统共和孰为得失。武汉之党，主总统共和者也，国民平和者，主虚君共和者也。今南北以兵相持，终难解决，必赖有第三团出而和定之。顷与全国志士欲开国民大会，决议中国政体，吾党则力主虚君共和者也。今旧朝禅让，实同于无矣。吾党无论旧朝如何，即有变动，吾党欲戴孔衍圣公为虚君。孔衍圣公者，孔子之后而汉人者也。”也就是说，即使上策不行，也要确保中策，务必维系君位帝制。

之所以非保留虚君不可，是因为总统共和制将引发内乱外患，而虚君共和所争者只在总理大臣，前者必然兵戈相见，后者只需口笔之争，所以，“今吾党竭力欲保中国统一，其宗旨非虚君共和制不可；其下手，非开国民大议会兼纠合军队不可”^[4]。这无异于新形势下该党的正式行动纲领。

为了应对时局，阐明虚君共和的理据，康有为专门撰写了《救亡论》，他坚称革命将导致国家危亡，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而将虚君共和视为化解革命所造成的危机的唯一途径。后来他回忆道：“辛亥八九月之间，举国行大革命。吾惴惴恐慄，惧中国之亡也，横览万国，竖穷千古，考事变，计得失，怵祸患，作《救亡论》以告邦人，寄之上海。是时革命之大势，若卷潮倒河，人皆畏避，无敢刊者，即强印之，亦无敢购读者，遂匿藏焉。”两年后政局的发展变化使其言得到印证，才刊行出版。虽然文章全面而详细，关于虚君共和的论说，并未较前述各文增加多少内容，无非是强调十九信条之后，君主只剩虚名，政体与共和无异，留此冷庙土偶，“而其效用可以弭乱，而令外人不干涉，后则不至岁易总统以相争杀”。总而言之，有百利而无一害。^[5]

紧接着，康有为又写了《共和论》《安新中国议》《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等文，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虚君共和的主张。《共和论》又名《共和政体论》，文中将共和今义增加到六种，即将法国和葡萄牙分别单列，前者为上下国会合选代表王之总统共和，总统代表王者，有任期无实权，政府由宰相行政；后者为上下国会合选之总统不代表王之共和，国会公举总统，无宰相有任期。与美国共和的区别在于总统由国民选举还是由国会选举。“议长共和制者，太平大同之制也，非今中国据乱世所能骤至也。”“自美、法以外，妄立美共和政体者，未有不乱无已者也。”

康有为坚决反对总统而主张君主，主要是考虑到总统出于选举，人人可以觊觎，而君主由于世袭，一般人不作非分之想。况且君主有名无实，争之无用。这正是针对民主共和的弊端最有效的形式。其好处之一，“虚君之用，以门地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选举，以贵贵不以尊贤。夫两雄必不并立，才与才遇则必争，故立虚君者，不欲其有才也，不欲其有党也，然后冢宰总百官以行政，乃得专行其志，而无掣肘之患”。

其二，“夫立宪之法，必以国会主之，以政党争之。若无虚君而立总统，则两党争总统时，其上无一极尊重之人以镇国人，则陷于无政府之祸，危恐孰甚。故虚君之为用，必以世袭，乃为久确而坚固。又必禁由于公选，乃无大党，而不必有才，乃不与宰相争权，而后内阁乃得行政，而后国乃可强。欧洲数百年历试而得之，故明知君主之无用无才，而必立之者，赖其无才无用以为用也”。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挪威、希腊等国必立君主而不立民主，“恐公选者之必才，而世袭者未必才也，宁迎外国异族人为王，而不立本国入者，为其无党也。其苦心委曲，以成就此虚君之法者，皆所以免争总统时陷于无政府之祸也”。

康有为一再声明自己与清廷本系宿仇，想出这一办法，完全出于爱国救亡的真心，“夫欲明君主共和新制之妙理，则观于立宪之君主而可恍然矣。立宪各国，政体虽有不同，而权在国会内阁则一也，与共和国无少异也。夫既全权在国会，由国会政党之大者组织内阁，故其君主毫无用人行政之权，故宪法大义曰君主无责任，曰君主不为恶，曰国会监督，曰大臣代受责任。夫在天谓之为命，在人谓之为责任，在下接之谓之为代受，在上去之谓之为革。然则代受责任乎，禅让乎，革命乎，名体虽微不同，其实一也”。说来说去，虚君共和无非君主立宪的变相。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指责国人变法事事师法欧美，其实往往一知半解，所以大败。“欧美政艺，一切皆经试验实测而来，皆经百千败绩，乃改良而得之，各国各有其历史风俗，易地则败。今吾国人皆慕欧美人之良法，而无其百试之经验，万一误而蹉跌，则五千年文明之古国，岂可为试验场乎？”希望海内同胞慎择熟讲而后行之。他自认为虚君共和就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来的发明创造，以君主论，专制与立宪相近，以民权论，则立宪与共和相近，虽有君主，却与专制政体截然相反。“共和之君主，其虚名为君主虽同，而实体则全为共和。夫凡物各有主体，专制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专制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既有此新制，则欧人立宪、共和二政体，不能名定之，只得为定新名曰虚君共和也。此真共和之一新体也。”明明是君主制的变种，偏要说成共和之新体。

康有为不但对自己的创新颇为自信，而且不无自得，他认为，名从义生，“欧人多生出之新名者，欲精切其体也。今空名之君主者，只能编入共和制，而不能编入立宪君主制也。天下古今之义必出于三，孔子之言三统三世是也。若以君主言之，既有专制之君主，有立宪之君主，自应有共和之虚君；以立宪言之，有立宪之民主，有立宪之君主，自应有立宪之虚君主；以共和言之，有议长之共和，有总统之共和，自应有虚君之共和。其义一也，未发其义则忘之耳”。人天生必有争心，没有机会条件就不会泛滥。“盖虚君共和之制，实非君主也，不过共尊一土偶之神耳。以总理大臣代君主之权，特令人只争总理大臣焉。所以大导国人之争心入于政党，争政党多者，得为总理大臣，而争政党者，只以口舌笔墨，所以暗销争总统之干戈。发其伏流，俾行轨道，虽有洪水乎，有河道则不泛滥滔天矣，是所以为绝妙之良法美意也。”这样法良意美的政体，甚至超越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实堪称最，“天佑中国，事变最后，乃忽得奇妙之政体，岂非厚幸耶！”^[6]不仅虚君共和的政体非同寻常，必出于三的论证方式也是异想天开。只是共和制的总统也未必掌握实权，责任内阁制之下，总统不过名义上的最高元首，不一定非要保留君位才能免于相争不已。

在《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中，康有为坚持强调中国已是民主立宪，不必继续争论不已，连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国体政体也是多此一举，应当立即停止内部争斗，以免招致瓜分惨祸。^[7]

不过，尽管康有为喋喋不休，其主张虚君共和的主要目的，无疑还是保留清朝的名分。他指十九条之后已是虚君共和，甚至断言没有摄政，连虚君共和也不是，“只能谓之候补袭帝之总统共和国”。为了平息各方围绕是否君主立宪持续展开的纷争，他建言“用资政院上奏辩明此义，发一懿旨，共和已定，则争君主立宪者，亦无所措辞矣，亦可以解求共和者之怒心矣。更有无上最要者，今日怒心全由民族，必定国号、去纪元，乃可以隐销其兵气。……请资政院与内阁各上一奏，亟下懿旨，改国号为中国，用孔子纪年。细思国号必当有‘中华’二字，不必回避，以为统一之基，令南方难自分异，又可得民心。全国皆为中国入，禁不得称满、汉字，后与帝及百官皆仿英例，临资政院宣誓，与新贵共入中国籍，即改汉姓，诸满人并尽赐汉姓。如此一举，令国民攻满者无所措辞”^[8]。可是，康有为的一厢情愿非但不能取信于南方，连清廷也不买账，康党屡次电请，均未得到清廷的正面回应。

[1] 《中国革命消息·张謇复袁世凯电文》，《时报》1911年11月21日，第2版，“专电”。

[2]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3卷，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41—42页。

[3] 《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9日），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17页。所录几封信虽然内容详略不同，文字有异，但写作时间、对象、意思大体一致，当为同一信函的不同底稿。

[4] 《致党内公启》（1911年11月），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18—219页。

[5] 《救亡论》（1911年11月），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22、238页。

[6] 《共和政体论》（1911年12月），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41—250页。

[7] 《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1912年1月），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57—272页。

[8] 《致某君书》（1911年底），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51页。

第二节 梁启超的尴尬

梁启超在虚君共和的问题上对康有为亦步亦趋，他写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其下篇《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问题》，几乎照本宣科地重复了康有为关于虚君共和的全套说法，即虽然承认新中国当采用共和政体，但现行的共和政体多不适宜，尤其是美、法式共和政体，惟有虚戴君主的共和政体，“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虚君共和制滥觞英国，全由习惯积渐而成。其后比利时著成文宪法，遂为全欧列邦的模范。

“其为制也，有一世袭君主称尊号于兆民之上，与专制君主国无异也。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必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故言国法学者，或以编入共和政体之列。独其所以异者，则戴一世袭之大爵主为装饰品，国民待以殊礼，且岁供皇室费若干以豢养之而已。夫欧人果何取乎此装饰品，而全国人屈己以礼之，且出其血汗金钱以豢之也，以其可以杜内争而定民志也。……是故十九世纪欧洲诸国，无国不经革命。夫革命固未有不与君主为敌者矣，及其成功也，则仍莫不虚戴一君主。其尤取巧者，则不戴本国人为君主，迎一异国异种之人而立之，但使之宣誓入籍宣誓守宪而已。”

借由国体政体的分别，将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相混淆，不过自欺欺人而已。尽管梁启超跟着康有为鼓吹虚君共和国会权重，政府强力，为政体极轨，但是对于是否能在中国实行，与康有为的认识却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满人皇帝能否被国人接受，不无疑虑。他说：

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令此事殆成绝望，貽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僇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度。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

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虽然，吾盖误矣。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不仅如此，即使清皇室改从汉姓，以人心怨毒如此之甚，国民也未必许其尸居虚位。虽然宪法信条已经誓庙公布，可是事定之后，清朝未必甘心长此退让，而不谋所以恢复其权力。“窃以为若万不得已而戴旧朝以行虚君共和制，则迁都实为一最重要之条件。诚能南迁，则民权之确立，庶可期矣。且京师久为首恶之区，非离却之，则政治之改革，终未由奏效也。”只是此事未必办得到，即能办到，国民也未必满意。至于奉衍圣公为皇帝，亦有三疑，一是清室未必禅让，则外国不易承认；二是孔子为一教主，拥戴其嗣为一国元首，不无政教混合之嫌，而启他教教徒之疑忌；三是于蒙回藏的内附缺少维系作用。所以，“同是戴虚君，而衍圣公不如现皇室……现皇室既不能戴，则我国行虚君共和制之望殆绝也”。以迁都相制衡，与孙中山约束袁世凯如出一辙。但前提是国民允许皇室存在。

相较于康有为一口咬定非虚君共和不可，梁启超只是表示虽然如此最好，可惜时势不合，未必可行。“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牖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夫决定一国建设之大问题，惟全国民能有此权，决非一私人所能为役也。”^[1]面对进退两难的局面，虽然梁启超声称要再三苦思，却是江郎才尽，有心无力，束手无策了。

尽管内心不以为然，梁启超还是不能违背康有为的意旨，行动上不得不积极与国内各方面接洽联系，推行虚君共和的主张。11月26日，梁启超致函潘博（若海），表示愿意与袁世凯相互配合，稳定局

势，转移国民心理，而不就袁内阁法律副大臣之位，正是为了说话有力。他说：

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其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所为文已成者不少，惟当分先后，择时然后布之。^[2]

此函向袁世凯交心的同时，自暴虚君共和不过君主立宪的幌子。12月22日，罗惇齋（癭公）来函报告与袁世凯接洽的情形：“昨谒项城，备达尊悃，……因询公对于时局之议论，略以相告。渠言：我总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答言：按十九条，便非立宪，纯是共和，南军既要求共和，我当允其共和，但当仍留君位，可名为君位共和。渠言：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当下不便驳之，但答云：不如君位共和之直捷了当，君主无否决之权，无调海陆军之权，但当名为君位耳。渠颌之而已。”同时还力图通过和谈代表影响民党，“晚已电告蛻，将尊意见书及北江致黄兴速录送唐大臣，并将尊意见电告唐，由燕孙发出。今日又告燕孙，请其将君位共和名义电告唐，私向彼党密商，谓君主不过装饰品，何必流无数血以争此虚名。我既承认共和，彼许留虚君，则和成矣。燕颇赧此言，已允电唐矣。唐已与黄兴晤谈甚久，黄持甚坚，谓正式会议时，各人必致大冲突，当大决裂云”^[3]。黄兴等人坚决反对虚君位之说。

通过唐绍仪影响民党之外，梁启超还派盛先觉到上海探听革命党的口风，据说章太炎有将满洲交与清帝使之自立之议，“觉以询之，章曰：‘昔诚有此议，今已知其不可而作罢矣。’觉又闻章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后，首立清帝为大总领，后再黜而竟废之之议，以询章，章曰：‘昔亦诚有是，然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甚嚣嚣，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谈矣。’次及觉此次路经须磨，面谒南海及先生事，并略述南海及先生意。章曰：‘今也，两先生心迹盖昭昭然于天下矣，吾何嫌焉。’觉因进先生所托之书焉，章阅毕曰：‘曩余致书任公，盖未知其隐衷故尔，今知之矣。’觉乃略道虚君共和主义，章求其详，觉因出先生所属携长书示之，章请俟三数日略行研究而后相答，觉许之，并历述南海及先生之苦心孤诣，且求其善为研究焉”。

此事看似大有希望，以至于来人作出判断，“由是观之，章之难能主张虚君共和，盖可想见，而似默然许可也。何则？觉先进言中国现情，不称共和，章聆而深然之故也”^[4]。可是“研究”的结果，令其大失所望，章复函谓：

清帝犹在，而蒙古已宣告独立，是虽存清帝之号，未足羁制蒙古也。况清帝若无实权，则非蒙古所惮；若有实权，则是一国二君，其祸甚于蒙古背叛。若只戴清帝为元首，而欲汉人柄政，此非袁世凯辈不作此妄言。蒙古果叛，中国本部遂不足自立耶？此亦不然。本部之地大于日本七倍有余，日本犹足以自强，况中国本部乎？要之，兵强财盛，本部足以雄视世界，兵孱财尽，虽有无数外藩，亦何所益耶！徒以地之广狭论国之强弱，谓外藩一失，中国遂不能自持，此亦愚者之见。共和政体既就，蒙古必无恶感。仆所见蒙古人，其恨满人至于衔骨，其对汉人犹有同舟共济之意，所患者俄人诱之耳。然即清帝不退，能使俄人无蚕食之心耶？俄人能运动蒙古人，汉人亦能运动蒙古，岂在持清帝之虚名以招致之乎？^[5]

看过复函，来者终于明白：“要之，革党万不能就虚君共和之策，较温和如章太炎者，所说犹然，况其余乎？黄兴专注北伐，似不可动，可动者其宋教仁乎？惜未能相见也”^[6]。在举国倾向共和的大势所趋之下，指望革命党人接受清帝继续在位，实在是痴人说梦。

章太炎的观点，在1912年1月4日《大共和日报》发刊辞作了正面表述，在他看来，“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中华国

民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加之治也。议院之权过高，则受贿鬻言，莫可禁制；联邦之形既建，故布政施法，多不整齐。臧吏遍于市朝，土豪恣其兼并，美之弊政，既如此矣；法人稍能统一，而根本过误，在一意主自由。民德已偷，习俗淫靡，莠言不塞，奇邪莫制，在位者无能改革，相与因循，其政虽齐，无救于亡国灭种之兆。中国效是二者，则朝夕崩离耳”。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不能横取照搬他国成法。而光复宗国，和宁兆民，为势所必然，“近见之徒，复欲拥戴虏廷，以持秩序，云共和不可行于中国，是孰尸其咎哉”^[7]。他虽仍然批评美法的弊政，却断言共和大势不可逆转，而且几乎是指名批评康梁拥戴虏廷反对共和的谬论。

12月15日，罗惇齋再度来函报告南北各方对“虚君共和”主张的态度。其时议和移席上海，时论称君主一层，大有希望，而梁士诒表示不过有三成把握而已。南方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人，如浙省陈敬第（江苏为雷奋）来函，谓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袁世凯为总统，杨度则谓袁仍可为拿破仑。各报均言唐绍仪力主共和，梁士诒表示绝无其事。

“梁征问公议论，略以相告，梁谓君位共和，项城与唐均同此旨，嘱将尊旨隐括简言由梁电告唐，资其议和之材料。即已电蛻将尊意见书暨北江致黄书，并录送唐阅，或可资其采择。惟深察南中情形，似非民主不可，若决定民主，则项城不知如何处置。”^[8]后来获悉，唐绍仪将所谓虚君共和之制提出与南方商议，而伍廷芳“仍执不允”^[9]。

到1912年1月27日，罗惇齋总算认识到：“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日日言君位，至今尚未改口，特松缓耳。而其左右自唐氏明赞共和外，如梁如赵如杨哲子及其余，皆均持共和（见所措置），均向共和一边进行。”据此，不仅“足以断定项城之主共和也”，而且可以判断，“此时虚君共和字样，京中久已消灭矣。至改中华国从汉姓一层，杨士琦提议不从，至今则无及矣。当派议和代表时，即行此策，撤去众射之的，犹可及，今则时已过矣”^[10]。这等于承认虚君共和已经胎死腹中。

2月5日，罗惇齋再度来函，告以：“日来共和政体已决定，君主议论已渐灭无余，京中报馆并改变言论，所尚持君主论者，仅资政院议员所开《民视报》耳，仅数百纸，不足轻重也。”康有为创制的“虚君共和”名称，“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折，竟以此名词入告，

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非虚君共和政体也。不意长者费多少心血，供他人涂饰耳目之用，至可叹也”^[11]。袁世凯借用虚君共和名义，旨在与南方讨价还价，实际上不过以退位换优待的名义。就此而论，戊戌以来康梁一派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及其与各方论争，可以说均由事实给出了无情的结论。

[1]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43—46页。关于《新中国建设问题》的写作及发表情况，赵波的《“虚君共和”说和辛亥年康梁一派的应变举措——新中国建设问题解析》（清华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进行了梳理，对李国俊等指为1911年11月作，当时以单行本发行之说存疑，认为没有提供具体凭据及合理解释。同时依据著者自识和文章内容，判断应写于11月26日以后，完成的下限当在12月初中旬（第7页注19）。梁启超此文是响应康有为或被命题作文，开始写作的时间当早于11月26日。至于发表，分别于1911年12月28日至1912年1月10日连载于天津《大公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12年1月9日）至十二月初九日（1月27日）连载于《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12年1月10日）《法政浅说报》第27期亦开始刊载。（感谢邓华莹提供刊载情况的资料。）

[2]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研究室编《历史与文物》第一期《梁启超复杨度亲笔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9—570页。

[3]宣统三年十月三日罗癭公《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7—568页。以上两函的收信人及时间，《梁启超年谱长编》有误，据李永胜《清帝退位前夕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订正。

[4]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盛先觉《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1页。

[5]宣统三年十月章太炎《复梁任公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4—575页。

[6]宣统三年十月章太炎《复梁任公书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4—575页。

[7]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4日，第一版。

[8]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8页。

[9]宣统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7页。

[10]宣统三年十二月九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9页。

[11]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0—591页。

第三节 虚君共和的反响

康有为苦思冥想出来的奇招妙法，最终落得个被寄予厚望者利用来涂饰耳目的下场，真是情何以堪。不过，虚君共和的主张还是留下了历史印迹，尤其是《大公报》连篇累牍地讨论政体问题，兼采帝制与共和的主张甚嚣尘上。有人附和其说，并且公开上书江浙军政府，声称直接闻于英、美、德、法、日、俄、奥各使者的意见是：“中国行省较多，领土亦广，向无组织，势难一致，骤言共和，必召内乱，又言民主、君主，在实权不在虚名，苟民主政体，总统权重，又无国务裁判良法，往往任期未滿，即起纷争，如南美、中美各国，屡见流血之事，可为前车之鉴。倘君主政体，君上权轻，则君上仅拥虚名，而实权尽在国会，如英之宪法，实斟酌尽善，于中国现状，尤最为合宜”。而“信条十九条，虽存君主立宪之虚名，已握民主共和之实权，总理由国会公举，已与民主选举总统无异，朝廷有颁布而无否认，更与共和取决议院无异，是中国之君主立宪，视各国之民主共和，相去仅一间耳”^[1]。有人则说：“中国此次所颁之宪法信条，纯系脱胎英制，虽袭君主之名，已具有民主之实”。从中国情势的各方面考查，仍有保留君位的必要。^[2]

还有人借评论国事共济会将君主、民主取决于全国人民一事，表示自己也是国民一分子，也要对君民共主之说表达意见。“所谓君民共主者，非故为模棱，意在调停也。吾国各省本非列邦，则内容当如美利坚之联合各州，采取共和制度；吾国蒙、回、藏各部本有王公，则表面当如德意志之拥戴一尊，采取帝国制度。如此则内民主而外君主，由合而分者亦由分而合，于世界国家联合及联合国家外别开一新例，以为我中华联邦帝国光，则鄙言其庶几愚者一得乎？”其所创制，就是“斟酌于德、美二国之间，使各省为民主之联邦，而中央仍不失为君主之帝国也”^[3]。这些话，不但意思，连文字也与康有为各文如出一辙。

不过，即使在北方，此时公开反对虚君共和的也不乏其人。有人直截了当地予以痛批，指清人入主华夏，为中外最不平之政，“凡关于禄俸爵赏升迁调补，则旗优于汉，及刑罚则旗独轻于汉，贵贱之相悬，刑罚之不中，罄竹难书。盖不平之毒怨，积之数百年矣。今欲平

此不平，舍速建共和，别无二法。而况四百兆民意，齐注于共和”。正如清内阁全权议和大臣唐绍仪所言：“大势所趋，已往莫遏，尚何容有再事调停，徐徐商榷之余地也。”恰在此时，大名鼎鼎的康梁师徒提出《共和政体论》和《新中国建设问题》，“各以其灿花之笔，翻莲之舌，演绎数千言至万余言，约其要，不过以中国建设共和之难为前提，以虚君共和为归纳，引证之宏，给辩之巧，在主观未确定者，或虑为此客观之所惑，是不可以不辩”。

作者之前曾撰文论君主民主问题，列举现在民心趋向共和的种种事实。在他看来，康有为的初衷在保皇，梁启超的初衷在开明专制，眼看大势趋于共和，“不敢以一二小己之私心，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四百兆同胞宣正式之战，而乃出其魑魅魍魉之技，以虚君共和，滔滔辩难，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维持君位之计，貌似天花乱坠矣”。康梁明知“天所废之，谁能兴之”，“人心尽去，举国皆敌”，仍不惜与举国为敌，逆流而动。“果其真因建设共和之难，而出此调停之计，曷不请清廷降一级，为爱新觉罗王，升衍圣公一级，为汉王，改活佛为藏卫王，以与蒙古王、拜城回王，平列为五王，代表汉满蒙回藏五大种族之众，另举大总统以为共和之主，以内阁总理负责任，岂不名正而言顺哉。”鉴于康梁意在欺世，“怀已往之私恩，谋将来之利达”，作者不顾老病衰残，“大声疾呼于我最尊贵最亲爱之暗杀健儿实行委员之前曰：康有为梁启超者，我四万万同胞之公敌也，警醒警醒，注意注意”^[4]。

1911年12月16日，针对“十九信条”，《民立报》刊登奉天某报所载南北议和二十二条，据称是经清内阁会议决定、清廷批准，作为唐绍仪南下议和的条款，其中直接涉及君主与共和关系的就有二十条：一、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二、大清皇帝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王。三、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蒙古、青海、西藏在内。四、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作行政机关。五、国王及大总统之岁俸由国会议定，但其额务从优厚。七、行政权统归大总统总揽，国王属宪法上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九、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十、国王及大总统之待遇共为同等。十一、国王所自使用之人得由国王任用，惟此项人员与政事无关系。十二、国王为万世一系。十三、如有加害于国王或谋危害国王者，皆处死刑。十四、除大总统外，所有国民皆为臣民。十五、国王及大总统均受同等之尊称。十六、凡与国王为敌之国家及其君主或大总统，吾大总统亦视之为仇敌。十七、国会为立法机关，无论大总

统及国王均不得干预。十八、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十九、宣战、媾和及缔结国际条约并颁布法律等权，操自大总统。二十、宪法及关于国王权限事宜之改订，须候国王同意。二十一、宪法改订专由国会决议。二十二、除以上各款外，资政院已表决的信条均予采用。^[5]

此说看似荒诞，实非空穴来风，盖事出有因，坊间媒体的相关消息时有所闻。12月，汉口议和及各省代表陆续出发赴沪，据说“有某君提议将来宪法可仿比利时纂拟，比国虽系君主政体，其国会之权利甚伟，民权亦较英、德甚大，实不啻君主共和国，中国此时颇宜采仿，袁内阁已颇赞同，议和大纲即以此为标准。并闻英使之意亦拟定中国政体为君位共和立宪国，君位之下，另举总统办理国政，此为中国特色，各国所无云”^[6]。另有消息称：“闻当唐大臣赴沪议和临行时，曾请取项城意见，今探得其内容如下：一、虽夺君主实权，但须仍拥立之；二、总理大臣应由民选，须附以与共和国大统领同一之权限；三、另置上下两院；四、各省采美国制度，自为政治。并以民军果否承认皇帝存续尚未可知，若民军坚执意见，则再行协商，惟须达到和平解决之目的。又闻唐大臣昨又电致袁内阁，略谓现在民军所主张之议和条件四大纲：一、改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二、黄帝纪元与宣统年号并列；三、摄政王改用汉员；四、地方行政官准人选举。”^[7]

和谈陷入僵局，唐绍仪“电请袁内阁指示迁就办法，而袁之复电略以君主如不能成议，则应改为联邦共和政体或君主名义之共和政体，即取消皇帝名号，另改名称均无不可，倘必欲废弃皇室，断难办到云”^[8]。南北和议搁浅之际，内阁又有人透露：“在前数日唐大臣连次密电请示退让办法，袁内阁已有允认共和之意，惟于共和中必须仍保全皇室，方能承认，如君主名义之共和政体及君主名义之联邦政体等办法。”^[9]

实情是否如此，另当别论，此事当与康梁等人的主张及活动不无关联。即使是袁世凯一方故意放话，渊源还是可以追溯到康有为的虚君共和主张。

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想法如出一辙，还有人提出了“帝国共和主义”的理念和具体建置方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李离，临时国民公会代表朱通儒、刘振源，宪政实进会代表宋

育仁、于邦华等呈文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认为南北和议因为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政体有待国会公决而面临破裂，甚属非计，要求宣布帝国共和，以巩固皇室。在他们看来，南北虽然都有和平解决之心，可是政治学说不明，无法摆脱君主共和非此即彼的取舍抉择。“夫大权操之于一人，是谓君主立宪，日本、俄罗斯是也。大权操于议会，是谓共和立宪，德意志、英吉利是也。至于法兰西、美利坚二国，近人译曰民主，曰合众，谓为共和政体之一种则可，谓为共和政体之概则，则不可。若但言共和二字，则不在有世袭之君位与无世袭之君位明矣。此从法理上解释而绝无疑义者也。”

清季国人好以个人所知局部片段的西学知识为一般通则，由于各自所本不同，因而凡事要在是非曲直上争个输赢。上述号称绝无疑义的解释，当然也是不无可议，甚至在一些人看来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可是这样的说法是否合乎法理通则，另当别论，至少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所谓深入人心的“共和”观念或思想，其实还是一个各自表述的概念，而且所表述的意思言人人殊。

本着调和帝制与共和在观念和制度上截然对立的主旨，呈文者中有人“尝旁考列邦政体，原本信条，折衷乎英法之间，提倡帝国共和主义。拟尊皇帝为大圣皇，宣布共和政体，召集国会，公举大统领，草拟宪法，实行共和立宪，以冀早定国体而息政争”。

从法理、领土、国教、种族、党派、文义等六方面，呈文者详细阐述了实行帝国共和主义既适合于中国当时情势、又有助于学理发展和体制设置的重大理由，宣称：“此六大问题既完全解决，其余纪元问题、国号问题、首都问题，皆可以国会公意决之。总之，此帝国共和四字，成一完全独立主义，各方面均弥满无憾，非迁就两可之间为调停计也。”例如从法理上看，君主立宪政体有三原则，一、君主不负责任；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三、君主不能为恶。可是颁布法令概以君主名义，不可说绝对无责任。所谓由国务大臣代负责任，不知是对君主还是人民负责。若对君主，则行政失当，君主亦有责任；若对人民，则拒绝副署，又未免侵犯神圣。“学者于此等理论苦无确当定义。今以政权完全付之大统领，则元首不过以一特别阶级，为全国瞻望。而一切宗教、典祀、封号皆以至高之元首为之，可以为善，不能为恶。将来政体上发明最简当之定义，我国政治史有特别光荣矣。”^[10]

可是，即使拥清者，对于这样的主张也视同无理取闹。已经赋闲的恽毓鼎虽然对宣统朝局极不以为然，清朝和帝制危在旦夕还是令他五内俱焚，并与各省志存皇室者组织了同志联合会。1912年1月28日，他至同志会，“知大事已去，无可挽回，痛恨欲哭，而闽人张知庐编修犹登台长篇大论演解帝国共和政体，余不能再坐，惘惘而出”^[11]。

与此相似，康梁的虚君共和在政坛社会上不无影响，本会内部却鲜有赞同者，很多人还直接表示异议。11月党禁初开，就有人主张赞成共和，徐勤致函康有为，直言不讳道：“顷十八省已尽行独立，上海已有各省代表齐集，组织新政府及民主宪法。满人气运已绝，若复抗舆论，存皇族，必为全国之公敌矣。美洲则人心更主共和主义，乞切勿再倡存皇族以失人心，而散会事。”^[12]吴贯因（即吴冠英）致函梁启超，也认为既不宜附和民主共和，也不能仍标榜君主立宪：“夫在一年以前，此说固有最强之理由，今则立言不易矣。盖昔所以主张君主立宪者，谓欲避杀人流血之惨也，今则已杀人矣，已流血矣。将士之暴骨沙场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民之失所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万，问其原因何在，则皆由皇室无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无道，遂使举国涂炭，今仍欲倡议保全其皇位，其势实不顺。”十年以来，一国青年有为之士为政府官吏所杀者，无虑数万人。“今者怨毒之气，已弥漫全国，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术或以力钳止之，纵或能弥缝一时，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发。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听之革命之良心，此则俟袁世凯与之交涉可也，非吾党所宜代为之言也。”^[13]

不仅如此，在同党看来，非但不能继续主张虚君共和，保留清室，而且应该设法与之切割，以自证清白。有同党致梁启超函称：“自武昌肇事以来，足下政见未经发表于世，有之则仅一《新中国建设问题论》，其时所持论仍是虚君共和制。若有机不出，则人将疑足下仍有故清系恋，他日若有宗社党余孽煽惑，且诬足下以恶名，虽有百喙将何从而辨之。”总之，“吾党处现在时局，既已屡次失机，如袁果有援引之意，万不可错过，否则一年之后，政党林立，人才辈出，他日将无容吾辈跼足地矣”^[14]。虚君共和在世人眼中，已经与拥清保皇脱不了干系。

在民主共和的大势所趋下，虚君共和的确不合时宜。其时南北舆论大都倾向民主共和：“惟前代之革命战争，无非因争夺王位权而

起，盖专制相承之国，其国民初未有立宪共和之观念，故革命之起，无不以王位为其目的物，故革命之名词，亦仅为易姓改物时之所专用。自欧美之政治思想输入以来，久苦于专制之国民，乃勃起而欢迎之，革命之声，渐流布于薄海内外，而革命之意义，亦大变其本来，几若专为推翻专制政府，改建立宪共和政体之标志。故自今以后，我中国革命战争之兴起，不可不以转移统治权为目的，若复有觊觎王位、专窃政权之举，则固为我国民族之所决不能容者也。”也就是说，真正转移统治权的革命，恰好是防止争权夺利的有力保障。

辛亥革命即体现了真正革命的作用。“此次我国革命军之起，其宣示于我国民者，一为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是无人种战争之意味，……一为建设民国、创立共和政体，是无争夺统治权之性质。故此次战争，纯乎为转移统治权之政治战争，一改历代革命战争之面目，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一种之异彩。不特大多数国民倾向于此主义，即清政府中亦已承认此主义而不惜让步于国民。虽实行宪政与创立共和，主张各异，而转移统治权之主义，实已确立而不可移。我国民今日所当兢兢注意者，即在维持此主义，不使稍有所动摇，以免他主义之阑入。”^[15]这的确是“形势比人强”的典型表现。

有人进而概括宣称：“夫国体有二，曰君王，曰民主。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民主立宪者，诚现今最良之政治，亦我同胞四万万人所公认之题目也。故共和政体，实中华民国必不可易之政体。”^[16]正因为共和不可阻挡，任何可能威胁共和实现的言行都会遭到强烈反对。“今各省军政府成立，共和政府亦将出现，其于君主政体已有不能并立之势。乃政府欲为调停之计，劝谕各省公举代表晋京与资政院议员组织临时国会，以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不知召集之诏甫下，反对之电已来，则将来国会之能否召集，不烦言而已决。”^[17]

对于试图调和君主与共和的努力，康有为自诩是创新的“神来之笔”，可是连持论偏向北方的《大公报》也发表评论讽刺道：“自君主、民主问题争持不解，于是居间人于无可调停之中幻造一调停之法，曰君主共和立宪国。予初以为外人之恶谗，特用以调侃吾国之君民两党者，乃征诸近日所闻，则赅赅乎将有实行之势。既有君主，何云共和，既云共和，何有君主，子矛盾，尚复成何政体？既有皇帝，何用总统，既有总统，何用皇帝，并妻匹嫡，尚复成何国体？是

真于君主、民主、联邦、合众诸种国家之外，别创一新奇之格，宜称之为曰骑墙国。”^[18]

日系的《泰东日报》连载评论《无意识之虚君共和政》，认为虚君共和为无意识之举，因为大概有两种情况需要虚君，一是群雄割据之时，希望宪政的国民为了统一民心，公推一位有德的贵胄为皇帝，免其一切政权与义务，只在各种典礼上为神圣的元首；二是当国民政治思想十分发达，以自由讨论评决国家要政为是之时，由国君特委国民代表以统政的权利及义务，而国君则自就闲散之地而独守其神圣，其视国民如赤子，国民视君如父母。考察革命党起义的理想和清廷对革命党的真意，绝不可能将昨日的虏酋视为父母，或将昨日的匪类视作赤子。袁、孙若以此为敷衍手段，不仅欺天，还会为百年国体留下永无断绝的祸根。

虚君位之妙，在于国君自卸其精神的责任，或国民愿代国君负担责任，毫不含有限制君权之意。好比孝子持家，揽权负责，同时标榜老父代表门户。如果精神上的根据有瑕疵，则与虚君位原理不符。清帝与中国国民之间，本来就隔膜甚大，经过公开冲突，被迫下台，更难协调。或谓清帝有利于绥抚蒙藏回部，共和政府则难以做到这点；实则清帝退位后并非如罗马教皇为教界元首，而清朝统一蒙藏也不是由于宗教精神的凝聚。如果需要对蒙藏的教皇，则清帝还不如活佛。况且二十二省也不能视清帝为神圣教皇。清人入主中国，即使盛世帝王，也不得国人爱戴，被迫退位的清帝，更没有虚君的资格，虚君共和或帝国共和，都是妄说。^[19]

不过，由于南北君民之争久拖不决，战事延续的危机始终笼罩，且时有波折回澜，尤其是北方的一些报纸，不时发出怀疑的声调，制造悲观的气氛。有人质疑：“中国既不能法美国之共和制，又不能使独立各省复归统一，然则果何道以从乎？”^[20]也有人模棱两可，一方面指责“于是忧时爱国之士各抱政治主义立说，上书指陈得失，或主张君主立宪，或主张民主共和，议论纷纭，言各成理，何去何从，几令同胞莫衷一是。不知君主、民主者，国体之区别也，立宪、共和者，政体之关系也，苟国体徒易其虚名，而政体罕收其实效，夫亦何取而为此无意识、无价值之革命也哉？且立宪、共和所异者，只此名号之分，而实在之精神为国民求权利者，则一也”。另一方面又断言：“旷观世界大势，由专制而进于立宪，由立宪而进于共和，此为一定之阶级，而不容稍越者也，使共和政体行之而不善焉，则易开衅

隙之端，将仍归专制之下，此又天演物竞之理，势所必至者也。”

[21]

对于“政体之递嬗而演进也，率由专制而趋立宪，由立宪而转共和，故如我国今日之急进，人亦有以躐等为言，以为自后政争将无宁岁者”的说法，有人不以为然，表示：“殊不知此亦视国民之道德心何如，共和国民应有之道德，我国民果无不完且备也，则彼殆适成其为杞忧之见。” [22]

与躐等说相伴，君主的存废及其作用再度成为议论的话题。有的只是就具体事务或区域而言，如“今更进言吾目前最危最急之祸，非存君主不能解免者，莫财政若。此次兵争，财政上之丧失，无虑巨万金，公私交困。……如取共和之实而仍君主之名，则政体改而国体未改，关税即可收回，贷款不难成立” [23]。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很大，“君主、共和，双方并峙，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谁欤能下真实之判断者？以程度言，则边僻地方，尚以开明专制为最宜，去君主立宪，尚觉偶乎其远，而奚论共和也。以东南各省之趋势言之，则受君主之酷毒也已久，人心殆无不倾向共和一方面，语以君主立宪，格格乎其不相入也” [24]。国体政体取决于国民程度，而国民程度因地而异，不可一概而论，所以要因地制宜。

有的则涉及整个政治体制的建制，或者承认“共和国体，为世界立宪国家最优最美最良最善无疵之国体。凡其国国民教育，普及发达，程度智识，日新月异而岁不同者，无不以共和国体为所欲达之最上目的”。但是共和要从形式及精神两方面观察，“精神上共和者，其全国内一切立法、司法、行政之活动，及改革一政治，施行一政策，无不顺乎大多数国民之趋向与社会之心理。其发表于外部，而见诸实行者，恰与舆论相符合，此精神上共和也。如英、比等国，虽名为君主立宪国体，而实具共和之精神”。至于“形式上共和者，其国之性根本属专制，而又知专制之不足以立国，不足以服民心，不足以与世界列强齐驱而并驾也，乃一时的将国体上冠以共和之名义，为将来阴行专制手段之地步” [25]。必须名实相副，才是真共和；如果徒有其名，则与专制无异。

如果说上述还只是对民主共和表示怀疑，对君主立宪有所寄望，属于态度消极，那么有人就从当时各方争议不下的几大问题入手，提出调处的具体方案。而所提的方法，名为调处，其实正是虚君共和论

的余绪。关于国体问题，其引马卡伯利的君主、共和两分法，虽然东南各省已群趋于共和主义之潮流，而唾弃君主二字，但共和有贵族、寡人、民主三种，贵族共和不宜于今日，“惟民主、寡人两主义颇有研究之价值。平心而论，吾国今日全体人民（合满、蒙、回、藏在内）果能及民主共和程度乎？未可知也。人民既无此程度而贸然行之，是犹强学步之婴孩以趋走也，鲜不僨仆者”。

民主共和既不可行，余下的只有寡人共和。“吾国学识宏通，深明中外大局，贤达君子颇有其人，依宪法上之规定，以此项少数人行使政权，如历史上周召共和之例，与夫日耳曼联邦共和之制，稍为近似，实今日之便利也。至其组织之法，宜设大统领正副各一，代表君主行使中央政府最高权力，为国民担负责任。统领之下，设内阁一所，以内阁大臣数人组织之，不设总理，而统属于统领，仿佛美国元老院之制。其选任之法，大统领则由国会公推，内阁大臣则由大统领酌派，而必得议院之同意。又各部之部长及联董可以入充总统及内阁大臣之任，而内阁大臣及统领等又可出当部长及联董之职，犹之周代侯伯之出专征伐入辅王政之义。”

至于国际代表名义与国号，“民军之所求者在夫改良政体，而非欲帝制自为，政府之所争者在此空虚名义，而非欲大权独揽。夫政治之权力既为君主所甘让，民军已攫取之，帝号之名义为民军所不需要者，政府何妨仍用之，而何必为此两败俱伤之策，以自相残戮乎？为调和两方面以维持大局计，莫若仿春秋侯伯共戴周室，周召夹辅王政之义，政治行以共和，名号仍存君主，定现在帝室为国中一特别阶级，畀皇族懿亲以畿辅特有权利，庶为平允。若国号则两方面有调和之一法，黄帝纪元乃关民族全部分历史上之总纪念，现帝国号乃属一朝代统系之问题，二者不甚相牴牾，何妨双方采用，称黄帝纪元若干年第几朝代某国号某帝第几年较为便利。至各联部部长之职守，今帝之特权，由宪法上规定之，如是则君主、民主之纷争可以平息，满汉之意见可以融化，国势必蒸蒸日上矣”^[26]。这样内外有别的苦心孤诣，正是虚君共和的变种，其目的同样是借着南北君民相持不下的机会，为清帝留下一线生机。

[1] 《许鼎霖致苏州大都督程、上海外交长伍、民政长李书》（续），《大公报》1911年11月27日，第2版，“代论”。

[2] 第三者：《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大公报》1911年12月5、6日，均第2—3版，“征文发表”。

[3] 徐士瀛：《读大公报论中国今日政体上之解决书后》，《大公报》1911年11月29、30日，均第2张第3版，“来稿”。

[4] 《驳康梁虚君共和说》（录稿），《爱国报》第1840、1841、1844号，1912年1月28、29日，2月1日，第六页。

[5] 《唐绍仪媾和策》，《民立报》1911年12月16日，第4页，“新闻一”；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0—1372页。经清内阁会议决定，由清廷批准等信息来自郑孝胥日记，所以两注一并给出。《民立报》还称此“恐系传闻之词，姑照录之”。关于二十二条，两处内容大体一致，文字略有不同，其中第二十条意思不同，《民立报》为“宪法及关于国王权限事宜”，《郑孝胥日记》为“宪法上关于国王权限事宜”。另外，《民立报》本页还有一篇《所谓议和之条件》评论此事，对此方案不满，称“既为共和国矣，何以复有国王”。

[6] 《研究政体之种种问题》，《大公报》1911年12月13日，第3版，“要闻”。

[7] 《关于和议之紧要消息》，《大公报》1911年12月23日，第4版，“要闻”。

[8] 《关于议和之紧要消息》，《大公报》1911年12月25日，第4版，“要闻”。

[9] 《袁内阁对于和议之政见》，《大公报》1911年12月27日，第4版，“要闻”。

[10]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61—166页。关于此事及张琴，参见李冬木、[日]佐藤亘、[日]吉田富夫《帝国共和：从“清皇”到“大圣皇”——关于“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文史哲》2016年第1期，第128—142页。

[11]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73页。

[12]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2—593页。

[13]宣统三年十月廿四日吴冠英《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5页。

[14]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冯翼年、梁炳光《致孟远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2页。

[15]伦父：《革命战争》，《东方杂志》第8卷第9号，1911年11月15日，第3页。

[16]朴庵：《建设共和政府之研究》，《民国报》第1号，1911年11月21日，第1页，“论说”。

[17]梦幻：《对于召集临时国会之感言》，《大公报》1911年11月22日，第3版，“言论”。

[18]无妄：《闲评二》，《大公报》1911年12月24日，第2张第1版。

[19]《无意识之虚君共和政》，《泰东日报》1912年2月9—15日，（一），“如是我观”。

[20]卢剑秋：《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续），《大公报》1911年12月19日，第3版，“征文发表”。

[21]止岐氏：《对于同胞之忠告》，《大公报》1912年1月3日，第2张第2版，“来稿”。

[22]《论共和政体成立之有望》，《盛京时报》1911年12月31日，第1版，“论说”。

[23]许士熊：《解决现局平议》（续），《大公报》1912年1月6日，第2张第4版，“来稿”。

[24]《论中国之前途》，《盛京时报》1912年1月13日，第1版，“论说”。

[25]《形式共和与精神共和》，《盛京时报》1912年1月14日，第1版，“代论”。

[26] 《致民军政府请速和平解决以维大局政见书》，《大公报》191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1月18日，第2张第4版，均“录件”。

第四节 虚君共和与国体政体

君主与共和能否并存，因缘于国体政体的分别与联系，从而惹起国人对于国体政体问题的再度关注，连旗人也加入讨论。对于君主独裁，包括旗人在内的国人大都主张扬弃，“我国历史上的沿革，以国体而论，本是君主国体，以政体而论，本是专制政体，我们立国数千年，从来并没见史书上载着有民主共和这种名词。论起实际来，君主与人民并没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只与政体上大有关系，政体良美，人民便能同蒙其利，政体恶劣，人民便能交受其害，这是中外哲人贤士久已考察出来一个历历不爽的道理。我们向来立国，全用的是专制政体，这个专制政体，乃是最不利于人民的一种物件，因为专制政体乃是一个君主独裁的政治”^[1]。此言出自旗人之口，可见扫除君主专制确是人心所向。

就时势而论，共和无疑是大势所趋，而国体政体的论说为此推波助澜。“自国体问题发现，举国人心所以反对君主、倾向共和者，为人人欲得选举权、参政权，一扫数千年专制帝国之积弊，不使新中国留此污点也。盖帝国与民国，其政体迥不相同，君主与民主，其地位亦截然相反。今论者万口一辞，无不以共和为无上之政策，不但南省绅民出死力以相争，即北省绅民亦随声而附和。”^[2]正因为明了道理所在，才能万众一心，声应气求。

国体政体之分在日本原是为了论证其独特的君主立宪体制合理而生，移植中土，却成了民主共和思潮的一大推手。但是究竟采取何种政体为宜，仍然众说纷纭。因为“共和与专制二者，乃政体上之区别，而于政事之美恶，则另为一问题”^[3]。尤其在尚未脱离清朝控制的北方各省，虽然知道民主共和已是大势所趋，对于国民程度是否适合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疑虑。有人就此论道：

国体者，一国主权所在之谓也，国民者，组织国家之要素，辅国体之进行，俾国家稳健坚固而不生危险之现象者也。国体程度高于国民程度，或二者相差过甚，则国家对内无以谋生存发达，对外无以团结势力，而竞争于世界大同之时代。国民程度高于国体程度，则其国民必厌恶政府，组织绝大政党而思所以改造国家，推倒政府，此自然

之势也。共和国体为世界立宪国最优之国体，欲觐其国民之程度果与国体适合与否，须从其国内之各种社会、各种教育及农工商业发达之状况而定。所谓共和国民者，必其国内之大多数人民知识、学术及政治上之思想皆与国体相符合，而后国家基础益固定而不可以动摇。非然者，其国体中每生种种之变相，非渐流为少数专制，即渐趋于独裁政治，或酿成议院专制之结果，是皆国体之变态，其人民实力不足与国体相辅而行之流弊也。中国今日国体将确定为共和，一般国民皆休养生息于共和国体之下，然中国国体果与中国国民程度相合与否，为最有研究价格之问题。

作者希望政府“留意于增进国民之程度”^[4]，以免各地国民程度不一，与共和国体不相适应，滋生种种弊端。所以，尽管大势潮流，多半倾向共和，君主已处于失败之地，却未必是民主优于君主的体现，“民主自民主，共和自共和，合而为一固可利国福民，离而为二仍不免革命流血，勿谓共和二字即民主之代名词也。知乎此者，乃可与言真共和”^[5]。

也有人虽然承认“大道有经有权，有常有变，经与常固一定之规则，权与变则与世为转移”，也知道“欧西自契约说行，权利、义务各自分明，君主遂为人民之公仆，久之，世界渐趋于文明，程度日高，权力日涨，竞争愈烈，生存愈久，于是尽人皆有国家之观念，抱政治之思想，知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弃君主而图共和”，可是却辩称：“合中外之治理、治法以参观，果能国利民福，虽开明专制也可，君主立宪也可，即民主共和也亦无不可。国体之解决不解决，在通人达士固无所谓争执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清廷统治甚好，非历朝历代专制可比，应当继续维系。^[6]

形势比人强，在国体政体热议的纷纷攘攘之中，清廷终于决定退位，接受共和。可是关于此事的报道中，清帝退位享有优待不断被说成是虚君共和。2月4日《大公报》的报道就说：“议决虚君共和国体各条件已纪昨报，兹闻以上各项现向南京枢府往返电商，此中一、二、三、八、十、十一、十三七项略经议定，其余六项现正电商之际，可望彼此一致，无所更动。但此等未决条项经民国赞同后即奏请懿旨确定，故公布之期尚须有待。又闻十四日御前会议后，皇太后业已承认虚君共和，南京亦表允从之意，惟目下尚有一般反对者，故宣布须少缓。”^[7]次日该报仍然声称：“虚君共和国体日前□御前会议已经决定，迭志本报”^[8]。又援引来自内阁的消息说，近日驻京各公

使连赴迎宾馆拜晤袁内阁，有秘密会商之要件，“闻其内容系关于解决国体后之各项问题，如内阁所提出之虚君位共和办法及取消南京政府等事，民军尚未承认，内阁抑或坚持，彼此又有互相纠葛之势，故各公使仍拟再为调停，以免终于决裂云”^[9]。

也有人看到，和议迟迟无果，并非因为君主的存废，“或谓国体一日不定，和议一日不成，即战祸一日不息，不知国体问题早已迎刃而解，而今日所断断争执者，则为解决国体之外，另发生之一大问题也。盖未允共和以前，由种族问题发生政治问题，由政治问题发生国体问题，此今日议和之结果也。既认共和以后，由皇室问题发生国会问题，由国会问题发生政府问题，此今日议和之开端也。国体问题所争者在君主、民主，其名固不并存，政府问题所争者在南京、北京，其势亦不两立。然君主既两无所望，则国体之解决其事易。”如果和谈不成，重新宣战，“当认为孙、袁之宣战，而非君民之宣战，盖君主二字，无论虚君共和、民主共和，已于议和两月以来暗中消灭”^[10]。这一判断，在北京方面大体不错，在南京方面则未必尽然。袁世凯并不代表君，孙中山则仍然代表民。

虚君共和虽然事实上没有可行性，舆论风传却始终不绝于耳。“内阁前日呈进要折一封，图一件，据个中人云：该图确系为虚君共和政系表，折中系解释君位与该政体之维系，并证明日前所拟十三条之种种关系。惟该表当日复由内廷发还内阁。”^[11]“袁内阁于十五日呈递密折一件，其内容闻系详细解释虚君共和一切组织，其最关紧要之句为政权虽皆逊让，皇位仍旧存留，请毋滋生疑虑云。”^[12]据说内阁还接到康梁二人联名来电一件，“其内容系表示赞成虚君共和之政体，并于内阁所拟各条款颇有指陈。袁已将种种不得已之苦衷电告康梁，并详述其委屈婉转保存君位之本意云”^[13]。

罗惇齋指康有为的虚君共和为袁世凯所利用，最大的可能就是后者将此与退位优待混为一谈，以便敷衍满蒙亲贵王公。《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可以佐证：“虚君共和政体已将规定，袁内阁特将所拟条款于十八日通告驻京各蒙古王公。兹闻该王公等对于所拟均极赞成，并无反对之意，日内即行公谒袁总理详筹一切。”^[14]“虚君共和政体，内阁特将十九信条所定各节逐一比较，于日昨布告亲贵。兹闻各王公以政体虽改，而宗祀未湮，君位犹存，深感袁总理维持之苦心，故均无反对之意，虽恭邸亦表示赞同，刻均静候发表。”^[15]

利用虚君共和，不单是为了安抚北方，也有增加与南方讨价还价筹码的用意。“共和诏旨一经发表，袁内阁即当首先将所抱宗旨刊布中外。兹探袁内阁对于此项刊布极为踌躇，偏于君主则与时势不合，偏于共和则招中外讪笑。近与各幕府屡次讨论，当商出一法，系对于君主及共和两方皆用虚写，其重要处即将此次出仕原属调停和局，并无他项奢望种种之苦衷叙明，大约将来即用此意。”^[16]

南方对于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始终高度警惕，双方反复磋商的条款，都要清楚写明清帝退位或逊位，才能给予优待。一直关注报道此事的《大公报》对于双方所争的焦点心知肚明，在刊出新订条款后特加按语：“以上各款仍系逊位，并非辞政，不得谓之虚君共和，不知内阁如何磋议。”^[17]其后续报道称：“内阁前次提出优待各条款，已由南京民军议决电复，袁内阁遂于二十一日特开阁议研究。闻袁意以各项条款虽多删改字义，尚无不可。惟其中最要者为甲类中皇帝尊号无相承不替字样，且以外国君主待遇，殊与内阁所拟虚君共和宗旨相悖……皆为关系至要问题，未便承认，议定后除电复伍代表外，并奏请皇太后钦核。”^[18]

面对南京临时政府方面的坚持，袁世凯再次以武力相威胁，“冯、姜、段各军统对于虚君共和政体极表赞成，已联电伍廷芳，要求承认优待条件”。伍廷芳通电表示：此次袁内阁提出优待条件，已由参议院协定，并将修正案令全体议决，“惟清帝逊位字样必须标明，非是即不足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且含有虚君位之嫌疑。此次自武昌起义所流之血，聚集可成江河，国民之所希望者，惟在共和，故对于清帝逊位一事不能不始终坚持。而诸公欲保存旧帝之苦心，此间已为人所共谅。但以此事关太钜，不能含糊了事”。冯国璋接电后，“再联合各路军队复去一电，于逊位二字大为反对，力请撤销，否则死不认可”^[19]。如此可见，南北暗中就是否虚君的博弈，其实相当激烈。民党唯恐稍有不慎，给清廷留下任何重掌权力的口实机会。

清帝退位诏书颁布之日，有人总结一年来的大变局，分为三个时期，最后“为君民议和时期，即专制消灭时期也。当此之时，言战则饷械俱穷，言抚则口舌无效，适因外交团之介绍，停战议和，于是由种族问题变为政治问题，更由政治问题变为国体问题，而君主、民主之争议起。其始政府坚持君主立宪之说，迨一再展期，共和之潮流遂有一往莫遏之势。政府知非改建共和不足以挽回人心，保全领土，皇太后亦力顾大局，不忍以一姓之尊荣陷生灵于涂炭，慨然允行虚君共

和国体，以政权让之国民。有施必有报，民军遂提出优待皇室条件，以表其酬报之忱，此今日议和之终局也”^[20]。有意无意间仍然将退位优待混同于虚君共和。

虚君共和的主张能否成立，是否如康有为所自诩为奇妙政体，可以从当时中外人士关于国体政体的辨析大致反映出来。有人主张：

共和为国体之一，而或以为政体者，此不明国体与政体之区别者也。国体与政体之区别，极易混淆。虽欧美积学之士，犹复断断致辩，莫衷一是。然苟就统治权以立论，则二者之区别，初不甚难。……国体所以定统治权所在之问题者，政体所以定统治权作用之问题者，由统治权所在以定国体，则有君主国与共和国之分。而共和国，实兼贵族国与民主国而言，即一人而占国家最高地位者，为君主国，少数人而占国家最高地位者，为贵族国，一般人民而占国家最高地位者，为民主国。更由统治权之作用，以定政体，则有立宪国与专制国之分，即立法、司法、行政三者。各设分任机关以运行之者，曰立宪；其不分任者，曰专制。然则共和乃国体之一，其与政体，固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乃不明此义者，犹复以之为政体。一若政体之中，于立宪、专制外，更有共和政体之一种，与立宪、专制，鼎足而三，是则非但不合于学理，亦且有背乎事实。何则，共和国家，未有不立宪者，若以共和为政体之一，而立宪又为政体之一，岂非一国而有两种政体乎？……不宁惟是，若以共和为政体，则政治而善，将唯共和贪其功；政治而不善，亦将唯共和尸其咎矣。不知共和乃国体，其优胜之点，即在元首不世及。夫元首不世及，则不患无治人。至于政治之善恶，又当视其政体以为转移。此所以共和国家，未有不立宪者，盖必立宪而后不患无治法。由是以观，则不患无治人，为共和之力；不患无治法，为立宪之功。一为国体，一为政体，各有所长，莫能相掩。若直以共和为政体，而政治之善恶，其功其过，又悉归诸共和，是岂持平之论，焉得而不辩哉。^[21]

按照此说，君主制与共和制同为国体，而同一国家不能有两种对立的国体，因此绝无并存兼容的可能。

同样是依据国体政体的辨析，日本人士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

抑所谓君主国体、共和国体云者，固似正反对之国体，如水火之不相容，然此特为法理上之相违，国家之本质，则君主国体、共和国体实为同一。盖国家由主权而成立，所谓主权者，法理上绝对无制

限，君主国之主权与共和国之主权，其本质为平等。惟主权之所在，或存于一人之君主，或存于国〔团〕体合议之意志，而别为君主国体及共和国体，其主权之性质，要为同一，何则？主权者之意志，即成法律，而既成法律以后，则为无论君主国与民主国，皆得向于其人民要求强制，使其绝对的服从法律，则无不同也。至于共和国体，虽又有贵族共和、民主共和之别，然此亦但因组织主权团体员数之多少，而无根本的差别。惟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法理上似为全然正反对之二大制度。然在今日世界文明各国，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成立宪政体，故处今日而论国体，断无优劣之訾议。此何以故？昔之政体，君主、共和同为专制，故评论其优劣，研究其利害得失，有时谓当废君主国体而变为共和国体，有时谓当变共和体而改为君主制。若夫立宪政体，则政府之权限与人民之自由皆据宪法而确定，不能互相侵害，故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其行政之实质内容均属同一，无变更国体之必要。立宪代议制之君主国，其国体虽为君主制，而政体实含共和制。单头大统领之共和国，其国体虽为共和制，而政体当仿君主制。要之，国体为君主制者，则其政府之组织（政体）宜调以共和制之要素，采共和制之所长，补君主制之所短，此至要之务也。^[22]

尽管二者各执一词，无法统一，只要不带成见，甚至别有用心，就学理而论，也无须统一。无论如何，帝制与共和，不可能作为国体而并存，但可以作为国体与政体而兼容。只是现实政治不容含糊其词，有所闪失。伍廷芳解释优待清室条件时，斩钉截铁地指出：“民国政府于赞成共和、自愿辞位之清帝虽可予以优待，然万不能于共和国体稍有妨碍，有蹈虚君位之嫌。”^[23]此言足以为针对民主共和的国体政体之争以及虚君共和主张画上句号。

[1] 君主立宪维持会编辑部干事春治先来稿：《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利害》，《大公报》1912年1月23日，第2张第4版，“白话”。

[2] 梦幻：《阅直、豫谘议局与民国总统来往两电书后》，《大公报》1912年1月24日，第2版，“言论”。

[3] 《论今后我民之天职》，《盛京时报》1912年1月24日，第1版，“论说”。

[4] 选：《共和国体与共和国民》，《大公报》1912年1月28日，第2版，“代论”。

[5] 梦幻：《闲评二》，《大公报》1912年2月1日，第2张第1版。

[6] 《候选知县朱龙伯上袁内阁书》，《大公报》1912年1月31日，第2张第4版，“来件”。

[7] 《国体问题宣布之慎重》，《大公报》1912年2月4日，第3版，“要闻”。

[8] 《国体问题将完全解决》，《大公报》1912年2月5日，第3版，“要闻”。

[9] 《解决国体后仍待调停》，《大公报》，1912年2月5日，第4版，“要闻”。

[10] 梦幻：《解决国体外之议和问题》，《大公报》1912年2月5日，第2版，“言论”。

[11] 《呈进虚君共和政系表》，《大公报》1912年2月6日，第3—4版，“要闻”。

[12] 《袁内阁密奏之内容》，《大公报》1912年2月6日，第4版，“要闻”。

[13] 《康梁赞成虚君共和》，《大公报》1912年2月8日，第5版，“要闻”。

[14] 《蒙古王公与虚君共和》，《大公报》1912年2月8日，第4版，“要闻”。

[15] 《亲贵王公与虚君共和》，《大公报》1912年2月8日，第4—5版，“要闻”。

[16] 《袁内阁宣布宗旨之预闻》，《大公报》1912年2月8日，第4版，“要闻”。

[17] 《民军电复优待皇室条款》，《大公报》1912年2月10日，第4版，“要闻”。

[18] 《关于优待条款之阁议》，《大公报》1912年2月11日，第3版，“要闻”。

[19] 《各军统关于逊位之电争》，《大公报》1912年2月12日，第5版，“要闻”。

[20] 梦幻：《辛亥年回顾录》，《大公报》1912年2月13日，第3版，“言论”。

[21] 浩如投稿：《论共和为国体之一》，《盛京时报》1912年2月15日，第1版，“选论”。

[22] 高劳：《东洋最初之共和国》（节译日本《太阳杂志》），《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1日，第36—37页。

[23] 《临时政府法令及来往公文·伍代表解释优待清帝条件》，《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1日，第26页，“内外时报”。

第五节 结语

1912年10月22日，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此文当年就做了《庸言》的代发刊词，而该刊是梁启超宣传进步党政见的主要阵地。这篇文章相当于梁回国后的宣言书，同时也是关于自己过去政见的辩解书，从中可见其共和心路历程的跌宕起伏，也相当程度反映了辛亥时期中国共和发展演化的轨迹，而国体政体之辨正是其辗转腾挪的学理凭借。

梁启超声称，自己的立言宗旨，“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世论或以其曾主张君主立宪，如今在共和政体之下，不应有发言权，即欲有言，也应当先自引咎，以求恕于畴昔之革命党。甚至捏造谰言，“谓其不嫌于共和希图破坏者”。即使同党同道中，也有人“疑于平昔所主张，与今日时势不相应，舍己从人，近于贬节，因噤嚅而不敢尽言者”。梁启超以为，“此皆讦词也。无论前此吾党所尽力于共和主义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张，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此志固可皎然与天下共见”。

梁启超如此坦然自辩，理据就是“国体与政体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识者频能知之矣”。去年九月以前，君主存在还俨然为事实，而政治败坏已达极点，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的方法，分为两派。一派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使得君主因民怨而自速灭亡，因而不救正其失政，惟有从事秘密运动以加速其覆亡。一派则不忍生民涂炭，设法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藉以与一战”。两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却是相辅相成。武昌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相互协力，就是明证。既然前此曾言君主立宪者并未负于国民，则今日更不必因何嫌何疑而不敢为国宣力。

至于强诬前此立宪派为不嫌于共和，更是无理取闹。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对于国体主张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夫于前此障碍极多之君主国体，犹以其为现存之事实而承认之，屈己以活动于此事实之下，岂有对于神圣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反挟

异议者。夫破坏国体，惟革命党始出此手段耳，若立宪党则从未闻有以摇动国体为主义者也。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而何有节操问题之可言耶。”前此所担忧的革命后种种险象，不幸而言中者十之八九，事实章章在目，不能隐讳。不能说中国今日已治已安，爱国志士的责任从此完成。“平心论之，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既然欲将国家脱离厄区跻诸乐土，而今方泛中流，未达彼岸，其责任的艰巨十倍于前，更加不能推卸。

因此，梁启超理直气壮地宣称：

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则谓吾既已为国家立大功成大业矣，畴昔为我尽义务之时期，今日为我享权利之时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于清政府者，今则欲取什伯倍之安富尊荣于民国以为偿。此种人自待太薄，既不复有责备之价值。其束身自好者，则谓吾前此亦既已尽一部分之责任，进国家于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则翛然于事外而已。而所谓温和派者，忘却自己本来争政体不争国体，因国体变更，而自以为主张失败，甚乃生出节操问题。又忘却现在政治，绝未改良，自己畴昔所抱志愿，绝未贯彻，而自己觉得无话可说，则如斗败之鸡，垂头丧气，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两方面之人，既皆如此，则国家之事，更有谁管。在已治已安之时，人人不管国事，尚且不可，况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若谓前此曾言立宪之人，当共和国体成立后，即不许其容喙于政治，吾恐古往今来普天率土之共和国，无此法律。吾侪惟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尽人有分，而绝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国家为其私产，以政治为其私权，其所以迫害吾侪不使容喙于政治者，无所不用其极。吾侪未尝敢缘此自馁，而放弃责任也。况在今日共和国体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此鄙人所为欲赓续前业，常举其所信以言论与天下相见也。^[1]

国体政体之辨，为梁启超找到脱困的空间，避免了一面倒的共和声势下今是昨非的尴尬。国体政体辨析的出现及其在近代中国的表现，表明因缘不同的社会文化创造出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学说，虽有一定的规律和一般的规则，却很难成为毫无例外的通则。以前所未有作为己所不能的依据，是行动力缺乏的表现。反之，以为可以一厢情愿地任意作为，迟早也会付出代价。其间的“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拿捏起来极为困难。政治学、国家学、法学之类的学科分际，其实是依据人类社会不同实体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归纳和解释，并非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公例，梁启超等人书生意气，纸上谈兵，以为必须完全按照学理建政，只能是缘木求鱼。

可是，梁启超虽然惨败，革命党也并非完胜，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毕竟也是重要参照。参验民初的历史，康有为、梁启超关于共和之后的种种预言和描述，可以说有着惊人的相似。几年后，康有为将其辛亥之际的文字编辑成《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表示当年的预言都不幸成了现实。中国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承受了无数的苦难和牺牲，才终于摆脱了割据纷争以及专制独裁的困境，以至于民初不少人为何当初悔恨不已。然而，这或许是浴火重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即使历史可以从头来过，人们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近年来或者提出回到康有为，显然对于辛亥民元康有为鼓吹虚君共和的别有用心及其到处碰壁的尴尬境遇不甚了然，至少所开出的方子无法根治所面对的症结。

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必须取法域外，有所选择，取法是大势所趋，选择则要根据国情。而不同方面和人物的立场地位见识有别，取法选择自然有异。化为政治口号的共和，在辛亥革命的滚滚洪流裹挟下看似成为人心所向，只是这样的异口同声之下，各自心中的共和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指向。如果各方都一味以各自的利害为考量取舍，冲突就难以避免。而模糊分歧的最大公约化，不过是暂缓了矛盾的爆发，并没有解决问题。究竟如何是好，还有待国人继续披荆斩棘，开拓进取。

[1]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第5—7页，“讲演”。

汉奸篇

引言

“汉奸”一词，作为一类特定人物的专门指称，今人看来似乎不言而喻。尤其在网络世界，动辄以“汉奸”相称乃至对骂，已经成为流俗。尽管有人说叛国通敌当汉奸者以中国称最，可是，放眼中外，即使考虑到语言和翻译的差别，具有类似意识的国家、民族其实并不多见；纵观古今，有此概念并用于特指的历史也不算长，充其量就是近世才有的新名词，决非如坊间和媒体所误以为的是汉代以来的旧观念。

问题是，这一指称因为泛用而习以为常，很少有人注意其渊源流变。偶有提及者，也是望文生义地倒述。直到近年，才有识者发觉其非同寻常，予以关注并有所探讨。发其端者，首推神户大学文学部的王柯教授，他于2004年在《二十一世纪》第6号发表了《“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一文，用历史的方法对“汉奸”一词的起源流变进行了大致的梳理。该文经过补充增订，改题《“汉奸”考：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发表于岩波书店《思想》第981期，并收入陈理、彭武麟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吴密发表了《清代官书档案所见汉奸一词指称及其变化》（《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汉奸”考辩》（《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谁是“汉奸”》（《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等文，并撰写了题为《民族和国家的边缘——清代“汉奸”名实关系及其变迁》的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在王柯的基础上，将晚明至清亡的汉奸指称及其演化分时段予

以呈现。作者显然不满于先入为主地认定“汉奸”为民族主义的主观臆造，不过基本架构仍是后设的民族与国家。

201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杨思机提交的出站报告《汉民族指称的形成与论争》，不仅探究了“汉族”这一特定专有名词概念形成演化的历史进程，为理解把握“汉奸”的演变提供了必需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专章论述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奸”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注意到王学庄发表于1996年《近代史资料》总88号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作者辨》一文，已经考订出1907年1月25日在《汉帜》第1期发表《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的“锄非”，并非一般认为的刘道一，而是陈家鼎。^[1]此事一般难以想到和征实，虽然已被订正，可是前人失察，撰写专题论文于后，却继续以非为是，非经再度指示，很难避免以讹传讹。

经过上述努力，“汉奸”一词的缘起及其流变，大体梳理清楚，据此可知，“汉奸”并非古已有之，所谓历代汉奸，不过是用后来的观念指称前事；目前可以查实的“汉奸”一词，最早见于明末治理和经营西南土司地区的过程之中；清中叶以前，“汉奸”主要是清朝官方用于指称煽动拨弄少数族人反抗朝廷的不法汉人；鸦片战争前后，在延续清中叶概念的同时，又转而指勾结外夷祸害中国的汉人之奸徒，使得汉奸的指称泛化；扩而大之，后来也指学习外洋、用夷变夏的国人，汉奸与卖国贼连为一体，并且涵盖范围扩大到非汉人群。辛亥时期，与清政府的“汉奸”指称相对，革命党的排满宣传衍生出新的“汉奸”意涵，替满人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汉人谓之“汉奸”。

在王柯、吴密的论述前后，还有一些学人分别对清中叶西南地区、鸦片战争时期以及辛亥时期的“汉奸”问题做了专题研究，概念的把握未必自觉，所探讨的问题及所引述的材料史事，则与两位大体相同或基本不出所论范围。^[2]

先行研究推进至此，看似已经剩义无多，可是相较于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的错综复杂，可以发掘解读的历史实情仍然所在多有。现有的研究，或着重于概念的意涵，所预设的架构及选取的例证，不免仍然以后来观念先入为主，不能展现史事发生演化的多种可能；或缺乏观念的自觉，于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分别及联系模糊不清。尤其是关于辛亥时期汉奸概念的转义，大体虽然不错，具体则有笼统之嫌。吴密的博士论文全文近300页，涵盖整个清代，关于辛亥时期的汉奸问

题，仅第五章第二节专门论述，只有15页。尽管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对清末革命派‘汉奸’话语的构建及其所起的作用研究非常不足”，并且尽力搜集资料，试图重建相关史事，较前人的认识有所进展，尤其是关于辛亥武昌战事发生后的论述，为前人所未及，可是相较于材料与史事，不能不说仍然显得相当薄弱。不仅文本史事的梳理解读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就连已经学人考订的事实，也不免以讹传讹的一错再错。

杨思机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专章论述辛亥时期的汉奸问题，篇幅有20页。关于武昌起义前的部分，征引稍多；武昌起义后的部分，与吴密的博士论文讨论的问题相近，征引的材料则各有侧重，杨文主要依据当时报刊的即时报道，吴文则依据《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等资料集；此外，杨文还专节论述了革命期间“汉奸”含义的再次蜕变。

有鉴于此，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辛亥时期“汉奸”指称的转义及其使用为主题，进一步耙梳史料，重现史事，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历史本相及发展进程，进而依据历史实事把握相关概念及其演化。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本和史事，解读与前人有别，主要是正面阐述，而非对面驳论，识者自能辨别。

[1] 详见王学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作者辨》，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244页。

[2]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注意到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的突出和复杂，略而不论。白纯《鸦片战争前后的汉奸问题初探》（《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将鸦片战争前后的汉奸分为转卖鸦片者、接济逆夷者、煽惑百姓者、充作内应者、贿赂乞降者等五类，并归纳了清政府防范和处置汉奸的主要措施。王瑞成《晚清的基点——1840—1843年的汉奸恐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认为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泛滥，与各级官员推卸战败的责任紧密相关，背后则是国家与沿海社会关系重构的冲突。

第六章 清季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

辛亥时期，汉奸由原指鼓动少数族人反清以及勾结外夷祸害中国的汉人，转而指替满人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汉人。1901年孙中山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是迄今所知转义最早的发端。戊戌之后梁启超等人倾向革命，为“汉奸”转义推波助澜。《汉奸辨》区分“真汉奸”与“正色汉奸”，明确“满忠”才是真汉奸，分界由与朝廷为敌变成与国民为敌。而陈家鼎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列举的六种汉奸，可归为清朝文武汉官、保皇立宪派及假新党三类，均有实指，在强化倒满锄奸的同时，也产生将对敌手段用于同道同党的副作用。随着锄奸言行的泛化，“汉奸”在作为对敌斗争利器，的同时，部分变成打击异己的政治标签。

第一节 “汉奸”新义

辛亥时期排满革命的“汉奸”话语究竟开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一桩悬案。王柯将1903年《黄帝魂》一书所收《汉奸辨》，定为20世纪初叶，革命派为了打倒清王朝，开始对“汉奸”进行再定义的代表作，未提及此前是否已经出现再定义的先例。吴密也认为：“革命派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用‘汉奸’来指称那些维护清朝统治镇压革命的汉人为汉奸难以考证。”不过明确提出：“但若说到比较早而且影响比较大的当推‘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的陆皓东。”^[1]这样的看法，为探究汉族及汉奸缘起的学人普遍持有，杨思机也基本承接了这一认识。

1895年10月，陆皓东因广州起义事泄被捕，11月7日（九月二十一日）被杀。其间遭受刑讯，在供词中陈述受孙文的影响倡行排满：“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

陆皓东的供词，或者又称遗书，出自邹鲁所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甲）第1章（658—659页），该书并未提供原件影本，也未注明来源根据。邹氏民国时负责征集有关国民党史的文献，或许此项文件在征集所得的资料之列。不过，除《中国国民党史稿》外，其他相关著述，包括后来编辑的资料，均未征引过这份文件的底本。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之前，也从未有任何官私文书或报刊披露过此项文件。可见，除了邹鲁外，这实际上是一份不知所据的文件，《中国国民党史稿》成了目前唯一可以依据的底本。

如果供词为征集国民党党史资料所得，可能的来源不外有三，其一，清方档案；其二，后人保存；其三，他人收藏。而文本形式亦有三种可能，一是原件，二是抄本，三是转述。这些重要信息，显然与判断供词的真伪是否以及可信度息息相关。可惜的是，关于上述各节，邹鲁并无只字交代供词的来源出处，其他方面对此也没有任何说辞。就此看来，似乎只有邹鲁是唯一的知情人。后来的引据者，因为没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或质疑，无法对此进行必要的验证。

黄宇和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一书中，专门探讨了存在很大问题的“所谓陆皓东供词”的真实性，他认为该供词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鼓动反清而制作，二是南海县令为了堵住前来营救的美国驻广州领事的嘴而炮制。^[2]此说质疑供词的真实性，主要侧重于出自陆皓东本人还是其他当事方面，但没有完全否认其当时性。

从供词的遣词用字看，即便邹鲁确有所本，并非原本或经过改动的可能性也相当大。例如文中几处使用的“汉族”指称，现在虽然习以为常，当时却并非常用的专有名词。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汉族的概念1897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而且与汉人、汉种混用，20世纪初年，才逐渐普及并且开始进入约定俗成的过程。至于为“汉奸”重新定义，此前几无先例，此后数年间也几乎没有响应者，显得过于突兀。因为造新词固然不易，旧词新用同样困难。在刑讯的特定场景下，创新或熟练使用非常用词，难以想象。况且，即使供词的确存在，在邹鲁编撰出版《中国国民党史稿》之前，也处于世人不知的秘藏状态，要以供词作为新义“汉奸”比较早的例证，在考订确实之前，还须慎之又慎。由于供词此前并未问世，“且影响比较大”的判断，更是无从谈起。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革命党人为鼓动反清而制作的推测失去凭借。

质疑陆皓东供词的“汉奸”新义，并非否定“汉奸”的转义与革命党有关。从陆皓东的供词到1903年的《汉奸辨》，前后有八年时间。这在历史长河中或许显得短暂，可是世纪之交，恰是新名词开始涌入的时段，其间一些旧词也做了重新定义和解读，而最有可能最早对“汉奸”重新定义的，仍属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其关键的文本，则是孙中山本人撰写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被认为最早发表于1903年9月21日出版的留日江苏同乡会主办的《江苏》杂志第6期，后来编辑《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即据此将此文的时间系于1903年。直到1995年，狭间直树教授发表了《关于〈东邦协会会报〉刊登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文研究》第18号），并于次年在神户召开的纪念孙文诞生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关于〈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的若干问题——孙文来日初期的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的报告，确证《江苏》所载《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其实是两年前的《东邦协会会报》刊登的同一文章的再度发表。

[3] 1901年12月20日,《东邦协会会报》第82号卷首发表了署名“孙文逸仙稿”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虽然《江苏》刊本文字有所更动,尤其是原来的朝廷改满朝、清朝,清政府改虏朝、鞑靼,清改满、虏等,进一步凸显了反满的色彩,关于汉奸及其相关的用词则基本保持原样。

时间提前两年,不仅对了解文章的语境和解读孙中山的本意大有裨益,而且使得“汉奸”一词重新定义的起点有了新的证据。孙中山在文中明确说:

清廷常图自保以安反侧,防民之法加密,汉满之界尤严,其施政之策,务以灭绝汉种爱国之心,涣散汉种合群之志,是事以刀锯绳忠义,以利禄诱奸邪。凡今汉人之所谓士大夫甘为虏朝之臣妾者,大都入此利禄之牢中,蹈于奸邪而不自觉者也。间有聪明才智之士,其识未尝不足以窥破之,而犹死心于清朝者,则其人必忘本性、昧天良者也。今之枢府重臣、封疆大吏殆其流亚,而支那爱国之士、忠义之民,则多以汉奸目之者也。策保全支那者,若欲借此种忘本性昧天良之汉奸而图之,是缘木求鱼也。[4]

据此,“汉奸”在满汉对立中,不再是指反对满清的汉人,而是士大夫当中帮助满清的“甘为虏朝之臣妾者”,是“忘本性、昧天良”的奸邪之徒,其中就包括枢府重臣和封疆大吏。这与此前的“汉奸”含义截然不同,而与辛亥时期革命党人排满话语系统中的“汉奸”指称基本一致。虽然不足以支持六年前陆皓东的供词,至少表明受孙中山影响而倡行排满的陆皓东供词的主旨与孙中山的思想一脉相通。

孙中山重新定义“汉奸”,排满以为根本改造的宗旨当为主要动因。而戊戌前后“汉奸”语境的若干变化,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这些变化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汉奸”之“汉”的范围由汉人扩大到华人。鸦片战争后“汉奸”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时期之一,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申报》刊登《防奸续议》的论说,指出:“奸细有二,一为汉奸,一为倭奸,非汉奸则倭奸无所容身,非倭奸则汉奸亦不能传消息。”并进而提出防治办法:“窃以为防倭奸易,防汉奸难。倭奸虽改扮华人,终有破绽,若汉奸则本系华人中之无赖,惑于富贵功名之说,竟不知顺逆,觊颜事仇。其人本系华人,别无记号可以认识,其宅心之险恶,则更甚于倭奸。何以言之,倭奸虽为恶于我华,而其百计千方,暗中侦察,泄我秘要,以破我师,在

日本人视之，尚不失为忠心耿耿。独华奸本系食毛践土，履厚戴高，尔祖尔宗，尽是圣清之黎庶，乃一旦心肠变易，将情输之于敌人。在我朝固罪无可逃，而敌人亦视为无足重轻，不过饵以重利甘言，驱之如牛羊犬豕耳。我故曰倭奸固宜防备，而汉奸益诛之，而罪不胜诛也。防之之道奈何，曰先严惩治汉奸之律，凡有华民之为倭人间谍者，获即斩首，略不稽留。即使幸脱网罗逃之海外，亦设法拘获，明正典刑。如是则倭奸无容顿之人，其计可以立破。”^[5]

从汉到华，是清中叶以后文化认同的一种趋向，中古时的汉化，到了清代渐成华化。显例之一，如清中叶华侨指称的出现。这一变化具有复杂内涵，其中之一，当为汉的自我意识相对于满日渐清晰，但是相对于外夷或外洋，其内向的覆盖面有所不足。若汉特指固定人群，华的涵盖则要宽泛得多。华奸之类的说法后来未能通行，可是汉奸之汉与华侨之华却有所对应甚至互通。这成为清季中华民族概念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渊源，意味着这不仅仅是由于民族认同的紧张而生造的政治概念。尽管民族自觉实际上主要是由外来民族主义思想观念的传输刺激而生成。

由汉而华的另一潜在意向，显示汉与华本来均不是人种观念的分别，而是文化意识的差异，当汉可能与入种相关联而产生混淆时，只能以华取而代之，才能保持文化取向的本意。后来无论是满汉之争的汉族意识强化，还是针对这种取向的批判，都同样是误将汉视为同一种族，而有违所谓“汉”只不过是文化认同的历史存在本相。就此而论，汉与华本是一脉相通的，二者都具有来源各异的人群的文化混同性。须知今日所谓汉族，从未经过民族识别，就被视为当然的共同体。实则其来源的多样性几乎可以一望而知。

其二，按照清朝的正统观，“汉奸”已不仅指鼓动非汉群体反清的汉人以及勾结外国出卖中国的奸邪，而是将一切反清之人均与“汉奸”相联系。这样的衍伸在媒体和士绅的意识言语中已经展现出来。戊戌政变后，《申报》刊登《慎防逆党煽惑海外华人说》，表示：

“彼梁逆早存一败事后只身远遁之意于胸中，乃欲诱人背君去国，窥其肺腑，其毒盖更甚于洪秀全、杨秀清之流矣。原刻拟以汉奸龚孝拱等人，窃恐尚未情真罪当，其他种种狂妄之说，直与獠犬无殊。”

^[6]1899年2月，湖南曾子彦上书该省当道，提出：“自强邻逼处，削夺我藩篱，侵占我土地，因而内地匪徒，隐为汉奸，显肆猖獗，愚民易为所煽惑。”希望继续湖南创立保卫局开民团之先声的事业，各府

厅州县陆续举办团练。^[7]是年四川余栋臣势大，扣押安定营统领周寿卿，官府剿抚未定，派王秉节前往处置。“初，地方绅董惧余匪之滋扰也，议定每日馈银二百两，按十日一付。及甲乙丙丁四绅董谒方伯，方伯面斥云：汝等既为余匪筹措银两，非汉奸而何，彼敢将朝廷二品大员扣留，岂非造反乎。”扬言要“先将汝等四人正法”，然后“进兵痛剿”。^[8]变法的梁启超、反教的余栋臣和盗匪一样被当成汉奸，则清廷眼中的“汉奸”在反清的时趋中势必转向正面。

其三，变法救亡思潮的兴起导致“汉奸”指向的转移。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一方面批评自强改革，“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材乎。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看似延续既有的“汉奸”指向，另一方面，又对以往将主张学西学谈救亡者目为“汉奸”表示强烈不满，“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而大臣之中，“懵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9]。

按照梁启超的逻辑，不是学习西学、呼吁救亡的人为汉奸，恰恰相反，不能变法图强，抵御外侮，才会导致汉奸的产生。这样的认识，为“汉奸”的转义铺平了道路。1899年底，翰林院编修沈鹏因天灾应诏上折直言，即沿袭这样的逻辑，指荣禄、刚毅、李莲英为三凶，主张诛杀之。他说：“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纪诵圣德，闻中外之讹传，辄用怵惕，而忧疑其用情虽愚，其爱君则挚。刚毅必指为汉奸，摧夷挫辱。夫人一念爱君即为汉奸，则必仇视皇上，腹诽圣德，而后为大清之良民，中国之良士，是则率国人而叛皇上者，刚毅也，其设心于皇上为何如乎。此可虑者一也……此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于皇上则同，且权势所在，人争趋之。今日凡旗员之掌有兵柄者，即职不隶荣禄，而亦荣禄之党援也，凡旗员之势位通显者，即悍不若刚毅，而亦刚毅之流亚也。而旗人汉奸之嗜进无耻者，日见随声附势而入于三人之党。时势至此，人心至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故窃谓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10]既然爱君反成“汉奸”，除了逼迫国人背叛皇上之外，也为反过来将附和“三凶”者认作“汉奸”提供了可能。庚子自立会起事，“熊锦堂、张鑫

山与易敬臣等人误听康逆唆使，投入自立匪会，私售富有票，后得省悟，至驻扎日晖港之安字营投诚。某日，奉江南提督李大人及前任道宪余大人之命，往南通州一带劝令匪党曾国章等反正，途遇康党刘保林交付一信，嘱持往见曾。丈夫（即熊锦堂等）不知其诈，贸然前往，曾指为汉奸，立用洋枪击毙，并将尸骸剁分数段，易更被曾剖腹屠肠，抛尸丝鱼港内”^[11]。此处的“汉奸”，是指投降官府的变节分子，与原来反对“满清”的本义截然相反，而与革命党排满话语的“汉奸”含义颇为近似。

此后，梁启超一面借用原来保守官绅对洋务官僚及其事业的抨击，指清廷未能提出并确定“合于今世文明国民所同向”的教育宗旨，前驻日公使李经方为日本东京中国公使馆中附立之学堂所题对联，“斯堂培翻译根基，请自我始；尔辈受朝廷教养，先比人优。此二语实代表吾中国数十年来之教育精神者也。舍翻译之外无学问，舍升官发财之外无思想，若此者，吾亦岂能谓其非宗旨耶。以此之宗旨，生此之结果，吾中国有学堂三十余年，而不免今日之腐败，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不容假借者也”。这样的教育宗旨实际上是“培汉奸之才”，“开奴隶之智”，“夫使一国增若干之学问智识，随即增若干有学问有智识之汉奸奴隶，则有之不如其无也”^[12]。

另一方面，梁启超又针对刚毅所说“学堂为养汉奸之地”的言论敬告当道者：“夫学堂则何至养汉奸，然使诸君而真改革也，则学堂中人皆为诸君用；使诸君而伪改革也，则学堂中人皆为诸君敌焉矣。此乃刚毅所谓汉奸也。夫敌守旧，敌也，敌伪维新，亦敌也。刚毅知其将为敌而锄之，诸君不知其将为敌而养之，则诸君之智，不如刚毅远矣。然则诸君今日而师法刚毅可乎？曰：是惟诸君。虽然，吾有以知诸君之不敢，且有以知诸君之不能也。今者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自外。自哥仑布开辟新陆以来，麦志伦周航全球以后，世界之风潮，由西而东，愈接愈厉，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势必趋而集于亚东。天之所动，谁能静之。岂惟诸君，虽周公、管仲复起，其无奈此风潮何也。利而导之，则功成焉，名立焉，国家安焉；逆而拂之，则身败焉，名裂焉，国家危焉。刚毅之术，是见洪水之来而欲堙之搏之也，其势必横决而倒行。今者诸君之术，则筑短堤柔堤以障之也，其势非泛滥而出焉，则刷落而溃焉，其无救于时一也。呜呼，诸君诸君，可以择矣。”^[13]

此处的“汉奸”，已经不是顺着顽固官僚对洋务官员及其事业的指责，而是刚毅之意的反说，不改革或伪改革，学堂中人势必群起与清廷为敌。其承接世界风潮推动改革的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被刚毅之流视为“汉奸”敌人，其实是革新的动力。

时势的变化为汉奸转义提供了必要的语境，在江西南昌，新政前后的观念迥然不同。“华字各报省城统称之曰洋报，向来阅者甚少。上年拳匪乱起，更诬之为私通洋人，称曰汉奸。虽有一二通识者心知其非，亦不敢公然置辩。本年朝廷颁行新政，彼都人士方知报纸能益人见闻，争先购阅，从前闭塞气象，焕然改观，舍旧图新，机缄其在于是欤。”^[14]原来的“汉奸”行为如今成了时趋，认识自然随之变更。

梁启超的观念变化在保皇会同仁中不乏同调，尤其是具有反满革命倾向的康门弟子，有的言辞较梁启超更加直截了当。1902年，欧榘甲在《新广东》中就针对刚毅“学堂徒养汉奸而已，不能成人才，无用”，应将各省学堂悉数裁撤的主张，提出：“虽然，刚毅之所谓汉奸者，乃以恢复汉人之权利，不愿为满人之奴隶，故目之为奸耳，此真吾汉人独立之种子，不可不培养者也。”鉴于“满洲朝廷，既以学堂为养汉奸之大患，虽经议和赔款假行新政，以愚内外之心，三年以来，昏乱犹昔，欲其立学堂以培我民之自立，岂有是理哉？且即有学堂，亦不过以奴隶教育施之，直奴隶学堂耳，岂足望以自立哉？然则此事将如何而可？吾则曰：诸君不欲自立则已，若其欲自立也，岂无法以处此乎？”各省欲图自立，宜开自立学堂。^[15]清廷眼中的“汉奸”，在革新者看来就是汉人独立的种子，那么，“汉奸”的帽子应当转而戴到对立面的头上，“汉奸”的转义，也就呼之欲出了。

[1] 吴密：《民族和国家的边缘——清代“汉奸”名实关系及其变迁》，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67页。

[2]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72页。

[3] 《孙文和华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汲古书院1999年（该论文集的中文版1997年由神户孙中山纪念会印刷，非卖品）。该文后以《关于〈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的若干考察——孙文访日初期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为题，收入林家有、李明主编《孙中山与世界》（长春：吉

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几年后，狭间直树教授又写了《关于孙文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发表于2001年《民国档案》第4期，进一步讨论孙中山的文章为何会再度刊载的问题。

[4] 孙文逸仙稿：《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东邦协会会报》第82号，1901年12月20日。

[5] 《防奸续议》，《申报》1894年9月4日，第1页。

[6] 《慎防逆党煽惑海外华人说》，《申报》1898年11月14日，第1页。

[7] 《曾君子彦上湖南各当道论办团练书》，《申报》1899年2月21日，第3页。

[8] 《详述蜀匪余蛮子就抚事》，《申报》1899年4月14日，第2页。

[9]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83、21、69页。

[10] 《续沈编修应诏直言折》，《申报》1899年12月10日，第1页。

[11] 《沉冤求雪》，《申报》1901年1月17日，第3页。

[12] 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4—55页。

[13] 梁启超：《敬告当道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29页。

[14] 《赣水寒流》，《申报》1901年11月26日，第2页。

[15] 欧榘甲：《新广东》，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89—293页。

第二节 “汉奸辨”

几乎所有研究辛亥时期汉奸问题的学人，都注意到并且着重引述了1903年《黄帝魂》所收录的《汉奸辨》一文，可见此文在“汉奸”转义进程中的极端重要。可是，关于此文的相关信息，如作者、出处、撰写及发表时间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王柯就没有直接认可作者是否章士钊，并特别在注释中写明：“该文章并没有明记作者与写作时间，有人以为是章士钊（1881—1973）所写。收录该文的《黄帝魂》（黄帝子孙之多数人著）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十四（1903）年出版的民族主义作品。《黄帝魂》的编者说《黄帝魂》所收的文章都是‘最近十年来报刊杂志所选的文章以及新近作成之文章之精华’”^[1]。

据张枏、王忍之编辑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所附“书刊介绍”，《黄帝魂》1903年初版本仅29篇，1911年再版，增至44篇。据章士钊说，最初出版的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便是为了印行该书而成立。可是这个29篇的初版本，迄今为止似无人见过。目前可见的29篇本，为“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六日再版”，不过底本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八年十一月一日初版”，可以认定为初版本的翻版。全书正文共218页，撰述者为“黄帝子孙之多数”，编辑者为“黄帝子孙之一人”。据章士钊的《疏〈黄帝魂〉》，前者指各篇有多个作者，后者则是黄藻。至于发行者和印刷者，均为“黄帝子孙”，也应该是黄藻自称。台湾由罗家伦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影印的《黄帝魂》，为45篇的增订本，正文共310页，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印刷，同年十二月六日出版”。不过，无论哪一版，版权页都没有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的字样。初版本实为30篇，目录遗漏了“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则，增订本同样遗漏此条，实为45篇。

关于《汉奸辨》的作者，据章士钊《疏〈黄帝魂〉》称：“此为吾在《苏报》所撰之文，为汉奸翻案，为汉奸寻觅出路。”^[2]不过，查阅台湾出版的两种《苏报》影印本，均未找到此文。《章士钊全集》据《疏〈黄帝魂〉》之说收录，也只能依据《黄帝魂》，当亦未发现《苏报》刊登的原本。所以，此文是否刊于《苏报》，以及是否

出自章士钊之手，仍有疑问。由此连带出文章发表的时间问题，虽然30篇的初版本的确收录此文，但无法确证具体写于何时，如果是为《苏报》撰写，是否已经刊出。《苏报》1903年因报案被封之前，曾经两度改版，均与章士钊等学堂风潮的退学生密切相关。章士钊注疏之时，虽然是当事人，却也忽略或是忘记了版本和篇幅的分别，所疏实为后来的增订本。

《汉奸辨》在辛亥革命排满的历史进程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汉奸史的学人虽然有所描述，却未能举出相关实例予以证明，这似乎也从侧面反映此文的问世及流行还须进一步深究。倒是其中关于汉奸的指称起于汉代之说，对时下的汉奸论影响深远。不少人将其说等同于历史事实，望文生义地相信“汉奸”一词的确始于汉代。因为胡汉相争，“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称焉。汉人为汉奸者有之，外人称汉人为汉奸者亦有之”。这样的说法不过是想当然耳，汉朝人并不会自称汉人，“汉奸”之号那时纯属子虚乌有，而汉人自称与外人他指之别，更是无从谈起。经过近代知识转型之后，用后来观念解读前人前事，已经习以为常。稍加留意，诸如此类的现象比比皆是。一般情况下，作为俗语或方便名词无伤大雅，作为严肃的历史认识，则有无汉人汉奸的概念，意味着汉与非汉的界限是否分明，一方的自我意识与另一方的非我意识相当强烈，以至于约定俗成用了相同相通的名称。就此而论，不仅汉代人没有这样的观念，汉代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后来被指为汉人的那一大群人也没有这样的集合观念，或是虽然偶有，内涵外延却与今迥异。

《汉奸辨》的主旨的确如章士钊所说，是要为“汉奸”翻案，并为之找出路。作者认为，汉奸名号流传了二千年未有定评，因此往往有视爱同类为汉奸者，泾渭不分，殊堪痛叹。翻案的主要做法是区分“真汉奸”与“满洲人之所谓汉奸”。“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又分为死生两类，前者为历朝历代的汉奸，包括扶清灭明的吴三桂等人以及助满洲歼灭太平王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后者如谄媚那拉氏枉杀中国义士的张之洞，为清廷阻止游学生进步的蔡钧，助清官吏搜括中国货财孝敬满洲、承担各行的巨商劣绅等。至于满洲人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包括汉武帝时誓杀匈奴的霍去病、卫青等，宋朝的岳飞，近代的太平王洪秀全、烈士唐才常、林述唐等，“乃如之人，诚汉奸中之卓卓者矣”。虽然这样的“正色汉

奸”暂时不及“满忠”人多势大，后起者犹复无量。“吾敢决之曰：三年之内，胡虏朝廷，必亡于汉奸之手。”

为此，作者“敬告汉人，慎毋为害己之汉奸，当为爱己之汉奸，更愿今日之为汉奸者，各尽其才智力量，勇往向前，剿灭丑类，恢复三千余万里之山河，更新四百兆人之魂胆，立新中国于环球之上，汉奸之名，不将流芳于万世乎？不将传扬于地球乎？今日汉奸尚其勉之，不必以异族人之目我为汉奸，遂畏汉奸之名而为之讳也”^[3]。

《汉奸辨》的思路以及所谓“正色汉奸”的概念乍看显得有些怪异，其实是假设从“满清”立场而言的反话，希望汉人不要畏惧清廷以“汉奸”的罪名相加。就翻案而言，该文进一步明确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将满人所指汉奸视为革新独立的正面形象的取向；就正名而言，将真汉奸定性为助异种害同种，两方面相辅相成，否定清的汉奸论与确定汉人立场的真汉奸属性，正是“汉奸”转义的一体两面。反清不仅反叛作乱，还有排满革新，结交外国也不仅是卖国求荣，还有学习振兴。昔日的“满忠”，如今转而变成真正的汉奸。

《汉奸辨》的观念和主张，不乏同调，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就鼓吹“杀尽仇人”，“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前者指“满清”，中间为洋人，至于后者，吴密认为“不但包括投降洋人的汉奸，也包括谄媚满人的汉奸”，确有道理。

诚如研究者所论，辛亥时期排满革命话语中的“汉奸”，主要是指在满汉冲突中维护“满清”一方的汉人。具体所指，包括三类，其一，帮助外族侵害本国，如《汉奸辨》所列举的历朝历代直至清初的“死汉奸”。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演说中所提及：“汉人之失国，乃由不肖汉奸助满人入关，征服全国”，^[4]就是此类的典型。

其二，为虎作伥，残害同胞以维护异族统治，如《汉奸辨》列举的曾、左、李、张、蔡以及巨商劣绅。扩大而言，一切维护清朝统治的汉人官绅都在汉奸之列。其中既有已经故去的“死汉奸”，也有为数众多的“生汉奸”。由于晚清这类汉奸往往与丧权辱国、出卖利权相联系，故而又与卖国的汉奸相一致。而出卖中国的不仅是汉人，其他非汉人群有此类行为者，也可能被指称为“汉奸”。

其三，虽然主张在清朝的体制内进行改革，却反对或不赞成推翻清朝的革命。这类汉奸首先是指康梁等人的保皇会，继而扩大指向国内的立宪派。由杭州中学堂退学生在上海组织的《新世界学报》社，在《新世界学报》停刊后，于1903年6月创刊《经世文潮》，作为前者的继续，不满于行世的各种经世文编“支离缪盭，用其体例，变其精神”，专设人种之部，刊发讨论满汉问题的文章。^[5]该刊1903年9月21日第7期刊登的《满清毋庸立宪》一文，一面指斥“太平之役，头等汉奸胡、骆、曾、左、李之伦，率其犬羊之性，残同胞以保客帝江山”；一面预言刚刚开始热议的清朝立宪之说，“不过欲为满洲立万年之基业，为汉人下不脱之羁轭，其永远之奴隶性质，深于胡、骆、曾、左、李万万。如将此等人正名定谥，非加以‘头等特别汉奸’之徽号，不足以定其罪而蔽其辜也”。立宪声起，“于是满人防御汉族反侧之心，藉以稍慰，谓执持欧洲数册君主立宪之底稿，虽头等汉奸胡、骆、曾、左、李复生，不能有此制汉扶清之力也”^[6]。

1903年，清廷尚未定议是否要采取立宪制，议论立宪的主要是部分官员和士绅，严格说来，还没有形成后来称之为立宪派的势力。

《经世文潮》的笔锋所向，只是泛指倡议立宪的官绅。而在海外，主张保皇立宪的政治势力确实存在，并与革命党在华侨中展开激烈争夺。本来革命、保皇两党在庚子前后有所合作，尤其是以梁启超为首的部分倾向激进的康门弟子，愤于时势，背着康有为暗中与革命党、中国国会联系，准备合作以武力推翻当朝执政，实行民政。格于形势，计划流产，梁启超继续与革命党合作的愿望遭到康有为的强力压制，不得已退回保皇的立场，却仍然利用孙中山在美洲各埠华侨中的人脉，使得孙中山感到受骗上当，被迫严词揭露保皇派的言行不一。

同样在1903年，当国内有心排满革命者刚刚为“汉奸”正名之际，孙中山就在《檀山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断言革命与保皇决分二途，势不两立，康梁等人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骨子里志在扶满臣清；檀香山保皇会《新中国报》副主笔陈仪侃口谈革命，身入洪门，“实为保皇之中坚，汉族之奸细”。并且宣称：“古今来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者，不可胜计，非独康梁已也。满汉之间，忠奸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舍从违，必能审定。”^[7]明确指康梁保皇拥清为汉奸，希望华侨认清革保分界，速定趋向。如此一来，敌我与同道的联系及分别，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变得相当复杂，开启了“不反对敌人之人也是敌人”的政治论述的先河。

[1] 参见王柯《“汉奸”考：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思想》第981期。

[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3] 章士钊：《汉奸辨》（1903年），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1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159页。

[4] 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5] 《经世文潮叙例》，《经世文潮》第1期，1903年6月25日。

[6] 《满清毋庸立宪》，《经世文潮》第7期，1903年9月21日。

[7]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1—232页。

第三节 驱满酋与杀汉奸

既然汉奸是排满革命的重要对象，革命之际如何处置汉奸就成为革命党的重要政治选项。1905年孙中山再度游历美洲大陆，为致公堂重新拟定新章，其中规定，必须“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被满清灭亡二百六十余年”，本来不是满人能够做到，关键在于“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以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1]。所有三类汉奸都在必须清除之列。1906年所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特别规定，革命起义时，“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反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先期发布这样的宣言，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革命式的扫荡，“将使禹域之内无复汉奸之迹”^[2]。

其他革命团体也将诛杀汉奸定为政治方针，光复会所订光复军“普告同胞檄”，就将“满贼汉奸”相并列。光复军告示明确宣布：义师所至，“与吾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的不肖匪徒共有五类，“一、满人从不降者杀；一、反抗本军者杀；一、乘机打掠者杀；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一、仍为汉奸者杀”^[3]。

为了鼓吹杀汉奸的正当性，革命党人大造舆论。由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清代著名汉奸，而湘军屠杀同胞最多，湖南受到各省人士的同声指责，甚至形成排湘主义。湘人对此深刻反省。1906年10月，陈家鼎在《洞庭波》撰文指出，湖南有媚满性之圆足、合群性之缺乏、保皇性之愚谬、守旧性之固结、排外性之误看等五项“亡湖南之病根”，又针对性地提出速行悔过、首倡起义、力讲外交、公约自治、预备革命五项“医湖南之药石”的办法，希望湖南由戊戌以来为小日本，此后转为小法兰西，要从变法的渊藪，变成革命的摇篮。^[4]

如何实施上述方针，《洞庭波》同期发表了“屈魂”（宁调元）的《仇满横议》，提出实行最激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激进的破坏方法，主要有翦其羽翼和捣其巢穴两种，“前一策，则以歼满酋，除汉奸，

排虏官”。汉奸历朝历代都有，到了清代，“其术日工，其徒亦日众。使满清三百年之祸水之鼓荡之泛滥，以淹没我如花似锦之山河，溶解我连绵不绝之帝统，沉溺我独立自由之男儿，至今日而尚未已，殆全出于若辈之手之泡制。……盖若辈其面则人，则心则兽。凡可以为异族用，即可以为吾同族仇。可以为吾同族仇，即当以待异族之法待之。彼施全之击秦桧，万福华之刺王之春，是其例也”^[5]。此说的除汉奸，不仅在革命军兴之际，而且在革命未起之时，就要以暗杀行刺的方式，翦除助纣为虐的汉奸。

由于自责深，湖南人士对于指责湘人的他省之人有汉奸行为，也格外痛恨。《洞庭波》刊出湖南留日学生来稿《公致江苏学会书》，对江苏学会主张立宪予以严词抨击：“中国之亡也久矣，一亡于建虏之袭用汉制，再亡于湘军之助虏中兴，终且亡于保皇党之鼓吹立宪。夷狄用夏，汉人所以相视不惊；满祚中兴，汉家所以再志亡国。此范文程、洪承畴、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可杀也。况当清廷恶劣腐败不绝如线之际，忽有人效其鹰犬，盗取各国议院之陈语，加以上下平和之美民〈名〉，以愚其民，以救其亡，而为清室立万年有道之基者，其罪更可胜诛乎。是故立宪者，满族之至幸，而汉族之至不幸者也。欢迎立宪者，对于满族之至忠，而对于汉族之至不忠者也。以不忠之人谋不幸之事，此其人之工于贩国，甘为奴，直令天下人耻之辱之笑之骂之痛哭之，举国皆欲杀之者，而不料其出现于我学会上之江苏学会也。……自后有追咎汉奸者乎？吾不曰湖南，而曰江苏。”^[6]江浙人士抨击湘军残害同胞甚力，言词牵及一般湘人，如今居然也为清廷作伥，难怪其愤愤不平。只是江苏学会并非学生团体，而是张謇等人的组织，他们本来就是主张立宪的中坚分子。

全面论述杀汉奸最详尽的，当属1907年1月25日出刊的《汉帜》第1期题为《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的长文。该刊由清国留日学生编辑，在日本出版，其实是《洞庭波》的续刊。由于《洞庭波》第1期出版后即遭封禁，主持编务且包办政论的陈家鼎、宁调元等人亡走日本，筹划复刊，几经周折，定名《汉帜》，所以《汉帜》第1期本是《洞庭波》的第2期。《仇满横议》论及除汉奸一节时提及：“本报第二期有《驱满酋必先排汉奸》，专论于此，故不详述。”^[7]

文章的作者署名“锄非”，长期以来，各种辛亥资料集想当然地确定其人为别署“锄非子”的刘道一。1996年，王学庄在《近代史资料》总88号发表《〈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作者辨》，根据文本所提

及时的时事，以确凿无疑的严谨考订，证明作者绝不可能是1906年12月9日已经被捕入狱的刘道一，又根据《汉帜》的前身《洞庭波》的三位编者的人脉活动及其介入当时湖南学界新派中禹之谟、周震麟两派激斗的关联程度，力证作者应为陈家鼎。这不仅纠正了关于这一重要文献作者的误说，更为重要的是，为理解文本提供了可靠的凭借，不再望文生义地穿凿附会。可惜杨思机之前几位专论汉奸问题的作者均忽略了这一重要成果，使得文本的解读不知其能指所指，由后出外在的观念引申而来的种种揣测推论，难免隔靴搔痒。

王学庄独具慧眼，敏锐地看出《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的文风前后不一，前半关于历史上汉奸之害较纾缓，后面关于杀汉奸较激切。除了内容的约束外，可能的原因是后半部分为后来补写或改订，思想随时势有所变化。

《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开章明义地提出：“乱中国者满人，亡中国者非满人也，汉人也。盖汉奸者，引入满人之媒介也。”并历数殷周以来历代汉奸之事，证明每次胡祸乱华，都是汉奸造成，而清代汉奸的危害尤甚。“今日汉奸界之怪现状，且百出而未已，魑魅魍魉，吾见亦多。欲宽宥此现在的汉奸而不杀，则过去的汉奸已可鉴，未来的汉奸更方长。同胞多一优容汉奸之日，即汉奸多一残食同胞之时。汉奸多一番得志之机，即满酋多一次横暴之力。汉奸与同胞，则极端为反对性也。满酋与汉奸，则天然的化合物也。是故今日之计，救同胞而不杀酋奸，是犹抱薪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也；逐满酋而不杀汉奸，是犹隔靴搔痒，靴不启而痒不止也。汉奸乎！汉奸乎！而可任其白日横行而不杀乎？国人皆曰：杀，杀，杀！”

在论述了杀汉奸与杀满酋同样甚至更加重要后，接下来文章列举了六种必杀的汉奸及其理由，这六种汉奸又可以归为三类，一是清朝的文武汉官，二是保皇立宪派，三是假新党。

清朝的汉官，也就是转义后最早认定的汉奸，陈家鼎共列举了三种，即张之洞，各官吏之暴者，各监督、兵官之妖者。张之洞也是汉官之一，之所以要单独提出，而且列为此类的首要，是因为“庚子之汉变之屠戮，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之洞之残汉媚胡，可谓不遗余力。现且侦骑四出，罗织党人，务欲尽取汉族思想家付之胡刀而后快。各督抚不久即更替，之洞独十数年而不换者，虏廷岂有爱于之洞哉，不过资其善杀汉人，以之坐镇上游，虽咸同间之官文驻鄂，

尤不若此用家奴以防家贼之便。盖之洞者，满族之功臣，而杀同胞之上手也。吾辈不杀此老贼，终无以寒汉奸界之胆耳”。

所谓“庚子之汉变之屠戮”，当然是庚子镇压自立军的旧账，而“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则指1906年12月中旬缉捕“孙文党”王胜等人事，以及派兵镇压萍浏醴会党起事。至于“现且侦骑四出，罗织党人，务欲尽取汉族思想家付之胡刀而后快”，为陆续拘捕朱子龙、胡瑛、刘静庵、梁钟汉、张难先、李亚东、季雨霖、吴贡三、殷子衡等九人而形成的武昌日知会要案。^[8]不仅如此，“若夫吕海寰之喉成《苏报》案，庞鸿书之锻炼湘狱，岑春煊之横虐广东，丁振铎之断送云南，李盛铎、戴鸿慈之奔走宪政，严修、徐世昌之附和维新，皆获咎祖国最甚，必正以国民之天诛，而之洞不过其首座也。开花之弹，无烟之枪，我国民其试演于数贼之颈哉！”单列张之洞为一类，就是要将汉奸中罪大恶极并且继续作恶的官员作为锄奸行动的首选，意在敲山震虎，产生威慑作用。

“杀汉奸必杀各官吏之暴者”，是泛指一般官吏。为官即须作恶，“况寄宦异族之朝廷，尤非多杀民命，多削民脂，不足博虏廷之欢耶。‘廿年身世家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胡虏不能自戕民之命也，则借官以戕之；胡虏不能自取民之产也，则借官以取之。官者，盖虏与民接之机关物也。环顾宦界，了知大义，不敢残民，迫于无可如何，以奴为隐，俟机待发者，亦有其人。至于豺狼成性，相将食人，借国民皮肉，为升官发财之券，日月谄事胡虏，以保我爵位勋阶者，比比皆是。枢臣则以囊括海内、专利中央为能；督抚则以镇压民气、摧抑革命军为能；州县以拿获会党、严刑威民为能；武员以扣减军饷、杀败国民兵为能。上而中堂、宫保，下而老爷、太爷，顶子之红色蓝色，无非血也；补服之禽形兽形，皆非人也。终日如阎罗夜叉，惟惧民死之不速。‘笑骂还他笑骂，好官任我为之’。是不啻为虏置千百猛兽于民上也。项羽起兵，先杀会稽守；洪军所过，先杀地方官；俄虚无党革命，惯杀将军宰相。驱满者之先杀此伪官也，必矣”。只有诛杀残民媚虏的满奴汉奸，才能翦除清朝的羽翼，顺利实现排满革命的大业。

专门将官吏中的“各监督、兵官之妖者”提出，是因为军队和学生为社会中具有天然组织形式的群体，成为革命社会动员的重点，同时也是官府防范的要害。“迩来民族主义日益传播，学生兵士大半有革命思想，而监督与兵官压之。种界非不知，大势非不晓，第以利禄

主义所在，毋宁禁下而不为。今岁湖南内地学生，皆有独立资格，而监督则遏之，各省学界可概也。湖北之常备军赴湘倒戈，而兵官则禁之，各省之军界可概也。学生而欲革命乎？吾请从革监督之命起也。兵士而欲革命乎？吾请从革兵官之命起也。十九世纪以来之大革命，类皆学生兵士为之。第不先去学校军伍之汉奸，作直接的革命，而欲一跃颠覆政府，作间接的革命，难矣。学校最忌冲突，而破坏为虏作厉之奴圈，则冲突即其进步也。军界最讲服从，而上官杀百姓之命令，则不必服从也。学生谛思，兵士乎谛思。”辛亥武昌起事的历史进程显示，正是在军队、学堂深入进行有组织发动，成为首义取胜的决定性因素。

陈家鼎罗列的六种必杀的汉奸，顺序并非随意排列，而是有所讲究。上述三种，张之洞不过列在第二位，其余分列第四、五位。第二大类的保皇会康梁则列在第一位，庆祝立宪党也列在第三位。也就是说，在陈家鼎看来，保皇派和立宪党的危害犹在汉人官僚之上，因而诛杀最具紧迫性，成为杀汉奸行动的当务之急。“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甲午以后，虏廷不绝如线，而康、梁以痛哭流涕之妾态，倡为维新之论，保皇之名。种族之历史不通，国民之原理不晓，惟鳃鳃鼓其开明专制、政治革命之丑论，以作君王怜妾之宫怨词，‘汉使若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身居海外，心在虏廷，周旋清公使五臣之前，惶恐用我孤臣之不速。报章则可进呈御览，宪法即为身之护符。左道诬民，此孔子之所以诛少正卯也。康、梁者，今日之少正卯。欲息邪说，正人心，不诛此两妖魁，不可得也。”康梁等人的维新保皇之说，蛊惑人心，混淆视听，成为排满革命的最大障碍，必须息邪说，正人心，才能祛除心魔，扫除障碍，为排满革命开辟通道。

所谓“庆祝立宪党”，并非专指立宪派，而是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乃庆祝立宪会，倡之于学界，应之于政界、商界，创办于京师、上海，遍及于各省各郡各埠，龙旗耀日，演说如雷。美国之贺离英独立旗耶？日本之欢迎征露凯旋军耶？醉耶？梦耶？痴耶？迷耶？举国若狂，不可思议。盖非别有肺腑，必不至斯”。“以异族政府之得意处，即亡国遗民之伤心处也。……是必令各处有血男儿，各出其如热如火、如捷如神之手段，诛杀此贱奴而后可。否则我同胞如此丑举，不独见耻于同国，当亦见笑于虏中矣。”也就是说，凡是为预备立宪感到欢欣鼓舞并且喜形于色者，都在可杀该杀之列。

必杀之汉奸的最后一项，是“假新党”。假新党虽然列于各类汉奸的末位，重要性却不可小视。陈家鼎这样描述“假新党”：“所贵乎新党者，贵有道德也，贵有团体也，贵有高尚之品格也，贵有坚固不摇之性情也。乃迩来有假新党焉，今日遇革命党，则力主驱逐鞑胡；明日遇立宪党，则又主不分满汉矣。留东则演说场唱民族，归国则保和殿颂圣神矣。‘今朝新贵人，昨日革命党。’此其人之名托志士，实则死奴，其心已不可问，况又遇利之所在，不惜牺牲同类，以取快于贼中”。

如此看来，假新党属于见风使舵的墙头草似的政治投机分子。可是，陈家鼎并非泛称，而有实指，即所谓“龙○○本唐才常之同党也，而以事与唐不合，即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周○○本夙由口谈排满，挤刘某彭某之不革命，而钓得学界名位者也，乃忌禹之谟名出己上，以事不相能则迎合当途，而陷成禹之大狱。是其例也”。文章隐去名讳的实指，专论汉奸的各文均未予以指证。还是王学庄的论文具体指出，龙○○即龙泽厚，周○○即周震鳞。关于龙泽厚导文廷式举发自立军之事，其实为一桩聚讼纷纭的悬案，难以征实。而将周震鳞指为假新党，进而指为汉奸，却是革命党内讧的产物。

周震鳞曾与黄兴在武昌两湖书院同学，参加过华兴会，在明德学堂教过书，又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是湖南教育界新派的领袖之一。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命人携来委任状，委周震鳞为同盟会湖南主盟人。1907年《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一文发表后，周震鳞身份暴露，被迫亡走日本，由黄兴、刘揆一等人接待。由此可见，周震鳞不会是假新党，也没有首鼠两端，陈家鼎指名喊杀，另有原因。

1906年，湖南学生因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以及组织自治会等事，与当局发生冲突。关于如何处置事态，教育界新派以禹之谟为一方，以俞诒庆、周震鳞、罗永绍、陆鸿逵为另一方，形成严重对立。后一派多担任正式职务，自然不能公开支持学生的举动。由于双方各执己见，难以妥协，以致禹之谟被捕入狱。陈家鼎是护送陈、姚归湘的代表，并首倡公葬岳麓山，虽然他与周震鳞同龄，又是小同乡，且先后同学，甚至有人说黄兴给周震鳞的委任状还是由陈带到，可是在对立中坚决站在禹之谟一方，而且将禹之谟被捕入狱归咎于周震鳞等人。在他看来，双方的斗争甚至压倒了与旧派及清政府的斗争。^[9]所以他在文章中指名痛斥：“若而人者，鬼鬼怪怪，妖状莫名，欲不革命，则又恐新政府之成立；欲不倾杀同人，则又虑满政府

之牵连。嗟乎！新党可冒，民族实行主义亦可冒乎？人有恒言曰：‘与其为伪君子，不若为真小人。’吾亦曰：‘与其为伪新党，不若为真守旧也。’盖旧党之汉奸犹可防，新党而汉奸，则防无可防矣。害马者不去，则必败群。假新党而不杀，吾恐外患未至，而祸已伏于萧墙矣。”

周震麟是否伪新党，是否汉奸，历史早有公论，陈家鼎的一时愤激也情有可原。可是，汉奸指称出现泛化，甚至不问青红皂白地乱指，且不惜加诸同党之身，却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指保皇会为汉奸，还有情非得已的时势以及破除迷茫的必要，将庆祝立宪者一概定为汉奸，打击面就显然过宽。而在革命党内部纷争时也互指对方为汉奸，无疑超越了必要的限度，成为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手段。辛亥时期革命党乃至同盟会内部滥用“汉奸”互相指责的情况屡不一见，影响恶劣。民国以后，“汉奸”的乱骂转移到“反革命”的滥用之中，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难以抹去的消极影响。

“锄非”的文章最后总结道：

查清之乱华也，开十七史之奇变，比之周汉晋唐，无此得裨之惨；踞十八省之疆土，比之南北五季，无此占地之广；苟延二百六十五年之甲子，比之宋一代，无此猾夏之久。盖今世汉奸之术工于历代，则虏害亦大于历代；汉奸之运长于历代，则虏命亦寿于历代也。今日者，其胡人学汉之毕业期，今日之中国者，其汉人贩国之总卖办所乎？清康熙之谕旗营曰：“从古汉人叛乱，只用汉兵征讨，岂有满兵助剿？”噫，虏之为此言也，殆习见历代亡汉之历史，皆汉奸之历史欤？清廷向来衣钵，皆此驱汉人以杀汉人者，为秘密之方法。入关时无论矣，至平后三藩时，此方法一盛，平粤捻时，此方法又一盛。迨观最近之湘赣光复军起，调兵遍全国，而邻近易召之荆州驻防旗，曾不少动，此方法乃盛而又盛矣。数百年来，不废八旗一兵，不折索伦一骑，可端坐以观汉人之自戕，为圆明园下酒物也。古之中国，以夷攻夷。今之夷狄，以汉杀汉。以夷攻夷者，中国灭夷之上策。以汉杀汉者，非夷狄灭汉之奇术乎？狼无狈不立，狈无狼不行。满酋非汉奸无以至今日，汉奸非满酋无以终余生。汉奸既与满酋有密接之关系，则汉奸已同化于满。吾国民之杀汉奸，谓之杀汉奸可也，杀满人亦可也。如果内患扫除，不为胡用，则以彼辽沈巢穴已失、全国人心已去之虏，有不入吾掌握者，吾不之信也。嗟嗟！朔风怒号，白杨萧萧。失国之戚，与子同袍。憾之结兮，望帝魂之来兮，卢骚我邻。虚

无党赠我以弹兮，我祖皇帝遗我以大刀。我誓悬虏首于太白兮，我先杀

此汉奸之不同胞。^[10]

清代汉奸最盛，为害最大，清朝统治非汉奸不立，所以倒满必须先杀汉奸，内患扫除，则满酋必倒，这样的宣传对于鼓动排满革命风潮，使得武昌起事后全国形势有如摧枯拉朽，的确起到巨大作用。而汉奸等同于满虏，杀汉奸就等于杀满人的逻辑推论，在此后的中外冲突中一直被延续。

[1] 孙中山：《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1页。

[2]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314页。

[3] 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附录·第一集《革党文告》，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79页。

[4] 铁郎（陈家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1906年10月，第1—21页，“论著”。

[5] 屈魂（宁调元）：《仇满横议》，《洞庭波》第1期，1906年10月，第43—45页，“论著二”。

[6] 来稿：《公致江苏学会书》，《洞庭波》第1期，1906年10月，第93—94页，“附录”。

[7] 屈魂（宁调元）：《仇满横议》，《洞庭波》第1期，1906年10月，第45页，“论著二”。

[8] 详见王学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作者辨》，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8号，第238页。

[9] 参见王学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作者辨》，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8号，第236—244页。

[10] 锄非：《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汉帜》第1期，1907年1月25日，第17—36页，“论说”。

第四节 锄奸及其泛化

虽然革命党将杀汉奸列入政纲方略，主要还是指义师兴起后所到之处铲除继续忠清为敌者；而激进舆论鼓动对汉奸进行暗杀行刺，在产生巨大政治压力的同时，因打击的对象过于宽泛，真正实行的并不多见。

在辛亥前革命党举行的刺杀起义行动中，锄汉奸色彩相对鲜明的主要是相互关联的徐锡麟案和秋瑾案。

1907年7月，皖浙两地的光复军拟联手举义，所发布的“光复军告示”，历数“满夷入关”后的种种暴政，以及立宪的虚伪，内忧外患，“推厥种种罪由，何莫非满政府愚黔首虐汉族所致”，为此，“共起义师，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义兵所临，秋毫无犯，各安旧业。我汉族诸父兄子弟，各安生业，无庸惊疑。……至若有不肖匪徒，妄讥义师，结众抗衡，是甘为化外，自取罪戾，当表示天下，与吾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并宣布五条杀例：“一、满人从不降者杀；一、反抗本军者杀；一、乘机打掠者杀；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一、仍为汉奸者杀。”^[1]秋瑾亲笔所写“普告同胞檄”，也以“欧风美雨，澎湃齐来，满贼汉奸，网罗交至”，大声疾呼“用是张我旗鼓，歼彼丑奴，为天下创，义旗指处，是我汉族应表同情也”^[2]。

革命党宣传上或有先杀汉奸以及打击面过宽的偏激，在实行的过程中，显然还是以排满为主要目标，自称“革命党大首领”的徐锡麟，在供词中就毫不掩饰地坦言“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他说：

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的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

获，实难满意。我今日之意，仅欲杀恩铭与毓钟山耳，恩铭想已击死，可惜便宜了毓钟山，此外各员，均系误伤。惟顾松系汉奸，他说会办谋反，所以将他杀死。赵廷玺他要拿我，故我亦欲击之，惜被走脱。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此举本拟缓图，因抚台近日稽查革命党甚严，他又当面教我拿革命党首领，恐遭其害，故先为同党报仇，且要当大众将他打死，以表我名。只要打死了他，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顺了。^[3]

顾松为安庆巡警学堂收支委员，徐锡麟事先安排其等官员到齐即行关闭大门，而顾松阳奉阴违，致使事败，徐锡麟指为汉奸，罪有应得。而秋瑾案误传由胡道南告密，后来胡也被少年行刺身亡，却是冤案。

革命党的暗杀行动引起社会上一些担忧和困扰，章太炎特意撰写了《排满平议》，澄清排满与杀汉奸的关系，力证排满革命不是种族复仇。他说：“满人之与政府相系者，为汉族所当排；若汉族为彼政府用，身为汉奸，则排之亦与满人等。近世革命军兴，所诛将校，什九是汉人尔。游侠刺客之所为，复不以满人、汉人为别。徐锡麟以间谍官于安庆，适安徽巡抚为恩铭，故弹丸注于满人之腹，令汉人为巡抚，可得曲为赦宥耶？吴樾所刺，满人、汉人则相半。谁谓汉官之横暴者，吾侪当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满为名者，今之所排既在满州政府，虽诛夷汉吏，亦以其为满州政府所用而诛夷之，非泛以其为吏而诛夷之。是故诛夷汉吏，亦不出排满之域也。”^[4]按照章太炎的说法，锄奸还是服从于排满。尽管存在个别失误，总体看实行起来分寸把握较好，有效地避免了滥杀，同时宣传上的火力全开又使得对于清朝汉官的压力不断加强。连主张君主立宪的《中国新报》、《政论》、《庸报》，也都被主张“排满复仇主义”的蒙古人称为“汉奸”^[5]。

与排满革命话语的“汉奸”指称渐趋主导相辅相成，原有的汉奸概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排满话语的“汉奸”毕竟只能在革命党的报刊上公开正式使用，至于国内的一般媒体，无论赞同与否，只能在报道如徐锡麟案时刊布包含相关语词的文件，而不能正面使用排满意义的汉奸指称。在这些媒体上，卖国求荣仍是汉奸指称的重要意涵，只是有时所指发生了变化。辛丑条约后，清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原来被视为个别官员的卖国行径，如今普遍化为清政府的集体行为。在此起彼伏的收回利权、抵制外货风潮中，清朝官员的畏缩

避祸多被指为媚外的汉奸举动，连带有出卖利权之嫌的一些士绅也被认定为汉奸。

在汉奸转义到排满的话语系统之后，原有指称汉奸含义的情形依然存在，其主体又有官府和民间之别。前者如1909年苏抚奏上海道蔡乃煌漠视公款，玩忽纲纪，举止轻浮，存心叵测，办事本不可恃。元源钱庄倒欠案，因有厘局等存款，札饬蔡道追缴，数月未覆一字。欲提省审追，蔡道又狡猾袒护，谓厘局所存，并非公款，不便先追；又谓商人将图自尽，人命堪虞；又谓该商与洋人素有往来，恐其干预内地审判，一味恫吓。现仍饬提省审讯，能否追到，虽亦难必，然蔡乃煌竟露汉奸行径，遇有重要交涉，必致贻害朝廷，断难容忍。请即革职。^[6]此事无论是否别有隐情，即使奏折所列罪状全部属实，充其量不过下属对上官有所不敬，以及对外微露怯意。清季在上海之类华洋杂处的地方为官，涉外之事极为棘手，拿捏不易也是事实，苏抚见微知著，但竟然联想到汉奸行径，则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

各地官府之外，清廷也时常面对处置汉奸的问题。1910年5月，各枢臣奉摄政王谕询处治汉奸赵郁卿办法。某枢臣拟请援照高某等一案定罪。摄政王以情节重大，未便一再轻纵，谕令严惩。^[7]

上述事件，朝廷官府均沿用原来的汉奸之义。不过，由于汉奸转义为排满话语，清廷及各级官员使用汉奸一词的频率有所下降，倒是民间社会，由于抵制外货、收回利权的风潮不断，而且没有与排满汉奸相牵混的顾忌，频繁使用汉奸的指称。早在中美工约抵制美货期间，厦门南洋工会所议抵约章程就规定：“如遇有汉奸在本国拐骗带领工人出洋者，即公禀地方官拿办，为自戕同种者戒。”^[8]广东拒约总公所曾以赴港各员不照原议遽覆美商，海内外同胞多不承认，“日前总公所接各处来电云：迳复美商诸人，昏庸狡诈，陷害同胞，无不切齿。现事已至此，可奈何。且此中离奇，一言难尽，难保无汉奸从中运动，前途渺渺，后患何穷”^[9]。

随着“汉奸”的语意逐渐宽泛，使用起来也出现随心所欲的趋向。如“台僧通慧和尚向在杭垣艮山门外某庵住持，于佛教经典颇得真解。旧岁创发宏愿，周游南洋群岛，极为华侨欢迎，慷慨布施，计得洋七八千金。回浙后，决拟创办孤儿院，教养兼施，逐渐推广。以二千金购得大街孩儿巷口基址，改建三层洋楼，预约年内落成。惟款项有限，深虑将来不济，故欲以慈善事业兼办营业性质，意欲仿制东

洋药品如千金丹、清快丸、宝丹、胃活等类，而冠以中国名义，致一般社会咸疑其有洋股，而为汉奸。现该僧从某绅指教，慈善与营业分而为二，不相牵混，俾免谣诼”^[10]。

如果说上述事件多少还有些汉奸的影子，那么绍兴萧山县清丈旗地一事，就很难说与汉奸有多少瓜葛。“自前抚奏请设局清丈以来，各沙民以为夺其生计，抵死抗拒，叠次聚众，毁局殴官。本年省委文总办拟联络就地士绅和衷商办，沙民等复迁怒各绅，指为汉奸，将戚绅住宅焚毁。前月又焚汪绅望庚房屋，全家什物细软书画图籍，概付一炬，并戕伤该绅幼孙，惨酷情形，闻者发指。增中丞以沙民悍顽梗化，拟飭宁绍台道带兵督丈，沙民等得此消息，愈激愈愤，竟歃血同盟，相约死抗，人心惶惶，谣言蜂起，殷实之户，纷纷挈眷避地者甚多。昨日署萧山余令专差密禀，以转瞬丝茧上市，洋商接踵，设或稍有疏防，非但酿成交涉，地方更不堪设想，拟请迅派重兵下县，藉资坐镇，当奉中丞批准。届时由县先行出示晓谕，禀请酌派省兵驻扎，以资镇慑。”^[11]

在非排满话语系统中，汉奸的所指也有或隐或显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对外交涉不能维护国家利权的清朝官员，成为汉奸的重要指向。

1907年12月，留东全浙代表陈时夏、章日致电北京盛宣怀：“草约公为祸首，今惑汉奸王某之言，意勿改。王皮肉寝食在即，公不晤□□先及公。”^[12]1909年5月，“凯约翰新拟铜官山合办合同，系驻英公使李伯行所运动，皖人愤极，议以江浙对付汪大燮法处置李伯行，以清汉奸”^[13]。

指现任官员为汉奸，开始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因而最先主要是用于相关绅商身上。1905年8月，浙江同乡公鉴：“六月二十二日，浙江同乡会京官代表有卖矿之人，所举总理不由同乡投票公举，全浙商民不能公认。”

事件的详情，据浙人发布的具名公启，当天旅沪浙江同乡170余人在斜桥洋务局集议自办浙赣铁路，“原为杜绝卖国汉奸藉图私便而起，当如何慎选公明廉达之士，以为全省表率。乃有素无公德之汪康年，闻沪上有特开议会之举，踉跄南归，与张元济二人，口称奉同乡指派，并不将公函宣布。鄙人当日即知汪康年并非公正之人，曾致函

发起人王、沈、严三君，略述斯意。不意当日果用野蛮专制手段，强压乡里，不由投票，擅自私举总理。偶有一二申辩者，即以厉声厉色凌辱之。此等举动，已令人愤懑。及阅廿六日《同文沪报》，有高尔伊致张叶一函，历举汪康年与白鼐思湘矿交涉一事，始知汪康年与高尔伊同一卖矿汉奸。乡人既屏绝高尔伊于前，亦岂能容忍汪康年于后。方今路政发轫之始，又当拒绝覬觐之时，此会实为防外患而发。汪康年卖矿证据落入手中，若不由我浙人鸣鼓而攻，公同屏斥，何以谢外人而杜口实，何以谢湘人而资惩戒。为此，刊布登报，广告大众，合请吾浙寓沪之同乡伯叔兄弟，于七月十九日下午三钟至六钟，在新闻徐园会议，别开同乡议会，撤退同乡代表字样，再行公举。此举关系全浙生命，商民体面，务请责临为幸”^[14]。

汪康年其人的历史地位自有定评，无论如何，指认他是汉奸，恐怕有些牵强。之所以每每将涉及路矿等利权的官绅指为汉奸，反映出在民众心中，清廷已经失去维护国家权益的能力和资格，而且对于官绅插手路矿等事高度警惕。山西平定州十七都开矿，就鉴于泽潞各矿引起交涉，决议自行开采，并议决清查民户三法：“一联络人心，以万众一心，人人知实行开采为宗旨。二申明约束，以保护善良，稽察汉奸为宗旨。三演说集股，以家喻户晓，多少不拘为宗旨。”^[15]

不过，汪康年与“汉奸”似乎总也脱不了干系。1910年冬，《申报》报道了旅京湘人特开矿事秘密会议一事，次年2月，事情有了新的进展。“兹探悉私卖湘矿者系湘人魏某、浙人汪某，串通某国商人，私立一合同，指定湘省数处矿业由外人自由开采，运动费之数共六千金。但合同内载明，如运动无效，六千金不能退还。旋魏某回湖南专任运动官绅事宜，而汪某则专司与洋商交涉之事。不意作事不密，被旅沪湘人侦悉。时魏某尚任上海某局总办，即迭次与之交涉，而魏某回信，谓家祖为湖南开通之先河（指魏默深），弟亦深悉外情，乃至谣诼横来，殊不可解云云。旅沪湘学会具函驳之，长至三十余页，魏始气丧，约会于飡明公司，携带合同，面开谈判。湘人乘其无备，起而夺其草合同，立刻禀报商部存案。此前事也，现闻洋商又向湘抚索开湘矿，湘人大惧，刻正筹议对付汉奸之法。”^[16]虽然已是陈年旧事，还是与汪康年有所牵连。

文学作品中，汉奸成为重要的反面形象。《申报》连载时事小说《人面兽》，其中第五回“怒忠言臧祖鼃入党，做圈套方宫保回心”就借由书中人物说话，刻画出汉奸的嘴脸，“我想魔国人自己失信的

事情，也用不出什么狠处来。只要我们中国没有汉奸去帮他们的忙就好了，天翁何苦定要去顶这汉奸的名儿呢。一场抢白，听得天戌恼羞成怒，红了脸，竖了眉毛，把茶碗略端了一端，喊一声：来！送客！立起身向里边就走”^[17]。

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反复强调锄汉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理据是：“夫世界之所以有竞争者，固首以种族为大关键，而国界次之。而其竞争对付之手段，又因种界之远近亲疏而分其猛毒之隆杀。”^[18]“执一光复为宗旨，而百折不回其志，万变不离其宗。此固汉人所同具之观念（汉奸则异），而发自秉彝之良知者也。”^[19]历史上“曾国藩、胡林翼诸汉奸，杀同胞，媚异族”^[20]，固然可恨之极，现实中对抗革命的张人骏、张鸣岐，更是“汉奸之尤”^[21]。

在答复来函质疑汉奸亦为同胞是否该杀如何分辨时，雷铁厓确切无疑地声言：“确为汉奸，必不相恕，疑似者置而不论。足下云不愿同胞为汉奸，而彼竟为汉奸以祸同胞，劝之不改，将如之何？”^[22]并正式警告汉奸道：“夫汉奸之所以醉心者，胡官耳。……呜呼，汉奸！人生不易，杀生可畏。吾效如来说法以警惕尔辈，亦一片婆心。果始终不悟，亦自作之孽不可追也。”^[23]

为了彻底断绝汉奸的后路，雷铁厓还提出最终之锄满者即汉奸的命题，认为：“汉奸之在今日，用死力以扶满虏而杀同胞，在满人方面观之，汉奸真彼族之忠犬矣。……然则易地以观，一旦革命成功，丑虏失势，汉奸对之当何如？曰：当必以死力杀同胞之心转而杀满人。是果何故耶？汉奸之心纯在利禄，固不问种族之为谁。满人有利禄则媚满而杀汉，汉人有利禄则媚汉而杀满耳。”^[24]这番话一石二鸟，主观意愿是使满人与汉奸相互猜忌，客观上与历史的发展也大体吻合。

在鼓吹排满革命的同时，革命党人还对各种不同的观念意见有针对性地进行驳斥。1907年春，雷铁厓撰写了长文《中国已亡之铁案说》，批驳梁启超的“满洲非国”论和杨度的“中国不亡”论，他说：“革命者，《春秋》大义也，然吾恐彼保皇之人目盲心塞，终不解中国已亡而汉人革命为何事，更即其所抱持之宗旨而作为传，以提撕之并以告后世之史官，作为万世之定案。曰：皇者何？载湉也。载湉者何？满虏之酋也。保之者何？康梁也。康梁者何？汉奸也。曷为保之？保其永主中夏亡中国于万世也。”“我汉人何辜，而独遇此残

酷之虏哉，而汉奸犹且怜彼贫焉。……以同胞之惨如是，而彼汉奸漠不关心，乃斤斤焉虑群虏之贫而若不胜怜惜者，亦何薄于同胞而厚于异种如是也。汉奸汉奸，扪心自问，于汝安乎？”^[25]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雷铁崖也不以为然，甚至指为与汉奸同样的清廷帮凶：“推无政府者之心，将以大同为圆满，而又无能力去各国政府，以使世界大同，则惟有于中国求大同。既曰大同，则无分夷夏，虽以逆胡之罪，亦将容之，不然则有悖大同之义。夫不去逆胡，能去满政府乎？不能去满政府，则无政府主义适以巩固满政府，非与汉奸同处乎？”^[26]

革命党人在海外的宣传，锄汉奸也是重点之一，1908年8月，新加坡星洲阅书报社延请胡汉民、汪精卫演说，“入社听讲者，约四百余人”。汪精卫主要阐述实行民族革命的必要，“人之有团体，本于爱人之心，由有爱人之心而生平等观念，以一少数民族为制于上，而多数大民族为所征服、压制者，即种族上之大不平等。吾辈言民族主义为革命者，即求汉满之平等也，发于爱人之心者也。人或以为请求满洲立宪，即可调和种族之不平，殊不知民族之既调和，而后可言宪法。犹之两军相对，既有休战之意，而后可提议讲和之条约。今若谓满人已迫于革命军之势力，而可休战讲和，相与订立条约者，则吾嫌其太早计矣”。

胡汉民则着重区分汉奸的种类以及指出除汉奸的迫切性，他说：“满人以少数蛮劣之民族，而能征服、压制汉人多数文明之民族者，以满人有团体，而汉人无团体之故。汉人无团体，而以有汉奸破坏之故。汉奸有二种，或显借满人之势力以行破坏之手段者，如清初之洪承畴、吴三桂辈，咸同以来曾、胡、左、李辈，现时之张之洞、袁世凯辈是也；或并无势力，惟思献媚于满人，造作邪说，欲以破坏汉人团体者，则一班言保皇、言乞求立宪者皆是，辛苦艰难，为满人辩护，诌张多幻，而反对革命，彼实自离于汉人团体，而希冀附合于满人团体者也。故汉人欲求自由，谋光复，必先巩固我汉族团体，而除去败群之人，即自掊击一班言保皇、言乞求立宪者始”^[27]。

对于汉奸指称的泛化殃及己身，梁启超觉得相当委屈，而对于指人为汉奸的逻辑，感到难以接受。只是碍于其威力太强，隐忍多时，不敢触其锋芒。1911年，上海几家报纸因梁启超反对锦爱铁路和中美同盟，与自己政见不同，愤而连续数月进行攻击，“日日以捏造事实

诬人名节为事”，梁启超隐忍再三，终于按捺不住，“为全国言论界之道德风纪起见”，致函各报馆主笔，进行申辩，其词涉及近代中国政争的许多潜规则，颇可玩味。

梁启超认为：“天下无论何种政策，莫不同时有利害之两方面，缘此而论治者，往往各有所主张，而中间容有辩论之余地，此各国之所同也。吾所主张，岂敢自谓其无误，特就其所见及者而论之耳。公等不以吾言为然，从而纠正之，此吾所最乐闻。公等所纠，而足以服吾之心，吾固不惮降心相从。若犹未也，则更相与往复其论，以求最后之真理。凡以言责自居者，不当如是耶。而公等徒以政见不同之故，而诬吾以受日本人指使，且日日闭门捏造新闻，此则吾所最为公等不取也。推公等之意，或良出于爱国热诚，以愤恨日本人之故，但使有政策可以排日本者，则虽加数倍之牺牲而不惜。而鄙人所主张，则谓我国数十年来以外交政策失宜之故，所牺牲者已不少，今良不愿更附益之。故于公等所主张，不敢漫然雷同。公等为感情所激，乃至以窃 之疑相加，即鄙人亦未尝不为公等谅。今更披肝沥胆，申明鄙人立论之根据，以释公等之疑，然后将鄙人历年来与日本人之交际，及其对于日本之态度，与夫吾之所自处者，据实直陈，愿公等平心听之。”

脱离具体语境，仅就梁启超这番陈词而论，可谓合情合理。近代政争过程中，肆意抹黑对手，成为常态。清季开启恶例，遗患无穷。只是梁启超的辩词，在他虽然自以为公正持平，别人却未必认可。

他说：

鄙人素来持论，谓对外不恃空言，而恃实力。所谓实力者非他，即先设法求得一良政府，将内治整顿完备是也。故以为全国言论界惟宜合全力以攻击现在之恶政府，使之虽欲恋栈以败坏国事而有所不能。一方面则以稳健之智识灌输国人，使之有组织善良政府之能力。此著办到，然后对外乃有可议。而不然者，徒日日怒骂外国人之谋我，甚无谓也。夫国家之对于国家，谁则无野心者。如两军遇于战场，其磨刀霍霍以互欲相屠，固其所也。我怨骂彼，彼遂能因我言而辍其谋乎？若云以此警告国人，斯固宜然也。然警告之本意，固当使国人知现在时势如此其危急，尤当使之知所以致此危急之由，其原因皆在政府之失政。缘此而知改造政府之万不容己，则所警告者为有力矣。而不然者，虽四万万人人人皆瞋目切齿于外国之谋我，顾能以个人之力，各各持挺以抗之乎？盖人之谋我者，乃挟其国家之力以谋

我，我欲与之抗，亦惟挟国家之力以与之抗。而司国家之总枢机者，实惟政府。故欲使国民敌忾心得有道以自效者，非先得一良政府以统率之于上，决无当也。彼外国之先觉者，固亦常借外交问题以鞭策其民矣。例如日本人因美舰入浦贺而奏勤王讨幕之功，因改正条约问题而数次推倒政府。其报馆之立言，虽借对外为题，而结论则未有不归于督责政府者也。而彼政府之欲自固其位者，则又往往导其民气使泄于对外，使无暇攻我，而因得以自即安。观于此，则国民对待恶政府之手段与夫对内对外先后缓急之次第，不从可察耶？今我国对内问题不解决，而徒日日鼓吹对外论，推其效果之所极，不过多发起几处国民军，多成立几个拒款会耳。夫此等宁得曰非佳事，而试问能收分毫之实效否耶？能丝毫达其爱国敌忾之目的否耶。而全国报馆，一若以此为最大之天职，而见他人持论，其对外词锋稍缓者，辄指为汉奸，此吾所大不解也。^[28]

近代中国的和战问题本即长久困扰，令人极为纠结，受此影响，对外不逞强就形同示弱，有汉奸之嫌。梁启超是清季舆论界能够呼风唤雨的有数人物，尚且不能承受“汉奸”千夫所指的重压，其余更是不问而知。由于排满话语系统的“汉奸”指称在当时语境下强势而有效，极具杀伤力，革命党人不仅用来进行社会动员，抨击清廷和保皇立宪，还会用作内部纷争的锐器。1909年底，在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冲突中，瓜罗庇勝华商阅报所同志在《中兴日报》发表声明，反驳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文函对孙中山的各种指控，就有意无意地将陶、章等人与汉奸相牵混。

该声明称：本社同仁及各埠于七月接到匿名书，“当时侨寓英法荷各属之人，皆知为陶成章与一曾在《中兴》败事开除者，由荷属荧惑一二不经事之教员所为”。此乃“汉奸者流，日防汉族有还魂之日，恣为反间构陷，而更助之为虐，固意破坏，不问可知。……能言不能行之人，其弊害势有所必至者。原其平日读书，皆富贵利禄有以逼之。今言革命，不过穷极无聊，随声附和，非真有种族、政治、民生思想发自良知者。今极力破败若此，其中翎顶铜臭之毒欤？毋亦汪公权之一派已矣”。匿名书自称为七省委派分驻英荷各属的办事之人，“何舍至公至正至善且至易办之法而不为，而必为汉奸之下策”^[29]。

凡与己意不合就是汉奸，则“汉奸”无形中从对敌斗争的利器，部分转化成为打击异己的政治标签。

[1]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附录·第一集《革党文告》，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3），第76—77页。《申报》1907年7月30日第4版刊登的《革命军首领徐锡麟伪示》，文字略有不同。尤其是五条杀例：“一遇满人皆杀，一遇汉奸皆杀，一不听命者皆杀，一私自逃逸者杀，一扰害平民者杀。”

[2]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附录·第一集《革党文告》，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3），第79—80页。《申报》1907年8月17日第10版《革命论说》的文字稍异。

[3]《皖抚恩新帅被刺七志》，《申报》1907年7月17日，第4版，“紧要新闻”。文中端方等三人名字隐去，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补。《浙案纪略》所录徐锡麟供词，与《申报》所载稍异。

[4]太炎：《排满平议》，《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第12页。

[5]蒙裔之多分子：《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民报》第20号，1908年4月25日，第113—119页，“来稿”。

[6]《申报》1909年4月19日，第1张第4版，“专电·电一（北京）”。

[7]《申报》1910年5月16日，第1张第3版，“专电·电二（北京）”。

[8]《南洋工会筹议抵制美约章程》（厦门），《申报》1905年9月3日，第2、3版。

[9]《拒约总公所会议回覆美商事》（广东），《申报》1905年12月31日，第3版。

[10]《方外组织孤儿院之热心》（杭州），《申报》1909年12月28日，第1张后幅第3版，“学务”。

[11]《沙民抗丈旗地之近状》（浙江），《申报》1909年5月19日，第2张第2版，“政界”。

[12]《留日学生代表致盛宫保电》，《申报》1907年12月18日，第1张第3版，“路款要闻”。

[13]《申报》1909年5月24日，第1张第4版，“专电·公电（安庆）”。

[14] 《浙江同乡公鉴》，《申报》1905年8月12日，第1版。

[15] 《平定州开矿办法》（山西），《申报》1908年2月24日，第2张第3版，“实业”。

[16] 《盗卖湘矿之作俑者》（北京），《申报》1911年2月8日，第1张第4版，“紧要新闻一”。

[17] 念一：《人面兽》，《申报》1907年12月30日，第3张第2版，“小说”。

[18] 雷铁厓：《斥妖报征文问题》（1911年6月14日至8月16日），唐文权编：《雷铁厓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6页。

[19] 雷铁厓：《斥政党》（1911年4月28日至5月25日），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263页。

[20] 雷铁厓：《可怜汉奸之子孙》（1911年3月28日），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239页。

[21] 雷铁厓：《咄咄二张》（1911年11月7日），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380页。

[22] 雷铁厓：《再答木君》（1911年2月27日），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218页。

[23] 雷铁厓：《警汉奸》（1911年8月24日），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344—345页。

[24] 雷铁厓：《最终之锄满者何人》（1911年5月26日），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283页。

[25] 雷铁厓：《中国已亡之铁案说》（约1917年3至5月间），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12、23页。

[26] 雷铁厓：《政府说》（1907年10月25日），唐文权编：《雷铁厓集》，第36页。

[27] 《星洲阅书报社演说纪事》，《中兴日报》1908年8月6日，第4版，“本坡”。

[28] 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47—48页。

[29] 《复泗厘歪也再寄匿名谤书者》，《中兴日报》1909年12月8日，第1版，“特件”。

第七章 首义之区的汉奸问题

作为辛亥首义之区的武汉是清革武力对决的关键地区。战事紧张之际，防奸锄奸成为当务之急。湖北军政府力求在确保军事胜利、政权稳固以及树立文明形象之间取得平衡，颁布相关的法律军规，由专门执法机构严格掌控汉奸的指认及其处置，有效地防止了滥捕乱杀，为光复各省提供了防奸锄奸的重要经验。只是战事失利的情况下，必须有人承担罪责，以便稳固军心民心，而坊间传闻和媒体报道不免道听途说，加上汉奸是政治指称而非法律罪名，加剧了汉奸如鲫的乱象，使得首义之区的汉奸问题极为凸显。先行研究中，存在过信报刊报道及当事人记述的偏颇，没有对证据进行必不可少的比勘验证，简单地以材料为事实，夸大了汉奸问题的严重和锄奸行动的流弊。

第一节 以间谍为汉奸

武昌起事后，随着局势的迅速变化，排满革命的话语从原来的非法状态迅速转身为高扬的政治旗帜，汉奸的指称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显著增高，并且成为人们口中的时髦话流行语，应对汉奸的各式各样相关行事也逐渐展开。由于民军一度高扬逐满复汉的旗帜，以孤立清廷，汉奸理所当然地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并且收效显著。而汉奸并非法定罪名，界定不够严谨，革命党一直以来的政治宣传，又着重强调锄奸的重要与必要，所定范围不免较宽，虽然光复后处置力求谨慎，尽量避免复仇滥杀，但在清方顽固抵拒的形势下，对于继续与民国为敌者，仍然不得不保持高压态势，锄奸行动因而得到强力推行。

起义的枪声响起，为了唤起民众的支持以及坚定必胜的信念，民军有意识地凸显反满复汉的色彩，之前大力宣传的杀满贼除汉奸理所当然地列为首要任务，而且迅速以文告的形式公诸天下。起事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名义颁布布告，宣称：“第一为民除害，与众戮力驱驰。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息久支。”^[1]该文告不仅在武昌散发，还通过不同渠道流向其他城市，远在千里之外仍然处于清朝控制下的上海，10月27日城内各处墙上就忽然张贴出此项布告，令当地人感到“殊可诧异”^[2]。

10月12日，武昌军政府又颁发《布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文》，历数清代汉人杀汉人的历史，昭告“军政府提携义师，肃将天讨，期与四百兆人平等以尽国民之责，亦与昔之英雄割据有别，固将使禹域之内，无复汉奸之迹”^[3]。同时还发出《鄂军都督致满政府书》，为武昌兵变正名定性：“是故慷慨激昂之士，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咸欲殄灭满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诛戮汉奸，以登亿万生灵于衽席。……而义旗以立，而满奴以窜，而汉奸渠魁以潜逃，时八月十九日事也。”^[4]

消灭汉奸的任务还具体化到军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上，其《略地规则》的“安民局之事务”第七条为“诘奸宄”，内容为：“如查有为□□作奸细及为妨害我军队之行为者，捕获送军前究办。”关于清方文武官员反正来附者也做了明确规定：“凡反正之官，必将其官印文

书及具有永远降服誓表送到军队之前，始为反正之实据。”对于一般国民，则发布安民告示，如果有不肖之人，“私通□□或作奸细或作有害军队之行为，亦为贼害同胞，军政府查出实情，亦必尽法惩治”^[5]。这些规则文告，为各类人群区分及认定是否汉奸，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判断依据。

清军的反扑使得扫除汉奸很快就由政治宣传变成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战事初期，“长江上下船中，均有汉奸，军政府侦探队布察严密，鲜有漏网者。武昌城中奸细极多，有图放火者，有探军情者，有谋刺者，有下毒药于井中者，但均为窥破，以军法从事者，日有数人”。以至于《时报》派往武昌的特派员用了“汉奸多于鲫”^[6]这样醒目的标题。媒体固然不免夸张，但形势的确相当严峻。11月26日，时任步队第五协统领的熊秉坤上书都督黎元洪就忧心忡忡地表示：

“所可恃者，湘军一协而已，顾亦伤亡过半。现敌人狡诈百出，汉奸星散，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其漫延于武、汉间者，没露无常。”^[7]依据各报的报道，首义之区的汉奸大致分为五种类型，一是通敌叛变、为清军做向导，或以散布谣言等形式破坏民军的军事部署，导致民军作战失利。如10月13日杀汉奸刘赓藻以整军心^[8]、阳夏之战后将周国斌及黑山炮台管带霍某正法等。周兄为张彪的差弁，阳夏之战，周国斌往汉阳，其中表与敌军排长相识，后者暗地贿使，于夜晚将汉阳防御阵地地雷引线割断，致使工事失守。^[9]黑山炮台管带霍某被北军运动，于10月24日晚“忽命炮兵将炮口移向龟山，炮兵不允，霍以手枪伤之。傍一炮兵大呼，亦击以手枪。幸又来二人，大呼捉拿汉奸，始有多人奔集，将霍拿住，送往司令部，讯明实情”，25日即行正法。^[10]有的汉奸化装成贫民，诱使民军统领过刘家庙，结果中了清军的埋伏身亡。^[11]

阳夏战事十分惨烈，因为民军屡遭重挫，关于汉奸破坏的传闻不绝于耳，而战地局势纷乱，也给奸细散布谣言造成可乘之机。“初七早，外间谣传甚多，或谓黑山已夺去，有谓民军粮台亦被烧，或谓龟山、汉阳城均为旗军所得，由汉奸为向导，纷纷不一。”实则因为援鄂湘军“皆是老练精敏之才，富于革命思想，故临阵无不向前冲锋，而湖北兵之老练者大半派往南京或他处，防守汉阳城中所留新招之兵居多，该新兵等大都无甚学识，往往出兵湘军在前，鄂军从后，前军胜则该新兵思夺湘军之功，若前军稍退，后军即退走而逃。初七日上午，汉奸故散谣言，谓某处已失，湖北兵不知是计，闻此警信，不战

自扰”^[12]。谣传与实情显然有所不同，可是局势的混乱，导致谣言满天飞，致使人心惶惶，又加剧了战事的危机。

战局僵持阶段，原张彪旧部张朝禧、向安邦等先后为清军做向导，偷袭民军阵地，并将战地电网地雷引线割断，或调转炮口轰击武昌，向安邦还试图潜回武昌为清军内应，被民军抓获正法。^[13]

二是以投毒、暗杀等方式破坏社会治安和军政首脑机关。10月20日晨，便有汉奸二人在小朝街水井暗投毒药，被民军发现，搜出毒药数包，扭送执法处，经执法官讯明梟首，并派人沿各街道鸣锣警告，勿随便汲饮井水。^[14]战事胶着之际，“武昌城内近有汉奸四五人暗投毒药于食水井中，前日业经拿获三名，梟首示众”^[15]。武昌保安总社接到政事部函称：“稽查长报告，有民人窥见城中某处有汉奸细在井旁暗中投害硝强毒水，奸细未获，井旁遗落水瓶。为此通告各局所，一体防守。”^[16]12月初，因为又有奸细于各水井投毒，水带绿色，入口即麻，军政府传知各保安会，通知所辖各户认真防范。^[17]湖北军政府首脑成为暗杀行刺的重点目标，仅1911年12月29日这一天，就先后发生了两起针对都督的暗杀事件。上午8时，“忽来口操北音者六人，往都督府进谒，据称系山东代表，检查部验明徽章并公文印信均完全，以为有此实在凭信，决无意外之虞。岂料其公文徽章全系伪造，盖假扮代表以实行暗杀主义者。由检查部带入，都督迎至客堂，宾主交谈，颇为欢洽。都督敬礼来使，款留早餐，食时都督亲与坐席。忽见一人伸手向身边摸索，仓皇四顾，若恐有人见之状。卫队见其形色有异，上前注意视察。该奸见卫队上前，疑已破露，急抽身起。都督见此情状，亦起而避之。卫队扭住搜查，六人之中有三人藏有炸弹五枚，当送执法讯问。据称均系河南人，受某某之付托而来者，公文徽章均系伪造。都督以此等奸细，并非有心破坏民国，实系受某人之愚，着先收入模范监狱，俟详细审讯后再行定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天下午2时，在武昌大东门外南湖军队大操场演习在沪新购飞艇，都督前往视察，“在场各兵士俱举枪致敬，都督答礼未毕，忽卫队中一人持枪向都督击射，连放三响，俱未获中。都督见枪声自卫队中发来，心知有异，遂策马前进，直入演武厅内。在场各兵队闻枪声，知卫队有贼，亦群来围捉”。鉴于卫队非都督旧部，即有妥保，均系毫无异志之人，行刺者必系奸细混入。而被拿获者着黑色军装，与民军无异，当即解交执法处讯供究竟如何混入^[18]。据称其中一发子弹击中黎元洪的佩刀柄，刺客随即丢掉手枪，

闪入人群避匿，卫队将其拿获，交执法处讯明，系河南人，俞姓，向在京营当兵，受某旗人指使来鄂，混入都督府当马夫，欲乘间行刺诸要人。已正法示众。^[19]

三是勾结清方，提供情报，杀害革命党人。其时“武昌城内汉奸甚多，近因门禁森严，不能传达消息，遂有放鸽传书，以旗或灯代语者，均经查获不少，然其传送之法层出不穷，我军必宜加意防范也”^[20]。鄂军军务部以奸细甚多，杀不胜杀，非将所有弊端严行禁止不可，特出告示：“两军对敌，凡属弊端，均宜禁止，以绝敌人与汉奸私通之害”，规定严禁放鸽、高悬旗章以及夜间高悬天灯等行为。^[21]

武昌起事后，麻城素有革命思想的屈子厚鼓动县知事更换军政府印。防营管带刘金堂率队驻防麻城，勾结知事，暗与敌通。屈晓以大义，反被刘等设计冤杀。事为军务司长查觉，派人查拿，知事逃，刘解省，承认通敌。军法会议以其有显然汉奸确证，为民军军法所难恕，决定枪毙。^[22]

四是暗中制造事端，破坏民军的形象声誉。“鄂省下薪河及凤凰山炮台，均可轰击汉口，诂每次炮击招商局、小关帝庙、签捐局等处之敌兵，其炮弹多射在英租界一码头一带，敌兵未有所伤。汉口英领屡次渡江诘问，黄总司令乃亲至炮台，试放三炮，皆中在招商局等处，方悉掌炮之兵系属汉奸。当讯出弁目四人，确受张彪之贿，有意酿成交涉。当将该汉奸梟首，以昭炯戒。故日来英界已不见有炮弹飞至矣。”^[23]

五是清军提供粮饷和武器弹药。如“三德里同济堂内有汉奸二人，携洋八万元，银四箱及子弹无数，意欲接济北军。前日被民军侦知，照会法国领事，将该汉奸等拿获，送入捕房，迨讯问后，当将银洋子弹一概送交武昌”^[24]。“汉奸欧阳鹤（湖南人，其叔欧阳利见，前任浙江提督）前为北军代办军械，现兼办粮台，十六日又将商家堆存货物偷买与洋商，意欲接济清军饷银，经该洋商以大义责之，乃抱头而逃。”另外“汉阳有项某者，冒充汉口商会司事，向礼记栈房购米二百余担，并付以现银，即欲出货。该栈司事详加盘诘，知为北军所派，乃谓须有汉口礼记帐房凭据，方可出货。项某以大言恫吓之，该司事仍不允，项乃悻悻而去”。报馆特派员不禁慨叹：“呜呼！何汉奸之多耶。”^[25]

面对汉奸活动的猖獗，政府和军队之外，民众也有组织地参与防奸行动，有时还会主动采取措施，挫败清军的阴谋。“清军统领冯国璋贿通汉奸诱得汉阳后，大肆搜括，为接济军饷等用，不知该城库款子药早为民军搬空，粮台亦临时焚毁。现北军在城待款甚急，无法可想，又嘱某国侨民将众商人堆栈内盐麦荳米各货约计百余万金盗做押款，事已垂成，欲借驳船运货，为旅汉商人访知，急诉明各洋行大班，谓商等在汉设行经营，已被北军焚毁一空，现汉阳所屯之货，大半已售与洋商，因遇战事不能出货，若北军如此办法，不但商民受害无穷，即洋商处亦将无从交货云云。想各洋行深明大义，决不受该侨民之欺骗也。”^[26]

[1]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 《本埠之鄂乱观》，《申报》1911年10月28日，第1张第7版，“要闻一”。

[3]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15页。

[4]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19—20页。

[5] 《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51、153、160—161页。

[6] 《第三特派员亲往武昌记》，《时报》1911年11月11日，第1版，“记事”。

[7] 熊秉坤：《熊秉坤事略》，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8] 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9] 军法处：《军法处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汇编》上，第413页。

[10] 本馆第二特派员来函：《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日，第1张第5版，“要闻”。

[11] 《大革命之大风云》（廿五），《民立报》1911年11月4日，第3页，“新闻一”。

[12] 第二特派员来函：《汉口战报》，《申报》1911年12月2日，第1张第5版，“要闻”。

[13] 《武汉战情轶录》，《民立报》1911年12月9日，第3—4页，“新闻一”。

[14] 《汉奸以药毒民》，《民立报》1911年10月27日，第3页，“新闻一”。

[15] 《武汉新纪事》，《申报》1911年11月13日，第1张第6版，“要闻一”。

[16] 《武昌保安总社特别之布告》，《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第94页。

[17] 《武昌近事一班》，《顺天时报》1911年12月3日，第4版，“各省新闻·湖北”。

[18] 《武昌拿获奸人类志》（十一月廿六日国事新闻报），《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第255—256页。以上两则文字据《爱国报》第1827号第3页《黎元洪之遇险》有所校订。

[19] 《武汉最近大事记·汉奸讨死》，《时报》1912年1月7日，第3版，“地方要闻”。

[20] 《武汉最近之闻见》（特别通信），《申报》1911年12月17日，第1张第6版，“要闻”。

[21] 《武汉最近之报告》，《时报》1911年12月12日，第3版，“地方要闻”。

[22] 军法处：《军法处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汇编》上，第414—415页。

[23] 《汉口战报》，《申报》1911年12月5日，第1张第6版，“要闻”。

[24] 第二特派员函述：《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4日，第1张第5版，“要闻”。

[25] 第二特派员来函：《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1日，第1张第5版，“要闻”。

[26] 第二特派员来函：《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11日，第1张第5版，“要闻”。

第二节 第一、第二汉奸辨

在战事激烈的情况下，各种消息传闻满天飞，媒体很难查实，况且瞬息万变的战局中个别消息是否属实，对于媒体而言，也无关紧要，因而相关报道难免附会或夸张。典型事例就是有第一、第二汉奸之称的张云汉、张景良案。据称：汉口保卫战失利，汉奸张云汉、张景良等暗中破坏是重要原因。“十九事起，军政府即派张云汉领兵一千，乘车往守武胜关。不料张某非特未往守关，竟为敌军作伥。后为部下所执，送往武昌正法。此第一汉奸也。月杪大捷之后，军政府派张景良为汉镇总司令，张本素倡革命主义，而又久居湖北军界者，但其妹嫁某满贵人，故初七八之事，已有远因在焉。张于黄兴拜将之后，遂于武昌斩首示众，汉军之大受损失，汉镇之被焚，皆此第二汉奸所致也。”所谓初七八之事，即“初七八之失利，实以汉奸张景良故意少发子弹”^[1]。

吴密相信上述报道属实，并引用《清史稿》等资料予以佐证。不过，这些案件的实情是否如报纸所说，以及能否定性为汉奸，目前所见资料存在不少相互牴牾之处，尚须进一步深究。

据瑞澂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致清政府的密电，张云汉率领的步队两标，在瑞澂、张彪带领清军反扑武汉的战斗系列之中，驻守刘家庙。^[2]武昌起事后，革命党忙于巩固战果，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即10月13日，才开会筹划抵抗北军。曾有多人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出过固守武胜关、破坏隧道的建议，结果只派张永汉往守武胜关。^[3]张永汉为第21混成协第42标统带，“十九日夜，省城同志反正，比得本标统带张永汉命令戒严，出入不易”。幸有侦探因公报告，往还不绝，才能会议响应计划，联络布置。起事时，该协公举林翼支为营代表，队官以上各长官均潜匿无踪。“二十一日晨六时，奉鄂督黎命令，四十二标二营占领武胜关。林代表奉命即准备出发，先令赵君承武为前站，侦探队伍亦随发。行至大智门，有土人报告，豫军五十七、八标及鄂军步队辎重不下数千人，在刘家庙驻扎等情。林君当商于诸同志云：‘我军人数薄弱，寡不敌众，前进无济反害，不如折至汉阳兵工厂，协助一营固守兵工、钢药各最要地点为是。’众谋僉同，即折至汉阳占领大别山。……二十二日，奉鄂督黎命令，委任林翼支为第一

混成协统领，并著仍回汉口驻扎”。该营在汉分途招募，三数日即成军一协有余。^[4]

据此，张云汉应为镇压革命的清军将领，并未参与起事。第42标统带为张永汉，新军起事时，他进行压制防范，后来则逃匿。奉命带兵往守武胜关的，是该标二营代表林翼支。另据曹广生的《赵承武传》，八月十九晚起事后，“派多人遍觅统带管带，不得，乃公举林翼支以戴之。承武则偕同志数人暗夜奔至大智门，意欲阻止张永汉北上，未遇而返。复邀胡光瑞率数十人往毁铁道。至刘家庙，遇巡防营至，遂方针所指，处处皆迷。承武愤不欲生，将投江从屈子游，经同人再三泣挽乃止，叹曰：‘吾岂以个人之私意而出此哉！诚以汉奸北上，则民军之情况，满贼皆知，铁道未除，将武、汉作战场，生民涂炭，吾恐无面目对吾鄂父老耳’”^[5]。照此说法，张永汉北上，并非带队据守武胜关，而是北上去投南下的清军。汉奸的罪名不错，案情却大不相同。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10月13日参谋部开会，“共商预备抵抗北军南下方略。有请破广水铁道阻止敌人，蔡绍忠则请破坏黄河铁桥。按兵法所云，容易破坏，修理最难。如此研究，颇乏赞成者。故拟定派张永汉守武胜关而已”^[6]。此说或为报纸报道的来源依据。

《新闻报》就说：“民国军都统黎元洪侦知北军将到，派军至武胜关迎击。兹悉系派四十二标标统张永汉带领原标前往把守，闻该标健儿最勇敢善战。”^[7]上述多为当事人于事后不久的记述，却相互歧异冲突，要想取舍近真，还有待更多资料的发掘。

张景良的罪行，也与42标有关。10月17日，42标于黎明攻击刘家庙，因新兵过多，不识战术，无大胜负，三营管带赵承武等牺牲。19日，复攻刘家庙，杀敌无算，大获全胜，“失计者，未直追至三道桥以外驻扎堵截耳。其未追之由，实害于战时总司令张景良心怀叵测，一经战胜，即命令不准直追，各率队回营休息，致敌军得占三道桥优胜地势”^[8]。

张景良原为湖北新军第29标标统，很早就是军政府军事领导的核心成员。或谓张景良起义之初投机革命，“欲得一指挥全权，以效忠清廷，乃伪为奋勇，以售其奸”。10月13日，被张振武查知，“独欲杀之。黎公与蔡济民保送执法处禁锢”。到10月27日，因何锡蕃身负重伤，张景良被黎元洪任命为汉口战时总指挥官，“责其立功赎罪。

汉贼罗家炎、刘锡祺、宋锡全等，参列战争，与张景良潜谋不轨，并私运子弹助敌军，以致我军失败”^[9]。此说或有不实。10月14日（一说15日黎明）都督黎元洪召集军事会议商议应对北军之策，与会者为黎元洪、纪堪颐、杨开甲、蔡绍忠、张景良、萧祖汉等六人。16日午前会议，公举黎都督兼军令部总长，杜锡钧正长，孙武军务部正长（受伤未到会），蔡绍忠副长，杨开甲参谋部正长，张景良副长，汤化龙内务部正长。^[10]由此可见，张景良一直是重要的军事领导成员，临危受命，是从参谋部副长的位置接手汉口总指挥，并不是戴罪出征。

据何锡蕃的《湖北起义战守实录》，10月27日汉奸罗家炎私运子弹暗送敌军，指挥官张景良失败潜逃，刘锡祺助敌侦探，同时拿获交军政分府正法。^[11]则张景良并未故意少发子弹，其罪责是失败潜逃。据《民立报》号称的“最详最确之武汉战事谈”，是日革命军总指挥何锡蕃中弹落马时，刚好张景良受命前来接替指挥，“畏缩不前，兵退即一人拍马向北军直跑，其为汉奸无疑，众兵奔前擒之，拘于江汉关署内。至于罗嘉言管带运送子弹向北军直进被擒，押回武昌后，即在谘议局门首枪毙”。另据一位宋姓民军军官说：“近数日汉奸甚多，城门不易出入，盘诘甚严。前者汉奸放毒入井，当获而剖其腹而掬其心。汉军战夺武胜关，为罗某张某卖放，以致北军近胜。至刘家庙已获汉奸罗某等，挖出两目，梟首汉口示众。”^[12]

罗家炎（嘉言）原为辎重营管带，据说民军起义以来，表面颇热心任事。10月26日，奉命管理弹药库。“罗心怀叵测，暗与北军通消息，联络一气。初五夜发弹时，每兵只发两排。兵士请益，则答以子弹不足，明晨续发。及至子弹告罄，罗故作仓皇之色，连呼兵士速催子弹。兵士均希望子弹速来，未肯即退，诟罗已派心腹人将军需处送来接济之子弹中途拦阻，及战场派人来催，始知底蕴，然已无及矣。”此事被指为27日兵败的两大原因之一。“兵士知中罗计，大呼罗为汉奸。罗知奸计破露，策马直投北军。马队见其奔逃，上前追赶，卒被捉获，捆送军政府严讯，已正法矣。”^[13]

关于张景良等人的为人、被捉、定罪与处刑，诸多亲历者的记载相歧相背，或情节相仿，人时地迥异。如涂维扬《蔡汉卿事略》记，10月12日，蔡汉卿任军政府总稽查部部长，“时府中参谋张景良，不事事，有去志。先生窥其隐，大言曰：‘瑞澂、张彪未获，若苟图富贵之心未忘，居位不任事，是包藏祸心，欲侦我情形，去以告敌也，

不杀之，不足以劝来者。’遂调炮队同志百余人，整队于府前，亲至楼，欲促杀之。同事有怜其才者，请于都督，暂交执法处以观其后，乃释之，时二十六日事也。后张景良运弹清军，我师败绩，咸服公之先识焉”^[14]。这与前引《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所说应为同一事，可是除了张景良外，人物、时间等均不相同。八月二十六日即10月17日，张景良刚刚担任参谋部副长，即使流露去志，蔡汉卿也不至于调兵抓人。情节如此离奇，背后当别有隐情。

关于张景良的罪责，众口一词都是通敌，指张景良任总指挥后，“与罗家炎、刘锡祺潜通北兵，私济子弹。……同志以汉口失败，胥由汉奸”^[15]。至于具体情节，各说又有不小差异。有的较为含糊，只是说指挥不当，贻误战机，颇有可疑，如“阳夏烈战，张景良充临时总指挥，经（姜明经）充炮兵顾问。时，北军入关，已越两日，按兵未动。经献出奇前攻方略，悉中机宜，奈未实行。景良以奸疑伏诛，随派经充总指挥”^[16]。有的则指其有意助敌，所谓“连战至九月初二，我军扼守华景街、歆生路一带。是役也，总指挥张景良有异志。兵士遥指敌曰：‘宜放枪。’张景良诒之曰：‘非敌也，是我军之另进者也。’并指挥大队趋敌火线，敌以十四生的大炮击我炮队，兵士伏于铁道轨旁，死伤不计其数。罗家炎掌军械，人发子弹二排。名交锋，实则束手待毙”^[17]。还有的只是指其救援不力，临阵脱逃：“初六日，我战不利，求援于总指挥张景良不应，败退于大智门。收拾残余，本部仅有兵三百余名。时，总指挥张景良已遁。”^[18]

指认罪行已是众说纷纭，关于具体抓捕及处置之人，更是说法不一，具体而言，有下列各种：

方兴说。汉口之战，“我军猛烈异常，敌累战累却，乃多方设间，诱我总指挥张景良，遂纳款于敌，命军械官罗家炎押子弹，暗济敌。张景良益指挥前进，敌忽枪炮齐击，毙者不计其数，我军遂溃，二队队长马融死之。众军知为张景良所误，执而诛之。（方）兴遂命黄天骥、吴宗汉、罗维等缚罗家炎，磔之武昌。义士愤不泄，多剖取心肝食之”^[19]。

李文辅说。“初六，七句半钟时开仗，战斗甚烈，敌军勇进，占据三道桥。我军拼死进攻，几退几上，不能取胜。血战至三句钟后，余随詹君飞马督战，大振军威，合攻前进，刘家庙已经夺回。不料指

挥官张景亮（良）被敌人串活，措弹不发，致阻锐气。众目所睹，汉奸无疑，于是当场将该奸捉获，送交分府收押，当请都督命令法办。”次日李即将三名汉奸斩首。^[20]

周全胜说。“是役也，张景良为总指挥，罗家炎为军械官，以纳款于敌，由是张景良自误戎机，罗家炎暗运子弹以供敌用，全胜遂率十余人缚张景良于大智门，杀之江汉关，并与方兴、吴忠汉、黄天骥、罗维等缚罗家炎，诛死武昌。”^[21]

彭士林说。彭起事后任军政分府卫队队长，“九月初六日，带队至大智门一带攻击，因张景良颠倒指挥，致我军败北。是日，去歆生路将张景良捉获，至军政分府执法处讯明，越日正法”^[22]。“初六日，指挥官改授张景良。诂知张与罗嘉言（家炎）表里为奸，颠倒队伍，减发子弹，我军因以败绩。敌人直逼汉镇，林退至军政分府，而我军已寂无人声矣。幸获张景良、刘锡祺二人斩之。”^[23]

上述各说，虽然都自称亲力亲为，而且撰写的时间就在事后不久，但是于抓捕、处决张景良等人的地点、时间以及顺序等等，均无法对应。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10月27日民军第九标一营为右侧前锋，二营往右翼接济，三营堵截左翼宽阔地。二营距一营战地尚有数百米，江中发炮，二营兵士如鸟兽散。“忽右翼散兵奔报曰：‘兵等子弹放尽，汉奸罗家炎不接济军火，致兵等束手，无能为力，而又江中汉奸萨镇冰发炮横击之，以致胡队长死于前，管带亡于后。’忽左翼散兵奔报曰：‘敌人已逼近，汉奸张景良接（按）兵不绝力援助。’……下午，汉奸罗家炎获，解都督府斩决。闻者见者莫不切齿，欲啖食其肉。及晚，汉奸张景良又获，解送江汉关斩决。闻见者如对待罗奸，不稍异。民气如是，虽败亦何惧！”^[24]“初六日，在车站拿获汉奸罗家炎、张景良等，解省充办。”^[25]

与各亲历者的自述言人人殊不同，具体负责审理案件的军法处显然参考比勘了各方的说词，进而查明实情。据《军法处事略》，其事详情为：汉口刘家庙前后屡战，民军总指挥官次第受伤，以张景良充任总指挥。九月初五（10月26日），以罗家炎熟悉军事、任事勇敢，派其充任全军输送子弹指挥官，预定初六拂晓开战。罗家炎奉命后于初五日中午至汉口民军司令处，进见总指挥官张景良，彼此未见，亦未接洽。罗所受任务，应于开战前将全军所需子弹数目计算概略，预计战前如何征发，战时如何补充，以及大小接济子弹的分配。罗未见

张，既不复请接见，又不将难于按给理由报告军务部、参谋部，另图救济方法，也没有向汉口军政分府陈请补救，置任务于不顾，当晚偷闲至□□里安眠。致使初六晨拂晓战，全军兵士每人只有子弹一、二排，以致民军大挫，死伤及半。迨审讯该员时，□□里并无该员亲朋，乃系在游戏场所住宿，放弃任务，贻误战机，同人多以兵挫难振引为啮齿，要求正法。当时亦以情节较重，军心要结，军法亦所难恕，故即正法。然当时有以罗之妻子为应死，要求惩办，势甚凶凶，难以理论。不得已稟请都督，为民国无死反妻孥之法，经都督允准，谕飭各军不得饬阻罗之妻子，并加抚恤及保证书，使罗之家属得回故里。^[26]

军法处是具体承办此案的权威机构，事关定罪量刑的依据，对于案情的掌握较为准确，不像坊间传闻、媒体报道那样，可以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也不能群情激愤地众口铄金。由此可知，不但张景良并非故意少发子弹，就连罗家炎也没有私运子弹暗送敌军。执法处所定罪名是输送子弹不力，贻误战机。张景良或有消极避战之心，却并无通敌之事。以惩办汉奸的名义将遭受败绩的责任军官正法，目的是为了固结军心民心。

自从清季练兵以来，湖北新军就不断被人拿来与北洋军进行比较，两强相争究竟鹿死谁手的话题，一直热议。辛亥两军武汉对阵，南下的北洋军是整建制，而以湖北新军为基础的民军，却是打乱原有建制重新扩编而成，不仅新兵多训练有素的老兵少，武器也不足，没有形成战力。加上军官严重短缺，临时提拔低级军官甚至士兵到高级指挥职位，没有作战指挥的能力和经验。所以，南北两军实际上是不对等作战，南军明显处于劣势，只能靠热情和信念支撑。张景良战败之前，10月20日何锡蕃出战不利，从造纸厂、头道桥南横堤退守刘家庙，即失却地利。另一说在二道桥的支队长谢元恺主张退守刘家庙，三营营长彭纪麟因滢口左右依水，系绝道，易守难攻，力谏不听。^[27]而战斗过程中清海军兵舰突然从江中发炮横击，民军死伤惨重。清军又陆续增兵，并在机枪、野炮等重武器方面占有优势，这是民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0月26日战于汉口水塔，虽有督战队，民军仍然不支退却。^[28]

战局军情究竟如何，军政府的领导层应该十分清楚。可是民军失去汉口重镇，武昌岌岌可危，如果实情公告，等于承认民军无法战胜清军，势必导致军心民心的涣散甚至崩溃，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而

如此重大的失利，也不能不追究责任。将败因归咎于“汉奸误事”^[29]，以“汉奸”的罪名对战败的指挥官进行严惩，不仅有助于固结军心，警戒动摇分子，继续坚持作战，同时对于军队和民众也算有所交待，使得军民郁积的激愤情绪得到纾解。汉口汉阳失守后，军政府发布安民告示：“汉口、汉阳之役，偶遭失败，睽厥究竟，非战之罪，实为汉奸之甘为奴隶，甘为牛马，于中惊扰，自相残杀。此等败类，昧于种族大义，徒知利禄熏心，深为痛恨。”^[30]这对于安定民心稳定局势，的确起到重要作用。

话说回来，罗家炎贻误军机，罪无可恕，但如果真是汉奸资敌，对其妻子的处理必然有所不同。尽管民国废弃连坐，至少不会给予抚恤。由此可见，军政府对于事情的原委其实是心知肚明。

[1]《第三特派员亲往武昌记》，《时报》1911年11月11日，第1版，“记事”。吴密的博士论文对于第一、第二汉奸案有所讨论，基本取信。只是关于张景良原来的政治态度征引了清革双方的部分说法。

[2]《武昌首义后清方电报补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231—232页。

[3]《纪堪颐革命事略》，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2—423页。

[4]胡鹏举：《胡鹏举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39—540页。

[5]曹广生：《赵承武列传》，《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51页。

[6]蔡绍忠：《蔡绍忠革命功绩并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30页。

[7]《武昌革命军九志》，《新闻报》1911年10月20日，第1张第3页，“中外要事”。

[8]胡鹏举：《胡鹏举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40页。

[9]民史氏：《张振武之革命战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395—396页。

[10]《纪堪颐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423页；蔡绍忠：《蔡绍忠革命功绩并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30—31页。

[11]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1页。

[12]《大革命之大风云》（廿五），《民立报》1911年11月4日，第3页，“新闻一”。

[13]《辛亥中国革命史·战场归客谈》，《神州日报》1911年11月3日，第2页，“特别纪事”。1911年11月3日《时事新报》的《中国革命史八纪·汉报述初六战情》（第1张第2版“特别纪事”）称：“是战之负，非我军不勇，实由汉奸罗管带嘉言暗施毒计。据军界人云：昨晚因今日有战事，司令处特发炮弹九千，枪弹数十箱，交罗经管。诟罗暗与敌通，只肯发炮弹二十，枪弹每人两排。至枪空弹尽之时，彼即截断后面接济，迫我军溃退后，彼即单身前向，直投敌军，为我马军所见，上前捉获，已捆送军政府正法。”

[14]涂维扬：《蔡汉卿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24页。

[15]邓玉麟：《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28页。

[16]陶炬、周登瀛、黄兆奎：《姜明经传》，《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46—547页。

[17]《胡襄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42页。

[18]熊秉坤：《熊秉坤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8页。

[19]方兴：《方兴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07页。

[20]李文辅：《李文辅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443页。

[21]周全胜：《周全胜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498页。

[22] 彭士林：《彭士林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650页。

[23] 周祖培：《周祖培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03—504页。

[24] 熊秉坤：《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署阵亡各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54页。

[25] 熊秉坤：《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105页。

[26] 军法处：《军法处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11—412页。

[27] 熊秉坤：《五旅中级以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61、81页。

[28] 熊秉坤：《五旅中级以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93页。

[29] 任启珊：《王师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178页。

[30] 何锡蕃：《湖北起义战守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6页。

第三节 汉奸的指认与处置

由此连带产生的问题是，即便所犯通敌罪行属实，是否以汉奸罪论处，值得进一步深究。被指为汉奸的刘金堂临刑前哭诉道：“吾所为处吾死刑，吾死无憾，惟憾吾不当因犯汉奸罪，九地之下，其将何面目见吾祖黄帝暨诸先烈之灵乎！”^[1]刘金堂并未否定其通敌行为，抱憾的是被定为汉奸罪，无颜面对先祖先烈。在当时的语境下，一般而言，通敌即为汉奸，似无不妥，但认真追究，汉奸的罪名，其实并不存在于当时军政府的法律系统之中。

军政府成立后，清朝的旧法不能简单沿用，而仓促之间也不可能从容订立新法，虽然各地军政府没有明言，实际可行的做法是将既有成法略做增补删改加以利用，否则势必陷入无法可依的窘境。而清朝历史上虽然曾经将不少“汉奸”治罪，具体罪名却并非汉奸，况且如何定罪，多出于军政长官乃至清帝的意旨，军政府很难原样照搬。

不过，军政府处置汉奸，又有与清朝的旧惯相似之处，即汉奸并非一般刑事民事案件，而是属于军法的范畴。据江夏临时审判厅暂行条例第三条：“本所管理一切民事、刑事诉讼案件及存案注册等事，但属于军法者，不在此限。”^[2]《鄂州约法》则规定，妨害治安可以秘密审判。而《中华民国鄂军都督示》公布的斩刑八条，分别为藏匿满人、藏匿侦探、买卖不平、伤害外人、扰乱商务、奸掳烧杀、邀约罢市、违抗义师。^[3]鄂军军政府的军律分为杀、罪、罚三类共二十二种，其中罪三项，罚六项，杀十三项，与惩办汉奸相关的杀例为：二反奸者杀，三降敌被获者杀，四私通军情者杀，五泄露军情者杀，六临战退缩者杀，七临战逃溃者杀，八造谣者杀，九私逃者杀。^[4]这些具有军法性质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汉奸罪一项。只有10月2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军鄂军都督黎示》明确声称：“设有汉奸傀儡，立即斩首不惜。”^[5]据此看来，汉奸罪应是俗称或泛指，凡是与通敌或破坏民军相关的行为，均被视为汉奸行径，其行为的主体，都可以根据各种相关律条予以惩办。这也就是说，汉奸实际上是一项政治指控而非法律罪名。

由于法规律条没有订立“汉奸”的罪名罪状，只是按照常理和革命党的政治判断，凡是继续拥护清朝统治并与民军为敌的汉人官绅将士，都在汉奸之列，这在实际进行中存在诸多难以操作之处。尤其是在战事胶着的危急时刻，出于对敌方压力的预应性超强反弹，很容易导致扩大化。而军政府为了树立文明形象，防止被清廷和列强妖魔化，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防止出现种族复仇式的滥杀。武昌起事的次日晚，“经执法官程汉卿报告，请都督黎公与诸革命家张振武、高振霄、陈宏诰诸君商定，以义军举动，总宜文明，故不命令，不准私放枪声。即巡查军队，见有路遇间谍与旗民等，均不准擅杀戮，必须送交执法处审理处置”^[6]。

尽管如此，起义初期，还是出现了锄奸过度的偏向，引起军政府的高度警惕。起事数日后，司法处的呈文称：“日来各分部、各稽查解来汉奸与满人以及迹近嫌疑并无确证之犯甚多，几有不容卑处详讯，迫令即予杀戮之势，甚至彼此在堂交斗，殊于司法裁决有碍。”为此，司法处“拟请此后无论何人交来案犯，如系汉奸嫌疑，均由卑处讯取确供，按罪定刑；如系满人，亦由卑处讯明后，收监呈候核夺施行。”鄂军都督府根据司法处的呈文向军令、参谋、军务三部发出关于陆军司法的通知，就此明确表示：“军政府兴师起义，原为伐罪救民，以人道为主义”，不能“妄肆杀戮”^[7]。后来又以黎都督的名义发出布告：“设有满汉奸细，速报本督知音。”^[8]此举一是便于最高统帅及时掌握相关情报，二是为了将汉奸的定罪权收紧，避免滥指误杀。

军政府时期，实行军事管制，一切案件归执法处负责审理，“以署内看守所区分为轻重禁闭两所。凡俘虏之旗民与汉奸、间谍，皆于重所锢之。凡关于他案人犯，则于轻所拘留之。……因执法科时有间谍、汉奸交讯，而此等案件情节，关于战机甚巨，故革命家高振霄、陈宏诰二君初任执法科调查，与科长程汉卿时于联络，遇有关于战机事宜，以便报告部长，而资准备”。该处慎重死刑，对间谍、放火、临战私逃各犯，情节重证据确凿者随时处决，其余禁闭。又将有悔意的年壮力强者重新编队助战。^[9]

严格掌控汉奸的指认及其处置，显示军政府主要将汉奸的范围限定在间谍、通敌、破坏等具体行为上，而不是将所有拥清的汉人官绅将士统统视为汉奸，即便这些人仍然处于与民军敌对的状态，只要没有采取上述各项具体行动，一般也不以汉奸论处。

尽管已经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在激烈的对抗冲突中还是容易出现扩大化的倾向，尤其是在汉口、阳夏相继失利后，武昌“城内搜查汉奸极严，自初八日起至十二日止，获汉奸数百人，皆湖北籍，即标明罪状杀之”^[10]。这样大规模的锄奸行动，很难逐一甄别，其中难免有误。据报：“近日武昌城内查诘汉奸，异常严密，二十五日，有汉口英文报访员在城内被汉兵获住，几至被杀。后盘诘再三，送至审判厅，复盘问三小时，始由某西人保出。”^[11]诸如此类的情形，在被处置的汉奸中恐怕并非绝无仅有。

杨思机已经注意到，湖北、江苏两省为民军控制的两大中心，关于通敌的汉奸的报道特别多。^[12]而多的情形，一是汉奸活动的实事多，二是关于汉奸的报道多。二者有所关联，但未必完全一致。至于多的具体原因，一是两地战事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战斗激烈，配合军事行动的谍报和破坏活动相应较为频繁；二是媒体和社会的视点集中，有关的传闻和新闻引起普遍关注。此外，武汉作为首义之区，对于战事失败势必导致清廷反攻倒算的担忧较其他地区更为强烈，这一方面使得当地军民抗击清军和推翻清朝的决心意志极为坚定，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过度防范的情形。

由于武汉战事进行之际，汉奸破坏导致军事失利的危害被凸显出来，光复各省吸取经验教训，借鉴首义之区的做法，再结合当地的实情，防奸锄奸之事受到特别重视。在军事冲突持续时间较短的地方，拥清势力只能暗中进行捣乱破坏，肃清残余、防奸锄奸则成为巩固新生政权的重中之重。总体而言，首义之区掌控防奸锄奸的尺度较为适当，既有力地打击震慑了清方，稳固了新生政权，为光复各省树立了典范，又使得革命者的形象很快得到国际舆论的正面肯定。

[1] 军法处：《军法处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15页。

[2]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734页。

[3]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24页。

[4] 《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条件》（九月十三日经纬报），《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第147—148页。

[5]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27页。

[6] 军法处：《军法处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10—413页。

[7] 《都督府通知》，《民立报》1911年10月25日，第3页，“新闻一”。

[8] 《武昌内政一斑》，《时报》1911年11月10日，第3版，“地方要闻”。

[9] 军法处：《军法处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10—413页。

[10] 《武汉最近之闻见·其二》（另一访员通信），《申报》1911年12月10日，第1张第5版，“要闻”。

[11] 本馆特派员来函：《武汉停战后近状·其二》，《申报》1911年11月20日，第1张第5版，“要闻”。

[12] 杨思机：《汉民族形成的指称与论争》，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第84—85页。

第八章 光复各省的防奸锄奸——以沪军都督府为中心

辛亥各省光复，防奸锄奸成为重要任务。由于坊间传闻、媒体报道以及别有用心者的攻诋，加上汉奸罪是政治而非法律术语，使得在锄奸范围事实上大为缩小的同时，汉奸问题看似乱象纷呈。实则以上海沪军都督府为代表的各省军政权和南京临时政府都力求在确保政权稳固和树立文明形象之间取得平衡，分设侦缉和执法机构，相互制约，严格掌控汉奸的指认及其处置，有效地防止了滥捕乱杀。而政坛变幻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判断汉奸的尺度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考验着革命党的政治伦理。

关于上海沪军都督府在防奸锄奸中的角色作用，由此引发的上海与苏浙两省其他军政权乃至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以及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翻云覆雨中，革命党领袖与基层围绕汉奸问题的政治伦理分歧，未尽之意甚多。

第一节 严厉打击

与首义之区武汉相似，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是光复各地汉奸问题十分突出的地区。杨思机已经注意到，湖北、江苏两省为民军控制的两大中心，关于“汉奸”通敌的报道特别多。^[1]至于多的原因，一是两地战事激烈且持续时间较长，配合军事行动的谍报和破坏活动相应较为频繁；二是媒体和社会的关注集中。武汉系首义之区，一度成为全国各方各界目光聚焦的中心，上海则是近代中国报馆最为集中之地，南京又是南北争夺的关键，后来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而多的情形，一是汉奸活动的实事多，二是关于汉奸的报道多。二者有所关联，但未必完全一致。

光复各省吸取首义之区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做法，再结合当地的实情，防奸锄奸之事成为巩固新生政权的重中之重。光复后的上海虽然为民军所控制，仍是南北中外交通的汇聚之地，五方杂凑，又有实施治外法权的租界作为庇护，各方势力纷纷利用方便条件进行各种活动，以图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这使得沪军都督府的防奸锄奸举措显得格外重要。

各地陆续光复，而战事依然胶着，民众对于整体局势忧喜参半，汉奸多便是隐忧之一，“东南半壁，以次恢复，可喜。然金陵未下，民贼未除，又可忧。各处旗人多有降服，可喜。然暗杀党汉奸多如鲫，又可忧”^[2]。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防范和惩治汉奸的事务受到特别重视。相比于武汉，各地的防奸锄奸虽有程度不同，汉奸的表现和军政府的处置办法则大同小异。

在江西，“九江马路巡警道马献忠初表同情，后将九江军政府详情密报敌军，后以事泄，梟首示儆”^[3]。“赣省近有汉奸在井放毒，业已严备，现经军队在洗马池药店拿获买毒之鄂人，解赴军政府，就近正法。闻系官场受张勋之指挥者。而二十六日又有三人在鄢家井放毒，被警拿获，搜出毒药数包，色白性猛，解往军政府严办，幸未毒毙多命。又有一股汉奸在北营坊演武厅侧井放药，因其井口盖锁被其破坏，察知放毒，水已变绿，以金簪试之，顿变白色，当经验明，遍告禁食云。”^[4]九江炮台统制徐世法与张彪密使五人合谋，运动军队

降清，事为赣军政府谍报科侦悉，将六人拿获，徐世法永远监禁，其余五人即行枪决。^[5]此外，马献廷暗报军情，搜出报告铁证，作为汉奸间谍明正典刑。^[6]1911年12月31日，江西都督马毓宝致电孙中山及各都督，通告对汉奸李瑞齐的处置结果。据称：“前此战事失利，皆由张彪将我情实尽贡敌人，使其均操胜算，而张彪之所以昧于大义，不克幡然来归，而甘为彼族向导者，皆瑞齐一人作成。乞即行就地正法。”^[7]次年1月初，经执法部检查证据，讯供确实，宣布罪状，将该犯绑赴刑场正法。^[8]

安徽独立后，局势反复不定，素以杀革命党为宗旨的汉奸刘国栋争都督之位不成，率无赖千余人围攻军政府，抢去都督印信，送与皖抚朱家宝，以致安庆局势糜烂。^[9]

江浙一带，杭州光复时，“闻是日共计拿获汉奸十四名，均带凶器云”^[10]。11月22日，扬州“汉奸龙振仁冒充民军，混入敢死队营，闯入边指挥振新卧房，意图行刺，幸即捕获，即由新军姚统领证实，该汉奸确为张勋兵士，当由边指挥传令押赴校场正法，并标以数语，甘心为贼死，擅入指挥房云云”^[11]。扬州江北北伐军司令正长徐宝山通电各都督各报馆：“据泰州缉私营张管带报称，有汉奸二名来泰窥探虚实，擅自入营，勾通龚姓号兵，秘密商议。该管带以形迹可疑，当即拘讯。该汉奸供称：系小海一带定存营派出，与号兵串通，约会腊月初大队到来，一同起事，为刘凤朝报仇，以泰州为根据地，进攻扬州，并举张勋营兵通同一气，供认不讳。当由该管带将汉奸二名、号兵一名枪毙。”^[12]南京则拿获汉奸孙清泉，孙原为清朝侦探，偕同精制炸弹的外国人到宁，被宪兵查获看管，因其在上海颇多恶迹，电知陈其美派人提赴上海讯办。^[13]还发生过汉奸在贩卖的香烟中下毒之事，吸食者七孔流血而死。^[14]

在湖南，据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通报：12月11日长沙来电，拿获汉奸文顺卿，供出同伙多人，驻武昌、湘阴、续巷、长河等地，用暗记暗号。^[15]具体详情是：12月上旬，湘潭船抵汉，据美最时洋行伙友谈及，长沙城内于6、7两日“搜拿汉奸多名，现在该处各旅馆皆有满暗杀党”。8日，“有一旅馆将门紧闭，经侦探队长连查数次，踢门进内，拿获少年五六人，并搜出炸弹二箱，一并拘送军法司讯究，并将旅馆发封，栈主拘押”^[16]。文瑞卿系12月10日由军队拿获，于肋下搜出康熙钱暗记。随经都督讯明，饬即梟示，以昭炯戒。

次日，又由岳州司令部解来北军间谍周小浓一名，亦经都督讯明，飭令正法。几天前，在岳州拿获私运米石接济敌人之王慎堂等五名，随即斩决，将首级解至各关隘示众。^[17]12月底，驻扎湘潭县的“第十三标吴统带于昨日拿获汉奸一名，供称袁金岳，系属张彪侦探，来湘探听军情，并相机采办军米，并谓同来者共有李生鸿等八人，均带有枪弹路银，日间以口号，晚间以铜钱为暗记等语。当经会同湘潭县余令、左路巡防队谢统领覆讯明确，即电禀都督，就地斩决示众，并由都督通电各省各属，一体严行防范”^[18]。

当汉奸却不得满人善待，下场可悲，成为对汉奸的儆戒。在湖北沙市，“劣绅夏炳南自闻鄂军起义，甘为汉奸，即往荆州为满奴筹划防守策。满奴每每在沙市捐饷，必先令夏往沙市商会酌商，否则继以兵力。夏知商民积怨，恐家属被害，亦将家属搬入荆州城内，仗满奴保护。夏有女，年甫及笄，姿色颇佳，被清将军联魁闻知。一日晚，夏在将军处闲谈，将军言将娶夏女为妾，夏以他辞推诿”。将军“命人斩之，并书不听命令即应斩首八字，置在夏尸上”。报馆特加评语道：“呜呼！为汉奸者其鉴诸。”^[19]

战局的犬牙交错为汉奸的跨地区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内外勾结，增加了防奸的难度。“有人由段祺瑞处探得消息，前湖北候補道卞綽昌因我军起义逃往南京，后南京又被我军光复，卞闻汉阳适为贼据，遂又奔赴汉口，往谒段祺瑞，求委差使。段谓汝系张文襄之亲戚，民军办事者多张之门生故吏，汝可渡江探听民军虚实，再来报告，自有上赏。卞谓卑职旧日仆人尚住武昌，可得敌人消息，如亲赴武昌，尚须有确实可靠之人在民军中，始可前往。吁！卞綽昌竟自寻汉奸做耶！我军政府当慎防之，尤当调查卞贼仆人住处，一一逮捕，不使泄我军秘密。”此外，“武昌军务部据侦探员报告，汉奸张某遣暗杀党六人，已赴宁沪一带，均系西式装束”^[20]。

鉴于防奸锄奸的重要，各地光复政权相继颁布了明确的赏罚条例。山东军政府成立后，颁布赏罚各条，其中就包括“泄漏军机及谣言惑众者斩”，“为满清作奸细者斩”，“反抗义师者斩”。与之相对，则有捉送汉奸者赏，报告敌情者赏，创练民团杀敌者赏，率众投诚者赏，暗杀敌人首要者赏。^[21]沪军政府颁布了军律十条，赏例八条，惩罚令二十七款又附注七条，军械律十条，逃亡律八条，没有明确涉及惩办汉奸的条文，相关的为军律第三条奔投敌营及临阵脱逃，第五条泄漏军情及散布谣言摇惑军心，均处以死刑。^[22]在定罪量刑

方面，由于仓促间不易制定新法，根据司法部总长伍廷芳的呈请，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规定，除第一次刑律关于帝室之罪全章以及关于内乱罪之死刑碍难适用外，暂时沿用前清各项新律。^[23]各地抓捕汉奸，主要是由军队或专门组织的侦缉队实行，而审讯及处置汉奸，则由军政府的相关部门负责，按照军法执行。上海的汉奸问题特别突出，为此专门设立了侦探队和谍报科（又称间谍科），进行明察暗访。侦探队的设立，始于清末，清政府主要是为了对付革命党日趋频繁的活动，并且在各界各类民众运动中侦察反清人士的动向，以图及时掌控，防止事态扩大。军政府设立侦探队，很大程度上是针锋相对地延续了清政府的做法。而专职防奸肃奸的侦探队、谍报科的设立及其运作，又使得汉奸问题更加凸显。

沪军都督府执法科科长由蔡治民（名寅，以字行）担任，谍报科科长则由应桂馨担任。前者留日期间即加入同盟会，是老革命党人，后者原来是上海青帮成员，与陈其美结识，加入同盟会中部总会，参加了辛亥光复之役，得以任此要职。应桂馨后来一度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卫队司令，临时政府解散后，又辗转与袁世凯的心腹洪述祖搭上关系，成了刺杀宋教仁的主凶。

应桂馨带领的谍报科与蔡治民主持的执法科之间，由于职能不同，在防奸锄奸方面存在着相互配合又彼此制约的关系。谍报科主要负责侦察和抓捕，拿获得越多越好，而执法科则要对所捕获的嫌犯进行审讯甄别，根据人证物证还原案情，并据以定罪。两个部门的尺度掌握明显有所差异。

由于防范处于守势，情况复杂，对于事态的发展难以准确预判，只能尽量朝最坏的方面着想，力争做到万无一失。因此，来自谍报科的情报的确有汉奸多如鲫之势。为了严厉打击日益猖獗的汉奸活动，沪军都督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防范，千方百计堵住一切漏洞。有消息称：“汉奸挟带炸弹，图谋不轨，曾经在沪宁车站及各客栈缉获数名，解府严讯。”“都督府又据侦探密报，谓汉奸党羽近因搜查严密，已相约不乘火车，不住客栈，假作避难商民，租住公馆，一谋施行暗杀，一作侦探机密，请飭四出搜查等情。故陈都督刻又添派精细人员，不动声色，分投踵缉。”^[24]听说万国红十字会发放护照较为宽松，谍报科特致函该会：“闻某红十字会发给护照多张，内有政界中人，乘坐日清轮船赴汉接济，难免无满清侦探混迹其间。”认为一律发给护照，漫无限制，“商请改制徽章，分别办事徽章、捐款徽

章，使人易于明了。照此办理，与贵会初无窒碍，敝处则裨益良多”^[25]。

在严加防范的同时，还加大了侦办和镇压的力度。沪军都督陈其美“探得留东满族学生妄立敢死队名目，希图混入武昌，行刺民军重要人物。兹查有满奴三名，随同汉奸多人到沪，行踪诡秘”。立即悬赏布线，“除派暗探密拿外，特布告同胞，如有拿获真凶押解来府者，每名给赏洋二千元；来府报密因而拿获者，每名给赏洋五百元”^[26]。对于谍报科的情报，陈其美宁可信其有，屡屡据以发出通告，指派侦探查拿。如“沪军都督据谍报科员报告谓，近有汉奸多人，匿迹沪南新舞台后面某旅馆内。当即派令侦探会同市政厅包探往拿未获，除先回复陈都督外，并至附近各旅馆严密搜查，务获究惩”^[27]。

响应沪军都督府的倡导，上海的一些准军事组织进一步加强戒备措施。南市商团公会司部“以本埠为华洋杂处之地，奸宄最易混迹，且近来汉奸甚多，潜赴各处探听军情，行动颇为秘密，殊难防备。本司令部亦系办公重要之地，防范不得不严，是以每日严定口号，凡在陆家浜事务所出入同志诸君，均须通谕，并有银牌记号，以昭郑重。故于昨日通告进出各员，如逢卫队人员查问，必须和气应答口号，不得无意识之举动，自失高贵资格。嗣后或有明知故犯，一经查出，按照违背命令议罚”^[28]。商界还组织了共和团，所定暂行条例专门规定：“组织侦探，一部分专探汉奸售军火及私运粮食或军用品接济清廷，残害同胞者，预备对付方法。”^[29]女界也组织了中华女子侦探团，公开宣言：“本团团员有泄漏机要甘作汉奸者，一经查出，稟请政府以军法从事。”^[30]也就是说，不仅要侦探汉奸，还要确保组织内部不出汉奸。

严密防控之下，上海的确破获了不少汉奸要案，较为著名的为招瑞声案和程豹案。招瑞声是清海军部军政司谋略科科长，奉海军大臣命令，“近由北京来沪，拟运动海军依附满清，否则使守中立，不为民军效用。迭经各处函电通告沪军政府，由陈都督密派谍报科设法拘获，验明正身，并有新裕船员曾亲问其意，到堂作证。当晚又奉执法科长蔡治民君讯取口供，该汉奸知己无可抵赖，直认不讳”^[31]。沪军都督府执法科长蔡治民公布的罪状是：“该犯籍隶广东南海，现充满清海军部谋略科科长，上月自天津起程，潜来沪上，密谋运动我海军归降清廷，否则保守中立，不为民军效用等情，迭经各处函电告

发。又以该犯所谋不慎，泄漏机宜，有新裕轮船船员声告，亲闻该犯口语以为证。我海军人员深明大义，敌忾同仇，本非二三宵小所能煽惑。特该犯混迹南邦，效忠北庭，为反间之谋，昧大顺之义，忍心反噬，役于虎而为俛，甘冒公仇，投诸豺而不食，罪何可逭，法不容宽。业奉都督命令，于本月初四日申时，将该犯提赴九亩地明正典刑，为不知顺逆倾陷大局者戒。”^[32]清方闻讯，海军部奏请恤典，赏给治丧银八百两，追赠为协都统，从优议恤。^[33]

程豹是江西人，“现年二十余岁，由端方购充清江督署秘密侦探，又进同盟会为会员，即将同盟会内容潜行报告，以致民党进行方针屡被破坏，民党恨之刺骨，咸欲得而甘心。此次武汉起义后，程又东奔西窜，甘为满虏之走狗。数日之前，潜来沪上，与旅沪满清官员秘密往来，图谋不轨，并暗中大施运动，勾探军政府行军方略。事为沪都督陈英士君所知，密令谍报科长应君调查属实，设法拘住，于昨日午后五下钟解至军政府，经都督验明无误，即飭立时枪毙”^[34]。程豹的罪行基本属实，执法科蔡科长示谕通告：“该犯籍隶江西，为清江督端方侦探部下走卒，入日本东斌学校，投身中国同盟会，阴则侦刺会中内情，以去报诸贼酋，民党进行，屡被破坏，赣宁同志，迭遭陷害，民党中人，腐心切齿于此多也久矣。呜呼，缙骑功高，清流祸极，含沙射影，鬼蜮之技靡穷，奉恶邀功，虎俛之诛宜首，同胞之所共愤，法律之所不容，非尽法惩治，无以慰我诸先烈之灵，而儆其余。业奉都督命令，于本月初二日酉时，将该犯在军前明正典刑。”^[35]都督发交招瑞声和程豹的罪名，都是汉奸，所以《申报》特意强调：“噫，凡为汉奸者，亦可以知所儆矣。”^[36]

[1] 杨思机：《汉民族指称的形成与论争》，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第84—85页。

[2] 立三：《可喜又可忧》，《申报》1911年11月20日，第2张后幅第2版，“自由谈”。

[3] 《第三特派员亲往武昌记》，《时报》1911年11月11日，第1版，“记事”。

[4] 《赣省改举都督之新猷·汉奸放毒之戒备》，《申报》1911年11月27日，第1张后幅第3版，“要闻”。

[5] 《辛亥中国革命史·汉奸徐世法之罪状》，《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9日，第2页，“特别纪事”。

[6] 《附录执法部枪毙汉奸之示谕》，《时事新报》1911年11月11日，第2张第2版，“特别纪事”。

[7] 《民立报》1912年1月2日，第3页，“沪军政府电报”。

[8] 《汉奸之结果》，《民立报》1912年1月10日，第5页，“新闻二”。

[9] 《安庆糜烂始末记》，《民立报》1911年11月22日，第3页，“新闻一”。

[10] 《杭州光复记（三）》，《申报》1911年11月9日，第1张第6版，“要闻一”。

[11] 《扬州最近闻见录》，《申报》1911年11月26日，第1张后幅第3版，“要闻”。

[12] 《申报》1912年1月8日，第1张第3版，“公电”。

[13] 《南京擒获汉奸记》，《时报》1912年1月23日，第4版，“地方新闻”。

[14] 《南京要闻汇录》，《时事新报》1912年1月26日，第1张第2版，“特别纪事”。

[15]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439页。

[16] 第二特派员函述：《武汉最近之闻见》，《申报》1911年12月20日，第1张后幅第2版，“要闻”。

[17] 《三湘七泽之近闻·拿获汉奸》，《申报》1911年12月27日，第1张后幅第3版，“要闻”。

[18] 《湘省军界近状·湘潭拿获汉奸》，《申报》1911年12月29日，第1张后幅第3版，“要闻”。

[19] 《沙市汉奸之结果》，《申报》1911年12月28日，第1张后幅第2、3版，“要闻”；《辛亥中国革命史·汉奸夏炳南之结果》，《神州日报》1912年1月6日，第2页，“特别纪事”。

[20] 《武汉最近闻见录·其二》（特别通信），《申报》1911年12月31日，第1张第6版，“要闻”。

[21] 《山东军政府成立》，《申报》1912年1月31日，第6版，“要闻”。

[22] 《沪军政府新律令》，《民立报》1912年1月29日，第6页，“新闻三”。

[23] 《大总统据司法总长伍廷芳呈请适用民刑法律草案及民刑事诉讼法咨参议院议决文》，《临时政府公报》第47号，1912年3月24日，第1页，“咨”。

[24] 《汉奸之鬼鬼祟祟》，《申报》1911年11月20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

[25] 《间谍科防汉奸混迹》，《申报》1911年12月23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都督府谍报科致红会函》，《时事新报》1911年12月23日，第2张第3版，“本地时事”。

[26] 《沪军都督通告二》，《申报》1911年11月8日，第2张第2版，“本埠特别纪事”。

[27] 《查拿汉奸》，《申报》1911年12月12日，第2张第3版，“本埠新闻”。

[28] 《商团公会防奸之通告》，《时事新报》1911年12月26日，第2张第2版，“本地时事”。

[29] 《商界共和团之缘起》，《申报》1911年12月15日，第2张第4版，“来件”。

[30] 《中华女子侦探团缘起·中华女子侦探团简章》，《申报》1911年12月19日，第2张后幅第3版，“快人快事”。

[31] 《枪毙汉奸》，《申报》1911年12月24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

[32] 《汉奸罪状之公布》，《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第5页，“新闻三”；《宣布汉奸罪状》，《申报》1911年12月25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

[33] 《招瑞声之恤典》，《爱国报》1912年1月23日第1835号，第3页，“国事要闻”。

[34] 《又去一个汉奸》，《申报》1911年12月22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

[35] 《汉奸程豹之罪状》，《申报》1911年12月23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同日《神州日报》第3页《中华民国之新江苏》所载，文字稍异。

[36] 《又去一个汉奸》，《申报》1911年12月22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

第二节 慎重甄别

被抓捕的人当中无疑有相当数量的汉奸，但在不可放过一个的心理驱使下抓人，是否汉奸以及能否按照汉奸论处的问题也日渐增多。有的案件显得证据不足，如“沪军都督府谍报科员某君昨据侦探报告，谓顷间获到湖北人杨亚夫一名，形似汉奸，举止可疑，某君即令拘解市政厅，收押候究”^[1]。所谓“形似汉奸，举止可疑”，显然过于主观随意。在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下，用这样的尺度判断和抓捕嫌犯，难免过滥。同样以“形迹可疑”被沪军政府谍报科侦探拿获的马麟，收押在义武宪兵队期间，其弟马钰前往探视，亦遭拘押。后经南京军政府总参谋来函，才将马钰保出，暂寓旅馆，听候传质。^[2]民元1月，安徽敢死队司令部的朱祖谦来沪采办军装，被闸北民军指为清军段芝贵派来的暗杀党，以手枪连击，身中六弹，幸而未中要害。^[3]

负责谍报科的应桂馨原来有帮会背景，所用人员，鱼龙混杂，不仅捕风捉影地滥抓，有的甚至挟嫌报复。如“前日有间谍科侦探王竹卿至闸北洪安里拘拿前充总局侦探之董三福，指为汉奸，解请总局暂押候讯。昨据董妻陆氏投稟声诉云：该探王竹卿（即绰号小绍兴）系著名长江帮积窃，本年三月，氏夫在美捕房包探杨掌生处为伙时，曾将王竹卿、李荫堂二犯缉获解办，并搜出手枪两支。王等在捕房自认为暗杀金琴生案内凶犯，迨解公堂，忽翻前供，惟认行窃。公廨有案可查。今忽平空诬害，希图报复，求恩伸雪。孙科长谕令退去，听候讯核”^[4]。

当然，抓人从严，在战时非常状态下也无可厚非，而且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滥杀。执法科对于抓捕的嫌犯认真慎重地取证甄别，尽可能防止了汉奸定罪的泛滥。具体而言，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对同时查获的多人据实分别对待，避免一概而论。“沪宁车站查获之汉奸五人，已经闸北司法审讯，惟刘继成（即刘莲生）、张信全二人，确系汉奸，于昨日解交沪军都督府。至晚九时，经司法科正副长升讯，先据张信全供，与刘素不相识，因廿一日晨友人谈及刘欲赴申，是以同行，并不带有枪械。刘供伊兄现在张勋处充当武弁，此次因见战事正剧，嘱伊带洋数百元回天津原籍，所携手枪，系防身之用，札文则为回家炫耀乡人，聊撑体面，万不敢为汉奸刺客，叩求恩典。问官诘

谓由火车至申，改换轮船赴津，路途平稳，无用此枪，显有不实。着令严加收押，候禀明都督后，定按军律处治。”^[5]二是根据情节，判断各方面证言的虚实真伪，决不轻易定讞；一时难以判断的，酌情暂时看管，以待进一步查证审理。有时移交的嫌犯坚持不肯认罪，与抓捕方各执一词，执法科更加慎重对待，设法查实。如“本城小南门内巡警教练处查获之满籍汉奸放火图乱之杨月富一名，昨由教练处派员将杨押解至都督府，亦奉司法科长二员升讯。杨供实系汉人，且此次无心失火，实未纵放，且此系教练处，并无军政民政长官在内，即为汉奸，亦不肯在此间下手，似不须小题大做。而当时拘捉之人，坚谓目见放火，一面将其获住，一面将火救熄，决无疑义。问官以兹事体大，可在原处暂押，容查明实在情形，再行处置”^[6]。案情类似的还有“沪军第一师团第二营营长昨日饬派兵士解送嫌疑犯张何一名至沪军政府，即经执法科长蔡君研讯，据称前在北京运动禁卫军士，令其反正，为民军效力，现在回沪，住居租界小花园旅馆。不料被师团误疑汉奸，拘解到府，须求明鉴。判交义务宪兵队看管，候查明再核”^[7]。

有时虽有疑似情节，亦不简单结论，如“汉奸杨文彬受满清政府陆军部指使，由京乘坐火车至天津，换趁轮船来申，购办军服等物，希图接济北军，胆敢在沪北一带张牙舞爪，到某妓院大言炎炎，致为沪军政府谍报科员查知，饬派侦探将杨拿解到府，奉执法科长蔡君谕，着将杨文彬暂发义务宪兵队看管，候讯核办”^[8]。

有时各方说法不一，沪军都督府也不轻易放过。1911年12月下旬，前清民政部签字科科长顾鳌“反对民军，破坏大局，胆敢在四川会馆开会，邀集同乡演说。事为黄大元帅访闻，特令司令部王正祥会同沪军都督府侦探前往拘拿。至四川会馆，业已散会，顾登马车而去。中途围捕，顾又敢开放手枪拒捕。卒因众寡不敌，得以就获，现解入军政府，奉陈都督命，交宪兵队看管，候交执法科研讯”^[9]。旅沪川人上书陈其美，披露顾鳌的丑史，据称顾为四川广安人，素以无赖闻，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夤缘得北京外城警厅差事，后又运动为资政院政府委员。此次来沪，系自向袁世凯陈说能运动此间陆海军归顺清廷，故袁给以重金南下。^[10]

北京《爱国报》的消息则称，顾鳌是议和代表唐绍仪的随员，“日前于上海四川会馆演说，因谈及君主立宪问题，当有民军在会，谓其反对共和，蛊惑人心，指为汉奸，遂通知黄兴部下之宪兵，立将

顾某当场拿获，送至黄兴处审问，后又发交至沪军都督府，现已由执法科转送至市政厅收押”^[11]。由于控保双方各执一词，迟迟不能定讞，为郑重其事，1912年1月中旬，陈其美致电孙中山，报告案情，请示办法：“川人顾鳌，前经同盟会中多人告发，坚认顾为汉奸，且称周代表系顾鳌至戚，以私谊误公等情。既据程总长函称各节，尚希尊处详细查明电示，以凭核办。”^[12]

三是没有确凿证据，又未发现可疑言行，即交保开释。“陆军入伍招待所前日送嫌疑犯王邦凯、李鹤松二人至总局，由司法科密讯。据王供，湖北石首县人，前在湖北荆州中学堂毕业后，入陆军学堂，今年六月咨送保定陆军入伍队当军士，队长萧姓，因八月十九武昌起事，全队解散，二十七日由天津乘轮来沪，本月初三日投两湖招待所效用，被经理人疑为汉奸。惟行李内并无违禁之物云云。李供前虽与王同学，此次并非同来，甫于前日在二区会见。孙科长得供之下，判各交妥保，分别开释。又萧德云亦因形迹可疑，由光复军在火车站查获，解交司法科，讯无作奸痕迹，判令交保开释。”^[13]以冒充汉籍嫌疑被捕的留日学生邓光济、邓光镜，经蔡治民详细查访，毫无犯证，“复由本府人员及该生等同乡先后证明确系贵州籍，由日本来沪，既非满人，尤非奸细”，虽然军务戒严之际，难免被疑羁留之事，军政府还是勇于担当，除由店铺保结开释外，又以该生等无故受累，明白宣布，以全其个人名誉。^[14]招瑞声案同时拘获的还有其族侄招信庭，经审讯，与案情没有牵连，即从宽交保释放。^[15]

四是经过审理，查无实据，又有其他方面的有力证言或担保，即行释放。1911年12月底，沪都督府执法科长蔡治民发出布告：“阴历十月十八日奉都督发下陆军学生马林一名，据本党报告，该学生忠事满清，此次来申，恐有不利，请即拘案讯办等情。当此北虏未靖之际，难保无汉奸潜来沪上，密事侦探，该学生既被嫌疑，自应拘留，听候讯究。当经本科详细讯问，并由本府谍报科派探侦察情形。据查，马林虽曾为满清信阳兵站长，此次辞差来沪，尚无甘为汉奸实据”。再加上接到“安徽孙都督、南京顾参谋、漳州刘司令、本府沈科长请予保释之函电，业于元月十二日稟奉都督，准予释放”^[16]。马林（即马麟）系南通州军政府押解来沪，南京参谋长顾忠深等人力保其决非汉奸，而且携眷至申，意在投效沪军政府。^[17]被先锋队指为嫌疑的赵珊林，非但不是汉奸，且系民党热心侠士，粤省光复时颇为得力。经孙中山电示，即发给川资，赴宁遣用。^[18]

即使对于确有证据、又由都督直接交办的案件，执法科也要仔细鉴别真伪，根据实情，做出判决。典型案例之一是詹登云案。此案由沪军都督府直接交办，“兹悉詹实系汉奸，因至沪军都督府署侦探军事，为陈都督察破奸伪，拘押饬究。昨由谍报科查得詹党羽极多，来沪已有旬日，寓居法界密采里西旅馆，改名徐敬贤，曾向本埠复新军装号内伪称皖省都督，来沪定购皮件，幸未骗去。所穿身上之军服，亦从诳骗得来。其他羽党，分居英界客利饭馆，且有结欠膳宿旅资情事，密采里洋人已报请追给欠款。闻陈都督以既有奸党，应即拿办，爰特饬探密拿”^[19]。

媒体对于此案颇为关注，有详细报道称：“汉奸詹登云，原籍安徽，此次受清廷载涛等嘱，来沪侦探沪军政府重大事件。詹抵沪后，寓在沪北某西旅馆，头戴二等双龙宝星，身穿二等金线军服，胸悬徽章，冒称皖军都督，每日至沪军政府拜会都督陈英士君，面谈军情。陈君接见之余，大有可疑，迨詹去后，陈君谕饬谍报科科员张惠良等前去密查。嗣据复称：查得詹实系汉奸，冒充都督，调查我军实情等情。陈君正在核办间，昨午詹登云又投府拜会，陈都督立命传见，一再驳诘，詹一味支吾，陈君喝令拿下，查其所悬徽章，为吴淞军政分府赵王两招待员之徽章，诘其如何得来，则称受我之愚，为我骗来。陈君以其尚有羽党，饬发执法科长蔡君严密讯究。”^[20]另有消息称：“兹又在詹衣袋内检出与龚姓合同草稿，订定在外洋购办毛瑟枪三万枝，有俟运到一万枝，先付洋十万元字样。陈都督以事关重大，应饬妥人密往密采里该汉奸寓所检查行李，有无挟带炸弹及作奸证据，以凭核究。”^[21]

这样一起看似板上钉钉的铁案，经过执法科的认真查证审理，却出现重大转折。半个月后以“沪军都督府执法科长蔡”的名义公布的结案判决书称：

案奉都督谕：有广东人詹登云，私穿军服，佩带本府徽章，在外招摇，并敢冒称安徽都督，恐防汉奸，亟应严拿惩办等因，即奉饬本府谍报科拿获解案。当经本科调集人证物证，详细研讯。据供：南京回申，已近四载，现应吴淞敢死队王队长邀往，并公举第二队队长，故敢身穿军服。又以家中房屋太狭，暂住密采里。至佩带徽章一节，实因门口稽查甚严，暂向招待员曹初发借用，出于一时之愚，不敢冒称安徽都督，如有觊觎非分实迹，请即枪毙等语。又据国民模范团张

世周面诉，该犯曾取去军装皮件样本及九龙带等物。又据华庆公司面称，被该犯取去二等三级军装一套，又金表一只等语。

查此案既经本府详细探访，确系招摇撞骗，并无冒居安徽都督实据，即或口头自称，亦不过为欺诈手段之一种。且查该犯一贫如洗，旅金服费尚未交付，安得有此余财，为非常举动，是亦足为非汉奸之一证。惟佩带本府徽章，已传讯招待员曹某，确被借用。当禁令森严之际，胆敢借用徽章，藉此招摇，张世周及华庆公司等均遭欺骗，实属胆大妄为。除已将借出徽章之曹初发奉都督示谕撤职以示薄惩外，应将该犯詹登云按律处置。依照新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凡诈称吏员之资格或僭用官吏之服饰徽章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留或三百元以下罚金。现查该犯既擅带本府徽章，自应照律开，拟由本科呈请都督核准，着将该犯詹登云收禁一年，以为招摇撞骗贻害地方者戒。起获新式手枪一支，没收存库，赃物给主认领。令即判决，特此宣告。

[22]

由此可见，原来看似确凿无疑的案情以及人证物证，其实全都别有隐情。

谍报科与执法科，是防奸锄奸最为重要的两个关键部门，行事的反差如此之大，固然与应桂馨、蔡治民的人格品质有所关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各自所司职责有别所致。执法科并不因为案犯系都督亲自交办，并且已经指定罪名，就草率定案判处，而是调集人证物证，详细研讯，并依据证据事实，推翻汉奸的罪名，再依照新刑法的相关条款，重新定罪量刑。詹登云案从应该就地正法改为收禁一年，不仅反映了执法科的严谨，也显示沪军都督府的锄奸行动整体上并没有出现任意指控、滥杀无辜的扩大以致失控的情形。

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尤其是敌我斗争白热化之时，在生死存亡的高压之下，锄奸过度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通例常态。其他光复各省也的确存在过当的现象。如江西“前有汉奸在某处水井投放毒药，经巡警拿获，解送军政府听候核办。兹闻该犯名程有才，湖南人，就获后狡不招认。经执法科重责军棍四十，始招出由湖北来，受满人贿托等语。当经彭都督下令处决，遂由执法科长提出该犯，在军政府门首正法”[23]。刑讯逼供是前清惯例，也不能说毫无效果，可是重刑之下的供词，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

总体而言，各地军政府为了树立文明形象，防止被污名化，即使在锄奸方面，也是慎之又慎，唯恐造成负面影响。陈其美在各地都督

当中，对敌算是铁腕式的人物，为此后来入选首届统一的民国政府内阁，颇受各方质疑，以至于始终不便北上就任。即使如此，在强势锄奸的同时，他还是非常注意依法办事，而不以军政长官的意志为转移。当然，所依之法，是反清革命之法，而非清朝的旧惯，对于清朝的正统性，民军根本不予承认。有的先行研究者未能比勘各方面的记载和实情，片面突显锄奸泛化的情形，显然有失偏颇。

[1] 《杨亚夫是否汉奸》，《申报》1911年12月11日，第2张第3版，“本埠新闻”。

[2] 《汉奸自投罗网》，《民立报》1911年12月19日，第5页，“新闻三”。

[3] 《又获汉奸嫌疑犯》，《神州日报》1912年1月24日，第3页，“本埠新闻”。

[4] 《闸北种种》，《申报》1911年12月12日，第2张第3版，“本埠新闻”。

[5] 《都督府审讯汉奸》，《申报》1911年11月16日，第2张第3版，“本埠新闻”。

[6] 《城内·是否汉奸》，《申报》1911年11月16日，第2张第5版，“琐闻”。

[7] 《嫌疑犯之口供》，《申报》1912年1月8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

[8] 《汉奸杨文彬被执》，《申报》1911年12月27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

[9] 《汉奸何多》，《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第5页，“新闻三”。另据《申报》报道，济军在沪宁车站拘获顾鳌，“指为汉奸，解至沪军政府看管候讯。旋有某绅等四人投函具保，未知陈都督能俯如所请否”。《究竟是否汉奸》，《申报》1911年12月25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

[10] 《辛亥中国革命史·汉奸顾鳌之丑历史》，《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7日，第2页，“特别纪事”。

[11] 《议和随员被擒》《爱国报》1912年1月3日第1815号，第2页，“国事要闻”。

[12] 《沪军都督去电》，《申报》1912年1月20日，第3版，“公电”。

[13] 《闸北种种》，《申报》1911年11月27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

[14] 《宣示并非奸细》，《时事新报》1911年12月8日，第2张第3版，“本地时事”。

[15] 《中华民国新江苏》，《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4日，第3页。“特别纪事”。

[16] 《城内·并非汉奸》，《申报》1912年1月15日，第7版，“琐闻”；《并无汉奸实据》，《时报》1912年1月15日，第5版，“本埠新闻·纪事”。

[17] 《非汉奸请求开释》，《民立报》1911年12月30日，第5页，“新闻三”。

[18] 《到底不是汉奸》，《民立报》1912年1月29日，第6页，“新闻三”。

[19] 《密查汉奸詹登云之证据》，《申报》1911年12月9日，第2张第3版，“本埠新闻”。

[20] 《苏省光复近事汇述》，《神州日报》1911年12月8日，第3页，“特别纪事”。

[21] 《密查汉奸詹登云之证据》，《申报》1911年12月9日，第2张第3版，“本埠新闻”。

[22] 《詹登云收禁一年》，《申报》1911年12月23日，第2张第3版，“本埠新闻”。

[23] 《赣省光复近事片片》，《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0日，第3页，“特别纪事”；《投毒汉奸正法》，《申报》1911年12月7日，第1张后幅第4版，“各埠通信·江西”。

第三节 汉奸指称的泛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等人即以各种形式发出指令，消除党见，防止仇杀，包括保皇党在内，只要不继续反对民国，都不应追究其罪责，也就是说，“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有无违犯，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至于挟私复怨，藉是为名擅行仇杀者，本法之所不恕”^[1]。不过，内务部颁布的《保护人民财产令》规定：“现为清政府官吏，而又为清政府出力反对民国政府，虐杀民国人民，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内者，应一律查抄，归民国政府享有。”^[2]虽然已将不再继续与民国为敌者排除，执行起来却很容易与惩办汉奸相配合。

在武汉，警察第十一署署长彭华章奉警务筹办处札饬调查公产官产满产，指派警长朱宝华前往调查，“已查有紫金山系江夏公益保存会管业；又有前抚标牧马场内有菜园四块，水田十九畝，藕田一块，藕塘一口；又马蝗头有汉奸冯启钧地皮一段，计菜园三十九块；又长春观对面地方有地皮一段，计菜园十八块；又天符庙对面有汉奸冯启钧地皮一段，菜园三十八块；又杏花村有梁节菴私建小学堂一所，均经彭君呈请筹办处收作公产矣。又宾阳门外第三十二号房屋前曾顺姓旗人居住，经警察十一署署长彭君华章查知，已饬房主倪德福缴旗人床架一乘，棹子一张，茶机一个，其余物件散失，责令房主查获再报”^[3]。仕清的汉官被当作汉奸，与旗人的财产同样被清查处理。

在安徽，前清知县王清涛由山东至皖，“住居大南门某姓宅内，行踪诡秘，经调查员侦悉，报告都督府。随经孙都督派员拿获，搜出侦探实据，即将王清涛发交军务部讯取确供，立即枪毙，以昭炯戒”。清安徽巡抚朱家宝率兵驻亳，由倪嗣冲迎驻颍州，并有传闻说要进犯安庆，当经庐州分府电请速拨大军抵御，以免梗塞北伐孔道。^[4]云南留皖将校徐祚、高本智等，要求各报馆刊登致云南都督蔡锷等滇省重要军政官员的通电，指“朱家宝甘为汉奸，领兵犯亳，请速筹对付其家族办法，以谢同胞。同人等当挥戈赴亳，手刃其腹，以洗滇羞”。^[5]

惩办汉奸之风还波及海外侨界。美洲加拿大域多利致公总堂和同盟会特命谢君秋、梁翼汉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并于1912年1

月29日致函孙中山：“外洋汉奸极多，反对革命之筹饷，各人名一概交二君带回中国，交军政府办他们汉奸可也。……域埠之汉奸与云埠之汉奸常被翼汉君驳斥，梁君有舌辨，惟少言，独斥汉奸。”^[6]

凡事一旦流行就很难免俗，“汉奸”在光复地区很快便成了流行语。有人调侃道：“现在我们居然是个共和国民了，各种东西，都要改良改良，……还要到处演说。演说的方法，一要会骂人，如忘八蛋、汉奸、奴隶等不离口；二要多用同胞字眼；三要引证袁世凯、冯国璋等人；四要自称曰兄弟，称人曰诸位；终则以现在时间太短兄弟不能多说为结束。”^[7]“汉奸”俨然成为新派人物的口头禅。

如果“汉奸”仅仅骂人而已，充其量只能泄愤。可是这一指称在当时却是能够坐人死罪的名义，这就非同小可。江西“光复以来，城各处，辄有一般痞棍，胆敢捏造黑白，指平民为汉奸，不分昼夜，乘机索人财产，或遇有孤弱，辄敢诬良为娼，闯入人家，希图强占抢劫。似此不法行为，殊堪痛恨”。维护治安的锄奸，畸变成扰民祸害的口实，“现经军政府访闻及此，通飭军警，认真巡逻，从严拿办云”^[8]。

光复后，广西桂林军政府都督陆荣廷“因满酋未灭，本都督专注北讨，对于绿林，一视同仁，不忍以不教而诛，欲率之从事北伐。乃征集所开办逾月，竟不投诚，猖獗如故，各属强迫官吏交印夺税缴枪纳款之案，时有所闻，近更冒称民军，攻陷贺县，逐官戕绅，专行掳掠”。于是派人督队击散，不至蔓延。进而通令各地分府：“该匪等于地方反正之后，尚有此等举动，显系汉奸从中煽惑，意图破坏共和，言之殊堪痛恨。本都督悯其愚顽，再三宽办，可谓仁至义尽，此后实属宽无可宽。自今日始，该匪党如仍在外造谣生事，扰乱治安，仰各该文武，着即分别严拿痛剿，毋使幸逃”^[9]。绿林土匪，习性难改，本来就是靠着打家劫舍为生，而不管政府是谁，硬要指为汉奸煽惑，应是前清的思维惯性使然。

广西共和党支部对于该省光复后形势的看法，与陆荣廷的差异不小。2月，该支部的刘崛等致电孙中山：“敝省虽称独立，而一切用人行政，纯与本党共和宗旨反对。现已电陆都督暨议院，提议本党要求各件：一、不准沿用亡清巡防队名目及编制；二、现存五百余万公款，应开列预算表册开销，不准分文滥用；三、军政府用人，应由公民选举，以备委任；四、不准袒护官犯及汉奸；五、悉数招抚绿林，

分别安置；六、除劫掠外，不得诬民军为匪；七、征集北伐军，照原案办理，赶速出发。请其明确速复，否则本党用相当手段，以促进行。事关政治革命行动，合先电告，以免误会。”^[10]这封类似最后通牒的电文，表明在政治革命的意义上，该党对于陆荣廷治下广西的状况已经忍无可忍。包括不得袒护汉奸、诬民军为匪、用人公选、取消清军名目编制等，都是依据实情而发，与陆荣廷的施政针锋相对。

不仅军政权以汉奸为罪人的口实，社会组织也动辄将与己意不合的人事指为汉奸。如上海“有以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名义刊发传单及电致大总统，为伍秩庸、温钦甫两君争外交部正副长位置，广帮多不知情，迨接到传单，各始讶然。越日阅报章，复发见往返各电，益复大哗。昨有广帮多人到公所查诘此传单及电报系何人擅发，而所董某某等亦以未有所闻，恐系匪人冒名捏发……且近日汉奸遍布，保皇党又蠢蠢思动，或者串同一二败类冒名刊发，亦未可知。粤人士深明大义，必不肯代人受过，定能查究其人，严加惩儆也”^[11]。其实，就算有人冒名，为伍廷芳、温宗尧争职位，也很难与汉奸扯上关系。甚至陈其美的兄弟陈其采，因在清军谘府任交通科长，奉命南下，也被指为汉奸，要求陈其美大义灭亲，将其拿办。^[12]

风声鹤唳之下，难免因为草木皆兵弄出些冤假错案。肄业于北京法政学堂的浙人姚新僦，宗旨学术均极纯正，因学堂散学，南下旋里，“乃或以为来自北京，目为汉奸，指摘交加，浸成市虎”。好在“同人等知之有素，用特代为辨正，录诸报端，凡我同胞，幸勿误会”。并且借机批评道：“似此凭空诬谄，将使人人自危。丁斯共和时代，有此现象，殊非中国前途之幸。”^[13]

姚新僦幸而只是误会而已，不过名誉受些影响，原来在清陆军部当差的闽人林立、叶兴清就没有那么幸运。民元1月，他俩“因清政府将次推翻，特于日前乘新康汽船回闽，都督府疑为汉奸，特派水巡警在马江捕拿。然林为巷下庙防营队官郭又伯之旧同学，故郭是日亦赴马江迎接，水巡警以为串通汉奸，一同擒拿，直送司法部监禁三日。郭君以军界人员，即有大罪，应经司令部审问，司法部原无拘禁军人之律，当即作书，请司法部转交司令部。诂司法部不为通，幸郭君设法运动，始得出狱。城台军界以际此共和时代，司法部不以法律逮捕，无异专制野蛮，且司法部长梁干卿、郑烈等，皆东洋留学生，谅知法律，乃不问是非，侮辱军界，拘禁军官，既乏饮食，又无卧具，大动公愤。经郭君多方劝谏，始免暴动。现林君以有陈英士部督荐

书，已经释出，叶君以无证据，现尚在押未释。日昨又拘陈某一人，亦无确据，不过前年四月间友人书信中，有调官军剿马贼一语，司法部竟视为汉奸之证据云”。为了抗议军政府司法部越权违法，侮辱军官，郭兆桢（又伯）具稟控诉，要求予以追究，明定界限，以儆官邪。^[14]

光复后各地剪除辫子，固然可以作为与满清断绝关系的象征，可是将不肯剪辫者一概视为汉奸，也会滋生流弊。有人以反讽的口吻发布寻辫启示：“启者：本庄伙友曲辫子，乃浙江绍兴府土头乡人也。在本庄司账多年，平日除略涉镶边和酒之外，别无妄为之处。只以性成执拗，又不明世界大势，与人言语，执定己意，正合俗谚所谓咬碎石罅者也。日前出门访友，忽路遇民军多人，指为汉奸，拳足交下，破其面目。回来又遭庄中诸同事揶揄，愤恨交迸，即偕并州先生出门而去，数日不回，似已为一去之黄鹤矣。”^[15]“伙友”固然愚钝，民军任意指为汉奸，且伤其身体，亦属过当。

在镇江，果然因商团劝告巡警剪辫，反被报复，酿成风潮。据报道：“商团每晚巡逻，见巡士有不守警章及未剪发辫者，辄反复劝告，巡士等久已厌闻。适有用强迫手段沿途为人剪发者，行人误传为商团中人，该巡士得所借口，遂于团员张某行经山巷时，突有三区巡士十余人，诬张为汉奸，先将身畔银洋十四元四角、银表一只，悉行攫去，复以警棍迎头痛击。张为自卫计，急夺军棍还击之，究以寡不敌众，逃至礼拜寺巷内。该巡士等且追且击，巡长复拔指挥刀猛砍数下，张某头面等处均受重伤。幸商团中人闻声往救，该巡士始相率遁去。商团咸抱不平，急扶张至民政部报告，延西医先行敷治。现在商团公议，暂停上操出巡，免再遭害。该团会长刘君亦赴军政分府，面稟请究。”^[16]强迫剪辫者反被诬指为汉奸，显示这一指称大有无坚不摧，畸变为内部争斗利器之势。

流俗难免泛滥，杨荫杭的《汉奸释义》，主旨不在使“汉奸”的指称有序，而是指陈随心所欲的乱象。所以他说：“曾仕满人者，尚不得概称曰汉奸，其人为未仕满人而政治上稍持异论者，更无论矣。稍持异论者尚不得概称曰汉奸，其表同情者更无论矣。然今日风气，则遇持平之论而争之不胜者，辄目为汉奸。其意若曰，吾目为汉奸，则其人不感言矣。素抱革命宗旨者，其人未必无一不是，然有非之者，则亦目为汉奸。其意若曰，吾目为汉奸，则其人不感言矣。吾谓汉奸之罪，固不容诛，然以汉奸二字为攻守之具者，则必言不中理，

或有遗行者也。且易斥人为汉奸者，往往即向之摇尾于清廷者，此亦不可思议者也。”^[17]以汉奸为攻守之具，也就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其矛头不仅指向政治异见者，也包括同情者乃至一切不一概以己见为然之人。至于原来摇尾于清廷者往往好斥人为汉奸，则是为自保而不惜害人，与后来好用过激以蔽短者何其相似。实则一旦局势丕变，此类人也最容易变节。

泛滥导致乱象，引发争议，也颇受后人诟病，最为典型的案例，即陈其美杀陶骏保事。此案发生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据陈其美一方公布的说词，为“沪军都督府查知镇军参谋陶骏保于各省联军攻克南京之时，竟将在沪领去之枪弹措勒不发，致前敌之军大受影响。及至金陵光复，又捏冒攻宁之功，几酿变故。前日复潜至沪上，布散谣言，图谋不轨。经都督府暗探调查属实，即由陈都督与黄大元帅及程都督商议对付，咸谓陶之罪状，早为军界所知，不得不除此害马，为冒功酿变贻误前敌者戒。爰于二十三日午后五时设法请陶至沪军都督府面见陈都督后，都督命卫队将陶拘留。陶则大肆咆哮，硬欲重见都督，俾发一言。旋奉都督命令，饬将陶即在二门口枪毙，当即宣布陶之罪状两条如下：（一）冒攻宁功，几酿军变。（二）在镇江扣留子弹，贻误前敌”。

1911年12月14日，沪军都督府出示晓谕：

兹查镇军参谋陶骏保，前于联军会攻江宁时，所有沪江解赴前敌军用弹械，胆敢妄肆意见，私自截留，致张贼未能即除，民军颇受影响，东南大局，几被贻误。幸各军不分畛域，奋勇力攻，始得于本月十二日将全城光复。迨后正应合群策群力，以图北伐，直抵黄龙，乃陶骏保一味营私，拥兵自卫，不放联军入城，占据各要隘，通电各处，捏报军功，几酿大变，致临时政府未能即日成立，而义旗北伐因之迟延。种种行为，令人发指。前日复敢潜来沪上，广布谣言，煽惑人心。所有劣迹，经本都督彻底查明，爰与大元帅黄、江苏都督程诸公再四筹商，均以此等汉奸，万难宽纵，当于本月二十三日酉刻将陶骏保在军前明正典刑，以昭军纪。^[18]

一夜之间由共和功臣变成满奴汉奸，对于陶本人及其家族，无异于从云端跌落深渊，陶骏保之兄陶逊后来就此向陈其美提出九问，其中第八问便是汉奸罪名是否坐实。“又曰此等汉奸，决难宽纵。汉奸之名词，固可漫加乎？既曰汉奸，则必有通满之迹，所谓通满之迹者何在？若据所宣布莫须有之罪状及张皇其词之告示，即可谓为汉奸之

实据，则所谓汉奸者果为事实上之汉奸欤？抑仅意想上之汉奸欤？如意想上之汉奸即可以定汉奸之罪，则何人不可指为汉奸耶？即如令弟霭士，亦曾受汉奸之嫌，黎副总统特发电通问。设黎副总统当日不为审慎，即凭其意想骤指霭士君为汉奸而屠戮之，我公将以为何如耶？生命之问题重，名誉之问题尤重。”^[19]

陶逊呼冤，就清洗汉奸罪名而论，主要是强调陶骏保没有通满之迹。可是从武汉战地的情况看，通满并非以汉奸论罪的必需条件。只要在军事行动中影响民军的部署计划及其实施甚至实施不力，都可能被视为汉奸。如果陶骏保的行为的确干扰了江浙联军的作战计划和行动，被称为汉奸严格说来未必恰当，却也不能说是莫须有地深文周纳。与张景良等案相比，陶骏保案或有程度不同，却无本质差异。两案的直接主持或参与定罪的黄兴，并未接受遗族的喊冤而予以平反。^[20]可见至少在他看来，将张、陶二人以汉奸论处，合情合理。

不仅如此，有人“心直口快”道：“汉奸为吾人之所痛恨，人人欲得而诛之，故其欲不利于民军也难。假志士得一般人之推重，且有种种大权在手，故其贻害于民军也巨。试到各筹饷会一询其近日收数何如，自知予言之不谬。盖助饷者欲以节衣缩食之钱购买他日之自由，不欲供济一人之挥霍也。沪上不乏义勇之士，何不设法除此败群之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21]假志士为害犹甚于汉奸，则至少应与汉奸同罪。

[1] 《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1912年1月29日，第9页，“电报”。

[2] 《内务部通飭保护人民财产令》，《临时政府公报》第6号，1912年2月3日，第6页，“令示”。

[3] 《湖北通信·清查公产》，《申报》1912年1月20日，第7版，“各省通信”。

[4] 《汉奸来皖送死耳》，《申报》1912年1月23日，第6版，“要闻”。

[5] 《安庆徐祚等电》，《申报》1912年1月22日，第2版，“公电”。

[6] 翠亨孙中山故居收存提供，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438页。

[7]田：《时髦派》，《申报》1912年1月6日，第2张后幅第2版，“瞎费心思”。

[8]《赣省政要汇闻》，《申报》1912年1月17日，第5版，“要闻”。

[9]《广西匪乱近状》，《申报》1912年1月29日，第6版，“要闻”。

[10]《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1912年2月11日，“附录·电报”。

[11]《查究冒名发电》，《申报》1912年1月7日，第2版第2张，“本埠新闻”。

[12]《武汉最近大事记·汉奸终无结局》，《时报》1912年1月7日，第3版，“地方要闻”。

[13]《为姚新偶辩护》，《申报》1912年1月30日，第8版，“来函”。

[14]《闽垣妄拘军官之公愤》，《申报》1912年2月5日，第6版，“要闻”。

[15]爱：《招寻曲辫子广告》，《申报》1912年1月10日，第3张第2版，“游戏文章”。

[16]《镇江剪辫风潮续志》，《申报》1912年1月8日，第1张后幅第2、3版，“要闻”。

[17]老圃：《汉奸释义》，《中国革命记》第16册，“言论一斑”，第4页。

[18]《陶骏保枪毙矣》，《申报》1911年12月15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时报》1911年12月15日第5版“本埠新闻·纪事”所载《陶骏保正法》，文字稍异。

[19]《陶逊致沪军陈都督书》，《申报》1912年3月8日，第7版，“来件”。

[20]莫永明：《陶骏保案与江浙联军内部的矛盾》，《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第124—127页。

[21]东阜：《假志士之罪浮于汉奸》，《申报》1912年1月15日，第8版，“心直口快”。

第四节 “城头变幻大王旗”

研究者对于其时汉奸指称乱象横生的情形基本予以认定，而对于乱指的言行则予以否定。其实，认定之前，解读纷繁复杂的史事及其因缘更为重要。所谓形势比人强，汉奸指称表面的乱象，根源在于形势及其变化的复杂。只有深入认识后者，才能梳理出前者的理路，而不会被表面的纷乱弄得头晕目眩，只能借助外来后出的架构重新条理，陷入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越远的尴尬。

由于立宪派很快附和革命，而声望地位相形见绌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借重士绅的影响力，以便恢复秩序管控社会，原来汉奸的重要成员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同道。即使清朝的汉人官员，不久也纷纷成了反正的功臣，或谈判的对手，进而咸与维新，携手共和。两相作用，在汉奸指称日渐泛滥的同时，汉奸的所指实际上却有逐渐缩小的趋势。随着光复地区的不断扩大，眼看清廷大势已去或是被形势裹挟而加入民国的清朝文武官员不断增多，一些曾经镇压革命沾染鲜血的汉奸摇身变为同僚。

与此相对，南北和谈期间，一些光复省份出现反复，如“山西自军政府失败后，阎锡山都督率兵南下，驻扎平阳府，所有各部办事人员，大半随从军队。惟梁善济等数人本系汉奸，一面搜括各处财款，暗入私囊（梁初为军政府财政长，故乘时搜括），一面与清臬司李盛铎（军政府成立时李亦为办事员，与梁合谋内应官军，此时已升藩司）会衔出示安民”^[1]。还有不少汉人官员继续效忠清廷，如多次被指为汉奸之尤的冯国璋，据说还组织了敢死队，“闻此项敢死队系由汉奸冯国璋所统，刻已先拨两营，预备妥协，一二日内即当开赴湖北前敌，以期与我民军决一死战。并闻此二营敢死队之内容，虽名为禁卫军，实则汉军某标亦有混杂在内，皆由冯国璋招致而来。该汉奸尚有人心耶”^[2]。

和议告成，南北统一，昔日的汉奸成了共和的功臣。折冲樽俎的谈判代表和高瞻远瞩的民党领袖可以捐弃前嫌，咸与维新，正在惩奸除恶的民军革党刚刚经历浴血奋战，忽然要在生死恶斗的当口化敌为友，一时间难以接受也在情理之中。况且，反正的官绅更具社会声

望，往往凭借各种关系取代地位影响较低的革命党人，使后者深感受到排挤和不公待遇，从而心生怨愤。加之旧官绅的政治理念和做派本来与革命党有异，执政施政自然有别，共事之际，难免冲突。国民党后来发动二次革命，与之相比只是时间早晚不同而已。

临时反正或咸与维新，能否让现行的汉奸即时脱罪，不仅免于追究，而且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民国的官员，的确令人相当纠结。由于汉奸本来就不是法定罪名，而是政治标签，使得汉奸如何才能洗白成为棘手难题。如果不能一概免责，和议显然不能成功。如果统统不予追究，付出牺牲的民党情何以堪。上层领袖可以一笑泯恩仇，贴身肉搏的基层成员则没有那么容易就怡然释怀。“汉奸”指称成为他们舒愤懑的说词和求公道的凭借。

在浙江湖州，光复后出任水陆全军统领的刘复，被原清军张勋部下的周树森串通当地士绅，趁机夺职，遂通告各省都督、军政府司令处、各军统制，详明原委：

自闻杭州光复，即日誓告水陆各营将士，力陈大义，激励有众，先以保全地方之生命财产为唯一要务。满拟筹防稳固，一面陈明军府，选兵出发，从海内志士之后，以援武汉而捣幽燕，尽我国民爱国之诚，用我将士忠勇之气，光我黄帝神明之胄，遂我人民思汉之心。复虽不才，甘愿牺牲一身，与众誓同生死，凡我有众，悉表同情。爰会绅商学警各界公同商决，立悬中华民国旗帜，全府光复。于时军政、民政、财政各部长均请地方公举，分任义务，复独任防务，效命戎行，区区寸心，毫无权利争竞思想。此光复之事实，昭昭在人耳目者也。乃有周树森者，原隶民贼张勋部下，曾在九江抗拒民军，私逃来湖，确系汉奸。彼以旧充湖统，串通某绅，欲夺兵权，以为窃据之地。某绅不明大义，竟以个人之见请于浙省军政府，以周树森代统。我军各将士闻之大哗，金谓彼既汉奸，实为民军公敌，反侧之心，昭然共见，不愿隶其部下。诟该汉奸恃有暗地护符，竟肆野蛮手段，强劫炮机，并抢衙署，居心叵测，意在破坏光复，专与民军为难。于是水陆将士全体鼓噪，将出于战。复恐地方糜烂，并以民军名誉及大局攸关，赶至军前，以身力阻。各将士椎胸泣血，誓死相随，宣言改隶他人，死不奉命。而湖郡绅商各界又迭开全体大会，公议留复，坚不放行。窃思若不交卸，则类弩马恋栈；决然舍去，又为军民维系，不得自由，进退两难，势同骑虎。而或者不察，乃乘机以复为拥兵自卫，更诬各军队以肆行抢劫之名。呜呼，私人之见，乃不讲公理，不

顾公益，至于此极乎！复不得已，派代表分赴杭沪都督府陈诉，蒙沪军陈都督曲鉴下情，电商杭州，并电告于复，命复分兵北伐，以慰军心。复当率此爱国血性男儿，遂其忠义勇敢之志，以副沪军都督顾全大局之至意，虽使复捐糜烂躯肉，无遗憾矣。特恐忌者之意，又横加复以拥兵自卫之名，因为是通告之书，以表曝于天下。风云紧急，遑为区区得失之争，天地无私，可誓落落丈夫之志。言不尽意，惟当代伟人诸公谅之。^[3]

刘复被人排挤，当为不争的事实，至于周树森是否汉奸，则各方标准显然不同。浙江军政府用人方面引起诸多争议，要因之一，即所用从前与清朝有关的人员是否汉奸。光复有功的刘复，自然不认可周树森用计弄权，更加不认可浙江军政府的所用非人。刘复一事，不过开端，此后浙江军政府本身也颇受质疑有无汉奸之嫌。而刘复跨界向沪军都督求援，并得到支持，表明他更加相信发起光复的革命党，而怀疑浙江都督怀有贰心。

刘复一事牵扯出江浙地区各光复政权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尤其在用人方面，分歧很大。浙江省尤好用清朝官员，使得自认为受到排挤的革命党或光复之士转向革命色彩浓厚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求助。而后者也每每仗义执言，代为出头。2月4日，陈其美致电孙中山和司法部部长伍廷芳等，为“南社社员、同盟会友，奔走于革命事业多年”的山阳志士周实、阮武二君鸣冤。据称：“此次武昌建义，南朔响应，独金陵负隅，周君弃学还淮，为学界公推，与阮志士组织巡逻部，分任正副长，力保危城，勋劳卓著。嗣值苏、常、扬、镇相继反正，周、阮二君遂于九月二十四日，以淮城宣布光复，万众欢呼，独伪清山阳令姚荣泽匿不到会，阮志士因其有骑墙之意，正言诘责。姚衔恨刺骨，不得已，勉司法长。突于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遣快役持片声请议事，拥至府学魁星楼下，不质一词，将周志士七枪毙命，阮志士剖腹剖心，其惨酷实出于万国人道外。周父鸿燾，年已七十，威迫具结，监禁十年。迨私仇既复，即将司法长告退，是姚贼之任司法长为复仇地步，仇复即退，非真心反正，已可显见。”

案情已经颇为离奇，办案过程更加令人匪夷所思。“嗣有镇军支队到淮，向姚问及周、阮死状，姚惧，朦禀蒋都督，设法补批，并弃淮逃匿通州，周父始得于十月八日出狱。先阮志士两兄保麒、玉麒，弟锦麒，虑遭毒手，避地镇江，姚布散流言，谓周父、阮兄均经告密，希图脱卸。其美迭据南社全体公函及周父来禀，求为昭雪，因行文通州，密拿姚贼，解申讯办，通州分府拘姚后，匿不解申。正在为

难之际，复据镇军顾问官周祥骏、阜宁学界曹凤镛等公函，淮安学团顾振黄等五十余人、乔树森等十余人公禀，及阮兄保麒、玉麒、弟锦麒来禀，泣求解提姚贼到案对质，因复派员到通守提。旋据该员持回通州总司令张謇复咨，内开大总统批姚伪令呈禀，内有候令行江苏都督将周、阮全案彻查，秉公核办之语，以为总统既批令苏都督，愈不肯解送来申。但此案姚已出其伪官贪囊，四出运动，层层推究，则蒋都督系据淮绅之节略，程都督复据蒋都督之电文，而淮绅节略之内容，又纯据姚贼之狡口，而姚贼之所以得逞其狡口者，又恃乎不署姓名之山阳公团，及不负责任之皖南同乡，为之袒护，而所以得其袒护者，皆伪官金钱之力也。”

在陈其美看来，此案并非简单的刑事案，而是凸显在光复政权之下革命党的政治价值遭到严重挑战。“姚贼于一日而杀两志士，复欲以只手掩尽天下人，使志士埋冤，纪纲堕地，虽满清旧例，本不赞助民军，而民国方兴，岂容悬此冤狱。姚贼所谓扰乱秩序，所谓潜图起事，所谓道路传闻，所谓招引江北溃兵，所谓意图抢劫，所谓图吃丧口酒，所谓谋毁衙局，所谓谋杀绅董，所谓连日密议，谋口煤油于大成殿及奎星阁高处，举火为号，又所谓虽无实证可凭，已万口沸腾等语，种种欲加死者以不洁之名，而仍是无根可查之语。姚贼之险恶既如此，而狡猾更有甚者，即如拘留家属，先封财产，其美致通州电中，本无此语。正月一号，张謇来文，谓姚荣泽冒死不韪，被众指摘，敝处昨奉苏督电，示伊在山阳任内尚有经征未完之款项，当将寓内起出衣箱物件查明，封存司法厅，呈候苏督核示遵办。其家眷先交典狱科周以恭看口。嗣讯明该眷无辜，已交保释。然则拘留家属，根于张謇而已，释放、发封财产，根于苏都督之电示，而均与其美无关。今读大总统批姚伪令禀，又似姚氏家属未放，庄督又以发封财产责其美之不仁。苏、通两处前后案卷歧误如此，倘非姚贼出其奸谋运动，发封其财产，拘留其家属，故意使民国蹈此缺点，而藉以报告大总统，并将苏督之电装载于其美，俾沪、苏、通三处参互错乱，争辩不暇，而彼乃得挟大总统之批，逍遥于法外，其计之狡，实匪夷所思。”

此案牵涉苏、浙、通、沪四地的光复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也被卷入其中，各方的依据、判断大相径庭，究竟如何还原真相，已经不仅是刑事案件那样简单，而是成为不同势力之间的政治较量。陈其美显然相信南社和同盟会方面的证言，并据以拿人，浙督蒋尊簋、苏督程德全、通州司令张謇、代理继任苏督的庄蕴宽则采信姚

荣泽以及据说由其操纵的淮绅之言辞。孙中山不知就里，难以决断，判交苏督审理，沪督又认为如此一来则此案无法水落石出。如果革命党人无辜牺牲，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死于汉奸的报复而沉冤不能昭雪，铁证如山的汉奸行为反而取得合法性，则革命的意义究竟何在。陈其美于电文末尾沉痛地大声疾呼道：“其美如诬姚贼，愿甘伏法，惟至今通分府并未解申，未知何故。大总统及法部，保护人道，尊重人权，当知吾辈之所以革命者，无非平其不平。今民国方新，岂容此民贼汉奸，戴反正之假面具，以报其私仇，杀我同志，其美不能不为人昭雪，虽粉身碎骨，有所不辞。愿大总统及总次长有以教之。”^[4]大有如若不将姚荣泽绳之以法，就要向临时政府兴师问罪之势。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姚荣泽随即被押送到上海受审，而在审判程序和形式上，主张军法从事的陈其美又与坚持司法独立及程序正义的伍廷芳发生冲突。为了对外树立民国政府的文明形象，这一次孙中山转而支持伍廷芳。陈其美在夹缝之中成为江浙一带革命党的护身符，也因此得罪了周边各路名公，成为南北各方聚讼纷纭的争议人物，以至于后来不愿北上就任国务总长之职。

民元2月11日，《申报》《时报》等突然刊登光复会以及绍兴、宁波、严州、处州等地同盟会代表分别发出的通电，向孙中山及同盟会总理汪精卫等举发同盟会员、浙江都督蒋尊簋，光复会列举的罪名是：“前在浙时，诱卖本会员□□，在粤东西摧残志士，黄总长、钮次长谅有所闻。今又钻营任浙都督，引用姚、刘诸汉奸，私植党羽。前数日间，在申拜结亡清诸逃员，日数十起，昭昭在人耳目。既贻贵会羞，复为民国害。不速加诛，贵会养痍贻患，何以答同胞？”

同盟会各分支提出的罪状为：“任用汉奸，反对民党，肆行无忌，宣言解散会党，以军法部勒浙中官吏人民。共和时代，岂容此等专制恶魔肆其威权？人民愤怒。”“勾结前在广西同恶相济、屠戮志士之汉奸姚梧冈，引用蒋、刘、来、应诸奸，朋比作慝，声称目的已达，欲消灭各民党。悍然对众宣言：凡行政各员及起义诸人，应以军法部勒。恣意专横，莫此为甚。同盟会有此败类，实贻全体羞。”

“肆行专制，任用姚、刘、蒋、应诸汉奸，反对民党，声言用军法部勒，解散各会党。人民愤怒，敢声其罪，昭告天下。”“搔残民党，滥用汉奸，欲以军法部勒党人，侵夺参议职权，横行无忌。”至于如何处置，有的一般性要求“乞照会章惩处”，“并乞总会严厉惩

办”，有的则具体提出办法：“乞即取消会员，量予惩处，以去公敌而申公愤”或直接“请斥出本会，以儆奸邪”^[5]。

光复会和同盟会组织不尽一致，同盟会各分支也有人事不同，而所列罪状及其惩处办法大同小异，至少应是事先沟通联系，甚至暗中有人操纵，反映出浙江光复政权内部存在严重的派系分歧以及激烈的争权夺利。值得注意的是，各电虽然指陈蒋尊簋的种种恶行劣迹，却并未指其为汉奸，而是说他任用汉奸，其所用台州军政分府都督姚桐豫（梧冈）、总参议蒋方震等人，虽在前清为官，光复及民元的表现，却不能说是汉奸。蒋尊簋原任广东都督府军务部长，因其时輿情要求“浙人治浙”，被迎回本籍继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他深知该省内部派系复杂，用人施政，尽可能有效而稳妥。只是他离开浙省有年，仓促之间，又要任用可靠之人，引发不满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动辄指为汉奸，却并非持平之论。2月末，黄兴见报载电称蒋方震为汉奸，殊为失实，特通电各报馆，为其辩诬：“现在南北统一，人人尽力民国，断未有甘心向虏者。前有小愆，亦在所不咎。请登报申明，以彰公道，更盼浙省同盟会诸君急为查究有无挟嫌诬陷情节，以保本会名誉。”^[6]不久查明，此事果然是化名捏诬，刊登电文的《申报》为此还公开致歉。^[7]

浙省光复政权在内部争斗中滥用“汉奸”之名相互攻讦，已成通病。2月，浙江旅松军界228人的代表光复会员松军第一团长张兆辰、同盟会员第二团长韩尚文通电孙中山、陆军参谋部长、各报馆、浙江蒋都督，此前以“统制周承蒞营私植党，群议早腾，近采乡评，听闻益竦”，公电请简贤员，谁知“总统、都督不加谴责，浙同盟会忽电松军分府，诬为汉奸，严密查拿。某等本天保城铁血余生，鸿毛泰山，大义了然，第恐同盟会鸿号素隆，以支部中最少数人私见，假全会名义，利用汉奸题目，毒肆狡谋，侵权违法，厥害犹浅，共和肇基，藉党会以竞优存，使吾浙非同盟会者人人自危，殊非诸先觉所以革新华夏之意”^[8]。

周树森等人的汉奸身份，或许并不明显。前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照首义前革命党的标准，确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他曾多次率部镇压革命党的起义，血债累累，尤其是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损失惨重，精英尽失，李准成了党人的眼中钉，必欲杀之而后快。由陈冠慈（敬岳）等人将其炸成重伤，陈也因此被捕遇害。经此一劫，李准颇生惧意，暗中向革命党输诚。辛亥广州光复，因手握兵权的李准倒

戈，兵不血刃。为此，同盟会领导层对李准的功绩极为肯定，可是一般民军不肯善罢甘休，仍向李准寻仇。被迫逃到香港的李准生死两难，只得先后致书都督胡汉民、陈炯明，希望军政府能够留其生路，以尽民国一分子之力，他说：

准为清吏时，三月二十九之役已结怨于军政府，及光复后，民军之至省垣者日众，其一二无知者，日以炸弹相恫吓，复有悬高价以离间我军心者，防营溃散，不可收拾。准身居险地，几不自保，虽欲再尽力于我同胞，实势所不能为矣。思之再三，不得已，惟有舍粤人而来香港。但冀谣言稍静，粤民知我之心，即返粤垣，与粤人共谋建立民国，以与列强争雄于东亚。以准身虽去粤，心实以粤事为念。不图来港后，陈夔龙复有电保之事，清廷遂命准会同梁鼎芬叛粤。准不应命，曾有电致陈伪督，已登诸报章。准能为民国效力，而不能禁他人反对民国也。乃粤人不察，遂以疑准，加以乡人刘绍基复以借贷不遂，故造谣谓准为保皇党，欲借正大之名，以行其私。而谣言日甚，群疑愈深，准几为民国所不复容之人。呜呼，不亦诬乎。至陈敬岳一事，准于受伤时即缄告张鸣岐免其一死，斯事已登之报章，准已不杀之于前，岂于将反正时，复处之于死地，前后不符，事可明矣。且准受伤后，即回虎门调养，又在假期内，早已不与闻政事。乃民贼张鸣岐密谕李世桂，使其杀之而不告准，推其意，故欲使民军仇准，则准虽反正，亦将无容身之所。故于鄂省起义后即杀陈敬岳。准在虎门，实未闻其事，张之独行独断，不令准与闻者，凡事皆然，又岂独陈敬岳一事哉。呜呼，事若不一，粤人疑我日甚，准将何以立于世耶。既为民国之人，复不容于民军，准虽被汉奸之名以死，犹不足惜，恐未反正之清吏闻之，虽欲反正，而恐身不能保，是逼其为汉奸以终身，则共和政治

之成立，不牺牲数百万生民不可得矣。^[9]

以胡汉民为首的同盟会广东领导层，充分肯定李准的反正之功，大势所趋之下，李准也能够与清朝彻底划清界限，坚持以民国一分子自认，可是对于曾经和牺牲烈士生死与共的战友而言，杀了作恶的喽啰，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首恶逍遥法外，甚至成了共和的有功之臣，真是情何以堪。辛亥政坛风云的诡异，使得民党各个层级之间的价值判断陷入严重分歧，汉奸问题上的各执己见，只是表现之一。

^[1] 《山西民军近状》，《申报》1912年1月14日，第1张后幅第2、3版，“要闻”。

[2] 《满奴害人将自害矣》，《申报》1912年1月18日，第3版，“要闻”。

[3] 《湖州光复水陆全军统领刘复来函》，《申报》1911年12月19日，第2张第4版，“来函”。

[4] 《民立报》1912年2月6日，第3页，“沪军政府电报”（据《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补）。此案详情可参见《时事新报》1911年12月4日“纪事”《淮安冤杀军政分府之详情》（清江通信）。

[5] 《中华民国立国记》，《时报》1912年2月11日，第2版；《申报》1912年2月11日，第2版，“公电”。

[6] 《申报》1912年2月27日，第2版，“公电”。

[7] 杨思机：《汉民族指称的形成与论争》，第91页。

[8] 《时报》1912年2月22日，第4版，“公电”。

[9] 《李直绳辨诬书》，《申报》1912年1月6日，第1张后幅第2版，“要闻”。

第九章 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辛亥南北和议期间，对汉奸的口诛笔伐成为稳固新生政权和鼓吹北伐的重要方面。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造成通过北伐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的强大声势，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包括强迫剪辫和追凶在内的惩奸行事引发北方一些报刊的非议，而从和议到统一，政坛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意涵逐渐回到指称卖国的原意。

第一节 锄汉奸的舆论

光复各省严加防范并坚决清除的所谓汉奸，大抵与间谍奸细相等，虽然执行中存在扩大化的现象，总体而言，相当克制，与之前将满人以外所有拥清官绅军人乃至保皇立宪派一概视为汉奸相比，范围已经大为缩小。而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由于语义杂乱，在媒体和坊间，汉奸指称却有泛滥之势。徐血儿在《民立报》鼓吹“锄汉奸”，明确宣称：

有有形之汉奸，有无形之汉奸，有形之汉奸易防，无形之汉奸难测，故有形之汉奸宜锄也，无形之汉奸尤宜锄也。

间谍、侦探、私购军火者，汉奸也，即任事不力，心存两可者，亦汉奸也。助满为虐、希图富贵者，汉奸也，即反对共和，鼓吹和议者，亦汉奸也。汉奸扰扰，何处非是，呜呼，亦神州之不幸也。

人第知有形之汉奸，而不知无形之汉奸，故有形之汉奸为祸浅，无形之汉奸为祸深。

锄！锄！！锄！！！凡依违扰乱，破坏共和者，皆汉奸也，国民之仇，天下之敌，锄而去之，宇宙廓清矣。^[1]

就制造反清革命的舆论而论，徐血儿的主张无疑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可是按照这样的定义，锄奸的范围无疑将大幅度扩张，且难以掌控。针对坊间媒体的汉奸指称略显泛滥，杨荫杭专门撰写了《汉奸释义》一文，希望明确汉奸的界定，清晰化所指能指。他说：

吾国所谓汉奸，显系军事上之罪人，而非政事上之罪人。名之曰汉者，盖对外而言，固非限于满汉而言也。斥之曰奸者，盖必有确实之罪状，固非指政见相反者而言也。果尔，则汉奸之为爱司匹翁固无疑义。而以上所列之界说，实即汉奸之界说也。知汉奸之界说，则知清朝之官吏，无论如何腐败，要不得概称曰汉奸，因清朝官吏，固非尽入民国战线内为秘密之行动、虚伪之陈述也。即偶有侦探信息者，苟为本人自行侦探，或以他种资格而行侦探，亦不得以汉奸目之，以其侦探之目的，不在报告敌国故也。藉曰汉人作满人之官，当一例称之曰汉奸，则今日民政府固不乏陈锦涛辈，我民政府方招徕之不暇，固未常[尝]斥为汉奸也。^[2]

杨荫杭如此说法，除了法律出身的背景使然外，主要反映了光复地区的情形。据此界定，汉奸的覆盖面的确不是扩大，而是显著缩小。而这时北方的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清王朝的控制之下，以袁世凯为首的汉人文武官员继续维护清帝的统治，资政院的钦定议员还在鼓动武力镇压革命，一些省份的谘议局坚持君主立宪，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在继续策划虚君共和，试图在保留清帝名位的前提下实行宪政。因此，民军并未放弃原来惩办汉奸的立场，将所有顽固坚持清王朝实质性执政权乃至名义统治权的非满人政治势力一概斥为汉奸。尽管其中有的已经成为政治谈判的对手或暗中联系争取的对象，只要没有公开放弃拥清立场，这些“政事上之罪人”，就仍然是民党和舆论万炮齐轰的靶标。因此，虽然受到惩治的主要是军事性的奸细和破坏者，其他拥清的汉官并未脱除汉奸的标签。不断加大政治舆论压力，成为民党的重要任务。

还在战事紧张之际，民党一方面防范和诛杀间谍奸细，一方面就对坚持拥清的汉人文武官员大张挞伐。武汉停战期间，有民军于汉口德租界旁的华景街张贴条告，其中大书：“汉奸袁世凯，万代臭名扬，一个匪头目，名叫冯国璋。”^[3]矛头直指首要。芝加哥华侨代表全体旅美学商发出公电，告诫袁世凯“宜为汉族总统，勿任满清利用，以延虏祚。如果甘为满奴，誓为三百九兆人寸磔此汉奸，以谢同胞”^[4]。《神州日报》也刊发社论，警告袁世凯不要继续为满清效力，否则天下万世必指为汉奸民贼，专以手枪炸弹对付。^[5]

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上海报界纷纷倒向民军方面。还在光复前夕，原来持论平和的《申报》就以游戏文章的形式，宣布重要汉人官员的汉奸罪状及其处刑：“盛宣怀身作汉奸，实为祸首，大势已去，挟资逃之东洋，该死。”“袁世凯处此时世，尚甘为汉奸，该死。”^[6]革命党的《民立报》以“声讨汉奸”为题，痛斥“袁世凯今亦变其素志，羡慕族之爵位，而欲与同种为敌矣。果然，则降为一汉奸耳，不足贵也。吾爱国好男儿颈，当于五步内溅之”^[7]。11月底，风传袁世凯被刺身亡，《民立报》欢欣鼓舞，“快哉快哉”，痛论“汉奸之末路”：“汉奸袁世凯之罪状，久已昭著于天下，今者电音递至，谓袁贼已为侠士刺死，伸大义，诛逆贼，诚今日不快意中之大快意也”。并严词宣告：“轰然一声，扫除元凶，此一侠士胜百万师矣。天意助汉，遂使汉奸授首。冯贼冯贼，汝犹逆天乎。”“金陵克而袁贼又诛，公然与同胞为敌之张袁二汉奸，其末路如是如是，汉奸胡不自省。”^[8]

光复后，在民党的要求和大势所趋之下，报界更是一片逐满贼杀汉奸之声。《民立报》大声疾呼“锄汉奸”：“种德不明，汉奸孳生，呜呼汉奸，尔固何心，助仇寇，戮同胞，貽神明华胄不世之羞也。异族专横可恶，汉奸事敌自残尤可恶，汉奸不除而尽之，则天下糜烂矣。锄汉奸！锄汉奸！健儿之身手，国民之天职，洗神州不涤之污，伸祖宗九天之恨。”^[9]《神州日报》也呼吁“诛汉奸”，痛斥张勋、张人骏等造成金陵糜烂至极，而汉口、金陵血战，均为汉族同胞，“呜呼，何汉奸之多也。盖二百六十年来为汉奸者，每邀异族之奖，而从未伸同族之诛，是以人乐为之，而为虎作伥者之不绝于世也”。呼吁民军速斩汉奸头颅。^[10]

原来持论温和的《申报》，在此期间成为鼓吹锄奸舆论的重要阵地，人们以各种形式对汉奸进行口诛笔伐。汉奸的主要特征就是“甘心卖国”，“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尽堪悲”^[11]。而清朝的统治，全靠汉奸支撑，“汉人若不为汉奸，胡庭何以有悬貍”^[12]。有人借评点诗词发挥政治理念，痛斥“武将文官总旧僚，恨他反面事新朝。此黄帝子孙之甘心为汉奸也”，呼唤爱国男儿起而锄奸，“仇深报复知何日，不信黄魂唤不回，此爱国男儿之心理也”^[13]。也就是说，所有继续仕清的文武官僚，都在黄帝子孙甘心为汉奸之列，都会成为爱国男儿复仇的锋芒所向。

有人专门编了“新式汉奸五更调”，历数在世的重要汉奸及其罪状：

一更一点月上山，汉奸袁世凯，呀呀得会，甘作满奴才，君主立宪弗应该，王八蛋，假议和呀，自家弗停战，呀呀得会，请俚吃炸弹。

二更二点月照窗，汉奸冯国璋，呀呀得会，狗肺狼心肠，汉皋百姓才死光，抢典当，掳民财呀，还要抢衣裳，呀呀得会，好像强盗帮。

三更三点月正清，汉奸叫张勋，呀呀得会，像个乌龟精，敢搭民军拼一拼，逃狗命，小猫子呀，喜欢偷野腥，呀呀得会，快点去自尽。

四更四点月正中，汉奸倪嗣冲，呀呀得会，要想立大功，统兵南下路不通，苦无穷，旣军饷呀，北军逃无踪，呀呀得会，必死在营中。

五更五点月已完，汉奸段祺瑞，呀呀得会，急得团团转，民军备战多完全，大开战，汉皋地呀，立刻可夺转，呀呀得会，民国万万岁。^[14]

袁世凯虽然为虎作伥，也难以挽救清朝败亡的命运，只能成为陪葬，所谓“清政府妄想挽回，西天出日头。袁世凯甘作汉奸，难保骷颅头”^[15]。

武汉风传的第一第二汉奸均为张姓，接着又有汉奸张振臣通敌，破坏民军炮火地雷之事发生，《神州日报》观战员感慨道：“此汉奸又姓张，张氏可谓汉奸世家矣。”^[16]有张姓人士鉴于效忠清廷与民军为敌的同姓汉官为数甚多，点名评论道：“张彪、张勋、张怀芝、张人骏、张绍曾、张鸣岐、张汉云、张景良、张福堂、张镇芳、张楚宝而外，有山西伪抚之张锡奎，复有山东伪抚之张广建，袁世凯心理中，一若非张姓莫能抗民国也者。虽然，尔诸张果数典而忘祖耶？有何面目见誓复祖仇之留侯，力排建虏之苍水于地下乎！当此民国初立，共和将成，尔诸张仍行豺狼之心，恐狗彘不食其肉矣。我亦姓张，恨不能缚诸张而击杀之，惟有布告我张姓，共除此不孝子孙，以雪祖宗之奇丑，而免他姓骂我张姓皆汉奸满奴也。”^[17]

不但拥清的汉官，继续鼓吹君主立宪的士绅也被当作汉奸。宜昌民军司令唐牺支通电南京、武昌及各省都督、各司令部部长：“查获汉奸孙鸿猷假慈善会会员名义由京赴蜀，挟有伪清赈捐簿据多张，显系为满奴暗筹军需，并带有匿名国民实利意见书多本，专主君主立宪，破坏民主共和为目的，语言狂谬，实为民国罪人。除由牺支按律拘禁严罚办外，此种书本关系甚大，且羽党甚多，各处散布，应请钧处飭下，严密查禁，以免国民误入迷途。”^[18]

各省光复进程中，资政院民选议员纷纷辞职，少数残余和钦定议员顽固坚持反对共和革命的立场，引起各方公愤。有来稿呼吁“促令资政院议员解散也。夫虏兵不足恃，将不足恃，督抚不足恃，乃恃此卑鄙无耻之资政院，为之竭力嘶声，鼓吹议论。彼议员利于三百金之巨薪，京堂之美名，竟忍心害理，为虏廷辩护，以勾结煽惑等字，加之革军，视义师若匪类。噫！彼议员之肉，其足供吾父老之食乎”，并且宣告：“我各省谘议局宜亟电讨各省民选议员，勒令解散，否则认为汉奸，义师至必杀无赦。”^[19]

11月30日，报载与黎元洪有旧的梁鼎芬发表的电文，劝黎改弦易辙，继续效忠清廷。有心人“循览数四，不禁骇叹。呜呼，梁鼎芬非所谓中国大名鼎鼎之读书人耶？何丧心无耻一至于此”，特意投稿，逐条痛批：

满贼以盗贼之手段占我神州，害我君父，屠我人民，毁我宗庙，裂我冠裳，凡有血气，莫不引为切齿之仇不共戴天。故自武昌起义以来，上自学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暨妇人女子，莫不欢欣鼓舞，如见天日，或从军，或助饷，除袁、冯诸汉奸而外，从未有明示反对者。今梁鼎芬乃竟认贼作父，以仇为君，妄窃忠君之义，欲黎都督效忠满奴。庸詎知中国之君，久为满贼残害，二百六十年来，满贼之冒称吾君者，非吾君也，实吾仇耳。古今万国，有认仇人为君者乎？^[20]

有人更直接指斥道：“梁节庵上黎都督书，语多荒谬，甚至以忠孝二字，反责黎都督。呜呼，节庵忘其节矣，其甘为虏臣而汉奸耶？其以服从满奴作走狗者为忠孝耶？”^[21]

有人观察全局形势，认为民军势力，已完全巩固，既有海陆军，又有土地、财产、人民和人才，之所以“尚未能使各国承认为中华民国，而仅认为交战团者，则以未设临时政府故也”。主张从速建立临时政府。而在对待民国的态度上，只有一二汉奸与人民尖锐对立。^[22]以对待清朝和民国的态度，作为区分人民和汉奸的权衡尺度。

在民党和舆论的口诛笔伐之下，汉奸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有人认为不仅要建铜像以表彰为我同胞争自由幸福的爱国男儿，还别出心裁，建议设立“汉奸陈列所”，因为“一般汉奸，或纵火残虐同胞，或伪降杀戮同胞，甘为满清走狗者，皆我同胞之公仇，亦当万世不忘者也。故鄙意当设汉奸陈列所，或将汉奸尸身，灌以药水，置之玻瓶而陈列之，或绘像而陈列之，或雕像而陈列之，使后人过之，皆得指而骂之曰：某也奸，某也恶，某也为民贼，某也为伪志士，一一唾骂之，俾稍泄我同胞之恨。谅我同胞，当亦乐于赞成斯举也”。所拟简章规定：

一、本所专为陈列汉奸而设，故名汉奸陈列所。一、本所之宗旨如左：

（甲）保存汉奸之臭名。

（乙）为后日读史者之实物标本。

一、无论何人，均得入所参观，不取分文。惟须遵守左列各项规则：

（甲）参观者尽可唾骂汉奸之罪状，惟不能动手。

（乙）参观者尽可摄影写生，惟须于事前咨照本所办事员，以便预为布置一切。

一、本所备有招待员若干人，如参观人有不明汉奸罪状者，可随时质问。^[23]

光复之后，为了表示与清朝断绝联系，象征性的重要举措是剪辫。各式各样鼓动剪辫的文章，不约而同地将坚持蓄辫视为继续忠清的汉奸行为，从不同角度想方设法说明剪辫的重要与必要。有辫无辫，俨然成为共和国民与汉奸的重要外在形象区分。

《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多篇有关剪辫的“游戏文章”，有人讽刺欲剪还留者的内心纠结：“辫子曰：吾宁累累坠坠任以终乎？将磨光刮垢斯无碍乎？宁斩草除根以尽薙乎？将留刘海以饰观乎？宁民军一式以危身乎？将留此秽物作汉奸乎？宁秃然光头以效僧乎？将忽前忽后，弯曲盘结，以学满族乎？宁八千烦恼以自除乎？将等待他人欲刑欲罚而始弃乎。宁濯濯若牛山之草乎？将垂垂若豚犬之尾乎？任人牵拉，存以取羞辱乎？宁与西人相似乎，将步胡奴之尘乎？宁效文明之族乎？将仍曲辫之号乎？此孰利孰害，何去何从，心去取而不明。性命为重，头发为轻。倘然割弃，难拖花翎。明人多剃，胆小犹存。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疑心。”^[24]

有人借虚构人物多角度探究和说明务必剪辫的理据：“光头尝持热心爱国者皆剪辫之说以劝人，人乐我之劝而剪者，已不下百人。有友人某君，藏发于帽，光头又以前说劝之。某君曰：除辫固我汉人之快事也，无君言余亦知之。然我汉族本蓄发不辫，今惟不辫不剪，复我祖国衣冠，还我本来面目，于事亦何伤，何君之哓哓必欲余剪耶。光头语塞，强应之曰：君言良是。然头发素受我族人民之爱护，乃二百八十年来，忘恩负义，竟肯顺从满奴为辫，是亦汉奸也，应以一刀惩之。某君曰：然则二百八十年以来服从满政府之人民将如何。光头不能答，只得到《申报》馆内求钝根代为一答。钝根于是代答曰：二百八十年间之人民死亡殆尽，其未死者，率皆衰老顽固，不能及其身而惩之，惟有罚其子孙作和尚以赎前愆。某君之祖若父，既为服从满政府者，是某君之发不能不剪也。”^[25]

有人模仿都督的口吻强调剪辫的合情合法与必要：“民军都督某某，使站岗警察某某，以剪一刀一，伺过街之行人，将其辫子割而告之曰：……今民国建共和，自由平等，五族之众，皆抚而有之。况革军所得扬州之近地，军督民长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辫子其不可与都督杂处此土也。都督受总统命，守此土，治此民，而辫子依然后垂颈项，拖处若赘疣豚尾鸭屁以累其身，以教其子孙，与都督抗拒，甘作汉奸。都督虽宽大，亦安肯为辫子低首下心，唯唯诺诺，为民吏羞，以留孽于此耶？”^[26]

有人正话反说，模拟不肯除辫者创设保辫会，强词夺理道：“今因民国勃兴，汉人纷纷剪辫，其意以为去满奴之记号，免豚尾之毒讽。我辈虽亦汉人，但顽固性成，大不谓然。试举其利害，与诸同志约略言之：一不能作汉奸，恐无升官发财之地。二不能媚清廷，惧有后患。三有违妻妾之命。有此三不利，故吾辈宁受唾骂，急思保存。爰集同志，创设保辫会。”^[27]照此说法，则不肯剪辫正是为了便于继续媚清廷当汉奸。

各大报纸几乎一面倒地拥护革命鼓吹锄奸，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由于“沪上各报馆对于南北军情，彰善瘅恶，知无不言，薄海同心，人人痛恨满兵之惨杀，咸有灭此朝食之概。某贼臣深为此惧，特派汉奸携带巨款出京，运动报界，故为北军张大其词，以馁夺民气，传闻已有入其彀中者”。《神州日报》对此宣称：“此汉奸之人名已据告确凿，姑存忠厚，以俟其后悔。”^[28]进而专门发表《新辨奸论》的社论，以汉族起义，建设共和，人民为真自由而战，报馆又居最高地位，以指导人民为天职，记载言论，无不一秉大公，决不能受南下某议员的运动利诱，“或力主停战议和，或妄登民军内讧，或为北军张大其词，谬称其势力何若，战术何若，而其宗旨，要不外于懈国民复仇之心，灰军人进取之志”。以后凡报馆有上述言论，就是满奸汉贼，是黄帝子孙不共戴天的公敌。^[29]

[1] 血儿：《锄汉奸》（二），《民立报》1911年12月4日，第4页，“大陆春秋”。

[2] 老圃：《汉奸释义》，收入《中国革命记》第16册，“言论一斑”，第3—4页。

[3]《武汉停战后近状》（特别通信员来函），《申报》1911年11月20日，第1张第4版，“要闻”。

[4]《大革命之紧要消息》，《神州日报》1911年11月3日，第1页。

[5]天僇：《再告袁世凯》，《神州日报》1911年11月8日，第1页，“社论”。

[6]松隐庐：《该死一打》，《申报》1911年11月1日，第2张后幅第3版，“瞎费心思”。

[7]血儿：《声讨汉奸》，《民立报》1911年11月3日，第1页，“天声人语”。

[8]血儿：《汉奸之末路》，《民立报》1911年11月29日，第1页，“天声人语。”

[9]血儿：《锄汉奸》（一），《民立报》1911年12月2日，第4页，“大陆春秋”。

[10]健生：《诛汉奸》，《神州日报》1911年12月7日，第4页，“时事小言”。

[11]我我：《读诗一得》，《申报》1911年12月14日，第2张后幅第3版，“下酒品”。

[12]七宝杞人：《革命军顺次尽寒韵（仿柏梁体）》，《申报》1911年12月14日，第2张后幅第3版，“尊闻阁词选”。

[13]渊渊：《读诗一得》，《申报》1911年12月3日，第2张后幅第3版，“心直口快”。

[14]陈缅生：《新式汉奸五更调》，《申报》1912年1月6日，第2张后幅第2版，“瞎费心思”。

[15]张和尚：《续十头》，《申报》1911年12月13日，第2张后幅第3版，“瞎费心思”。

[16]《辛亥中国革命史·汉阳五日血战记》，《神州日报》1911年12月3日，第2页，“特别纪事”。

[17]《申报》1912年1月28日，第8版，“心直口快”。

[18]《中华民国立国记》，《时报》1912年1月19日，第1、2版，“要件”。

[19]野民：《敬告我新国民》，《申报》1911年11月27日，第1张第2版，“评论”。

[20]江左书生：《驳梁鼎芬电文之荒谬》，《申报》1911年12月4日，第1张第6版，“来稿”。

[21]七宝张一：《革命声中之不可解半打》，《申报》1911年12月11日，第2张后幅第3版，“心直口快”。

[22]无名：《论宜速设临时政府》，《申报》1911年12月8日，第1张第3版，“评论”。

[23]戇夫：《汉奸陈列所简章》，《申报》1911年12月13日，第2张后幅第2版，“游戏文章”。

[24]爱：《卜发（仿卜居）》，《申报》1911年12月2日，第2张后幅第2版，“游戏文章”。

[25]光头叶：《剪发谈》，《申报》1911年12月24日，第3张第3版，“千金一笑”。

[26]爱：《祭辫子文（仿祭鳄鱼文）》，《申报》1912年1月1日，第2张后幅第2版，“游戏文章”。

[27]爱：《保辫会章程》，《申报》1912年1月4日，第2张后幅第2版，“游戏文章”。

[28]《辛亥中国革命史·汉奸运动报馆之可杀》，《神州日报》1911年12月3日，第2页，“特别纪事”。

[29]辟邪：《新辨奸论》，《神州日报》1911年12月4日，第1页，“社论”。

第二节 缉凶与北伐

惩办汉奸不仅宣诸于口，更重要的是落实为行动。鉴于“民党起义以来，诸事为汉奸所掣肘，致全国统一之功，迟迟不能告竣，军士茹苦，商民受困，内外大势，日趋危急，皆汉奸阶之厉也。故稍知大义者，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汉奸之肉而甘心”，广东人士发起组织共和民会，规定对待汉奸的办法最为详尽，并且发布公启，广告同胞，痛斥“伪吏汉奸，充积遍地，甘为功狗，助桀为虐，残害同胞，违背人道，若不设法以剿除之，绝虏廷之牙爪，警虎伥之冥顽，死灰燎原，孽根滋蔓，其为患正未可料也。今我国家乃共和之国家，土地即共和之土地，是共和之民，适合居之。彼汉奸者，其意志与共和相背驰，其手段与共和相冲突，其终必至尽破坏共和而复相互残害，为汉奸计，固不应居共和之地，即为共和国民计，亦不屑容此辈之汉奸，可断然矣（世界文明国，凡犯害国家治安，有递解出境之条，如土著者，无境可递，及处以典刑）。此所以调查汉奸与夫处置之法之刻不容缓也。处置之法不一，或直接以除祸害之根苗，或间接以断虏廷之手足。倘蒙热心同胞赞许，请即签名入会，分任各务，以尽国民一份之责任”。

该会所订章程所要处置的汉奸“以现任京官及各留任满奴为范围”，具体条款为：“一宗旨。本会专为对待清官汉奸而设，以断满清之手足而利民国之进行为宗旨。二进行。本会经同人签认后，先电告各团体，约定时地集议，然后由本会举定代表若干员，与各团协议实行，经各界通过后，即分电已反正各省，仿照此办法进行，以期反正及未反正各血性同胞共表同情。三会所。本会经省城各界通过后，即在省城择地开办，为集议调查实行对待之所。四调查。布告各界担任调查，请举所知之京官汉奸与及未反正之清吏来会切实报告，本会并以正式公文呈请军政府传知各县长，报告所属乡村市镇，切实调查。五通告。既确查得某人现仍为清官，即将其人姓名里居伪职来本会报告，由本会迳电其人，限期回籍，仍令其家属转告原人。六对待。限期既满，仍甘作功狗，自戕同种，为同胞当以公敌对待之，以达到目的为止。其子孙屏逐出共和国地之外，以免谬种留传，染污我共和土地，扰乱共和治安。其在籍财产以一半留在乡里中办其地方公益，一半献诸军政府，以充军费，以清奸源而昭炯戒。七变通对待。

或谓盗跖其父母，尧舜其子孙，文明公例，罪不及妻孥。其子孙或遵共和之化，则可居共和之地。公拟一地方，派人监禁之，监守一切费用用地租，由原人所出。监禁之期，以共和政府大局成立为率，以防煽惑而明心迹。此在原人，若非立心作汉奸者，必乐于赞成。非此，则举动出入，同胞不免伺窥防之，因此辄有疑误意见之生，名为监禁，实则保护。八特别对待。如汉奸之子孙故意逃匿，则照第六条之对待，并自后永远剥夺其公民选举之权，以警效尤。”^[1]

南洋华侨因汉奸仍未尽灭，特组织一对待汉奸团，举定干员，分赴各省，实力从事，务达目的方休。其章程为：“（一）现时仍作满清官员兵役者，不分文武大小，皆汉奸也，我同胞宜一律竭力对待。

（二）对待汉奸先谋诛其本身，我同胞务以炸弹及一切危险等物尽戕汉奸生命。（三）所有汉奸家属宜各查其籍贯住居，必须尽将现附满清之汉奸家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切尽拘入各省州县大监之中，定一期限，著该汉奸家属函电召其反正。若其逾限，即尽将其家属人口诛戮一空，以警效尤。（四）凡汉奸之田园屋宇家业，各凭本籍人士协同查明的确，即尽数充公。”其公启声称，这些对待汉奸办法，骤听似属野蛮，实则此种汉奸即黄帝复生，亦必大义灭亲，毫无姑息。满贼若非得此汉奸为听命爪牙，早已气绝。鄂省血战，忠烈数万，非死于满贼之手，实死于汉奸之手。“以此言之，即诛汉奸之家属及掘汉奸之祖坟，亦不为野蛮。”^[2]《时报》为此评论道：“身为汉人，而乃甘事异族，且更作种种举动，以为同胞之患，是尚得谓有人心者乎？华侨之对待汉奸团，拟尽拘其家属，以勒令反正，虽或疑其稍激，然正不可无此当头之棒也。”^[3]

光复后，各地纷纷举行悼念烈士的活动，汉奸相应地成为控诉的对象，在此过程中，锄奸与北伐自然联系到一起。华亭韩小洲撰写的“追悼中华民国诸烈士歌”唱道：

二百余年胡氛浊，爱国男儿风浪恶。牺牲多少英雄血，造成时势民气作。义旗迅举武汉间，登高一呼河山旋。四方响应呼光复，东南士气雄万千。吁嗟乎，痛恨汉奸袁冯张，以汉杀汉惨复伤。汉口一炬成灰烬，汉阳失守退武昌。幸我众志坚如铁，不灭胡人誓不歇。争以血肉换自由，前仆后继鬼神泣。金陵攻破张贼逃，欢呼汉土还同胞。临时政府方组织，安享共和幸福饶。追忆流血诸先烈，战死沙场众英杰，或以赤血溅汉奸，或以黑铁除满孽，奋不顾身救同胞，同胞何以酬勋劳，馨香崇拜光历史，铜像巍峨万古昭。

寄语民军将佐，不信袁奸诈和，直捣黄龙，收复幽燕，创新民国。^[4]12月17日，武昌军民召开追悼会，凡莅会者，皆有感泣悲歌之意，工队营长金骥敬撰二联，景仰烈士是其一，更主要的就是表达复汉锄奸的强烈意愿：“联汉族，竖汉旗，杀汉奸，灭汉贼，复汉仇，汉口汉阳，收回大汉河山，后汉光昌胜前汉。”^[5]

广州的悼念烈士活动与惩办汉奸一同举行。炸击李准的林冠慈烈士殉义，随葬于东门外的红花冈。光复后，由同志查得墓地，开棺检视，于12月14日行改葬礼。是日会葬者万余人，各军队、各团体皆排队到祭。温生财之子佛琴亦由南洋回粤，亲至同盟会与各会员磋商，欲将其父迁葬红花冈，最终决定于12月29日与陈敬岳一并移柩。“至害温生财之郑家森，现已拿获，于十月二十九日解往黄花冈义士冢前，剖开取出心肝肠肺致祭，以慰英魂，并由石字营战军复将郑之肝肺用竿高悬，沿途游行，俾为汉奸者戒。”^[6]

生祭之外，还有冥祭。1912年1月12日，粤东北伐军总司令部统率教练团并所部粤东各军队，前赴东门外牛王庙，致祭庚戌年正月阵亡新军各烈士，“用纸札李世桂、吴宗禹、张哲培三人为汉奸，李、张两名装札袍帽红顶，吴宗禹装札操衣靴帽，均装草履，用草绳反缚，双膝作跪形，抬以下柜，分配挽联，各军到牛王庙前将纸人放下，跪向坟前，各军队祭毕，将各纸人用竹炮轰毁，隆隆一声，化为灰烬”^[7]。

辛亥前安庆先后两次举行起义，首为徐锡麟，次为熊成基，“不幸均被满官摧残，以致大功未成”。光复后军政府展开追凶行动，“刻经统一机关处派员侦缉前次效力满官，拿获熊、徐二君之汉奸，顷闻已将首次残害同胞之丁有才拿到，不日即行严办矣”^[8]。

在追缉残害革命志士的汉奸的同时，对于两军对垒期间暗中资助清方的官绅也以汉奸罪名进行追究，查抄其财产充作军饷。“前粤督袁树勋在湘汉广有商业财产，现冯国璋派人致书袁氏，勒逼其报效五十万充作军费，否则将其汉口商业房产概行毁坏。袁不得已，愿先报效现银十万，其余亦允分期措缴。此事湘人闻而大愤，以民军前向劝募军饷，袁竟不允，而此时偏肯资助北军，故拟将袁在湘财产全行抄没，以儆汉奸。”^[9]扬州、南京等地则将上海光复时在江南制造局顽抗的张士珩（楚宝）财产没收充公，以济饷源。^[10]武昌也将汉奸盛春颐（盛宣怀之侄）、冯启钧等人的产业查抄充公。

抄没汉奸家产，惩戒之外，还有解决财政困难和宣泄民愤的作用。上海当局开始对此态度谨慎，所属法华乡乡民徐联科、乔猷黼、杨枕旦、朱斌等，鉴于“汉奸盛宣怀沪上置有不动产甚多，租界以内，大都影戩洋商，一时不能彻查。惟内地二十八保三图四图八九图内，共有盛贼之田一百五十余亩，均是德华公司暨五福堂二粮串为凭，历年赋税，由盛贼完纳”。曾经递函乞查，军政府没有回复。

“近阅各报，悉苏省程都督飭员将盛贼之产悉数查没，并飭苏松太各属一律报明查收，以彰公道等语，人心为之大快。”于是再度具禀，乞查汉奸私产以充军需而泄民愤。禀称：“窃自沪城光复以来，军需浩繁，庶政待理，经济困难，已达极点，需款既不易筹，公债更难假借，默观时局，深抱杞忧。……盛贼罪大恶极，人人欲得而甘心，收没其产，犹不足以蔽其罪。敝乡事同一律，岂容任其漏网，况豪奴凶隶，时来乡间逼租，稍不遂意，即遭威吓，乡民愤气郁积久矣。若不迅赐查没，何以泄民愤而定人心。伏祈都督俯察下情，迅赐会同民政长派员来乡，飭各地保指准查收，藉充军用。如或延迟，该奸神通广大，难免无暗借洋商出面影戩等情，为此迫切上陈，惟冀公鉴。”

在乡民的再三要求和江苏军政府查没行动的影响下，沪军都督陈其美将此事交由执法科核办，上海县民政长于12月9日接奉民政总长李平书训令，以“事关惩处汉奸及供给军用，果能施行无碍，自属一举两得，合行备文，移请迅即派员前往该乡查明办理，并将该乡民等录呈之各图粮户额数，另录存案，尚祈照验施行等因。准此准罪人财产，亟应藉没归公，省城既奉查，本邑自应遵办。令即按照单开各图迅传各该图地保册书核对粮册，守管该地，勿令隐匿，随将原有之单契一律注销，布告公众，以快人心”^[11]。按照上述程序，上海光复政权查没汉奸财产的行动也相当严格规范。

在有些地方，惩办汉奸不仅涉及当下，还会追究历史。江西南昌原有曾国藩祠宇，光复后军政府尚未议及，好事者已将其牌位改书

“例授大汉奸大民贼曾国藩之牌”，可见民心思汉之一斑。^[12]浙江嘉兴西门内广平桥南，旧有清提督程学启祠，“日前军政分府方青箱君以其效忠异族，屠戮同胞，宣布各属，即将该祠拆毁，并将栗主焚毁，以为汉奸效力清朝者戒”。布告力数该汉奸为满奴效顺，种族之见不明以及背主、杀降、自戕同类等四大罪状，“今者大汉光复，凡属汉奸，皆在痛绝之例，是宜焚其栗主，以报汉族之仇，毁其淫祠，以昭后人之戒”^[13]。这样的标准，与革命党此前排满宣传的口径吻合，不过，如果照此办理，各地锄奸的范围和频率势必猛增。从媒体

的报道看，类似的情形并未大量出现，表明各地光复政权没有普遍采取同样的处置标准。

汉奸大量聚集之地，还在清廷控制下的北方各省，因而惩办汉奸不能仅仅局限于光复省份，更为重要的还是如何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这部分汉奸包括两部分，一是原籍属于光复各省而本人继续在北方为清廷效力的汉人，二是效忠清廷的北方汉人官绅。民军的矛头首先针对前者。1912年1月4日，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发表对中央政府的意见，正式提出：“各省汉人此时仍在满洲政府范围内者，限以阴历年终一律回籍，踰限不归，并不通告理由者，即行除籍（当议决电各省请转电在满洲范围内之汉人）。”^[14]此举无疑是对原籍独立各省但仍在清朝控制区域的汉人下了一道最后通牒，被除籍也就等于被定为汉奸。广东梅属镇平黄开文被清廷任命为湖北汉黄德道，镇平人闻讯，开会集议对付办法，决定将其削籍，抄没田产，并通电上海、广州等地各报馆，痛斥其“人群败类，中国汉奸”^[15]。

辨明北方的汉奸身份，是要为北上锄奸开辟通道，其具体行动，就是北伐。而北伐的锋芒，包括所有继续效力于清廷的南北汉人。北伐联军总部发出布告，宣称：“南京既下，北虏尚存冯国璋、张怀芝诸汉奸助贼逞凶，英雄用武，男儿报国，正此时也。本部现正联合各省组成北伐军，直捣幽燕，誓清汉字，已设招兵处于西门斜桥湖南会馆内，自本月十七日起至卅日止，凡我爱国健儿热血志士，速来本处报名，听候检验体格，兵饷格外从优”^[16]。号召军民挥师北上，武力锄奸。

南北和谈期间，由于和议一波三折，人们普遍怀疑清廷和袁世凯的诚意，北伐呼声日益高涨。凡是主张君主立宪者，均被指为汉奸，成为重要打击对象。1911年的最后一天，扬州北伐正司令徐宝山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报馆，表示：“今总统既已举定中山先生，经略全局，自有伟筹，宝山惟有统率旧部及长江健儿飞驰河洛，直捣燕冀，誓非恢复神州，歼除满清，不敢作停战策画。倘有偷安小子，无耻汉奸，甘媚异族，不审民主共和，阴主君主立宪者，宝山惟有立率江淮英杰，共申忘本之罪，湔灭败类，无怪宝山鲜爱护同胞之谊也。”^[17]

五天后，漳州司令官刘蔚率全体军人致电孙中山、黄兴等，提出：“民主、君主不能并立，神种、满贼不能两□□□□□宗旨，

近日袁贼行阴险手段，外主议和，内增兵力，老我士气，离间民心，临时国会之招集，迁延时日，罔上空谈。吾辈军人只知持铁血主义，达共和目的。今民国已立，总统有人，满胡残虏已无招集国会之权，诸公早定大计，直捣贼巢，倘有汉奸辈倡议君主者，惟暗杀之。北伐，北伐，纵以吾辈之血染成民国地图，亦所不惜。”^[18]

华侨对北伐高度关注，积极推动。旅越华侨致函广东各团体，通告当地筹募公债的情形，请北伐队火速出发。旅越华侨对于募集公债一事“人心踊跃之故，盖非注意于目前之治安，实以北伐军至今未发，急欲助充军实，促其进行。方今外人之举动，有所左右，袁贼狡黠，复有少数汉奸，今为效力，散布各省要区，外表同情，阴行破坏。民国新立，未有根据，散漫纷纭，危于累卵。鄂军虽强，独力无助，万一再有失败，则北兵之势，必先直犯广东。……且以北兵之强悍，满虏之野蛮，汉奸之狠毒，所至之地，斩刈焚烧，无复人理”。唯有北伐胜利，推翻清廷，乡里才能永保平安。“若不以此为急，斤斤然议论治安，怵于目前之小乱，而昧于将临之大祸，是入袁贼之彀，中汉奸之计也。”^[19]

这番陈词，将北伐与保卫故里的关系说得极为透彻，不消灭满贼汉奸，则家无宁日，国无宁日。而掌控北方的袁世凯之流，正是汉奸之尤者，讨贼即为锄奸。为此，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促使北伐早日出师。

国体问题迟迟不定，清帝不肯轻易让位，使得一些热血志士尤其是身处北方的革命党人神经紧绷，锄奸行动也进而采取极端形式。据报道：“顷得密报告，京津间有人组织一己死队，其意以为敢死、决死等队，尚处于未死之地位，此队之组织，其人之地位实为已死，先由最精医学家研究一种毒药，制成蜜丸，服之须十日始死。闻入其队者即服此丸二粒，十日之内，力谋狙击，无论中否，药发必死。队中命令极严，以击死阻碍共和之满奴汉奸为目的，定为抽签之法，抽得应击之人，其人必去狙击，连日炸弹轰掷，即系此队党人。”^[20]此事是否属实，还需查证。这种不留生路的必死精神，反映出革命党与满贼汉奸的对抗已到你死我活的紧要关头，先驱者宁可牺牲生命，也要诛杀仇敌，以换取国家民族的新生。

鉴于汉奸的危害极大，有人甚至向北伐队提出：“健儿此行，其宽待满族，严惩汉奸，无汉奸则往年葡萄牙旬日革命之功，已重现于

吾国，何至费我健儿多少之力之血也。城下之日，孰为汉奸，往斧其吭，诛止其魁，释其下人。”^[21]将汉奸当作首要打击对象。

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清朝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其时梁启超等人正在设法与袁世凯联系，利用这一关系，试图在保留清室的立宪体制下有所作为，可是举国上下对汉奸的一片讨伐之声，令多少了解实情的同党对此策略毫无信心，直言劝告梁启超大势已去，必须改弦易辙。12月14日，吴贯因（即吴冠英）致函梁启超，不赞成后者在北方谋划参政之事，主张养晦待时，徐观后变，因为其时该党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附和民主共和，则为革党所轻，仍然标榜君主立宪，则与民族主义风潮相悖。昔之为君效死者为忠臣，“今日为君效死者，人则字之为汉奸。夫诚得忠臣之名以死，则或有愿为之者矣；若蒙汉奸之名以死，谁复乐为之乎？”^[22]

康梁等人在共和的大势所趋之下，继续鼓吹虚君共和，企图保持清帝，遭到舆论的唾弃。其时各报刊载康有为致徐勤的密函影本，题目就标名“汉奸康有为寄徐勤之密书发现”^[23]，并且撰文《汉奸康有为之罪孽》，对该函全文逐句痛批，作为“康奸与徐勤书判词”，宣称：“汉奸康有为与徐勤亲笔一书，系在坎拿大搜得，寄至本社，……措词悖谬，而依赖满政府及蓄意破坏民军之种种罪孽，昭然若揭，可作汉奸口供观之。”^[24]人心所向，一顶千夫所指的汉奸帽子，让坚持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的康梁一派失去政治上的回旋余地，束手无策，抛弃帝制成为他们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至于清帝的存废，只能听天由命。

康梁之外，其他继续主张君主立宪者也都被视为汉奸。和议期间，一些滞留北方的立宪派人士纷纷南下，试图助成君主立宪。贵州都督赵德全致电孙中山、伍廷芳和各都督，以“袁贼狡诈异常，政体交国民会议一节，窥其意，必潜派汉奸运动，达君主立宪目的，苟不如意，再开战端。适接湘电，□□已随唐使到沪运动。袁贼诡谋已露，应严加防范，免中袁计”^[25]。提请防备汉奸乘机运动，破坏共和。毛遂自荐亲赴江浙为袁世凯充当蒋干的曹汝霖，就被指为假留学面目藉作汉奸易售其欺。^[26]天民公民社电告上海共和各团，以蹇念益、江庸、周应昆、章仲和、陈叔通等潜到上海，布散流言，献媚于袁世凯而保伪清禄位，又有叶姓李姓诸人探听民军情况，报告伪清。

上海各团体接获消息，筹备扑灭之法，并警告沪上人士勿与之往还，以免玉石俱焚。^[27]

光复政权在管辖区域内惩办汉奸的同时，还针对北方的本籍汉奸展开通缉和诛杀行动。浙江省临时议会和都督汤寿潜发出咨文，诛杀汪大燮、章宗祥和盛宣怀。咨文称：清朝浙江虽然遭受文字狱的惨祸，但北面事胡者实繁有徒。“豪杰之士，身在伪朝，存心报汉，尤足称也。至如大奸大慝，挟策权门，效忠贼主，交接外人，凌轹汉族，则罪在不赦。杭之汪大燮、湖之章宗祥其选也。春秋诛邾莒以用夷礼，况为之臣，况为之俦，以贼吾民乎。西律不经裁可，身为外臣，而昭刑戮者，所以禁奸，其厉犹尔，况于怀慝肆恶之人。请诛汪、章如盛宣怀。”^[28]在福建，曾经担任北军司令的汉奸叶兴清归闽，因破坏共和，被都督拘禁，拟治死罪。^[29]

进入民国，杨度被指为汉奸，一定出乎他的意料且感到冤枉。1月5日，湖南国民协会通电各省都督各团体各报馆：“汉奸杨度，比附满酋，力请袁世凯出山，致祸结兵连，残害吾同胞数万，罪已应死。近复随同唐绍仪至沪议和，密遣党羽分赴各省，鼓吹君主立宪谬说，冀得淆乱是非，遂其奸诈。若不速诛此贼，何以对我死义诸先烈。敝会及两省人民已将该贼宣告死刑，惟闻该贼踪迹诡秘，刻尚潜匿沪宁等处，敢乞各省都督通告所属，一体严拿，并恳沪都督及各团体派探密缉，如果弋获，即请就地正法，声布罪状，以谢天下。湘中人士无任感祷。”^[30]此电何止是通缉状，简直就是追杀令。

杨度自认为怀有救国抱负，只是太多的追求与众不同。留学期间，他就在革保之间特立独行，结果两边争取不成，竞相批驳抨击。归国后杨度为清廷所用，于预备立宪多所谋划。武昌起事后，他主张袁世凯出山，但要说袁就是因他而再起，则言过其实。战乱蔓延，杨度又与汪精卫等筹划组织国事共济会，试图以国民会议表决国体政体，也是两头不讨好，民、清双方均予以否决。反倒是在南北和谈的谈判桌上，成为重要选项。虽然未能如愿，毕竟于防止战事扩大，避免生灵涂炭有所作用。上海议和期间，杨度的确仍然坚持认为君主立宪更加适合中国，可是也表示要看多数国民的态度意见，并且最终转向促进共和。他留学归国入仕，是希望凭借有力的政治支撑实现其主张抱负，在新政和宪政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虽然做不到爱中国不爱大清，但要说他是爱大清不爱中国，恐怕有些牵强。其行事

固有正误当否之别，在他心中，根本还是爱国而非卖国，其他只是凭借支点的选择变更而已。

必杀令的公布，使得锄奸行动有可能溢出军政府的掌控。上海光复后，“有不肖汉奸串通某国洋商私济野蛮政府军火”，民党“为持人道起见，特组织锄奸团，分布南北各交通要道，专杀此等营私罔利违背人道贼害公理者”。汉口禅臣洋行买办赵华堂，“张彪之狗党也……武汉起义后，曾受张彪託，为满兵来沪上采办军火一次。此次再来，为热血同胞侦知，特自汉尾随来沪，将饷以手枪，因在船未得其便，直至南洋丸抵埠后，乘赵立趸船与人细语时，始砰然一声，正中要害”。锄奸团发布通告，宣布其“由本团派人实行枪毙，以示儆惩。此后如有以军火私济清政府者，本团即认为人道公敌，一律以此法处治”。并进而宣称：“本团系出于个人爱国私忱，用特声明。再本团会员因分布各省，需人甚多，如有深于理化及通三国语文以上者，请将姓名住址登载各报，以便前来接洽为祷”。西文《文汇报》记者亲眼目睹刺杀过程，行刺者为无辫少年，得手后向闵行路及百老汇路遁去。“旁观者似知赵某受击之原因，皆静然表同情于刺客。”记者虽然觉得事件极可怖，但是“能令吾辈西人见之，可知人心仇视汉奸之恨也”^[31]。

光复各省的锄奸行动以及所引发的一些流弊，引起同情者的担忧、有心人的质疑和善意的批评，也被别有用心者故意夸大，进而严厉抨击。“有自上海来者言，与彼党议论，稍立异同，或微露不然，甚则枪拟，轻或搥面。如顾鳌、唐宝锷以演说君主立宪被拘；程豹以曾充端方委员，招瑞声以供职海军部，均指为汉奸处死。盖与庚子北拳情形无异。偶闻诋斥，或形迹嫌疑，目为二毛，遭戮辱矣！”^[32]连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发刊辞》中，也将“汉奸之名，以淆白黑”^[33]，作为乱象之一。可是，程豹和招瑞声间谍案证据确凿，顾鳌等主张君主立宪也毋庸置疑，非要说上述诸人均均为滥捕乱杀，甚至等同于义和拳反洋教，显然是恶意攻诋。

其时舆论主要由民军控制下的上海报界所主导，北京报馆小心翼翼，以免惹祸上身，只有天津报馆还算活跃。而代表袁世凯一方发言的，就是貌似中立的《大公报》。开始该报还不敢直接反对惩办汉奸的宣传和行动，而是假借外国人之口来表达不满。如援引外交界人士的消息称，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原来因为革命党人图谋政治改良，具有文明思想，表示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今调查最近举动，多不合理，

如滥杀北人，诬指汉奸，勒逼清政府官吏，强指土匪为民军，勒捐军饷等项，均属有背文明，务必即行蠲除，否则各国将不能承认为交战团云”^[34]。又说：“外交界人云：现在沪宁皖苏闽浙等处民军举动异常纷扰，最大者计分三端，一为诬指汉奸，挟仇戕杀；一为勒捐，抄查商民私款；一为强迫剪发。现闻沪宁两处外交团均极不平，已为最后之忠告，以民军既自以文明自居，即不应有此扰害公安专制之举。倘再无所约束，则各国必将以别项办法对待云，并已将此意电告驻京公使矣。”^[35]

诸如此类的报道，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者故意向清方示好，就是报馆自身的有意编造。实际上，除日本外，各国对于介入中国冲突一事相当谨慎，上海领事团不会直接采取有可能引起政治判断的干涉行动或是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言论。即使是新闻界散布此类信息，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制止或澄清。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不希望冲突各方误会其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以免损害该国在华尤其是在南方各省的生命财产等利益。

在借重洋人无效之后，《大公报》开始直接表达对光复各省“诬指汉奸”言行的强烈不满，并且不惜夸大捏造事实，进行恶意攻击：“专制与共和，乃极端的反对者也，而今日之共和国，竟操无上的专制手段。有意见不同者，则倾轧之排挤之凌迫之杀害之，遇指陈其弊者，即满奴之汉奸之嫉殛之寇讎之，不谓饮以拳銃，即云食以炸弹，党同伐异，臻于极点，一言不合，枪声立现。而一班军人尤多骄恣傲慢，睥睨同胞，稍拂其意，立即用武，因使居于民国界内者，言论意想皆不得其自由。袭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与前此满政府之伪立宪尤凶百倍矣。”^[36]不惜将已成落水狗的清廷拉来陪绑，只是为了达到污蔑共和国的目的。

《大公报》对于锄奸的宣传和行事反应如此强烈，间接表明锄奸的确对北方的官绅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这对汉人官员不敢坚持拥清具有不可忽视的心理冲击作用。连梁启超等人都害怕背负汉奸的骂名，其他与清廷离心离德的文武汉官，早已不是为了保存清王朝而与民党为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坚持对抗民党，就是要想方设法卸下头上的汉奸帽子，以便心安理得地进入民国的新时代。

^[1] 《关于对待汉奸之商榷》，《神州日报》1912年1月17日，第3版。

[2] 《对待汉奸团出现》，《时报》1911年12月25日，第4版，“地方要闻”。

[3] 《时评二》，《时报》1911年12月25日，第4版。

[4] 华亭韩小洲：《追悼中华民国诸烈士歌》，《申报》1911年12月21日，第3张第2版，“尊闻阁词选”。

[5] 工队营长金骥：《上月二十七日开追悼会凡莅会者皆有感泣悲歌之意敬撰一联以志景仰》，《申报》1911年12月23日，第3张第3版，“尊闻阁词选”。

[6] 《红花冈上三雄鬼》，《申报》1911年12月27日，第1张后幅第2版，“要闻”。

[7] 《粤东陆海军近事》，《申报》1912年1月20日，第6版，“要闻”。

[8] 《皖省劫灰录》，《申报》1911年12月30日，第1张后幅第3版，“要闻”。

[9] 《武汉最近之闻见（特别通信）》，《申报》1911年12月17日，第1张第5版，“要闻”。

[10] 《彻查汉奸财产之实录》，《神州日报》1912年1月3日，第3页，“特别纪事”。

[11] 《没收盛宣怀田产之公布》，《申报》1911年12月24日，第2张第2版，“本埠新闻”。《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4日第3页《中华民国新江苏》所载，文字稍异。

[12] 《辛亥中国革命史·南昌归客谈片》，《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5日，第2页，“特别纪事”。

[13] 《焚毁汉奸之淫祠》，《申报》1911年12月4日，第1张后幅第4版，“各埠通信·浙江”。

[14] 《湖北省会议纪实》，《顺天时报》1912年1月19日，第4版，“各省要闻”。

[15] 《汉奸看看》，《天铎报》1911年12月26日，第2版，“中外大事”。

[16] 《北伐联军总部招募广告》，《申报》1911年12月12日，第1张后幅第6版。

[17] 《民立报》1912年1月1日，第2页，“扬州电报”。

[18] 《民立报》1912年1月7日，第2页，“漳州电报”。

[19] 《旅越华侨北伐热》，《申报》1911年12月26日，第1张后幅第2、3版，“要闻”。

[20] 《已死队出现》，《天铎报》1912年2月8日，第3版，“中外大事”；《京津间之已死队》，《申报》1912年2月9日，第3版，“要闻”。文字稍异。

[21] 健：《北伐队赠言》，《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0日，第4页，“时事小言”。

[2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4—596页。

[23] 《民立报》1911年12月27日，第1页。

[24] 《汉奸康有为之罪孽》，《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第4页，“新闻一”。

[25] 《中华民国立国记》，《时报》1912年1月24日，第1版。

[26] 《汉奸南下》，《民立报》1912年1月4日，第4页，“新闻一”。

[27] 《不知死活之汉奸》，《民立报》1912年1月6日，第6页，“新闻三”。

[28] 《浙议会请诛汉奸》，《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第4页，“新闻一”；《请诛奸贼之西汉文章》，《天铎报》1911年12月26日，第2版，“中外大事”。文字稍异。

[29] 《共和国之紧要电报》，《神州日报》1912年1月29日，第1版。

[30] 《湖南国民协会电》，《申报》1912年1月5日，第3版，“公电”。

[31] 《又杀了一个汉奸》《汉奸应丧胆矣》，均见《民立报》1911年12月2日，第5页，“新闻三”。

[32] 苏舆著，胡如虹编：《苏舆集·辛亥溅泪集卷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

[33]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4日，第1版。

[34] 《外人不满意民军之种种》，《大公报》1912年1月17日，第5版，“要闻”。

[35] 《各国最后之忠告民军》，《大公报》1912年1月22日，第5版，“要闻”。

[36] 杞忧：《革命之革命观》（续），《大公报》1912年2月5日，第2张第3版，“来稿”。

第三节 追究与释嫌

和谈成功，共和告成，统一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北清革咸与维新，昔日的对头成了同僚。可是汉奸问题并没有就此消于无形，反而因为政坛风云日益诡谲，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

进入民国，宗社党和升允等人依然奉清朝为正统，他们眼中的汉奸仍是指反清者而言。升允暗中鼓动复辟，所致东北某统领的信函即称：“今之共和云者，乃表面而已，其实际各据一方，各施其能，名实不符，何望其共和之有哉？吾恐愈求共和而共和愈远。盖今我中土非君主立宪不能有效，而共和绝无存立之理，况名实不符，各据一方乎？……愿阁下早为裁决，因时而动，以免汉奸之势力至此，欲战不能，悔之晚矣。”^[1]试图以“汉奸”即革命党势力未及的东三省作为恢复清朝统治的基地。

革命党中的激进分子对于和议也相当不满，2月15日，陈炯明万急通电军政各方，以和议条件内仍然包含早已径电力争的帝号不去、亲酋袭爵、仍居北京、拥有禁卫军等件，表示：“和议果属如是，是清帝不啻以袁内阁为汉奸；……参议院议和总代表昏庸误国，已堪痛恨；乃闻参议院竟主张移都北京，与废帝同居一方，以遂其串通宫邸、推翻民国之诡计，极其危险。”扬言“如再不能力争，粤省应先将本省参议员取消，以为各省之倡”^[2]。

统一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成立不久，《大公报》便将矛头指向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指“种界之害”是“汉奸”泛滥的根源。所谓“自满廷专政，汉族沦夷，革命家遂倡为种族之说，唤起同胞，满夷、满贼之称，在当时原不足怪。今民国建设，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昔为仇雠，今为兄弟。况以狭义言之，汉、满、蒙、回、藏固分五族，以广义言之，汉、满、蒙、回、藏实同一种。不特汉族同为一国，即满、蒙、回、藏四族，亦皆我一国之人也。凡有破坏共和者，同为五族之罪人，断不可再存种见。乃新政府组织，除内务部理藩一职外，四族之人，既不免同抱向隅，而各省军政府之捕人，非指为满奴，即目为汉奸。以共和时代，五族一家，而仍留此等名目，以快其报复之私，万一绝之过甚，激起其保种保族之心，即

以曩日我之仇彼者，转而仇我，种祸讵有已乎。是欲巩固共和，而反以破坏共和也”^[3]。其说用新概念表达旧意识，看似冠冕堂皇，实则不无混淆视听之嫌。

实际上，南京临时政府对于防止打击汉奸扩大化相当重视。早在1月14日，孙中山就通电各省都督、各军政分府，要求对汉奸嫌疑据实依法慎重处理：

近因各地每日有曾仕清廷之人，罪状未著，遽以嫌疑被逮。如其人果系汉奸，敢于破坏我国前途，则诚自速愆尤。若以为曾受清命，则魏奕曾仕隋室，刘基曾仕元朝，专制鼎革之秋，犹且不问。若今日改革政治为共和，则国犹是国，人犹是人，蓄众容我，并无畛域。当此百务方新，革命英奇，难敷全国建设之用，宁可以狭义示人，动辄捕逮狙击，使四海之内，屏息而听，重足而立。嗣后各地如遇此等嫌疑告密之事，应先令查根凭实，再交审判厅确实查核，庶刑当其罪，法允于平，不致以嫌疑二字，滥用拘系，为民国革新名誉之累。^[4]

特意要求不以嫌疑而滥用拘系，当然说明告密者多而处置不慎的情形确存在。从武汉和上海的实情看，革命党人对于汉奸论罪较为严格，滥用者多是附从革命的官绅，除了个别故意借机报复者，多数应是害怕被指为汉奸的自我保护性举动。1912年4月1日，《时报》刊载程潜致孙中山的呈文，对各地军政府官员的素质及胡作非为的行事予以尖锐批评，并提出改进办法：

盖光复伊始，官吏考试任用，既无明文规定，不能不通融迁就，于是所谓军政府、军政分府、民政长者，半由声名平常、劣迹昭著、戴革命假面具、口仁义而心蛇蝎之人运动得之，要津既据，作福作威，凌轹乡土。据报纸所载，见闻所及，有非依法律辄侵入人民家宅，搜索银钱、衣物、书籍，而恃强占有之者；有托名筹饷，强迫捐输，甚且为掳人勒赎之行为，而暗中侵蚀干没之者；有恶直丑正，诬指为汉奸而枪毙之，或籍没之者；有非依法律逮捕人民，拘禁刑责，血肉横飞，奄奄垂毙者。此外，以本省而排斥外省之人，以此府州县而排斥外府州县之人，以此党而排斥彼党之人，甚者以手枪炸弹为快意泄忿之具，恣睢暴戾，言者咋舌。前南京枪毙缪思敬、崔瑛，宣布罪状，南京近在咫尺，见闻可及，若外省之非缪、崔而亦缪、崔者，所在皆是，纠弹不及，制裁全无，人民何辜，罹此荼毒？前阅报纸，有某省自治员为人所衔，被掷诸粪厕者，或啮毙者。今人民之恨若辈，殆又过之。拟请大总统发布命令，用极浅显、极简单之白话刊刻

告示，凡人民受前项疾苦者，准一面寄登各报，一面按照《临时约法》陈诉平政院。该院未成立以前，或因远道不便，则向各省都督府控告，一经调查确实，立予尽法严惩，将罪状昭示天下，以资警戒。其诬告者，按律反坐，行知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广为传布，务期家喻户晓，俾免含冤莫伸。^[5]

无论孙中山还是程潜，所反对的都是汉奸之名的滥用以及惩办行动的乱来，言下之意，真正的汉奸仍然有必要进行甄别，予以镇压。南北统一后，这样的行动应否继续，尤其是在光复各省，如果遇到昔日的汉奸被派来担任军政长官的情形，应当接受还是予以抵制，这成为对革命党人政治伦理和政治智慧的极大考验，同时也扩大了革命党领导层与基层的分歧。

辛亥民元的政坛变幻，的确给人以翻云覆雨之感，很快，杨度就从人人得而诛之的汉奸，变成各方争相延纳的元勋。对此冰火两重天的时势变换，《申报》的时评感叹道：“今日之杨皙子，犹是昔日之杨皙子也，光复时之杨皙子则目为汉奸，宣布死刑，民国成立后之杨皙子则目为革命元勋。至谓解决北方之共和，全恃杨力，国民党招徕之，共和党赞扬之，俱以杨不肯入党为憾。诟昔日之杨皙子果异于今日之杨皙子耶。曰昔日之杨皙子，倾倒梁任公者也，今日之杨皙子，犹是倾倒梁任公者也。昔日之梁任公，人皆欲杀，今日之梁任公，既为杨所推荐，则人必移其欢迎杨皙子者以欢迎任公，吾知邀梁入党者又必纷纷矣。”^[6]

杨度的是非曲直不仅是个人际遇的尴尬，而是反映了政局变幻所引发的普遍困扰。1912年3月7日，范光启等人联名通过民立、神州、时报、大共和报馆转发了致南北军政各方及京、津、武汉各报馆的通电，指“汉奸王赓前在亡清陷孙公少侯于狱，既得伪军谕使后，即密札上海皖商夏某，使调查安徽革党，密札误投，逆谋败露，前经本党宣布死刑，久稽天讨。兹再揭其罪状，以示众共弃。又伊近日竟勾串劣绅，冀充皖督，望同乡人士万勿为其所迷”^[7]。

范广启等人的指控，遭到一批南北人士的反驳。3月11日，程德全、章炳麟、张绍曾、刘莹泽、陈宦、吕均、钱芥尘等通电南北各方和各地报馆，指“范光启君等电口汉奸王赓一则，当与事实矛盾。此次共和成立，王君以充旧内阁军事参议，转移北方将士心理，赞助项城民国计画，功效极大。其在九、十月间未入北京以前，首在吉林主倡共和，各方反对，几遭暗杀，北方人士多能言之，岂有首主共和之

人，密谋调查同党之理？至于孙君少侯被逮，据当时报纸所载，咸谓系安徽桐城凌某所为，更于王君无涉，事实彰彰，海内本有公论。惟念民国新造，弓影之来，最是使正士寒心，尤恐范君等南北睽隔，传闻异词，致生误会。某等夙与王君并无友谊，此次战证以至友所口，或同谋共和事业，深知王君为热心共和、尊重道德之人。用特申明事实，俾海内同志不厚诬正人，或亦于主持公道有关焉”^[8]。

次日，朱瑞等五人的通电也见诸报端，“其中所言均系为汉奸王赓作辩护，盖因同人等于数日前宣布王赓劣迹之通电也”。16日，范光启等再向南北各方、各地报馆及各团体发出通电，对上述两电予以反驳，指程、朱二电，一则强词夺理、抹杀事实，一则模糊含混，硬为解释。“诸公衮衮，明达兼人，而宵小运动多方，竟令贤者为其所迷，作此无聊之辩护，殊堪浩叹。”为正视听，再度公开辩驳道：

查王赓籍隶合肥，素以谄媚亡清亲贵为宗旨，铁良、良弼、载振均系赓之恩师。孙公之狱，确系赓所告发，此事久经安徽同盟分会宣告罪状，神州同志莫不同知，汉奸美号，非自今始。方今民国初立，南北一统，固不可再以汉奸二字加入，然大名鼎鼎之汉奸，使非革面洗心，立功民国，以赎前愆，则不可一例相待也。今后汉奸称谓无自发生，往昔汉奸谥号依然存在，公理然也，事实然也。札查革党一事，系经同人目击赓寄密札与夏某，误投李某，旋用五百金购回原札，安徽商人俱能言之凿凿。朱、程诸君何所据而谓并无其事，更何所见而谓同人之言为弓影之谈。赓在吉林，反对独立，江淮同盟会员有往吉林谋光复者，几遭毒手，旅吉人士众口一辞。去年十月，赓有上载振一书，载在吉林报章，画策虏廷，冀平义师，何得云首主共和，更何得谬称正士。使赓能脱胎换骨，闭户悔过，则同人等自当宽其既往，予以自新。无如妖心不退，故态依然，有计夤缘，混入袁君幕府，多方运动，冀充安徽都督。同人等为世道人心计，为安徽名誉计，自不得不宣布其劣迹。

至赓此次南来，系与唐君等代表袁君，投鼠忌器，打狗看主，大局所关，自当别论。宣布死刑一节，系本党从前秘密作用，于理于法，非可宣诸大众。惟虏廷已覆，革命已成，凡属漏网汉奸，业经民恩大赦。然昔日之罪案，即今日之秽德也。前电偶及，盖为显托。同人等与赓均系切近同乡，私交最厚，相知最悉，非若程君德全等所云，并未相识，仅据友人所言，即出为辩护也。张君绍曾系赓之同僚，程君德全系赓之旧主，章君炳麟谅系受程之嘱托，其余诸人大率皆与赓交好，如其爱之，则宜劝赓束身悔过，勉作忠厚乡人，渐消从

前罪恶，何必为赓掩饰，更何必为赓表扬，使赓醉心利禄，恋栈官场，叫嚣于东西，奔走乎南北。所谓欲盖弥彰，愈弄愈坏，非徒无益，而反之害者也。朱、程二电中有厚诬正人及王赓主张共和等语，违背事实，颠倒黑白，未免过甚，尤恐该二电出自王赓捏名，是以再曰。

为了昭信于天下，联名各人不仅公开实名，而且分别列出职衔。^[9]两相比较，前一电署名者十六人，后一电署名者二十八人，多十二人；前电具名的陈策、高樾、戴圣德三人，未出现在后电的名单中。而常恒芳、郭梓青、王正蕃、郑赓臣、陈章奇，赵云龙、赵丹、朱子明、陈芝宣、毛保乾、吴文龙、方潜、高荫藻、凌济安、王天培等十五人，为后电新增的署名者。这表明通电并非冒名捏造，也不是被列名却不知情。至少发电人自认为内容属实，敢于承担责任。

辛亥王赓在吉林策动独立，最后被巡抚礼送出境，确有其事。^[10]同时他也向袁世凯进言，希望其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受到袁的高度重视。^[11]问题的关键，在于原来的汉奸如何才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融入民国，并且可以任职于光复各省，而为革命党所接纳。皖省同盟会员显然不接受民国共和，既往一概不究的说法，无论就公理还是事实，往昔汉奸谥号依然存在，不能一笔勾销。革命党人的愤懑情绪通过各种形式宣泄出来。“日前南京陆军部派有调查员邓君子赞来皖调查军政，当经孙都督派员招待，并于翌日聚宴于大观亭。惟时邓君酒喧耳热，不觉高唱入云，以楚音而唱皮黄，旁观大为捧腹。及席散后，邓君又欲在中途放枪为乐，同人等恐惊商民，极力阻止。于是邓复上大观亭，见亭上置有商民各界石勒朱家宝肖像，乃大声急呼曰：此汉奸也，我当以手枪奉敬。遂将石勒毁坏。”^[12]邓子赞酒后失态，未必不是以酒蒙面，借机吐露真心。

追凶的范围还延伸到北方军界。3月28日，“南方军界同人”通电军界统一联合会及南北军政各方、各报馆，声言：

现在共和成立，南北一家，自应消除意见，免启猜疑，努力同心，为中华民国前途同谋幸福，断不致因从前意见之不同，复存恶感。惟王遇甲、易乃谦、丁士源、徐孝刚等前在汉口擅杀无辜，越出战斗范围以外。例如降兵数百，王遇甲、易乃谦以机关枪惨杀之；白发老翁，数龄稚子，丁士源亦指为汉奸，缚树枪毙；停战中徐孝刚亲以海军大炮轰击民军，乡民无辜冤死者，难以数计。天怒人怨，鬼哭神号，凡有血气者，莫不痛恨，非因意见不齐抵抗民军者可比。暴戾

如此，实属惨无人理。此人道之罪人也。王遇甲等均系南人，以南人而惨戮南人，乡里目为戾气，妇孺不共戴天。试问遇甲等得志快杀之时，亦曾有南人本是一家之感否？此乡党之罪人也。南北未经统一以前，尚云意见歧异，及至共和宣布以后，王遇甲等对于南方代表谩诋共和，故意挑起南北恶感，其意何居？此共和之罪人也。以上三罪。有一即不能容于民国，何况三罪俱备，南方各界，咸称罪大恶极，应行宣布死刑。如仍旧委用，将何以对服生者，安慰死者？窃恐意外之虞，不久发现，谁将任其咎？贵会既云以国家为先提，自应为民除害，今反为少数恶人辩护，使数万万人之人心仍不能安，南方之危局仍不能保，窃惑焉。贵会之名，既为全国军界统一会，则南方军界应有发言之权，况四凶均属南人，事实在南，见闻确实，万无诬蔑之理。请速将王遇甲等逐出军界统一会，不然南方军界决不承认贵会。

[13]

对此要求，北方军界显然难以接受，因为照此办法，几乎无人不在可以追究之列。而在光复地区，锄奸的行动依然延续。在四川，4月14日，泸州川南总司令署暨同盟会同人致电已经解散去职的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及成都都督府、重庆镇抚府，称：“荣县谢烈士奉琦以伪清光绪三十二年受中山先生委任，运动改革，倡议川南，事泄江安，意图再举。殊有伪党人汪霖熏心利禄，效忠满奴，勾结清兵，搜捕烈士，致谢君就义叙南。同人痛心疾首，誓诛汪贼。汪自知不保，远窜滇南。同人复推周启圣、张谷两君赴滇密谋暗杀，事皆不济。今幸革命成功，天夺汪贼之魄，为周、张两君诱解回泸。昨同人大开议会追悼烈士，并公决处汪贼以死刑，用除汉奸而昭炯戒。”^[14]该电还同时发给上海大共和报馆、天津民意报馆，要求登诸报端，实际上就是要昭告往昔的汉奸，不会因为政局变化就能轻易地逍遥法外。

南北统一后，追究汉奸罪行的行动在一些地方仍未结束。在湖南，“宜章李楷平当去岁反正时，曾为敌人眼线，陷害起义诸志士，即经该县士绅稟请缉拿，现已拿获报案。昨由谭都督令行司法司提省究办，以儆奸邪”^[15]。在湖北，“黎副总统因去岁南北交战时，汉口正金银行买办景维行私自介绍洋商潜卖军火于北军，致伤毙三楚军民无数，实属可恶。爰查照前南京内务部通令，凡与民军抵抗者，无论何项人等，应将其财产收没归公，将景维行所有汉大舞台戏园及左右房屋数十栋、地皮数千方，派员调查确实，一律充公。景闻信当将

各项契约交于美律师福祿士，假作抵押，欲藉洋势抵抗。业经警视厅清理公产局派员在福处验明契约，呈请都督核办在案”^[16]。

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语境转移之下，满奴汉奸的意涵适用性明显降低，民贼汉奸的卖国指向逐渐凸显。由于国家的主体由皇帝变为国民，与清中叶以前的汉奸多指与朝廷为敌不同，转义后的汉奸主要是指与民为敌。

不过，作为具有最大公约的政治词汇，如何或由谁来判断是否与民为敌，往往只能凭借权力的大小或声音的强弱。汉奸被继续作为指斥贬低任何敌手对方的方便名词，有着生死牌似的政治效用，因而往往其具体意涵已不明显，可是杀伤力却依然强大。指为汉奸，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有汉奸的实事，而是根本剥夺其发言辩解的权力，百口莫辩就算达到目的。

他人姑且不论，从身为清季言论界巨子的梁启超也感到压力山大，就可见汉奸之名的杀伤力之强。因共和革命而失势的保皇党定策利用矛盾，蛰伏待机，仍与革命党严重冲突。1912年8月中旬，罗癭公致函梁启超，谈及与革命党的恶斗：

同盟之恶公，固无待言，其中欲竭力与公接近者，仅刘揆一人，彼中诋为汉奸，日来同盟各报，均登搜罗某某棍编证据。近日各方面对公均表同情，渠等积愤，无所泄，乃施毒手于佛苏，连日丑诋皆及公，盖忌公归也。及黎公为佛事电来，渠报（《国风》《国光》）谓黎为不要脸之狗，谓共和党为康梁党，表面为黎，欲推翻共和，规复帝政等语。^[17]

虽然南北统一后民党内部的分歧日益显现，而且梁启超开始有融入民国的趋向，但要公开与梁启超交好，仍然不得不忌惮汉奸的污名。

五族共和的实现，使得反满的汉奸语境迅速淡出，但是“汉奸”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1912年10月2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生戎肇敏、高钰阅《朝日新闻》，见有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总统铁道政策的消息，不胜骇异，遍询同人，无知其事者，遂开同窗会于本校，并邀请各校代表于次日开会于改盛馆，公决条件如下：一、联合京外各校，请驻日代表致电政府，声明《朝日新闻》所载9月29日所谓留学生

电，实非留学界之同意。二、致函上海报界，请登报声明。三、与东京各报交涉，要求更正。

尽管采取了善后措施，还是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和评论，《民意报》10月12日发表《留日学生之丧心病狂》的社论，以日本报载的9月29日留学生电为依据，予以抨击。留日学生觉得有违事实，辩解道：“二三汉奸致政府之电曰全体，东京各新闻所记亦曰全体，而《民意报》信之，怒骂全体，几视留日学生无一非朝鲜一进会李完九之徒，是视吾侪全体无一非卖国贼也。乌乎，中华卖国贼竟若是之多乎。且二三汉奸假全体名义致政府电，其政见虽闾巷小民亦知其荒谬，而谓留日学生举冥顽不灵如此乎。虽然，数千里之间阻，仅凭二三汉奸之伪电，一纸之日报，所记载与事实相悖，又何足怪。”

19日，留日学界再集会于神田青年会，据报，9月29号于牛込東五軒町の清風亭，的确有湖北同乡集会，议程一为独立纪念，一为追悼湖北阵亡将士，并未涉及政事。“夫同时同地，必无两会并开之理。然则致政府之电，非二三汉奸受外人之唆使，必外人狡焉以谋我也。”所以第一高等、高等师范、高等工业、高等商业、志成学校全体学生发出公启，祈报界诸公声明更正。^[18]

于是，“汉奸”再度转身，又回到指称卖国贼的原义。只是这一次的国，不再是满人的大清国，而是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了。从内争到御外，爱国与卖国的转折之间，国的人、地涵盖都有大幅度扩张。原来用于包罗万象的汉已经显得狭隘，不得不让位于内涵外延更加宽泛因而容量更大的中华，汉奸所背叛出卖的，已不仅仅是汉人或汉族的利益，汉奸已是与整个中华民族为敌了。

[1] 《升允致东省某统领书》，《盛京时报》1912年3月28日，第4版。

[2] 《陈炯明致孙中山等电》（1912年2月15日），桑兵主编、赵立彬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1卷（1895—191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80—481页。

[3] 梦幻：《论破坏共和之五大害》（续），《大公报》1912年4月22日，第2版，“言论”。

[4] 《民立报》1912年1月18日，第3页，“沪军政府电报”。

[5]程滄：《呈請大總統嚴懲荼毒人民之官吏文》《時報》1912年4月1日，第1版，“要件”。

[6]《申報》1912年9月23日，第3版，“時評一”。

[7]《民立報》1912年3月7日，第3頁，“南京電報”。

[8]《民立報》1912年3月11日，第6頁，“公電”。

[9]《皖省軍政治界電》，《申報》1912年3月16日，第2版，“公電”。聯名通電者的名銜為：“前江蘇參事會長、鐵血軍總司令范光啟、皖路局長朱艮涵、教育次長倪緯漢，參議院議員胡紹斌、凌毅、常恒芳，皖軍第一師長孫萬乘、營長郭梓青、三十五旅長龔振鵬、參謀王正蕃、副官鄭賡臣，第一軍中隊長陳章奇、團長趙雲龍、趙丹、營長闕鈞、朱子明、陳芝宣、毛保乾，衛戍屬官吳文龍、淮上軍帥長鄭芳荪、南京府知事方潛，留日學生劉天民、高蔭藻，廬州外交長王善達、皖實業司長凌濟安、交通部部长許世清、廬州中學監督李緒昌、前皖軍都督王天培。”

[10]《孟憲彝日記》（一），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161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411頁。

[11]《批軍諮府軍諮使王庚上書》，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9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頁。

[12]《皖江近事記·都督宴會部員》，《申報》1912年3月29日，第6版，“要聞二”。

[13]《南京軍界電》，《申報》1912年3月28日，第2版，“公電”。

[14]翠亨孫中山故居收存提供，黃彥、李伯新選編：《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後）》，第575—576頁。

[15]《瀟湘近聞錄·漢奸結果》，《申報》1912年6月4日，第6版，“要聞二”。

[16]《沒收漢奸財產之交涉》，《申報》1912年7月15日，第6版，“要聞二”。

[1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2—644页。是时徐佛苏主办的《国民公报》被革命派攻毁，徐氏被殴伤，信中所谓“佛事”，即指此案。

[18]《东京留学界致报馆俱进会函》，《申报》1912年11月5日，第7版，“来函”。

后记

本书是努力承接前贤、续写辛亥历史的第三本专书，与之前出版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及《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起，作为对清季民元重大历史转折重新审视的结果，同时构成尝试续写大历史的开端。

所谓大历史，并非长时段或全球史之类的大时空历史，而是一般通史所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尽管意在超越者总是喜欢批评这些关注带有成见，希望扩展关注的层面，并且试图将以往关注较少的层面嵌入大历史的叙述，可是除非撼动大历史的基本架构，否则借鉴别科的钩沉填空补白，或许能够热闹一时，恐怕终究难以为大历史所充分容纳。应当承认，前人构建大历史的叙事架构，固然也受到时代的制约，但就总体而言，的确抓住了主干大节。如果相关的各类大事要人在大历史的叙事中完全缺位，则大历史的书写势必更加偏颇。

不可否认，原有的大历史也存在遗漏偏颇和误读错解。这些偏误主要源于相互关联的两方面，其一，材料不足。今日可以看到并且使用的资料，较前人何止千百倍。尽管前人大都读过书，应用解读材料的能力较强，毕竟所见有限，限制了其能力发挥的程度。因而一些关键材料和事实的解读，会在所难免地发生一些错误。今人若能学习掌握前贤的能力，有效利用材料大幅度扩张的便利，则可以纠正错误，充实史事，使得大历史的叙述更加坚实可靠。其二，观念先行。中国近代史的构建，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才形成现在的体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史主要不是因为学理的需求，而是革命现实目的的需要，尤其是解释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任务、动力等等，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急于构建与众不同的体系，便充分利

用有限的资料，编辑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并勾勒出解释框架。

续写大历史，纠正种种影响大历史叙述准确性完整性的错漏，固然为应有之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材料大幅度扩充的方便，改变视角单一的局限，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材料，重现史事的错综复杂，使得历史画卷更加丰富多彩。

凡事皆有机缘。将近二十年前，胡绳武先生在一次会议期间私下问道：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用于中古最为恰当，用于晚近则材料太多，不堪重负。能够背得动，的确难能可贵。然而总体关怀和终极目标究竟何在？先生的谬赞，可以视为鞭策，而先生之问，在史学范围的答案便是续写大历史。只是这样的自我期许宜做不宜说。

其实，续写大历史的念头在研究庚子勤王时已经发轫，此事先是沿用成说，敷衍成文，发觉按照既往的架构叙事于材料及人事处处捉襟见肘，于是全盘推倒重来，将各类新旧材料梳理比勘，贯通一气，终于能够大体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相比之下，新说与旧解出入不小，由此悟到，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无论材料的应用还是立论的当否，不免较为粗疏，大有可以改进的空间余地。

续写大历史当然不能简单地沿袭旧说，但也不能只是枝枝节节地填空补白，或一味翻案，故意立异。古史辨式的解构，偏重破坏，套用范式的立论，则不切实际。续写旨在重现，一要以全部的材料和事实为依据，梳理贯通，安放到得其所，不能断章取义地自圆其说，立说无数，似是而非。二要将所有后来的架构视为自然演进，防止阴谋论的放任，探寻历史本事、各种成说及重现之间的演化。重现庚子勤王的历史，得益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与陈寅恪等人倡行的融合长编考异及域外比较研究之法暗合，贯通所有新旧材料和史事，同步实现解构与重现。之所以不用重构，是因为历史研究要契合历史人事的本相本意，而重构的立论取证做法之下的自圆其说，容易流于似是而非，批评他人不无道理，一家之言却依然漏洞百出，终究于事无补。

大历史的续写，与一般另起炉灶编撰通史有所不同。后者主要考虑的是体例架构设置是否得当，能否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安放于适当之处，不可能完全在爬梳资料的基础上重现史事，更不可能处处推陈出新。续写大历史则是专题研究的变相，既要详人所略，阙疑

取舍，又要大致涵盖整体，使之焕然一新，不能只是补偏救弊。而这样的新，并非“我认为”之类见仁见智的相由心生，要尽可能贴近历史的本相，尽可能使历史认识与“原来如此”高度吻合。

将续写大历史付诸实现的直接因缘，则是辛亥百年纪念即将来临。其时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已经完稿，随即着手布置《孙中山史事编年》的编撰。因为前人着力已多，不少师友质疑此事的学术价值尚有几何。为了测试空间余地究竟还有多大，用一个月时间翻阅梳理了1911、1912两年的所有书刊报档，不仅看出不少可以写专题论文的问题，还显露出一本辛亥革命专书的轮廓。各专题论文陆续发表，结成专书时发觉篇幅太大，且内容呈现两个相互关联又明显有别的部分，一则着重探讨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风云变幻进程中的各方博弈，以及接受清朝阁府部院和建制民国政权机构的权力消长，一则探寻共和与汉奸概念的渊源流变以及由此展开的历史事实，所以顺其自然，分成两本专书。

《走进共和》的撰写，旨趣有所不同。阅读报纸和日记，可以看到大量为大历史的叙述所难以容纳的人事，大历史为后人的概括总结，即便努力贴近本事，也不得不有所取舍侧重，无法将形形色色亲历者的耳闻目睹统统囊括。即使大历史上重要浓墨重彩表现的人物，也很难面面俱到地将其亲身经历的所有事情以及事情的各个层面详细展现出来。说到底，大历史仍然是后人的认识，而非历史的事实，尤其不是全部的历史事实。将各个有迹可循、有据可查的当事人的亲历、心路展现出来，作为与大历史相辅相成的补充，应有其独特的价值。与重写大历史相配合，这样的小历史有两个系列，一是大转折时代，主要是近代中国的几个政权更替时期，一是关键年代，如戊戌、庚子、洪宪、五四等等，与大转折相比，虽然并非天翻地覆，却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甚至是划时代的作用。

大转折时代和关键年代的小历史，旨在与续写大历史相互配合，补充大历史的不足，而非印证大历史的情节。同时，小历史也不是近代以来新史学所倡导的民史，用以改变精英的历史。不过，小历史的撰写不能脱离大历史，没有续写大历史的史料史事联系贯通的基础，不可能恰当展现小历史。若以一般教科书和通史、乃至所谓公认研究的成果及其取法为知识背景，很难对小历史的认识解读入木三分。简单模仿之作，只能流于不知所然的表面文章。

按照现在通行的分科专门观念，《旭日残阳》为政治史，《走进共和》为社会文化史，而本书为思想概念史。只是这样的分别绝非在下的初衷，历史上的人事原为一体，而分科专门是后人的主观，史事不会依照后来的观念发生及衍化，因此，研究历史上的实事，只有放弃画地为牢似的照搬套用后来的分科专门观念和做法，才能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只不过同一史事有各种层面，而研究论著各有主题，不能面面俱到，必须各有侧重。因此，续写大历史应当接续前人研究，打通新旧材料，尽可能深究各种专题，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既知所阙疑，又详人所略。若是拘泥于分科专门，则认识不能贯通，容易流于割裂肢解历史的偏差。有鉴于此，续写大历史不能简单地用通史或教科书的方式呈现，盘旋于浮泛表浅的框架范式，见仁见智的自圆其说。如果只是提出一堆各说各话的观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提升毫无裨益。

三本专书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共同的目标则是从不同层面努力深化对辛亥民元历史大变动的认识。贯通各类新旧材料，订正重大史事的错误，澄清学界坊间的各种彼此歧异的说法，避免随心所欲甚至别有用心的解读，扩展视野，关注以往大历史较为忽视的人事。三者鼎足而立，相互参看，从帝制到共和历史转折的全景详情可以大体重现，认识可望更进一步。

史无定法，主题侧重不同，做法取径也要随之变化。那种不知因势而变的奥妙，凡事均以自己的定见为标准衡鉴，势必陷入井底之蛙的执念成见。《走进共和》出版后，有“乌有生”匿名批评。由于历来关于拙著的评议，公开刊载的未免隔靴搔痒，或是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陈言，尤其是一些强加己意于我的所谓意见，只要读完全文以及看过所有相关著述，便不难发现不过是各自的揣度臆想，甚至别有用心的曲解，真正深获吾心的，主要来自私函或面谈，所以一般不大留意。经门下提示，发来看过，觉得仅仅认对了一个字，还是撰写民初遗老历史者已经从其他书刊征引过，其余则非但一无可取，而且人已讲到“习相远”，自己还在“人之初”盘旋，甚至以己度人，以不知为知，不知其陋，不能藏拙，适以曝短，不值一晒。最典型如断言民间劝善书中语出自《增广贤文》，而自高身份者一般不会以俚语俗书为据，茫然于银钱问题绝非金融货币可以范围（其事苦思冥想二十年才从两位高人的研究把握大概），麻木于黄沉日记出自真正乡绅之手的罕见等等。此类事自己不能发现，并不足怪，已被勘破却仍然懵懂，非庸即妄。虽然迫于生计，能力不足又急于求成，其情可悯，即

便求名心切，也要取法得当，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难以走上治学大道，修成正果。

上述大意，当时即对门下大略讲过，多数不明就里；而几年测试下来，学界间中难免一二受蒙蔽者，随声附和，可见仍有混淆视听的效果。本来对于此类距离平等对话相差甚远的评议从不回应，只是作为自己及他者学术功力和判断品鉴力的检验，必要时再版之际分别于各处有所交代，目的也不是回应，而是为了防止受蒙蔽者惑于其词，导致吠影吠声而不自觉的尴尬，甚至误人子弟，须知学问之事决不能作无知无畏的门外文谈或“认认真真”的表面文章，来者读书必须前后左右验证，不能一味跟着感觉走，这是治学的铁律。

征引文献

报刊

《爱国报》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北洋法政学报》

《大公报》

《大共和日报》

《大陆报》

《东邦协会会报》

《东方杂志》

《洞庭波》

《读书月刊》

《法政粹编》

《法政浅说报》

《法政杂志》

《翻译世界》

《复报》

《广益丛报》

《国风报》

《国民日报汇编》

《汉声》

《汉帜》

《河南》

《湖北学生界》

《湖南官报》

《江苏》

《经济丛编》

《经世文潮》

《警钟日报》

《临时政府公报》

《民报》

《民国报》

《民立报》

《南洋总汇新报》

《清议报》

《申报》

《神州日报》

《盛京时报》

《时报》

《时事采新汇选》

《时事新报》

《时务报》

《实学报》

《顺天时报》

《四川教育官报》

《台湾协会会报》

《天铎报》

《万国公报》

《湘报》

《新民丛报》

《新世界学报》

《新闻报》

《新小说》

《新译界》

《新中华》

《选报》

《学海》

《译书汇编》

《庸言》

《游学译编》

《云南》

《政法学报》

《政论》

《政艺通报》

《政治官报》

《直隶教育杂志》

《中国革命记》

《中国新报》

《中外日报》

《中兴日报》

书籍论文

1. 《孟宪彝日记》（一），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2. 《孙文和华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京：汲古书院，1999年版。中文版1997年由神戸孙中山纪念会印刷，非卖品。
3. 张枏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
4. 《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5.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
6.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上海，1903年版。
7. 白纯：《鸦片战争前后的汉奸问题初探》，《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8. 保廷梁：《大清宪法论·国权主体》，上海：模范书局、江左书林，1910年版。
9.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1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1. 陈金英：《走向共和——论1903—1917共和思想在中国的确立》，2004年武汉大学硕士论文。
12. 陈理、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3. 陈力卫：《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以“民主”与“共和”为例》，《东亚观念史集刊》创刊号，2011年；《日语研究》第九辑，2014年。

14.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1928年1月5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6. 崔隽：《想象“共和”—republic在近代的汉译定名历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论文2014年。

17. 翠亨孙中山故居收存提供，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 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

20. 杜维运、陈景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

2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2. [日]葛冈信虎讲义，马毓福等编次：《法制大意》，湖北游学日本师范生编：《师范讲义》第3册，湖北教育部1901年初版。

23.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7.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8. [日]笈克彦讲述，陈时夏编辑：《国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

29.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0.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1. 李冬木、佐藤亘、吉田富夫《帝国共和：从“清皇”到“大皇帝”——关于“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文史哲》2016年第1期。

32. 李恭忠：《晚清的“共和”表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33. 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史学集刊》第5期，2009年9月。

3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丁酉重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3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36.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7. 阎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39. [日]美濃部達吉著、金泯澜编译：《国法学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

40. 莫永明：《陶骏保案与江浙联军内部的矛盾》，《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

4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2. 潘光哲：《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创发与建设（1845—1895）》，《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1949）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研院”近代史所2011年。

43.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4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45.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6. 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1卷（1895—191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7. 苏舆著，胡如虹编：《苏舆集·辛亥溅泪集卷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8. 孙宝瑄著：《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9.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50.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51. 唐文权编：《雷铁厓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52.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53. 王娇娇：《“共和”的简释——近代中国人是如何接受“共和”观念的》，2007年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54. 王柯：《“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二十一世纪》2004年第6号。

55. 王柯：《“汉奸”考：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岩波书店《思想》第981期。

56. 王瑞成：《晚清的基点——1840—1843年的汉奸恐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7.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8. 王学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作者辨》，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59. 吴密：《“汉奸”考辩》，《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0. 吴密：《民族和国家的边缘——清代“汉奸”名实关系及其变迁》，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61. 吴密：《清代官书档案所见汉奸一词指称及其变化》，《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

62. 吴密：《谁是“汉奸”》，《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

63.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左松涛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5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

64. [日]狭間直樹：《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共和”国の诞生》
（《孙文研究》第51号，2012年11月。

65. [日]川尻文彦：《“民主”与democracy—中日之间的“概念”关联与中国近代思想》，《新史学》第二卷，2008年。

66. [日]狭間直樹：《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共和”思想の形成》，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編集委員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东京，岩波书店发行2012年。

67. [日]狭間直樹：《关于〈东邦协会会报〉刊登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文研究》第18号，1995年。

68. [日]狭間直樹：《关于〈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的若干考察——孙文访日初期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林家有、李明主编：《孙中山与世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69. [日]狭間直樹：《关于孙文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

70. [日]狭間直樹：《梁启超研究与“日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1997年9月。

71. 肖宏发：《对“史与论关系”争论问题的逻辑考察与反思》，《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72. 谢放：《戊戌前后国人对“民权”、“民主”的认识》，《二十一世纪》第65期，2011年。

73.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74. 熊元翰编辑：《国法学》，《法律丛书》第3期，安徽法学社1911年初版。

75. 徐宗立：《共和的法理——一项历史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76. 杨思机：《汉民族形成的指称与论争》，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2年。

77.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78.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79. 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80.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1. 章宗祥译：《国法学》，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版。

82. 赵波：《“虚君共和”说和辛亥年康梁一派的应变举措——新中国建设问题解析》，清华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83.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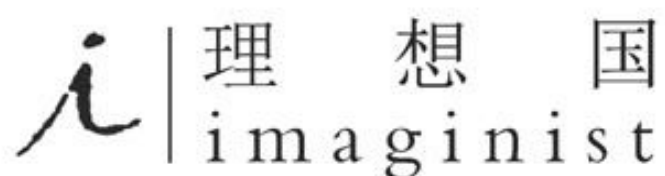
84.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85. 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

87.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88.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想象另一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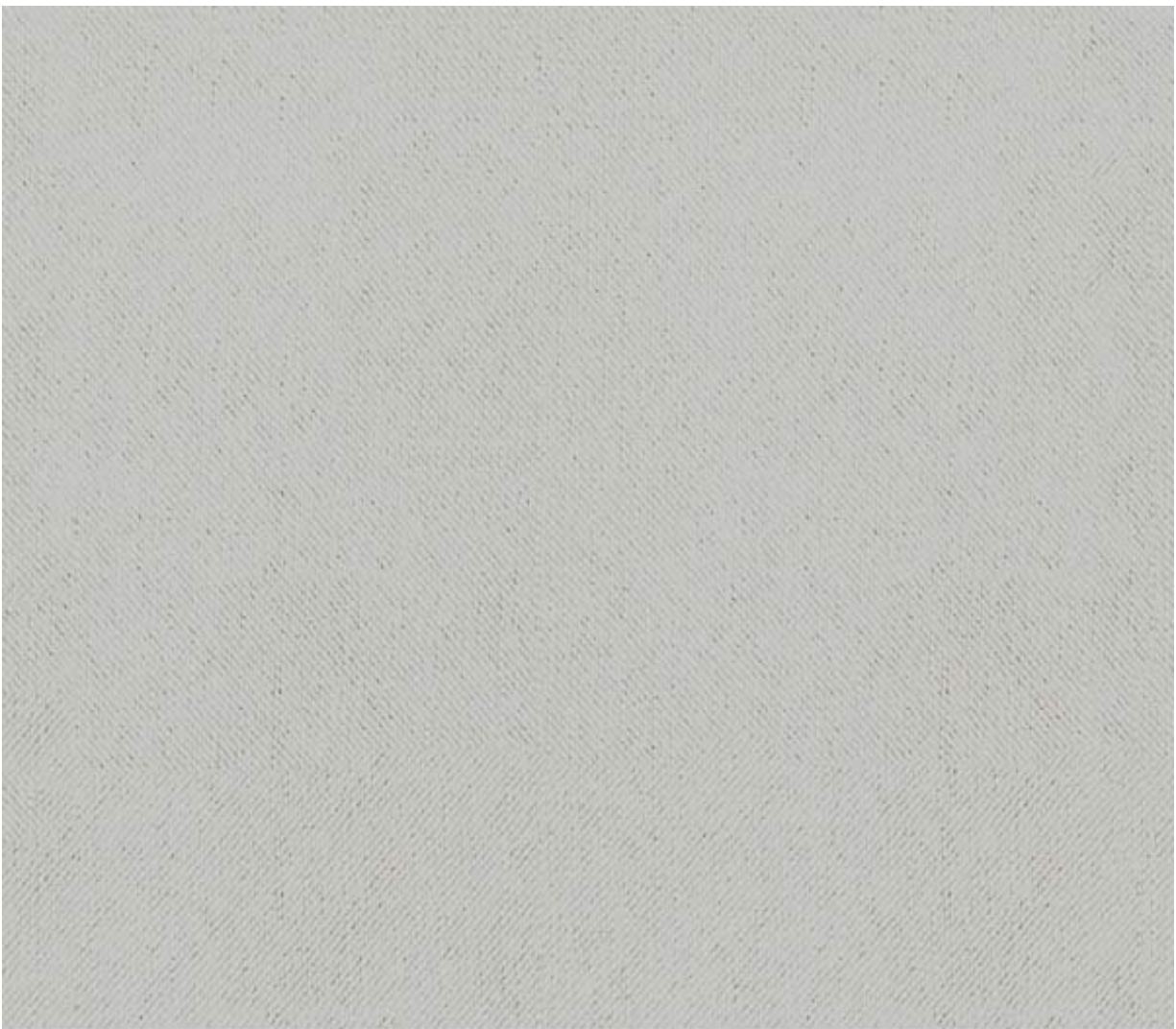
好文 影像 活动

共读 共赏 共享



手机扫码

发现更多内容



作为阅读者，应当积极调整阅读习惯，学会倾听历史的原声，不要把后来的认识与历史的事实相混淆，仔细体察领会文本传递出来的前入本意，进而看出由史家拼合连缀而成的历史图像是否适得其所。完整地倾听历史的原声，才能防止任意取舍史料以形成观点，理顺史论关系，让所有的材料与事实适得其所地回归时空原位，抛去那些稀奇古怪的翻案钩沉、刻板呆滞的说理套话，历史势将更加丰富多彩。



发现另一种可能

上架建议：历史、文集

ISBN 978-7-5598-2735-7



9 787559 827357 >

定价：78.00 元

旭日残阳

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桑兵 著

聚焦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国肇建
拆解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坛斗法
探讨由共和取代帝制的历史进程

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
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
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桑兵 著

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 桑兵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598-1072-4

I. ①旭… II. ①桑…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民国 IV. ①K25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018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张旖旎 罗丹妮

装帧设计：彭振威

内文制作：李丹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目录

CONTENTS

绪论：回到晚清再革命

- 一 渊源
- 二 承接
- 三 转身

提要

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 一 组织及成员
- 二 两面碰壁
- 三 南北议和的关键议案
- 四 袁世凯、唐绍仪的态度取向
- 五 取代国会的政制选项

列强与南北和议的政争

- 一 各怀鬼胎的不干涉
- 二 英国变脸 日本无奈
- 三 向亲贵施压

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

- 一 国民会议的南北之争
- 二 和谈陷入绝境
- 三 舆情纷歧与风波再起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 一 重判《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
- 二 从退位到公决
- 三 掩人耳目的双簧
- 四 袁世凯逼宫

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

- 一 另立临时政府
- 二 再以国民会议障眼
- 三 回归原轨
- 四 退位与致政

五 争议仍未结束
接收清朝旧署

- 一 由新旧而南北
- 二 接收与合组
- 三 办理交接
- 四 一副空架子

创建民国新阁

- 一 以南北争新旧
- 二 兼容新进与故旧
- 三 专业化取向
- 四 舆论与申论

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 一 逊清皇室的欢迎活动
- 二 孙中山的满蒙危机应对
- 三 清朝皇室的自我认同

征引文献

绪论：回到晚清再革命

一 渊源

个人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与辛亥革命研究有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由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领衔的《辛亥革命史》编撰组一行人来成都开会调研，川大历史系邀请其中几位学者来校做学术演讲。恰逢改革开放不久，很少有正式的学术演讲，记得首场主讲人便是开沅师，讲演的内容是关于“同盟会成立与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等小团体的关系”。也许当时开沅师已有成稿，讲起来充满自信，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连对辛亥革命史事知之不多的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后来听过的学术演讲不少，说到印象深刻，还属这一次难以磨灭。

其时川大历史系部分恢复“文革”前的专门化教学模式，力求尽快将学生引入研究状态，因此毕业论文确定的时间相当早。我对中国近代史兴趣较大，又与擅长保路运动史的隗瀛涛老师有些联系，于是在定选题的双向选择中，挑了辛亥革命的题目，并以隗老师作为指导教师。论文从搜集资料到撰写进行得相当顺利，基本没有走什么弯路，按照隗老师的意见修改了两次，便基本得到肯定。这次还算成功的尝试进一步增强了我学习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的意愿。

毕业后考到中山大学随陈锡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陈先生的专长是孙中山研究，而孙中山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辛亥革命研究密不可分。中南地区的辛亥革命研究会，中山大学也是重要团体会员。中大图书馆收藏的晚清期刊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亦不多见，其中相当部分的卷期超出各种篇目索引、期刊介绍。仔细阅读这些书

刊，开始对清季留日学生的问题感到兴趣，稍后又扩大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和一般知识人的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可以深入探讨的题目。后来这些想法大都一一落实，撰写而成的论文，陆续发表后，收入结集的各部专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山大学，硕士也享有入库看书的特权，每日进馆，遍阅包括旧平装书和线装古籍的所有中外文书籍，大开眼界，思路迅速开阔。其间无意中翻到一本1913年出版的英文书《龙旗消逝》（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London-New York-Toronto, 1913），记录陕西辛亥革命以及救援陕北受困传教士的历史，虽然其中所载图片有的已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选用，研究者却很少征引。尤其是升允在陕西独立之时曾经与革命军有所交接之事，为各种中文文献所未见。出于训练外文和深究史事的考虑，将其全部翻译成中文。可惜最近一次迁居过程中，遗失少量书籍文稿，这份译稿不幸在其中。另一份关于华兴会考证的长文草稿，也不见了踪影。

1981年，还在硕士二年时，有幸参加了长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倡行者主要是鉴于武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容量有限，希望为更多的后进提供机会。这一届以青年为主体的长沙会议，影响持续了几十年，如今各校不少研究骨干，仍是那次会议的代表。在三次革命高潮的架构依然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环境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研究领域，都没有出现这样对新进学人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学术会议。而后来举办的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与之相比似也相形见绌。究其详，因缘时会，以及辛亥革命研究在那一时期具有更强的内在张力，当为重要原因。我生也幸，躬逢斯会，忝列预流之列。

硕士学位论文最后选定以1905年以前的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题，是考虑到原来关于近代中国学生的认识，大都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留学生的研究虽然方兴未艾，却有资料的局限，不易形成前后内在联系的具体课题。国内学堂学生则刚好兼得两利。因为有了四川大学毕业论文的训练，收集资料、写出初稿不难，可是修改定稿却大费周章。材料太多，史事繁复，而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历史又很难将每个个体逐一陈述，如何叙事说理，而不是简单地铺陈罗列，对于初学者还是一大考验。在陈先生的指导和陈胜彝老师的具体点拨下，历时十月，

十易其稿，终于获得通过。经过这次历练，对于掌握历史论文的写作自觉上了一个台阶，对于辛亥时期的历史也有了深入一层的认识。

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一年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设了博士点，开沅师是首位由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通过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是首个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单位。我一方面预感随着教育学术的发展，系统完整的学位训练势将日显重要；另一方面，硕士论文只写了1905年以前部分，此后直到1912年清亡，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群体的人数更多，材料和史事更丰富，社会作用和影响也更大，若能在开沅师的指导下续完晚清国内学堂学生的研究，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同时也能将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向前拉长。

怀着这样的期待，抱着试试看的忐忑心情，向开沅师表达了希望入门执弟子礼的想法。由于硕士论文答辩时，开沅师是主席，知道底细，很快明确回复，欣然同意。于是来到武昌桂子山，师从开沅师，开始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其时开沅师正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事务繁忙，但是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同届的博士研究生共有四位，其他三位分别研究商会、袁世凯和护法运动，大体都在辛亥前后的各个层面，可以经常相互交流。另外，华中师大还有政治学和文献学的博士点，在读的几位也是好谈之士。我的兴趣广泛，常常和他们海阔天空地谈西马和上古生殖文化等等。因为每每吃饭时在阳台交谈，某日突发奇想，笑谈可以研究阳台进入中国的历史及其功能的演化。

为学不能满足已有，因而常常要有意识地为难自己，以求突破改变。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虽然是接着硕士论文的下限继续往下做，硕士论文也得到相当的肯定，可是并不希望仅仅做成硕士论文的简单放大或延续。那时中国的思想界相当活跃，相对滞后的史学界，也不甘成为“死学”，引进了五花八门的理论，用于解释历史问题。那些左冲右突的时髦尝试，大都拿着外来或别科的系统条理固有材料，如今看来不无幼稚肤浅之嫌，当时却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尤为所动。自己也不能免俗例外，阅读了从结构语言学到行为科学的各类书籍，试图有益于研究历史。不过，历史学的训练还是本能地具有约束作用，一是总想追根寻源，不肯断章取义，二是不愿机械套用，尤其是不愿轻易用于表述，而是努力尝试在研究阶段运用相关原理方法解读史料史事。因此，虽然达不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如今看来还不至

于太过令人汗颜。而且经过一轮漫山跑马，倒是对历史为综合的学问不宜分科有所体验。

二 承接

开沅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家，尤其以辛亥革命史见长，尽管后来另辟教会大学史等崭新的领域，对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始终挂怀。还在辛亥革命研究如日中天之时，开沅师已经开始思考进一步推进提升的取径办法，并多次在学术报告中重点提示。大体而言，其取向包括相辅相成的两方面：一是要扩展辛亥革命研究的视野和方面，如加强对官绅商学等社会群体的研究，并着重指出应当大力研究作为革命对立面的清王朝；二是可以暂时跳出辛亥革命的范围，前后左右研究晚清民国史的各个时段层面，在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大幅度深化的基础上，将所获成果经验再转而应用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以期能够厚积薄发，反哺辛亥革命史，使后者提升到新的境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开沅师身体力行，组织力量，很早就开始着手编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其中英国档案有关辛亥革命部分的翻译。其时英国蓝皮书的相关部分已经翻译出版，两相比较，发觉后者往往于关键部分有所删减，以维护英国的形象。从而意识到辛亥革命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也体察到比较不同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

时间过去三十年，开沅师倡导的第一取向，在他的带领下取得显著的进展，而第二取向，恐怕有些不如人意。离开辛亥革命，多数学人向着各自心中崭新的领域披荆斩棘，一路狂奔，与初衷渐行渐远，好像不再打算回头，而且也回不来了。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和国内的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相继解散，虽然原因各异，却反映了辛亥革命史已经从显学退隐，和孙中山研究相似，日渐成了逢五逢十纪念史学的一部分。

出现这样的情形，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只是大势的当否，尚有可议。近年来，与原来中国现代史合并称为中国近代史的百余年历史的研究，呈现时段和层面不断下移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因素，无非是下列各项：其一，域外研究取向的带动。一方面，思想史、政治史、外交史等传统领域遇冷，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等等日

新月异。其二，创新填空的驱动。本来所有的人文研究都必须在前人基础上再进一步，否则就是废话，还有抄袭之嫌，刻意要求，意味着可以沿袭陈说，反之，则希望用前人未见材料研究前人没有做过的问题。其三，各种新材料的大量发现，不仅推动了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而且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四，已经前人研究过的部分难度较大，不易下手，难以超越，开辟新途则看似容易达成突破前人的目标。其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开放，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域之外的时段几乎可以同时满足上述所有条件，因而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

平心而论，中国近代史各个领域，很难说哪一部分已经研究到了穷尽的程度，无法继续深入扩展，可以束之高阁。与相对成熟的古代史相比，近代史更加显得薄弱甚至粗疏。中国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开始研究者较少，且多从其他方面转入，有些研究者的素质和意识略受限制。后来虽然人数迅猛增加，却又有趋易避难之嫌。在一段时期里，研究历史被以找好工作为目的的学子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而不得不读历史的人当中，选择中国近代史的原因有的居然是因为古汉语不好，不能选古代史，外语不好，不能选世界史。其实治近代史必须沟通古今中外，既要古汉语好，又要多种外语能力。加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原来选择性较明显，架构较为固定，禁忌和顾忌较多，许多重要的人与事，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更加令人头痛的是，材料太多，难以遍览，缩短战线，则容易偏狭。如何取得平衡，实非易事。可以说，治近代史其实是对学人天赋功力的极大考验。

所谓近代中国是史料大发现的年代，原来主要是指古代史料的发现远过于历代。至于近代史，除少数例外，一般不在学人的关注之列。古代史的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已经出现一些流弊，引起学界的警惕和批评。其中之一就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有时甚至错将常见书当作秘籍，遭到老辈的讥笑。而近代史料极大丰富，研究工作起步又较晚，未经前人过目的材料和较少着手的领域方面较多，学人受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之说的误导，一味披荆斩棘，而自诩填补空白。其实拓荒开垦形同刀耕火种，园艺式的深耕细作才是走出粗放时代的必由之路。

治史要想精益求精，必须专精与博通相济。前人披荆斩棘，垦荒拓殖，来者理应在其奠定的基础上反复耕耘，才能结出硕果。如果只是不断开荒，反倒很难走出蛮荒时代。前人尤其是前辈大家的工作，

往往抓住本源主干，如大事要人与文物制度。要想超越，应该首先能够接续其研究，然后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是一味扩张版图，不能接续既有事业，很可能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应当学习借鉴古代史大家的治学良法，根据晚近史材料极大丰富的特点，加以调适，充分彰显其潜力。否则连接也接不住，遑论超越？而深耕细作不是划分畛域，株守一隅。专家的通论，充其量不过是横通。

治学之道，应当先因而后创，接着做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要想创新，首先必须接得住。开沅师学术视野开阔，涉足的时段和方面甚多，其中尤以辛亥革命史研究最为人所称道。真正的耕耘者其实最能体察所开拓领域的潜力和趋向，他晚年仍一直将新编辛亥革命史资料作为重要事业，除了了却心愿，恐怕还有对于来者的期待。

近年来，有意承接陈锡祺先生的孙中山研究和开沅师的辛亥革命研究。这两个领域从来关系密切，同时并进，可以相得益彰。关于孙中山研究，陆续主持编辑编撰了《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正在编撰《孙中山纪念编年》和《孙中山图像编年史》。关于辛亥革命，从大小历史的不同视角，分别撰写了三本专书。此外正在主持编撰包括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纪念在内的民国重大纪念编年。努力的目标在于，搜集、整理各类新旧史料，深入探究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利用亲历者的日记，追寻近代中国政权鼎革之际各色人等的心路历程，作为重写大历史和呈现小历史的开篇，同时在整体联系的脉络之中，展现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历史枢纽作用，使得推进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与扩展深化整个近现代历史研究（诸如晚清史、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历史以及同时代形形色色的人事）相辅相成。

三 转身

民初乱象横生，社会动荡，康有为幸灾乐祸，将辛亥年撰写的那些自认为奇思妙想却不合时宜的文章汇编成《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的小册子，以显示其有先见之明。而一般民众身陷战乱危局，也常常抱怨早知如此何必革命。只是这样针对时势而发的怨言，并不能当成怀念清朝的证据，若是当真回到晚清，他们大概还是会毅然决然发动革命的。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而“辛亥革命”或“辛亥革命史”的说法，则是事件还在进行之际就已经出现。武昌起事后，上海各大报纸对南北战事的胜负极为关注，纷纷开辟专栏，予以重点报道。1911年10月15日起，《神州日报》关于武汉战事的报道，除了延续使用“鄂乱”“湖北乱事”等指称，也明确说是“革命”，甚至出现每天固定地以“辛亥湖北革命史”为名目的专题报道。^[1]随着形势的发展，10月26日，《神州日报》又将该专题更名为“辛亥中国革命史”。1911年10月27日，《时事新报》也将原来连续14天的专题报道“武昌乱事纪”改题“中国革命史”^[2]，稍后又以期刊形式编辑出版《中国革命记》。由渤海寿臣编辑，五族民报社1912年6月出版，汇编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各报关于革命报道的专书，书名就叫《辛亥革命始末记》。或称该书以及同年由“草莽余生”（廖少游，又名宇春）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为最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实则这一概念很可能源自《神州日报》的专栏，只不过事件进行中“中国”被凸显，时过境迁，时间的分别更受重视。

能够接得住或是承接得当，须有一定的条件，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就此而论，开沅师当年提出的扩展范围或暂时跳出，确是远见卓识。承接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这类前人成果相当丰富的老题目，并且希望由此开始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得益于三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其一，文献资料的大规模出版；其二，晚清史等前后左右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其三，学习和借鉴近代学问大家治史的取径和方法。

治史理应后来居上，不创新就形同废词，而根本的凭借是史料掌握的多寡和理解的深浅。套用一句流行语，研究历史光有材料是不够的，但没有材料则是万万不行的。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学术界出版界的自觉，各种历史文献被大规模编辑出版，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其数量远远超过上个世纪的总和。包括清史工程在内的多种大型资料出版以及网络资源的迅速膨胀，使得相关研究的取材较以往大为便利。虽然一味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容易偏蔽，可是没有新材料仅就旧材料反复解释，更加危险。况且，这些公之于世的文献，未必是尘封已久或躲在深闺，但除了少数机缘巧合者，相当多的部分接触利用可谓困难重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上面，久而久之，容易误以为看得到比读得懂更加重要。治史应以平等眼光看待一切材料，并将新旧材料融会贯通，进而比较不同的材料以近真且得其头绪。在大量文献容易利用的基础上，可以使读人所常见之书说人所不常说之话的境界更上层楼。

就本书所及范围而论，开沅师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以及《袁世凯全集》《赵凤昌藏札》和多种重要的日记文集报刊，都在其列。尽管这些新编新出文献未必全是新问世，可是经过整理编排，对于在原有时空位置中还原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大为便利。即便是影印出版，利用起来也极为方便。将所有新旧文献依时排列，大体能够一一对应，不仅可以相互比勘印证，近真求实，而且能够把握来龙去脉，进而体察解释背后错综复杂的联系。治史能够得到这样的典型案例和完整材料，可谓三生有幸。得此良机，全都仰仗前贤锲而不舍的努力。历史研究，若是不鼓励资料的编辑整理，一味要求推陈出新，只能是南辕北辙。

史料的大规模出版之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直接促进作用最大的，当属晚清史研究的显著进展。治史是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专精与博通互为支撑，因此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观天。一味株守一隅，专攻一点，不及其余，做成打洞式的学问，难免偏蔽。个人的学术眼界如此，一个领域或方向的研究态势同样如此。学术史上，高明者大都无门无派，无招无式，即便有所渊源，也要竭力超越，穷其变化。否则，画地为牢，还以固陋为独门奇技，岂不贻笑大方。

晚清史与辛亥革命史，时段上高度重合，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一而二之事。开沅师最为识者称道的，恰是《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这类侧重晚清史的论著，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年代，这样别开生面的研究的

确令人耳目一新。近年来，晚清史尤其是戊戌至清亡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诸多方面的成果明显较前深入拓展。尤其是制度和人事问题，已经开始进入精细化的境界。或以相关研究者人数和发表论著数量的减少作为凭据，认为晚清史研究相对于其他领域还处于滞后状态。其实，学术研究的高下，非但不能以数量多少为断，而且从之者众的热闹，往往是肤泛浅显的表征。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和论著数量早已超过其他各个历史学分支，可是其水准和地位一直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学问之事，往往喧闹的热潮过后，才能渐入佳境。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人当中，不乏训练和天分较好、素质较高、性情相宜、沉潜好学、耐得住寂寞的读书种子，正好适应时势的需求，进行精深的探讨。经过学人们不懈的努力，晚清史研究的水准整体大幅度提升，与专人和论著的减少适成反比。换言之，粗疏表浅的不入流做法，由于对清朝的体制人事认识大为深入，为重新探究反清一面的言行提供了重要参照和比较依据，单就革命势力一面立论的态度方式相应地随之调整，这就为深化和拓展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时期的历史进程研究，形成内在驱动力。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其发端又伴随着种种其他因素，预设前提的态度、粗放的研究方式以及随时而转的跟风趋时取向，严重影响了研究的格局和水平。在这方面，有必要学习古代史大家的治学经验，努力掌握其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应用于史料极大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尤其值得用心揣摩。“长编”不仅仅是资料排序或编年的初稿，也不像梁启超所说取材容易编排不难，既要在整体脉络中展现前后左右的联系，又要呈现比较不同史料以近真的取舍过程。这不但有助于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观念先行任意取证的偏蔽，以及事实未明急于说理的通病，更能强有力推动进一步夯实基础，垫高平台，使良法与材料相辅相成，发挥更大的效用，进而衍生发展出良法的变体甚至生成变相的新法。

就个人而言，二十余年来进行的庚子勤王、孙中山、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等方面的研究，对于重新接续辛亥革命研究具有直接的支撑作用，其效应相当显著。

着手庚子勤王的研究，其实是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和撰写孙中山传记的副产品，按照长编考异之法将所有资料顺序编排，比较近

真，得其头绪，发觉原来的解读几乎完全错误，不能将所有材料史事安放到得其所哉的位置。于是拨开迷雾，从头梳理，渐渐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研究，为集众的工作，参与者数十人，历时二十年，从最初隐约朦胧的雾里看花，到来龙去脉，胸有成竹，在中学、西学和东学的架构下，依据材料将人事放回原有的时空位置，将思想还原为历史，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此番重回辛亥革命的努力，前后共得50余万字，分成两本专书，其中《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基本运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的成法，另一本则为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的挪移。

曾几何时，凡事都好套用时代与阶级烙印的说词，细想也并非毫无道理。胡适指钱穆、张其昀等人是未出国门的苦学者，部分原因是说他们保留旧观念较多，不能如自己改得彻底。胡适的思想是否彻底，见仁见智，但是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息活动，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不易跳出思维的定势。欧洲走出中世纪，尚且如此。人生所受教育，都有时代痕迹，观念说话作文，难免留有印记。如今重读自己早年的作品，遣词用字就有显而易见的岁月流痕。而教书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一茬又一茬的青年学子流水而过，这些痕迹似乎辗转在他们身上依然显现。不禁慨叹历史教育的基本规则，仍有加强贯彻的必要。

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最能体现历史研究视角的相对性，将钱穆所说的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清晰分别，始终保持高度自觉。历史的相对性与所谓相对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主要是指历史亲历者立场态度地位条件各异，所记只能反映其有限的知，必须前后左右多角度全过程比较参看，才能察其大体，把握内涵外延。如此这般，有助于探究观念事物的渊源流变，防止以时代意见取代历史意见。

专题研究应立足于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所有与本专题有不同程度、层面联系的相关研究所达到的前沿为出发点。而专题研究各有视角取径，所谓先行研究并非综述，不必详细罗列所有相关论著，而又不能遗漏真有贡献之作。对此研究者必须胸有成竹。时下中国近现代史发表出版的论著虽多，却往往不能包含其先行研究，甚至不及先行研究。如果不加甄别地一概罗列，反而暴露继起者不能把握既有研究依时序后来居上的进展。那种罗列之后又滥加但书的征引，表明作者一方面误将先行研究视为自己的工役，另一方面则不知如何才能紧扣主题取舍得当。须知前人立论，各有视角，并非为自己打工，贡献

之外，便是留下的空间。更有甚者，每每罗列大批关联不大的论著，以炫其博识，却遗漏最重要的直接关联研究，因为若不如此其论著很可能变得毫无价值。这样故意毁尸灭迹，虽然屡屡瞒过不得要领的刊物和毫无章法的评审，却不能尽欺天下人。治学必须高度自律，心术不正，即使侥幸得逞于一时，等于将自己永远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来者的警示。

本书并非全面检讨后来所称辛亥革命时期的史事，而是聚焦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国肇建大约半年左右时间里，风起云涌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博弈角逐，也就是严格意义上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由此演出的一幕幕大戏，较荧屏银幕上的演义何止精彩百倍。现实比魔幻更加千奇百怪，丰富多彩，而历史本来的变幻莫测，让任何添油加醋都黯然失色。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坛过招，可谓棋逢对手，双方的出招拆解，明显较他人技高一筹。那些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指摘议论，自以为聪明过人，道德据高，其实是缺乏了解同情看不出门道的外行话。连过往的历史本相也会一叶障目，回到现场，恐怕难以成为真正的手，自然也就不可能领略双方的袖里乾坤。

自然界的旭日残阳，绝无交集的可能。而帝制终结与共和登台，却是相互交错。只不过夕阳余晖，尚有人恋恋不舍；旭日东升，还须穿云破雾。这与清帝退位和接收清朝何其相似。在革命进程中革命党一方是堂堂正正之师，其他各方留在历史画卷上的则多是侧面和背影，包括清帝黯然退位下台，最后一代王朝寿终正寝。清帝退位后，自己的作为与世的变化交相作用，使得清朝的帝后王公亲贵乃至满人，渐渐成了失语者，即使偶尔发声，也多是负面。这与退位之初各方的观感很有些不同。而导致二千年的帝制一朝覆亡进入共和时代，武力革命固然是主动，谈判桌上的折冲樽俎，台面下的密谋斗法和交易妥协，同样至关重要。关于清朝如何结束，民国如何建立，既有认识还存在不少盲点误区。由共和取代帝制，对于在皇权的灵光笼罩下生存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望着那些逐渐逝去的背影，总有一种正面相对、仔细审视的冲动。也许这就是史家的天性。

关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学界从来意见各异，比较具有共识的，就是推翻皇权，终结帝制。尽管对于中国是否需要皇帝，民初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尽管当今世界上依然保持皇权王权的国家不在少数，而且社会发展程度并不因此受限；尽管有些王权在社会矛盾不可

调和之际，的确起到了化解的作用，避免了流血冲突的惨剧；尽管王国的臣民们对帝王毕恭毕敬之余，王室成员的大事小情俨然已经成为重要商机，不仅可以怡情，而且能够发财；我还是庆幸辛亥中国不但将清帝赶下台，而且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制，让中国人从此不必继续再向帝王顶礼膜拜。

本书的取材，得到门下在读的博士生赵建民、邓华莹（现为中山大学副研究员）等人的帮助，尤其是前者，具有超强的搜寻和下载电子版书籍的能力。核对引文则由余露（现为岳麓书院助理教授）承担部分工作。提供过资料帮助的还有骆宝善、刘路生、左松涛等师友，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注释

[1] 《神州日报》1911年10月16日，第3版，“特别纪事”。

[2] 《中国革命史初纪》，《时事新报》1911年10月27日，第1张第3版，“特别纪事”。

提要

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关于杨度、汪精卫等人于辛亥民军、清军的战事陷入胶着时成立的国事共济会，学术界一直认为不得人心，因而短命，其组织、人员也语焉不详。仔细梳理比勘新旧各类相关资料，不仅能够求证国事共济会成员的身份作为以及该会之于辛亥政局鼎革的复杂关系，还能深入探究国民会议（大会）发生演化的脉络及其对近代中国政制建构的长远作用。国事共济会虽然为时短暂，所提出的国体政体主题，却牵动南北各方的敏感神经。而其主张的以国民会议（大会）公决形式解决重大国事纷争，不仅成为南北和谈纠结不已的一大关键，而且对民初以来中国政制架构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列强与南北和议的政争

南北议和第二、三次会议之间，袁世凯对于唐绍仪提出的通过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议案，迟迟未作答复。他虽然大权在握，但在亲贵、革军、尤其是列强的压力之下，必须竭力保持平衡，避免局面失控。列强本来赞成君主立宪的居多，随着局势的变化，英国逐渐倾向于接受由中国国民公决的共和制作为解决时局纷争的选项。与英国保持同盟关系的日本出于自身利害考量，坚决反对中国改行共和制，受制于英国和其他列强，不能单独采取干涉行动，被迫袖手旁观。袁世凯主要关注权力的归属而非国体政体的形式，他既要利用内外矛盾达成目的，同时也要因应时势的变化，调整实现政治诉求的具体方略。因而必须造成“非袁莫属”的时势，才能水到渠成地登上权

力的巅峰，从容施政。在外力干扰解除后，袁世凯转而逼迫清廷及亲贵就范。

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

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由于民军根本否定帝制，主张共和，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暗示清帝退位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其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

南北战事相持不下，为了避免因战祸延长给国家社会带来重大危机，促使清帝退位成为首要选项。这一场台前幕后牵涉中外南北各方

的政治博弈，孙中山和袁世凯可谓棋逢对手，彼此出招拆招，明显较相关者技高一筹。在清廷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袁世凯上下其手，一面化解君主党的反对压力，一面排除民党的限制约束。他力图借权力来自清帝逊让之名主导南北政府合并，使得延续清朝的法统与承接清朝的政府相辅相成。对于袁世凯的种种心计，孙中山虽然预判准确，针锋相对，却无力回天。通过清帝退位，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在实现帝制到共和的跨越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共存，同时也留下重大隐患，令当事人后来痛心疾首当初做出的妥协。

接收清朝旧署

和议告成，依法国务院成为统一民国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各方角力的关键。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共和政权，而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袁世凯变身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千方百计将前清的阁府部院当作民国的北方政府，以图偷梁换柱延续清朝的法统，抗拒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革命法统。民国从前清接下的不但是机构的烂摊子和财政的空架子，还有麻烦不断的大批旧员和层出不穷的人事纠纷。

创建民国新阁

既往研究中，民国肇建的具体过程主要关注军事冲突和政治角逐，至于国家行政权力机构如何建制，则语焉不详，甚至略而不论，而这对于理解民国的创建及其趋向至关重要。接收清朝旧署与建置民国新部的南北新旧之争相互纠葛，使得各种风潮层出不穷，新政府的成立及其运作举步维艰，作为责任内阁的国务院无形中大幅度被弱化和虚化。精心导演了这一幕开国大戏的袁世凯，看似渔翁得利的最大获益者，各方角力的结果，府一极坐大坐实，最终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民元8、9月间，孙中山北上在京活动21天，百忙之中，专门抽出4天与逊清皇室往还，不仅出席了清皇室的宴请，还分别拜访了前摄政王载沣、贝子溥伦、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并由后者及其所派人员陪同，游览了颐和园、南海、天坛等宫苑名胜。隆裕太后积极回应民国政府的呼吁，对孙中山来京表示欢迎，虽然带领宣统会见孙中山的初衷碍于皇族内部的反对未能实现，仍为招待孙中山提供仪驾之便。长期敌对的双方握手言欢，孙中山（包括黄兴）方面既是对清帝退位实现共和统一表达肯定和敬意，也是做出由反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以回应各方的质疑，使得满蒙回藏能够与汉人同心协力，以期实现合各地为一国、各族为一人的誓言。而在清室方面，虽然国体变更、失去统治地位未必心甘情愿，但是包括隆裕太后、摄政王以及参与招待孙中山的几位皇族内臣，的确有意信守协议和承诺，在民国政权下继续安享尊荣。为此，隆裕太后还从全族和宗庙陵寝的安危以及中国的安定着眼，扼制各地亲贵旧臣的图谋不轨。在京满人的满族同进会，则积极在民国政治架构里争取自己的权益。清皇室皇族乃至满人在作为征服者统治者和中国人之间必须二取其一，多数人宁可放弃前者而不愿失去后者，其表现在民初得到一般国民的普遍认可。这样的大势所趋，重要的动因在于晚清因应外强的压迫，清廷不得不撤藩建省，放弃内亚的藩部制而一律采取中华体制，同时逐渐弱化旗人的特性，使得旗民分治的界限日趋模糊。虽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凸显了满汉矛盾，仍不宜用民族识别以后的观念来加以解读。尽管后来宣统卷入张勋复辟和伪满洲国，祸及全族，逊清皇室和旗人对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毕竟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

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辛亥武昌起事后，民军与清军陷入犬牙交错的混战，局势扑朔迷离，前途一时难卜。一些身处北方的人士一则担心乱局久拖不决，生灵涂炭，强邻趁机瓜分；二则唯恐清、民双方关于国体政体的抉择尖锐对立，纷争不已，势成割据，很难实现长治久安。因而联络组织国事共济会，提出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对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进行国民公决，从而用和平方式解决武力冲突，打破当前的政治僵局，并且为国家民族的安定发展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

由于北方仍然处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而光复各省坚持推翻清朝帝制，对于公决君宪民主之举均不以为然，发起和参与其事者，当时大都隐姓埋名，事后亦不愿述及这段不大光彩的往事^[1]，相关人事，长期隐而不显。后来的研究，一般通史、相关专书及专题论文虽然间有提及，大都语焉不详。^[2]一些当事人的年谱涉及相关人事，还有所舛错。

国事共济会虽然为时短暂，成效不彰，所提出的国体政体主题，却牵动南北各方的敏感神经，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而其主张的以国民会议（大会）公决形式解决重大国事纷争，不仅成为南北和谈纠结不已的一大关键，而且对民初以来中国政制架构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仔细梳理比勘各类相关资料，于求证国事共济会成员的身份作为以及该会之于辛亥政权鼎革的复杂关系之外，还能深入探究国民会议（大会）发生演化的脉络及其对近代中国政制建构的长远作用。

[1]各当事人对于该会事宜多不愿言及，如黄远庸声称：“余于革命时，有一事大足记述，即余被推为代表，谒见庆王、那桐者，说宪法事。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热之庆、那，到此最后关头，其情状可怜，乃出意表。庆王自谓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那桐者至踟躇而道，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余非到此等时，尚不知彼等之恶劣，一至于斯也。吁嗟，满洲亡其家国于此等人之手，岂不可哀。”（远生：《忏悔录》，《东方杂志》第12卷第11号，1915年11月，第9页。）这样的选择性记忆，除了作文的需要外，显然与后来时势的变化有关。

[2]先行研究大都是以汪精卫、杨度等人为主题，涉及国事共济会。直接以国事共济会为题的有闻少华的短文《汪精卫与“国事共济会”》（《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韩国首尔大学金衡钟的《1911年的汪精卫、杨度与国事共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杭州师大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前者1975年就与丁贤俊联名发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投降派——汪精卫》（《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5年第6期），还根据《辛亥革命始末记》和《民立报》辑录了《国事共济会资料》（《近代史资料》总5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闻少华的文章扣题而过于简短，金衡钟文则主要篇幅用于概述汪精卫和杨度辛亥前的政见，认为国事共济会宣言基本反映后者的理念，并声称由于资料缺乏，于会本身着墨很少。波多野善大的《辛亥革命の南北议和と汪兆铭》（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小野勝年博士頌寿記念東方学論集》，京都，朋友书店1982年版），王晓秋的《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清末京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明清论丛》第11辑，2012年）及其汪荣宝研究，裴京汉的汪精卫研究等，也从特定角度论及国事共济会。

一 组织及成员

一般相关论著中，关于国事共济会的陈述包括下列内容：其一，成立时间为1911年11月15日；其二，发起主持者为杨度、汪精卫、汪大燮，有的还分别提到黄为基、汪荣宝、范源濂；其三，幕后指使人是袁世凯，袁还提供了50万巨款；其四，目的是以民间团体的形式鼓吹停战，主张南北议和，由国民会议和平解决国体或政体问题。^[1]上述各条，除最后一条外，其余均有可议。

国事共济会最早公开进入国人的视野，是1911年11月15日北京的《爱国报》以《中国共济会出现》为题刊发报道：“近日大局纷扰，南北相持，内部之糜烂，外部之乘机，内外人士，莫不引为忧虑。闻有某某志士组织一中国共济会于天津，立宪党用杨度出名，革命党用汪兆铭出名。该会之宗旨，首在要求停战，北军之停战，由立宪党要求政府，南军之停战，由汪设法向南军鼓吹。此议既决，则组织国民会议，聚集全国代表，协议政体。政府及南军共应服从国民之同意。现已由该会发表意见书，布告天下云。”^[2]

第二天，日系的《顺天时报》以“特件”的名目刊载了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并于次日将宣言书以及该会简章连载完毕。简章共七条，可以大体显示该会的宗旨目标、政治主张、行动方略和组织形式：

国事共济会简章

- （一）本会以保持全国领土（各省及各藩属）之统一为宗旨。
- （二）本会依前条之宗旨，要求两方停战，鼓吹组织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以免全国战争之祸。
- （三）本会会员平日主张君主立宪者，担任请愿北京政府赞成本会办法，平日主张民主立宪者，担任请愿武昌军政府赞成本会办法。
- （四）无论何人，得本会会员二人之介绍，均得为本会会员。
- （五）本会本部暂设天津，各省及各藩属地方，随时得设支部。
- （六）本会设干事四人，两党各举二人。

（七）各省及各藩属地方有赞成本会宗旨者，得自行组织支部，一面通知本部。^[3]

成立国事共济会，主要就是分别劝说清廷、革命党双方停战，用国民会议的方式决定国体政体。虽然目标是临时性的，却有建立全国性常设组织的愿望。

此事因为事先没有得到信息，南北报界的反应相对迟缓。两天后，近在咫尺的天津《京津时报》以《中国共济会出现》的同名标题转发了《爱国报》11月15日的报道^[4]；而天津《大公报》直到11月19日才刊出国事共济会宣言书^[5]。

报馆最为集中的上海，虽然已经光复，脱离了清朝的统治，但与北方的信息并未中断。11月18日，《申报》刊登消息：“立宪党杨度、共和党汪兆铭组织国事共济会，议有章程八条，俟各省代表到京，将开大会，提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两问题，由多数取决。”^[6]次日，《时事新报》也转载了《京津时报》关于国事共济会的报道。11月21日，《时事新报》又刊登了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并附简章。而《民立报》对于此事的反应较慢，信息不灵之外，更主要的应是不以为然的态度。

关于国事共济会成立的时间，先行相关论著多指成立于11月15日，主要是依据报纸刊出国事共济会宣言书的时间以及当事人汪荣宝的日记等资料。汪荣宝日记中的相关记述如下：

九月二十二日丙戌（阳历11月12号星期日）

早起，闻南京已复，与闰生同往电报局探听消息，晤杨霁川，知南京确已无事，并闻武昌有平和解决之说。午刻回闰生寓。……二时半赴哲子约，顺道复访闰生，伯屏在坐，以李总裁致议员书见付，大略言京师现在无事，大局颇有转机，属各议员早日会集，定廿三日开会云云。遂诣哲子，商榷国民议会发起事，预议者除余及哲子外，有孟鲁、静生、继新、翊云、远容，议决先组织一团体，名为国事共济会，由会中提出一陈请书于资政院，请召集国民议会，解决近日纷争之问题。……晚饭后，孟鲁及宰平来谈，孟鲁报告国事共济会发起办法，顷又另议得妥当办法，本夕尚拟接续会商，因复共诣闰生一谈，旋又同往哲子处商榷，至三时顷而散。

九月二十五日己丑（阳历11月15号星期三）

……饭后到法制院，晤仲鲁、仲和，又往统计局，与哲子商榷国事共济会问题，旋以议员谈话会赴资政院。……五时顷散会。到章寓，闰生由津回京，亦来谈。晚饭后回寓。^[7]

另外，严修是重要知情人，关于此事，其日记中也有所记述：

九月二十二日，……午前，苻曾、石曾、唐易庵（渔）、黄远庸（为基）、稽恪生、江翊云同来，黄君发挥政见。

九月二十三日，……访黄远庸、唐易庵，晤翊云、宰平、季新、李景圻、石曾。……晚车同石曾晋京。

九月二十四日，七钟起，小食后访哲子久谈。访静生不遇。……到内阁印铸局，晤卢小湘，待一小时，璧臣始至。谈次，袁云台亦至。璧臣留饭，饭后同云台至其家见宫保，同见者哲子、燕孙、伯讷。谈至十二钟辞出。

九月二十五日，六钟半起，与苻曾兄弟同车回津。……（午）饭后访唐绍川大臣。又至单级讲习所，陪石曾、季新又到唐处久谈。四钟出。^[8]

《顺天时报》11月16日刊出国事共济会的宣言书及简章，则该会的成立应在此前，但是否到前一天才成立，则有待斟酌。严格说来，国事共济会类似于同人团体，其政治目的也相当简单，不会过于在意讲究组织形式。从汪荣宝和严修的日记看，发起组织的活动集中在11月12日，一鼓作气，连夜完成。此后的活动，尤其是15日，已经不是结会，而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的运作和具体事务的商议。如果说12日至15日这几天均有可能作为国事共济会成立日期的话，最恰当的应该是12日或13日，而非15日。《爱国报》最早于11月15日报道国事共济会成立的消息，也可以间接印证该会的成立当在此前。

国事共济会之所以在天津发起，并将本部暂设天津，是因为其时北京风声鹤唳，官绅纷纷逃往津沪等地。该会即由避地天津的清朝官员与寓居天津的人士相结合，由是发起和组会等活动主要在天津进行。由于北京局面仍然危殆，虽然暂时没有失陷之虞，但随时可能陷入混乱，避居天津的官员时时往还于京津之间，一时间不敢举家回京。或指该会总部设于天津，其策划与活动则在北京^[9]，至少就策划一点看，与事实不尽吻合。

由于局势相当混乱，为了防止参与其事者遭遇人身危险，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发表时，发起人只署了“君主立宪党杨度等，民主立宪党

汪兆铭等”，其余则不列名。而各种事后的记载，于此也往往略而不论，因而相关论著大都语焉不详，只能简略举几位可能参与者的名讳。前引各研究论著提及的参与者，杨度（皙子）、汪精卫（季新、继新）毫无疑问，汪大燮其时仍在驻日公使任上，后来才擅自潜回国内，而且汪荣宝和严修等人的日记以及其他资料均未提及其名，应当不在发起人乃至会员之列。汪荣宝本人的日记可以提供其参与并主导其事的确证，黄为基（远庸）、陆宗輿（闰生）、范源濂（静生）等亦可由汪、严的日记予以证明。其中汪荣宝所记“远容”，即严修日记中的黄远庸，本名为基。12月15日罗惇齋（癭公）致梁启超函提到：“汪兆铭同时南行有黄为基者，与其发起共济会。”^[10]

确认并梳理发起参与国事共济会各人的履历、身份和倾向，有助于理解该会的性质及相关史事。

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人。1902年留学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1903年再入弘文书院（一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汪精卫同学，研究各国宪政，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1907年回国，任湖南宪政公会会长。次年，由袁世凯、张之洞保举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时任皇族内阁统计局局长。

汪兆铭（1883—1944），字季新，笔名精卫，原籍浙江山阴，生于广东番禺。1902年得秀才，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后加入同盟会。因刺杀摄政王被捕入狱。武昌起事后，被开释出狱。

汪荣宝（1878—1933），字袞父，江苏吴县人。1897年丁酉科拔贡。1898年应朝考，以七品小京官入兵部任职。1900年入南洋公学堂。后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主攻历史兼及政法。肄业回国后，历任京师译学馆教习、巡警部主事、民政部参议、宪政编查馆正科员、资政院议员、协纂宪法大臣。

黄为基（1885—1915），字远庸，江西德化人。浙江南浔浔溪公学肄业，1903、1904年两年内连捷举人、进士（最后一届会试）。后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1909年回国，任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官。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后留学日本，先后在大同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一说法政大学法科）学习。1905年回国，历任学部主事、参事，参与创办清华学堂。

陆宗輿（1876—1941），字闰生，浙江海宁盐官人。1899年自费赴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法制经济科学习。1902年归国后任进士馆和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5年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后为宪政编查馆馆员、资政院议员、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度支部右丞。

此外，汪荣宝、严修的日记还提及伯屏、孟鲁、仲鲁、翊云、宰平、苻曾、石曾、唐易庵（渔）、稽恪生、仲和、李景圻等人。有的较易确认，有的则较为难解，还有的存在信息舛错，有必要逐一加以考订。

苻曾（亦作符曾）、石曾，为晚清名臣高阳李鸿藻之子李焜瀛（1874—1937）、李煜瀛（1881—1973）兄弟，《严修年谱》以石曾为李景圻字，误。^[11]李焜瀛曾任兵部员外郎、刑部郎中、邮传部左侍郎。李煜瀛留学法国，参与革命党，在巴黎创办豆腐公司，以收益接济同志。民初与张继、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发起进德会，提倡改良社会风俗。

孟鲁、仲鲁为李景和、李景圻兄弟。据1920年北京敷文社编辑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李景龢（亦作和），字孟鲁，年三十五岁，福建闽侯县人，前清举人。日本法政大学卒业，内阁中书。历充总统府秘书、众议院议员、总统府谘议、参议院参政。”^[12]李景和的职位不高，但接近中枢，权力不小，《申报》曾有报道称：“满清有势力人物如良揆、良弼、刘道仁、李景和、卢静远、沈林一、唐宝锷之类，于邮传部中均有干薪……为数甚巨。”^[13]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指定为临时筹备处法制股办事员。^[14]

关于李景圻，《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的记载为：“字仲奋（应为仲鲁），年三十三岁，福建闽侯县人，日本成城学校毕业，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仍入该校研究科，专攻国法行政法各科，得正学士学位，充出使日本考察宪政大臣随员。回国应学部考试，中式法政科举人，分发黑龙江补用知县、京师法律学堂教员兼法政学堂教

员。”历任理藩部科员、蒙藏事务处副科长、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大理院推事、刑事第一庭庭长。^[15]民初袁世凯组织“宪法研究谈话会”，与曹汝霖、陆宗輿、汪荣宝、章宗祥等具有法律知识的人士一起出任委员。

翊云，严修日记指名为江翊云，即江庸（1878—1960），江瀚之子，福建长汀县人，生于四川璧山。成都中西学堂英文班肄业，后留学日本，先后就读成城学校、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1906年毕业回国后，任分省试用知县，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师范学堂教习，学部普通司兼参事厅行走，京师法政学堂教务长，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兼法律学堂总教习。1907年调任大理院详谳处推事，大理院刑科第一庭帮审官。1908年应学部考试，成绩优等，奖给法政科举人。1909年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任京师法律学堂监督。^[16]1911年作为唐绍仪随员参与南北议和。民国成立后，留任大理院推事兼北平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后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部次长、总长，日本留学生总监督，法律编查馆总裁。

伯屏，又作伯平，即金邦平（1881—1946），安徽黟县人。1899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律例科毕业。1902年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毕业回国，先后任翰林院检讨、直隶总督袁世凯文案、北洋常备军督练处参议等职。1905年考取游学毕业生进士。1906年任天津自治局督理，后来担任资政院秘书长等职。民初历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政事堂参议、农商部次长兼全国水利局副局长、农商部总长。

宰平，即林志钧（1878—1961），福建闽县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留学日本，法科毕业。历充储才馆馆员，外务部日本股股员。民国时任外交部佥事、大理院推事、司法部参事、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司法部民事司长，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仲和，即章宗祥（1879—1962），浙江吴兴人。早年中秀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1903年回国，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清廷赐进士出身。历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1910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1912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等职。

唐易庵、稽恪生的情况不详。

严修虽然介入国事共济会，与共和、君宪双方都有所联系，但是内心还是赞成君宪，不以共和为然，至少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当时的情势。在此期间，他曾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旷生入内室久谈，而与来访的李石曾“宗旨不合，辩论良久”。12月4日，听来访的唐莫庭“谈皖中近事甚详。又述上海革军占领后情状”，表示：“余私持中国不能遽跻共和之见，今益自信不谬矣。”不过，罢官之后的严修不愿公开介入清政府的政事，袁世凯请其赴鄂参与南北议和，亦力辞不就。

[17]

国事共济会成立后，根据简章的规定，还积极发展会员。11月18日，内阁承宣厅行走许宝衡（1875—1961，祖籍浙江仁和，生长于湖北）在法制院遇到杨度，“见其与汪兆铭所组织之国事共济会简章及宣言书，哲子劝余入会。哲子所主者君主立宪，汪所主者民主立宪，欲要求停战开会公决，此二主义仿法国拿破仑第一时由全国人民投举公决帝政、民政两问题之例，此会若成，于战争之祸或可少纾，然亦难矣”。[18]

综合参与其事的骨干人员的情况，可见君主立宪党占大多数，民主立宪党除汪精卫外，可以确定的只有李煜瀛。当然，顺直地区的革命党人可能还有列名者，只是不能具名，无法查考。这些人年龄相近，在28岁至38岁之间，大都有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经历，并且学识才干出众，在京师各部院任职，参与预备立宪活动，不少人与袁世凯的渊源甚深，关系匪浅。

此外，依据会章，各地赞成该会宗旨者，可以自行组织分会。目前已知的有奉天分会，以申钟岳、荣升为正副会长。其宣言书称：

奉省逼处两强，际此风鹤频惊，烽烟四起之时，其地位尤较各省为危险。谋独立则易启外人之干涉，守中立则无健全之形势，言保安则恐土匪纷起，人心恐惶，甚或假革军名义以实行抢掠，玉石不辨，剿抚俱难，而全省糜烂矣。主急进则恐党派分争，兵连祸结，甚或分满、汉种族以互相仇杀，生命财产同归一烬，而人道有乖矣。若犹是不南不北，观望徘徊，人心一无归向，党派势必纷歧。京政府既保护维艰，军政府亦经营莫及，孤城坐困，干戈顿兴，血肉纷飞，头颅浪掷，胡匪大起，强邻横来，嗟我爱国诸志士，忍独令我奉演此最危险

最凄惨之悲剧乎？然而祸患之来，必由于党派分立，而党派分立，又不外君主、民主之一大问题，主张各异而谋国则一，若合两党而共成一会，鼓吹临时国民会议，以解此难解之问题，以血肉相搏之争端易而为樽俎雍容之谈判，吾四万万同胞之幸福莫大乎是。此杨、汪两君所发起之国事共济会，我辈不能不赞成，而奉天国事共济分会不能不成立也。钟岳等现已联合两党志士同时发起，一日之内闻风而至者数十人，足征趋治避乱人情所同，谋国爱民各党一是。当即一面刊发宣言书及分会简章，一面通告天津总会，协谋共济，指日告成，我爱国志士尚其鉴诸。

据此，奉天分会除了本部的政治诉求之外，还有自己的考虑，即对内借此避免本省陷入纷争战乱，对外试图在京、军两政府之间左右逢源。该分会的简章第一至三款与总会一致，第四款增加“但必已成年而具有政治思想者”一句。以下各款为：“（五）本分会假设奉天亚东栈为临时事务所，各府、厅、州、县随时另设支部。（六）本分会设干事若干人，开会时由各党公举。（七）各府、厅、州、县有赞成本分会宗旨者，得自行组织支部，一面通告本分会。（八）本分会特制黄质红花徽章，文为‘奉天国事共济分会’，分给各会员配带于左臂，以示区别而免危险。”其发起人为：申钟岳、支可宗、李镇东、邵元良、李作新、王恩澍、李琇环[寰]、陶魁贤、侯家麟、唐钟澍、高遐福、张肇甲、刘秉钧、王梦龄、仇振名、德权、景云、锡福、锡祥、董凤池、裕纶、方经权、邢德、陈荆玉、罗霭云、恒祺、孙祖泽、刘文宝、习子澄、金子明[铭]、庆升、李小[筱]峰、李复斋、刘昱五、刘襄臣、李久华、孙泽纶、齐允中、荣升、姜舜卿、陈嘉谟。^[19]

奉天国事共济分会随即推定了各职员，以申钟岳为正会长，荣升、支可宗为副会长，下设执行、评议两部，执行部以高其志为正部长，邵元良、陈嘉谟为副部长，下设文牒（李镇东、方经权、李艳阳、李作新）、庶务（季宗鲁、王梦龄、姜舜卿、景云）、会计（陈永藩、恒祺、陶魁贤、胡名海）、招待（罗霭云、李琇寰、侯家麟、徐振东）、交通（唐宗澍、邢德、王恩澍、于翰馨、德权）、纠察（锡祥、董凤池、李祯赓、定昌、孙泽纶、张恒懋、黄鸣春、金维三）六股，评议部以锡福为正部长，杜阁臣、刘文宝为副部长，李久华、齐允中、刘襄臣、刘星五、李筱峰、庆升、金子铭、习子澄、孙祖泽、陈荆玉、仇振名、刘秉钧、张肇甲、高遐福为评议员。^[20]

另外，吉林、黑龙江也成立了国事共济会。据吉林西南路兵备道孟宪彝电告总督：“奉吉两省发起国事共济会，无疾而呻，徒滋扰乱，宜及早解散，用保治安。”^[21]该支会由郭宗熙、王国琛、傅疆、何寿鹏、李宝楚、范治焕、汪熙、王运孚、周家树、吴渊、王家襄、维钦、朱兆熊、穆恩堂、成凤韵、文耆、程崇实、易翔、汪樵琴、李惠人、余大鹏、王盛春、李焕章、谢家琛、刘康煜、成鳌、徐志铎、范溥、张树荣、王庚等人发起。“省城官绅睹国事日非，急谋共济之方，乃援天津国事共济会章程，亦组织一支会，名之曰吉林国事共济会。现由发起人散布通告。其通告略谓：时局阽危，外患逼迫，共和立宪与君主立宪之二大主张，相持莫决。诚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祸延噬脐，虽悔何及。现天津业有国事共济会之设，吉林僻在东陲，实为根本重地，亟宜组织支部，以期联络一气，共保平和。同人等兹择于本月初十日午后二时，假谘议局先开成立大会，凡军界政界绅界学界警界各同胞，无论满汉回蒙，客居土著，凡有赞成本会宗旨者，即希届时惠临，共同讨论为幸。”^[22]

十月初十即11月30日，吉林共济会在东门外谘议局开发起大会，各界到者千余人。

首由发起人王揖堂报告宗旨，大旨谓此会发起于杨哲子、汪兆铭两君，其目的在政治改革而非种族相争，则所争者大，非个人存有私见，而肇此祸端也。并阐明民主君主理由。次由清交涉司郭宗熙演说，谓欲解决此种问题，须从人民之心理、各地之现状着想，庶几适当。盖发表意思为个人之自由，而解决此种问题，则毫不可强制。至于进行手续，第一，须问此会赞成否。如果赞成，则要求谘议局为共济会机关，设匭征求意见，以便取决。谘议长庆康报告，奉天国事共济分会亦已成立，今日来函，并附宣言书与章程，颇多可采取之处。诸君今日既莅会，必赞成，似无庸表决，认此会为当然成立（众拍手）。遂宣言从此吉林共济分会成立。次由孙君演说，谓吉林一省，若人民各行其是，则今日之会必不能解决，不如编簿列册，别为两党，民主君主，各以己意，自行签名，庶可以计数之多寡，而解决此问题。当由各发起人先行签名。又有开埠局员陈士龙登台哭呼曰：

“今日请不必争论，今日之争战，死者莫非吾同胞我兄若弟，兄生于南而弟死于北，则我将何适乎？可以见人民涂炭之苦矣。诸君今日欲解决者，无非谋人民幸福，则莫如先请停战。今日应电政府请求，若断断于此，空言何补，而死者不可复生，生者行将及难。”时台下人以陈君之哭甚哀，亦同声痛哭，声振屋顶。后谘议局员李君谓：照今

日现状而论，主张民主之多，已经可见。惟请停战一层，尤为本会进行之第一要着。今日应即解决，不失为国事共济四字之义。至能否调停，则非鄙人所能知矣。然今日民主既经多数，则后之吉林结局，亦可知矣。诸君欲免生灵涂炭，则要求之电，责任同负，自必不能推辞。应即举定起草实行（众拍手赞成）。民政科长范治焕谓：会已成立，今日余之主张，则在民主。盖人人具民主之心，已不自今日始，今日而民主不成，民主之势或衰，则他日者民主之余烬，必然复生。与其此次生灵困苦之时，不为一网打尽之计，再贻君主怪物于世上，将来仍有血肉横飞之一日，不如今日收十分之效果，免将来之涂炭云云。众以为然。故民主之势力殊盛，即多数旗人，亦以民主为正当。坐中赞成君主者，据记者（访员自称）所闻，惟有一人。此人系江南（松花江南岸）蚕桑局经理傅金坡，年已龙钟，人极顽固，众闻其言，无不嗤之以鼻。^[23]

黑龙江国事共济会支会的报告书称：

窃自蜀鄂肇乱，天下骚然，军队杀戮，惨无人理，以汉口、江宁、太原为最甚。而我人民所以遭此涂炭者，则以政治腐败，上下壅塞，君主之阶级过高，贵族之权限太盛，有以致此也。由是各省纷纷宣告独立，粤闽湘皖开之于先，江浙云贵继之于后，晋秦兵变，齐鲁民哄，君主命令，不出都城，所属行省，惟余燕豫。中国大局已成不可收拾之势。我黑龙江省素混于满蒙界限，民情朴质，风俗闭塞，只知服从命令，遑计利害攸关。当此孤悬塞外无所倚赖之际，若不预先筹画，保合治安，则为奴为仆，作牛作马，皆目前事也。况又处两大之间，日人扼之于南，俄人伺之于北，稍有疏虞，即招外祸，更为我人民所当深思熟虑者也。今北京已设有国事共济会，乃杨君度、汪君兆铭所发起，其宗旨以招集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而我江省处此时代，无论君主民主立宪，皆有密切之关系。凡财政之支绌如何筹算，军事之薄弱如何整顿，商务之萧条如何振兴，实业之幼稚如何提倡，俄人之跋扈如何对待，国债之担任如何偿还，胡匪之抢掠如何抵制，皆我江省人民所绞脑焦心之处，亦君主民主立宪所当共同研究者也。而尤须注意者，则预备选举解决之问题，自应首先考察地方人民之程度高低，或宜于君主，或宜于民主，苟不先胸有成竹，及至临时会议，将以何者为倾向乎？虽然，此盖关我江省之狭义宗旨，且夫广义，则对于全国之民生财力不受损害，列强之豆剖瓜分无可藉口为必要。仆等已为该会会员，拟在本省组织一国民共济支会以号召同志，力挽危局。我江省军学绅商各界，诸多热诚君子，倘能发愤有为，襄同办理，匡我不逮，不独仆等之幸，亦通国之幸也。^[24]

据此，该会为已经加入国事共济会者在本省发起组织，发起人为管颖侯、高察骥、薛珠、秦广礼、杨振翻，他们如何先期加入国事共济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京津入会，二是由北京来人或通信方式在黑龙江加入。该支会的简章与奉天分会同样是八条，但内容明显不同。“（一）本支会以保持全国领土之统一及预备本省之宪政进行为宗旨。（二）本支会为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之问题之研究预备。（三）本支会有要求本省督抚允许之权利。（四）本支会与本省谘议局有联合提倡之责任。（五）无论何人与本会宗旨相同，有人介绍，均得为会员，然须誓共守信义。（六）本支会设在省城，其各府、厅、州、县随时亦可设为支部。（七）本会会员有赴本府、厅、州、县提倡之义务。（八）发起人及会员量力捐助会中经费。”^[25]仍然坚持预备立宪，且与谘议局联合，其倾向显而易见。

虽然《顺天时报》声称自杨度等人发起国事共济会后，“于是各省纷纷设立分会”，实则除东三省外，其余各省尚未发现成立分会的记载。可见国事共济会主要是在仍处于清廷控制下的北方尤其是东北一些省份活动，光复各省无人响应。

注释

[1] 前述先行研究各文外，可参考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0页），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267页），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页）。

[2] 《中国共济会出现》，《爱国报》第1766号，1911年11月15日，第2版，“国事要闻”。

[3] 《国事共济会宣言书（续）》，《顺天时报》1911年11月17日，第2版，“特件”。关于宣言书的时间，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8—540页）据11月18日《经纬报》，但是署期11月15日。

[4] 《中国共济会出现》，《时事新报》1911年11月19日，第2张第1版。该报所加按语称：“此条系由《京津时报》内摘出，确否则未能悬拟。”

[5] 《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天津《大公报》1911年11月19日，第2张第3版。

[6] 《申报》1911年11月18日，第1张第3版，“专电”。

[7]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编委会编辑：《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1054页。

[8] 《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第3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7—1708页。

[9]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536页。

[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8页。

[11]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265页。此误因《严修日记》在李景圻后将石曾退格，似为前者的字。

[12] 《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1集，北京，敷文社1920年版，第46页。

[13] 《交通部之今昔观》，《申报》1912年4月26日，第2版，“要闻一”。

[14] 《约请临时筹备处各股办事员名单》，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

[15] 《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1集，第39—40页。据《清实录》记，为最后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得举人，廷试以知县分省即用。

[16] 《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1集，第24页。

[17] 《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第3册，第1710—1712页。

[18] 许恪儒整理：《许宝衡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77页。

[19] 《奉天国事共济分会之成立》，《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8日，第5版；《奉天国事共济分会成立》，《顺天时报》1911年12月2日，第4版，“各省要闻”。

[20] 《国事共济会推定职员》，《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日，第5版。

[21] 《孟宪彝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379页。

[22] 《吉林国事共济支会成立》，《顺天时报》1911年12月8日，第4版，“各省要闻”。

[23] 《吉林共济会大会记》，《时事新报》1911年12月13日，第2张，“特别纪事”。

[24] 《黑龙江国事共济支会报告书》《黑龙江国事共济支会报告书（续）》，《顺天时报》1911年12月5、6日，均第2版，“要件”。

[25] 《黑龙江国事共济支会报告书（续）》，《顺天时报》1911年12月6日，第2版，“要件”。

二 两面碰壁

按照国事共济会制订的简章，其宗旨是保持全国领土（各省及各藩属）的统一。为达此目的，要求清军、革命军双方停战，组织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以免全国战祸蔓延。具体进行办法是，由主张君主立宪的会员向北京政府请愿，主张民主立宪者向武昌军政府请愿。国事共济会宣言书详细阐明了上述宗旨和实现步骤。在该会看来，双方相争起于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的分歧，要想解决纷争，必须由此入手。君主立宪党认为：中国立国，以满汉蒙回藏五种人集合而成，而蒙回藏人之所以能与汉人同处一国政府之下，全恃清帝名义羁縻之。如今世界各国对华政策，方主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而其所谓领土者，乃合二十二行省、蒙古、西藏、回部等藩属而言，若汉人以二十二行省自立一国，变为民主政体，一时兵力必不能兼定蒙藏，而蒙藏又无独立一国之力，则满洲君主去位之时，即汉蒙回藏分离之时，蒙必归俄，藏必归英，东三省必归日俄，而各国领土保全之策以破，德法不能坐视英俄日之独有所得也，法必得云南等处，德必得山东等处，于是汉人土地亦不能瓦全矣。欲求领土之完全，满汉蒙回藏之统一，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因此主张君主立宪。

民主立宪党认为：各国革命，可以至君主立宪而止，而中国则不能。“非谓君主之为满人，必欲以种族相仇之见排而去之也。乃以君民之种族不同，则人民之权利必为君主所吝与，即令一时被迫而尽与之，然使尚有保持君位之力，则亦仍有推翻宪政之力。故君主一日不除去，即宪政一日不确立。根本解决之法，惟有改君主为民主，满汉蒙回藏五种皆平等立于共和政府之下，始有完全之宪政。并非于政治革命之外，别有所谓种族革命也。”因此主张民主立宪。

虽然两党各持一说，各谋进行，其所争之点无他，君主民主之一问题而已。“此外如确定宪政，发挥民权，则两党之所同也。满汉蒙回藏五种，必使同立一政府之下，决不可使分离，以与各国保全领土主义冲突，又两党之同也。然则两党共同之目的安在乎？皆不过成立立宪国家以救危亡之祸而已。”

因政见不同而产生对立，本是立宪政治的常态。可是中国尚未进入宪政，冲突双方只能寻求武力解决的途径，从而引起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巨大危险，尤其是如何在实现政治变动的同时确保国家的统一，或者说国体政体的抉择不会导致国家的分裂，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长期持续，成为中外南北各方关注的焦点。“近者革命军起，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设必欲恃兵力以决胜败，无论孰胜孰败，皆必民生涂炭，财力困穷。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设更不幸而二十二行省中有南北分立之事，又不幸而汉人团为一国，蒙回藏遂以解纽，以内部离立之原因，成外部瓜分之结果，则亡国之责，两党不能不分担之矣，岂救国之本意哉。”

战乱与分裂，固然是君宪、民主两党都无法承受之重，更为重要的是：“两党之政见应何去而何从，非两党所能自决也，必也诉之于国民之公意。用是两党之人联合发起，以成斯会，意在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君主民主两党皆有服从之义务，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世界历史上，法国拿破仑一世执政时全国人民投票公决帝政或民政，南意大利诸小邦投票公决属于罗马教皇或撒丁王国，“国家大事决于国民会议，此先例之可援，而适于今日中国时势者也”。至于实行该会宗旨，“其对于北京政府之行动，由君主立宪党任之，其对武昌军政府之行动，由民主立宪党任之。总之，两党之意，不欲背其平日救国之怀，而以相争酿成危亡之祸，故于纷争之际，咸有惴惴之心，此则对于全国国民所共同求谅者也”。

[1]

主张君主立宪者向北京清政府运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向资政院陈情，希望由该院议决，具奏请旨；一是直接向内阁呈请代奏。

11月17日中午，汪荣宝前往李景和家，与杨度、范源濂、汪精卫等人商榷国事共济会办法。当日，杨度以国事共济会君主立宪党的名义，由议员范源濂、刘泽熙为介绍，向资政院递交了陈情书，内称：

近者革命事起，全国响应。政府与武昌革命军各拥重兵，两不相下，无论孰胜孰败，皆必民生涂炭，财力困穷，决非可恃兵力以决胜负，必宜别有平和解决之方。度等为此，发起本会，建议两方停战，

组织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以免全国战争之祸。现由本会决定陈请贵院议决，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一俟武昌承诺停战之后，即将赴鄂军队撤回，以示永远停止战争、不以兵力解决之诚意，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实为全国之幸。为此陈请，即希照章议决施行，无任翘企之至。
[2]

11月20日早10时，汪荣宝造访杨度，关于国事共济会问题商议许久。其间范源濂、汪精卫先后来谈。饭后，汪荣宝和范源濂同往资政院。关于资政院会议讨论的过程，汪荣宝日记比较简略：

三时顷开会，首议剪发具奏案，多数赞成，次议改用阳历具奏案，决议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元旦，次议共济会陈请事件，静生首表赞成之意，经三四议员讨论后，喻君志韶起而反对，宗室某君和之，拍案大呼，声震议场，秩序大乱，遂由议长宣告散会。
[3]

而报纸的报道则大为详细，逐一记录了整个会议进程以及所有的个人发言。仔细比较，各报的报道不仅细节上详略有别，具体内容也有所差异。综合各报所记，大体经过情形如下：是日午后2时55分，资政院举行第11次会议，议长李家驹出席，到会议员共92人。由股员长报告或议员、陈请股股员提出议题共9项，包括初读的出版条例法律以及会议的爱国公债章程案，速开国会以消内忧而弭兵祸、鄂军煽乱官军克复汉口总统等纵兵焚烧杀掠请朝廷严加惩处并将激成叛兵之张彪即行正法、保存中国事、陕省糜烂大局岌岌宜速派知兵大员相机剿抚等建议案，改用阳历、降旨剪发、特赏内帑充妇孺救济会经费等具奏案。而具体讨论国事共济会议案的过程，可以比较《顺天时报》和《经纬报》的报道大体还原：

程序	《顺天时报》 ^[1]	《经纬报》 ^[2]
介绍议案	议长命郑议员潢报告收受杨度及汪兆铭陈请组织临时国民议会以决定君主立宪民主立宪问题，其陈请书之内容在请政府速急停战，万不可以军力平乱。	杨度等陈请设立国事共济会，其意以为战争不已，则生民涂炭无有已时，于此求一和平解决之法，即两面停战，复召集国民会议，仍可表决君主民主立宪问题。
议员张锡光发言	张议员锡光谓此事关系重大，须细心研究。	
议员江辛发言	江议员辛曰：停战非不战之谓也，作战准备两方尚准进行。	
议员范源濂发言	范议员源濂[濂]复登台演曰，谓平定内乱，断不可专用兵力，无论孰胜孰败，皆于国家前途不利。现在革党系极端的主张共和政体，而本院又系极端主张君主立宪政体，两不相下，非有第三者出而调停，终不能解决。现中国共济会既有此陈请书，本院可代为上奏，听候裁夺。	范议员源濂[濂]登台发言，谓国事共济会其所希望即在国民会议，其应议问题，即君主与民主之政体。或者谓提议民主非本院所宜，但革命党以此为旗帜，徒恃本院持君主立宪之说未必足以破之。宜请明发上谕，许开国民会议，两面共同研究，主张君主立宪者，详说其真理，以维持君主立宪。盖国民会议在中国为例外，在各国为常举，且为各国办有成效之法。但求此法不壅于上闻，采择与否，听之朝廷而已。
议员刘述尧发言		刘议员述尧谓：国家既不以兵力平乱，惟有以此和平方法解决之。国事共济会者即发表政见之地也。

续表

程序	《顺天时报》	《经纬报》
议员李文熙发言		李议员文熙谓：大局如此，本院对于存亡问题，不能不设法研究。盖两面趋于极端，势必出于战，战则生民涂炭，不堪设想。至有谓该会合两党聚为一堂，恐易生冲突者，似无足虑。盖政府与革党及各省三面派人为共同之讨论，自可和平解决。
议员牟琳发言	牟议员琳又诣演台曰：革党当起事之日，即张中华民国旗帜，岂肯骤然取消。若国民议会能组织成立，将来征集全国人民意见，若主张君主立宪者占多数，则革党是服从全国人民之意思，亦好让步。且两方战事一停，外人即无从干涉。故本院对于此陈请书不妨代为上奏。	牟议员琳登台发言，谓大乱起源，即因政治不良所致，现信条颁布，人民之要求极为圆满，故资政院对于政府，但能为君主立宪之请愿。如有国民会议可以发表意见，否则南方纷纷独立，但有民主之说，其势甚危险。又大局糜烂如此，革党已宣布为中华民国，未必肯自行取消。如能开会服从多数，亦未始非取消民主党之机会。即自中国历史地理观之，亦不利于民主。至谓资政院系主张君主立宪者，不能提及民主，但国事共济会非出自本院，但为之上达，亦不至有所违碍。
议员喻长霖提问	喻长霖忽起身曰：资政院前次奏请颁布之信条十九条，系确定君主立宪，今又将此陈请书代为上奏，岂不自相矛盾。且政府虽或承认，若革党不承认，又将如何。	喻议员长霖、景议员安均谓与信条有冲突，宜取消。
议员牟琳回答	牟议员答曰：此事系国民陈请，于资政院无涉。	
议员景安、毓善即席喧嚣	景安即拍桌大声反对，毓善亦反对，云资政院不能不守法律。	
议员籍忠寅发言	籍议员忠寅登台演曰：诸君对于此陈请书无须激烈，资政院议员并无主张民主立宪之人，且无论君主民主，资政院无议决之权。总之，君主民主问题一日不解决，大局即一日不能定。当此存亡一发，诸君不必动气。资政院系主张君主立宪，革党系主张共和，两者断不能直接谈判。若将此陈请书代为上奏，请组织国民会议，将来由国民议会解决，方是最和平之办法。	籍议员忠寅谓我辈既为资政院议员，自无主张民主者。但时势危急如此，不能拘牵法理。凡有可以救亡者，吾辈即当细心研究之。乃者乱事迭起，将及一月，其所以不能即平者，即君主民主两问题未决之故。自种种方面观察之，既无以兵力平乱之理，则惟有合全国人民之意见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本院对于此陈请书，但期以之上达，承认国民会议，将来国家前途乃有希望。不然，因内忧而牵及外交，乃至危险之事也，可不惧哉。

[1]《资政院第十二次议事详志》，《顺天时报》1911年11月21日，“时事要闻”，第7版。

[2]《资政院第十一次会议纪略》（《经纬报》十月初二日），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228—1230页。该报所称资政院第十一次会议，与《顺天时报》所称第十二次议事为同一事。

辩论至此，因“反对者颇持激烈之说，议场大哗，议员亦多退席者”，议长遂宣告会议展期，时间已到5点5分。^[4]

从与会议员发言看，赞成或默许国事共济会者居多。可是由于旗籍议员反对者依仗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持论激烈，其他议员不便坚持立场，主持会议的议长等人也不愿多事，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资政院提出议案受挫，杨度等仍不甘心，11月23日，又向内阁呈请代奏，其书曰：

国事共济会会员、君主立宪党开缺学部副大臣杨度等，为请朝廷明降谕旨实行停战，速开临时国民会议，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救危亡而维大局，呈请代奏事：窃自武昌革命军起，全国响应，朝廷号令不出都城，未独立者仅直隶、河南二省耳。宗社之危系于一发，若欲仍恃兵力以戡内乱，非特生民涂炭，财力困穷，且沿江沿海遍竖白旗，亦复战不胜战。与其专为战守之计，何如别求解决之方。用是集合同志，创成此会，意在要求两方停战，速开临时国民会议，而以君主、民主一问题决之国民公意。

议者以为会议必由多数取决，是否必为君主，殊无把握。不知此时欲言完全把握，虽伊、吕复生，不敢自信。惟是会议既开之后，则外交内政，利害得失，彼此可以互陈，以期归于一是。比之目前状况，君主立宪之言仅能言于都下，而各省概置不理者，实犹彼善于此。即令决议改为民主，然朝廷既肯以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则尧舜至公之心，已为海内所共敬。人民对于皇室，其必优礼相加，而无丝毫危害之意，可以预决。而知和平解决之方，莫逾于此。

拟请明降谕旨，实行停战。一俟武昌革命军承诺停战之后，即将赴鄂军队撤回，以示永远停止战争、不以兵力解决之诚意。并召集临时国民会议，议决君主、民主问题，若能将君主、民主朝廷皆乐于观成之意，昭示天下，咸使周知，尤足以生人民之感情，为平和之保障。至于临时国民会议之组织与其选举方法，应由会中拟具草案，仍

由两方[承]诺，然后据以召集。未便由谕旨遽定办法，致生窒碍，合并声明。^[5]

比较宣言书以及提交资政院的陈情书，呈请内阁代奏书的行文用词可见杨度等人真的急了。一方面，各地光复之声不绝于耳，形势发展的迅速远超出他们的预料，清廷能够直接管辖的区域日益缩小，而且上海已经邀集各省代表商议组织临时政府事宜，照此下去，清廷连可议的余地也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向资政院的温和陈情居然遭遇强烈反对，令他们觉得与其轻描淡写不如放声作狮子吼。相比于朝廷、百官和钦派议员，杨度等人对于局势实况的知情度无疑要高得多，因而对形势的判定要清醒得多。这时资政院自身已成众矢之的，而多数议员会议时尚主张对革命党痛剿，难怪汪荣宝慨叹道：“真可谓至死不悟矣。”^[6]

但呈请内阁代奏依然不能奏效，而局势瞬息万变，很快就到了国事共济会无所作为、无须维系的节点。1911年12月4日，仍由国事共济会发起人君主立宪党杨度等、民主立宪党汪兆铭等同启，该会发布了解散国事共济会宣言书：

自战事开始以来，两党之人皆知战事延长，于中国前途有无量之危险，故欲以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息将来之战祸。两党之人持此目的，发起斯会，一面由度陈请资政院议决，呈请内阁代奏，舌敝唇焦，以求主张之通过，一面由兆铭电达上海军政分府转武昌军政府，请求承诺所主张。乃资政院不为议决，内阁不为代奏，而武昌军政府亦无回电。上海回电，只承诺国民会议，于停战与否，并未提及。今者武汉血战，兵事方殷，平和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在君主立宪党之意，始终不愿以杀人流血解决君位问题。北军进攻，实所反对。在民主立宪党之意，则以为若别无平和解决之法，惟有流血以护其宗旨。是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用，特宣告解散。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发起人杨度汪兆铭等同启。^[7]

依据解散宣言的内容，国事共济会中君主立宪党呈请清内阁代奏之举也碰了壁。而民主立宪党向南方革命军政府的陈情，武昌军政府方面没有回应，上海虽然回电，却只承诺国民会议，不及停战之事。可是，尽管南北两面同样碰壁，解散宣言却刻意强调南方的态度对于该会的解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认为是民主立宪党执意流血以护宗旨，才使得国事共济会的主张归于无效，等于将此事的流产归咎于革命党方面。

对于国事共济会的主张，南方民党的确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尤其在停战议和与国体政体公决两个关键问题上，根本予以否定。从11月初开始，《民立报》不断发表有关此事的社论，振公的《和平解决之殷鉴》指出，“今日汉满已成不两立之局势，即今日之汉族同胞已达有进无退之地位”，法国大革命之历史和清政府往昔之态度显示，“吾国革命事业进行之态度，不可迷心于和平解决而稍涉犹疑。盖和平解决之终了，即野蛮专制之发端”；当日该报的“天声人语”栏还大声疾呼“万无和理”。^[8]随后又“警告国人毋惑于议和谬说”，认为“自袁世凯起用以来，议和议和之声，久已播扬人口，……朝廷必仍假立宪之虚名，以实行其专制，则是吾国终无革新之日，即终必沦于瓜分灭亡”。^[9]

南方民党根本反对和议，则对于国事共济会的停战、公决主张更加不能接受。关于此节，各种先行著述虽然提及南方民党对于国事共济会及其主张表示反对，可是语焉不详。已经处于光复政权之下的南方各报，虽然没有响应国事共济会的主张，但也没有正面予以批驳，真正严词痛批的主要还是《民立报》。11月19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刊登马君武的《言论自由》，断言：“闻汪精卫与杨度立共济会，其事若实，精卫未免太退化。盖今日全国民希望共和，其意态至明白，无所用于派代表至污秽黑暗之北京会议也。”^[10]三天后，《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撰写了专题社论《无聊之共济会》，正面表达了否定的意见并详细阐述了理由：

近闻北京共和党人汪兆铭与立宪党人杨度组织共济会，欲各省派代表至京，议决君主、民主两大问题。记者闻之而疑，以为或舆论猜测之辞，不必见有实事。而今复见其布告书及草章，始知北京党人竟有此无聊之举动，其根本上见解已属荒谬无聊。记者既有所见，安得不辞而辟之。嘻，今后之中国，为君主为民主，尚欲开议解决耶。以全国国民之同意，咸趋于共和民主，帝王一物，已不容复现于新中国，而况彼爱新氏无知之孺子乎？且中国革命，本非欲汉族独立组织国家，亦必合满蒙回藏四大民族共立于共和光中，同享自由之幸福。今天下光复过半，苟立宪党人能省大势之所归，同心协力，推倒满清皇室，则战祸自然消弭。而其消弭乃根本上之方法，亦无复逾于此者，又何必以五大族之英秀人群终屈服于一二冥顽无识野蛮皇族之下哉。

作者分别剖析了满族、立宪党和共和党之于君主、民主的利害关系。在他看来，满族虽然与汉族为世仇，“亦其不肖酋长遗谋不彰之

咎”。如今汉族既消除前嫌，开心剖肺示天下以至诚，则满族亦必企望共和早日成功，“而不愿爱新氏一家高踞君主之位，而貽灭类之大祸”。立宪党人本是同种，休戚与共，何必自相歧异，使国是不能早定，而为他人作保卫尊容计乎？“盖今日君主之不祥物，断断不容于中国，已不待片言之讨论，又何必作此种无谓之举动，以惑世人之观听哉。”至于共和党人，其宗旨目的手段既以共和为主体，则心中对于民主建施不应稍存疑虑，而君主之不及民主，其理解亦复洞稔。

“今日革命事业将告成功之际，为共和党人者，亟宜注全神于建设，而巩固中华民国万世不拔之基。奈何复随波逐流，惑于立宪党人一二之谬说，将待于君主民主之解决乎？……而一世英物之汪兆铭，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族说法乎？不然，既纯然主张共和，则不致而有所欲各省代表会议于君主民主为也。”最后，该作者称：

共济会之设，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夫共济会成立之意义，亦不过曰消弭南北之战祸而已。然所谓消弭战祸者，岂在君主、民主两问题之解决哉，亦不过曰共和目的达则战祸弭，共和目的不达，则战祸一日不得弭而已。在京党人既恐战祸之延长，即当于各方面尽力使共和目的早日得达，不当妄行要求停战，而作无聊之讨论也。记者最后之一言，甚望吾全国同胞不承认此种荒唐之共济会，而并力于共和之建设，使君主之不祥物永远不存留于二十世纪之新中国，流无数热血而购得真正之自由，亦爱国男儿所乐为也。战祸云乎哉？^[11]

同日，《民立报》第3页新闻版又以《共济会之宗旨何在》为题，刊登了驻津访员的来函，内容与18日《经纬报》的消息相同，文字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添加了一些批判性的评语：

国民会之发生，乃著名之宪客某为政府所画之密策，袁内阁、李资政大赞成之，而革党中亦颇有中其计者。兹由个中人探得某宪客所议国民会得力之点如下：（一）国民会之招集，非两月后不能开会，此两月中，各省人心一懈，鄂晋等要省必可夺回（宪客做梦）；

（二）即一旦开会，主张君主立宪者必占多数（宪客放屁）；（三）即令主张共和之票竟占多数，亦必有许多反对之省分，彼时国民与国民宣战，政府可不劳而致胜（政客恶计，其如各省国民不宣战何）；

（四）藉京城恐慌人人逃归之际，密遣议员托词避乱，庸重金回籍运动在籍之议员军人，令其主张君主立宪，不悦者手枪毙之，则国民会开时政府必无失败之虞（议员变为走狗，宪客变为流寇）。^[12]

闻少华注意到，在刊发上述社论的次日，《民立报》刊登一条醒目的消息《欢迎革命家黄复生、罗伟章》，消息称：“记者（即徐血儿）顷晤黄君，询以汪先生对于‘共济会’的意见，俱悉汪先生之苦心，不辞嫌疑。记者昨日对于汪先生之责难，诚过非贤者。”并以负疚的心情表示：“呜呼！英雄为同胞谋幸福，致久陷縲绁之厄，今反使其一片不得已之血心，不得大表白于天下，是则非社会之过，乃记者之过也。”^[13]据此做出的判断是，徐等于正式向汪精卫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全盘否定了社论。并由此进而推断《民立报》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如果没有得到革命领导人的同意和督促，是不可想象的。

此说略显急切，在随后的南北和谈期间，国事共济会的方案虽然一度成为正式选项，民军内部的反对声音依然强烈。也就是说，为汪精卫洗冤，不等于认可国事共济会的办法。持论激进的《天铎报》就于11月22日刊登短评《不可揣测之共济会》，质疑该会：“共济乎？集会乎？无意识之结合而已。姑无论共和立宪两主义如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也，就令国民代表群集京师，两者之中，必有所择。此时多数意见如属意共和，则请愿虏廷解权逊位，当由君主党任之。试问杨度有此能力乎？否则会议结果主张立宪，则运动民军释兵解甲，当由民主党任之，试问精卫南来由此面目乎？要之，此会就令成立，必无结果，可断言也。精卫闻誉卓卓，当不致退化至此。如果在发起之列，或为别有用意。道途传说，未敢轻测大贤，姑拭目以覩其后。”

^[14]11月29日，《天铎报》又刊登消息，指“汪精卫中途变节，与著名之走狗杨度为伍，所设国事共济会，其宗旨虽惝恍迷离，而真相固已暴露于社会，无可掩覆。近闻与袁世凯密谋，且函致各省都督，大施秘密运动之手段”^[15]。

不过，北方反对的声音同样很大。资政院陈情未获通过的次日，徐佛苏拜访了汪荣宝，主张南北分立，力言统一主义不可行于今日，且谓国事共济会徒滋纷扰。汪荣宝觉得“所言亦颇有理由”。^[16]而言官对于钦派议员们至死不悟的态度依然觉得软弱无力，希望言辞更加决断，出手更加凶狠。12月2日，御史欧家廉具奏，折称：“近闻资政院仍主不用兵力。京师复有弭乱和平会声明已电武昌和平解决。其尤可愤可恨者，则莫如国事共济会，欲以君主民主政体召集国民，投票取决。是匪战而胜则以兵力取吾国，匪战而败则以民力取吾国。然则无论如何终亦必亡而已。”他主张乘胜进剿，一律肃清，不任调停。同日又再度上奏，历数资政院要君之罪三，误国之罪三，通匪之

罪五，其中通匪之罪第五条便是：“国事共济会欲以君主民主政体投票取决，大逆不道，令人发指，而该院竟提作议案，既不能通过，又欲协商阁臣代奏，其为敌作伥也可恨，其视君父如路人也可杀。”

[17]

言官动辄口诛笔伐是常态，钦定议员居多的资政院会议否决呈请也在意料之中，倒是内阁拒绝代奏的举动令人有些不可思议。一般论著均指国事共济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受袁世凯的指使，而这时袁世凯正是内阁总理，反而拒绝国事共济会的要求，似乎不合情理。

国事共济会的兴废与袁世凯的行止的确有着密切联系。国事共济会于11月12日发起，而袁世凯于11月13日抵达北京，11月14日晚，汪荣宝、杨度等人即分别拜见袁世凯。避居天津的汪荣宝于13日晚接到资政院电话通知回京议事，抵京后的活动日程为：“饭后到资政院，晤伯屏，悉昨日会议，以袁相已到，本院应与接洽一切，故今日特开谈话会议议对待袁相之法。三时顷开会，李议长报告顷已晤袁相，尚拟辞职，又对于宪法信条上总理大臣之地位颇不了了，且亦未悉资政院政见是否与己相合，故非讨论明白，不能担此重任。议员讨议数四，公举征宇、绶珊、仲威及余，凡四人，前往谒见，解决各项问题。旋散会。电约袁相于八时顷往见。余先散，与征宇等约以七时半会东兴楼，旋往东单二条胡同访仲和。晚饭后，赴东兴楼，与征宇等同诣锡拉胡同谒袁，袁首述主张君主立宪之宗旨及理由，次述对于信条上种种之疑问，次言对内对外各种困难情形，末言辞职之意。余等一一为之解释，并劝其当以天下为己任，不可固辞。袁允再商，旋各散。余回二条胡同，许九香来谈，是晚即宿章寓。” [18]

同日，杨度等人亦拜见袁世凯。严修日记：“九月二十四日，七钟起，小食后访哲子久谈。访静生不遇。……到内阁印铸局，晤卢小湘，待一小时，璧臣始至。谈次，袁云台亦至。璧臣留饭，饭后同云台至其家见宫保，同见者哲子、燕孙、伯讷。谈至十二钟辞出。”

[19]

如果说汪荣宝等人见袁世凯主要还是资政院的公事，只是先与章宗祥会晤，可能涉及国事共济会的立场主张，杨度和严修、梁士诒等人一同拜见袁世凯，显然就是为了国事共济会的事情。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汪荣宝专程到统计局与杨度就国事共济会事务再次商议。两天后，又到李景和家与杨度、范源濂、汪精卫等人商榷国事共

济会办法。恰在此时，袁世凯内阁成员连同副大臣名单一并发表，汪荣宝对于新内阁的用人颇感失望，但这并未影响国事共济会的行动步骤。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的当天，各报即刊出消息称：“其政见之第一步，即在质询国民之意见，是否将满廷倾覆，抑仅令政治改革。又谓袁系主张君主立宪之人，惟限制君权云云。”在南方民党的报纸看来，这种说法“揣袁氏之意，直以各省起义为儿戏已耳。是说之无根据，而又最足摇惑人心，不辞以辟之，必有坠其术中者。……今日我国除采用共和政体外，必无以免危亡之局也”。^[20]

可是，南方指为无根之谈的传言，在北方却在实际进行之中。尽管此前杨度曾经往来于京师、彰德，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从时、地、人等因素比照看，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平息战事，与其说是由袁世凯授意，不如说是杨度等人主张建言、袁世凯考虑作为备选方略之一更加近真。

九月二十八日（11月18日）《经纬报》的报道提及，“该会之发生，乃著名之政客某为政府所画之密策”^[21]，所谓著名政客，依据以往关于国事共济会的描述，指向似为杨度。在国事共济会中，杨度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名义上担任君主立宪党的具名代表，而且该会的许多决策活动均由他一手操办。国事共济会成立伊始，清廷发表了新一届袁世凯内阁的成员名单，杨度榜上有名，任学部副大臣。但为了国事共济会立场持中，取信各方，杨度特意辞去官职。

《民立报》据德文报电称：“杨度虽授学部侍郎，不允授职，汪兆铭曾与之在京组织一会，请各省派代表至京，研究是否主张共和，抑或君主立宪。”^[22]为此，陈请内阁代奏书中他还特地标明“君主立宪党开缺学部副大臣杨度等”。

此时袁世凯虽然接受内阁总理之职，可是尚无全权，而且摄政王在上，不仅颇多掣肘，两人的宿怨心结也难以化解，因而一直犹疑不决，屡屡表示去意。随后几天，局势风云变幻，从汪荣宝所记他们获取的信息及其反应，可以大概窥知何以如此迅速地结束国事共济会。

11月29日，汪荣宝访李家驹（柳溪）及赵秉钧（智菴），“各谈半时许，旋回寓。饭后到部办事，四时顷散。到陆宅，拟与仲和同谒袁相，因兴致阑珊，复思作罢，忽得费仲深自苏州来书，附来上袁相书一缄，属为代呈，仲和因力劝余往一见。即持书往谒，良久入谈，余告以大势之所趋及国民意向之所在，不宜过事拂抑。袁相极言外交

危急，历引三韩故事为鉴，现在总以赶速平和了结为要。亦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谈一时许辞出，仍回陆宅住宿”。

11月30日，“早起，回寓。徐相来谈，谓革党近在奉天、大连等处有所举动，颇有日本人在内为之主谋，并接济军械，俟革党发动，日本政府即以兵据奉天，盖运动中国内乱，因而乘机以平乱为口实，遂其野心也。又闻英人进兵广州，法人进兵云南，若再不解决，必召瓜分之祸，属设法将此意宣布国民，先将奉天暴动暂行按住，徐商平和解决之策。余允到津与闰生一商”。

12月1日，“早起，……旋往闰生处，转述徐相意，共商办法。饭后，与同诣哲子，遇季新，邀之来寓一谈，缉菴、巨六、哲子、孟鲁、意城、仲威、子来、君度先后来”。

12月3日午后，“在津友人先后来访，知南京已于昨日被民军完全占领，并闻官军与武昌革军定休战条约如下：一、两军各不得进攻；二、于休战期内各不得增加战备；三、海军中立；四、休战期以十五日为限；五、本条约由英领事保证之。傍晚，得念慈书，报告南京被占之事。闰生来谈，旋与立甫、蓉阁共为手谈以消遣。晚饭后，子来、意城来述南中情形，已而孟鲁来长谈”。

12月4日，“早起，访闰生及伯刚，各谈片刻而回。得仲仁、翼之等公电，属转达项城，大意谓两军各有和意，会议结果应绝对服从，请预储实力，以免反汗”。^[23]

短短几天，局势变化的主要焦点就将由战场转到谈判桌上。结束国事共济会，可以避免两面受敌的尴尬，尤其是避开清廷内部强大的阻力，而将其政治主张通过和谈来实现，然后转而向清廷施压。

作为国事共济会的分支机构，奉天的国事共济分会“其宗旨甚形歧异。因系政界发起，故到会签名者大率主持君主立宪，而各界人士咸希望共和政体，彼此各执一是，恐难取效”^[24]。该会既然以立宪派居多，便循合法途径，举定职员后，将所拟办事章程禀请总督鉴核。结果总督谕饬：

朝廷实行君主立宪，重要信条业已宣誓，是国民改革之目的已达。国事共济总会原为征求两方面意见而设，今宗旨已定，即可无须再立分会。且闻天津总会近已解散，则各省分会更属何所附属，所谓

继续进行尤属无谓，且党派分歧，议论蜂起，决非人民幸福。反不如各安生业，一意保安，俟大局平定，再行组织政党，较为有益。仰即遵照解散，所拟章程著即作废。^[25]

合法程序尚未完成，组织便已经寿终正寝。而吉林和黑龙江的国事共济支会，成立之时已是国事共济会即将解散之日。

注释

[1] 本节以上各段引文均见于《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国事共济会宣言书（续）》，《顺天时报》1911年11月16、17日，均第2版，“特件”。

[2] 《致资政院陈情书》（1911年11月17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刘晴波编：《杨度集》，第540—541页。

[3]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第1059页。

[4] 《资政院第十一次会议纪略》（《经纬报》十月初二日），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第1230页。《顺天时报》之《资政院第十二次议事详志》记为“是时已五钟半，议员纷纷退出，议长即宣告散会”。

[5] 《呈请内阁代奏书》（1911年11月23日，据《国民公报》1911年11月26日），刘晴波编：《杨度集》，第541—542页，标题将“代奏”误为“代表”。

[6]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第1063页。

[7] 《共济会如此下场》，《民立报》1911年12月11日，第3页，“新闻一”。刘晴波编《杨度集》第542—543页署期为12月5日，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第1376—1377页无具体时间，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36页记为12月4日。

[8] 振公：《和平解决之殷鉴》，血儿：《万无和理》，《民立报》1911年11月6日，第1页，“社论”“天声人语”。

[9] 《警告国人毋惑于议和谬说》，《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第1页，“社论”。

[10] 君武：《言论自由》，《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第4页，“大陆春秋”。

[11] 血儿：《无聊之共济会》，《民立报》1911年11月22日，第1页，“社论”。

[12] 《共济会之宗旨何在》，《民立报》1911年11月22日，第3页，“新闻一”。

[13] 《民立报》1911年11月23日，第3页，“新闻一”。

[14] 布雷：《不可揣测之共济会》，《天铎报》1911年11月22日，第2版，“遁职一”。

[15] 《汪精卫之鬼鬼祟祟》，《天铎报》1911年11月29日，第3版，“中外大事”。

[16]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第1060页。

[17] 故宫档案馆：《武昌起义清方档案·清吏条陈·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御史欧家廉奏折》，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1—502页。

[18]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第1053—1054页。

[19] 《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第3册，第1708页。

[20] 汉立：《万难舍去之民主论》，《民立报》1911年11月24日，第1页，“要件”。

[21] 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引九月二十八日《经纬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第1367—1368页。

[22] 《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第3页，“专电·大革命之外电”。

[23]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第1068—1073页。

[24] 《共济会之现状》，《盛京时报》1911年12月5日，第5版。

[25] 《督宪谕饬解散共济会》，《盛京时报》1911年12月5日，第5版。

三 南北议和的关键议案

就在国事共济会宣布解散之际，形势继续急剧变化。一方面，革命军和清廷通过不同渠道暗中已经开始议和；另一方面，迫于列强拒绝借款等内外巨大压力，摄政王被迫退位，袁世凯如愿成为责任内阁的全权总理大臣。相较于成立之际，局势更加有利于国事共济会主张的实现。因此，与现行成说有异，国事共济会的政治主张虽然南北两面均遭碰壁，但未必是全然不得人心，而该会的解散，也并非由于其政治主张不切实际。恰恰相反，在南北和谈中，以国民会议表决国体政体成为重要选项，也是清政府与民党持续争执的焦点，而国事共济会成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尖锐对立的南北双方之间的润滑剂。深入一层考察，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国事共济会的组织公开解散，才便于其成员在南北和谈中发挥作用。

国事共济会解散后，一部分成员试图另行组织，介入南北和议之局。汪荣宝记：12月8日，“四时许诣陆宅，巨六、孟鲁、伯平诸君以两军在汉口开平和会议，欲另行组织团体，相机补助，劝余同行，余殊不欲预闻”。汪荣宝的态度，并非不关心和谈，而是不希望结团引人注目。12月12日，“早起，雪，访闰生，略谈即回。旅居无事，私拟媾和条款数事，大略如下：一、改大清帝国为中华民国；二、民国之统治权由国民依宪法组织各机关行之；三、大清皇帝及其继统之子孙永远享有皇帝之尊称及荣誉；四、皇帝驻蹕热河；五、皇帝于皇室自治事宜有制定法规之权；六、皇族之有爵者依旧世袭；七、皇族除特免兵役义务外与国民有同一之权利义务；八、皇室经费年三百万圆；九、本约与民国宪法有同一之效力。似此调停，君民之间彼此均可相安无事，实为上策，未审会议诸君见及此否”。

次日，汪荣宝将所拟媾和条款示来访的张心穀，张大赞成之，遂访陆宗輿，初意约其一同入京将条款游说徐世昌转达袁世凯，陆宗輿颇不同意，争论良久，即回。后来汪荣宝又找曹汝霖共同游说徐世昌，曹辞以感冒。12月22日，因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南方民党坚持共和，停战展期，山陕告急，外债又无从借贷，曹汝霖嘱将前拟条款转达徐世昌，忠告袁世凯。汪荣宝遂作书致徐世昌。^[1]只是这时上海和

谈已有眉目，准备以国体政体问题付诸国民会议公决，汪荣宝等人所拟条款胎死腹中。

另一部分国事共济会成员，如江庸、杨度、汪精卫、黄为基、章宗祥、金邦平、范源濂等，则直接介入了南北和谈，而且杨度、汪精卫还分别在清廷、民党以及南北之间起着沟通联系的作用。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不久，就“令资政院议员多人，又另委任杨度、刘泽熙等会同拟订议和条件”^[2]。据说汪精卫曾在北京多方策动，促成唐绍仪为议和代表；后来又在谈判过程中辅佐伍廷芳，力图掌握和议的主导权。^[3]也就是说，解散国事共济会，并非因为和平解决无望，公决不可行，而是很难说服清廷接受这一方略，于是将主攻方向转到南北和谈的谈判桌上。

南北和谈中，北方所代表的是袁内阁而非清廷，谈判很大程度上就是贯彻落实国事共济会的宗旨，实现停战，通过协商，决定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问题。清廷看似仍在袁内阁之上，其命运却操自他人之手。这一转换虽然不过是权力的转移，而非宗旨的改变，其结果却避开了清廷的干扰，使得袁世凯可以掌握操纵局势发展变化的主动权。

12月18日南北开议，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停战问题，三天后的第二次会议则进入正式议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的取舍。民国总代表伍廷芳坦言民军主张共和立宪，清帝逊位，由百姓公选大总统。唐绍仪声称，北京来者不反对共和立宪，所协议的是和平达到共和宗旨的办法：“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双方似乎一拍即合。所以伍廷芳说：“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4]

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却有些微妙。伍廷芳以为只要优待清室，包容满人，便可以和平解决。而自称全权大臣的唐绍仪，虽然代表袁世凯表示接受民主共和，又认为“国人皆希望共和”，前提却是“必须徇众”。所谓徇众，具体办法就是由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唐绍仪自称武昌起事后他曾上折请求用此办法，清廷不允，但是现在自己仍然坚持。尤其强调：“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

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5]

唐绍仪所说的奏折，迄未见到。专文论述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的学人，或坦言未见，或未予追究。^[6]张晓辉、苏苑著《唐绍仪传》称，武昌起义后，唐绍仪拒绝出任邮传部尚书，主张根本改革：（1）禁止皇室亲贵参预政权；（2）确立立宪政体，尽速制定宪法，召开国会；（3）实行责任内阁，改革地方官制，中央与地方分权；（4）裁减军费；（5）国家重大问题，由新设国会决议解决办法。10月19日，唐起草了一份说帖，呈送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徐世昌，提议“赶速召集国民大会，商讨今日中国如何立国，以解决一切所不能解决之问题”。并且《唐绍仪传》特意括号说明“此即后来南北和谈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的发端”。^[7]

关于此事的依据，《唐绍仪传》没有注明出处。而时间和引文的文字与张国淦自拟的一份说帖完全一样。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记，八月二十七日，内阁阁丞华世奎（璧臣）告诉他：江苏程德全因时局危迫，电奏“请罢免现任亲贵内阁，另简贤能，并惩办酿乱首祸之人，提前宣布宪法”。揭破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向来疆吏不敢据以上闻者，可谓有胆。然而，当轴对此电奏的态度却是：“摄政王不置可否，庆邸自知才力不足，屡屡乞休，今日得此电奏，总协理一同恳求罢斥，泽、洵、涛三人，不以为然，泽尤强硬，言荫昌大军，已到汉口，指日可平。”张国淦表示：“此次武昌起事，在民党方面，酝酿不止一朝，其潜伏势力，弥漫全国，若视为武昌一隅，能用大兵剿灭，便是错误，当求其他方法解决。雪帅电奏办法，如在两三年前，或可有效。现在局势如此，似非此种常谈所能挽回，雪帅岂有不知，但身任疆吏，不得不如此立言耳。”华世奎指误国全在载泽一人，并以其言转陈总协理。次日，总协理请张国淦详写办法节略。于是张拟就一份说帖交华世奎转呈总协理。说帖全文如下：

窃以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当先审世界之大势，大势所趋，有如决川，虽有强力，莫之能遏。今日世界大势，论政体则有专制立宪之殊，论国体则有君主共和之异，在各国早演为事实，在吾国尚视为新奇。溯自甲午中东一役，继以庚子联军，朝廷毅然改图，已颁布立宪之诏矣。顾人民奔走呼号，争先恐后，而政府迟回审顾，计日待时。其稳健者主张君宪，无以厌其要求；其激烈者倡言民主，更复资为口

实。总之，无论君宪民主，悉本于爱国之忱，爱国无望，于是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之说，相摩相荡，而全国风靡矣。

大凡事变之来，必求自省。本朝临御天下二百余年，昔何以盛，今何以衰，昔何以治，今何以乱，推原其故，皆因政治之不修，兼以世界潮流，澎湃而至，穷变乃久，决非拘囿成法所能挽回。今之论者，以为川鄂一隅，党徒思逞，大兵一集，指日可平。然民心已涣，政府何以萃之；民心已动，政府何以静之；疆吏之离心离德，谁共艰难；军士之趋势趋时，谁能效命；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为矣。论者又以为亲贵内阁，应予罢斥，实行立宪，以期补救。然此种办法，若在两三年以前，见诸实行，急起直追，尚可收效。今则涣汗之号已失，崩溃之局已成，虽莅太庙而宣誓之，诏国人而申儆之，时事日非，空言何补。为今之计，唯有开诚布公，以全国人心为趋向，当即飭令开拔军队停止前进，赶速召集国民大会，商讨今日中国如何立国，以解决一切所不能解决问题；内政如何而修明，外侮如何而抵抗，种族如何而融化，党派如何而沟通。议决以后，立即宣布，朝野上下，一律遵守，庶可示国人以大信，保皇室之久安。

侧闻总协理谦让为怀，屡思引退。继任人选，如程德全、伍廷芳、唐绍仪、张謇、汤寿潜、梁启超、谭延闿、汤化龙、蒋方震、蔡锷、章士钊、陈锦涛等，果能前席以待，定为众望所归。在此时间，开放党禁，如蔡元培、王宠惠、章士钊、居正、宋教仁、胡汉民等，不宜歧视，亦当旁求。在朝有焕然之改观，在野自幡然而望治。并由社会有力人士，唤起舆论，分途向各方接洽，勿论何人，以国家为重，停止一切进行，静待大会议决。或谓时局纷庞，众论簧鼓，果其议决，有为政府所不能办者，又将奈何？然今日举朝皇皇，几有朝不保暮之势，再经酝酿，窃恐土崩瓦解，更不忍言，至彼时求如今日之从容讨论，且不可得矣。与其人为汤武，毋宁我为尧舜。华盛顿开国之成规，法兰西革命之惨史，在人自择，亦在人自为，不必残民而召其亡之痛，不必流血而臻大同之庥，中外播为美谈，古今传为盛事，孰得孰失，是在总协理衡量轻重，造膝密陈而已。既承明问，敢用直言，事机急迫，伏望恕其狂妄焉。幸甚。

所谓总协理，即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奕劻、徐世昌等。据华世奎说：“此说帖交总协理，阅至末段，庆邸颇惊异，亦无表示；徐相言，可告其将‘与其人为汤武’以下删去，再誊一份送来，以便呈摄政。”张国淦认为摄政王载沣无知识，不足与言，故不愿删去再誊，华亦未催，只是告以：“说帖中国民大会，徐颇重视。”又说：“总协理询问王宠惠、章士钊、居正、宋教仁、胡汉民等为何如人？”

张国淦自称：“其后伍、唐议和，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其发端即在此。”虽然临时国会一事后来议而无果，“此说帖无足轻重，然其立论以国民会议解决时局，与当时一般之主张君宪不同”。

[8]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以国民会议的形式作为解决重大问题的选项影响深远，如果发端的历史地位能够确立，价值不言而喻。

不过，程德全电奏发于八月二十五即公历10月16日，而八月二十八为10月19日，此时仅武昌一地起事，虽然川乱已久，各地局势开始动荡，但只有零星暴动。这样早就提出召集国民大会来解决包括立国在内的一切问题，似嫌突兀，尽管文字内容并无与时势不相吻合之处。

张国淦不仅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发明权归于自己，而且声称南北和谈采用此法亦由其建言，据他说，十一月初五日（12月24日）深夜，唐绍仪嘱汪精卫、魏宸组来，约其往唐绍仪下榻的戈登路英人李德立家，唐声称：“若不承认共和，不能开议。已电袁内阁，袁主张亦困难，但在会议席上，又不能公然表示，奈何！”张国淦即表示：“在武昌起事时，我曾有一说帖，召开国民大会，此时如以国民大会，讨论国体问题，代表人民公意，似尚不难解决。”唐曰：“召集大会，须相当时日，又不敢言确有把握，奈何！”张认为：“不必过虑，在今日共和已不成问题，此不过一种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再酝酿，当有多方面凑合，得以达到目的，何妨与伍代表一商。”唐沉思半晌，说道：“确是好办法。”于是“唐告伍，伍亦欣然接受，当密电袁，袁复电同意，故有初八日召集临时国会之电”。

[9]

据此，召集国民大会讨论国体问题是南北和谈期间张国淦向唐绍仪建言的结果，而唐绍仪致袁世凯的电报则显示其离京南下前已经和袁世凯会议有关事项。况且十一月初五已在第二次会议之后，以此证明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主张源于张国淦的建言，时间上无法对应。张国淦关于晚清民初的记载，虽然作为当事人亲历者的确掌握不少内幕隐情，但也掺杂一些后来的绘声绘色，令人征引之时颇为迟疑。此即一显例。

目前关于南北和谈的资料，唐绍仪部分缺漏最多。后人著述误引张国淦所拟说帖为唐绍仪的说帖，并不能否认第二次会议时唐绍仪自

称曾经上折的说法。有学人注意到，1911年11月21日洪述祖致赵凤昌的一封信，透露了一些关于此事的消息。函谓：

上月初在少川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代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劲。（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10]

作者据以推断，1911年10月下旬，洪述祖在唐绍仪处读到赵凤昌的歌电（10月26日），次日起草了一份诏书文稿。这份诏稿是由唐绍仪授意或在其赞许下拟定的，意在由隆裕太后发布诏书，召开国会，以多数决定采取君主或民主制，但遭到王公贵族的反对，并无结果。到11月13日袁世凯出山，才由唐绍仪把诏稿分送王公贵族和袁世凯。袁甚为赞成，却难于启齿。不得已，同意唐绍仪所请，将其从原定内阁名单中开缺，以便行事。11月18日，唐绍仪往晤奕劻，反复劝说。庆王以不能独断，推说次日决定。而次日却又翻覆，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徐世昌、袁世凯均力争不得。唐绍仪便建议由袁世凯以内阁总理的身份奏请施行这项主张，如清廷不允，即以辞职相逼。^[11]

与此相应，11月14日，清廷眼看“自武昌事起，各省纷扰，大局岌岌，实为全国存亡所关。朝廷胞与为怀，不设成心，亟应征集国民意见，共谋扶危定倾之策。著各督抚传谕各该省士绅。每省迅速公举素有名望、通晓政治、富于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克期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12]此举很可能是对国民会议的一种变相回应，只是代表选举、召集地点等事项，显然与民意相去甚远。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资政院尚且不能代表民意輿情，临时召集的代表更是难以表达意见。

作为奉诏者之一的张謇，鉴于武昌起事后形势剧变，已经改变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态度，认为唯有共和可以解救危局。不过他更加倾向于清帝主动退位，通过袁内阁暗中冒死建言，至于公开答复清廷的电召，则声言：

政体关系人民，应付全国国民会议。以业经辞职并非公推之一二人与少数廷臣讨论，断无效力。现在各省表示独立，若仍以君主名义召集，势必无人承认。应先请明发谕旨，宣布尊重人道、不私帝位之意，以豁群疑而昭圣量，然后令全国军民公举代表，于适宜之地，开会集议，确定政体及联合统一之法。事经公决，国民自无异议，即不至有纷争割裂之祸。事机危迫，舍此无可和平解决。^[13]

拒绝的是清廷以君主名义召集的官绅会议，而主张全国军民公举代表的国民会议。

此外，由唐绍仪发端的说法还得到一些相关证据的支持。1911年12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浙江代表陈毅报告，在汉口与黎元洪大都督代表会晤的清内阁总理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称，“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所以代表会当天做出“缓举临时大总统”的决议。^[14]这表明到上海之前唐绍仪已经向民党表示要以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

在此前后，提出类似主张者不仅唐绍仪一人，正在密切关注时局变化以图积极参与的梁启超也有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主张。11月18日，梁启超获悉袁世凯内阁以其为法律副大臣，立即致电袁世凯请辞，同时进言道：“祸变至此，今后戡难图治，必须视全国民多数意向，虽有非常之才，苟拂輿情，终无善果。”具体而言：“今惟有于北京、武昌两地之外，别择要区，如上海之类，速开国民议会，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会议结果，绝对服从，庶几交让精神得发生，分裂之祸可免。”^[15]

唐绍仪、梁启超、张謇、张国淦、洪述祖等人的不约而同，至少说明在当时中国朝野政坛上的一些有力人物看来，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决定国体政体是不错而且可行的选项，唯有如此，才能迅速平息战乱，避免分裂。可以说，唐绍仪在和谈第二次会议提出用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注释

[1]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第1077—1091页。

[2] 《民立报》1911年11月23日，第2页，“专电”。

[3] 《铃木驻南京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函》1912年2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

[4]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1页。

[5]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92页。

[6] 丁贤俊、陈铮：《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37页；朱英：《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76页。

[7] 张晓辉、苏苑：《唐绍仪传》，珠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29页。

[8]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25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273—275页。

[9]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252），第292—293页。

[1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9—1070页。

[11] 丁贤俊、陈铮：《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37页。

[12] 佚名辑：《宣统政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80），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1页。

[13] 《复内阁电》1911年11月27日，《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页。据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3页），电报发于11月27日。

[14]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年版，第250页。

[15] 《梁启超致袁世凯电》，《申报》1911年11月26日，第1张第4版，“公电”。电文署期“勘”，即二十八日，当为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即公历11月18日。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法部副大臣梁启超致内阁电》记：“立集国会，以顺輿情、定国体。”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4页。

四 袁世凯、唐绍仪的态度取向

面对国体政体的抉择和国民会议这样前所未有的取径，袁世凯必须权衡取舍。提议人虽然代表了中国朝野南北的实力派，但是在袁世凯的政治考量中，列强尤其是英国（仍然主导世界并且在华拥有话语权）和日本（虽然后起却与中国利益攸关）的态度更加至关重要。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列强，对于中国发生革命后国体政体的态度取向，大体与本国实行的政治制度相吻合，并依据局势的变化前后有所调整。其中日本、俄国坚持君主立宪，英国开始认为君主立宪适合，后来则倾向于只要是中国民众自决，任何政治形式均可接受。12月19日，袁世凯将与上海唐绍仪的来往函电抄件各一份派人送给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唐来电称：

本人由汉口启程之际，英国总领事曾向本人透露称：革命党坚决主张国体共和，和谈能否成功，实无把握。做为调停方案，拟向双方建议在一定期间采取君主立宪制，限期至现今皇帝年满二十五岁为止。届时可视皇帝之才德如何，学问如何，以及民智程度又如何，由国会研究决定究竟采取君主政体或民主政体。未悉此案是否可行？该总领事又云：此案业已告知黎元洪，等等。在今后会议中，革命党方面是否会提出如上议案，虽尚不得而知；但英国公使是否仍持此意见？阁下对此有何见地？均希急电示知。

袁世凯的复电谓：

我方应坚决主张君主立宪，应以《十九条》为谈判基础。估计革命党方面必加拒绝，但总要坚持到底。直至争论到最后，方能考虑调停办法，借以博取天下之同情。^[1]

英国总领事的方案，虽然较唐绍仪等人的意见更为保守，将国会公决国体放到十几年以后，基本思路和取向却与唐绍仪等人大体一致。而袁世凯的答复以及将相关函电送交日本驻华公使，一方面是显示自己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则有试探反对中国实行共和的日本政府的态度反应之意。

关于袁世凯、唐绍仪围绕国民会议的策划活动，在京师探听消息的罗惇齋于12月13日致函梁启超有所报告：

汪兆铭自共济会后，时来往京津之间，先由严修介绍见袁。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之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汪复至津见唐，唐言此事是我发起，必以多数为服从。汪已屡与唐协商。（唐为正，杨士琦、严修为副，有严不愿行之说。）此次议会北中以唐为主体，南中以汪为重要枢纽，议决后战事当可望和平。

袁当时尚未敢迫监国退位，及收禁卫军后，乃由唐代为计画，先将禁卫军炮队全数调援山西，再将药弹运送南伐之军，除调发外，京中所留仅三四千人，无炮无弹，决定洵、涛等必无能为，乃决请监国退位。旋派冯国璋充军统，尽收满人兵权（军谘府早已归徐，满人无一有兵权者。）而满人最枭雄者为良弼，亦收为己用。于是满人之权，尽入己手，必无他虞。乃派大使赴汉口议和，无论解决如何，皆易办理，皆唐氏帷幄之功。^[2]

是函显示，从罗所获信息看：其一，国民会议由唐绍仪发起，唐本人当时几次在不同场合如此表示；其二，袁世凯赞成由国民会议多数取决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其三，为袁世凯谋划的政客，杨度之外，唐绍仪更是关键人物，就地位而言，唐绍仪更加有力。再参照前引严修日记，国事共济会成立之际，其成员以及严修的确与唐绍仪有所接触商议，则唐绍仪幕后策划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问题，不是没有可能。只是从时间看，国事共济会并非由唐绍仪授意组织，唐的作用应是在国事共济会与袁世凯之间联系，利用国事共济会鼓动实施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方略。

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在袁世凯、唐绍仪看来，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是迫于形势而对民党和清廷的权宜之计，甚至如报纸所称的缓兵之计，还是真的打算将国家大政诉诸民意。进而言之，袁世凯对于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选择究竟态度如何，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对此是否具有完全的共识。由于相关记载千差万别，以及袁世凯、唐绍仪、杨度、汪精卫等人后来的表现各异，导致学界认识分歧，事实真相扑朔迷离。需要仔细梳理解读史料，努力回到历史现场，设法还原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

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曾宣布其政见，其中说道：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3]

袁世凯的此番表白，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故作姿态？关于袁世凯的政治取向及其权变底线，他本人在不同场合以及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出来的信息，可谓变幻莫测，以致令许多局内人也大惑不解。而袁世凯公开与私下的解释，则往往强调其他各方的态度压力，使其身不由己。最终目的，还是考量对方的立场和利益。只是在不断东倒西歪、左右逢源的终点，达成最符合袁世凯本人利益的目标，或者说，使之成为最大的获益者。所以亲历者和后来人均认定袁世凯是弄权窃国。

接受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前提，需要对共和有所认识。袁世凯原来主张君主立宪，重返北京政坛之初，与之关系密切的坂西利八郎少佐就告诉他人，袁世凯觉得与黎元洪很难和解，因为后者坚持建立纯粹的共和国，两人的立场完全相反。^[4]11月14日，袁世凯派其子代表他往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 N. Jordan），试探英国的态度。据说袁世凯原本希望挽救清廷，现在似乎已再不可能扮演忠贞角色，不知究竟应采取何种路线，实在极感困惑。黎元洪和武昌起义的领袖们已促请袁世凯出来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并保证充分予以支持，相信上海、广州及其他革命据点也都会跟着给予支持。虽然袁世凯希望在清廷之下组成立宪政府，但一般民众希望废弃王朝制度，唐绍仪和袁氏的许多旧友也拒绝为君宪与袁合作。针对袁世凯的询问，朱尔典表示，外国人的一般看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清王朝作为国家的象征元首，同时进行立宪改革。共和体制看来仍不适合中国，而是一项冒险的尝试。袁世凯的儿子声称起义人士要袁担任统治者，甚至暗示其父可能被拥立为皇帝，共和只是个过渡阶段，并同意朱尔典的请求，让朱尔典将所谈秘密转告美国公使。^[5]

可是，次日朱尔典拜会袁世凯，听其本人直接表达的意见，却有异于其子的推测。袁世凯指黎元洪坚持废除清制，而反对自己的所有建议。上海和南方革命军皆支持成立民国，北方民意则赞成君主立宪。袁意欲领导赞成后项政策的党派。资政院已不足以代表全国民意，袁建议在上海或天津召开各省代表大会，将自己的计划交由大会

通过。若能结合北方各省支持其政策，将可形成一个政府核心，借以终将赢得南方的支持，或以武力收取。但袁同时又说毕竟面临极大困难，旧幕僚四处分散，不易与其结合；国库空虚，没有收入，无法推展政务执行与军队补给。其明言的政策为：妥协辅之以武力。目标则为：确实把握民意，据以策定计划。希望英国有实际经验的政界人士以朋友身份协助其完成艰巨任务。^[6]

11月19日，唐绍仪告诉朱尔典，他认为袁内阁的政策在目前舆论中被认为毫无希望，并说已婉拒入阁。其建议由太后懿旨令摄政王让权，暂时改由汉人辅佐皇帝，同时另下谕旨，待尽早于上海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民意表决采取何种政府形式，届时另作变更。唐期望最终成立民国，由袁世凯担任总统，并正致力于达成此目标。北京的资政院议员和回国留学生多数赞成建立民国，唐之目标必然得到他们的赞同，可能亦为袁氏本人所默许。^[7]

次日，朱尔典接见了三位由唐绍仪介绍来的主张共和人士的代表，据说均与袁本人保持着私人联系。他们指责袁世凯采购军火，增派大批军队前往汉口，此举将引起血战，无益可言，所以反对任何外国人违背中立原则给予袁氏财物支援，并询问能否加以劝阻。朱尔典答称已尽力协助防止生命损失，列强在汉口只有防卫性行动。而三位来访者辩称情形并非如此。主张共和的人士皆热切盼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唯有清廷暂退热河，等待民意宣言，且清军撤离北京，方可得见和平前景。袁本人应当认清这一局势，惟尚待有人向其提醒劝说。对于是否愿意出面担任劝说者的问题，朱尔典表示干涉如此大事，驻华公使绝不可为。^[8]

后来朱尔典报告称：唐绍仪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做法令人费解，唐本人的解释是，他发现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共和主义信念比预料的要强烈得多，而被迫做出其所能做的最大妥协，以期实现和平解决。然而，极为普遍的看法则是，从不隐瞒其共和倾向的唐氏认为，他能够左右北京，并制造一种使袁氏非担任共和国总统不可的形势。但无论袁氏的倾向如何，由于谈判的方针使将领们和北方军人产生反感，他不得不对唐氏及其行动不予承认。^[9]

虽然此前相继有唐绍仪、张国淦、洪述祖等人建言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还是有些忐忑。据张国淦记载，袁世凯到京后，主张君主，不言共和。后各处通电到京，表示虽不赞同共和，但世界既有共

和学说，不妨研究，于是约汪精卫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及共和学理，三夜后渐及事实。汪又约魏宸组同往，讨论君主、共和何者适宜中国。因魏善于辞令，每以甘言饵之，连谈数夜，袁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其促成不可，且非其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汪、魏并常到六国饭店，与唐绍仪接洽。唐谒袁所谈，汪、魏亦不知。袁本意在拉拢民党，为便于接谈后进一步了解，故唐往南议和，汪、魏同往。^[10]

针对袁世凯就任之初所发表的政见，时论揭露其隐衷道：

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已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其所以反对共和者，意固别有所在。……袁初到北京，即向人云：内阁大臣三年一任，为期太迫，恐于政治不能多所举措。识者莫不嗤之。今于共和前途，如是作梗，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11]

《时报》的意思是，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目的只在最高权力，而且必须专制。至于名目以共和还是君主，则要看如何才能有助于攫取和施展权力。后来白蕉撰写《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即征引《时报》的这一段文字，证明“袁之不见信于当时”。^[12]张国淦《北洋从政实录》从不同角度记录辨析了袁世凯、唐绍仪、杨士琦和国事共济会关于君主民主的本意及差异：徐世昌告以袁表面维持清室，其次讨论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北方代表唐绍仪所谓主民主，意思为袁受禅，而杨士琦所谓君主，也是项城而非宣统。同时汪、杨组织国事共济会，杨度所谓君主者，与杨士琦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

^[13]

《时报》的政治后台是袁世凯的政坛老对手康梁一派，因而能够洞察袁世凯的内心世界。不过，袁世凯的这一点司马昭之心，当时却未必路人皆知。康梁等人在京师负责与袁世凯及其亲信联络的罗癭公、蓝公武等人，对于袁世凯、唐绍仪等人究竟宗旨为何，前后探得的消息就很不一致。12月15日罗癭公致函梁启超称：

议和已移至上海，唐、杨、严之外，加派杨皙子为参赞，范静生系范老约同行。时论谓君主一层，大有希望，而梁燕孙谓不过有三成把握而已。汪兆铭同时南行有黄为基者，与其发起共济会，则谓汪宗

旨极和平，而沪中各报已攻击之。汪力调停于官、革两方面，而革一边不甚有势力。南中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人，如浙省陈敬第（江苏为雷奋）来缄，谓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哲子谓项城仍可为拿破仑云。各报均言唐力主共和，梁燕孙谓绝无其事。梁征问公议论，略以相告。梁谓君位共和，项城与唐均同此旨，嘱将尊恚隐括简言由梁电告唐，资其议和之材料。即已电蛻将尊意见书暨北江致黄书，并录送唐阅，或可资其采择。惟深察南中情形，似非民主不可，若决定民主，则项城不知如何处置。有言俄、日、德三国断不容中国出于民主，必出而干涉，以兵力压制革党，此后隐忧方大，深望南中有深识之士，早为解决耳。日内拟谒项城，备达尊旨，已托其近习约期相见。燕孙谓项城得尊缄（已泄矣），询及若海，燕云：不识。适杨哲子（已泄）在座，谓其人在津，并略陈若梗概。项城甚欲晤谈，请即函若，粤事毕即北上可也。燕谓公言论机关，所需款几何？答言：非十万两不能开手，欲握言论之中坚，非绝大报不可。燕谓：大众商量，亦以公为君主立宪主持最力之人，得公主持于下，必可渐转舆论。其意似甚欲项城出资，组一机关报，此事当熟商之。鄙意谓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14]

康梁等人当时主张虚君共和，梁士诒等人的说法，很可能是投其所好。照此看来，袁世凯、唐绍仪等人眼中的共和，与南方民党的共和迥异，而南中各色人等心中的共和，也相去甚远。可见即使在“共和”的观念上，各方也是相当不共和的。

南北和谈第二次会议虽然由唐绍仪提出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问题，伍廷芳并未明确表示同意。他认为清廷不会允许这样做，况且“今各省既皆言共和矣，可谓众矣”。尽管还有数省服从于清政府的权力之下，总体而言已达多数取决的多数。又提及各省代表已至南京议决共和，若是另行选派代表，势必耽搁时日。既然多数国民心理倾向共和，应当从速决断，以免另起风波。唐绍仪则指出，各省代表不能由谘议局指派，到上海的直隶、河南、东三省、甘肃等省代表，不能代表实际管辖各该省之人，不具备决断实行之权，但原则上同意和平解决，且非共和政体不可，并表示将以此办法致电请示袁世凯。

^[15]

这一请示，迟迟未得回复。第二、三次会议，整整间隔了8天，这在瞬息万变、火烧眉睫的局势中，可以说相当漫长。虽然唐绍仪声称袁世凯内心赞同共和，而要袁接受共和就非以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

政体之法不行，袁世凯实际上也未必在意国体政体的名实，可是到了公开表态决断之际，身处南北中外各种势力夹缝之中的袁世凯，还是要瞻前顾后，权衡再三。

8天当中，袁世凯在列强和南北各方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在避免日本强力干预中国的政局发展以及国体政体的选择之后，袁世凯又迫使清室及王公亲贵同意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政体。12月29日和谈复会，并连续举行会议，取得了一系列协议。可是在国民会议召开的地点以及代表产生的方法上，双方再度陷入僵局。由于袁世凯担心按照和谈协议的安排，将失去掌控局势的主导权，否认各项已经达成的协议的有效性，唐绍仪及全体袁内阁和谈代表被迫请辞，由袁世凯亲自主持谈判事宜。后者不仅坚持在会议地点和代表产生方式等问题上拒绝让步，而且欲将所有成议推倒重来。

伍廷芳接受袁世凯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的要求，事先并未征得民党各方面的同意，因而民党对此本来不予承认。可是，当袁世凯因为主张会议地点在北京、代表选举办法由清廷制订的意见不被接纳，便全面撕毁所有协议时，民党方面反而成为和谈成果的捍卫者，并借此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和谈本无诚意，甚至其人亦无诚信可言。眼看和谈陷入绝境，双方急于和平解决者干脆抛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选项，另起炉灶，暗中联系，策划直接逼使清帝退位，以达到用不流血的方式实现共和的目的。

正当清帝退位之事筹有眉目，将近公布之时，不料机事不密，报纸先期发布，引起清廷内部的一片混乱。清廷和袁世凯为了稳定北方局势，不得不公开否定相关交涉，并且重提国民会议的旧案。民党方面不知就里，质疑之外，双方展开新一轮的唇枪舌剑。经过一阵台面和台下心照不宣的骂战及交涉，1月29日停战期限已到，伍廷芳公开宣布由于清廷的阻挠，和平解决的期望破灭。至此，民党方面关于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问题的努力完全终结，转而全力运动逼使清帝退位，以实现共和。

有意思的是，1月29日停战届满的当天，杨度等人在北京组织共和促进会，主张从速实行共和。在回答他人的诘难时，杨度表示，原来主张君主立宪是为了和平，而今日北京主张君宪者大都主战，只有共和才能和平。^[16]另组新会，也可以说是国事共济会主张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变相。

清帝宣布退位后，2月16日，伍廷芳、温宗尧、汪精卫等公电南京孙大总统、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对于南北和谈的一波三折加以总结：“盖所谓议和，即与北省同胞和衷商榷之谓。迨前清内阁袁君世凯所遣全权代表唐君绍仪至沪，彼此开议，唐君即宣言欲和平解决。惟以北省军民与十四省起义之民军情谊或有隔膜，意见自不免参差。如欲一致进行，必宜先避冲突之端，以成共济之美，因欲彼此息战，开国民会议，取决多数，以定国体。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乃事机未熟，枝节横生，补救调和，费尽心力。由是乃有清帝退位之说。”^[17]有意无意之间，议和与国事共济会的联系若隐若现。

注释

[1]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89—290页。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6—577页。

[3] 《袁世凯宣布政见》，《时报》1911年12月1日，第2版。

[4] 《鹭泽与四二来函》，[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页。

[5]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1月14日北京发，第278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1页。据袁世凯的儿子说，袁本人主张迅速建立完全的立宪政府，保留清王朝的地位，而不让其掌握实权。但与之间接洽谈中的国民大会不信任清室的诺言，坚持要求解除清军，作为一项保证。《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6日发自北京，第427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12页。是函提及11月22日的电报，署期似误。

[6]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1月15日北京发，第281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02页。

[7]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1月19日北京发，第287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05—106页。

[8]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1月20日北京发，第288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07—108页。

[9]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1月6日于北京，第13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90—191页。

[10]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252），第115页。

[11] 《袁世凯之隐衷》，《时报》1911年12月29日，第2版。

[12]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13] 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1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8页。

[15]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92—394页。

[16] 《复黄光焯陆廉钦书》（1912年2月4日，据北京《民视报》1912年2月4、5日），刘晴波编：《杨度集》，第544—546页。

[17] 《临时政府公报》第20号（附录），1912年2月23日。

五 取代国会的政制选项

通过国民会议以和平方式解决重大问题，避免冲突战乱和分裂瓜分的危机，在世界历史上不乏先例。1912年2月1日起，《盛京时报》连载论说《论国民议会宜借鉴于历史之陈迹》，对于国民会议的历史演进有所陈述：“革命成功后，大权属国民，以决定新政体必开会议。然其间虽含有自开或迫于旧政府开之两性质，要曰国民会议，或曰构成会议（政体构成之义）。此种会议，开幕于法兰西大革命之后，屡反复于十九世纪之间，历史上斑斑可考也。此次支那革命之结果，闻亦欲寻国民会议之例，以解决新政体之问题。详绎十九世纪历史上之事迹，可作支那国民之殷鉴者良多。……革命军设能避延长战争之惨祸，不失列国感情，即可免列国之兵备干涉者，可断言也。”国民会议有一般国民的无限制直接选举，与先由各地选举大统领选举者再由选举者选举大统领的间接选举法两种。美国即后者。法国1848年用直接选举，结果拿破仑三世出现，共和政体不能持久。而中国的问题是，若国民会议决定采取君主制，又或皇帝要裁可决议，革命军当如何应对。国民会议只能决定政体如何，具体审议宪法条文，应由国民会议后再委任少数国民以会议之。^[1]

就当时中国的时势看，混杂着满汉对立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冲突双方不但此消彼长，而且你死我活，乍看似乎很难找到调和妥协的空间。当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派合组的国事共济会提出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之时，清廷、革命党两边的反应都是坚决反对或不屑一顾。但是，伦理中国社会毕竟是由各种纽带连结起来的人际关系网，又极具兼容性，表面的势不两立之下，潜藏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当战事进入胶着状态，双方均无把握克敌制胜之时，暗地的接触、交涉与公开的谈判、联合便持续进行。在双方重要人士的主张支持下，一开始就被弃置的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却成为南北和谈的重要选项。只是倡议的一方后来偷梁换柱，将临时性的国民会议变成正式国会，使得原来被排除于谈判之外的清廷仿佛成为主导者，甚至根本否定和谈的成果；而以为国民会议不过是走向共和的台阶过渡的一方，反而扮演了和谈维护者的角色。

尽管国民会议一波三折，最终胎死腹中，毕竟几度成为和谈的选项，维持了停战的局面，避免了战事的延续和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也使得一直虎视眈眈试图武力干涉的列强尤其是日俄两国碍于各国的牵制不能出手，其所预期的藩部脱离未能实现。而且通过各方角力妥协，最终迫退清室，在实现国体政体重大转变的同时，国家民族避免了分裂，维持了统一。在列强眼中连君主立宪也程度不及遑论民主共和的中国，居然克服了内外种种难以跨越的障碍，和平化解了危机，成功建立起东亚第一个共和制国家，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从后来者的观念考察，清帝退位与让位于袁世凯均为辛亥革命的败笔，前者埋下复辟和伪满洲国的祸根伏线，后者造成革命果实被窃取，专制独裁政治得以延续，甚至出现洪宪帝制的闹剧。诚然，政坛上的袁世凯给予世人的普遍印象早就是权谋狡诈，可是，如果将袁在国民会议问题上的种种言行统统断为弄权算计，似亦有夸大其能力之嫌。在列强、皇族、枢臣、督抚、议员、言官、北军、革命党、民军以及朝野立宪派势力的错综复杂之间，袁世凯不得不想方设法借力打力，以求局势不至于朝着不利于己的任何一面极端发展。其公开与私下言行的差异，的确存在时势使然不得不然的无奈。他知道保留清帝大势已去，真心民主则情有不甘，其余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皇帝不是满人，维护帝制的努力也许不会那样孤立无援；另一方面，对于共和的普遍向往，夹杂着对于清帝的深仇大恨。只有彻底结束满人的帝制，汉人才能因为免于秋后算账而感到心安。

国民会议的几度搁置，并不意味着这一解决政治冲突的和平方式不得人心。在民初乃至后来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不仅屡屡作为国人决定重大事宜的临时选择，而且越来越成为取代声名日益狼藉的代议制的重要选项。

代议制进入中国，始终争议不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直以开议院为主要政治目标，预备立宪期间，这样的宗旨被立宪派承继。革命党人方面，也不乏对议会政党政治抱有极大兴趣的宋教仁等。在革命党人中，湖南人士历来被视为激进的力量，不过他们中间却有不少人对于通过参与现政权进行改革兴趣盎然，包括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和杨毓麟，看似情绪激昂，却未必一味激进。而实现参政目标的重要渠道就是议会政治。

一些重要的革命党人从来反对代议制，最著名的就是章太炎和孙中山。1908年，章太炎针对杨度等人鼓吹开国会，撰写《代议然否

论》，指代议政体为封建之变相，实行选举法，则“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腹腊齐民，甚无谓也”。甚至提出，“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建立共和，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国务官之选，须看功过才能；选议员则不以成绩，“有权力者能以势藉结人，大佞取给于口舌，哗众鬻群，其言卓犖出畴辈，至行事乃绝异”。民权不能借代议扩张，而反因之扫地，造成社会贵贱贫富分裂。他主张另设法司、学官制约负责行政、国防及代表外交的总统，视议院为民之仇，而非民之友。^[2]

章太炎的主张是否可行有效，的确令人怀疑。不过，孙中山也有类似想法。他赞赏瑞士的直接民权，而对美国的代议制不以为然。为此，他要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另设考选权和纠察权，实行五权分立，以改善三权分立制度。具体而言，关于考选权，孙中山认为：“因为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我期望能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如今天的一般共和民主国家，却将国务当作政党所一手包办的事业，每当更迭国务长官，甚且下至勤杂敲钟之类的小吏也随着全部更换，这不仅不胜其烦，而且有很大的流弊。再者，单凭选举来任命国家公仆，从表面看来似乎公平，其实不然。因为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而完全不用考试的办法，就往往会使那些有口才的人在选民中间运动，以占有其地位，而那些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美国国会内有不少蠢货，就足以证明选举的弊病。”^[3]对于国人普遍向往的民主政治形式，尤其是被认为最好的美式民主如此评判，的确有些惊世骇俗。

对代议制的非议，主张主权在民的卢梭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他认为主权不可放弃，亦不可代表，指代议制违背公理法则。中江兆民翻译的卢梭《民约论》十九世纪末即在中国翻刻流行，成为趋新人士重要的思想资源。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主张，至少与卢梭的观念相契合。

民初议会政治的实行，为清季各种争论不休的政治理想提供了检验之机，其效果显然未可乐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借为吴其昌所撰《梁启超传》书后，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结缘进行辩解之余，引申论道：“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歿，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飙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

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4]

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陈寅恪的这番话难免被解读成守旧。其实，但凡经历了民初开国会历史进程及其变相的过来人，都是有目共睹，异口同声。虽然胡适一度认为贿选反而说明议会仍有效力，可是最终连捍卫国会的护法者也弃之如敝屣，不得不另辟蹊径，就不仅仅是好与坏那样简单。只是后来人不知前事因缘，以至于前仆后继地做循环反复的努力而不自知。

议会制与政党政治相辅而行，而在北京政府时期，议会中的党派代表却逐渐流于各省和中央军政实力派的附庸，使得各方面极为不满，酝酿着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普遍意识到，国会的不良是导致现行政体失效的主要原因，如何进一步对政体进行改良，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径：一是在现行政体的框架下，削减国会的权力；二是引入直接民权，建立真正的人民主权机关，并以此作为各权力机关之母。

改革的基本理路，是间接民权与直接民权的协调，代议制的间接民权受到严重质疑，但是直接民权在广土众民的国度又难以操作，只能在二者之间设法平衡。在此思想观念的主导下，改革的基本取向大体有二：一是就代议制本身进行调整，包括削减国会的权力和改变国会的结构，并以国民大会或国民会议的形式加以补充和制衡，尤其是解决临时性重大问题，必须召集国民大会（会议）；二是彻底放弃代议制国会，而以国民大会或国民会议作为替代。

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开始采取第一种方案，试图改造国会，不料在选举中被安福系官僚利用金钱和依靠政治实力派打得大败。此事让自清季以来一直对开国会孜孜以求的研究系人士深刻反省议会制是否适应中国的问题，汤化龙沉痛地说：“使吾意想中之国会政府一日见诸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吾乃真死心削迹矣。吾政制师外国，不知彼固亦旧而新、恶而善者，方其自旧之新、自恶之善，必有层累曲折致力之所，始逮今日。吾但取彼既新既美之制，涂附旧习恶政之上，以冀相入，其药不应病，宁足怪。而觐国者皆摭此遗彼，此良可

恨。吾将亲察而求之，或有万一之获。”^[5]外国的良法美制是根据其国情民意不断调适的结果，照搬未必能治中国之病，必须另辟蹊径。

梁启超欧游之后，对在中国能否有效实行代议制也完全动摇，他说：“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则无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6]在1919年9月创刊的《解放与改造》发刊词中，他公然宣布：“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7]也就是说，要从代议制的间接民权转向直接民权，用直接民权来取代代议制。

欧战的惨烈令人根本怀疑欧洲文明的至高无上，在欧洲东方文化流行一时的反衬下，国人对于西学西制的盲目信从有所降低，代议制民主未能制止人类陷入大混战的惨剧，自然也在反省之列。《东方杂志》刊出署名昔尘的《议会政治之失望》，提出议会制是否应当继续的问题：“观察今日各国之议会政治，实益倾于少数者之独裁政治，其组织议会之议员，对于社会改造之大问题，殆毫无智识抱负。所谓议会者，几成别一天地，与国民一般之全体生活，完全悬隔，而行反背时代要求之政治，是议会迫世人以直接行动也。今后之世界，将议会主义者占胜，仍得维持势力而竟其改革议会之功乎？抑非议会主义者占胜，而依直接行动以行社会改造之事业乎？”^[8]

孙中山本来就主张直接民权，实行全民政治，只是为了反对北方的军阀官僚政客，才打出护法的旗帜。1923年1月1日，国民党发表宣言，指“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并提出三点主张：“甲、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乙、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丙、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9]曹锟贿选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改组，正式放弃护法旗号，重新回到军事革命的路线上。

曹锟贿选事件不仅使得更多的人对国会的幻想破灭，而且国会本身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张君勱在《申报》发表《我心理上国会之死刑宣告》，宣称：“当此武力与民治对峙之日，议员诸君所当注目者，即如何以法治之力限制政府之行动，宪法所以达此目的之具也，预算

亦所以达此目的之具也，此二者正诸君之所当力争者，乃每以人事问题如内阁如总统驱诸君以旁鹜外驰，而诸君初不之觉，亦有甘为人利用以人事牵制根本问题之解决者。……特殊势力环伺于国会之侧，国会当以一致之团结图所以驱除此特殊势力，乃诸君计不出此，忽党袁，忽党孙，忽党段，忽党黎，授外人以可乘之隙，而国会亦无以自保。……若此无以名之，名之曰有奶便是娘，岂真为法统为主义者，亦曰金钱之驱使耳。”^[10]

如果说从汤化龙到梁启超的反省，主要还是探究橘逾淮为枳的问题，那么昔尘到张君勱就不仅仅是考虑代议制是否适合中国，而是将中国国会的破产视同代议制本身势将衰落的表征。就此而论，孙中山重回武力革命不过是举国上下对现行政治体制彻底失望的表现。既然代议制不适宜中国，也不再属于世界潮流，能够取代间接民权的就只有直接民权。而直接民权的机关形式，主要就是国民大会（会议）。这样的追求，本质上也是希望努力超越模仿移植的欧美政治体制的局限或痼疾。

自辛亥提出用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来，每当遇到重大国事问题，就不断提出并召集国民大会（会议）予以应对。开始是因为没有正式国会，后来则是国会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再后来就对国会的正当性产生怀疑，甚至主张根本抛弃代议制。重新设计政体，一方面是削减国会的权力，从国会析出部分权能归属于其他机关；另一方面是尝试特设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主权机关，并以主权机关作为凌驾于各权之上的常设机关。国民大会（会议）一是要在割据分裂的政局之下发挥民意在解决诸如政争、制宪等重大问题时的作用，二是要更好地体现主权在民的思想，使得全体国民能够普遍、常态、有效地行使主权。

直接民权源于主权在民的观念，可是，笼统分散的国民如何才能组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并有效行使主权，却是令人困扰的难题。“民主国则主权在民，民无直接行使主权之方法，则国会代为行使而又不受真主人之束缚，假其名义以制政府，又脱其束缚以便身图。”^[11]上海未参加贿选的议员尤其重视主权机关的创设，其宣言要求：“主权在民，不可不切实规定，谓最高发动及监视之机关；……宪法修正最终之决定，不可不归诸最高主权之机关。”^[12]代议制可以常设并且有效，仅仅增加国民动议和直接投票，未必能够起到国民普遍行使民权和监督权力的作用；而为制宪等事项设置的国民大会或国民会议，

只是临时性处置。以怎样的形式使国民成为行使主权实际而有效的机关，成为有识之士苦思冥想的棘手难题。

在众多加强直接民权的设想中，孙中山参照综合各种国民大会方案制订的五权宪法，将国民大会正式列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常设机关和最高机关，不仅拥有法律上创制与复决的最终裁决权，还有对国家各机关人事选举与罢免的最高决定权。这样的政治架构，成为国民政府的正式建制，也影响了此后国家政权的政治建制。若以为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对苏维埃体制的简单移植，忽略了民初实行代议制的诸多流弊以及国民大会产生实施的渊源流变，则是错解历史，误读现实。至于新的政治架构仍然难以解决国民直接和常态行使主权的难题，则应当进一步向前探索，而不是简单地反向诉诸历史已经证明不能很好代表民意的代议制，重蹈以西为新的覆辙，看似求新，实则复古。如此才能避免陷入循环往复的泥淖，走出一片前无古人的崭新天地。

注释

[1] 《论国民议会宜借鉴于历史之陈迹》，《盛京时报》1912年2月1、3、6日，均第1版。

[2] 太炎：《代议然否论》，《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第1—28页。

[3] 《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1906年11月15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320页。

[4]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8页。

[5] 《汤化龙行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7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0页。

[7] 梁启超：《解放与改造发刊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

[8] 昔尘：《议会政治之失望》，《东方杂志》第17卷第17号，1920年9月10日，第28页。

[9] 《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天津《大公报》1923年1月1日，第2张第2页。

[10] 张君勱：《我心理上国会之死刑宣告》，《申报·国庆纪念增刊》1923年10月10日，甲组第3张第11版。

[11] 心史：《今日为制宪较相当之时期》，《申报》1923年10月14日，第3版。

[12] 《关于宪法问题之两宣言》，《申报》1924年1月31日，第4张第14版。

列强与南北和议的政争

辛亥南北议和，在第二、三次会议之间，整整休会了8天。考虑到局势危殆，军情紧迫，举行和谈本来就是为了救火，8天的间歇显得过于漫长。关于此事，相关论著虽然有所提及，并未予以深究。原因之一，或是认定和谈不过袁世凯的机心诈术，所有事情均按照其预先策划的权谋实施展开，所以不必追究。可是历史是各种去向各异的力量合力作用产生种种变量的结果，很难完全依照某一方面的预想发展而不受其他各力的影响。即使有所预谋，也不能予取予求，甚至未必能够如愿以偿。休会的8天，正是各方博弈、充满变数的过程。其间列强尤其是英国和日本的态度至关重要。虽然多数材料已经披露，研究者耳熟能详，应用起来仍然难免任意取舍的偏蔽，况且还有不少新出材料，如果安放得当，可以起到成活一片的作用。依时序将各类新旧材料排比对勘，不仅各方的各种言行可以显现本意本相，而且彼此的内在联系也逐渐浮现。原来关于此事详情细节的解读认定，可以渐次调整，使得整体上贯通无碍，不至于捉襟见肘，则认识更加近真，头绪也更为清晰。

一 各怀鬼胎的不干涉

在1911年12月20日举行的南北和谈第二次会议上，双方代表同意和平解决纷争战乱，并以实行共和为预期。只是袁世凯内阁总代表唐绍仪希望通过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程序，达到结束帝制实现共和的目的，以示遵循多数国民的意见，使得国体政体的转变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在民国总代表伍廷芳没有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唐绍仪表示将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实现和平解决的办法致电请示袁世凯。^[1]

关于唐绍仪的提议，无论当时人还是研究者，多纳入袁世凯的权谋诈术进行考量判断，以为唐不过袁的工具，两人合演双簧。随着研究的深入，后来虽然加以区别，仍然认定袁世凯狡计弄权，事先安排好了一切戏码，并且进行幕后操控。从结局看，这样的判断并非毫无道理，也符合对袁世凯的盖棺论定，但是转换视角，未免有高估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及其掌控局势的能力之嫌。实际上，袁世凯固然是主角，其他各方也并非只是陪衬而已那样简单，更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木偶。

对于已经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而言，亲贵、革军、名节等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其仿佛走在钢丝绳上，稍有不慎，便失去平衡。更为关键的是，虎视眈眈的列强虽然表面上不干预中国的内政，形同中立，实际上各怀鬼胎，各有盘算。如果说袁世凯面对国内官革南北各方的压力还可以从容应对，甚至如时人及来者所认为的，狡计玩弄于股掌之上，那么列强的态度却绝对不可忽视，更无法左右。换言之，袁世凯非但不能将己意强加于列强，还不得不看列强的眼色行事，在明确列强的态度之前，他无法回复唐绍仪的请示。而列强各国对华利益不一，态度有别，如何协调平衡，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袁世凯所能做到的，只是设法利用列强的相互制约，尽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接到唐绍仪的请示电报，袁世凯首先必须展开外交层面的活动，以争取达成实现内政方面政治目标的条件。而他之所以整整耽搁了8

天，主要就是因为迟迟未能得到列强一致的同意，尤其是至为关键的英国和日本的态度没有最终定论，使得袁世凯无法做出最后决断。

早在和谈开始之前，列强就已经围绕对华政策问题展开了多方磋商交涉。在列强当中，日本可以说是最不愿意看到中国变成共和国的国家。其公开的理由是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共和制，勉强实行，势必导致内乱，列强趁机插手，影响日本的在华利益。而不能宣之于口的原因还有担心因此引发日本国内的动荡，危及天皇和明治政府的统治。为此，日本除了与具有同盟关系的英国力求保持步调一致外，还极力拉拢同样不希望中国实行共和制的俄、德等国，以便朝着维持清朝和君主立宪的方向对华施加压力。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1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往见袁世凯，希望尽快恢复秩序，避免列强干涉，尤其关注其解决时局的根本方案。袁世凯趁机询问道：

本人始终认为中国非行君主立宪不可，而革命党及其它方面俱主张共和制或联邦制，极力抗争，本人之主张颇难贯彻。不知贵公使以及欧、美各国人士认为君主立宪与联邦共和等政体何者更为适宜？

伊集院答称：

按贵国近三百年来之历史以及各地实情观之，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为万全之策。至若实行共和制或联邦制等类主张，俱与当前之民智程度不相适应，其后果，难保不招致灭亡之结局。

为此，要尽快改正此前宣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以免出现“名为君主立宪而实为民主立宪之怪现象”。并且告诫道：与日中夙有共同利害关系不同，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政体问题并不关心，“彼辈所孜孜以求者，惟其自国人民生命财产之保全、通商贸易之发展以及利权范围之扩大等等而已”。希望袁世凯迅速稳定秩序，不给外国人以干涉的口实。

伊集院注意到，袁世凯对于国体问题无所适从，所称君主立宪，也只是原则主张的自我表白，而没有明确见地。^[2]其实，就本心而论，袁世凯未必没有政见，在共和与君宪之间，他显然更加倾向于后者。可是，面对举国反清以及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呼声，他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共和。尤其是如果要将国家大权由清廷转到他本人手中，

共和制总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重要选项，甚至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选项。

为了加强对华影响力以及确保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日本政府决定和与自己有同盟关系的英国协调立场。10天后，日本外相指示其驻英临时代办山座圆次郎与英国外交大臣会晤，希望以中国实行清朝名义主权的君主立宪制为最良方策，并作为两国联手行动的基准，采取具体办法，与各方会商并提出建议。^[3]12月1日，山座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示以日本政府的两封来电，认为中国局势的发展使得单靠中国政府已经无力恢复秩序，列强不应继续保持旁观态度，必须采取适当的手段，以维护在华拥有的重大利益。进而希望就采取什么步骤与英国坦率交换意见，并达成协议，再根据协议，联系其他列强。目前中国人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哪种更加适宜。日本政府认为共和制对中国不切实际，而清朝业已完全丧失权威，所以，挽救局势的唯一最佳办法是，一方面放弃空洞而不现实的共和制理想，一方面清廷废除独裁制度，尊重汉人的权利，建立一个实际由汉人治理的政府，但名义上仍在清朝的统治之下。为此，列强应该劝清廷承认按照上述原则以求维持王朝，同时让革命分子了解共和理想不但不实际，还会危害国家的生存和民族未来的繁荣。由此促成两派停战议和。希望与英国在认识和行动步骤上协调一致。^[4]

据山座转述英国助理外交次长坎贝尔（F. A. Cambell）的话，英国在最良方策的意见上与日本完全一致，但不赞成外力干预，主张由南北双方筹思熟议，唐绍仪说服其他委员赞成君主立宪，亦非全无可能。^[5]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告诉格雷，驻北京的外国代表一致认为，在清朝名义下组织立宪政府是最佳解决办法，共和制可能行不通，并会导致中国分裂。但是如果由外国干涉来促进，君主立宪也会受到歧视。目前列强做出任何维持清朝的协定在这个国家都很不受欢迎，并使列强因此而担负重大责任，被看作是半个多中国公开反对的专制统治的拥护者，不得不在必要时迫使南方接受其方案。这给地理接近的日、俄两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便利。目前唯一的选择是延长停火使各省代表调节分歧，达成协议。干涉是一切办法均告无效时的最后选择。^[6]

尽管如此，日本对于袁世凯是否坚持君主立宪始终有所担忧，以极大的忧虑看待官、革双方取得共和制的可能性。^[7]并且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试图采取武力介入的方式。只是迫于列强的

相互制衡，不敢轻举妄动。12月5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朱尔典提交了包括两份文件的备忘录，并解释道，日本政府已经得出结论，以不可缺少的外国干涉来恢复中国秩序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就此征询朱尔典对于局势的看法。朱尔典虽然同意满人名义统治下的立宪政府是危机的最圆满结局，但是长江以南各省都已宣布为共和，清王朝信誉扫地，袁世凯也无望在现政权下得到各党派的支持。尽管和谈前景渺茫，仍应等待结果。伊集院表示日方并未准备立即付诸行动，但要做好准备，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必然代之以武装干涉。朱尔典表示几乎不敢想象用强权迫使亿万人民接受一种他们反对的政体，这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应尽全力促进斗争双方直接谈判，以避免上述不幸事件。

[8]

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C. M. MacDonald）在就上述问题会晤日本外相内田康哉时表示，自己个人也颇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但是看了有关长江流域及中国南方事态的报道，再看成千上万在日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其中甚至有数百人宣誓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以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又令人觉得极不可能如日本所说，去说服中国的革命党承认民主共和无法实行，因为民主共和的目标似乎已经深植在这些人士心中。对此内田外相认为这些革命热情只是空谈，一旦面临死亡，这些热心的革命者将会迅速改变心意，以求生存。中国真正的民意是赞成君主立宪。

日本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清晰地显示，日本政府十分担心中国实行共和制，因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如果都实行共和制，对于日本将产生巨大影响。日本极力否认中国革命党人对于民主共和向往的真诚和决心，认为由苦力和社会不良分子组成的革命军一旦给养不济，可能重演义和团之乱，而中国的真正民意是实行君主立宪。因此，日本政府对于美国舆论同情中国人、提倡共和的意见完全抹杀，非常希望列强赞同自己的看法，并力求为此共同采取一致行动。除了对于战乱延续秩序混乱的担忧，日本政府与其他列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极不希望中国成为共和国。这样的担心固然有害怕战乱和分裂影响日本在华利益的考虑，同时也唯恐共和制的新中国对日本国内政局造成冲击。而英国方面，包括窦纳乐本人，对于各地中国青年踊跃参与革命的热情和真诚都留下了深刻印象。[9]

12月11日，听说清国陆军部有人秘密透露，如果和谈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

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伊集院公使于次日紧急求见袁世凯，要求其就上述信息坦率言明态度以及各种相应举措。袁世凯坚持表示，始终主张君主立宪，而且清廷已经弃旧图新，变更国体没有必要，南方各地四分五裂，更不能实行共和。如果革命军方面坚持共和主张，只好发表声明，坚决予以反对，让世界各国评论双方意见。

对于袁世凯的表态，伊集院认为虽然完全否认共和政体，但是否保留清帝，则含糊其辞，有可能改变国号，或进一步限制君主大权。^[10]日本政府表示，完全支持袁世凯关于根本方针的表态，为此将不吝给予相当援助。^[11]

问题是，尽管日本很想，毕竟不能单独对华采取行动，尤其是与之有同盟关系的英国的态度，至关重要。早在12月初，日本就主动提出，在此紧急时刻双方真诚合作的愿望之下，两国应达成一份备忘录并付诸实现，主要内容是：

看来所有最有能力形成一个主张的人都同意，在清王朝名义的统治权之下的立宪政府，将为目前危机提供最佳解决办法，而共和制则是行不通的，可能引起中国的全面分裂。所以，乍一看，列强似应支持现存王朝。但英王陛下政府认为，中国过去的历史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外国干涉会损害而不是促进君宪制度。强烈赞成共和的南方党人会得到许多新的拥护者，这是外国列强公开承认的事业。……很可能从外部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任何解决办法都行不通。^[12]

12月11日，山座圆次郎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另一份备忘录，进一步确认两国看法相同，都认为解决当前危机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以清朝为名义最高主权的立宪政府。日本政府知道帝党和革命党均无实力解决问题，没有列强的帮助就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此紧要关头，应与英国政府就各主要在华利益国采取何种步骤交换看法。尽管日本政府对于汉口即将举行的和谈不抱太大的希望，但赞成英国政府的看法，除非发生意外，否则应等待会谈结果再决定是否采取任何步骤。^[13]

南北和谈开议前，美、法、德三国驻华公使于12月15日访晤英国驻华公使，提出两点，除了借款问题，时局已不容再事袖手旁观，并提议与清国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日、英、美、法、德、俄六国紧急磋商。英国公使征得日本驻华公使的同意后，当天下午，上述各国公使

或代理公使会晤讨论，一致认为，如不由外国施加影响，南北不可能达成妥协，时局之解决毫无希望。决定将各国政府的意见作为备忘录，由各国驻上海总领事非正式递交即将在上海举行会谈的官、革双方和谈代表，以促其达成协议。^[14]

在六国当中，日、俄两国其实对于中国能否实行立宪政体也抱有疑虑，只是迫于当前形势，认为此外别无良策，对于共和制则根本反对。日本尤其担心中国实行共和制。为此，分别征求各国的态度。英国方面虽然觉得中国更适宜于君主立宪，但是认为官、革双方已不可能在保存清廷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希望考虑新的解决方案，如是否可以立孔子后裔为皇帝等，据说此议出自伍廷芳一边。日本坚持君主立宪，为了应对排满，赞成所谓由汉人组成的“摄政会议”，并且表示愿意就此征询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表示，如果和谈不成，将借助于各国调停，日、英两国可为主导，尤其是日本为主动。对于新立满人以外的皇帝、太后垂帘听政、汉人组织摄政会议之说，袁世凯认为前两项不可行，而极为赞成摄政会议，并就此征询日本公使的意见。事后日本公使又向英国驻华公使通报了与袁世凯会谈的内容，英国公使基本表示同意。^[15]

英方记载的朱尔典与伊集院谈话的内容，与日方的文件大体吻合，但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例如，如果上海和谈不成，袁世凯承认尚未制订出明确的政策予以应对，除了听取列强的建议，别无办法。日本公使趁机表示，假如中国需要求助于外国，应首先找英国和日本，因为两国在远东的利益关系最重，而且对中国最友善。袁世凯表示同意伊集院的看法，他已看出英国尽力帮忙促成中国两派的和谐。日本的建议如果得到英、日两国的同意，他十分愿意照办。在伊集院的询问下，袁世凯还表明，只要英、日两国同意，一旦上海会议失败，他只向两国求助，并遵照其决定和建议行事。对此英国认为，日本外相的言行过分且不明智，令人以为英、日两国立场一致，在调停中支持失败的一方，可能对英国在华人民、财产和贸易造成极大损害，而且给观望期待的其他列强制造了机会。^[16]

12月17日，为了促成和谈，日、英两国驻华公使通告袁世凯，两国愿就官、革双方协商进行善意斡旋，并于次日分别转告唐绍仪和伍廷芳。据称唐绍仪闻讯表情十分喜悦，觉得和谈前途颇有希望，而伍廷芳则一语未发。^[17]

此后，日本又分别与美、俄等国磋商，着重探讨是否实行君主立宪制、满汉权力地位以及万一和谈破裂如何采取进一步行动等问题。俄国等担心日、英联合干预，排斥其他国家，同时对于美国能否接受维持清廷表示担忧。^[18]

经各国公使分别征得本国政府的同意，12月20日，各国驻上海总领事（或代总领事）分别访晤了唐绍仪和伍廷芳，提出如下备忘录：

六国政府认为，中国目前战乱的延续，不仅使国家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侨民的物质利益人身安全面临着危险。迄今一直保持绝对中立态度的六国政府认为，自己有义务非正式地提请双方委员注意，必须尽快达成有益于平息目前战乱的协议，确信这一观点与有关双方的愿望是一致的。^[19]

这一行动，引起各方的不同解读，民军方面视为对光复政权的承认以及列强中立的表态，清方内部则意见不一，唐绍仪愿意理解为列强希望和平解决，而清室及亲贵也感到了由谈判解决时局问题的压力。恰在此时，袁世凯接到唐绍仪关于是否可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请示电。

注释

[1]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91—394页。

[2]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49—252页。

[3] 《内田外务大臣致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电》1911年1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53—256页。

[4] 《格雷爵士致窦纳乐爵士函》1911年12月1日外交部发，第244号；附件《日本政府给日本驻英代办山座圆次郎的指示》，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19—121页。

[5] 《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67页。

[6]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2月3日于北京，第318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21—122页。日本的想法又见《致朱尔典爵士备忘录》1911年12月5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49—151页。

[7] 《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2月7日东京发，第55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24—125页。

[8]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8日于北京，第490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48—149页。

[9] 《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8日于东京，第332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67—170页。

[10]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68—270页。

[11] 《内田外务大臣复伊集院驻清公使电》1911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74页。

[12] 《致日本代办备忘录》1911年12月5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14页。

[13] 《1911年12月11日山座先生递交的备忘录》，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35—136页。

[14]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76页。朱尔典称，美、德、法三国代表竭力强调有必要立即给袁世凯以扶助，使之能够迫使革命党人做出合理的让步。朱尔典担心招致革命党的报复措施，不甚愿意参与借款。日本公使对于美、德、法的观点表示同情，但在接到日本政府的指示前，不能表示任何明确的意见。俄国代办则觉得接受这

一请求有巨大困难，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给袁世凯以援助，可能会阻碍而非促进上海的谈判。因为借款之事无望达成协议，会议转而讨论上海谈判和六国联合行动以协助解决的可能性。（《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21日于北京，第508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66—167页。）

[15]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6、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80—287页。

[16]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18日于北京，第504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64—165页。

[17]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7日、《有吉驻上海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87—289页。

[18] 《埴原驻美临时代理大使复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9日、《本野驻俄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90—295页。

[19] 《六国代表致上海和谈委员的备忘录》1911年12月21日于北京，第508号附件，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67页；《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77页。

二 英国变脸 日本无奈

就在各国驻上海总领事分别向唐绍仪和伍廷芳递交备忘录的当天，《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G. E. Morrison）拜访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提出：清廷已无力作为，解决时局，除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外别无他策。现在舆情极力主张共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促使双方和谈委员达成一致，使清皇室退至热河，建立共和政体，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并声称已就此意昨日与伍廷芳交谈了一个多小时。^[1]紧接着袁世凯又通知日方，据上海方面报告，黄兴等坚决主张共和。唐绍仪认为各国领事的外交方针似有所变化，未必仍旧支持君主立宪，请尽速筹拟方策。日方表示态度并无改变。据说同时袁世凯还派人询问英国公使的态度，英方同样答以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场没有变化。^[2]

12月21日，风云突变，英国驻华公使突然造访日本公使，告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与唐绍仪密谈经过，认为长此下去，官、革谈判不能成功，既然不能保全清廷，可否推袁世凯为大总统。伊集院公使认为，废除清廷，建立共和政体，清国无法维持统一与安宁的秩序。因为袁世凯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一致拥护与信任，南方各省对袁相当反感。英国公使表示，素来也相信维持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是最佳方案，共和体制无论如何不能巩固。但现在既已无法强制革命军接受这一方案，“就只好从谈判决裂和成立共和政府这两害之中任选其一”。伊集院同意从诸害中选其为害最轻者从之的主张，但以君主立宪为最佳方案。如果成立共和而导致四分五裂，就不再单纯是清国的内政问题，必然引起国际纠纷。与其实行共和使清国趋于瓦解或大混乱，不如冒着引起南方反感的风险由外国人施加压力，以消除大乱根源共和制的危险。这同样是两害相权取其一，只是取舍的对象不同。

英国公使表示，原则上同意伊集院所说，但英国在华中、华南地区拥有贸易上的重大利害关系，故英国政府不能无视南方人的思想感情，甘冒遭受攻击的风险而轻易采取措施以强行贯彻君主立宪。倘若莫理循等人已将其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之类的意见电告本国报界，情况将更加如此。对此，伊集院向日本政府抱怨英方顾虑颇多，行事软弱，不可能下决心施加压力促使官、革双方在君主立宪基础上达成协

议。其基本态度是与其无术可施，不如推出袁世凯为大总统以求稳定时局于一时。^[3]

对于英国政府态度的转变，日本政府大不以为然，继续坚持以君主立宪制度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良方。英国则照旧表示原则上赞同日本的主张，但无法强迫中国人接受。日方进一步声称：日本与各国不同，与清国具有特殊利害关系。如清国实施共和制度，并由此引起更大的混乱，日本国不但在实质上将遭受甚大损害，而且在思想界亦必蒙受极大影响，希望英国公使理解日本的特殊境地。此外，日本公使还描绘了实行共和制对于外国的可怕前景：清国人的特点在于不知事物的发展各有极限，一旦得势，如不在适当时机加以扼制，即将肆无忌惮，不知自制，甚至难保不招致自我毁灭之灾。如果收回利权的观念不被抑制，甚至坐视其实现共和制度，将一发不知自制，甚或想入非非，以为万事均可按照彼等的意愿推进。其结果，必然是排外思潮更加泛滥，以致掀起收回利权之狂潮，动辄与外国人作对，必使外国之处境较前更加困难数倍。如此下去，愈演愈烈，其结果不问自明。^[4]

鉴于英国的态度明显朝着认可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方向转变，日本一面通过各种渠道尝试施加影响，继续坚持努力实现君主立宪的方针，一面开始考虑进一步干预或退一步默许的变项。12月22日，日本驻上海参事官松井访晤唐绍仪，告以日本政府的旨意以及日本驻华公使与袁世凯会谈的梗概，并言明：“帝国政府为维护君主立宪，已准备提供充分援助。至于何时提供何种援助，将与袁世凯随时磋商定夺。”此时唐绍仪也接到袁世凯来电，告以“日、英两国政府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扶持满洲朝廷”。据说唐绍仪离京之前，驻日公使汪大燮曾电示日本准备向武昌方面派兵两个师团，所以袁世凯相信日本会提供兵力援助。但是唐绍仪认为这无异于借用外国兵力屠杀本国人民，以扶持清廷，甚为不当，已致电袁世凯，力阻其借用外国武力。同时正告松井，插手操纵别国的国家体制，实属无理，“现时国民舆论既已要求共和，置此现实于不顾而仍欲扶持满洲朝廷，是何居心，本人甚感难于理解”。进而毅然决然地表示：“本人必敦促朝廷速颁上谕，国体问题一任民意决定，由国民组成共和政府，各国承认与否，任其自便。倘共和国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届时各国必然进行干涉。在此以前，各外国切不可横加压迫。”

面对唐绍仪毋庸置疑的表态，松井重申该国政府认为共和政体万万不适于清国国情，明知其不适宜而硬要勉强试行，非常危险，不如帮助清国从开头即建成一种合宜之政体；多少施加一点无形压力，或能产生促使革命党反省的作用，为此才表明对袁世凯提供某种援助，但是否认会出兵。唐绍仪希望日方促使袁世凯放弃能够借助外国武力的念想，若清廷按照上述意旨颁发上谕，就可以实现停战撤兵。至于是否成立共和政府，另行计议。^[5]

关于唐绍仪的态度，朱尔典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来电获悉，共和倾向十分明显的官方代表唐绍仪实际上已宣布背弃他受命代表的事业，并电告袁世凯，为避免谈判破裂，有必要发表正式声明，未来国家取何种政体，应留待三个月内在上海召开的国民会议决定。这是打破僵局和避免更多无谓牺牲的途径。可由22行省的议会各举三名代表，双方的现有代表一概不准与会。此建议明显得到革命党中稳健派的赞许。这是使袁氏摆脱目前抛弃清廷和对抗民意的尴尬处境的唯一出路。^[6]

此时日本从英国政府获得的信息显示，英国反对干涉中国的事变，革命党不会同意保存清廷，如果袁世凯不改变主张，即将驱逐满人。虽然共和政体不适宜中国，其他选项如另立皇位之类，可否作为今后的应对办法予以考虑。^[7]12月22日会见朱尔典时，袁世凯非常强调他与共和毫不相干，况且即使本人愿意接受革命党的建议，也无法使他的将领和军队听从。袁还以看上去极为真诚的口吻说，他确信共和政体将导致中国分裂和灭亡，宁可退隐，也不愿参与如此冒险的尝试。他主张保持国家的完整，并相信帝制观念牢固地扎根于民众的习惯和心理之中，不能容忍因共和立宪的引进而造成对过去的剧烈破坏。像伍廷芳、温宗尧这种既无执政经验又无国家知识的人，无权代表中国民众。朱尔典表示个人同意袁的观点，但提出可以接受唐绍仪的建议，将此问题提交专门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袁世凯认为在目前混乱的状态下，要召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会议极其困难。没有皇上的谕准，他不能接受该建议。然而他个人十分愿意让同胞们对此做出清醒的抉择。^[8]

12月22日下午，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拜访袁世凯，就和谈问题与袁交换意见。他首先对公开声明自己原系共和论者的唐绍仪能否代表号称坚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完成谈判使命表示怀疑。袁世凯则辩解，唐绍仪的确是依据自己亲授指令的君主立宪方针与革命军折冲至

今，只是或许受南方革命气氛感染，头脑混乱而倾向共和，袁自己绝无赞成之意。伊集院不欲纠缠于袁、唐各自主张的真实性，进而追问在此情况下和谈能否取得成效，袁认为唐绍仪所提将国家体制交由国会的建议是否可行。

袁世凯声言革命军方面绝对反对君主立宪，坚决主张共和，不能指望我方目的仍能实现。实施共和政体，国民所受荼毒必较专制政体更甚，且政府内部也将争权夺势，以致四分五裂。至于国会议决政体，未免缺乏常识过甚，因为国会作为国民议政机关必须以完整选举为依据，即将在上海召开的国会，其议员全系自命之各省代表，组成漫不负责之团体，不能决定一国之安危大计。今后仍将坚持以得到英、日两国支持的君主立宪为目的。可是，今日英国公使态度突然转变，表示支持君主立宪只是个人意见，并无政府任何明确训令，英国已转为袖手旁观。如果日本政府与英国持相同态度，自己只好引咎辞职。不知日方是否继续支持君主立宪。

伊集院表示，无论英国政府态度如何，日本绝不致中途改变方针，必始终支持君主立宪原则，以求迅速平定时局。最后声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单纯着眼于物质利害的欧美各国，万一中国变成共和国体，日本国民在思想上必受到不少影响。仅此日本也要支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尽可能促其实现。

不过，接下来袁世凯转述了与英国公使面谈的情形，后者认为，事态既已如此，必须迅速研究补救办法。其意见是，唐绍仪既已来电提出建议，不如将计就计，以召开国会决定国体为基础，考虑解决方案。革命党拟议召开的国会，只能代表局部地区，不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我方何妨乘此时机提议将此局部性机构改变为确能普遍反映全民意志之全国代表机关，然后讨论国体问题。这就需要马上制订选举法。为此，双方继续停战两三个月，在此期间内多方筹备，以便召开不偏不倚之国会，议决国体”。^[9]

袁世凯认为，英国公使所言，固不失为一种方案，并且坦言，即使停战，也无法实现君主立宪的目的。此后，他又一再追问日本公使，日本政府能否始终支持君主立宪，是否将来也不会改变态度。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袁世凯进而询问日本能否在不采用危险手段的范围内公开表明立场，例如由松井参事官在上海向唐绍仪和伍廷芳同时言明日本政府援助君主立宪。如此，对于清方将是唯一之奥援，或能

收到意外成效。伊集院认为此举并非难事，同意立即电报日本政府考虑，希望上海和谈维持现状，切莫轻率做出决议。

袁世凯与伊集院的此番会谈，与其说是继续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努力，毋宁说更多意味着袁世凯再次试探日本的底线并逼其表明态度，如果后者不能采取切实行动，自己便不得不改弦更张。所以伊集院的感觉是袁的处境已十分困窘，危机迫在眉睫。日本政府“若不急速采取措施，以明确之态度提出具体方案，引导袁世凯充分信赖我国，则本职今后与袁世凯殊难维持以往之关系。而且鉴于袁氏性情与素行，在穷极之余不无可能一改常态，转而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10]

日本外务大臣内田接到伊集院的来电，认为“帝国政府已面临必须下定最后决心之时刻”，日本将于12月24日举行元老会议讨论局势。可是就在23日，袁世凯特派蔡廷干通告伊集院，庆亲王订于次日在袁邸会见日、英两国公使，当是奉皇太后之命就目前时局问题与两国公使磋商。同日，山座驻英临时代办又报告前一天莫理循来电的要点，据说袁世凯虽然仍然主张君主制，但到最后如果无术可施，就很可能同意就任第一任大总统。虽然各方面对其本人反感颇大，却认为容易获得国际承认。其步骤将首先颁布上谕，邀集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讨论政体，朝廷则按会议决议行事。有理由相信黄兴将同意此种步骤。国民会议将做出何种决议，已毫无怀疑余地。不过，袁世凯公开扬言，日、英两国决心采取共同行动，维护君主政体，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11]

日本政府并非不愿武力干预中国内政，在六国联合向和谈双方递交备忘录后，日本仍想采取进一步行动，为此向列强各国发出备忘录，征求意见。俄国等虽然觉得刚刚采取过联合行动，此举不知意欲何为，仍然表示同意和日本一致行动。只是由于英国的反对，日本只能遗憾地予以放弃。^[12]迫于其他列强的牵制以及无力单独掌控广大地域的局面，日本元老会议只是继续坚持确立君主立宪为解救清国时局之最良方策，至于具体行动，还是原定以日英同盟为基础解决清国时局的方针，不敢单独行动。为此，只能以非官方形式，派人秘密前往上海劝说革命军方面的有力人士，使之软化，从而继续以君主立宪为基础进行协商。

12月23日，朱尔典收到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来电，告以袁世凯答复唐绍仪，进一步强调六强不会承认共和，而愿坚持维护君主制。共和派的领袖们怀疑列强宣布调停的通牒所含的意图。唐绍仪则激烈反对列强调停，认为将使中国各阶层各党派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人，对中外利益产生极大的损害，希望英国驻上海领事催请袁世凯接受唐绍仪在12月20日的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英国政府否认所谓六强不会承认共和而愿维护君主制的说法，并指示朱尔典强烈驳斥袁世凯有害和不真实的有关言论。^[13]英国外交部于12月25日发表声明，否定英、日两国协同支持清国实施君主立宪政体，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的报道。英国政府努力的目标，是援助中国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建成有效的政府。朱尔典警告袁世凯，不要把英国同日本连起来作为君主制的支持者。

此消息在日本国内也产生不良反响，有报纸发表社论，批评政府的明显偏向和干预政策，引起革命党对日本的强烈敌意，呼吁寻找新的处理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据说日本外相的确收到革命党的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14]1912年1月8日横滨的《日本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某个与外交部门有长期联系的官员的话，否认日本为了强迫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将不惜诉诸武力，并指相关的谣传源于袁世凯。同时全面和正面阐述了日本政府的公开对华政策，甚至否认日本政府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制。^[15]此举显然是出自日本政府授意的非正式澄清和表态。

英国政府的声明，不仅是对莫理循来电的回应，前一日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先后会见英、日两国公使，当面告以决心采纳唐绍仪的建议，召开国民会议讨论政体问题，并已据此拟就致唐绍仪的电稿，授权他同意在双方商定的条件下，于两三个月内召开国民会议做出决定。奕劻保证此建议得到整个皇族的同意，请朱尔典作为老朋友坦率表示看法。朱尔典表示，这似乎是理由充足的提议，使政府在道义上居于有利地位，若革命党人反对，则会对他们产生不利的影响。^[16]只要真正体现全国人民的意愿，自己没有任何异议。

奕劻询问道：倘若革命党不接受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的建议，使得谈判破裂，朱尔典是否考虑到外国列强会出面进行干涉。朱尔典表示，没有英国政府的指示，他不能做出回答。他认为，倘若共和派拒绝调解，干涉只能意味着试图用武力对南方诸省实行强制，他几乎不能设想会有列强采取如此步骤。尽管奕劻和袁世凯反复说明共

和制在中国不能产生一个巩固的政府，袁世凯还表示假如国民会议决定实行共和，就会辞职，而朱尔典也表示同意两人的看法，却坚持外国人不能越俎代庖决定共和制在中国是否可行。而且在华外国人的观点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不适合，也有人认为地方政府的许多方面本质上是民主制。在上海的外国人似乎全部偏向共和制。^[17]

稍后日本公使伊集院表示，日本政府一向认为实施君主立宪为解救清国时局的最佳方案，至于是否为此使用武力，自己尚不确定，所以关于电训，需要请示本国政府。日本外相内田认为，如果日、英两国承认电训，等于两国政府赞成召开国民会议决定政体，似有排除美、俄、法、德面对中国重大问题独断专行之嫌；如将政体交由国民会议讨论，最后必至采用共和制，而不愿屈居汉人共和制之下的满、蒙、回、藏各族势必分裂出去，甚或依附其他强国，致使保全清国领土之原则遭到破坏，而清国本土也难免陷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日、英两国对此应当慎重其事。在此之前，还应采取某些可能措施，例如向革命军晓以利害，详细说明采取君主立宪制度为收拾时局之最佳方案，劝诱彼等在此基础上继续商谈。并希望由六强国共同行动，施加无形压力，为解决时局开辟通道。^[18]

对于日本的建议，英国方面似乎有些敷衍。英国驻华公使在会见袁世凯时回答后者询问“是否可以指望外国干涉”，即明确表示绝对不可加以干涉，否则就是压迫大半个中国。不论政体如何，但求在国民自行选择下，出现一个统一、巩固的中国。而英国外交次长助理兼代亚洲司长蓝格雷回答日本驻英代理大使山座的询问，已经表示英国从未特别希望中国采用立宪政体，更不同意使用武力；只要中国人决定采用共和制，袁世凯或其他人出任总统均可；至于废黜皇帝和袁世凯掌权是否会引起动乱纷扰，则不能顾虑太多太远。况且动乱未必会加害于外国使馆。

日方对于英国态度的转变相当不满，坦言驻外公使未经请示本国政府即对如此重大事件径自发表意见，实为产生误会之根源；真正代表民意之国会，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很难组织，而且其间很难维持局势。所以，即使召开国会，也不可能真正测知民意所在。根本问题不在总统人选，而在如何确定政体。并且认为，北京发生动乱时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可保无虞的估计未免过于天真。山座几乎是在毫不掩饰地逐一驳斥英方的意见，尤其是反复指出英国政府曾经多方认定君主立宪政体为解决中国时局的最良方案，希望依然照此共同致力。英国外交

次长表示，个人虽然赞成君主立宪政体，但不会作为政府的原则立场向革命党公开宣告。若与各国协商共同进行，可能较为适宜。蓝格雷还指袁世凯未经商谈即贸然电示唐绍仪英、日两国偏袒君主立宪政体的举动殊为不当。^[19]

据伊集院公使的报告，庆亲王表示并不坚决认定共和制度绝不可行，只是觉得按现时国民程度，很难完全实现，希望日本明言将用何种具体办法援助君主立宪。伊集院对于庆亲王所谓共和并非绝不可行一语，表示颇难理解。袁世凯急忙从旁开解，称其反对共和，但不便在外国官员面前吐露反对之意。接着提出，当前有一难题，上海和议已休会4天，唐绍仪每日数电催索回示，不能再等日本政府训令。加上英国公使态度模棱，难以捉摸，故拟按英公使提示的变通办法，全面组织国民议会，议决政体。现已拟就复唐电稿，请问日方意见。电稿要点为：首先制订选举法，待地方平定后，由各省选出议员，齐集北京，召开国会，其决议案由皇上批准，然后公布。筹备工作至少需要数月时间。

对此难题，伊集院显然不以为然，反问袁世凯：如果革命军接受这一方案，是否有决心断然实行。袁世凯答称：革命军绝对不能接受，如此便可以将难题推给对方。如果拒绝，谈判即行决裂，然后再下最后决心。伊集院认为此举太过危险，万一革命军方面接受，即不可挽回，所以应暂时放弃这种意念。无论是对方提出的国会议决之说，还是英国公使示意的组织完全国会之说，均不可行。如果袁世凯在日本政府回训之前贸然采取上述手段，日本将怀疑袁世凯的真意，从而引起对中国不利的后果。^[20]在外交场合把话说得如此直白，几乎等于赤裸裸地进行威胁。

伊集院回到使馆后，当天袁世凯又紧急召见日本公使馆的高尾翻译官，转告新收到唐绍仪急电，由于伍廷芳不断催促开议，并怀疑延宕会期是备战的缓兵之计，必须痛下决心，或急速决定召开国会，或断然辞去总理职务。^[21]

日本与英国的协商进行得也很不顺利。12月24日，日本驻英临时代办山座圆次郎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根据21日伊集院与朱尔典会晤形成的备忘录，对朱尔典似乎转向支持袁世凯出任共和国总统为解救时局的良策不以为然，认为包括满人和革命党在内的各方面对袁都会产生恶感，中国难免再度陷入危机。日本政府坚持认为，君主立宪是解

救中国时局的最佳方策，并热切希望英国政府同意这一观点，一如既往继续尽心竭力地谋求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同时期望确认朱尔典与伊集院私下会晤时所透露的观点，是否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22]

内田外相复电伊集院公使，认为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决定政体问题，目前不但英国驻华公使已表态同意，而且有迹象显示，英国政府亦必逐渐趋向同意。如果英国政府决心同意，则日本不顾两国间的协调关系而单独出面梗阻，亦属无趣。同时袁世凯本人坚持君主立宪的决心业已动摇，甚至皇室懿亲如庆亲王等，亦有转而赞成召开国民会议议决政体之迹象。事态至此，虽然日本仍然坚持原有看法，为清政府决定由国会议决政体而感到其前途堪忧，但是单独继续拥护君主立宪的理由业已丧失，其处境已无进一步为清政府尽力之余地。指示伊集院在接到英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后，即刻向袁世凯透露上述意旨，鉴于各国意向以及清政府的转变，日本只能听任事态自然发展。^[23]

此时日本政府当中仍然有人企图武力干涉中国的政治走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便是其中代表。民元1月8日（辛亥年十一月二十日）孙中山与黄兴会见来华的犬养毅、头山满等人，据说犬养毅离日赴华前，为听取日本政府对华之方针，特往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询以“政府是否绝对不许中国行共和政治？”西园寺答道：

“没有这回事，邻国采取何种政体与日本无关。”但内田康哉却对犬养毅说：“中国行共和政治对日本不利，所以我们反对，必要时，日本将以武力维持中国的君主政体。请您将这种方针转达南方革命党的领袖。”犬养毅对此很反对，所以特地请东京帝大教授寺尾亨和早稻田大学教授副岛义一、松本康国同往中国。^[24]是日会见时，犬养毅转达了内田外相的意图，并提出“大同联合论”，认为中国欲达革命目的，须联合岑春煊、康有为，进而与北方的段祺瑞结合以对抗袁世凯。不过，对于岑、康二人，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跟这两个人合作。”^[25]

12月25日，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与日本外相内田、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会面，日方再次表达前一天致电日本驻伦敦代办已转达英国外交部的观点，其要点为：六国应当真诚地呼吁革命党尽力接受有限的君主制，指出在这种政体下革命党几乎可以得到所要求的一切。一旦各国默许袁世凯关于代表会议的建议，就要服从会议的决定。窦纳乐答称，革命党会把这一行动看作是干涉，是强制汉族中更富有学识的一半人采用他们强烈反对的方针。因此所提步骤是极不明智的。^[26]

尽管日本原则上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认为会议将被伍廷芳、孙逸仙之类的人支配，投票赞成共和制，而这一政体肯定会使中国亡国；应由对革命党施加强大压力的六国列强再做一番努力使其看到君主政体的优越性，并确信这样的压力会产生非常可观的效果。可是如果英国政府赞成召开国民会议，日本将立即采取一致步骤，只是应当得到所有六国的支持。窦纳乐表示进一步施压是不明智的，而且革命力量及其共和观念，显然要比日本认为的大且深。^[27]

12月26日上午，袁世凯致函朱尔典，告以由于事情紧迫，而且日本要求的两天答复期限已到，打算当天下午复电唐绍仪。朱尔典回复说，没有日本公使的同意不应复电，并致函伊集院报信。随后伊集院来访，与朱尔典长谈，强调如果中国建立共和制，日本将被置于极其困窘的境地。并试图使朱尔典相信，若列强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保持君主政体，将会对革命党人产生预期的影响。朱尔典指出，革命党人控制了外国人在华所有生命财产的四分之三作为抵押，英国驻沪总领事和其他权威观察家认为，革命党肯定会不满于强迫他们接受特殊政体的企图，而对他们控制范围内的外国人采取报复措施。考虑到在华外国侨民以及居住在香港、新加坡的华南人大都对革命公开表示同情，英国的地位变得特别微妙。据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斯（E. D. H. Fraser）的报告，伍廷芳等人宣布，日本人的反对将使全体中国人在生死斗争中团结起来，民军奉命12月31日再次进入战争状态，并致电警告日本公使和日本政府，战端再启的后果完全由日本承担。^[28]

是日，格雷答复山座，应谨慎行事，不可企图强迫革命党人或袁世凯接受各自都未准备接受的方案；迄今为止的调停行为应明确表明，期望看到在中国人民愿意采取的无论什么政体下，有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国。如果越出这一范围，向革命党表示偏好君主制，必须先与列强磋商并取得一致意见。在此之前，应当考虑有所偏好或施加压力的巨大危险。当天形成的山座递交的备忘录显示，日、英两国促进由国民会议决定政体，排除与中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列强的影响，由中国人民自行决定中国的头等大事。照此行事，国民会议无疑会选择共和政体，结果满、蒙、藏等将不愿隶属中华共和国而自行分裂出去，或奉其他国家为宗主国，最终导致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原则消亡，中国将四分五裂。山座个人认为，明智之举是向双方解释中国的真正利益在于采取君主立宪制以解救时局，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协议方为上策。若英国同意以上观点，日本可以征得其他四国的同意，利用

六国在道义上的影响，为目前局势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打开通道。

[29]

同日下午5时，在袁世凯的一再催促之下，伊集院往访袁世凯，极力劝其缓发回复唐绍仪的电报。袁表示万难再事迁延，而且复电已经发出。伊集院声明，日本政府断不能同意此举。既然无法扭转其决心，只好急报本国政府，而袁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30]后来袁世凯告诉伊集院，唐绍仪组织完全国会的方案，果然未被革命军接受。据唐绍仪电奏，对方坚持共和政体，不肯退让。^[31]

次日，日本外务省接到山座代办关于26日与蓝格雷会谈的报告，英国外长正式指令，英、日两国政府应避免以强制手段提出革命党和袁世凯双方均不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两国政府的行动应一如既往，限制在调停的范围之内。同时要明确宣示，两国政府的希望，仅在于促使中国建成一个真能代表人民意愿，并团结巩固的政府。非经有关列强协商一致，切不可超出这一范围贸然行事，并特别提出不应向革命党进言应该采用君主立宪制度等，以免造成中外纠纷。进而声明，对政体问题的可否提出建议，或采取哪怕是微小的类似压迫之行径，即使由列强共同提出，也是重大冒险行动，必须事前慎重加以考虑。这无异于彻底堵死了日本强行干预的一切企图。

不仅如此，英国驻华公使还表示，共和制度将是一种危险的尝试，但只要与中国人民的愿望相符，不论采用何种政体，自己均无异议。若按唐绍仪所提办法向革命党提出建议，革命党当不会认为这是对该党不公平之行动。若由外国提出劝告，促使彼等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则必激起革命党之反感，招致南方忌怨，从而认为不可以如此行事。^[32]

彻底明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后，日本政府通知各国，鉴于英国的意见和中国政府的意图是将政体问题留待国民会议决定，日本政府对华时局转为暂持静观态度。^[33]俄、德等国也均认为不宜干涉。但是德国提出，若有某些国家动议，由各国协商，共同劝告中国采用君主政体，将欣然表示同意。^[34]

当然，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实是在是情非得已，而且仍然不肯善罢甘休。28日，山座再度拜访格雷，留下一份日本政府关于中国局势的电报译文。该电报内容与26日山座递交的备忘录相同，只是作为日本政

府的正式意见。格雷则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列强通过施加压力来决定问题的尝试是极其冒险的看法。^[35]

注释

[1] 《有吉驻上海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97页。

[2]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97—299页。

[3]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99—301页。

[4]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05—307页。

[5] 《有吉驻上海总领事转发松井参事官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07—309页。

[6]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28日于北京，第520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73—175页。

[7] 《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复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09—310页。

[8]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28日于北京，第520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73—175页。

[9] 今人翻译的国会，当时除清廷用临时国会外，一般为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而共和君宪，当时人混用国体政体加以概称。有关情形，另文详述。本文尽

可能按照所引材料原来的说法，难免歧异，并不表示对所用概念的当否已做判断。

[10]《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10—314页。

[11]《内田外务大臣复伊集院驻清公使电》1911年12月23日、《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3日、《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14—316页。

[12]陈春华、郭兴仁、王远大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1911.5—1912.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3—234页。

[13]《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2月23日北京发，第364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46—147页。

[14]《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1月6日发自东京，第8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93—195页。

[15]《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1月9日于东京，第9号，附件《日本对华政策——外交官的看法》，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95—197页。

[16]《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28日于北京，第520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73—175页。

[17]《朱尔典爵士与庆亲王和袁世凯会谈记录》1911年12月24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75—176页。

[18]《内田外务大臣致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电》1911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17—319页。

[19]《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复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22—325页。

[20]《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19—321页。

[21]《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21—322页。

[22]《山座圆次郎先生递交的备忘录》1911年12月24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55页。

[23]《内田外务大臣复伊集院驻清公使电》1911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26页。

[24]陈鹏仁译：《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3—35页。

[25]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26]《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2月26日于东京，第65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47页。

[27]《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1月5日于东京，第6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88—190页。

[28]《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28日于北京，第520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73—175页。

[29]《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1911年12月26日外交部发，第238号；《山座圆次郎先生递交的备忘录》1911年12月26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55—156页。

[30]《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27页。

[31]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34页。

[32] 《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复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27—328页。

[33] 《内田外务大臣致山座驻英临时代理大使电》1911年12月27日、《内田外务大臣复本野驻俄大使电》1911年1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29—330页；《格雷爵士致窦纳乐爵士电》1911年12月28日外交部发，第67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56页。

[34] 《杉村驻德大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36页。

[35] 《格雷爵士致窦纳乐爵士函》1912年1月4日于外交部，第5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56—157页。

三 向亲贵施压

随着列强对华态度的变化，实行共和制的外力干扰基本解除，袁世凯遂将主攻方向对准清廷和亲贵。12月27日，唐绍仪电请袁世凯代奏召集国会解决国体问题：

查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行会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艇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且闻中国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议一败，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倘知而不言，上何以对皇太后，下何以对国民。绍仪出都时，总理大臣以和平解决为嘱，故会议时，曾议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以为转圜之法。伍廷芳谓各省代表在沪，本不乏人，赞成共和，已居多数，何必再行召集。当时以东三省、直、鲁、豫及蒙、回、藏等处，尚未派员，似非大公，折之。伍廷芳仍未允认。现在停战期间已促，再四思维，惟有吁请即日明降谕旨，命总理大臣颁布阁令，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征集意见，以定指归。

[1]

据徐世昌说：“唐电到后，袁约余（徐自谓）计议，认为国体共和，已是大势所趋，但对于宫廷及顽强亲贵，不能开口。若照唐电召开国民大会，可由大会提出，便可公开讨论，亦缓脉急受之一法。乃由余先密陈庆邸，得其许可，袁即往庆处计议，当约集诸亲贵在庆处讨论（载泽未到），决定赶由内阁奏皇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次早，皇太后据内阁奏召集近支王公会议，庆邸首先发言，毓朗、载泽表示不赞成，然亦说不出理由，其余俱附庆议。于是允唐所请，当即下召集临时国会之谕。” [2]

同日，赵秉钧鉴于上海会议情况日趋险恶，君主立宪主张已万难贯彻，若停战期满而会议无结果，后果不堪设想，甚或致使清朝覆亡。各部大臣只有处理国务之责，而无改变国体之权，袁世凯又不便

提出，为此，必须做出最后决断，建议让皇太后及皇族了解实情，以便下定决心，明降谕旨，最终结果只能是共和体制。具体做法，首先如实禀奏上海会议经过情形，将唐绍仪与清政府间往还电报全部呈阅，并将官革两军实态、各省动向及缺乏饷械、财政窘迫等情况列表，由各部大臣联衔启奏。全体阁僚一致赞成，定于28日入奏，又因内阁将于28日开会，入奏改为直接面商。^[3]

综合考察和评判上海和谈第二、三次会议休会期间列强与袁世凯之间的博弈，实际情形应是，日本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坚决反对中国改行共和制，为此不惜采取包括武力干预在内的强硬措施。欧洲列强当中，本来赞成君主立宪的居多，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主要势力范围集中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的英国态度发生变化，反对外力干预，逐渐倾向于接受共和制作为解决时局纷争的选项。与英国具有同盟关系的日本跟不上英国的变化，又受制于英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牵制，无法单独采取干涉行动，最终被迫袖手旁观。

相对于日本始终坚持君主立宪，袁世凯的态度与英国大体同步，面对日本和清廷，其真正要选择的并非国体政体的形式，而是权力的归属。袁世凯与清廷宿怨甚深，早就不想继续受制于皇族亲贵，更不愿顶着排满的声浪与天下人为敌。不过，袁世凯也自知生存于错综复杂的矛盾漩涡中心，未必服众，必须赢得各方的同情，造成“非袁莫属”的时势，才能水到渠成地登上权力的巅峰，并且继续维系与各方的关系，以利于将来的施政。他巧妙地利用内外矛盾达成目的，或是矛盾的变化发展刚好适合了他的政治诉求。总之，如果不是袁世凯太有心计，就是运气太好，局势的确一步步走向袁世凯最希望的方向和目标，使其心中所想逐渐付诸现实。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要因应时势的变化，调整实现诉求的具体方略。

28日，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会奏“革军力主共和，代表请开国会，拟恳召集宗室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按照这份会奏的描述，和谈为英国公使朱尔典倡议，日、美、法、俄、德诸国先后赞成。而伍廷芳“极言共和不可不成，君位不可不去”。虽然袁世凯迭饬唐绍仪与之辩驳，彼党毫不通融，“必我先允认共和，彼方肯开议条件。唐绍仪[仪]又电称，各国政府投书劝和，双方并题，彼党认为已以政府见待，其气愈增。即就劝和书观之，亦只期和平了结，并无不认共和之意。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果能议决

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既然形势无可转圜，言和则说词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即能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4]

接到这样迹近最后通牒的会奏，近支王公当天召开紧急会议，经过一番争闹，束手无策的清廷只好答应袁世凯的要求，太后懿旨：

据专使唐电，上海连日议和，各省总代表伍坚称，人民志愿趋向共和为唯一之要求。此次武昌变起，朝廷即许滦州将士十九条之陈请，由皇帝告庙宣誓，颁布信条。原冀早息干戈，与全国人民同享和平之福。今人民以不信朝廷之故，希望改建共和政体，余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中国从前政体相因二千余年，现际世界大同，本无久而不变之理。皇帝缙承大统，甫在冲龄。余一妇人，更何忍以天下自私，黷武穷兵，致亿兆人民糜烂于兵革战争之惨。惟改革事大，不得不迅开临时国会，征集意见，以定指归。著袁即以此意电令唐转告伍，宣示各省，速于日内即就议和之地召集。如果全国人民大多数赞成共和，则天视视民，天听听民，余与皇帝必不违天而有所吝惜。^[5]

并且明发上谕：

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著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奠群生而弭大难。^[6]

当一切木已成舟之后，第二天，袁世凯告诉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清皇室对万事俱已放手，决心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听任采用共和政体，毫无其他办法。^[7]其实，皇室早已成为袁世凯手中的一枚棋子，其存在和作用只能仰仗于袁世凯的政治需求。

南北和谈第二、三次会议之间袁世凯的内外活动显示，在不同的背景、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袁世凯所说的话不一定是其内心的直

接表达，脱离相关语境，抽出只言片语，很难作为指认袁世凯真心实意的凭据。必须前后左右，相互参看，才能大致体察袁世凯究竟意欲何为。由此可见，即使预设了政治目标，强人要想达成心愿也并不那么轻松自如。8天的纵横捭阖，在精于算计的袁世凯虽然谈不上惊涛骇浪，却也经历重重险阻，绝非一叶轻舟顺流而下那样轻而易举。

注释

[1]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252），第293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25页所录电文字句有所出入。

[2]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252），第294页。

[3]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31页。

[4] 《与诸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宗室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09—210页。

[5] 《附录2·清廷致内阁》，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07—208页。

[6] 故宫档案馆：《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懿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55页。

[7]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35页。

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

辛亥南北和议，谈判桌上的主要议题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如何召集等问题。而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是被学界认定不得人心的此前国事共济会的主张，该会因为这一主张两面碰壁，很快便宣告解散。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弈，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方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相关事实，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大致描述，只是涉及各自的立场责任之时，未能详细梳理材料与事实的关联，追究起来难免先入为主，时有偏颇之处。将原有材料与各种新出资料排比对勘，可见各方介入其事的你来我往几乎都能一一对应，各种言论行事的缘由趋向，也大致可以呈现。在此基础上探究相关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仅近真，而且能够通贯无碍，以免任意取舍造成对史事本相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

一 国民会议的南北之争

南北议和首次会议决定停战事宜后，于12月20日第二次会议进入正式议案，首先要解决的君宪与共和的取舍问题，也是南北和谈的主要议题。时人普遍担心双方在此问题上尖锐对立，很难达成一致。不料，在民国总代表伍廷芳坦言民军主张共和立宪，清帝逊位，由百姓公选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内阁的代表唐绍仪竟然声称北京来者并不反对共和立宪，所协议的是和平达到共和宗旨的办法。其原话是：“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这番出人意料的表态在令关注各方愕然之余，也显示谈判双方似乎一拍即合，事态的发展比预期要顺利得多。既然主要分歧已经化解，接下来的具体操作不过是技术性程序性问题。所以伍廷芳说：“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

可是，正当人们以为难关已过，感到如释重负之际，却波澜再起。恰是在看似皆可商量的实施办法上，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且各不相让，以致到了难以商量的地步。伍廷芳以为只要优待清室，包容满人，便可以和平解决。而自称全权大臣的唐绍仪，虽然代表袁世凯表示接受民主共和，并且认为“国人皆希望共和”，可是实现的前提却是“必须徇众”。所谓徇众，具体办法就是由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唐绍仪自称武昌起事后他曾上折请求用此办法，清廷不允，现在自己仍然坚持。尤其强调“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对于唐绍仪提出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建议，伍廷芳并未明确表示同意。他认为清廷不会允许这样做，“今各省既皆言共和矣，可谓众矣”。尽管还有数省服从于清政府的权力之下，实际上已经达到多数取决的多数。况且各省代表已至南京议决共和，若是另行选派代表，势必耽搁时日。既然多数国民心理倾向共和，应当从速决断，

以免另起风波。唐绍仪则指出，各省代表不能由谘议局指派，到上海的直隶、河南、东三省、甘肃等省代表，不能代表实际管辖各该省之人，不具备决断实行之权。但原则上同意和平解决，且非共和政体不可，表示将以此办法致电请示袁世凯。^[1]

袁世凯迟迟未能回复唐绍仪的请示，第二至第三次会议，整整间隔了8天，这在急如星火的情势下，可以说相当漫长。8天当中，袁世凯暗中加紧活动，利用列强以及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迫使坚决反对中国实行共和制的日本以及不肯轻易交权的清廷皇室亲贵接受召集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的办法。虽然唐绍仪声称袁世凯内心赞同共和，而要袁接受共和就非以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之法不行。可是到了公开表态决断之际，身处南北中外各种势力夹缝之中的袁世凯，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十足的把握掌控局势，只能利用各种势力相互制约，保持平衡，因而不得不瞻前顾后，权衡再三，唯恐处置不当导致局面失控。

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无论如何实施，至少形式上看，共和与君宪两种结果均可能出现。尽管袁世凯本人一再公开声称他主张君主立宪，保留清帝，实际上只要能够大权在握，也可以接受共和，出任总统。但是，这样的两可未必能得到各方的认可。在外部，列强当中日本坚决反对中国实行共和制，其他也大都认为中国不宜实行共和制。在国内，清朝皇室尤其是亲贵视君位为身家性命的保障，不肯放弃权力，坚决抵制共和。

日本反对中国实行共和，除了担心在华利益受损之外，主要是害怕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都采用共和制，会对日本本国的天皇制造成巨大冲击。与日本结成同盟关系而且同样在华利益巨大的英国，以及多数列强，都认为中国以保留清朝皇帝而将政权交给汉人执掌的君主立宪体制为宜。为此，日本进行了各种外交行动，设法与英国在对外外交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进退，以此为基础主导，争取与其他列强步调一致，对中国的官、革双方施加压力，使之按照列强的意愿决定国体政体。

英国方面，虽然同意日本政府的看法，不认为中国适宜共和制，但是因为其利益和人员主要在光复各省，担心外交乃至武力干预激起强烈反弹，引发排外运动，同时目睹南方各省和华侨、留学界日益高涨的共和热情，英国不仅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而且反对明确向南北

各方表达关于国体政体的意向，声称将此大事交由中国人自行决定。在英国的坚持下，无力单独行动的日本只好极其不情愿地放弃任何主动干预的想法，任凭局势自然发展。

外力干预的危险消除后，袁世凯加大力度继续向清廷和王公亲贵施压。在局势的迅猛发展和唐绍仪的不断催促下，无钱无兵又各怀鬼胎的王公亲贵既不能战，便只好退而求和。12月28日，经过一番争闹，尽管百般不情愿，束手无策的清廷只能答应袁世凯的请求，同意召集临时国会，将国体政体付诸公决。

清廷颁布上谕的当晚，唐绍仪终于收到袁世凯的电令。12月29日，上海南北和谈复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关于袁世凯电令的内容，会谈速记录只记录了唐绍仪所说：“昨夜得袁内阁之令，嘱我令商阁下招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2]而会议当天发出的伍廷芳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南京代表团、天津《民意报》电，内容较为详细，而且有所不同：“今日唐使言：自初一会议以后，日将赞成共和之意电达告袁内阁，昨接袁电嘱开国民会议，将共和问题付之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的电报是说决定君主民主，而伍廷芳则强调共和指向，有意避开君主制的存废是否仍在考量之列。

从一开始民党方面就坚持以实行共和制为议和的前提条件，因而不以清廷为谈判对手，虽然第二次会议唐绍仪提出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建议，伍廷芳并未明确表示同意。而再度开议，伍廷芳却轻易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等于放弃了既定的和议原则立场。对此伍廷芳解释道：“廷意共和主义已为全国人心所趋向，原不必再开会议以观民情，但袁既欲免战事，且有服从民意之心，则此亦可为解决目前问题之一法。因与唐使开议。”^[3]1912年1月和谈陷入僵局时，伍廷芳答复南京代表团的问难，解释稍详，意思一致：“廷意今日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尤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且传之万国，知民国政府为国民多数之意见。使清帝服从，不徒用兵力，尤为文明待遇。实历史上光荣之事，故廷意以为可行。至于民国各省决无适用清政府所定选举法之理。”^[4]等到清帝退位，与温宗尧、汪兆铭等人辞去和谈代表之职时，伍廷芳又声称，开国民会议，取决多数，以定国体，“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5]。

如此轻描淡写地解释这一原则性让步，很难令人信服。国事共济会提出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时，民党方面坚决反对，丝毫不予考虑，南北和谈一开始，又坚持以共和为前提，否则不能开议，何以会轻易同意唐绍仪提出的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设计？这不仅回到国事共济会的立场，而且使得民党既定的开议前提形同虚设，因而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南方参与和谈的人员当中，明确主张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就是国事共济会的民党代表汪兆铭，他在南北之间极力运动协调，影响力却未如预期，所以罗癭公说：“汪力调停于官革两方面，而革一边不甚有势力。”^[6]不过，汪兆铭与杨度联手进行的活动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起到重要作用。由于他的居间关说，12月9日，黄兴复电表示：只要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其前提条件是，“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7]

黄兴的意思，是要尽快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实现得到国际承认的共和制中华民国。第二次和谈会议前夕，唐绍仪专门拜访了黄兴，并提出自己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宗旨。可是在会议期间提及此事时，并未说明黄兴作何反应。据12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致内田外务大臣电，20日唐绍仪密电称：“昨日与黄兴会晤，进行简短交谈，以探索其意向所在。革命党坚决主张共和，似已毫无折冲余地。此次会晤虽系个人交谈，但在正式会议上双方若公开坚持各自主张，谈判必至破裂；且各国领事之外交方针似亦有所变化，未必仍旧支持君主立宪。务希尽速筹拟方策，来电示知。”^[8]由此可见，黄兴并没有同意唐绍仪的建议，至少并未就此明确表态。

从现有资料判断，同意北方提出的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建议，应是民国代表伍廷芳个人的决定，事先并未征得民军各方的同意，这也是造成此后南方无视和谈达成的协议不断出招的潜因。而伍廷芳之所以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擅自做主，一方面是自己认为自己拥有代表民军的全权，而且共和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即使公决，也不会发生意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直表面维持不干涉中立的列强，终于决定出手逼迫官、革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这表明，列强虽然不会强行干预南北各方的政治取舍，却不能容忍战事持续，局面失控，危及自身的利益。

1912年1月2日，面对来自光复各省对其同意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强烈质疑，伍廷芳致电南京及各省做出解释说明：

顷接长沙谭都督元电、福州孙都督侵电，论国民会议办法，鸿识远虑，极可钦佩。廷于唐使提请国民会议时，曾力言今各省代表团即是国民会议，勿庸再为赘举。唐使坚称：直隶、山西、河南、奉天虽派代表，只有发言之权而无决断实行之权，且蒙、回、藏尚未有人来，不可使疑为见弃云云。廷意今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犹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从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且传之万国，知民国政府以国民多数之意见使清帝服从，不徒用兵力，尤为文明待遇，实为历史上光荣之事。若决议共和彼不肯从，则是失信于天下，不止为全国人民所共弃，且将为万国所共弃。故廷亦以为可行。至于民国各省决无通用清政府所定选举之理。已将国民会议之组织办法，议决电闻。至议决之地方，唐使言：袁意在北京，廷则主张南京。唐使历以青岛、威海卫为言，廷皆拒绝。后以不愿因争议之故，耽延时日，改为在上海开会，唐使允电告袁内阁，尚未回电。至于日期，务宜从速，俟续议订定，即行电闻。^[9]

这段话较前引三处解释更为详尽，但仍然只是事实陈述。实际上，必须仔细考察休会期间官革中外之间错综复杂的博弈，才能合理解释伍廷芳的行为。在此期间，袁世凯通过公开或私下的各种渠道，让伍廷芳认识到：袁世凯可以接受共和制，并出任总统；内有清廷、亲贵和满人的压力，外有日本等列强的反对，袁世凯不能自己公然主张共和制，否则无法稳定局势，实施统治；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停战，列强可能采取干涉行动；必须设法打破僵局，使和谈继续进行，并尽快取得成效。

既然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已有默契，接下来事情的进展似乎相当顺利。第三次会议决定：

（一）现在两全权代表会议，图解释猜疑，以安大局，特订条款如左。

（二）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三）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

（四）自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时起，所有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之清兵，五日以内，一律退出原驻地方百里以外，只留巡警保卫地方，民军亦不得进占，以免冲突；俟于五日之内，商妥退兵条款，按照所订条款办理。其山东、河南等处民军已经占领之地方，清军不得来攻，民军亦不得进攻他处。至于国民会议办法、地方、日期等及清军退兵条款，均于明日续议。^[10]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次会议上，双方还商议改定了“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各五款。此事本应在共和制确定之后才会提上日程，如此看来，尽管国体政体形式上要待召开国民会议来公决，与会双方的确心照不宣地都认为已是确定无疑之事，因而才会着手商议后续事项。

双方大概均认为关键障碍已经突破，因而连日开会，希望一鼓作气将所有事项迅速敲定。可惜事与愿违，接下来的第四次会议在国民会议的开会地点以及与会代表的省份比例等问题上，双方又出现尖锐冲突。由于袁世凯来电不愿会议地点在上海，唐绍仪提出，会场在上海，蒙回藏全体反对，宜在北京。伍廷芳坚决反对在北京开会，认为“万万不能，如此则无庸议”。接着唐绍仪又提出汉口、胶州、威海卫、烟台等地，伍廷芳则以交通不便、地方偏僻等理由予以否决，仍然坚持以交通便利、会场易择、行旅皆安、万国消息灵通且两位全权与各代表接洽亦易等条件好的上海为最宜。考虑到袁世凯坚持不愿在上海，伍廷芳又提出香港备选，唐绍仪亦不赞成。

鉴于民党坚决反对在北京开会，唐绍仪表示：“我料投票必为共和，但形式上事耳。”伍廷芳顺势道：“一家之事，何必如此争执？今日之事，将近成功，不如以上海为便也。”于是双方将议题转到与会省份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到会省份达三分之二以上即可开议。唐绍仪认为，今为特别之事，宜全数同意。伍廷芳觉得不能以一二省之故而不开议，虽然如唐所说可以随时开会，毕竟会期一定而且有限。唐绍仪仍然认为三分之二未免太少，举总统亦不如是草草。有所争议的其他还有蒙古能否算作省之类的具体问题。会议最终议定国民会议产生方法四条：一、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成，每省为一处，内外蒙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二、每处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到会代表不及三人之处，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日期，各处代表四分之三到会，即可开议。四、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电召集；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代表，

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并由民国政府电知该省谘议局；内外蒙古及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11]

12月31日第五次会议时，危机已经出现。先此，就在29日和谈复会的当天，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次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事，议决由伍廷芳答复毋庸再开，因已选举临时大总统，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并以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义，于当天电告清内阁总理袁世凯：“现各省到会代表已一律承认共和国体，无庸至北京取决。……并请万勿再持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之歧说。”^[12]是为民军方面首先直接否决和谈所议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君主民主的协议。所以在第五次会议上伍廷芳说：“南京代表团来电，不认国民会议，故我亦为难，至于极地。”不过，伍廷芳对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质疑及意见并不接受，他告诉唐绍仪：“然我有全权代表，即可以全权行事也。我等所商量者，并非不正式。君既为全权代表，彼不能不承认也。”坚持继续沿着既定方向进行谈判。

这时唐绍仪方面也遇到阻碍，主要症结还是会议地点。袁世凯并不否认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的原则，可是坚决反对以上海为会议召开之地，希望民党去北京，而伍廷芳又坚持不肯，双方僵持不下。伍廷芳提议由上海城改为租界，唐绍仪仍然表示为难之极，理由是袁世凯以为粗率。对于这样的解释，伍廷芳觉得不可思议：“只求开会正式，不必上海粗率，北京即不粗率也。”进而表示：“未决定国体之前，彼此猜疑甚多。故速决为佳。”双方就此你来我往，纠缠不已：“唐：所以问优待皇室之事。伍：先决定国体问题为宜。唐：蒙古反动，非所愿也。上海会议，蒙古必不肯来，宜以何法招之使来？伍：汉蒙平等，有何不可。唐：一个月内开国民会议何如？伍：太迟。”^[13]由此可见，双方在具体细节上再度陷入相互扯皮状态，检验并且考验各方对于和谈及其取向的真心诚意。

袁世凯接受唐绍仪的国会公决之请，除了事先有所密谋，主要是可以借此应对内外各方的压力，使之相互制衡，从而让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12月29日，他密电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告以“将来用正当选举之法，举合格代表之人，使正人得以发言，君宪未必无望，或可舒目前之兵祸，杜外人之干涉”^[14]。同时，他又告诉来访的《大陆报》访员：“余今决计反对民军所定召集国会办法，因民军之要求为一方面之主意。似此集

会不足代表团体，将与戏剧无异。故余主张召集此会，其会员须实有代表各省之性质。”其结语“则仍主张君主立宪，谓民主共和恐不易成功云”。^[15]

袁世凯的左右为难与表里不一，刚刚回到北京的莫理循洞若观火。袁世凯得到的印象，或者说由于日本方面的施压而产生的误解，是日本政府无论如何不承认在中国建立共和政府，不仅英日两国将会共同行动，其他大国也达成了类似的谅解。莫理循认为唐绍仪12月20日在上海发表同情共和的声明，应是得到袁世凯的充分认可，可是袁世凯在北京的说法则与此相反。莫理循看过唐绍仪提供的所有与袁世凯的来往电报，早在12月21日，袁世凯就告以唐的突然行动令所有的外国公使迷惑不解。唐绍仪敦促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袁复电称日本的伊集院公使表示了含蓄的威胁，他不能促使颁布诏书召开国民会议，因为各种迹象表明会议的决定肯定是建立共和国。“在那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从英国和日本得到什么呢？”

鉴于上述情形，莫理循从上海发电报建议英国政府最好明确宣布，不再以任何方式担保支持帝制在中国延续下去。同时，唐绍仪电请袁世凯指示驻英公使刘玉麟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要求对此明确表态声明。结果表面上表示与日本协同行动的英国，实际上不得不反对日本人的政策。而日本国内共和思潮的增长令天皇深感忧虑，担心中华民国的建立会对日本的民权运动起到激励的作用。

尽管莫理循向上海的共和派首领们指出，孙中山或黎元洪出任民国总统，绝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革命党的领袖们表示肯定会任命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而且准备写下书面谅解。可是袁世凯明确告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他不能接受这一任命，并且责成向所有外国政府致函说明。他不愿做篡位者，只有清廷本身要求任命他，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莫理循提出，一旦国民会议提名，清廷就自己支持任命袁世凯当总统。^[16]

12月30日，袁世凯接到唐绍仪汇报当天会议要点的来电：

其会议地方，伍初欲在上海城，怡坚执不允。伍谓否则可在南京，怡驳之。另提出胶州、烟台、威海卫、汉口等处，伍亦坚执不允。又谓各处均不如上海之便，如不欲在民军驻扎地方，则仍在上海

租界，断不能改，此为万国公共地方等语。怡以钧电不主上海，亦未允。现未议决。其到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开议一条，怡谓此为中国极大之事，必须全国各省及各属地均到齐方能开议，如三分之二即开，是含有东三省、直、鲁、豫等省不必列入之意，岂为公允。伍谓并无此意，可电催各省速派。怡谓既须候各省到齐，则十一月二十日断难开议。伍谓以速为佳，因民军跃跃欲战，且地方商业以战事亏损甚大……至选举一层，伍谓各省已来沪之代表，多系该省谘议局员，自属合格，何必再定选举法，徒延时日。怡谓恐非谘议局员尚居多数。以上各节均未议决，现订明午再议。惟不认选举法及上海会议两节，我拒之甚力，彼持之益坚。应如何对待，乞裁夺电示。^[17]

袁世凯回电称：“彼此宗旨原在和平了结，如强以万办不到、万来不及及不合公允之条件，是失和平之意，永无了结之期，是岂两造之本意。”^[18]这样“万办不到”的底线很快就摆上台面。收到12月30日唐绍仪来电呈报当天第四次会议签定的国民会议产生办法四条，袁世凯极为不满，断然予以否定：“本日已迭次声明，必须将选举法妥拟协定，并由阁电申明。讨论权限，承示签定。代表人数四条，断无效力，本大臣不能承认，请取消。另向伍代表照迭次阁电妥议，以昭信用。”^[19]

当天，袁世凯又接连几封急电，分别阐述制定选举法以及地点选在北京的必要性：

定选举法及在北京开会均属必要，无论君主、共和，皆以图国利民福、永远治安为目的。兹当解决国体之时，必须普征全国人民意思以为公断，自应用各国普通选举之法，选出国会议员，代表全国人民意思而议决之，始能收效。倘以少数之代表人草率议决，实与专制无异。各省及各藩属军民决不公认，必至再起争端，殊乖和平解决之本旨。此必须定选举法之理由也。如民军虑本政府藉此为迟期备战之计，则退兵条款现已订明，于五日内妥订实行，断无违约之理。至必在北京开会之理由有三：一、北京久为中央政府地点，而民军完全统一之政府尚未成立。一、按全国道里，以北京为相距适中之点，而蒙、回各属人民远赴上海，未必肯去。一、各国公使驻在北京，万国具瞻，可昭大信，非上海一隅之地所能并论。以上各节，务望坚持。^[20]

国会公决，如以潦草从事，断无效力，军民必不信从。昨采北京舆论，且明达时务者，金谓必须北京开办正式国会，否则无人承认。

请竭力坚持，勿稍松劲。 [21]

次日，袁世凯继续就上述问题穷追不舍，追问“真五电所签四条谅已取消”，并且变本加厉，进一步提高价码和扩大范围：

此事既已普征全国人民意见公决为宗旨，自应由各府、厅、州、县各选议员一人，方足当“舆论”二字。若每省只有代表三人，仍蹈少数人专制之弊，内不足以服全国之人心，外不足以昭列邦之大信。且各藩属辖境甚广，除内外蒙古十盟外，尚有科布多之杜尔伯特两盟，新土尔扈特一盟、伊犁之旧土尔扈特等五盟、青海之左右翼两盟，此外察哈尔、乌梁海、哈萨克部落尚多，若有一处不选议员，不列议席，将来议决，断难公认。又，国体未经议改以前，召集国会仍应由本政府发布命令于各省各藩属，其电邮阻梗之处，可由各军政府担任转递。至来电所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节，未经本政府承认，断无分电之理。 [22]

按照该电，已经不仅是在选举代表的办法上讨价还价，而是根本否定和谈的政治基础，如果清政府正统合法，则革命当然属于非法行动，无所谓谈判可言。国体变更与否，对于清政府固然是重大抉择，对于独立各省，早已随着光复而实际改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便是独立各省联合组成的革命政权。此政权的政治目标旨在推翻清政府，而不是获得清政府的承认。

显然，袁世凯在迫使清廷万事放手之后，面对原来借力向清廷施压的革命党急于恢复或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只是正统的形式虽在清皇室，实际权柄却握于全权责任内阁。尽管这一政府仍然披着清朝的外衣，控制范围已经大幅度收缩，毕竟占据着原来中央正式政府的正统地位。

同日，袁世凯还向唐绍仪发去如下内容的电报：

数千年君主国体欲于此时议改，非得真正之国民会议多数取决，必不能服全国之人心，免将来之革命，并不足对付目前外交。兹有二事，请向伍代表切实声明：一、国会地点必在北京，断不迁就。二、选举法已另择要电达，必须照此协订，万不能名托召集，实同指派，以为掩耳盗铃之计。如伍不允此二事，请询其是否欲开假饰之国民会议，不愿开真正之国民会议，即是否不愿和平解决。各军队企踵待命，不能刻延，请速复。 [23]

这封电文的措辞与前大不相同，不仅以不容商量的命令口吻，而且以武力相威胁，形同向革命军发出最后通牒。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授命草拟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其要点为：一、临时国民会议于北京召集之。一、各厅、州、县及府之有直辖地方者，各选议员一人。一、各省以各府、厅、州、县行政长官充选举监督。一、各藩属以扎萨克总管部长、城长等充选举监督。一、有全员三分之二以上到会即为成立。一、除左列各项外，凡有国籍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于该选举区内有住所满一年以上者，皆有选举及被选举资格：甲、褫夺公权者。乙、受徒刑以上之刑，由宣告之日起裁判尚未确定者。丙、禁治产及破产者。丁、僧道及各宗教教师。戊、现役军人及因此次事变在召集中者。庚、现任官吏及现任民军政府服职务者。一、选举用单记名法投票。一、以得票最多数之人为当选议员。至此项议员选定后，应由各府、厅、州、县地方行政长官发给印文执照，赍送到京。计到京议员已届总数三分之二时，即行开会。^[24]

照此办法，全国必先恢复现政府即清王朝的统治，相形之下革命军便处于非法状态。这让主张以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唐绍仪极为尴尬，因为本来这一建议是回应民军方面坚持以承认共和作为开议前提的权宜办法，他相信此举不会改变实行共和的结局，只是让袁世凯易于接受，并且让伍廷芳也相信这是迅速结束战事、组建新的共和政府的最佳途径。袁世凯的态度究竟是出尔反尔前后反复，还是唐绍仪擅自做主使得两人产生分歧，值得考究。可是这样一来唐绍仪无论如何已经无法在谈判代表的位置上继续待下去，袁世凯全盘否认其所签署的所有协议，使之无形中失去代表的资格，此前伍廷芳所说双方代表的全权，不复存在，唐绍仪只能按照自己事先的声明，辞去谈判代表的职责。12月31日一早，他就致电袁世凯，提出辞职：

此次奉派代表来沪讨论大局，原为希冀和平解决，免致地方糜烂起见。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初经提出国民会议一策，当亦全体反对。多方设法，方能有此结果。今北方议论既成反对，而连日会议所定条款，宫保又不承认，怡等才识庸懦，奉职无状，自明日始，不敢再莅会场。除知照伍廷芳外，请速另派代表来沪，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首席全权代表去职，其余辅佐之人也不安于位，于是全体代表一并辞职。^[25]12月31日的第五次会议，其实是在唐绍仪及北方各代表已经集体辞职的情况下召开的，不过聊以尽责而已。伍廷芳提议国民

会议在上海开会，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唐绍仪允诺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26]会后唐绍仪报告：

今午会议，催定地方、日期，谓国体早定一日，则军队可早散一日，百姓亦多受一日之福。怡谓如在北京开议，则诸事易决，北京为各使所在，足表郑重之意。反复详说，伍仍坚持上海，谓各省代表俱诱至京师围杀等语。怡谓蒙古王公已联名函称不认共和，若不在北京，彼决不允来沪，将来国体虽定，蒙旗不从，必生大阻力，不可不注意。伍谓共和国体与蒙人有益，譬如免为奴才、免其进贡等事，一经解说，彼必忻然信从。怡询以另有何地可商，彼坚不允另议。至日期一节，伍谓只可展数日，多断不能。怡再三譬解，谓若不通融，即非和平解决之意，我只有辞去代表。彼仍坚执。又谓今日如无议决之款，外间必鼓噪。怡不得已，将不甚重要数条与之签定，另由文四电呈阅。……伍奉南京各民军电称，临时政府已成立，何必待开国会徒延时日，可知我等允开国会已为众论所诘责。况连日所议均甚平和，宫保素有卓识，当知并非格外要求，何至有不满意。若此数条将不能决，军队断不允从，我之所处亦甚为难。等语。似此情形，势难讨论，明日不再开议。^[27]

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等人的请辞电，表示接受，并于1912年1月2日致电伍廷芳，声明：

委托唐代表赴沪作为总理大臣全权代表，专为讨论大局之利害。其权限所在，只以切实讨论为范围。乃迭接唐代表电开与贵代表会议各节，均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电请唐代表转致。嗣据唐代表一再来电，请辞代表之任，未可强留。现经请旨，准其辞任。至另委代表接议，一时尚难其人，且南行需时。嗣后应商事件，先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往返电商，以期简捷，冀可早日和平解决。^[28]

如此一来，虽说和谈北方一面只是由唐绍仪代表变为袁世凯直接主持，可是唐绍仪等去职的原因是商定的各项协议均归无效，整个谈判表面上看似未曾中断，实际上回到原点，之前的种种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1]《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88—394页。

[2]《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94页。

[3]《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1年12月29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83—384页。

[4]《致南京代表团电》1912年1月12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37页。

[5]《致孙文黎元洪各省都督电》1912年2月16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97页。

[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8页。

[7]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5页。黄兴的复电是发给汪兆铭，唐绍仪称：“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91页。

[8]《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97—298页。

[9]《致南京及各省电》1912年1月2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16—417页。

[10]《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1年12月29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84页。

[11]《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97—401页。

[12]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44页。

[13]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403—404页。

[14] 《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1911年12月29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19页。

[15] 《接见〈大陆报〉访员之谈话》1911年12月29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20页。

[16]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815—819页。

[17] 《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来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25—226页。此电署期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即12月29日，而内容与第四次会议相符，似应为30日。

[18] 《致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电》1911年12月3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24页。

[19] 《内阁致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电》1911年12月3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27页。

[20] 《内阁致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电》1911年12月3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27—228页。

[21] 《致议和北方代表唐绍仪电》1911年12月3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29页。

[22] 《内阁致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电》1911年12月31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31页。

[23] 《内阁致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电》1911年12月31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32页。

[24] 《内阁致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电》1911年12月31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31页。

[25] 《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等来电》1911年12月31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36页。

[26]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404页。

[27] 《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致内阁电》1911年12月31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37页。

[28] 《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37页。

二 和谈陷入绝境

袁世凯接受唐绍仪的请辞并且亲自上阵，旨在推翻后者所签订的各项条款，除了会议地点和选举办法之外，他还就双方撤兵、提取洋款等事否定前议，重新提案，并提议停战期限延长15天，以便重新谈判。

变生不测，让自作主张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的伍廷芳始料不及，但也为他的尴尬处境带来解脱的转机。本来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已经否定了和谈达成的协议，宣告共和已经成立，国体问题已无谈判讨论的必要，只是伍廷芳自认为握有代表全权，可以继续谈判，只要谈出令民党满意的结果，获得承认应该问题不大。唐绍仪的辞任和袁世凯的决绝，一方面令伍廷芳大感意外，另一方面，则给他提供了一个和谈如何收场的下台阶。因为现在他需要担心的，已经不是如何让民党接受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和约，而是如何反对袁世凯单方面撕毁协议条款。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全盘推翻协议，使得伍廷芳无形中处于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

事态发展至此，似乎进入一个怪圈，由于南北政局的错综复杂，双方的和谈代表其实都无法真正握有全权，不能代表利益诉求各异的各派势力。伍廷芳在以共和为谈判前提的立场上妥协，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已是后退一步，并未得到民党方面的一致认可。然而，预想为不过是形式上增设让袁世凯易于接受共和结果的程序，却遭到原以为受惠一方的袁世凯坚决抵制。而由唐绍仪和伍廷芳签订的协议，本来同样遭到民党的否决，但是袁世凯的否决举动却成为其出尔反尔、居心叵测的铁证，使得根本反对和谈的民党人士反过来维护和谈达成的协议，以便加强反袁的声势。

接到袁世凯准许唐绍仪辞任以及就已签定的协议重新提出谈判条件的来电，伍廷芳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复电痛批袁世凯背信弃义：

顷接盐一电，深为诧异，此次唐使来沪，携有总理大臣全权代表文凭。开议之始，互验文凭，本代表即认唐使得有全权会议。五次所

订各约，一经签字，即生遵守之效力。来电所称唐使电开会议各条，均未先与商明遽行签定。本代表实不能承认此言，但知一经唐使签字之后，贵政府即当遵行。今唐使虽已辞职，而未辞职以前所签字之约，不因此而失其效力。贵大臣深明交涉，谅必能守此公例。至于所称应商事件，先由贵大臣与本代表直接往返电商云云。应商各件，有非面商不能尽者，远隔数千里，仅以电报往返，必有难于通悉之处。故会议通例，必须面商。通函尚不能尽，何况电报。本代表此次与唐使会订国民会议办法，已将就绪，只余会议地方及日期，已由唐使电达，中外想望以和平解决，指日可俟。今忽有此意外，和局难保不因此动摇。贵大臣如果有希望平和之决心，应先示人以信，宜迅照初十日所订定退兵办法，飭各军队于五日之内，退出原驻地方百里以外，以昭大信，是所切禱。

接到袁世凯当天提议停战期限延长15天的第二封电报，伍廷芳电复，请袁世凯先就国民会议办法尚未确定的地点及日期迅为回复，

“如以本代表办法为然，则国民会议指日可开，大局早定，人心早安，诸事皆易商量；如不以此办法为然，则彼此磋商必非电报所能尽悉。请贵大臣亲来上海一行，以便彼此直接妥商”。并告诉袁，与唐绍仪约定，若要重开战事，两军须得全权代表电报述和议决裂，才能发令开仗。^[1]此后又数电反驳袁世凯所谓唐绍仪没有全权的说法，坚持双方所有签订的协议一律有效，只能遵守实行，不能再事更改。

双方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之中，关于国民会议的功能定位明显存在反差。伍廷芳所认定的是处置紧急重大问题的临时举措，因此必须从速决定，以便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而袁世凯和清廷所主张的则是正式国会，既然问题重大，不可从权草率，以免将来风波不断。其中又各夹杂有利于己的政治考量，前者希望一鼓作气，后者试图拖延待变。就可行性看，国民会议本来就是应急从权之举，在当时形势下，召开正式国会不但缓不济急，而且无法操作。可是如果按照民党的想法，以南京的各省代表为基础，则结果不问自明，袁世凯当然不肯接受，所提出的不能代表全国人民意愿的质疑也并非毫无道理。

眼看伍廷芳对于上述问题寸步不让，袁世凯于1月4日突然提出：

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

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亦即取消。^[2]

此电或者解读为袁世凯是因为南方成立临时政府并选出总统才反对和议达成的各项条款，其实，早在12月29日被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就致电袁世凯，说明组织政府的理由，并表示暂时承乏，对袁“虚位以待”。1月2日袁世凯复电：“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问。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3]虽然倨傲无视，却没有多少恼怒。如今忽然借故兴师问罪，显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过是为了扳回谈判桌上的不利地位，转守为攻，迫使民党一方自觉理亏，从而在国民会议代表选举和开会地点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对于袁世凯咄咄逼人的诘问，伍廷芳于1月6日正式答复道：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绝不相妨。理由之一，现在民军已光复十余省，不能没有统一机关，在国民会议议决之前，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是民国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通例。若以此相诘，则清政府何以不在国民会议议决之前即行消灭，还派委大小官员。“请先责己，而后责人，方为公允。”此时袁世凯是内阁全权总理大臣，所有人事任免均由其一手操纵，伍廷芳直指其短，抓住要害。理由之二，既然双方均须遵守国民会议的决议，袁内阁也面临一旦决为共和，清帝是否立即退位的问题。两方全权代表签字作准之事，各自遵守，不必彼此质疑。

同日，伍廷芳又连续发出五封电报，继续分别就国民会议代表组织办法、会议地点、唐绍仪的代表权限、请另派代表南来面商等事，与袁世凯反复交涉。伍廷芳的基本立场是，无论袁世凯怎样想方设法地挑剔和否认，始终坚持已经签订的各项协议正式有效，只同意就协议未定事项进行谈判。凡是已经定案者，则绝对不能就哪怕任何细节重启谈判，以防一旦破例，袁世凯势必步步进逼，全盘推翻所达成的协议，后果将不堪设想。

针对袁世凯的各项具体说辞，伍廷芳不厌其烦地一一驳斥。关于国民会议的组织办法，伍廷芳认为袁世凯及北京诸公不知文明选举办法，所以指每省只有代表三人仍蹈少数专制之弊。代表由各处公举，即代表该处人民之意，合之则为全国人民之意。国民会议必早日开会议决国体，才能定人心，息战祸，不要横生枝节，耽误时日。至于唐

绍仪代表签订的各项协议，事先与袁世凯商明与否，为其内部之事，自己不必过问。但既认其为全权代表，依照万国公法，所签条款即为有效。袁世凯以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便是将自己的权限完全交与唐。唐使不远数千里前来议和，岂有只与以讨论之权，而每事必先商承之理。并反唇相讥，诘问其辞职有无清政府准辞明文。北京系清朝故都，民军起义，建立共和，不应承认专制政府，尚何国都名义可言。交通方面，北京南来不过三四日程，所牵就者甚小。国会无论设于何处，皆为万国所具瞻，况系国内之事，毋庸狃于公使驻在地。北京为清政府势力圈，曾经犯使馆，杀驻使，难保不会围议院，杀代表。况且载涛等人募死士刺杀民党要人，连袁世凯本人也要兵卫保护，何况他人。本来双方各自主张开会地点在北京和南京，改为上海，已是两相迁就的结果。袁世凯撤去代表，理应亲来上海，而无强邀伍廷芳北上之理。上海和谈，袁内阁代表安然无恙，为了国家平和，袁更应亲自前来。^[4]

不过，伍廷芳反问袁世凯的几个问题，自己也很难确保。尤其是万一国民会议结果为君主立宪，民军方面能否遵从，可以说结论毋庸置疑是否定。因为此举本来只是为了借袁世凯之力推翻清朝，而不是在国体政体问题上还有两可的商量余地。按照私下的磋商约定，只要袁世凯做到这一点，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总统大位。正因为如此，民党方面也深知袁世凯担心万一民党失信，岂不是落得个鸡飞蛋打。1月2日接到袁世凯语气冷漠的电报，孙中山即复电表示，为了避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君主、民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5]。

孙中山的电文颇有耐人寻味之处。和谈协议是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孙中山却声称君主、民主已经不在讨论之列。这显然是根据双方私下磋商的方案立论，完全排除了君主立宪、保留清朝的选项。他一再表明将让位与袁，就是要打消后者的疑虑，以促使其兑现结束清朝统治的承诺。

可是，刚刚回国不久又迭经纷繁立国大事的孙中山，对于和谈的详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所以当天他致电伍廷芳，切盼其“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1月4日，又再度电询伍廷芳：“国民会议地点、时

期及退兵办法商有头绪否？祈电知。以后请将会议情形，逐日电告为盼。”^[6]他要求民军“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以北伐促和议，同时又公开向北军将士宣言：“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7]

伍廷芳1月6日复电的辩解和反唇相讥，袁世凯当然不以为然。1月8日，袁世凯再度复电伍廷芳，坚持道：“国体未改以前，数百年已成之政府，无取消之法。而十七人暂举之总统，无公认之理。贵代表既知国会解决必须服从，何以未解决之前便先自武断国体？其蔑视国会，反对多数公决，更复何词可辩？但来电于政府、于总统既皆以临时为名，是已经承认今日之为暂设，而已经承认将来之可取消，不必再相诘问矣。”^[8]并且连电对伍廷芳的诘问逐一驳斥。

关于选举办法，袁世凯辩解道，本政府所提出的选举法，较各国国会现行之通例，手续已简捷数倍，而贵代表犹嫌迟滞，无非欲以国体问题付诸草率之解决而已。既然承认多数取决，一省三代表，一人又能投三票，合计全国不过72票，24人即可代投全额，13人就过半数，可以解决国体。所谓代表由各处选出，所以三人不得云少，可是所定开会日期紧迫，没有容各处由众选出的时间，只能随意指派。南京以17票选举大总统，中外疑讶。若再以指派之少数人草率解决国体，将犯天下国民之众怒，而和平目的终不可达。国家存亡，民族祸福，系于国会一决，非儿戏事，望三复思之。^[9]

关于开会地点，袁世凯觉得因此欲取消北京首都名义，殊堪骇怪。岂有国民开会公决国体问题，舍首都而行之外国租界，其为国体之辱，当亦民军之所同耻。民军代表没有其他反对理由，于是硬不认北京为首都，又强引南京为比例。北京建都多年，万国使节在此公认。而南京政府既为临时，内无国民全体公认之确据，外无各国政府公认之明文，不能但凭民军代表的武断之词，以暂设之虚称，易永建之实际。所谓上海地方平稳，则手枪炸弹恐吓，天下所共闻。应共怀国家荣誉思想，不要以野蛮自认。^[10]坚持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万无更易之理。^[11]

关于唐绍仪的代表权限，袁世凯指伍廷芳未能细察其代表的性质与文凭的词意，且以一国的国体问题，动引国际公法，又不详考各国学者之说与其成例，空言往还，于重大条件反而不答复。重申凡未经与自己商明的协议，无论和谈代表辞职与否，一律认为无效。^[12]

关于伍廷芳要求袁世凯南下一节，袁以总理国务，不能远出予以拒绝，反而请伍廷芳到北京面商。至于另派代表，则声称国体问题非代表所能断定，现在所议各项细节，可以直接电商，不必转折。^[13]

此番较量，双方针锋相对，你来我往，一方坚持已经签署的协议不能更动，会议地点必须上海，时间越早越好，另一方则截然相反，已经签署的协议概不承认，地点必须北京，时间程序不能仓猝草率。双方电文往返，除去关键名词的对立，连措辞都几乎一模一样。较量的结果，看似势均力敌，不分高下，却埋下了清帝退位后袁世凯要求取消南京临时政府的伏笔。

袁世凯自就任内阁总理直到南北和谈期间，在各种场合关于国体政体问题的表态，看似相互矛盾，前后反复，其实有其一定之规。这也就是《巴黎时报》北京特派员感到大惑不解的问题。11月23日，该特派员专电叙述谒见袁世凯的情形，觉得“袁之政见极为奇异”，一方面，袁认为“中国政治运动现分两派，一主共和，二主君主立宪。共和政治本最文明，然须人民程度相当，始有良果。中国仅少数人能知共和，其大多数均不解共和为何物，骤以此种政治施之全国，未免太早。倘欲真得共和，非经绝长久之时间及绝强大之改革不易办到。今之各省所为，徒召分崩离析，扰乱秩序，决非生民之幸。吾意以为，但将君权限制，政治改良，实行十九信条，必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当访员问以究竟用何法方可平定内乱，袁之答词大出意料，“谓先与武昌议和，倘不就抚，则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是。吾但从多数之票决为趋向耳”。“此其措词，又似听命于舆论，而并不坚持君主矣。”^[14]

无论是老谋深算的权术作用，还是形势比人强的定律使然，袁世凯一以贯之的做法主要就是对清廷以民党坚持改变国体为口实，对民党、同侪和世人则表面上继续拥护君宪，暗地里密谋逼退清廷，压服民党，接掌大位。

一般而言，袁世凯的公开表态，均为主张君主立宪，如11月21日回答英国《泰晤士报》访员的提问：

余今决意重行组织一巩固之政府，以免国家之分裂，故极主张保留清朝，以成一有权限之君主政体。盖将以此为表示权力之中点及担保中国完全之结束物耳。且谓，余信国民十分之七仍持保守主义。现

民军已有意见不和之征，北方民军与南方不甚融合。如果覆灭清朝，则必有第二次之革命，于是中国将数十年不能安静。^[15]

两天后，又对来访的《泰晤士报》访员表示，决意保存“满洲皇室”名义，但须限制君权，一切以议院为主体。“其意谓倘肇共和虚名，各省行将自讐，势必内乱继续不已，或陷中国于无政府之地位。故欲保中国之领土完整，尊敬门户开放及各国均势，固莫妙于以君主为大纛，而尽去满人之特权及专制之恶习也。”袁世凯深信中国人民十分之七为守旧派，同情改革者不过十分之三。即使共和成立，将来或再有其他守旧党起而革命，谋设专制政体，如此则内乱连绵，或数十年不能平定，中外各国将同受其困。^[16]

袁世凯的表态，除了基于自身的认识，更多的当是考虑到日本的对华政策能否接受变制的事实。12月21日，袁世凯电告唐绍仪：“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致破坏种族。”^[17]直到1月中旬，“日本是袁世凯和他的下属的主要担心的对象”，尽管莫理循不断告诉他们，根本用不着担心日本人为支持现在的帝制而进行干涉。^[18]

袁世凯的不断表态，使得正在暗中设法争取与之携手合作的梁启超等人产生误判。12月下旬，蓝公武致函康有为、梁启超，报告袁世凯的动向：

北方前此表面上虽似退让到极点，有开国民会议公决之诏，实则皆项城之计画，借以敷衍时日，为其计画进行之地，前数函均已言及。当诏书未下时，闻李柳溪言，南方之内讐，早在项城意料之中，汉口退兵一节，实以山、陕未平，兵力不宜分，况孤军深悬，既不得用，又犯大忌，故拟退至武胜关一带，反攻为守……前数函中述及项城欲与先生联络一节，并有资助经费等语，均系李柳溪正式转述项城之语。此事如何办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盖南方之必败，识者早已料及。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盖欲建设，非俟此时，亦仅空谈而已。项城虽有权术，然在今日南北兵力对抗之际，固其世界，而至用兵之时告终，以口舌笔墨争竞时，则彼之能力甚薄，

盖武力者仅可以对抗武力，若国会报馆等，则非武力所能抗者也。武等急欲组织团体，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计，然反对项城静以待时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则表同情于我辈者颇多，惟在民军威力之下，不敢轻动，故拟俟时机稍熟，即行发起一极大政党。^[19]

由此看来，梁启超一派对于政局发展的前景不无乐观，准备在国民会议召开的阶段乃至正式国会时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2月27日，蓝公武再度函告康、梁：

今日往见李柳溪，渠云：和议无成，行政经费至本月十六日已尽，借款目下难望，一亲贵嫉视项城。渠又谓目下以筹得款项，按兵不动，（大约以亲贵捐款及卖却宫中宝物为敷衍一时之用。）徐待南方内讧，然后攻其一二重要地方，乃再以和平方法解决时局为上策……此间又有发起国民会议之说。以武观之，时机尚早。^[20]

依据京师内线提供的这些信息，梁启超明知袁世凯召集国民会议只是缓兵之计，却相信其终极主张仍然是维系清王朝的君主立宪，因而不断提出虚君共和的诉求，以为可以影响袁世凯的决策。可是，在识者看来，形势早已根本转变，梁启超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已经时过境迁。12月14日，吴贯因（即吴冠英）就致函梁启超，以大势所趋，劝其放弃君主立宪主张：“况今日又有所谓民族主义之说出于焉。故昔之为君效死者，人皆称之为忠臣，今日为君效死者，人则字之为汉奸。夫诚得忠臣之名以死，则或有愿为之者矣；若蒙汉奸之名以死，谁复乐为之乎？”^[21]虽至以汉奸恶名相加，仍然不能动摇梁启超的信念。直到1912年1月27日，罗癭公来函告以：

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燕言君号一层，南中承认，仅力结燕，项容言战否？燕言决不战，此则可以表示者也。）日日言君位，至今尚未改口，特松缓耳。而其左右自唐氏明赞共和外，如梁如赵如杨哲子及其余，皆均持共和（见所措置），均向共和一边进行。前者已有真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定初二赴津，车已久备，因津宅已预定矣。亲贵哄闹之后，此事暂搁。此时去停战期满不过两三日，而项城神志从容（此叶玉甫之言，至日日欲闻也。），纯无焦急，足以断定项城之主共和也。

罗癭公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梁启超信息不灵，以致对于局势的判断有误，告诫其必须及时改弦易辙，调整政策：

此间情形日夕万变。公在异国遥策国事，断不能亲切，所凭者东报耳，东报多不可靠。而近者东人，有思鼓煽以利中国之分裂，其言固多不可信也。此时袁氏断不能表示宗旨，其所谓连络者，欲其不为我敌且将收为我用耳。然断无推心置腹听客之所为，又断断然也。吾党与之结合，当在不即不离之间，断无委身其中之理。但使宿嫌捐弃，有可以相助者，略为助之而已。此时国体未能决以前，袁断不将真心出示吾党，亦无明助之理，但虚与委蛇可也。

尊电嘱送燕、柳阅，此时虚君共和字样，京中久已消灭矣。至改中华国从汉姓一层，杨士琦提议不从，至今则无及矣。当派议和代表时，即行此策，撤去众矢之的，犹可及，今则时已过矣。佛苏谓决不可送燕、柳阅，仆与宪同意，遂联名电复，请勿再电（电来无用，电费可惜），此时只有静候解决耳。所谓生米煮成熟饭，特未开饭耳。必谓非生米不可，则徒费饲耳。前两日恭邸甚激昂，泽亦甚主持听袁辞职，可以铁组织内阁。若辈徒哄闹耳。太后决不敢听袁辞，袁亦必不辞，若辈纷纷主战，非不能战也，若辈战则义和团之故辙，徒增糜烂，以至亡国耳，袁必不肯。观日内袁氏从容之态，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22]

罗癭公直言不讳的劝告，似乎仍未打破梁启超将维系君主立宪寄予袁世凯的幻想。2月5日，罗癭公再度来函，将北京的内幕实情和盘托出：

日来共和政体已决定，君主议论已渐灭无余，京中报馆并改变言论，所尚持君主论者，仅资政院议员所开《民视报》耳，仅数百纸，不足轻重也。日日言发表，终未实行者，或言大纲虽定，尚有细目待磋商，南中未全见之故；或言太后虽已默许，仍待臣下决议，屡议皆含糊而散。项城必欲出诸众人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故至今不能发表。再有一说，诏纸已备好，盖宝交到项城之手（袁部分之人不肯认）。项城挟以为与南磋商之据，已电知孙氏，此说最近之。所称日日发表者，非无因也。

“虚君共和”名称，长者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折，竟以此名词入告，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非虚君共和政体也。不意长者费多少心血，供他人涂饰耳目之用，至可叹也……大局已如此，亦断无可商量之余地，只能待大定后，另谋组织耳。前此所谋皆成过去矣。^[23]

事已至此，梁启超方才如梦初醒，彻底放弃回到北京实现君主立宪的计划。如果说《时报》指袁世凯有权术无政见的议论在一些人看来还有诛心之嫌^[24]，那么正是袁世凯自己用行动证明该报所言不虚。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和伍廷芳就国民会议组织办法、地点、唐绍仪的权限及其签署的各项协议的效力等问题各执己见，反复辩驳。尤其是唐绍仪的权限问题，成为双方言词交锋的焦点。袁世凯声称唐绍仪逾越权限，因而所签署的各项条款当然无效，伍廷芳则坚持既然是全权代表才开议，所签协议均当遵守。不仅议而未决的会议地点、日期彼此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就连已经定议的各项协议，也难以维持，和谈大有全盘破裂之势。

1912年元旦，朱尔典拜会了袁世凯，主要谈论和议的困局以及解决办法。袁自称一直致力于促进和平地解除危机，感谢朱尔典对这一目的抱有同情并提出了若干友好的建议，眼下的状况似乎表明，继续使用和平方式已不可能，庆幸朱尔典能听取他关于需要改变政策的原因的解释。袁氏指和谈一开始革命党的态度就是蛮不讲理，拒绝讨论共和制以外的任何事情。因此，当唐绍仪报告说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将政体问题提交国民会议决定时，袁还强迫皇上发布上谕，表示同意。可是革命党的代表伍廷芳对这一绝大让步并不满足，强迫唐绍仪签订了四项一面倒的条款。虽然唐无权在袁奏准之前同意任何事情，为了避免谈判破裂，袁仍然准备接受，只是电告唐未经批准不得再签署任何东西。不料唐已经签署了另外四项条款，接受了革命党人关于国民会议组成的要求，使之局限于该党首领们提名的一小撮成员中，绝不能广泛地代表国民。唐的不明智行为在北方引起强烈反对，袁指示唐遵照内阁关于召开具有更广泛代表性国民会议的提议的精神，修改后来签署的条款，于是唐提出辞职。革命党似乎并不希望和平解决，非但未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还不断违反停战协议。

朱尔典认为没有理由采取中止谈判这样严重的步骤，清政府理应对天下讲清楚自己的道理。袁世凯辩称他对民党的一再让步，已招致对他的一片毁谤，被公开指责是暗中的革命党。其实他不会接受革命党已经塞满其代表的国民会议计划以及已在预料中的结果，这会在北方引起一场革命。蒙古王公、皇族和军队反对共和制和继续谈判，而民党坚持在上海召开已确定成员的国民会议，拒不接受袁内阁提出的组织具有真正代表性的大纲。既然和平协议无望，袁只好

辞职。除非英国驻沪总领事劝说伍廷芳以两个要点为基础重新谈判，一是组成何种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国民会议，二是应在何处召开。

朱尔典指出，清政府目前坚持从全国每个地区和民族选一名代表的观点，与上次有庆亲王出席的会谈中曾论及的观点区别很大，那是由每省谘议局选举三名代表，不包括上海和南京的现有代表。要在北京召集一千多名代表，需时数月，难以实现，正如革命党的组织国民会议计划太狭隘一样。肯定另有可行的中间路线，如同会址可选上海或北京以外的某地。袁世凯重申不存在妥协的希望，并夸大北方动乱的危险性，将领们一致要求开战，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军队。朱尔典反复强调政府应当提出合情合理的妥协方案，使拒绝的一方承担破裂的责任。袁则反复申说已不断让步表明和平愿望，担心局势已非他所能控制。^[25]

1912年1月间，双方在谈判桌上交涉不断，各逞口舌之利，却始终毫无进展。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不可能完全压倒对方，同时和谈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且都希望尽快和平解决，避免战乱，恢复秩序，即使逞强，也无法得到国内外的支持，所以任何一方都不敢率先重启战端。停战期限一再延展，和谈进程只能在扯皮中继续耗下去。而双方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使得彼此达成协议的几率几乎为零。1月10日，鉴于袁世凯坚持推翻前议，伍廷芳发文六国领事，通告清政府和袁世凯破坏已定议案，将来战事再起，罪在清政府^[26]，等于正式对外宣告和谈已经破裂。

注释

[1] 《复袁世凯电》1912年1月3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18—419页。

[2] 《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4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48页。

[3] 《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电》1912年1月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39—240页。

[4] 《复袁世凯电》1912年1月6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26—430页。

[5] 《复袁世凯电》1912年1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

[6] 《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7页。

[7] 《致陈炯明电》1912年1月4日、《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7、11页。

[8] 《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7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79页。

[9] 《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7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80页。

[10] 《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7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81页。

[11] 《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9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95页。

[12] 《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9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93页。

[13] 《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9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95页。

[14] 《答〈巴黎时报〉特派员之谈话》1911年11月2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70—71页。

[15] 《答英国〈泰晤士报〉访员问——同题异文》1911年11月21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5—66页。

[16] 《答伦敦〈泰晤士报〉访员之谈话》1911年11月2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71页。

[17] 《致议和北方全权大臣代表唐绍仪电》1911年12月21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178页。

[18]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832页。

[1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0页。

[2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6页。

[2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5页。

[2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9—590页。

[2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0—591页。

[24] 《袁世凯之隐衷》，《时报》1911年12月29日，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第16页。

[25] 《1912年1月1日与袁世凯会谈纪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91—193页。

[26] 《致六国领事文》1912年1月10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36页。

三 輿情分歧与风波再起

随着谈判双方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步步升级，南北各界的舆论越来越关注国民会议，反对、赞同、建议、指责，各种声音纷纷扰扰，或公诸报端，或发电上书，或代表民意，或依据法律，将谈判桌上的冲突对攻延伸到媒体坊间。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使得各地拥护共和的团体民众欢欣鼓舞，不少地方与南京各省都督代表团根本反对和谈及国民会议的主张一致。江西军政府通电大总统、黄大元帅、黎副总统、伍代表、都督各军司官和各省同胞，宣称：民军起义，唯一目的即在建立民国，共和政府业已成立，何待再取决于国民会议？况且新疆、甘肃、内外蒙古、前后藏等处代表，非三五月不能到齐开会，袁氏狡诈多端，意在延缓时日，“如堕其术，后果堪虞。万一会议结果表决君主立宪，将来亦为再酿第二次革命之惨”。清廷应逊位归顺，否则联师北伐。“至于派国民代表赴会一层，应请作罢论。……清廷藉国民会议以便彼党，准备破坏之诡，不如先时制人，速定大局，倘因议案已成，不便翻变，惟遵照议定二十日开会日期，即以是日为国民会议结果之日，无论清廷允否，吾辈惟有决定实行。”呼吁赞同各省，即电大总统及伍外交总长。^[1]

漳州民军司令刘蔚声称：民主、君主不能并立，袁贼外主议和，内增兵力，老我士气，离间民心，“临时国会之招集，迁延时日，罔上空谈”。如今民国已立，清廷已无召集国会之权。惟有北伐，直捣贼巢。^[2]桂林议院也来电反对由国民会议议决国体，并质疑何以会承认国民会议：“现在大总统既已举定，即认定民主国，投票十七省亦属大多数，国体问题解决已久，何以再须会议？万一各代表把握不定，或暗受奸人运动，竟自取消前此选举大总统之举，不特贻笑外邦，且留第二次革命，目前必致大乱。各代表承认国民大会，究竟因何情形？望即明覆。”^[3]

与南京各省都督代表团的根本反对有所不同，中华共和宪政会提出：“共和国体，无可再决。即允唐请，应电袁飭属由民设之新旧政

团各选一人后，复选到会，切勿由各伪督抚自派，以符正当舆论。民军各省尤须一律，方免藉口。”^[4]

黎元洪也赞成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办法，但是认为应“妥为筹画，以免疏漏”。1月1日，他致电大总统、各省都督、各军政分府和代表团：“伍公与唐使屡次会议，所议各条极为周到。但事体过大，间不容发，万不可不格外严密，以防万一之败。”为此，他提出四条意见：“（一）会场宜仍设上海，万不可移于他处。（二）会期宜速，万不可多延时日。（三）民国代表宜选的确抱共和宗旨者，万不可失人。（四）此会事关特别，宜用记名投票法，并将省分注明，以防流弊。”^[5]

湖南的谭延闿等人对于和谈始终持有异议，指袁氏狡谲，清廷号令不一，至于国民会议，则认为“南京代表既到十七省，此后纵召集国民会议，满廷不得再派此十七省之人，名额亦必按省平均，不得畸异”^[6]。1月3日，谭延闿再度致电伍廷芳、孙中山和各都督，认为以国民会议和平解决战争，达到共和目的，固然有利于民国前途与世界和平，但是袁世凯素以诡谲著称，若以金钱和高官厚禄运动，至以君治国家决议，民国内部必有多省不肯承认，势必再起战争，招致干涉瓜分。其欲将会议地点定在北京，无非是便于运动，或于和议不成时，抑留代表。“且临时大总统既经举定，中央政府成立在即，倘决为君治，何以为情？刻下主张共和者已达十四省以上，而其他省分亦均跃跃欲试，则全国人心已可概见，似无庸再开国民会议”，请“设法将国民会议取消，加意防范，极力组织，俾自立于绝对不致失败之地位，庶免误中奸计”。^[7]

1月10日，谭延闿公电南京大总统、黄陆军部长、武昌副总统、上海伍外交总长、陈都督及各报馆、各省各都督、各总司令官，请限期以袁世凯同意和谈达成的协议作为开战与否的决断：

袁贼狡谋，和议万不可恃，无非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正拟联合各省，要请大总统及伍外交长，不再迁延议和，布告开战。适得南昌马都督佳电，以袁世凯来沪与否，及会议地点、日期，限于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内答复，决不再延长停战期限等因，敝省极表同情。务恳伍外交总长即与袁世凯严重交涉，将前次与唐代表所订之两军须得全权代表电报述和议决裂、战事重开，始可发令开仗一条，即行更正。

若至停战期满，尚未将君主、民主问题解决，即令各路开战。如大总统及各省都督赞成此议，即请伍外交总长宣布中外，万勿再与迁延。^[8]

黎元洪将湘赣两省都督的来电转达孙中山、伍廷芳，要求依照所请施行。^[9]两天后，即1月12日，没有收到回复的谭延闿再度致电大总统、黄陆军部长、武昌副总统、上海伍外交总长、李总司令、各省都督、各路司令、各埠报馆：

袁贼议和，无非肆其狡猾狼毒之手段，舞弄民军。敝省原不承认，早经迭请外交总长，请将条文改正，国会取消，未蒙复答。固知开议艰困，未便通口诘难。但君主、民主问题，必非从容坛玷所能解决。况以袁贼阴险，虏性刁顽，必须决胜疆场，乃可以登同胞于共和幸福之中。以伍总长之高明练达，岂不知是，而必强与羈縻，实所不解。近日连接各处来电，不胜隐忧。曾于蒸日电恳大总统，将议和事件截至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决不再延长停战期限，致误军机。顷得江北蒋都督蒸电及安庆孙都督真电，知袁贼节节进兵，是彼已破坏和局。扬州徐总司令宣布袁贼罪状，的是至言。惟各省都督既明知和议不可恃，何必再与开议，而不直切宣战，一扫膻腥？大总统原有主持和战全权，不待延闿一人私议，特事机日迫，不敢缄默，用是披沥愚忱，再请各都督合恳大总统，飭令外交总长与袁世凯严重交涉，无论所订若何条件，以二十七日以前解决，过后只有开战二字，万不承认议和，自堕全功。^[10]

谭延闿的通电引起各地民军的响应，广西的陆荣廷、王芝祥通电南京大总统、黄军政总长、武昌副总统、上海伍外交总长、各省都督、各总司令官，表示：“谭都督十号电计达台览。国体已定共和，袁世凯尚欲以会议解决，其狡诈人所共见。无论如何结果，必至于战。”^[11]贵州都督赵德全附和道：“袁贼狡诈异常，政体交国民会议一节，窥其意，必潜派汉奸运动，达君主立宪目的，苟不如意，再开战端。适接湘电，音[言]常已随唐使到沪运动。袁贼诡谋已露，严立范围，免中袁计。”^[12]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甚至质问道：“袁世凯以停战议和为缓兵之计，欲充其军备，缓我军心，其理易明，其事已见，乃我当道诸公一再允其停战要求，究竟是何居心，有无特别缘故，实难遥揣，要之，欲求早日平和，即须早日决战，能用最多之铁血，方能解决最后之问题。若终始堕其术中，恐宋襄之仁，匪仅无辞以谢天下，大局亦将不堪设想矣。”^[13]

1月15日，汤寿潜通电各方，指“此次议和备战，其不信有十四”，包括“明授唐使全权，议件必须电商，名实先已不符”，“遣使议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默许共和为政体，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密请退位，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在斗满汉为鹬蚌，彼将收渔人之利”，“国民地点已明言北京或天津及南京矣，袁自任接议，不敢南来，复强伍总长来京”，“各款由全权唐使电商而后定，忽有取消之说，并径撤唐使”……请从速决战。^[14]

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上书孙中山，陈说和战利弊，态度坚定，言辞痛切，说理深刻，最为学界所称引，他说：

和战之局，势宜早定也。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战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有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劳]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湖山之歌舞依然，吾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依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先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之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

顾犹有持慎重之说者，以为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燮和独以为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岂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尊重人道耳，敬畏舆论耳，非有爱我之心也。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今俄之于蒙古，其明征矣。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乎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悖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

久，而损失愈大也。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15]

总之一句话，必须停止与毫无诚信的袁世凯议和，以武力决定民主君主。

1月26日，蔡锷通电各方，以和谈已无意义，力主整兵开战：“谭都督咸电，鄙意极为赞同。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期战息，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圆袁逆狡，遵守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签定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议和，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订，惟有诉诸兵力耳。”请求率精兵长驱河洛，戮力中原。^[16]

各地光复政权的军政长官人人慷慨激昂，社团民众也群情激奋。1月18日，龙州商会电称：“经十七省举定总统，民主多数已占，我□优胜，纵稍流血，肯弃万载幸福？勿迁就复开全国投票再决，恐蹈袁计，恃票取决，列强藉口，遗恨难追。”^[17]湖南南路士民通电孙中山和各省军政府：“和议屡展，士气已衰，开会投票，尤属至危。共和民国，已经中外承认，若待再议，则前举总统、组织政府等事皆戏耳。既凭票决殊难预卜，现今反正止十四省，满人范围尚有十部，以每部三人相较，我只多十二人，若满人转得七人，君主即定。我代表持论堂皇，众所深信，设持之不坚，君主多得一二票，天翻地覆，何堪设想。各省军士云屯，既无战警，恐生内衅。祈速决战，取消国会，毋堕敌计，免误大局。”^[18]

争相请缨之外，也有人试图从中调解，以打破和谈僵局。1月10日，曾以第三者自任的张謇鉴于国民会议解决政体只剩开会手续及地点未定，不忍因此再肇战祸，密电袁世凯，拟亲自赴鄂与段祺瑞密商。“一则表示南方设立政府，绝无拥护权利之思；一则酌拟国民会议办法数条，请其与黎元洪双方结约，作为南北军人之公意，各自电请政府照办。意既出于军人，设南北政府不允照行，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如是则南北政府得以军人为借口，可免许多为难。”所拟办法

大意为：“一、开会地点在汉口；二、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或省议会公举；三、各省议员人数暨票数，旧查人口之多寡为比例；四、蒙古即派在京王公，西藏或派北京雍和宫喇嘛，或五台山之呼图克图，或章嘉佛；五、开会期至迟不得逾一月；六、多数决定政体后，两方即须照行，蒙藏亦不得翻悔；七、政体决定，另举总统。”张謇自称各条“皆极公允”，请袁世凯决断。若否决，则不再过问，“但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耳”。^[19]

同日，岑春煊致电袁世凯，表示：“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为皇室计，为国民计，惟有恪守唐使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计，庶几上安下全，举国蒙福。”^[20]

光复各省弃和主战的声音日渐强劲，在北方，从1911年12月底开始，反对国民会议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资政院议员毓善等致函袁世凯：“恭读初九日谕旨，朝廷不私天下，退让已极。乃闻伍廷芳尚不满意，必须迅速开会。以现在上海之人，强指为各省代表，草草议定。似此办法，名曰共和，实则专制。诚恐君位一去，大乱斯起。本意以求和平，反令相争相杀之机永无止境。”进而提出：一、国民会议选举章程，必由内阁起草，会场必在北京。二、唐在上海未评论君主民主利害，先自赞成共和，其电奏一味恫吓，全堕彼党之计中，实不称任，请迅速调回。三、停战期内各军队不可撤退。四、奏请售卖大内宝器，以备急需。^[21]

12月31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电内阁度支部：“明诏召集国会，取决国体，朝廷不设成见，胞与为怀，同深感泣。惟此次讨论大局，革军处处强我听彼，其要求以少数代表于上海开会议决，固可逆料及之。尊处严持拒驳，至佩公忠。”若不行则开战，力筹军饷。^[22]1月6日，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等致袁世凯转伍廷芳等电：反对共和，坚持君宪，万一实行，绝不承认，惟有联合同志之士，共图保境。^[23]

1月28日，资政院议员喻长霖等致内阁袁世凯函称：“前本院建议取消国民议会，业经咨呈在案。刻闻有变通选举法之议，谕旨未发，大众惊骇。查遵奉十九信条，皇上有颁布权，无不裁可权。……至临时国会选举，必每县一人，会场必在北京，本院亦早有所陈。兹闻内阁议拟改为各府五县以上者举二人，五县以下者举一人，殊于国民名义不符。顷外间喧传，竟有俯允南军之请，每省举出六人，议场改设

于天津、青岛、汉口之说。倘果如所言，直以国事为儿戏。微特议员等不敢承认，即全国人民亦不敢以此草率办法了之。窃谓临时国会即未便取消，亦当坚持前议，每县必有议员一人，会议必在北京，万不可再行游移。”议员们一再筹商要求公布的建议案，旨在“坚持君主立宪，以维大局而免流弊”。^[24]

不过，北方官民也有赞同国民会议的呼声。1912年1月2日至4日，河南谘议局接连三次致电内阁，先是要求坚持和议，倘稍有更动，“河南人民誓与朝廷断绝关系，宁死不纳租税”。继而反对“借口正式选举，稽延时日”，“国体一日不定，生民一日不安”。接着指资政院“自反对和议，久成国民公敌，刻在院仅有少数议员，且民选者又占少数，对于解决国体无建议之资格。钧阁如勉从该院要求，无论如何办法，人民均不承认”。^[25]

唐绍仪辞去谈判代表之后，仍然暗中代表袁世凯与伍廷芳等人沟通联系，设法促成清廷交权。1月8日，他电告内阁：“四蒙独立，是已离去中国，外人得所借口，势必瓜分，和议若再不决，将来东三省又倡独立，辽东岂复中国所有。探闻民军拟自行召集国会，凡蒙回藏东省直鲁豫各处均电约到沪投票。此举不商之于我，惟求各国承认。但国民自行集议，各国决无不认之理。”^[26]

国民会议的僵局和变相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只是立场看法分歧相当大。据远东通讯社的报道，1912年1月3日比京《独立报》著论：“其实皇室早已处于无权之地位，当其既颁明诏，召集国民会议，付以决定政体之权，是即不啻逊位。彼亦预知共和党人决不承认君主立宪，即使国民公意，欲用君主立宪，亦必择汉人为君主也。”1月6日纽约克哈尔特专电：“涛、朗两邸于召集国民会议一事，极力反对。庆邸则甚助袁，后太后卒定大计，明颁上谕，似无更改之余地矣。”伦敦《每日电报新闻》专电：“袁与革党谈判，决不能和，袁请国民会议开于北京，须有三分以上之议员到齐，始得开会。革党不愿以北京为召集地，且仅允每省派出三人，袁则必须每府派出一人，因此不能解决。”又据纽约克哈尔特北京专电：“各国驻京使馆，得伍廷芳同样照会，声言此次谈判不成，皆袁一人之过，兵连祸结，袁实负此责也。各国外交官深知此语不确。和议破裂，伍与其党徒，实尸其咎。召集国民会议，公决政体，原为该党所请，袁既允其照办，该党忽又翻悔，仅肯以南京会集少数代表，由各革命政府派出之人，作为国民会议，其不足以得真实之民意可断言矣。今日袁以所有与伍

交涉之全案，抄送各公使阅看，公使均赞袁之公平正直，且称袁之所提议者，皆系十分牵就。袁仅欲得全国之真实民意，毫无错处可供革党指摘。”^[27]

要想打破僵持不下的局面，必须另辟蹊径。1月12日，上海外国商团致电内阁及奕劻、载沣：国会公决政体，意见相背太远，非一时能以解决现在争端。应互商设临时政府，以保治安。^[28]实际上唐绍仪辞职后，一直通过梁士诒与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并与民党方面秘密磋商。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南北双方干脆放弃招致各方不满的国民会议，通过直接促使清帝退位的方式，解决国体政体问题。到1月14日晚，袁世凯已经准备接受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并受命掌管政府，而不再提及国民会议。^[29]

与袁世凯的暗中运作相呼应，1月15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等电请内阁代奏：“自初九日奉上谕，政体由国会议决。薄海臣民咸晓然于朝廷公天下之心，非私一家一姓，深为欣忭。乃十二三以后，改议选举章程，节目繁难，延长时日。人民颇疑朝廷有翻悔公同议决之意，未免失大信于天下。方今人心趋向共和，决无第二问题，不独东南十数省矢力同心，即西北各省闻亦均表同意。……应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一面速开国会，选举总统，宁息战祸。”电报由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等联署。同日岑春煊亦电请内阁代奏：“既许人民开国会决政，何忽迁延反复？是必有人以一己之私心，不顾大局之糜烂，皇室之危患者。”^[30]公开呼吁清廷交权，国家改制。

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李离、临时国民公会代表朱通儒、刘振源、宪政实进会代表宋育仁、于邦华等人鉴于国会公决政体因选举法及开会地点相持未下，致使和议有决裂之虞，异想天开地上书袁世凯，提出帝国共和主义作为替代方案，试图将帝制与共和熔于一炉。^[31]主张虽然显得有些另类，目的都是为了设法摆脱困境。

面对民军所提退位即予以优待的条件和内外压力，清廷多次召开近支王公会议，讨论是否接受国体变更事宜。恰在此时，天津《民意报》刊载1月18日伍廷芳致武昌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各司令、天津《民意报》公电，内称：“此次停战展期者，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议有头绪，大约再过数日即可决定。届时如再失信，必为天下所不容。”^[32]事机泄露，

引起多数亲贵的激烈反对，原定于1月22日发布清帝退位诏书之事暂被搁置。不得已，1月22日，隆裕太后由国务大臣胡惟德等面传懿旨，谕飭仍按召集正式国会办法与革军接议。

清帝退位未能如期实现，袁世凯不得不通电北方各军队将领，声明唐绍仪辞退后与伍廷芳直接电商，往来各电，均经登报。且国体须由国会公决，系遵懿旨办理，为国民所公认，“本大臣岂容有与伍秘密磋商之事”。希望军民勿信浮言。^[33]同时致电伍廷芳，重提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的陈案，要求再度商议选举和开会办法。^[34]

伍廷芳接到袁世凯的来电，还以为所说为另一事项，复电道：优待条件已正式直接通告尊处，“至于临时国会，应俟清帝退位后，统一全国之共和政府议定选举法，以行召集”^[35]。袁世凯回电表示：“优待条件，此方未经认可，现在无庸置议。正式国会一节，前经尊处允认，既须以国会公决国体，未决以前，自不能设共和政府。希就前议选举法及开会地点详细讨论，想出妥实办法见复。”^[36]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授权美联社发表声明，表示自己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全国百姓的最大利益，而非革命党人或拥护帝制者的利益，希望能够继续担任总理大臣，直到创建国会，选举产生议员，或为大多数中国人探索出一条合适而正确的出路。鉴于革命党领袖的态度，普选看来不可能完成。因此，希望尽快创立某种形式的负责任政府，实现和平。如有任何人有能力并愿意为全国人民的利益寻找出路，自己愿意辞职并移交政权。此间一些外国使馆督促本人负起责任，继续主持国政，表明他们对现政府有信心。^[37]1月24日，又奏告遵旨与伍廷芳接议情况，“复语狂悖，尚无头绪”^[38]。

原来双方签署的协议是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旧事重提之时，却变成了召集正式国会。看了后一封来电，伍廷芳才知道袁世凯是旧话重提，可是却不知道事从何来，所以他回复道：“国民会议选举法，前与唐代表议定，惟开会地点及日期与阁下电商未决。此乃十余日以前之事，迺来所切实筹商者，为清帝退位办法，立候解决。何乃忽提过去之事，实所不解。祈开诚布公，速将清帝退位问题解决，以慰天下之望。”^[39]而清廷和袁世凯此时则不断强调继续商议国民会议之事，否认清帝退位之说。1月24日，谕旨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可酌量变通办理。

清方的反复，引起各种传言揣测，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1月25日，由袁世凯副署清廷上谕，宣称国体问题由国民公决得到朝野上下的赞成，“现在讹言繁兴，人心不靖。诚恐民听易惑，致生误会。其国会办法正在磋商之际，凡我臣民尤不容妄启谣疑”^[40]。

同日，袁世凯奏报，原拟每州、县、旗各选一人，伍廷芳坚持定为24处选区，每处3人。现拟改为28处，每省1处，蒙藏6处，每处6人，共168人，与资政院相当。国体未决之前，民党不敢来京，地点酌定为天津、汉口、青岛。民军所拟优待皇室条件，系两面派人暗中商议，如改为国会议决国体，优待皇室条件应由国会议定。^[41]

当天，袁世凯还答复伍廷芳，强调与之久商未决者为国会选举及地点日期，而非筹商退位办法。其就选举及地点日期另电详述的妥善办法，在坚持国体问题关系至大，务求全体国民公意，条件自应详密，手续不能草率的前提下，鉴于战事仍是暂停，国民深受其害，为了及时解决，将原订选举条件酌量变通，以便简化手续，从速召集，所修改的各条为：选举区各省以每府及直隶厅州为一区，无属县者附于邻府，非府辖州县合五州县为一区，各藩属以一盟或一部为一区。选举区以统属五州县为断，以上为大区，选出议员2名，以下为小区，选出1名，藩属每区选1名。顺天府与八旗选出4名。相关各条相应调整。开会地点则改在天津。^[42]

伍廷芳看过来电，仍然对袁世凯断然否认协商清帝退位并重提国民会议之事大惑不解，复电声明系袁世凯撤回代表，并欲消灭已经签定的条款，自己始终坚持，但两方谈判不能复合，中外人士皆虑和议之终无结果。然后有清帝退位之议，才筹商退位办法。况且优待清帝及满蒙回藏人条款，唐绍仪未辞职前已在会场交付，后自己又直电袁世凯。请于再次停战期满前，宣布清帝退位，以期和平解决。若清廷仍争君位，流全国之血，则咎有所在，非民军之责。次日复电，指袁世凯此前欲取消全权代表已经签定之条款，现在又要更定选举法，“直是翻悔，何云让步”。若届时清廷仍未宣布共和，则所开优待条件将全行作废。^[43]

袁世凯的翻云覆雨，引起各方的强烈不满。1月29日《时事新报》译载27日《大陆报》北京电云：袁态度反复，闻民国愿举为总统，即力主清帝退位，至前此所议之国民大会一节亦复尽行抹却。盖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同

日，报载孙中山28日致伍廷芳电，指袁反复，不承认选举国民会议以议决国体之法。虽然此事31日由总统府秘书处出面予以更正，然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44]

不过，这一次袁世凯的反复，是因为北方坚持君主制的清朝亲贵和将领鼓动风潮，反对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不得不掩人耳目。1月26日，他致电伍廷芳转唐绍仪，告以皇族及京内风潮起于“退位”二字。伍廷芳正式来电，万不可言退位，只能说决定宣布共和。^[45]又密电孙中山，说明自己现在逼处嫌疑之地，要防止君主党铤而走险，应互相迁就，以维大局。^[46]

此时袁世凯一方面继续就召开国民会议之事与伍廷芳公开周旋，另一方面则明里暗中想方设法逼迫清帝退位。他具折请清廷收回封爵的成命，声称自己入朝之初，抱定君主立宪宗旨，奉旨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虽然有违初衷，还希望国会不至偏重共和，尚存君宪之望。近来绅衿、督抚、使臣、商团、公会多主共和，国势已难维挽。^[47]又复电伍廷芳，请就变通选举条件及开会地点作复，至于退位一节，未曾与之商议，不敢置议。^[48]甚至表示不能先行逊位，要先开国会解决政体问题后，再议逊位。^[49]

鉴于事态有再度陷入僵局之势，相关各方展开紧急磋商。孙中山并未接受袁世凯的辩解和伍廷芳的建议，他致电各国公使，公开指责袁世凯闻民国愿举为总统之消息，即一变保清的态度，力主清帝退位，抹杀所议定的国民大会等事。还特电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的罪状。^[50]

1月30日，由于停战期限已过，清帝退位尚未宣布，伍廷芳如约通电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各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和北伐联军总司令，通报议和各事。虽然指袁撤销代表，推翻成议，但最终矛头所向，在于清廷少数亲贵把持反抗，“是则未能未[于]停战期内和平解决者，咎在清廷，非民国政府始料所及也”^[51]。至此，民党方面关于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问题的努力完全终结，转而全力逼使清帝退位，以实现共和。

而袁世凯方面，一面继续敷衍清廷，表示仍遵旨与伍廷芳商议国体公决的变通办法，并等待皇族王公讨论国体的结果，一面暗中对清廷施加压力。1月19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电请外务部代奏：和议不

成，应明降谕旨，慨允共和，逊位得名。22日，出使义国大臣吴宗濂、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亦电请宣布共和。25日，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电内阁，赞成共和，反对亲贵阻挠。次日，段祺瑞等47位军政大员联名电请代奏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52]

1月28日，山西巡抚张锡銓等电请内阁代奏：“此两月之内，默察人心大势，除共和之外并无解决之法。”数日以来，发生事实，有无待国会而已解决者，厥有五端：一、民军占领区域占优，北省谘议局多数主张共和，无可待。二、掌握兵权如段祺瑞等已联衔电请共和，不能待。三、民困国亡，不及待。四、在华外人侧重共和，再不解决，必将横生干涉，立召瓜分，不容待。五、北伐出发，不能待。

“有此五端，国会决解决之议已归无效。”并拟议十条：一、临幸颐和园或北狩热河，下诏南北罢兵，速组共和政体。二、派全权大臣与伍廷芳在天津组织临时统一政府，南北政府同时取消。三、优待皇室。四、南北军退回八月前驻地。五、安置满人。六、筹满蒙回藏问题。七、防止主张君主各军暴动。八、成立全国民意机关，正式选举大总统。九、临时统一政府期间，各省政权剿匪安民。十、双方不得因政见而仇视。还特意声明：“锡銓等明知共和政体未必真能适合于今日，然目前祸机所迫，除此别无解决之方。”^[53]

接二连三的电奏，无疑有人暗中指使或相互串联，甚至还有南北两军合作的计划，让已经宣布赞成共和的北军先行北上，民军继后。清方表面上对于民国临时政府发布的相关秘密交涉的消息予以否定，实际上已在紧锣密鼓的交涉商议之中。1月30日、2月1日，清廷连续召开御前会议^[54]，决定采用虚君共和制，君主不干预国政，仍然保留帝号君位。其后外交使臣和军政官员再度掀起一波电奏热潮。2月5日、6日，出使德国大臣梁诚、奥国大臣沈瑞霖以国会召集不易，请明诏宣布共和。2月5日，第一军总统段祺瑞电请内阁代奏：二三王公迭次阻挠共和国体，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同日河南巡抚齐耀琳电请内阁代奏，河南谘议局议长方贞、副议长张嘉谋及议员等呈：“十月初九日慈谕，以国体付之国民会议。果能立即召集，自可从速解决。无如中国幅员寥阔，召集不易，迁延时日，士人易生虎狼之心，内地尤多风鹤之警。将来议决之结果，仍必趋于共和。而议决自下与发布自上，其情势固大有不同。”请即时宣布共和。2月9日，署理直隶总督张镇芳、署理两江总督张勋、署理两湖总督段祺瑞、河南巡抚齐耀琳、署理山东巡抚张广建、安徽巡抚张怀芝、山西

巡抚张锡銓、署理山西巡抚李盛铎、吉林巡抚陈昭常等电请宣布共和。^[55]在民军坚持完全共和的主张以及北方军政官员的呼应之下，清帝最后被迫宣布退位。

2月16日，伍廷芳公电南京孙大总统、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对南北和谈的一波三折加以总结：“盖所谓议和，即与北省同胞和衷商榷之谓耳。迨前清内阁袁君世凯所遣全权代表唐君绍仪至沪，彼此开议，唐君即宣言欲和平解决，惟以北省军民，与十四省起义之军民情谊或有隔膜，意见自不免参差。如欲一致进行，必宜先避冲突之端，以成共济之美，因拟彼此息战，开国民会议，取决多数，以定国体。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乃事机未熟，枝节横生，补救调和，费尽心力。由是乃有清帝退位之说。”^[56]虽然是从民国和谈总代表的角度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大体如实，只是要想充分领会把握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所指能指，还须回到历史现场，循着各位当事人的耳目身手重新经历事情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若是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以后来的成见做简单的判断，就只能徒劳无功地增加一些说法，于体察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毫无裨益。

袁世凯同意和谈，未必仅仅施展诈术，所以需要随着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况且就算是阴谋弄权，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可以为所欲为，予取予求。他固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也有一定的政治底线，但主要考量的还是如何确保自己能够掌控局势的发展，以及按照自己的意愿掌控大权，直至问鼎大位。从结局看，袁世凯的确达到了目的，虽然未必是最理想的结果。可是从过程看，在那样一盘混战的乱局中，袁世凯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稍有不慎，便可能满盘皆输。如果认定其真的能够掌控历史发展的态势，不仅高估了袁世凯的实力和能力，也使得认识存在大量变数的历史进程陷入阴谋论的泥淖而不可自拔。

注释

[1] 《江西军政府来（元月5日到）》，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版，第48—49页。

[2] 《漳州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7日，第2页。

[3] 《桂林议院来（元月8日到）》，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45页。

[4] 《中华共和宪政会电》，《申报》1912年1月2日，第1张第5版，“公电”。

[5] 《沪军政府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2日，第3页。

[6] 《长沙谭延闿来（元月2日到）》，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162—163页。

[7] 《长沙谭延闿来（元月5日到）》，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47—48页。

[8] 《湘军都督电》，《申报》1912年1月12日，第1张第3版，“公电”。

[9] 《武昌黎元洪来（元月12日到）》，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155—156页。

[10] 《湘军都督电》，《申报》1912年1月14日，第1张第4、5版，“公电”。

[11] 《广西陆荣廷等来（元月14日到）》，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156页。

[12] 《沪军政府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24日。据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

[13] 《葛店李司令电》，《申报》1912年1月18日，第2版，“公电”。

[14] 《杭州汤寿潜来（元月16日到）》，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22—23页。

[15] 《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大总统书》，《时报》1912年1月19日，第1版。

[16] 《沪军政府电报》，《民立报》1912年2月5日，第3页。

[17] 《中华民国立国记》，《时报》1912年1月26日，第2版。

[18] 《湖南南路士民电》，《申报》1912年1月23日，第2版，“公电”。

[19] 《致袁世凯电》1912年1月，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日期据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9页）。所拟办法还有另稿五条，与此有别者为：开会地点及议员，照应代表与伍代表签定办法；开会期至迟不得逾两旬。有研究称张謇抵湖北后密电袁世凯，改请就商北洋所遣将领通电拥护共和，迫清帝退位。实则张謇在此期间并未再赴湖北。

[20] 《岑春煊致袁世凯电》，《时报》1912年1月10日，第1版。

[21] 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口日资政院议员毓善等致内阁总理袁世凯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55—156页。

[22] 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内阁度支部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56页。

[23] 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等致袁世凯转伍廷芳等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58页。

[24] 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十日资政院议员喻长霖等致内阁袁世凯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5—176页。

[25] 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河南谘议局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57页。

[26] 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清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自上海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59页。

[27] 远东通讯社丛录：《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494—500页。

[28]故宫档案馆：《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活动·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议和总代表译上海商团致内阁及奕劻载沣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536页。

[29][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835页。

[30]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等致内阁请代奏电》《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四川总督岑春煊致内阁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60—161页。

[31]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61—166页。

[32]《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月18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44—445页。

[33]《致北方各军队电》1912年1月24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83页。

[34]《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62页。

[35]《复袁世凯电》1912年1月23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3页。

[36]《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2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73页。

[37]《授权美联社发表的声明》1912年1月2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38]《与革军接议尚无头绪奏》1912年1月24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77页。

[39]《致袁世凯电》1912年1月25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4页。

[40]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1—172页。

[41]《国会选举暨开会地点等事奏》1912年1月2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85页。

[42]《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25日、《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2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86—387页。

[43]《复袁世凯电》1912年1月26日、27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7页。

[4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节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35页。

[45]《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转唐绍仪电》1912年1月26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93页。

[46]《致临时大总统孙文密电》1912年1月26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93—394页。

[47]《恩恩收回封爵成命折》1912年1月27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95—396页。

[48]《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来电》1912年1月26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99页。

[49]《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1912年1月27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402页。

[50]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第23—24页。作者称：“上则宣布袁氏罪状之特电，虽三十一日经总统府秘书处更正，然不能遂认为无来历也。”此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据《总理全书》之九《电文》收录，题为《致伍廷芳电》，署期1912年1月29日。两相比较，文字

几乎完全一样。《近代稗海》编者据《时事新报》校改的个别文字，或不如原文准确。

[51]《致孙文、国务各总长、参议院等电》1912年1月30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63—464页。此电的断句、标点、认字，均有些问题。

[52]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69—175页。

[53]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山西巡抚张锡銓等致内阁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6—177页。

[54]清制并无御前会议制度，应为当时报刊仿日本说法指称宗室王公会议。

[55]故宫档案馆：《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8—181页。

[56]《临时政府公报》第20号（附录），1912年2月23日。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辛亥革命的具体结局，严格说来，既不是民军用武力将清廷推翻，也不是通过南北和谈达成协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而是清廷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被迫让位交权，以换取对皇室皇族和旗人的优待条件。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明争暗斗，牵扯南北中外满汉清民各方的利害关系，堪称辛亥政坛波谲云诡的一幕大戏。历史上诸如此类的密谋，当事各方的说法往往各执一词，令人犹如雾里看花，即使亲历其事者也不得要领。而相关方面竭力角逐的诸多情节暗藏玄机，在不知究竟的后人眼中似乎无关紧要。相较于史事的周折复杂，通行的历史叙述显得有些平淡无奇。加之清帝退位的许多相关文件迄今仍未面世（或已遗失），当时坊间的传闻既多，如今学人的揣测亦夥，看起来更加扑朔迷离。

其中重要环节之一，便是袁世凯在奏准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后仅仅数日，就因为开会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事与其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僵持不下，以致后者辞职。可是，在和谈陷入僵局甚至几乎破局的情况下，唐绍仪并未返回北京，而是继续在沪宁一带活动，居间联系，并且很快传出清帝退位事宜已经颇有眉目的消息。以往的研究对此曲折虽然有所解读，大体看似成立，却总有一些重要证据与情节不相吻合，无法纳入，或是未经验证，难以支撑，令人忐忑。凡此种种，均与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关系密切。围绕该折的时间、内容以及是否出奏等问题的勘定，进一步搜集证据，梳理新旧材料，可以揭开谜底，接近真相。

一 重判《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

关于辛亥南北和议至清帝退位的历史叙述，已经进入教科书和一般通史，成为常识性的认知，大致认为双方开始是以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为条件，正当谈判进展顺利之际，由于光复各省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刚刚归国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导致袁世凯忽然翻脸，以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越权为由，借口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以及召开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否认唐绍仪已经与民军代表伍廷芳达成的协议，迫使唐绍仪以及所有北方议和代表全体辞职，由袁世凯本人直接与伍廷芳电报往还重新进行磋商。因为袁世凯欲将既有成果推倒重来，而伍廷芳要求其接受既成事实，导致谈判处于破裂边缘。在国民会议之事陷入僵局之后，袁世凯才开始以种种方式进行逼宫，要求清帝退位下台。^[1]

在此过程中，为了促使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奏《请速定大计折》，其主旨就是请清帝禅让，等于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要求。折称：“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垂法守。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末减皇室之尊崇。况东西友邦因此战祸，其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2]要求清廷召开皇族会议，从速决定帝位去留。这是目前所见袁世凯最早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直接证据。

不过，这份重要奏折何时拟订、何时上奏以及是否出奏，相关资料和据此而来的现行叙述存在诸多疑点。关于折出奏的时间，以往一般著述指为1月16日。此说出自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但该书并未注明来源出处。^[3]因此有的著述采用张国淦所说的上奏时

间，而另外注明底本。如《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指该折于1月16日上奏，注引出处则为1912年1月24日的《大公报》。^[4]这大概是各家所能找到的最早文本，所以《袁世凯全集》也采用这一底本。除此之外，《顺天时报》1912年1月27日第5版“奏折录要”和《中国革命记》第22册“文牍”也分别刊载了同一份奏折，文字基本一致。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涉及军国大事的重要奏折都是与诸国务大臣联衔会奏，而这份奏折的文本上并没有出现诸国务大臣的名字以及会奏字样，各报刊载时标名也不一致，《顺天时报》题为《袁内阁奏请速定大计折》，《大公报》题为《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而《中国革命记》题为《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所谓袁内阁，其实就是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简称，而不是指袁世凯及其内阁。这种情况显示，当时各报不能确知奏折究竟以什么名义提出。一般相关著述称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依据是奏折中有如下文字：

总理大臣受朝廷之委任，握全国之枢机，治乱所在，去就因之。独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则非总理大臣职任所能擅断。其国务大臣，亦只能负其行政一部之责，存亡大计，何敢思及。然为时局所迫，逼于旦暮，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谨合词具陈，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5]

这显示奏折的确是以袁世凯合同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拟定，却不能证明是否联衔会奏。另一种可能性是原来设想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出奏，实际未能实现。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虽然声称“内阁合词密奏政体共和”，具体叙述却有所保留，写为：“袁世凯等（全体国务大臣？）奏云”。作者于“全体国务大臣”之后特意加上问号，表明其亦不能确定是否由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一起会奏。^[6]迄今为止，不仅在清朝各种官书中找不到关于该折曾经上奏的蛛丝马迹，在存留的各种清廷档案中也尚未查到任何线索。

尽管如此，作为密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涉及何时出奏的问题。1月16日，袁世凯的确曾经入宫，据报纸的报道，目的就是与清太后面议退位事宜，“闻清廷虽愿退位，然必欲于既退之后，仍驻北京。袁世凯则坚请其退至热河，否则不愿与闻，以辞职相要挟云”。为此，前一天即1月15日下午，奕劻、载沣等曾经往谒袁世凯，会谈至

二小时之久，一面挽留，一面继续磋商是否退至热河。^[7]次日，袁世凯于11时入宫，12时15分出宫。^[8]事毕回邸途中，即被炸受伤。

此时关于清帝退位之事，坊间媒体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且重心已不在是否退位，而是何时退位以及以何种条件退位。既然袁世凯与清太后面议的主要是退位后的居处，则不至于到此时才提出清帝退位的问题。最早刊布《请速定大计折》的《大公报》显然注意到这一情节，特意在折后加一按语道：“此折上后即接到上海议和唐代表来电，政体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是以未发表。闻日来皇室会议仍系讨论此折。”^[9]此说与《中国革命记》第20册所载《议和记》相吻合，据称：唐绍仪解职后，“世凯察知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然又以帝位去留，非臣下所可擅断，曾于十月下旬，率各国国务大臣具疏陈请，召集皇族密开会议。盖欲令清廷自为审择，以统筹全局速定大计也。十一月九日，遂有召集临时国会，以政体付诸公决之清谕”^[10]。明指《请速定大计折》在清廷定策召集国会公决政体之前。

根据《大公报》的按语和《议和记》的记述，《请速定大计折》的上奏时间应在上一年即1911年岁末唐绍仪来电表示政体问题取决于国民会议之前，这无异于根本否定了1月16日为上奏日期之说。《袁世凯全集》的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该折内容主要涉及1911年12月底以前的事，因而没有采用疑点颇多的张国淦说。从奏折的内容判断，拟订时间的确当在1911年12月底之前，而不会在此后。该折如此陈述武昌起事后形势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困局：

窃自武昌乱起，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惟直隶、河南，未经离叛，然而人心动摇，异于恒有。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业已克复汉口、汉阳，收回山东、山西。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朝廷念国步之艰虞，慨生民之涂炭，是以停战媾和，特简唐绍仪、杨士琦等前往沪上，为民请命，此万不得已之苦衷，亦从来未有之创举也。屡接该大臣等来电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现期已满，展限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

查和谈最初协议停战至十一月初五日即12月24日，第二次会议时议定展期七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即12月31日。鉴于上述，《袁世凯全

集》的编者认为12月28日前该折已经写就，暂时系于1912年1月5日前，只是为了稳妥起见。参酌前引《大公报》的按语，可见这份奏折绝不可能写于1912年1月中旬，而是1911年12月下旬。至于具体时间，可以袁世凯与诸国务大臣会奏的《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为参照，在这份1911年12月28日正式上奏的奏折中，袁世凯同样概述了武昌起事以来各处变乱的形势，以及饷械不支难以久战的困窘，“万不得已，勉从英使朱尔典之介绍，奉旨以唐绍仪为总理大臣代表，驰赴沪上，与革军代表伍廷芳会同讨论大局”。由于伍廷芳坚持改共和，去君位，否则不能开议，唐绍仪只得提出速开国民大会公决君主共和问题之法，“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袁世凯等鉴于“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要求清廷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就唐绍仪所请召开国民大会公决国体问题请旨裁夺，以定大计。^[11]

《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要求“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其时距停战展期仅三天，也就是12月28日。进一步推敲相关文字和事实，《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及可能上奏的时间，当于12月24日停战期满后刚刚展期七日之际，具体而论，大约在12月25、26日间。

《议和记》又称：“袁世凯接唐绍仪电，言伍廷芳等均恳请皇帝逊位，使共和政体早日成立，中国可跻富强，非特国民之福，亦皇室之幸。将来国民对于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等语。凯得电后，甚为踌躇，连日与庆邸及诸亲贵会商，尚无结果。惟清内阁连发数电，嘱唐绍仪如承认共和，先将优待皇室条件提出议妥。”^[12]也就是说，退位之议是因为民军方面坚持和谈以共和为前提而不得不做出的应对举措，此时袁世凯很可能将所拟《请速定大计折》给奕劻、载沣等人看过，并且将相关信息传达给清太后。

不过，一旦正式奏请清帝退位，就要召开宗支王公会议进行决断，形势的发展显然尚未到此地步，没有完全的把握，袁世凯和清廷都不敢贸然行事。不仅如此，袁世凯甚至对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也表示担忧，并通过梁士诒等传达自己的苦心孤诣。而对光复地区的人心向背更加感同身受的唐绍仪坚持原案，“袁世凯因连接唐绍仪密

电，知民党始终坚持共和，无法挽回，且于清帝让位问题，亦难回答。若继续开战，又以借款无着，不能支持，因此焦灼异常。且以承认共和一层，关系太重，不敢负此责任”，于是于12月27日举行内阁会议，商定全体辞职，即日请清廷特开御前大会。其原因有四：一、民党坚持共和，君主立宪目的不能达。二、民党要求禅位，倘即让步允许，深恐诸亲贵啧有烦言，难免意外。三、不让步则和议决裂，即须开战，无款无饷，人心军心不固。四、无可筹之款以维持支撑。

[13] 此次内阁会议决定的方针，应是促使清帝退位。

恰在此时，唐绍仪来电告以民军方面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本来就担心退位引起强烈反对的袁世凯遂相应改变计划。次日，清太后召见王公，醇王载沣、庆王奕劻、贝勒载洵、贝勒载涛、贝子溥伦、贝子载泽、肃王善耆等七人入对，询问上海和议及近日国家艰危情形，清太后痛哭，各王公亦哭。旋召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入对，袁力陈国民坚持共和政体，万难转圜，此事过于重大，请太后宸断。“太后谓：‘余系妇人，皇上年幼，凡事皆靠汝等国务大臣主持。如将来办得好，固系汝等国务大臣之功，即使无法转圜，至于失国，有我为证，将来皇帝长大，亦不能怪汝等。’于是袁世凯言及唐绍仪来电，请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一节。清太后命照此办法施行。各国务大臣退，将慈谕告知庆邸，庆再入对良久，而召集临时国会之旨乃决。”[14]是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当天清廷即谕令袁世凯转致议和代表，同意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政体。

综合上述，定大计与决大计两份奏折应是先后拟定，定大计折在前，决大计折紧接其后，前者旨在解决被迫承认共和后必须面对的清帝下台问题。由于民军和谈代表突然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实际上奏并公布的是《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不过，虽然《请速定大计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但也没有束之高阁，由于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并进而试探帝后的态度，可以作为应急权通的选项以备不虞。后来果然在国民会议受阻的情况下被重新提出，发生作用。

《请速定大计折》时间的改判，使得既有论著对于辛亥之际和战历史进程的通行认识及其相关描述有必要通盘重新检讨，并相应地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写，否则原来种种的看似顺理成章，都变得相互矛盾，难以成立。或者说，现有的说法，其实是在忽略部分材料和事实

的基础上自圆其说，而《请速定大计折》时间的重新判定，使得这些被忽略的材料及事实的正当性凸显出来，原来成说的逻辑链条则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因而不得不进一步梳理条贯所有的材料和史事，重新解读，使之真正能够得其所哉。^[15]

注释

[1] 较近的著述如张海鹏、李细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页。

[2] 《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大公报》1912年1月24日，第2张第2—3版，“要折”；《内阁请速定大计折》1912年1月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259—260页。

[3]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9—300页。

[4]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梁华平、严威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9册，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

[5] 《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大公报》1912年1月24日，第2张第2—3版，“要折”。

[6]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92页；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第460页。

[7] 《西报纪清帝退位之预言》，《时事新报》1912年1月17日，第2张第1版，“特别纪事”；《民立报》1912年1月17日，第3页，“西报译电”。

[8] 《西报述袁世凯遇险事》，《时事新报》1912年1月18日，第1张第2版，“特别纪事”；《时报》1912年1月18日，第2版，“译闻”。

[9] 《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大公报》1912年1月24日，第2张第2—3版，“要折”。

[10]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0册，第1页。

[11]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内阁总理袁世凯等奏折》，军机处折包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224—226页。《袁世凯全集》据《内阁官报》，该折题为《与诸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

[12]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15册，“记事”，第11页。

[13]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14册，“记事”，第13—14页。

[14]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14册，“记事”，第14—15页。

[15] 或许是因为注意到《请速定大计折》的诸多疑点，有的辛亥革命史著述并未征引这一重要文本（《北伐、议和、清帝退位与袁世凯窃权》，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80页）。

二 从退位到公决

既然《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和暗中沟通在《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之前，则袁世凯首先是直接要求清帝退位，紧接着才顺势改请允准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袁世凯并非清帝退位的首创者，武昌起事后，最早提出让清帝自动交出政权设想的，应是伍廷芳等人。从民党方面倡议，到袁世凯试探性向清廷提请，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事刚刚一月，伍廷芳、樊增祥、宋教仁、于右任、夏敬观、唐文治、张謇、赵凤昌、庄蕴宽、汤寿潜、张元济、姚桐豫、江谦、高凤谦、温宗尧、汤寿彤、程德全、王敬芳等十八省发起人就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主张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临时会议机关，商定共和政治，会议三要件之一，为“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次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联名敦促监国摄政王载沣赞成共和，宣称：“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同时又致函庆亲王奕劻，告以己“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希望奕劻“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与民享共和之幸福，则皇室不失其尊荣，生灵得免于涂炭”。^[1]

虽然致摄政王的电奏中没有使用“逊位”字样，只是希望清帝及摄政王以尧舜自待，但在给奕劻的信中，明确使用了“逊位”一词。逊有退、让二义，逊位也有退位、让位二解，前者只是单纯地退出现在的位置，后者则包含给谁让出位置或将位置让给谁的意思，近似于主动的禅让。而禅让对于让位者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对于承继者则意味着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此时各省光复政权尚未成立共和政府，伍廷芳等人所说逊位后同赞共和，应是根本放弃帝位和帝制，赞同由全体国民成立共和国，而不包含将权力交给谁的问题。

11月18日，张謇致电清内阁，拒绝出任江苏宣慰使及农工商大臣，并请内阁代奏，要求实行共和，清帝逊位，电称：中国国土辽阔，种族不一，应效法瑞士、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分治。“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昔尧禅舜，舜禅禹，个人相与揖让，千古以为美谈。今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列祖在天之灵，必当歆许。论者或以兹事体大，宜开国民会议，取决从违。窃以为不经会议而出以宸裁，则美有所归，誉乃愈大。至于皇室之优待，满人之保护，或阁臣提议，国会赞成，立为适宜之办法，揆之人道，无不同情。”^[2]

张謇的电报，不但明确要求清帝推逊大位，而且希望不必经过国民会议讨论取决，即由清帝直接裁断，主动许认共和。此时摄政王已经失去权力，所以张謇没有将他列入应当逊位的名单。

与上一次的联名电奏迟迟未能交到摄政王手上不同，由内阁代奏的电报当天就得到回复，清廷表示：宪法十九信条已经宣布，即将宣誓太庙，此后庶政实行，公诸舆论，决不致再有障碍。“至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廓，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仍著该大臣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并将朝廷实行改革政治意旨，剴切宣示，以释群疑。”^[3]显然，此时清廷仍然抱有侥幸心理，并不情愿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轻易地主动交权让位。

此后，其他方面也陆续提出同样或类似主张。11月23日，一度宣布独立的山东都督孙宝琦致电光复各省，提议各省派员至京津开临时议会，兼收未独立各省，可议决国体政体问题，兼有临时政府作用，“异日以全国意见，要求逊位，可无兵戈而收胜利”。^[4]所说虽然是在临时议会议决国体政体之后，才以全国意见要求清帝逊位，基本办法毕竟是顺应人心，由清帝主动交权让位。

11月25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致电摄政王载沣，以南中已大开国民会议，新政府不日成立，近畿人心亦皆感动愤励，提出：“为今之计，若朝廷能早行揖让，公天下于民，民必以优礼报皇室。即大位不以自居，而全国生灵之福，仍出自朝廷之赐。若失此不为，则新政府既成，各省已一律承认，不但直隶不能独异，且恐南军北上，京师蒙尘，虽欲为尧舜之事而不可得。福祸安危，在此一举。”

[5]清军夺占汉阳后，12月3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以军事虽利，人心未回，杀戮愈多，益难收拾，再度电请内阁奏明朝廷：“罢兵息战，由朝廷自行谦逊，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于天下。保全中国，维持皇室，端在此时。”[6]所谓揖让、谦逊，都是要求清廷主动交出权力大位。

直接向清廷呼吁请求之外，还有人积极展开活动，联络南北各派势力，力图形成强大压力，迫使清廷就范。11月26日，蓝天蔚打出中华民国军政府关东临时大都督的旗号，致函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促其顺应大势，“更有进者，力奏朝廷暂避热河，皇上有禅让之美名，人心或有思清之一日，大局幸甚，人民幸甚，皇室幸甚”[7]。11月29日，朱其璠受袁克定的指派到达湖北，随身携带汪精卫的信函，内容包括邀约南北联合，共同要求清帝逊位。[8]

12月5日，在汉口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请伍廷芳来鄂与北方代表会商和平解决事宜，开议的条件为：一、推翻清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9]半个月后，黄兴也派顾忠琛与北方代表廖宇春密商，后者提出四条：一、优待皇室；二、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三、优待满汉两方面将士；四、开临时国会。双方讨论后改为五条，第一、二两条顺序变换，为确定共和政体和优待清帝。[10]这几次接触谈到议和条件，均没有提及清帝如何交出政权，为何要给予优待，应该是将清帝退位让权作为前提条件，无此前提，则其他都谈不上，所以如何退位反而不在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自11月1日皇族内阁解散，由袁世凯组织全权内阁，摄政王就已经失去权力。挨到12月6日，眼看局势日益恶化，为了平息众怒，隆裕太后懿旨，准载沣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干预政事。[11]媒体对于此事亦称退位或逊位。

由上述可见，早在南北和谈开议之前，双方就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联系，希望尽可能以较小代价结束战事，实现共和，这使得清帝退位让权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基本条件。所以谈判一开始，民军方面就表示不以清廷为对手，北方的唐绍仪只是袁世凯内阁即政府的代表，而且因为民军坚持开议的前提是实行共和，否则免谈，则清廷的命运可以说是未议先定，所商议的并非清廷的存废，而是以什么形式退出历

史舞台的问题。通过交权让位体面下台，避免战事延续，恢复和平统一，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成为各方认可的首选。

南北议和，民党中广东人士多力持清帝退位之说，不准满人继续秉政。而上海、武昌及其他各地的民党，无不同此意见。^[12]12月20日，民军代表伍廷芳于第二次会议时首先提出逊位：“且改为民主，于满洲人甚有利益，不过须令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改革之后，满人与汉人必无歧视，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并声称前此已和汤寿潜、程德全、张謇等各都督致电摄政王，“只请逊位，其余一切优待”。^[13]第四次会议时，又说：“总之，清帝让位，则诸事易商。”^[14]逊位与让位，都是交权下台，遣词或略有分别，意思则完全一样。

清帝主动交权下台以平息战乱的办法，得到一些清朝驻外使节的赞同和响应。12月25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驻荷兰国大臣刘镜人电请外务部代奏：“今既政变纷乘，人怀民主，似不如追踪太王，明诏父老，则先圣后圣德一道揆，既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仁人之报，利亦必溥。”^[1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尝试向清廷提出逊位禅让的请求。

清帝退位牵涉诸多方面，仓促间难以办到，况且以何种理由退位，也要名正言顺。12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开会时，据浙江代表陈毅报告，在汉口与黎元洪大都督代表会晤的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全权代表唐绍仪就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所以代表会当天做出“缓举临时大总统”的决议。^[16]稍后黄兴派人与北方代表会谈，虽然也有召开临时国会的议项，却并非作为清帝退位的必经程序，而是结束清朝统治实现共和之后的建制。

议和谈判过程中，本来坚持共和毋庸再议的伍廷芳突然同意采用召开国民会议或大会取决国体政体的办法。这一方案此前由杨度、汪精卫等人组织的国事共济会提出，试图以此解决南北之争，结果两面临壁。该会虽然被迫解散，多位会员却参与了南北和谈，并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继续鼓吹其原订办法。唐绍仪和伍廷芳同意采取这一方案，当与他们的鼓动怂恿大有关系。“清廷遣派代表与民军议和之原因，实由君主立宪党杨度与民主立宪党汪兆铭发起国事共济会于北京，清资政院极意助之，于是李家驹以此意面达袁世凯。袁谓调和两

方，固属美举，然谁能当此第三人之任。须知第三人者，必须于两方均无关系，且与两方均无恶感，而后可寻。”于是有人运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作为调人，而朱授意汉口英总领事出面介绍。首次会晤，伍廷芳即提出四项要求，以清帝退位、改行民主政体换取对清帝和旗人的优待。^[17]

国体政体如果定为民主共和，清帝让位就是理所当然。可是，尽管这一次双方的谈判代表意见一致，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的方案依然是两面不讨好。民军方面，认为起义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民国，共和政府业已成立，何待再取决于国民会议？况且召集各处代表，非三五月不能到齐开会，恐怕是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以便趁机上下其手，“万一会议结果表决君主立宪，将来亦为再酿第二次革命之惨”。清廷应逊位归顺，否则联师北伐。至于派国民代表赴会一层，应作罢论。^[18]

面对各地光复政权和民军的一片反对之声，伍廷芳于1912年1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光复各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廷意今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犹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从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19]照此说法，清帝不会主动退位，袁世凯也不便出面劝清帝退位，只有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实行共和，清帝才可能顺势接受退位的不得不然。

即使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在清朝内部遭遇的阻力也不小。在清朝王公亲贵和满汉官员看来，南北和谈的决定只是少数人意见，召开国民会议多数取决，虽然能够反映民意，清帝可以顺从为由，体面下台，也不无机会以君主立宪的名义继续执掌权力。对于坚决拥清者而言，国民会议不过是缓兵之计，他们既不能接受由帝制到共和，更不愿看到满人失去帝位。

注释

^[1] 《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1911年11月11日、《奏请监国赞成共和文》1911年11月12日、《致清庆邸书》1911年11—12月，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第365—370页。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6、284页）将11月12日伍廷芳等人的联名电奏分别系于10月21日和11月24日，其实这是同一件事。前者可能计算错了阴阳历，

后者则是《宣统政纪》卷六十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80]，第9页）所载该电奏由美国使馆转致载沣的日期。

[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3卷，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第41—42页；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王兴科、何广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8册，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255页。

[3]佚名辑：《宣统政纪》卷六十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80），第9—10页。

[4]郭孝成：《山东独立状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7），第325—326页。

[5]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月初五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致载沣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43页。

[6]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月十三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44页。

[7]《蓝天蔚致东三省总督赵制军书》，《盛京时报》1911年12月3日，第1版，“丛录”；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王兴科、何广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8册，第289—290页。

[8]李国镛：《李国镛自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辛亥革命资料》第25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页。1912年12月5日，胡适在任鸿隽处看到《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8页。）因事出机密，袁世凯不便出面，若被北军查知，则声称由袁克定差遣。

[9]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第246页。

[10]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辛亥革命资料类编》（《近代史资料》专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页。

[11]佚名辑：《宣统政纪》卷六十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80），第1—2页。

[12]《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13册，“记事”，第2—3、17—19页。

[13]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1—12页。

[14]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21页。

[15]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出使和国大臣刘镜人致外务部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54页。

[16]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第250页。

[17]《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13册，“记事”，第2—3、17—19页。

[18]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48—49页。

[19]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46页。

三 掩人耳目的双簧

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在袁世凯不无拖延待机的盘算。所谓“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所以他担心的是“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是否听从”。^[1]照理，这一方案更加符合清廷和袁世凯的政治需求，这也是袁世凯搁置《请速定大计折》，将清帝退位改由国民会议公决的主要理据。可是，正当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问题磋商顺利之时，袁世凯却忽然出手否认已经签定的一切条款，使得和谈很快陷入僵局。

关于袁世凯的突然变脸，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因为孙中山归国及其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因而其借故向民党施压。不过，袁世凯开始对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反应平淡，后来兴师问罪，主要是针对伍廷芳在国民会议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问题上寸步不让采取的报复性反制。也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非导致袁世凯再度变计的诱因。

唐绍仪被迫辞职，看似造成谈判停滞甚至濒于破裂，然而不无诡异的是，此后他非但没有离开上海，而且暗中仍然与伍廷芳沟通联系，时时往来于沪宁之间。而孙中山一再表示自己是虚位以待：“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2]孙中山的再三表态，不仅产生了另一种逊位即孙中山本人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在向特定人物明确发出心照不宣的特定信号。在当时情况下，这个特定人物，显然就是袁世凯。

一般认为和谈受挫显示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在如何结束战事、统一中国的认识上严重分歧，直到1月中旬提出《请速定大计折》，事情才出现转机。既然《请速定大计折》提出的时间提前到1911年12月下旬，而袁世凯重新运动清帝退位在唐绍仪去职不久就已经开始，则原有的判断必须大幅度调整，才能合理安放材料和解释事实。

关于和谈的立场和底线，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意见的确一度有所分歧，唐绍仪曾复电梁士诒、阮忠枢，详细分析了局势并解释其态度的变化。他说：

彼党以共和为标准，反是则无可开议。若一决裂，则大局更糜烂不堪。反复焦思，更无一线转圜之地。来电发明师座对内对外对上对下之苦心，仪岂不知之。顾师所重者，护持太后皇上耳，所虑者，各国干涉耳。试问战争再起，度支何如，军械何如，能操必胜乎？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皇族，能保安全乎？外人生命财产，能保护乎？宗社倾危，列强分裂，汉族亦因以沦胥，危险之势，孰甚于此。若从国会之议，皇族之待遇，已许优隆，外人之干预，无由窥伺，倘能建设完全，尤为中国之幸福。危险者如彼，而有可希望者如此，然则所以对内外上下者，更何疑虑哉。仪初意亦何尝赞成共和，第亲历汉沪，目击情实，不得不急为变计。人民各国，皆注目于吾师一人，宗旨一误，祸害立见，与其坚执于前，毋宁养晦待时，舍是二者，决无胜算。支电不尽所言，故复详述。万里遥隔，五内如焚，前席剖陈，望兄为助。师意若何，仍乞电示。^[3]

据此，唐绍仪南下前与袁世凯商定的办法，并不是接受共和，到武汉和上海后，知道形势无可挽回，必须以共和为开议前提，并且按照清帝退位交权的基本路径安排各事。^[4]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只不过是给了清廷一个体面的下台阶，而不是说真的要由国民会议来决定是否实行共和。可是，好不容易才确定的行动方略，何以短短几天内风云突变，以至于袁世凯和唐绍仪分道扬镳？

其实，唐绍仪因为与袁世凯严重分歧而辞去议和全权代表只是表象，另一种可能性的几率更大。有消息称：

或又曰：绍怡之辞职，非得已也。绍怡南下，有在京各省代表从行，许鼎霖者，江苏代表之一。既至沪，愤会议之不获与，无发言权，悉民军者，方以民军饷械匮乏日聒于鼎霖，乃不待会议之毕，与福建代表严复等行矣。入都谒世凯，备言民军之腐败，兵乌合，饷无着，北军当之，直摧枯拉朽耳。绍怡至沪，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世凯唯唯。鼎霖乃密告亲贵，亲贵诘世凯。世凯曰：“是何言，余遣绍怡，讨论大局也，他非所知。绍怡既不称职，当罢免。”会绍怡驰电请解职，遂允之，而以彼此电商请于廷芳。自此以往，南北两方，皆藉电报以议和。而唐绍怡虽不居代表之名，仍有参与议和之实也。

^[5]

北归后许鼎霖的确曾在资政院会议时发表攻击民军的言论，鼓动武力镇压。如果唐绍仪的辞和袁世凯的准都是因此而起，则此事并非由于两人之间出现分歧，而是为了规避亲贵对唐的攻诋责难，不得不再度改弦易辙。袁、唐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彼此心照不宣。

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折冲樽俎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中密商的掩护，与此同时，南北双方通过几条线秘密接洽，商议如何能够迫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实现共和，尽早结束战乱。唐绍仪辞职，和谈表面陷入僵局，其实是因为由国民会议公决的途径行不通，只得重新转向寻求清帝退位。唐绍仪滞留沪上，孙中山宣称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都是配合袁世凯设法迫使清帝退位演出的戏码。

关于袁世凯与唐绍仪联手演出的苦肉计双簧戏，有一定内幕渠道的《时事新报》评论道：

袁世凯入京以后，深知全国民心，倾向共和，而于清廷一方面，又不愿以武力相角，使无数生灵，同遭涂炭，故于外则奏派代表，赴南议和，于内则施其沉毅果决之手段，以布置大局，务使清廷处于安全之地位，而国家可免瓦解之忧。无如一般顽固之流，不明袁世凯之苦心，既不知赞同其宗旨，又不能协助其进行，诽谤横兴，而唐绍仪不得不辞职。幸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电报为议和机关，争执虽多，事实尚顺。惟各省军队大半不明此中真况，常起意外之风潮，而平时伏匿之匪党，又思乘机攫利，此亦议和时期中之至可危事也。事后思之，犹觉懔懔。……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有限之文字，传达无限之论议，而种种不可明言之事实，又无从以电报泄露于外，使清廷一方面，或另生枝节。是以袁世凯电请伍廷芳北行，伍廷芳电请袁世凯南行，于事实上观之，伍廷芳不妨暂离上海，而袁世凯万不能暂离北京，故所谓北行南行，皆表面之词也。唐绍仪与伍廷芳签定之条约，断无推翻之理，而袁世凯一再以未与本大臣商明为言，故作必欲推翻之理论，电书往还，两不相让，亦皆表面之词也。其争执最烈之点，为国民会议一节，若袁世凯所开条件，非历数月不能办到。在袁世凯何不可通融办理，而所以斤斤电争者，亦未始非表面之词也。一言以蔽之，袁世凯若不赞成共和，必无南北议和之事，议和亦无如是易成也。^[6]

这些揣测判断可以从北方紧锣密鼓进行的促使清帝退位行动得到印证，唐绍仪辞去谈判全权代表之后，继续参与南北交涉。他本来就另有与袁世凯沟通联系的管道，南下议和的随行代表中，杨士琦未与

议。“盖上海电报局不允用密码通电，而关于议和事宜，必须与袁世凯秘密商议。既不能用秘电，故唐绍怡将遣其回京，面晤袁世凯磋商一切。”^[7]1月8日，唐绍怡致电清内阁，告以四蒙独立，瓜分在即，若东三省独立，辽东亦不复中国所有。民军拟自行召集国会，各国绝无不认之理。“又闻东南各商埠洋商团体拟联电本国政府转劝皇上逊位，以期解决而保商务，现正在沪筹拟。”^[8]等于试探性地公开动议重启清帝退位事宜。

唐绍仪的意向得到原东南立宪派人士的积极配合。两天后，张謇接连发给袁世凯两封密电，一谈国民会议问题，另一则明确提出：

“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并且针对僵局出谋划策道：“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黻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交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畀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可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蹇默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9]

张謇的谋划，的确击中清廷的要害，清军将领如果加入政争，天平势必朝着既定的方向倾斜。后来北方军人表态拥护共和，果然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此举也开启了近代中国军人干政的恶例，埋下民初军阀混战的隐患。此时袁世凯已就清帝退位一事暗中加紧动作，对外却依然故作姿态。直到1月25日，袁世凯才复电张謇，闭口不谈清帝退位之事，话题仍在国民会议方面：“国会公决，系朝廷存亡关键，须请皇宗同意，非行政官所能擅专，极多困难。连日协商，渐有头绪，已迭电少川矣。”^[10]其实此时所协商的已非国会公决，而是清帝退位。

事实上，国民会议刚刚陷入僵局之时，逼劝清帝退位之事就已经重启。早在1月4日，原来“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官话报》就完全改变立场，刊发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袁世凯还私下对莫理循说：“再加些压力，

朝廷就垮台了。”莫理循获悉，热河正在筹建宫廷，并认为“如果朝廷去热河，事情就简单了”。^[11]

1月11日，唐绍仪再度电请清内阁代奏，要求清帝逊位：“朝廷既愿将国体付诸公决，其公天下之心，为薄海所共钦。惟大势所趋，万众一致，临时国会，仍用正式选举法，非半年不能成事，民军万难承认，且恐旷时日久，转生意外之变，反与皇室诸多不便。务祈俯顺民心，早日逊位，则民军念禅让之德，皇室待遇，必极优隆。除密将优待条件电呈内阁外，谨请代奏。”只是袁世凯觉得时机未到，退位之议还不宜拿上台面，旋即复电谓：“吾公既已辞职，该电未便再行代奏。”^[12]

袁世凯的婉拒欲盖弥彰，两天前即1月9日，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已经与莫理循商谈敦促清帝退位事宜，并于次日致函莫理循，希望上海商会将此消息通过英国公使电告各方，再由上海领头，各通商口岸陆续跟进，对清廷施压。^[13]莫理循的看法是：“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议，一个好办法是使上海商会通过约翰·朱尔典爵士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这个建议来自袁世凯自己的人，我认为可行，因为，如果我们能使一个商会这样做了，所有旁的商会将会跟着做，积累起来的力量会是非常强大的。”^[14]同日，梁士诒私下前往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议，梁说：“现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要决定代替满清王朝的政体。问题在于：如果朝廷愿意让位给袁世凯，或者是授权给他建立临时政府，各国是否将承认他。”^[15]

12日，莫理循在一封信中乐观地表示：“你收到这封信以前，我几乎肯定你已得到皇帝退位的消息。正在为此进行安排。”皇室必须去热河。尚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满人和皇室的安危及利益。“我相信，在诏书发布以前，将会同革命党作出安排。我还了解到唐绍仪将作为中间人，进行秘密调停，使革命党同意这种安排。”^[16]14日，梁士诒又告诉朱尔典，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是否接受共和将会拖延时间及带来危险，“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一道谕旨，宣布满清王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政府工作，直到选举共和国总统时为止”^[17]。

1月16日，也就是袁世凯被刺的当天，莫理循兴奋激动地写信告诉《泰晤士报》的布拉姆：“退位诏书明天或后天就发布。星期天晚上，我详尽地、如实地向你拍发了关于谈判的电文^[18]。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下午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了各种提议。昨天一大早，我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来见我，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相告。他来告诉我：前天晚上，袁世凯最终接受了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意在四天之内由皇太后发布退位诏书，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由人民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受命掌管政府。没有提到国民大会。”星期天即1月14日，就在这一天，袁世凯已经和清廷议定清帝退位，实行共和，由袁世凯掌管政府。莫理循还明确说：“一封宣布袁世凯的决定的电报于深夜发给了唐绍仪。你比我更了解东方人。在整个这场危机中，我们都在和东方人打交道。我们无法象理解欧洲人的行为动机那样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唐绍仪的辞职要求被接受了，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袁世凯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是通过他的亲密朋友梁士诒进行联系的。”^[19]

种种迹象表明，早在1月16日之前，促使清帝退位之事不仅已经重新启动，而且几乎要大功告成。而民军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袁世凯与清廷的交涉，由于清帝退位的条件必须满足民军的要求并得到其同意，所以绝不仅仅是知情人，更不是旁观者。如果说南北和谈的对手是民军与袁世凯执掌的清政府，关于清帝退位的交涉，袁世凯就只能是居间沟通，民军以袁世凯为协商的对手，袁世凯则要两面传递信息，讨价还价。由于退位交涉暂时只能暗中进行，南北和谈仍在就国民会议举行的具体事宜争论不已，只有少数介入退位密议的南北人士才知道你来我往的函电纷争，其实已经演变成障人耳目的烟幕。

注释

[1]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内阁总理袁世凯等奏折》，军机处折包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226页。

[2] 《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1页；《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第4页，“令示”，1912年1月29日。原作“民国会议”。

[3]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14册，“记事”，第12—15页。

[4] 莫理循声称：“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唐绍仪的辞职尽管被接受了，可是从那以后他同袁世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有时直接通信，但一般通过梁士诒。”《致威·伍·柔克义函》1912年1月24日，[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845页。

[5]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0册，“记事”，第3—4页。

[6]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1册，“记事”，第1、17—18页。

[7]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13册，“记事”，第2—3、17—19页。

[8]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清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自上海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59页。

[9]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561页。

[10]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10册，第559页。

[11] 《致达·狄·布拉姆函》1912年1月5日，[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825—826页。

[12]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2册，“记事”，第26页。

[13] 《蔡廷干来函》1912年1月10日，[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830页。

[14] 《致克·达·卜鲁斯函》1912年1月10日，[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

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830—831页。

[15]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2年1月12日发自北京，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1页。

[16] 《致达·狄·布拉姆函》1912年1月12日，[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832—833页。

[17]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2年1月15日发自北京，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280—281页。以上两封电报分别称来人为袁世凯的亲密朋友和私人秘书，《辛亥革命史》指其人为梁士诒。

[18]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原书注释：“这份电文登载在1912年1月15日的《泰晤士报》上，题为‘满人倒台，退位条件’。”

[19] 《致达·狄·布拉姆》1912年1月16日，[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835页。

四 袁世凯逼宫

接下来的问题是，差不多一个月前拟订的《请速定大计折》，为何会在一个月后披露于报端，并且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大公报》的按语道出了部分原因，即1912年1月下旬皇室会议讨论清帝退位问题，仍以《请速定大计折》为底本。更为重要的是，其时南北之间以及袁世凯与清廷之间关于清帝退位的磋商再度陷入胶着，尽管上海的几家报纸借西报发声，开辟专栏集中报道西报对清帝退位的种种预测，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消息，宗室王公的商议却不断遇到强力阻挠，迟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退位的交涉也只能秘密进行，还不能公之于众，因而需要一些确实可信的证据来为鼓动退位的舆论提供有力支撑，将幕后的交涉摊开到阳光下，进而增强对清廷的压迫。

这时南北各大报关于清帝退位的消息不绝于耳，而表面局势的发展却是和谈陷入僵局，战事扩日持久，且可能蔓延扩大，这引起各方面的极大担忧。眼看国民会议的分歧难以协调，各方又将目光聚集到清廷退位之上，以为一念之差，容易速效。在南方各省，已经附和民军的原清朝官员纷纷电请清帝退位。1月15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和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等联名致电清廷：“皇太后、皇上既以公天下为心，保全民命为重，应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一面速开国会，选举总统，宁息战祸。”^[1]同日，四川总督岑春煊也致电清廷：“今为朝廷计，与其徒延时日，致上下不能径接以诚，何如廓然大公，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俾天下知禅让美德，实出自朝廷本怀。人民感念至德，必筹安富尊荣之典，上酬皇太后、皇上之美，宗室王公与八旗亦蒙安全之福。”^[2]这些不约而同的说词，都将清廷禅让与降旨确定及组织共和政体联系在一起，似乎清廷不降旨则共和政体就不能成立。这与民党所认定的共和已经成立、清帝退位不过避免战事延续的看法明显有别。

光复政权的官绅也将目光投向袁世凯，希望他出面迫退清帝，打破僵局。1月14日，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及张一麟致电袁世凯劝告道：“夫致君尧舜，学唐虞之禅让，是谓大智；救民水火，免生灵之涂炭，是谓大仁。此中机括，在公一身。……公果为民请命，清廷未必不幡然改图，千秋万国，自有公论。”^[3]同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熊希龄、副会长张学济等150人联名致电袁世凯，指“满室已失人民之信用，实无再为君主之资格，必须迅速避让，免致涂炭生灵。国民会议之局，亦可不必举行也。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诏退位，勿误大局，天下幸甚”^[4]。众口一词之下，清帝成为众矢之的，袁世凯则为众望所寄。

公开呼吁的同时，暗地里的实际进行已经渐有眉目。1月，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经由汪兆铭代转来电称，希望速定共和政体，早建统一政府，以弭内忧而消外患，并提出三条件：一、清帝退位后，举袁为大总统。二、共和成立后，接管清政府所有北方军队，不咎既往，与南军一律待遇。三、先行议定优待皇室及旗民生计。直、豫两省谘议局与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举当是为袁世凯劝退或逼退清帝，询问民党可以给予的报酬。1月14日，孙中山复电表示：临时政府的唯一目的就在速定共和，“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自无不能。……清廷以退让而释干戈，皇室报酬，应示优异”^[5]。本来总统大位已经有为袁预备之说，只是因为和谈一拖再拖，光复各省担心生变，组织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时，就已经表明暂时承乏之意，如今不过再度确定袁世凯开出的条件而已。

同日，民军和谈总代表伍廷芳电告孙中山和黄兴：“旅沪洋商团来函，以商务损失，渴望两方不再开战，早日和平解决，并电催清帝退位以顺人心。”又告以“唐君绍仪来言，得北京确实密电，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伍廷芳代为保证道：“孙君肯让已屡经宣布，决不食言。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之正式公文。至此后两方政府如何合并，可由两方协商决定。”^[6]1月15日，孙中山复电伍廷芳，肯定了后者的回答：“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7]

也有人对于袁世凯的作用表示怀疑，担心他才是一切波折回澜的幕后黑手。1月15日，汤寿潜通电各方，指“此次议和备战，其不信有十四”，包括“遣使议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默许共和为政体，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密请退位，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在斗满汉为鹬蚌，彼将收渔人之利”。请从速决战，不令其阴谋得逞。^[8]

袁世凯在国民会议公决与清帝退位之间出尔反尔，固然有做戏给世人看的成分，以及在南北清革的夹攻下不得不然的难言之隐，可是要说所有反复都毫无权术的考量，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没有南北和谈，袁世凯自己就要充当迫使清帝退位主张共和的主谋，在北方难以立足，要想接掌大位，势必难上加难；而如果由国民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共和，袁世凯就不能成为共和的元勋，也无法从清廷那里继承法统，即便出任总统，也不过是听人摆布的傀儡。两种情况都于己不利。由和谈及国民会议形成外部压力，再经由自己将压力转到清廷，从清帝退位中得到授权，得益最大的人，无疑就是袁世凯。看似左右为难的他，很可能就是居间播弄的操盘者。

正当坊间传闻不断，舆论沸沸扬扬之际，清帝退位的秘密磋商突然正式曝光。1月17日，伍廷芳忽然复电武昌各军官，宣称：“此次所以允其展期停战者，因清帝退位已将成议，日来正切实磋商，如能定期宣布，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条件均易就绪。所以未通电布告者，因事在筹商，未经决定，故尚须少待。”^[9]1月18日，伍廷芳又复电孙文、黄兴：“如公必不能来，请俟清帝宣告退位之后，再商办法。”^[10]这些言词，清晰显示南北双方已经就清帝退位一事达成共识，北方的秘密进行成效显著，至少民党一方获取的信息，几乎是水到渠成。所以同日伍廷芳又公电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各司令以及天津《民意报》：“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11]这等于是将密谋的信息公诸天下，以安抚因和战不定而情绪日益激昂的各地军民。

在南方的一再催促下，运动清帝退位的步伐明显加速。1月17日，袁世凯电告伍廷芳：“皇太后悯全国生灵之涂炭，不忍再事战争，已有允认之意。本大臣与庆、醇两邸，仰体慈宫意旨，政见亦均相同。惟蒙古各王公尚在反对，势须设法与之详细讨论，以期和平解决。若以强迫行之，其各王公等恐必归藩独立，大局终难平定。”^[12]

在向民军诉苦的同时，袁世凯也加大了对清廷施压的力度。其被炸的次日即1月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奕劻、载沣、载洵、载涛、溥伦、载泽及在京蒙古各王公与会，至晚8时，议定：一、此次续展停战期内，必将君主民主政体从速解决，决不争执，以免生灵涂炭；二、所有前议和代表唐绍仪签押条款，全行奏明，以便酌度施行；三、应将召集国民会议办法，速与民军代表共同商妥，早开会议，决定政体。会议时“奕劻首先主张共和，溥伦和之。奕劻并谓此时承认共和，君位虽去，君名犹存。故惟有决定让位，以示朝廷大公无我之心。蒙古王公群起反对，力持君主政体之说。倘南方坚持共和，则宁使南北分离，决不赞成民主。而尤以那彦图为最。奕劻谓公等皆有旗可归，有土可守，成则有功，败则无害，然使两宫困守京城，一旦有变，谁能担此责任。蒙古王公驳之甚力，奕劻等无词以对，遂又决定于十二月初一日再行开议解决。会议既毕，亲贵齐至内阁，面询袁世凯之意见。袁谓倘不能达此目的，立即辞职。至退位与否，事关重大，必须太后自行主张”。关于民军优待清室条件凡九项，“清廷会议时业已承认”。其第一条就是，“清帝退位后，仍受外国君主之待遇”。当天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至北京，也极力游说满洲皇族与袁世凯，请清帝速退位，和平解决。^[13]

由此开始，清廷连续召开御前会议，重点集议退位问题。随着压力增大，反对的声音也陡然增强。1月18日午前，清廷再度开会，奕劻、载沣、载涛、载洵及蒙古王公均集，袁世凯亦至。“会议至午后四钟始散，闻宣布共和，至是已有成议。清太后以载沣、溥伦等婉劝退位，诏已拟定，正待签名宣布，又召集贵族会议，铁良与年少亲王，推载泽为领袖，联合载涛、溥伟等，极力反对。清太后因又迟疑不决。载沣、溥伦、奕劻等因相率告假，于是少年无识之王公，更肆无忌惮，运动再开御前会议。召见时王公皆向清太后长跪，溥伟亦无表决之言。毓朗不能耐，就询溥伟方针，以游移不决之言答之。”^[14]

1月19日，分别召开了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据说“禅位诏书，本已拟就，拟由近支王公议决署名。而溥伟、载涛、载泽、铁良及蒙王某等反对极烈，乃由亲贵领袖奕劻发言，谓我非欲主张共和，惟大局如此，当筹画保全皇室之法，似可采用共和，以和平了结，免至皇室别有危险。溥伟又出而反对，谓吾国不能共和，万不得已，则当南北分立。载涛意见亦同。奕劻谓我年七十余，无论君主与共和，我皆不及享受，有何成见。但今日君主之说，既不能行，南北分立，亦徒托

空言。故不如径行共和，以救危局。铁良、载泽创议，欲分南北为二国，抗议纷呶，卒无成议”^[15]。

出席会议的溥伟记载，会议开始后，太后问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曰力主君主，并主战。太后谓战胜固然好，万一战败，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指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即使可恃，受臣民优待，岂不貽笑列邦，貽笑千古。溥伟又称：“臣最忧者，是乱臣藉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16]

当天午后3时，举行内阁会议。“国务大臣中，惟袁世凯、唐景崇未至，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三人为袁世凯代表，亲贵中惟肃王、豫王未至。梁士诒先发言，谓袁内阁有病，不能出席，今以本大臣及赵、胡二大臣代表袁内阁，商议组织临时统一内阁之事。赵秉钧接言，谓此办法系将南京政府与北京内阁先行解散，而在北方另行组织临时统一政府，暂理全国事务，一面开国民临时大会，以决定君主民主之问题。因北方兵力不敷分布，且兵饷只敷二月，后即难继，现时尚能保全者，东三省外，止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此四省人民，主张共和，时欲起事者，所在皆是。徒以兵队镇摄，故目前尚可保守耳。万一民军北来，两宫之安宁，与宗庙社稷，皆有危险。今日之事，非空言所能解决，除组织临时统一政府外，尚未有别种办法，请斟酌。语毕，国务大臣退去，王公自开会议。”^[17]

各方意见相持不下，令缺少主见的隆裕太后更加举棋不定，召见亲贵时说：“时至今日，大事去矣。民军以死争共和，非达到目的不止。吾苦心焦思，终不得一良策以挽回大局。我朝二百余年之基业，竟丧失于吾手，真令人死不瞑目。”旋又谕令及早图谋生计，现无他法，唯有逊位而已。言罢涕泣不止。^[18]

清太后的两难和袁世凯的逼宫，引发各种议论。汪荣宝致函其父，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某微窥其意，盖始终不愿以兵力从事。……项城入京以来，其眼光所注，专在外交及亲贵，故其布置，亦惟对于此二者着着进行，却未曾留意其部下之军队，有反抗之举动。自初九日懿旨颁布后，翌日舒清阿即怂恿张怀

芝通电各镇，联名请战，而冯华甫既克汉阳，以不得进攻武昌成就其盖世之功为大恨，遂亦有意反对，鼓吹开战之说，于是一班资政院之顽固议员，乘民选议员之散去，大举活动，开会演说，竭力主战。项城出于不意，仓皇失措，不得不将唐少川代表撤销，借国会地点及会期各问题，与伍秩庸往返电商，以期延宕时日，乘间调处。而主战派气焰非常之高，项城几有维持不了之势，乃拟具奏辞职。……此信一出，于是东交民巷各使馆不约而同，各电其本国政府，请示办法。项城又大惊，乃招集各驻使，告以虽有辞职之说，尚无其事，请各安心。当此进退维谷之时，而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等督抚，又连电反对共和，措辞甚厉。似此情形，实觉无从收拾，一旦阁令不行，各处军队自由行动，则南北糜烂之局成，列国瓜分之祸至矣。此中消息，未识南中新政府亦有所闻否，如果真心主张共和，为国利民福起见，似宜迅速疏通北军以平其气，□□□□以安北人之心，发表优待皇室条件，以释亲贵之疑，实行□□□□□以示尊重人道之意。如此则共和可望，国家可全。^[19]

有鉴于此，有报刊评论道：“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议和以来，条件纷陈，实以清帝逊位为主要。袁世凯以此说进，而奕劻亦以此说进，伍廷芳以此说进，内外臣僚亦多以此说进。清太后为保全皇室安妥生灵起见，已有允许之意。奈不明大局者尚一再抗拒。此议和结果之所以迟迟也。”^[20]此说与通行说法有别，却大体能够将所有材料史事贯通无碍。

正当御前会议就清帝退位僵持不下的敏感时刻，天津《民意报》将1月18日伍廷芳致武昌黎元洪及光复各省军政当局及本报的公电刊载出来。^[21]此前南北各报关于清帝退位的传闻不绝于耳，可是并无确据，这下密谋被当事一方意外披露，引起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为了防止情急之下局面失控，清廷由诸国务大臣胡惟德等面传懿旨，仍按召集国会与革军接议。^[22]随后的两次御前会议，由于各王公反对甚力，奕劻托病请假，袁世凯亦不与会。

乱局之中，京城反对退位的声音骤增，这让本来不满于孙中山寸步不让的袁世凯有所借口，放缓了逼宫的力度。“初三日奕劻、溥伟至内阁公署，面询袁世凯以政见，如决意主张共和，即请宣示，吾辈当奏请两宫逊位，以便早定大局。袁谓此等大事，不敢擅决，且民军虽暂承认停战，然此期要求之各件，异常坚执，两方意见，极费调停。此等重任，万难独负。仍请两宫与亲贵商酌妥善，再定办法。”

[23]同时根据懿旨，袁世凯于1月21、22日连续致电伍廷芳，重提由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希望尽快商定选举及开会办法，否定优待各条件已经彼此直接商定。[24]

接到袁世凯的来电，伍廷芳一时间居然反应不过来。1月23日，他复电袁世凯，告以优待条件已正式直接通告尊处，“至于临时国会，应俟清帝退位后，统一全国之共和政府议定选举法，以行召集”

[25]。而袁世凯复电坚称：“优待条件，此方未经认可，现在无庸置议。正式国会一节，前经尊处允认，既须以国会公决国体，未决以前，自不能设共和政府。希就前议选举法及开会地点详细讨论，想出妥实办法见复。”[26]次日，袁世凯还向清廷奏报，遵照懿旨与革军代表伍廷芳商办，“覆语悖狂，尚无头绪，仍与切实磋商”[27]。

1月25日袁世凯答复伍廷芳的询问时，仍然矢口否认双方曾经商议过清帝退位事宜：“本大臣与贵代表久商未决者为国会选举及地点日期，并未与贵代表筹商退位办法。来电尤不可解。请就选举及地点日期协商妥善办法，以期早日解决。此外非所敢闻。”[28]

这一次袁世凯的反复，的确是情非得已，他担心坚持君主制的清朝亲贵和清军将领鼓动风潮，反对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导致局势失控，所以故意予以否认，并再以国民会议为障眼法。直到此时，退位仍然不能提上台面，则前此不得不秘密进行，就在情理之中。

面对进退两难的局势，袁世凯一方面要利用清帝退位与南京民国临时政府讨价还价，另一方面要应对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继续对清廷施压，陆续披露一个月前的相关文书，便成为可用的策略之一。

《请速定大计折》刊布5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封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被媒体称为“清廷实行逊位之先声”，函谓：

近因武昌乱起，不两月间，糜烂者已十余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虽南克汉阳，西收晋鲁，然战域范围过广，而府库空虚，军需莫出，行政经费罗掘殆尽，用是停战媾和，特派唐、杨二大臣等前往沪上。帝德如天，为民请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屡接唐大臣等电称，民军之意，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期限已满，复展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若一旦所议无成，危亡等于呼吸，常此迁延，前敌哗变堪虞，东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诸庶民，前已

允监国摄政王退位归藩，时局所逼，迫于眉睫，若上法尧舜，实行禅让，则皇室尊荣，迈伦千古，迥非列朝亡国可比。自此旗汉同风，共建强国，凌欧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鲜生计，经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误会，务望贵衙门晓以大义，切宜镇静，必能妥筹生计，不可妄听谣言，致误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29]

与《请速定大计折》相比较，这封信同样应写于1911年12月底，属于旧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开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谈判以退位换取优待的密谋，瓦解亲贵和将领的反对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尽快兑现。

概言之，袁世凯自1911年底就开始暗中谋划和运动清帝退位，并拟就《请速定大计折》，正式提出要求。清廷方面，隆裕太后、载沣和奕劻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换取优待皇室皇族和旗人。但是如此大事依制必须经过宗室王公的议决，清廷和袁世凯担心仍在秘密磋商阶段的退位之举未必容易过关。为使清帝能够体面下台，同时减少清朝内部的反对，征得民军议和代表的同意，清廷改行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令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如此一来，作为袁内阁全权议和代表的唐绍仪成为拥清势力强烈反对的众矢之的，迫不得已，只好以国民会议召开的细节问题纠缠为遮掩，重回运动清帝退位的旧轨。而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民军方面意外披露，果然引发拥清势力的激烈反弹，危及进行中的清帝退位交涉及安排。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在公开场合讳莫如深的禁忌话题，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注释

[1]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等致内阁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60—161页。

[2]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四川总督岑春煊致内阁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61页。

[3] 《电劝项城承认共和》，《大公报》1912年1月17日，第5版，“要闻”。文中称二十七日，即15日，但落款为寒，则是14日。

[4] 《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熊希龄等致袁内阁电》，《大公报》1912年1月19日，第2张第2版，“录件”。

[5] 《复直豫谘议局电》1912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0页。

[6] 《致孙文黄兴电》1912年1月14日，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40页。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157页；第1编，第71页。

[7]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71页。

[8]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22—23页。

[9]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21—22页。

[10]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74—75页。

[11]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22页。

[12]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3册，“记事”，第14页；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议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33页。

[13]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3册，“记事”，第10—11页；《清廷第一次会议情形》《清廷第二次会议情形》，《时事新报》1912年1月24日，第1张第2版，“接特别记事”。

[14] 《议和记·清廷之御前会议再志》，《中国革命记》第23册，“记事”，第15页。

[15] 《议和记·清廷初一日之御前会议》，《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2页。

[16] 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12—114页。该日记所载出席会议的14人中没有奕劻。

[17] 《议和记·清廷之内阁会议》，《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2—3页。另组临时政府之事，引发南北新的冲突，导致清帝退位一再拖延，另文详

论。

[18] 《议和记·清太后之见几》，《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3页。

[19] 《议和记·附志袁世凯之隐衷》，《中国革命记》第23册，“记事”，第15—17页；《表白项城心理之函件》，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各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第234—235页。该函为汪荣宝给其父汪凤瀛的家书，为苏州军政府检查邮件时发现，1912年2月1日《国民公报》以《表白项城心理》为题刊登，汪荣宝看到报纸后十分不满。（赵林凤：《汪荣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汪荣宝两度在日记中提及此事，家书写于阴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即1912年1月14日。（韩策、崔学森整理，王晓秋审订：《汪荣宝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32、340页。）

[20]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页。

[21]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22页。

[22] 《与革军接议尚无头绪奏》，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77页。

[23]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2页。

[24]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2页。

[25]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4页。

[26] 《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73页。

[27] 《与革军接议尚无头绪奏》，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77页。

[28] 《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并附录》《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86—387页。

[29] 《辛亥中国革命史·清廷实行逊位之先声》，《神州日报》1912年1月19日，第2张第2版，“特别纪事”。

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

辛亥战事陷入僵局之际，迫使清帝退位交权成为各方心目中快速解决纷争、以最小代价平息战事、避免国家分裂的首要选项。虽然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方案一度提供了清廷体面的下台阶，很快就因为唐绍仪的辞职而被搁置，双方后续的反复交涉不过是演双簧为暗箱操作退位之事障目。可是即使在密谋曝光之后，清帝退位依然久拖不决，亲贵王公的坚决反对和袁世凯的弄权算计，使得水到渠成变得波折回澜。世纪回眸，当年各方所争都是大是大非的关键，只是那些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不得不争，每每体现于表述的一字之差，例如关于清帝如何交权下台，先后使用过退位、逊位、让位、辞位、去位、致政、归政、还政等多种说法。旁观者不知就里，每每视为无谓之争，后来人雾里看花，不加深究，也容易一笔带过，甚至视而不见，或误作别解（如近年来围绕袁世凯政权法统承继问题的争议）。那些脱离材料本来时空位置的解读，往往条理越清晰，去事实真相越远。必须梳理渊源流变，洞察各种说词的本旨及转意，才能正本清源。有鉴于此，尽管尚有部分秘辛未见天日，依时序综合比勘各方记述和各类资料，可以明了证据的意涵，重现史事本相及其演化，让辛亥民元中国政坛上一幕幕波谲云诡的大戏，活灵活现于历史舞台之上。

一 另立临时政府

1912年1月中旬，媒体坊间盛传清帝退位即将实现，民军方面甚至正式公布了相关信息。不过，将伍廷芳致民军各方各电的内容与清廷宗室王公会议讨论的情形比较，可见两边的判断存在明显反差。伍廷芳意指清帝退位已是水到渠成，而清方的相关磋商仍处于暗箱操作阶段，至于台面上，不仅和战尚在两可，即便求和，也还有直接退位抑或交由国民会议取决的不同选择。尤其是清帝退位，还没有提上正式议程，根本不到指日可待的程度。其间的隔阂，既存在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之间，也存在于南方与袁世凯以及袁世凯与清室之间。其中固然有沟通不畅互信不够引起的误会，也有各自目的不同而导致的争拗。袁世凯居间操弄，想方设法凭借有利地位，获取最大利益，使得退位诏书的颁布一波三折，久拖不决。

在1月19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刚刚被炸受伤的袁世凯以疾辞，由赵秉钧、梁士诒代表。赵秉钧突然提出：“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溥伟对以：“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1]提议尽管未获清廷批准，赵秉钧却并非一时口快，袁世凯的确准备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定初二赴津，车已久备，因津宅已预定矣。亲贵哄闹之后，此事暂搁”^[2]。可见此事筹划已久。袁世凯事先派人到天津实地勘址，具体商定以京奉铁路局为临时政府办公之所，并向道胜银行借房数十间以敷分用。^[3]

易地另组临时政府，在袁世凯固然是想避开亲贵的干扰，更为重要的，则是处心积虑将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并列对等，使之同时消灭，大权统归于己，一方面避免将来全国性政权不得不延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尴尬，一方面也使清廷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能听命于己。媒体得到消息，“并闻明诏宣布辞政之后，即命各大臣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召集国会，公举第一任大总统及副总统，现在之南京政府及临时

总统，应即一律取消。凡涉及政治之事，均由大总统主持，清帝不得过问。俟再行召见各国务大臣，详商一切，即可决定”^[4]。

预先获悉了部分相关信息的孙中山立即敏锐地察觉出此举异乎寻常，于1月18日复电伍廷芳，表示为了民国前途，让位的手续应当慎重，并提出五项条件，前两条就是：“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5]

这封巧一电至关重要，孙中山准确预判了袁世凯的政治盘算，虽然不能不实行共和，相较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显然更愿意其权力来自清帝的逊让。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要以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合并的名义，使得延续清朝的法统与承接清朝的政府相辅相成，进而吞并南京政府。实际上，自袁氏拥有全权并组成责任内阁后，他就已经是政府首脑。如果其阴谋得逞，民党就无法掌控局势的走向，也无从保证袁世凯遵守民主共和的路线。如此一来，所有的努力和牺牲，都可能前功尽弃。

伍廷芳仔细阅读孙中山的来电，知其“但虑袁被举后，即北京设临时政府，强全国服从，则必不能收全国统一之效”，故改一、二、四、五诸条，以为防闲，用意至为深远。“接电后，即转达唐君。唐谓清帝退位后，北京必不即设临时政府，此层可以无虑。但全国统一之政府，必不可不迅为成立。否则，北方陷于无政府之状态，而统一政府虽举袁为总统，决不能由袁一方组织。故孙公辞职、袁公被举之后，两大总统为交替起见，对于组织统一政府，必须直接筹商。唐所以屡欲孙公来沪，即为预筹统一政府办法，免致临时仓猝。……总之，清帝退位一层，若能办到，则以筹设统一政府为第一。如此事与唐、汪等商议，意见俱同。”^[6]和谈代表的意见相同，刚好反衬出孙中山政治嗅觉的灵敏。

与此同时，双方关于退位条件仍然分歧较大。19日，伍廷芳致电孙中山和黄兴，报告唐绍仪送来密电称：“前途对于宫廷及皇族力以保全皇号自任，今忽改为让皇帝，此字类于谥法，又近于诙谐，皇族必大起反对。且此等称谓，直是闭门自尊，盖我辈既是民国，本无君臣，其所谓皇帝，断不至牵连到民国。”南北合一之后，保留大清虚号，可借此操纵，使满蒙离而复合。否则无可与交涉之词。由此可见，原来在谈判桌上讨论的清帝退位条件，早已转为暗中磋商，袁世

凯表面与伍廷芳进行交涉，而在实质性的清帝退位问题上，仍通过唐绍仪就近与伍廷芳接洽。^[7]

当天伍廷芳又复电孙中山、黄兴：“唐来言，清王公今日下午会议，即可决定，欲急将条件议妥。廷见无甚出入，为早定大局起见，已从权允许。总之，今日万国注目，甚望和平了结，皆谓中国不宜再有战事，而吾党所流血以求之者，只在共和。若清帝退位，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枝节，似可从宽。……此次协议转折过多，由袁转唐，由唐转廷，由廷转致尊处，意见偶有参差，即致全盘阻滞，既易致误会，尤易坐失事机。故廷于大体无甚差池，及与尊意无大出入者，先为允许，无非欲及早定议，以便进行。汪等意见相同。”^[8]所说转折过多，再次证明唐绍仪居间沟通的角色作用。而“似可从宽”之处，却未必是枝节。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正是这样的大体从权，导致民军和谈代表在孙中山反复坚守的关键问题上大意失荆州。

南北和谈，在面对面的伍廷芳和唐绍仪背后，还有袁世凯和孙中山，而孙中山的一再坚持，令伍廷芳左右为难，尤其是针对袁世凯见招拆招的应对之策，显然认识不一。伍廷芳虽然大体知道统一政府如何组织的极端重要，与孙中山的本意还存在不小差距。孙中山看出了其中的偏差，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特意致电伍廷芳转告唐绍仪，“申明巧一电之意”，即1月18日提出的对袁要约五条，明确指出：“一、清帝退位，系帝制消灭，非只虚名。二、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授权。三、袁可对中外发表政见，服从共和，以为被举之地。四、临时政府不容有两，以避竞争，今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当然统一。五、袁可被举为实任大总统，不必用临时字样。如此始得民国巩固，南北一致。”^[9]重点是防范袁由清帝授权以及另立临时政府，以确保帝制消灭和民国巩固。

伍廷芳将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正式电告袁世凯后，孙中山觉得兹事体大，当天连电伍廷芳，告以将对袁要约改为三条：

“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孙中山着重解释道：“此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在所必争，请唐告前途当计及远大，毋生异议。盖袁不得于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清统治权以自重。当清帝退位，民国临时政府当然统一南北，则外国必立时承认，此其期间甚短速。文之誓词以外国承认为条件，为民国践行此条件，立即退让，举袁为实任大总统，则文

与袁俱不招天下之反对也。”^[10]清帝退位清政府同时消灭、北方不能另立临时政府以及由民国临时政府统一南北，着着制住袁世凯的要害。

其次，致电黎元洪，通报关于清帝退位办法的交涉及其进展，以及对袁要约，并声明：“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请仍照前电准备。”黎元洪复电表示赞同。^[11]

再次，21日午后，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第一次阁议，议决大事三条，其中之一就是“和议大定，优待清皇室条件已由伍总长开去，将来清帝退位后，将请袁世凯来南京，以就此间临时政府”^[12]。据此，不准袁世凯另组政府，目的在于根本否定北方的清朝政府，而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全国统一政府，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应到南京就任。这样袁世凯与清朝的关系就会完全斩断，南京临时政府成为唯一合法的民国共和政府。

关于清帝退位，伍廷芳等人或许过于乐观。22日收到民军正式提出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电报，袁世凯即复电表示：“所称优待各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13]据此，则与清廷的交涉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更谈不上宣布退位。

不过，袁世凯或有故伎重施之意，因为不满孙中山加诸其身的种种限制，而矢口否认先前双方已经谈妥之事。以袁的一贯行事风格，涉及清帝退位的大政方针，应无可能完全撇开清廷，擅自与民党协商。实际上，21日伍廷芳就收到唐绍仪的密电力争北方政府的存废，据称：

本拟赶促进行，初三日即可发表。今孙所开四条，多与前言不符。此事关键，所最重者，在接气与不接气。如帝已退位，而孙未退，是全国只有一南京政府，袁既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又已脱去清政府所授之政权，则手下兵队听谁调度？北方秩序谁任维持？北京驻使向谁交接？所谓不接气也。且最可虑者，是时袁则有受为南京政府部下之势，北方军士必出阻力。孙电第三条云向院辞职，则院可挽留；定期解职，则期可延缓，与春一电伍致孙电即可发表让袁一语不符，与帆电孙即日解职一语不符，与第二电孙复伍电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一语不符，又与议定降旨之日孙即行解职一语不符。北方各界，谣言

阻力日益繁多，迟则大碍。总之，大劫当前，四万万只人只差三十点钟便成熙皞之民，忽接孙电四款，将今日进行次第全行紊乱，此后四万万必死一半而后已。且项城为一时人杰，岂必欲争此总统，若疑其有莽、操之志，尤不直一噓，不过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而已。^[14]

照此说法，原来满口应承的北京必不即设临时政府，变成不设临时政府又脱去清政府授权即无法掌控军队，维持秩序。而孙中山要求的由民国临时政府统一南北以及袁世凯南下就任，则因为北方军士力阻袁变成南京政府部下而绝不可行。非但如此，既然袁世凯处心积虑设计的继续掌控北方政府的举措合情合理、不得不然，为防范袁世凯阴谋的要约，变成出尔反尔的节外生枝，破坏清帝退位及南北统一的罪责反而落到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头上。

此电无意间披露出隐情，本来当天清帝宣布退位，之所以生变，是由于袁世凯不愿遵守三项要约，故意声称尚未与清廷商议，以便拖延时间，与民党进一步讨价还价。伍廷芳当即将电报转告孙中山，并另行致电孙中山、国务各总长和参议院长，报告原定发表清帝退位谕旨因故稍滞。“此难问之发生，在清帝退位后对于北方如何处置，清帝统治权已经消灭，而我临时政府事实上尚不能直接统辖北方，则北方将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据目下情形，是北方各官吏将士赞同共和，对于组织统一全国之政府宜得其同意。故廷芳以为，清帝退位，宜由袁世凯君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以两方同意组织统一全国之政府。如此，则统一政府成立之后，于内必能统一全国之秩序，于外必能得各国之承认。廷芳受议和全权代表之委任以来，往复筹商，以为惟此可期解决。”当天在场的陈其美、温宗尧、汪兆铭等对此表示赞成，并已告唐绍仪转电袁内阁。^[15]

伍廷芳等人的从权，等于落入袁世凯设下的套中。有消息称袁世凯此时得到清廷授权，与南京政府协商，以双方同意，在天津设立临时新政府。为此，袁通飭邮传部预备专车20辆，以备急用。^[16]袁世凯之所以不顾孙中山的坚决反对，始终不肯放弃另组临时政府的打算，表明此举为其通向权力顶峰的最佳途径。看到伍廷芳的公电，孙中山觉得事态严重，次日“万急”致电伍廷芳及各报馆：

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能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时举袁。嗣就后来各电观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

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故文昨电谓须俟各国承认后，始行解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若袁能实行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则文当仍践前言也。至虑北方将士与地方无人维持，不知清帝退位后，北方将士即民国将士，北方秩序亦即应由民国担任。惟一转移间，不能无一接洽之法，文意拟请袁举一声名卓著之人。交接一节，满祚已易，驻使当然与民国交涉，方为正当，其中断之词[时]甚短，固无妨也。

此外，孙中山还进而提出袁世凯断绝与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的具体条件程序：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二、同时袁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孙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孙中山并且郑重声明：“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同日，孙中山又电示伍廷芳、汪精卫：“前途若再不办到，则是有心反对。”^[17]

孙中山通电曝光秘密交涉，显然是不满于伍廷芳等人的权宜处置。同日，他还以大总统名义派秘书长胡汉民到临时参议院紧急交议上述程序条件，当日由出席会议的20位临时参议员议决通过。

如果说伍廷芳以唐绍仪为谈判对手大体势均力敌，与袁世凯相比就稍逊一筹，在防范袁方面，他有些掉以轻心，对于孙中山采取的制袁措施则有些不以为然。他虽然将五条办法转达，却视要约及办法为临时加码，认为不如催袁速使清帝退位，以为与清政府断绝的实证。清帝退位后，袁同时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如此则尊处践约推袁。而关于组织统一全国之政府，必须彼此协商，出于两方之同意，则第五条所定，亦已包括于其中，似此则在我无食言之嫌，而前后交涉皆持一贯之方针，庶易就绪。否则所开条件，逐日变易，使廷亦茫无所措，而前后不符，受人疑驳，更无以取信于天下。恳请尊处筹一定之办法，始终坚持，不可随时更变。”言下之意，袁世凯的精心算计情有可原，孙中山的针锋相对倒成了随时变易。

对于清帝退位后统一共和政府的组织程序安排，伍廷芳始终未能领会其至关重要。他以为：“总之，若清帝退位，全国有统一之共和政府，则我辈目的已达。总统如何选举，国务总长如何委任，似皆容

易商量。若以此复起战争，使天下流血，岂国民之福？”^[18]可是，如果南北共组统一政府，等于承认袁世凯主持的政府与临时政府处于对等地位。如此一来，中华民国统一政府与清朝的关系就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了。

唯恐孙中山不为其言所动，22日，伍廷芳再度致电，以唐绍仪的辩解为前提，反而责怪孙中山言而无信，他说：

迨清帝退位之诏已定于初三日发布，而尊处巧电忽添入五条件，与前电不符，使廷失信，处两难之势。而袁意倘各国未能即时承认民国，斯时北方诸省清帝统治权既已消灭，南方临时政府事实上又不能统一，便成无政府之状态，何以维持秩序，对付外人。以此之故，所筹之事，一时停滞进行。廷意凡议和必得两方之同意始为公平。故马电谓清帝退位之后，由袁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以两方之同意组织临时政府，大总统已有推袁之说，则国务各总长亦必以两方同意，始得发表。廷以为舍此办法无以解决目前难题。如尊处承认此办法，则大局可定，似无须告北方另派正式代表以续和议。廷对于此事心力已尽，自维受事以来，夙夜尽瘁，寝食不安，只为欲完全达到共和目的，不期于将近成局之时，又生此波折，进退维谷，不知所可。如马电所陈办法不以为然，则此后变故滋生益难逆料，惟有请另派贤能接议和全权代表之责，俾廷得奉身而退，以免愆尤。^[19]

对于袁世凯务必由南北政府共组民国新政权的心思及其潜在危险，伍廷芳似乎毫无察觉，反而认为理所当然，甚至不惜以去就相争，逼迫孙中山维持原议，放弃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次日孙中山复电，请伍廷芳正式通知袁世凯，清帝退位的五项条件“经参议院之同意，于马电所陈协商办法，并无窒碍”。而唐绍仪所说清帝退位以后政府组织之事，关系根本大局，必须认真追究。“盖推袁一事，始终出于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及见袁转唐有取消民国临时政府之电，此事于理绝对不行，要求其一不能摇动民国前途之保证，故有巧电，只保[系]手续稍异，并无有变初衷。继见来马电以各国承认时期为不能待，有袁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组织临时政府之说，则袁要有赞同民国之表示，以离去满州政府之关系，彼此始有协商之地。”孙中山一面说明势所必争之理，一面则解释前后一致之情，希望伍廷芳以民国前途为重，坚持到底，继续担任全权代表。

^[20]

挽留伍廷芳意在避免功亏一篑，可是对其关键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孙中山仍然十分担忧，他特意致函《字林西报》，发表书面谈话，说明自己力排众议，坚持让位举袁，而在磋商最后办法之时，袁世凯忽然电称“南京临时政府应于清帝退位后二日内即行取消”，“吾人以袁氏前既有可疑之状，今又有此举，莫不为之惊讶，决定不允照准。……余辈所不欲者，惟袁氏不承认吾人所立之临时政府，及不照吾人所定办法，任意私举代表而已。”只要袁氏或列强承认民国，即举袁充大总统。如袁氏不欲俟列强承认，则孙中山亲往北京，或袁世凯来南京亦可，以磋商最后办法。^[21]

连民军和谈总代表伍廷芳以及陈其美、汪精卫等人都不能清醒认识的问题，社会各方更加难以把握，孙中山的坚持引发不少揣测传闻。1月24日下午，《大陆报》记者晋谒孙中山，谈及该报所载“中国政局之要略”，孙中山深以记者误解为憾，表示：

余自抵国后，对于和议，常望袁世凯归从民军，而以总统推让之。此心此志，至今未尝稍渝。余既与袁氏约，袁氏即劝令满人逊位，后由唐绍仪交来电音，承认吾人之条款，并请南京临时政府于清帝逊位后两日内解散，以免两临时政府互起冲突，惟此举吾人不能不反对之。盖将失去中央权力所治之各省也。且临时政府早向袁世凯明白声明，满人当赞成共和而逊位，非赞成袁世凯而逊位，则余始退任。袁如实行共和政体，则余亦退让之。若袁世凯仍为满人效力，则余未便轻让。……须知共和政府为国民军各将士所造成，流几许热血，费多少金钱，始购得此共和两字，其价值之大，殆可想见。故余实无权可以贸然授与，而不得不要求实行之保证。^[22]

这番话基本抓住了症结所在，孙中山坚持清帝逊位必须是赞成共和而非赞成袁世凯，重要理据就是清帝逊位给袁，即为私相授受，赞成共和，则是交权让位给南京临时政府，再由后者让位给袁。如此，就能够斩断袁世凯与清朝的继替关系，使得中华民国统一政府的法统绝不由清廷禅让而来。

1月27日，孙中山又致电各国驻华公使，通告和议出现反复的原因，矛头直指袁世凯：

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欲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若愿尽力共和，则今日仍愿相让。当袁氏闻民国愿举

为总统之消息后，即一变其保清之态度，而力主清帝退位，至前此所议之国民大会一节，亦复尽行抹却。既而知民国必欲其实行赞成共和，而决不肯贸然相让，堕其诡计，则袁氏又复变态矣。盖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也。^[23]

如果说促使清帝退位第一阶段的主要障碍是皇室与皇族赞同与否，第二阶段则是围绕退位后统一政府的组织，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展开博弈。居间的民军和谈代表，对于袁世凯的招数和孙中山的对策始终不得要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帮了倒忙。

注释

[1] 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11—112页。溥伟将此事系于1月17日，据《中国革命记》连载的《议和记》，应在1月19日。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9页。初二即1月20日。

[3] 《组织临时政府之地址》，《顺天时报》1912年1月24日，第7版，“时事要闻”；《清廷退位问题》，《民立报》1912年1月29日，第4页，“新闻一”。

[4]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7页。

[5] 《致伍廷芳电二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6页。

[6]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78—79页。

[7] 《致孙文、黄兴电》，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第445—446页。

[8]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79—80页。

[9] 《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0页。编者注释此件所标时间系电报收到日期，发出当为1月19日。

[10]《复伍廷芳电二件》1912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0—31页。

[11]易国幹、宗彝、陈邦镇辑：《黎副总统政书》卷五，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年，第5页。

[12]《记新政府第一次阁议》，《申报》1912年1月25日，第3版，“要闻”。

[13]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2页。

[14]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2—83页。

[15]《致孙文、国务各总长、参议院长电》，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0—451页。

[16]《清廷退位问题》，《民立报》1912年1月29日，第4页，“新闻一”。

[17]《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电》1912年1月22日、《致伍廷芳汪精卫电》1912年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35页。

[18]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9页。

[19]《复孙文电》1912年1月22日，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2—453页。

[20]《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7—38页。

[21]《致〈字林西报〉等书面谈话》1912年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1页。据编者注释，所标时间系《民立报》发表日期。

[22] 《孙总统之言论》，《申报》1912年1月27日，第3版，“要闻”。

[23] 《西报记和议中梗之原因》，《时事新报》1912年1月29日，第1张第1版，“特别记事”。

二 再以国民会议障眼

正当南北双方因为清帝退位后统一政府的组织争执不下的敏感时刻，天津《民意报》刊登了1月18日伍廷芳致黎元洪、各省军政长官及本报的公电，社会因而得知：“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议有头绪，大约再过数日即可决定。届时如再失信，必为天下所不容。”^[1]尽管此前南北各报关于清帝退位的消息早已沸沸扬扬，可是并无确据，如今当事一方披露密谋，引起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原来暗中进行的奕劻、袁世凯等人不得不暂时搁置。“初三日奕劻、溥伟至内阁公署，面询袁世凯以政见，如决意主张共和，即请宣示，吾辈当奏请两宫逊位，以便早定大局。袁谓此等大事，不敢擅决，且民军虽暂承认停战，然此期要求之各件，异常坚执，两方意见，极费调停。此等重任，万难独负。仍请两宫与亲贵商酌妥善，再定办法。”^[2]

密谋的曝光也打破了帝位去留话题的禁忌，被迫提上议程。22日，清廷举行御前会议，满蒙王公均集，不限近支，惟奕劻、载洵、溥伦未至。7时后入内召对。“清皇太后之意，以从速决定为要。盖不欲久延不决，以废时日。善耆、载泽、载涛、载沣坚抱君主立宪主义，而溥伟持之尤力，并言袁世凯辞职，我辈当另组织政府，依据开临时国会办法，在北京开会，主持君主立宪，此外不能承认。否则即与民军决战。各王公赞成之，但以奕劻既在假期，又系亲贵领袖，必须就商以决定办法。遂公议俟协商后议决。”据说会议时，“首由溥伟痛陈利害，至数万言，末言今日时局糜烂，为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惟一条生路，止君主立宪而已。臣等宁决死殉国，岂愿一日偷安。次由各王公群起，参劾奕劻，并数其历年误国之罪，皆谓此次奕劻主张共和，实系个人私图，计在盗卖社稷。旋有某亲贵奏言：奕劻诸人，已承认皇室经费四百万，皇帝迁居颐和园。清太后大怒，询溥伟果有此事否。此事关系甚大，即使承认共和，亦应将条件商议明白，乃能成议，何贸然乃尔。况此时并未承认共和云云。诸王公唯唯而已”。

否定共和，就意味着重启战端，对此王公亲贵意见不一。而无论战和，袁世凯都是关键人物。“反对共和者，诸王之外，以载泽为最

力。其对清后云：袁世凯言库款支绌，军饷不足，不能开战，于是设种种名目，如爱国公债，如短期公债，勒捐亲贵大臣，现已筹有一千余万。钱既到手，因何不战云云。载沣闻之，乃谆嘱世续、徐世昌，谓如有宣布共和谕旨，不得大家同意，万不能钤盖御宝。”主和派以溥伦为代表，“言词极为痛切，略谓我族再主中夏，固已无望，即国民会议，于我亦决无利益。袁世凯虽力欲保持君主，而势孤党弱，譬之片石当冲，众流澎湃，何能有济乎？目下和议虽未决裂，而南京已组织政府，北伐之声，日益加厉，四路已有民军踪迹。袁世凯虽防御甚坚，设有疏虞，噬脐已晚。与其待兵临城下，服从武力，何若先自逊让，尚可稍留爱蒂。优待皇室之说，系由民军商请，公论在人，决不中变，即民军欺我满人，亦决不能欺袁世凯。我满人恃有袁世凯，可不必深虑也”。袁为中外各方众望所归，只是“理学气太重，日来辞职之意甚坚，吾人当劝其不可拘泥，只求能保全中国，不独吾满人之幸也”。

争论结果，对于溥伦所说众无异议，而奕劻尤为赞同。“亲贵既退，国务大臣入对，首由胡维[惟]德叩询各王公意见。清太后曰：彼辈亦无成见，但望汝等善为办理。各大臣合词曰：此次组织临时政府，实为不得已之举。但临时政府组成，仍须召集临时国会，乃能决定政体问题。今日究应如何取决，则非臣下所敢妄议。惟若战端再启，兵不敷用，饷亦无着，是为难耳。清太后沉吟久之曰：现在仍以速召国民会议为正当办法，仍望汝等善为办理。”^[3]为了防止退位密谋曝光引发的风波事态扩大，由国务大臣胡惟德等面传懿旨，仍按召集国会与革军接议。组织临时政府之议被搁置，退位之议也暂停，重新回到召开国民会议的老路。

对此结果，君主党仍然心有不甘，他们加紧活动，力图进一步扭转局势。蒙古王公在京组织联合会，1月23日开成立大会，议决赞成君主立宪，举定亲王那彦图为会长，并致函内阁，质问和议情形。声称如赞成共和，蒙古将为库伦之续，全蒙解体。24、25日，清廷连续召开御前会议，“王公大臣中之反对共和者，以载泽、溥伦[伟]为最，铁良又暗中运动，拟俟袁世凯内阁解散，将以赵尔巽为总理，铁良主持军务，荫昌督兵赴战，欲以兵力解决之。更有主张借用外兵以平民军者。”^[4]

在亲贵反对共和之声暴涨的情势下，溥伟、荫昌找到袁世凯，质问其近日计划。“荫昌谓南军全恃虚骄之气，其实力究不如北军，与

之决战，可期必胜。君何专以礼让为事，老师糜饷，徒延岁月。今北方军队已跃跃欲试，望君主持。溥伟谓君前此不欲主战，藉词饷项无着。今已领发内帑及王公捐款爱国公债，已近千万，可支持数月矣。和议决无可望，逊位之举，万不可行。民军处处违约进兵，若不速筹战备，必为和议所误。”面对溥伟等人的催逼，袁世凯知道其不过是虚张声势，“谓公等卓见甚佩，但余才力薄弱，不能负此重任，请自为之”。^[5]实权在握的袁世凯，撂挑子就是对付亲贵最有效的方式。

此时北方政坛暗潮汹涌，一方面，吴宗濂（驻意）、汪大燮（驻日）等驻外使节继续要求清帝交权让位；另一方面，反对逊位乃至武力勤王的嚣声突起，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致电清内阁，“传闻朝廷将有逊位之举，大臣有赞成共和之说，可惊可怪，莫此为甚”。声称国家不可一日无君，请内阁明确表态，以释群疑而靖谣言，同时自行组织勤王军队，预备开拔。^[6]

乱局之中，袁世凯在京城压力骤增，这让本来不满于孙中山寸步不让的他有所借口。接到懿旨，袁世凯即致电伍廷芳，重提由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希望尽快商定选举及开会办法。接着又回复伍廷芳复电，“所称优待各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7]。等于矢口否认暗中进行的退位密谋。

24日，袁世凯通电清军将领，坚决否认《民意报》所载伍廷芳关于秘密磋商清帝退位的电报：“查讨论大局，自唐代表辞退后，由本大臣与伍代表直接电商，往来各电，均经登报，众所共见。且国体须由国会公决，系遵懿旨办理，为国民所公认，本大臣岂容有与伍秘密磋商之事。诚恐军民因见伍电致滋疑讶，希切实晓谕，勿得轻听浮言，以免摇惑而维秩序。”同日，又致电东三省各督抚，否认东北陆防全体军人来电的指控，“至逊位、赞成之说，概系谣传，万勿听信”。希望所组织的勤王军迅速开拔，进援徐、颍两州。^[8]

次日，清方发生了三件与清帝退位关系密切的事情。其一，清廷谕旨：国会办法正在磋商，凡我臣民尤不容妄启谣疑。着内阁告诫军民，勿得听信浮言，转相煽惑，以维秩序。^[9]这是针对清帝退位消息公开所引起的政坛风波而发，目的是平息事态。其二，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电内阁，声称将领要求共和，听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愤愤不平，要求联衔代奏，否则暴动。^[10]这是配合袁世凯继续逼宫，促使清帝退位。其三，袁世凯奏请修改国会选举办法，指民军所拟优待

皇室条件，系两面派人暗中商议，前曾代请面奏，如改为国会取决国体，则优待皇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议定。^[11]这是做出在清帝退位一事上反悔的姿态，以便与民党讨价还价。是日清廷御前会议，“满蒙王公咸集，突劄以南京所开五条件，已得参议院同意，绝不更动，故亦销假赴会”^[12]。

清方翻云覆雨引起政坛波谲云诡，使得局势陡然紧张起来，社会上出现了种种流言蜚语，其中之一，就是将风云突变的原因归咎于孙中山未能信守承诺，导致清帝退位无法如期实现。25日，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特别大会，磋商政策，对于和议及孙中山自愿辞职，以总统推袁世凯一节，陈说如下：

（一）和议所辩论者，系政体之为君主抑为民主，须付国会议决。（二）孙君未任总统以前，并未订有条款规约，而后任职。（三）孙君辞职，并请人民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出自己意，民党未有提及，继经孙君再三劝导，始得公认，庶几国事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四）孙君请袁世凯为总统时，订明袁须依附民军，并须由袁世凯自行声明，附合民军，中国人民始能举之为总统。（五）前致满洲亲王条件，仍旧遵行。倘袁允洽以上条件，则举袁为总统，亦照遵行。（六）孙君政策，前后一辙。孙君亟欲早日谋致和平及全国人民幸福，并无丝毫推广自己声势之意。（七）近来讹传淆惑听闻，是非民军公敌，即民军中之奸宄，故意倾败大事，在会职员，心甚忧之。^[13]

显而易见，此会旨在澄清真相，为孙中山解困，向袁世凯施压。

至此，伍廷芳终于明白袁世凯是重续前议，可是却不知事为何来，忽然要从进展顺利的清帝退位跳回已成死结的国民会议，所以25日他回复道：“国民会议选举法，前与唐代表议定，惟开会地点及日期，与阁下电商未决。此乃十余日以前之事，迩来所切实筹商者，为清帝退位办法，立候解决。何乃忽提过去之事，实所不解。祈开诚布公，速将清帝退位问题解决，以慰天下之望。”^[14]在浑身是眼的袁世凯面前，伍廷芳不免显得有些木讷。

袁世凯的回复虽然承认曾与民军磋商优待皇室条件，并代请面奏，仍矢口否认双方商议过清帝退位事宜。^[15]对于袁世凯坚持不认，伍廷芳还是大惑不解，于26日复电声明，国民会议之事系袁世凯撤回代表，并欲消灭已经签定的条款，“中外人士皆虑和议之终无结

果。旋因清帝有退位之议，故复筹商退位办法。此事中外皆知，岂能掩饰？况优待清帝及满蒙回藏人条款，于唐代表未辞职以前，在会场交付，其后复由本代表直电尊处”。请袁世凯于1月29日再次停战期满前，“迅将清帝退位，确实宣布，以期和平解决。若清廷仍以争一君位之故，流全国之血，则咎有所在，非民军之责”。次日，伍廷芳又复电指责袁取消全权代表签定的条款于前，更定选举法于后，声言所开优待条件，系为清廷宣布共和之对待。若届时仍未宣布，则全行作废。^[16]

不过，这一次袁世凯的反复，确是因为北方亲贵和将领鼓动风潮，反对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袁世凯担心局势失控，所以故意予以否认，并做出继续谈判国民会议的姿态。26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转唐绍仪，告以“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希望所拟电稿“但求实际，不必字字咬实也”，并称北军将领均来电请共和，勿以停战期限相逼。又密电孙中山，表明自己“现逼处嫌疑之地，倘和议仍不能成，即决意引退，决不愿见大局之糜烂。惟各君主党意见愤激，急而走险，如借用外兵等危险之举，恐难免于实行。应请互相迁就，以维大局”。^[17]还通过唐绍仪复电孙中山，剖明心迹：“鄙人衰病侵寻，敢冀非分。区区此心，可质天日。所望国利民福，免资渔利，斯愿足矣。祈公亮[谅]之。”^[18]

在袁世凯等人的策动下，其属下将领动作频频，作势兵谏。25日，伍廷芳电告黎元洪：“日前唐使绍仪致电段君祺瑞，劝其赞成共和，讽令清帝退位。昨接段回电云，比因政体由内会议，自应静候解决，乃至今尚未定议，顷已电阁府部，痛陈利害，并联合各军奏议俯顺輿情云云。段能如此，洵明大义。尊处速派心腹代表与之接洽，并劝其速电清廷，谓停战期将满，我辈断不忍南北自相残杀，应请清帝速行退位，否则统兵入京。如此，则清廷退位之事，必不敢迟延不决，以误时日。”^[19]黎元洪认为清廷显系不愿共和，电告孙中山、伍廷芳，若停战期满，清帝仍未决定退位，不能再度展期，此前所提优待条件，一律取消。^[20]

果然，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7人于26日联衔电奏，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不必等待国会公决，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暂时代表政府进行交涉，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与此同时，山西巡抚张锡銓等北方督抚也联衔致电内阁，以召开

国会已无可待，请代奏十条要求，首先就是恭请皇太后、皇上临幸颐和园，或北狩热河，下诏南北罢兵，速组共和政体；派全权大臣与伍廷芳内在天津速组临时统一政府，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

不无巧合，同样在26日，杨度、薛大可、王赓、蹇念益、籍忠寅等在北京组织共和促进会，其宣言书称：“欲求中国之保全，先求南北之统一，欲求南北之统一，先求北方之实行共和。近者朝廷有逊位之说，尧舜盛德，薄海同钦。乃亲贵王公及顽固之徒，忽大张君主立宪之帜，破坏阻挠，不遗余力。”^[21]“并闻各亲贵与君主党甚疑与某有密切之关系，盖因其宣言书与某之议论相同，且杨度又为某素所最信任之人也。”^[22]所谓信任杨度之人，就是袁世凯，因而此事可以视为袁世凯向南方公开释放的信号。

27日，袁世凯复电伍廷芳，依然口口声声要求请就变通选举条件及开会地点作复，不敢置议退位之事，并说：“现时外人所以承认我国者，实因朝廷尚在也。今政体未决，此间若即逊位，恐外人将否认我国，势必联袂干涉。故此间先行逊位一节，万难遵办。仍是先开国会，俟政体解决后，再议逊位，为最适当之办法。”^[23]如此再三否认退位密议，是否真的只是为了塞住拥帝势力的悠悠之口，不能不引起民军方面的警觉。

鉴于事态再陷僵局，相关各方紧急磋商，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当日孙中山电示伍廷芳，和局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参议院尤极愤激，誓以同心共去共和之障碍。清方撤销唐绍仪、不认全权已签之国民会议选举法及提出清帝退位之议、正式公文通告的优待条件和各项办法又复不认，“再三反复，知清廷实无心于平和”。此番开战，其曲在彼之真相，请伍廷芳正式对内对外发表。^[24]

接到孙中山的电报，伍廷芳提出，段祺瑞等北洋将校已联名奏请共和，而袁内阁来电，据唐绍仪说皆系表面文字，“其实袁运动清帝退位未尝少辍”。昨已电告袁，若停战期满，未得清帝退位确报，优待条件全行作废，须等待其复电。如仍无使清帝退位之意，再行发表所有真相。如此，则清廷争君位不惜流全国之血，必为人道所不容，民国政府希望和平之善意更加昭著于天下，对外可得友邦之同情，对内可激同胞之义愤，更为妥当。^[25]同日伍廷芳复电袁世凯，指“更

定选举法直是翻悔”，再度声明，停战到期之前，若仍然未得清廷宣布共和确报，则优待条件全行作废。^[26]

孙中山并未接受伍廷芳的建议，27日当天就致电各国公使，公开指责袁世凯关于清帝退位和国民大会之事反复无常。28日，又特电伍廷芳，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的罪状：

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到共和之目的。不意袁世凯始则取消唐绍怡之全权代表，继又不承认唐绍怡于正式会议时所签允之选举国民会议以议决国体之法。复于清帝退位问题，业经彼此往返电商多日，忽然电称并未与伍代表商及等语。似此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况民国既许以最优之礼对待清帝及清皇室，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启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27]

是电将袁世凯作为破坏和议的罪魁祸首，连清帝不能逊让的罪责也要让其概括承受。

26日夜半，京城发生行刺大案，军谘使良弼被炸成重伤，数日后身亡，这为打破僵局平添变数。良弼是宗社党骨干，本来坚决反对清帝退位，可是恽毓鼎次日得到的消息却是“暗杀者为君主党中人，奉天人。良弼近日力主共和逊位之议，故遭此一击，惜乎不死也”^[28]。

据胡惟德言：当天接到段祺瑞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电报，内阁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袁世凯出示来电，“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其时备有赞成不赞成两单，军谘使良弼（弼），素为人所注目，至此，言现在除共和无别路，即在赞成单内签名”^[29]。另据1月25日段祺瑞致清内阁电，阻挠共和者为恭王、泽公，并不包括良弼。

^[30]莫理循也说：“我相信袁的每一个将军，甚至一些满人，如良弼，都反对保留清朝。”^[31]行刺者后来证实是革命党人，之所以将良弼作为暗杀对象，很可能与袁世凯故意散布消息说各王公反对共和系良弼一人运动所致有关。而袁如此做法，目的就是要借他人之手铲除劲敌。^[32]

良弼被炸身亡，引起拥清势力的变化。28日，蒙古王公及恭、肃、礼、豫、洵、朗、泽、荫等君主党在西安门外西安茶园开会密

议。此前满人设立君主立宪维持会暨君主同志会，反对共和，宗社党为其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机关。其首领铁良运动满蒙王公，在京谋借外兵，赵尔巽在奉天附和，招募勤王队，自请入卫。宗社党召令来京，行至丰台，要求铁路运载。良弼被炸后，铁良畏祸逃走，宗社党势衰，机关遂移至奉天。

拥清一派失势，和战的天平随之倾斜。29日御前会议，清太后先后召见满蒙亲贵王公、各统兵大员以及国务大臣，垂询和战办法。袁世凯、奕劻未到，国务大臣奏称：现在办事，不外和战二者，和战问题，所关太大，非臣下所敢擅决，还请太后宸断。且太后并未垂帘，从前国事办坏之处，断不能归咎于太后。各国改建共和，皆由人民流血强迫。若太后不待人民流血之强迫，即能俯从民欲，则将来国民必感激太后，而太后之名誉亦万世不朽。旋奉清太后谕，明日召集奕劻、载沣商议，即决定办法。次日，清太后召集各国务大臣商议退位事，未决，须另日再议。^[33]

注释

[1]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22页。

[2]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2页。

[3] 《议和记·清廷初四日之御前会议》，《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3—16页。

[4] 《议和记·清廷初六日之御前会议》，《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9—20页。

[5] 《议和记·各方面之反对共和》，《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9页。

[6]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四日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0页。

[7]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2页。

[8]《致北方各军队电》《内阁等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83页。

[9]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1—172页。

[10]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2页。

[11]《袁世凯关于办理国会选举暨开会地点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58页。

[12]《议和记·清廷初七日之御前会议》，《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3页。

[13]《议和记·南京政府之会议》，《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3—4页。

[14]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4—85页。

[15]《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并附录》《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86—387页。

[16]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6—87页。

[17]《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转唐绍仪电》《致临时大总统孙文密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93—394页。

[18]《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10页。

[19]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126页。

[20]《武昌来电》，《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第10页，“电报”，1912年1月29日。

[21]《共和促进会之进行》，《申报》1912年2月5日，第3版，“要闻”。

[22]《共和促进会之内容》，《大公报》1912年1月29日，第5版，“要闻”。

[23]《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402页。

[24]《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页。

[25]《致孙文电》1912年1月28日，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9—460页。

[26]《复袁世凯电》1912年1月27日，丁俊贤、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7页。

[2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第23—24页。此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据《总理全书》之九《电文》收录，署期1912年1月29日。《近代稗海》编者据《时事新报》校改的个别文字，或不如原文准确，今从《孙中山全集》校订。

[28]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3页。

[29]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309页。

[30]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2页。

[31]《致达·狄·布拉姆函》1911年11月21日，[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第796页。

[32]据《朱芾煌日记》，炸刺良弼等人，系其结客谋划，目的在于为袁世凯扫除障碍，实现南北统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188页。

[33]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18—19、27—28、32页。

三 回归原轨

局势很快出现戏剧性变化。29日，孙中山致电清军将领，抨击的矛头由袁世凯转而指向少数皇族，声称：“近与袁内阁切商清帝退位办法，已有成言，而为满洲少数皇族所把持挟制，遂令内阁为难，陷于危困。南北本是一家，岂肯为彼少数人之私而流血。”希望各将领与段祺瑞等一致奏请共和。这与前一日致伍廷芳电以袁世凯为首恶的口径大相径庭。张怀芝复电认可联衔奏请共和，却指责民党扰乱地方，要留君之口，化除满汉，留袁之手，剿平扰乱。^[1]

次日，伍廷芳公电孙中山及军政各方，通报议和缘起、过程和近况，表明双方经过沟通，已澄清误会，重回原轨。31日，南京总统府秘书处又出面更正孙中山宣布袁氏罪状的特电。清内阁外务部随即发布文告，宣称：“外间所传内阁总理与孙逸仙之交涉，并非由内阁总理直接办理，亦未由其承认。凡可以臻和平解决之条件，内阁总理固无不乐于从命。惟内阁总理从未尝抱欲任总统之奢愿，而其政策，不过欲维持国家之完全，确定巩固之政体，以期联合南北，恢复和平而已。此次孙逸仙之宣言，殆其秘书员误会内阁总理之政策。”^[2]让下属背锅，为政坛暗箱操作变生不测时惯用的手法，所以识者指出：“然不能遂认为无来历也。”^[3]

张国淦称，30日清廷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进止。原来历次会议时，贝子溥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王奕劻附和，皇太后抱皇帝大哭，醇王载沣无言，恭王溥伟和载泽反对甚力，无结果。后奕劻、溥伦被宗社党挟持，或出尔反尔，或避而不至。良弼被炸身亡后，宗室王公人人自危，是日会议亲贵即无持反对论者。其后宣布共和，乃皇太后一人主持。^[4]《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据此称是日由隆裕太后决定退位，似言之过早。清制本来没有所谓御前会议，此为媒体坊间附会日本之说，此次近支王公会议所定事项，应是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酌优待条件。这意味着清廷准备接受退位，而非确定退位。

不过，张国淦所言当为31日御前会议的事。据《议和记》，是日清太后先召国务大臣入内，谕云：“予于君主民主两端，本无成见，

故已屡次召集卿等详究利害。惟默观大势，固已趋向共和，殊难挽回。卿等有何意见，不妨详陈。时势已迫，今日应即将政体解决。”旋由国务大臣胡惟德奏道：“人心已去，固无庸讳。北军全体趋向共和，是最近之铁证。且民军曾允特别优待皇室，若乘此机会，俯顺輿情，且可得禅让之美名。风云日紧，故敢冒犯直陈，惟乞宸断。”清太后点首，似以为善。退出后，复召见袁世凯，谕以速与民军商酌退位后之各项条件，俾得将共和诏旨，早日宣布。是日各亲贵中，奕劻仍赞成共和，载沣亦颺之。载泽、溥伟等初犹持异议，继由奕劻详言北军解体之关系，及满族主战之无把握。清太后泣，载沣亦泣，溥伟等乃不敢持主战之说。然又闻某亲贵与蒙古王公密议，请清太后清帝暂住热河，决计宣战。当奉清太后面谕：“此事须有把握，不可徒逞意见。现在前敌诸军，趋向共和，必不能战。不幸溃败，更难收拾。但可永保宗社，于愿已足。”

接着王公大臣至内阁与袁世凯会议国体问题，提出五项要求：一、用中国年号；二、大皇帝仍驻紫禁城；三、满人有被选及选举大总统之资格；四、由共和政府岁给大皇帝俸一千万两；五、八旗俸饷不裁，以筹出正当生计为度。某王又探询袁世凯宗旨，答称：“某之宗旨，在消弭战祸，保全和局，采取多数輿论，决定完全政体。无论如何为难，必勉为之，以期达到目的。若有无意识者，无知妄作，置大局于不顾，则非表同情，决计辞职。”某王默然。

次日续开御前会议，清太后表示对于国体问题，绝不固执私见，拟定采用虚君共和政体，筹商宣布召集国会，公举大总统，并先行颁布君主不干预国政之谕旨。此后一切政事，皆由大总统主持。惟王公世爵旗民人等及各路军队各部衙门善后办法，必俟双方认可，方能发表。连日张勋败耗至京，民军北伐之势愈急，亲贵乃知大局不可维持，主张共和者遂占优势。

2月2日再开御前会议，讨论国体，清太后主张平和，谓凡事由余一人担承，尔王公等反复推求，迁延不定，疑议繁生，将来必演出同室操戈涂炭生灵之惨剧，辞意甚厉。并云此后我自主持，无须集议。奕劻等人唯唯而退。报纸的跟踪报道称：

自御前会议以来，政体问题确已解决，清太后颇有见解，不为群说所动。惟宣布明谕，非得亲贵同意不可，连日召见王公，皆由于此。至亲贵于御前会议时主战之说，全由铁良、载泽主动。铁良向持排汉主义，此次江宁兵败宵遁，欲洗其失守之罪，乃向亲贵宣言，谓

江宁失守，实由袁世凯拥兵不救之故。并谓清兵既克汉阳，英人遽出而调停，亦因袁世凯与民军暗相约定，欲以和议阻碍清军进行，使南京得从容组织临时政府，其居心实不可问云云。于是亲贵颇疑袁。良又诒冯国璋曰：蒙古诸王公各愿回蒙练兵，以备勤王，可用为恢复之后劲，大功不难成也。国璋亦为所动，故力持主战之说。良见其计行，遂于御前会议时，力主开战。其实王公主战者，不过溥伟、载泽二人，余皆无一定宗旨。蒙古王公亦不认有练兵之说。二人既退，私谋借兵日本，并仿庚子义和团办法，调赵尔巽带关外马贼入京，先杀汉人，后攻民军，以破釜沉舟之力，保存满洲君主，非达到目的不止云。^[5]

尽管皇族内部意见尖锐对立，形势已经刻不容缓。次日，隆裕太后下旨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6]由此可见，此前确有可能袁世凯只与个别清室要员密商清帝退位事宜，尚未进入正式与皇室皇族共商的阶段，而所通报的情况令民党方面产生误解。当天伍廷芳接到唐绍仪送来的北京电，转电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袁世凯得到清廷授权，可以公开与民军洽谈清帝退位及优待条件。^[7]

同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正式提出以南方所拟为本、与各方面协商修订的优礼皇室条件，分为大清皇帝优礼、皇族待遇以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三部分。^[8]北洋系将领积极配合，4日，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张勋等64人致电伍廷芳，表示北方军界现多主张共和国体，“朝廷若以政权公诸国民，为数千年来未有之盛德，凡我臣民自应欢迎感戴，以尽报答之微忱。我军界同人协同北方各界人商议优待各条件，务请贵代表照此承认，庶可望从此戢祸息兵，得以和平解决，免至兵连祸结，横生分裂之惨”。具体开列的条件与袁世凯的完全一样。^[9]北方军人干政，对清廷和民国都造成巨大压力。

注意到局势的变化，当天孙中山、黄兴联名致电伍廷芳，明确表示：“现在南北各军同赞共和，原无再起战争之理。惟清帝尚未退位，袁内阁主张共和，为二三顽迷者所钳制，是以民军急图北上，速定大局。清廷意欲停战，惟有早日退位，否则迁延不决，徒滋祸害，恐惹起种种难题，民军岂能终止进行？顷已通电张勋、倪嗣冲、朱家宝、升允征求意见，如果赞成共和，彼此自系友军，自应联兵北上，共逼清帝退位，早图底定；若以言词表赞成，而于事实为抵抗，无论是否误会民军宗旨，而在民军方面不能不认为反对共和之仇敌，将于

天下共同公诛之。”也就是说，清军应与民军联手，南北合力直入北京，以实力定大局，“不合此宗旨者即为共和障碍物，民军不能不竭力排除之，既非挑战即无所谓停战也”。^[10]

是电显示，孙中山等人已将矛头转向清廷和拥清势力，希望袁世凯和清军将领与民军合作，共同逼迫清帝退位，实现共和，从而避免重启战端。否则民军将挥师北伐，扫除一切障碍。同日，伍廷芳致电孙中山，告以袁内阁正式交来优待条件，当日午后二时，偕唐绍仪、汪兆铭坐专车来宁，面商一切。2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审查伍廷芳、汪精卫、胡汉民等报告袁世凯所提优礼条件，对于原案多所修正。表决通过后，即电达袁世凯。

次日，伍廷芳复电袁世凯，告以因来电所开优待条款较南方提出的改动甚多，深虑各省不能通过，故特与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商酌，加以改定。由于已得临时政府之同意及参议院之议决，断难更改。主要改动是清楚写明因清帝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退位之后，给予优待。南京方面的立场十分清楚，优待是对清廷交权让位的回报，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北洋系将领再度配合袁世凯的意图，2月5日，段祺瑞等九人联衔电请代奏：“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11]矛头直指皇族。6日，伍廷芳复电冯国璋等，告以优待条件的交涉修订情况：“查此次修正案与袁内阁所提出者大旨相同，较之本代表前所提出者更为优渥。惟坚持者，在清帝实行逊位。盖必如是，然后共和国体乃完全成立。否则，有类于虚君位之嫌，故独于此始终坚持。要之，全国人民为共和而流之血，前后积聚，可成江河，万不能含糊了事，以貽后祸。”^[12]既指出双方达成的共识，又表明民军所必争的关键。

同日，“清太后召见近支王公、国务大臣，咨询优待条件事宜，并决定发表日期。惟应召者人数甚少，多无成见。清太后对于此次条件，颇为满意。载沣亦无异言。仅有某王对于皇室经费一层，持之甚坚，谓分文不能短少。又谓其余条件，亦应酌为增益。清太后谓此项条件乃自我提出，此时已无可更动之理，况亦无可更动之处。某乃无言。遂议定再召奕劻诸人妥商一切”。

接着举行内阁会议，袁世凯向到会的近支及蒙古王公、统兵大员、各部大臣传阅段祺瑞指王公破坏大局的来电。溥伟愤然曰：“段祺瑞此电近于胁迫。本爵等前因朝廷既愿让出政权，不敢再事反对，故已先后署名，表示认可，何竟指王公为败类。”言时声色俱厉。幸袁世凯极力劝止。蒙古王公等亦谓：“某等对于君主民主，并无成见，但须双方和平了结，则为我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退位，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最后袁世凯声言：“诸公政见甚是，如此则和局不难有成。诸王公既已俯顺舆论，允认共和，想退政谕旨，不日可下。惟现时最称紧要者，即系段军统率兵来京一事，如任其来，则两相猜疑，局面不免扰乱。拟即阻之。然须将各王公赞成共和意见表明，诸公以为如何。”众称是。于是拟长电一道，由袁世凯领衔，王公大臣依次署名，当时发出，遂散议。当日袁世凯以南京参议院议决优待条件入宫与清太后商议良久。段祺瑞亦至京往见袁世凯，密商布置退位事宜。

7日，清廷再开御前会议，结果颇一致，虽间有反对者，亦无效。只是随即召开的内阁会议磋商优待皇室条件，反对南方削减经费为常年二百万两。即由阁丞华世奎起草电驳。^[13]

与此同时，伍廷芳两度致电孙中山、国务各总长、参议院议长，通告就袁内阁所提条件有所修正的交涉情形。同日又致电黎元洪，告以修订的优待条件已极宽容，唯坚持清帝逊位，以固中华民国之基础，免于虚君位之嫌。

虚君共和，是康有为在各地纷纷宣告独立、清廷朝不保夕、共和新国即将出现的形势下苦思冥想出来的“妙法”，他坚持认为没有君主势必造成内争，引发外患。而虚君最好是保留旧主。袁世凯与清廷恩怨甚多，并不情愿受制于人，也不想做大清朝的忠臣，但是却借用虚君共和的名义，以缓解与皇族的矛盾，增加与民军讨价还价的筹码。南京方面则唯恐虚君坐实，非但共和不能完整，清帝还可能反攻倒算。而确保共和的主要途径，就是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将清廷彻底赶下台，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制。至于共和成立后如何防止陷入内乱和专制，则是在共和体制内逐步解决的下一步问题。

清帝退位及其优待条件公之于众，在南北双方都引起强烈反弹。2月7日，北面招讨使谭人凤致电袁世凯，反对保留清帝尊号。他详细分析道：

夫君主、民主国体既绝不兼容，总统、皇帝名称自不能两立。今总统之外，再拥皇帝，非驴非马，不独无以尊崇国体，实恐见侮外人，其危险一。清廷退位，非出于禅让之本心，而屈于民军之势力。若阳许逊位，阴行帝制，将来暗结私党，巧借外援，路易十六之祸，行将立见，其危险二。既许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本无干涉内政之特权。惟国交仪式，系尊重国体，非尊重其个人。玉帛往来，仅一时之礼。今清廷退位，国体变更，五种民族，视为一体。君权已全体取消，帝号本无所依据，若视为外国君主，称帝于民国之内，则彼将怀抱野心，煽惑蒙、藏，徐谋恢复，启藩部分离之渐，坏中华统一之基，其危险三。逊位之后，领土、主权，一律转移于民国，此应然之势。若仍拥帝号，难保无赵尔巽、升允之徒，坐据偏隅，遥奉名义，以相号召。将来内部征讨，劳民伤财，殆无宁岁，其危险四。

他主张称清逊帝为让皇帝，及身为止。至停战展期，万不能再允。“倘犹观望迟延，即认为有意挑战，惟有联合南北各军队一致进行，兵临城下，噬脐何及。”^[14]

对于谭人凤的反对之声，袁世凯只能敷衍了事，复电称：“国体问题，正在磋商，力求平和解决。其中为难情形，唐、伍两君皆所深悉。来电所虑各节，必可消弭。此事但求实际，不系虚称。如以武力迫胁，则恐横生枝节，反多阻碍，大非吾人渴望平和之心。”^[15]

与此同时，北方拥帝势力的反弹也日形激烈。8日，袁世凯致电上海唐绍仪转伍廷芳，描绘北方形势的复杂，做出推心置腹的姿态，争取理解和同情：“此次条件，系奉交议。今早燕孙等请旨验商，刻已发去。南方为难，亦所深知。但北谈平和，群起仇视，近日多方解说，始稍有头绪。要以优待条件能满大众所望为主，否则必有绝大暴动。京内洋人藉居各巷深多，倘扰乱，枝节必多。且肃、恭两邸潜赴奉，因而奉天军民正激烈反对，恐终须为日人所占，又不准金波赴奉。异常焦灼，正在解劝，未知有无效果。请切电简樞，万勿附和。而芝泉所部又出变象，亦须设法抚集。芝尚未到京，兄实为保全大局和平解决起见，岂专眷念故君耶。祈谅之。”^[16]

北方拥清势力主要聚集在奉天一带。早在1月20日，就曾以奉天谘议局、教育会、自治会以及农、工、商会等团体的名义致电清内阁，号称“东省人士拥戴君主，矢死不能移”，所谓“朝廷将有逊位之说”，东省人民万不敢承认，要求内阁“宣布政见，亟谋所以表示之，以靖浮言而安全局”。^[17]稍后东三省军队再度致电清内阁，反

对朝廷逊让，亲贵逃避，宣称“各省一心共襄尊王，军民庶众翘首以待君宪之治”，东省士民尤为奋激，“已实力联络，誓死希望君宪”，要求袁世凯“早定方针，以安人心而靖大局”，并“宣布政见，表示机宜，慎勿轻从一二人之私言，而显违敝省军民之同心”，否则不能尽保卫维持之责任。^[18]

2月7日，总督赵尔巽又来电，以东三省地位、人民心理确与内地不同，提出“万一政体解决出于军民希望之外，则对于东三省应有权宜办法，方免危亡”。他迭次密召士绅、军队商议，将所要求归结成七条：“一、东三省臣民对于大清皇帝致其尊敬亲密，永无限制；二、东三省人民得专备大清皇帝选充警卫官兵；三、大清皇帝于东三省三年巡幸一次；四、南北政府未统一、各国未正式承认以前，不令东三省承认；五、凡有兴革章制，三年内不强东三省以必行；六、三年内东三省官吏，自总督以下，中央不得任意易人；七、三年内东三省赋税、军队，不调拨他处之用。”^[19]

关外异动不断，的确令袁世凯担忧局面失控，使得清帝退位和自己接掌大位的计划进程变生不测。7日，他电告赵尔巽：“日来各处谣传，谓袁某阳持君主，阴谋共和，此乃革军间疏我北军之诈计耳，祈勿疑议。开战在即，凡事诸要小心，□勿以革军谣言贻误大局，丧失地方。”^[20]次日，又以内阁名义致电赵尔巽等，回复其半个月前转来的奉天谘议局等团体和军队的质问，辩称：“内阁只有行权之责，至解决国体，关系重大，非阁臣所敢擅裁，迭经皇族会议，请旨办理。近日讨论优待条件，亦系奉旨之事，并随时请旨遵行。凡奉旨不准宣布者，例不得布告士民。现国体如何解决，尚未奉有明诏，诿可以臆度之词，向人商议。是以贵局、会来电，未便作复。总之，无论何省，断不肯置之不顾。”^[21]

同日，袁世凯再度电示赵尔巽：“近日近支王公均以军离饷竭，无可言战。慈圣亦谓，如待瓦解，兵临城下，优待皇室一层岂能再议。两害取轻，不如先与南方商酌优待条件，果能合宜，亦可俯顺輿情，宣布共和政体。因命凯与南方作正式商议。奉旨后，力辞不获。现在开议，上命不许宣布，因暂未能明告。且时局变幻多端，仍不知能否即行解决，尤未可与人预议解决后之办法。”^[22]打着帝后的旗号，在袁世凯既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也有奉旨办事的便利。从他隐约透露出来的实情可见，直到此时，袁世凯仍然小心翼翼，唯恐操作稍有不当，清帝退位之事便会前功尽弃。

注释

- [1] 《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第9—10页，“电报”，1912年2月1日。
- [2] 《外务部代宣布文告答孙文宣言》，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443页。
- [3]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第23—24页。
- [4]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309页。
- [5]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6册，“记事”，第3—4、6、11—12页。
- [6] 《临时公报》1912年2月13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1页。
- [7] 《临时政府公报》第9号，第13页，“电报”，1912年2月6日。个别文字据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辛亥革命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3页）校订。
- [8] 《民立报》1912年2月7日，第2页，“紧要电报”。
- [9]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04—106页。
- [10] 《沪军政府电报》，《民立报》1912年2月7日，第3页。
- [11]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军总统段祺瑞致内阁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8—179页。
- [12]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06—107页。
- [13]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6册，“记事”，第29—30、40页。
- [14] 《民立报》1912年2月8日，第3页，“公电”。个别文字据《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9册校订。
- [15] 《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7册，“记事”，第11页。

[16] 《致上海唐绍仪转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1—502页。

[17] 《奉天谘议局等致内阁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3页。

[18] 《东三省军队致内阁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496页。

[19]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来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4页。

[20] 《内阁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497页。

[21] 《内阁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2页。

[22] 《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3页。

四 退位与致政

在清帝退位问题上，袁世凯谨慎应对固然有难言之隐，而孙中山等人的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确有通盘算计，试图上下其手，坐收渔利。他与孙中山的角力，主要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一是自己掌控的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二是清帝交权下台诏书的措词。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常常将二者搅在一起，以增加讨价还价的空间和瞒天过海的几率。

2月8日，清内阁致电唐绍仪并转伍廷芳，表示优待条件经各方面商议，南方大加删改，窒碍甚多。“如第一款，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保[系]北方军民暨满、蒙人极端注意，万难更改；‘逊位’二字，尤为北方军民所骇异，必须改为‘致政’或‘辞政’；‘赞成共和’改为‘宣布共和’；‘外国君主’改为‘各国君主’。”并且强调：“此次极力迁就，万不能再有更改。”^[1]

同日，梁士诒连发三电给唐绍仪，前后两电主要是关于逊位，告以今早召对逐条逐字讨论：“所最决意坚持而言之再四者：一、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十字。二、不用‘逊位’二字。上云：‘事实虽如此做，然若于字面上摆出，将来京外因此而风潮迭生，我不安，国民亦不安。’三、必须用仍居宫禁或日后退居颐和园，随时听便居住。……此三层如办不到，恐难以宣布共和。务必劝伍迁就。”梁士诒强调：“惟清朝立基近三百年，遽易国体，万分为难。南方未能尽悉详细，我辈志在为国民谋幸福，稍不审慎，北人大乱，外人干涉，所失甚大，故不可不委曲求全，以期达到目的为宗旨。应在实际上讲求，不可徒快一时之观听，而生无数之波澜。民国既得其实权，又何惜此小礼节、小款项耶？”并进一步“细为申明”道：“‘逊位’二字，最难者即满、蒙暨北方军队、督抚，多不谓然，改为‘致政’，人心稍安。”请唐绍仪“密告伍公，同谅苦心”。

至于第二电，则是组织统一政府问题。据称：“项城本无意于总统，因中外逼迫，勉许暂任，以救大局。今见组织统一如此之难，恐

无益危局，反启事嫌，拟请孙始终其事。惟北方如无政府，满人必仍生变动，正中王公之计。外人亦言，如此北方无政府，各国先须调目兵防卫。……是时业已退位，项城将听何人之命令而维持布置耶？抑自行主张？即弟意仍求公切商统一办法，政府人员，似可多用南方人，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2]

归结起来，三封电报主要传递了四点意思：其一，清帝尊号应相承不替；其二，必须改逊位为辞政；其三，北方袁世凯政府不能取消；其四，新组织的统一政府必须设在北方。而最要之点，就是要按照袁的意愿划定新的统一政府与清朝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北洋军人与袁世凯相呼应，当天冯国璋、段祺瑞等64位将领致电伍廷芳：

“屡闻南方宣言，如国体改定，朝廷仍不失其安富尊荣。今条件中，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为尊荣最要之大纲，靳而不予，抑独何心？应请仍照原文，万勿更易。逊位一语，军界同人极为骇异，应请修正。此两层最关重要，绝对不敢附和。其余各节，均听袁内阁与贵代表协商。如贵代表有和平解决之真心，期免生灵涂炭，决不因此争执，致败大局也。”^[3]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袁世凯的要求和北洋军人的举动，显示袁世凯千方百计企图斩断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联系，绝对不受其控制，这正是孙中山最为担忧的事情。同一天，孙中山会见了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F. McCormick），后者明显感到，临时大总统最焦虑的一是日本，二是中国人民是否会不再支持南京政府。“清廷的退位诏已经写好，只因南北双方的态度尚待协调，延迟未发。袁世凯赞同君主制，并保证支持清廷。假如民国归了现在的袁世凯，其目的将丧失；假如民国归了一个维护‘中华民国’的袁世凯，其目的将可达成。”^[4]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尽管清帝即将退位，可是稍有不慎，让袁世凯阴谋得逞，民军的所有努力都有可能付诸东流。

对此关乎民国存亡前途的根本大事，孙中山绝对不能让步。2月9日，伍廷芳电告袁内阁：“此方所坚持者，为不使有类于虚君位。如照来电，必致各省、各军群起反对。前修正案系临时政府交参议院议决，无可更改。现各省且有以为太优者，实难再改。本代表深知阁下为难更甚，现力求迁就改正如下，已至极点，决难再让矣。事机紧迫，懈稍逝，万勿往还商榷，致耗时日。”此番改动最多也是最关键之处，即将所有“致政”一律改为“辞位”。^[5]

在清帝退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9日段祺瑞致电伍廷芳，再度提出协商组织正式政府事宜，主张“宣布共和之日，两方政府同时取消，临时大总统并须预行推定。至临时政府必要人员，及临时政府暂设地点，应由全体公同商定。即以退位之时，为共和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庶统治机关不致旷时，两方不致陷于无政府之危险”。并要求将应推之大总统及临时政府必要之人员与地点迅速交与北方军界公议。^[6]段祺瑞对袁世凯亦步亦趋，对南方步步进逼，显示另组临时政府的确居心叵测。

取消南北政府另组临时政府之议，早经孙中山断然否定，理据是南京临时政府绝不可与袁世凯主持的清政府相提并论。尽管康有为认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已经掌握实权，清帝不过虚君，可是名义上袁内阁仍是清朝的政府。如果将袁内阁与南京临时政府视同对等，无异于承认其权力由清廷授予的合法性，则革命的正当性就会变得相当模糊。因此，孙中山一再坚持清帝让位的对象是共和政府，下台之后，其政府即袁内阁自然解散，由南京临时政府组织统一共和政府，然后自己让位于袁，再由袁接掌统一政府。

而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盘，在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较量中占据优势，就要打破清廷的挟制和民党的约束。另组临时政府遭到各方反对，袁世凯仍然想方设法使其责任内阁作为正式政府的延续合法化。尽管孙中山敏锐察觉，坚决反对，无奈其他民党觉得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其余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北方政府的地位悬而未决，留下巨大隐患，致使袁世凯后来步步得逞，不能不说是重大的政治失误。

清帝交权下台虽成定局，可是向谁交权，以何种名义，关系到未来中国国体政体的性质。2月3日，袁世凯奉密旨授为全权大臣与民军磋商清帝退位事宜，媒体的报道却是“内阁确奉到皇太后懿旨承认退政”^[7]，并非退位。《大公报》明确称：“内阁消息，宣布共和谕旨已经各王公及内阁公同拟定，其中措词只为推卸政权，并无禅让字样。惟昨闻袁内阁以此项谕旨虽已拟定，诚恐颁发后，民军仍有挑剔，致滋纠葛，因于十五日曾将此次谕旨草案电致南京政府，预令查核再行颁布。”^[8]据说此事出自袁世凯的意旨，并得到清室及皇族的认可。“皇帝推卸政权、承认共和之诏旨，已于十五日由内阁恭拟草案呈进，闻秉笔者系为华世奎、阮忠枢两人，秉承袁内阁之意见而订

拟，由皇太后钦览后又由各王公、贝勒公同参核，酌易数字，已交世、徐两太保敬谨收存，恭候皇太后懿旨即行颁布。”^[9]

退政与退位，一字之差，意思迥异。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自十九信条发布，清室已经失去政权，形同虚君。所谓退政，仅仅是交出政权，对于国家，仍然保留君位。如此，则国体仍是君主制，政体才变为立宪制。当时种种试图调和君主与共和的设想，如虚君共和、帝国共和之类，其动机和目的都是力求保留君主，以为非如此不能防止内乱外患。可是在革命党看来，君主不去，就会对共和制构成严重威胁。民军同意清帝以交权退位为条件予以优待，保留帝号，只是作为外国君主待遇，与国体政体毫不相干。双方的主张尖锐对立。

政与位的本质区别以及主导组织临时政府的用意，在袁世凯等人1月底拟制的《北方议定组织临时政府草案》显露无遗：

（一）皇帝辞政。为国利民福起见，所有保持安宁，恢复秩序，联合汉、满、蒙、藏、回等事，断不可无统一机关，故特委袁世凯暂行组织临时政府，代掌一切政权，以期维系大局，主持外交，俟国会正式举定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再行取消。（二）皇帝辞政后，仍驻蹕宫禁，毋庸迁移他处，以维京畿及北方秩序，裨免糜烂。（三）将来大总统府第，即在北京择地另行建筑，或以新建筑之监国府邸为总统府。（四）自武汉事起，至今三月有余，南北各省经济匮乏，不独国库为然，南京临时政府亦事同一律。皇帝既经辞政，所有通国一切行政，即应统筹全局，以图富强。但一切行政费用，所需甚巨，其东南已经独立省分，能否继续支持，临时再行磋商。至北方各省，国库如洗，目前已属难支，将来临时政府成立后，更须力促一切新政之进行，所需政费，必较今日为尤巨，应如何应付之处，须预筹妥善办法，以免临时棘手。（五）皇帝既经俯顺輿情，政权必当统一，南北各省，仍当化除成见，扶助中央，酌为筹解经费，顾全大局。倘有贫瘠省分因此次糜烂实难兼顾，中央亦可暂缓协济以纾民力。（六）皇帝辞政后，京中各行政衙门，国务大臣以下之官员，悉仍其旧。但组织临时政府，需款浩繁，所有各署官员之津贴，自临时政府成立之日起，统计六个月，暂弗发给，以纾财力。（七）政费一项，以军饷为最关重要。所有北方军队之饷项，于此数月期内，无论如何，均须按月照给，以维持秩序而免哗溃。其南方各军队之饷糈，亦须通盘筹画，不得少有缺欠。至南北方军官将校，均仍旧职，不稍更动。

（八）现所组织之临时统一政府，一经各国承认，一切外交事宜，悉

由临时统一政府直接交涉。（九）所有外债以及新旧赔款之担任，政体既定，即应继续依期偿还。各省无论如何，亦须依旧筹措，按期照解，以昭大信。（十）皇帝辞政时之谕旨，除刊刻誊黄颁行天下外，更须另颁谕旨于各军队，俾得晓然于朝廷辞政之深意，以免暴动而维治安。^[10]

按照草案所定程序办法，不仅袁世凯的权力来源及所承继的法统为清朝皇帝，由北京临时政府统管全国行政军政，而且以“辞政”名义交出政权的清帝是否同时失去名义上的统治权，并无清楚认定。也就是说，清帝可能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从反面证实孙中山看似斤斤计较的执着坚持，绝非杞人忧天，多此一举。

由于南北双方围绕清帝退位诏书的措辞问题反复缠斗，宣布退位因此一再推迟。媒体对于双方立场的差异有所风闻和揣测，伍廷芳来电所示修订的退位诏书及优待条件，“各款仍系逊位，并非辞政，不得谓之虚君共和”，内阁不知如何磋议。^[11]《大公报》非常准确地把握到双方争执的关键所在：“其争执尤力者，一则曰皇帝辞政，一则曰皇帝退位，故现尚未决。”^[12]可见辞政与退位之争，在北方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坚持辞政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造成虚君共和的假象。

北洋系将领再度不失时机地演出了配合袁世凯的戏码。“冯、姜、段各军统对于虚君共和政体极表赞成，已联电伍廷芳，要求承认优待条件。旋接伍通电，略谓此次袁内阁提出优待条件，本代表因事赴南京，已将此项条文由参议院协定，现已将修正案全体议决。惟清帝逊位字样必须标明，非是即不足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且含有虚君位之嫌疑。此次自武昌起义所流之血，聚集可成江河，国民之所希望者，惟在共和，故对于清帝逊位一事不能不始终坚持。而诸公欲保存旧帝之苦心，此间已为人所共谅，但以此事关太巨，不能含糊了事等语。冯军统昨已再联合各路军队复去一电，于逊位二字大为反对，力请撤销，否则死不认可云。”^[13]赞成共和而反对逊位，则所赞成的只能是虚君共和。所以2月10日伍廷芳复电明确指出：“惟清帝若不实行逊位，则有类于虚君位之嫌。”^[14]

其实，逊让之类的言辞，对于清朝的君臣都已经不再讳莫如深。2月9日，各省督抚等联衔电请代奏，就公然声称：“共和问题迁延未定，逊让政权之明诏迟久未颁，中外失望，军民解体。”要求速降明

谕，宣布共和，“上以幸福予国民，下以尊荣酬君上，其为懿美，超轶唐虞”。^[15]民军方面，对于优待清帝也有不少异议。广东都督陈炯明以和议内有清帝仍居北京、不去帝号、王公仍旧袭爵，电示“全粤愤懑”。为此，伍廷芳通电民军各方，宣称：“廷所坚持者，必清帝宣布赞成共和，然后中华民国于其去位之后，予以优待。……至于已经去位之清帝，亦不过虚名之爵号，似无须过于争执。”^[16]

按照预定日程，清廷应于2月11日明诏宣布共和，可是诏书的关键措辞迟迟未能商议妥协。接到伍廷芳发来的修正优待条件，袁内阁当即开会讨论，再将逊位改为辞政，并送交隆裕太后，得到后者的首肯。^[17]2月10日，唐绍仪万急致电袁世凯：“吾师为难，非特仪所深喻，即南方诸君亦所共谅。惟宣布谕旨与照会字样不符，外国人先阅谕旨，互相较对，必干诘问，万不可行。至优待条件发生于辞位，若云辞政，则十九条已无政权，何待今日。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明日入觐，务恳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方能保全国防，保全满族。若少不忍，转生大乱。言尽意竭，乞勿再赐电商。”^[18]唐绍仪的确讲到了要害之一，只是民军全力防范清帝，反而忽略了袁世凯弄权的潜在危险。

眼看事情可能功败垂成，同日张謇急电袁世凯转汪荣宝、陆宗輿：“南方对于优待皇室条件，当局与参议院反复磋磨，视来件无大出入。不独体项城为难，亦以顾全项城，维持国防而然。伍昨复阁电，实已笔舌俱瘁，费尽磋磨，无可再说。要之，种种优待专为辞位二字之代价，若不说明，何以合南北赞同共和之心理，亦何以示将来政治之健全。二君明于时势，务望力助项城，必践廿四发表之约。万勿迁延两误，败破大局，追悔无及。”^[19]

尽管各方竭尽全力克服最后的障碍，共和明诏还是未能如期颁布。2月12日，伍廷芳转发黄兴来电给袁世凯：“今南北协议之惟一目的，实欲早定共和大局，然欲定大局，必速下逊位明文；欲迫促清廷逊位，必南北军队连续北上，以武力胁制之；欲南北军队连续北上，则张、倪二君应率所部军队离开徐、颍，以为南北军队之先导。……设仍扼据要害，阻我北上，则清廷存侥幸之心，逊位有观望之患，且恐惹起他方面之效尤，大局牵延，必至更形糜烂。”^[20]催促之外，形同最后通牒。

不过，这份最后通牒未及生效，经过最后时刻的紧张较量和磋商，清帝退位诏书的内容文字终于为双方所认可，并于最后期限内通知了南京临时政府。2月11日清内阁发出多份电报，向南方民党报告消息，首先是向上海唐绍仪发去一封简短的电报，请其转达伍廷芳，优待条件本日奉旨允准，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希查照办理。同时又万急致电南京孙大总统、参议院、各部总长和武昌黎副总统，告以“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袁世凯表明自己极愿南行，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尽一致，请示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21]

在另一封致上海唐绍仪、伍廷芳、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和参议院的电报中，袁世凯正式转达了明诏的完整文本：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乐，拂兆人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定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22]

2月12日，与诸国务大臣会衔副署的上谕正式公布，与前一天通报南方的电报文本基本一致。同时公布的还有全体内阁大臣会衔副署上谕并附录优待清帝、清皇族及满蒙回藏各族条件。按照明诏宣布为帝政终结的约定，是日为清帝正式退位之日，历经二百余年的大清王朝就此寿终正寝。

注释

[1]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09—110页。

[2]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11—113页。

[3]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07—108页。

[4] 《接见麦考密克时的谈话》1912年1至2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1—142页。

[5]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13—114页。

[6] 《临时政府公报》第14号，第3页，“附录·电报”，1912年2月13日。

[7] 《退政懿旨已交内阁》，《大公报》1912年2月7日，第3版，“要闻”。

[8] 《诏旨仍须商之民军》，《大公报》1912年2月6日，第2张第1版，“北京”。

[9] 《承认共和谕旨之秉笔者》，《大公报》1912年2月6日，第2张第1版，“北京”。

[10] 《北方组织临时政府之草案》，《申报》1912年2月9日，第3版，“要闻”；《议和记·组织临时政府之草案》，《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25—27页。

[11] 《民军电复优待皇室条款》，《大公报》1912年2月10日，第3版，“要闻”。

[12] 《共和明诏迟缓之原因》，《大公报》1912年2月11日，第3版，“要闻”。

[13] 《各军统关于逊位之电争》，《大公报》1912年2月12日，第5版，“要闻”。

[14]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137页。

[15]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署理直隶总督张镇芳等致内阁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81页。

[16] 《致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等电》，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86—487页。

[17] 《逊位诏旨尚未发表之原因》，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议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第40—41页。

[18]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停战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辛亥革命》（8），第242页。

[19]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张謇致袁世凯转汪荣宝陆宗輿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82页。

[20]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15—116页。

[21] 《致上海唐绍仪转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致上海唐绍仪南京临时大总统孙文等电》《致临时大总统孙文等电》，均见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30—531页。后一封电报的文字，与《共和关键录》间有不同，如“弊政”为“帝政”、“辞位”为“逊位”、“各国”为“全国”。

[22] 《临时公报》1912年2月13日（辛亥十二月二十六日），第2页。《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第1—2页“附录·电报”个别文字不同。

五 争议仍未结束

清帝退位明诏颁布的次日，伍廷芳通电中华民国军政各方：顷接北京袁世凯三件来电，“其一谓廷所开清帝辞位后优待条件已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其二则清帝辞位之诏。其三为袁君赞成共和宣言书。现在清帝既经辞位，北方秩序暂由袁君维持，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统一办法”^[1]。同日又电请国内各军队一律改悬中华民国五色旗，以免冲突。^[2]

当天伍廷芳、温宗尧、汪兆铭还以全权代表及参赞的名义通告全国，就清帝退位的磋商过程做出详细交代，并就必宜注意的重要事项进行解释，其中之一就是清帝名号。“参议院所坚持者，在‘辞位之后’四字，而于清帝与大清皇帝之别，谓为无关宏旨，可以‘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为最后之决定。盖如是，则辞位之后，自可称为已经辞位之大清皇帝，与虚君位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也。至于前清内阁初所要求者，为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廷已严加拒绝，彼亦虑蹈于虚君位之嫌，承认廷所主张矣。”^[3]

根据《袁世凯全集》的汇编，清帝退位诏书存留有若干底本，应该出自多人之手，并经多人改定。其中袁世凯仅仅改动了几处，只是增减几个字，甚至只是调整了字词的顺序，而使得意思迥异。如“将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改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4]。这些改动不仅相当关键，而且居心叵测，成为后来袁世凯弄权的

凭借，为争议再起埋下伏线。

接到清帝退位诏书，孙中山表示将如约兑现让位允诺，但是诏书文本仓促定案，显然未经其核准，因而对于清廷私相授权予袁世凯，产生不祥预感，他致电伍廷芳和唐绍仪，通告阁议情形，并提出：

“惟退位诏内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众不乐闻。徇电告项城，请即南来，并举人电知，畀以镇守北方全权。照此办法，众当贴然。项城辛

苦全[备]至，今日应将往来密电，证以事实，由沪发表，以明公论。”^[5]

对清帝退位诏书的相关内容感到疑虑的不仅孙中山，看到诏书的正本，温宗尧立即致电南京外交总长王宠惠，诘问：“清帝已去位，此项全权系何人所授？民国必不应仍认清帝有委托全权之柄，且袁世凯成为清帝委托之人，于推举总统一端，恐生障碍。循名核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事不成。为共和大局计，为袁世凯计，均应请将‘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十一字删除，方臻妥协。乞商明参议院并临时政府诸公，妥筹应付，是为至要。”^[6]

设立临时政府之事，南北双方一再缠斗，袁世凯希望同时取消南北现政府，另立临时统一政府，孙中山坚决反对，认为随着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清政府即袁内阁应同时归于消灭，南京临时政府即为全国统一的共和政府，然后袁世凯南下就职，以南京临时政府为全国统一政府。由于相持不下，2月11日，黎元洪以事机甚亟，不能久延，致电伍廷芳，认为“宜即时请临时政府及北京各派代表到鄂，共同组织正式共和政府，所有政府成立之地点，与大总统以次各员，均于此时商定。北京退位之时，即我正式政府成立之日”^[7]。在湖北设立统一新政府，化解南北相争死结的同时，却延续了宁汉之间的角逐竞争。

孙中山等人所担忧的主要是袁世凯是否斩断与清廷的关联，正如清帝退位后孙中山答复谭人凤所说：“前提条件，系委曲以求和平，若虚君之制犹存，则决不能承认。文虽愚昧，亦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伪共和之谬制。”^[8]可是虚君主不仅限于清帝，伪共和也不单是虚君制。南方以为袁世凯维护清廷，与北方以为其赞同共和，都是各执一偏。实际上，袁世凯维护清廷旨在减少拥帝势力的压力，以便与南方讨价还价，而赞同共和则是为了迫使清廷让步并减轻民党的反对力度，他所需要的，是能够任意发挥的无限权力。他审阅军谘府军谘使王赓关于破坏后建设的上书，觉得“多可采”，尤其在“共和成立后，暗中应以开明专制之精神行之”的“开明专制”四字下加了着重圈点。^[9]由此可知其心机取向。孙中山虽然早有警觉，百般防闲，却执着于斩断袁与清廷的联系，而未能有效防范袁世凯本人专制集权，加之同党大都共识不足，最终还是棋错一着。

已经如愿以偿、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在扫除了清帝的障碍后，对南方的态度也陡然强硬起来。2月15日，他复电孙中山、黄兴等催其南下

赴宁组织临时政府的敦促，悍然表示：

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翫置，并非因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

是电以退为进，充满挑战意味，简直就是一封问罪书，欲将“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的罪名强加于孙中山，而自居于爱国地位。^[10]为此，袁世凯派唐绍仪赴宁协商。2月18日，唐绍仪代转梁士诒复孙中山电：“清谕有全权组织字样，南方多反对者。实则此层系满洲王公疑惧，以为优待条件，此后无人保障，非有此语，几于旨不能降，并非项城之意。故奉旨后，亦未遵照组织政府。清谕现在已归无效，若欲设法补救，除非清谕重降，自行取消不可。又万万无此办法。南方若坚持此意，实为无结果之风潮。乞公以此意劝解之。”^[11]

梁士诒所说，未必全然谎言，奕劻、溥伦等赞成清帝退位的皇族成员确以袁世凯为护身符。而退位诏书文字的更改，也有可能出自袁世凯以外其他方面尤其是清室的意思。但从此前屡屡企图另设临时政府的举动看，袁世凯考虑自身的利益明显多于照顾清室。将已经逊位的清帝抬出来做挡箭牌，仍是屡试不爽的老伎俩，而且木已成舟，无法更改，形同无赖。这样的局面，正是之前袁世凯、唐绍仪等人一再信誓旦旦保证不会发生的情形。

延续袁世凯的意旨，与之关系匪浅的日本法政学者有贺长雄精准地抓住了南北争执的焦点：“方兹之时，南方意思固欲将北京朝廷法律上现有之统治权即其一部分，亦不肯照旧承认。如彼北美十三殖民

地将属于英国王及国会之统治权全体排斥，从新造就一个统治体，然又如法朗西国民斩馑路易十六世，用示主权之全然断绝，另由人民互相公约，从新建设统治体。然南京政府亦拟举二百六十年间爱新觉罗氏传承之统治权，将其关系一概废绝，从新竟据民意，设立共和国。其要求袁总理全行断绝与清廷之关系，竟由个人资格赞成共和主义，以此故也。然袁总理所拟移转统治权之方，与此相异。以为清帝辞位，南京政府先行取消，另在北京依据清帝付托之统治权，从新组织共和政府，此南北意见之差异。”尤其是“上谕中所言‘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暨‘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以上二句为民国国法沿革上最重大之文字，革命时代统治权移转之次第，于此四十有一字存焉”。

有贺长雄对于此事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应当心知肚明，却别有用心地据此提出：“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既如上文所述。因而其国法有与纯因民意成立之共和国相异之处。”所谓不同之处有三：一、能将不参与革命、不赞成共和之地方暨诸外藩仍包于民国领土之内；二、无须遵据普及选举法开国民议会；三、中华民国宪法不必取法于先进共和国宪法。^[12]有贺长雄旨在为袁世凯的权力来源辩护，却从反面证明由袁亲自操刀改定的清帝委任一节，绝非可以无足再论，更没有归于无效。不仅如此，有贺长雄的说法其实就是将革命之际袁世凯百般掩饰的心计，转化成统治权转移的事实，为其专制集权法理背书。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的精心布局以及有贺长雄的倒因为果，不但让近年一些法学者掉入彀中，用以作为力证袁的权力来源并非受自南京临时政府的凭据，凸显袁氏弄权的老道和专家的懵懂，而且相信袁世凯否认其权力来自清廷的说词，也是将无赖语当作大实话，着了老袁的道而不自觉。仔细梳理事情的发生衍化，可见袁正是处心积虑要借清帝逊位让权彻底斩断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连接，其别有用心的否认不过是欲盖弥彰的遁词。

袁世凯的险恶用心早已被识者看穿，孙中山和温宗尧追究之外，邵力子专门写了社论《关于清谕之研究》，在他看来，退位诏书所谓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乃指清帝辞位后暂时统摄京津等处之机关，绝非吾中华民国提议组织之临时统一政府。观袁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之名义，布告前清各省官僚军警，而其致电我民国各个人或团体，则仅自署其私人之名，此中固大有分寸”。尽管如此，还

是要防微杜渐，“宜由南京政府参议院及各团体电致袁慰亭，明告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之名义，为吾民国所绝对否认。若以事实上之万不得已，暂以维持京津等处之秩序，吾人可权宜通融，惟必须于参议院举出总统及临时统一政府成立以前，先行取消”。^[13]只是仅仅凭借“忠告”，袁世凯绝不会轻易就范。

好事多磨，总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关于清帝退位的表述，北方反对退位、逊位，南方不接受辞政、致政，最终改为辞位。而在此前后，不仅各方表述存在微妙差异，正式文件里面也有不同说法。

民党民军对袁内阁及北方，往往是退位、逊位、辞位兼用混用，南京临时政府及独立各省、民党团体相互之间的正式电文一般均称退位，偶尔也用逊位。而北方对南方及对外，则多用辞位，或避免此类用词。以南方和谈总代表伍廷芳为例，1912年2月6日复电袁世凯，标题为《关于皇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行文开头称“清帝退位”，各款则用“清帝逊位”。^[14]致电南方军政各方，则称逊位、退位、去位。清帝辞位明诏宣布后，虽然改为辞位，仍有逊位或退位等用法。对北方将领及袁内阁，则多用逊位。孙中山对南方多用退位，兼用逊位，对北方逊位、退位并用，甚至同一文件也存在混用的情形。^[15]也就是说，尽管协商过程中争执不下，最后各让一步，定为辞位，一旦帝制结束，退、逊、让、辞，倒是真的成了无谓之争。

媒体和社团，一般而言也多是混用，但也有特别在意者。清帝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披露后，即招致不少批判之声，尤其是对清廷仍居北京、不去帝号等项，反应强烈，指为“不伦不类之共和国，必至贻笑万国，贻害将来”，表示坚决反对，要求从速改订。^[16]《天铎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严词谴责，并强烈要求取消。“青兕”的文章抗议北方设立临时政府与优待虏廷。^[17]《民立报》编辑周浩的《反对清帝退位条件宣言书》，不但痛斥袁世凯居心叵测，还指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大抵为各省都督以私意选派，“真志士寥寥无几，向之保皇及立宪两党多置身其间，于清帝未能忘情，甚或阿附袁世凯以博将来之利禄。交此条件于参议院，适足成全若辈难言之隐，遂致赞助之不遑”。于是遍告军学商报各界，于2月10日午后2时赴张园开会，公议对待之法。主张“今日之事，惟有以干戈相见，庶可巩固民国之基。欲取消此种条件，必先由军学商报界发电各省都督，宣布参议院之无状，撤退保皇及立宪两党人物”。^[18]

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公布前夕，已经差不多一年未著文字的戴季陶在《天铎报》发表《天仇宣言》，抨击和议优待清帝、敷衍和平之谬，揭露袁世凯的种种布置手段，反驳各报的赞同言论，并公开向新政府诸公喊话：“攻破北京之日，即和议成功之日。无论政府设于南京北京，以及大总统为孙为袁为某某，皆为至易解决之问题。北京不破而言和议，是甘断送中国南北各省人民之生命及四千年之荣誉历史者也。”又忠告外交界诸公：“外交以武力为后盾，今日对于满清及袁党诸人，无所谓和，迫降而已。降则设法处分，不降则右陆军而左海军，进攻而已。”并大声疾呼于“吾党旧日同志”之前：“三民主义革民党至死不变之主义也，若一日作官，而遂变其初心，奸狗彘不食者，当不至此。鄙人虽不才，深不愿吾同志有此行为也。”^[19]

周浩为了反对议和条件，辞去《民立报》编辑之职，以全力组织自由党附设的《民权报》，且刊登启事，表示无暇为人作嫁，《民权报》未出版前，对于时局的意见，借《天铎报》发表。^[20]其言行透露出对《民立报》和革命党领袖的强烈不满。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正式公布后，李怀霜也刊登宣言，斥责优待条件浅率之伦，指参议院奸欺不轨，临时政府疲柔无力，吾党忠士悲愤填胸，并反驳指其为主张无政府的攻诋，明确表示无政府不可实行于今日。如果逊位伪诏一下，便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反对优待条件，正是为了保存南京政府。^[21]正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多太强，伍廷芳等和谈代表才不得不通告全国，详细说明原委，以释群疑。

激进青年和社会党更加觉得不可容忍，关注时局的苏州学生叶绍钧坚决反对优待清室，认为“以君主而加于人之上，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国之中国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岂以巨数金钱，作其甘心自退之报酬乎？更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乃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巩固民国耳”。恰好这时社会党也对议和之事颇有意见，专门开会讨论，陈翼龙发言，指清帝逊位予以优待、袁世凯统辖北方等事，决非南京参议院中少数人可取决而实行之，“必待其逊位，是仿佛待命于清帝，而民国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动矣。清帝既为君主，则即为民生之恶魔。试问有出巨资以优待恶魔者乎？况其资皆出之于民者也，试问民生果愿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孙中山、袁世凯或第三人为大总统，“当合全国民之公意而定之”，

不能任由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鉴于事关全体国民，他提议派人到上海，联合《天铎报》发起的国事纠正会，掌握实据，逐条驳斥，广泛宣传，“必至修正议和条件而止”。获得在场者的一致赞成。^[22]

沪上各团体果然于2月10日在社会党会场开会，先由发起人邹亚云敦请江亢虎演说，接着余纯武、余鹤、夏重民、谢树华、梅竹庐、徐茂均、蒋宸予、周文奎、李怀霜、凌翹、陈光誉、梁廷柱、许克诚、邹捷三等相继演说，“皆激昂慷慨，责参议院之债事，伍廷芳之溺职，力主战争，不欲和议”。继由邹亚云提议组织临时机关，由江亢虎主席定名为和议纠正会，公举代表江亢虎、夏重民、李怀霜当晚即向伍廷芳责问，并电致参议院。又决定次日在张园开大会，请各团体提出意见，以维持中华民国、监督临时政府为目的，在沪诸君皆为会员。^[23]代表访问伍廷芳提出反对意见，未得要领，遂即再开大会，“意赴宁要求修改，期不悖共和本旨”^[24]。

以清帝退位的形式和平解决南北战事，结束帝制，实现共和，在以往的研究中颇受诟病，指为只得到一块民国的空招牌，不仅革命不彻底，而且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从而留下后来帝制复辟的严重隐患。诚然，退位优待以及袁世凯出掌大位的结局未必理想，可是，转换角度，在整个世界革命史上，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二百余年的清王朝连同二千余年的皇权帝制一起走下历史舞台，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东西列强都认为绝无可能的地广人众的国度，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体政体政治形式。不仅如此，由于政权的和平更替，包括藩部在内清朝原有疆域和各族民众，基本得到维系，避免了稍后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解体命运，在实现从帝制到共和的跨越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共存。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堪称绝无仅有的典范。

受到后来历史进程的影响，对清季民初的政权鼎革分别用不同的革命史观重新审视，形成与历史本相有别的描述解读。而当时各方各有所图，也不可一概而论。本来逼迫清帝退位，是在南北和谈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直取核心的办法，面对清廷皇室的袁世凯不便将内心想法和盘托出，而要借重南方民党施加压力，自己则做出勉为其难的姿态。他或许不无对清朝的臣节，但更多的还是对自己权力来源的考量，宁可让失去权力的清室担些虚名，以免受南方政府的约束钳制。他利用清朝，旨在应对革命党，同时也有承继大统的美誉，以及主导另组政府的便利。他对清室绝不以禅让的尧舜视之，正因为清室已经

失势，才会藕断丝连。对于袁世凯的弄权，孙中山预判准确，针锋相对，却苦于同党共识不足，给袁世凯留下回旋空间，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疏失。南北妥协，避免流血瓜分，做成共和新局，令各方不仅如释重负，而且都有所期待。只是后来局势的发展，恰好应验了各自的担忧，促使他们重新反省，又不免后悔当初不得不然的妥协。

注释

[1]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19页。

[2] 《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第2页，“附录·电报”，1912年2月20日。

[3]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20—122页。《袁世凯全集》第19卷据《伍先生（秩庸）公牍》将该文题为《伍廷芳通告全国文》，与《伍廷芳集》署期均为1912年2月17日。但文内有“与前清内阁往复磋商，昨日得其复电”，应为2月13日，后面落款为前全权代表，又应在2月16日辞去议和总代表一职之后。此电为銑二，銑一电署期为2月16日。就上述信息推断，电文应写于2月13日，而发表则在此后。

[4] 《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44—545页。

[5] 《致伍廷芳唐绍仪电》1912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4页。

[6] 《温宗尧反对全权之要电》，《大公报》1912年2月25日，第5版，“要闻”。

[7]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39—140页。个别文字据《中国革命记》第27册校订。

[8] 《复谭人凤电》1912年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1页。

[9] 《批军谘府军谘使王赓上书》，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21—523页。

[10] 《致临时大总统孙文等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77页。

[11] 《临时政府公报》第20号，第3—4页，“附录·电报”，1912年2月23日。

[12] 有贺长雄：《革命时统治权转移之本末》，《法学会杂志》1913年第1卷第8期，引自史洪智编：《日本法学博士与近代中国资料辑要（1898—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281页。

[13] 《民立报》1912年2月16日，第1页。

[14]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96—97页。

[15] 《临时大总统咨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文》，《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第1—2页，“令示”，1912年2月20日。

[16] 《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第4页，“附录·电报”，1912年2月14日。

[17] 青兕：《北方设立临时政府于优待虏廷之抗议》，《天铎报》1912年2月5、6日，第1版，“铎声”。

[18] 周浩：《反对清帝退位条件宣言书》，《天铎报》1912年2月8日，第1版，“铎声”。

[19] 《天仇宣言》，《天铎报》1912年2月12日，第1版，“铎声”。

[20] 《周浩启事》，《天铎报》1912年2月13日，第1版。

[21] 《怀霜宣言》，《天铎报》号外，1912年2月14日，“铎声”。

[22]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3—96页。

[23] 《和议纠正会开会记事》，《神州日报》1912年2月11日，第3版，“特别纪事”。

[24] 《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第6页，“附录·电报”，1912年2月14日。

接收清朝旧署

民元南北和议成功，清帝退位，人们关注的目光集中于共和取代帝制一点，后来更以革命的眼光重新审视辛亥民元的政治鼎革，批评当时民党过于妥协。实则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绝不仅皇室亲贵交出最高权力那样简单。作为政府机构的阁府部院，是帝国统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结束，关系政权交替顺利与否的全局，却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只有个别具体研究提及相关前清部门的接收问题。^[1]另一方面，统一的临时政府实行内阁制，作为法理上权力重心所在的国务院的成立，才是政权完善的重要表征。而袁世凯由清朝最后也是唯一一届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摇身变为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原来清朝的阁府部院以及阁僚司员，不但是其维系局面的倚靠，而且成为与南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凡此种种，都使得原本瓜熟蒂落的接收清朝，成为民国创立的要素，增加了民初政局的复杂和变数。

注释

^[1]如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述及学部的接收事宜。

一 由新旧而南北

南北和谈，民党以共和为先决条件，等于将清王朝排斥于谈判桌之外。袁世凯在一番作态之后，接受了这样的条件，以便从清廷手中接管政权。不过，民党的预想，虽然可以交出大总统的位置，却不仅仅是要求袁世凯承认共和的名义，而是要其全盘接收南京临时政府。也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是当时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的共和政权，既然袁世凯同意废除帝制改为共和，就理所当然地应以南京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的权力机构。即便袁世凯心有不甘，也要千方百计地迫其就范。对于民党的一厢情愿，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自然心知肚明，一旦如民党所愿，自己即使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也不过是虚位的国家元首，掌控了参议院和内阁的民党才是实际的执政者。这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条件。为此，他煞费苦心，与南方周旋，使得局势一步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转化。

为了改变因接受共和为谈判前提所造成的相对于民党而言的被动局面，袁世凯应对之策的重要支点，是竭力维持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对等地位。为达此目的，他固守两条：一是坚持自己的权力来源并非延续南京临时政府；二是将自己担任全权总理大臣的清朝末届内阁，变成看似具有民国北方临时政权性质的实体。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受到内外形势和各方力量的制约，不得已将战略目标确定为促使袁世凯逼退清室，从而颠覆帝制，建立统一的共和政权。既然自身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渡，其体制就不得不随之调整变化。开始实行总统制，后来又改为内阁制，试图以内阁和参议院钳制令人疑虑担忧的袁世凯。不仅如此，南方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任，一方面是使其脱离北方的势力基盘，斩断与清王朝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让袁世凯全盘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乃至人事，或者更为恰当地说，是要将袁世凯放在南方共和政权的顶端，虚高架空。

对于这样的安排，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他很快就抓住了关键所在，利用实权在握的优势，反守为攻。南方排斥清朝

和帝制，而以袁世凯政府为对手，使其地位既似第三方，又是正式北方代表，客观上也使袁世凯多了辗转腾挪的空间。与之对面的孙中山，政治敏锐度极高，往往能够明察秋毫，针锋相对地进行应对。可以说双方都是政治博弈的高手，只是如何对策，不仅考验政治智慧，而且受到局势、实力和各方错综复杂关系的牵制。

正如学人已经论及，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围绕组织统一民国政府的角力，在南北和谈期间便已展开。孙中山注意到袁世凯有可能利用与清王朝的关系，尤其是掌控全权政府的有利地位，而将其接掌政权做得好像接续清朝大统，以免受到南方共和政府的约束钳制。在清帝决定退位之际，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便代表内阁提出一项解决时局的方案，即南北现有政权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统一政府。孙中山敏锐地察觉此举背后的玄机，电示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明确反对清廷私授政权于其臣，反对北京更设临时政府，接着要伍廷芳将各项条件交各报馆公开发表，以确保袁世凯斩断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1]

袁世凯当然清楚，完全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势必落入张网以待的民党彀中，所得大总统的位置名号，不过是形同虚设的傀儡。这是权力欲很强的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的。他特意将退位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虽然仅仅变动“与民军”三个字的位置，意思却大相径庭。据此，袁世凯可以自行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然后再与民军协商统一。如此一来，则不仅袁世凯的权力来源受自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无关，民军在创建共和政府时不具有法统地位，而且无论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袁世凯都是大权在握的权力中心。孙中山对此虽然感到愤怒，可是退位诏书颁布，木已成舟，回天乏术，只得以临时政府约法、定都南京以及参议院等条件相约束。^[2]据当事人之一的蔡元培回忆，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南来就职，并且定都南京，就是希望其以此“表示接受革命政府之系统，而避免清帝禅让之嫌”^[3]。

仔细推敲，袁世凯的意图，固然有正统观念，主要还是防止掉进民党设好的套中。相比之下，退位的清室对其未来的执政已无实际约束力，而且清朝正式宣布还政于民，还使得袁世凯天经地义地成为民政的代表。此外，民党方面的防范措施，也有含混不清之处。尤为重

要的有两点，一是就职与定都相分离，二是统一政府的组织尚无定论。这些恰好为袁世凯施展权术留下了必要的空间。

由于南方阵营内部存在分歧，虽然孙中山提出定都南京作为牵制条件，实际上定都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北上迎袁专使蔡元培一再声明此行并不涉及建都奠都事宜，只是请大总统南行，等于明示首都的地点仍在可以讨论之列。鉴于北京局势不稳和北方军人将领纷纷反对统一政府设在南方，权衡妥协，蔡元培等先是放弃临时政府地点之议，以换取袁世凯南下就职，继而提出在袁不能南行，而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的情况下，采取变通之策，即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然后重兵护卫参议院及内阁迁北京。^[4]此事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迫于形势，蔡元培虽然对袁世凯不断做出让步，可是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后再迁往北京一条，却至关重要，不仅将袁世凯控制的前清政府排除于组建统一政府之外，而且使得权力重心所在的责任内阁与南京临时政府一脉相承。

可惜蔡元培等人的想法显然还是一厢情愿，袁世凯不得不接受南方由参议院议定的条件，同意南北统一政府实行内阁制，便无论如何不能放手由总理以南方临时政府的班底为基础建立统一政府，否则，就真的可能流于徒有虚名的傀儡总统。清帝的辞位诏书，给他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他所采取的首要步骤，就是设法将他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掌管的各级各类官署确定为继续维持统治秩序的合法权力机构，而不仅仅作为末代王朝的阁府部院。

辛亥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两道布告。其一，布告内外大小文武官衙：

现在共和国体业经宣布，世凯忝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深惧弗胜。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间断，现值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庶政方新，百端待举，全赖群策群力，互相匡助，务以保全治安，共维大局为要。著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

其二，布告军警：

本政府组织伊始，地方治安，关系至重，全赖军警协同维护，免使居民惊扰。现军警各界赞成共和，早经联合一致，尤应各尽义务，合力维持。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藉以统一政权，保持秩序。倘有不逞之徒藉端生事，扰乱治安者，定当按法惩治，以维大局。凡各级长官，务当共申此旨，认真约束，勿得稍有松懈，致干咎戾。

同日，袁世凯又致电北方各督抚各府州县：

现在改定国体，采用共和，业经大清皇帝明白宣布。凡我国民，须知此次改革，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创局，非舍故君而代以新君，乃由帝政而变为民政。自兹以往，我中国之统治权非复一姓所独擅，而为四百兆人所公有。我中华国民，不论满汉蒙回藏何种民族，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上之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惟当新陈代谢之交，正祸福攸分之日，始基不慎，遗害何穷。吾人同属国民，各有天职，艰难缔造，义不容辞。凯以非才，谬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其何能堪。所赖我贤士大夫，各竭知能，共谋匡济。诸公久膺疆寄，外观世局，内察民情，必有以慰同胞望治之心，方不负大清皇帝致政之意。其或愚氓无识，胥动浮言，亦宜剴切详明，广为劝导，务令各安生业，不酿事端，是为至要。至地方有司，在新官制未定以前，一切暂仍旧贯，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赓续进行，切实保管，不可稍懈。总之，共和国家，舆论即为法律之母，国是一定，万难再事动摇。无论何人，均有服从国法之义务。凯虽不敏，愿与诸公努力行之。^[5]

袁世凯的这两道布告，很快传达到其实际统治的地区。两天后，即十二月二十八日（1912年2月15日），吉林各地官署接到北京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阁令两电，两相比较，虽然吉林西南路兵备道孟宪彝所记较为简略，除个别字外，内容基本一致，甚至文字也几乎一样。次日（2月16日），吉林各地官署再接吉林公署转发的北京来电^[6]，即袁世凯致北方各督抚各府州县电，文字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同日发布的通电，经长春传到吉林，反而晚了一天。

袁世凯的这几道电令布告，虽然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的名义，显示其权力受自清帝，对于光复独立各省应当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地方的前清政权已经分崩离析，执政的是新建的光复政权；但是对于尚未独立的北方各省，尤其是京师的清朝阁府部院而

言，却是意义非凡。既然是大清皇帝授意改政，授权组织政府，既然全体国民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既然军警各界赞成共和，早经联合一致，那么就可以和袁世凯一样，由清朝的臣子变成民国的官民。与此相应，各机构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由皇朝的衙署化作民国的机关。

在政权鼎革时期，新政权实际接管之前，要求旧政权的机构人员暂时负责维持秩序，本来也是常态，未可厚非。可是袁世凯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于维持秩序一节，更重要的，还是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正统化。而且其所谓法统，绝非南方民党力图开创的革命法统，而是一方面承继清朝的正统，另一方面又符合民国的新法统。唯有如此，作为前清内阁总理大臣摇身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才能使其所属的各级政权继续实施合法统治，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组建统一共和政府的重要凭借。吉林各官署接到的电令，在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外，还有袁阁的名义，则不仅全权来自清廷的授予，所以采用共和要经大清皇帝明白宣布，而且所谓内阁，既是清朝的最后一届内阁，更重要的还是由袁世凯掌握全部国家大权的责任内阁。如此一来，袁世凯就在清朝内阁与共和政府之间，由大清皇帝搭起一道连接的桥梁，实现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政治企图。

1912年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随即开始筹备接掌大位事宜。他设立了临时筹备处，直接隶属于临时大总统，为备咨询筹划之机关，在其正式就职前筹备将来建设之计划，分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六股。^[7]同时，作为共和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还继续发布原有清朝内阁各部的人事任免令。如2月21日临时大总统袁命令：学部呈称本部正首领唐景崇假满病仍未愈，应派员接任，委任张元奇兼署。2月22日临时大总统令：法部副首领因病请辞，照准，委任王世琪兼署。3月15日，度支部首领绍英开缺，委任周自齐暂行管理度支部首领事务，陆宗輿暂行管理度支部副首领事务。^[8]也就是说，此时袁世凯是一身二任，民国统一政府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仍然兼负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大臣的重任。

壬子新正（1912年2月18日）这一天，作为袁世凯内阁法部大臣的沈家本“本应诣皇极殿行朝贺礼。因服色不便未去。同人相约如此”，而署度支部大臣绍英却照样朝服进内，先后在皇极门外和乾清门内行三跪九叩礼。^[9]可见同人未必是所有同僚。不行朝贺的真实原因，当是原来的阁揆已经摇身变为民国总统，使得阁僚们处境尴尬，

不知如何才能左右逢源。这一选择，体现了他们在旧主与新酋之间的向背。武昌起义后，京官纷纷出逃避难，各部官员多属暂、兼，已经是维持会性质。因为与南方临时政府关于定都何处的争议迟迟未决，袁世凯只能暂时以原来的内阁为政府。所以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仪式虽然冠冕堂皇，可是因为新政府尚未成立，仍由清朝最后一届内阁的各署首领依次行礼，然后再带同丞参司员谒见行礼。

[10]

在今人眼中，共和与帝制为截然相对，而在进入共和时代的亲历者看来，共和的含义却千差万别。在1912年3月10日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受任典礼上，迎袁专使蔡元培代表孙中山所致祝词和袁世凯的答词，可见双方对于共和各有侧重的选择取舍。蔡元培的祝词称：“我国新由专制政体而改为共和政体，现在实为过渡之时代，最重要者，有召集国会、确定宪法诸事。孙大总统求全国第一能负此最大责任之人而得我大总统，因以推荐于代表全国之参议院。参议院公举我大总统，而我大总统已允受职。孙大总统为全国得人庆，深愿与我大总统躬相交托，时局所限，不克如愿，用命元培等代致祝贺之忱，希望我大总统为我中华民国造成巩固之共和政体，为全国四万万同胞造无量之幸福焉。”袁世凯的答词则谓：“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敬谢孙大总统及欢迎团诸君。”^[11]两相比较，祝词着重于应努力造成与专制相对的共和政体，答词却有意回避此节，凸显自己的众望所归。由此看来，虽然袁世凯在誓词中也表示要奠定共和基础，其共和的意涵更多是指五族共和。

如果说继续旧部的人事任免还是由于袁世凯一身二任，只是实际上有将清朝部院化身为北方共和政权之嫌，前清内阁各部的首领丞参司员作为政府人员正式参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礼，则从仪式层面完成了从被推翻的帝制政府摇身变成与南京共和政权对等的北方权力机构的合法化程序。而北方各省总督与南方各都督同派代表出席临时大总统受任礼，也昭示了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中南北一视同仁的局面。

[1] 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第172—173页。

[2] 此事原来一般据胡汉民自传所记，指为整句由袁世凯添加。参见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第177页。

[3] 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6页。

[4] 《致孙中山电》1912年3月4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3—144页。

[5] 《临时公报》1912年2月14日。

[6] 《孟宪彝日记》，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第558—569页。

[7] 《临时筹备处规约》，《临时公报》1912年2月22日。

[8] 《临时公报》1912年2月22日、23日。

[9] 绍英著：《绍英日记》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283页。

[10] 《沈家本日记》，沈家本撰，韩延龙、刘海丰、沈厚铎等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2—1344页。关于临时大总统的受任仪式，参见《袁大总统举行受任礼纪盛》，《顺天时报》1912年3月10日，第7版，“时事要闻”；《袁总统受任之要电》，《神州日报》1912年3月11日，第3版，“要闻一”。

[11] 《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第3页，“专电·北京电报”。

二 接收与合组

3月13日，已经就任临时大总统三天的袁世凯发令，特任唐绍仪为民国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时报》的“专电”和“译电”就分别发布信息，“专电”称：“袁拟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并赍誓词赴宁，到参议院代表宣布受任，即在宁组织全体阁员，然后北上。是为统一政府成立。经电商孙总统，得复允洽。”“译电”则谓：“袁履任后，将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命赴南京组织统一内阁。袁初谓建设统一政府之办法当如此。至初八日乃接南京政府复电，一一赞成云。”^[1]是日《民立报》的“西报译电”亦称：“袁大总统定初十日（今日）上任视事，举唐绍仪君充内阁总理，唐君再赴南京组织新内阁。袁大总统初八日接到南京来电，允可以上一切办法。”^[2]不同来源的内外专电均确切指称组织统一内阁事宜应由唐绍仪南下在南京完成，印证了蔡元培所说与袁世凯的约定确有其事。

蔡元培与袁世凯的约定并非只是心照不宣的君子协定。3月6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议案，因收到蔡元培北京来电，报告北京现状及对付之法，要求四点：一、袁世凯不必南行就职；二、临时政府暂设北京；三、袁在北京行就职式，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参议院承认后，由总理在南京组织政府，与南京现在之临时政府办交代，组织完备，乃偕参议院迁往北京；四、参议院及内阁全部迁北京时，用重兵护送，以巩固政府，弹压地方。孙中山据此提出四项办法：一、电请黎副总统来南京代表受事；二、以同意委任总理得参议院之承认，在南京组织政府，与现在政府交代；三、如黎副总统不能来南京，则拟交代于武昌；四、袁世凯可否于北京行正式就职礼与临时政府地点暂设北京一节，请由参议院决定。

参议院对此意见不一，或谓所拟办法非但无济于现在之问题，且徒多生事。经过全院审议会审议，决定办法六条，其他如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向参议院宣誓后由参议院承认并重告全国、孙大总统于临时政府交代后始行解职等，大体如前议，可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第五、六两条意思却有些含混，多少偏离了初衷。一是袁大总统受职后

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二是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与现在政府行交代事宜。^[3]与蔡元培的要求及孙中山所拟办法相比照，组织内阁之权操于袁世凯之手，不仅总理人选无须与南京、武昌协商，还要决定各部总长人选。而原来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政府，变成只是由总理总长办理南京临时政府的交代。可以说，参议院的举措顾及了自己的面子，却使得南方民党钳制袁世凯的利器大为受损。

3月17日，唐绍仪会同黄恺元、刘冠雄、王正廷等人乘火车南下，“此次唐氏南行，负责甚重，国务员之位置，须俟唐到南与各员接洽，得其同意，方能正式宣布。盖恐发表之后，又纷纷辞职，蹈从前之弊也。如原定诸人须有更动，则可由唐氏随时选任”^[4]。3月25日唐绍仪到南京后，“国务卿即须发表。现各部人员，唐均暂时慰留。至政府迁往北京，约须在一月之后也”。据3月下旬的《大陆报》称，其时新内阁国务员国务卿只确定了三人，其余将于本星期内宣布。^[5]3月29日，唐绍仪列席参议院会议，发表政见，提出各部总长名单。除交通总长外，均获通过。

革命党为了制约袁世凯，特意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依照内阁制原则，国家权力在于内阁，总统无权参与或干预内阁的人事。即便根据南北双方约定，也应由袁世凯和南京、武昌方面协商决定。不过，民国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与一般的内阁制却有三点不同：其一，大总统并非虚尊，其总览政务，绝不仅仅是名义；其二，国务院不是由多数党（一党单独或数党联合）组成，很难与国会结成同盟；其三，国会本身基础薄弱，无法有效制衡行政权力。宋教仁以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就可以使总统政治权力至微，纵有野心，也不得不就范，只有纯就体制而言。所以胡汉民指出，内阁制纯恃国会，国会无力，无由抵抗，遑论内阁。^[6]

胡汉民所言很快就得到印证，在府院会的三角关系中，总统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由于袁世凯的实际权势及其与唐绍仪的关系，阁员的人选其实是以袁为主导提出和确定。但是袁世凯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如果唐绍仪南下，真的是在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基础上组建统一政府，然后再让内阁与参议院一道联袂北上，则尽管定都北京以及占据内阁阁员的要津，仍然无法割断与南方民党政府的联系，更难以驾驭南方临时政府的大批司员。所以，袁世凯必须想方设法要使组建统一政府之事发生于北京，而且是以南北政府现有人员为基础

重新组建。为达此目的，袁世凯双管齐下，一方面尽快公布阁员名单等信息，并改变在南方组建国务院北上接收的前约，让总长已在北京的各部抢先办理交接，造成接收南北政府的行为性质相同的印象；另一方面，迫使在南方组建内阁的唐绍仪以及南方各国务员匆匆北上，使得新政府整体北迁的计划消于无形。

3月30日，组阁事宜终于告成。新内阁成立之日，一直密切注视中国政局变动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发表评论，认为经过20余日才能成立，新内阁可谓难产。但总长人选南北尚无偏颇，只是面对问题甚多，执政有待考验。^[7]同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现在各部总长业经任命，除内务、陆军总长在京及外务总长另已派署外，其余各总长未到任以前，在京原有各部事务，暂行照旧办理，以待分别交替。^[8]京中旧部如度支部、农工商部、海军部、学部、邮传部、法部等，皆奉总统令停止办公，清理文件，预备交替。^[9]

这时新政府尚未正式成立，袁世凯也没有正式发布接收令，可是各部除了准备各项交接事务外，一些由北方人士任总长的部门已经悄然开始实施交接。有报纸报道：“自各国务总长发表后，北京各旧部即纷纷赶办交替，除内务、陆军两部由赵、段两总长自行交代自行接收外，其他各部均于八号呈报总统府，已将应行交代事宜办理完毕，专俟各总长到京后交替等情。当奉大总统批复，司法、交通两部即由徐次长、施总长即行接收，无须与各部一同延候云。”^[10]也就是说，还在4月上旬，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由其旧部属出任新政府国务员的部门自行接收的行动已经开始。这与其说是接收旧政权，毋宁说是进一步认可新旧政权继替关系的合法性更为恰当。

国务员名单公布后，南京临时政府如约解散。4月2日，南京领事团接电：南京临时政府今日解散，各部次长即由总长推荐，然后开阁议委任。新内阁定于本月十日移往北京。领事团随即将此消息通报《字林报》。^[11]由于是新建政权，确定组阁名单，与完成所有组阁事宜距离甚远，除了次长的人选及委任外，还有各部机构的组织与人事的安排。为此，唐绍仪继续在南方进行活动，以便组织一个基本成型的新内阁并如期迁往北京。

可是接下来事情似乎不大顺利，4月10日的约期已过，唐绍仪和新内阁未能动身北上。这引起北京方面的严重不安。南北之间因为定都问题曾发生尖锐分歧，南方虽然迫于情势以及内部意见不一，不得已

同意定都北京，却始终心存芥蒂；而北方在首都之地最终定局为事实之前，对此仍不无疑虑。北京传闻说：“唐总理、各国务员及参议员迟不来京，此间均疑南人因反对迁移北京，故此留难。”^[12]不过，这时让北方更为担心的或许已经不是首都地点在南在北，而是害怕唐绍仪在南方组织的政府太过完善，使得北方失去人事安排的空间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北上之后袁世凯的旧部只能屈从。

对于唐绍仪延期滞留南方继续组建新政府部门的行动，袁世凯事先已经获悉，为此感到相当忧虑。他不能容忍唐绍仪将一个以南方临时政府人员为基础主干的新政府带到北京强加于自己。据报道：“国务员迟不来京，袁总统甚为焦虑，初九日午后，召集陆军总长段芝泉、内务总长赵智庵、署外交总长胡馨吾在本府楼上筹议办法。经袁总统宣言，谓国家危急已至如此，而国务诸公尚多猜疑，必欲拥兵北上，外则貽笑友邦，内则徒生意见。”如果报道属实，则在4月10日之前，袁世凯等人已经决心迫使唐绍仪等加速北上。在确定了危及国家的罪名之后，袁世凯复电唐绍仪，南来人员限期4月20日必须一律到京。^[13]此举的目的，显然在于阻断唐绍仪在南组建新政府各部的计划，迫使其回到北京后再进行组建统一政府的活动。

列强再次机缘巧合地帮了袁世凯的大忙，恰在此时，北京外交团提议，以民国政府久不成立，南北势将分裂，将公举代表监督财政。北方各种拥袁势力趁机鼓噪，向南方施压，逼迫滞留上海的唐绍仪迅速回京，参议院和各国务员随同北上，在京从速组织政府。4月12日，北京国民协进会致电上海各报馆各政团：“乃自总理受任以来，掷至宝之光阴，为无谓之延搁，影响所及，险象迭生，竟使外人于民国开幕之初，即议监我财政，国民未睹共和之建设，先见亡国之端倪，谁生厉阶，种兹恶果。试问总理及参议院，何忍曲徇私利，陷全国于无政府而不顾耶？顷参议院已有二十以前到京之说，切望总理率各国务员于两三日内起程北上，先使政府成立，以抵剧烈之外潮，诸事方能着手，尤望各政团各报馆将此危急情势，警告国内，共谋拯救，无任迫切。”^[14]一时间南北各方风起响应，公私各电敦促参议院和国务员北上者达数百通之多。

其实，按照唐绍仪事先宣布的日程，最早也要4月10日才能和新内阁及参议院北上，这时不过刚刚到期，虽然的确未能如期启程，但要是虚掷光阴，故意延搁，却是欲加之罪了。所谓曲徇私利，无疑正是以南方临时政府人员为基础组织新内阁部之事。对此唐绍仪抵达南京

时，已经预期组织政府部门或许较确定阁员难度更大，因而表示政府迁往北京的时间当在一月之后，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而北方的拥袁各派借故造势，目的就是要打乱相关的部署计划，夺取组织政府的主动。

在各方的压力下，尚未完成组阁事宜的唐绍仪只得匆忙决定尽速北上。据4月15日总统府得南方来电：“谓唐总理偕同内阁各员及随员等四十人，定期十五日（昨日）夜半乘招商局新昌轮船来京。”唐绍仪及各国务员电告袁总统，准期二十一日可以抵京。^[15]关于其滞留南方的原因，各报前后报道不尽一致。开始说是包括处理沪军都督的去留、南京各部之交代、向沪上某银行商借款项以及罗致人才等。^[16]后来唐绍仪由沪启程时，电达梁士诒转呈袁世凯解释其留沪原因为：一、财政总长熊希龄不肯就职，电邀张謇来沪劝驾；二、江苏都督庄蕴宽辞职，难觅替人，程德全最合适，而程不肯轻允，几经磋商，始克就绪；三、江苏境内尚有上海、江北两都督，势必取消，而定江苏都督驻扎地点于南京，转折甚多。^[17]似未涉及在南方组织统一政府事宜。

而据《民立报》的消息：“唐总理绍仪来沪浹旬，与各国务员面榷要政。屡得袁总统、黎副总统电促北上，急于星火。”^[18]《顺天时报》也报道说：“唐总理在上海勾留数日，现与各国务员会同妥商南方政府善后办法，日无寸暇。故袁大总统日来甚为焦虑，限期电催从速北上，以便组织新内阁。”^[19]可见唐绍仪南下的确与组阁事宜有关。所以，开始南方各报报道南京临时政府各部北上之事，给人的印象就是新组建的政府整体迁往北京。如《大共和日报》4月4日北京专电，措辞即为“外交、理财两部须先移至北京，其余各部亦陆续移往”。这与蔡元培所定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办交代，然后内阁与参议院迁往北京，以及唐绍仪到达南方之初所说组织好政府再迁往北京的意思大体一致。

不过，关于此事，无论是唐绍仪还是南京临时政府，态度与说词都有些模棱两可。其时南京某报主笔曾以个人名义询问参议院不甚赞成袁世凯所交国务员提议的原因，某议员的答复是：袁的提名为12部，与参议院议决的10部制不合；人选中袁仅推荐4人，其余为孙中山所荐；袁的议案系由孙中山接收，而孙尚未交院，参议院为此已备正式公文质问。记者又问：按照贵院所议，“唐内阁一接收，孙公即日解任，政府各员随同唐内阁北上耶？抑袁总统在北，政府在南耶？”

议员答道：“依事实观察，政府应在北京，政府与总统无分而为二之理。”^[20]如此答复，显示参议院未必完全清楚蔡元培所议定的条件以及为何要定下这些条件，或是已经放弃了原来议定的一些原则。4月初，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已停止办公，次长亦各存五日京兆之心，科长科员等虽经唐绍仪慰留，而愿北上者十只一二。故现在各部人员形同过客，但愿早日交替。^[21]

事情的复杂反映于信息的不一致。在刊载某报主笔与参议员问答之事的同日同版同一栏目，《顺天时报》还刊登了一则据称是探听确切的消息：“南京各部员暨各科员均皆一同来京，并携带卷宗交代。”^[22]所以4月2日孙中山总统与各部员行正式解职礼后，各部次长由各总长介绍召开内阁会议，内容之一，便是“取决新内阁前往北京，十日内可就绪”^[23]。与之吻合的相关事情不止一端。4月7日午前10时，刘冠雄作为新任海军总长到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行受职礼，海军人员到者百余人，前总长黄钟瑛在沪未返，由王统代为宣读解职辞，侯毅代总长宣训词，海筹舰长林颂庄代表全体述答词，刘冠雄书“共和万岁！民国万岁！海军万岁！”十二字，启用关防，同声呼万岁。刘冠雄还以人惟求旧为由，邀请该部已经辞职的各员一概北上。^[24]4月17日，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曾公电北京总统府，因袁大总统迭次电促南京各部北上，该部将于18日赴京，所有关于司法行政事件，祈直接北京本部办理。^[25]种种迹象表明，南方临时政府各部确有机机构北移的主观认为。也就是说，如事先约定，应由唐绍仪在南方成立新政府，接收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即国务员接收南方各部并行受职礼，然后北上接收前清各部，而非由南北政府的人员共同合组新政府。只是实际进程中演变成南京临时政府各部就地交代并停止，仅有部分人员北上，参与新内阁即国务院的组建。

得到唐绍仪等人的承诺，袁世凯仍不放心，抢先对外发布新政府各部所在地址：总统府，南苑行宫（拟改陆军部旧署）；内阁，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参谋部，煤渣胡同前贵胄法政学堂；陆军部，铁狮子胡同旧署（拟改盐政院）；海军部，石驸马大街旧署；外交部，东堂子胡同旧署；内务部，民政部街民政部旧署；教育部，铁匠胡同学部旧署；理财部，户部街度支部旧署；司法部，刑部街法部旧署；农林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工商部，粉子胡同农工商部旧署；交通部，西长安街邮传部旧署。^[26]这种看似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架势，使得南方的国务员更形被动。

与此同时，北京军界统一会致电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官各会党各报馆：“内阁总理暨各国务员不能克期任职，政府不能正式成立，国步益臻危险”，鼓动各方致电袁世凯，“倘果五日以外犹事迁延，非如原电所云，恳请大总统先行派员署理，实无救亡之策”。^[27]黑龙江都督发电，也有国务院各部先行派员署理之说。还有消息称，袁世凯电催唐绍仪，限于14日到京，“否则即仿胡惟德署理外交总长之例，命北京各部旧首领署理国务大臣，组织政府，以便政治之进行”^[28]。这无异于对南方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参议院和国务员不能尽快到京，北方将单独重新组织政府，其班底则照用前清旧员。

迫于内外形势，尽管各部组织事宜尚未完成，唐绍仪和国务员也不便继续滞留南方。4月15日，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等由宁回沪，与总理唐绍仪于晚11时乘新昌轮船同行北上，轻装减从，联袂偕来。18日抵塘沽，19日到天津，20日正午乘车进京。同时携来南京总统府秘书室及各部印信文件。^[29]海军总长刘冠雄于4月19日由上海启程，司法总长王宠惠则准于4月21日由粤启行赴沪。财政总长熊希龄于5月初抵京。工商总长陈其美以沪军事事务尚未布置完成仍然留沪，后又因舆论反对之声强烈，屡请辞职，坚持不肯北上就任，派熙彦先行暂理。^[30]而尚在驻俄大使任上的外交总长陆征祥远在俄京圣彼得堡，致电袁世凯，定于五月初由圣彼得堡乘夜行车回国。^[31]直到5月28日，才由津来京。^[32]正式就任更是迟至6月10日。^[33]其到任前，总长一职由胡惟德署理。

总理唐绍仪于4月20日午刻抵京后，径赴总统府商议要政。次日，内阁阁员晋谒袁世凯商榷部务。对于仍有国务员迟迟不到任的情况，袁世凯再度施压，“袁总统与唐总理会议，以各部长悬职不就，准再俟一星期，如再不到任，即另行委代”。新内阁先设国务会议厅，每日令各国务员赴厅集议。各部先设临时办公处，俟参议院通过内官制后，再行完全成立。^[34]对于先期公布的各部署地址有所调整，大总统与各国务员决议，陆军部迁出，租定安定门内大佛寺以北东胡同路北某私宅办公，原署修缮，作为国务院办公之地。司法部仍用法部旧署，俟大理院新署完工再行迁入。工商部仍用农工商部署。农林部拟暂用典礼院署或吏部署。参谋部拟用西长安街銮舆卫地址。^[35]

[1] 《时报》1912年3月10日，第2版，“专电”“译电”。

[2] 《民立报》1912年3月10日，第6页，“西报译电”。

[3] 《临时政府大决议》，《民立报》1912年3月8日，第7页，“新闻一”；《临时公报》1912年3月9日。据3月6日下午的《参议院议事录》，议案系由谷钟秀提出。（张国福选编：《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3页。）

[4] 《唐少川南下之行色》，《神州日报》1912年3月23日，第3版，“要闻一”。

[5] 《南京近事摘要》，《神州日报》1912年3月29日，第3版，“要闻一”。

[6] 《胡汉民自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4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7] 怒安译：《支那新内阁》，《神州日报》1912年4月9日，第1版，“译论”。

[8] 《临时公报》1912年3月31日。

[9] 《民立报》1912年4月1日，第3页，“专电·北京电报”。

[10] 《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4月17日，第3版。

[11] 《西报记南京近事》，《神州日报》1912年4月3日，第3版，“要闻一”。

[12] 《申报》1912年4月14日，第1版，“专电”。

[13] 《盼望国务员到京之迫切》，《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3版，“要闻一”。

[14] 《北京国民协进会电》，《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1、2版，“公电”。

[15] 《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1版，“专电”。

[16] 《唐总理滞沪原因》，《顺天时报》1912年4月10日，第7版，“时事要闻”。据称这是唐绍仪密电袁世凯的相关内容。

[17] 《唐总理电释留沪原因》，《申报》1912年4月22日，第2版，“要闻一”。

[18] 《国务员联袂北行矣》，《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第10页，“新闻四”。

[19] 《唐总理北上问题》，《顺天时报》1912年4月9日，第7版，“时事要闻”。

[20] 《某记者与南京议员之问答》，《顺天时报》1912年4月9日，第7版，“时事要闻”。

[21] 《南京政府近闻纪要·各部之近状》，《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7日，第4版，“紧要纪闻”。

[22] 《部员议员之来京消息》，《顺天时报》1912年4月9日，第7版，“时事要闻”。

[23] 《要电》，《天铎报》1912年4月3日，第1版。

[24] 《新海军总长受职记》，《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9日，第3版，“紧要纪闻”。

[25] 《南京司法部移北京公电》，《顺天时报》1912年4月20日，第7版，“时事要闻”。

[26] 《新政府各部地址表》，《申报》1912年4月17日，第2版，“要闻一”。

[27] 《申报》1912年4月14日，第2版，“公电”。

[28] 《关于新国务员之要闻·电促尅期北上》，《时事新报》1912年4月12日，第2版，“紧要时事”。铁血监督团也发出内容相同的电报。《北方通信纪一·各界对于国务员之公愤》，《时报》1912年4月23日，第2版，“要闻”。

[29] 《唐总理偕国务员到京》，《顺天时报》1912年4月20日，第7版，“时事要闻”；《唐总理回京时的气象》，《时报》1912年4月27日，第3版，“要闻”；《国务员联袂北行矣》，《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第10页，“新闻四”。曾有消息说几位总长偕同参议员60余人于4月19日到京，内阁总理唐绍仪20日到京。《时报》4月19日刊登的4月18日天津专电则称，唐绍仪和各总长当日到天津，即乘专车赴京，并未驻留。

[30] 《申报》1912年4月22日，第1版，“专电”；《陈其美之举员自代》，《顺天时报》1912年4月24日，第7版，“时事要闻”。

[31] 《民立报》1912年4月18日，第3页，“专电·北京电报”。

[32] 《申报》1912年5月29日，第1版，“专电”。

[33] 《外交部总长陆征祥通行就任日期文》，《政府公报》第44号，1912年6月13日。

[34] 《申报》1912年4月23日，第1版，“专电”。

[35] 《再纪各部署之地址》，《申报》1912年4月23日，第2版，“要闻一”。

三 办理交接

唐绍仪抵京当天，即由旧员缮写前清内阁一切文书案卷及人员名录的清单，收拾器具，准备迁往设于原陆军部的国务院办公处。^[1]4月21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现在国务院业经成立，在京原有各部事务，应即分别交替，由各部总长接收办理。”^[2]这一道命令，应是新生的共和政权正式接收清朝旧政权的法定文书。按照日程安排，各部定于4月21日停止办公，开始办理交代，次日各部总长行正式接任礼就职。^[3]不过，由于各部总长来源各异，到任时间不一，所以各部的交接手续并非同步以同样方式办理。

按照原定程序，统一共和政权成立之际，南北政府同时解散，国务总理在南方成立新内阁，接收南方临时政府，然后北上接收旧政权。可是由于事先约定细节上并不明确，尤其缺乏具体程序，实际操作起来，国务院的整体行动不仅最初演变成南北各部的各行其是，而且随后不得不在南北旧员的基础上合组新政府。原来的北方各部其实是前清旧署，与南方临时政府处于敌对状态，即使同意以清帝退位的较小代价换取帝制结束，南方民党也从未承认其合法地位。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下令原责任内阁各部继续执行政务，新内阁发表，袁旧部任总长的各部又自行接收，加上袁世凯本人以及北方各总长的原有身份，使得北方各部看似具有某种权力来源相当含混的民国新政权的合法性。而南方临时政府在被新内阁接收之后，其人员又以个人身份北上参与新政府各部的重组，等于再度被遴选，在新政府中民党的色彩进一步淡化，革命的新法统几乎荡然无存。

教育部是各部中办理交接事宜较快且较为顺利的。总长蔡元培到京数日，以次长范源濂未归，故于接收事宜，未曾议及。等到范源濂回京，即商量接收办法。^[4]蔡元培本来计划，“此次办理学务，除酌留学部旧人外，尚在各处网罗知名之士。现蔡因罗致之人尚未到京，而学务又不能久延，乃先派人接收学部事务，以便着手开办”^[5]。4月24日，蔡元培发布《接收前清学部谕示》：“本部未成立以前，须先派员接收学部事务，以便重行组织。兹派白作霖、赵允元接收总务

司事务，陈应忠、刘唐劭接收专门司事务，陈清震、王章祜接收普通司事务，路孝植、王家驹接收实业司事务，陈问咸、柯兴昌接收会计司事务，崇贵、陈琦接收司务厅事务，彦惠、刘宝和、祝椿年、李春泽接收督学局事务，高步瀛接收图书局事务，常福元接收名词馆事务。定于本月二十六日上午十钟办理接收。该员等自接收之日起，即应按日到署，各司其责。俟本部组织成立，再候本总长分别委任职务可也。”^[6]

依据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这份谕示的底本虽系蔡元培本人所留手稿，可是教育部的接收当在谕示发出的当天即24日已经付诸实行。据5月1日《教育部呈分设厅司请委任参事等职文》：“本部已于四月二十四日接收学部事务。”^[7]同日《教育部通行各部院等文》亦称：蔡元培于4月24日就任教育总长，即在旧学部办公。相应通行各部院各旗都统南京留守各直省都督民政长查照，嗣后京外各衙门如有公文函件，可径向该处投递。^[8]稍后教育部又续派崇岱、孟心远接收八旗学务处，晏孝儒、高文彬接收国子丞衙门，彭聚星、秦锡纯接收图书馆。^[9]

已经先期在南京行过受任礼的海军总长刘冠雄于5月1日到部就任，而海军部的接收手续从4月27日起已经开始办理。据4月28日专电，“海军部已于昨日派员接收，计留旧部员二十余人”^[10]。所谓留用旧部员，只是暂时办理交代人员，据《申报》5月3日《各部新陈代谢记》：“海军部于前月二十七号办交代，甚形忙碌。其交代人员悉由总长先时派定，新旧两方面俨如旗鼓相当。新人员中派出吴振南、侯毅、吕德元、陈鹏翥、刘永谦、陈复、刘华式、曾兆麟、冯涛、丁士芬、刘勋铭等二十余人，旧人员中派出严复、吕富永、张贤远等亦二十余人。海军部旧共八司，已有七司交代清楚，惟军储司以帐目蒙混，无从稽查，旧存款本有二百零三万有余，大半毫无着落，各人均不愿接收，故该司交代，拟另日再办。”^[11]具体分派为：秘书处侯毅、梁能坚，军制司刘华式、郑礼庆，军政司余振兴、郑友益、汤文城、荣鸿澜，军学司曾兆麟、奚定谟、阳明，军枢司孙必振、陈宗雍、钟纳，军储司吕德元、刘永谦、刘勋铭、朱伟、冯涛，军法司陈复、马国宾，军医司姚蔡常、夏昌炎，主计处陈鹏翥、张承愈、丁士芬。各于4月27日午后1时前往旧部，分别接收。除另派旧部人员会同办理外，并由吴振南参事同该员认真将旧部一切印信文件财产物品，务须详细检核，点收清楚，不得稍有忽漏。^[12]

海军部的交接持续了数日，5月3日海军部发布《海军部承认各处交接事件日期广告》：“本部与旧海军部办理接收，行将就绪，嗣后凡与各处交接事件，在阳历五月一号以后者，均归本部承认。”^[13]

教育部的接收事宜进行顺利，蔡元培处置得当之外，有其体制上的便利。因为该部接收范围大体为学部管辖之内，相对简单，容易操作。而从帝制变为共和，新旧政府的设置并不都是这样简单地对应，不少新设与旧管无法对口，给交接之事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如前清的农工商部，民国一分为二，变成农林、工商两个部。这样的安排，既有农工商业日显重要的时势需要，也不无位置南方要人的权宜考虑。而新设事务固然可以各自为政，与农工商部的交接则须两部协调进行。农林总长宋教仁于4月27日正式就任，暂在农工商部署内设立办公处，并行文各部院：“凡有咨报文件，均至办公处投递，俟本部择定公署地址迁入后，再另行通告可也。”^[14]由于工商总长陈其美迟迟未能北上，“宋总长于接收事宜尚未议及，须待陈工商长来京，将分割事宜议妥，方有办法”^[15]。新部已经开门办公，旧署的摊子却依然存在，不知何时如何收场。4月30日，农工商部总算交代清楚，全体解散，所有堂司各员及苏拉同时离署。当日该部仅有南来人员十余人典守一切。^[16]

另一种情况是旧部撤销，归并到其他新部，如理藩部的归属。民国实行五族共和，各族平等，而且是在国民的身份地位上一律平等，具有强烈宗藩色彩的理藩部自然不宜继续存在。开始袁世凯拟将理藩部归并内务部，内务总长赵秉钧申请改隶内阁，袁以内阁事务过繁，不暇兼理，仍持前议。因管理蒙藏必须熟悉边事，特命原理藩副大臣荣勋为内务次长，并依总长赵秉钧所议，设接收所，接收理藩部事宜。将来或设立边务总局，以荣为局长。^[17]4月23日下午，内务次长荣勋奉命到理藩部办理接收，将一切案卷查点加封。^[18]后内务部设立蒙藏事务处，专管蒙藏事务。

有的旧部整体上虽然与新部对应，其下属机构仍有不能为新部所容纳者。如度支部原有银库、缎匹、颜料三库，后两库所存为香烛纸帛，用于宗庙祭祀。财政总长拟派人前往调查，所有物品或归皇室，或变价办公，并将二库裁撤。^[19]

内务、陆军、司法、交通四部，因为总长或次长为旧部人员，可以自行交接，本应相对简单。但是四部在新旧体制中均为大部，地位

重要，各方牵扯也多，因而在新旧交替过程中，都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国务院成立后，先期自行接收的内务部因受人指摘，全体辞职，暗潮剧烈，波及警界。^[20]内务部所辖内外两厅曾风传有归并之说，外厅区全体解散。好在四区各员虽然未受民国委任，因警察于人民直接，又属国民一分子，故仍然照常办事，以维地面。新政府成立后，特呈请派员接收，其未交代以前，仍照常办理。^[21]

法部自4月21日国务院成立，各部奉命准备办理交接后，署中即公事停办，印信停用，有要紧事，送往国务院交新任司法次长徐谦办理。法部大臣沈家本“专候交代事毕即可脱离政界矣”^[22]。法部旧人为此到徐谦处大闹，又聚会商议应对之策。徐谦曾建议变通办法，在总长到任之前由次长代为接收旧法部，事为唐绍仪所驳。5月1日，王宠惠抵达北京，次日就任司法总长。5月7日，司法部正式办理交接，所派9人中，骆通等4人为南来之员，其余5人为法部旧人。^[23]次日交接完毕。司法部暂时仍在法部旧署办公。21日，司法部又派恩培接收了法律学堂。^[24]

交通总长施肇基于4月22日受任，交接事宜的办理情形前后数变，先派曾述桢、罗忠诒、李建勋、王景春、章祖禧、叶恭绰、蒋尊祹、于俊年、龙建章、许沐盛、姚华等12人接收交代事件，并由其厘订办事章程及其他一切事项。^[25]后续留旧部人员达31人，分为四科，由船政司长龙建章、路政司长叶恭绰、电政司长唐文启、邮政司长唐元楷出任科长，另给委任状，分别供职，办理接收事宜。^[26]再后留用旧部员增加至51人，分为总务、路政、电邮航政三股，接收各司公事。^[27]

度支部于新政府成立时，即已预备交代，派人清理案卷。因为总长熊希龄尚未到任，交接迟迟不能进行。其时其他各部办理交替，纷纷裁汰旧员。度支部冗员向较各部为多，预计将来裁汰，亦必较各部尤甚。所以部员中自揣无望者，已不俟发表，即纷纷出京，其余亦均不到部。据说每日赴部签到者，不过五六人而已，即交代册卷，亦无人理处。主管部务的度支部副大臣周自齐感到极为棘手，无可如何，赶紧出京赴山东都督的新任，以免纠葛。^[28]因部中诸事无人主持，故有兼署之举。开始拟以梁士诒署理，梁不承诺，改命施植之。而施

并不到署办公，一切事暂由陆宗輿、王璟芳、曲卓新等三人处理。^[29]

待到总长熊希龄抵京时，该部已无一人到署办公，只留了庶务科数人，将案卷清单及署中印钥送往熊希龄住宅。惟金银库系库款存储之地，丞参嘱咐管理人当面交代后方能离开。^[30]5月6日，熊希龄到部视事，传见丞参之外，点收各项公牍，并盘查金银库，查毕即亲自标封封库，加派兵警日夜驻扎保护。^[31]该部共留用旧员王璟芳等41人，并设立部务筹备处，以王为总办，章宗元副之。^[32]稍后南京部员及新调各员陆续到京，即选派沈式荀、钱应清、徐恩元、陆定、陈同纪、潘敬、杨汝梅、陶德琨、王君黾、姚传驹、王世澄、卢学溥、罗永绍、项骸、黄序鹈、向瑞琨、嵇芩孙等员，迅速到处办事。^[33]

先期已由段祺瑞自行办理了交接手续的陆军部，仍然需要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所以该部自4月29日起分司分科办理部务，并以此作为本部正式成立之期。^[34]

除了阁部，还有一些前清机构在裁撤归并变通之列。开始计划裁撤取消的有弼德院、都察院、翰林院、太医院、变通旗制处、内阁承宣厅、制造局等。^[35]除制造局拟改庸勋局外，承宣三厅及叙官、统计、印铸三局均照旧职任略加变通。^[36]5月上旬，由承宣厅交到法律馆呈请辞职一件，总统批示照准，指定法制局局长接收办理。该局于5月10日派员前往接收，所有草案稿本公文档册关防钥匙款项账据并房屋器具印刷机器，凡属馆中所有，均经分别造册移交，法制局逐一点收清讫。除咨行财政部查照外，并呈明大总统鉴核备案。^[37]内阁叙官局改为铨叙局，5月8日，大总统任命张国淦为局长，张于当日到局视事，并定于10日午前接收一切文卷。^[38]5月上旬，印铸局改组，旧局员仅留3人，其余交卸解散。^[39]5月中旬，国务院咨行清宫内务府令转行知照前清内阁制造局，“谓该局所管事宜，现已归并铨叙局，兹改于本月二十日（即四月初四日）派委夏局员等前往接收，希飭各禁门等处查照放行”^[40]。

由于新旧体制不能完全对应，出现了个别旧机构的接收之事无人过问的乱象。如“各部皆有人接收，惟典礼院竟至无人过问，有云应归教育部，有云应归内务部，有云归皇室者，究竟如何结束，不得而知。该院人员，莫不惶惑无主”^[41]。据说内务部官制有典礼司，或

许将来归于该部。^[42]直到6月初，才决定归于教育部，并由该部派人接收。^[43]大理院卿率全院人员辞职，已获总统批准，可是接收未派专人，另组又不闻办法，无所适从。^[44]后大理院依然保留，5月18日，任命许世英为大理院院长，6月14日，许到院视事。^[45]

有的前清机构，理应裁撤，却出现了一些人为变数。“内阁成立，都察院本在裁汰之列，惟宪法上行政裁判机关尚未成立，日前袁总统拟即将都察院改为评政院，特命筹备处拟就章程，俟交参议院通过后，再行发表。或言将改名察礼院，未知孰是。袁总统前曾函致钦天监，邀请监正恒安、陈寿彭、左监副徐洪塘、右监副常海至迎宾馆，委任修改中华民国二年新旧合历。闻该监各堂现正筹议，除按新旧历合订外，计存者为干支节气月令星宿，废者为前清纪年忌辰及种种迷信，添者为星期革命大纪念日及日月蚀之原理与新天文之说略等项，约于日内先将草案送呈袁大总统核准后，即行入手修纂。说者谓该衙门本应淘汰，今得此一举，又可苟延残喘矣。”^[46]

好在这些传闻并未变成事实。5月26日国务院令：“现经国务会议决定，钦天监及典礼院均应隶教育部，所有事宜即归教育部管理，该衙门即赶派员司清查卷宗物件，交由教育部接收。”^[47]6月2日临时大总统令：“翰林院、都察院、给事中各衙门著即取消，由国务院派定专员办理一切清厘裁撤事宜。”^[48]

担任这些衙门的接收委员之一者为许宝衡，其心境行事，很可以反映一些前清旧员参与组建共和政府的心路历程。他原是清朝内阁承宣厅行走，进入民国，一面继续原来承宣厅的公事，一面被袁世凯派为内政秘书，并奉袁世凯之命，参与临时筹备处事务，还兼任参议院特派委员。虽然认为民国取代清朝，是由承平进入乱世，“当此乱世，一瞑不视，未始非福”。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弃世。“余颇信数，以为人生祸福利害，无不有定，无可趋避；又以为为人之道不应无始终，不应弃事，不应专顾自己。寄云谓当今之时，是非无分晓。余谓只能尽其在我而已，不必责人，亦不必徇人也。凡人若有应服之职务，万不可委之而去。譬如一室，为我所居，必无室而后与我绝；一物为我所用，必无物而后与我离，至于离绝之后，而我徇之，则儒家之一义也；离绝之后而我忘之，则佛家之一义也。若孔子之儒，释迦之佛，则无徇无忘，顺其自然而已矣。”秉此信条，许宝衡剪发易服，以示顺应共和新政。

5月24日，国务院总理发令取消前清内阁承宣厅筹划一切：“现在本院承宣厅业已成立，所有从前内阁承宣厅及统计局即行取消，一切文件器具，由本院承宣厅派人接收。”^[49]旧人许宝衡作为新政府的代表前往接收故物，将旧案清理送方略馆大库。以后又陆续接收了翰林院、给事中衙门等处，前者“仅一主事，交印二颗，其文卷书籍皆无存者，器具则为茶役等所朋分”，后者也是交接印信外，文卷等类皆无。^[50]这种情形，也是共和政府接收清朝所有阁府部院办理交接时的普遍状况。都察院即因无可交代之处，自行关门。^[51]

5月初至6月中旬，新设各部相继从国务院承宣厅领到新铸印信，随即启用。^[52]前清及南京临时政府各部的印信则交还国务院销毁。原来临时机构用木刻印信，后均改用银质印信。新的政府机构正式开始执行职掌，办理相关公务。5月中旬至6月上旬，印铸局、法制局、临时稽勋局、铨叙局也分别从国务院承宣厅和大总统处领到并启用新印信，并将原来印信交国务院或大总统。^[53]

截至6月中旬，前清旧署的接收大体完成。不过，由于其中的种种曲折，究竟是新生的共和政权接收了帝制政府，还是南北双方共同组成新政府，变得相当模糊。而改变原定在南京成立内阁的约定，又使唐绍仪接收南方临时政府时的种种允诺无法一一兑现，引出后续一连串南北新旧相争的政坛风波。

注释

^[1]《唐总理到京志略》，《神州日报》1912年4月27日，第3版，“要闻一”。

^[2]《临时公报》1912年4月22日。

^[3]《申报》1912年4月21日，第1版，“专电”；《时事新报》1912年4月21日，第1版，“电报”。

^[4]《国务院开幕后之重要问题》，《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2版，“要闻一”。

^[5]《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要闻一”。

[6]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55—156页。

[7] 《教育部呈分设厅司请委任参事等职文》，《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5月5日。

[8] 《教育部通行各部院等文》，《政府公报》第2号，1912年5月2日。

[9] 《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要闻一”；《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一）》，《神州日报》1912年5月6日，第4版，“要闻二”。

[10] 《申报》1912年4月29日，第2版，“专电”。

[11] 《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要闻一”。

[12]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神州日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要闻一”。余振兴原误作余，感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张力研究员据余氏回忆录指正。

[13] 《承认各处交接事件日期广告》，《政府公报》第6号，1912年5月6日。

[14] 《农林总长宋教仁通行各部院等文》，《政府公报》第4号，1912年5月4日。

[15] 《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

[16] 《旧农工商部之末日记》，《时事新报》1912年5月8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17] 《藩部归并内部之手续》，《申报》1912年4月18日，第2版，“要闻一”。

[18] 《荣次长接收理藩部》，《顺天时报》1912年4月24日，第2版，“杂报”。

[19] 《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5月1日，第3版，“要闻一”。

[20] 《申报》1912年4月25日，第1版，“专电”。

[21] 《六部近闻一束》，《民立报》1912年5月1日，第7页，“新闻一”。

[22] 《沈家本日记》，沈家本撰，韩延龙、刘海丰、沈厚铎等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第1346页。

[23] 《各部近事记（四）》，《民立报》1912年5月13日，第6页，“新闻一”。《时报》称：“司法次长徐谦督催该部司员赶办交代，已有多日。现总长王宠惠既已到任，南来人员亦已陆续到京，全署各员不得不实行交代。业于日前面晤南来各员，将一切案卷逐次面交。惟法部原有人员尚有不少留任者，其位置手续目下尚不能议决。”（《新政府各部之组织》，《时报》1912年4月28日，第2版，“要闻”。）据此，法部旧员是向南来人员交代。

[24] 《沈家本日记》，沈家本撰，韩延龙、刘海丰、沈厚铎等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第1346—1360页；《司法总长就职通告》，《政府公报》第10号，1912年5月10日；《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二）》，《神州日报》1912年5月8日，第4版，“要闻二”。

[25] 《北京各部之现状·交通部之更革》，《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页，“新闻一”。

[26] 《交通部新派科员》，《顺天时报》1912年4月24日，第2版，“杂报”。

[27] 《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第2版，“要闻一”；《新政府各部要闻》，《时事新报》1912年4月30日，第1版，“紧要时事”。

[28] 《新旧各部近状记》，《申报》1912年5月4日，第2、3版，“要闻一”。

[29] 《新旧各部近状记（续）》，《申报》1912年5月5日，第2版，“要闻一”。

[30]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9日，第4版，“要闻二”。该部发给司员一月薪水，饬将文件早为清理完备，4月22日起一律不必到署。（《北京通信记·各部署交代忙》，《时报》1912年4月27日，第3版，“要闻”。）

[31] 《熊总长之莅部》，《顺天时报》1912年5月7日，第2版，“杂报”。

[32] 《申报》1912年5月9日，第1版，“专电”。

[33] 《财政部部令》，《政府公报》第21号，1912年5月21日。

[34] 《陆军部呈报成立日期及大概情形文》，《政府公报》第3号，1912年5月3日。

[35] 《北京近讯摘要》，《神州日报》1912年3月20日，第3版，“要闻一”。

[36] 《新政府内政外交志略》，《时事新报》1912年4月23日，第1版，“紧要时事”；《北京政海春潮记（三）》，《神州日报》1912年4月27日，第3版，“要闻一”。

[37] 《修订法律馆呈本馆草案档册关防及房屋器具等物均交法制局收讫文》，《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5月15日。

[38] 《铨叙局局长张国淦呈报视事日期文》，《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5月17日；《铨叙局定期接收》，《顺天时报》1912年5月10日，第2版，“杂报”。

[39] 《印铸局之交替》，《时事新报》1912年5月8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40] 《清宫近事记》，《申报》1912年5月26日，第3版，“要闻一”。

[41] 《北京各部之现状》，《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页，“新闻一”。

[42] 《京华政局丛谈（九）》，《神州日报》1912年5月30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43] 《京华政局丛谈（十）》，《神州日报》1912年6月2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44] 《京华政局丛谈（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20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45] 《大理院院长许世英通行视事日期文》，《政府公报》第50号，1912年6月19日。

[46] 《都察院与钦天监之存废问题》，《申报》1912年4月11日，第2版，“要闻一”。

[47] 《政府公报》第28号，1912年5月28日。

[48] 《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6月4日。

[49] 《国务院令》，《政府公报》第25号，1912年5月25日。

[50] 许恪儒整理：《许宝衡日记》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7—411页。

[51] 《察院掩门》，《顺天时报》1912年4月26日，第5版，“琐事杂志”。

[52] 各部接到和启用新印信的时间顺序为：农林部（5月1日接到并启用），海军部（5月5日启用），工商部（5月6日启用），教育部（5月7日启用），司法部（5月1日领到，9日启用），财政部（6月12日启用）。参见《政府公报》第11—15、44号（1912年5月11日—15日，6月13日）各部呈报启（开）用印信日期文。

[53] 各局接到和启用新印信的时间顺序为：印铸局（5月12日领到，次日启用），法制局（5月14日启用），临时稽勋局（5月26日领到并启用），铨叙局（6月8日领到，10日启用）。参见《政府公报》第16、30、44号（1912年5月16、30日，6月13日）所载各局启用印信通告。

四 一副空架子

共和政权成立，接收清朝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是却普遍遭遇两个相互牵连的棘手难题，使得相关进程一波三折，充满明争暗斗。这两大难题一是财务，二是人事。

国务员名单刚刚发表，《时事新报》就发表论说，认为官制不善，百弊滋生。前清官制之弊，其一在于冗员太多，鱼龙混杂，相互牵制，人浮于事，泥职低效；其二则官俸厚薄不均，贪污受贿，奔竞钻营。^[1]清帝退位后，原有各官署奉命继续执行职掌公务。3月间，度支部曾经公启：因改用阳历，所有各处薪水公费养廉工食等项，自阳历3月1日起改照阳历按月给发，以前应支各项发布按日计清。军饷暂照旧。^[2]不过，此则公启真是名副其实的官样文章，实际情况是，“自清廷退位后，北京旧部除外邮陆军等部外，其余各部司员情状极为瑟缩”^[3]。据说“各部所发津贴，数目不一。陆军部则如数全发至五月底止，度支部邮传部发至四月底止，农工商部内阁各局均发至三月底止，学部正月发二成，二三月则一文未付，法部、大理院则正月起即不名一钱”^[4]。

一方面没有任何收入维持基本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却要照旧供职办公，一般京官本来相对拮据，旷日持久，实在难以坚持。到3、4月之交，原来最是清水衙门的学部的官员终于开始骚动。“兹闻学部各员司以及书记工役人等，因枵腹从公，刻已数月，薪俸无着，堂官不设法周济，窘迫交加，故于前日不谋而合，群向会计司索款，谓津贴虽已停缓，饭资自应发给，群集一处，势甚汹汹。而会计司各员以本司虽为部中财政总枢，但刻下所存之款，只剩银洋五百元，即悉数付去，为数亦微，碍难分布。相持良久，各员司云，今日无论若干，即我辈每人得三数元亦可稍充膳食之用，而济目前之急。会计司不得已，允从之。总计此五百元之款，分给百余员，按照月薪，分为三等，以五元四元三元为限。后为工役所闻，竟将署门关闭，群索饭食。会计司无可如何，只得再由此款内均摊，计每员只分二三元不等。”耳闻目睹这般情形，连报馆也慨叹“旧部之窘况亦可怜矣”

[5]。据说学部因三月内薪水分文未发，后来得知薪水均暂发给二成，“各司员闻之，莫不欣然有喜色矣” [6]。

学部的窘况或许最为严重，但绝非孤立事件，其他各部也有类似情形，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随着情况的日益恶化和逐步蔓延，各部与度支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北京各部薪水今春大半减成给发，度支之支绌可想而知。乃该部司员薪水独照旧数，因此各部群起责问，疑该部别有余款。嗣据度部复称，捐纳项下有部办费，本归各司员分派，近数月之薪水，即以此项应得之私款均匀摊派，并非自私。他部始各无词。现值新旧交替，细查存款，除存在大清银行之十余万两已不能作数外，其余丝丝入扣，连铜元计算在内，只有二万余两。以皇皇巨国总汇财政之度支部，而交替时竟不名一钱，强留此数以作交代时之场面，亦可慨矣。”受困最甚的学部率先向度支部兴师问罪，“学部涓滴无款，屡向度支部筹商，皆未应命，即薪水一项，亦只允发二成。近学部拟控告度支部，谓其有意留难。度支部闻之，促其早日上控，意谓逞此时机，可向总统府一罄困难苦衷”。 [7]

度支部的哭穷诉苦，并非都是搪塞遁词。据度支部侍郎（后署理度支部大臣）绍英记，武昌失守后，陆军大臣率兵前往镇压，度支部发放了50万两行饷。八月廿四日（10月15日），又放给银行接济市面银50万两。九月初二日（10月23日），度支部还放过一次款。到十月十一日（12月1日），部库实存现银987171两，辅币74万。而筹划已久的向法国续借六千万佛郎（约合银二千万两，六厘息，九六扣，扣去回佣钱等，实合九二扣），又因英美德法俄日会议决定，中国借款概行拒绝，无法成事。十一月初九日（12月28日），清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进退大计，并召见内阁国务大臣商议和战问题，袁世凯表示：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战亦无把握。十五日（1912年1月3日），皇太后交下金八万两，收部库。

其时朝野上下对于亲贵不肯出钱大为不满，而度支部会同外务大臣查明亲贵大臣在各银行并无存款，实则亲贵早已将款全数提出。袁世凯欲战则兵少饷绌，欲和则君主立宪宗旨难保，唯有辞职请另简贤员办理。绍英以现在虽库款尚敷一月之用，而军用浩繁，终有饷项难继之一日，愧悚奚如，也被迫一再请病假并且奏请开缺。 [8] 南北和谈期间，清廷一度发行爱国公债，后来袁世凯也以备战为名勒捐亲贵，前后得银约二千万两，可是这些款项看来大都未入清朝的国库，当由袁世凯实际掌控。 [9]

部库空虚的实况，因为京师官场的中饱侵吞等种种贪墨积习泛滥而更形严重。《民立报》一则《京署人员大活动》的报道，详细披露了形形色色的官场怪现状：

自去年九月以后，各署人员均逃走一空，其能者多赴南京谋新位置，无能者多避居天津。近来大局既定，各员均纷纷回署，遂发现四种怪象，一曰分公款，一曰控庶务司，一曰分私款，一曰卖会馆。几至人人皆有传染病，各署莫不如是。各署大抵皆存有办公经费，自奕劻发起瓜分弼德院经费后，翰林院、内阁承宣厅继起，有一人分千余金者，有得数十金者，于是因分数不均，大起争端，近且互相控告。其余各衙门要求分款者亦纷纷而起。各署经管用款，或曰庶务司，或曰会计司，掌全署收支，为最阔之司，平日充司长者，大约无不舞弊。现在遂群起攻击，如学部会计司彭祖龄、海军部军储司长林葆纶，农工商部庶务司长顾寿人，叙官局庶务科长钟仑，弼德院庶务科长张祖廉，均被人指控有吞款情事，概交由度支部查办。又各省会馆皆积有存款，群以手枪威迫，几欲尽数提出瓜分。会馆存款既罄，又分旅京公学经费，又分印结局存款，甚至义园（即同乡坟山）之款亦丝毫不留，竟扰及已死之人矣。会馆存款分后，又奇想天开，出卖会馆，由陕西之兴安馆首先发起（闻主持者为李联芳），售价一千八百金。此外则关中馆亦拟出卖，因陕甘两省人争执未决，故买者未敢承受。湖南善化馆亦定价出售，经谭延闿电内务部阻止，遂由警厅干涉，已破坏其事矣。^[10]

清季奕劻长期担任首辅，无能贪财，时时处处以个人利益为考量。辛亥武昌战事蔓延，皇族内阁被迫解散，他转身成为弼德院院长。可是面对国库空虚，他率先从银行提取现银，又不肯出钱应变。“自共和宣布后，各部署朋分公款之事，不一而足，弼德院其最著者也。”^[11]共和实现，奕劻首先发议：“以本院不适于共和政体，应即销灭。盖该院存款甚多，不消灭不能分用也。”他授意副院长邹嘉来与秘书官张祖廉密商，三股均分。不料机事不密，为众录事所知，群起与邹、张为难，邹许给1300两，众录事不肯，复加1000两，风潮始息。前任院长陆润庠、荣庆的家丁闻知，亦相争闹。邹、张各于自己款下拨出140两和60两，凑成200两与之，事虽平息，却闹得全院周知，只得与众公分，三人独优异，共分赃12000两。^[12]

瓜分贪污仍不足以餍其私欲，官员们又有各种花样翻新之举，将黑手伸向扣俸及爱国捐。“闻叙官局亦因此略有风潮，该局人员近来到署者甚少，故今年应领春俸凡有未到署者，概由局长扣除。惟却未

退还度支部，均经饱入私囊。现未到署各员大为不平，正与张为严重之交涉。又吏部从前各员凑缴爱国捐一万两，从前度支部有凭原给收条将银两发还捐主之案，不意吏部将此收条遗失，以至未向大清银行领取。现在叙官局清理案牍，忽寻出此收条，遂由禧斌、荣埜、崇彝、普寿等四旗员将一万金领出，秘密瓜分，现为阖局人员所知，皆欲利益均沾，竞争之风潮正烈。”^[13]

现金瓜分完毕，又异想天开地打起了存款的主意，此事由法部发端。“法部人员因自去年九月部中将薪水折扣发给，十二月后且丝毫未发，以致每日并伙食费而亦无之，尤以旗籍人员为甚，加以近来南来人员极多，势必分布各部当差，法部旧员知地位不保，穷愁更甚。”^[14]为此，“近日法部司员纷纷请领公费，而度支部无款可支，法部乃奇想天开，仿照南京前卖债票办法，将该部从前寄存大清银行之官款存据，作七折卖与外人”^[15]。首先售卖的是法部存于大清银行的十万两公款的契约，转售德华银行，得价六万余两，代理总长及司员等议将此项银两补发前欠薪津，余下之款全部分给阖署人员，以便部务交代后，旧员被裁撤，可以作为回籍旅费。不料次长徐谦大不谓然，拟将此款存放某处，既不补发所欠薪津，更不分作裁员旅费。“以致各员大哗，谓徐次长欲将此款见好于新政府，甘令僚属坐受其困。”法部大臣沈家本对于徐谦的做法不以为然，结果徐谦因此连日不到部，沈家本亦不任代理之责，司法文牍到部，均搁置不办，行政运作陷于停顿。^[16]

随后该部司员集会商议，认为此项公款系本部官员应得经费下扣留者，因年前大清银行无款拨付，合部官员皆系自备资斧，维持公务，既然此款已经变通为现银，理应补发欠薪。徐次长欲讨新政府一面之欢心，抹煞全体数月垫款，有违公理。有某君欲率司员到徐谦寓所与其理论，被劝阻，决定采取自由办法，即不待徐谦认可，便将各项欠款逐一发放。若徐谦从中阻挠，即联名上书大总统，以全体司员之力推倒徐谦。^[17]

为达目的，该部司员“前日结合数十人，持法部存放大清银行官款六十余万两之折据，向汇丰银行某买办以六成折卖。该银行因见大清银行于去年曾登广告，申言各处官厅不能折卖，即向法部人员云，如大清银行能将此折之存款改为私人存款，始能收买。该人员等乃以此事要求法部新任次长徐谦照办，徐不允，致大起冲突”。徐呼警丁将此等人员勒送出外，该人员复求沈家本，沈不理，该人员等三十余

人竟至大清银行，要求将官款改作私款。“其理由谓该部此款系苏元春赃款所报效于部中，作改良监狱费用者，不能视为官款。大清银行云：此款虽系他人所报效，然受报效者系法部，非私人，且存此款于本银行者系法部名义，今日万不能改作私款。该人员等竟至怒骂，谓我等系法部人员，深知法律，决不干休。大清银行监督张允言等知势已决裂，乃延该人员等至客厅理论，该人员仍坚持坐索，后以警察之力，始将该人员等勒令出行。”^[18]

法部的非分之想虽然未能达到目的，恶风一开，却引起连锁反应。“闻翰林院亦仿法部办法，公然向度支部请将寄存大清银行所存之公款存据改换堂名，以便折卖，公众朋分。经部批驳后，又自向大清银行请求如前法办理，银行亦以婉词拒绝，请须先经度支部许可方能照办。”^[19]

大规模变公款为私款的企图虽然未能得逞，不过私下里分散的交易行为已在进行，于是有人想出应对办法。北京“各衙门所存公费，多系大清银行支票，该行不付款，以至数月薪水无着。现在各署人员以解散在即，多有以此项支票向外国银行出售，外国人即以五成四成现银收买，当道亦置之不闻不问”。有鉴于此，有人提议：“与其支票落于外人之手，将来不能不完全兑付，令外人坐享厚利，何如此时将积欠薪水由财政部发给债票，分期偿还。”^[20]为了堵塞漏洞，袁世凯谕告各公署，不准将公款储蓄券向外国银行典卖，并饬中国银行，不准各公署将此前在该行存储各款约券辗转外兑，各部所有存款须即开具清单呈阅，以凭核办。^[21]

经过众多旧员千方百计地层层洗劫，各机构财务大都成了空壳，最终影响到新旧政权的交接，影响了新政权的正常运作。其中尤以海军部情况最为严重。原军储司司长林某，于辛亥乱事之际，将该部所存200万元全数用私人名义存入震发合银号。后北京发生兵变，林某携款逃往天津，大起洋楼，任意挥霍，致使该部一切薪津开支俱无着落，累电催其回京，皆置之不理，首领谭学衡亦束手无策。^[22]

至海军部刘冠雄总长派员接收部务之际，“由海军部交出残余之现金为银元十枚，银十两，铜元一千余枚，此外则为大清银行存款一百八十余万，交通银行存款廿余万，皆不能支取者。所造之报销册，全属子虚。刘总长不肯接收。按前清之海军部，本系载洵为招权纳贿而设，以谭学衡为副大臣，与载洵狼狈为奸，另又招致一在京汉路局

著名舞弊之某某为司员，以作外线，其余司员，皆年近耳顺，不独无海军知识，且均疲聋可怜，不能办事者。是以不多日而该二人之私蓄遂以千七百余万及数十万称名于时。此犹系暗中得来者，至倚仗亲贵勒派外省解来之开办常年经费，亦并未购一舰造一港。”媒体探知实情，义愤填膺，呼吁：“此等毫无心肝之人，新政府必切实清查其实数，悉行追缴，不令就此糊涂了局也。”^[23]据说刘冠雄查得海军部亏空公款甚巨，而谭学衡又事事推诿，故不肯接收，拟向载洵交涉。^[24]而载洵畏罪，与德国人葛幼斯携带金珠潜往天津德租界。^[25]实际上刘冠雄也不便和前清亲贵直接冲突，而是与旧官僚打起了消耗战。“日昨海军总长刘冠雄派人到海军部接收各项事宜，谭学衡因所挪用之公款尚未凑齐，延不交代，谓必须刘总长到部面交云云。而刘又不欲与谭会晤，故现在双方相持不下。谭亦可谓善于推诿矣。”^[26]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命令各署官员继续担任职掌，办理公务，可是实际上这些官员在风声吃紧时早就逃之夭夭，并未尽职尽责守，以至于不少衙署的文书案卷乃至家具器物等应当交接的物品几乎荡然无存，除印信外，无可交接之物。更有甚者，当局势明朗时，他们又纷纷返回京城，想方设法瓜分各署余下的钱财器物，甚至将贪欲之手伸向公有性质的会馆。一旦面临裁撤，他们又相互串联，结成团体，向新政权要求种种权益，以补偿他们并不曾有过的看守之功。“现在旧部各员，业已解散，惟各部所发津贴，数目不一。……以至被裁汰者大为不平，已联合团体，分见袁总统、唐总理质问，恐不免尚有风潮。”^[27]

诚然，政权更替之际，政府长期欠薪属实，京城的众多小京官养家糊口也的确不易。然而，欠薪的正主是前清政府，在袁世凯主政的维持阶段，他们又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国务卿至京，即将组织新政府，旧日部员当然消灭。近日各部人员约分三派，其一则到处运动，卑鄙苟贱，无所不至，希冀得一新位置，所谓狡黠派。其二联合多人，把持案卷，不肯交代。宣言只能新旧参用，不能令旧者向隅，且美其名曰办防堵，所谓愚蒙派。其三则为老京官，自知不容于政府，但要求补发前数月津贴（自八月军兴以来，各署津贴多未发给），以还宿债，并酌给川资，俾得回籍，免流落异域，所谓可怜派。三派之趋向各不同，要之，皆在金钱上著想。至于洁身而退者，惟外务部之张权，农工商部之冒广生，典礼院之吴国镛，学部之宗树枏、胡玉缙、刘罪释，陆军部之陶葆廉，叙官局之宝铭，御史崇芳、齐忠甲寥寥数人。”^[28]在袁世凯的操弄下，作为革命对象前清官员，在共和

政府面前没有丝毫愧疚，反而显得理直气壮，大有自居为与南方民党平起平坐的北方政府成员之势。

注释

[1] 《论官制与官俸》，《时事新报》1912年4月1日，第1版，“论说”。

[2] 《度支部公启》，《临时公报》1912年3月16日。

[3] 《旧学部之窘况》，《申报》1912年4月4日，第2版，“要闻一”。

[4] 《北京各部之现状》，《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页，“新闻一”。

[5] 《旧学部之窘况》，《申报》1912年4月4日，第2版，“要闻一”。

[6] 《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4月24日，第2版，“要闻一”。

[7] 《度支部之窘状》，《申报》1912年4月29日，第2版，“要闻一”。

[8] 绍英著：《绍英日记》第2册，第233—268页。

[9] 袁世凯勒捐皇室亲贵，另有图谋。据十一月初蓝公武致梁启超函：“北方前此表面上虽似退让到极点，有开国民会议公决之诏，实则皆项城之计画，借以敷衍时日，为其计画进行之地。”而袁世凯的计划，一面解除亲贵的兵权，变卖宝器，勒捐亲贵，以为要挟；一面等待南方内讧，重开战端，获胜后仍以国民议会为收场地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0页。）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参见王春林：《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58—67页。

[10] 《京署人员大活动》，《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页，“新闻一”。

[11] 《旧部署风潮迭起》，《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要闻一”。实则奕劻并非没有出钱，而且不算少，只是相比于所有家财，不过九牛一毛。其瓜分弼德院款项，或许正是为了弥补割肉之痛。

[12] 《弼德院堂司各官朋分公款》，《时事新报》1912年4月1日，第2版，“紧要时事”；《北都之要闻种种》，《大共和日报》1912年4月2日，第3版，“紧要纪闻”。

- [13] 《旧部署风潮迭起》，《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要闻一”。
- [14] 《大闹大清银行》，《民立报》1912年5月1日，第7页，“新闻一”。
- [15] 《法部与前翰林院之穷状》，《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
- [16] 《司法部分款风潮》，《顺天时报》1912年4月24日，第2版，“杂报”。
- [17] 《司法员大动公愤》，《顺天时报》1912年4月25日，第7版，“时事要闻”。
- [18] 《大闹大清银行》，《民立报》1912年5月1日，第7页，“新闻一”。
- [19] 《法部与前翰林院之穷状》，《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2版，“要闻一”。
- [20] 《北京各部之现状》，《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页，“新闻一”。
- [21] 《禁售官署储款券》，《顺天时报》1912年4月26日，第7版，“时事要闻”。
- [22] 《京部司员之劣迹》，《时事新报》1912年4月1日，第2版，“紧要时事”。
- [23] 《前清海军部之糊涂帐》，《申报》1912年5月13日，第2版，“要闻一”。
- [24] 《申报》1912年5月1日，第1版，“专电”。
- [25] 《民立报》1912年5月7日，第3页，“专电·北京电报”。
- [26] 《六部近闻一束·海军部》，《民立报》1912年5月1日，第7页，“新闻一”。
- [27] 《北京各部之现状》，《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页，“新闻一”。

[28] 《京署人员大活动》，《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页，“新闻一”。

创建民国新阁

论及民初政争，一般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民党与袁世凯的角力，重视坐上总统大位的袁世凯如何揽权，而相对忽略国务院的建置。可是，按照参议院的决议案，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内阁制，国务院才是权力中枢。袁世凯首先要设法将国务院弱化，才能实现大权独揽的政治企图。因此，即便将关注重心放在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之上，也要弄清楚袁世凯是如何将内阁制虚化，逐渐实现总统大权独揽并使之制度化的。

关于接收清朝和创建民国首届国务院即内阁部院的种种史事，不仅研究者的目光甚少触及，甚至编辑各种与此相关的辛亥革命或北洋军阀的资料也基本付诸阙如。虽然民国成立距今已经百年，其筚路蓝缕的成立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还是一笔糊涂账。了解接收清朝旧署与创建民国新阁的来龙去脉，可以深入一层认识民国肇建历史进程的本相，对于开天辟地、白手起家的创举多几分了解同情，少一些后来者惯常的自以为是。

一 以南北争新旧

接收清朝旧衙与组建民国新署是相互牵连之事。前清旧员所争，绝不仅仅在于留作退路的钱财，更重要的是立足进取的位置。政权兴替，共和政府成立，作为被接收对象的前清官员，于情于理，都没有争位置的资格，更缺少敢于出头相争的底气。可是在袁世凯的有意主导之下，新旧交接与南北统一相牵混，在共和政府建制的问题上，南北统一盖过了新旧交替，使得前清官员堂而皇之地获得与南方临时政府人员参与新政权的同样权利，从而演化出本不该有的南北之争的种种怪相。

按照与迎袁特使蔡元培等人的约定，应是在南方成立政府之后，国务院与参议院一起北上。如此，则应由北上的新政府人员负责接收前清各个官署。相应的前清各部司员固然可以选择留用，其主动权却完全在于新政府，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可是北方的气氛与此迥异。

“探闻近日京津两处各省在京供职人士纷纷集议，谓统一政府成立，南北政府同时销灭。现在南方人员多方要挟，以求固其位置。闻各国务员北来，所带人员有千余人之多。其余要求咨送留学及酌给川资者时有所闻。是在南方人员或入政府或留学或酌给川资，已各得其所。吾辈身处北方，履艰冒险，地势虽异，而情形则同，不可不谋抵制之方。刻拟集合团体，要求大总统，将来政府人员，必须南北参合并用，并请咨送留学或酌给数月津贴以作川资。刻下正在组织团体，进行甚亟。不知大总统将何处以之。”^[1]

王朝帝制与共和政权的对立，俨然变成南北政府势异情同的对等，既然南北统一，就要一视同仁，参合并用，否则就是不公不正。正是循着这样的逻辑，四月底“北京报上发现一种告白，文曰：袁唐鉴：旧人用否早宣布，勿含糊敷衍，致人倒悬。谚云：宁斩立决，不愿斩监候。下署十一部员无运动者总代表白”^[2]。

为了造成舆论压力，前清司员竭力鼓噪，将新旧之争说成是南北之争，并且夸大北上人员的数量及其能量。“所带人员有千余人之多”，虽然是极端说法，却有进一步的细节描绘：“此次唐总理及各

国务员到京，由南带来之各部司员甚多，所有前清各署司员，除内务、陆军、交通各部无大更动外，其余各部一律扫除。并闻即陆军部一部，其由南带来者已有一百五十人之多，而度支部亦复不少，故该部已于日前将各司员一律发给薪水，并令各员此后勿庸进署听候差遣。各司员领此薪水后，情形极为懊丧。”^[3]

诸如此类的说法，如果不是以讹传讹，就是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以激化南北人员的矛盾。南京临时政府本来从简，加上部分人员主动辞职或不愿离开南方，北上者人数有限。据1912年4月28日《申报》刊登的《新到南方人员一览表》，随同唐绍仪到京的，计有农林部的余光粹（君持）、唐劲中（伯感）、刘百（耕尘）、陈文选（彰炳）、陈乙白（物庵）、李世翰（心持）、彭彰斌（巨川），工商部的吴铁城，内务部的胡宗铨、孙润鑫、伍日成（朝旭）、赵燊黄、金体选，陆军部的傅鸣一、易晋熙、傅维四，教育部的刘先登（尚之）、顾行（子言）、宋志群（汲仁），总统府秘书官郑宪五、刘元梓、金溥崇（峰材），外交通商司长冯自由，卫戍总督执法处的龚治初，以及职务未详的周虎彝、王竹怀、黄衍鋈、董鸿祎（恂士），共28人。19日陆军次长蒋作宾带来殷学潢、朱常、田秉衡、杨业、朱子英、龚云青、刘受之、袁伯周、朱兆熊等16人。而参谋次长钮永建随带80余人，尚未到京。^[4]前两项相加，只有44人，即使后一说属实，总共也不过百余人，这与随同首批国务员到京千余人的说法相去甚远。^[5]

在南北人员参合并用的基础上建制新的共和政府，的确面临粥少僧多、难以位置的压力。其原因主要是前清各衙署冗官冗员甚多，而新政府的位置较前大幅减少，各部员额依据事务繁简，依次为60、80、100人（实际不止此数，如参谋部203人、财政部130人^[6]），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南方北来人员，更形拥挤，大幅度裁减势在必行。据报道，北京自改革后各衙门裁汰人员非常之多，如度支部原有员司1200余人，仅留40人，学部旧人300余人，仅留24人，邮传部旧人800余人，仅留50人，农工商部旧人400余人，仅留32人。日来纷纷各还乡里。^[7]

在此情况下，专程由南方北上者似无不予安置的道理，因为南京各部人员北上，原来就是为了接收前清政府，并作为新政府的基干，而不是与前清旧员合组新政府。据调查，到5月初，南京临时政府各部司员北上者已占相当比例，陆军部70人，到京者50余人；内务部33

人，到京者10余人；教育部60人，到京者20余人；理财部原数不详，到京者30余人；总统府秘书官到京者8人。^[8]裁员主要是涉及前清旧员，他们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不妙，即使由北方人士担任总长的各部，虽然可以酌留一二旧司员以资熟手，多数必遭裁汰。而且如赵秉钧等人，同样重视文凭和经验，在位置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很难容忍无能者尸位素餐。于是旧司员只能千方百计力争，除了内部相互竞逐之外，还要想方设法挤压南方来员的空间。所采取的办法无外乎如下数种：

其一，捷足先登。按照约定程序，国务员即各部总长应由总理决定，事实上袁世凯一开始就起主导作用，使得北方占据了总长的重要位置。为了安抚南方，将几个相对次要的总长位置留给民党，并且在次长的人选上尽可能根据总长的归属配置南北人士。如此一来，南北统一变成南北平衡，总次长之间难以和谐，导致南北分界与冲突由国务院延伸到各部，进一步加剧了司员的对立情绪。陆军部风潮即因此而起。

陆军部总长为段祺瑞，陆军部推荐次长时，段祺瑞依次举荐徐树铮、王赓、蒋作宾三人。以蒋为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次长，不过聊备一格，并非真的愿意援引。不意正式发表时排在最后的蒋作宾成为次长，种下双方不和的远因。发表之后，段祺瑞致电蒋作宾，可酌带部员北来，其意不过是敷衍南军的面子。而北军将领谓段放弃权利，要求提前分配重要位置，于是委派徐树铮为秘书长兼军学处长，王赓等五人为司长。蒋作宾应段电约，带来南中部员80余人，不料到北京后，见重要部员均已发表，而段祺瑞事先无一言商酌，以致所带人员无从一一位置，遂大为愤懑，严词相责。段祺瑞谓次官与副大臣不同，无干预委任秘书长司长之权；至于电约南员，原意仅数员，谁知竟来了80余人。双方为此大起冲突，蒋作宾负气不肯到署。后由军事统一会及某巨公出面竭力调停，于原定五司之外，另立三司，位置南员。且声明以后司长由总长荐任，次长不得预闻，科长以下由次长委任，总长亦不干涉，划清权限，以免再起争端。双方认可，风潮始息。^[9]

清季陆军留学生向有一怪习，即毕业届数甚严，二三期不能居一期之上，颇似翰林院前后辈的分别。秘书长徐树铮为第八期毕业，原来段祺瑞欲举为次长，部中群滋不悦，即使担任秘书长，也颇滋异议。段祺瑞以其办事得力告诉次长蒋作宾，蒋始无异议。各司长北方

旧人与南方新人额数颇足相当，如罗开椿、施尔常、魏宗瀚系北方旧人，林摄、沈郁文、翁之麟、方擎系南方新人，故外间议论均称平允。^[10]不仅司官一级南北搭配，科长一层也考虑南北平衡的问题。

^[11]但是总体而言，陆军部人员的新旧比例为4:6，旧人占优，而且其中颇有人不称职、用非其才之弊。^[12]由于陆军部职员多系前清旧吏，南方军界在京谋差者700余人，奉委者不及十分之一。新成立的参谋部所委人员均系第七、八两期留学生，南方的第一、二期生数十人，只有个别获任。因而南方军界人士公同质问参谋次长，与之大起冲突。^[13]

其二，请托奔竞。官场历来趋炎附势，且以血缘地缘业缘等纽带结成各种关系，夤缘攀附，尤其改朝换代之际，更是四处钻营。“自国务卿由南来，此间一般运动家咸奔赴塘沽迎迓，闻塘沽客店人为之满。如内务长赵秉钧亦微服而往。十九日午刻天津车抵前门车站，迎迓者几无立足之地。”^[14]据称“各部奔竞之风，以外交、交通为最盛，而以农林、司法、财政三部为最清静”^[15]。遗憾的是，在前清旧员大幅裁汰后，“新来者亦有不少，打磨厂南河沿一带客馆俱有人满之患，大都与某部总次长有一面之缘，希冀谋得一席者”。《申报》记者因而慨叹：“官之可欲如此，钻营奔竞之风，谁谓共和国民必损于专制国之人民乎？”^[16]

记者的愤懑，确系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奔竞之风如此之盛，是因为效果显然。国务总理唐绍仪等即带头破坏官箴。“铨叙局局长张国淦自任命之后，各处请托之条子纷至沓来，日有百余起，较之从前之叙官局为甚，而尤以唐总理交下之条子为最多。惟该局所定员额不足十人之数，应酬一人，即得罪一人，故张对于此事十分为难。且以民国新造，此等现象究不雅观，然又不好不留唐等面子，只得一一延见，用好言相慰，无非随后留意等语。闻张胸中已有成竹，拟亟择旧人中之精干者补足额数，藉以杜绝请托。果尔条子无效，不知又有多少人失望矣。”^[17]

其三，消极抵拒。新政府成立后，各部旧员多以被裁在即不赴署办公，而新员尚未到齐，不能全面接手，以致部务悬搁，颇有妨碍进行。为此唐绍仪要求各部陆续接收后，部员裁留问题应尽快宣布。

^[18]大总统亦因国务院刻已成立，指示所有各部事务，应即向新任总长交替，旧有部属人员一律解散，以便新总长另行委任。“现各部人

员闻此消息，大起反对，其理由系谓政府前当需人之际，力为挽留，数月间多不发薪。现在新任有人，即挥之使去，殊觉欺人太甚。闻已议请大总统先行拨给解散款，然后方肯交替公务。并闻日前海军部不允办理交代，即缘于此，而他部由是亦渐有暗潮发生。”^[19]

由于新国务员不日就任，旧署各司员均已无心办公。教育部接收学部办理较为顺利，是因为此前学部政务已经陷于停顿状态。该部首领张元奇奉大总统任命内务次长后，即赶紧到内务部行就职礼，并逐日到部办公。袁世凯以教育部无人管理，仍命张兼管，而张以既赴内务部充次长，又复到教育部充首领，面子不甚好看，遂变通办法，飭各司司长将公事逐日送至私宅阅看，应如何处分者，即批在稿件之上。科长以下不得见首领一面。“此系前清时所无之事，或者自前学部飭各学堂停办以来，至今本属无事可办，故不妨作如是之怪现相也。”^[20]

度支部司员向最冗杂，该部正副首领格外体恤，于罗掘俱穷之日，阳历三月薪津仍旧照支，并未短发。然而该部各司员或盘踞总统府，日夜设法运动，或潜赴天津，与民党接洽，以便将来仍得巩固旧日势力。“至一般老朽，明知该部位置将来必为民党或本部运动大家所得，故亦不肯卖力气，或在京师闲居，或在天津观望，该部应办各事极多，一律停搁不理，其小事则更不待问矣。”^[21]据度支部人云：“该部本多冗员，将来裁汰者亦必多。故自揣不能被留者，均纷纷出都，不俟发表。其余亦均不到部。近日画到者日不过数人，即交代卷册，亦无人经理（从前每日收文率用二人装以大笼，抬至司内，其文牒之多可想）。周自齐极为棘手，然亦无可如何。故特赶于熊总长到京前先行出京，以避此难关。”^[22]该部旧员鉴于邮传部解散情形，自揣万难留用，准备也全体联名辞职，以免被裁。有一二欲暂留观望者，亦被迫胁。^[23]

财政总长熊希龄到京后赴部视事，见大堂上度支部旧司员名单，连同盐政院币制局调查局，共1300余名，除有差事者约400人，告假回籍者约200人，其余700人均有官而无差，即所谓散走司官。熊颇为骇异。闻其中有学识经验者颇多，以格于成例，未由表现。熊拟择用数十人，并就本部应用之学考试一次，以定去留。^[24]而南京财政部原用人员亦未便概摈不用。南京理财部共有八九十人，陈锦涛荐与熊希

龄49人，已陆续到京。^[25]熊决定在旧司员中选留40人，其余皆好言遣散。^[26]

5月7日，熊希龄发布总长令：本部改革之初，拟先设立筹备处，派员司筹议办法，其旧部当差各员，除金银库员司及前次派管案卷各员，仍应暂留管理外，其余先行解散，俟本部组织完全，再行分别去留，量才委任。筹备处总办王璟芳，帮办章宗元，下分总务、币制银行、盐务、公债、税务、会计、库务等七股。^[27]各股员司吴乃琛、曲卓新、张茂炯、刘泽熙、蹇念益、周宏业、陆世芳、李景铭、刘颂虞。王宗基、钟峻、陈威、甘鹏云、庆琛、钱承鋹、雷多寿、曹宝珣、袁永廉、何卓时、张竞仁、楼思诰、乐守纲、钱锦孙、王朴、熊正琦、高彤墀、司骏、卞颂元、沈承烈、赵世棻、蹇先骕、晏才杰、应国樑、杨赓元、润普、李恩藻、张绍、宝宗、张荣骅，均着即日到处办事，俟南京部员到京，再行选派加入。^[28]

为了安定人心，熊希龄遣散旧员之时，允诺此后添人，必予各旧员以优先权。除了筹备处留用人员外，所选定诸人及南京同来之人，尚须陆续派办职事。^[29]5月23日，发布财政部令：“本部现拟修正官制，预备交议，一俟通过，即须分司办事，所有旧部各员司人等，应由筹备处查明详细履历，办事成绩，开列清单，呈候核夺。”^[30]除候补人员外，所有实缺各员及曾有乌布差委者一律列册。各旧员闻知，无不喜形于色，以为人人皆有留用之望，有人还预行剪发，置备洋装，以图取悦于总长。^[31]

虽然熊希龄优待有加，旧员却未必一律配合。度支部部员张茂炯曾在盐政处任职，颇知盐政利弊。惟以办事棘手，殊不愿就。故此次虽经熊总长留用，仍派盐务股差使，而卒不任事。近在天津，熊希龄两度专函专电催其回京，皆不应。第三次由楼思诰亲自到津劝驾，仍坚持不允，“其归志可谓决矣”^[32]。其实张茂炯其人绝非淡泊名利，此前他署盐政院厅长，盐政院裁撤后，仍回度支部供职，设法运动绍英派在丞参上行走，已拟就堂谕，尚未画行，因共和发表而搁置。绍英开缺后，由周自齐署理，张茂炯乘新旧交替之际，串通考绩科书吏，将堂谕簿添画伪行，并将同党大员如盐政处开缺人员及各司长等衔名一并加入，一时丞参上行走竟增至10人之多。“虽满清黑暗时代，亦无如此骇人听闻之事，不意于中华民国见之，可谓奇矣。”^[33]

其四，以退为进。据报道，民政部司员与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感情极厚，新内阁成立前，均极力维持，唐绍仪到京且常川入署办事后，全体司员以民国政府成立，原来南北政府当然取消，上书辞职，赵秉钧照准，以便另行组织。北京内外厅区各员，亦集议全体辞职。袁世凯因为内务部所管警政与市面关系密切，颇感棘手，召集赵秉钧筹商善后办法。^[34]起初媒体以为是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欲将民政部旧员大加裁减，引起部员全体辞职。而总理唐绍仪力主调停。赵秉钧因唐绍仪主张多留旧部员，大起争论，赵负气向总统袁世凯辞职。^[35]后来得知实情刚好相反，前清民政部旧员有700余人，加上南来各员，必定有一番大淘汰。^[36]其时内务部设立蒙藏事务处，已调用旧理藩部司员数十人。总理唐绍仪之意，各部皆须多用南方人员，而额缺又不可多设，意欲少用旧人。总长赵秉钧以久在民政部，熟人甚多，穷于位置之法，大有左右为难之概。民政部旧司官闻讯，乃全体辞职，以为保全面子之计，“现在内务部衙署已无复旧司官之踪迹矣”。

蒙藏事务处所留理藩部旧人及派定之职掌为：总办文哲晖，帮办吴燕绍，第一科长毓盛，副科长沈国钧，第二科长宝训，副科长沈家彝，第三科长扎拉芬，副科长朱麟藻，第四科长吉章，副科长李景圻。“其中最可笑者，自总办起皆一满一汉，按次配合，俨如前清六部旧习。且此等人半皆纨绔，对于蒙藏毫无阅历，更无政策。呜呼，曾是共和国而仍有此腐败现象耶。”^[37]

趁着内务部司员因新旧用人问题全体辞职的风潮，总长赵秉钧以志不能达，亦向总统袁世凯自请辞职。袁一面表示慰留，一面谓国务长进退由参议院决定，参议院开会之期已近，应暂勉留以待，看能否通过。现在职权内不能允许辞职与否。据说袁世凯为此特邀各部总长讨论调停办法，拟调赵秉钧为河南都督，张元奇升为总长。唐绍仪闻知赵秉钧辞职，顿悟赵秉钧所争在保全地面上之安危，非为见好司员起见，即与赵约，不干涉部中用人权，并劝其从国家前途着想，万勿辞职。^[38]此事实际上是旧司员借故要挟，以退为进，迫使唐绍仪让步。《时报》一则《新政府与旧人才》的时评敏锐地指出：“北京为旧人才巢穴之处，今新政府成立，于此旧有之各部人员淘汰与录用，必有一番之变动，而因缘运动者必多。主持之者，非有定识与毅力，欲一洗其旧习，非易事也。内务人员之全体辞职，其要挟已露端倪矣。”^[39]

当然，赵秉钧也不能一味偏袒旧部。南京内务部陆续到京34人，一度皆无位置，所以屡次诘问唐绍仪，因为唐在南京时曾表示，内务总长虽为旧人，南京内务部人员必有相当之位置。唐绍仪为了兑现承诺，与赵秉钧协商，请其设法安排。^[40]面对原内务部司员全体辞职的风潮，以及南方人员的压力，总长赵秉钧不得不设法调停新旧司员的感情，使之融洽，进而拟刷新部务，飭两厅丞调查各员履历学识，无论满汉新旧，如有才干之士，均挑选入部委用，已选定录事约70员，其他各司员亦已略定。^[41]同时特意表现出对北上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人员的优待，在本部官制尚未决议之前，“所有南京内务部投到之张友栋、伍晟、郑毅权、许家恒、居文哲、陈玉润、赵璧、饶光民、陈济、许允、赵世晋……等二十员暂留本部为办事员，于六月一号先行到署办事”^[42]。6月25日，内务部发布部令：“本部现应重新组织，所有办事各员，除已分别开单呈请大总统任用外，其列单之一百十四员应即先行到署办事。”其中首位就是后来牵连宋教仁被刺案臭名昭著的洪述祖。^[43]

其五，诸法并用。前清邮传部人事最为复杂，4月23日，交通总长施肇基到任，却没有到部，只是将一张留员名单贴于大堂，下署施肇基启。前数日，该部仅将现在办事之人酌留45人，合之新来者6人，共得51人。留用人员之所以如此之少，原因之一，是南来及由总理唐绍仪所委任者，以交通部为最多，达到80余人。故该部裁汰旧员比例较大，600余人当中仅留用45人，其他皆为位置新人之地。^[44]于是交通部被裁各员攻讦总长施肇基用人不公。^[45]风潮影响甚大，以致总统也不得不出面调停。

该部事务繁杂，而定员不足，设定官制时，派陆梦熊笺注，总长意以少改为妙。次长以下，设参事4人，秘书长1人，秘书4人，司长4人，科长24人，科员66人，并局入司，分三股办事。所有办事人员，路电二司所留者皆有线索可寻。其余则因职务关系，不能卒然更动者。^[46]而且这一定额还是总统干预的结果。总长原来只设80人，总统以为交通事繁，南北两方人员均须位置，始有酌用百员之说。^[47]此外，总统鉴于交通部风潮起因于各部员司去留无一定之办法，希望议订划一标准。惟以此事颇费调停，且曲折繁多，一时尚难解决。^[48]后来决定用考试方式进行选择，反而激起更大风波。

交通部考试录事的风潮刚刚平息，又因将署中旧人大加裁汰，而留用及调用人员不能尽孚众望，故被裁各司员联络录事，群起反对。留用人员多出于龙虎二将的叶恭绰、梁士诒门下，一般附势者争相奔走钻营。^[49]被裁司员因去取不公，于4月28日在湖广会馆开全体大会，研究对待叶、梁之方法。或主张上书大总统，请定去留办法，或主张以野蛮手段对待。而南方交通部人员亦于同日在金台旅馆开会研究到部问题。两相映照，颇耐人寻味。^[50]交通部各裁员上参议院请愿书称，施肇基毫无公理，任用私人，所留用者有科举出身如龙建章举人，蒋尊祹进士，有捐纳如安涛，而老资格如唐、何，留学生如陆梦熊等则不用，且留学生淘汰最多。^[51]

旧员对于新部也有趋炎附势的一面，《申报》报道过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例：“前邮传部有一戴水晶顶子而蓝翎之管门官，一老头子也，为旧日各部商标之特色。自改定政体后，乃易其官帽而为便帽。二十三日为新总长到任日期，此公乃易其便帽而戴黄色边之军帽。”该报特意点评道：“但能换戴新帽即可立地成佛，此管门老头子其代表也。”^[52]

北方被裁人员开会，是因为当局用人不公，拟用激烈手段对待。南方人员则以部中如此黑暗，殊难托足，且留部人员多无实学。交通部南来人员共50余人，裁去15人，留者或派为调查员，或秘书员，多非要缺。而施肇基又续调旧员及其戚友，以致南人大哗。^[53]继28日会议之后，特于4月30日再在金台旅馆开会，谓交通中人，非尽用航路邮电专门人员不可。如施总长不允，南方人员将全体解散。^[54]不料其中有人并非专门出身者，自料当有位置，所以反对该项提议，未能通过。^[55]交通次长冯元鼎以用人行政与总长意见不合，坚请辞职。旧部员共留51人，其中有目不识丁者，有数月足不到部者，平日实在出力者反多在淘汰之列，以致愤不能平，有人将重要文件及洋文合同等携之而去，准备将来交参议院弹劾。^[56]

交通总长施肇基在民国首届内阁各部总长人选中物议较多，坊间、报馆乃至官场，甚至误传其为总理唐绍仪的女婿或侄婿，暗指其凭借裙带关系得此位置。他在交通部并无根基，亦无实权，该部大事由梁士诒暗中主持，小事由参事程涪（原南京交通部秘书长）办理。此次该部所留南员，施均咨询程涪意见，而程向与南京交通部承政厅人员有嫌（据说因其窃取津浦免票被人攻击），是以承政厅人员除一

人系程的亲戚留用外，全部被屏黜。5月17日，南来各员公举代表刘芳、胡健赴交通部质问，施避而不见，由次长冯元鼎代见。代表质问道：程涓声名恶劣，何以反得参事位置？冯答此系袁总统所交名条，不能不特别优待。代表又问：此次留用人员，以何为标准？冯答曰：并无标准，南北均应同时解散，从新组织。代表问：既是南北同时解散，何以唐总理在南京时，定要我辈北来？冯曰：我不知，我不知，请诸君问唐总理去。代表遂回。南来人员的问答，清楚显示唐绍仪确曾履行与蔡元培的约定，希望以南京临时政府为班底组建新的统一政府并迁往北京。

5月18日，南来被摒人员代表陈非致函施肇基质问，施不答复。又有该部秘书叶兆崧等专门守候施于交通部大门，遇见即扭往国务院见唐绍仪。叶虽然已被留用，系与唐总理同乡，同来各员全被屏黜，不能不动公愤。见到唐绍仪，便诘问道：一、大总统何以有私交名条代人请托之特权。二、唐总理曾许特别酬报，何以不能见信。三、到北京后如不能任用，应即时宣布，何以迟至今日，始定去留。四、如因交通部用人甚少，不能位置，何以施于南北旧人之外，复调其原在弼德院就职的亲戚张祖廉等20余人，其理由安在。唐绍仪不能答。宋教仁、王正廷出为调停，允诺将交通部被摒各员调往两部安插。各员坚持不肯，以为若不合用于交通部，则其余各部亦不合用。若可用，非在交通部不可。唐绍仪无奈，许以星期一必有正式发表。叶等遂退去。

是夜，南来诸员秘密会议，提出方法数种，决心非推翻施肇基不可。具体为：一、齐赴参议院递请愿书，请质问大总统何以私交名条于施肇基。二、交通部如留用南来人员，不许有一人遭摒弃。三、交通部位位置比照南京从前地位，不得故为抑扼。四、南来各员在交通部立于监督地位，如交通部仍旧营私舞弊，得随时举发。五、程涓声名恶劣，交通部不许留用。六、以上五则如不能达到目的，以文明对待，将立刻全数移至施肇基私宅，否则以野蛮对待，手枪从事。^[57]经各方调停，结果程涓辞职，尤桐等调部或派外差，胡健、刘芬、陈非等不留用。南京交通部承政厅来员留用7人，未用5人。^[58]

南来人员加入争闹的行列，虽然其中别有曲隐，却引起舆论的不满，视为新旧之间的争权夺利。4月30日《申报》刊载的《新旧京官现形记》称：“近数日来，新旧官僚暗斗极烈，旧者萧索可哀，新者腐败运动如故，现象如此，大足为民国前途危。……内务部新到名角数

人，有一秘书长者，于总理未到任之先，即早欲到任，而内务部以本部现有名目，并无秘书一席，如何位置，须俟总理到京再定辞之。最奇者有一王黼炜其人者，南京法部之秘书长也，其人其文不敢下断语，惟自徐谦发表该部次官后，此人乃急欲发贺电，而苦南北阻隔，不知徐之居处，乃电天津许世英转递，可谓奇矣。”^[59]

共和开国的腐败现象确是前清旧习的遗留，只是袁世凯政府并不能完全代表共和政治，南方临时政府已经做出正面表率。孙中山对于清末仕途腐败深恶痛绝，很早就注意到临时政府草创之际，难免奔走请托，蒙混诈伪，使不肖者得以进身，特令内务总长悉心考察，慎重铨选，以肃官方而饬吏治。^[60]4月初，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参事田桐以及秘书长、各司长等提出辞职，表示：此前组建之际，“恐临时政府迟一日之组成，即国民前途多一日之危险，用是不揆愚蒙，遂承一时之乏。……今者国务总理已经发表，人才辈出，缺乏无虞，正等自愧樗庸，敢请解职，以让贤能，俾本部事务，得以重加整顿，无任屏营之至”。荐任官以外，委任官亦全体辞职，“希大总统令唐总理遴员接替，免误新政而迟进行”^[61]。此番集体辞职，背后或另有隐情，但是整体而言，不贪恋名利地位的举动，还是反映出为共和开局的新气象。

注释

[1] 《北政府旧人亦将要求位置矣》，《申报》1912年4月23日，第2版，“要闻一”。

[2] 《申报》1912年5月2日，第2版，“专电”。

[3] 《各署司员之末路》，《申报》1912年4月29日，第2版，“要闻一”。

[4] 《新到南方人员一览表》，《申报》1912年4月28日，第2版，“要闻一”。

[5] 《时报》1912年4月24日，第2版，“专电”。有报道称到4月23日，乘坐新铭、新济等船陆续抵达天津的南京各部部员达到数百人。

[6] 《参谋部题名录》，《神州日报》1912年5月27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京华政局丛谈（九）》，《神州日报》1912年5月30日，第3版，“国内

要闻一”。

[7] 《北京人才之新旧观》，《申报》1912年5月21日，第3版，“要闻一”。

[8] 《北京政海春潮记（八）》，《神州日报》1912年5月2日，第3版，“要闻一”。

[9] 《陆军部之暗潮》，《民立报》1912年4月30日，第6页，“新闻一”；《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

[10] 《六部近闻一束》，《民立报》1912年5月1日，第7页，“新闻一”。

[11] 陆军部“各科科长及秘书处人员亦已派定，其中除雷炳焜、唐汝谦、李学瀛、吴经明、塔齐贤为该部旧员外，余皆南方新人物”。军衡司长林摄，考任科长刘冠军，赏赉科长陈虬，军务司长沈育文，军事科长张华辅，步兵科长王凤清，骑兵科长花尚品，炮兵科长朱兆熊，工兵科长雷炳焜，军械司长翁之麟，枪炮科长韩林春，材具科长简业敬，军需司长罗开榜，会计科长唐汝谦，粮服科长杨鸿昌，军医司长方擎，医务科长张修爵，卫生科长李学瀛，军学司长魏宗瀚，教育科长丁锦，步兵科长陈乾，骑兵科长刘文锦，炮兵科长李实茂，工兵科长吴经明，辎重科长齐振林，秘书处长徐树铮，秘书曾毓隽，塔齐贤，梁建章，主计士杰。《新旧各部近状记（续）》，《申报》1912年5月5日，第2版，“要闻一”。

[12] 《陆军部之新旧官》，《时事新报》1912年5月11日，第2张第2版，“紧要时事”。

[13] 《各部之笑笑啼啼》，《时事新报》1912年5月5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14] 《京署人员大活动》，《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7页，“新闻一”。

[15] 《各部司员升沉记》，《申报》1912年5月28日，第2版，“要闻一”。

[16] 《北京人才之新旧观》，《申报》1912年5月21日，第3版，“要闻一”。

[17] 《各部司员升沉记》，《申报》1912年5月28日，第2版，“要闻一”。

[18] 《会议部员裁留问题》，《顺天时报》1912年4月25日，第2版，“杂报”。

[19] 《旧部署风潮迭起》，《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要闻一”。

[20] 《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4月23日，第2、3版，“要闻一”。

[21] 《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4月23日，第2版，“要闻一”。

[22] 《度支部之不解自散》，《时事新报》1912年5月7日，第1张第2版，“紧要时事”。

[23] 《度支部全体辞职风潮》，《顺天时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杂报”。

[24] 《京华政局丛谈（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20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25]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六）》，《神州日报》1912年5月14日，第4版，“要闻二”；《京华政局丛谈（二）》，《神州日报》1912年5月18日，第4版，“国内要闻”。陈锦涛北上之际所带人员，有30余人、40人两说。

[26] 《财政筹备处开办情形》，《申报》1912年5月14日，第3版，“要闻一”。

[27] 《各部纪闻·理财部之暂时办法》，《时事新报》1912年5月14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28] 《财政部熊总长令》，《政府公报》第7号，1912年5月7日。

[29] 《财政筹备处开办情形》，《申报》1912年5月14日，第3版，“要闻一”。

[30] 《政府公报》第23号，1912年5月23日。

[31] 《京华政局丛谈（二）》，《神州日报》1912年5月18日，第4版，“国内要闻”。

[32] 《各部司员升沉记》，《申报》1912年5月28日，第2版，“要闻一”。

[33] 《京部司员之劣迹》，《时事新报》1912年4月1日，第1张第2版，“紧要时事”。

[34] 《前民政部司员全体辞职》，《顺天时报》1912年4月24日，第7版，“时事要闻”；《内务部司员全体辞职记闻》，《时事新报》1912年4月30日，第1版，“紧要时事”。

[35] 《申报》1912年4月26日，第1版，“专电”。

[36] 《内务部辞职真因》，《民立报》1912年5月2日，第7页，“新闻一”。

[37] 《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另据《时事新报》报道，唐绍仪主张将旧有司员一体解散，重新组织。赵秉钧表示本部关系地方治安，未可一日无人办事。不同他部，可借解散之名招致多数新进。唐绍仪嘱其自行酌办。赵将此事宣布于僚属，于是阖署司员聚议，一体辞职，听候总长办法。（《内务部司员全体辞职记闻》，《时事新报》1912年4月30日，第1张第1版，“紧要时事”。）《神州日报》则称，4月2日赵秉钧与唐绍仪商议留用司员办法，唐告以内务部至多只能留用50人，赵以事繁不足用，且又接收理藩部，若仅此数，唯有辞职。唐不松口，赵遂辞职。司员迎合其意，200余人一起辞职。（《北京政海春潮记（六）》，《神州日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

[38] 《内务总长辞职不成》，《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要闻一”；《总统为唐赵之调停》，《顺天时报》1912年4月26日，第7版，“时事要闻”。赵秉钧调任之说，获系外间揣测。（《唐赵感情之冲突》，《顺天时报》1912年4月27日，第7版，“时事要闻”。）此事在《顺天时报》看来，却是唐绍仪欲位置私人，与赵秉钧意见相左，以致引发风潮。（《箴新政府之用人》，《顺天时报》1912年5月9日，第2版，“论说”。）

[39] 《新政府与旧人才》，《时报》1912年4月28日，第2版。

[40] 《南京内务部来京人员》，《顺天时报》1912年5月8日，第7版，“时事要闻”。

[41] 《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第2版，“要闻一”。

[42] 《内务部赵总长令》，《政府公报》第32号，1912年6月1日。

[43] 《政府公报》第56号，1912年6月25日。

[44] 《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交通部用人之种种》，《时事新报》1912年5月7日，第1张第2版，“紧要时事”。

[45] 《申报》1912年5月5日，第2版，“专电”。

[46] 《新旧各部近状记》，《申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要闻一”。

[47] 《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交通部用人之种种》，《时事新报》1912年5月7日，第1张第2版，“紧要时事”。

[48] 《总统之调停忙》，《申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要闻一”。

[49] 《六部近闻一束》，《民立报》1912年5月1日，第7页，“新闻一”。

[50] 《新旧各部近状记》，《申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要闻一”；《各部之笑笑啼啼》，《时事新报》1912年5月5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51] 《各部现形记（续）》，《天铎报》1912年5月16日，第3版，“中外大事”。

[52] 《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

[53] 《时报》1912年5月21日，第2版，“专电”。

[54] 《交通部南北司员会议之内容》，《时事新报》1912年5月7日，第1张第2版，“紧要时事”。

[55] 《交通部新司员之学识》，《时事新报》1912年5月10日，第1张第2版，“紧要时事”。

[56] 《交通部被裁人员之手段》，《时事新报》1912年5月3日，第1版，“紧要时事”；《旧部员去留记》，《民立报》1912年5月3日，第7页，“新闻一”。

[57] 《交通部两日风潮记》，《神州日报》1912年5月26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据说叶兆崧原为南京交通部船政司长，到京后施肇基委以秘书，愤懑不平，每日无事到施室久坐。施问以何故，告以天天监督，并历数其植党营私遏

抑新进之罪。施斥以胡闹，表示要辞职，叶答称极好极好，快点辞职吧。（《交通部激斗》，《天铎报》1912年5月24日，第3版，“中外大事”。）

[58] 《再记交通部无谓之风潮》，《神州日报》1912年5月29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59] 《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

[60] 《临时大总统关于慎重用人致内务总长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第37页。

[61] 《内务部全体辞职》，《民立报》1912年4月7日，第7页，“新闻一”。

二 兼容新进与故旧

民国新设各部尤其是南方民党担任总长的几个部，本来就深知南北新旧之间心结甚深，经财政等部风潮一闹，不得不更加重视南北新旧的平衡。即使情非得已，表面也要做出公允持正的姿态，以安抚人心，稳定局面。教育总长蔡元培本来认为“非将旧时部员大加淘汰，学务断难进步”，因而电致南方，延请现负时望者来京襄助，所请计有夏曾佑、袁观澜、钟宪鬯、蒋维乔、许寿裳、周树人、谢仁冰、汤爱理、王云五、杨焕芝、胡梓芳、曹典球、钱秩斐、高叔钦、陈墨涛、马振吾、林冰骨、赵幻梅、胡孟乐、张鼎荃、洪季苓、杨乃康、张燮和、顾养吾、许季上、伍仲文、伍博纯、王懋镕。^[1]但5月初其在该部大堂演说，却特意表示：“此次所派，系接收部务之员，将来组织新部，尚须续调多人，不仅限定此数。外间所谓全用南来之人，实系误会。”此话令学部旧员心生侥幸，“现在京师各报多谓学部人员不尽绝望者，即因有此演说耳”。^[2]

教育部的表态，绝非是故作姿态而已，在人事安排上，还要切实体现南北和衷共济的原则。接收学部事务后，分设厅司，规划一切，“所有参事、秘书长、司长各职，亟应慎重遴选，分别荐任。查有钟观光等七员，或久供部职，长于行政，或历办学务，确有经验，均堪荐请委任”^[3]。所谓久供部职长于行政、历办学务确有经验，从教育部的具体人事安排可以窥见要旨。该部委任各员定于5月6日开始办事，“兹闻范次长传语各司，凡本系部内旧员，即可于五月六日以前随时到署预备一切。并闻前次留办交代各员，此次有未派入厅司者，均将派入各局处办事”^[4]。其各科科员的任职，不仅平衡新旧，而且兼顾满汉，尽量淡化南北之分。^[5]首批留任的17名旧员中，有一人尚未剪辫。为保全饭碗，才含泪剪去。^[6]该部总共委任73人，其中35人系学部旧员。^[7]

交通部留人接收各司公事后，用人方针尚未确定。“该部录事原有一百三十余人，日前因事全数开除，后至初三日始择调四十人回署办事。”^[8]而司员在留用51人后，迫于南方来人日益增多，原来旧员

亦极力运动，又续调35人。^[9]因此南京来的54人，只能委派外省差事。^[10]

工商部因陈其美迟迟不到任，由次长王正廷暂署总长。“刻闻该部自参事而下位置，已由王次长向唐总理商定，计参事四人，周家彦广西、陈介湖南、廖炎四川、张奎江苏。又秘书长吴某，名未详，秘书官吴在章，此外尚有数十人，共计不足百名。惟在署旧日之司员，留者甚属寥寥，不日即当发表矣。”^[11]王正廷唯恐引起旧员的骚动，“语农工商部各旧员云：新部用人，原无成见，此次旧员暂为解散，将来仍有借重之处。……各旧员闻之稍慰”^[12]。后工商部实际留用旧员关文彬等25人。^[13]

农林部与工商部分别接收前清农工商部的相应部门，针对各部南北新旧之争风潮迭起的情形，以及本部面临的各方请托奔竞的压力，农林总长宋教仁专门发布启事：“本部建设方新，事尚单简，加以部款支绌，未暇扩充。积此二因，用人甚鲜，凡大雅所推或上书请试诸君子，其姓名住址均已汇登记室，俟将来本部扩充，需才孔亟之时，再行函聘。此刻诸君行止尽可自便，幸勿为守株之待，致误杖策之游也。”^[14]该部暂派临时办事员25人掌筹备规划一切事务，为承政厅魏震、罗戡、余光粹、张周、屈蟠、张焯，农务司陶昌善、陆长儒、恩庆、黄公迈、陈发檀、易次乾，垦牧司田步蟾、黄岐春、高文炳、周藻祥、钟赓言，山林司胡宗瀛、林祐光、唐荣禧、齐鼎颐，水产司王文泰、徐宗彦，临时庶务办事员张璧田、沈竹孙。^[15]其中魏震等11人系留用旧员。^[16]

海军总长刘冠雄先期在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行受任礼，在北上接收前清海军部时，即注意南北新旧的平衡，所派接收人员南北各半，旧员为王翰、袁瑞、吴纫礼、邓聪保、罗则均、徐兴鑫、林文戡、荣志、陈瑜、刘云鹏、施作霖、贾凝禧、林瑞田、高穰、潘之瑞、刘蕲、金翊夔、何纫秋、林子鼈、吕富永、徐维震、王世澂、谢天保、李宝符等。^[17]此外，旧部有希望留用者还有郑汝成、李寿田、严文炳、郑清濂、吴毓麟、陈士廉、方阜鸣、曹汝英、刘秉镛、招瑞声、刘传綬、林汝魁、薛昌南、曾宗巩、林葆纶、何嘉兰、李鼎新等人。^[18]

对于各部用人风潮不断，外报以为大都由于南北意见不同。^[19]各部被裁旧员大概也持相同看法，一度还发起组织北京各部联合会，拟向新政府要求位置，或发给一年薪水，以便另谋生计。具体办法为：一、分别录用，或为另筹生计；二、不主激烈；三、不准暗杀；四、坚持到底；五、不设会长，举干事20人；六、会费共同捐助。已印制传单，分送各部。如表同情者多，即定期开会。^[20]为此，袁世凯曾以手函交国务院，表示“嗣后国务既由总理及各部总长担负责任，本总统似未便干预。惟当此国基甫定之际，危急存亡，关系重要，新员故多才能，旧员亦非不可用。务请详细核酌，勿存成见”^[21]。唐绍仪也担心各部用人风潮不断，扰乱大局，因而决定除次长外各部用人由总长负全责，总理概不干预，直到考试任用章程制定颁布。^[22]连国务总理自己用人，也要考虑南北新旧满汉的平衡，“调用从前内阁承宣厅人员到国务院办公，计共九员，雷延寿、黄彦鸿、江保、傅鸿恩、伊密杨、阿松海、秦树声、吕式斌、曾文玉。内有旗人三员，盖以示不分界限之意”^[23]。

不过，南北之争毕竟不能完全掩盖新旧之别，由前清旧吏出任次长并暂主部务的司法、外交两部，反而更加趋新，以示与逊清王朝划清界限。尤其是辛亥武昌起事后，为了填补官员辞职离任的空缺，突击拔擢的一批原来层级较低的新锐，更是刻意表现进取。曾任大理院少卿的徐谦被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司法部次长，以才力不胜请辞，未蒙批准，就任，并先赴前法部办事。值司法部接收交替事务，补行呈报。^[24]其时司法总长王宠惠尚未到任，4月5日，徐谦谒袁世凯，拟将本部旧有司员酌留三成，其余全行裁撤。回部之后，又传令收发所所长派差茶役，将部署内外前清红白批示告示对联封开印报条等一律用青灰刷净，以展现焕然一新的形象。^[25]不仅本部如此，徐谦还将大理院、都中各级审判厅人员一律遣散，每处只留一人预备交代，为各部所未有。^[26]后王宠惠以各级审判厅不可轻易更动，指示暂留旧人，将来再行甄别。^[27]与此反差显著的是，南京司法人员随同唐绍仪到京的8人，派定参事3人、司长2人、秘书长1人、秘书员2人，并负责办理交替事宜，均委以重任。^[28]

法部旧员因为遭到裁汰而且不发欠薪，与次长徐谦发生冲突。“闻此事之真像，实系由徐次长所激起。盖王总长前曾来电，对于裁留司员，已主张新旧参半。而徐次长乃痛诋旧员，至指为亡清奴隶，拟全数解散，尽用新员。所有旧欠津贴，概不发给。因之大起冲

突。”^[29]徐谦致王宠惠函称，须一洗前清旧染之污。法部司员反唇相讥，谓徐亦系前清官吏，亦在当洗之列。^[30]

据《顺天时报》的确切调查，徐谦获任新政府司法部次长后，先与署理法部大臣沈家本谈及整顿司法手续，认为必须先将旧员咸令解散，另委任由欧美留学法政出身者。此后徐接到总长王宠惠来电，告以组织司法机关，所有人员新旧参用。而徐在署扬言王总长来电，不令委任旧员。不料电文为部员左某觅得且予以披露，使得徐谦与部员之间顿生恶感。该部接到政府公函饬令解散，以便另派，各司员称，解散固所应当，但是合署官吏约有千余人，请次长将此前扣留津贴存大清银行之款转售现银，补发欠款，即皂役亦应照军人解散办法，予以三个月口粮，以便另谋生计。徐佯允之，待将储款券向德华银行议妥售价，竟不认可。各司员以其失信，大哗，当议定将款自由分散。而中国银行不准司员更换折券，且不认部款转售之事，以致无法与德华银行兑现。司员遂聚众前往徐宅理论。徐拒不接见，还电话召来巡警多人弹压，各司员之激烈者欲冲入徐宅痛殴之，经劝阻，公举代表四人，到大总统府索要欠款，并具呈全体辞职。由于部内秩序大乱，监狱看守也纷纷整理物件，放弃责任，使得服刑的重案犯无人看管，要求徐谦派人接管。徐谦接报，迫不得已，请各司员不可辞职，将来必当新旧参用。^[31]

4月29日，原法部全体司员在总统府递呈二件，一提出全体辞职，二要求补发欠薪。大总统袁世凯当即交国务院调和此事。院议总长王宠惠未来京之先，旧司员不容令其辞职，至从前欠薪，理应照数设法补发。“总统总理当即责成徐谦一力维持，现在已有公函到部说明总统总理之意见，传知各司处所矣。”^[32]这种息事宁人的处理态度，虽然避免了政局动荡，却以否定徐谦的改革为牺牲。

出任外交次长的胡惟德，原系清朝最后一届内阁的外务大臣。外交总长陆征祥因为尚在驻俄大使任上，到任较晚，部务由胡惟德暂代。“闻胡惟德拟将司员中之年少而曾习外国语言文字者，择优派赴外洋，专研究国际法学，使其深造，藉以养成外交之人才。该部司员等一闻此信，大为恐怖，有虑不能入选，早归裁撤者，有以美差方将运动成熟，恐以出洋中止者。独一般有小差使之年轻者，则跃跃欲试，异常高兴，并日日密探胡氏何时遣派。惟据胡氏告人，虽有此意，亦须俟陆总长到京再定办法。故各司员至今仍惶惶不定。”媒体

揣测：“旧日外务部人员刻虽全数留部，然将来仍不免于天然淘汰。”^[33]

果然，总长陆征祥到任后，于6月17日连续发布几道外交部部令：本部现应从新组织，所有办事人员，除经大总统任命及收文处电报处之士魁、张沛霖两员外，着即一律解散，另候新令，再行到署。接着先派定张煜全等65员留部办事，暂仍各按原厅司分别办公。其先未派在厅司者，暂均赴承政厅办事。此次未经留部之易迺观等25员，均在本国高等学堂或留学他国毕业，着记名存部，另候续传。^[34]6月22日又发布外交部部令：此次未经留部各员内，年逾六旬之恒林及业经病废之陈全森二君，着每月暂给四十元。^[35]算是善后措施。

新旧参合的做法，使得一些前清庸吏得以继续尸位素餐，败坏了民国新政府的形象，引起官场和舆论的不满。教育部留用旧员彦德，虽曾留学日本六个月学习警视，毫无学识，因为系荣庆侄婿，得以混入学部，不数月而署督学局长，敷衍因循，久为识者所訾。国体变更，应在淘汰之列，竟然仍得充任学务局长。北京学界大起激愤，拟联合团体，起而反对。外交部司员共130人，旧者约40人，其中有聋者、残废者、终年不起者及未剪辫发者，其顽固不堪、无新知识者更居大半。“共和国之外交部，乃容纳此种司员，亦一大缺点也。”^[36]海军部留用42名旧员，与刘冠雄所称实学专长和素称得力两条标准亦不尽相符，而且多属闽籍。不但旧员颇有怨言，南来人员也大为不满。^[37]

注释

[1] 《各部之笑笑啼啼》，《时事新报》1912年5月5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2] 《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要闻一”。

[3] 《教育部呈分设厅司请委任参事等职文》，《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5月5日。

[4] 《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第2版，“要闻一”。

[5]据教育部令：本部接收学部，亟应依据教育部官制选任职员，组织成立。除呈请大总统任命钟观光、马邻翼、蒋维乔为参事，董鸿祯为承政厅秘书长，袁希涛为普通教育司司长，林桢为专门教育司司长，夏曾佑为社会教育司司长外，兹委任吴震春、陈应忠、赵允元、刘唐劭、崇贵、陈琦为承政厅文书科科员，严葆诚、陈问咸、李廷瑛、柯兴昌、兴安为承政厅会计科科员，顾澄、陈简、赵用霖、德启为承政厅统计科科员，建筑科：贝寿同、范鸿泰、赵世喧，编纂员：顾兆熊、汤中、张轶欧、常福元，审查员：白作霖、林启一、陈懋治、高步瀛、毛邦伟，普通教育司第一科：许寿棠、刘宝慈、吴思训、胡豫，第二科：陈清震、谢冰、杨乃康、张鼎荃，第三科：张邦华、伍崇学、谈锡恩、李宝圭，第四科：洪思苓、陈文哲、王家驹、杨华，第五科：张敬熙、桂诗成。教育专门司第一科：王之瑞、刘家榆、杨曾浩、蒋履曾、秦锡铭，第二科：路孝植、曹典球、王焕文、程良楷、王季点。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沈彭年、樊炳清、冀贡泉，第二科：周树人、胡朝梁、许丹游、洪度。第三科：伍达、王章祐、齐宗颐、徐协真。（《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5月5日。）教育部广告：本部因承政厅及各司官制尚须提出参议院酌量变通，故自参事秘书长司长呈请大总统任命外，五月初五日部令系于未经参议院议决以前暂就现在应办之事量为分设，故于承政厅未设秘书，而暂委科员，于编纂审查两项暂不荐任，而假定为编纂员审查员之名，又于各司亦暂不设科长，均俟参议院改定官制颁布后，再准据规定名称，分别荐任委任，始为完全成立。特此声明，庶免误会。（《政府公报》第7号，1912年5月7日。）

[6]《六部近闻一束》，《民立报》1912年5月1日，第7页，“新闻一”。

[7]《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9日，第4版，“要闻二”。

[8]《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第2版，“要闻一”。

[9]《交通部续调人员》，《时事新报》1912年5月25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10]《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9日，第4版，“要闻二”。

[11]《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要闻一”。

[12]《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第2版，“要闻一”。6月29日大总统批署工商总长王正廷请开去署任及本官呈：“前因陈总长迟滞不

至，部事无人主持，是以任命该署总长署理此缺。今总长一席仍在虚悬，而时事之艰，无异往日。该署总长素以爱国为前提，尚期贯澈始终，毋萌退志。所请开去署工商总长及次长之处，碍难照准。”（《政府公报》第61号，1912年6月30日。）

[13] 《申报》1912年5月4日，第2版，“专电”。

[14] 《农林总长宋教仁启事》，《政府公报》第38号，1912年6月18日。

[15] 《农林总长令》，《政府公报》第9号，1912年5月9日。

[16] 《申报》1912年5月4日，第2版，“专电”。

[17] 《海军部之接收人员》，《时事新报》1912年5月4日，第2张第1版。

[18]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神州日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要闻一”。

[19] 《西报记各部之纷争》，《神州日报》1912年5月3日，第3版，“要闻一”。

[20] 《旧部员去留记》，《民立报》1912年5月3日，第7页，“新闻一”；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神州日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要闻一”。

[21] 《袁总统对于用人之宣言》，《时事新报》1912年5月1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22] 《北京政海春潮记（九）》，《神州日报》1912年5月3日，第3版，“要闻一”。

[23] 《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要闻一”。

[24] 《司法部次长呈报就职日期等文》，《政府公报》第12号，1912年5月12日。

[25] 《徐次长之政见》，《顺天时报》1912年4月6日，第7版，“时事要闻”。

[26] 《北京近讯摘要》，《神州日报》1912年3月20日，第3版，“要闻一”。

[27] 《京华政局丛谈（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20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28] 《北京政海春潮记（六）》，《神州日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要闻一”。

[29] 《旧部消灭记·法部裁员冲突》，《时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时事新报》报道：司法部风潮真因，亦由裁旧更新而起。徐次长先以此意电商王总长，王回电谓过渡时代，不能求全责备，请斟酌损益，以得其平。事为各司员所知，乃借发款事与徐次长冲突。事为唐绍仪所知，以为仅仅争薪，函告徐次长，未领薪水将来必能补发。（《各部之笑笑啼啼》，《时事新报》1912年5月5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30]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9日，第4版，“要闻二”。

[31] 《司法部冲突之种种》，《顺天时报》1912年4月27日，第7版，“时事要闻”。

[32] 《新旧各部近状记（续）》，《申报》1912年5月5日，第2版，“要闻一”。

[33] 《各部司员升沉记》，《申报》1912年5月28日，第2版，“要闻一”。

[34] 《外交部部令》，《政府公报》第50号，1912年6月19日。

[35] 《外交部部令》，《政府公报》第59号，1912年6月28日。

[36] 《京华政局丛谈（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20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37] 《旧部员哭笑记》，《民立报》1912年5月7日，第7页，“新闻一”。

三 专业化取向

袁世凯在成功地将视线由新旧转移到南北，从而脱离南方临时政府的革命法统，解决了自身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之后，也面临着如何建立有效政府的难题。他显然深知前清政府效率不高的种种弊端，希望自己的政府行政运作得力高效。新政府国务员公布，西文《大陆报》即以为“参用南北人才而得其平”，尤其注意到前清科第出身者仅有熊希龄一人，“是尤足征时势之变更，而此后用人行政之方针，当不如前清之局于一偏矣”。^[1]至于国务总理和各国务员，更要面对机构精简的压力。民初财政窘迫，只能进一步压缩职位，相应地对于在位人员的能力要求大幅度提升。在此情势下，平衡南北只是暂时性的权宜之计，选拔能员干吏才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当务之急。

清季改制，停考科举，变更官制，文官试验一事已经列入议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务总长程德全鉴于各地光复政权唯军政全归我有，府县等地方官吏皆仍清朝旧人，无视民生疾苦，不知政治学问，不革于下则国本不固，于2月13日呈请速颁文官试验令。孙中山认为任贤选能为当今急务，令行法制局编纂文官试验草案，咨文参议院议决颁行。^[2]

作为清季新政与宪政的要角，袁世凯对于职能政府如何高效的问题并非没有认识，甚至较一般官员体会更深。3月中旬，袁世凯就表示，民国成立，所有文官考试任用等项章程关系重要，拟即参照旧时法制院所编订的各项官制草案，斟酌损益，俟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施行。^[3]4月9日，在京的赵秉钧、段祺瑞、胡惟德等几位总长以及总统府秘书等在迎宾馆召开会议，讨论各部酌留属员问题。有人主张各国务总长次长全体到北再行核定去留，有人主张先将旧日司员有毕业专门文凭人员请总统宣布命令留署以免骑墙，有人主张凡各部旧有丞参，以录事以上无论有无文凭，一律甄别，凡取最优等者留署派差外，其余全行裁撤，以免运动之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好呈请总统裁夺实行。^[4]

袁世凯认识到，新政府即日成立，各官署章制及一切用人之资格权限，关系紧要，不容再缓。鉴于“北京各部司员久已人浮于事，南京遣来各司员又甚繁夥，甚难位置。至临时约法中于各部司员之任用，惟略为规定，然并无一定手续”^[5]，在几位总长议而不决的情况下，袁世凯于4月中旬与赵秉钧、段祺瑞面商任用之法，决定先期议定任用官吏暂行办法。“官制即暂用南京参议院所议决之官制通则，其各部用人之权，分为二级，各司长局长由总次长合意选任，而科长以下则由司长局长荐举，其资格凡高等专门学堂毕业，与在该部供差得力五年以上者，无须考试，其余则须一律试验，方得委任。”^[6]另有报道称，其任用资格，科长以下，原在南京供职者，如系高等专门学校毕业免考，在北京供职者，在部五年著有成绩免考。此外皆须考试，“以免贤者向隅，不肖者滥竽，仍蹈前清时代之覆辙”^[7]。

据此，留用人员兼顾学历与经验，新进人员则着重讲究学历知识。因为没有学历者，单靠经验很难通过标准化专业考试的程序。即使各部由总次长自择的用人，也要得到参议院审查员的同意，而且要依据学历高低确定职位。“闻大概办法须各国高等毕业者方可充司长，本国高等毕业者方可充科长，普通毕业者充一等科员，至有知识经验而无毕业文凭者，只可充二等科员。至薪水一节，有说最少每月一百元，有说最少每月三十元，须交参议院通过，刻下均未能定夺。”^[8]

国务院成立后，袁世凯要求各部事务即向新任总长交替，凡旧有之部署人员，应一律解散，以便新总长另有委任。各旧部纷纷交替，各部员司亦均大行更动，而各部人员因总统函饬解散，颇起反对暗潮，要求大总统先行拨给解散款，才肯办理交代。唐绍仪在用人问题上与赵秉钧冲突后，虽然做出让步，决定今后各部用人，除次长外均由总长负责量才任用，总理概不干涉。惟所用人员是否称职，总长仍负全责。等到考试任用章程拟定颁布后，再行分别考核。^[9]4月22日，唐绍仪与各国务员会议各部用人办法，于调停新旧之间，颇难处置。因为财政总长熊希龄尚未到任，而用人与财政关系密切，以致未能议决。^[10]然据闻所有委任各员仍系暂局，俟三个月后尚须由本部总长甄别一次，始能确定去留。^[11]

开新必先除弊。5月底，铨叙局发出通告，前清官吏的科甲、捐纳、保举、劳绩、世袭等资格一律取消。^[12]6月4日，国务院又发布

命令：“兼差为旧日恶习，庶政废弛，胥由于此。盖人才各有专长，精力不可分用，专责始克有功，兼任不免两败。民国初建，百度维新，岂宜重蹈覆辙，致坏首基。为此通令行政各机关在职人员，勿得兼任他差，其有兼差者，即由各该机关查明开去，以肃官纪而饬吏治。”^[13]清季改制，由循例转而讲求效率，各部行政，实缺与兼差大都名实不符，不少官员对于政务力不从心，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少数一身数任，在各部院行走的能员干吏。废除兼差，必然朝着行政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科举出身的旧员难以胜任，势必让位于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生。

各部负责专门行政事务的国务员，因为职责所关，无疑更加欢迎推行专业取材标准，而不是平衡南北新旧的政治考量。拿到这两柄尚方宝剑，他们不但可以更好地跳出新旧南北的纠结，而且能够设法有效地解决粥少僧多的难题。在处理南北新旧人员的去留问题时，财政部、内务部均已提出按照学历和能力选取的思路办法。

前清各部的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上下夤援，盘踞部中，不要说一般人无法插足，就连想要有所作为的堂官也无可奈何。据说“北京名誉最劣之衙门，向为邮传部，前清时几于无人不舞弊，无事不有弊，无时不弄弊。其司员非权贵之亲友，即多金之纨绔，俗所称少爷部者也。虽有自好之士，一入邮部，亦无不传染。每日到署则串通舞弊，出署则酒地花天，不知所谓公事也。尤奇者，开部不及五年，尚书更易十三次，如张百熙、林绍年、岑春煊、陈璧、李殿林、徐世昌、唐绍仪、沈云沛、盛宣怀、吴郁生、唐绍仪、杨士琦、梁士诒，几于朝暮易置，而侍郎则可以数计。盖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也。……司官中之黠者如梁士诒、叶恭绰，稍能留心公事，便露头角，历任堂官，无不倚如左右手。梁、叶二人，遂援引无数粤闽同乡，勾结一气，上下把持，司员中如关赓麟、关冕钧、谭祖任、唐士清、谭天池、何启椿、梁用弧……惟其然也，事无巨细，非闽粤两省人不能预闻。满清有势力人物如良揆、良弼、刘道仁、李景和、卢静远、沈林一、唐宝锷之类，于邮传部中均有干薪，为数甚巨。”

盛宣怀接掌部务，改委浙人许引之为京奉路总办、苏人孙钟祥为京汉路总办，不过徒有虚名，并不敢放手整顿。盛拟以许鼎霖取代叶恭绰，方商之沈云沛，梁士诒已指使其三家机关报群起攻击，事遂作罢。越数日，盛由其宅内下一堂谕，派皖人徐乃光为总局总办，以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计。不意盛方到署发表此堂谕，载洵忽来电话，横加

干涉，盛只好取消成命。而徐系载泽私人，于是载泽载洵又起冲突。自梁士诒任邮传部长，又兼大总统府秘书官，各路总办俱改用粤人。“一般舆论咸谓该部如欲整理，非全易旧人不可。……然后大加刷新，以专门人才组织之，或可有重逢天日之望。”^[14]

首任交通总长施肇基为人圆融，误传是他岳丈的唐绍仪又为梁、叶密友，舆论以为其不过傀儡而已。可是施肇基履任后，颇思有所振作，率先将交通部因乱事告假人员予以裁撤，随后“外交、内务、理财、教育等部亦有裁减员额以节财用之风声，于是在各部当差人员，皆于心界上增添一忧愁之点，其中恐慌尤以旗人及守旧派达最高之度，新人物尚能勉强自持，不呈露张皇之状况”^[15]。

可惜施肇基的改革阻力太大，一波三折。4月22日，施肇基到交通部履任，于前清邮传部司员只留40余人，次日复到署，将所留各员逐一点名，余俱解散，并谕各录事，定于23日当天当堂考试，分别去留。“诂解散各司员暗中鼓动各录事，以官制取消，皆属平等，须将留部及新来各员一律考试，分定等级，万不能以一人意旨，即指某为科员，某为录事，是共和反胜于专制矣。随将堂谕揭破，由承参厅善言解劝始散。次日，复全体到署会议，拟具公呈一通，每厅司局处各举代表二人，由各代表发言，向总长质问。秘书长某闻信，再三劝慰，维时已三钟半，总长尚未到署，遂将公呈先递秘书长处。旋总长到署，当将公呈交阅，并面述众人反对理由。总长无可如何，即将所发布告取消，并谓将来办法与司员一律，决不畸重畸轻，其事乃寢。”^[16]

邮传部录事所争表面上是要求与新来人员一律平等待遇，其实主要还是害怕考试遭到甄别淘汰。因为施肇基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到京人员并无特殊礼遇。“闻南政府交通部员陆续到京者计有六十余名，俱系留美邮电学生，于日前往见施总长，施卒然曰：诸君此来欲谋司长科长耶？现本部旧人甚多，一时恐还借重不到。即使将旧人尽行解散，本部亦无如许位置云云。该部员闻言大怒，曰：我辈本系交通部人员，以公是总长，不得不来相见，安见便是谋司长科长耶？何苦一见面便若此盛气相侵，使用满清专制上司的架子。一人冷笑曰：汝不过唐少川之侄婿耳，有何实学，堪任总长？言已，相与鼓掌大笑曰：不必理他，我们散罢。遂一哄而去。”此事出自坊间传闻，连报道相关消息的《申报》也认为“此说恐未必确，想施总长或不至若是颟顸，南政府人员亦未必若是暴躁也”。

在迫使施肇基取消定期考试以定去留之后，邮传部录事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反而变本加厉。作为替代办法，施肇基“但令各司员出具切实考语，以便分别录用。诎录事等尚不谓然，前日又在署中开会演说，要求全体录用。事为施总长所闻，以如此纷扰，将来办事，何可下手，势必遇事阻碍，尚复成何事体。因于昨日将全体录事一律解散。闻此次好事者不过少数，而藉此糊口者一闻此命，莫不愁锁双眉矣”^[17]。不过，解散所有录事之后，公牍无人缮写，积压无数，尤以路政司和铁路局公事最多，南京到部和本部留用人员只得全部集中到铁路局办公。施肇基拟将旧有录事一律召回，但必须严行考试，酌留一半，以足敷办公为止，而免冗费，不再另行招考。^[18]

司法部暂时主持部务的次长徐谦，4月初便于谒见袁世凯时表明用人方针，将来属官新官制确定，缺额均选用中外法政专门毕业人员补充。而且留用法部旧员，也要定期先行考试，以定去留。^[19]又以从前的法官多有不胜其任者，拟俟总长王宠惠到京后会商，将原有法官全行甄别一次，其甄别之法分为三项，一出洋留学法政有毕业文凭者，一在本国法政法律学堂毕业而有裁判才智者，三于新旧法律人情风俗均皆透彻，而又于裁判上富有经验者。除此三项外，无论其系何项出身，概不留用。^[20]因为旧员的联合抗争，甄别被迫暂缓，但徐谦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

总长王宠惠到任后，虽然表明不分新旧的态度，做法却基本延续徐谦的思路，立即发布司法部令：“溯自国体变更，中央行政机关本应首先改组。维时国务院尚待组织，在京原有各部不得不暂时继续办事。迨四月二十一日奉大总统令宣告国务院成立，旧日各部事务应分别交替，由各总长接收办理，是为一定之手续，亦正当之办法，固无所容心于其间也。顾自共和宣布以来，全国统一，在北在南，凡经服务之人，均属尽力民国。本总长同深敬佩，毫无歧视。兹经本总长派员接收前法部事务，无论新旧各员，未经指派者，均暂缓进署，听候另行组织。本总长自当虚心访察，延揽富于学识经验之人，共图司法行政之进行。除荐任官外，所有应行委任各官，即当另行通告，定期考试，以示大公。且此次考试并非专为去留部员之计，其考试及格而未经选入本部者，仍可为改良法院之储备。惟是民国用人，期无倖进，而官制谨严，必难普及，任劳任怨，本总长亦所不辞。区区此心，实惟共谅。”^[21]此项命令既确认了接收前清法部的正当性，又表明南北官员都是尽力民国，因而无论新旧，一视同仁，不分轩輊，还毋庸置疑地宣布必须通过考试确定去留，考试合格，也要根据官制

需要任免，不合格则连录用资格也没有。这不但断绝了倖进者的企图心，也有效地避免了因为粥少僧多而可能引发的风波。

据《天铎报》报道，考试之法并非由王宠惠主动。徐谦主事时期，因意见冲突，风潮不断，即在部中宣布，大总统传谕，各部用人，皆由总长酌派，一时未得派差者还可续派。旧司员张振庠抗论道：酌派二字太嫌囫囵，总当以考试为定。随后又上一意见书，谓国称民主，大总统尚无随意指派官僚之特权，而各部总长乃能随意酌派属员，与共和原则太不相符。要求徐谦请王宠惠详解酌派二字，以释群疑而绝侥幸。该意见书刊登于某报，为王宠惠所见，深以为然，故实行甄别以膺众望。开始南北各员报名考试者仅50余人，后王总长电话传谕，非报名投考者，无论南北，一概不用。所以第二次续报名，又增加了50余人。^[22]

随后司法部发布招考通告：

查普通文官须经考试任用，为东西各国之通例，司法一职，实全国人民自由生命财产所关，非遴选人才不足以昭慎重。兹本部组织伊始，除荐任官外，所有科员等必须考试及格者，方予委任，以示大公。为此，通告南京司法部及北京旧法部人员，均可报名应考。至此次考试，并非专为去留部员而设，其考试及格者，如未选入本部，仍可为将来改良法院之储备。凡有志愿者，即日赴部报名，幸勿自误。

报名期间：5月8日至11日；报名处所：前门内本部（旧法部）报名处；报名手续：填写履历，呈验凭照。考试日期：5月14日至16日；考试时间：每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时至5时；考试处所：顺治门内象坊桥财政学堂；考试科目：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监狱学，以上六科，每科发法律原理问题四则，其中指定二则必须全答，每则30分，其余二则任答其一，40分。考取数无定额。

^[23]

据说旧司员中由法政法律学堂毕业者闻之咸有喜色，由科甲捐纳出身者，于法律毫无研究，一闻考试，皆切齿痛恨，已多携眷回籍，不与考试。^[24]截至报名日期，仅有百人投考，其中录事70余人，司官不过20余人。^[25]而有毕业文凭的只有50余人。^[26]经过考试，司法部最终录用了刘定宇（平均84分）、宋庚荫（63分）、何蔚（61分）、吴汝让（60分）、徐彭龄（59分）、何超（58.6分）、马有略（57分）、傅绍儒（51分）、王彦藻（50.3分）、苏镇垣（50分）十

员，着于6月8日下午2时来署接见。^[27]仅就分数判断，即使录取者也是相当勉强，充其量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谈不上择优录用。徐谦阅卷后即表示可取者不足10人，颇难去取，交由总长定夺。^[28]

考试虽然如期举行，效果却未必合乎预期。而且南省各员对此不以为然，拟联合团体，断不投考，宁愿罢归。但必须由总长发给川资。闻王宠惠系为徐谦所播弄而演出此无谓之举，现颇悔考试办法之不当，将来任用司法机关各员，当以法律法政毕业者为标准。除未习法学而确有经验者酌留数员外，其余悉尽毕业人员委任。^[29]

由于各部留用旧人之事风潮不断，宋教仁、范源濂、徐谦等主张考试一次，以定去留。但是其他总长也有不同意见。蔡元培就认为：“旧司员不少品端学粹之人，若必待考而后用，恐稍具崖岸者洗耳而走矣。量其才而用之，既用之后，不能称职，退之可也，安用考试为。唐总理亦赞成其说。故考试之事，已成画饼矣。”^[30]教育部在交接用人等方面较为顺利，与蔡元培的取法不无关联。用考试来阻退旧员或许有效，选拔优才则整体而言或许适得其反。当然，教育部与各部有所差异，士人自高身份，各有所长，以考试排名次定取舍，实在有辱斯文，难免投机者趋迎、自重者却步，形成负筛选。

除司法部外，工商次长王正廷也于5月上旬委派周家彦、廖言、屠振鹏三人考验农工商部旧员，以定去留。丞参以下一律与考。^[31]内务总长同样对于任用司员一事难于处置，经张元奇调停，决定采取考试甄别之法，分别去留，以消异议。^[32]

其余各部，虽然没有要求必须通过考试来甄别录用，也以不同形式强调和坚持专业化的取向，因而重视学历出身。如海军部旧员共有103人，其中曾习海军者仅30余人。总长、次长拟将未习海军人员全行淘汰，即使曾习海军者也要择优授职。^[33]总长刘冠雄当众宣言：“此后部中委任各员，须系海军出身，其非海军出身者，必须熟悉部务，确有经验，不能似前清时代之庞杂。”^[34]经过筛选，连同南来的40余人，海军部人员合计不过70余人，拟改设七司，逐渐派定秘书长、司长等员。^[35]该部旧人以刘冠雄用人不公，联名上书质问，旧人中留学外洋者又要挟刘另设海军参谋处，以位置多人，刘皆不为所动，反而进一步向唐绍仪提出，历年各省所设船政水师海军学堂毕业多人，其中不无人才，拟考试取录，以备任使。^[36]

教育部总长蔡元培用人虽然不得不兼顾南北，其本意却是“将学部旧司官一体解散，从新组织，以示振作”。农林部总长宋教仁要等工商总长陈其美来京，才能商议分割接收事宜及其具体办法。“惟闻已调取部中学生出身之履历，大概有注重学生一面之意。”^[37]陆军部按暂行新官制派定人员后，总长仍以“本部关系全国军务，非用专门人才不可”，发谕要求旧有员司凡由陆军各学堂及专门学堂出身者，应仍留备差遣。^[38]财政部筹备处续调93人，以东西洋留学生为最多，其中原在南京财政部的34人，新调者59人，而旧度支部人员甚属寥寥，以致其余旧员为此怨声载道。内务总长赵秉钧拟定五条留人标准，第一条就是留学东西洋或国内警察学堂毕业，其余依次为当差资格5年以上，素日办公勤慎而无贻误，历充要差甚为得力以及现充要差难以更动。^[39]

法制局局长章宗祥系留日出身，前清任过内阁法制院副使，“以民国初立，法制关系重要，极思认真办理，一洗从前腐败之习，其所调用人员，均系东西洋留学生”，如朱献文、汪有龄、余荣昌、恩华、徐秀钧、汪炽芝、胡初泰、林行规、杨荫杭、胡貽穀、陈介。^[40]同样偏重留学生的还有财政部，以致除了南北意见外，尚有所谓东西之竞争。“盖西洋毕业人员多看不起东洋学生，而东洋毕业人员又妒忌西洋学生，于是南北东西，时生冲突。”这与五族共和、政府用人不分畛域的精神相悖。迫不得已，总长熊希龄在部宣言：“本总长用人，一视其人之贤否，不论其新来旧留，更无东洋西洋留学之区别。诸君惟当以国家为前提，万不可存高傲心，尤不可存嫉妒心。”^[41]

外交部的用人政策有所不同，总长陆征祥因为长期驻在欧洲，不太熟悉部务，而且南京方面来员仅4人^[42]，因而采取相对稳健的做法。6月11日外交部发布部令：“本部为民国外交行政中央机关，整理伊始，端赖群材，学问经验，二者并重。本总长久驻欧洲，未亲部务，尤赖老成硕彦相与匡扶。现当鼎革之交，部制未经订定，员缺或难相济，势属无可如何。惟外交前途方当力图发展，则需才正广，所有本部旧时员数，比诸他国，并不为多。本总长为事任人，不拘一格，果有相当之才，必不使抱向隅之憾。至任用之先后，地位之高下，未必尽能满志，亦或势使之然。但本总长区区愚忱，天日可鉴。兹特酌定办法，所有在部诸君，请照所拟程式，各具履历，亲笔填写，于两日内送交承政厅转呈。除由次长、参事及司长诸君各就平日所知开单推举外，即凭所具履历参酌择用。惟既经本部派定以后，如

于他官厅署兼有差务者，应即自行决定去留。”^[43]这与蔡元培的用人方针颇为近似，也是适合该部实情之举。

注释

[1] 《西报评论新国务员》，《时事新报》1912年4月1日，第1张第2版，“紧要时事”。

[2] 《内务部请颁文官试验令呈及临时大总统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第28页。

[3] 《北京近讯摘要》，《神州日报》1912年3月20日，第3版，“要闻一”。

[4] 《会议裁留部员》，《顺天时报》1912年4月10日，第7版，“时事要闻”；《预备各部要务》，《新闻报》1912年4月16日，第1张第3版。

[5] 《北京政海春潮记（三）》，《神州日报》1912年4月27日，第3版，“要闻一”。

[6] 《任用官吏暂行办法》，《申报》1912年4月20日，第2版，“要闻一”。

[7] 《北京政海春潮记（三）》，《神州日报》1912年4月27日，第3版，“要闻一”。

[8] 《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第2版，“要闻一”。

[9] 《各部用人之责成》《解散署员之暗潮》，均见《顺天时报》1912年4月26日，第7版，“时事要闻”。

[10] 《北京政海春潮记（五）》，《神州日报》1912年4月29日，第3版，“要闻一”。

[11] 《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要闻一”。

[12] 《北京政界之潮声》，《时事新报》1912年5月31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13] 《国务院令》，《政府公报》第37号，1912年6月6日。

[14] 《交通部之今昔观》，《申报》1912年4月26日，第2版，“要闻一”。

[15] 《新官场现形一斑》，《申报》1912年4月26日，第2版，“要闻一”。

[16] 《旧部署风潮迭起》，《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要闻一”。据《时事新报》1912年5月4日第2张第1版《交通部之风潮》，施肇基于到任次日发布告，将从前所有录事概行甄别考试。全体录事大动公愤，谓共和成立，阶级陋习宜扫除净尽。司员与录事同属办公人员。而一则随意录用，一则必经考试，殊不足以昭公允。遂全体会议，由各厅司局处公举二人向总长质问理由。总长屈于公论，立将所发布告取消，并谓将来办法，当与司员一律，决不畸轻畸重。风潮于是略息。《神州日报》则称，施肇基受任之前，奉总统总理谕令，只留专门毕业生和当差五年者，但所留51人中，多未毕业之人，且有办事七年而不留用者。司员咸抱不平。25日考试录事时，后者诘问考试理由。施谓革命时代以前之人，不适用于今日，不得不加考试，分别能否称职，以定去留。录事等即驳之曰：录事固皆革命以前之人，然总长独非革命以前之人乎？革命以前之人既不适用于今日，则何必多此一考。且总长既与录事等同为革命以前之人，即同为不适用于今日之人。如欲取消录事，须请总长自行取消，以为之倡。又谓司员不考，独考录事，其不平等太甚。施黯然。少顷即曰：不考何如？录事谓：不规则之命令，非总长亲自取消不可。施无如何，遂亲手将传谕销毁。（《北京政海春潮记（七）》，《神州日报》1912年5月1日，第3版，“要闻一”。）

[17] 《交通部风潮迭起》，《申报》1912年5月6日，第2版，“要闻一”。

[18] 《交通部录事之转机》，《顺天时报》1912年5月7日，第2版，“杂报”。

[19] 《司法次长之政见》，《顺天时报》1912年4月9日，第7版，“时事要闻”。

[20] 《司法人员大恐慌》，《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第8页，“新闻三·北京通信”。

[21] 《司法部令》，《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5月8日。

[22] 《司法部小风潮》，《天铎报》1912年5月21日，第3版，“中外大事”。

[23] 《司法部招考通告》，《政府公报》第9号，1912年5月9日。

[24]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五）》，《神州日报》1912年5月13日，第3版，“要闻一”。

[25] 《京华政局丛谈（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20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26] 《京华政局丛谈（七）》，《神州日报》1912年5月27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27] 《司法部考取科员单》，《政府公报》第39号，1912年6月8日。

[28] 《京华政局丛谈（十）》，《神州日报》1912年6月2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29] 《司法部小风潮》，《天铎报》1912年5月21日，第3版，“中外大事”。

[30]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神州日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要闻一”。

[31] 《各部纪闻》，《时事新报》1912年5月9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32]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一）》，《神州日报》1912年5月6日，第4版，“要闻二”。

[33] 《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要闻一”。

[34] 《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第2版，“要闻一”。

[35] 《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要闻一”。

[36]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六）》，《神州日报》1912年5月14日，第4版，“要闻二”。

[37] 《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1版，“要闻一”。

[38] 《各部纪闻·留用专门人才》，《时事新报》1912年5月15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39] 《北京政界之潮声》，《时事新报》1912年5月31日，第2张第1版，“紧要时事”。

[40] 《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要闻一”。

[41] 《各部司员升沉记》，《申报》1912年5月28日，第2版，“要闻一”。

[42] 《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二）》，《神州日报》1912年5月8日，第4版，“要闻二”。

[43] 《外交部部令》，《政府公报》第44号，1912年6月13日。

四 舆论与申论

权力枢要所在的内阁各部分争风波不断，引起舆论的持续关注，并随着事态的发展不断发表相关评论。各报背景人事不同，立场观点各异，总体上反对无谓之争影响政局乃至国家形象，具体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以及当事各方责任的判断却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国务院刚刚成立，《时报》就发表署名“孤愤”的社论《敬告新内阁诸公》，欢呼新内阁成立之余，提出两点消极希望。其一，“今日各部草创伊始，凡一切部员，皆赖总长之组织，非如满清时代袁内阁之有旧部可循也，又非如南京政府未统一以前之可以草率从事也。国人既属望于诸公，诸公宜振刷精神，组织一完全之内阁，俾一雪吾国人政治能力薄弱之耻”，不要以为临时内阁是过渡之冲而瞻前顾后。其二，责任内阁多由同一政见同一党派组织，新内阁则新旧杂糅，南北兼用，难免政见分歧，产生冲突。希望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勿生意见，力求维持。^[1]社论准确把握住了国务院的与众不同及其基本症结，指出南北政府政治上居于对等地位，因而合组统一政府，首要应当防止新旧杂糅而导致分歧冲突。尽管署名社论一定程度上只是体现作者的意思，此文的确反映了《时报》关于此事的基本态度。

自武昌起事以来，中国的政治格局加速分化重构，与《时报》背景全然不同的《大共和日报》，观点却不无近似。4月1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第一版发表署名“揽莽”的社论《论新政府用人之方针》，敏锐地认识到，在责任内阁成立后，“所竞争不下，而犹待调停者，惟旧时各部之员司，以及南京各部之新进耳。在旧部员司，以为政体虽改，而国实未亡，各部所办之事，什八九仍沿前清旧制，朝章国故，吾辈最为谙习，疏附先后之选，舍吾辈其孰与归。彼草茅新进之流，决不得分吾曹一席之地。而南京政府中人，则人人皆趾高气扬，以新国人材自诩，谓政府为民国政府，但有迁徙而无解散，他日即移驻北京，而各司人员决无另行组织之理。彼旧时腐败官吏，自当在天演劣败之列，而不可更留为新国玷”。

上述两造自以为是的言论，作者已经耳熟能详，对于双方的观点却不以为然。国步艰危，爱国忧时之士，应当同心戮力，不能因为萦

怀利禄，不惜各分门户，反唇相讥。尤其是那些自命志士为物望所依归者，如果只知保全利禄，则民国前途真的希望渺茫。

有鉴于此，社论明确提出：“吾以为政府总理及各部总长次长，对于此事，当始终持坚忍之主义，以综核名实，激扬清浊为己任，不惜以一身丛怨府，必举前清时代长官模棱瞻顾，僚属奔竞把持之旧习，扫荡而廓清之，庶几风气转移，人才蔚起，纵内忧外患之方殷，不难鸠群策群力以挽回之。而不然者，或屈于情面之瞻徇，或怵于势力之撓逼，明明知为害群之马，乱苗之莠，而聊且虚与委蛇，以名器为调停之具，影响所及，岂徒国事蒙其损害而已。南北新旧之交争，其势方较往时尤为烈，而国家员缺有限，终不能人人而厌其取求。”

在社论的作者看来，冗员过多有其前因。清室末造部署骤增，夸毗侧媚之夫，轻险剽悍之士，皆得乘时速化。而南京临时政府草创之初，急欲得人，薰莠泾渭，无暇别择，所招来位置者，大抵虚声无实，欲得俸钱以糊口者。“吾故以为今日官人之法，当一化南北新旧之畛域，而实行甄别澄汰之方，考之言以覘其平日之蕴蓄，询之事以验其临时之干略。……当今日存亡绝续之交，苟委任不得其人，虽欲追悔而无所及。”

4月28日，《时报》针对交通、内务等部裁撤冗员，而袁世凯急谕总长设法调停之事，发表署名“惜诵”（李岳瑞，1852—1927）的社论《论各部裁汰冗员不可为浮议所动》，指调停之举为大误。“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前清末造，官邪之炽，宠赂之彰，殆未有过于京朝士夫者也。民国初基，万事草创，正宜实行改良官僚政治，以尽涤旧时之秕政。而首善之区，四方观听攸系，更未有重要于各部之曹司者。苟不急行沙汰澄清之策，则官邪之芽蘖犹存，即暂时敛戢于目前，而暗长潜滋，终必尽复故态而后已。”

清代京朝官势力凡三变，清初员少缺多，乾隆以后缺少员多，庚子后政纲定为中央集权，内外轻重失衡，倖门大开，致以贿成。外吏之望京秩，若有班生登仙之羨，乃至有舍监司实缺百计谋一丞参行走者，邮传、度支两部，尤为群羶所集。京员暮夜包苴，植党营私之伎俩，倍蓰于往时，外吏廉耻道丧，国步随之。共和政府开幕，正宜乘机转移风气，用人不拘一格，必须真才实学，不使滥竽伴食之流、夸毗侧媚之夫与绝足轶群之士并处一堂，以致功过不清，赏罚不明，重蹈前清覆辙。交通、内务两部甄别裁汰冗员，为当务之急，不可因员司反对抗议而畏难色沮。凡才俊之士，自信且自尊，不会轻言反抗，

而斗筭之才，必由賄賂囑托而來，人數雖眾，有害無益，全體引退亦不足惜。“若對於此輩而亦畏蒞之不暇，天下尚有一事之可為乎？特在事者當鑒以公明之識，而持以堅毅之誠，既不可賢否混淆，致真才被黜，而適與此輩以借口，尤不可于投鼠忌器之見，因一二要津之關係而遂至誦大法以遷就之。此議倘得實行，士氣官方，必將為之一變。往時叢脞敷衍之風，不俟戒而自絕，共和政體之良法美意，庶不至有名無實而徒托空言乎。”^[2]

可惜良好願望並未變成現實。5月4日，《時報》再度發表署名“惜誦”的社論《北京部員去留之紛爭感言》，對於南北人員的爭鬥表達強烈不滿，認為南北雙方雖然自詡為新國之才俊和勝朝之故老，自負為開國元勳、禮樂先進，視對方為亡國大夫、佯荒下士，其實都有貪圖名位利祿之嫌。清季吏治腐敗，天下士子群趨仕進，世風淪喪，不待武昌起義，清室已必亡。民國初基，最急之先務，“當舉前清官僚政治之極弊，汎掃而澄清之，廉耻厉而氣節昌”。如此重責，不僅在政府易轍改弦，尤在士君子洁身自愛。若總次長位置私人，員司各自競爭，不知處堂巢幕之可危。“平心論之，兩方政府取銷之時，皆當舉全部員司而解散之，而別加嚴重精密之甄叙，汰弱留強，拔十而得二三，亦云足矣。然後合并而組織之，別成立一新機關，被摒者既無辭以戀棧，留署者自感奮以馳驅，朝氣盛而錮習祛矣。”必須破除情面，裁汰冗員，才能樹立正氣新風，國立民依。^[3]與上一篇社論着重遣責前清官邪秕政明顯有別，此文對於南北新旧人員各打五十大板，看似公正無偏，前提却是將南北政府等同視之，完全無視其性質差別。其實所謂南北新旧之爭，主因在於人數眾多的前清旧員力圖把持排拒。這顯示袁世凱混淆視聽的效果顯著。

正当各部用人風潮涌動之際，《順天時報》以《箴新政府之用人》為題連續發表論說：“民國新政府成立，旧部人員即消灭，此當然之理也。然新旧之交替，案卷之接收，萬不能純用新人，當參用旧員，俾相接洽，此又必然之勢也。各部總長用人之初，不問其為新旧派，不遑考其人之賢否，必求我所最信任者，其為我所素景仰之大名士，或不為我用，而我所信任，又為我用者，即為我之親友，當此不循資格之時代，更無庸顧忌援引私人之嫌，此亦自然之情也。必謂新政府之組織，盡用新人材，所有旧員，盡投濁流，而袁大總統、唐國務總理，固皆滿清之旧臣仆也，則何以解。必謂政府之建設，用才不拘一格，賢者智者，兼收并進，片長薄技，弃瑕錄瑜。然所留用者，間有劣員，所裁汰者，未必不才也，則又何解。於是新黨中之懷材郁

郁者众矣，旧员中之得意洋洋者多矣，甚至为一人之位置，有为前清所革斥，舆论所攻击者，有激起国务员之冲突，致以去就争，冲动暗潮者。在旧人员失其为官之营业，恐无瞰饭地，为昏夜之乞怜，为奔走之运动，乃其习惯伎俩，毫不足责。独怪受其愚弄者，何以置世界之大不韪，竟弗觉悟乎？”

又进一步梳理法部旧员之争款，非用人问题直接影响；唐绍仪与赵秉钧之冲突，咎在唐位置私人。虽然举贤不避亲，唯才是举，但前清积弊，天下败坏，由于亲贵揽权，革命激起，肇端援引私人。过去指责清政府误国殃民，诸君一旦得志，不引为前车，竟步其后尘，为一己之累不足惜，“特恐为吾外强环伺，党争屡起，基础建设未固之民国前途累也”。^[4]

不过，法部旧员所争，究竟是何种款项，众说纷纭；而唐绍仪的行为是位置私人，还是兑现在南京时的承诺，也有曲隐。

按照《箴新政府之用人》的描述，法部人员津贴，向给半额。自去年春，度支部照给全额，拨款交法部。而法部堂官按八成发给，酌扣二成，存入银行。现各员以为将被裁撤，此款既难取现，拟减成出售。如此，则法部员司不过是拿回自己被扣的款项，而且是情非得已，又只能拿回部分。其要求不但理所应当，而且令人同情。但实情如何，其他各报的报道与此有异。《时报》的《法部之分赃问题》就说，法部原存款银三项，一为贻谷交款，一为瑞洵交款，一为苏元春交款，共计九万余两。善铨挑唆徐谦、沈家本倡议将此款三人暗中分吞，又担心惹起风潮，乃集商于各司官员，而众司员意见不一。沈、徐提出，如主张分款，须先行具结。各司员质问此事由何人发起，二人却相互推诿。^[5]

唐绍仪明知各部用人全权在于总长，却要大加干涉，“在己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以此次赴南，曾经面许多人，各部长虽不谓然，究无敢显为抗者”。唐绍仪要求内务部位置80人之多，而内务部差缺总共不过百零。总长赵秉钧表示：“原人多系可靠熟手，况大局俶扰，奔走任事，赖以维持四月之久，其功具在。若废弃不用，不惟失之苛刻，且骤易生手，于政务上亦多妨碍，万难如命。”听了这一番看似合情合理的解释，唐绍仪仍然坚持前议，不容置疑：“余之八十人断断不能减少。”赵秉钧以既要位置多人，即请加增额缺，唐又不允，于是双方大起冲突。^[6]

这类报道中的细节，如是否有80人之多等，还须进一步考证。问题是，唐绍仪如果真想位置私人，是否有如此之多；即便有，能否一味强人所难，态度如此蛮横，却丝毫不觉理亏。双方彼此心知肚明而不愿宣之于口的，恐怕仍是新政府成立背后的种种约定与出尔反尔。唐绍仪在南方面许多人，应该不是私人行为，因为按照约定，或者说他的理解，他接受下来的南方临时政府各部，就已经是新政府的班底。随之北上，是接收前清旧署，而非重新待选。而组织内阁各部，正是总理的职责所在，而且是头等大事。只是在上有大总统、下有各部总长的夹击之下，作为责任内阁的阁揆从起步组建阶段就已有大权旁落之势。

紧接着，《顺天时报》再度发表李振铨的论说《论政府用人之宜慎》，认为民国初建，五族同心希望政府稳固。“欲求政治之进行，自以用人入手第一要义矣。况政府人物，为众目所睹，如万矢之的。苟其贤也，则交誉之，其不贤也，则群毁之。故非有知人善任之明，弗克收国利民福之效。”前清失败要因，在于用人不慎，上下交相恶，安富尊荣，揽权纳贿，奔竞营求，谋缺钻差，金钱花酒，结纳夤缘，不顾才能贤否，学识深浅，以官爵禄糈为拍卖物品，植党营私，相习成风，“遂至政治之腐败，民生之疾苦，国势之衰颓，不可收拾，而陷于危亡也”。近日各部用人，意见分歧，或登用新进，或挽留旧人，各行其道。“夫政治之设施，必思想与经验二者相辅而行，始能发展其作用，而达良好之结果。”思想专凭主观之企图，经验专依客观之事势，表里相实，不可偏废。大抵旧日官吏，无政治思想，而其间安分守常的老成者具有政治经验，新进之士多富有政治思想，却茫然于政治经验。萌芽时代的共和国新政府，悉委托于一般旧人，势必重蹈前清覆辙，若委托于一般新进，又难免新手驾危船孤舟行于惊涛骇浪，张皇失措，船毁人亡。“窃愿当轴者于用人一事，毋瞻徇私情，毋拘泥资格，毋存意见，毋分畛域，毋厌故喜新，毋昧今泥古。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因材施教因地因事因时以慎选之，以严核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随材器使，量能授职，循名责实，至正大公，斯庶乎政无废事，官无弃材，以保此主权人民土地之三要素，而完全我绚烂之国家。”^[7]

接收逊清王朝的政府旧署，应是由帝制而共和的国体更替过程中天经地义之事。严格说来，当时中国只有两种政权，一是南方的光复独立政权，实行民主共和新制，一是北方的逊清王朝政权，仍然延续皇权帝制的旧轨。国体变更，接收清朝政权，理所当然地应由共和政

权主持进行。可是旧政权在其阁揆袁世凯摇身变成统一共和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之后，由于袁世凯及其部属的有意扶植，名分上似乎也呈现脱却王气演变成与南方临时政府对等的权力机构之势。犹如戴罪之身在等待宣判行刑的过程中不仅成功脱罪，还莫名其妙地化身正统。南北政权同时解散实际上意味着双方均不具备或已经结束法理正统地位，无形中剥夺了南方临时政府的正当性，而赋予北方旧政权以某种合法性。在以南方临时政府为主体组织新政府，继而北上接收前清旧署的约定化为乌有之后，统一共和政府的组建异化为南北合组政府，以致无法名正言顺地选用各部官员。在新旧南北的纠葛中，政权鼎革应有之义的接收清朝不仅变成承接一副烂摊子，而且清朝的官场积习随着旧员的录用在新生共和政府中逐渐发酵，中国前所未有的由帝制而民政的国体政体变更，不免黯然失色。

不仅如此，责任内阁是权力中枢，国务院及各部人员的组成，不仅关乎新政权的行政能力，也会影响到能否体现其民政性质，从而奠定共和基础。毋庸讳言，南京临时政府草创之际，确有用人无暇考察斟酌、难免鱼龙混杂的弊端，所谓南北新旧之争，南员同样难辞其咎。但不应混淆的是，争端主要起于冗员过滥的前清旧员，如果依照约定，在南方组织政府北上接收前清旧署，则不仅革命法统得以延续，前清衙署不再具有北方政权的地位，旧员更无不待选而力争的资格底气，新内阁可以从容选拔良才，以应共和时代的新型政事，避免南北新旧的纷争困扰。

更为严重的是，在应对风潮不断的过程中，法理上作为权力中枢的国务院受到来自大总统和各部总长司员的挤压，成为矛盾冲突的焦点，不仅承受了极大的政治与社会压力，而且日益被矮化虚化，权力不断流失，总理难安其位，加剧了政局的动荡，责任内阁有名无实。南方民党一厢情愿的院会协同合力制府的政治安排，本来就缺少实力支撑，由于参议院未能给予至关重要的国务院建置以足够重视，民党参与执政的机会从一开始就被严重削弱，本应大权在握的院一极反而最为弱势，自身难保，以致阁揆非但无法有效地掌权行政，还不得不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

精心导演了民国开国这一幕大戏的袁世凯，看似渔翁得利的最大获益者，各方角力的结果，府一极坐大坐实，最终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作为清季封疆大吏中趋新的要角，直隶因袁世凯办理新政成效显著而成为各省的楷模，对于清朝吏治的积弊和权力架构的弊端，袁世

凯知之甚深，因而用人行政极为注重学历和专业化。被裁撤的前清旧员投其所好，早就筹议设立速成法政学堂，以应文官考试之预备。^[8]使得民初法政学校数量猛增，北京及其周边聚集了大量就读法政学校或只是设法购买相关文凭的“高等游民”，以便轻松取得做官的资格，摇身一变实现由旧官吏到新员司的转化。北京政府时期官员的学历构成因此在短期内大幅提升，造成行政专业化的假象。

中国官场的这一副马厩，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扫干净，不过，想不想打扫以及如何打扫，对于能否打扫干净至关重要。就此而论，民国肇建，建立新制度和组织新政府，虽然无法规避万事开头难的一般规律，毕竟不能说是开了一个好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起步已经偏离正轨，进程与结局可想而知。即使对于袁世凯本人，包容太多的旧物显然也是负累，不仅新政领袖的声名毁于一旦，整个政治生命和历史定位也将循此轨道由云端跌入地狱，到头来，机关算尽得来的荣华和权力都烟消云散，只落得个无限骂名在人间。

注释

[1] 《敬告新内阁诸公》，《时报》1912年4月2日，第1版，“社论”。

[2] 惜诵：《论各部裁汰冗员不可为浮议所动》，《时报》1912年4月28日，第1版，“社论”。

[3] 惜诵：《北京部员去留之纷争感言》，《时报》1912年5月4日，第1版，“社论”。

[4] 醒：《箴新政府之用人》，《顺天时报》1912年5月9日，第2版，“论说”。

[5] 《法部之分赃问题》，《时报》1912年5月3日，第3版，“要闻”。

[6] 《北京通信记·国务总理之位置内务部人员》，《时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要闻”。

[7] 李振铨：《论政府用人之宜慎》，《顺天时报》1912年5月10日，第2版，“论说”。

[8] 《时事新报》1912年4月15日，第1张第1版，“电报”。

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民国元年8月至9月，孙中山北上，在原来清朝的京师如今民国的首都与各方人士会面交谈，其中既有同党同道，也有曾经的敌人对手。这些日程安排紧密的交往，大都在学人的视野之中，有了相应的研究和认识。唯有一个身份特殊的方面，鲜有论及，或虽有简略提及，情节却有错误，即与逊清皇室皇族的交往。^[1]在这些交往中，作为被革命推翻而以退位方式下台的末代王朝的统治者，逊清皇室与革命党的领袖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交集，这些交集又如何体现了双方各自的态度，对于民国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如何理解革命党民族主义的排满和清皇室在政权鼎革之际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值得深究。

注释

[1]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陈锡祺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6—727页）于9月10日和11日分别有溥伦代表清皇室宴请孙中山以及访晤摄政王及后者答拜的条目，日期和情节均有误。

一 逊清皇室的欢迎活动

1912年8月24日下午5时40分，孙中山从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自1894年6、7月间游历京津后，这是孙中山再度踏上国都的土地。只是前次还是清朝的京城，如今已是民国的首都。孙中山此次北上，主要是应总统袁世凯之邀，共商国是。作为让权退位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卸任总统，孙中山在北京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

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身影，即几个月前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不得不退位下台、终结帝制的清皇室。作为曾经的手，清皇室与孙中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可谓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所以逊清皇室的欢迎之举，令外界有所疑虑。《新闻报》就有报道称：“孙中山到京后，各界奉总统传谕，不得不竭力欢迎。所有总统府之接待，备极优隆，即外人亦为之惊诧。至于一班皇族，摄于威势，亦不敢不先后趋跽。”^[1]

但是，这种迫于形势随大流的说法，与实情并不吻合。逊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与北京各界的欢迎活动几乎同时启动。孙中山到京次日，《爱国报》就刊登消息：“清太后拟在颐和园欢迎孙中山，闻已派定世续、伊克坦、绍英、溥伦为代表，所有远支近族清室人员，皆可到会。惟须由皇室领取特别徽章，届时佩带入场。”^[2]此举当然与总统袁世凯的传谕不无关系，不过逊清皇室也有主动释出善意的意向，并非一味敷衍了事。孙中山在京期间，“一切供给，异常精致，其预备之马车，系德国新制，旁有克林德厂等洋字，马车内皆用黄绫，外驾黄缰。或曰系从前预备清太后乘坐，此次特行借用者。双马皆白色，俄国产，其行如飞，洵良马也”^[3]。如此，则借用是为了显示尊崇，符合对于卸任总统的礼仪规格，非此不易找到与身份匹配的车辆；允许则多少体现了隆裕太后的豁达，并借此表达对孙中山的敬意。所以北京路透电称：

孙逸仙君此次游京，有种种极有兴味之事，其一则为前清隆裕太后注意此举是也。隆裕太后闻孙逸仙君寓于外交部，即谓该处系办公之地，恐供张不能周到，谓政府如需器用陈设诸品物，可向宫内借

用，俾孙君于其住室得以安舒。并以白纸书折交与政府，令将应用各物填入，以便检交，且言不日拟在内苑宴待孙君及其眷属，日期则随孙君之便择定可也。隆裕太后之礼贤，深为外间称美，预料此举可以感动满人，而得极佳妙之影响。孙君游京所生美满之效果，殊难缕指述也。^[4]

根据各报简略而且前后有些歧义的报道，可知逊清皇室在颐和园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原定于8月27日举行。^[5]为此，前清隆裕太后派世续等人往谒孙中山，预备在颐和园进行布置，届时召开大会，大设筵宴，并选择内库珍宝磁玉数件，作为投赠礼物。^[6]

世续（1852—1921），字伯轩，索勒豁金氏，隶内务府满洲正黄旗，实为朝鲜人。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转吏部尚书兼都统。三十二年（1906年）为军机大臣。历转文华殿大学士，充宪政编查馆参预政务大臣。宣统初因病告假。三年（1911年）复起原官，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资政院总裁。世续是整个清朝历史上位列三公的有数之人，在光绪死后主张立长，辛亥赞成清帝逊位，后来又不以复辟为然。此时他是逊清皇室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媒体又称之为皇室总长，所以隆裕派他领衔负责筹办欢迎孙中山的事务。

不仅如此，西报还有消息称：“孙逸仙君来京，欢迎礼节极其荣盛。闻清太后拟星期六在颐和园接见孙君。”^[7]星期六为8月31日，此说如果属实，则在皇室开会欢迎宴请之外，隆裕还准备亲自与孙中山会晤。此外，据《申报》8月27日北京专电：“清太后隆裕拟在颐和园接见孙中山时派世续招待，并命陆润庠随同宣统谒见。”^[8]如此，小皇帝也要在师傅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

逊清皇室的欢迎活动，并没有如期举行。其原因应是来自亲贵的反弹阻力较大。《文汇报》9月1日北京电讯：“清隆裕太后拟接见孙中山一节，现因满亲贵竭力反对，故已作罢论。”^[9]原定8月27日在颐和园举行的欢迎宴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未能举行。舆论对于逊清皇室宴请孙中山不无微词，《申报》副刊“自由谈”刊登“游戏文章”，以调侃的口吻拟清太后邀请孙中山宴会：“旧历七月二十四日，新历九月五日，前清太后率小犬皇帝，恭备汉满全席，请民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驾临冷宫，赐教一切。先生不弃孤儿寡妇，惠

然肯来，从此联结情感，消泯嫌疑，则不特敝后与小犬两人之幸，抑亦我满洲亿万众前途之福也。先布区区，恭迓摩挲。”^[10]

不过，隆裕太后的会见虽然被取消，皇室的欢迎宴会则只是延期到9月11日，并将地点改为金鱼胡同那桐的故宅。

关于此事，因为各报的报道有些混乱，影响后人的论著产生了差异。如《孙中山年谱长编》据9月11日《申报》的报道，记为9月10日，而《黄兴年谱长编》据9月19日上海《民立报》，记为9月11日。^[11]同样依据9月19日《民立报》报道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却记为9月12日。^[12]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消息本身前后不一，或是各报的报道彼此歧异，加上有时讯息中使用今日、昨日等词，与报道或报纸发刊的时间不一致，引用者没有前后左右加以比较，各取一说。如《神州日报》9月11日的“特约路透北京电称”：“今日（初十日）溥伦代表清室在那桐住宅内设宴款待孙中山君。”同样的电文，9月11日的《时报》“特约路透电”栏也予以刊载，内容基本一致，顺序稍有变化。“今日（初十日）前清皇室在那桐住宅内宴待孙中山君，以溥伦为代表。”同日的《民立报》《申报》也刊载了内容相同来源一致的电讯。据此可以判定，各报不约而同地指称清室欢迎宴请是在9月10日举行，其实是依据同一份来自北京的特约路透专电。

此外，《新闻报》9月19日的报道《清皇室欢迎孙黄》，则将欢迎活动举行的时间记为9月12日。^[13]

综合考察各种相关记载，9月10日和9月12日说均为误报误判，9月10日说的来源为路透电，而9月12日说可能是误植所致。正确的日期应该是9月11日。依据如下：

其一，各报关于此事的其他直接报道。

《顺天时报》9月10日以《清皇族欢迎孙先生》预报：“闻前清伦贝子拟定代表前清皇族，定于明日下午七点，在金鱼胡同那桐宅邀请孙中山开欢迎会，已由孙中山欢诺云。”这一消息次日起陆续得到各报的证实。《时报》9月13日“译电”栏北京专电：“十一日溥伦款孙中山以盛宴。”《神州日报》9月13日“本馆特电”所载12日发的北京

专电《清室已经欢迎》：“满清贝子溥伦昨晚宴飨孙中山等，代表清室欢迎。”《爱国报》9月11日则以《孙中山赴会忙》为题报道：“旅京粤省人士，定于十一号（今日）下午三钟，在南横街粤东馆，开会欢迎孙中山，又是日晚七钟，前清贝子溥伦代表皇族，在金鱼胡同那琴轩故宅，设宴约请孙先生，开欢迎会。”上述各项消息，均明确指称清室的欢迎宴请于9月11日举行。

其二，主要客人黄兴、陈其美等人的行踪。

黄兴是清室宴请的主要客人之一，席间又代表孙中山致答词，其行程对于判断欢迎宴请的时间至关重要。本来孙中山与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准备同行北上，不料张振武、方维被杀事件发生，孙中山坚持北上，同意黄兴缓行。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后，电催黄兴北上，以消除北方意见，实现南北统一。黄兴顾全大局，于9月5日自上海启程，途经烟台、天津，9月11日才抵达北京。《民立报》北京特派员对此过程进行了连续即时报道，11日午后2时30分发出的电报称：“今日下午二时，黄克强、陈英士由天津专车入京，抵站时赵署总理、段陆军长、刘海军长、各国务员均上车与黄、陈二公握手，略周旋即下车。各界欢迎者甚众，计外宾议员政界学界各党会自治界工商界女界慈善会约数千人，均在站行列，脱帽鸣掌，欢声雷动。黄、陈亦脱帽答礼。”11日午后8时40分发出的电报称：“黄克强抵行馆，用茶点毕，四时半偕陈英士往拜袁总统，寒暄甚洽，即留晚餐。七时，前清皇族于那桐宅中开孙、黄欢迎宴会，清隆裕后即派溥伦代表，并邀各部长陪席。闻黄克强由总统府往拜孙中山后，即偕往那宅。”^[14]

既然黄兴和陈其美等人9月11日才抵达北京，绝不可能出席前一日举行的欢迎宴请活动。

《民立报》的其他报道以及其他各报的报道，均表明黄兴到京与出席清室欢迎宴请为同一天发生之事，而具体时间为9月11日。《民立报》9月12日的北京专电，明确说9月11日清皇室于北京那桐住宅开孙、黄欢迎宴会，隆裕太后派溥伦为代表，并邀各部长陪席。黄兴在拜见袁世凯后，由总统府往拜孙中山，遂偕往那宅。^[15]《民立报》9月14日刊登北京特派员13日午后4时10分发来的电报称：“黄克强、陈英士前日入京访袁总统，袁留晚餐，黄、陈因前清皇族请宴，时间已至，未入席即兴辞而去。”^[16]《时报》9月12日酉刻北京专电称：“昨日（十一日）午后五时，黄兴及陈其美偕张昉谒袁总统，由王

赓、哈汉章、唐在礼引入相见，行鞠躬握手礼，谈一时许。黄以非陆军出身，面辞上将甚切，袁未允许，当在府中留宴，陪客为段祺瑞、赵秉钧、范源濂、刘揆一、沈秉堃、王赓、陈宦、哈汉章、唐在礼诸人。因同时清皇族在金鱼胡同宴孙文、黄兴及陈其美，故席尚未终，黄、陈辞去。”^[17]

其三，陪客之一的绍英的日记记载。

绍英原来是袁世凯内阁的度支部首领，1912年3月13日，谕旨补授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两天后，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开去绍英的度支部首领。从此绍英便专办逊清皇室内务府的事务。不过，因为原来内务府由世续总管，如今清帝退位，没有朝政等军国大事，世续以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仍然掌管颐和园、御茶膳房、造办处等事务，绍英不过随同办理而已。^[18]

绍英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并非每日必记，且随事情的轻重缓急详略不一，但重要事情一般不会遗漏。当日他记道：“八月初一日晚，醇邸、伦贝子、世太保公宴孙中山、黄克强、陈君其美及国务院诸员、参议院吴宗濂、汤化龙，陪客中有顺王、江统领朝宗、禁卫军统制王廷桢、张仲和、长君朴等，景三哥与余亦在陪客之列。”旧历八月初一，即新历9月11日。

载沣因病未能到会，宴会开始，首先由贝子溥伦代表皇族演说，以表皇族开会欢迎之意，略谓：“从来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孙中山先生之谓乎？今改数千年专制政体而为共和，固由孙中山先生及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无私、以天下之政权公诸天下。惟自改变共和政体以来，而天下事变愈亟。语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后政治日进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优待之荣，而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均惟诸位先生是望云云。”说毕又云：“余今日得见诸位先生，至为光荣。”举酒愿祝诸位身体健康。同座均鼓掌。

随后，孙中山请黄兴致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今者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云云。”欢迎宴会自8时入座，10时散。^[19]

关于此事，各报均有详略不同的报道，所记录的主客双方的致词答词，虽然大体相同，但也有不少小异，不仅可以了解时间程序、参与人员、经过等具体情节，还能借以探查各报的立场态度，有必要加以仔细比对和解析。

《申报》记载：“清皇室于前日下午八钟在金鱼胡同那宅设宴招待孙中山诸人，由贝子溥伦主席，俟黄、陈二君赶到后，即相偕入座。先由溥伦致欢迎词，略谓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此次国体更新，共和成立，皆孙、黄诸君数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鉴于孙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毅然退位，赞助共和，实为民国之福。今日我皇族诸人得与诸君欢聚一堂，曷胜欣幸。更望以后实行五族平等，巩固国基，即我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赐矣。溥伦演说后，即由黄克强君起立答词，谓此次中国改建共和政体，实为顺大势之潮流，又得孙先生数十年鼓吹诱导之力，故能人心一致赞成。然若无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变国体，破坏不多，成功最易，实诸皇族之力也。”^[20]

《时报》9月13日申刻到的北京专电：“十一日前清皇族宴请孙、黄，席中溥伦述词，赞美共和，谓皇族实受其赐。黄兴答谓，改建政体，实顺今世潮流，隆裕太后及各皇族赞助之功甚大云。”^[21]

北京的《爱国报》报道较为准确：“十一号下午八点多钟，清皇室在金鱼胡同那桐宅，开会欢迎孙、黄两先生，代表贝子溥伦主席。十点钟，黄克强、陈英士二君始由总统府赶到。入座后，先由贝子溥伦代表述欢迎词，略谓：孙、黄二君，皆今日中国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此次国体更新，共和成立，皆孙、黄诸君数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鉴于孙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毅然退位，赞助共和，实为民国之福。今日得与诸君欢聚一堂，共谋幸福，何快如之。更望以后实行五族平等，巩固国基，即我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赐矣云云。演说毕，即由黄克强君起立答词，略谓此次改建共和政体，实为顺大势之潮流，又得孙先生数十年鼓吹诱导之力，故能人心一致，全国赞成。然非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变国体，破坏无多，共和成立，实诸皇族之力也云云。黄君演说后，宾主畅饮，至十一点钟，尽欢而散。”^[22]

《民立报》北京特派员的专函，记录最为详细：

午后七时，前清皇族开会欢迎孙、黄两先生，到者近百人。代表溥伦起言：“今日欢迎孙、黄两先生及陈英士先生，本由醇亲王主席，因醇亲王偶感风寒，特派兄弟为代表。兄弟意见，革命本国家进化应有之事，故汤武革命，称为圣人。且此次革命，原属国体问题，现在建设共和，不独皇室仍受优待之荣，并使满洲人民同享共和幸福，迥非前古帝政时代可比，此敝皇族所极为感谢者。”言毕，即读颂词如下：

“语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业，斯言也，乃于中山、克强两先生暨诸杰士见之。两先生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非以共和定国体，不能为人民谋幸福，不能与列强谈竞争，于是遍游欧美，参以时机，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此固见两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无私之心，遂以天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不图唐虞揖让休风，复见于今日也。独是建设以来，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大陆风云，更亟于两先生未创共和伟论以前。然则时势造英雄，抑英雄造时势耶？今两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争以望见颜色为荣，且与大总统握手言欢，论道经邦，一堂抵掌。本爵现因小恙，未能亲接鸿言，心殊抱歉。深愿海内升平之治，将于先生倚之赖之，正不仅我皇室享优待之荣也。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惟于两先生是望。”

颂词毕，克强先生起为答辞，谓：“二十世纪之国家，须赖国民共同护持。专制政体不足以独立于地球之上，非建设共和，无以保全我五族同胞。孙先生与兄弟及诸同志，应世界之潮流，倡政治之改革，赖全国人同心协力，始有今日。君等乃归功于孙先生及兄弟，实为惭愧。且自武昌起义，甫及三月，大局略定，全赖隆裕皇太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遂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同法美共和相比肩，而北京首都，不见兵革，社会秩序，亦得安宁，尤为和平幸福。虽现在内政外交诸多困难，然以五族同胞共和，血诚力肩斯任，于共和国家前途，必能发展。兄弟等敢不竭其死力，以奠国家于久安，致负隆裕皇太后、皇帝退让之美举。今承开会欢迎，孙先生与兄弟得与诸君一堂聚首，畅叙平生，区区此心，极为欢悦，并请贵爵将兄弟等意转述皇太后、皇帝之前，实为感祷。”^[23]

根据《民立报》的专函，溥伦所致欢迎词，其实包含两部分内容，除了表达他本人的意思，更主要的是代表载沣宣读以后者名义撰写的颂词。《神州日报》就以《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颂辞》为题刊登

了全文，并且注明“由溥伦代表”，文字与《民立报》北京特派员专函所载大体相同：

语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业，斯言也，乃于中山先生见之。先生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非以共和定国体，不能为人民谋幸福，不能与列强谈竞争，于是遍游欧美，鼓吹提倡，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此固见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无私之心，遂以天下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不图唐虞揖让休风，复见于今日也。独是建设以来，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大陆风云，更亟于先生未创共和伟论以前。然则时势造英雄，抑英雄造时势耶？今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争以望见颜色为荣，且与大总统握手言欢，论道经邦，一堂抵掌。本爵现因小恙，未能亲接鸿言，心殊抱歉。深愿海内升平之治，将于先生倚之赖之，正不仅我皇室享优待之荣也。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惟于先生是望。^[24]

清皇室举行欢迎宴会的地方是金鱼胡同那桐的故宅。那桐曾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解职后又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不久，弼德院撤销，那桐以病向总统辞去税务处督办之职，并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1912年7月11日，那桐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连日记也只能口述。此前国务院全体国务员和五族共进会欢迎宴请孙中山，都是借那桐京宅西院的花园。

清皇室举行欢迎宴会的前一日即9月10日，孙中山曾乘车分别前往醇王府、伦贝子府和世中堂宅拜晤。据《爱国报》报道：“十号午后三点钟，孙中山先生由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乘汽车赴醇王府、伦贝子府并世中堂宅，拜谒晤谈，至五点五十分回馆。随行只有游緝队帮统恒成同车，此外未带一人。并闻十一号上午十一点，前清醇亲王载沣赴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回拜。”^[25]

拜访醇王府的情形，据载沣之子金友之记述，孙中山曾到后海北河沿醇亲王府来进行访问，事先袁世凯派当时任北京步兵统领的江朝宗来府中等候。孙中山到达后，由载沣迎至宝翰堂会晤，江朝宗也陪同就座。略事寒暄后，孙中山以载沣在辛亥代表清政府逊位，和平交出政权，致以慰勉之意，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共跻富强。孙中山又谈到：为了达成南北统一，已辞去正式大总统的候选人，自己将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会建设工作，拟于十年内实现修筑

二十万里铁路的愿望。同时，面赠亲笔签名相片一帧。次日，载沣由江朝宗陪同前往宾馆回访。^[26]

载沣退位摄政王，与清帝退位交权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虽然报纸有时也将前者称为逊位，但这只是迫于各地反清的形势，不得不将众矢之的牺牲，客观上为袁世凯掌握全权清除了障碍，使之得以迫使清帝退位，从而实现共和。说载沣代表清政府逊位，应是后人混淆史事的误记。

拜访世续宅的情形，据刘宗汉记，其宅第在北京东城东四南大街灯草胡同路北，门牌14号，刘家与之对门，当日听见胡同内世家门前人声喧哗，知道是革命党孙文上世中堂这里来了。此事表明孙中山不再把清室作为革命的对象，认可优待清室条件，已从反满变为五族共和思想。可惜世续的后人已经故去，详情无从考察。^[27]

溥伦的伦贝子府，在大甜水井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华门一带，王府井大街自南往北第三条胡同，府邸为胡同中段北侧的19、21号），原来与其弟溥侗合住，民国后兄弟析产。三处相距不算远，孙中山又乘汽车，所以能够于三小时内往返。

关于此事的时间经过，各报报道也有歧异，令后人难以判断。主要的差异点有两处，一是孙中山拜访的日期是9月10日还是11日，二是载沣回拜的时间是孙中山来访的当天下午还是次日上午，二者彼此关联。

《时报》最初的报道是正确的，其9月13日“译电”栏所刊北京专电称：“初十日孙逸仙访清摄政王，良久始别。”该报同日刊登的12日申刻北京专电也说：“初十日孙中山往访前清摄政王，十一日王往孙寓答访。所传前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说不确。”^[28]

《神州日报》9月13日“本馆特电”栏刊登12日发的北京专电《孙中山与载沣交欢》：“孙中山昨日拜会前清监国载沣，下午载沣即赴孙处答拜。外人颇称满人能顾大局。”同时刊登的12日特约路透北京电称：“孙中山君昨日（十一）往谒前清摄政王后，下午即来答拜，讨论大局逾一小时之久。满人对待南方各重要人物之情谊，深足令人感动，舆论亦极赞许。众意皆谓满人现竭力消灭恶感，而附从共和国民，并力以求中国之幸福云。”同样内容的特约路透电北京专电，9月

13日的《申报》《时报》也予以刊载，均指孙中山于11日上午访晤逊清摄政王载沣，当天下午载沣即赴孙中山处答拜，双方晤谈，讨论大局逾一小时之久。外人颇称满人能顾大局。^[29]

在此，路透社再次成为不实消息的源头，令人怀疑其报道的权威性。《申报》的编辑注意到外人的消息有故意混淆视听之嫌，刊发一则北京译电：“孙中山君乘车外出，所过之路，均遮断交通，俨如前清之君主，京中各报颇为忿怒。隆裕太后欢迎孙中山君一举，因各亲王竭力反对，业已作罢。”文末特意注明：“按此又系外人谣言。”^[30]

清皇室欢迎宴会的次日，孙中山又由隆裕太后派员陪同引导游览了颐和园，“兹闻清太后特派皇室总长世续并伊克坦、绍英、溥伦为代表，暨皇族诸君，于十二号那天，约请孙中山游览颐和园。是日上午九点钟，中山先生乘汽车出西直门，前赴万寿山，进东宫门，游览宴会毕，拍照纪念，至下午七钟进城，沿途有中北右三营游缉马步鼓号各兵队，妥为照料。”^[31]此行由世续亲自陪同并担任导引，据《时报》9月15日所刊14日未刻北京专电：“孙中山偕黄兴近日大游内宫颐和等园苑，由世续导引。”

第二天即13日早9点钟，“孙中山先生赴南海游览，由世伯轩总长派员招待。是日下午三点多钟，又往天坛参观，至六点多钟回馆”^[32]。

注释

^[1]《孙中山到京后之八面观》，《新闻报》1912年9月3日，第1张第3版，“新闻一”。

^[2]《皇室欢迎孙中山》，《爱国报》第2039号，1912年8月25日，第3版，“本京新闻”。

^[3]《北京欢迎孙中山详记》，《神州日报》1912年8月30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4]《申报》1912年8月27日，第2版，“特约路透社·北京电”。

[5] 《天铎报》1912年8月27日，第1版，“本报专电·北京”。

[6] 《神州日报》1912年8月26、27日，均第2版，“本馆特电·北京专电”。

[7] 《西报记孙中山到京事》，《神州日报》1912年8月27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8] 《申报》1912年8月27日，第2版，“专电”。

[9] 《中山亦知皇帝之贵乎》，《神州日报》1912年9月3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10] 累赘：《清太后邀孙中山赴宴柬》，《申报》1912年9月2日，第9版，“自由谈·游戏文章”。

[11]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726页；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329—330页。

[12]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高路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10册，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13] 《清皇室欢迎孙黄》，《新闻报》1912年9月19日，第1张第3版，“新闻一”。

[14] 《民立报》1912年9月12日，第3页，“专电·北京电报”。

[15] 《民立报》1912年9月12日，第3页，“专电·北京电报”。

[16] 《民立报》1912年9月14日，第3页，“专电·北京电报”。

[17] 《时报》1912年9月13日，第2版，“专电”。

[18] 绍英著：《绍英日记》第2册，第289、292—293页。依制，内务府总管大臣最多可设三名。

[19] 绍英著：《绍英日记》第2册，第345—348页。

[20] 《黄克强在京之酬酢观（二）·清皇室之招待》，《申报》1912年9月18日，第3版，“要闻一”。《新闻报》1912年9月19日第1张第3版“新闻一”刊发的《清皇室欢迎孙黄》，文字与此基本相同。

[21] 《时报》1912年9月14日，第2版，“专电”。

[22] 《清皇室欢迎孙黄之盛会》，《爱国报》第2059号，1912年9月14日，第4版，“本京新闻”。

[23] 北京特派员函：《黄克强入京记（二）》，《民立报》1912年9月19日，第7页，“接新闻一”。

[24] 《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颂辞》，《神州日报》1912年9月17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25] 《孙中山访谒清皇族》，《爱国报》第2057号，1912年9月12日，第3版，“本京新闻”。

[26] 金友之：《孙中山先生会见逊清摄政王载沣小记》，《团结报》1982年10月16日。

[27] 刘宗汉：《孙中山拜会清室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记闻》，《北京文史》2009年第2期。

[28] 《时报》1912年9月13日，第3版，“译电”；第2版，“专电”。

[29] 《申报》1912年9月13日，第2版，“特约路透社·北京电”；《时报》1912年9月13日，第3版，“特约路透社”。

[30] 《申报》1912年9月3日，第2版，“译电·北京电”。“文汇报九月一日北京电云：孙中山君在京出行时，所经过各街道，皆预先禁绝交通，故北京各华字报对于此事颇有烦言，谓不啻为满清时代之皇帝出行。”（《中山亦知皇帝之贵乎》，《神州日报》1912年9月3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31] 《孙中山游览颐和园》，《爱国报》第2059号，1912年9月14日，第4版，“本京新闻”。

[32] 《孙中山参观坛海》，《爱国报》第2059号，1912年9月14日，第4版，“本京新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编《纪念孙中山先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幅照片识文为“孙中山与随行人员在故宫太和殿前留影”，应为1912年9月6日在明长陵祔恩殿前留影。此时清帝仍居紫禁城，尚无故宫之称。孙中山未与清太后、清帝会面，也没有进入宫禁，只是游览了南海。

二 孙中山的满蒙危机应对

孙中山此次北行，于8月24日进京，9月17日离京，其间于9月6日至8日赴张家口参观，居留北京的时间总共为21天。在此期间，各种会晤、演讲等活动极为频密。如此繁忙之中，抽出4天时间专门与清皇室交游，绝不会仅仅是客套应酬那样简单。

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种族观念相伴随，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反满的确是色彩鲜明的一面。革命党的早期宣传不乏诛杀清帝、驱逐满人甚至杀绝满人之类的激越情绪，并声言要建立纯粹汉种的中国（如邹容的《革命军》）。虽然后来革命党人一再辩明反满只是反对清帝及其统治集团，并不针对一般满人，而且反满是因为满人实行帝制，极不平等，若是帝制自为，即便是汉人做皇帝，也在天下共击之列。不仅要杀“满酋”，更要杀“协助满酋残害同胞的满奴汉奸”。可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确实带有种族排斥的指向。受此影响，反满情绪高昂者就怀有强烈的排满意向。如1908年3月10日《中兴日报》刊发希侠来稿《对满愤言》，明确宣称：

排满者，排去满虏之全数，非排去满虏之君位也。满虏之践吾土、食吾毛、敲吾骨、吸吾血、受吾豢养者已二百六十余年矣。此二百六十余年之中，吾汉人之受戮而死、饥饿而死、失业而死、漂流而死者总计已达满虏全数三倍之多矣，吾汉人遭满虏如此之惨，即使取彼满虏五兆人全数而戮之以为京观亦不为过，而何止于排之而已也。……务使满虏为齏粉、汉奸为肉泥、中国为干净土、满州[洲]为血泪场、十八行省为自由园、四百兆人为主人翁、蒙藏回疆为游乐所、昆仑乌岭为升旗山、黄河扬江为澄清水，斯为排满之结果，斯为汉族之光荣，斯为历史之辉耀。^[1]

武昌起事之前，所有的反满宣传只是宣之于口，暗杀起义中针对满人的举动，也只有局部作用。而自武昌成立军政府起，作为新生政权如何处置与满人的关系，就成为亟待解决的全面性实际问题。就情理而言，当时大致有四种选项：其一，实行种族复仇，从肉体上消灭

满人；其二，将满人逐回东北；其三，18行省独立，脱离清廷统治；其四，五族平等，共建共和。

第一种选项，实际上可以说并不存在，即使是激进的排满主张者，也懂得必须遵守文明的原则，才能不被各国视为野蛮。不过，在起事的初期，最早揭竿而起的地区特别担心清廷反攻倒算，好像摸黑夜行者不停地大声呼喊一样，用过激的口号一面为自己壮胆，一面鼓动人们起而响应，希望一鼓作气，取得胜利，消除危机。如湖北军政府的《兴汉军歌》就有“杀尽胡儿兴大汉”的歌词。^[2]不过，整体看来，作为一次全国范围的革命，除个别地区外，总体上人员伤亡较小。报复性的屠满事件很少出现，偶尔发生的秘密会社成员的滥杀很快得到制止，对象也主要限于军人。

第二种选项，道理上似乎是冲突双方解决矛盾的途径之一，满人被驱逐回其龙兴之地，汉人则重新掌控关内中土地地区，各归本位。所谓反清复明，预想的结局便是如此。可是无论清方还是民党，几乎没有人想过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无疑表明革命党已经不再将满人视为非我族类，而满人也不以中华之外的异类自我定位。

第三种选项，在清廷坚持不退而民党又无力直捣黄龙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按照孙中山的解释，各地独立，便是向清朝独立，而不是向中国独立。但是如果原来的18行省独立，势必导致南北分治的局面。武昌军政府用18星旗，象征18省，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会会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孙中山以民国各省用旗有三，武汉首义十八星旗、苏浙五色旗和汉族共和党天日旗。他本人不倾向于用五色旗，因为这原为清海军一二品官员用旗，失体；以五色代五族，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武昌主张用首义之旗，孙中山则倾向天日旗。但希望民选国会成立后再定。^[3]

第四种选项，也就是历史进程实际发生的真实选项。从现有观念看，可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因为18行省的独立，固然是对清廷独立，可是其他部分就未必如此，其民族自决既可能向心参与，也可能离心脱出。在强邻环伺的态势下，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势必引发瓜分狂潮，动乱的中国势将分崩离析。

因排满而导致分裂，显然不是革命党的政治选项。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民族之统一。”^[4]民元凡是赞成共和的，多主张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所谓五族共和，民族统一，就是要化各族之地为一国，化各族之人为一族。此处所说的回，并非民族识别后的回族，也不仅限于当时的回部，更主要的是泛指西北广袤地方的回疆。满、蒙、回、藏人数虽然不多，地域却十分辽阔。任何一地如果从中国分离出去，都会使山河变色，造成整个国土版图大幅缩减，引起四分五裂。

多民族国家的独立，往往同时引起向心和离心两种倾向。辛亥南北战事激烈，满、蒙、回、藏等地均出现内外势力相呼应的分离倾向。和谈成功，南北统一后，边疆危机依然持续，引发国人的高度关注。孙中山北上之时，满蒙问题尤为凸显。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孙中山在外交方面拥有长才，其关于满蒙问题的对策，格外引人注目。

恰在这一微妙时刻，8月28日《大陆报》发出一封北京电，报道该报记者采访孙中山的情况，其中话题之一，就是满蒙问题。电称：

“本馆（大陆报）访员今日（廿八日）进谒孙逸仙君……谈及蒙古与满洲之状态。孙氏之意，谓中国若以武力解决，必无效果。须待至数年之后，俟国力雄厚，然后所有领土自不难恢复。但至一世之后，而中国人仍不能振作，以复其领土自主之权，则中国将不国。而亡国之惨，亦中国人民所当受。至借外力以恢复中国领土，则窃不敢谓然云。”^[5]

《民立报》也刊载了这份电报，文字却多有不同：“今日（二十六号）《大陆报》访员见孙中山先生……论及满蒙大局问题，孙氏云：中国今日势孤无助，未便兴兵，满蒙实有不可收拾之势。目下不得不暂待时机。数年之后，兵力充足，领土自可恢复。且曰：设此四万万人于数十年后不能恢复领土，则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孙氏以为，恢复已失之领土而求助于邻邦，似不甚可靠。”^[6]

《时报》的“北京专电”关于此事的记载文字亦有所不同，电称：“二十八日孙逸仙接见《大陆报》访员……论及满蒙情势，孙氏言中国今日欲抵拒强权，已属无用。盖中国今日无此能力，遂不得不徐俟数年后国势渐强，然后能恢复疆土。孙氏言此四万万人苟于彼时

尚无此能力，则中国殊不值存立于世界。盖孙氏似不信于丧失疆土之际，尚能恃他国援助。”^[7]

《新闻报》同样刊发《大陆报》28日北京电，内容较为简略：“本报访员今日谒孙中山……又论满蒙事，其意国力未强，目前即无可望，亦不愿借重他国之力以争之。”^[8]

不厌其详地列出各报的记载，是因为《大陆报》这次采访孙中山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披露之后，引发不小的风波。而控辩双方对文本的解读截然不同，是导致争议的重要原因。杨荫杭（署名老圃）在《时事新报》发表社论《孙中山之满蒙弃置论》，对孙中山的言词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他指“孙前总统对西《大陆报》访事谈满蒙问题，谓满蒙尽可弃置不理。今欲设法保持，乃无益之事。吾以为不如暂时弃去，他日我中华民国自有取回之法云云”。虽然“孙先生发此议时，慷慨激昂，抵掌而谈，谓四万万人众，若不能取回已失之地，亦不成为四万万人众之大国民。西人闻者，皆为之感动云”，但自己不能接受如此说法，并进而提出四点质疑：

然记者窃有疑矣。满蒙等属地可以暂时弃去，待他日取回，则中国本部似亦可暂时弃去，待他日取回。土地之所以不可弃者，固非以其不能取回而不可弃也。然孙先生则因深信四万万人有取回之能力，遂倡弃置之议。此不可解者一。

满蒙等虽曰属地，实关于全局者也。弃满蒙则日俄独得厚利，失远东列强之均势，他国岂能甘休。若他国群起而效日俄之所为，即为瓜分之实行。然则主张弃满蒙，实不啻主张弃中国全部。此不可解者二。

今日中国危机，皆伏于满蒙，今日万国视线，皆注于满蒙，吾侪小人所寤寐不忘者，皆满蒙问题也。孙先生为建立民国之大豪杰，度必有保持之法，乃竟以保持为无益之事，不特以保持为难行，直以保持为多事。然则古今来鞠躬尽瘁，不顾成败利钝之大豪杰，自孙先生视之皆愚人矣。此不可解者三。

孙先生周流列国，所在皆考察其政治，吾国人之熟悉外国情形者，殆莫孙先生若也。然孙先生主张迁都以避外人之压迫，外人窃窃私议，既疑孙先生未读条约。此次又对外人明言保持满蒙之无益，而欲弃去不顾，恐外人又不免窃窃私议，疑孙先生不知今日国际竞争之大势，而轻于发言。幸而孙先生无缔结条约之大权耳，设孙先生有缔结条约之大权，则今日此言出之口，明日必有无数外国代表登门而

请，除满蒙属地已得先生允许外，必更有某国请弃山东一带之地，某国请弃云南一带之地，某国请弃扬子江一带之地。孙先生如反悔前言，彼必言数年之后，尽可由四万万大国民光复故土，想孙先生亦无词以拒之也。然今日孙先生固信口言之，而外国人已笑孙先生之失辞，岂前言戏之耶。此不可解者四。^[9]

杨荫杭长于文笔，又精通法律，他的文章引起輿情的关注。为了消除负面影响，端正视听，《民立报》特意以馆主的名义刊发社论《正〈时事新报〉中山满蒙弃置说之误解》，对事情和文本深究详解。该文首先肯定孙中山长于外交，平日对外报记者谈话，未尝失言。辛亥归国途中，欧洲报界记者纷纷来见，孙中山无一语涉及政事。到上海后，西报记者来访，亦只能得到圆滑的谈话。西报记者因而转向郝门李（Homer Lea）刺探消息。郝门李是军人，短于外交，语语关涉中立，遂引起美国总领事的干涉。而孙中山的外交益负时誉。

《民立报》讲这段往事，无疑是为了证明孙中山处理外交的手法老练，为接下来进入正题做好铺垫。所以接着话锋一转，切入本题：

“前日《时事新报》记者以中山先生与《大陆报》访员谈满蒙问题，未尝细玩全文意义，遂目中山先生为作满蒙弃置论，所言殊骇听闻。孙先生为一代人豪，爱国巨子，岂肯倡此谬言。按之九月六日《大陆报》所登访函，益知《时事新报》所指中山欲弃置满蒙，尽属误会。

《大陆报》访函之译文曰：‘孙前总统明言彼不以目下断断于保持此藩属为有用。其持态以为即使失去，中国将来有得回之日。彼言辞间极著重而又惹人注意，言时声状，以一手击他手，奋然而言曰：倘此四百兆人不能于一时代间组织完备，以夺回所失疆土，则彼以为此四百兆人不应享有国家。’”

如果《民立报》的译文符合原意，的确与各报所刊登的内容有些出入，所以作者接着解读道：“读此可知中山先生当时之愤慨，固讽某某国之不应乘中国有事之秋，而实行其侵吞主义。盖外交家于谈论间不能以愤激之语直接侵人，致起国际上之交涉而伤感情，卒至无交谊可言，岂非为外交上之一失败。故先生对于蒙藏，实以为切肤之痛，此次对《大陆报》之谈话，胸中却含有无限愤恨之气，未便形于言词，遂乃见诸颜色，以为满蒙果竟为强暴者所并，中国亦必力图恢复，不能以其亡而听之。末且谓于一时代间必组织完备，夺回所失疆土，以示四百兆人之决心。先生为中国魁杰，坚忍之志如此，则将来满蒙即使不保，强暴者亦终不能长据吾土，藉可遏抑强暴者并吞满蒙之野心，实先生之志也。则先生又何尝有丝毫弃置满蒙之意乎！”

为了澄清事实，作者进一步征引原函：“中山先生此次谈话之有力，再读《大陆报》访函之下文，亦可了然。其文曰：‘访员屡提起孙君以彼之力引动政府，将全案宣告世界，使世界人得知中国外藩变端若何之真相。盖访员以此人为众人所注目，频年以来，皆能善用声誉，必能乘时而起。然彼不以为然，声言此举无用，世界人应已知之。且即世界人果知之，亦无能为力，岂不废然。中国今日不能如野心之国任所欲为，他日中国强大，斯时将有所处之。’”

在全面征引和解读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

观于“中国今日不能如野心之国任所欲为，他日中国强大，斯时将有所处之”之语，则孙先生用意所在，益了然可见。夫先生为创造民国之人，日以五族共和之义诏于天下，则先生对于满蒙之土地，焉有忍于弃置之理。故满蒙弃置之说，纯然出于误会，不足以毁先生。至《大陆报》二十九日专电，不过撮取谈话中之一语而已，其真意亦不如《时事新报》所译也。《时事新报》记者以满蒙尽可弃置不理一语，代表中山先生全段谈话之精神，则不但未曾细味中山之用意，且未读《大陆报》访员之原文，抑更不知外交上之措词，故记者不得不正其误解。^[10]

不过，《民立报》的社论虽然可以澄清《大陆报》采访报道的原意，仍然难以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当时孙中山还有另外几项主张和行事被坊间舆论与此牵扯到一起，一是主张迁都，二是拜祭明陵，三是租借甚至“割让满洲给日本”的传闻。

迁都的本意是为了防止袁世凯破坏共和，作为巩固民国的重要措施。此时孙中山又以避让外强逼迫作为理据。而在南北两京拜祭明陵，被解读为种族复仇倾向。“老圃”就发表社论《孙先生恋恋不忘明陵》，认为元明清都是皇权专制，分别只在是否汉人王朝，既然反对专制，就不应单独拜祭明陵。^[11]至于割让或租借满洲以换取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孙中山的确曾经几度在日本人士的要求下，作为交换条件与日方有所谈判，甚至可能形成某种文件。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为财政极端困难，孙中山还想租借满洲给日本以换取大笔贷款，支撑战事和政权的运作。^[12]而现在这些都和满蒙问题联系起来，不言而喻，是指反满的孙中山真的可能打算出让满洲。

在《民立报》社论发表的次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篇《孙中山政见之平议》的社论，作者自称从前与孙中山固屡屡握手，“而深

悉其品性其人格之如何”。他以知情人的口吻写道：“抑予尤有疑者，孙氏为兴中会首时，于中日战后曾往台湾谒日本总督桦山资纪，面许割满州畀日，使日本助其革命。当时桦山曾密商日本政府，为伊藤辈所阻止。其后孙氏尝屡与日人宫崎等谋起义，并有割地赂日之言，为予居东京所习闻，且见于日人之著述。故孙氏返国任总统之初，有力诫其东三省不可再起民军者，孙则掉头不顾，且任蓝天蔚驰往。又有告以须急派专使赴蒙藏宣抚，申明五族共和权利平等者，孙亦唾弃不用。昨孙之来京，对外人有不必急争蒙藏之宣言，今更于此危急之时，又复主张舍弃北京之首都，其用心果仅出于单简之理想，未暇顾及他者乎，抑尚有前事之连念存乎，此吾人所急欲知其究竟者也。”^[13]

其实，孙中山不主张蒙藏用兵，是担心引起蒙藏人的反感；租让满洲，则是为了挽救共和大业采取的非常措施。在革命的思维中，这样的迫不得已可以作为不得不然的选项。不过，孙中山也需要改变原来排满的形象，为实现五族共和采取实际行动。而最具象征意义的举措，莫过于和曾经的对手清皇室交游，这不仅有助于安抚旗人，对蒙藏回也具有正面积极的示范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满洲无论割让还是租借，都容易令人联想到孙中山不以满洲为中国的主张，视为驱逐鞑虏的自然延伸。如果孙中山与逊清皇室握手言欢，则双方的冰释前嫌，正是落实孙中山合诸地为一国、合各族为一人的民族统一宣言的重要体现。相逢一笑之下，即使恩怨情仇犹在，对于大乱望治的各族民众，无疑是积极的信号。

注释

[1]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5卷，第310页。

[2] 《武汉革命大风云（十五）·兴汉军歌》，《民立报》1911年10月25日，第4页，“接新闻一”。

[3] 《复参议会论国旗函》1912年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7—19页。

[4]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5] 《孙中山与大陆报访员谈》，《神州日报》1912年8月30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6] 《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第6页，“西报译电”。

[7] 《时报》1912年8月30日，第2版，“译电”。

[8] 《新闻报》1912年8月30日，第1张第3版，“译电”。

[9] 老圃：《孙中山之满蒙弃置论》，《时事新报》1912年9月6日，第1张第1版，“社论”。

[10] 《正〈时事新报〉中山满蒙弃置说之误解》，《民立报》1912年9月8日，第2页，“社论二”。

[11] 老圃：《孙先生恋恋不忘明陵》，《时事新报》1912年9月7日，第1张第1版，“社论”。

[12]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8页。

[13] 《孙中山政见之平议》（逊志自北京属稿），《神州日报》1912年9月9日，第1版，“社论”。

三 清朝皇室的自我认同

孙中山的主观努力只是一方面，逊清皇室主动向孙中山示好，表达愿意在民国的政治架构内致力于巩固五族共和，则是双方能够彼此接纳的重要基点。

在清皇室欢迎宴会上主客双方的应答中，皇室方面表示承认国体变更，既肯定了孙中山等人坚持不懈达致共和目的的努力，也赞扬了清帝大公无私、以天下神器还诸天下的义举。希望孙、黄二人继续以非常之人，建非常之业，挽救危机，实现海内升平，使皇室永享优待之荣。黄兴则表示只有共和政体的国民国家才能保全五族同胞，清朝后、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遂使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将竭力克服内政外交的诸多困难，发展共和国家前途，不负清朝后、帝退让之美举。

这样的相互表彰，固然不无客套的成分，但绝不是敷衍的虚词。在皇室方面，国体变更当然是迫不得已，希望国家发展，社会安定，永享优待之荣，却是发自内心。而在孙黄方面，清帝退位于民国成立的重要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况且，要想国体稳固，民族统一，清室的动向具有重要的指标性象征意义。

清帝退位，结束帝制，虽然在皇室内部曾经引发激烈冲突，可是无可奈何之下毕竟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而在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后，一部分人的确准备遵守承诺和协议，不再幻想复辟大清的统治。或者说，结束大清王朝对于他们固然是痛苦万分，可是复辟非但不符合历史潮流，难以成功，还可能失去一切现实享有的优待。因此，他们宁可与民国政权搞好关系，以保持现有的待遇，而不愿冒险进行恢复大清王朝的密谋。

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与孙中山等人交游的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沣、贝子溥伦、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以及相关的那桐、绍英等人，都是原来赞成清帝退位的成员，虽然皇室已经无力改变命运，但是如果他们的同意，最终要实现清帝退位，和平统一，也并非轻而易举

的事。民国以后，他们安分守己地过着退隐的生活，尽可能协调与民国历届政府的关系，落实优待条件。

清帝退位，仍有部分官员心有不甘，陕甘总督升允起兵反对共和，宗社党在各地闹事，成为民国初建的极大隐患。对此，隆裕太后从维系大局出发，均出面予以制止。有报道称：“宗社党死灰复燃，运动清太后出京赴奉，共谋独立，清太后拒之。”^[1]北京宣布共和之初，“满亲贵恭王、肃王、泽公及铁良等谋在奉天独立，拥戴恭王为皇帝。事为清太后所闻，日前恭王回京时，清后唤其入内，谓大势已趋共和，尔等切勿在外妄有举动。恭乃唯唯而退。……闻清太后宣布退位后，恐亲贵不知进退，自取灭亡之祸，同日有旨交内阁电知东三省赵尔巽转饬各亲贵，速行回京，毋得误事。”^[2]

4月间，《申报》还从内廷人士和法系报纸探知相关消息，前者称：“清太后曾于旧历二月十二日上午由长春宫出苍震门诣宁寿宫皇极殿东阁内，饬太监电话召世续入内，复饬世续分电庆、醇、礼、庄、睿五亲王并涛、洵、朗三贝勒等即时入见。八点钟，该亲贵等除涛、洵外，均先后乘马车入神武门，至东桶子长街凝禧门前下车，步行入内。是时奎俊、徐世昌均在内，徐于该亲贵进内时即回归私宅。该王贝勒等乃入觐，侍议约两小时。探之，谓因前一日大总统将探明宗社党现在京外欲谋反对共和举动之证据，曾缮清单递呈清太后请示办法，故召该亲贵垂询一切，并饬庆邸等传谕载泽等迅速各归邸第，安分自守，不得徒逞意气，不顾大局，致宗庙陵寝不保，累及全族等语，并饬庆邸等于五日内奏覆，以便答覆大总统。”

后者云：“前清太后退政后，对于民国大事甚为关心，近闻京中谣传宗社党将在奉天等处起事，牵涉各亲贵，特饬世续传谕各亲贵，于二星期内一律返京，无事不准再赴他处，以免嫌疑。盖恐因疑生忌，激成他变，致召列强干涉，与退政之意大相矛盾耳。”^[3]

隆裕太后的考量，都在大局，其关注主要有二，一是全族和宗庙陵寝的安危，二是中国的安定。如果说前者主要是顾及皇室和满人的利益，后者则是以整个中国的统一为最大关怀。为了扼制亲贵旧臣的图谋不轨，她还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严加防范。“近日外间纷传宗社党蠢蠢欲动，虽尚无何项确据，然前清各亲贵行踪诡秘，实有可疑。清太后对于此事，极为注重，深虑牵动大局，叠电谕召在外嫌疑各亲贵旧臣来京。初三日，世续又奉清太后面谕，拟成电旨四道，函

致大总统，请代交电局拍发，立召善耆、恭王、载洵、升允四人迅即来京，勿得在外留连，致滋疑谤。闻大总统已核准照发。初四日，清庆亲王奕劻至宁寿宫请觐清太后，当奉谕，随皇室总长世续入见，密议许久，约二点钟始行退出。闻所议陈均为解散宗社党事。内侍仅闻太后有可否据此答覆袁世凯之一语，该邸所陈情形，无从深悉。是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钟，奕劻即乘京奉火车赴津。”^[4]

民国改元，那桐于旧历新正月初一即表明：“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5]他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由于表现良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不知其早已亡故，为了防止日本拉拢清皇族，还曾想予以表彰，以为风范。据说世续与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关系良好，是拜把兄弟，努力与民国政府维持关系。张勋复辟时，世续、绍英等人均不赞成。溥仪的小朝廷日夜谋划复国，甚至不惜与日本人勾结，建立伪满洲国，其父载沣却明确表示反对，坚持不肯到关外居住。

贝子溥伦（1874—1927，字彝庵，隶属满洲镶红旗。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理玄孙，道光帝嗣曾孙，隐志郡王爱新觉罗·奕纬嗣孙，贝勒载洵第四子）曾于1904年3月4日率清国代表团出席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并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城市进行考察，与各方会晤，被视为皇室的改革派。历任资政院总裁、皇族内阁农工商大臣。担任资政院议长时，因弹劾军机案，与奕劻交恶。但他和奕劻都赞同清帝逊位。民国后，溥伦长期担任清皇室代表，负责与民国政府打交道，一度还加入国民党。不过，他过于依附民国政府，甚至赞同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还将清廷的仪仗借给袁作登基之用，受参政院长，许亲王双俸。袁世凯垮台后，溥伦受到牵连，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在末代皇帝溥仪看来，载沣、溥伦、世续等人的态度行为，只是为了保证已有的利禄而因循苟且。而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也只有从不赞成复辟以及不为日本所利用的角度看来，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两说各有一定的道理，却忽略了一个必须澄清的事实，即逊清皇室的自我身份认同。^[6]

美国学界提出的新清史及其引发的相关论争，在清中叶以前的内亚化问题上，的确指出了单纯汉化观念的不足。清朝在这些地区与相

关方面打交道时，自我称谓、交际礼仪及处置形式办法，均视与对方的关系而有所分别，不宜全用汉化中心的观念来看待和解读。清朝确实另有一套，而且显然与汉人王朝的做法大相径庭，是基于满人原有制度和生存状态而生成。加强这方面研究，无疑是深化认识清朝的重要方面。

不过，新清史及其论争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偏颇。其一，新清史的主张者显然有意忽略了晚清的变化，尤其是这样的变化是清朝因周边环境的改变而采取的主动应对措施。也就是说，在外力的压迫之下，清朝不得不改变内亚化的旧惯，改行明代以来的体制。结果，清朝日益以明制为本体实行对整个中国的统治，也使得自己完全脱离内亚的胎记，融入中华。

其二，新清史的主张者和反对者，都不免受晚清以来尤其是民族识别以来民族观念和民族存在的影响制约，以此反观清代的民族问题，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实情况和自我意识带入，自然发生许多的误读错解。

清朝一统后，大体在原来明朝控制的区域承袭明制，在满、蒙、藏、西域等地则因地制宜。这样的分而治之一直延续到晚清。随着列强逐渐侵占周边各国，清朝的原有属国纷纷成为各国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藩部也日渐动摇，边疆危机空前严重。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历来都有，但是大都属于局部和暂时性的，朝廷有能力应对和解决。可是晚清以来所面对的压力，却让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捉襟见肘的应对过程中，清朝的君臣逐渐发现，凡是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虽有危机而不易失地，容易控制，否则不但难以有效控制，还会导致动乱分离。

为了根本解决边疆危机造成固有疆域的丧失，清朝不得不改变以藩部拱卫内地的旧制，撤藩建省，加强藩部与内地的联系。原来清朝对于藩部与内地，并无孰轻孰重之别，只是治法不同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保留藩部特殊地位的意向。可是藩部的建制在外强的步步紧逼之下显得涣散无力。1884年，朝野上下在收复新疆后经过几番争议，清廷终于决定撤藩建省。

与稍后的台湾建省有所不同，后者只是在原来的府州县基础上升格为省，新疆建省则是内部改军府制为州县制，整体上意味着清朝放弃所谓内亚化的藩属体制，朝着将所有统治区域变为中华体制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清国与中国，逐渐浑然一体。继此之后，清廷将满人视为禁裔的龙兴之地也改为直省，并相继启动蒙古建省和西藏改制。只是尚未完成，清王朝即寿终正寝。

行省制始于元代，明朝延续，清因明制，原本并非一级行政架构，而是皇权的分身，与部院的分事而治相互呼应，为内外相维的分地而治。新疆建省，使得清中叶以来行省逐渐变成直省的趋势进一步强化，省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与藩属的因人而治不同，直省的分地而治与近代国家较为接近，不论是何人，只要居住在同一地区，就具有同等权利和地位。民族统一，意味着融合成为共同的国族。这样的观念和制度，在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延续。

正是由于这样的变化，使得清皇室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能够接受退位交权以保持留在中国大家庭的身份。他们当然希望自己仍然是清国的统治者，并不情愿成为一般国民，可是，如果必须放弃政权、皇位和帝制，才能留在中国，避免被驱逐，即便国号改成民国，体制改成共和，他们也不做第二选择。这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如宗社党和溥仪，就宁可求助于外强，也要千方百计地恢复皇位和帝制，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其说首先是一般中国人，毋宁说是中国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所以在掌权和归属之间，他们只能在具有统治权的前提下才能接受清国即中国的身份。只是这样的满人即使在皇室皇族中间也为数不多，多数满人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国民的现实。

民国成立后，在京满人组织了满族同进会，“志在联合全国旗人，使京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人士互相砥砺，一致进行，以享大同之幸福。征求全国各旗人之意见，筹划旗民之生计，帮助政治之进行，增进自治能力，以使同胞享有共和事权之利益为主义”。发起人和赞成人大都是前清的满蒙官员，宗方小太郎列举了正副会长、评议长、评议员、预备评议员、赞成人、名誉赞成人的名单后，认为“可谓已蒐集其同族之人材”^[7]。

报道孙中山在京活动较为详细准确的《爱国报》，全名《正宗爱国报》，原来是彭翼仲被发配后由《京话日报》改刊，主编丁宝臣（本名国珍，以字行）是回民，其办报宗旨意在唤起国人，共谋同种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保卫中华万万。民初该报与满人关系紧密，成为后者发声的重要园地。满族同进

会的评议员春秀，就于孙中山在京期间，在该报发表连载文章申论《国会应设旗人专额议员之理由》，认定立宪国以国民趋向为国家意志，辛亥革命，因为大多数优秀人民主张共和，所以推翻了专制君主。而地大人众的国度，须实行代议制，国会代表各方面势力，上下两院，分别代表国民的普通势力和特别势力。正式国会参议院组织法，议员由各省、蒙古、西藏、中央学会选出，唯独没有旗人，不够公允。因此满族同进会要求参议院设专额旗人议员，理由是：一，“现在是五族共和，旗人应享的公权，即应当与汉人平等，民国不当歧视”。二，按政治原理，国会是网罗各方面势力以达代表目的的机关，旗人入关二百余年，“在满汉感情上，已经久已融洽多年（排满革命，是外省旗汉人发生的恶感）”，旗人在社会上成为一种特殊势力。现在皇室虽已退位，旗人的特别势力，不可不消纳在国会里，让旗人在议院畅所欲言，免得旗人政治上不得志，别生枝节。“满族同进会所持的理由，不但专为旗人权利方面设想，而且要替民国设想，可称是两全其美。”

参议院不设旗人议员的理由，一是旗人没领土，二是各国无以种族名义列席国会的先例，三是旗人散居各地，可与汉人一起参选，四是旗人特设议员，反倒显出种族畛域。但在春秀看来，仔细推敲，各项皆不充分。参议院组织不取纯粹地方代表主义，所以华侨无领土而设议员；旗人满蒙汉人全有，并非种族名词；旗人集中于直隶等个别省份，分地选举，名额有限，旗人难以当选；旗人议员与汉人同立一堂，可以融洽感情，调和意见，消除畛域。

有鉴于此，满族同进会三次上书大总统请愿，以争公权，并提案于参议院，得到大总统、国务员和多数参议员的赞成。“兄弟这篇议论，所为告知我们旗人，须知参政这件事，是人民在国法上应享的权利，得之则荣，不得则辱。”如果将来旗人没有国会议员，“我们旗人，在中华民国，没有说话的权柄，事事得听人的喝，受人的处分，听人喝受人处分，即是奴隶，不能算完全的国民。请看印度在英国，波兰在俄国，朝鲜人在日本，何尝有参政权。要而言之，我旗人获得此权则生，获不得此权则死。如不幸此案被参议院打消，我旗人务必再接再厉，虽请求至万次，亦不达目的不止”。为此，满族同进会发起旗人参政预备团，“一来为将来继续要求的后盾，二来为预备将来选举的机关，凡京外旗人，皆可加入”。^[8]

春秀及满族同进会的政治诉求，不但完全接受了民国的政治架构，而且积极参与其中。逊清皇室和满人的表现，得到一般国民的认可。民元10月，北京举行国庆纪念活动，“纪念会以共和成立虽系南方革命志士发明提倡之功，而赞成共和者亦不可忽，昨特由该会总理陈家鼎函请民族大同会恒钧氏来会办事，并请将前清逊位之隆裕太后及摄政王像片送来高悬，俾国民瞻仰，以示大同，而彰美德”^[9]。共和纪念会的主办者还先期致函前清皇室，请其派员莅会，内称：“敬启者：敝会于十月初十、十一、十二三日举行国庆大典，已蒙各国驻京人员到会参观，敝会不胜荣幸。兹特肃函恭请贵太后、贵皇帝俯派代表莅会，共襄盛举，不但敝会增无量之光荣，即五族人民亦均受无穷之幸福。”

纪念会盛况空前。“是日赴会者三十余万之多，琉璃厂会场东西口均有松花牌楼。东牌楼有四大字曰：普天同庆；西牌楼有四大字曰：万邦协和。琉璃厂窑为开会地点，当中为追祭坛，上有灵牌，大书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台前有大运动场，周围一百余丈，场之南口曰得胜门。追祭坛之东为武德场，为体育会、汇文学校、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及协和医学校所建修。其西北为剧场，乃新剧团演剧之所。西南有招待场，为招待各团及诸先烈家属之处。迤西院内，有革命伟人、死义先烈之肖像及各处起义之纪念品。外有黄鹤楼，为女子师范学校所制，其前门内外有四大松花牌楼。门外中间之牌楼有四大字曰：于万斯年；东边牌楼上之四大字曰：尊重人道；西边牌楼之四大字曰：发扬国光；门内牌楼之前面，将隆裕太后宣布共和之明诏大书于上，其后面有四大字曰：五族同庆。”^[10]

从撤藩建省到融入共和，清皇室和旗人在外强压迫和世界潮流的鼓荡之下，逐渐主动或被迫进行相应的改变。在此过程中，掌握晚清大权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慈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不仅确立了撤藩建省的取向，也使得满人的汉化大幅度加强。据说慈禧不通满语，又重用汉臣，以至于坊间风传其本是汉家女。受其主导，清皇室为维护其特性而进行的教育渐被忽视闲置，恽毓鼎记：

自光绪二十年以后，裁撤上书房，近支子弟皆不令读书，年十六七，即华服骏马，出而驰逐，目不睹圣贤之论，耳不闻正人之言，志趣才识，何从高远？迨醇王监国，复遍布为行政长官，谄谀面谀，与之俱化，遂酿成今日现象。当江汉事起，不过一隅之乱耳，而纷纷提取现银数千万，辇而纳诸外国银行，市面为之窘滞。租界一席地，争

先恐后，借以藏身。士民为之动摇，外国为之齿冷。抱头痛哭，不展一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项城得乘间而入，唯所欲为。以此沦亡，自贻伊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亲贵已播亡国之种，安得不收亡国之果乎？余三年怨气，只博得今日万点啼痕耳。^[11]

恽毓鼎是讲官，又是汉人，关注重点只在读书与否。而上书房作为近支子弟的读书之所，目的不仅是一般的社会化，更要维持宗室作为统治者的特性。上书房的存废，对于皇室的身份认同转变可谓至关重要。^[12]

新清史围绕汉化与否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赞同与反对的各方，多少都受到晚清民族主义意识乃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民族识别后中国民族观念与现实的制约。其实，所谓汉化，只能理解为陈寅恪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化与胡化的意思，而不能将汉视为一族。历史上的所谓汉，只是大概的指称，并无明确的所指。元代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分，汉人与今日的汉族并不对等。清朝本是旗民分治，旗人包括满、蒙、汉，而民人更不仅是汉人。晚清受域外民族主义影响，加上人种和种族思想的作用，满汉差别和矛盾凸显。在反清排满宣传的鼓动下，旗民分治日益演化为满汉冲突。^[13]

民初五族共和，政府并不强调族裔之分，而主张民族同化，各民族的分别，只是大而化之，恰如五族只是象征意义，地的权重明显大于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实行民族识别，按照后设的标准，对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的所谓少数民族加以识别，数十年共识别出五十五个民族，其中问题很多，争议不断，尤其是对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人群未经任何识别，就统名之为汉族。实际上，大体而言，中国版图内的人群大别为二，即所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究其渊源，归根到底不过是已经同化和尚未同化的差别，汉族并非同源，为一大杂种，民族共同始祖的提出，正是为了便于来源各异的人群认祖归宗。

在满汉冲突的背景下，混一的汉被认为一族，失去了原来作为混同载体的功能。如果说历史上的汉化与胡化是以文化论种族的重要体现，那么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恰是对于强化民族分别的纠偏以及汉被视为一族的替代。中华与汉，其实是不同历史时期指向相似的集合概念，所谓中华民族与汉族，只是范围有别，而非族类有异。原来大体自我认同或被他人指为同类的是汉，如今则变成中华。^[14]换言之，历史上的汉化并非以一族同化其他，而是不同文化趋向高明或强势，其间各族并非放弃自我变成他者，而是改变独异融入一体。所谓

一体，本来是各族融合的共同体，可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越来越被标识为一族，而与其他同源却尚未完全融合的部分成为异体。于是，不得不另以中华民族取代汉为共同体名称，以利于民族文化的同化。纯然用域外民族文化理论加以解读，势必扭曲中国的本相。

清皇室和旗人对中华及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不幸的是，小皇帝身边的一些人各逞私欲，争权夺利，妄图借清帝重归大位实现各自的政治野心，让逊位者卷入张勋复辟的闹剧和伪满洲国的丑剧，不仅使得清皇室和满人的优待条件被废止，应验了隆裕太后当年的担忧，更背上了卖国求荣的千古骂名。尽管如此，追随而去的满人皇族毕竟是极少数，而汉人官员如郑孝胥等，与其说是忠于清室，毋宁说以皇权为一己私利的载舟。在中国历史上，向心与离心的倾向始终并存，越近文化的边陲，分歧越是明显。只是不宜一味放大离心的表现，忽略了向心始终占据主导，不要被若即若离的现象所蒙蔽，有意无意地对不离不弃的事实视而不见或故作别解。

从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活动可以看出，以清帝退位下台的方式结束战事，建立民国，维系统一，虽然未必是各自心中的理想结局，却是能够同时为各方所接受的折中方案。正因为各自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因而对于民国的前景均有所期待寄望。只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变化，使得各方逐渐淡忘了当年相逢一笑、把酒言欢的融洽，越来越释放出所做出的牺牲是否值得的疑虑。伴随着不断革命的步伐，胜利者反复回到清帝退位之前的历史选择，重新构造各自的理想模式。而退隐一方则日渐淡出历史舞台，成为仅仅留下背影的所谓失语者。这样的历史记忆浸透到历史认识之中，令人多了几分后来脱离实情的遐想，少了几分当时不得不然的无奈。无论对于历史有多少解读的方式，包括历史的事实是否能够认知，如何正视历史，尤其是如何正视得了历史，仍是考验人们智慧、功力和耐心的一大衡鉴。

注释

[1] 《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1版，“专电”。

[2] 《宗社党之亡清灭满策》，《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2版，“要闻一”。

[3] 《清太后解散宗社党》，《申报》1912年4月8日，第2版，“要闻一”。

[4] 《清太后消弭宗社党之办法》，《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2版，“要闻一”。

[5]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页。

[6] 黄兴涛的《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刘风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定宜庄的《晚清时期满族“国家认同”刍议》（《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编委会编：《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认识到新清史对于重新研究满人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只是所使用的诸多观念和证明方式尚有可议。

[7] [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23页。

[8] 春秀：《国会应设旗人专额议员之理由》（来稿），《爱国报》第2058、2060、2061号，1912年9月13、15、16日，均第1、2版，“演说”。

[9] 《筹备声中之共和纪念会·满族之光荣》，《申报》1912年10月14日，第3版，“要闻一”。

[10] 《国庆日纪事种种·共和纪念会之盛况》，《申报》1912年10月17日，第3版，“要闻一”。

[11]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74页。

[12] 虽然平行比较并非历史研究的正途，也有当否之别。或者将慈禧与英国女王相比较，实则前者更适宜与其同龄人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进行对比。相比奥匈帝国的解体及其皇室成员的悲惨下场，清朝能够基本完整地过渡到民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确非比寻常。就此而论，慈禧和伊丽莎白各自的实际作为及留存形象之间，反差过大。

[13] 关于满人的称谓及其演变，参见定宜庄：《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该文关于汉的部分，不无可议。

[14] 参见桑兵：《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征引文献

一 报刊

《大公报》（天津）

《大共和日报》

《东方杂志》

《国民公报》

《经纬报》

《临时公报》

《临时政府公报》

《民报》

《民立报》

《申报》

《神州日报》

《盛京时报》

《时报》

《时事新报》

《顺天时报》

《天铎报》

《新闻报》

《政府公报》

《中国革命记》

二 一般文籍

1. 《胡汉民自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4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孟宪彝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3. 《沈家本日记》，沈家本撰，韩延龙、刘海丰、沈厚铎等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汤化龙行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7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

7. 《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8.《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1集，北京，敷文社1920年版。

9.[澳]骆惠敏编，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严四光、俞振基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卷（1895—1912）》，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10.[日]波多野善大：《辛亥革命の南北议和と汪兆铭》，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小野勝年博士頌寿記念東方学論集》，京都，朋友书店1982年版。

11.[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编委会编辑：《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14.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1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6.陈春华、郭兴仁、王远大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1911.5—1912.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7.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8.陈鹏仁译：《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

19.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2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 丁贤俊、陈铮：《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2. 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3. 定宜庄：《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4. 定宜庄：《晚清时期满族“国家认同”刍议》，《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编委会编：《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 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26.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29.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0.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2编，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版。

3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

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编：《纪念孙中山先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4.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35. 韩策、崔学森整理，王晓秋审订：《汪荣宝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36.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37.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8.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39. 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0. 黄兴涛：《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1.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2. 金衡钟：《1911年的汪精卫、杨度与国事共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杭州师大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43. 金友之：《孙中山先生会见逊清摄政王载沣小记》，《团结报》1982年10月16日。

44. 李国镛：《李国镛自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辛亥革命资料》第25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45.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47. 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8. 刘宗汉：《孙中山拜会清室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记闻》，《北京文史》2009年第2期。

49.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0.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51.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2. 桑兵：《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53. 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54.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5. 绍英著：《绍英日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56. 史洪智编：《日本法学博士与近代中国资料辑要（1898—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7.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58. 王春林：《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

59. 王晓秋：《清末京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明清论丛》第11辑，2012年。

60. 王晓秋：《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61. 闻少华辑：《国事共济会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5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62. 闻少华：《汪精卫与“国事共济会”》，《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63. 闻少华、丁贤俊：《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投降派——汪精卫》，《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5年第6期。

64.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王兴科、何广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8册，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

65.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梁华平、严威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9册，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

66. 许恪儒整理：《许宝衡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67.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版。

68.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9. 佚名辑：《宣统政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80），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

70. 易国幹、宗彝、陈邦镇辑：《黎副总统政书》，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年版。

71.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72. 张国福选编：《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3.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25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

74. 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5.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76. 张君勱：《我心理上国会之死刑宣告》，《申报·国庆纪念增刊》1923年10月10日。

77. 张晓辉、苏苑：《唐绍仪传》，珠海出版社2004年版。

78.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9.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0.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81. 赵林凤：《汪荣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3.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辛亥革命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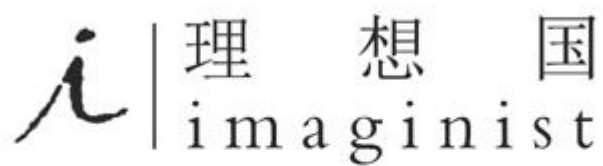
8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近代史资料》专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

8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
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87.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88. 朱英：《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想象另一种可能

好文 影像 活动

共读 共赏 共享



手机扫码
发现更多内容



自然界的旭日残阳，绝无交集的可能。而帝制终结与共和登台，却是相互交错。只不过夕阳余晖，尚有人恋恋不舍；旭日东升，还须穿云破雾。这与清帝退位和接收清朝何其相似。

由共和取代帝制，对于在皇权的灵光笼罩下生存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望着那些逐渐逝去的背影，总有一种正面相对、仔细审视的冲动。也许这就是史家的天性。

——桑兵

上架建议：历史、文集

ISBN 978-7-5598-1072-4



9 787559 810724 >

学术江湖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桑兵 著

陈寅恪的西学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对民国学术的无限向往与
对今日学术的盲目自信，
两种观念看似相反实则相同，
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
因而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

i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学术江湖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桑兵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 桑兵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598-0042-8

I. ①学… II. ①桑…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后期—文集②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民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089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张旖旎 罗丹妮

装帧设计：彭振威

内文制作：陈基胜 龚碧函

-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 一 圣道与技艺
 - 二 分途未必并重
 - 三 西体双轨
 - 四 分途与合流
- “中国哲学”探源
 - 一 “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
 - 二 泰西哲学与中学
 - 三 “中国哲学”的取向
- 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 一 废除汉字：近代汉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
 - 二 我手写我口：白话文的过渡使命
 - 三 文言白话 孰为正宗
 - 四 龙种？跳蚤？
- 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 一 元勋还是罪魁
 - 二 解聘与辞职
 - 三 师、生、校异趣
 - 四 挽留背后的矛盾
 - 五 消沉与发奋
-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 一 北将入主南营
 - 二 南北新旧
 - 三 由分而合归本原
- 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
 - 一 留欧前后的转变
 - 二 顿悟：环境与交友
 - 三 敬而不畏之畏
 - 四 心照不宣的礼让
- 陈寅恪的西学

- 一 学问难以贯通中西
 - 二 中国的东方学首席
 - 三 国人之中 西学较优
 - 四 取珠还椟
 - 五 申论
- 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 一 宋代为中国学术文化高峰
 - 二 “宋学”渊源
 - 三 新宋学及其取径
 - 四 南北宋的高下
-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 一 取西洋哲学观念
 - 二 了解之同情
 - 三 宋贤治史之法
- 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
 - 一 思想为语言所支配
 - 二 求其是与求其古
 - 三 方法为仪型 结论不成立
- 征引文献
 - 一 报刊
 - 二 一般文籍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一

人生苦短，转眼已是耳顺之年。虽然按照如今的算法，仍在壮岁，毕竟不如少年时来日方长的无忧无虑，却一如既往地满怀学术的热情与向往。记得读博期间，业师年满花甲，在弟子的眼里心中，已是纯然长者风采。如今在门下士看来，自己的形象或许亦相仿佛，只是内心浑然不觉老之将至。

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昙花一现者多，几度辉煌者鲜。中国不仅历史长，而且文化一脉相承，所以史料甚多，史学较精，在中国治史尤其是治中国史，是对学人的一大考验，同时也是一大幸事。

屈指算来，尚待完成的计划为数甚多，在编拟编的大型资料和编年系列各有十数，在写拟写的专书还有数十，而且常常触类旁通，生发出许多预想以外的新枝。如果不从现在起就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势必抱憾终身。学问始终是令人遗憾的事业，尤其是史学，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等到功力见识皆备之时，已是去日苦多，时光不再。治学总体上说当然是层垒叠加，后来居上，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喧嚣声中，不知有多少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才人的远见卓识被时光埋没。

缩短战线，并非如陈垣所说，减少时段与方面；而是如陈寅恪所为，不与人无谓争论，减少应酬，不好为人师，不争闲气。概言之，舍弃俗物牵挂，全力以赴，潜心著述，以待来者。顾颉刚少年成名后曾经慨叹，出名前穷死，出名后忙死。前者如今已经不成问题，后者却是扼杀无数才俊的陷阱，与鲁迅说的捧杀有几分近似。广州僻处岭南，应酬有限；极少担任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免去劳而无功的审议和光怪陆离的人情；遵循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无须江湖，不必乡

愿。除了气候不宜居之外，正是孤往治学的理想所在。加以学问的兴趣广泛，空间足够，可以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所谓真理不辩不明越辩越明之说，在抽象思维领域作用不小，而在史学研究领域，至少就近代以来的实际进程看，历次论战所导致的著述井喷，固然在引起广泛关注方面颇具影响，可是对于学术的实际推进，不仅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适得其反。网络时代，读书治学，更要注重孤往，因为坐拥书城，绝非难事，即使归隐林泉，只要能够上网，与身居闹市相比，也不过少了喧嚣和嘈杂，反而有助于专心致志。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潜心读书更加重要，单凭检索关键词做出来的学问，只能是浅薄的时髦。

命运因缘，冥冥之中一线相牵。少年时到过的桂林良丰雁山公园，不仅曾经做过清季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园子，还与不少民国学界胜流有缘。1932年，广西省政府在此创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1935年1月，胡适南下，曾到此一游，还以附近有相思江、岩边有相思红豆树，为园中的岩洞取名“相思洞”。后来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1942年，陈寅恪一家在热心之士的帮助下，从沦陷的香港脱险。因为担忧身体无法适应西南大后方的环境，陈寅恪滞留桂林，便在广西大学临时任教，因此与从来礼让的傅斯年就去留问题发生分歧，产生隔阂，埋下不愿远走海峡彼岸的心理伏线。

小时候居住的奇峰镇，与良丰墟由相思江一水相连。只是当时全然不知这许多故事，如今也不必自续出来一段前缘。同一条江流淌着不一样的水，就好像民国学界的取向与风气不仅五花八门，而且随时流转。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自信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而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许还相当隔膜，因而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时下每每听闻标举称引民国学人及学术不能得当，心中总感到几分异样。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人赵翼的名句不仅能够说诗，也可以转而论学。只是意思有二解，按照本意即不断推陈出新，不必固守模仿。可是，如果每一代都是才人辈出，又都能够各领风骚，则一时代必同时有无数各领风骚之人竞妖娆。各代之间，也就无所谓高下之分。另一转意，虽然历代均有才人，却只有少数能够各领风骚，而且并非每代皆有，所以数百年间只能由不世出的高人所笼罩

和覆盖。如此一来，历代学术发展的峰值高下不同，每一代的高峰跌宕起伏，后代未必高于前代。能够登顶一览众山小的，寥寥数代区区数人而已。在那些相对低洼的时代，有心向学之士不得不对着逝去的古人高山仰止，望着无尽的来者徒叹奈何。

平心而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除了当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风潮。^[1]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三者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教授控制学生，防止师生联合对付校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也不会留下骂名。这点秘诀，说到底不过校园政治的权谋而已。清华大学以“神仙、老虎、狗”来形容该校教授、学生、职员关系的经典表述，也很难复制。况且，海峡对岸的清华还出现望文生义的曲解，误以为有辱办事员的人格。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在“某籍某系”^[2]的协助下，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也为大学与当局的冲突不断添加助力。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配合国民政府的集权统一，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与现在颇有些滑稽的去行政化背道而驰，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如果以水平线以上的成果进行比照，得出普遍不如现在的结论也不算过分。

不过，民国学人仍然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遑论超越。况且当时的乱象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混饭吃的手段伎俩，在坊间或有盲从，在学界却口碑不佳、风评甚恶，连官场也未必以为然。那时学界对于高明还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也有一旦下海无法从良的戒惧，除了无知无畏和有意出位，一般不敢恣意妄为，否则很难在学术界容身立足。

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正所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何须勤拂拭，不使有尘埃”。

本来学问只是少数有志者的兴趣，如果广泛参与，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些所谓方法范式能够流行，显然不是因为高明，而是简单易学，以致众从。说到底，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有需求者提供方便。民国时期，那些面向青年和大众的学问，还有鼓动思潮的作用。当年胡适许愿中学生也可以整理国故，未必是存心蒙人，而是史无前例，又多少有几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唱了些等而下之的高调，贻笑大方。所以，要追仿古今中外的贤哲，必须心向极高处，而不以时流为准的。

二

认识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一环，是了解把握学人之间言行的关联性。关于此节，坊间学界有无数的困惑，各种认识和说法彼此相歧相异甚至相反。就作品与作者而言，钱锺书说过吃蛋不必看鸡，所论是文学，而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就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作者的原意，由读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进行二度解读。就原典与注疏而论，章太炎主张“凡书皆需看白文无注之本”，钱玄同开始不以为然，后来醒悟，知道“经义贵就白文细玩，注疏虽有时足供参考，然若字字点看，则徒乱人意，如章太炎师之于《说文》、廖季平先生之于群经、诸子，其所发明之精义皆由涵泳白文而得，全不似吴学末流、书院课艺之专务盘旋于许、郑、段、王之胯下也。……中国学问皆出于经，

经义不明，则神州哲学无从讲求，而汉、唐、宋世之前注，则发明经义者少，胡说乱道者多。不究白文，无从治经也”^[3]。

受误解类似说法的影响，或以为研究学术，应直面文本，不必纠缠于学者本人的生平活动及其交游等，甚至不必追究与同时代其他相关文本史事的具体联系。可是，一味望文生义，就难免穿凿附会，如果研究者对于这些活动、交游和联系洞悉于心，解读文本时则会成为涵泳白文的重要凭借。这样的看法原以为仅适用于思维具体的中国，而近年的研究显示，一生活活动范围不超出居处一百公里的康德，其著作也是在与前贤乃至时流对话，思想并非仅仅活跃于抽象的逻辑世界。此说若属实，则比较参证的适用范围还会扩大。

既然表达思维的著述不是作者的自言自语，影响其思维和表述的时空人事等等因素就理所应当成为帮助解读文本的重要参照。历史研究的六个W，即What、When、Where、Who、Which、Why，不仅同样适用于思想学术史，而且更加重要。杨树达解经，须以相关事实和其他典籍相互参证，才能明圣人之言行；欧阳渐治内典，也要由俱舍宗而俱舍学，否则难以领悟教义。他们都是高人，且是行家，尚且无法直面文本通晓本义，其余一般所谓研治思想学术史者，若是盲目自信，就有妄自尊大之嫌了。多数直面文本的解读，不是断章取义的妄解，就是生搬硬套的附会，所说于本意相去甚远，于前人相当隔膜。说是叙述历史，实则吐露心迹，外行看了觉得热闹，行家看来，不过横通之论而已。

记录学人言行的，除了直接材料外，还有间接材料，即使从类型上被归为直接材料的，如日记、书信、档案等，也包含大量间接性的记述，未必都能作为直接证据。而作为证据时，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应当比勘互证，不能轻易取舍。将有此说当作唯有此说，就会偏信则暗。以个人的经验，但凡并非真由本人署名的文字，网上不必论，辗转传闻而来的或道听途说，或穿凿附会，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由发布者自造，连个人的博客也是他人代为制作的，与本人毫无关系。媒体公开报道的文字，也很少属实。如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某著名报系所载在下的言论，或无中生有，或颠倒黑白，或背信弃义，无一为本人旨意。若是失察，引入正式论文，难免有轻信媒体可以守住道德底线之嫌。尽管今日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普遍而言或许尚不及以前，可是近代中国自有报刊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舆论与事实之

间的联系及分别，早已是治史取材验证必须讲究的重要环节。凡事不经验证，很容易上当受骗。

学人言行的关联性如何认定，更是一大难题。近代以来，虽然引入西式的学术批评，学人可以指名道姓地点评人物著述，可是好用此法者多为后进新锐，高明者一般不愿公开臧否人物及其文字。1922年3月，梁启超到北京大学演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不愧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竟然认为梁此举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除了在日记书信等私密文字中的坦白以及私下言谈的直率之外，学人公开发表的文字里更多的是古典今典之类的隐喻曲笔甚至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如果不能解今典通语境，虚实互证，一味望文生义地猜来猜去，很容易流于牵强附会。

同样以在下的经验，坊间学界关于本人著述的解读，除了别有用心的诛心之论，大都难免凿空逞臆，自以为是。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却硬指为“我说”、“我认为”的意思，其实多是解读者的“他说”、“他认为”的想当然耳，与鄙意相去甚远乃至截然相反。或者对号入座，未免自视过高，其实未必入得他人法眼。而学术对话的言说对象，除了古今中外的贤哲大家，应是所研究的问题。即便公开发表的论著，依照惯行或格于时势，总有些留白之处，作为文心诗眼，检验人我的眼力意境。凡此种种，相关的评议文字言论，无论臧否，大都隔膜，偶尔正中下怀、深获吾心的，自然感到喜出望外。

学术要不要影响社会和时势以及如何影响社会时势，是近代中国知识人相当纠结的两难之事。这在此前本不是问题——学以致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出为良相，退为良医，虽然进退不易，却也两宜。近代以来，受为学术而学术的新观念影响，以及四民社会解体之后社会分工细化的制约，一些学人在不同层面提出学术与社会保持距离的主张。王国维反对梁启超之流借学术鼓动思潮政治，傅斯年则主张少数人从事无用之学。对此，钱穆颇不以为然。他在具体学术观念上每每与梁启超针锋相对，可是总体评价却将梁启超放在许多公认的一流学人之上，并且指责后一类人的学问事业缺少社会影响。不过，要想影响社会时势，除了亲自从政之外，只有做帝师和笔杆子两条路，而二者都有损于学人的特立独行。看似如愿以偿的钱穆，晚年也遭遇他所批评现象的尴尬，其一生梦绕魂萦的中国文化情结，未能发挥预期的效应，凸显知识人失去士一身二任的身份之后，不能适应新角色的两难。

与之相关且同样令不少人感到困惑的，是学术著述能否以及如何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问题。学术为二三素心人的志业，往往曲高和寡。所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可遇而不可求。虽然今人追求社会平等，但暂时还无法改变文化分层的现实。例如，希望民众都读《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来认识三国的历史，只能是美好的愿景和幼稚的奢望。正如画家生前身后的境遇差若天渊，并不改变其画作的价值一样，学人首要关注立说能否传得久远，而不必苦恼著述是否看的人多。民众喜闻乐见与否，不应作为学术标准。可是，近代学术成果大都由大众传媒加以传播，刊物也好，图书也罢，都要一定的销量才能维持。陈寅恪就曾经因为《学衡》销路不好而建议吴宓停刊。而受众的喜好，与媒体的导向密切相关。在迎合受众与坚持学术本位之间，坊间与学界的沟壑日深，分歧益大，媒体对此难辞其咎。

钱穆的时代，学术与思想虽然开始分离，毕竟没有完全对立。不至于一旦享有时名，便往往有损于学术清誉。一般而言，社会影响大的思想大都负贩舶来的陈货，多数是言人所不敢言，而不能言人所不能言。与之相应，是否畅销与学术价值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一旦流行就难以免俗，学人因此在影响社会与改变自我之间变得越来越无所适从。其实，所有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都是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的，要把历史叙述得生动有趣、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收放自如，并非难事，这也是历史始终为大众所关注并且吸引大众的要因。只是受众程度不一，言说对象有小众大众之别，因而出现分层，叫好与叫座明显反差。在大众以为好，小众就未必认可；反之，小众举为标的，大众则往往莫名所以。学人大可不必为究竟是写《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而纠结不已，从心所欲即可，只是必须坦然直面，不要混淆彼此，明明写的是演义，硬要贴上正史的标签，令人怀疑其眼界还是模糊，心底依然忐忑。同时，媒体也不必越俎代庖，自诩代表民意，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与实情尤其不合。

大众式的历史叙述常常不得不加入许多非历史的因素，如假设、幻想、比附、揣测等等，若非如此，断简残片的史料不易连缀；而繁复的论证考辨很难为大众所接受，因为史家总要在诸如此类的地方表示质疑，提出新证，得出别解。一般受众对于不厌其详的专业性考究，缺乏耐心和解读能力，以为无关宏旨，殊不知这些琐细往往可以连缀成完全不同却更加近真的历史拼图，使得一切似是而非的精彩黯然失色。有鉴于此，学人不必在意现世知音的多少，真正的考验，在于面对古今中外贤哲的慧眼。

三

大学无疑是培养人才之地，如果大学始终教不出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难免引起普遍焦虑。其实人才的标准有多种，并无一是。什么是人才，各自的判断有别，人尽其才与养成优才，理念各异。按照一成不变的评价体系，衡量不出人才大概是常态。符合各类指标的人才，也不过是与指标相当而已，以此为准，等于承认指标的高明。可是，即便并不轻视所评出的人才，也几乎异口同声地不以指标为然。

教师很重要的本事之一，就是不拘一格，发现学生各自不同的天赋异禀，并由学校提供适合其生长的环境条件。接下来老师的作用，充其量就是引导启发而已。各式各样的科学化标准，说到底是不相信教师具有评判的能力和人品。按照标准化的指标所取得的优才，大都并非治学所需的真才。能够满足各项指标者，除少数例外，多数不过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凡夫俗子。

指责大学不重视培养人才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说大学片面强调科研，忽视教学。言下之意，讲课是培养人才，科研不过是谋取职称的手段，所以讲课才是为学生，研究则是为教师自己。于是以为大学老师主要应该讲课，甚至只考察讲课的效果如何，作为教师是否尽心本职的硬指标。这不仅有违教育原理，也有异于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实际。蔡元培当年执掌北京大学，实施多项重要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教师不能一味照章讲授，必须有专门研究。他告诉北京大学的学生：

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4\]](#)

经过努力，北大里面只会照本宣科地讲课的中外教员少了，教员必须做研究，并且不断将研究所得带入教学，尤其要言传身教，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研究引发学生自动研究的兴趣，进而加以引导。离开教员的研究，这一切都谈不上。大学教书，教师有学问，怎么教都行，没有学问，怎么都教不好。传声筒留声机般的讲授实不可取，即使用心教学，没有研究作为基础，也只是将教科书或讲义的现成知识讲得好听而已，甚至为了吸引听众而不得不讲些哗众取宠的横通之论。试想，老师不做研究，没有学问（这与发表与否、发表多少未必直接相关），如何能够教学生学会思考和研究？那些老生常谈和夸夸其谈，多半都是误人子弟。学生学不到东西还是小事，将学生教到不能再教的地步，才是害人不浅。

即使学生喜欢听，也不等于就不是灌输固定知识。以学生喜欢与否作为教员讲课好不好的尺度，看似外国经验，却未必先进。虽然私立大学开课吸引学生与收费相关，对于粉丝无数的讲者必须另眼相看，却也未必是普遍准则。季羨林留学德国期间，前一位导师的梵文课选修者仅此一人，后一位的吐火罗文课不仅选修者仍然只有一人，而且还是被迫选修。如果当年德国大学依照敝国现行标准，这样不受欢迎的课程根本不会有开设的机会，则世间也不可能有绝学的传人。由此可见，凡事过犹不及，不可偏执一端。

曾经作为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来华考查教育的陶内（Richard Henry Tawney）著书，所指出的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学生听讲太多，考试太多，自修太少，与教员接触太少。教员则每周讲课钟点太多，兼课太多，教材过于利用外来的。顶坏的教授不过重演他们在外国所听的讲演。学生所读书本也只重知识的灌输，脱离中国的实际和学生的需求。^[5]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的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周培智谈及英国各大学教授历史的状况：“据云学生每学年所选课程不过四五种，教授讲演亦甚随便，并且所讲甚少，非把某种历史全部讲完，全在使学生自己研究。教授但指定范围，至历史材料组织方法以及种种意义，教授全不指导，全由学生自己发明创造。盖中国教授方法在灌输知识，学生是被动的；英国教授方法在养成能力，学生是自动的云云。”朱希祖闻言感到：“如英国教授方式，非学校图书馆设备完善，历史参考书丰富，其他都市图书馆亦藏书丰富，可以补学校之不足，则学生乃可自动。若南京各大学图书馆之简陋，则不特学生不能自动研究，即教授亦无法进步，其流为循环教育，而为灌输式亦势使然也。然能逐渐改良，亦属至要。”^[6]

英式的大学教育当然是独树一帜，或者认为缺乏系统性。尽管如此，如今大学乃至社会公共设施的图书设备相当完善，网上资源更是极大丰富，而海峡两岸大学的学期之长、课时之多，大体相当，放眼全球，仍然显得极为另类。不知为何，时时处处好与国际接轨的国人，唯独于此固执己见，以为上大学不是来读书，而是来听授。

近代中国学人，高明者大都不善言辞，准确地说是不善于用一般听众喜闻乐见的言辞去迎合其心理。学问是小众事业，越是高深，懂的人越少。教书与讲学并非一事，现在流行的讲学，并非宋明的旧惯，而是民国以来的新风，亦称讲座。前者以来学为对象，可以系统地循序渐进；后者面对驳杂的受众，上焉者择其精要，等而下之就只能投其所好。因为对象和程序不同，讲座既无法系统传授，也不能过于精深。公开演讲之类，讲者与听众讲台上下随时互动，必须简洁明快地刺激后者的神经，每每将听众不懂、自己也未必知道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若以治学的严谨态度，有太多的曲折、限定、保留、或然，则兴趣并不在此的听授者很难耐得住性子。若是一味以大众为言说对象，固然容易满足其自得欲，却也是学术停滞的表征。

明道之学与横通之学的差别不但表现在形式上，大学的普通基础教育，若仅仅以传授知识为目的，也与演讲大同小异。章太炎的国学演讲，王国维、陈寅恪在清华的教学，都因听授者范围、层次的不同而效果迥异。钱穆自称当年在北京大学讲课极受欢迎，可惜缺少佐证，而且钱氏的无锡口音，一般人不易听懂。以其晚年在台湾讲演必须口译看，尽管早年北大的江浙籍学生为数不少，要全听懂也不容易。朱希祖就有过教完一学期课学生连其所讲朝代人物都不清楚的故事，而朱氏的海盐话与钱氏的无锡话在其他地方的人听来，难易程度当在伯仲之间。所以张中行虽然将钱穆列在北大教授善讲的前三（胡适居首，钱玄同次之），却也坦言其乡音太重，致使听者常常误会。

更有进者，课讲得好听与讲得好往往是两回事。好听与否，全在受众的现场感觉，听众层次有别，反应自然不一。能够激起现场听众普遍共鸣的，大体是感官刺激的结果，绝不可能是须经理性判断的高深学问。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上课，虽然一再降低标准，选课者仍然难以承受。而陈寅恪之所以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变换角度看，也就意味着学生虽然听不懂，少数外校的高才乃至教授慕名而来，却能够满载而归。民国以来，大学乃至社会上逐渐盛行讲学，流风所被，上课也以讲学为范型，课堂之上放言无忌的高论，不少是浅学者的妄

言臆说。真正会教书而不是专讲教科书，尤其是能够从目录版本入手教书的，已是凤毛麟角。

1928年4月7日，清华国学院毕业任教于南开陈守实“无聊中阅胡适《读书》一篇”，议论道：“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7]此意颇可玩味。胡适的水准至少当在一般之上，其讲授好听的程度还列于首席国立大学的第一，则普遍而言大学的讲课在通方之士听来岂非破绽百出？反之，若非绽论甚多，就很难讲得好看，高明之士滴水不漏的讲授，小夫下士听来索然无味，难以承接。黄侃和吴承仕嘲笑王闿运谬妄甚多，如何点化蜀人，与受教的蜀人感受也有不小的差异。如此，教育的循序渐进，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不断纠错的过程。待到来学者登堂入室，便不得不在老师宿儒的引导下逐渐调整。若不得高人点拨，则难免沦为一路勇往直前以致不可救药的牺牲而不自觉，甚至还会自鸣得意。

借用王国维“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一般而言，讲课让学生普遍觉得好看，大抵就不大好。因为学生大都只能凭感觉，不足以判断。大学听授，若是可信逐渐可爱，则是提升收获；反之，若可爱日益可信，则多为误入歧途。过于从形式上看重课堂讲授的灌输式教学，作为纠偏或有必要，作为理念则大可不必，且存在严重隐患。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大学教学就已经提倡专门化，鼓励和吸引本科生进入研究状态，效果如何姑且不论，理念应当是可取的。大学的教学，应当重在提升学生的能力，使之能够听懂讲得好并且逐渐觉得好看。

四

学术风气的转移与听授有几分类似，大抵青年导师多是学无根底或根基不厚的趋新者，才能引起知识和训练不足的从众普遍共鸣，而老师宿儒则一般而言是曲高和寡。学问之道，取法乎上不但为大众难以企及，就连专门从业者也无法做到。在教育日益脱离精英化的同时，治学也不得不为力不从心的职业人准备可以让他们保有饭碗的生存之道。以为通过评估可以揪着脖领使自己升空，无疑是愚人的妄想。如果学问的确为二三素心人的事业，则“致众从”与“传久远”

的相辅相成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权衡取舍，都在各自心中的尺度。

此说不仅在一般受众和本科生层面，即使攻读博士学位者，也难逃这一通则。时下常见学位论文的鸣谢，推崇导师的道德文章、学问人格，一派歌功颂德。此事无论所说当否，均不得体。高山仰止与居高临下，都不宜于弟子的身份。学问果真高明，恐怕不是弟子所能完全领悟，更无法评判。反之，能被弟子一眼望穿的学问，即便好，也有限。如果未必高明而一味推崇，反而显出教得不大好。弟子不知而妄论，老师也难辞其咎。

在中国传统社会，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地位之高，今日公私学校的教师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师只能礼敬，不能雇佣。等到民国以后教师不断要求补发欠薪，提高待遇，就仿佛后来再强势的威权，也已经失去昔日长老的威望一般，二者的身份地位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各有弊端，国立大学略好，只是派系纷争严重，令人视为畏途。即使如此，也还不至于斯文扫地。据说一位讲师问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某地政府有意请其做县长，如何去留。陈垣答称，做县长是下属，任讲师是礼聘。请益者当即省悟，所做选择或与一般取向有别。

有关师的历史和言说，将另行编辑《程师》一书予以展示。就为师之道而论，收徒不能过滥（时下从严几乎谈不上），否则很容易坏了门风；而弟子则须受教，不可自以为是。若是老师收徒不严，学生又不领教，就会发生种种不堪。论述民国时期的学风，师生关系以及是否会教和受教的问题，不可或缺。庸师固然会将学生教到不能再教的地步，劣徒也有冥顽不化的可能。认定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人尽其才，作为教育理念来追求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事实判断的假设前提则不能成立。

师生之间，应当各守本分。近代思想学问大家，往往桃李满园，长才辈出，弟子大都是慕名而来，问学受教。若有叛离或被逐出，则是天大的事，弄得身败名裂。即便革命时代造反有理，或是青年时期性格叛逆，当时的义无反顾事后总有些追悔莫及，而且后患无穷。如章太炎谢过本师（动机尚有争议），其弟子也不乏起而仿效者。好在太炎对门下宽大为怀，曾经背师者可以若无其事地重归。梁启超则终身对康有为毕恭毕敬，树立榜样，尽管其心中早已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后来也每每有忍无可忍之时。作为老师，章太炎对于门下弟子纷

纷改弦易辙的举动宽严有度，值得称道；作为学生，梁启超忍辱负重谨遵师命甚至舍命供养老师，更应当成为楷模典范。

研究学人与学风，弟子对于老师学行的记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资料，一般学术史甚至认定为直接材料。这样的看法大体不错，只是倘若将记述等同于事实，则难免偏蔽。大宗师的门下，往往只能各执一端，分别继承老师某一方面的衣钵，如此一来，势必守成有余，拓展不足。但凡高明的学问，大都难以捉摸。弟子对老师的学问高山仰止，很难全面充分地理解把握。有的对于老师所教，终生无法全懂；有的虽然反复听授，但每次领悟各异，甚至截然不同；有的学生后来居上，成就超越老师，但求学之际阅历尚浅，见识有限。在不同的人生时段看老师的学行，经历了由仰视到平视的转变，从雾里看花到如数家珍，当时的记述与后来的看法自然会有不小的差异。

况且，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传薪者，往往谨守为尊者贤者讳的古训，不会自我炫耀，亦不会秉笔直书师长的偏蔽。刘起釭的《尚书》研究或已突过顾颉刚，而始终坚称取径范型全由顾制定；朱维铮对周予同的经学史派分不免武断早已心知肚明，他人言及非但不以为忤，反而青眼相加，却不允许门下士妄加议论。两位前辈的为人行事治学，风格相去甚远，严守师徒之道则一如既往。

诚然，时下不无盲目高估民国学人学问水准的现象，仿佛大师满地走，实则一些如今被尊为大师者，当时的地位并不高，甚至根本不入流。尽管后来有的狠下功夫，学问大幅度提升，跻身高手之列；有的延年益寿，已然人瑞，却未必达到大师的境界；有的机缘巧合，婢作夫人，也不过山大王而已。而当年被戏称为大师的卫聚贤、郑师许等，如今恐怕连学界中人也知之甚少。

因此，如何运用弟子的记述领悟呈现老师的学行，应当有所讲究。若是将所有弟子的所有记述都视为事实，所重现出来的老师形象势必千差万别。尽信书不如无书，研究师生关系亦同理，有此说而不一定均如此说，无此说亦不一定断无此事。实事求是之是，即记述者心中之是，有悖礼法者坦率的判断不过是自己心中影像的再现；而不言而喻的留白，或是考验研究者的关键。

上述种种情形，于弟子门生之外同辈同行的记述当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所以，无论使用直接材料还是间接材料，都不能简单采信，

否则很容易导致偏听偏信。融会贯通所有资料，才能够不断近真且得其头绪，使得研究对象安放到适得其所的位置。

五

教不严，师之堕。此说对于发蒙的幼童而言大体不错，对于成年的本科生研究生则不尽然。学风不仅关乎先生，也体现在学生身上。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可是良师门下出来的未必都是高手，而新锐也未必都由名师点拨出来。

研究民国时期的教育学术，专注于学生学习及师生关系的成果相对较少。即使讨论师生关系，也大都因为双方均已成名，所以主要并不在授业受教阶段。王学典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8]，是这方面不多见的代表作。顾颉刚不仅学问欲极强，也喜欢教学生。由于口吃，教学主要不是讲课，而是吸引学生参与研究。为此在中山大学期间还与傅斯年发生纠纷。不过，在收徒这件事上，有时过分好心非但不得好报，还可能受害甚至贻害。

顾颉刚的众多弟子之中，成名的固然为数不少，惹是生非徒增烦恼的也不止一例。《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论及的何定生之外，最令其头痛不已的当属孙次舟。后者毕业于中国学院国学系，曾任山东省立临沂中学国文教员、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辑员。^[9]抗战初期，孙次舟申请中英庚款委员会的研究项目，需要联系指导教授，阴差阳错，居然说动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具名。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使得傅、顾二人大为困扰。1939年底，孙次舟以中英庚款补助，派至华西大学，“而该校无屋可居，遂迁怒及于校长，写信大骂”。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将孙次舟来函分别寄给担任指导之责的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在日记中记道：“孙次舟君才气甚旺，亦肯用功，而负才兀傲，目空一切，徒成其为狂生而已。英款补助，派至华大，而该校无屋可居，遂迁怒及于校长，写信大骂，张校长将此信给我看，以我负有彼指导之责也。此等人叫我如何去指导！”^[10]

相比于顾颉刚在日记中的私下抱怨，傅斯年的态度直率而决绝，收到孙次舟的来函以及中英庚款会来函附孙次舟致华西张校长信，他

断然回复道：

人生世上，此等到[至]简单之礼貌，亦或不不能[不能]，可叹也。中英庚款会来信，谓华西既不可入，可否仍向徐中舒先生处去。惟以愚见论之，阁下因自谓世上无可指导之人，去亦未必有益。此会补助，闻最多者二年，是则今夏一切结束耳；可自求高就，以骋大才矣。又，来函自称学生，以阁下之狂，何至如是，仆实受宠若惊。前年初晤，曾以“做实在工夫，勿作无谓辩论”及“虚心整理事实，勿复盛气驰骋己见”二义相劝，并无一接受，则仆虽厕名指导，实不能为足下师明矣。累次来信，皆不解所云，若谈一问题，而为仆所知，自当竭诚奉告，今连篇累牍，皆非仆可以作答者也。言尽于此。[\[11\]](#)

从信中所言看，傅斯年很早就认定孙次舟狂妄自负，朽木不可雕，虽然一念之差上了贼船，却不愿拖泥带水，快刀斩乱麻，力求早日解脱。孙次舟倒是很有些锲而不舍的韧劲，1942年春，他又将自己所写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文稿寄给傅斯年，或有希望后者帮助出版之意。傅斯年看后，于4月30日回复如下：

次舟先生大鉴：惠书敬悉。大著粗读一遍，用心深细，甚佩甚佩！所标条例，大体可通，然亦恐未可拘泥（所言有“注”字者为后人所加，甚当甚当！）此书正文、子注乃一人一时之作，与《水经注》之异代二人者不同。惟其如是，故《伽蓝记》不易分，亦唯其如此，其分与不分，亦不如《水经注》关系之重要也。愚于此未尝用心，率言之如此。此稿似可托颉刚先生设法一卖，（闻中大某种刊物有此）印费奇昂，一册万金，敝所原在上海印，不能寄来，今改在此地印，亦不能不以所中文稿为限，且须删短矣。物价如此，奈何奈何！[\[12\]](#)

傅斯年抬头以先生相称，其实是敬而远之，不愿居于师位。函中客套之外，也指明所论不够重要，并明确表示无法帮助出版。虽然语气还算客气，却不给孙次舟留有一丝幻想的余地。

孙次舟的确有些才气，也肯用功，仅1940年10月至1941年8月，顾颉刚就看过他所写的《周人对殷民之控制》以及论鲁学、古蜀国、黄梨洲等四篇学术论文，并为之点校、写评语，使其所获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补助可以延续。不过孙次舟似乎并不领情，1942年7月，已经离开齐鲁大学国学所的顾颉刚接到孙次舟的求助信，得知“次舟脾气太坏，无人不骂，以致齐大不予续聘，来书告急，然予何能为！予若介绍彼至任何机关服务，则彼骂人之账将尽登于我之账矣。肖甫、丁山、英士，同此性格，故遭遇之蹉跎相同也”^[13]。

在顾颉刚处未能如愿以偿，孙次舟转而连续致函傅斯年求助。8月14日，傅斯年因为“近接孙次舟君告急之信，嘱为找事”，致函顾颉刚，告以“其实彼之中英庚款会补助，本不许兼事，最近有该会派来敝所之谢君以兼事‘取消原案’（即开除也），故孙君历年兼事已为手续不合，如该会闻之，必有举动。弄得兄之为指导人者，亦不大好看（如谢君之开除，弄得敝所大失面子。实则弟全不知此事，而该会之不得兼事办法，曾历次通知本人及指导人也）。此时为孙君计，最好由兄为之觅到一附着之机关，俾可由此机关领米贴（中英庚款会之补助者必有此附着之机关，米贴即由此机关报领）。而中英庚款会方面，兄为之设法延续下去，此外弟实想不到他法也。孙君论人好加恶评，弟三年前为之曾告以不必再来信。弟此时不便多说，然兄于彼交情为深，似可规劝之也”。

其实傅斯年并非真心为孙次舟的前途着想，只是要将这只烫手山芋扔回去，并设法使其安分守己。不料孙次舟大概知道傅斯年与顾颉刚关系不睦，再度来函竟然大骂顾颉刚，试图以此博取傅斯年的好感或同情。傅斯年对此类小人伎俩忍无可忍，8月18日回信再度表示：

次舟先生：本月九、十三两日大札均悉。有关小说各书，敝所或有或无，例不出借他地，此无可如何者也。足下詈顾颉刚先生各语，实不堪入我之耳。言者纵不自爱，亦当知听者为何如人也。以后乞勿再惠我以书信，感幸之至矣。^[14]

话说到这个份上，换了他人纵然毫无自知之明，也应该感到难堪而知所进退。可是孙次舟显然不是一般人，他既不照常理思维，也不按常规行事。大概在他心中，充满天下人负我的怨恨，因而不仅若无其事，甚至理直气壮。不久，顾颉刚风闻孙次舟在华西坝“扬言与予绝交”，尽管为孙的事付出不少，但受累更多，所以顾非但不气，反而在日记中写道：“闻之真以得绝为快。”[\[15\]](#)

此后，孙次舟若无其事地继续写信向傅斯年寻求援手，而傅斯年不仅以“次舟先生”拒之于千里之外，而且直言不讳道：“查敝院此项奖金前此之给与，皆以实事求是之工作为范围，不尚辩论。如执事声请，请另照规定办法办理，弟不能代为提出。”不但如此，还毫不留情地将“原件挂号寄还”[\[16\]](#)。而顾颉刚惜才，不忍如傅斯年的当机立断，仍然为孙次舟看稿写评语，使之得以继续在学界闯荡。

孙次舟大概颇有些天才情结，在人生的回途上，他借着悼念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发出“保护天才”的呼喊，在对故人怀念的情思中，多少有些角色自代，或隐或显地流露出个人际遇的慨叹。1942年10月，他从报端获悉张荫麟于当月23日逝世，很快写了一篇《敬悼张素痴先生》的文字，发表于11月2日重庆的《中央日报》。文中他首先悼念了上年亡故的滕固（字若渠），1937年夏，孙次舟不赞成滕关于南阳汉画像中的乐舞是巴渝舞的解释，撰文反驳，认为是唐人所说的百戏。看到驳论，正在南京行政院当参事的滕固不仅赞成其考证，而且表示发表文章总希望引起同好的兴趣，继续研究，“所以读到反对的文字，从不愠怒，非常高兴”。据说滕固“总说要他善取人之长，乐助人治学，与一般时流的文人居心不同”。孙次舟觉得，“像这样坦白率真，容人论辩，在我所接触的文人中，实不多见”。

容人大度，固然是美德，不过，孙次舟的滥批，几乎到了狂悖的地步，得不到善意的回应，也在情理之中。不能反躬自省，反而苛责他人，本来还属正常的悼念情意，出自孙次舟之口，听起来总有些强词夺理，感觉怪异。

孙次舟治学好为驳论，尤其是针对名家手笔，总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却往往不得要领，不足逞强，适以曝短。朱希祖《古蜀国为蚕国说》发表后，孙次舟很快写了《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献疑》，刊于

1942年《齐鲁大学学报》第一期，朱希祖看过，觉得可反驳者甚多。“又有丁山《九州通考》更属荒谬，其中自相矛盾不一而足。史学界为此等谬种扰乱，可叹之至。”不久卫聚贤来函，“怱怱撰驳孙文，并谓今西南诸族尚有猺叟、栗叟、么叟等名，孙谓蜀即叟说，不能成立。惟余以孙等随波逐流，趋向不端，不愿与之辩论，拟撰他文以应酬卫君”[\[17\]](#)。

钱穆的《中国史纲》出版后，各方好评甚多，而孙次舟发表《评钱穆中国史观》一文，“肆意抨击，全是小人行径”。1943年9月21日，金毓黻在日记中叹道：

韩昌黎诗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其孙君之谓乎！

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名愈大，则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同时并至。今观孙君所论，真所谓求全之毁也。且其用心甚属险恶，摭取《国史大纲》中一二语，以明其不满于当代，而有讪谤时贤之意，几欲以此兴文字狱，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近顷欲甘心于钱君者，不止孙君一人，皆由其善著书名满一时使然。韩退之云：“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怠与忌二者，毁之所由来也。孙君本怠于自修，而又忌钱君之能修。所以有此求全之毁，小人可畏，至于如此。古人著书不轻刊布，直至身后乃得行世，正坐此故。甚矣，小人之可畏也！[\[18\]](#)

学术批评，衡量的不仅是所评对象，更是批评者自身。但凡著述，若以无知者为言说对象，恐怕费无数的笔墨，也难达其意。评人之书，首先必须读得懂，才有可能恰如其分。所谓求全之毁，主观上是以小人之心，损人利己，欺世盗名；客观上则是以不知为知，以不懂为准则，无知无畏，看似故作大言，实则自曝其陋，而且往往以己度人，不过暴露内心黑暗而已。不久，金毓黻又于日记中道：

徐澄字语某大学学生云：“非骂人不能出名，且须取极出名人骂之。”得此诀者又有孙次舟，今世学人不为孙次舟骂者，盖已鲜矣。《唐语林》卷五，“宋璟劾弹昌宗等反状，武后不应。李邕立阶下大言曰：‘璟所陈社稷大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让曰：‘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传。’”黻按：如澄字及次舟，皆窃李邕之术以求出名者也。邕为唐代闻人，以口无择言，不得令终，宜引以为戒，又何可效之耶！[\[19\]](#)

民国学界的骂人意在出名，与时下演艺界种种吸引眼球的奇术怪招异曲同工。而孙次舟敢于骂人，又不仅仅是为了出名而已，这很可能是他自认为与社会进行抗争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这是天才所共同具有的特质。张荫麟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是称得起天才的有数之人，

既号文人，又称“天才”，多半是极端尊重意志的超人。他有思想，有主张，有他个人的处世态度。“不与世谐”当是古今中外的天才文人共有的趋向罢。为了不肯谐俗，社会便要横暴的施以压迫，但这意志坚强的“天才”不会因外来的暴力而有所屈挠，有所妥协。他将抱着满腔热情与这浊世搏斗。他不惟不染俗尘，他还要在旁边督责着，指导着，要社会走上一条理想的路途。“文人”总是少数，“天才”更是少见。当他满腔热忱不能被社会所了解所接受的时际，一定要招来四面八方的非难与攻击，于是不能不为迎战而疲劳，而负伤。到了劳顿过度，或略负创伤，便不能不暂事休息，以求再战。于是所谓“爱情”这东西，便作了天才的躲避的休息所了。

凡号为人类的，总会知道爱情在人生中之可贵，但真领会爱情的深处和知道他的重要的，莫过于号为天才的人。因为一般人之于爱情，是要以此为沉醉，以此为发泄，或以此为交换某种利益的工具。天才们之于爱情，则异乎是。他是要由爱情中取得温暖，取得同情，取得休息，甚至取得保护。一个天才，往往受到社会的冷酷待遇。一个天才，很不容易被一般人深切了解。一个天才，他不会琐屑米盐的计划，穿衣住屋的打算。这一些缺陷的

补救，只有仰仗于爱情之巨手。如果一个天才未曾得到爱情之助力的，这会使人怀疑着如果有了助手，他更伟大一些。如果获得，无端又告消失，这天才便要使人担心着会突然归于毁灭。

关于爱情的部分，孙次舟应当风闻一些事情，那的确是导致张荫麟早逝的要因。不过，不为社会所容的部分，显然与张荫麟的境遇有些距离，倒像是孙次舟的自画像。所以他借着悼念张荫麟，大声疾呼“保护天才”，希望中国的男女不要对天才这样的嫉妒和无情。“我对还生存着的天才们，当怎样给以助力，给他以保护呢？这责任自然会落到我的身上。我们不怕饥饿，不怕威迫，不怕炮火，所怕的只是精神的寒冷。……我们生长在中国的地方，我们应给中国的天才作打算。”^[20]第一人称单复数的变化，显示孙次舟有为天才群体代言的潜意识。

黄侃论及近世的学风，斥为“钩沉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21]。除了骂人之外，孙次舟还喜欢翻案和出奇，论学尤好语不惊人誓不休。后来他写了不少论文，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不小争议的，一是否认张献忠在四川曾经滥杀，一是论证屈原死于同性恋。这样以天才自命的愤青之于社会学界，究竟是幸与不幸，未敢断言，但是让这样的天才有了再去教育其他潜在天才的机会，必定是无比的悲哀。

有才气又肯用功的孙次舟，得到傅斯年和顾颉刚的眷顾，机缘运会也算不差。据说张荫麟以其对古史考证颇有工夫，所著《中国史纲》第一册出版后，还请他能不客气地指正错误。能够被天才所瞩目，在他人或许受宠若惊，在孙次舟则至多是惺惺相惜。可惜孙次舟非但不受教，而且不自量，全然不守弟子之规。自大与能力不成正比，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学问也每下愈况。傅斯年当机立断，以绝后患，而顾颉刚的惜才怜才，对于孙次舟而言，似乎有帮助青年学人成长的积极一面，可是不仅自己为其所累，还可能因此间接地误人子弟。这样难以挽回的损害，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和弥补过失呢？

此一显例，无论师生都应当引以为戒。心存敬畏，潜心虚怀，治学才能循其正规。如果不能讲究操守，甘做小人，固然可能得逞于一

时，但天下人不可尽欺，反而自己迷失本性，做了妄人，终将害人害己，落得个身败名裂，岂不悲哉。

[1] 民国时期此起彼伏的大学风潮，学界曾经着重从学生运动的角度加以解读，实则原因甚多，不可一概而论。近年来，循着大学与近代中国的取径，对于大学风潮以及背后所反映的大学内外各方关系的研究，受到重视。略显偏颇的，则是大学的学人与学术，未能纳入叙述的架构。无论如何，大学为教育学术机构，学风与世风相互激荡，大学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关怀，或多或少可见学人的学术及风尚的影子。

[2]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除了浙江大学竺可桢等个别例外，论专业造诣大都不在一流甚至不入流，大学行政也似乎不以专业优长为取向。因此，也就不会自居于学术领导者的地位，想出花样繁多的种种创新招，只是提供服务而已。

[3]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4—315页。

[4]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2日。

[5] R. H. Tawney著，蒋廷黻译：《中国的教育》，《独立评论》第38期，1933年2月19日，第13页。

[6]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75页。

[7] 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29页。

[8]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9] 桥川时雄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第312—313页。

[10] 《顾颉刚日记》第四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第332页。

[11] 《傅斯年致孙次舟》（抄件）（1940年2月24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1070—1071页。

[12] 《傅斯年致孙次舟》（抄件）（1942年4月30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257—1258页。

[13] 《顾颉刚日记》第四卷，第708页。

[14] 《傅斯年致孙次舟》（抄件）（1942年8月18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07页。

[15] 《顾颉刚日记》第四卷，第738页。

[16] 《傅斯年致孙次舟》（1942年12月16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69页。

[17]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第1279—1280页。

[1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5228—5229页。又见同书第5251—5252页“钱宾四教授以所著《国史大纲》见贻，喜不自胜，报以此诗得三十韵”。

[1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第5325页。

[20] 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30页。

[21] 《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2页。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晚清长期持续的科举与学堂之争，所争的焦点，其实是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以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教会学校在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争议和争夺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学制颁布之前，一般而言，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名曰中西分途并重，实则可谓西体中用。不过，教会学校的西体，与普通学校有别，实际上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中西学相对之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学与教相对时，则以宗教为体，中西学皆为用。秉承这一宗旨，教会学校始终坚持分途教授中西两学，这与中国社会整体上迫切希望将中西学熔于一炉的取向明显脱节。在经历了种种融合汇通的阵痛后，国人仿照或借由东学，形成影响近代中国至深且远的新学。教会学校中西学分途教授的态势，既使教会学校本身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等问题上存在相当的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影响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与此相关的各类材料已经被陆续整理汇编，相关史事一般教育史或传教史的研究者也都耳熟能详，可是转换扩张视角，对于材料和事实或有深入一层的解读。

一 圣道与技艺

中国历史上始终与外部联系密切，而整体性集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三次，即两汉至两宋受佛教影响的一大要事因缘、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带入西学、晚清以后伴随欧风美雨而来的从西学东渐到输入新知。大体而言，三次的情形各有不同，前两次的态势基本一致。在佛教千年的濡染浸淫下，至宋代形成新儒学即理学，可是宋儒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有意掩饰佛教性理之说，而上溯两汉乃至孟子的心性之学，以至于后来高明亦难以分辨说法与史事的联系及

区别。来华耶稣会士带入的西学，不仅扩充了士大夫的知识，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认识。不过，明末清初的诸儒延续宋儒的态度，尽可能掩饰其知识的变更，更绝口不提来源。今日学人经过仔细比较来华耶稣会士带来的西书与可能接触这些西书的士大夫前后相关著述的内容变动，逐渐将所谓自然科学方面影响的脉络一一揭示；但是在人文制度方面，因为方以智等人同样将来自域外的观念用先贤的语言说出，迄今为止仍然只有笼统的推测性说法，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即便清代考证学是否受到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一节，也是聚讼纷纭，未得一是。

与前两次相比，晚清以来中国受到的第三次域外文化的整体性影响不仅层面扩大，程度加深，更为关键的是，态势完全改变。中学与西学的冲突融合在经过夷夏大防、中体西用的阶段之后，乾坤颠倒，中西越来越与新旧相对应，而“西”与“新”又被视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取珠还椟逐渐演变成标榜华洋兼备，进而大张旗鼓地输入新知。全盘西化虽然在认识层面引起不少反弹，在事实层面却是高歌猛进。从反省落后的原因以及追赶先进的目的出发，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增添；凡是人无我有的，都要舍弃；凡是人我皆有但形式内容有别的，都要洗心革面。而思想学术文化的转变与教育的变更关系紧密，承载西学的学堂教育在西学压倒中学的转换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学入华并非始于晚清，在坚持道学为本的同时，朝野上下也逐渐承认西学的实用，因而考虑如何将西学与中学整合成为一体的问题。最初的思路是纳西学于科举，道咸同光四朝，仅官员正式提出的有据可查的科举改革方案就有十八种之多。^[1]可是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却始终不得要领，以科举整合西学的努力屡试屡败，而西式学堂的发展却日趋完善，由单一逐渐全面，由无系统时期进入有学制时代。在张之洞等重臣的鼓动下，清廷最终转而纳科举于学堂。

今天看来，这一转换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时的学堂教育已经实行分科教学，采用分门别类、循序渐进的教科书和教程，所谓中学与西学熔于一炉，实际上等于用西学的炉子重新熔铸中学。中学固有的体系被拆解之后，逐一对应于西式的分科。由于自然科学的部类基本就是照搬移植，除了具有地域性的若干学科（如地理、地质、动植物分类等）的若干部分，一般而言中西融合的问题并不会令人感到困扰。而在人文社科部类，则科举不能兼容西学的麻烦

依然延续，出现如何安放中学的纠结。虽然文史政经勉强削足适履，哲学、社会学照虎画猫，都还算有了安身之所，经学却始终不安于位，最终由低而高地逐层退出学制体系，作为补救措施而专门单列的存古学堂也显得不伦不类，魂不附体。这样一来，中学可以说全面解体，在学堂体系里，西学成了正式的体，中学只能旁落到用的地位。与之相应，学术的重要载体报纸杂志也采用了类似的架构，使得东学式的西体中用化新学知识迅速普及。

自国人重视西学和西式教育之始，如何在学堂中安放中学与西学就成为左右为难的大问题。这一历史进程，主要是在国人自办的学堂演进中逐步展开的。在此期间，教会学堂以其实用有效，以及在西学的教学方面占据优势，一度成绩显著。可是，在中西学的融合方面，教会学校的作用却似乎不如人意。

冯桂芬的《采西学议》较早提出在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

按照冯桂芬的设想，学习西学，不仅要学会语言文字，还要兼习算学，因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欧洲近代科学的基础究竟是算学还是实验科学，另当别论，重要的是认定算学为一切西学的本源基础，习算学的目的也就是要进而学习一切西学。只不过其所谓“一切”，仅仅指名了格致、制器之类，而不及人文社会方面。

冯桂芬以为：“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蠢愚谬妄之通事，词气轻重缓急，转辗传述，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2]这样的比较，未免高估彼酋掌握中学的能力，不过旨在强调要在西学堂中由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的重要理据。其《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关于中学教师的资格职能进一步明确为：“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路。三年为期，学

习有成，调京考试，量予录用。遇中外交涉事件，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可以咨访，可以介绍，可从前通事无所施其伎俩，而洋务之大害去矣。”而历算、格致、制造等反而可以通过翻译成书来学习。^[3]也就是说，中学的经史仍然为本体，以俾学习者仕进。

冯桂芬的主张显然被主持相关事务者所接受，上海同文馆试办章程规定：延订近郡品学兼优绅士一人为总教习，举贡生员四人为分教习，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而以讲明性理敦行立品为纲，西语西文之暇，仍以正学为本。算学西文须逐日讲习，经史各类，随生徒的资禀所近分习之。^[4]后来广方言馆的课程规定：习经、习史、讲习小学诸书、课文、习算学。学生分上下班，初进馆者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如算学、代数学、对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事，皆用初学浅书教习。若作翻译者，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书。上班分七门，学生专习一艺，如地质冶炼、铸造、制造、制图司机、航海、水陆攻战、外国语文及风俗国政。中师、西师分限督课。^[5]广州同文馆即“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大义，俾得通知古今，并令仍习清语”^[6]。

京师同文馆用科甲正途出身者学习天文算术，主要就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反对者则担忧中西学混通，影响读书学道，舍圣道而入歧途，因而只赞成在历法、制器等方面中法与西法互相考验。整体而言，中西学必须截然分立，不应混淆。所以倭仁将礼义与权谋、人心与技艺相对。于凌辰担心开天文算学馆会开启学洋人与鄙洋人的朋党之争，背后其实也是担忧中西学相争不已的麻烦会浮上台面。^[7]京师同文馆将中西学分为两途，西式的艺学课程分科教学，中式的经史仍然延续旧惯，因而虽然朝野上下关于中西学的优劣短长争得不亦乐乎，但在学堂内部，中西学实际上是有别而无争，的确可谓并行不悖。

不过，这样的中西兼顾虽然相安无事，却也是两不相干，等于在同一教育机构当中实施两套各行其是的教育，灌输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1888年，刘铭传议设台湾西学堂，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兼通，亦以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陂。日以巳、午、未、申四时专心西学，早晚则由汉教习督课国文，遇西国星期，课试策论。^[8]福州船政学堂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9]江南水师学堂设汉文教习六员，驾驶管轮学生分时讲授《春秋左传》、《战国策》、

《孙吴兵法》、《读史兵略》诸书，并有经济之文以扩知识，定期由教习命题作论，呈送改阅。^[10]江南储材学堂类似，号称中西并重，因学生为中国人，粗知汉文，故其致力以中四西六为断。每日下午一点半钟入讲舍从事中学。分别层次，分类训课。已入泮者教古文之法，分习历朝各大家派；已开笔未全篇者，以“春秋”三传、《国策》、史汉各家逐字逐句先释训诂，再分疏国势、疆域、政治等；仅能属对及破承题者，授以《朱子小学》。^[11]

虽然守成官绅一再声称中国早有天文、历算、术数、匠造等学，而且较西洋为精深，可是近代西学东渐，这一部分自然科学的知识一般而言无须与中国固有的学问相融合。而在科学与文化兼而有之的医学领域，中西医积不相能，非但不能融合，而且后来陷入长期此是彼非、非此即彼的境地。

中西并重分途的情形毕竟不能持久，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八日（1889年11月10日），张之洞上《增设洋务五学片》，提出：

查西学门类繁多，除算学囊多兼通外，有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种，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泰西各国以邦交而立公法，独与中国交涉恒以意要挟，舍公法而不用。中国亦乏深谙公法能据之以争者。又凡华民至外洋者，彼得以其国之律按之，而洋人至中土者，我不得以中国之法绳之，积久成愤，终滋事端。夫中外之律，用意各殊，中国案件命盗为先，而财产次之。泰西立国畸重商务，故其律法凡涉财产之事论辩独详，及其按律科罪，五刑之用，轻重之等，彼此亦或异施。诚宜申明中国律条，参以泰西公法，稽其异同轻重，衷诸情理至当著为通商律例，商之各国，颁示中外。如有交涉事出，无论华民及各国之人在中土者，咸以此律为断，庶临事有所依据，不致偏枯。顾欲为斯举，非得深谙中外律法之人不可，此公法学之宜讲也。

为此，要在粤省新设的水陆师学堂讲习上述数种学艺，分别募致五学洋教习各一，拟各科招生三十名，其中习公法者于精通该国语文以后，尚须兼习希腊、拉丁二国语文。生源拟从闽厂酌调已通英语及

各项算学的上等学生五六十名，更就上海广方言馆及广东同文馆考校录取。[\[12\]](#)

1896年，梁启超的《学校余论》对京师同文馆教不得道的情形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西人之教也，先学本国文法，乃进求万国文法，先受本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乃进求万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国学校之所同也。”京师同文馆所用洋教习不通中学，华文功课循例塞责，无足轻重，华教习大半乡曲学究，中西两面均粗浅，不得谓之学。梁启超的主旨，不仅是反对只习艺学、不问政学的偏颇，主张要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更为重要的是，强调在政学层面必须中西汇通，否则势必粗浅，不能精深。[\[13\]](#)

二 分途未必并重

与中国人所办西式学堂中西分途的情形相仿佛，教会学校也实行双轨并行的方针，只是国人自办的西式学堂名义上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而教会学校正相反，坚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被视为近代中国教会学校发端的马六甲英华书院，创办之始就明确表达了初衷，其筹组计划书声明：“本书院之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二则举凡恒河外方各族，即中国、印支及中国东岸诸藩属之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其就读于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语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之造就。”书院的欧籍学生必须授予中国语文，惟各生得按其意愿在宗教、文字、经济诸科上有所选择。本土学生则必须以英国语文授以地理、历史、数学及有关学术与科学之各项科目。如时间许可，亦将授以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及马来文等。[\[14\]](#)1818年教会于当地开设的三所华文学校，华文基本课程为《三字经》。[\[15\]](#)

另一所创办较早的马礼逊学校，上午英文教课，下午国文教课。[\[16\]](#)教科为初等之算术、地理及英文。地理、数学用西文教本，并授以四书、诗经。1842年迁港后，课程中英兼备，最高第四班，英文科

包括天文学、历史、地理、数学、作文诸目，中文科则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诸目。分别由中西人士教导。^[17]

尽管教会学校的教学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体制教程，中西学双轨并行的模式，为大多数教会学校的教学所实行。这样做大体上出于两方面考虑：积极的角度，中文单独设科，是寄希望于清廷在科举中增设西学，在西学方面具有优势的教会学校毕业生如果能够考中，则个人与学校都会声望倍增。而要想在仕途上功成名就，就必须学习和掌握中学。消极的角度，学习中学有助于巩固和扩展生源。例如“当沪南之初办学堂也，召集生徒，诚非易事，必于宗教书籍之外，兼授经史，而后踵门求进者尚稍有其人，不然则竟至无人过问。然此当指男校而言也”^[18]。

不过，随着西学的地位不断攀升，中西并重演变成独尊西学，中学沦为次等点缀。尤其是科举制由改到停的变化，更使得中学在教会学校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兼习英汉文，国文虽然列为学科之一，却徒具形式，教师素质差，待遇低，上课在地下室。汉文试以一论一策。直到1917年，该院的汉文课程设置仍然保持一定的旧惯：预科第一年，上下《论语》、小学、论说文范、习楷、作文、月课；第二年，中国舆地、上《孟》、《左传》一二、《战国策》菁华、习楷、作文、月课。正科第一年，《东莱博议》、《左传》三四、《孟子》中下、习楷、作文、月课；第二年，史论正鹄、中学历史、《左传》五六、习楷、作文、月课；第三年，古今大家、中学历史、历代名人书札奏议、作文、月课，国语；第四年，国文、《史记菁华录》、中学历史、作文、月课、国语。^[19]到二十世纪初，教会学塾中西学仍然分别教授，中学课程一如中国传统，三、百、千之外，主要是四书易知摘要、幼学琼林、诗经、左传摘要、东莱博议等。^[20]

中西并行，不仅教材、课程分别按照中西的惯例，时间安排和教法也是各自我行我素。1874至1875年间，徐汇公学由一位进士和两位举人教学生八股文，神父们认为先背诵的教学法不理想，但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改进方法。这样的“想不出”到了圣约翰大学时期变本加厉，成了“不能想”。该校分西学、中学两斋，中西学两不牵混。中斋正馆三年、备馆四年。各人根据中西文水准，决定入正馆还是备馆，如西优中劣，则中学入备馆，西学入正馆。反之则颠倒。一般学生不注意中文。初级班由中国教师用汉语教学，以上各班级则多由外

籍教师用英文教学。尽管不少教师觉得中国旧式教育的死记硬背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扼杀创造精神和个人意见，仍然认为起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文科目必须继续采用传统方法学习，任何试图改用西洋的方法都是有害的。^[21]

中西分途，等于是同一人在学校用两种不同的办法学习两套全然不同的知识，这两套知识体系在教育体制上几乎不发生交集。尽管少数能够兼通中西的教师可能对其中一些知识做出解释或批评，总体而言，两套知识的汇通是师生个人的事情，并非学校教学的要求。虽然有的教会学校希望毕业生能够同时掌握中学和西学，而且也有成功的范例，但是一身二任显然无法作为普遍期许的目标。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创办的上海中西书院，从院名即不难窥见其沟通中西的理想抱负。海滨隐士在该院创办十二年之际所撰《上海中西书院记》称：

当今之世，揆今之时，度今之势，而欲施教化之用，成学问之功，藉以有济于今之世，有合于今之时，有利于今之势者，专尚中学固不可也，要必赖西学以辅之；专习西学亦不可也，要必赖中学以襄之。二者得兼，并行不悖，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

该院创院十余年，聘请久为士人所推重的沈毓桂为掌教，中西课程各占半天。门下士已有千余人之多，招商局、电报局、各口海关、南北洋水师学堂、北洋医院，取用多人。名成利就者，亦复不少。

然林君之心犹有憾，必欲大用而后快。自甲午年始，大加整顿，以冀诸生获非常之益。西教习冯昌黎先生、刘乐义先生、林乐知先生之第二女公子、尹致昊先生、中教习杨嘉贵先生、曹砥隅先生，皆品学兼优，功课严密，定卜日而就月将。由是观之，不禁叹立法之精详，识见之高超，局量之恢宏，考核之严密，意甚美焉，法甚良焉。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庶几教化之用，可由浅而入深，学问之功，可谓无微而不至。中学之

益，于是乎进，西学之益，亦于是乎兴。二者得以两全而无害，几如一贯之可通，则此书院之设也，不亦尽美尽善，而超出乎沪上之诸书院哉。[\[22\]](#)

关于创院的理想目标，林乐知的《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自道心声：

余侨寓沪上二十有余载，习见中人之子弟聪明颖悟者多，苟教育之有方，上皆可蔚为伟器，下亦能执一艺以成名。而今之最切于世用者，莫如西学。……其教虽以西法为主，而西学中学究当相辅而行。故聘西师授读外，兼延中国积学淹博之士，课诵经籍，删改诗文尺牋，以期西学中学悉造乎精纯。盖西学固为今日当务之急，而非明乎中国之书理，熟乎中国之文法，则西学要不过得其糟粕，终无由抉其菁英，将挟之翻译西书，而莫通义理，与之讲求格致，而莫测渊微，此其人即或见用于世，第足供奔走之役，无当于远到之程。而本书院所定之章程，中西并教，实为握要以图也。[\[23\]](#)

可是这样的理想即使在中西书院也难以实现。林乐知所订《中西书院规条》称：中西两学并行，习西学以达时务，尤宜兼习中学以博科名，科名既成，西学因之出色。[\[24\]](#)中西书院先创西学馆，1881年设立中西两分院，后分中学、西学、算学、格致等五馆。功课中西并授，无畸重畸轻之弊，或上午中学，下午西学，或上午西学，下午中学。“凡肄业诸生，定以十二岁以上者，习学西学；如有聪明子弟，十岁以上者亦可。八九岁亦可准来馆读书，迨年稍长，再习西学。”同样出自林乐知之手的《中西书院课程规条》也说：“中西两分院，今岁落成，来年择日开馆施教。凡诸生肄业，先在分院习学二年，然后选升大院习学四年。迨有进境，情愿再学，又准在院二年，前后八年，庶可造就人才，以备它日大用。”[\[25\]](#)

虽然名义上中西两学并重，以求“西学既以淹贯，中学复得明通，就试风檐，可冀功名之取；如供差委，并邀爵命之荣”^[26]。实际上该院的课程设置主要是西学方面。八年的课程依次为：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习学琴韵；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第四年，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第五年，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第七年，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功用，翻书作文；第八年，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书作文。

至于“中学课程，因诸生年岁大小不同，难以预拟，因材施教，各分班次”^[27]。具体由沈毓桂司其事，分四级授课，有讲文、五经、赋诗、尺牍、对联、书法。“每逢礼拜三，中教习出题，命学徒作诗文呈削，更每月考校一次，而于制艺试律外，参以诗论尺牍，汇呈总教习分别录取，以定优劣。迄今八易星霜，而精益求精，务求实济者，皆监院林君之善于创，而尤赖司事沈君之善于因也。”^[28]

沈毓桂的见重于士林与中西书院的中西并重，只是一定条件下的相比较而言。1882年林乐知视察中西书院，发现情况未可乐观：

乃近日遍观两分院之学生，力求精进者固多，而潜萌退缩者亦复不少。推原其故，一则以嫌西学之迟缓，一则似病中学之怠荒。不知人当务其大者远者，仅徇于耳目之前，无益也。故夫本分院所教之西学，由源以及委，由本以及末，一时虽见为迟缓如破竹，然数节之后，自有迎刃而解之势，将见其甘，不见其苦，见其易，不见其难，而学成致用，可以膺使节之选者在其人，可以任翻译之职者在其人，内而总理衙门，外而通商节署，及乎海口大关，机器各局，西国医馆，西商洋行，随在可以位置一席，不其美欤。……至若中学之怠荒，容或有之，然亦因诵读之功，半分西学，自不如一无间断者之易进竿头。况又重之以偏主西学之私衷，故西学到塾，而中学不到塾者有之，西学克奋，而中学苟且塞责者有之，虽中师沥诚启迪，不少偷安，终难入暴弃之中藏而生其智慧。惟深明中学不能精熟，西学必不能通达之故，则其于学，当无传而不习之虞，而日就月将，自不能已矣。^[29]

同样号称中西并重的中西女塾，也是重英文轻中文。除语文外，课本均为英文，连中国历史、地理也由美国人编写。中文即使不及格仍可领取文凭。

登州文会馆看似在中西两面均不乏成功的典范，以西学论，不少毕业生被官办学堂聘为教师，以中学论，1875年该校首届毕业生邹立文未毕业即参加乡试，名列前茅，而末届科考也有该校毕业生郭中印参加。主持者该馆的狄考文认为，儒学思想的支柱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要取代儒学的地位，就要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人，使之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取得其所占的统治地位。该校的儒师聘请廪生、秀才担任，教授三字经、四书五经，以应科举。所编写的教科书也只有经过改造的科学部分。实际上中西两学还是分别开来，各有讲究。

三 西体双轨

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在各校继续分途实施中西教育的同时，教会试图通过编写教科书来统一教学。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届大会成立的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该会由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林乐知、黎力基（Rudolf Lechler）和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担任委员，计划编写小学用的初级、高级教材各一套，包括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自然史、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西方工业、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政治经济学、声乐、器乐、绘画。体裁须文理简洁，为此还要统一术语。[\[30\]](#)

由于该会决定暂不翻译成北京方言，绝无可能统一成目前通行的专门术语，而且1890年以前该会编译的教科书虽然为数不少，大半属于自然科学、算学、西洋历史、宗教、伦理等科，一般不会遇到后来全面统一译名时所产生的种种困扰。否则，在相关学科的范围内势必要面对中西学相互贯通的棘手难题。

正是在统一编辑教科书的过程中，原来各自为政的教会学校遭遇了一些普遍性问题，并且引发了争议。因为原来登州文会馆自编的教科书，仅限于该校自用，而统编教科书不但门类增多，而且希望教外的中国人也乐意采用。教会学校究竟是仅仅以教育为传教工具，还是要向全社会传播普通知识，成为意见分歧的焦点。这一关键认识，牵涉到教会学校的主办者对待中学和西学的态度。

概言之，教会学校对于中学的态度无论差异多大，主要还是利用，而其所坚持的西体一般却有两个，且彼此不能完全协调。如何利用中学，又受制于各自的西体主张或侧重。

狄考文虽然坚持教会教育应该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因而主张应先授予优化的中文教育，并从中文学习西学的科学知识，但他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与儒学争夺统治地位。他于1877年发表的《基督教会与教育》声称：

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使得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科学的名声已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中国，教育极受人们所推崇，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上所能起的影响极其有限。中国的经典教育是这样一种教育：西方传教士想在其中出人头地，依靠它来谋取地位和发挥影响是既不实际，也不可取的。他们应该依靠西方科学知识在人民中取得好名声与好影响，这样做更好些，虽然西方的科学知识到目前为止还很少为中国人所了解，但是它有着极高的声誉，因此一个精通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知识的本地牧师也将取得其他途径无法取得的声誉和影响。有了这一条件，他们的地位就非农村地主所能比拟了，而后者正是用异教来束缚民众思想的主要力量。由于传教士掌握了傲慢的中国学者既无法否认则又难于抵制的科学知识，因此他能取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31\]](#)

发表于1890年的《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狄考文进一步强调：“所谓完整的教育，我指的是要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以及基督教的真理有个良好的理解……接受儒家学说的人，即以儒学那一套哲理作为他立身处世的思想支柱。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人头脑中的儒家思想改变过来，我们就得培养一批接受过基督教义和自然科学教育熏陶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阶层。中国的环境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西方科学在中国赢得了并将继续赢得声誉。任何一个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熟谙中国文化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将成为有影响的人。”“一个中国人缺少本国语言的知识训练，将损害他所有的外语和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谁在这方面有了缺陷，他马上就会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32]

仔细揣摩狄考文的意思，所争主要不在中西学的优劣短长，换言之，西式科学在他眼中也不过是有助于传教的工具而已。“随着本地基督徒人数的增加并向内地扩展，他们将日益脱离外国人的直接教诲和控制。这时就会产生受异端邪说的侵蚀和中国经典思想的不良影响的危险。”^[33]充满儒家说教者可以培养成宣讲福音的人，只是不能完全清除其头脑中的异端思想，所以靠不住。“如果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传到中国而脱离基督教，儒家学者将以骄傲自满情绪来接受新学问，发现它仅仅是二千余年儒家学说的佐证和更详尽的说明。然而基督教徒所传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将给上帝提出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上帝存在于大自然、历史和天意之中。”中国需要更新道德品质，唯有基督教能够完成这项工作。没有这种更新，光是增加知识，改变社会的外部条件，是没有力量把中国从自古以来的自私奴役下解救出来的。脱离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纵使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很快就会变得像儒家那样冷酷和自私。^[34]

也就是说，在狄考文看来，西方世俗的哲学和科学并不能单独战胜儒学，虽然科学对中学具有强劲的冲击作用，可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精神支撑，难免被异端邪说的儒学所腐蚀。所以，尽管科学能够帮助传教士取信于中国人，以便更好地传播基督教的真理，真正能够战胜儒学的还是基督教信仰。言下之意，教会学校西学的双体，一是科学，二是基督教，相对于中学，西学的科学和基督教都是本体，但在西学的架构内，宗教信仰更具有本体性。

到1890年的在华传教士大会，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专门写了《论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的地位》的长文，坦率地承认：“很难说，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中占有什么地位。正如一位传教士说得好，整个课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们不能和中国经书相处，而我们不能不和它相处。”

由于当时教会学校各自目的不同，对经书的处置不一，或将全部四书五经列为中文课程，要求学生熟记，练习作文，预备参加科考，或只教四书。在时间分配上，或一半以上时间习经书，或只用很少时间。前一类希望教会学校的学生与中国人学校学生所受教育相等，以便在中国社会和政府机构中占有位置，后一类则只是为了做教会工作。第三类人认为教会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在基督教徒的影响下，把西方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这样我们教育人的目的比起他们古老的儒教经典将更有价值。多用时间精力教经书，不能给他们更为有用的知识。课程应当包括学习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自然科学三方面，缺一不可。但教会学校不是培养专家，否则任何一科专研下去都要全力以赴。

潘慎文认识到：“中国语言的经纬出自经书。作家常用的大量引用语和举例，他们的诗和历史典故，字的读音和定义，一言以蔽之，语言的要素和精神是从经书中产生和形成的；所有大量的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作品都被经书的文风和道德原则所笼罩。任何人没有经书的知识，就不能写商业和外交书信。不言而喻，学习经书被认为是语言的知识来源，乃是不可缺少的。”虽然现行的中国教育制度有许多问题，应当改变，但是不教授经书，学生就无法在国内取得地位和影响。

经书既然如此重要，传教士的真正问题就不是“中国经书在我们教会学校中有没有地位，而是它应属于什么样的地位。它和我们来中国教学相比，其相对的重要性是什么？要给学生多少时间上的比例来学习经书？是否应该学习‘四书’‘五经’？如果不是，哪些部分可以省略，或只要学习一部分？如何教学？要逐字地牢记住吗？或者还有更好的方法？对其中国异端教学论和伪科学如何抵制？除了熟记之外，又如何能激发和发展学生的其他智能，尽管学习经书会受到思想束缚和感觉迟钝的影响。在女子寄宿学校中，要学多少经书？在全日制学校中允许花多少时间学习本国书籍”^[35]。对此教会教育家不可能做出满意的决定。中国的私塾用十至十五年时间教学生经书，教会

学校只有三分之一或一半时间，同时还要学习其他课程，以求各方面都有成效。

如前所述，在华教会学校为了吸引中国学生，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中西课程并重，加授经学等中国传统知识。传教士们认识到经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儒家圣人认识到家庭、国家、社会的有机联系，他们提出‘五伦’。渗透中国新教育的基督教将仔细地保留这些教训中一切正确的东西”。“中国经典著作极大部分包含着圣人关于政治、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原则的教训。自古以来精通这些教训是加官晋爵、求取荣华富贵的条件。”^[36]为了迎合中国学生的需要，经书在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中得以占有一席之地。

在此思想观念的主导下，教会学校的中学教育主要是用中国人固有的方法满足其固有的需求，教法、教材与教程基本仿照中国的学塾书院，培养的目的也是科举考试之类。这样的中西分途，使得中学与西学在教会学校里面并非中西合璧，而是各行其是。各校的教学安排虽有不同，大体上经学课程的内容多习四书，程度较高的兼及五经。由于采取西式分科教学、分级设学的办法，这些教会学校不仅有中学的内容，而且有了层级安排。像山东登州文会馆分备斋、正斋两级，大致对应小学、中学程度。备斋程度较低，主要学习《孟子》、《诗经》、《大学》、《中庸》。程度较高的正斋，则有《礼记》、《书》、《左传》、《易》等。

通过中文来学习和掌握西学与宗教的设想虽然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可是由于只涉及较低层面，因而一般没有希望中文进行相应改造的迫切要求，更加难以产生将中学与西学汇通的愿望。教会学校不过是希望造就虔诚的基督徒，并以其科学和经史的底蕴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以便于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与国人自办的西式学堂越来越强烈的中西并轨的需求形成明显反差。

四 分途与合流

在学制确立之前的无系统时期，由于中国自办西式学堂不如人意的反衬，在华教会学校看似成绩不俗，但就教会学校的初衷而言，最为积极的评估也很难说实现了预期。无论是中学的经史学习，还是西

学的科学教育，除了少数例外，其实成就极为有限。教会学校将中西学分途教授，而希望学生能够自动将两套学问有机融合的想法，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教会学校的教育宗旨名为中西并重，其实在学的范围内，中西相对，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扩而大之，学与教相对，则以宗教为体，中西学皆为用。教会学校的科学教育，虽然影响不小，在传教士的角度，只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传教士自认为具有精神道德的优势，极力想改造被其视为异端的中国传统文明，尤其是改变用传统作为理想来评判现实思维行事的价值取向，这与中国教育主张尊重传统的观念截然相反。这样的态度，的确影响了一些趋新士绅和教育家，否定和改造传统，成为他们认定的救亡振兴的必要前提。

问题是，中国文化总体上是非宗教性的，作为终极关怀的信仰在一般人心中的价值主要是有用。所谓信神如神在，儒释道耶，可以同时同地供奉，心诚则灵，关键看管用与否，至于究竟属于何方神圣，反而不大在意。这也就是为何长期受中国影响的东亚各国分别统计各教的信众相加远过于国民人数总和的原因。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当中，宗教神祇存在可以，独尊很难。传教士的反对中国传统，没有能够开辟上帝高歌猛进的坦途，倒是为全面引进西学鸣锣开道。即使西化的趋新人士，也只能舍中学而就西学，很少会弃圣道而尊外教。

况且，眼界日益开阔的国人对于近代以来政教分离的世界大势认识越来越清晰，1905年刘师培就知道“昔欧西各邦学校操于教会，及十五世纪以降，教会寝衰，学术之权始移于民庶”^[37]。1909年蒋维乔的《论教育与宗教不可混而为一》指出，初民时代，智识愚昧，圣人借神道以设教，故宗教尚焉，政治学术皆与宗教混而为一，教育亦然。“然科学愈发达，人智愈进化，各种原理，与宗教所说，枘凿不相容，则其势力，亦日渐式微。”所以政治与宗教日趋分离，教育与宗教不可混一。^[38]民初刘以钟鉴于“学校教育全脱宗教之范围，是世界之趋势也”，明确提出“教育与宗教分离”^[39]。

清季民初是否当设国教的问题，的确喧闹了好一阵，虽然不乏主张支持者，最终还是偃旗息鼓。后来国人在输入新知的同时大张旗鼓地非宗教，反对以教为体，这就意味着在教会学校的双体之中，中国人只接受西学之体，而根本抵拒以宗教为体。

教会学校的中学之用，一是可以与儒学出身的士大夫争胜，二是能够有助于更好地接受西学。前者适应科举，后者对应西学，二者既是有用于传教，也是迎合中国人的需求。不过，在变动不居的近代中国，这两方面潜藏着内在矛盾。在教会学校里分途并重的中西两学，在整个中国社会当中正在经历着融合汇通、逐渐并轨的阵痛。教会学校在此浩浩荡荡的大势所趋之下，仅限于用的中学只是迎合科举，未能积极参与甚至自外于融合中西创建新学的过程，使自己陷入相当被动的局面。

甲午战败，日本成为中国朝野上下新的学习榜样，仅仅学习技艺的洋务新政观念遭到严厉批判，被指为中日两国学习西方同时起步而成效差若天渊的一大要因。1898年创刊的《格致益闻汇报》序称：

太西之学，分天人二类。天学者，超乎物性之理，渊妙不能穷，终身读之而不竟……人学者，人力能致之学，种类繁多，难于悉举。

人学择其要，则有格物学、天文、气候、地理、地学、形性学、化学、艺学、算学、测学、量学、博物学、医学、律学、兵学、文学、史学，“凡十有七学。天学犹未与焉。若夫矿学归地学，光、电、声、磁、重、热、气、水等学，皆归形性学。农与商，西国从无专学，乃近今维新之徒，以光电等各列一学，而加以农学、商学名目，强作解人，图眩俗目，亦不思之甚矣。我中国声教之行，先于泰西，而为学反不及泰西，何也？自三代以迄宋元，志士引锥刺股，穿壁分光，其所学不过经史已耳，文词已耳，即或披涉万卷，博览百家，号腹笥，号经库，号渊府，名重斗山，口吐珠玉，要惟涉猎陈编，工于记诵，而果能仰观俯察，穷物理以济实用，如西国之名人者，某未之闻也”^[40]。

要全面学习西学，尤其是如梁启超所主张的由艺学为主转向政学为主，中西分途的状态自然不能继续维持。而日本在此期间对应西学构建起来的东亚各学，在用西式架构重新条理中学并予以重估的同时，也重建了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成为中国趋新人士模仿取法的重要凭借。这也就是西学入华多年之后，中西学仍然只是两张贴在一起

的皮却不能合成一体，反而让异军突起的东学乘虚而入，后来居上，占尽风头的重要原因。

世纪转换之交，宋恕、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刘师培等人都在仿效东学想方设法建构熔中西于一炉的新学体系。而他们所认为的中学原来的状态，或是根本没有分科，也就是不“科学”，即没有分科之学；或是虽有分科而不够细密“科学”，即不够公理和真理。随着科举改革尝试的屡屡受挫，“纳西学于科举”不得不改弦易辙，最终定策为“纳科举于学堂”。由于新式学堂普遍采用西式体系、教程和教法，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化为西体中用的现实，最终在西式分科的架构中削足适履地装入了中学。未被溶解容纳的中学异化成了旧学的象征，被列为淘汰的对象；反之，西化的中学连同西学一起，则是前景无限的新学的体现。

这样的结果，本来正是教会学校努力的目标之一，可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除了广学会之外，教会学校显然参与不够，以至于后来整体上长期被排斥于学制之外，不能得到中国官方的承认。而教会学校一直重视的经学教育，随着科举制的中止运行，在中国人的有系统学堂中也无法安身，不得不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从事实的层面看，教会学校的中西学分途并重很难称得上是成功，又因为未能积极主动地参与中西融合创建新学的过程，尤其是在学制的设置与演进方面，虽不乏间接影响，却少有直接作用，只能继续游走于教育体系的边缘。虽然严复坚持中西各有体用，不能强行混同，对于东学的大行其道并主导新政极不以为然，以东学为范型却是清朝教育改革的基本取向，教会学校后来也不得不采取东学影响显然的教材教法，以适应学制确定后中国教育的重大变化。

当然，历史很难用单一视角来考察，或者说，从特定角度看待纷繁复杂的历史，难免陷入片面。在新式学堂里用西式架构重组的中西学，虽然被认定为新学，并且的确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要确认已经达到中西合璧的汇通状态，就未必能够贯通无碍。用西学重新条理的中学，与中国固有之学形似而实不同，用于知今，或有便利，用于鉴古，难免隔膜。新式学堂出身的后来人将所传授的一套知识当作认识的前提，解读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术文化，总有些似是而非。尤其是经学的失位，表明原来认定的中体在新学体系当中不能适得其所。而经学作为道德支撑的主要凭借，据此形成的一整套礼制礼俗，源于社会文化，行于社会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宗

教关怀的中国伦理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规范。经学失位，道德失范，社会必然失序，这也是百年来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当革命的时代逐渐过去，建设的时代日趋主导，重建规范和秩序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对今人的巨大考验。

教会学校的中西分途并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承认中西学各有体用，不可混为一谈，难以强行撮合。中西学分别教授的安排，以及坚持按照中国固有的方式程序，使用中国的教材来教授中学，能够最大限度保留中学原有的状态和意涵，避免陷入后来名为比较实则比附的解读。虽然传教士掌握中学有限，动机未必良好，所请华人教习也罕有高明，因而难以达到高深程度，毕竟比后来西式学堂出身的新学家的乱解乃至今日坊间假道学的臆说更加接近原典的真义。

传教士相信，经书中的异端学说和伪科学，可以通过教会学校的基督教和自然科学课本的教学予以抵消。况且中国经书比希腊罗马古文要优越得多。经书的教学和解释留给当地教师做，教会人士只有当中国人不胜任时才教，一般只是指出经书中的错误观点。应当有对中国经书的基督教义的注解，如教科书委员会制订的教材，解释难解的文章片段，指出其中错误的学说，以及其中符合宗教原理和真实的科学知识部分。^[41]可是，在西学压倒中学的大势所趋之下，仅仅从保留文化物种的角度强调的原生态，很难令人普遍信从。正如当今人们对于生物物种的态度仍然误信适者生存一样。

清季以来，虽然西学渐趋一尊，其实好输入新知乃至鼓吹全盘西化者不少是“挟其十九世纪下半叶‘格义’之学”的“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全然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所挟以自重的“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42]，看似时髦的舶来品，却是过时的旧陈货。除一般性常识之外，学得再像，也是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货色。有鉴于此，陈寅恪预测：今后中国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结果当与玄奘唯识之学相同，“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43]。

另一方面，尽管近代中国人非宗教，但是经学的失位导致新的信仰需求更加迫切，而接受西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科学的信仰，这与

科学的精神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只不过上帝的万能一时难以征信，而科学的万能却有列强逞强称霸的范例，过于追求实用的中国人自然会厚此薄彼。对科学万能的信仰到了欧战结束后才有所动摇，因为科学万能的典范象征自身已经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惨绝人寰之中。

由此可见，中西汇通融合还是分途并重，实在是近代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后发展国家民族遭遇的普遍性两难命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天下与今日的所谓全球化大同小异）。应该承认，迄今为止，比较而言，东亚社会处理这一难题还算是成功，或者说，尚未出现更加成功的范例。这种现象，在一段时间里被解释为儒家文化的作用。此说不无道理，只是所谓儒家文化已经被重新条理改造，这样的成功归根结底仍然处于欧洲中心的笼罩之下。而真正的考验，还在一旦走出欧洲中心的笼罩之时。那时中学的文化物种之于人类未来发展可能选项的作用，将更加值得重视。如果现在不对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近代教育以及中西学的演变深入探究，全面检讨借鉴其成败得失，就很难形成必要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以应对崭新时代的来临。

[1] 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2] 以上引文均见《校邠庐抗议》卷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7—28页。

[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38页。

[4]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5—176页。

[5]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179—196页。

[6]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页。

[7]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辰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8]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256页。

[9]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347页。

[10] 《江南水师学堂简明章程》，《万国公报》第22册，1890年11月。

[11]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589—590页。

[12] 苑书义、孙华锋、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2—733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1页。

[14] 朱有璈、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15] 参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五章第一节，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16]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页。

[17]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220—223页。

[18] 范约翰：《上海清心书院滥觞记》，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275页。

[19] 《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章程》，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336—337页。

[20] 《耶稣教美以美会镇江女塾功课章程》，《各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十集，第42—43页，1904年。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5—106页。

[21] 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231、434—437页。

[22] 《万国公报》第60册，第10页，1894年1月。

[23] 美国林乐知来稿，《申报》1882年12月17日。《万国公报》第15年第720卷（1882年12月23日）刊载，题为《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启》。

[24] 《万国公报》第25册，1891年2月。

[25] 《万国公报》第14年第666卷，1881年11月26日。

[26] 海滨隐士：《上海中西书院记》，《万国公报》第60册，第11页，1894年1月。

[27] 《万国公报》第14年第666卷，1881年11月26日。

[28] 王良佐：《中西书院志略》，《万国公报》第19册，1890年8月。

[29] [美]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申报》1882年12月17日。

[30] [英]韦廉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33—37页。

[31] 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92、90—91页。

[32] [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95、97、101页。

[33] [美]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94页。

[34] [美]谢卫楼：《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110—112页。

[35] [美]潘慎文：《论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的地位》，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126—128页。参见胡卫清：《传教士教育家潘慎文的思想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6] [美]谢卫楼：《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107、112页。

[37] 光汉：《周末学术史序》，《国粹学报》第1期，学篇，1905年2月23日。

[38] 蒋维乔：《论教育与宗教不可混而为一》，《教育杂志》第1年第10期，社说，第117页，1909年11月。

[39] 刘以钟：《论民国教育宜采相对的国家主义》，民国经世文社编：《民国经世文编》第32册，上海：经世文社1914年石印，第41页。

[40] 《格致益闻汇报》第1号，1898年8月17日。

[41] [美]潘慎文：《论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的地位》，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129—130页。

[42]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56页。

[4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页。

“中国哲学”探源^[1]

古代中国有无哲学以及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已经困扰国人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且范围还有向海外蔓延之势。对此海内外学人已有为数不少的研究。^[2]不过，这一问题其实是“哲学”或“中国哲学”如何进入中国的衍伸，因而认识的关键，在于考究近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如何出现及传衍。就此而论，近年来无论史料的发掘爬梳还是史事的考订条理，都有长足进步。只是相对于问题本身，在关键的环节上还有史料史实的重要缺漏，由此留下不少未尽之义。

海内外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历次讨论中，论及“中国哲学”的缘起，始终缺少关键性的史料，因而相关史实的认定难以完全做到信而有征。由于这一历史最早发生于明治日本，利用新出及鲜见的中日文献，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办法，探究“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演化，成为解决这一难题至关重要的枢纽。本篇详人所略，着重探讨三个方面：1. “中国哲学”的产生；2. 中国人对“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接受；3. 国人对于“中国哲学”的反省。

一 “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

“哲学”一词，由明治日本思想家西周发明，已为学界所知。学人还分别指出两点，其一，西周的“哲学”仅指西洋，本来并不包括东洋。王国维称“哲学”一词是为了避开自然科学的“理学”，其实当时在日本“理学”也是philosophy的译名，并不专指自然科学；西周将哲学定义为“诸学之上之学”（the science of sciences），“诸学”是指一切分科之学，而不单指自然科学；而且西周并未用“哲学”作为philosophy的专有译名以排斥“理学”。有学者认为：

作为“明六社”的重要成员，西周将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而不沿用“理学”之名，是为了与传统的“国学”、儒学等本土学问加以区别。为了打破早年“兰学”之“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文化接受模式和扭转传统心态对西学的狭隘化理解，西周特别彰显了西学的整体性和完善性。这样，“哲学”就成为一种综合的方式，成为能与东洋学问全面比照的对应物。日本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多以传统学术为“虚学”，以西洋哲学为“实学”，“哲学”的理解和定名，承载了对传统儒学的厌离和批判，以及对欧洲形态的仰慕和渴望。^[3]

其二，虽然西周助早在1870年最早提出“哲学”译名，但只在课堂讲授时使用，由学生笔记的讲演录《百学连环》在其生前尚未发表；同时期的其他思想家大都沿用“理学”的译名，而西周助本人亦予认可；虽然1870年代“哲学”一词已经出现于报刊和演讲中，直到1880年代初井上哲次郎编撰《哲学字汇》时采纳西周助所译的众多西方哲学术语，才使“哲学”成为日本学术界普遍习用的译名。“理学”遂与哲学全然分家，用以专指各门自然科学。

上述两点，与“中国哲学”发源一事关系至为密切，也是理解古代中国有无“哲学”的关键。“哲学”是西周助用来对应philosophy的译名，其实任何语言的准确对译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而使用什么译名，更重要的是受所属文化及时代的影响制约。如果西周助的“哲学”是为了凸显西学的整体及其特质，并与东洋学问相区别，那么“哲学”一词本身对于东洋学问就具有排他性。或者说，至少西周助的本意，东洋的固有学问不属于“哲学”的范畴。

对于东西学术的差异，西周助等人已有明确意识。1877年，西周助在东京大学法理文学部发表演讲，批评日本的学问大都来自中国，且一味模仿，对于包括“哲学见解”在内的西洋学术亦取此种态度，呼吁后来者深究渊源，以致精微，发明新理。^[4]言下之意，就是“哲学”本来与中国无关。

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应是东京大学，关键人物为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以东京大学校友为主干组成的哲学会，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哲学”在日本的普及，不仅因为编辑出版了《哲学字汇》，更为重要的是，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自己的学问，即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宅雄二郎在1887年2月出版的《哲学会杂志》第1册第1号发表《哲学范围辩》，其中谈到1877年4月东京大学文学部设立史学哲学政治学科，没有用当时仍然流行的“理学”作为philosophy的译名而改用“哲学”，是因为此时science已经固定用“理学”作译名，必须改用其他译名，以凸显philosophy的特异性，易与其他诸学相区别。如此一来，西周助用以分别东西学问的蕴意无形中消失殆尽，“哲学”成为具有涵盖东西的普遍性的学问。

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哲学政治学科开办之初，所开哲学课程只有哲学史、心理学、道义学及一般哲学，同部的和汉文学科也只开设“欧米史学或哲学”，显然都在西洋方面，未及东洋。^[5]一旦“哲学”与“理学”分别对应为philosophy与science固定化，并且变成教育分科，则哲学有无东西之别的问题浮现出来只是时间问题。188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独立出哲学科，在第三、四学年课程中增设印度及支那哲学课。同时和汉文学科也在相同学年开设印度及支那哲学课。^[6]

究竟是谁提出本来西周助用于专指西洋学问的哲学具有普适性，因而西洋以外也有哲学，目前未见确切证据。三宅雄二郎在前引文章中论道，单就“哲学”而言，应指西洋哲学，但本来哲学分为东洋和西洋，东洋哲学包括支那、印度、波斯、犹太、埃及等，而西洋哲学包括希腊、罗马、英伦、独乙、佛兰西、伊太利等，其中支那、印度与希腊、罗马成抗衡之势。不过这样的认识带有后来附加的成分，担任支那哲学课教授的中村正直和岛田重礼，在汉文学方面固然出类拔萃，前者在明治思想界也有极高地位，对于如何讲授“支那哲学”却基本沿袭旧轨。其科目规定，印度及支那哲学第三年讲授佛教儒教的大意纲要，教科书为《八宗纲要》、《辅教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第四年纲要仍旧，加入老庄，教科书则增添《四教仪》、《维摩经》、《诗经》、《书经》、《易经》、《老子》、《庄子》。^[7]

1882年，东京大学哲学科的课程纲要有所变化，相关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明确将哲学分为东洋及西洋两部；二、从第二学年起讲授东洋哲学史。依据说明文字，东洋哲学史论述东洋哲学的沿革，以支那哲学和印度哲学为至要，而日本哲学主要出自支那哲学，支那后世哲学则大抵本于秦汉以前的哲学，所以首先要将孔孟老庄杨墨哲学的是非得失及其关系传统流派论证辨明，然后才能了解东洋的一般哲

学。如此，东洋哲学和支那哲学的概念框架逐渐成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东洋哲学史，除印度一脉而外，主要即是中国哲学史。

不过，从教学的具体内容看，仍是新瓶装旧酒，所列参考书目为《论语》、《孟子》、《杨子纂论》、《大学》、《墨子》、《中庸》、《荀子》、《老子》、《韩非子》、《庄子》、《杨子方言》、《列子》、《管子》、《淮南子》。至于第三、四学年的印度、支那哲学，无论科目纲要还是教科书，均原封不动地保持旧样。[\[8\]](#)

中村正直认为通汉文理解西学可以事半功倍，岛田重礼虽然竭力维系儒学地位，也只是反对一味偏颇，他们出任支那哲学课教授，至少表明并不排斥这样的名义。至于维持原有的讲法，或许习惯使然，或许心中仍有东西学问的分界，因而讲授东洋学问，还是依照原来的路径办法。1883年增设的古典讲习科，并不开列支那哲学课程，反而回到经史子文的旧例，再加上法制。[\[9\]](#)据中村正直报告，1881至1882年度所指导的哲学第四年生仅有贺长雄一人，先讲庄子轮讲、诗经讲义等课，后又增加书经、老子。而岛田重礼所教哲学第三年生，课程为孟子、老子、荀子。[\[10\]](#)可见他们都是在新的名义之下延续原有的讲学路数，没有尝试将东西学熔为一炉，或是借西法创造出新的“哲学”。

可是，后来中江兆民针对东京大学的“东洋哲学”说，却断言：“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只有考古学家、经学者和宗教家，并且点名批评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等人，“自己标榜是哲学家，社会上也许有人承认，而实际上却不过是把自己从西方某些人所学到的论点和学说照样传入日本”[\[11\]](#)。中江兆民的这些话，虽然近年来引起关注“中国哲学”发生史的学人的注意，却着重于“哲学”的有无，而忽略其本事。其实中江兆民此番话确有实指，所批评的是以东京大学为主导而发生的“哲学”泛化，并指明主要代表人物为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背后的史事恰是认识“中国哲学”发源的关键。

井上哲次郎是东京大学最早专攻哲学的学生，1880年7月毕业，本来希望留学欧洲学习哲学，因有人反对未能实现。这时支持其留学计划的东京大学三学部综理（即校长）加藤弘之嘱其编撰《东洋哲学史》。此举与东京大学哲学科后来增加东洋哲学史课程显然有着密切

联系。鉴于中村正直、岛田重礼对于此事的相对被动，这一变化当出于加藤弘之主动，而且上述相关科目纲要的说明文字，很可能也是加藤的意思。如此，则加藤在哲学由单纯西洋转为东西各有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藤提出的设想能否实现，还须找到合适的具体人选。东京大学哲学科虽然增设东洋哲学史课程，但缺少胜任的师资，此后两年内并没有实际开课。这时抱着编撰东洋哲学史目的进入文部省编辑局的井上哲次郎，因为以编纂教科书为主业的该局不承认《东洋哲学史》是教科书，不能如愿，又与文部省的官僚主义不相适应，仅仅一年，便专门找到加藤弘之，表示文部省不适合自己。加藤于是提议其到东京大学来编纂《东洋哲学史》。加藤弘之选井上哲次郎担任《东洋哲学史》的编纂，一方面固然由于实际上别无其他更佳选择，另一方面，则因为井上哲次郎已经显示出对于哲学的执着追求和在哲学的框架下沟通东西洋思想学问的取向和能力。

1881年4月，也就是东京大学文学部刚刚独立的哲学科以及和汉文学科增设印度及支那哲学课之时，井上哲次郎就与和田垣谦三、国府寺新作、有贺长雄等人依据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弗列冥（William Fleming）的《哲学字典》，大幅度加以扩充，编成《哲学字汇》。据井上哲次郎所写的绪言，其书有三点增补：1. 原书不多载近世之字，遍搜诸书，增加甚多；2. 前人的翻译，“妥当者尽采而收之，其他新下译字者，《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五车韵瑞》等之外，博参考儒佛诸书而定，今不尽引证。独其意义艰深者，掺入注脚，以便童蒙”；3. 哲学所使用的其他学科词汇的字义，以括弧标出。据三年后再版改订增补本时有贺长雄的绪言，《哲学字汇》一书虽然由几位东大同窗合撰，“井上君之力居多”。这本由井上哲次郎主导的《哲学字汇》，因为全用汉字对译，所以还附录了所有汉字的清国音符。

这一时期日本的翻译事业渐趋兴盛，因为各自用词不一，产生诸多问题。1883年矢野龙溪的《译书读法》指出：阅读翻译书的困难之一，是翻译者对同一西文词汇使用不同的汉字，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指称不同事物。而《哲学字汇》的功能恰好是统一译语。该书出版两年即告售罄，哲学也随之日盛一日地流行起来。由此可见，“哲学”一词虽由西周助发明，原来仅限指与东方儒学相对的西方哲学，同时所用的译名还有“希哲学”、“理学”、“穷理学”、“希贤学”、“天道”、“圣学”以及音译的“斐鲁苏非”等等。《哲学字汇》的

编辑出版，不仅确定了“哲学”作为philosophy的专门翻译名词，而且经过几度调整增补，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系统的专业术语。

尤其重要的是，西周助虽然使用汉字翻译，却并未刻意从中国典籍中寻求解读。《哲学字汇》所收词汇，较弗列冥的《哲学字典》增加一倍有余，而井上哲次郎等人有意从儒佛经典取名定义的解读取向，与西周助明显有别。该书没有详尽注释所本的全部中国文献，除井上哲次郎的绪言指名的几种之外，注脚中涉及的相关经典包括《易经》、《书经》、《庄子》、《中庸》、《淮南子》、《墨子》、《礼记》、《老子》、《传习录》、《俱舍论》、《起信论》、《圆觉经》、《法华经》以及杜甫、柳宗元的诗文，涉及的词汇有形而上、转化、俱有、解脱、凝聚、轮回、伦理学、无限观等。其余广泛参考的儒佛诸书，因各词汇未加标注，有待进一步查考深究。^[12]此书对于哲学的普适化以及“东洋哲学”或“支那哲学”的合理化，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882年3月，井上哲次郎就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教授，先到该校的编辑所专门从事《东洋哲学史》的编纂，等到书稿大部分写出，才开始上课讲义。^[13]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井上哲次郎的《东洋哲学史》是否付梓，2003年出版的《井上哲次郎集》没有收入这部书。不过，此书肯定以文本的形式存在过。与井上哲次郎同事兼同行的前辈岛田重礼不仅曾经阅读，而且做出评价。1884年，井上哲次郎终于实现留学德国的夙愿，岛田重礼在《送井上君迪之欧洲序》中写道：

大学助教井上君迪，素覃心西洋哲学，旁涉经史百氏，曾著东洋哲学史，自孔曾思孟，至杨墨老庄申韩之徒，凡关哲学者，囊括罔遗，论学术之醇疵，辩流派之原委，虽时有不合者，其言凿凿有稽，绝不为架空凭虚之说。余读之，适然惊叹，伟其天分甚高，学殖甚富也。……然人之才学，随境而长，君迪年少而气锐，海外之行，不止今日，他年行数万里之路，读数万卷之书，学殖益富，才识益进，至欧人称曰哲学东矣，则其适然惊叹者，岂惟余辈而已乎哉。^[14]

借由岛田重礼蕴涵丰富的文字，可以获悉：1. 井上哲次郎的确写出了《东洋哲学史》；2. 该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上古“哲学”；3. 与中村正直、岛田重礼等人不同，井上对西洋哲学颇有知识，所讲经史诸子，已经不是中国或日本的固有讲法，而是以“哲学”为框架进行取舍组织，虽然时有不合，假以时日，却可以建构起东亚哲学。

由于文本的缺失，不易深究井上哲次郎用西洋专属的“哲学”来条理东洋思想的目的及具体做法。然而机缘巧合，与之相关的两位人物的作为，或许有助于理解其本意。一位是担任井上哲次郎哲学史教师的美国人恩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フェノロサ），另一位是井上哲次郎的大学同班同学兼舍友冈仓天心。井上哲次郎自称费诺罗萨对其哲学兴味的加深，以及思想倾向给予很大影响，虽然语焉不详，将西洋学问对应于东洋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费诺罗萨和冈仓天心是明治日本创立所谓“东洋美术”的最重要人物，尽管两人的观点有所不同，后来更是分道扬镳，却分别构建出与西洋美术对应的“东洋美术”。此事后来看似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但在近代的东亚，在西学的猛烈冲击之下，人们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这样的对应一方面可以面对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一方面则有助于在东亚取得解读古今思想学问的话语权。冈仓天心编织“东洋美术”的谱系，目的之一，就是重构以日本为中心正统的东亚美术传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美术”的地位。而后来中国的学人正是在冈仓天心及其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下，重新确立文人画的美术和审美价值，才避免因画陷入国学、国医等国字号事物所面临的尴尬，并采取有效措施保存保护遗留下来的历代古物古迹。当然，如此一来，也难免用了西洋的美术眼光重新审视本国固有的作品，从而陷入日本式话语的笼罩之中。

相比之下，井上哲次郎或许没有冈仓天心那样显著的政治目的，而且两人的“东洋哲学”与“东洋美术”有着明显差异，后者还要分别东亚各国的高下，前者主要是用哲学框架重新条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不过，就“哲学”而言，井上哲次郎的抱负绝不亚于冈仓天心之于“东洋美术”。留欧途中，他赋诗道：“自此所期唯一事，西洋哲学欲穷源。”留学期间，又于梦中得句：“壮图千杰出，哲学万雄兴。”^[15]其对于东洋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实际影响，则与冈仓天心之

于东洋美术相当近似。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其一，使“哲学”由他者变成自己的事物，大幅度扩张了“哲学”在日本思想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其二，通过重新条理解读东亚的思想，获得掌握了在“哲学”架构下解释东亚历史文化和思想学术的主导权；其三，由于其“东洋哲学”以中国古代思想为主干，因而实际上建构起一套“中国哲学”的体系。

1883年9月，井上哲次郎按照其编撰的教科书所建构的系统，在东京大学讲授东洋哲学史，听讲者包括井上圆了、三宅雄二郎、日高真实、棚桥一郎、松本源太郎等十余人。^[16]其中好几位稍后就成为在日本鼓吹“哲学”尤其是“东洋哲学”和“支那哲学”的骨干，分别陆续撰写过专题著作。1884年，由井上圆了发起，于东京大学创立哲学会，会员包括加藤弘之、西周助、中村正直等29人，在纯正哲学的名义下，将哲学定位为具有统合一切学问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学问，并形成印度、支那、西洋各家哲学对应交流的格局，以便共同探究真理。^[17]该会通过举办演讲、发行杂志、编辑书籍等活动，加速扩大哲学的影响。后来又推加藤弘之任会长，外山正一任副会长，三年间开会26次，会员发展到70人。所举办的演讲除西洋哲学外，还包括印度哲学及佛教（9次），中国及东洋哲学（3次）。其中第二次会由井上哲次郎演讲“支那哲学概论”，第十七次会由岛田重礼演讲“东洋哲学概略”、有贺长雄演讲“孔门哲学或考”^[18]，不仅明确了“支那哲学”的概念，而且确立了日本哲学界西洋、印度、支那三分天下的局面。

以往学人认为幕末明治初期日本的中国学限于朱子和阳明学，而井上哲次郎的“支那哲学”，则包括孔孟和诸子，这不仅已经下至清学，而且对后来中国学人多以诸子学对应哲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井上哲次郎关于东洋、支那哲学的多种论著，是清季民初翻译次数最多的哲学类东学书籍。

“哲学”概念的泛化甚至滥用，在哲学会内部也引起反弹。会员西村茂树质疑将学问与宗教相混淆，尤其郑重指出：“哲学”本是西洋的学问，所谓印度哲学、支那哲学等等，其实是将各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将佛学、儒学称之为“东洋哲学”，恰如将“哲学”称为西洋佛学或儒学一样荒唐。“哲学”旨在探究真理，与儒、佛诸贤长于学德、追求修身养性截然不同。他主张日本的哲学应着重于三方面：其一，教育后进；其二，用哲学方法考察东方事物；其三，在东

方发明新规。^[19]西村茂树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极为重要，虽然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哲学”在东亚继续扩张版图，但也时时遭遇概念与事物不相啻衲的尴尬。因而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有识之士不断用不同的方式或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提出西村的质疑，考验着哲学界的智慧与学识。

东京大学的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将“哲学”与东洋相连接，使之由西周助的西洋学问变成普遍性学问，目的是用西洋philosophy解读中国思想，借此掌控东亚文化圈的话语权。尽管“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其后却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的习惯。中国在接受和质疑这一途辙的过程中，演化出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探究“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入华进程以及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思维三种不同的取向，对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泰西哲学与中学

“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进入中国的大致进程，前人已经有所描述。^[20]其间中国经过抗拒西潮的节节败退，不仅中西乾坤颠倒，而且进入转由东学学习西学的阶段，接受者有之，附会者有之，困惑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仔细分别，中国学人接受“哲学”之始，持异议者，如文廷式和严复，主要是就“哲学”一词能否准确翻译philosophy的本意，以及如何安置这一概念背后的学科架构提出异议。因为此前中国用于philosophy的译名已有多种，指向相近，含义各异，症结在于对西学的认识把握各不相同。其实，欧洲各文化系统不同学科的内涵外延，错综复杂，并无所谓统一的西学。接触的渊源和取径因人而异，见解自然有别。

最早将中国古代学说如儒学视同泰西philosophy的，其实是来华西人或早期汉学家。至于接受日本发明的“哲学”，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一是介绍日本的哲学。如黄遵宪对东京大学哲学政治及理财学科的介绍；康有为以1893年日本《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为底本改编的《日本书目志》，在《理学门》专设“哲学”一类，收书22种，图史等门也著录了一些哲学书目。二是新式学科在建

制，包括教育和学术两方面。如宋恕、蔡元培、吴汝纶等人构想建立以西学为范型的新学科系统，必须将哲学安放到适当位置。三是学习或翻译泰西哲学。这时基本还是将“哲学”视为他者的事物，尚未内化，也就不存在能否对应中国固有学问的问题。

如果说蔡元培、王国维等人在教育和学术的学科建制方面影响中国人接受“哲学”起了很大作用，梁启超则不仅迅速传播“哲学”概念，更重要的是沿用日本人的“支那哲学”，作为所办报刊的专栏名称，将中国固有的各种思想学说纳入“哲学”的框架之中。1897年梁启超读了《日本书目志》，已经注意到哲学。戊戌政变梁亡走日本，很快就与日本的哲学界建立联系。1899年1月2日出版的《清议报》第二期，即开辟《支那哲学》专栏，刊登谭嗣同的《仁学》及梁启超的校刻序。稍后，梁启超的序又刊登在3月10日出版的日本《哲学杂志》第14册第3号上，该刊说明是应作者的要求而登。同年5月13日，梁启超参加了日本哲学会的春季“会合”，与日本“诸贤哲相见”，并向日本同仁介绍了康有为“所言哲学之一斑”，包括“关于支那者”和“关于世界者”。显然，由日本哲学界加工而成形神兼备的“支那哲学”，使得本来就容易附会的梁启超不假思索地照单全受，并向国内士林和青年学生传播扩散。

不过，并非所有中国人都顺理成章地接受“哲学”，或者说还有如何接受以及接受什么的问题。1902年9月，《新世界学报》发刊，主办者为是年5月杭州中学堂风潮离校的教师陈黻宸和退学师范生汤尔和、马叙伦、杜士珍等人，该报分为经学、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地理学、物理学、理财学、农学、工学、商学、兵学、医学、算学、辞学、教育学、宗教学十八门，不少栏目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唯独心理学一门，所刊登的文字用现在的观念看多为“哲学”内容。据陈黻宸所撰该报《叙例》：“周秦大家，东西哲学，梵辞精奥，语录杂糅，斯皆心理学之荦荦大端欤。”^[21]可见其并非不知哲学之名，也不排斥哲学，只是认为应以心理学涵盖哲学。

《新世界学报》的分类和与此相关的说法，引起《新民丛报》的质疑，在评介时专门提出讨论，指其栏目分类“颇欠妥惬”：

如其中心理学者一门，最为鄙意所不敢苟同。统观三号，其心理学门皆论哲学也。日人译英文之Psychology为心理学，译英

文之Philosophy为哲学，两者范围，截然不同。虽我辈译名不必盲从日人，然日人之译此，实颇经意匠，适西文之语源相吻合，未易遽易之也。吾度著者未尝不知东籍中此两字之区分，然其意以为一切哲学，皆心识之现象也。故吾不从东译，而定以此名，鄙人窃以为误矣。哲学之大别，有唯心与唯物之两派，物者，正心之对待也。今惟以心学名之，不几将唯物论全行抹杀乎。若以为所研究之客体，虽有心物之殊，而能研究之主体，惟在人心，故定以此名。然则宗教学、政治学、法律学，乃至一切无形有形之学，何一非以吾心研究之，然则并此诸学而名心理学可乎。且既以Philosophy冒此名，则于Psychology又将以何语译之。此吾所不敢苟同也。Psychology与Ethics（即伦理学）皆为Philosophy中之一门，吾以为宜立哲学一门，而以心理、伦理皆入之，似为得体矣。[\[22\]](#)

从《新民丛报》编辑人员的情况看，这些没有标明作者的文字，很有可能是出自梁启超的手笔。

对于《新民丛报》的批评，《新世界学报》全面回应道：

人群进化之渐，即从人神经所已有之物，徐以引进所未知之途。故陈义不嫌其过高，而名词必从其所习。中人向解哲字颇狭，鄙意如英文之Philosophy，日人虽译为哲学，中人宜译为理学。古书理字范围甚大，鄙人尝谓世人专指宋儒为理学，荒谬无其伦比。鄙报初欲设理学一门，而以周秦汉宋各学暨东西哲学家言尽入之，然终以世人误解理学已久，未易领会，而中国古文，皆以心范围一切，鄙报宗旨，不欲人尽废古书，故不敢遽从东译，而暂定以此名。亦自知其名义未当，徒以诱世苦心，因时通变，即大教所谓未尝不知东籍中此两字之区分，以为一切哲学，皆心识之现象者，不觉自忘其齟齬不安也。若英文之Psychology为心理学，以读我中国古书，亦似多窒碍难通之处，则亦以古人之文，皆以心范围一切故也。唯心唯物，出佛氏旧文，然佛书视心字范围亦甚大，其言唯心者，亦暂对唯物而言耳。《大学》以知与物对，即佛氏亦有以识以性与物对者。然则英文之Psychology，舍心理亦未必无语可译矣。

该报针对《新民丛报》提出的所有无形有形之学皆以心研究，而不能都称为心理学的质疑，认为各种学都可以哲学研究之，因而日人各科学均有相应哲学之名，若立哲学门而仅以伦理、心理入之，也失之太狭。[\[23\]](#)

陈黻宸是清季主张分科治学的先行者之一，认为“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并且相信“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24\]](#)。只是如何具名，仍有偏重东译还是古书的取舍。

除了对“哲学”的译名有所质疑，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对于无论泰西还是东洋、支那的“哲学”，接受起来都鲜有迟疑。首次公开和正面的争议冲突，1903年出现在张之洞、张百熙和王国维之间。前人关于此事，多将二张视为一体，而放进中西新旧进步保守的解释框架。其实反对者以张之洞为主动，张百熙的旨意与之有所不同。1902年10月底，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端方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办学要旨八条，其中第八条为防流弊，其要义有三，一曰幼学不可废经书，二曰不必早习洋文，三曰不可讲泰西哲学。

中国之衰，正由儒者多空言而不究实用，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于佛家经论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爱恶攻取之故。盖西学密实已甚，故其聪明好胜之士别出一途，探赜钩深，课虚鹜远，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25\]](#)

按照张之洞的看法，哲学仍是泰西所有，与先秦名学、佛家经论相似，别出心裁，不图实用，学堂应究实理，不尚空谈。而他真正担忧的，则是新学士子借此昌言煽惑，任意抨弹伦理国政。所指实事至少有二，一是梁启超的《清议报》借“哲学”名义进行宣传，二是据说其时上海通日文者如叶瀚等，“往往自谓通教育、哲学两科，凡理化动植无不当行，辄挟所知以难人”^[26]。而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和参与过上海国会的人士，正是张之洞的心腹大患。新党对哲学的偏好借重，自然使得张之洞如鲠在喉，不去不快。

不久，管学大臣张百熙遵旨议复张之洞的奏折，他比照《钦定学堂章程》，认为高等学堂应设诸子、名学科目，“诸子一门，列入四部，此中国数千年相传之旧学，其说往往与西人之哲学相通，可为文学专科之参考。……至于名学一科，中国旧译为辨学，日本谓之论理，与哲学判分两派，各不相蒙，共大旨主于正名实，明是非，尚无他弊。盖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鹜广志荒之弊，名学主分别条理，迥非课虚叩寂之谈。此钦定章程中所以必取名学，而哲学置之不议者，实亦防士气之浮嚣，杜人心之偏宕，与该督等用意正同”^[27]。

清季学制多仿日本，而在整个系统之中，哲学仅及高等以上，至于学问分科方面，哲学的归属与所属，或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各家看法有别。如蔡元培和吴汝纶所据日本人士的讲法，即有所不同。况且还有哲学与诸子的中西属性问题。张百熙回应张之洞，顺势之外，也有不以泰西哲学为普适性学问之意，进而说明取名学而弃哲学的用心，实则其并不像张之洞那样断然排斥哲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期间主持制定的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依照西学通例，翻译课本，分为统挈（分名、数两宗）、间立（分力、质两门）、及事（治天地人物之学）三科，此外各种专门专业之书，包括哲学在内，“但使有补于民智，则亦不废其译功”^[28]。

二张的两折披露于世，“于是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为此，已经沉浸于哲学数年的王国维专门写了《哲学辨惑》，从五个方面论证哲学为有益无害之纯粹科学，不能以防流弊为名因噎废食，不可以有无实用为断；中国讲求教育，而教育的真善美即为哲学各科的主旨；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诸子、六经及宋儒之说，多深入哲学问题；中国古书散乱残缺难解，西洋哲学则系统严密，治中国哲学，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为此，他强调“专门教育中，哲学一

科必与诸学并立”。为了避免国人不知哲学性质而诟病其名义，他主张“正名”为“理学”，以息争论。^[29]

按照《钦定学堂章程》，大学堂于文学科下，已设理学之目。虽然未必如王国维所论，是用哲学观念讲理学问题，至少符合其宋儒所讲也是中国固有哲学的观点。几年后，王国维又发表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文章，继续抨击张之洞指哲学为有害无用之外，尤其强调外来哲学不仅与中国古来学术相容，而且为研究固有学术所必需的参照。只有兼通世界学术，才能发明光大我国学术。张之洞不仅排斥哲学，且摈弃诸子，局限理学于道德哲学，而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相等。因此，王国维主张文学科大学增设理学科（即哲学），并在其他各科增设“哲学概论”等课程。^[30]

除了严复等少数人外，近代国人大都缘着东学的途径接受哲学，反对哲学最力的张之洞，虽然对新名词不以为然，却是典型的东学派。今人论及近代中日两国维新与洋务的差距，更多着眼于制度经济学军事等能够目验的层面，实则和精神世界的学术文化领域，两国不仅时间相差20年，而且日本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包括新名词在内的话语体系，循着日本富强之道前行的中国人，很难摆脱其思想的控制。在中西学乾坤颠倒的背景下，国人以为用中学比附西学是进入世界体系的正途，不料在失去自我的同时，未必能够融入世界。从以西学解读中国，到回到中国看中学乃至西学和世界，或许有助于消除对立和紧张。

一介布衣王国维的批评当然无法改变重臣张之洞的看法，清季新式学制体系中一直没有哲学的正式合法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在当时的思想界没有影响。相反，在海内外各种中文报刊上，哲学成为不少人讨论的话题，翻译介绍之外，用哲学的观念解释中国古代思想者也不乏其例，如1905年王国维的《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政艺通报》），1906年刘师培的《中国哲学起源考》（《国粹学报》），1907年王黻炜的《哲学家荀卿》（《新译界》）等。同时，哲学也没有因为学务大臣张之洞的禁止而完全绝足于新式学堂。一些民立学堂课程中早有哲学一项，官办的北洋师范学堂奏定章程，地理历史类分科应授科目赫然列有“哲学”^[31]。1907年江苏教育总会上书学部，请改南菁高等学堂为文科高等学校，其本科分哲学、文学两部，分别招生，文学部也要开设哲学概论课程。^[32]1910年学部所奏

《改定法政学堂章程》，其正科的政治门课程，包括政治哲学。^[33]京师大学堂虽然没有哲学课程，译学馆所藏教科书，也包括《西洋哲学史》、《哲学泛论》、《宗教哲学》，而大学堂要求购办的书籍，则有《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哲学及心理学辞林》、《哲学历史》、《哲学二案》、《哲学简史》等多种。^[34]哲学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地高歌猛进，却已经润物无声地渗入华夏大地，逐渐成为思想界新的利器。

三 “中国哲学”的取向

张之洞带些蛮横的排斥态度，促使人们专注于努力争取哲学的合法地位，与哲学相关的其他问题反而很难得到充分展现。进入民国，哲学的顾忌不复存在。1914年北京大学设中国哲学门，开中国哲学史课程，哲学正式合法进入学制体系。这一变化，使得哲学很快升温，成为民初相对沉闷的思想界活跃的先声。1916到1919年，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一批哲学著作先后出版，原来被打入另册的哲学开始风光起来，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很快成为争论的焦点。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做法，公然标明：“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蔡元培为之作序，推许之余，更加断言：“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35]这样的说法，正是落实先前王国维与张之洞论争时的主张。

不过，这时的王国维已经开始反省自己早年的论断，认为用西洋哲学观念不能切当理解古人之说，他批评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本道：

如执近世之哲学以述古人之说，谓之弥缝古人之说，则可；谓之忠于古人，则恐未也。夫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时而说天道，时而说人事；岂独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复如此。幸而其所用之语，意义甚为广莫，无论说天说人时，皆可用此语，故不觉其不贯串耳。若译之为他国语，则他国语之与此语相当者，其意义不必若是之广；即令其意义等于此语，或广于此语，然其所得应用之处不必尽同。故不贯串不统一之病，自不能免。而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译古书之难，全在于是。[\[36\]](#)

王国维指古人之说未必都有条理，应当也是今人的条理，实则古人自有其条理，只不过不能用后来的条理去条理而已。不过他毕竟察觉到中西古今的条理不能统一贯穿，否则必失各自原有的本义。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乃至蔡元培，后来都逐渐察觉西洋哲学与中国固有思想的不相凿枘，放弃早年随意的附会，转取慎重的态度。1916年曹恭翊编撰《儒哲学案合编》（1918年1月出版），同一本书里面，将中国儒学与欧洲哲学分述，而不用哲学的观念看儒学，不强求削足适履地将中西学术熔于一炉。

针对胡适、冯友兰等人热极一时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立场态度各异的学人纷纷提出批评，反复指出中国的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明显有别。1928年，张荫麟撰文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所论最能击中要害，他说：

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presuppose）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焚耳。[\[37\]](#)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进一步详细论道：

欧洲各国的哲学问题，因为有同一来源，所以很一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如果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与欧洲哲学问题一致，那么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哲学问题。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既然如此，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问题。这个问题是否是一重要问题，要看写哲学史的人的意见如何。如果他注重思想的实质，这个问题比较的要紧；如果他注重思想的架格，这个问题比较的不甚要紧。若是一个人完全注重思想的架格，则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是哲学问题；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也都可以是哲学问题。至于他究竟是哲学问题与否？就不得不看思想的架格如何。……“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在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地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金岳霖表面的两可，在傅斯年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后者早年就认为，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洋哲学相比，以历史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1926年他听说胡适要重写《中国古代哲学史》，表示自己将来可能写“中国古代思想集叙”，而且提出若干“教条”，包括：1. 不用近代哲学观看中国的方术论，“如故把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它，不是割离，便是添加。故不用任何后一时期，印度的、西洋的名词和方式”；2. 研究方术论、玄学、佛学、理学，各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而且不以二千年的思想为

一线而集论之，“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38\]](#)。

稍后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又说：

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那样子而止，就是柏拉图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自贷嘉、来卜尼兹以来的。我们若呼子家为哲学家，大有误会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现在我们姑称这些人们（子家）为方术家。思想一个名词也以少用为是。盖汉朝人的东西多半可说思想了，而晚周的东西总应该说是方术。[\[39\]](#)

回国后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写了《战国子家叙论》，开篇即“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品，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他认为：

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彼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则知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意的斐洛苏非一科，“中国哲学”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明季译拉丁文之高贤不曾有此，后来直到严几道、马相伯先生兄弟亦不曾有此，我们为求认识世事之真，能不排斥这个日本贱货吗？[\[40\]](#)

傅斯年的看法摆脱了晚清以来比附中西的窠臼，如果放进王国维和张之洞的争议之中，学理上似与后者的判断相符，很值得当时和后来自认为中国哲学史家的深思。但那时的中国哲学史家正在热衷于建

构中国哲学史，后来则因为中国哲学史已是专门研究者从事的职业乃至事业，傅斯年的批评有意无意地逐渐被淡忘。靠中国哲学成名的胡适对于用哲学解读中国古代思想或已习以为常，或是碍于面子，对于傅斯年的批评，起初本能地有些抵触，后来却不仅接受，而且态度更为彻底。他大概觉悟到改换名称对于正名究实有百利而无一弊，所以不再使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目，一律（包括旧著）改称思想史，甚至到处讲哲学系应该关门。^[41]反倒是傅斯年回国后就了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的职位，尽管同时仍然大讲不能用“中国哲学”指称古代思想，毕竟觉得中国以外的哲学还应该讲，不认为哲学系要停办。

然而，其他学人并未放弃对金岳霖所说另一种可能性的追求，熊十力甚至认为：

一般人都拿科学的眼光来看哲学，所以无法了解哲学，尤其对于东方的哲学更可以不承认他是哲学。因为他根本不懂得哲学是什么，如何肯承认东方的哲学？我觉得在今人底眼光里好似东方硬没有学问。本来哲学上的道理能见到的人便见得这道理是无在无不在，不能见到的人也就没有什么。

依照熊十力的说法，指东方没有哲学就等同于说东方没有学问，不承认东方有哲学是因为不懂哲学。哲学有无的关键从东西转到科哲，所争论的问题迥然不同。他与林宰平之间曾就哲学一词的当否交换意见，后者“谓西人‘哲学’一词，本为知识的”，而熊十力“以中国学问为哲学，却主张知识与修养一致，此恐为治西洋哲学者所不许，盍若不用哲学之名词为得”。其实熊十力曾一度佩服张东荪所说“于宗教哲学外宜有一种东西，非宗教，非哲学，而亦兼此二者之性质”，并且“以为东方学问当属此类”。之所以最终还是不赞成张东荪之说，是认为学术只宜分科哲两途，不必另立名目，以免过于烦琐。他还声称：“欧人言及中国哲学，辄与宗教并为一谈，各国大学于哲学科目中并不列入中国哲学，或则于神学中附及之。此则于中国学问隔阂太甚，而为中西文化融通之一大障碍，私怀所常引为遗憾者也。”

不过，熊十力也知道中西学问的取径内容有所不同，“哲学之功，中圣深于体认，西贤极其思辨”。反对当时中国的各大学治哲学者，“一意袭西人肤表，以混乱吾先哲意思，究义不根于实，立言浮乱无纪。教者学者更相授受，向后将成何局？”“若乃探穷中土哲学思想，而亦袭取西洋皮毛以相牵合，则彼己两方根本精神俱失，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强调中西学术各有特色，须不设门户，取长补短，融会贯通。^[42]他和冯友兰、牟宗三等相继努力发掘总结提升中国哲学的体系，以求建立中国哲学的系统。当然，也有海内外学者认为，冯友兰、熊十力的努力，仍然在史学与哲学之间徘徊，未能真正变成哲学；而牟宗三虽然建构成型，却使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资料。言下之意，这样的努力还是作茧自缚。^[43]

冯友兰抗战期间撰写的“贞元六书”，是其建构中国哲学的代表作。朱光潜的《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一文论道：

中国哲学旧籍里那一盘散沙，在冯先生的手里，居然成为一座门窗户牖俱全底高楼大厦，一种条理井然底系统。这是奇迹，它显示我们：中国哲学家也各有各的特殊系统，这系统也许是潜在底，不足为外人道底，但是如果使它显现出来，为外人道，也并非不可能。

看到冯先生的书以后，我和一位国学大师偶然提到它，就趁便询取意见，他回答说，“好倒是好，只是不是先儒的意思，是另一套东西”。他言下有些谦然。这一点我倒以为不能为原书减色。冯先生开章明义就说：“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他在书中引用旧书语句时尝郑重地声明他的解释不必是作者的原意，他的说法与前人的怎样不同。这些地方最足见冯先生治学忠实底态度，他没有牵强附会底恶习。他“接着”先儒讲而不是“照着”先儒讲，犹如亚里士多德“接着”柏拉图讲而不是“照着”他讲，康德“接着”休谟讲而不是“照着”他讲，哲学家继往以开来，他有这种权利。^[44]

朱光潜的辩词为“贞元六书”开脱，仅仅从建构中国哲学的角度，当然可以称为“接着”讲，而《中国哲学史》却不能绕开“照着”讲而直接进入“接着”讲的阶段，亦即所谓求其是必先求其古。可是，建构中国哲学史，势必要用哲学观念条理古代思想。朱光潜也知道：

我们一般浅尝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人们，常常感觉到这两种哲学在精神和方法两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就精神说，中国民族性特重实用，哲学偏重伦理政治思想，不着实际的玄理很少有人过问；西方哲学则偏重宇宙本体和知识本身的性质与方法之讨论，为真理而求真理，不斤斤计较其实用。就方法说，西方哲学思想特长于逻辑的分析，诸家哲学系统皆条理井然，譬如建筑，因基立柱，因柱架梁，观者可以一目了然其构造；中国哲学思想则特长于直觉的综合。从周秦诸子以至宋明理学家都喜欢用语录体裁随笔记载他们的灵心妙语，譬如烹调，珍味杂陈，观者能赏其美，而不能明白它的经过手续，它没有一目了然的系统。[\[45\]](#)

在这方面，近代学人所致力，果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古人本意，并使得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还是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往往强古人以就我，陷入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越远的尴尬，想必仍然言人人殊。

史事表明，学问的科哲两分，并非天经地义，用哲学来建构中国古人思想的系统，很难完全不加比附，否则不像哲学；而一旦比附，又难免格义附会。即使作为不得已的方便名词，也不如仿傅斯年、胡适的成例，改用中国思想史，以免朝着哲学的方向做无谓的努力。如发端中国哲学的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科，上世纪末就已经自觉改称中国思想史。若用哲学观念发明古代思想，目的不在标榜认识古代，而是直接面向现在和未来，或许能循着新儒家的旧途径，丰富提升中国人的思维能力。犹如深通佛教的宋儒，避名居实，取珠还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46\]](#)，则有益于增进民族智慧。这也是“哲学”在中国所起的实际效用。

跨文化传通本来就充满误会，中国既往没有philosophy，“哲学”是近代以来东亚人心中的philosophy。同样，欧洲也没有“哲学”，更没有“中国哲学”。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就不高明的观念，显然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其实中国没有哲学与欧洲没有儒学、理学大同小异，无所谓先进落后之分。明治日本借用汉语创造“哲学”，试图对应philosophy之外，起到掌控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话语权的作用。因此“哲学”在明治日本和中国的语境不同，含义各异。

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同时给东亚尤其是中西学乾坤颠倒的中国提供了重估（无论附会还是用外来系统条理本来材料）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分为三类：

1. 用哲学概念重新组装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这也是迄今为止一般中国哲学史的取径。如此可以附会philosophy，却于理解古人思想无益，而且无论成败，内外均不讨好。

2. 梳理“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进入中国的发展演化，后一方面，包括“哲学”与“中国哲学”两部分。这也是撰写《“中国哲学”史》的主题及主旨。

3. 效法前贤，面向未来，尽力吸收philosophy以建构中国哲学，丰富和发展现代中国人的思维。第二类史事已经体现第三类努力，只是取向或有可议。三者互有重叠，往往不易分别，但还是各有侧重。“哲学”在中国的前途如何，后一领域的成效无疑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话语权的格局。这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宪政时期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政府的决策层出现东学压倒西学的情形，而且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此后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相当于日本大正时代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参考、借鉴甚至模仿东学著述，仍是相当普遍的情形。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与西相对的是东而不是中，便是东西两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时日本对华野心日渐暴

露，加上“二十一条”的刺激，国人一般不愿注明所参考征引的东学论著。这也是坊间甚多抄袭传闻的起因。

受此制约，国人一方面得以重建重估文化价值，一方面则深陷日本式对应西学解读中学的缠绕和困扰。迁延演变至今，这些概念名词已经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认识前提或工具，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义本相。就此而论，在思想学术领域来一次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为迎接世界的中国时代来临做好精神文化准备，此其时也。

[1] 本篇成文前，曾于2008年分别在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研究会和孙江教授等在日中国学者的研究会报告，听取意见。在资料搜集方面，得到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2] 参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景海峰编：《拾薪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景海峰：《从“哲学”到“中国哲学”——一个后殖民语境中的初步思考》，《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4] 《學問ハ淵源ヲ深クスルニ在ルノ論》，《學藝志林》第二册，明治十年八月，第1—9页。

[5] 《東京大學法理文學部一覽略（明治十一年）》，丸家善七，第26—29页。

[6] 东京大学法理文三学部编纂：《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一覽（從明治十四年至明治十五年）》，丸家善七，明治十五年四月，第35—38页。

[7] 东京大学法理文三学部编纂：《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一覽（從明治十四年至明治十五年）》，第94—97、174页。

[8] 东京大学法理文三学部编纂：《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一覽（從明治十五年至明治十六年）》，丸家善七，明治十五年十二月，第113—114页。

[9] 东京大学法理文三学部编纂：《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一覽（從明治十六年至明治十七年）》，丸家善七，明治十七年二月，第50—54页。

[10] 《東京大學第二年報》，第221—223页。

[11] 中江兆民著，吴藻溪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5—16页。

[12] 《哲學字彙》、《改訂増補哲學字彙》和《英独仏和哲學字彙》，均为日本名著普及会1981年复刻版，由飞田良文解说。

[13] 《井上哲次郎自伝》，岛蘭进、矶前顺一编纂：《井上哲次郎集》第8卷，东京：株式会社クレス2003年，第8—9页。

[14] 《篁村遺稿》卷中，第3—4页，大正七年九月，岛田均一刻。中村正直、岛田重礼等人，各有汉文文集，一般研治明治日本史的学人利用不多。而幕末明治日本思想界兼采中、东、西学，且通过汉语古典理解西洋，忽略日本的汉文书，不免片面，难以深究。例如，最早发明使用“支那哲学”的东京大学，近年来相关学人已经放弃“中国哲学”概念，并且努力探究当年何以、如何发明“支那哲学”，却始终不得要领。

- [15] 福井纯子：《井上哲次郎日记》，《東京大学史紀要》第11号，1993年3月，第25页。
- [16] 《井上哲次郎自伝》，第8页；《巽軒年譜》，島藺进、磯前顺一编纂：《井上哲次郎集》第8卷，第74页。
- [17] 加藤弘之：《本會雜誌ノ發刊ヲ祝シ併ヤテ會員諸君ニ質ス》，《哲學會雜誌》第1册第1号，明治二十年二月五日，第1—4页。
- [18] 井上圆了：《哲學ノ必要ヲ論シテ本會ノ沿革ニ及フ》，《哲學會雜誌》第1册第2号，明治二十年三月五日，第41—44页。
- [19] 西村茂树：《質疑》，《哲學會雜誌》第1册第10号，明治二十年十一月五日，第517—529页。
- [20] 陈启伟：《“哲学”译名考》，《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 [21] 《新世界学报》第1号，1902年9月2日，第2页。
- [22] 《新世界学报第一、二、三号》，《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第99—101页。
- [23] 《答新民丛报社员书》，《新世界学报》第8号，1902年12月14日，第115—117页。
- [24] 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5页。
- [25]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1488—1502页。
- [26]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 [27]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 [28]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5—196页。
- [29] 王国维：《哲学辨惑》，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6—219页。
- [30]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376—382页。
- [31] 《奏定北洋师范学堂章程》，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3页。
- [32] 《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办法草议》，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599—600页。
- [33] 《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495页。
- [34]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262—263、492、502—507页。
- [35]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5、182页。
- [36] 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静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0—151页。
- [37] 张荫麟：《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日。
- [38]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64—1265页。
- [39]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卷，第459页。
- [40]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253页。

[41] 详见桑兵：《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42] 熊十力：《十力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8、72、140—141、278、287、305—306页。

[43] 参见李明辉：《再论中国哲学的“创构”问题》，景海峰编：《拾薪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第274—283页。

[44] 朱光潜：《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文史杂志》第1卷第2期，1941年1月。

[45] 朱光潜：《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文史杂志》第1卷第2期，1941年1月。

[46]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2页。

文与言的分与合

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按照后来通行的论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多层面的重要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文学革命的结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正式通行的文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学，被倡行者视为一场变革文体的改良或革命。虽然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古已有之，虽然白话报刊自晚清以来已经蔚为风气，所造成的影响却不能与五四白话文学相提并论。其间的分别在于，前者只是部分，后者则是整体。所谓部分，或是部分的文，如语录体和小说；或对部分的人，如面向下层社会或妇孺的启蒙（包括识字及风教宣传）。相应地，所谓整体，就是覆盖全部的文和所有的人。其结果，白话文成为全社会各阶层正式通行的文体，适用于各个层面和领域。今日海内外所有使用汉语言文字者，基本已经没有人继续以文言文作为主要的表达形式。白话文不仅是今人相互沟通的手段，而且成为今人了解古人的凭借。

单从上述角度看，白话文学或许算得上是成功的尝试。不过，放宽视野，白话文学只是清季以来中国文字改革的环节之一。它会聚了文字改革的所有价值评判和目标指向，也承载或反映了文字改革所包含和面对的所有矛盾及其症结。就此而论，说白话文成功不仅为时尚早，而且问题甚多。和新文化带来的其他新事物相似，白话文作为清季以来语言文字革新的阶段性进展的体现，只有放到整个近代汉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才能认识其取向和功能，并且对其成败得失有所领悟。

对于五四白话文乃至清季以来文字与文学改革的功过是非，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学人深切反省，较为全面、彻底而较早的当属唐德刚的《国语·方言·拉丁化》，较近的则有王东杰的《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1\]](#)两位以及其他重新检讨这一

历史的学人的意见，大都显示了后来者由情绪回归理性的冷静，和跳出进化论单一取向的努力，所论已将大体意思揭出，细微处或略有不同，基本理念则大致无异。只是唐德刚的论述较为概括，且多文人笔法，王东杰则集中于晚清，从文与言的分与合的角度，尚有未尽之意，留下可以申论的空间余地。

一 废除汉字：近代汉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

夏志清为唐德刚《胡适杂忆》所写的序言称：“本书最精彩的一章是‘国语·方言·拉丁化’这一章。”这篇“立言”之作，“因为要补充、修正胡适对中国语言文字沿革史的了解，竟写了一篇面面俱到，极有深度的宏论”。通过对中西文字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显示出作者爱护方块字，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的爱国热忱。这一章的三大要点，一是拼音文字鼓励方言发展，方块字则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二是秦统一后即实行汉字改革，汉字可以简化，不可拉丁化，否则中国文化将会中断；三是学习方块字与拼音文字本来并无难易之分，文盲普遍是由于教育制度失败。[\[2\]](#)

可以说，夏志清大体把握住了唐德刚的本意，而唐德刚则基本抓住了清季以来汉字改革的症结。当然，其中也不免误读错解之处。唐德刚在大开大合、任意驰骋之余，偶尔会有疏于史事、略显随心所欲的微瑕。例如，关于文字改革至关重要的汉字存废问题，唐德刚这样论述道：

汉语拉丁化最早的倡议者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传教士。洋人习中文，以罗马字拼音帮助记忆，理固然也。

清末新学人劳乃宣辈也曾略加尝试。后来赵元任先生等搞罗马字拼音，也只是帮助发音，并不是要代替汉字。而真正要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则是吴玉章等左翼文人在1931年以后才推动的。[\[3\]](#)

其实，公开或暗地里主张废除汉字，几乎是清季以来所有呼吁文字改革者的潜在心声。尽管方案五花八门，说法各自不同，相互冲突不断，正是因为认定这一根本目标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改革汉字的努力才会继起踵接，坚持不懈。

1931年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在苏联提出中国文字的拉丁化改革方案之前^[4]，五四前后的国语罗马字改革方案讨论试行已久，胡适本人也是参与者。在主张或赞成拉丁化方案者看来，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弊端一是复古，二是难行。然而在汉字存废一点上，坚持国语罗马字的钱玄同，比赞成拉丁化的鲁迅有过之无不及。后来研究者指《新青年》同人中钱玄同的汉字改革主张最为激进，1918年3月14日，本来就好语出惊人的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以通信的形式“爽爽快快地说几句话”：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陈独秀稍后总结《新青年》的境遇道：“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并且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所谓本志同人，究竟有多少表示异议，以及对什么持有异议，颇可玩味。陈独秀本人就反问社会上的反对者道：“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他自己便只是因为语言文字需自然进化这一个理由而持论稍异。^[6]而且所异并非汉字当废与否，而是如何废、何时废的问题。他认为吴稚晖的“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

恐终无可逃”。只不过“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7]

钱玄同自称其当时的真心，并不主张立刻废除汉字及国语，而是暂时仍用汉字写白话文，将来改用世界语。至于《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所论，并非完全个人意见，有几句话是“代朋友立言”。所代之人，即为鲁迅，所代发之言，就是废除汉字。^[8]不过，在研究者看来，鲁迅虽然有过废汉字的言论，和钱玄同相较，反而比较持重沉稳。因为鲁迅更加注重学术文艺的思想内容，语言文体之事，尚在其次。当然，鲁迅对于文字革新的取向是赞成的，而且认为直接用一种西文更好。^[9]

黎锦晖称，1920年以后，钱玄同就觉得抱有世界大同而改革文字的理想太高，所以不提世界语，“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达国语的文字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致力于‘国语罗马字’了”^[10]。此说容易被误解为钱玄同对废除汉字的态度有所变化，其实钱氏只是少提世界语而已。1922年他为高元的《国音学》作序，概括声言：“以为要新国语能够充分改造，完全适用，必须从汉字革命做起。”而所谓汉字革命，干脆一句话：“非绝对的废弃现行的汉字而改用拼音新字不可。”^[11]他于次年发表《汉字革命》，更加断言：

什么是“汉字之根本改革”？就是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什么是“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应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12]

其时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于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常年大会，钱玄同联署，此案最重要之点，就是从小学校初年级起，废除汉字，改用新拼音文字——注音字母，并且逐渐由中学到大学，完全改变。大会讨论的结果，没有立即实行，改为试验，而钱玄同坚持主张废除汉字，并且毅然决然地表示：“我们的词

典中没有‘屈服’、‘投降’、‘妥协’、‘调和’这些词儿！”
[13]显然不满于仅仅试验一层。

此后，钱玄同针对整理国故、读经等不同的时势，不断地反复重申这些主张。[14]他不仅要废汉文，而且总想废汉语，虽然明知前者容或有望，后者绝不可能。[15]直到1934年，左翼文字改革的拉丁化方案伴随着大众语的讨论在上海文化界展开，钱玄同鉴于其反对国语统一，又疑心是有意宣传，不仅拒不合作，而且连国语罗马字也鸣金收军，只任简体字。其实大众语运动非但不以白话文为敌，反而是因为担心复古读经、恢复文言的呼声渐高，故意过度要求，以保全白话文的成果；而拉丁化和罗马字尽管具体做法有别，主要取向都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双方无疑是同一战线志同道合的同道。

唐德刚记述胡适在1950年代对于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态度，以为其主张汉字简化，而对拉丁化则持论谨慎。[16]的确，在新文化派的阵营中，胡适各方面都不能算是激进。不过，对于绝大多数汉语言文字改革者而言，废除汉字几乎是一致的基本取向，或者说，这是改革汉字的本能要求。说来也是造化弄人，胡适开始与文学革命结缘，起因居然是不满于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书记、基督徒钟文鳌“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宣传。但他后来接受了文字改革者的观念，所以1934年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所写的导言就明确表示：

一个国家的教育工具只可有一种，不可有两种。如果汉文汉字不配做教育工具，我们就应该下决心去废掉汉文汉字。如果教育工具必须是一种拼音文字，那么，全国上上下下必须一律采用这种拼音文字。如果拼音文字只能拼读白话文，那么，全国上上下下必须一律采用白话文。[17]

至少到这时，胡适对于废除汉字的態度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并没有显出特别的谨慎。

不仅如此，胡适对清季民初三十余年的汉语切音字运动进行总结性评价时，着重指出“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被困在重重矛盾之中

的”，表现之一就是：

音标文字是必须替代汉字的，而那个时期（尤其是那个时期的前半期）主张音标文字的人都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提倡用拼音文字来替代汉字。这完全是时代的关系，我们不能过于责备他们。汉文的权威太大了，太尊严了，那时最大胆的人也不敢公然主张废汉字——其实他们就根本没有想到汉字是应该废的。[\[18\]](#)

这样直率明确的批判，可以反证胡适自己对于汉文汉字存废的态度和主张。

不过，胡适对清季汉语切音字倡行者的本意，未必具有真了解同情。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就直接来自清季无政府主义者李煜瀛（石曾）、吴稚晖等人的鼓吹。所以，同样谈及这一段历史，钱玄同的感同身受显然较胡适更加贴切，他不仅指出“这二十多年中，也有几个明目张胆声讨汉字罪恶的人”，如谭嗣同、吴敬恒、褚民谊、李煜瀛等，而且对于其他人一方面主张另造拼音文字，一方面又赶紧声明不主张废弃汉字的态度有所体谅，“我想，他们要说那样的话的原故，或者因为社会上那些‘骸骨之迷恋者’太多了，要是明目张胆地说一声‘不要汉字’，恐怕有人要来胡闹，未免使得拼音文字的推行上发生阻力，所以姑且‘虚与委蛇’，也未可知。如果是这样，自然要算别有苦心”。尽管他并不赞成这样“灰色的革命”的态度，希望大张旗鼓地拼个你死我活，毫无妥协的余地。[\[19\]](#)

两相比较，钱玄同的看法更加近真。他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20\]](#)所谓“有新思想的人们”，不仅是当时新文化的同道，也包括清季改革文字的先驱。如果以上述为标准，则劳乃宣这样大体上不新的人物，在这方面也算有新思想。

清季拼音文字的倡导者所提出的方案，可谓五花八门，所陈述的理据，也是林林总总。但背后其实有一个基本一致的逻辑，即中国的贫弱落后，根源在于教育不发达；教育不能普及的主要症结，在于文字繁难，识写不易；文字繁难的突出表现，在于和世界万国有异，不

是拼音字母文字，而是象形文字。这样的象形文字脱离语言的进步，自异于五洲万国，妨碍了文化交流与文明沟通，成为智愚强弱的分界。极端而普遍的认识是：“我们中国在地球上呢，原算是头等富强的国度的，只因吃了文字守旧的亏，遂不觉走到贫弱一路上来。”

[\[21\]](#)这样的逻辑其实反映了进化论影响下中西乃至中西学地位乾坤颠倒之后，国人用新的世界眼光重新排序定位的认知方式，在确定中不如西的大前提下，所有的异自然都成为错，而改变的方向和目标，便是求同不存异。既然“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王炳堃），“切音字为富强之源”（沈学），文字进化的公例是由难而易，拼音文字又是万国通行，要想普及教育，臻于富强，进入世界文明行列，用拼音文字替代象形汉字，就是唯一可行的必由之路。

五四新文化时期主张废除汉字者，大体仍然延续这样的思维理路。钱玄同大声疾呼汉字革命，大胆宣言：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除了进一步强调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22\]](#)，钱玄同只是针对民初的时势，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23\]](#)，其余各条，大体是延续清季以来的成说。而他新增的这一条理由，则是因为内容不好，罪及形式。任鸿隽便调侃说这还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人〔把〕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24\]](#)

二 我手写我口：白话文的过渡使命

尽管废除汉字是清季以来汉语言文字改革的基本取向，可是语言文字的兴替并非朝夕可致，这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运动，实际留下的成果只有白话文、简体字和汉语拼音。而且其中只有白话文通行于整个汉语世界。胡适等人后来对于白话文的成功颇为自得，但这不过是汉语汉字改革进程一定阶段的替代。将白话文置于汉语言文字改革的整体历史进程之中加以考察，其利弊得失乃至成败，都有重估的可能。

胡适批评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先行者们的局限，共举出三条论据：其一，“他们明知汉文汉字太繁难，不配作教育的工具，可是他们总不敢说汉文汉字应该废除”；其二，“他们明知白话文可以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可是他们自己总瞧不起白话文，总想白话文只可用于无知百姓，而不可用于上流社会”；其三，“他们明白音标文字是最有效的教育工具，可是他们总不信这种音标文字是应该用来替代汉文汉字的”。^[25]不知有心还是无意，这样的顺序刚好显示了白话文在文字改革进程中的位置。前有汉文汉字当废的前提，后有用音标文字来替代汉文汉字的目标，居中的白话文所扮演的角色，自然就是承上启下，承前启后。

清季以来汉语言文字改革虽然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废弃汉字代以拼音文字的方向，但要达成这一目标，显然不能一蹴而就。不仅如此，在《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开始之际，这一改革已经陷入两方面的困境，难以自拔。一是统一国语走向纸面，与实际无干，失去活力；二是切音字和白话文始终与士大夫阶级无关。

文字改革之所以逐渐集中于统一国语，是因为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改用拼音的字母文字，而拼音文字讲究以声为主，字由音生，所谓“以音求字，字即成文，文即为言；无烦讲解，人人皆能”^[26]。而要做到言文一致，首先语言必须统一，众口一词的前提是异口同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方音，错综复杂，若要我手写我口，势必千差万别，无法沟通，造成隔阂乃至分裂。晚清各种方言小说流行，一些白话报刊也夹杂方言谐音文字，除非会听说相应的方言，否则无法单从字面加以辨识。欧洲各国其实也是由于各地方言的兴起，造成现在分治的格局。

切音字初起，因为面向一定区域的蒙童和百姓，开始传教士主要依据各地的方言，后来仿效而起的国人创制者大多也是依据方言。而方言切音，在中国可以行于一地，不能行于一国，要想全面推行，就要确定标准。1897年王炳耀提出《拼音字谱》方案，虽是拼写土音，已计划将来铁路兴，各省学北音必易，即用北音成书，十八省统一如一省。^[27]不过，确定北音为正声，显然有政治因素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存在官话音即正音、北音、南音等不同系统，官话音超越方言，又受方言的影响，操不同方言的人群努力往官话正音靠拢，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各地方言的约束，俗称各种不同区域的官话，相当程度上即反映了方音影响官话的事实。^[28]

新政复行，清朝主持学务的官员受日本影响，已经意识到统一语言的必要，1904年颁行的《学务纲要》，更确定“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国语”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至于用何种音为国语标准，朝野上下歧义甚多，学部始终犹疑不决。以北音为正和以官音为准的冲突，一直持续到民初的京音与国音之争。统一国语实际上是以官话音为基准，希望超越一切方音，而让无论东西南北的国人容易发出正确的声音。可是官话音本身并非单纯口语，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正确阅读书面语即文言的发音。统一国语试图先建立一种标准国语，就实行而言当然是纸上谈兵，就实效而言，却不止覆盖白话口语。可是这样的国语并不存在，要想标准化，自然是缘木求鱼。

胡适看出了统一国语陷入困境的症结，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意在“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29]。也就是说，要由国语的文学来建立国语的标准，然后才可能有标准的国语。这项事业虽然从无到有，却并非向壁虚造，而是借由已经通行多年的白话文，使这种本来只是小民百姓的工具，变成文人士夫乃至全民的语言文学表现形式，成为汉语言文字文体的正宗和文学的正宗。

不过，从文字改革的角度看，胡适的路线并不能解决问题。当时所谓白话，大体只有两种，一是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学，尤其是小说，当然还有禅宗和新儒家的语录，二是多数地区通行的蓝青官话。胡适无师自通的白话文学，主要是由看小说得来，可是旧小说的白话太简单，无法满足国语的文学的需要。不少趋新之士，有心做白话文，尤

其是白话散文，却无所凭借，弄得非驴非马，不成模样。吃过苦头的傅斯年知道白话文难做，不可乱做，于是提出两点凭借：“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

如何留心说话？一方面是“把文学的手段、组织和趣味，用到说话上来”，不必写字，已经成章；一方面则“用说话的快利清白——一切精神，一切质素——到作文上”，使文章保持语言的意味。可是说话的作用有时而穷，有助于文章的流利、丰满、质直、造句，而无助于文章的组织、剪裁、含蓄、成章，说话再好，也达不到第一等的高明，必须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才能改变白话文的贫苦、简单，增加层次和深度，使白话文具有逻辑、哲学和美术。[\[30\]](#)

胡适对傅斯年的意见相当赞同，认定“一面大胆的欧化，一面又大胆的方言化，就使白话文更丰富了”。可问题是，傅斯年的留心说话并非说方言，甚至不是一般的口语，那种端着架子，努力欧化的说话，犹如翻译话剧的道白，距离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理想境界似乎渐行渐远，言文一致，演变成了言将就文，所成就的，其实就是一套欧化的新书面语。如此一来，白话文实际上偏离了汉语言文字改革本来的使命和轨道，即言文合一，逐渐过渡到拼音文字。欧化的白话文和欧化的国语，仍然是知识人自己的领地。

况且，即使在这一领地内，也不能做到我手写我口，言与文仍然处于分离状态。依据胡适自己的观察：“中国文人大都是不讲究说话的，况且有许多作家生在官话区域以外，说官话多不如他们写白话的流利。”要想语言传神，就不能不夹杂方言土语。而方言一多，尤其是正音、北音系统以外的方言成分多，势必影响沟通，则言文一致与统一国语又发生冲突。更何况“初期的白话作家，有些是受过西洋语言文字的训练的，他们的作风早已带有不少的‘欧化’成分。虽然欧化的程度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如果不是坚信中不如西，痛斥言文分离者大概很难在欧化与口语之间平衡协调，因为欧化的语言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每个人日常的口语。

1919年5月，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的主编俞颂华问胡适：“方言绝难统一，言文断难一致。用白话文而无一定之标准，无文法可依

据，将来恐于表情达意，不免生出障碍来。足下对此有何高见？”胡适答道：“言文本来不能一致的，试看世界上哪里有一国家，是能言文一致的么？……我始终未曾提言文一致四个字来同人讨论。我的主张，简单的说来，就是希望有国语的文学和那文学的国语，有国语做标准，不必去强求那不可能的言文一致了。”^[31]胡适的这番表态，与《新青年》的同人显然意见不一，对于白话文变成脱离语言的新的书面语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却与语言文字改革的初衷本意相去甚远。在钱玄同看来，国语应该折中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他用言文一致的主张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胡适并未表示异议。^[32]

一旦承认白话文只不过是造成新的书面语，其合理性就会受到挑战。1919年底，长沙《大公报》记者就当面转述了北京大学法科教授李涤君有力而难驳的白话文反对论，大意是，从梁启超办《新民丛报》以来，报馆体裁的浅近通俗文言已经通行20余年，与白话文相比，不过少用助词。如果建设白话文学，只是换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字，岂非多此一举？胡适承认梁启超、章行严的文体已经应时而变，可以说理，那么，“为什么又要建设白话文学呢？因为章派的文章，不是人人能做的，就是能做的人，做一篇文章，也要费很大的气力。再就看的人方面讲，要看得很明白，也不容易。有了这两种困难，所以章派的文章，还是不适用。章派的文章，既不适用，所以我们不能不提倡白话文学了。照表面上看，现在流行的白话文，和浅近的报馆文，没有多大的分别。然就事实上讲，用白话达极繁密的思想，比文言实在要容易得多。就效果上讲，这两年提倡白话文的结果，中学一二年级学生，也能提笔发表他的思想。你看现在出版物之多，就可以知道了”^[33]。

胡适的答复未免有些强词夺理，白话文的写作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被视为白话文流行重要证据的出版发行了数百种白话报刊，真正进入研究者视野的不到十分之一，所见难免以偏概全。白话报刊的爆发式增长，其实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广泛鼓动青年和社会大众的产物，没过几年，胡适不无自得的白话文流行，就成了受批评的对象。对中国文坛的状况感到难以容忍的张闻天说：

自从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流行以来，一般青年都争着做诗、做文、做小说，这并不是他们对于文艺方面有特别的兴趣，这是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果。最近更因为做长诗不容易，所以大家去做短诗了。社会上充满了无数的青年诗人！其次是文章家，又其次是小说家！……但是我痛恨一般以文艺为终南捷径的青年！我痛恨一般没有什么东西可说而一定要说一点点的青年！这是侮辱文艺的庄严，和侮辱处女的贞洁一样的可杀。[\[34\]](#)

朱自清则综合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丁西林等人的评论，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近几年来‘一般的’趋向……总名之曰：‘杂志之学’！”“中国五四以来的杂志，虽也有些介绍西洋新学说的，但杂凑材料，东拉西扯的却非常的多！只看近日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尽，便可以知它们价值之如何了！”“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并借他人之口说：“新诗破产了！什么诗！简直是：罗罗苏苏的讲学语录；琐琐碎碎的日记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白话诗如摩登小姐，既无品格，又无风韵，和八股文“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35\]](#)

欧化的文风语调不仅在电影、话剧、小说等表现形式中成为坊间笑谈的取资，连胡适本人也对完全脱离汉语习惯的过度欧化表示不满。1923年胡适致函顾颉刚，声称：“我是向不反对白话文的欧化倾向的，但我认定‘不得已而为之’为这个倾向的唯一限度。今之人乃有意学欧化的语调，读之满纸不自然，只见学韩学杜学山谷的奴隶根性，穿上西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是最可痛心的现象。我的意思以为，凡人作文，须用他最自然的言语，惟有代人传话，有非这种最自然的语言所能达者，不得已始可用他种较不自然之语句。”[\[36\]](#)

不过，胡适的白话诗文在钱玄同看来“失之于太象宋词和明清小说一点”，后者本来不喜欢欧化诗文，可是后来反倒认为至少应该像周作人那种欧化语体文不可，“而且还应该努力做得‘极力各洛’，使其去中国旧白话文（三字注意）愈远愈好”。[\[37\]](#)五四以来的白话文，看似语体文，实则是欧化的书面语，并非真正的我手写我口。后

来大众语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出，内容的改变之外，的确有针对白话文充满贵族气和高等洋腔的考虑。

胡适改革语言文字的重心在于文体文学，但他内心十分清楚清季以来汉语言文字改革的基本取向，以及文字改革与白话文的密不可分。对于言文一致，他是否真的怀疑甚至否定，也不无可议。他肯定王照专拼白话的官话字母方案“是最明白的主张‘言文一致’，要文字‘当语言之符契’，要文字跟着那活的话言变迁。这个主张的逻辑的结论当然是提倡白话文了”。“有了活的白话文学的作品做底子，如果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倡音标文字，那个音标文字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

胡适大概察觉到文学革命的结果与文字改革的初衷多少有些背离，他承认：“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的问题之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着充分的注意，也没有多大的进展，——那就是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并且预言：“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更大收获了。”^[38]照此看来，胡适也是毫无疑义主张汉字拼音化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正是废除象形的汉字，改用拼音化的字母文字。

三 文言白话 孰为正宗

胡适自倡行新文学之始，就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命题。^[39]开始他对此并无十足的自信，可是不久便得到陈独秀和钱玄同等人的赞同。陈独秀断言：“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也，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0]钱玄同虽然认为陈独秀持论“过悍”，还是表示对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知识幼稚者，“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41]。得到鼓励的胡适，信心倍增，因而不断地反复论证和宣扬白话为中国文学正宗的命题。

就白话文成为正式和正宗这一点而言，五四新文学似乎是成功的。不过，全面检讨其论据和事实，显然就不太令人乐观。

按照胡适的逻辑，白话文其实只是用拼音文字完全替代汉字汉文的过渡阶段，可是，如果文言合一的拼音文字并不一定代表历史进步，也无助于教育和富强，这样的努力意义究竟何在，就大有疑问。

对于白话文学是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反对者显然大有人在，只是被认定为顽固守旧，没有见解，不容讨论、不容匡正而已。断定字母拼音文字更加先进，是清季以来国人面对列强的巨大优势，全面自我反省的结论，一切与东西方强国不同的事物，几乎统统被视为导致贫弱落后的原因和走向独立富强的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其实那些言之凿凿的所谓比较，大都只是因缘好譬喻的认知方式而看到的表面现象，格义附会之处所在多有。

国粹主义者主要是从保存固有文化的角度对于废汉文汉字的主张加以抗拒，给人以守旧的印象，其言论的正当性也就备受质疑。而一些来华外国人士的立场态度与文化守成者有些近似，很难一言以蔽之曰守旧。诸桥辙次曾经来函向胡适提问：“一、中国领土广大，南北各异，语言以白话代文言，宁不招国语紊乱而致人心乖离吗？二、文言有固定性质，白话有进化性质，若以白话代文言，则朝变暮改，还可期系统的发达吗？三、学童所修专是白话，则彼成人之后，不训读文言，则旧库载籍岂不空束高阁了吗？则禹域三千年文化将荡然扫地。请问有何办法可救此弊？”[\[42\]](#)

在胡适看来，日本学人未免替东方的遗产抱着过分的忧虑。其实明治日本正是在重估东亚固有文化的基础上重拾自信，进而实现维新。而且这样的问题在具有留学背景的学人看来，就不再是毋庸置疑。朱经农概括当时讲文字革命的大约可分四种：一是“改良文言”，并不“废止文言”；二是“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三是“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文拼音代汉字；四是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朱经农极端反对第四种，因为罗马文字并不比汉文简易优越，废汉文而让通国人民学西文，事实上也不可行。连欧洲本身也各有方言文字，无法统一，何况强求中国。这一层意思，后来唐德刚有进一步的详细申述。第三种因为四声的存在，同音字太多，造新词又不易，亦不可行。只能加在字旁作读音标准。至于第一、二两种，应相提并论，凡主张文字革命，二者必

择其一。而两种的不同，就是文言的存废。白话固然活，文言也未必死，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造成半文半白、雅俗共赏的另一种活文学。

对于朱经农的意见，胡适答称反对第四种极有道理，没有什么驳回的话，而让持此意见的钱玄同作答。第三种根本上尽可成立，将来总该办到，只是目前决不能做到。因为白话多用复音字，或配合上下文，不会误听。参照后来他答蓝志先反对拼音文字的理由，仍然坚持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可见胡适心目中白话文还是废汉字的过渡。至于第一二两种的改良文言和改用白话，胡适虽然声称两人的宗旨根本相同，所辩论的几个误解的论点，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43]也就是说，胡适觉得不可行的其实是完全改变汉语。

不仅有留学背景，而且是到求学问而非求学位的欧洲，又对比较语言学认识较深的学人，看待白话与文言的正宗地位，与胡适正相反对。1932年10月，清华大学的浦江清和朱自清谈及：

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中国语乃孤立语，与暹罗、西藏同系，异于印欧之屈折语及日本、土耳其之粘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以位置定效用。又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中国字为象形，形一而声可各从其乡，所谓书同文，象形字不足用，幸有谐声等五书辅之，乃可久存，见于记载，以省文故，另成一体与语言离，如今之拍电报然，又如数学公式然。故中国文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至《尚书》之文难读者，盖杂白话分子多。又谓以后文体变易，大抵以杂入白话分子故。

朱自清闻言，感叹“浦君可谓能思想者，自愧弗如远甚”^[44]。

朱自清早年事业上颇受挫折，不免自卑，深好自责，其实浦江清虽然也算出类拔萃，在比较语言学的领域还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通过他的口传达的当为陈寅恪的看法。浦氏曾任陈寅恪最早的助手，耳濡目染，受惠不少。而陈寅恪当时仍在少壮，与身边人谈论学问，少

有保留遮掩。也许由于浦江清好在人前转述陈寅恪的意思而并不说明来源，陈寅恪在后来的历任助手面前谈学论人，不再畅所欲言，有时甚至会故布迷阵。

陈寅恪“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的论断，与胡适奉白话为正宗的主张刚好针锋相对。不仅如此，陈寅恪还断言汉语言文字为分析的，是语言最进化的形式，汉字象形，文与言分离，也是进化的体现。这样的见解，建立在欧洲近代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献学的基础上，很难以知识幼稚加以指斥。而这对清季以来的文字改革乃至文学革命，几乎是全面的颠覆。

陈寅恪的这番议论，与是年夏季清华入学考试国文试题的对对子风波不无关系，此事背后也牵扯到白话与文言的高下优劣。陈寅恪在致清华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函中，着重对不适宜中国语文的格义式《马氏文通》之文法大加挞伐。他说：世界人类语言中，不同种类乃至同一种之中，均存在特殊现象，因而有不同文法，“欧洲受基督教之影响至深，昔日欧人往往以希伯来语言为世界语言之始祖，而自附其语言于希伯来语之支流末裔。迄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念得以革除”^[45]。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须具有历史观念，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马建忠效仿法国人，以印欧语系文法部勒汉藏语系的汉语，著为《马氏文通》，号称为中国文法之始，其实是将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号称文通，实为不通之至。

陈寅恪指责《马氏文通》，意在反对坚信欧化文字、欧化文法和欧化文体的时流痛加针砭。矛头虽然指向马建忠，板子却打在文字和文学改革者的身上。胡适早年崇拜《马氏文通》，并以学习英文的经验相比附，治汉语言文字，多由文法入手，甚至以为“文法乃教文字语言之捷径”^[46]，提倡文学改良，也强调文法的重要，且最好依据

《马氏文通》的文法来判断文章的通与不通。^[47]这些新文化论者信奉的时髦主张，用来攻击文化守成者可谓战无不胜的利器，在陈寅恪眼中却是过时的陈货。^[48]

有意思的是，留学欧洲之前，傅斯年也是挟十九世纪后半格义之学鼓吹新文化的健将。1919年3月，他在《新潮》第1卷第3号发表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宣称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文字替

代，汉语绝对可能用拼音文字表达，汉字绝对不可能无需改造用别种方法补救，被钱玄同诮为“实是‘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

“是对于汉字施根本攻击的急先锋”。^[49]而一个月前傅斯年在《新潮》第1卷第2号发表的《怎样做白话文》，又提出了胡适认为是最重要的两条修正案，即大胆的欧化和大胆的方言化。即使留学欧洲之后，直到1923年1月，他在伦敦为刘复的《四声实验录》作序，仍然相信汉语必须改用拼音文字，才能在进步语文中有一席之地。^[50]傅斯年本来是善于做四个字一句的文言文的，胡适以为意思不免晦涩，改写白话文，就明白许多了。^[51]

恰在此时，傅斯年学习了比较语言学，并与陈寅恪结交，后者与众不同的见识显然使之耳目一新。在不少学术观念方面，傅斯年的看法较出国前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对汉语言文字的看法。回国任教时，傅斯年将语言和文字分开，对古代文言分离能够给予历史的理解。虽仍然认为语言大变，文学免不了大变，却又说文学大变，语言不必大变，并且承认文言是“既简净又丰富的工具”^[52]。甚至认为汉语在逻辑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53]

傅斯年后来似不再鼓吹废除汉字，甚至主要使用文言来撰写学术著作，尽管他写《性命古训辨证》时，还是觉得文言不易表达“分析的思想”，并由此“深悟近代思想之不易以传统文言记录之也。盖行文之白话正在滋长中，可由作者增其逻辑，变其语法，文言则不易耳”^[54]。傅斯年的体验与文学革命者指责文言不能说理如出一辙^[55]，骨子里还是不能脱离欧化。陈寅恪则完全没有类似的困扰，他坚持用文言表述一切意思，包括分析的思想，甚至坚持用繁体竖排。这可以反证陈寅恪在对对子问题上的执拗，并非逞一时的意气。一些学问大家始终坚持用文言撰写发表学术文字，除了像陈寅恪这样坦承文言为中文正宗而且只用文言写作任何文字者外，有些学人本来可以写不错的白话文，可是写作学术论理文字时（主要是中国文史之学），还是沿用文言，非但不见妨碍表述，反而呈现更多可供玩味琢磨的意境。

四 龙种？跳蚤？

陈寅恪欲借对对子一事使中国学界略明中国语言的地位，扫除《马氏文通》的谬说，改良中学课程^[56]，在白话文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时趋之下，这样的举动似乎有几分堂吉诃德式的悲壮。一种语文的通行，往往由语文自身的良否之外的因素决定，由此滋生的流弊，也很难分辨究竟是由语文还是其他因素造成。尽管无力回天，陈寅恪力排众议的主张和独善其身的坚持，还是给世人以警醒。时过境迁，当年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文字的种种义正词严，如今听来已经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同样使用拼音字母文字的国家、民族或地区，无论原生还是后造，依然存在贫富不均、强弱有别的情形。就是同一国度的不同区域，教育制度的健全与否，也会造成教育发展水平差距甚远的局面，未必是由于文字的繁简文白。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一元化观念主导下的社会进化观，显然无法安置和解释人类文化多元的复杂情形。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一般而言，象形汉字为野蛮落后的表征，不能适用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论点，已经很少有人确信无疑。语言学从来不认为语言文字有着普遍适用的优劣新旧的评判标准，尤其是汉字计算机处理技术的开发应用日新月异，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象形汉字的模糊逻辑属性，可能比逻辑语言具有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更加适合于网络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

在放弃废除汉字取向的同时，人们似乎忘记了白话文与废汉字的内在关联，很少因为后者而重新检讨前者，而将白话文本身当成了重要的目标性成果。如果说废汉字其实是多此一举，作为过渡的白话文意义何在？这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难以回避。实践显示，无论繁体简字，象形拼音，对于教育都没有难易的明显分别。大中华圈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教育程度或许还在使用简体字的地区之上。简化字和语体文的普及，并未展现出有利于教育普及的优势和显著效应。教育的良否，主要取决于教育制度而非语言文字。仅就识字的效率而言，改为新式学堂之前的传统学塾，显然更高。后者教会学童认识3000字，只要大约两年左右。而前者必须完成六年的学业即读完高等小学，才能达到这一程度。即使考虑到小学阶段除了识字，还要学习其他课程等因素，其效率仍然有限。这也是民国时期在政府的高压之下，所谓私塾长期大量存在、乡村教育者对国民教育进行激烈抨击的重要原因。

白话文在历史上真正起作用，主要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辅助工具，以此使得知识人、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发生直接联系，从而造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在其他方面，白话文或语体文并未产生预期的效应，更达不到预定的目标。清季以来文字和文体改革的基本取向，即用拼音文字替代象形汉字，现在实际上已经正式放弃。时至今日，除了少数人外，文字改革的主要指向已不再是废除汉字。可是建立在言文应该一致的认知基础上，作为废除汉字阶段性过渡的白话文，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文体。面对既成事实，且受今人教育背景及知识来源的制约，未必非有不可的白话文取代文言，仍然被视为历史的进步。实则白话文自身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和后天不调，这些与生俱来的弊病，不仅依然难以根除，而且逐渐显现种种负面效用。时下语文水平普遍不高，成为书面语的白话文以及用语法教授语文，恐怕难辞其咎。

在了解语言和历史的学人看来，文言分离，优越有二：一是超越方言，可以普遍通行；二是脱离口语，能够流传久远。超越方言则交流广泛，流传久远则古今一贯。由于中国地广人众，各式各样的方言及其存在形态错综复杂，如果完全遵循我手写我口的原则，势必难以沟通。尽管官话的通行为东西南北人们的口头交流提供了媒介，尽管宋代以来长期流行的白话小说和语录文体可以借鉴，但是因为仍旧使用象形而非拼音的汉字，白话文要想作为正式的和普遍的表达工具，其表现力和准确度，均有严重的欠缺。不断吸收方言虽然能够丰富内容，却会增加分裂语言统一的可能。而强求语言标准一致，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某些方言的文化霸权地位，剥夺扼杀了另一部分方言文学的生存发展。改革者内部在方言与国语的问题上往往混淆言与文的分别，虽然不断有所讨论，并不能消除症结。此外，在文与言依然分离的情形下，新的书面语通过国民教育进行普及，并不能改变文化分层的状态和区域性差异，当然难以实现教育、文化、文学等方面全体国民的统一。

改善白话文的另一途径是借重域外。所谓欧化，不仅翻译文章，还包括套用印欧语系语法和大量使用明治日本逆输入的新汉语，这使得独立语的汉语属性发生深刻变化。学校教中文汉语由文法入手，而文法始终不能摆脱印欧语系的影响制约。语文普遍不好，在识字发蒙阶段已经注定。教育而外，语言文字变革本身有着重新检讨的广阔空间。普及白话文的需要，与大众传媒的激增、清季的讲报密切相关，后来又受到广播事业发展的助推，在观感和事实两面，新文化都不免

成为浅文化的代名词。今日文学家教育后进如何提高文学修养，不约而同地建议多看古诗和史书。而白话文追求言文合一所必需的双音字，除了日常口语外，主要词汇其实来自明治维新后逆输入的新汉语。与改革汉字者指责汉字不利于输入新知的认识相反，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在翻译西文时，为了精简和准确，不得不大量借鉴中国的古代典籍。其间有意无意的转义，往往造成与古人的隔膜和对西学的错解，并且让近代以来中国的精神世界深受东学的支配。就此而论，不仅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而且导致中外沟通的诸多缠绕与困惑。

尽管切音文字一直处于试行辅助的阶段，在中西新旧乾坤颠倒的大势所趋之下，清季以来中国的语言文字还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马氏文通》用印欧语法条理汉藏语系的汉语言文字、来自日本的新名词成为新概念的表述形式且使得原来以字为单位的汉语转而以词为单位，以及翻译带来的欧式白话文取代言文成为书面语，现在的中国人或许早已是用西思、发汉声、说东语，且习惯成自然，浑然不觉其间的种种不相啮衄。由于新式教育令广大国民受西化语文的社会化，高明者的思想主张又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雅俗共赏，前贤的论断几乎已成奢侈品。待到人们发现教育并不因为白话简字而易于普及，至少在识字与作文方面，新式学堂的教学效果反而不及原来的学塾，而非逻辑的方块字更能适应计算机语言的模糊逻辑，才意识到语言文字的发达进步与否，并不能以社会发展程度为尺度。

白话简字与其说是历史的进步，毋宁说是变化造成的现时状态。这样的不得不然掺杂着一些盲目，也反映了某种无奈。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的确在历史上推动中国思想界的风起云涌，起作用的与其说是废除文言文，不如说是打破了文言文在当时的僵化和垄断，使得语言文字在失范中重趋活跃，便于众人发声。历史进程显示，文体的兴衰，大都经历了从不拘一格到僵化桎梏的演变，其中过度的标准化正是走向呆滞的决定性杠杆。而这样的过程，在白话文的演进中同样存在。如何平衡规范与灵活，有序而不失之僵化，需要相当的艺术。强势而无理的规范，终将会使白话文重蹈文言文的覆辙。

在一元化进化论的主导作祟之下，近代以来，国人不断以为变化就是进化，而将现在等同于现代。典型的如钱玄同，坦言“一般入所谓‘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全世界的文化”^[57]。类似的意思，他在日记书信和文章中反复强调，如“一般入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

了。中国人要是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58]。所以他最佩服吴稚晖和陈独秀两人“将东方化连根拔去，将西方化全盘采用”的种种主张。^[59]受此制约，不少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的多此一举一度被视为势所必然，天经地义。而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白话文成为中国人通行的表达工具，恰好表明语言文字的好坏对于社会发展与否并无决定性作用。按照“语言说人”的规则、新式教育的推广普及是白话文的决定因素，而非如改革文字的初衷——由字母文字和白话文来推动教育的普及。

今人使用白话文，本来连方便也谈不上，不过因为木已成舟，只得将就。于是，恢复文言为通行已不大现实，而文学正宗的地位却也不容白话文独占。放宽眼界，不以后来的叙述为史事本相，回到历史现场，重现事物发生演化的进程本意，便成为史家的应有之意。否则，近代趋新人士用西学眼光看中国，解读已误，现在学人又以其所论为凭据，更加似是而非。

在中西文化相互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从夷夏之辨到中体西用的转折，清末民初，变化即进化的观念逐渐流行，并影响后来研究者的思维。国人认为，汉字繁复，且与语言分离，不能普及，妨碍教育，导致中国贫弱。循着这样的思路，以列强共有的字母文字为旨归，当然是不言而喻、理所应当的进步取向。语言文字改革各个阶段的不同派系，其努力的方向基本都是字母化（拉丁化或罗马化），也就是要废除文言分离的象形方块字，改用文言合一的拼音文字。虽然实际进程还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包括白话文和简笔字等等，作为终极目标的字母化却一直坚持到二十世纪末才最终放弃。

字母文字的前提是文言一致，笔写与口讲为一而二之事。而中国早就是地域广阔的文化集合体，方言众多，除了文字生成的渊源而外，若是我手写我口，势必造成无法沟通的局面，妨碍文化统一的格局。清末民初，在文言合一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的情况下，以何种官音为基准，仍然争议不断，取舍困难。五四前后提倡白话文学，初衷是使国语统一摆脱困境，走上言文合一的坦途，促进汉字革命，其实不过造成新的欧式书面语，非但文言仍然不能合一，还使得说方言的群体失去了书面文学创作的动力乃至能力。1930年代陈寅恪抨击时流以陈货为新知，宣称中国文学应以文言为正宗，绝非意气之见。虽然无力回天，却为放弃废除汉字的取向之后检讨作为过渡的白话文提供了重要的警示。

[1] 唐德刚的文章见《胡适杂忆》（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七章。王东杰的文章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8—89页。后者还有几篇相关的论文，并拟写成专书，因而在其为我主持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课题所提供的书稿中，对于这一问题前人的先行研究，作了相当细致的梳理。

[2] 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第26—27页。

[3] 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第148页。

[4] 吴玉章与瞿秋白、林伯渠、萧三等人，于1928年12月即开始讨论文字改革问题。1930年6月，吴、林共同编就《拉丁化中国字初学教材》。次年5月，将《中国拉丁化字母》交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举行的学术会讨论通过，并于华工扫盲中开始试用。接着举行多次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出版多种词典、课本和论著，大张旗鼓地推动实行。参见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2—198页。

[5]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6]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7] 《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8] 梦飞：《记钱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的谈话》，《文化与教育》第27期，1934年8月10日。

[9]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32—33页。

[10]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第31、157页。

[11] 钱玄同：《高元〈国音学〉序》，《教育杂志》第14卷第3号，1922年。

[12]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第1卷“汉字改革专号”，1923年。

[13] 钱玄同：《黎锦晖〈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的附志》，《国语月刊》第1卷“汉字改革专号”，1923年。

[14] 如1923年11月针对废汉字扑灭文化之说，宣称：“我是主张汉字革命的一个。我主张把国语写成拼音文字，我主张采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母来做国语拼音文字的字母。我从教育普及和文化革新上研究，断定国语应该改用拼音文字。我从便于无限制的输入西文词句上研究，从书写印刷种种方面便利上研究，断定国语字母应该采用罗马字母。我从中国文字古今变迁的历史上研究，断定国语能够改用拼音文字。”（《汉字革命与国故》，《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1925年讨论国音问题时，指出目前《国语周刊》最重要的使命有两点：一是建立文体自由力求活泼的新国语，打倒“文体纯正”、“力求雅洁”的鸟古文，一是建立拼音字，打倒方块字。（《关于国音》，《国语周刊》第9期，1925年8月9日）是年双十节，又提出今后要努力做三件事：打倒国粹，打倒古文，打倒汉字。（《国语周刊》第18期，1925年10月10日）1926年解释“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认为要使文字易学，国语统一，谋编目、分类、打字、排字等等的便利，所以要提倡拼音字，要图形式美观，书写便利，表音准确，与现世界的文化学术融合，所以要提倡国语罗马字。（《新生》第1卷第2期，1926年12月24日）1933年提议以公历1648年即《新韵谱》作者刘继庄的生年定为国语纪元，以国语一词，包含“统一国语，研究方言，制造音字三义（改古文为白话文亦是一义）”。（《国语周刊》第77期，1933年3月18日）

[15] 《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16] 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第147—148页。

[1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120页。

[18]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116—120页。

[19]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第1卷“汉字改革专号”，1923年。

[20]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第1卷“汉字改革专号”，1923年。

- [21]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7页。
- [22]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第1卷“汉字改革专号”，1923年。
- [23]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 [24]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 [25]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120页。
- [26]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第65页。
- [27]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第58页。
- [28] 参见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所指各种俗称官话为引申用法，与本义有别，固为的论，但也有关。
- [29]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 [30]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 [31] 《与胡适之博士谈话》，《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8日。引自吴元康整理：《胡适史料补阙》，《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第8页。
- [32] 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 [33] 真心：《关于新文学的两个问答》，长沙《大公报》1920年1月16日。引自吴元康整理：《胡适史料补阙》，《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第9页。
- [34] 张闻天：《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
- [35] 朱自清：《课余》、《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新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5、200、209—217页。
- [36] 《通信》，《小说月报》第14卷第4号，1923年4月。引自吴元康辑：《胡适史料拾遗续编（下）》，《历史档案》2007年第3期，第9页。
- [37] 《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第52页。
- [38]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111—113、120、131、139页。
- [39]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 [40]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 [41] 钱玄同：《论白话小说》，《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 [42] 耿云志编：《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3页。此为编者归纳的大意。
- [43]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 [44]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63—164页。
- [45]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0—251页。
- [46]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142页。
- [47] 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 [48] 陈寅恪：《致傅斯年》二十二，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2—43页。

[49]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第1卷“汉字改革专号”，1923年；《高元〈国音学〉序》，《教育杂志》第14卷第3号，1922年。

[50] 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20页。

[51] 《胡适之先生谈片》，《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2月11日。引自吴元康整理：《胡适史料补阙》，《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第7页。

[52]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30页。傅斯年专列了一节讨论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

[53]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252—253页。

[54]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3页。

[55] 钱玄同便反驳白话浅文言深的言论道：“我们提倡国语文学的理由，老老实实、干干净净的说：就是——因为古文贫乏、浮泛、浅陋、幼稚，不足以传达高深绵密思想和曲折复杂的情感，所以对彼革命，将彼推翻，另外建立丰富、精密、深奥、进化的国语文学！绝对不是嫌古文深奥难懂，‘为通俗起见’而另创浅陋的国语文，‘使一般人易懂’，可以‘由浅入深’去学古文！”（《一封最紧要的信》，《国语月刊》第1卷第10期，1922年）

[56] 陈寅恪：《致傅斯年》二十二，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

[57] 钱玄同：《〈世界语名著选〉序》，《晨报副刊》1924年5月20日。

[58]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第1卷“汉字改革专号”，1923年。

[59] 《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第65页。

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太炎前期弟子，大都颇负盛名，坊间流行的五大天王之说，能够反映章门学术江湖地位的一时如日中天。^[1]不过，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亦以字行。浙江鄞县人。或谓其本名巽，似与其长子相混淆）虽然身份不浅（章门弟子中，马裕藻年长，有老大哥之称），地位不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十四年），却不得列名其中。不仅如此，由于他既无著述，又少轶事，以致几乎没有人做过研究。坊间流传的一些文字，大都敷衍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相关记述而来，其中以讹传讹乃至穿凿附会之处不在少数。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马裕藻，首先必须解决材料从何而来的问题。马裕藻的生活交友圈子，多以同门为轴心纽带，而同门当中，多人留有日记并且已经陆续出版，虽然所记大都琐事片断，如果相互参照，拼合连缀，也可以组成大体完整的图形。同门之中，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树人、周作人等人的日记已刊，其中马裕藻与钱玄同的关系最近，朱希祖次之，周氏兄弟又次之，与黄侃较为疏离，与吴承仕则交恶。而各人的日记详略不一，间有散佚，如朱希祖北京期间的日记便付诸阙如。以同门日记为基础，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可以大体还原这位雁过无声人过无名的名人的历史轨迹，进而探究民国时期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

本篇仅取1934年北大解聘国文系教授牵连马裕藻辞去系主任一事，重现相关史事并讨论背后的问题。关于此事，坊间传说及有所涉及的文字相当多，大都以林损、胡适为主角，不仅各执一偏，而且真伪莫辨，形同八卦翻新。一些言之凿凿的考证，也因为各自的成见太深，无法摆脱偏听偏信的局限。而马裕藻作为配角，显得可有可无，使得此事似乎只是学界的轶事花絮，而与近代中国文学观念及组织关

系的重大意义不能显现，马裕藻的历史地位也难以彰显。为此，在尽可能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

一 元勋还是罪魁

周作人谈到北京大学的“三沈二马”，指出五四前后不能如此说，因为那时只有沈尹默和马幼渔两位进北大，还在蔡元培长校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些带头作用”。人称“鬼谷子”。“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2]

民国时期北大派系林立，暗潮汹涌，不少人视为畏途。沈尹默在北伐之后离开北大，任职于教育界；与马裕藻分别担任史学系和国文系主任，又参与北大最高决策机构校评议会的朱希祖，在学生风潮的冲击之下也不安于位，南下广州；而马裕藻却能够稳坐泰山，历经风雨而岿然不动，与北大共始终。他自1913年在北大国文系任教，教授“中国文字声韵概要”等课程，从1920年起担任系主任，前后长达14年之久，在派系纷争激烈复杂的北京大学，堪称异例。

或谓马裕藻为北大国文系的开国元勋，只是这样的有功之臣究竟功在何处，值得玩味。学人的声望地位，应与所具备的学术有关，可是马裕藻的学问似乎颇受人质疑。他没有出版过任何学术著作，也几乎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2004年由北京大学校史馆编辑并由该校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厚本《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找不到他的踪影，也没人为他写下纪念性文字。虽然坊间关于马裕藻的记述多由周作人的“北大感旧录”敷衍而来，可是周作人在书中专门写到马裕藻时，居然说：“幼渔虽说是极熟的朋友之一，交往也很频繁，可是记不起什么可记的事情来，讲到旧闻轶事，特别从玄同听来的也实在不少，不过都是琐屑家庭的事，不好做感旧的资料。”^[3]其日记中所记录的两人之间的频繁交往，除了孔德学校的事务以及偶尔的仗义助人外，多是饭局宴客之类的应酬，所以反而无从下笔。

因此，不仅前此主导文学系后来被章门弟子排斥的桐城派对他不以为然，同辈学人也不无微词。杨树达曾以请吴承仕任教之事告诉马裕藻，后者答称：“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杨树达认为，马裕藻本人即为“十年不作一文者也”。同门的黄侃声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承仕）、钱玄同外，余（季豫）、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言下之意，他人均不足道。^[4]黄侃性情乖僻，与一些同门关系不洽，与钱玄同冲突尤多，论学却不会因人废言。同治音韵之学，黄侃可以和老师齐名，所论可谓定评。吴承仕与黄侃的关系不错，与马裕藻等则时有冲突。^[5]而马裕藻虽然号称旧京治音韵四派之一的古韵派代表，也仅仅是口碑而已。

尽管蔡元培改革北大后，主张北大不是照本宣科地传授知识，教师不能单纯教学，必须研究，没有研究也不可能教好书，国民政府时期北大未必以学术见长，而且无著述不等于没学问，不好为人师而学富五车的名家不乏其例，有的学问甚至为一般著作等身者望尘莫及。太炎弟子当中，黄侃未及著书而人已逝，钱玄同议论多而成功少，其余则或多或少，勉强可以结集，只有周氏兄弟倾向文学，著述较多。可是像马裕藻那样几乎不著一字，也是绝无仅有。

学为己之后为人，若无余力发明，守成足矣，至少可以传承学术文化。因而那时大学教师的有无学问，一般不以著述的多少甚至有无作为标准。温故而不知新，迂而已，不温故而欲知新，甚至温故不懂仍然强要创新，就绝不仅仅是妄，更等同于存心害人。或者看懂书已经力有不逮，还要“勇于”推陈出新，说自己也不明白的话，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文字，无知无畏。有的虽然所说看似有理，其实不过自己心中的条理系统，非但不能贯通材料事实，反而去真相越来越远。有的一心突过前人，填补空白，充其量拾人牙慧而已。

上述各种有助于立足学界的情形，对于马裕藻似乎概不适用。正式选修过他所授课程的日本京都大学留学生吉川幸次郎，后来在南京见到黄侃才觉得遇到真正的学者。也有的教师虽不勤于著述，却长于授课。同样不好著述的钱玄同讲课在学生当中就口碑不错。而这方面马裕藻也并非强项，他的口才不佳，讲课平庸沉闷，使人思睡，只有偶尔透露其妻的贤惠，让对他既无惧意，也无敬意的学生们有了恶作剧的由头。据说学生对他的评语是“糊涂”二字。吴虞任教于北大期间，就知道“马幼渔、沈士远为三千学生所认为不行者”^[6]。倒是其女马珏，因为被评为北大校花，引人注目，花边新闻不少。有一年北

大纪念建校，现场向千余学生问卷，认为北大有吸引力的答案之一，竟是北大有花王。花王者，各校校花王者之谓也。

然而，如果以为马裕藻是只会周旋于各方的好好先生、沙龙教授、宽厚长者，则大谬不然。他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期间，正是所谓某籍某系把持最甚之时。“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媚嫉之故。”同为浙籍的单丕甚至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连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7]。

所谓浙人把持最甚的，在北大主要就是指朱希祖主任的史学系和马裕藻主任的国文系，所以单丕指名是“愤朱、马辈把持”。胡适对此早有耳闻。1920年6月12日，陶孟和就致函胡适，告以“近日沈、马诸公屡有秘谋，对于预科移至第三院一事犹运动反对，排列课程，延请教员，皆独断独行，长此以往，恐非大学之福。弟意非有除恶务尽之办法，则前途不堪设想。暑校完事，务必早日归来为妙”^[8]。

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9]，并以校学生会名义在河北《民国日报》载文攻诋。8月1日，马裕藻以“是实藻诚信未孚所致”，致函文学院院长陈大齐辞职，请召集国文系教授会改选主任。两天后，陈大齐复函慰留，称：“先生主讲北大垂二十载，诸生无不热忱爱戴。若偶因学生误会，遽尔灰心，将国文学系主任辞去，则该系一切进行计画势将停顿。爱校如先生，当不忍出此。务请以学校前途为重，慨允继续担任国文学系主任。”^[10]后经代理校长的陈大齐和校长蔡元培再三慰留，马裕藻和与之同时提出辞呈的朱希祖才勉强同意复职。^[11]不久，朱希祖因为学生再度闹事，愤而去职。而1931年国文系学生又集会要求聘杨树达任教，锋芒所向，也是把持系务的马裕藻。

在同门眼中，马裕藻的形象则与外人所见大相径庭，其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平时不善言谈，但又容易激怒，在北大评议会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便要大声叱咤，不留情面，与平常截然不同。按照常理，训人总要有底气，而底气必须有所凭借。在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制的大学里，如果学问不出众，而能长期稳坐系主任的位置，并且进入最高决策机构校评议会，而且敢于大声呵斥他人，究竟底气何来？

太炎门生是缘由之一。民国以后，太炎弟子在教育部、教育界和北京大学成为最具声势实力的学术群体，一时无两。马裕藻在太炎门生中被视为老大哥，他人自然不敢小觑。

某籍某系是缘由之二。太炎门生中，以浙籍居多，但其他籍贯者也为数不少。而在教育部、教育界和北大的浙籍人士中，许多并非出自太炎门下。二者互为犄角，相辅相成，声势进一步张大。

上下呼应是缘由之三。北大长校或代理的蔡元培、蒋梦麟、陈大齐（百年）等，都是浙江人，或与章门弟子有旧，或曾经得到这一重要势力的支持，所以不免为某籍某系所包围。沈尹默后来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12]蒋梦麟本来与北大没有渊源，代蔡元培入长北大，只能依靠拥蔡且有实力的教授。至于陈大齐，民初还在浙江时就与一干章门弟子关系密切，在北大期间也是过从甚密。甚至可以说，本来就是“我们”中人。

性格中庸是缘由之四。马裕藻调和新旧，不偏不倚，一般不得罪人，人脉很广，而且不以荣衰青白眼相加，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与各方维持良好关系，鲁迅落难时，就觉得只有马裕藻的态度依然如故；同时又让人不觉得具有威胁，不予排斥防范。

敢于担当是缘由之五。马裕藻看似主见不多，可是并非一味推诿，相反，在各种会议中每每发表意见，在处置各种事务时往往被选为参与人。在北京各校与教育部的冲突中，1923年5月4日，还曾带队包围教育总长彭允彝的住所，不准其外出。^[13]

以上五点，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在当时北京大学的组织体制之下，马裕藻非但不是滥竽充数，而且人望极高。这可以从其连续高票当选系主任窥见一斑。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各级行政以及委员会等，多由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1920年4月13日，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会开会，总共十五位教授有十三位到会，马裕藻以十一票的罕见高票当选主任，第二位的朱希祖仅两票。^[14]1922年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改选，马裕藻以八票当选。另外两位得票者为沈士远两票，吴虞一票。而物理、英文、法文、政治、法律等系，当选者最多（如英文系主任

胡适)不过得到三票。^[15]其后历年改选连任,马裕藻少则三票,多则八票,在各系主任得票中属于最高。此外,马裕藻1918年即当选为校评议会委员^[16],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几乎年年当选,可以说是少有的常青树。只是在选举教务长时,马裕藻的票数在得票者中反而最少,可见其影响范围及层面的限度。^[17]

指马裕藻把持北大中国文学系,在马自己看来,肯定觉得委屈。1929年国文系提出的应增聘教授名单,包括胡适、林损、黄侃、郑奠、黄节、杨振声、闻一多、沈尹默、吴承仕、鲁迅、吴宓、赵元任、吴梅、黎锦熙、郁达夫、萧友梅,确是新旧兼容的一时之选。^[18]

二 解聘与辞职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宛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而马裕藻在历次风波中,都能够平稳过渡或涉险过关。国民政府统一之后,政治格局天翻地覆,教育界和北京大学随之变化。尤其是蒋梦麟再度接长北大,听取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意见进行改革,太炎门生失去上面的保护,下面又有人暗中鼓动学生闹事,终于无法继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1930年,北大在经历了1927年以来的连续动荡之后,蒋梦麟出任校长,次年,着手整顿各学院。他首先废除了北大实行多年的教授保障法,使得教授可以被解聘,社会科学院先行改聘教授,并自行兼任文学院院长;其次则配合由他主导制订的国民政府关于大学组织的新立法,改评议会为校务会,前者基本采用民主制,后者则由当然委员(行政)和选举委员(教授)组成,以全体教授、副教授选举之代表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织之,实际上是变相的行政主导;接着提出文学院新计划。后一项尚未来得及实施,1932年,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落实国文系改革计划,可是裁并课程之类的措施遭到马裕藻等人的抵制,只得暂时搁置。直到1934年,蒋梦麟与胡适协商后,决心排除阻力,实施改革,并引发与国文系教授林损的冲突,马裕藻也被迫去职。

关于此事的由来，胡颂平所编《胡适年谱长编初稿》称，国文系主任改由文学院院长兼是出自校长蒋梦麟之意，致使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1890—1940，字公铎，浙江瑞安人）、许之衡（1877—1935，字守白，广东番禺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三人相继辞职，引起一场大纠纷。林损怀疑此举出自胡适的心意，因而写信攻击。后因亲历其事的张中行撰文质疑胡适取代国文系主任及解聘林损有公报私仇之嫌，引发胡适研究者程巢父的兴趣，做了一番刨根问底的探究，证明蒋梦麟此次整顿北大国文系，源于1930年傅斯年、顾临、胡适帮助蒋梦麟拟出一个改革北大的具体方案，即次年1月9日的“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其内容据《丁文江的传记》的记载，为1931年中基会第五次常会通过的“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条款，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其中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

会后，蒋梦麟到北平做北京大学校长，他要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因主持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故不受北大的薪俸。中基会与北大开始会拟合作办法草案，由胡适起草。同年4月24日，胡适出席了中基会在北平南长街会所举行的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北大合作设立研究教席及奖学金案，合作办法规定设顾问委员会，由北大校长、基金会干事长，及双方合聘之胡适、翁文灏、傅斯年共五人担任。所定“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载明，合作以五年为期，自二十年度起，至二十四年度止。

1948年12月13日胡适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称：

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研究合作费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育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

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19\]](#)

程巢父的文章解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何以蒋梦麟在拖延了几年后不得不痛下决心，原因就是，如果当年再不执行与中基会的合作办法，协议即将到期，无法交代，而要实行，就必须先行解聘若干教授，腾出位置，才能引进新人。但是程巢父据此断言解聘林损不关胡适的事，恐怕有些武断。蒋梦麟的意思只是表明他愿意唱白脸作歹人，问题是蒋何以要解聘林损，以他的学识，应当无法准确判断国文系教授的水准能力，即使有主见，也不便贸然自行决断。在程文所列相关者中，最可能在这方面发挥影响的正是胡适。胡适当然不会以林损骂自己为由头，而是说北大的温州学派没水平，不值一谈。如此一来，林损自然就成为首先被开刀的俎上鱼肉。其实，时至今日，关于林损的学问到底如何，诉讼双方还是各执一词，并不交集。

1934年4月17日，《世界日报》刊登特讯《北京大学将裁并学系说》，称：

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教授林损昨日突致函该校当局，呈请辞职，该系学生闻讯，拟全体赴林宅挽留，林遂在第一院贴出通告，大意谓：本人尚未离校，有事可在校晤谈。该校当局接林辞职函后，亦正在设法挽留中。闻林辞职原因，系因该校当局近拟将国文系归并史学系，改称文史系，并拟将文学院其他各系及法学院各系，亦加以归并或裁撤，因此国文系教授均表示消极，林则首先辞职。闻国文系其他教授马裕藻、黄节、许之衡等，亦将相继提出辞呈。但是否属实，尚待证明。 [\[20\]](#)

16日这天，刘复（半农）刚好有课，目睹了事情的发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到一院上课，忽于壁间见林公铎揭一帖，自言已停职，学生不必上课云云。殊不可解。电询幼渔，乃知梦麟嘱郑介石示言公铎，下学年不复续聘，你先为之备，公铎遂一怒而出此也。以私交言，公铎是余来平后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职，心实不安，然公铎恃才傲物，十数年来不求长进，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上堂教书，直是信口胡说，咎由自取，不能尽责梦麟也。[\[21\]](#)

18日，《世界日报》调查后更正了林损辞职的原因。[\[22\]](#)同日《北平晨报》刊登消息《蒋梦麟否认北大裁并学系》，进一步追究冲突的由来。该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当事人蒋梦麟、林损和学生，做出综合报道。蒋梦麟否认外传北大将国文系并入史学系改为文史学系之说，称本校国文系具有悠久历史，事实上又无裁并需要，故从无此项目计划。至于将文学院各系并入法学院，更无其事。北大各系均有悠久历史，事实上亦不能裁并。林损辞职，是因为本校拟于下年度将国文系教授更动数位，林在之内，“本校教授聘约均以一年为期，于每年度开始时选出，现本年度行将终了，应行更动之教授亦将决定，想林先生对本校之更动教授事件，有所预闻，故提出辞职。总之，本校更动教授之拟议则有之，而裁并学系之说实无。本校国文系主任于下年度起，拟请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先生兼任，胡先生并已同意”。

林损则表示：“本人之辞职原因，系与蒋（孟麟）、胡（适之）两先生学说不同，本人之与孟麟、适之二先生之学说不同，由来已久。”记者叩以不同在何处，林笑而不答，并出示致蒋、胡、国文系同学函稿及留别诗。其致蒋梦麟函称：“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生交相责难[\[23\]](#)，瘖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从此别，祝汝万春。”致胡适函称：“损与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议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布告来学诸生谓：“损即日自动停职，凡选课者，务祈继续自修，毋旷时日，以副平素区区之望。”别学生诗曰：“终让魔欺佛，难求铁铸心，沉忧多异梦，结习发狂吟。敦勉披襟受，余情只海深，吁嗟人迹下，非兽复非禽。”[\[24\]](#)

言辞之间，可见林损对学生尚有惜别之意，对蒋、胡则积怨极深，去志已决。学生来其寓所挽留时，林表示与当局意见不合，决不再返校，希望诸同学毋再徒劳。诸同学不弃，可随时互相研究，亦可互护其益。

上海各报，关注此事的不多，只有19日《申报》的北平特讯报道较详，指北大教授纠纷，林损与胡适意见冲突而辞职，国文系将大变动，胡将兼主任。据称：“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林损突然提出辞职，教育界非常注意，其内幕复杂，为北大多年积成之结果。林氏致函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并布告学生，自动辞职，同时留别学生诗一首，痛述苦衷。蒋氏昨发表谈话，否认裁并学系。林氏亦表示意见。”

林损回答来访的《申报》记者关于其辞职原因的询问，言辞与《北平晨报》可以互为补充：“本人辞职，因学说上意见与适之（文学院院长胡适）不同，并非政见之差异。本人系教授，教授教书，各有各之学说，合则留，不合则去。其实本人与适之非同道久矣，此次辞职，完全为闹脾气。至于裁并学系说，系学校行政，非教授所顾问。”而蒋梦麟回答记者的询问时，也表示北大组织绝不更变，下学期国文系教授略有更动，此系人的问题。

事发后，由于林损自动停课，使得选课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17日下午4时许，国文系有10位学生自行赴林宅，请求其打消辞意。林表示义无反顾，诸君诚意，只能心领。虽然来人再三请求为学生学业前途计，早日到校授课，林毫不松口，且劝学生不必挽留。来访的学生对记者表示，挽留系私人意见，将来开国文系大会，再正式要求勿萌去志。

胡适虽然早已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实际上未完全负责。“现北大决定改革国文系，该系主任马幼渔深感困难，亦拟辞职。马氏辞职后，北大当局决仍聘马氏为教授，主任一席，将请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事实上，胡博士对于此席，当不致推辞。”

据熟悉内幕者称：“自蒋梦麟长校后，确拟整顿国文系，对于课程有所革新，因革新课程，乃涉及人的问题，故林损首先辞职。学校当局对于林之辞职，表示惋惜，在学期中间辞职，更无办法。中国文学系教授对于中国文学，各有意见，现课程将有更改，系主任马幼渔

确有困难之处。”据北大教授陶希圣推测，改革国文系是因为该系预算较多，恐下学期将略有变动。[\[25\]](#)

胡适挂名北大文学院院长期间，傅斯年对于该院文史两系的事务背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件发生，他从蒋梦麟发来的函电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惟手示未提及马幼渔，深为忧虑不释。据报上所载情形论，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此在先生之当机立断，似不宜留一祸根，且为秉公之处置作一曲也。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似乎一年干薪，名誉教授，皆不必适于此人”[\[26\]](#)。大有赶尽杀绝之势。

当天，傅斯年又致函胡适：“在上海见北大国文系事之记载，为之兴奋，今日看到林撰小丑之文，为之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参加恶战。事已如此，想孟麀先生不得不快刀斩乱麻矣。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耻也。今日上孟麀先生一书，痛言此事。此辈之最可恶者，非林而实马，彼乃借新旧不同之论以欺人。试问林、马诸丑于旧有何贡献？此小人恋栈之恶计，下流撒谎之耻态耳。越想越气，皆希努力到底。”[\[27\]](#)

傅斯年分别致函蒋、胡二人，看似响应赞同，实则带有督战之意。胡适到北大后，提倡整理国故，甚至输入新知，都得到章门弟子的积极支持，尽管观念意见并不完全一致，除了钱玄同、周作人之外，与其他人的不合逐渐显露。而蒋梦麟以局外人入主从来难以掌控的北大，章门弟子的鼎力支持至关重要。对于他们而言，辞退单打独斗的林损毫无挂碍，可是要赶走马裕藻，就难免要顾及道义情面、现实利害以及舆论清议。

任教于北大的章门弟子原来与傅斯年不仅有师生之谊，还有提携之功。1918年夏，沈尹默、马裕藻、马鉴、钱玄同、刘复、陈大齐等人着手编辑《国语读本》，因“几个人空的时候很少，并且常识太不完备”，到1919年1月14日《国语读本》第二册急需着手编纂时，“拟请傅孟真君加入”，众人商议的结果，“拟请傅君先搜材料和选字”[\[28\]](#)。以未毕业的本科生而有这样的机会，还是在一众师长自觉常识太不完备的前提下，可见太炎门生对这位后生的看重。

或许正因为接近知底，声名显著的太炎门生头上的光环反而黯然失色。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大张旗鼓地对“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发难，指“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29]。

这样的罪名，的确是非同小可。照此看来，章太炎非但于近代学术无功，反而阻碍了学术的发展进步，罪莫大焉。不仅如此而已，如章的“一流人”，首先就是或至少包括章门弟子。章氏门下，除了朱希祖治史，与老师不同，黄侃的音韵学有所突过以外，其余大都尚在老师的笼罩之下。而且章太炎主张学术在野则盛，不肯到国立大学任教，如果没有弟子们的把持，也谈不上“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傅斯年之所以要对章太炎大张挞伐，真正的目标或许不在老师，而在占据南北大学文史各科要津的一众弟子。

近代学界风气转移，往往好以革命方式打倒前人，树立自我，否则城头难以变幻大王旗。而前人往往不可能真正打倒，除了少数妄人，一般也心知肚明，所以真实的目的不过是树立自我而已。傅斯年归国之时，南北各校如清华和中山大学等等纷纷伸出橄榄枝，唯独母校北京大学深陷与南北政权的苦斗之中，无所表示。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傅斯年虽已急于打倒无理的权威，破除偶像的崇拜，并没有指名道姓，此时突然发难，很可能是因为事先曾经想染指北大而遭到阻碍排拒，因而决心非根本扫除祸根不可。

据刘半农4月20日的日记：“到马幼渔处小谈，梦麟已决定辞退林公铎、许守白二人，并以适之代幼渔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幼渔甚愤愤也。”^[30]马裕藻并不在被解聘者之列，所愤在于校方对他视若无物，解聘教授居然绕开现任的系主任，况且连自己系主任的位置也早已通过非常手段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决定拿下，真是情何以堪，就算涵养再好，也万难靦颜留任，只能提出辞呈，索性连教授职位一并辞去。

三 师、生、校异趣

进入民国，北大一直风潮不断，自蔡元培改革以来，往往是师生共同对抗外力，而且多以新旧冲突为公开号召。而蒋梦麟、胡适的此番改革，虽然仍以新旧冲突为旗号，却至少看起来是挟国民政府之威，强势行政，因此不仅引起林损等人的抗拒，也没有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支持。

或许由于连番护校的同舟共济以及长期运动的疲惫，风波之前，北大国文系师生关系还算融洽，表征之一，就是1934年1月2日午后，该系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全体师生联欢大会^[31]。冲突发生后，国文系学生一直要求校院系各级挽留林损。22日，记者访晤该系学生组织的系友会干事，“据谈：本系全体同学，对林、许、马三教授，坚决挽留；对缩减经费，决反对到底；至于对胡适之先生兼主任问题，亦希望胡先生能接受同学意见，发展本系。学校当局如不采纳同学意见时，或于日内再召集全系同学大会，商讨第二步办法”^[32]。

4月23日上午9时，该系学生派系友会干事孙震奇、石蕴华、徐芳、李耀宗四人为代表，谒校长蒋梦麟，对该系发展及挽留马、林、许三教授，有所请求，并提交改革国文系的八项书面意见：一、反对将国文系并入史学系。二、请勿将国文系经费减削。三、请勿变更该系现行分组组织法。四、此后学生对增进系务向校方提出意见时，请校方予以接受。五、对变更系主任人选无成见，亦不表示迎拒态度，但继任者须真能改善并发展该系，否则决反对。六、请挽留林损教授。七、请挽留许之衡教授。八、请勿准现系主任马裕藻教授辞职。看似不偏不倚，实际上主张维系原状，至少人事变动方面与蒋梦麟等人的诉求背道而驰。

面对学生的请求，蒋梦麟逐件答复：国文系绝对不并入史学系；国文系经费减削，是因为本校经费亏欠五万余，如不整顿，势将破产，故择重复而不需要之课程，酌予减少，决不阻碍国文系之发展；变更国文系组织与否，系新主任之职权，无法答复；学生有所建议，本人极为欢迎，如学生意见与教授冲突时，则采纳教授意见，因教授为当然指导者，其意见当较学生为真确；胡适下学期担任主任最适当，其决不因学生之迎拒而定就职与否；挽留林、许二教授问题不必谈论；马辞主任，因其任事二十余年，工作过劳，不妨略为休息，但教授职务，决不使告辞。

至于该系改革后的课程计划，约为：（一）注重新旧文学、文艺理论、文艺思潮以及世界民众文学之介绍。（二）文学院一二年级课程打通，注重三个目的：（甲）凡文学院求知工具，均须特别提倡。

（乙）使文学院一二年级学生，均得到世界近代一般文化之熏陶，以便明了中外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其相互关系。（丙）使各系主科得有研究方法，择一重要问题研究，以便得有相当途径。^[33]

关于此事，《世界日报》的报道更加详细，而与《北平晨报》所说间有不同，学生代表所提七点要求为：（一）本系全体学生，反对与历史系合并。（二）本系全体同学大会，认为谋全系之发展，非经费充足不为功，故反对缩减经费。（三）本系此次改革，同学毫无成见，不过应保存文学、语言文学、文籍校定等三组。（四）全体同学拟定课程意见书，务请学校当局采纳。（五）主任人选，同学概不表示意见，惟以能接受同学意见，共谋本系之发展者始可。（六）系主任马裕藻及林损、许之衡，皆系多年之老教授，务恳学校予以挽留。

（七）马裕藻态度如何，请学校表明意见。

蒋梦麟答称：所谓合并文史两系，学校根本无此拟议及办法；经费问题，自民国十九年至今，亏款共五万余元，每月一分利，则须五百元。“若长此拖延，则非只国文系不能生存，即整个北大，亦将灭掉于社会。故此后拟每月储蓄五千元，其抽款办法，一由事务，一由教务。事务方面，所有冗员及一切开支节省；教务方面，凡课系重复者，与事实上不需要者，酌加减少，而减少范围，亦决不影响国文系之发展”；“国文系既然改革，所有课程，当由新主任重新规定，本人不能答复，且既曰改革，又何能表示成见”；“同学方面意见书，决竭力采纳，然教授亦同时建议于学校，或与同学建议相抵触者，则接受教授者，因教授之见解，当然较为真切”；“主任人选，前已商请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先生暂代，彼允考虑后答复。假使彼不愿就职，当无所谓迎拒，如彼愿就斯任，则任何阻碍，均不计及也”；“林损、许之衡两先生，均有难言之苦衷，而为谋国文系之整饬，势不得不于下年度解聘，现在亦决不挽留”；“马裕藻先生，因彼在本校服务达二十余年，而且年事已高，目前亦不妨借此机会休息数月。但下年度无论如何，要请其担任教授职务，钟点不计”。

在随后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蒋梦麟又进一步表示：改革文学院的目的，“即在消除以前‘系自为政’，各不相问之弊。盖处今日之世界，无论研究何项学问，首需有求智工具——中国文语、外国文语、

世界历史。故余改革文学院计划，决首先授全院学生以此种工具（以前系自为政时则不然，例如国文系学生，对外国文语不注意等等），然后使之充分明了历来中外文学之沿革，及外国文学输入中国后之影响及趋变等等问题，最后乃为学生开辟一研究途径，使其将来专门研究某种学问时，有所遵循。刻胡先生允助余实行，则将来结果或能为国家养成不少人才。总之，此种改革，含义极大，扩而言之，可谓非单纯的北大问题。故欲谋达到其目的，其枝节问题，如马、林、许三先生事，虽不愿为，亦不得不为，盖此系一种国家公事，不能以私人友谊延误”。

蒋梦麟对学生的请求，看似耐心解答问题，实际上态度相当强硬，无异于宣称必须按照当局的既定方针办，没有任何松动的空间余地。而他对记者的解释，看似冠冕堂皇，但前提是所主张的改革的确有利于国家及北大，而几位教授则是改革的阻力障碍。这一前提的两方面都是假设，均不能坐实。以国家的名义，强势推行某种学术观念，不仅有违其历来所宣称的思想主张，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只有在中西新旧乾坤颠倒的大环境下，才显得义正词严。

当天学生代表又分别访晤马裕藻、林损、许之衡等人，许外出未遇，林损表示决不复职，同学如愿听讲，可来我家授课（林在北大授“秦汉文”、“释典文学”等二科）。马裕藻则出示了4月22日手书致全系同学函，内称：

本系此次变更教授及主任问题，乃数年来久悬未决之案，前因未至公布时期，故一时未能泄漏。今既正式宣示，则藻之去职，自属当然之举。昨日阅报，知诸君开会，有所议决，藻以一日长乎诸君，用特略抒鄙见，幸垂察焉：（一）本系每月经费，前学年约四千四百余元，本学年已减去四百余元，此后似乎不宜再减（本校为国人自创大学之较久者，国文学系之特别发展，亦属当然）。若能稍增，尤所望也。藻对学校当局，亦当以个人资格，恳切陈述。（一）本系组织，虽不敢谓绝对合理，然在最近时期，似尚未发见如何悖谬之点，此后若能更向合理之途改进，亦为夙所期望，诸君缜密思维，毋多固执，幸甚！幸甚！（一）本系经费及组织二者，若能规定，则人的问题，即可不必讨论。就情感言，一时不无惆怅之意，然因此而损学业，则关系甚大，想诸君初衷，决不谓然也。此外尚有一端，亦为诸君所应注

意者，即文学院各系，亟应沟通是也。关于史学、外国文学两系，与国文系，如何沟通之办法，曾与陈受颐先生商谈，惜未得具体的结论，此后若能将此事实现，则本系宽裕之款，尤可使本系更得有所发展，岂不甚善。书不尽言，敬希诸君努力自爱。

[\[34\]](#)

尽管马裕藻内心很不以校方的做法为然，仍然从大局出发，维护北大的声誉，顾及同学们的前程，反过来劝学生以学业为重，以北大为重。相比之下，蒋梦麟非如此不可的态度，虽然自认为正确，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又有前此国文系系自为政的前科，仍然显得有些强横霸道。主张自由者得势不饶人，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弊端，尤其是往往是否得理尚在未定之数。文化守成者指新文化派专制，由此可见一斑。

24日，林损再度致函胡适，“全函虽然不过百字，而措辞异常激愤，似近谩骂，且其函末曾有‘盍张尔弓，遗我一矢’之句，满带与胡氏挑战之意味。记者睹此函后，即驱车往访胡氏，比承胡氏接见，记者即询以对于此函之态度，及对于国文系各项问题之意见，据胡氏答称：‘余并未收到林先生第二次之来信，此次国文系解聘教授事，事极平常，诚不得谓之风波。至关于合并国文系、史学系为文史系之说，恐系上次茶会中我所说的将文学院改为文史学院之误传，此不过在茶会中拿来当一种笑话去说，况教育部大学组织法中，亦无文史学院之规定，当然不能成为事实，且此事蒋校长亦加否认，想外间不致更加怀疑。下学期文学院教授无大更动，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已由蒋校长兼代，本人拟于下周起，赴校办公。对国文系主任职，就否未定。国文系将来宜多聘中西文学兼通之教授。’语至此，记者即问：‘闻梁实秋先生将来北大任教，确否？’胡答：‘不确，即欲聘梁先生，恐梁先生亦不能来。’” [\[35\]](#)

胡适对梁实秋评价不高，但是校长也不敢随意回答的人事安排，胡适却直言不讳，若是未定就否，难免僭越之嫌，否则恐怕早已决定，只是对外尚需推辞做作一番。所谓多聘中西文学兼通的教授，也表明其聘请方针，而这正是解聘林损等人以及改革系务的主要理由。至于兼通中西文学，与学贯中西一样，都是唬人的大帽子，认真追究，西方文学不过是东方人心中的想象，西方人并不知有此物的存

在。即便将欧美概称西方，大概也无人敢于自称通西方文学，正如国人很少敢自称通中国文学一样。更何况什么是中国文学，也还意见分歧。一边都不通，如何兼通？实在有自欺欺人之嫌。胡适所说其实不过是当年治中国哲学史用西洋间架填充中国材料的翻版，兼通就是要将固有材料放进西方文学的框框里去。

24日下午四时，北大国文系系友会召开第二次干事会，交际股首先报告与当局交涉及挽留林损等人经过，并加以检讨，未得圆满解决又无法进行者，提交第二次大会讨论，并通过议案：一、意见书本星期末征集后应尽早整理就绪，备交第二次大会通过。二、交际股应至马、林、许三先生处正式慰问。三、闻王[刘]文典先生有意调停更动主任事，交际股应速往正式请其出面调停。四、再向学校当局挽留马、林、许三先生。五、决定课程意见书原则，应采兼容并顾主义。会后交际股某干事称：本股代表明晨再谒校长，挽留三教授。当晚系友会又公函全体同学，征集课程改善计划书。[\[36\]](#)

由于国文系学生认为解聘三位教授有碍该系的发展，25日上午九时，系友会干事会再派代表孙震奇等四人谒见蒋梦麟，再度挽留林损、马裕藻、许之衡三教授。蒋表示：“此次马、许、林三君之变动，本非余所愿为，但为发展北大国文系计，为同学学业计，不得已而出此。诸同学之挽留，为师生感情上必有之表示，故不认为意外。关于林、许二先生之辞职决无办法，至于马（裕藻）主任，学校下年度仍请其担任教授，同学与学校之意见，现渐趋吻合，相信此问题不久即可解决。同学之国文系课程改善计划书，本人当于学校经费及课程标准及不阻碍国文系发展原则之下，决竭力采纳。”[\[37\]](#)《世界日报》26日的报道称：蒋梦麟对于学生取消解聘的意见表示“此事决难办到，且不愿再谈。在此项办法未决定前，渠本人亦踌躇再四，不欲执行，但最后因谋发展国文系起见，只得忍痛为之”。代表们无奈，遂退出。

下午三时，代表分赴三教授私宅，代表全系同学，备致慰问之意。马裕藻等均表示回校事可不必谈，林损且劝全系同学，安心读书，对国文系此次事变，幸勿使其扩大，致误学业。此时据说胡适经蒋梦麟坚请兼任国文系主任，再三考虑，已有允意。而马裕藻的系主任任期到该学期末终了，不再续任。系友会代表下午五时又访晤刘文典，探询对调解系主任问题之方式，得到的回答是，前曾以私人资格

分访蒋、马，均未获见。拟最近再度分访两人，方式为请马继续担任教授。^[38]

4月27日，马裕藻携辞职书亲赴毛家湾蒋梦麟寓所面呈，请从下学年起辞去教授一职。“当由蒋恳切慰留，谈至数小时之久，马仍未允。”次日上午，“蒋亲至马宅，并携亲笔慰留函，劝打消辞意，态度十分恳切。相谈约两小时，闻马经蒋再三挽留后，可望打消辞意”。该报还披露了两人的往返函件，马函谓：“孟麟校长：藻在本校服务，垂二十年，毫无他技足称，诵秦誓之词，益足令人惶愧。请于下学年起，辞去教授一职，敬希俯允。”蒋函谓：“幼渔先生大鉴：昨奉手教，并承屈驾，以拟下学年起，辞教授职为言，当即恳切面留，未蒙即允为憾。适之先生闻之，谓万不可听先生远引。特再奉恳，并踵府面请打消辞意，务乞惠然允诺，无任感禱。先生服务本校，垂二十年，为校为学，成绩卓著，岂忍一旦舍去耶？专此即请教安。”^[39]据此，胡适显然担心马去物议太甚，不敢贸然采纳傅斯年趁机一鼓作气扫除祸根的建言。由此可见，在人的去留问题上，胡适的态度意见至关重要。

5月1日，国文系系友会举行干事会，讨论目前亟应解决的各项问题，决定的事项之一，是由交际股派人探询马裕藻和胡适的最近态度。^[40]5月2日，系友会干事孙震奇等四人因为三教授辞聘问题迄未解决，分谒马裕藻和胡适，探询意见，结果极佳，决定于8日召开国文系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挽留三教授及审查该系干事会草拟的改善国文系课程发展意见书。马裕藻在寓所会见来访者，回答对下年度教授职是否允就以及对国文系改组各事的意见，表示六点：一、学校改善国文系，系学校行政，本人无反对必要，况个人主持国文系时，本未使之臻于尽善尽美。但将国文系根本推翻，则不敢赞同。二、不主张缩减国文系经费。三、林损为人耿直，言谈间难免直率，学校正宜竭力采纳其意见，从事发展国文系。今竟因其言谈直率，影响解聘，个人认学校为不智。四、国文系可与文学院其他各系相沟通，俾收研究上种种之便利。此外并就北大国文系所未办者，成立考古学系、东方文学系、语言文学系三系，以补文学院课程所不足。五、下年度教职，须看学校对本人主张是否采纳为定，如不采纳，当不能就。六、去职后，关于国文系主任人选，就北大国文系范围内言，胡适自兼尚属勉强，他人恐难胜任。

或者称，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后，厉行改革，马裕藻系主任的位置岌岌可危。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历数自己任上的基本工作，说明国文系改革面临的困难，对胡适不满意的地方进行解释。据看过信的人评论，那种语气，就是下级向上级提交的一份报告和答辩，透着愤懑和无奈。随后，他辞去系主任职务，带着“好好先生”的头衔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即便偶尔被提起，也往往是作为陪衬。甚至没什么人记得。就马裕藻的上述表态看，与所描述的相去甚远。

当天下午四时，四位代表又到第一院文学院院长室见胡适，首先问道：若马裕藻去职，是否允就主任？胡适表示：“蒋校长过去曾对我谈，北大国文系向负声望，外间对国文系，亦有相当之认识，为更求发扬光大计，故有此次之改革。马主任如认此种改革困难，学校当另请新的主任主持云云。故本人对国文系主任就职与否，须俟将来事实需要而定。”代表又问如将来就主任，国文系如何改革，俾便发展。胡谓：“就本人之意见，改革将分三项原则：（一）注重学生技术。吾人以为学生研究学术，如国文系之文籍、校订、语言、文字等学科，无论任何一种，均应注意技术上之研究，始有充分之进展。

（二）历史之系统。现在国文系定有唐宋诗、六朝文等课程，吾人不应仅就一二人加以研究，尤应研究其历史之变迁。（三）增加比较参考材料。研究学术，须与他科为比较之研究，如研究外国文者，须与中国文互相比参考，始能获得新的结果。”[\[41\]](#)

《世界日报》的报道，马裕藻的答复，与《北平晨报》几乎一样，而胡适的谈话则差别不小。胡适说：

蒋校长现在对文学院，甚表示失望，他希望我来改革文学院，文学院之改革，第一便是教授问题，解聘旧教授容易，但添聘新教授很难。前因敝人有病，且北平不安，所以文学院既没有从事改革，现在想从事改革文学院，且蒋校长允于遇着困难时给帮忙，所以我仍允就院长一年，以便从事改革。至于国文系主任一职，愿于必要时（即发生困难时）担任一年。关于林、许二教授之解聘，预先予以解释，原系好意，不料反被误会。功课计划书，少数人之意见，亦当注意到。关于国文系将来之改革，第一，须注重技术之获得，即由学校请人帮助同学研究，而使同学获得一种治学方法。第二，关于历史方面，应有系统，添设总

史、分史等科，课程须名符其实。第三，多得比较参考之材料，如文法须知比较文法，语音学须知比较语音学等。注重门径，此种课程须加多，但此课须聘新人来教授。第四，多添研究科，因研究科之课程，往往非讲堂内所能讲。第五，为降低课程标准，提高训练。[\[42\]](#)

关于此次风波，胡适日记刚好失载，直到5月2日，才记到相关事情：“第一天到北大文学院复任院长。国文系的学生代表四人来看我，我告诉他们：

（1）如果我认为必要，我愿意兼做国文系主任。

（2）我改革国文系的原则是：‘降低课程，提高训练。’方法有三：

①加重‘技术’的训练。

②整理‘历史’的工课。

③加添‘比较’的工课。”

与《北平晨报》的报道比较，各有异同。是年北大文学院旧教员不续聘者除林损外，还有梁宗岱、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以及一位外籍教师。[\[43\]](#)

按照蒋梦麟等人的约定，解聘教授一事，胡适或许的确并非主动，可是要说毫不知情，也有违事实。看到林损的来信，胡适于4月16日即复函道：“今天读手书，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之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44\]](#)

可是在林损乃至马裕藻看来，胡适的作为就没有那么襟怀坦白。据马叙伦记：“盖攻读有节概，犹是永嘉学派遗风，既不肯屈己附人，而尤疾视权势。……其在讲堂，有刘四骂座之癖，时时薄胡适之，卒为适之所排而去。”^[45]从傅斯年的态度看，他对林损并不十分在意，而蒋梦麟必欲解聘林损，应是受胡适的影响。虽然林损骂人甚多，被骂最多的还是胡适。马裕藻认为林损被校方解聘是因为言谈直率，其直率的锋芒所向，各方均心知肚明主要就是胡适。由蒋梦麟出面作恶人不假，至于向谁作恶人，事先不可能不与胡适协商。若是如此，胡适仍然难免公报私仇之嫌，至少也是真心实意地假正义之名报了一箭之仇。

4月22日《京报》报道：“北京大学将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二人自下学期起解聘，并聘请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国文系主任，胡已允就。该系主任马裕藻因此遂提出辞职。学生会议决，组织系友会，并推派代表，携课程计划书，谒见该系当局，贡献改进该系课程意见，对新旧主任交替事，亦将有所表示。惟据蒋梦麟昨日语记者，马裕藻主任辞职，校方尚未接到马氏辞职书。”蒋梦麟还声称：“解除国文系两教授聘约，系自下学年起，本学年内并不更动，故除林损先生未到校上课外，许之衡先生仍每日照常上课。学校下学年起，各系课程均拟从新计划。各系经费，在月入七万五千元之款额下，将加紧缩。国文系裁并科目与解聘教授，乃总计划及经费紧缩政策之一端。关于国文系及其他一切学校行政，校方均有妥当计划，例如国文系课程计划书，自在筹拟之列。该系学生如有意见，固可陈述，以供参考。但学校自亦有妥当计划。至国文系主任，此亦涉及学校行政范围，学校自有权衡为之。设有人竟反对胡适兼国文系主任，余绝对不答应。胡适‘学贯中西，国家之宝’，胡兼国文系主任乃北大之光荣，求之不得，岂可反对。”^[46]此言大有替天行道，顺者昌逆者亡的意味。

改革国文系之事，很可能是傅斯年鼓动蒋梦麟及胡适所为。蒋梦麟历次回答学生和报馆的询问，关于解聘教授的态度如此决绝，也依稀可见傅斯年的影子。没有傅的督催，蒋梦麟或许不忍下此狠手。而傅斯年的想法，与胡适相当吻合。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仅仅针对林损，而是包括林损在内的一切进步的障碍，其中自然也有马裕藻，甚至首当其冲的就是马裕藻。

马裕藻与胡适的矛盾由来已久。本来双方都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同道中人，胡适的整理国故、文字改革等等，也得到包括马裕藻在内

的章门弟子的支持。双方合作既多，日常交往也不可免。回国初期号称不应酬的胡适，后来常常是章门弟子名目繁多的饭局宴会的座上客。不过，在学术理念上，马裕藻不像钱玄同那样一味趋新，也不如黄侃那般主要仍旧。久而久之，双方的不和谐就暴露出来。1925年8月28日，“北大开评教联席会议，脱离案仍未报行。闻幼渔对于适之几致冲突”^[47]。虽然此后两人仍然能够共同参与必要的应酬，没有完全翻脸，彼此内心的不以为然却逐渐积成怨愤。

蒋梦麟的改革国文系、辞退林损等人的教职和取代马裕藻的主任位置，应当事先都与胡适商定，却并未征求国文系教授会以及主任马裕藻的意见。按照新的组织规则，聘请教授固然是校长院长的分内之事，但是不等于完全无须必要的程序，可以私相授受。此事不仅令林损觉得有辱斯文，马裕藻也感到相当难堪。所以，风波乍起，马裕藻就明确站在林损等人一边，指责蒋、胡处事不公。他被迫辞去主任之职，倒未必是要与林损共同进退，而是像林损一样，避免被赶下台的屈辱，给自己留一点学人的尊严。

四 挽留背后的矛盾

胡颂平称林损骂人的信引得舆论界大起反感，有些想当然耳或是一面之词。实际上，当时中国正面临内外紧张局势，北大的风波并未引起多少关注，除了北平当地的报纸，尤其是《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等几家较为关注教育界的报纸外，南北各报报道此事的为数不多。上海只有《申报》详细报道了各方的意见，看不出偏袒任何一方，其他各报也几乎不持立场。

冲突的相关方学生的态度值得特别注意，1929至1931年间，北大和北师大曾经不约而同地发生以将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等人赶下系主任位置为目标的学生风潮，背后显然有人指使挑动。而这一次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却一再要求校院主管挽留林损和马裕藻，使得蒋梦麟和胡适多少有些尴尬。尽管学生们并不反对改革，也不排斥胡适，却不忍看着教过自己多年的老师如此离去。此前在北大先后被南北政府长期停发经费的艰难时期，他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而且学生们似乎并不认为林损等人太旧，甚至不认为旧即不是学问。

5月8日下午四时，国文系学生在第一院召开全体大会，出席者40余人，主要讨论通过课程计划建议书，以及交际股报告见蒋、马、林、许各二次，刘文典、胡适各一次的经过，并通过多项议案。关于系主任问题，决议以有真实学问而接受同学意见者为标准。马先生问题案，决议新主任不能接受意见时，则坚决挽留马先生。对林损“不再作形式之挽留，但求同学能明是非，因事态之发生，尽人皆知其内幕，而林先生更非反顾之人，同学亦均清楚，徒作形式，反与林先生之令名有玷”。计划书则文学组增世界文学史、释典文学，文法研究改在语言文字组，诗律改名，世界名著介绍不作必修或选修，新文艺试作不考试。另外通过临时动议：课程应名实相符，讲授者须真有实学；赋予干事会善后之权；失败时发告同学与当局之宣言；以系友会名义送林先生离平。

会后，又续开干事会，讨论执行会议决案办法，定于5月9日派交际股赴第二院办公处谒蒋校长，陈述大会议案，并提出课程计划意见书，请求采纳。所提出的国文学系课程大纲为，一年级共同必修科：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诗名著选、中国文名著选；二、三、四年级分组必修及选修科：语言文字组：语音学、语音学实验、言语学、音韵沿革、古音系研究、中国近代语研究、方音研究、说文研究、金元以来北音研究、形义沿革、清儒古韵学书研究、甲骨文字研究、钟鼎文字研究、蒙文、藏文、满文、中国文字及其训诂等韵学；文学组：文学概论、文艺批评、文艺心理学、近代文艺思潮、新兴文学概论、中国小说及小说史、诗史、词史、曲史、三百篇、辞赋、乐府、汉魏六朝诗、词、曲、诗律、唐宋诗、周秦文、汉魏六朝文、世界名著介绍、修辞学；文籍校订组：中国文字及其训诂、音韵沿革、经学史、国学要籍解题及其实习、古籍新证、考证方法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校读实习、三礼名物、古典制学、金石学、古历学、古声律学、外人所著中国学书研究、中国文法研究。三组共同科选修：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该会代表孙震奇会后还向记者转述了访晤胡适关于课程的意见。[\[48\]](#)

9日上午，国文系系友会四位代表谒见蒋梦麟，当面呈递改善国文系课程意见书，再度请求不缩减国文系经费，保留国文系三组，希望学校竭力采纳意见书，新主任资望必使同学满意，采纳同学意见，希望学校仍聘许之衡为教授。蒋表示国文系经费在不妨碍发展的前提下可酌予缩减；希望同学不必坚持保留三组，如有较保留更好的办法，

可以采用；改善课程意见书斟酌考虑后，再定取舍；新主任胡适先生，学识之丰，品德之高，无待赘述，相信其能副学生之望，同学如有更好发展国文系的建议，相信胡不可能不采纳；许之衡的续聘，现在不谈，将来再议。代表们又请特别注意意见书中每门课程内容应一致以及各门课程教授之聘应能胜任两点。

另据北大某重要负责人称：学校认国文系主任、教授之解聘事不成问题。一校行政之兴革，权在学校。此次学校为整顿国文系计，始于人事上稍有更动，变更之后，必有赞成者及反对者，此亦常情。学生对于国文系如有更好之发展计划，学校当竭力采纳，否则即全体反对学校之计划，学校亦不便更易其既定计划。今日蒋校长见学生，对各项要求已有相当答复，想国文系问题，即可告一段落。又据关系方面消息，蒋梦麟意以胡适兼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是否留任教授，要看学校对其发展国文系计划是否采纳而定；蒋有意续聘许之衡教授，暂不欲发表；林损则决意去职，以免难堪。[\[49\]](#)

事已至此，国文系系友会干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将该系问题结束。5月14日。该会发出两份布告，宣布对于挽留解聘教授等事“进行结果，因限于环境，未臻圆满”，拟即告一段落，“非敢有所懈弛，实因事态发展，似已达于绝境，即使再事进行，亦恐无从为力。惟诸同学如有见教，同学等定当仍本初衷，继续努力也”。对于改革计划，在校方具体表现之前，亦无从再行交涉，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如有三分之一以上同学有具体意见，即召开第三次全体大会，讨论进行。此外，林损决定于5月20日离平返籍，现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延聘其担任音韵学及文字学教授，尚在考虑中，待南归扫墓后再做决定。“国文系学生因林在校执教鞭已届十载，一旦别离，颇有恋恋不舍之意，已决定日内由同学私人发起欢送会，现在征求同学同意中。”[\[50\]](#)

欢送会最后是以系友会的名义出面组织。6月5日下午二时，北大国文系系友会以林损解职将返浙江原籍省亲，特在中山公园春明馆为其置酒饯行，并邀北大教授马裕藻、陆宗达作陪。届时国文系全体学生40余人到会，系友会代表孙震奇致欢送词，首述惜别之意，次对挽留未遂，深感遗憾。林损接着起立答词，多勸勉学生努力学业，勿徒重情感之语。后马裕藻、陆宗达相继起立发言。五时许摄影，尽欢而散。会后林损对记者说：“余做事一向主张合则留，不合则去，故此次去北大，本无何种留念。今日承国文系学生欢送，余于惭愧之余，

复生无限之感慨。余已说知学生，努力向学，莫负国家培植青年之热望。本人二三日内即携眷离平，返浙原籍休养。广东中山大学近虽有函请余前赴该校掌教，惟余拟作长时间之休养，故不准备前往。”

[\[51\]](#)

这次风波，以校方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而告结束，不过，就算舆论赞同改革的一方，就算学生赞同改革，按照蒋梦麟以师为重的判断标准，也不等于林损等人就毫无道理。这一点从马裕藻与蒋、胡的分歧中可以清晰呈现。熟悉内幕者所说的“中国文学系教授对于中国文学，各有意见，现课程将有更改，系主任马幼渔确有困难之处”，究竟意见分歧如何，困难何在，值得深究。胡适后来回忆此次风潮，宣称“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52\]](#)。这应该也是胡适当时极力掩饰的心迹。至于胡适眼中的最无用和不相干，未必真的就是无用和无关，只是他不懂、或者虽然略知一二却不以为然罢了。

4月24日，因“北京大学国文系纠纷，校长蒋梦麟主张急进改革，学生及系主任马裕藻主张缓进，因意见不同，暂难解决”，《京报》记者特地采访马裕藻，后者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此次国文系改革问题，一方面固属思想问题，他方面又为主张问题。本人以为，研究学问，应新旧思想并用，既不反对新，亦不拥护旧，新者更有新，旧者亦有其研究之价值。新派讲方法，方法固需要，但对于文学，不可仅讲方法，而不研究。胡适之先生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学生专讲方法，以为阅读《哲学史大纲》即可了事，而不读子书，此不可谓研究。研究学问，不论新旧，辜鸿铭亦可请到北大讲课。大学与中学不同，中学须有统一思想，以免脑筋紊乱，大学则不应思想统一，必须新旧并用，始能获得研究之结果。林损先生与胡适之先生意见不合，业已四年，本人则在两者之间。蒋先生（孟麟）曾向余谈改革国文系，余亦赞成改革，惟改革之方法不同。余自民国十年迄今，查阅课程指导书，每年均有改革。余对于改革国文系，应采用缓进方式，另有人主张采用急进方式。急进固称改革，缓进亦不可谓非改革。……故此次国文系问题，系急进与缓进主张之不同，并非大改革。缩减经费一层，本人亦赞成，但国文系已由四千四百

元减至四千元，此刻不能再减。中国人自办之大学，似乎不可以外国人之方法办理中国文学系。至于本人辞职，毫无问题，学校行政，自有校长负责。[\[53\]](#)

马裕藻的这番言论，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学”变迁的一大症结。这也是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事件表面的人事纠葛背后最为关键的要害问题。之所以不厌其详地梳理相关史事，正是为了让背后的意义逐渐浮现，不再仅仅是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文坛轶事或为乡前辈钩沉辩诬的学林掌故。

自从晚清受西学影响分科治学以来，关于中国文学的内涵外延就成为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后来虽然未必争，却也是各说各话而已，根本达不到约定俗成。傅斯年指马裕藻的新旧不同之论为欺人，质问林、马于旧有何贡献，实则历史进程恰好表明，至少在中国文学方面，新旧不同确为不争之的论。

中国学问本不分科，晚清以降，受西学制约，中学被放入西学的框架重新安置。即便如此，哪些放入哪科，仍然见仁见智。按照宋育仁“书不是学而书中有学”之说，四部虽不是学问分科，可是四部之中可以窥见学问的渊源流变及其分支类别的联系区别。这也是《四库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能够指示自学者门径的道理所在。西学传入之后，中学与西学如何汇通，四部之分看似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产生了困扰，使得似是而非看起来有模有样。叶德辉即以集部为文集别集，对应于文学。而这样的对应能够适合部分仍旧者的文学见地，无法与趋新者相吻合。近人所写中国文学史，眼界相去甚远，不要说林传甲、钱基博的著作，就连傅斯年的讲义，也被认为并非文学史。由于无法统一，便生出广义狭义之说，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是无可奈何也无可如何的懒人办法，有用却无效。若以新文学的观念看，钱基博等人的文学史就与思想史大同小异；若用固有的文学观念看，现在通行的文学只是新式的文学，内容多在到处放不下只好硬塞进去的子部，正式的文反倒不在其中。

中国文学的变异所导致的紊乱，始终困扰着人们的认识，中国文学系亦即国文学系应该讲什么，怎么讲，莫衷一是。早在1917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之时，就着手改革，首先即学科之变动，而变动的关键，就是如何进一步在西学架构下安放中学到至当。对此见仁见智

之事，立场不同，看法各异，分歧在所难免。《申报》报道当时的争议道：

陈氏之意，务在调和新旧两方面之思想，使“古代为黄金时代”与“愈至后世愈进化”两说并存，于是其中遂难免二者思想之冲突。故第一次文科教授会议，其间遂生无限之争论。此事吾人初未明其真相，兹据当时在坐某君之言曰：此次大学文科之争议，决非如外间所传闻，吾人直可断为当然之争议，且各出于良心之主张……陈学长之本意，以为教授科目与其程序，皆应与世界普通之分类相合。其提案之要点：（一）哲学中不当立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之名，而于哲学史中始以地分之。（二）经书当依其性质分列文学、史学、哲学之中，不必再存经学之名。（三）讲中国文学史者自古迄今，讲中国文学者则当自今迄今云云。此种提案果确合于吾国情形否，姑不具论，要为世界言文学者普通之说法，然颇不合于旧派文学者之心理，反对最烈者为陈介石、黄季刚二教授。陈氏之意，以经为中国所特有，故无妨即特存经学一部，黄氏之意，以为文学史可自古迄今，文学又何必自今溯古。持之既久，遂不免言语之冲突。校长乃宣言再付评议会决议。[\[54\]](#)

陈黻宸、黄侃二位的想法，稍早的1917年2月3日，朱宗莱（蓬仙）在马裕藻宴请的饭桌上就有类似表示：“大学分科讲文学，未知其范围如何？如系西洋式的讲授，则无从讲起，不特无以逾于桐城派，且恐流于金圣叹一路。”在场的钱玄同则认为：“此说余未敢谓然。论文学自身之价值，自当以美文为主（即所谓西洋式的），然说理、记事两种，既用文字记载，亦自不可不说明白。”[\[55\]](#)

类似的争议，后来陆续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处反复出现，观念各异的人们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明白，或是无法让他人明白自以为明白的意思。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一些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改称国学系。1930年代北大国文系改革前后，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古直针对该系入学考试只有白话，发起改革课程，以经为基本国文，子史辅之，课程设置分必修、选修二类。必修以群经、史传、小学、文选为主，选修则泛滥

于经传、四史、诸子、专家、骈文、诗词。此举大有改国文系为国学系之势，遭到容肇祖的反对，结果容被调整到史学系。^[56]此事后来激成全国范围的读经与反读经，凸显了新旧之争的意涵，而使得经学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学究系何物、该如何教、教什么的意旨被冲淡，甚至完全淹没。

读经与反读经的论争沉寂之后，困扰时人的中国文学观念并未得到澄清。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要纠正学生“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的思想，声称：“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57]1949年以后，大陆的中国文学系进一步更新，与此前新旧兼容的中国文学也有所差异，以致今日海峡两岸的中文系交流之际，常常有不相啻枘之感。

凡此种种，都表明马裕藻当年所主张的新旧不同、应当兼容的理念并非错误，以今日的中国文学观，究竟能够理解中国固有文学到何种程度，不至于变形走样、似是而非，已经是强人所难的事情。此事凸显近代学人以新旧夺人话语权的流弊匪浅。傅斯年与他人论战之时，常常好故意剑走偏锋，所强加于对方的罪名以及所划分的此疆彼界，未必都如所说。在考古问题上与河南人士的冲突，指对手不知近代考古，只会挖宝，便有深文周纳之嫌。史语所拒读书的人于千里之外，主要也在人而不在学。章门弟子中同样好故意偏激的钱玄同，到1926年已经开始反省“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笃旧的信奉者只要无害于他人社会，就应该任其发展。“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58]中国文学要想兼顾古今，就难免牛体马用之讥。就此而论，马裕藻的新旧之论反而有先见之明。如果当年多一些包容，现在自然就会少了几分尴尬。

作为解聘风波主角之一的林损，其学行究竟如何，是把握解聘及马裕藻竭力维护行为是非曲直的重要参证。对此立场各异者人言言殊。同门马叙伦称：“攻读之学，受于介师（指陈介石黻宸）及师之从子孟聪（陈怀）。长于诗文，倚马千言。八叉成诵，洵不虚也。其文畅达，位置当在魏叔子、邵青门间，时亦有汪容甫风格；诗则才华斐瞻，深于表情。”^[59]陈黻宸清季即在京师大学堂掌史席，太炎门生以外的浙江籍教授，与之多有关系，被胡适视为北大温州学派的主角。陈独秀改革北大文科时，陈黻宸的看法与黄侃相似。而黄侃在同

门中虽然脾气古怪，学问却是最好。黄侃与林损关系甚佳，曾与之诗酒唱和。林损任教东北大学期间，还举荐黄侃应东北大学教授之聘，两人朝夕切磨，情谊益深，所谓“辽东充隐日，携手每同车”，“对坐忘君我，时时苦诤论”。后林损不安于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之职，颇感孤寂，黄侃又为之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处联系教职。其侄林尹（景伊）从学黄侃，并娶黄侃甥孙女为妻。林损辞职后，黄侃以其下期行止靡定，颇以为念，再为其谋中央大学教职，对林颇为敬重。

黄侃好骂人，对门下士尤其严厉。林尹与之相处，“恐不胜骂而不堪其骂也”，特请林损即来一函。^[60]能够降得住黄侃，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虽然胡适对北大的温州学派相当轻鄙，蒋梦麟视林损为改革的障碍，可是后者离开北大后，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争相聘请，私谊之外，总有学问的根基。从胡适、刘复等人的西式标准观念，自然很难领悟林损一类学问的佳境胜处。这也是马裕藻反对急进改革主张缓进的重要原因。其坚持新旧并用，意即随时间自然协调演化，不必主观强求一律。

林损进北大甚早，曾以一人之力，办一刊物，名曰《林损》，内设若干栏目，所发表的文章，全是林损自己的作品。此事堪称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一桩奇事。五四前后，他对趋新与守旧均不以为然，以为学无所谓新旧，更无须调停，惟求其是而已，并与兄林辛（次公）、师之从子陈怀等人创办《惟是学报》，倡捐新旧文化之争。吴宓曾与之久谈，即“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61]。类似的评语，吴宓只给过陈寅恪。2002年，台湾读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陈镇波所编《林公铎先生全集》一、二册，可惜有始无终。2010年，黄山书社出版了陈镇波、陈肖粟编校的《林损集》，林损一生的著述，大体完璧。无论当年北京大学如何取舍，历史终究应验了马裕藻的主张，还各人应有的地位。

五 消沉与发奋

风波过去，胡适兼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7月13日，《申报》刊登蒋梦麟的谈话，后者称：“对聘请教授亦取人才主义，不论私交，亦不顾与学校历史之久暂，纯以其个人能否及肯否负责教授为转

移。……故今年对老教授之解聘者，亦所难免。”^[62]算是北大校方对国文系解聘风波的正式结论。林损离开北大后，任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10月11日，朱希祖在南京应缪凤林宴，与林损同席，忆及民六蔡元培长校北大，在教员休息室戏谈卯年生的朱希祖、陈独秀为老兔，胡适、刘文典、林损、刘复等为小兔，如今各人或死或走，“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渎遇，不无感慨系之”^[63]。感慨之中，透露出对胡适、傅斯年之类学术官僚把持学术的不满。

对于北大教授解聘辞职风波，钱玄同的立场显得有些尴尬，仅于4月18日在日记中记了一句：“今日报载北大教授林损下半[年]将辞退，他即先行辞职，蒋梦麟又说下半年中国文学系主任由适之兼任云。”^[64]林损离京之时，马裕藻因为传达消息的人误会，不知具体时间，未能到车站话别，为此颇感歉疚，特致函说明缘由，并谓：“中央大学之聘，先生已经接受，在平同人，闻之甚快。季刚与先生终属同志，尚希善为处之。直率之词，幸勿见责。”^[65]要知道马裕藻的懒于笔墨，不仅是著述，连写信也是尽可能从简。列名的通函通电，大都出自他人手笔。即使同门之间通函，有时也只是附在他人之后，一句话表示己意同上。围绕林损的解聘，可以说是马裕藻平生诉诸笔墨最多的事情了，由此可见他的极为郑重其事，也可见此事对他的影响之大，非同寻常。

1936年，林损从林尹来函得知，马裕藻向他“备述相忆之情”，特致函告以近况：“二年以来，师友崩逝，天命所寄，不可无撑柱者。第四次大病，幸而不死，然忧患所萦，自顾茕然，日下灯边，讲《易》而已。读书万卷，不能疗饥，纵能疗饥，如此世界何！纵能经营，何如世界！世界无恙，如此道义何！”^[66]虽然与马裕藻同病相怜，却一如既往地抒愤懑。

下台之后，马裕藻仍然如常参与各种宴会之类的应酬。按照1935年度北大文学院公示的课程安排，马裕藻继续在中国文学系担任经学史、清代韵学书研究以及专题研究（二）声韵学专题研究等课程。^[67]实际上，这些课程是由他人分担。7月13日，魏建功从马廉（隅卿）处电话嘱钱玄同往谈下半年北大事，据云：“今日晤适之，知幼渔之功课，一年之声韵由魏任，清代韵学书研究由钱任（钱：沿革二，古音二也），不知师大许可否？因今年教部对于北、师、平诸大之训令均有院长、主任绝对不得兼课之言也。”^[68]8月25日，魏建功

又告诉钱玄同，“北大已决定将‘音韵学’一门分为△组，历史方面为三类，钱——黎——赵教之也”[\[69\]](#)。失去系主任的位置，马裕藻也不再任校务委员，只担任新设的毕业考试委员会委员，其他校级组织均退出。保留国文系教授之外，还在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任中国声韵学指导教授。7月，北大发布名誉教授名单，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马衡、朱希祖等榜上有名。按规定，名誉教授只授予兼任者，马裕藻仍是专任，不得列名其中。

1935年1月2日，胡适回顾1934年亲历的大事，关于北大中国文学系的改革，认为“此事还不很彻底，但再过一年，大概可以有较好的成绩”[\[70\]](#)。可是这样的包票很难说落到了实处。学生方面，对于急进改革的方式及其成效未必认可。1936年新生入学前夕，有署名“大嫂”者为《北大迎新特刊》撰文介绍“文学院概况”，其中关于国文系如此说道：

国文系的主任，也就是我们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妹妹们，谁不知道胡先生是“白话文运动的开山老祖”和“五四运动”的老将呢。他二十年的努力，的确替学术界开了些新的风气，替中国文学换了一套新的衣裳。不过有人说他现在有些“倚老卖老”了。他的胡氏学说有些都是胡说，他不但不往前跑，而且向后转了。他是很会笑的人，平常的时候，脸上常浮着一层轻浅的微笑，并且有时还会哈哈大笑。他自称是自由思想家，不过我告诉你们可不要太相信他的话，而过火的“自由”起来。他一翻脸你们可就吃不了的兜着走了。最好是“不可不自由，不可太自由”。北大的国文系，分为纯文学组和语言文字组。文学组所设科目，都是些文学史各断代的散文和韵文。语言文字组的科目，大部分是继承清代朴学的衣钵，主要的是文字学音韵学，一小部分是训诂和校勘。[\[71\]](#)

至少从公布的课程表看，北大国文系相比于之前很难说有多大改变，可见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换人而非易事。当然，换了人，同一名目之下所讲的内容或许大不相同。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人才，革新整顿，当以此为皈依。北京大学以首席国立大学的优势地位，出人才是理所应当的事，只是民初以来，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人才培养的成效未能与其地位相符。改朝换代之后，北大国文系收效并未彰显，从近年坊间列举的北大中文系百名优才看，所出人才至少不见得比此前多且好，甚至不如从前。抗战期间西南联大被视为浴火重生的奇迹，可是过度夸大就难免变成神话。

自从民元长校浙江第一中学因风潮鼓动被迫下台以来，北大解聘教员之事让马裕藻再度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眼看同门先后离开北大，孤立无援的他无力抗拒，只能接受现实，曾经公开表示的当以去就相争也不能坚持到底。他离开校系学术行政的位置，一度相当落寞消沉，暂停上课便是消极抗议的表现。章门弟子大都不能长寿，此时马裕藻已经年近花甲，血压高，又有腰伤，有时因病连应酬也不能参加。^[72]但病好则如常，甚至一晚赴两处宴会。他还是北师大的名誉教授^[73]，并继续参与孔德学校事务，只是对于北大的事较为淡漠，倒是钱玄同曾请其担任北师大国文系毕业试验的校外监考委员。钱玄同编辑刘师培和章太炎的文集，他也参与其事。马裕藻与钱玄同来往较多，与周作人也有所联系。钱玄同与马裕藻私交甚笃，自称经常到马家“骗饭”。1934年7月30日，马裕藻高堂病笃，即电话请钱玄同前去制礼，而又规定除废跪拜和改良讣文外，一切从俗。8月6日钱玄同前往吊孝，9日又去写铭旌。^[74]

1935年10月10日，钱玄同见报载黄侃于两天前逝世，私下论道：“平心而论，余杭门下才士太少，季刚与逖先，实为最表表者，若吴处士辈，腐恶兼具，何足算哉！”^[75]钱与吴承仕交恶，所论偏于一端，但也大体可见马裕藻在他心中的学术位置。10月30日，钱玄同收到马裕藻寄示的所编《经学史讲义》目录及第一章，大为感慨：“他笔墨比我更懒得多，今竟奋起编讲义，且用白话为之，余可不勉夫？不知这一学年中，我能否讲[编]一部分国音沿革讲义焉耳？”^[76]马裕藻发奋编讲义，一方面是对辞职风波迫不得已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响应黄侃逝世后章太炎催着门下赶紧动手著述的呼吁。可惜为时已晚，11月28日，他的脑病（癫痫）和腰伤再度发作。12月4日，据说一度神志不清，次日好转，大夫说不发烧，无尿毒，无危险象。12月9日略好。15日精神颇好。12月28日，居然可以起床走几步了。到

1936年2月14日，马裕藻的病全好，重新上课。^[77]此后与钱玄同走动日多，但是编讲义一事却就此搁置下来。^[78]

中国历来读书治学，讲究为己之后为人，能够承接前人已有而仍有余力发明，才能有所著述，否则述而不作。章门弟子大都谨守途辙，不轻易著述，1916年2月3日，钱玄同在沈尹默处遇康心孚来索《中国学报》稿，剖明心迹道：

余告以当世学者，本师以外尚有廖季平、刘申叔诸先生，珠玉在前，则糠粃固不足以登载。余不愿在报馆撰文，实有三[二]故，（一）年来虽略略问学，顾均取诸人以为善，如小学，大体古人取自段玉裁、朱绶章，取自本师。古今音韵之条例，古人取自江永、陈澧，取自季子。道术大原，古人取自庄子，取自廖季平。群经义训，古人取诸董仲舒、刘向、何休、刘申受、陈朴园、邵位西，取诸廖季平、李命三、康长素、崔先生。而治身心之学，则远师古人，以新安、姚江、博野为埠。己无心得，何必抄袭古人成说。（二）若不问是非，专务驳难古人，穿凿牵强，如昔之毛西河、袁枚，今则湘江著《翼教丛编》，刻《玉房秘诀》之某伦者，余虽不肖，尚不屑为。兼以余之治经，宗孟、荀、贾、董迄刘向以来之说，排斥新室以后之伪古说，同人中颇有以师未死而遂背，疑为故立异论，以为逢蒙杀羿之举。在余虽自信不敢党师门而妒道真，求学惟求心之所安，然三人成市虎，人言亦殊可畏，故宁藏拙而不登也。^[79]

虽然钱玄同认为太炎门下才士太少，又指马裕藻比自己笔墨更懒，其实后者倒是一位有些老派的读书人，他好收书，范围很广，历代各类文籍，包括晚清报刊亦予购置，遇到难得的本子无缘入手，还会雇人抄书。从留学日本时起，钱玄同等同门就每每向其借书，直到晚年依然如此，如《民报》、刁汝钧《敦煌变文俗字谱》稿本等等。见得多，虽然受人点拨不够，见识未必高明，但也不会人云亦云或是全然外行话。这与今日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海量论著有天壤之别。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下，近代学人能够始终如一者如凤毛麟角，少年成名的梁启超不得不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胡适于不动声色间大幅

度调整学术取法和观念，傅斯年留欧前后，学术也发生180度转变，王国维、刘师培乃至章太炎，都不免悔其少作，章太炎与支那内学院结缘后，晚年还嘱咐弟子编文集时将其中谈佛学的部分全行删除，以免门外文谈之讥。与其在出手不凡与保持晚节之间纠结，留有以待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有四位教授因为困难不能离开北平，名为北大留校教授，马裕藻为其一，另三位是孟森（心史）、周作人、冯祖荀（汉叔）。钱玄同亦滞留北平，与马裕藻仍然走动，谈论古音问题，办理孔德学校事务。“幼渔谓江慎修之入声甚好（《古韵标准》），而阴去声大不高明，且不与入声衔接，尚不逮顾。盖彼与顾不同，彼对于入声仍是从阳声着手也。其说甚是。”^[80]其间钱玄同的身体日渐差，原来多是去马裕藻处，现在反而多是马裕藻来访。不时也还有饭局之类的应酬。

在沦陷区挣扎求存，生理与心理的压抑痛楚非亲历其境者难以体察。四位留校教授，孟森1937年底即故去，冯祖荀在伪北大任教，周作人则落水做了汉奸，只有马裕藻始终闭门不出，坚持到1945年过世。仅此一点，可以说北大虽然曾负于马裕藻，马裕藻绝不负北大。北大所著校史，不宜为避免与伪北大的纠葛而对留平人员视若无睹。

中国虽然历来重视地望，有为乡贤立传的传统，但是由于统一期长，大小文化长期并存互渗，所谓地方名流，包括籍贯与居处两种，后者往往具有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性影响。清朝实行避籍制，当地之绅与外出之官尤其是京官，互为奥援。清中叶后，省籍日见凸显，旅外同籍在居处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地域性的同乡关系，不仅形成了绍兴师爷、蓝田厨师之类的行业性社会联系网络，而且也助推浙籍学人在民国时占据学界要津，引领时代风气，声势一时无两。因此也导致与他籍人士产生心结，以致引发摩擦冲突。至于和原籍的联系，则因人而异，如朱希祖对海盐人事的关注介入就较马裕藻对鄞县的关注为多。如果研究乡贤局限于原籍，难免流于乡愿之学，过度强调籍与贯，反而可能贬低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近代以来，打倒前人、树立自我，成为学术界一种扬名立万、行之有效的普遍形式。世风与学风变化之快，与此紧密相关。在此过程中，新旧只在转念之间，那些曾经革过别人命的人，自己的命被革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势所必然。只是如此这般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未必

能够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学术的翻云覆雨，或许能够造成一时之闻人，却难以推出百代之英才。大浪淘沙过后，各自的学术地位终究会水落石出。后来者重新审视学人与学术的历史，不要仅仅被半桶水的咣当和倏起倏落的潮头所吸引，否则非但看不出历史的本相，还难免自曝其短。

这一桩学界公案之所以聚讼纷纭，缘于今人治学，株守一人一事，往往研究某人，即只看某人的直接材料，进而以某人的眼界为眼界，再进而以某人的是非为是非，结果，所谓研究，无非是延续前人的观念及其价值判断，继续彼此的相争不已。身处山中，自然难识庐山真面。历史上的人事，当事者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而所说之理往往又此一时彼一时。偏听偏信，既不能近真，又无法明理，或无知无畏，一往无前，或今是昨非，流质善变。一时的道理和一面的意见，固然是史事的一部分，但不等于就如此说或皆如此说。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治史尤其应当注意。这并非相对主义，而是历史本来就是有条件的相对而言，没有绝对。

尤有进者，近代中国的知识人，包括主张自由者，仍然多以是非定存废，他们非但不会捍卫异己的权利，反而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千方百计剥夺对方的权利。只有在维护自己或与己利害一致的权利时，才会利用自由的功能，作为抗争的凭借。在此环境下，近代中国的大学如何行政，其实是两难之事，令人相当困扰。民主制是长效机制，乱世纯用民主，难免动荡不宁。而行政主导如果过于强势，加之居高位的学术官僚往往自认为具有高瞻远瞩的学术判断力，又将学术发展与个人在其中的作用相混淆，而戴上为国为民的堂皇冠冕，很容易导致以一己之见决定学术发展的取向做法及轻重缓急，虽然短期内看似有效，却是南辕北辙而不自知，于学术的发展害莫大焉。待到后人评论千秋功罪，四面看山，还原历史真相，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追悔莫及了。好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尚未定于一尊，各校还有自行其是的空间。所谓百年树人，一时间难以验证，花样繁多的各种教育改革，到头来究竟于养成人才贡献几何，大都难言成功，倒是改革者轮番登台献艺，种种旨在博取时名其实是欺世盗名的出乖露丑表演，令来者不胜唏嘘。

[1] 朱希祖闻黄侃转述章太炎对人言：黄天王，汪东王，钱南王，朱西王，吴北王。“盖以余与玄同倾向新文学，乃以早死之南王、西王相比也。”（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中册，第461页）相同的排列又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111页。章太炎对前期弟子的评点，前后有别，各人所得亦不同。汪东《吊吴靚斋诗》注：“章门四子，黄季刚、吴靚斋、钱玄同及汪旭初。”又称：“当日章师戏言，黄为天王，汪为东王，吴为北王，钱为翼王。以钱为畔师，故称翼王。”朱希祖到

中央大学后，章又谓汪东曰：“吾门四王当改定，去钱入朱。”与黄侃所说有异。章太炎《自撰年谱》提及弟子成就者，仅列举黄、钱、朱，未及汪东。（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第1126—1127页）

[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361—362页。

[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91页。

[4]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63页。

[5] 吉川幸次郎：《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第384—394页。

[6]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2—233页。

[7]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6、45、70页。

[8] 《陶孟和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7页。

[9]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43、45、57、72页。

[10] 《国文学系主任致院长函》、《院长复国文学系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21号，1929年8月5日，第1、2版。

[11] 《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第1版；《蔡校长致马幼渔先生函》，《蔡校长致朱遏先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43号，1929年9月30日，第1版。

[12] 沈尹默：《我和北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0页。

[13]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14] 《中国文学系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581号，1920年4月14日，第2版。其时该系教授为：杨逊斋、陈子存、徐哲如、程演生、刘半农、吴瞿安、钱玄同、马幼渔、沈士远、魏仲车、沈兼士、沈朵山、毛夷庚、孟寿椿、朱希祖。

[15]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5页。其时北大各系选举，每每出现出席者各得一票的现象，只能由校长附加投票决定。

[16]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51页。

[1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192页。

[18]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03页。

[19] 程巢父：《张中行误度胡适之一——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辨证》，《书屋》2004年第1期，第21—25页。

[20] 《北京大学将裁并学系说》，《世界日报》1934年4月17日，第7版，“教育界”。

[21] 《刘半农日记》，《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第33页。

[22] 《国文系教授林损辞职系因下年度将解聘》，《世界日报》1934年4月18日，第7版，“教育界”。

[23]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1215页作“学者”。

[24] 《蒋梦麟否认北大裁并学系》，《北平晨报》1934年4月18日，第9版，“教育界”。文字参照1934年4月19日《申报》的《北大教授纠纷》校订。

[25] 《北大教授纠纷》，《申报》1934年4月19日，第4张第15页，“教育消息·外埠”。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531页。编者注此信约写于1931年，误，解聘林损事在1934年，参见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扎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所载1934年夏林损致蒋梦麟、胡适各函。另据傅斯年同日致胡适函署期4月28日，则是函亦写于当日。

[27]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413—414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129页的识文有若干错字，以致意思不通。耿云志《胡适年谱》第219—220页的摘引虽不全，但识字较为准确。

[28]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41页。

[29]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5页。

[30] 《刘半农日记》，《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第34页。

[31]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981页。

[32] 《北大国文系代表今晨谒蒋梦麟》，《世界日报》1934年4月23日，第7版，“教育界”。

[33] 以上均见《北大国文系学生派代表谒蒋梦麟》，《北平晨报》1934年4月24日，第9版，“教育界”。

[34] 以上均见《蒋梦麟昨接见北大国文系代表答复各项问题》，《世界日报》1934年4月24日，第7版，“教育界”。

[35] 《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昨发表谈话》，《世界日报》1934年4月25日，第7版，“教育界”。稍后蒋梦麟即聘梁实秋为外国文学系主任。

[36] 《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昨发表谈话》，《世界日报》1934年4月25日，第7版，“教育界”。

[37] 《北大国文系代表昨再谒蒋梦麟》，《北平晨报》1934年4月27日，第9版，“教育界”。

[38] 《北京大学国文系代表昨再谒蒋梦麟》，《世界日报》1934年4月26日，第7版，“教育界”。

[39] 《蒋梦麟挽留马裕藻》，《世界日报》1934年4月29日，第7版，“教育界”。

[40] 《北大国文系将开全体会》，《世界日报》1934年5月2日，第7版，“教育界”。

[41] 以上均见《改革北大国文系》，《北平晨报》1934年5月3日，第9版，“教育界”。

[42] 《北大国文系下年度改革计划》，《世界日报》1934年5月3日，第7版，“教育界”。

[4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7—378、388页。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37页。

[45] 马叙伦：《石屋余沈·林攻洩条》，参见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扎二十九通》，第163页。

[46] 《北大国文系教授林许去后，主任马裕藻辞职，蒋梦麟推崇胡适到极点》，《京报》1934年4月22日，第7版，“教育”。

[47]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第652页。

[48] 以上均见《北大国文系代表定今晨谒校长蒋梦麟》，《世界日报》1934年5月9日，第7版，“教育界”。

[49] 以上均见《北大国文系内部问题告一段落》，《世界日报》1934年5月10日，第7版，“教育界”。

[50] 《国文系问题已告一段落》，《世界日报》1934年5月15日，第7版，“教育界”。

[51] 《北大国文系学生昨日欢送林损》，《京报》1934年6月6日，第7版，“教育”。

[5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429页。

[53] 《国文系纠纷内幕情形》，《京报》1934年4月25日，第7版，“教育”。

[54] 《北京大学文科之争议》，《申报》1917年10月17日，第2张第6页，“要闻二”。

[55]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07页。

[56] 参见刘小云：《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1926—1949）》，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57] 刘北汜：《忆朱自清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第215页。

[58] 《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第75页。

[59] 马叙伦：《石屋余沈·林攻读条》，参见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扎二十九通》，第163页。

[60] 以上参见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扎二十九通》，第168、169、174—175页。

[61]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三册，第59页。

[62] 《蒋梦麟将赴欧参观教育》，《申报》1934年7月13日，第4张第14页，“教育消息”。

[63]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第414—415页。

[64]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05页。

[65] 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扎二十九通》，第176—177页。

[66] 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扎二十九通》，第185页。

[67]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第1163—1165页。

[68]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23—1024页。

[69]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34页。

[7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429页。

[71]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第1701页。杨翠华专文正面评述了蒋梦麟此番改革的成效，不过主要就理科着眼，未及人文社会学科。参见杨翠华：《蒋梦麟与北京大学，1930—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第261—305页。

[72]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50页。

[73]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55页。

[74]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027、1028、1029页。

[75]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144页。

[76]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150页。

[77]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159—1160、1161、1163、1167、1179页。

[\[78\]](#) 马裕藻偶尔会向师友赠书，不过都是别人的著作。

[\[79\]](#)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283页。

[\[80\]](#)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下，第1294页。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中国历史上的学分南北，由来已久，仔细考究，所据大都是后来的臆见，而非当日的实情。五四新文化以来，南北学人的派分因缘大学、刊物、学会等等的联结作用，观念差异与人脉亲疏相互纠葛，明争暗斗，成为无形之手，操控着学界的取向，影响学风的流变。双方代表人物表面似乎并非强分疆界，畛域自囿，实际上成见不浅，心结已深。影响之深远，至今流风遗韵不绝。不过，民国时期的所谓学分南北，依据不同，讲法各异，深究起来，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非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之后，学术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双方各自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彼此渗透。另一方面，双方代表者在争斗过程中难免意气用事，偏离主题，其执着纠缠的此是彼非，在旁观及后来者眼中未免偏激，因而修正调整，回归学术本原。出身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又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扮演要角的金毓黻，关于南北学风异同的看法及其与南北两派学人的关系，并非中西新旧，非此即彼的观念所能解释，在一般近代学分南北的叙述中或为异数。只是换一角度看，这样的异数反而显出某种常态，值得后来者深思反省。

一 北将入主南营

1940年12月，迁徙重庆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的历史学会编辑出版了不定期刊《史学述林》。1941年元旦，担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的金毓黻为该刊题词，特别从南北派分的角度立论，全文如下：

本校之历史学系，具有二十余年之历史。盖自南京高师之史地科，东南大学之史地系，逐渐衍变而成，且继长增高，以至于今日，甚矣其难也。尝谓吾国古今之学术，因长江大河之横贯，显然有南、北两派之差别。先秦诸子，孔、孟居北，而老、庄居南，儒、道二家，于以分途。魏、晋、南北朝之世，经学传授亦有南、北两派，颇呈瑰玮璀璨之光。至唐初《五经正义》成书，而其焰以息。清代学者初有汉、宋二派，继则经学家有古文、今文之分，宋学及古文学多属北派，而汉学及今文学多属南派，皆有显然之途轨可寻。史学亦然，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学之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屏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学衡》杂志之刊行。考是时与其役者多为本校史学科系之诸师，吾无以名之，谓为史学之南派，以与北派之史学桴鼓相闻，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今校长罗君治西史有声，曾为北派学者之健将，嗣则来长吾校，将满十年。向日以为分道扬镳不可合为一轨者，今则共聚一堂，以收风雨商量之雅。盖学术以互竞而孟晋，譬之江河分流，以俱注于海，其趋不同，而其归一也。违难以来，迁渝续课，本系爰有历史学会之组织，并因时与地之便利，从事巴蜀史迹之考察，甲骨文字之整理，同学诸子，交相勗勉，欲以研治所得，分期刊行，就正当世，而本系诸师，亦稍出所作，冠之篇端，以当嚆引。编次既竟，命曰《史学述林》。夫学问之道，以求是为归，何必尽同。本系诸君应勿忘往日史学南派之历史，以共树卓然自立确乎不拔之学风，因而相激相荡，与以有成。是则本刊之行，不过其嚆矢焉耳。^[1]

这篇文章简短而概括，涵盖了中国学术南北派分的历史，指出了近代南北学派分合的过程，希望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发扬南派史学的学风。其中的深意发人玄想，尤其是这些话出自一位非但不是南派旧人，而且是北派同门的学人之口。

金毓黻1913年入北京大学文学门，1916年夏毕业。此时北京大学后来被指称的新文化派尚未成形，金毓黻无与其间。不过，所谓北都学者，主要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金毓黻与之毕竟有同校之谊，这一因素对于金毓黻进入中央大学乃至其后来的学术活动，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因为对待包括文言与白话在内的整个新知与旧识态度的差异，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与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在公私明暗的各种场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论争。在不断的冲突摩擦中，彼此成见益深，心结加重，无事之时，还能维系矜持状，一旦涉及人事权利，则此疆彼界，爱憎分明，毫不含糊。

1928年之前，北京大学位处京师，挟最高学府之势，带引领风气之威，气势无疑压倒南派。1928年2月，吴宓与来访的陈铨“因谈及中国近今新派学者，不特获盛名，且享巨金。如周树人《呐喊》一书，稿费得万元以上。而张资平、郁达夫等，亦月致不貲。所作小说，每千字二十余元。而一则刻酷之讥讽，一则以情欲之堕落，为其特点。其著作之害世，实非浅鲜。若宓徒抱苦心，自捐貲以印《学衡》，每期费百金。而《大公报》在我已甚努力，所得报酬亦只如此。呜呼，为义为利，取舍报施，乃如斯分判。哀哉！”^[2]新派固然不限于北，却以北为最盛。

学衡派内部，这时对于《学衡》的看法则出现分歧，胡先骕认为：“《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业已玷污，无可补救。”主张改到南京出版，由柳诒徵、汤用彤、王易三人主编，而且“须先将现有之《学衡》停办，完全另行改组。丝毫不用《学衡》旧名义，前后渺不相涉，以期焕然一新。而免新者为旧者所带坏”^[3]，令吴宓大为悲愤。和学衡派健将吴宓关系密切的陈寅恪，也曾劝吴宓放弃《学衡》，因为已经没有社会影响。而吴宓拟作“宣传作战之地”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学衡》同志莫肯相助，浦江清、赵万里等又主张加入语体文及新文学，并请朱自清为社员，吴宓只好放弃一切主张、计划、体裁、标准，遵从诸君之意。^[4]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之后，尤其是迁都南京，引起南北两派态势及关系的调整变化，情形远较先前复杂。国民政府南迁，需要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巩固统一的局面，与政治、军事的行动相配合，在思想文化方面，力图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破旧立新为主导的趋向，回归守成。为此，特调在中山大学任上整饬校风有功的朱家骅接长中央大学。朱家骅一生，先后在北京、中山、中央三所大学任教长校，这三所大学不仅地域上分别位居北、南、中部中国的重要位置，更具有社会旗帜性的广泛影响力。1944年2月25

日，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纪念周讲话时说：“中央大学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在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中央大学不仅具有一般大学与大学生的使命，还应负起特殊的责任。”^[5]而这样的领导地位和示范作用，原来无疑是由北京大学来承担。只是中心地位的转移，不仅仅是空间位置的移动，更伴随着风气的改变。

迁都造成的政治中心南移，不可避免地影响故都学术文化的中心地位，加上国民政府有意扶植中央大学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本来作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受到很大冲击。连高闾仙都注意到，“前者文化中心在北平，今已渐有转移之势”。并且提出：“东北虽不必为文化中心，而由学者努力之结果，亦可有构成文化中心之希望。”^[6]作为文化中心，北京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变动，广东等地也萌生跻身学术文化中心的意愿。迁都引起北平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无疑给其他地方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乘机提升自己的学术文化地位。

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北方学人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一方面试图将政治与学术分离，努力维系故都的学术文化中心地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后来一再强调，北平时期的北京大学从一度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的漩涡，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7]另一方面，北方的新派学人对国民政府先倨后恭，在抵制大学区、反对党化教育和批评训政等一系列冲突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北平的新派学人开始尝试调整改善双方关系，政府方面吸收新派学人参政，新派学人方面则予以积极响应。相比之下，反而是与新派不和的那些学人更能保持自由独立精神。

五四时期国民党曾经受到思想宣传和青年运动的影响，有意识有目的地吸收参与五四新文化的青年加入国民党，而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也能从富有朝气的革命的国民党那里感受到强大的磁力，加上蔡元培等人与国民党的渊源，早有一些北京大学出身的师生陆续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与知识界的重要纽带。先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罗家伦、顾孟馀等，都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念书。金毓黻指罗家伦为北派学者的健将，其实后者治学的时期并不在北大。经过国民政府吸收学人参政，北京大学出身的学人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权力位置，成为新政权炙手可热的新宠新贵，适应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转移，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在新的中心建立人脉，或是因缘校友的关系，给予同门种种的方便和照顾。

金毓黻显然也是风气转移的受惠者，出身北京大学而能在南派的大本营中央大学立足并且担任要职，他的那些占据要津的同门师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毓黻进入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傅斯年是关键人物。金毓黻在1938年5月1日的日记中记到：“昨晤傅孟真于曾家崖中研院办事处。余之来中央大学，系由君介绍，厚意可感，不敢忘也。”^[8]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有流言不利于金，傅斯年闻知，不避嫌疑，力证其清白。此事令金毓黻万分感激，在日记中记到：

二十五年之夏，余自沈阳逃出，经日本而至南京。援我于困厄之中，而不致饥寒于他乡者，傅君孟真也。近八年来，与孟真不常晤面，而精神息息相通。近以外间流言不利于余，日前偶向孟真言之，孟真曰：“君之行谊，余知之最清，设有人不利于君，余必为之辩护，请勿介意。”余乃为之大感动，古人云：“患难乃见交情”，吾于孟真见之矣。

次日金毓黻将所撰备忘录请傅斯年签证，“君即慨为签证，并系以注语甚详，谓余所记皆属事实，并谓余受困时曾寄语孟真，将乘机逃出，后果实践其言。噫，知我者舍孟真其谁属哉！”^[9]他曾经赋诗夸赞傅斯年道：

北方学者谁第一，以吾所知有孟真。宁谓豹文终可隐，由来龙性最难驯。尘飞雷动三千里，雨骤风狂十二春。起废箴盲斯责重，君如不负属何人！^[10]

表面看来，傅斯年与中央大学没有关系，其实迁都之后他一直关注学术文化中心位置的流动，以及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在1933年，他就和丁西林、李四光、李济等人联名致函丁文江，谈及“‘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

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浜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发轫不可”^[11]。尽管他对中央大学评价不高，毕竟不能无视国民政府极力扶持的态度，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效果。有迹象表明，傅斯年很想将触角伸入中央大学，而且他的确具有一些便利条件。

傅斯年职务上与中央大学并无关联，其介绍能起作用，应与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有关。金毓黻在1940年2月29日“致罗校长志希书”中说：“以愚个人言，承公不次之厚爱，得来本校任课。”而且罗家伦并非一般性地接受私人请托，金毓黻“到校之后，亦常与公接晤，每次晤面，往往披心见素，推诚相与，出愚意想之外”。这种礼遇，在中央大学教职员乃至院长系主任中堪称异数。据金毓黻自称：“自愚入本校，前后已三、四年，见公与各教授之联系甚少，从未见到各院办公室或教职员宿舍作少许时间之谈话。与公常见面者，一为各院长，二为各系主任，然非有事亦不常往。每次往见公者，多在外室守候，或至数次不得见。因此之故，无要事之系主任，及无责任之教授，决不肯轻与公面谈，又因此而生之隔阂猜疑亦属不少。”金毓黻认为：“他人如肯尽言于公，公必能尽量接受。以此向他人言，则不甚信，久之愚乃悟公于处人接物之方式，尚有未尽适宜，以致于此极也。”^[12]连曾经任教于北大的老师辈朱希祖也屡被冷落，可见金毓黻的待遇的确非同一般。

而金毓黻对罗家伦等也常怀知遇之恩，他说：“罗君志希于余有刮目相看之意，深可感也。尝谓志希有学人风度，此非阿好之语，有目者当共见之。”^[13]不仅称罗家伦是北派的健将，而且将其长校中央大学的十年视为南北学人和衷共济的体现。两人关系的紧密令金毓黻敢于直言谏事，曾效仿汉贾谊上书罗家伦批评中央大学校务，认为“公之现境诚所谓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而已耳”。他指责罗家伦长中央大学不如清华时期有计划，应付环境，迁就事实，重量轻质：“本校各系之名教授甚多，足以动青年之观听者亦不知凡几，然研究学术之精神，终逊于西南联大一筹者，正以各院系无特殊研究学术之表示，亦不见注重何种学术以为本校研究之中心，因此不能引起社会人士之重视，此即重量不重质所受之影响也。”他还希望罗家伦不要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对于学生参与党派活动，也要裁以正义，大度包容。^[14]对此，罗家伦不以为忤。

向罗家伦推重金毓黻的北大同人，不止傅斯年一人，金毓黻称：“往者段君书贻（锡朋）谓余为东北读书种子，属罗君志希善视之，

其厚奖余甚可感，而余则深愧不足当此称也。”^[15]

举荐提携之余，北大出身者相互之间也就有了某种义务责任。稍后金毓黻受聘于东北大学研究室，因中央大学各方面矛盾逐渐尖锐，系务繁琐，分任两地，难以兼顾，遂致函已经离任的罗家伦，“诿向顾新校长将中大史系主任辞去，以便专任东大研究室事。顷接志希来电转顾君之意，坚约回渝。童教务长冠贤亦来电，以是为言，且以余出身北大，顾君亦为北大旧人，不能言去”^[16]。1945年12月1日，金毓黻“傍晚于密雨中入城，参北大同学会，与会者百余人，为欢送傅君孟真赴北平也”。席间金毓黻还赋诗一首：

傅君孟真为余北京大学同学，近将北上接收母校，赠以此诗，藉壮行色。

短衣匹马西来久，霁月光风北望高。对我眼明如蜀锦，多君语快过并刀，神京祭酒当时重，太学诸生旧日豪。天际知看沧海去，凭将只手挽滔滔。^[17]

二 南北新旧

金毓黻虽然出身北京大学，却并非新文化阵营中人。他从北京大学毕业之时，蔡元培尚未接长北大并对北大进行兼收并蓄的改革，除了太炎门生外，各色各样的新派人物还没有进入北大。而太炎弟子当中，既有后来成为新文化派的骨干，也不乏被视为保守的代表者。金毓黻在北京大学文学门的几年间，先后从陈衍问诗文法三年，从朱希祖受中国文学史二年，听陈汉章所讲中国通史课程^[18]，尤其受黄侃的影响为大。他曾说：“以现世之人为师，良者既不多得，则莫若以古人为师。……吾昔研理学，以陆稼书为师，研文学，以姚、曾两氏为师，皆以古人为师也。至研小学，始以现世之人黄季刚先生为师。

然求之今世师，如黄氏者有几人焉？以现世之师难得，故终不能不以古人为师也。”^[19]

而黄侃对金毓黻也是另眼相看，称“斯乃东序之秘宝，匪独渤海之骏雄也”。据汪希针转告金毓黻：“黄先生每与相遇必称毓黻，相念至深，又尚论关外人必以余为称首，何其见爱之甚也！”两人的师生之谊非同寻常。1927年11月金毓黻往谒任教于东北大学的黄侃，“相见之下，欢若平生。盖先生颇赏余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而不为外物所囿。余亦以先生为当代大师，负有专门绝学，而不能与俗谐者也”^[20]。而黄侃虽为太炎门生，却和刘师培一道，被认为是蔡元培改革北大以后的保守派代表，与趋新的同门分道扬镳，并曾和钱玄同当面冲突。

南北学派之分，虽有指认的习惯和叙述的方便，却不免抹杀阉割了部分事实。尤其是南北之中暗含新旧，与实情分别更大。就实际而言，南北学人当中均有所谓新旧之人，而且近代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新旧的界线变动不居，先锋落伍的现象屡见不鲜。五四新文化以后，在黄侃等人看来，关内庠序竞器成风，尤其是新文化派渐居主导的北京大学，新派不断排挤旧派，1920年代后期张星烺函告陈垣：

“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北大现在已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不宜再使与纯萃学术牵混。”^[21]在所谓旧派人物纷纷他去之后，原来的新派内部亦起纷争，曾经一度能够把持校务的浙人尤其是章门弟子相继被挤出北大。至于学衡一派，根本否认自己是守旧，他们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在吴宓看来，钱基博、黄节等才是旧学家。^[22]

随着政局和风气的变化，南北学人既有对垒，也有对流。五四运动发生后，黄炎培、蒋梦麟等人主张蔡元培复长北京大学，“南方预备如左：（一）……同人当竭尽全力办南京大学，有子公在京帮助，事较易。办成后渐将北京新派移南，将北京大学让与旧派，任他们去讲老话（亦是好的），十年二十年后大家比比优劣。……（二）如北京大学不幸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其经费当以捐募集之（炎、麟当赴南洋一行，《新教育》可请兄及诸君代编）。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总而言之，

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黄炎培和沈恩孚分别眉批道：“此亦是一句话，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也。”“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23]

其实，各派学人的本意，无不想南北通吃。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南方学人北上的会合。清华大学内部纷争不断之际，吴宓计划在东北集合力量，将各地的学衡派人士汇聚到一起。而陆续被北京大学排挤出来的桐城派以及黄侃等人，也相继出关。可惜东北局面不能持久，加上一些人本来对于出关有所顾虑，只好回到关内，不少人仍然选择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一脉相承的中央大学。黄侃、吴梅、朱希祖等人相继加盟中央大学，一时间中央大学似乎成了北京大学弃将的用武之地。金毓黻进入中央大学历史系之时，正是由朱希祖担任该系的系主任。^[24]

就人脉与学问渊源而论，金毓黻似与所谓旧派关系更深。但是金毓黻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面对新潮汹涌，却并不守旧，甚至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趋新意向。只是金毓黻对待世变与学问，都取相辅相成、殊途同归、求是而不强同、不偏于一端的持平态度。他教人学文，始终主张学桐城，不仅与鼓吹白话的新文化派截然不同，与尊师黄侃也有异。他看《唯是学报》所载林损的《述古篇》论泥古诬古之非，“一指竺旧，一指鹜新，二者各有所失，林氏颇欲持二者之中，而为此论。寻其所言，述古者，乃取古事以为今镜，犹孔子因夏、殷礼而损益之意，取舍之权，仍以宜于今不宜于今为衡，是其立说，与现世潮流思想并无乖违。述古之职，由斯而明，不图林氏竺守古学，反以持论自陷，且真理因之愈彰，此林氏之所不及料也”。反对泥古不知变通。并进而论道：“以现在言，只有新而无旧，然有新未尝不包旧；以过去言，只有旧而无新，然无旧亦不能生新。此新旧二者之辨也，余于静中参验得之。”

对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所撰新书《中国文法通论》，金毓黻以为：“用归纳法剖析中国文法，颇得纲要。自马建忠氏撰《文通》后，能不依傍前人稗贩外籍者，惟有此书，诚仅见之作也。一年以来，吾国政象，泯棼极矣。独有二三学者，冥求搜讨，昕夕不遑，屡有造述，成绩斐然，此真学术界前途之佳象也。而二三老成，稽首蹙额，相与叹息，谓为国学陵夷，今不古若，何其慎乎！读刘君此作，能无豁然。”^[25]

不久，金毓黻专门从图书馆借来新出版的著作，分为科学方法论、文学概论、国语文法、文字学、史学等五类阅读，据称“近日学术界革新之事业方法有二：一曰整理国故，一曰迎受新潮。新潮之输入者，已具有条理，自无整理可言。至言整理国故，则多主用科学方法。胡氏《中国哲学史》之著，其见端也。然科学方法之何若，为研究学术之阶梯，引为先务，职是故耳”^[26]。这可以视为其以整理国故为迎受新潮之举。金毓黻有感于《建设》杂志所刊胡汉民论儒教喜排斥异己的文章，担心当时为新文化运动者的命运。^[27]

1921年2月28日，金毓黻拟作《学术论》或《并行与调和》，其大旨“首论方今学术，异说蜂起，道可并行不悖，不足为病。次论并行与调和异。并行者，各自独立而不相犯；调和者，去其异而摭其同。混淆黑白，强作解人，二者截然不同。……次论唯其并行，故各树壁垒，互相非难，其于世运，亦互为倚伏消息，此起彼仆。迨为日既久，人皆厌之，二派忽互相结合，别生新机，茁壮萌芽，起而代之。此所谓新者，与调和异。调和之义既如上述，此则面目、性质，皆与旧者迥殊。……往世若朱、陆之争，汉、宋之争，近日新旧文学之争，东西方文化之争，皆此类也。……次谓学术之是非，随时会而异，适于时者，即为真理。吾人但观察时势所宜，以定从违，不必横存主奴之见以自陷。末论道虽并存而不悖，但吾人取舍从违，不可不有定见；否则倘恍游移，不下己见，出以模棱两可，虽能成名，上之不过如梁任公，下之亦仅为张东荪，劳瘁毕生，徒为稗贩，终无所得，真可笑也”^[28]。此文是否写成发表，不得而知，从中却能清晰了解作者对于新旧派分的态度。

1923年，胡朴安在《国语句刊》发表《整理国学刍议》，批评“今之治国学者以一知半解为创获，抽数寸之丝自诩有用，不知全丝之弃者实多也。（今之治国学者不在全部着手，往往考一人之年岁至费数万字，与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有何异乎？）”其时金毓黻正以中国学人往往好博不精为鉴，对胡氏的看法有些不以为然，他说：“胡氏治学颇主先求其会通，次以寻其枝叶，所谓先立其大则小者不能夺，立论何尝不是？然十丈之木积于一寸，万顷之涛积于一勺，不自铢积寸累作起，而云能观其会通，大言欺人，徒自误耳。梁卓如谓清代诸儒多为狭而深之学问，所以能精，此真一语破的。惟其弊坐在终身徘徊于此，不知更进一步，故不免以破碎贻讥。胡氏鉴其弊而不究其利，执其果而不求其因，立论所以未融。”^[29]

稍后金毓黻又进一步论道：“往世学人多务博知，语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不知古籍充栋有若江海，一人之腹岂能尽受？况自海通以后，西籍东来，学术复日新月异，分门专攻且不能精，并骛兼营大圣犹病，故用心如何之博，而力终有不逮也。尝谓学问之道，只宜求精，不宜贪多，究一名物，研一理道，务必穷原竟委，以求真知，其无与于此事者，虽一无所知，无害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即千古为学之准。积知日久，自能贯穿百家，博虽未可骤语，通则庶几近之。故学者只直[宜]求精、求通，不可求博，博则贪多而不能精，学不能精则终无通之一日，不可不戒。”^[30]“傅君斯年谓研治学术问题，重于泛论。此所谓问题者，即梁新会所谓狭而深之功夫，亦与李笠氏所谓读古书宜先窥本书，后读通论，同一旨趣也。余年长晚学，喜读泛论之作，如未遍阅群经，而先阅皮氏之《经学通论》，未读全史，而先览刘子玄《史通》。以故所得至浅至陋，侈口而谈经例史例，而实一事不知。循此不改，恐一业无成。傅君之言，诚我之苦口良药也。”^[31]

今人看清季以来思想文化学术，受后来主流一脉叙述的影响，好以中西新旧之类的两分法立论。就极端而言，两分固然界限分明，但一般而论，中西新旧等等因素虽然存在，却未必形成楚河汉界，壁垒森严。用主流一脉的叙述架构，这些多数无法安置得当。1924年1月，金毓黻读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感悟道：“清季诸儒谈古文学者，以孙籀廌为最平实，而章太炎则不免失之激切；谈今文学者，以皮鹿门为最平实，而康南海则失之夸，廖季平则失之诞矣。二派相争，始于嘉道，迄清亡而始稍戢。惟孙、皮两公不尚意气，或专讲故训，或宣究大义，只知实事求是，不知有门户之争，是最可师法者矣！”^[32]

秉承上述宗旨，金毓黻对于那些批评趋新乱象的意见也相当重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渐趋平和的迹象。1924年章太炎的《救学弊论》发表，此时章太炎已被视为拖车向后，渐入颓唐，该文所指摘的为学五弊，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陋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主要即指新式学校文科的流弊，矛头所向，新派首当其冲。而金毓黻认为是“针砭时贤之作，持论明通，致为可贵”。他说：

寻章氏所论，以重耳学弃眼学为学校师徒授受之弊制，可谓谈言微中，揭举高明光大四字，为治学之准绳，尤足杜歧途明正轨。世谓章氏好为迂怪不近人情之论，特未细心察之耳。章氏又谓今之学校先宜改制，择其学风尤劣者悉予罢遣，闭门五年然后启，冀旧染汙俗悉已湔除，于是后来者始可教也。又曰：“不能行吾之说，则不如效汉世之直授《论语》、《孝经》与近代之直授《三字经》、《史鉴节要》便读者，犹愈于今之教也。”此其持论，诚不免偏激失中，然又盛讥翁同龢喜谈《公羊》而忘其他经史，潘祖荫好铜器款识而排《说文》，始驱学者于诡侧之径，此诚切中近五十年学术界之积弊矣。故章氏所举五弊，今日之治国学者多患之，以为不如是则必见讥于大雅也。从章氏之说，则虽读《三字经》、《史鉴节要》，尚可日进于高明光大之域。否则日谈《公羊》、好铜器，立脚虽高，其隐患之中于人心者，将不可思议。輓近士习庞杂，或尊古而昧今，或援西以鄙中，持论愈高，见理愈谬，譬如治丝而棼，自以为是，不知识者已哂议于后矣。得章氏之说以正之，其裨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33]

金毓黻读吕思勉《中国史》，认为“有系统，有断制，堪称为中国史之第一名作，并世作史诸家未能或之先也”。由吕著新解迭出而无穿凿武断之失，金毓黻引申道：“今日之新史学家，动云民族、社会为史籍之中心，古人不知注意及此，故中国无史。不知前世一国之重心在君主，故偏治乱兴衰，以为人君之鉴戒；今世一国之重心在民，故偏重民族、社会，以究进化之因果。……不明因时之义，不知会通之故，以古人之见胶固胸中不知变通，固背因时之义，以今之见裁量古人而横坐以不是，亦岂通人之论乎？”^[34]

他请高闾仙为东北学社同人讲学，高氏指“北平各学校之现状，说务新奇，言人所不敢言，杂之以客气，存之以成见，不谓之流弊不得也”。主张先理旧学，再究新学，反对附会西学，“讲学问应先明途径，标立宗派，自存成见，非善学者也。学者各就性之所近以研究，不必以己所好而以为是，不好而以为非。因他人已讲好，无以复加，于是别辟途径，以为号召，此今文学之所以立也。考据家之长处在于能寻出来源，而其短处则在徒逞一时之快，而不顾上下文义”。针对近来北平有一派讲学问专寻王高邮之短，高氏以为“考据专明一义，不顾全体，往往失古人之义，故为学当以诚为主，能诚始不流于

偏”。金毓黻对上述看法主张颇有同感，认为：“综观先生之所论，力求平实，不尚新奇，整理旧学，以为新学之先驱，并非反对新学。即此一端，亦足以为吾人之师矣。”^[35]

金毓黻甚至认为顾颉刚、钱玄同“两先生乃今之妄人，其言不尽可信。……凡明一义，说一理，能破尤贵能立，此论理学之通则也。顾、钱两先生能破而不能立，故所破者多不可靠”^[36]。抗战期间他从友人处借来《学衡》杂志多册，“读其中诸文如逢故友。念自旧典丧失，尝惘惘如忆良朋，《学衡》亦其一矣”^[37]。这显然反映了金毓黻学问取向的情感偏好。

三 由分而合归本原

因缘上述人脉以及自己的学术理念，金毓黻主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期间，的确贯彻了“和而不同、求是为归”的宗旨。这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其一，金毓黻本人的思想观念有所变化；其二，邀请主张各异的不同派别的学人来校讲学；其三，确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的治史纲领。

随着个人学识阅历的增长，以及受抗战发生以来学术风气变化的影响，金毓黻的学术理念出现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其中比较显著的一点，是由原来受新派影响的由专而通，转向传统的由博返约。

五四时期，受个人经验及学界风气的影响，金毓黻主张求精，反对务博，他说：“凡人于学问，只宜求精，不可务博，博则力分，力分则业荒，业荒则永无求精之日。博与精常成反比，而吾国学者多务博，此所以少进步也。以余所知，友朋中知关心学问者，皆偏于求博，余之受病尤深，此后宜力戒之。”^[38]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自责“务广而荒”，金毓黻认为其“自知甚明”，进而论道：

“吾国往世学者有一通病，曰不求精而务博。即曰能精，亦精者什一，而博者什九。又此方求精，他方复求博，欲一人之身万物皆备，此吾国学术所以不进步也。梁氏之好博，亦吾国学术界数千年之遗传性使然，梁氏实蒙其影响而非其咎也。新学钜子胡适之亦有好博而不求精之弊，试一翻其著述自知之矣。梁氏如能从此彻底觉悟，大加忏悔

悔，而别作狭而深之运动，为学术界作一革新模范人物，诚吾国学术界前途之幸也。”^[39]他看吕思勉在沈阳《高师月刊》发表的《论整理旧籍之方法》，觉得“立论平平，无卓识独见可言。唯谓近人思网罗群籍更编一完全之史者，其结果无不失败，反之专研究一部分更求精密者，其结果无不成功，并举《通志》之不如《通鉴》为例，此真不刊之名论也。夫专则易精，泛则难备，专门史之优于普通史以此也”^[40]。

然而，抗战期间金毓黻的看法可谓急转直下。1938—1939年间，金毓黻写成《中国史学史》，关于专题研究与新史撰述的关系，有如下论断：“部分之研究，其手段也，整个之贯通，其目的也，不能因在手段过程中，得有大量之收获，而遂忘其最后之目的，即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盖为人而作传谱，为事而立标题，皆为治史之手段，而其目的乃在造有系统有组织之通史、专史，亦必各个部分咸有精确之断案，然后造作通史、专史，乃易于成功，亦即吾理想中比较完善之新史。”^[41]他认为，治史之士，宜备三勤，即眼勤、手勤、脚勤。“学贵博综，治史尤要，隘塗自限，决难有成。子玄有言：记言书事，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故必博览群籍，知其大略，然后可言删定勒成。古人著书，取材至富，温公《通鉴》即其明征。设非乙部名著，悉入吾眼，则执笔撰述之时，何由奔赴腕下，供我驱使。”^[42]

友人谓其读书预算太大，“故每撰一书则觉头绪棼烦，积年莫殚之势”。而金毓黻觉得：“然预算太小，则取材不丰，考论不详，何足以言撰述，且安能示人传后。是故宁求其质之精，而不求其量之多，质精而量多，非有兼人之力不可。”^[43]其致函高晋升，也谈道：“愚谓学问之道，一在征文考献，一在问难质疑。不多读书，无以极其博；不多求友，无以致其微。昔者韩昌黎氏，论毁字之原，由于怠与忌。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今之学者能不蹈此者，盖亦鲜矣。”^[44]复函黎思年，又提及：“研乙部书，始于博而终于约，当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读破万卷，犹患其少，迨用力既深，不无偏好，就其偏好之一段，加以极深研几之功，由博而返乎约，于是有深造自得之效矣。”^[45]

1941年8月，金毓黻专门总结研史之法，于具体五法之上，提出：“综而言之，一须求正确；二须求贯通。研史之结局，能达到十分正确者甚少，但不能不以求得正确为目的，此其一。史料如散钱，以贯

穿钱，钱始不乱，故研史必以贯通为目的，此其二。研史之序，始于博而终于精。博而不能精，则不免博而寡要博之讥。然未有不博而能精者，博而能精，则专门名家矣。”^[46]其时萧一山撰文《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认为史学有详近略古之例，“且史学本为一综合科学，必纵览广乙得博约之旨，而后能无偏执固陋之弊，是史学又以贯通为务，殊非仄深之士所能喻也”。金毓黻颇有同感：“研史以达变知今为务，以详近略远为例，实为史学之真谛。至贯通重于仄深，而仄深不过为贯通之始功，此又为研史者应知之义。萧君揭櫫此义以告学者，诚所谓探骊得珠，片言居要者也。”^[47]

理念转变之下，金毓黻的一些学术判断也相应有所变化，对于原来北大时的老师陈汉章的学问评判，即为显例。他说：“曩岁陈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通史，繁称博引，累数百翻而不能终其物。叙上古史喜用《路史》、《绎史》，多为荒邈无稽之说，而先生不加简裁，遂为执业诸子所不满。然蕲春黄先生尝谓陈先生读书之多，称引之富，一时无两，难能可贵，自刘仲叔以外为推重之一人，诚为服善之笃，亦见持论之公矣。今细译先生此作，则于探赜索引之中，时著平实可信之语，博综约取，允为传作，以视曩日判若天渊，岂非以年愈高而学愈进，学愈进而心愈下欤。”^[48]实则金毓黻本人的观念变化也是看法前后不同的要因。陈汉章的学生辈大都只知道陈读书广博，而其京师大学堂时期的业师柯劭忞却屡次说：“当代经学，伯陶第一。”^[49]其原因决非仅仅由于陈汉章读书广博且记忆力强，更重要的在于贯通的前提必须由博返约，没有博闻强记，很难达到贯通无碍的境界。

当然，从通的角度看，金毓黻并非完全复归旧轨。他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指摘梁启超之病为妩媚，胡适之过为武讦，表示“诚为的当”。“胡氏所倡新文化运动，亦有可议之处，然吾闻之能破而后能立。夫既已破之矣，又贵继之以能立。胡氏于旧文化已极破坏之能事，而同时亦能提出建立之新条件。此胡氏所以能有局部之成功也。钱氏虽力攻胡氏，加以讥笑，不过属于破坏之一方，而未闻别有建立之方案。是以钱氏于学术上究无所贡献，此又钱氏之不及胡氏者也。若夫梁氏，因有趋时好以媚少年之嫌，然于旧文化虽未如胡氏之尽量摧毁，而于学术上亦尝提出新建设方案，以嘉惠来学。两两相衡，钱氏似不敢望其项背。由是言之，钱氏此论，不过快其口说而已，初非深根宁极之论也。”

对于钱基博褒贬章士钊欧化的古文和周树人欧化的国语，金毓黻也不以为然：“谓钱氏濡染于古文雅辞甚深，故士钊之欧化的古文称为谨严，又誉为茹古涵今，铎裁自我。而于树人之欧化的国语，则深致不满，然今之少年崇拜树人之国语文，几以为斯道之圣手。《鲁迅集》风行全国，少年无不人手一编，盖其崇仰之情尤过于钱氏之崇仰士钊。且以人数较之，崇仰士钊者多在中年以上，或为老年，至崇仰树人者，则十、九为少年也。两两相较，则崇仰树人者多于士钊十倍，其势盖不可侮矣。然犹可曰少年人识力未定，不足以为定评，然新旧殊途，鉴赏自异，不能谓中年人、老年人之果为是，而少年人之果为非也。总之，士钊、树人二氏皆有建立之绩，为人称颂，胜于壹意摧毁而不知建立者，且殊未易论其孰为优劣也。”^[50]

与此相似，金毓黻拟重订《续通鉴》，合宋元明清为一书，偶与罗家伦论及，后者谓“《通鉴》有启发性，而《毕鉴》无之。喻以近人之著作，则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启发性，而冯友兰之作无之；梁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启发性，而钱宾四之作无之。然冯、钱之作，皆视胡、梁为密，其终不之及者，惟在无启发性耳”。这样的看法当属见仁见智，而金毓黻以为“所论极有理致”^[51]。

金毓黻的求是求通，有其新的变化趋向，显著的表现，是他对几种新出中国通史的看法。北大同学兼同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立论和金毓黻多异其趣，金毓黻认为该书“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又前此尚论诸家所未有也”。范文澜“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52]。范著主唯物史观，金毓黻的意见并不在此，对于同样以唯物史观为统的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金毓黻的看法却是：“然其最可取者，全书以经济史观为主眼，一贯而下，颇能自成家言。论其骨干，实为绝去依傍，自抒所见，此亦难能可贵之一端。余读此书有不忍释手之征象，则此价值高人一等又可知矣。”^[53]

不仅如此，金毓黻还将周著与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比较：“愚谓治本国史有二途，一曰鸟瞰式治史法；一曰虫蛀式治史法。置身于史实之外，凌空而俯视全局，历历在目，位置之远近，形状之大小，悉可一览而得，此所谓鸟瞰式治史法也。置身于史实之中，一一从事展玩，而从而分析其内容，以寻其症结所在，此所谓虫蛀式治史法也。鸟瞰式治史法，如乘飞机升于高空，以俯视某大都市之全景。虫蛀式治史法，如身入某大宅中，而细数其所藏。虫蛀式治史法，亦可

曰解剖式治史法，取若干史实一一为之分析，而明其得失去取，非置身于史实者不能为也。近人吕思勉氏之《中国通史》，系用虫蛀式治史法，着重于分析，如身入大宅之中而细数其所藏。周氏之《通史》不然，不重分析而重观察，凌空俯视，以明其全局情状，此则用鸟瞰式治史法也。愚谓治通史应以鸟瞰式为主，而以虫蛀式或解剖式辅之，庶乎其可，否则通于此则窒于彼，虽名通史，实史考之丛编耳。”^[54]就通史而言，其对周著的评价还在吕著之上。

本着学术互竞，不囿于门户的精神，金毓黻以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和历史学会的名义，邀请学术观念与做法各异的学人前来讲学。稍后到东北大学兼职，也继续请人讲学。仅就日记所载，先后有罗家伦、李济、郭沫若、卫聚贤、丁山、潘重规、王献唐、萧一山等。所讲虽有泛论与具体的分别，均涉及治史的态度方法等大问题。

历史学会第一次讲演，邀请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时间在1939年9月29日，讲题为《治历史之态度与方法》。罗家伦首先强调历史为事实的记载，过去的事实不能改变，但史实受时空观念影响，难以确认，史家因而可以不断重新认识。重现史的观念，应以进化论为基础。以既得之事实，不断增加了解，即为历史的认识。研究历史不可矿石化，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往往强人就我，请君入瓮，先有成见，不能产生历史学者。研究历史的先决条件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或基本，有了社会科学的各种工具或技术，才能产生有意味的史学。专题研究可以约而能精，但不能忘却整个事实。以小见大，为专题研究之利，还要将历史多量之事实加以联络，立一整体计划，再从事分段研究，研究有得，再为联络，以得公平估价。此即治史方法。金毓黻认为其治史理论“颇能治中、西为一炉，精湛之至”^[55]。

1940年5月5日，金毓黻邀请郭沫若和卫聚贤来校讲演。郭氏所讲为考古学与文字学应相互为用，考古学者往往成见太深，对文字学加以轻视，其实文字学者只是缺乏科学方法。考古学者过于拘泥形式、花纹。以记载之文字居于次要地位，亦属偏见。若能将二者打成一片，使其相得益彰，则其效尤宏。卫聚贤则概述考古学的途径，即书本材料、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人种学、地下文物。^[56]郭沫若所讲实为近代中国考古与史学研究关联性的一大问题，至今仍不免困扰相关学人。

1941年4月，金毓黻为了唤起后学对于考古的精神感召，邀请李济来校讲演，以历史学会名义主持，史学系全体学生出席，他系学生亦多来旁听。其讲题为《治史学之方法及趋向》，有意思的是，李济也认为研究古史以疑古为出发点，不信文字记载为太过，依据地下发掘所获的新史料，以证古史，或补其未备，固为新的研史方法，但不能因此而抹杀文字记载。研史态度应以矜慎为主，不必畸于一偏。^[57]这与郭沫若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年5月，该校历史学会布置文物展览会，又请王献唐演讲鉴别古物的方法。^[58]

1941年8月，在东北大学请丁山为研究生讲治古代史的方法，其一曰怀疑，即鉴别史料真伪，以周还周，以汉还汉，不以乙时代材料证甲时代史事。其二为建设，即以民族问题为研究中心，由语言入手，而得其真相。考证、语言、地理诸学，为研史初步，研究制度乃为历史本身。“吾国史政治之影响究大于经济，近人研史或从经济入手，非研史之正轨也。”金毓黻觉得其所谈颇多创见，“余因此而得有启发”^[59]。

稍后请潘重规讲演，所讲为《清代之考证学》，潘认为清代汉学家求难求是，今人则求易求新。清代考证学有三要点：一为留心细微，二为精于分析，三为必有证据。留心细微以树立根底为前提，所谓树立根底，乃为整个而非部分，亦为必不可缺之条件，前人所谓稳扎稳打是也。于某一点稍有忽略，即为学问全体之缺点，有一字不能解，或为之误解，则其全部为之改观。精于分析，以收集完备为前提，钩沉极致，必有条理。必有证据，以不妄言为前提。证据既具，始谓之不为妄言。其末流又有三弊，一曰重颂数，忽躬行；二曰舍根本，逐微末；三曰立门户，逞私见。今人多置基本书不读，而别求其欲读之书，所以愈渊博而愈空疏。潘重规与金毓黻同为黄侃弟子，而金毓黻对其极为推重，许为“其真能承先生之衣钵而得其心传者，石禅一人而已。……是则读书种子之称，惟石禅当之而无愧”^[60]。对于演讲，金毓黻叹为“所论皆极精辟，足为学子针砭，亦可谓大声疾呼，垂涕而道者矣”^[61]。

稍后萧一山演讲《治学方法及其态度》，略谓治学步骤有三：一曰博；二曰约；三曰通。学者先由博反约，由约而求通，求通之中又有博。科学方法有二，即演绎法与归纳法也。演绎法近于博，亦为由约而博；归纳法近于约，亦为由博反约。又有辩证法，分正反合三段，目的亦为求通，一言合则通矣。历史学之科学化有因果、实证、

系统三段，因果近博，实证近约，系统则通，而后可也。“总之，吾国固有之学术精神固极伟大，而论学之语言，人之殊患于散漫无系统之可言，是为方法不良。应以中国治学之精神，参以西人治学之方，二者相济，庶几可矣，此即所谓治学方法也。”至于治学态度，亦有三端，即求真、虚心、专一。[\[62\]](#)

这些演讲对金毓黻本人也有所影响。以求通而论，可与该系教授沈刚伯为研究生所讲《近代世界史界研究之趋势》相互印证。沈氏认为，工业革命、民族主义对史学研究影响颇巨，工业革命有二特点：一为分工，二为规律化。“流风所被，史学研究遂亦进入狭而深之一途，竭精敝神于小问题，而昧其全体，诚学问之敝也。惟近十余年来，世运推移，学者多感其弊，而综合研究乃代之以起，此可以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伦敦世界科学家大会之提案证明之。……近数十年吾国研史之风，一受外学输入之影响，一受固有朴学之影响，亦与世界研史之趋势同其轨，并世学人亦多竭精敝神于小问题，而罕为具体之研究者，直至最近始渐有转变，如能改变其风气，而为博大综合之研究，则得之矣。”金毓黻称：“沈君所论之最有趣者，近顷学人号称精研史学，乃在学校任教，至不能开二三种科目，其讲一科目多至数小时即已竭泽而渔，此诚可笑，此缘竭精敝神于小问题之所致也。”[\[63\]](#)

考古学的影响亦相当明显。金毓黻为此专考文物之义：“往日治史，必以征文考献为重。所谓文献，即史料也。今世学者治史，首重搜集史料，而加以整理之。所谓史料，实含文与物二者。此所谓文，乃兼文、献二者并言。至所谓物，则在文献之外，即地下发获之实物是也。古人重文，故一求于典籍，实物可供参考者，亦以有文字者为贵。今人不然，古代文物，无论有无文字，皆极重视。而物之价值尤过于文，凡史籍所记，苟无物之证明，则以为不可尽信。……此为近日谈史风气之所趋，故余特举文与物二者以明其究竟焉。”[\[64\]](#)

金毓黻求是求通的观念，集中体现于他为中央大学历史学系撰写的《治史纲要》。该纲要形成于1941年6月，仿《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之义，亦为三纲八目。金毓黻的想法，是鉴于“本系向未建立中心，致学子茫然无所适从”，希望以此有所改变。三纲为：

第一、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说明：本系治史，侧重中国部分，故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应以各正史之书志及《通典》、《通考》、《会要》、《会典》诸书为研究对象。其前代治乱大事，如正史之纪、传，及《通鉴》诸书所载，仍就制度文物有关联者从而研究之，其他则暂行从略。

第二、求通重于求专。说明：本系研究之要点，求通重于求专，以探求历代制度文物之因革损益为主，视断代、专门、国别各史皆为通史之一体。又如清代考证学之优点，亦尽量利用之，但亦用以求通，而非求专。凡作专题之研究，皆以力避支离破碎，求得贯通之旨为主眼。

第三、以养成学问欲为系风。说明：本系以养成学问欲为系风，即为学问而治学问之谓。如太史公之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乃为治史之极则，故于史学之本体及辅助治史之学科，皆以积极之态度从事之，持此不变，积以三四年之岁月，自有相当之成就，而良好之系风亦藉以养成矣。

八条主要有：本系课外研究分组进行；本系同学应就表列各组及其细目，每人任择两种为研究对象；各组研究指导，由本系师长担任，有必要可商请系外专家；同学每两月撰送研究报告一次于指导教师；研究报告成绩评为最佳者，给予奖金并设法发表；参考书由本系向图书馆借用，必要时酌量自备；暑假尤其适用，但研究报告仅限一次。分组为五，即通史（含中国、西洋等科）、断代史（含中国古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蒙、明清、中国近世等科）、文化史（即制度文物史，含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学术、历代制度）、专门史（中西交通史以及中国佛教、史学史、社会、经济、地理沿革、历史地理各史）、国别史（西域、印度）。^[65]

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其实就是关注正史即政治史，这可以说与清季至战前所有新史学的主张颇异其趣，而回归中国传统史学的正轨。只是并非简单地复旧，而是在求是的原则下，吸收各家各派之所长，融会贯通。不受门户局限的目的，是要提纲挈领地把握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特质，以制度文物为脉络，贯通包括治乱兴衰在内的整个历史的发展变化。为此，他特请贺昌群开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史课程，并专函说明：“系史系特开之课，与政治系之中国政治史旨趣不同，

彼所重者政治，因而叙及政治之制度，其范围有限。至史系所开者，以政治经济并言，举凡《通典》、《通考》所列礼乐、官学、兵刑、钱谷诸门，无一不在网罗之中，则所赅者广矣。鄙意中大史系之特点，应以研究典章制度为中心，则吾兄所开之课，亦即中心之中心也。不惟兄应如是，即弟拟开之课亦侧重是点，专言宋代以来之制度，以与兄所讲者沆瀣一气，如是则兄乌所用其迟疑乎。”^[66]

不过，《治史纲要》固然是金毓黻等史家高明的体现，而高明也就意味着高难。金毓黻读《宋会要》食货门农田杂录，“此书盖为档案之汇录，亦分类之史料汇编，故不胜其烦琐难读之感，乍读之实觉干燥无味”，如果细心阅读，可见有宋鼎盛时的社会状况以及朝局争斗。“此等史料皆于干燥无味中求之，一不留心，稍纵即逝，故读此等书籍，非有耐心不可，从首至尾一字不肯放过，乃能小有所获。此治制度文物之史，所以尤难于治乱兴衰之通史也。”^[67]对于青年学子，似乎悬的过高，并非短短数年间可以成效大著，以至于中央大学培养出来的治史人才，相比于其他各校，略显不足。^[68]或以为史学为一高成本的学问，必需阅历与积累，青年时期的判断追求，后来可能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逐渐变化。这对于史学的教学，无疑存在两难。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号称老成，也不免有人同时向北京大学研究所暗通款曲，以致院方不得不明令研究生必须做出取舍。

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

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69]

这样说多少有夸大《学衡》作用之嫌，也与胡先骕本人先前的动摇不相吻合。可能的情形是，派分则难免偏于一端，加以意气用事，遂脱离学问应循的轨则，并与多数学人的一般态度不相啻。时过境迁，风气转移，趋于极端的派系不得不回归正轨。只是造成派分的原因不可能根除，人有意识的活动与历史有规律的运动之间，本来矛盾统一，而人的能力、条件有限，往往各取一偏，治学派分因而难免，于是进入新一轮新的循环。后来中研院成立近代史所，引起不小的争议，看似学术观念分歧使然，但如果掌门人不是郭廷以而是金毓黻，学术分别仍旧，反应效果则当大相径庭。

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学分南北，在后来主流的叙述中，隐然成为新旧的同义词，并有连续的人脉关系，化作成见与心结，继续操控学界的动向。实则南北各有新旧，一般学人也不作此是彼非、壁垒森严的划线。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

[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629—4630页。题词系于1940年12月30日，但据1941年1月1日的日记：“撰《史学述林》题辞。”则实际撰写的时间应在1941年元旦。

[2]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7页。

[3]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三册，第437页。

[4]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96页。1929年1月19日，吴宓与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等会议《大公报·文学副刊》改良之事。

[5]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第60页。

[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四册，第2503页。

[7] 蒋梦麟：《新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6、184页。

[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144页。

[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八册，第5934页。

[1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第5486页。

[11] 《傅斯年致丁文江》（暂系年于1933年7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548页。

[1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487—4488页。

[1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八册，第5894页。

[1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485—4488页。其实罗家伦对本校教授的态度未必都是礼敬，同样来自北京大学且于罗有师谊的朱希祖便几度遭遇怠慢。

[1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661页。

[1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778页。

[1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八册，第5959页。

[1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五册，第3998页；第七册，第5599页；第六册，第4046页。

[1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第279页。

[2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三册，第1963—1965页。黄侃语见当日日记所录黄侃复金毓黻函。

[21]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22]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四册，第282页。

[23]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48页。

[2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第5599页。

[2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第72页。

[2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第106页。

[2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第159页。

[2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第263页。

[2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二册，第954—955页。

[3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二册，第985—986页。

[3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二册，第1148页。

[3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二册，第1013页。

[3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二册，第1195页。

[3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二册，第1470—1471页。

[3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四册，第2503—2505页。

[3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四册，第2585页。

[3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122页。

[3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第157—158页。

[3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第220—221页。

[4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第362页。

[41] 金毓黻：《最近史学之趋势》，《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6—437页。

[4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145页。

[4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183页。

- [4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243页。
- [4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317页。
- [4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779页。
- [4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834页。
- [4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046页。
- [49] 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40页。
- [5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第5243—5244页。
- [5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第4927页。
- [5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八册，第5869页。
- [5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第5039页。
- [5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第5014页。
- [5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376页。
- [5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551页。
- [5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697页。
- [5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714页。
- [5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786页。
- [6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662页。
- [6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804—4805页。
- [6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836—4837页。
- [6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七册，第4924—4925页。
- [6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八册，第5831页。
- [6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738—4741页。
- [6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870页。
- [6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750—4751页。

[68] 尚小明提交“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6月29日—7月2日）的论文，对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培养的学人有详细统计，其标准口径略有可议。其实东南大学时期也培养出浦江清等良才。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出人不少，金毓黻教过的学生当中，如邵则云、苏诚鉴、王聿均、黄彰健、唐德刚等各有所成。

- [69] 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0月1日。

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

在新思潮鼓舞下满心向往融入世界潮流的傅斯年，赴欧洲前后，经历了读西书与留西学的不同阶段。学习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不仅是眼界的放大和知识的扩充，同时也导致态度的变更甚至立场的转移。另一方面，在留学的选择从清季以日本为主转向民初以欧美为主的时势中，傅斯年与陈寅恪都认为求学问与求学位不同，求学问应去欧洲，对于时髦青年纷纷去美国求学位不以为然。傅斯年没有到过美国，陈寅恪虽然一度远赴太平洋彼岸，可是对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美东学术环境印象不佳。傅、陈二人相识于欧洲，彼此论学，从后来的著述言论看，常有许多相近相同的见解。

因为同是民国学术界屈指可数的人物，关于傅斯年与陈寅恪的关系，学界与坊间多有探究演绎，其学术主张的异同，自然也在关注之列。两人学术上的种种近似，自然不乏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形，但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至于究竟哪一方占据主导，或者说究竟谁影响谁的问题，因为彼此都缄口不言，又少见相关记述，难以征实，因而大都茫然不觉，不以为是问题，或虽然有所察觉，限于材料不足征，只好存而不论。间有心生疑惑者，私下谈及之外，也不便贸然揣测。此事若是执着于实事求是的一般套路，大概很难做到信而有征的程度，必须前后左右，以实证虚，才能看出端倪。从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或许可以探查两人学术关系究竟哪一方占据主动的蛛丝马迹，进而窥知可能与大体。

一 留欧前后的转变

经历了晚清中西学的乾坤颠倒，民初教育界学术界的时趋已经是以西为准为尊为优，趋新人物大都拿着西学的尺子裁量中国，寻找落后的原因症结，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有，凡是人无我有的都欲去之而后快，凡是人我共有但形实不同的都要加以改造，恨不能与心中的“西方”整齐划一，觉得非如此不能拯救和振兴中国。留学欧洲之前，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傅斯年显然是一位好弄“新潮”的“新青年”，其所追逐的新潮，其实就是西潮，凡事皆以西为准，学术判断自然不能例外。

可是，这时傅斯年所认为的西化标准，大体来自中国人的西学介绍宣传（包括学校的正式教学）以及直接阅读西书。其中的许多理念，虽然至今仍被普遍奉为毋庸置疑的信条，实际上潜藏着认识危机：一是诸如此类的解读是否符合西人的本意，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存在误会曲解；二是即使符合原意，是否为一般通则，抑或不过是个别具体的说法；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人而异的看法乃至一般适合“西方”的原则，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通则，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势。这三方面，没有留学机缘的国人可能不易加以验证，或是虽然可以根据后来不断接受的新信息有所调整，仍然很难胸有成竹地予以确认。即便留学者，如果顶礼膜拜地一心求法，也未必会心生疑惑。但是，对于有心求证者而言，随时都会对原来奉为公理的信条进行检验，从而不断调整修正原以为天经地义的观念。傅斯年显然属于这一类有心之人。

留学前后两相比较，傅斯年的学术观念最为显著的变化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分科治学的意义；其二，中国有无哲学及其作用；其三，汉语言文字的功能和命运；其四，对于宋代学术的评估。其五，古史观念。仔细考察，留学前后傅斯年在前四个方面的认识，几乎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后一方面的显著变化，已有学人留意，即原来傅斯年颇信疑古之说，此后则由疑转信。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一文指出：留欧后期，傅斯年对于古史信多于疑，虽然还处处流露出晚清今文家疑伪的口气，态度已大大不同，对于《左传》等书虽然仍有所保留，但基本上已信过于疑了。而且觉得古文家伪造的许多东西必有很长的渊源，不可能只是顺应政治需求而造出。^[1]继而陈以爱《从疑古到重建的现代中国史学——以王国维对傅斯年的影响为中心》，进一步指出傅斯年古史观的转变发生于1923至1924年之间，并且围绕王

国维的作用，仔细梳理了各种相关的人事因缘和影响。^[2]本篇草就数年，虽然陆续和一些弟子同好谈过，却始终有些忐忑，直到2011年看了陈以爱的论文，才自觉大体不错，且不至于诛心之论。相关问题后续各节将着重讨论。

关于分科与科学及科学方法。与今日人们自以为是的不言而喻有别，清季以来，科学的重要含义之一，便是分科治学。在中西学乾坤颠倒的语境之下，分科被视为科学的基本形式或载体。1918年4月，傅斯年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撰文批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开宗明义地提出：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学科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

遵循学应分科的理念，傅斯年进而批评“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 of 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其才气大者，不知生有涯而知无涯，以为举天下之学术，皆吾分内所应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所学之范围愈广，所肄之程度愈薄，求与日月合其明，其结果乃不能与烛火争光。清代学者，每有此妄作。惠栋、钱大昕诸人，造诣所及，诚不能泯灭；独其无书不读，无

学不肄，真无意识之尤。倘缩其范围，所发明者，必远倍于当日”
[\[3\]](#)。

按照傅斯年这时的看法，分科治学就是科学，分科的西学自然比不分科的中学来得科学。这样的判断一旦与科学的其他含义相牵混，分科的学问就成了科学、正确、公理的化身。由此看来，专精自然优于博通，宁可窄而偏，不能泛而浅。

傅斯年不仅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学与西学的优劣高下，更主张用西式的科学来改造中学。例如他佩服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是因为可以把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作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材料上占重要部分。也许通过整理还能使世界的学问界发出新枝。[\[4\]](#)用西学的系统条理中国的历史文化材料，既可以使中学变得科学，还能够进一步丰富发展世界的学科，让世界的学科更加丰富多彩。

然而，到了1923年，傅斯年突然顿悟，且敢于大胆表达。他以外行的身份为刘复的《四声实验录》作序，从外面说入，居然断言当时中国人（其实也包括他本人）所谓“这是某科学”，“我学某种科学”，都是些半通不通不完全的话，其完整的表述为：

一种科学的名称，只是一些多多少少相关连的，或当说多多少少不相关连的问题，暂时合起来之方便名词；一种科学的名称，多不是一个逻辑的名词，“我学某科学”，实在应该说“我去研究某套或某某几套问题”。但现在的中国人每每忽略这件事实，误以为一种科学就好比一个哲学的系统，周体上近于一个逻辑的完成，其中的部分是相连环扣结的。在很长进的科学实在给我们这么一种印象，为理论物理学等；但我们不要忘这样的情形是经多年进化的结果，初几步的情形全不这样，即为电磁一面的事，和光一面的事，早年并不通气，通了气是19世纪下半的事。现在的物理学像单体，当年的物理学是不相关的支节；虽说现在以沟通成体的结果，所得极多，所去的不允处最有力，然在一种科学的早年，没有这样的福运，只好安于一种实际主义的逻辑，

去认清楚一个一个的问题，且不去问摆布的系统。这和有机体一样，先有细胞，后成机体，不是先创机体，后造细胞。但不幸哲学家的余毒在不少科学中是潜伏得很利害的。如在近来的心理学社会学各科里，很露些固执系统不守问题的毛病。我们把社会学当做包含单个社会问题，就此分来研究，岂不很好？若去跟着都尔罕等去辩论某种是社会事实，综合的意思谓什么……等等，是白费气力，不得问题解决之益处的。这些“玄谈的”社会学家，和瓦得臣干干净净行为学派的心理学，都是牺牲了问题，迁就系统，改换字号的德国哲学家。但以我所见，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读书的时候，也要以问题为单位，去参各书。不然，读一本泛论，再读一本泛论，更读一本泛论，这样下去，后一部书只成了对于前一部书的泻药，最后账上所剩的，和不读差不多。

与出国前傅斯年关于中西学术不同的说法相比，可以说是完全颠覆前说。

不仅如此，出国前傅斯年相信清代学问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的归纳法，而在“科学”改观后，傅斯年对科学方法的想法也有所变化。近代中国人所认定的科学方法，主要就是归纳法与演绎法，而这原是明治日本学者西周助用于翻译逻辑方法的专门术语。或许由于逻辑方法相对于东亚思维的先进性，清季民初接受日式术语和学理的国人，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在讲到科学方法之时，无不以逻辑方法等同于科学方法，其中又尤其偏重归纳法。这种在欧美并不普遍甚至完全没有的观念，却被国人毫不犹豫地奉为公理定律。

按照英国一般的认识，只有能够用实验反复证明的才是科学，所以傅斯年有位朋友告诉他：“只有实验是科学方法。”准此，则达尔文的方法、理论物理乃至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等等，都很难与科学方法搭上关系。傅斯年认为此言有所夸大，值得注意，但不必当真。“一切人文科学虽在方法上看来好像很受拘束，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他们一向传下的去经历事实一种老调，一旦到了心思细警的人手里，马上出结果。”例如刘半农研究四声，既要实验，也要人文学者的老法子和考证家的细心，不能舍弃推测故训的大本营。^[5]

后来傅斯年谈到统计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时，表示应当仔细慎重，因为历史现象不能恢复，又极复杂，如果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加上，恐怕有点疏误。“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Mass-facts）。然而直截用起统计方法来，可原小心着，因为历史上所存的数目多是不大适用的。”[\[6\]](#)

1935年傅斯年所写《闲谈历史教科书》，详细论述了历史不能归纳概括以及求因果的道理。他认为：算学与物理科学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这个凭借，在地质、生物各种科学已难，在历史几不适用。物质科学只和百来种元素办交涉，社会科学乃须和无限数的元素办交涉，算学家解决不了三体问题，治史学者自然不能解决三十体。史学家不应安于庞加莱（Henri Poincaré）的所谓“天命”，即认为可以重复出现的事实，如元素、种类，使科学得以发展。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只是史论而不是史学，是一家言而不是客观知识。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他还进一步分辨物质科学和历史学的区别道：

物质科学中，设立一个命题，可以概括（Mach所谓述状）无限度的引申命题……所以编这些门类的教科书，大约有三个领导的原则。第一项，列定概括命题，以包函甚多引申的命题与无限的事实。第二项，举切近于读者的例，以喻命题之意义。第三项，在应用上着想。这些情形，一想到历史教科书上，几乎全不适用。第一项固不必说，历史学中没有这东西。第二项也不相干，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第三项，历史知识之应用，也是和物质知识之应用全然不同的。我们没有九等人品微分方程式，所以人物只得一个一个的叙说。我们没有百行的原素表，所以行动只得一件一件的叙说。我们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因果二词，既非近代物理学所用，亦不适用于任何客观事实之解释，其由来本自神学思想出。现在用此一名词，只当作一个“方便名词”，叙说先后关系而已，并无深意。[\[7\]](#)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去较远，尽管处于崇尚科学主义的大背景之下，直接应用自然科学的法则来研究历史的情况，毕竟不大普遍。历史研究的科学化，除了一般追求，社会科学的引入及其应用影响更大。傅斯年对于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时趋似乎不以为然，1942年10月11日，他复函好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吴景超，有的放矢地强调：“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8]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主要是比较研究，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类像相聚，每每喜欢求同，而史学因缘于事实联系，更加着重于见异。这并非排斥规律，历史事实均为特殊、个别，不等于没有联系，只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来强求史料与史实的一律及连贯。这样的取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归纳法的。

关于中国哲学。中国本来有无哲学，或是否能用哲学观念条理解释古代思想的问题，出国前的傅斯年并无怀疑。他虽然是国文门的学生，却对哲学充满兴趣。不过，尽管据说他对胡适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讲法表示赞许，但他与一般直接用西洋近代哲学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的做法还是有所分别。在他心中，古今中外并不一定能够完全附会对应。所以他更多的是用近代西洋的尺度衡量检验中国。他认为“西洋学术界发展至今日地位者，全在折衷于良心，胸中独制标准，而以妄信古人依附前修为思想界莫大罪恶。中国历来学术思想界之主宰，概与此道相反”。其所学之目的，全在理古依人，没有开新独断，所以陈陈相因，非非相衍，谬种流传，于今不沫。“现于哲学，则以保持道统为职业。”

以西洋学术思想为准绳，傅斯年批评：“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像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这样的比较看似合情合理，其实也是一种强求，前提即假定西洋学术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知思维受语言的制约，联想、玄想、比喻之类，正是由文字决定的思维方式。他指责中国历代论玄学、文学、政治、艺术者，“无不远离名学，任意牵合，词穷则继之以联想，而词不可尽；理穷则济之以比喻，而理无际涯”^[9]。这些言辞，依稀可见胡适以近代西洋逻辑学比附古代中国名学，又以名学条理古代思想的影子。而用名学解历代思

想政治文化，并未跳出以比附为比较的窠臼，同样是受文字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的表现。

傅斯年早年认为，相比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洋哲学，以历史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不过他并不否定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皆与五行家言相互杂糅。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对该校将哲学门隶属文科的制度表示怀疑，专门致函蔡元培校长，指陈这种制度安排的流弊。他认为：“以哲学、文学、史学统为一科，而号曰文科，在于西洋恐无此学制。日本大学制度，本属集合殊国性质至不整齐之学制而强合之，其不伦不类，一望而知。”中国人研治哲学，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以自然科学为材料，哲学发展史上，凡自然科学大进步之时，即哲学放异彩之日，“以历史为哲学之根据，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学为哲学之根据，其用至博”。误以为哲学与文学关系密切而与科学关系较少，是中国人的谬见。原来北京大学的哲学门，仅可谓为“大清国大学经科学理学科”，不足当哲学门之名。应将哲学门改归理科，学生才能于自然科学多所用心，以利于哲学的发展。即使退而求其次，也应将哲学独立，与文理科并列。[\[10\]](#)

秉承上述观念，傅斯年批评“今之谈哲学者，皆以为玄之又玄。其实天地间事，自魑魍魑魅而外，未有玄之又玄者，哲学则实之又实耳。字句必有着落，思想必有边际，必也深切著明，然后可称胜义”。否则不过魏晋文词，而非语哲理。[\[11\]](#)为此，他专门写了《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一文，为当时中国有高谈哲学的声浪，一般人以研究哲学自任觉得很可乐观。“因为一种哲学对于一个人的效用，比他的饭碗问题还要紧；而一种国民哲学对于他的民族的势力，远在政治以上。”希望哲学进入正经轨道，而只有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新系统哲学才是正经轨道。

所谓哲学的正经轨道，决不会指初民的国民思想，决不会指往古的不能成全备系统的哲学，定是指近代的哲学，更严格地说起来，应当指最近三四十年中的新哲学——因为旧哲学的各种系统，经过一番科学大进步以后，很少可以存在的，只有应时而起的新系统，可以希望发展。

也就是说，傅斯年知道近代欧洲的学问其实是经过重新系统化的，所以在他心中，“哲学是一时代学术的会通的总积”，哲学与科学相辅相成，“哲学不是离开科学而存在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积”^[12]。对哲学这样的推崇备至，与后来的嗤之以鼻形成鲜明对照。而这里所谓科学，既包括一切自然科学的分科，也包括所有学问的分科。

到了留欧后期，傅斯年的观念完全改变。1926年，仍在德国的傅斯年听说胡适要重写《中国古代哲学史》，特意表示自己将来可能写“中国古代思想集叙”，不用近代哲学观看中国的方术论。^[13]不久，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又明确表示不赞成胡适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叫作哲学史，认为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把子家叫作哲学家，大有误会的可能。用新名词称旧物事，人文上往往不可以，因为多是似同而异。不仅子家只能叫作方术家，思想一词也要少用为是。^[14]

回国后任教于中山大学之时，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进一步论证“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品，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认为拿诸子名家理学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相比，不相干者多，相干者少，“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意的斐洛苏非一科，‘中国哲学’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15]。短短几年间，哲学在傅斯年心目中就从一切学术一切科学的会通总积、对于个人的效用比饭碗要紧、对于民族的势力比政治重要的齐天，跌落到没有哲学的民族思维习惯更加健康、所谓“中国哲学”是应当排斥的“日本贱货”的深渊。

关于汉语言文字。留学欧洲之前，傅斯年是鼓吹新文化的健将，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还是用文言写成的《文学革新申义》，内容却是鼓吹文言合一。通过回顾历史和观察现实，他得出四点：第一，中国语文分离，主要由贵族政体造成，贵族性好修饰。如果不以高华典贵为文章的正宗，即应多取质言。而且贵族之政，学不下庶人，文言分离，无害于事。“今等差已泯，群政艾兴，既有文言通用于士流，复有俗语传行于市民，俗语着之纸墨，别为白话文体。于是一群之中，差异其词。言语文章之用，固所以宣情，今则反为隔阂情意之具。与其樊然淆乱，难知其辨，何若取而齐之，以归于一乎？”

第二，语文关系紧密。“一代文辞之风气，必随一代语言以为转变。今世有今世之语，自应有今世之文以应之，不容借用古者。与其于今世语言之外，别造今世之文辞，劳而无功，又为普及智慧之阻，何如即以今世语言为本，加以改良，而成文言合一之器乎？”

第三，白话优于文言的巨点之一，是“不以时语为俚，不以方言为狭。惟其用当时之活虚字，乃能曲肖神情”，上古典籍亦然。

第四，白话近真，文言易于失旨。文不尽言，言不尽意。言语本为宣达思想的利器，可是思想无涯，言语有限，思想转为言语，必然有所流失，再转文辞，流失更多。“苟以存真为贵，即应以言代文。一转所失犹少，再转所失遂巨也。”况且，科学盛则古典文学衰，代之而起的应是利用科学之文学。以此为准，必须扫除桐城、南社、闽派等古文，制作模范，发为新文。[\[16\]](#)

紧接着，傅斯年又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表示对于废文词而用白话深信不疑，但希望改用文言合一。因为文言与白话分别经过二千年的进化与退化，前者虽死，内容丰富，后者时兴，而所蓄贫乏。要“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乃吾所谓用白话也”[\[17\]](#)。

1919年2月，傅斯年在《新潮》第1卷第2号发表《怎样做白话文》，宣称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对于白话文学主义没有丝毫疑惑，并提出了胡适认为是最重要的两条修正案，即大胆的欧化和大胆的方言化。要把白话文变成文学文，欧化是必由之路。“照事实看来，中国语受欧化，本是件免不了的事情。十年以后，定有欧化的国语文。日本是我们的前例。日本的语言文章，很受欧洲的影响。我们的说话做文，现在已经受了日本的影响，也可算得间接受了欧化了。偏有一般妄人，硬说中文受欧化，便不能通。我且不必和他打这官司，等到十年后，自然分明的。”

一个月后，他又在《新潮》第1卷第3号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开宗明义道：“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的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这两桩事不特妨害知识的普及，并且阻止文化的进取……假使西洋人至今还用埃及巴比伦的象形文字、希腊罗马的古语，断断乎不能有现代西洋的文化。从此可知现在

中国的文化不在水平线上，都是他俩的功德了。”宣称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汉语绝对可能用拼音文字表达，汉字绝对不可能无须改造用别种方法补救，“希望这似是而非的像形文字也在十年后入墓”。

傅斯年以语言为表现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器具，以方便为准则，废文言改国语，废汉字改拼音，都是为了方便。中国字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难学，尤其与欧洲各国文字相比，难易不可以道里计。这种可恶的文字不仅妨害大多数的教育普及，并且阻止少数人的智慧发展。“总而言之，中国文学〔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18]仿佛是铁器时代仍用石器，野蛮时代造出的文字一直保持到现代，只能自惭形秽。态度如此彻底，言辞如此激越，难怪被钱玄同许为“是对于汉字施根本攻击的急先锋”，“实是‘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19]。

可是，到了回国任教之时，傅斯年的观念与说法全然改观，他将语言和文字分开，对古代文言分离能够给予历史的理解。虽仍然认为语言大变，文学免不了大变，却又说文学大变，语言不必大变，并且承认文言是“既简净又丰富的工具”。“由标准语进为文言，浅的地方只是整齐化，较深的地方便有同于诗歌化者，诗歌正是从一般话语中最早出来最先成就的一种艺术，一种文言。”只是中国的文言与古文相合。^[20]

1931年陈寅恪因为清华入学考试出题对对子引起风波，傅斯年风闻其事，特致函询问。陈寅恪复函，概略谈了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特性以及近代以来欧化的看法：“清华对子问题乃弟最有深意之处，因考国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国文法在缅藏语系比较研究未发展前，不能不就与中国语言特点最有关之对子以代替文法，盖借此可以知声韵、平仄、语辞、单复词（vocabulary）藏贫富，为国文程度测验最简之法……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中国对子与中国语之特点最有关，盖所谓文法者，即就其语言之特点归纳一通则之谓，今印欧系格义式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

陈寅恪留学期间，就表示回国后不与人进行无谓的纠缠争辩。此番对傅斯年愿言其详，不无引为同道之意，所谓：“以公当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与之言比较语言文法学者，故亦暂不谈也……弟意本欲藉此以说明此意于中国学界，使人略明中国语言地位，将马氏文通之谬说一扫，而改良中学之课程。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21]

不仅如此，陈寅恪还进而对俗流盲目趋新的现象大加针砭，他说：“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讥笑。然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22]在致傅斯年信中又说：“总之，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种语言统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遗传习惯不合于论理，非中国文法之所应取法者也。”^[23]其实傅斯年出国前也是挟十九世纪后半格义之学的一分子，知道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且抛弃成见改信新说，还是留学后眼界扩大，又与陈寅恪论学的结果。

关于中国历代学术的高下。出国前，年仅23岁的傅斯年虽然不过是北京大学国文门的学生，可是由于读书较多，思想大胆，又适逢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且不乏发声的园地，所以已经发表了不少政论和学术文章。凭借新旧优劣的自以为是，敢于对中国历代学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对于中国学术的看法大体是：“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宋代学术再兴，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即以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体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清代学术善于疑古，“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24]。

虽然傅斯年对宋代学术不无好评，还专文评论过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认为“这两部书很被清代汉学家的攻击，许多人认他做全无价值的‘杜撰’书”。其实比毛公的传、郑君的笺高出几百倍，后来的重要相关著作见识远不敌朱熹。“关于《诗经》的著

作，还没有超过他的。”朱熹的训诂虽不免粗疏，却少有“根本谬误”的毛病。尤其是以本文讲诗义，能够阙疑、直言，敢于推翻千余年的古义，具有称心所好、不顾世论的魄力。^[25]不过，整体而言，出国前的傅斯年对清代学问的评价更高。

不知有意还是巧合，1919年4月1日的《新潮》第1卷第4号“故书新评”栏目刊载的两篇傅斯年的文章，刚好分别评议宋代和清代的学问，除了评朱熹的两部书外，就是评点“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该栏目本来就是借个由头谈想法，所以很可以看作是傅斯年对两个朝代学问基本看法的郑重表述。傅斯年认为，清代的学问是对宋明的反动，像是西洋的文艺复兴，正对着中世的学问而发。虽说是个新生命，其实复古的精神很大。“清代学问是中国思想最后的出产品。在汉朝以后出产的各种学问中，算是最切实最有条理的。”各时代学问的差别，取决于原动力的不同。宋朝学问的原动力是佛、道两宗，谈起心性来，总是逃禅；谈起道体来，必要篡道。“假使唐朝一代的学者，能在科学上研究得有些粗浅条理，宋朝的学问必定受他的影响，另是一番面目。无如唐朝的学问太不成东西了，宋人无从取材，只好逃禅篡道去。所以整天讲心，却不能创出个有系统的心理学；整天说德，却不能创个有系统的伦理学。程伯子的天资，朱晦翁的学问，实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所成就的，也不过‘如风如影’的观念，东一堆西一堆的零杂话。这都由于先于他的学者，不能在科学上有点成就，供给与他，因而他走了错道了。”

清代学问的原动力，是经籍的古训。如戴震所说：“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清代学问都是针锋相对地发出，宋明的学问是主观、演绎、悟、理想、独断的，清代的学问则是客观、归纳、证、经验、怀疑的。方法截然不同，主义完全相左。“清代的学问，狠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与西洋的不同在于分别用于窥探自然或整理古物，一求真理，一求孔孟的真话。清代学问的消极方面是怀疑，导致百家平等；积极方面是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用归纳法将无数的材料反复仔细考索，求异求同。“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一般中国人不肯尽弃中国学问，与其选择其他，不如粗略研究清朝学问，比较近于科学，有益少害。^[26]

回国后，傅斯年关于宋、清学术的看法较前正相反对。他在中山大学讲中国古代文学史，指“近代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开创于赵

宋”^[27]。讲《诗经》，又说欧阳修大发难端，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宋朝人经学思想解放，眼光敏锐。宋末王应麟（伯厚）则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28]虽然傅斯年看重实学，因而“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29]，仍然承认清代学术的价值贡献，总体评价却是宋代远在清代之上。

傅斯年对宋代的肯定更多地是由于史学，他认为宋代史学最发达，而最有贡献且趋向于新史学方面进展的，以《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为代表。前者引书多至数百余种，折中权衡不同材料，后者利用新发现的材料以考订古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的窠臼，转注于史料的搜集、类比、剪裁，与今日新史学的相关方面相一致。北宋史学远超前代，可惜南渡后无甚进展，元明时生息奄奄。^[30]如果照着宋朝晚期一切史料的利用，以及考定辨疑的精审进化到明朝，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不幸因为胡元之乱，以及清代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不仅不能开新进步，反而退步。^[31]相较于出国前关于宋、清两代学问的看法，刚好乾坤颠倒。

二 顿悟：环境与交友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政坛社会波谲云诡，思想文化起伏跌宕，成名的学人当中，思想学术观念今是而昨非者比比皆是。趋新者如梁启超、胡适，后者大变而不动声色，甚至有意掩饰变的方面和幅度，前者则大张旗鼓地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并不以流质善变为耻。钱玄同还自认为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情形较梁启超有过之无不及。即使后来被视为守成的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年轻时也俨然新学少年，成熟后才悔其少作，回复本位。不过，一般而言，这样的转变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潜移默化，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梁启超变来变去，颇为时人诟病；王国维兴趣转移，由雕虫小技而正途大道；章太炎、刘师培脱去西学外衣，回复中学本相。对于少年时的趋新，他们或笑而不答，或坦承有误。相比之下，留学期间傅斯年几乎各方面都出现180度转变，显得早熟和急促，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这样的顿悟就显得有些突兀。

产生外力冲击的机缘，首先可以想到的就是留学的效应。近代中国的青年出洋留学，眼界大开，思想观念较出国之前迥异者不乏其人。只是原来大都并无固定见识，尤其是对于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术知之甚少，留学更容易滋生食洋不化的西化倾向。傅斯年则相反，从原来单向度的一味趋新，变成多视角的重新估价。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虽然就读于国文门，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也读过不少西书，而且是原文原版，在北大所受的基本教育，也是西式的分科教育。在他看来，“今日修明中国学术之急务，非收容西洋思想界之精神乎？中国与西人交通以来，中西学术，固交战矣；战争结果，西土学术胜，而中国学术败矣”。可是，虽然人们认识到必须学习和取法西方，但“一方未能脱除中国思想界浑沌之劣质，一方勉强容纳西洋学说，而未能消化。二义相荡，势必至不能自身成统系，但及恍惚迷离之境，未臻亲切著明之域……此病不除，无论抱残守缺，全无是处，即托身西洋学术，亦复百无一当。操中国思想界之基本谬误，以研西土近世之科学、哲学、文学，则西方学理，顿为东方误谬所同化”^[32]。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思想界自身没有调理构造好，学习西方势必走样，而要改造中国的思想学术，又必须倚重西土学术。这样互为因果的纠结，令当时学人普遍感到相当困扰。

1919年元旦，傅斯年集合北京大学同学中的同好，创刊《新潮》，由他撰写的《新潮发刊旨趣书》，对于大学和出版界的职务作用的期许，都是如何才能进入世界潮流。他说：

夫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更不以方土易其质性。今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直不啻自绝于人世。既不于现在有所不满，自不能于未来者努力获求。长此因循，何时达旦？寻其所由，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于人于己两无所知，因而不自觉其形秽。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引导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33]

这些言词，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社会进化论主导的世界眼光的典型表述。而诸如此类的中外东西类比，同样是其所批判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好譬喻的典型表现。只是傅斯年当时举证的许多理由，后来都被唐德刚批倒，不过是时代的偏见和对西学一知半解的误会。

遵循上述理念，《新潮》辟有书评栏目，选评一些国内外出版的著作，开始以国内出版物为主。傅斯年发表的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断言：“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34]这可以看作是蔡元培所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取法旨意的翻版。后来傅斯年为《新潮》的“故书新评”栏目辩解，也表示：“照真正道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35]

对于当时中国人所写的新书，傅斯年同样以西洋学术为准绳加以评判。他借评蒋维乔《论理学讲义》之机，进一步阐述道：“我以为救正中国人荒谬的思想，最好是介绍西洋逻辑思想到中国来。因为逻辑一种学问，原是第一流思想家创造出来，是一切学问的基本，是整理思想的利器。现在的中国思想界，只是空泛乱杂，没有一点道理可讲的，要是能够介绍逻辑进来，比较一下，顿然显得惭愧的很，也就不觉的救正许多了。”^[36]

据《新潮》第1卷第3号的“通信”，书评刊行后，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新潮杂评》，指出：“与其批评中国的出版物，不如介绍外国的出版物……如是批评中国书总离不了抨击，抨击有什么结果呢？还不是骂一回就完了吗？”因而建议“此门可以删去，另添一个介绍西洋新书的”。傅斯年认为这种见解极好，表示欢迎，并声称自己一个月前已经想到这一点，“觉得把工夫用在评中国书上，实在不值得。与其做‘泥中搏斗’的生涯，何如做修业益智的事业”。他公开致函新潮社同学读者诸君，提出计划以《新潮》第1卷第5号多介绍西洋文学、哲学、科学的门径书。然后在新潮社里设一个西书研究

团，在热心赞助的教员指导下，各选精要书籍，限期读完，写成提要，择优发表。从第2卷第1号起，书评增设“西书提要”。

在同期发表的《译书感言》中，傅斯年还提议组织译书会，希望从新潮社做起，杂志每期要翻译的好文章占三分之一。他自谦浅陋，新学问只有逻辑学读过十几本书，其余更是粗浅。“但是我对于许多问题常有插嘴，只有逻辑永不敢做一字，可见‘学然后知不足’，而且精密的学问，实难得轻易下笔，不如迳自翻译，比较的可以信得过。”这大概反映了当时一般读西书以求西学人士的普遍状况。读书稍多的领域不敢信口开河，反之却可以放言无忌，这样的无知无畏，绝不仅仅为五四时期鼓吹新文化的新青年所独有。

面对有人质疑“新的是极端崇外，觉得欧美的东西都是好的”，傅斯年坦然应道：“觉得欧美的东西都是好的，固然是荒谬极了，但是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是崇拜进于我们的文化。”中西文化都是人类进步上的一种阶级，“不过他们比我们更进一步，我们须得赶他”。虽然中西文化没有绝对的是非，“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37]。

这时的傅斯年系统谈论清代学问，每每与西洋中世纪转向文艺复兴相比较，虽然他不无自觉，强调“这不是我好为影响附会的话。实在由于同出进化的道路，不容不有相近的踪迹了”，所以还是置于同一系统之中。尽管他认为清代学问较有科学精神，还是告诫道：“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38]

在提倡白话文方面，傅斯年本来担心白话文学主义的真价值会被速效弄糟，因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可是转念一想，“中国人在进化的决赛场上太落后了，我们不得不着急；大家快快的再跳上一步——从白话文学的介壳跳到白话文学的内心，用白话文学的内心造就那个未来的真中华民国”^[39]。

出国前夕，傅斯年为《新潮》写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希望同社诸君：（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40]只是办杂志多少也算是服务社会，而不到三十岁的确未能显出力学的耐心。他自称去欧洲是要“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41]。在《新潮》写下那些崇尚西学的高谈阔论的傅斯年，其实内心里颇为怀疑自己到底对西学了解多少，认识多深。其对于西学的崇拜，与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多少有些盲目和迷信。其依据不过是西方列强战胜东方、称霸世界的现实，以及日本仿效西方跻身强权的榜样。

到英国短短的几个月后，傅斯年的思想就出现变化，自觉以前意气极盛，陷入许多错谬，现在平静许多，没有从前自信得强了。天地间的道理处处对着迟疑，考虑的心思周密，施行的强度减少。^[42]总体说来，就是改变了一味趋新并且以西为新的片面。具体而言，变化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其一，认识到极旧之下每有极新；其二，对基督教一元论影响下的进化论发生动摇；其三，开始怀疑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的正当性。

1920年8月，留学欧洲的傅斯年致函胡适，抱怨在北京大学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此说看似仅仅批评旧学者，至少时下学人多持此解，其实更主要的却是指责新风气。他提醒胡适，“为个人言，古来成学业的，都是期于白首，而不隐于才华；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希望北京大学里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傅斯年在北大，受胡适的影响最多，“止于批评”的学风的形成，包括胡适在内的所谓新文化派难辞其咎。所以傅斯年不惜犯颜直谏，“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请胡适勿为盛名所累，“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43]。

傅斯年这封写给师长的“私信”，虽然已经相当大胆坦率，以至于胡适的反应有些过度，却自觉言辞之间支支节节，不能达意。两个月后。他写给蔡元培一封“公函”，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晰，他说：

“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望大学更进一步去。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供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44]

傅斯年的觉悟，首先是离开北京政治思想文化的喧闹，沉潜自省的结果。他自己总结了不想做文章的四条原因，大体可以反映其思想的变化：“一来读书之兴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很觉得自惭了；三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中更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 [外向] 的倾向锐减，而introversion [内向] 之趋向大增，以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45]

其次，应是到欧洲后受其学术文化熏陶的结果。“牛津剑桥以守旧著名，其可恨处实在多。但此两校最富于吸收最新学术之结果之能力。”“而且那里是专讲学问的，伦敦是专求致用的。剑桥学生思想彻底者很多，伦敦何尝有此，极旧之下每有极新，独一切弥漫的商务气乃真无办法。伦敦譬两校以游惰，是固然，然伦敦之不游惰者，乃真机械，固社会上之好人，然学术决不能以此而发展。”^[46]他将北京与上海、北大与清华比附于剑桥与伦敦，实则在剑桥与北大之间，后者只能扮演“伦敦”的角色。所以中国留学生大都求速效，急名利，忽忘学业，所谓人才，也每每成政客与记者一二而二而一的人格，不能真研究学问。

出国前傅斯年对西学和西式学问的深信不疑，源于笃信进化论以及作为其支撑的一元化史观，相信西学的先进性，相信先进的西学可以普遍适用，相信落后的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后进民族都处于世界一体的序列链条的后端，应该也必须用西学的模式和办法重新塑造。到了英国后，发现其物质不如原来想象的高，而精神则不如想象的低，尤其是与在远东遇见的英国人完全不一样。对于读书过求致用以致没有长进自我反省，决心从学问上最近层做起。^[47]

傅斯年对于史观的成熟看法，集中体现于1931年写的《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的第三节“近代数种史观之解释”，他选择最有势力的进化史观、物质史观和唯物史观等三种史观进行分析，认为达尔文学说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马氏的生存竞争思想用于生物界，得出自然淘汰的观念，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思想由此生出。这一思想盛极一时，深深影响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学术界，连人文科学、物质科学亦大受影响。进化论的优点，“在将整个时间性把握住，于史学演进给一新的观点，同时文化人类学、人种学之兴起亦有帮助”，其流弊则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学术思想自由断裂，人道主义趋于淘汰，武力主义逐渐抬头。而唯物史观将整个世界的发展视作直线进程，各个历

史阶段只是把黑格尔的横断发展变为纵断发展。这种将历史抽象化的做法，与天主教一元化的神学思想有关。同时又根据工业革命前后的史料，试图将历史的片断现象概括为普遍现象，是诚不可能。^[48]鉴于归国后傅斯年的辗转忙碌，这样的认识应该是在留学期间大体形成。

环境的改变固然对傅斯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显示出读西书与留西学的作用的确不同，可是并不足以导致其观念认识的全面改观。傅斯年留欧初期，继续秉承中国传统学术不分科而分宗派便是不科学的观念，循着后来他所批评的路径探寻西学的奥妙，到英国半年后仍然在为学习哪门科学而感到犯难困惑。因为“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而恰是中世纪色彩浓厚的牛津、剑桥能够使人创新思维。傅斯年对学科学者感到可敬，尤其心仪对于所学的科学真能脱离机械的心境而入于艺术的心境如李四光、丁西林等人，希望先将自然或社会科学的一两种知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再转而学习哲学。所以数理化、医学、心理学无不涉足，却无所适从。^[49]此后几年间傅斯年很少留下文字，表明缺乏自信，还处于不敢或不愿表达的阶段。

稍加留意便可以发现，傅斯年的学术观念在几个重要领域发生顿悟和突变，重要的时间节点为从1923年开始的三四年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写于1923年1月，当时傅斯年仍在英国留学。是年夏秋，他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据说这时德国马克贬值，不少留欧学生转到德国，以图生活方便。实则德国的生活奇贵，转到柏林，并没有使傅斯年经济上减轻压力，但学术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间点显示，留学或许引起傅斯年学术观念的渐变，却不足以导致大幅度大范围的突变，引发这一突变的重要因缘，当是与陈寅恪相识以及彼此的频繁交往。

陈寅恪是1921年9月从美国哈佛大学转到柏林大学的，当时留美虽然已经成为热潮，陈寅恪却对美国的学术大为失望，即便后来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学，学术上也乏善可陈。陈寅恪的看法绝非偏见，十余年后，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还认为哈佛大学是穷乡僻壤，不愿屈就。傅斯年留欧期间结识陈寅恪的表亲俞大维，后者在傅斯年到德国之前，已经转入柏林大学。傅斯年到德国不久，便与陈寅恪相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很快有了共同的话题，这就是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

陈以爱注意到，傅斯年在1923至1924年间看到顾颉刚发表于《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的一系列关于古史层累地造成的文章，开始思考古史问题。《读书杂志》最早于1923年5月第9期刊载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并按语及附启，傅斯年从朋友处看到刊物时，仍在英国，与毛子水、刘光一、罗家伦等人谈及，都是赞誉有加。“不过，这时傅斯年也发生一些思想上的变化，使他不再像北大时期那样接受今文家说。这一个思想转变，对他‘走出疑古’有相当的关键性。而傅斯年的思想变化，似乎与陈寅恪的交往有关。”她引据傅斯年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的记载，说明从1924年起，傅、陈经常讨论古史。所讨论的问题，应包含了聚讼纷纭的今古文问题。这使得傅斯年对于今文家说的信心逐渐低落，而这对于他接受王国维的古史论，恐怕是相当具有关键性的。^[50]

这一看法相当敏锐，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放大。联系到傅斯年古史以外其他学术观点的变化，可以断言，傅斯年的思想转变不仅是对今文家说的信心降低，而是跳出了新文化那种中西新旧是非优劣截然对立的观念，不再简单地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取舍。变化前后傅斯年本人的学术观念大相径庭，而变化的结果与陈寅恪高度接近。

关于中国历代学术的高下，1924年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称：“大野三百年一统后，大乱上一回，生出了一个文化最细密的宋朝。在许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国文化之最高点。”^[51]尽管他并没有放弃对清代学术的肯定，却将原来不以为然的宋代学术置于清代乃至历代之上。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对宋、清两朝学术排序的简单换位，潜台词应是不再以清代学术比附西学的科学性。

傅斯年出国前以科学为准则，以清代学问为最佳，而清代学问是宋明学问的反动，肯定清代学问的观念相对高明。不仅如此，他还曾斥责中国历来所谈学术，多为含神秘作用的阴阳学术，而作为宋朝学术代表的朱熹，即坚信邵雍之言，杂糅五行家言的部分，一文不值，全同梦呓。^[52]留欧后期，傅斯年开始推崇宋代学问，甚至将宋代置于清代之上。而变化的原因，很难说来自读书和修课，最大的可能，是与陈寅恪每周数次的交谈。早在留美期间，陈寅恪就对宋代学问推崇备至，认为宋儒以取珠还椟法采佛理之精粹，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

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53\]](#)。

陈寅恪的这番见识，即使在当时留欧中国学人中也是凤毛麟角，傅斯年标举中国历代学术由清而宋的转变，所接触者中唯与陈寅恪的主张最相契合。鉴于此前傅斯年的学术观念与一般趋新者大同小异，而此后却有天壤之别，最有可能对其产生影响并足以全盘颠覆其成见者，陈寅恪为不二人选。尽管傅斯年在北大学习期间所读旧籍已经优于胡适，与陈寅恪的交游还是使其豁然开朗，学问功力突飞猛进，见识大为提升。只是傅斯年的顿悟尚不能彻底，后来他将两宋与明清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实学兴盛的时期，依稀可见原来高估清学的影子。

关于文言文，傅斯年本来善于做文言文，胡适觉得意思晦涩，改写白话文，就明白许多了。[\[54\]](#)即使留学欧洲之后，直到1923年1月，傅斯年为刘复的《四声实验录》作序，仍然相信“汉语不改用拼音文字，太阳底下的进步语文中，没有汉语的位置”[\[55\]](#)。恰在此时，傅斯年学习了比较语言学，并与陈寅恪结交，后者与众不同的见识显然使之耳目一新，原来笃信不疑的西化知识体系整体崩塌，进而以本来的系统调适整合重构。傅斯年回国之初写《战国子家叙论》，认为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56\]](#)前后数年，看法截然相反。不仅如此，后来撰写学术著作，还继续使用文言文。改文言用白话的重要理据之一，就是文言不宜说理，虽然傅斯年全用文言，也觉得有些不适，却依然没有改用白话。所以陈寅恪因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出题对对子引发风波，还致函傅斯年，引为同调。

限于材料，陈、傅二人是否互为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详情不易坐实。就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谈中外学术文化等内容看，陈的学术观念一以贯之，而傅斯年变化后的观念与之吻合。由此可以推断，其时陈影响傅的可能性较大，傅影响陈或英雄所见略同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三 敬而不畏之畏

傅斯年回国之初，清华便有请其任教之议，傅考虑后表示：“到清华本无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梁非我所畏，陈我所敬，亦非所畏。”^[57]此言显示当时傅斯年对王国维的敬畏，大体不错，不过，从后来傅斯年的言行看，他对“非所畏”的陈寅恪似乎怀有某种难以言表的敬畏甚至畏惧。

傅斯年的为人行事，颇有山东好汉之风，霸气十足，在学界政坛都有大炮的声名，与地位相当的同辈相处更加不会谦让。他留欧期间即曾与毛子水大闹，归国后，与多年的同窗挚友顾颉刚心结之下，一言不合，竟至破脸。他创建并长期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定不准兼职，唯独对陈寅恪、陈垣特殊待遇。尤其是对陈寅恪优待有加，不仅听凭其长期主要任教于清华大学的文史两系，而且对其提出的一些超出一般标准的要求也勉为其难地设法满足。陈寅恪自认为文化使命之身，无论当局如何优待，都认为理所应当，不会感恩戴德；而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也觉得合情合理，决不作非分之想。反之，若不得礼遇，则视为不恭。至于具体处置，一般又大体在维持气节与不失身份之间拿捏得当。

抗战期间，傅斯年与陈寅恪的关系终于因为后者先后滞留香港、桂林出现裂痕。陈寅恪夫妇体弱多病，不能适应昆明的高原环境以及恶劣的生活状况，而在战时条件下，很难寻得一片偏安之地。他赴英教书不成，暂时滞留香港，不愿返回昆明，以致香港沦陷后陷入困境，在朱家骅等人的援助下^[58]，历尽千辛万苦脱离日本占领当局的控制，到桂林后又欲在广西大学任教。而中研院方面院所未能协调沟通，所发出的专任研究员聘书，与规则及惯例不合。为此，傅斯年不得不与院方交涉，并向陈寅恪说明，言辞之间，不免有所误会，令陈寅恪相当不快。

此事的原委经过及其周折大致为：1942年6月9日，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致函傅斯年，告以：“寅恪兄已于五月廿六日从麻章往桂林，史语所是否拟请彼为专任研究员？月薪拟何数？请示及。薪似可从一月份支起，但从六月起实付寅恪，以首五月薪抵销旅费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往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许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亦请示及。”

傅斯年当即复一长信，大意云，陈寅恪来所专任其职，原为本所同人所渴望。但陈寅恪家庭情形或者不肯来李庄，自己亦不能勉强。

“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原信或用纪律二字，意思总是明显的）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故寅恪不能住在桂林而领本所专任研究员薪，必来李庄而后可以（此事服务规程有规定）。若彼来李庄，其薪自应为六百元，又临时加薪四十元。至于为弥补所领旅费，作为几个月专任薪报销，自无不可。”并说明陈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的缘故。

6月30日，傅斯年接到叶企孙的复函，内称：“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倘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傅斯年表示：“弟未打电给寅恪，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云云。彼又云（两信皆云然）正在著作，九月可完。绝未谈及到李庄事。”

此后，以陈未表示要来李庄，傅也未再致函叶。7月底，傅斯年获悉“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暂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后，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感到甚为诧异，以尚未得陈决来李庄之信，又未与叶通信，变更前议，何以忽然有此。“然以其云‘寄贵所转寄桂林’，弟亦放心，盖弟可将其暂时压下，再询兄其故也。”

8月5日，傅斯年又接到中研院总务处主任王毅侯7月31日来信，得知：“发寅恪兄聘书已办好，企孙兄函嘱迳寄桂林，免得转递之烦。并云一月至五月份薪由院保留，作抵销旅费之一部，弟本日寄寅恪一函，征其同意（函稿另纸抄奉）。”并云：“自六月份起全部寄交先生应用。”傅斯年对于叶企孙“仍照六月九日信办理，未参考弟意，亦未照兄六月卅日信所示办理。盖照最后一信，须待弟与寅恪商好奉闻，再发聘也”的处置，深觉不解，不能不紧急声明：

一、弟绝不能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六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之Tradition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

傅斯年还附列院章的相关条文，说明“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此事之所以令傅斯年大为不满，是因为牵涉两方面关系，使之左右为难：其一，对陈寅恪本人。“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从后续发展看，陈寅恪虽然明白，毕竟心生芥蒂。其二，对所内同仁。此前因为梁思永病费超支，令医务所破产，傅斯年“已受同人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人事会议及预算）办理，亦一长手续也”^[59]。

因事出急迫，在接到陈寅恪8月1日的来函后，傅斯年8日即以电报作复：“总处寄上之聘书以兄能来所为前提。”^[60]8月14日，傅斯年又复一长函，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是函所述，陈寅恪自香港脱险后，曾写信给傅斯年，“嘱函托立武在广西大学设讲座一事，弟当即将原函寄杭，并请其务必设法（中英庚款濒于破产），杭无回信。然兄八月一日信已言其既办矣”。后来又有武汉大学的张颐（真如）、王星拱（抚五）、吴其昌等人连来三信，请陈寅恪到该校设座讲学。“此盖慕名之举，而如吴其昌信，须弟一面劝驾，一面化缘，则太可笑也。”所以傅斯年回信时，“为一切了然计，直告张以资实，免得再来信不休”。

关于请求中英庚款在广西大学设立讲座教授之事，傅斯年虽然遵嘱代为说项，心中并不以陈寅恪的行止计划为然，他在信中直言相劝

道：

兄之留桂，早在弟意中，弟等及一组同人渴愿兄之来此。然弟知兄之情况，故此等事只有凭兄自定之耳。其实当年兄之在港大教书，及今兹之举，弟皆觉非最妥之办法。然知兄所以如此办之故，朋友不便多作主张，故虽于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于兄既定办法之后，有所见命，当效力耳。犹忆去年春，弟入中央医院之前一日，曾为兄言，暑假后不可再住香港，公私无益，且彼时多方面凑钱，未尝不可入内地也。但兄既决定仍留港后，弟养病歌乐山，每遇骝先、立武见访，皆托之设法也。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处，恐嫂夫人在彼比较方便，但从远想去，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迟）来川为宜。此战事必尚有若干年，此间成为战地，紧张之机会固远在桂之下，至少此为吾辈爱国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目下由桂迁眷到川，其用费即等于去年由港经广[州]湾到川，或尚不止，再过些时，更贵矣。目下钱不值钱，而有钱人对钱之观念，随之以变；然我辈之收入，以及我们的机关之收入，尚未倍之，至多未三之也。故今冬或明春入川，其路费筹措，或超过去年由港入川。然尚未必做不到，过此则不可能矣。即如昆明友人，此时欲留不可（太贵，比重庆倍之），欲行不得。研究所之搬，弟当时之意即不愿以“拖”而更陷于困境，宁可一时忍痛。此等情形，本在兄洞鉴之中。然弟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故愿事先以鄙见奉闻也。

指陈寅恪以“拖”字一误再误，甚至提出爱国的分际，在傅斯年不但明言责怪之意，而且可以说是放出重话。心细如发的陈寅恪当然明白这些言词所蕴含的意思及分量。

不仅如此，傅斯年还清楚地告知：“中英庚款会之讲座，本与一般大学教授同，尚不及最优者。弟闻消息，本年有裁去之议，而未果行。但该会明年或须关门（该会之欠债人即政府各部门，以交通部为最多，一齐赖债，该会遂向政府求乞，以维持其固有之事业，明年恐并此亦不易矣）。中基会者较优（目下月七百元），济之是一例也。但恐亦不能在广西大学设讲座（亦是向政府乞零钱）。故如此看来，

兄只可以广西为甚短期之休息处，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困难矣。”言下之意，桂林不可能久居，当然入川之事也不能久拖。

至于中研院允发专任研究员薪一事，傅斯年概述了与叶企孙等人往来函商的情形以及领专任研究员薪水必须以在李庄为前提等规则，并对发生误会的可能环节有所揣测，据他说：

企孙由昆明回信（彼往昆明，云九月归），云极赞成弟意，嘱弟电商兄来李庄否？弟以前已有两信寄兄，言李庄各情形（此信迄未于复信中谈及，但仲揆谓已转兄，究收到否，为念）未再去电，而兄命托杭在广西大学设讲座之一信到，弟知兄决留桂矣，故未即复企孙。同时接王毅侯兄信，则聘书已直寄兄，谓薪自一月起，六月以后寄桂林等语，并云皆是企孙之命。此则弟不解矣，盖与企孙复弟之信绝不同，此举可使人误以为兄可以专任研究员薪留桂，此又非企孙函弟之说也。此事错误在何处，俟企孙兄信到，或可知之。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不可不说也。兄之原薪（月一百外，有无暂加薪四十，已向企孙请示矣。企孙原件谓以专任为限），已函毅侯照旧寄兄于桂林。[\[61\]](#)

傅斯年详述事情的经过原委，除了追究发生误会的关节之外，大概也有担心陈寅恪误解以致心生不快之意，所以点明若是生人，可能怀疑自己从中作梗。同日，傅斯年又复函张颐，并抄寄陈寅恪，函谓：

寅恪先生事，弟之地位非可使弟“奉让”者，然历年来此等事，皆由寅恪自己决定。因寅恪身体、精神，不算健康，故彼之行止，朋友未可多作主张。寅恪历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

夫人不便入内地，而寅恪伦常甚笃，故去年几遭危险。今寅恪又安家桂林矣。既接受广西大学之聘，恐迁眷入川非明年不可也。寅恪来书，节略抄奉一阅。弟于寅恪之留广西，心中亦不赞成，然寅恪既决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转托杭立武兄矣。至于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体如何），弟等固极愿其在李庄，然如贵校确有何等物质上之方便，于寅恪之身体有益者，亦当由寅恪兄自决之。只是两处天气、物质，恐无甚分别，而入川之途，乐山更远耳。且为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先生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决不肯“主持”也。[\[62\]](#)

陈寅恪看过傅斯年的来函，对其中牵扯自己内人的言词颇不以为然，尤其是还将此意传达给了武汉大学方面，这不仅等于把滞港留桂等不当之举的主要责任推给了唐筼，而且还将推测之词向外扩散。其复函一面表示同意照章办事，绝不违规，“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遥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者也”。另一方面，则将拖延内渡及入川的罪名独自揽下，他说：

但有一端不得不声明者，内人前在港，极愿内渡；现在桂林，极欲入川。而弟却与之相反，取拖延主义，时时因此争辩。其理由甚简单，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现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而弟月费仍在两千以上，并躬任薪水之劳，亲屑琐之务，扫地焚香，尤工作之至轻者，诚不可奢泰。若复到物价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故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前之愿留香港，今之且住桂林，即是此意。若天意不许毕吾工作，则亦只有任其自然。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

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63]

陈寅恪的这番话，语带机锋，已然有些负气，让人既不能受，又不便驳。他此前曾经到过昆明，此番坚持不肯再往，原因之一，是昆明地高，心跳加剧。^[64]脱离环境因素，这一理由的确可以成立，尤其是对身体不宜之人而言，勉强可能是要命的事。可是考虑到战时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艰难困苦，以及内迁之地已由云南改到四川，傅斯年的要求也不算是过分。虽然傅斯年自称“弟于熟人每失之严格相乘；而于不相识者，有时放宽”^[65]。但是对于陈寅恪，似很难完全照此标准来要求规范。傅斯年自己也承认：“寅恪之脾气，一切事须彼自定，彼目下之要住桂林，一如当年之要住香港，其夫人故也，亦只有随其所欲耳。其实彼在任何处，工作一样，只是广西大学无书耳。本所第一组事，彼仍可通信指导，一如当年在港时也。”^[66]这在史语所，已是相当例外。而在陈寅恪一方，自觉并未违规，因而不能算是过分。

后来傅斯年知道叶企孙赶发聘书，是因为误会各校发聘书的习惯，担心后于清华，所以抢先。其实，各校发聘书的程序与中研院大不同。“在商量好之后，一发出，仍待其应聘书之来……然此次清华发聘，系继续旧办法；本院发聘，是更改旧办法，而毅侯兄遵命所示致寅恪之函，云及六月份起之专任薪直寄寅恪，此诚如尊言，未曾明允其住桂林，然亦未提明其须来李庄，故弟觉与弟前致彼之信不合也。此事若兄当时有一短信致弟，或一短电，弟可省甚多信（尤其是后来与寅恪之一长信及电，反复解释此聘书以来李庄为前提者）。若当时兄嘱毅侯兄去信时，末了写上一笔‘盼大驾早来李庄，为荷’，弟亦不至著急矣。此事寅恪尚未复弟，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解决，然弟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也。”

傅斯年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只是所得罪的不是寅恪太太，而是寅恪本人。尽管傅斯年自称从来在所内办事对熟人要求更严，可是要么陈寅恪不在熟人之列，要么傅斯年并不能完全做到一视同仁，他自己承认：“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以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

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耳。弟知他一切情形极详，看法如此……后来之问题，是他明年来川（恐广西大学非久居之地），川资如何出，此大是难事也。”^[67]这样一切由本人自决的情形，显然不是全所人员普遍享有的待遇，甚至可能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例。

经此一事，两人难免有些心结，从现有资料看，此后双方的来往明显较此前稀疏。^[68]不过，就事论事，尽管陈寅恪自认为并非无理强求，在傅斯年看来早已是法外开恩，而且陈当时的身份工作大都与史语所无关，由史语所负担负责，不合情理，难以服众。由于陈寅恪自入所以来就已经习惯了一切自行其是（当然基本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从来默许的傅斯年稍致不满，便引起陈寅恪的强烈反应。君子本来不易近处，陈寅恪就聘清华国学院之时，就让吴宓觉得“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69]性情刚正的傅斯年对陈寅恪情理之中的格外优待，仅仅用爱才惜才作为理据，恐怕难以自圆其说。即使陈寅恪天纵奇才，双方又是通家之好，也无法合理解释这样的微妙关系。

鉴于从史语所成立之日起傅斯年就对陈寅恪几乎是有求必应，与傅自称对熟人要求更严的说法相去甚远，至少是网开一面，则隐情当产生于两人开始交集的留学期间。除了承认陈寅恪是首屈一指的读书种子外，或许还碍于某种不能宣诸于口的事实，使得傅斯年有些难言之隐。

四 心照不宣的礼让

最有可能令“大炮”傅斯年对“敬而不畏”的陈寅恪一再隐忍之事，当是留欧期间其学术理念发生顿悟，陈寅恪起到至关重要的点睛作用。这一关键转折，使得傅斯年回国不久就能够在古史研究领域别树一帜，超越古史辨，展现新一代领军人物的雄心和理念。可是阴差阳错，傅斯年回国之初发表的相关文字，有意无意地对牵涉陈寅恪的个中情节有些含糊其辞。

要想打通此事的关节，关键还要进一步解读归国途中傅斯年所写致顾颉刚的论学长函。此函虽经不少高手反复解读，仍有难以贯通所有相关材料以及前后史事之处。据顾颉刚刊出此函时所加的按语，傅斯年的论古史书从1924年1月写起，写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还没有完。“他归国后，我屡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写给我；无奈他不忙便懒，不懒便忙，到今一年余还不曾给我一个字。现在周刊需稿，即以此书付印。未完之稿，只得过后再催了。”^[70]

傅斯年致顾颉刚的长函，始终没有续完，又未经傅同意而由顾公开发表，个中原因，杜正胜解释为傅斯年变了，不再疑古，而要重建，所以将长函视同敝履，弃之不用。^[71]而顾颉刚自己解释擅自发表的理由道：“但他自以为多年不读中国书，所发的议论不敢自信，不愿发表。我的意见，则以为我们既向时代的光明走去，处处在荆棘中开路，只求大体不错，不必有如何精密的结论。我们正该把自己想得到的意思随时发表，以博当代学者的批评，好互相补益匡救。故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既出版，即以付刊。傅先生见之，终不以为可。”^[72]此说涉及傅函的本意以及傅斯年对刊出之事的态度，参合各方面材料，似与实情存在滞碍之处，还有进一步解读的空间。

傅斯年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讨论古史的部分究竟何意，杜正胜、王汎森、陈以爱等人的看法大同之下，不无小异。所谓大同，即对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的基本观念和取径的赞同，所谓小异，即杜正胜认为傅斯年由疑古到重建发生于长函写就之后，或者说在其由欧洲归国途中重抄旧信之时。王汎森则认为长函本身即显示傅斯年已经由疑转信的征兆。而陈以爱虽然同意傅斯年与陈寅恪讨论古史后不再如前接受今文家说，对其“走出疑古”具有相当的关键性，仍然认为长函显示傅斯年当时对顾颉刚的层累说极为推崇，其思想的变化，包括对王国维的进一步认识，发生在留学的最后阶段以及由欧洲返国的航程中。其中关键性的事件是临行前接到顾颉刚寄来的《古史辨》第一册。

这三种说法的大同小异，关系到如何理解傅斯年与顾颉刚讨论古史长函的本意，以及傅斯年对于顾颉刚层累说的态度及其变化两个不同层面的事实。必须严格加以区分，不使混淆，才能恰当解读文本的意思和了解史事的本相。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傅斯年与陈寅恪的交往以及后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与陈寅恪讨论古史前后，傅

斯年的观念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程度如何，这些都与傅斯年不愿让顾颉刚刊发长函有着密切关联。

傅斯年在英国期间看到顾颉刚在《努力·读书杂志》连续发表的相关论著，的确表示过赞叹和欣赏，甚至想发愤写一大篇参与论战，可是始终不曾下笔。真正动手写下相关文字，是到了柏林之后几个月，即1924年1月开始。而且首先写的是评丁文江的文章，讨论古史的部分动笔更晚，据杜正胜的判断，当在1925年。而这时傅斯年的古史观念已经发生变化。重要的原因应是与陈寅恪讨论顾颉刚的古史论述。傅斯年给顾颉刚的论古史长函并没有提及陈寅恪的影响，而是后来才明确表示，写给顾颉刚的长函的意思，并非全是自己的见解，而是与陈寅恪一礼拜讨论几回的结果。

因此，要从长函解读傅斯年的本意，应当首先弄清楚三个问题：其一，陈寅恪对于古史层累说的态度看法；其二，陈寅恪在古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程度；其三，陈寅恪是否能够并且实际影响了傅斯年的古史观。

陈寅恪留学期间，曾对吴宓表示，不愿对国内学人的著述发表评论，以免牵扯分神。而对古史辨，却是为数不多公开表达的意见之一。本来陈寅恪认为：“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73]“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74]为了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及民国时竞言古史的风气立异，他故意针对清儒的陈说，公开声言：“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75]

古史辨所论，恰在陈寅恪认为文献不足征的范围，而层累说的取径办法，当也在陈寅恪的指摘之列。关于古史辨，据说陈寅恪曾在弟子面前有过正面评议，而正式意见，有明文可据的是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报告，他借表彰冯著之机，针对疑古辨伪说引申谈论材料与学术的关系，认为古书真伪不过相对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够审定伪材料的时代及作者而加以利用。中国古代史的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都不是一时代一作者的产物。过去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固然错误，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的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丛书，或一宗传灯语录，一味纠结于横切方面，也

是缺乏史学通识的表现。^[76]据此，古史辨的态度做法，恐怕难逃其缺乏史学通识，只能横切，不知纵贯的批评。

审查报告写于1930年代初，可是陈寅恪关于古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观念，却早在留学之际已经形成。他对古史辨最为不满的，除了方法之外，主要还在于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认为形同挖祖坟。陈寅恪深知各民族的上古历史其实都有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情形，本不足怪，但是他推崇宋儒对待中外文化取珠还椟的做法，以免数典忘祖。王东杰解读1929年陈寅恪诗赠北大史学系毕业生诗中“田巴、鲁仲两无成”句，在余英时旧解的基础上，确认“鲁仲”指胡适“整理国故”一派，而“田巴”当指顾颉刚的古史辨。据余英时征引的《史记正义》引《鲁连子》：“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霸，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所举“田巴”的特征，一是激烈的否定传统（“毁五帝，罪三王”），一是具有鼓动性（“一日服千人”），在当时的史学界中，惟古史辨学派足以当之。^[77]此说恰当，凸显了陈寅恪文化观念与古史辨迥异的主要之点。

还在中学时代，顾颉刚就指孔子之言为专制帝王之脚本，用以锢民奴心，以固帝制。孟子所谓王道、治民，与孔子相同。“夫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王道？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理治？视君王天子则若高出乎人类之中者，而其余同胞则悉处于被动之地位。若此学说有可尊之价值乎？且如为孔立庙，春秋祭祀，直是奴隶其心志，其害甚于迷信宗教矣。”^[78]这番“蔑侮圣教”的小子狂言，可见其后来疑古，确有反对孔孟之道为专制服务的渊源用心。而陈寅恪则认为中国文化的精义恰在《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文物制度均附着于帝王之制。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观念如何分歧，治学的态度办法是否得当，在学人尤为关键。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就政治文化观念而言无疑很难被当时的学界新进认可，但所论殷周制度的事实，却可以服众。顾颉刚也未必一味批孔，他试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认为孔子学说不完全是继续旧文化，多少含有新时代的理想，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傅斯年对问题本身不以为然，指出：“我们看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为它求一理性的因，因为许多事实的产生，但有一个‘历史的积因’，不必有一个理性的因。”^[79]这与陈寅恪对待史料的态度办法及史观一脉相通。

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陈寅恪，的确几乎没有留下有关古史的论述。一般认为，陈寅恪对于古史未必熟悉，至少从未发表直接的学术文字。目前所见相关史事，略有数例：其一，俞大维曾专门撰文指出陈寅恪对于先秦典籍史事的了解程度。其二，吴宓日记所录陈寅恪的谈论，可见其对于先秦典籍史事确有系统认识。其三，1932年俞平伯将所撰《〈尚书·金縢〉中的几个问题》送陈寅恪阅看，陈有详细意见。其四，蒋天枢校《周礼》，陈寅恪告以“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纂时所保存之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书比证。二，编纂者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80]。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和留英期间，不乏经常论学的师友，如在北大，与顾颉刚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徐彦之是近邻，每天闲谈，参与者常有潘介泉、罗家伦。在英期间，则有吴稚晖、丁西林、李四光、刘复等。到柏林后，可谈的人更多，如罗家伦、毛子水、俞大维、姚从吾等。虽然傅斯年对俞大维相当推崇，许为最能读书的两人之一，可是上述诸人的学术喜好及水准，恐怕难以对傅斯年学术观念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能够发生关键影响的，首推陈寅恪。所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姚从吾等研究史学的交谈，都是推崇顾颉刚在史学上称王，其他人无论如何，只能称臣。而在与陈寅恪结交之后，则朝着与陈趋同的方向转变，与此前的观念大相径庭。

按照傅斯年归国途中致顾颉刚的长函所说，他在柏林期间因为懒，很少与人交谈，每每以通信代替行步。此说未必全部属实，至少对于陈寅恪是例外。陈寅恪回国后虽然不好应酬，留学期间，却喜欢与人交谈，话题不仅学术，也包括时政社会。如在哈佛时与吴宓就有长时间谈论，语涉广泛。到欧洲后又与包括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一千人等在内的留学生时常交谈。据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回忆，1924年他们在柏林期间，傅斯年、陈寅恪常常午饭见面，有时还有茶会。最难见到的是俞大维，陈寅恪与傅斯年来得最多。^[81]另据1924年3月12日姚从吾从柏林致朱希祖函，亦可知与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等饭余常相聚谈。^[82]

傅斯年说看到顾颉刚在《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9期以后发表的关于古史层累造成说的文章，很想写文章参与讨论，因为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至今已把当时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记得者寄我颉刚。”并且特别叮嘱

后者：“只是请你认此断红上相思之字，幸勿举此遐想以告人耳。”
[\[83\]](#)

即使从现在的观念看，傅斯年此函论及古史的内容也是相当有见地，并无拿不出手见不得人的地方。虽然表示过曾经准备称臣，毕竟笔锋一转，显示了崭新的境界。唯一让人觉得有些不够坦然的，就是没有提及自己观念的转变何以发生，关键的人事是什么。如此说并非指责傅斯年刻意隐瞒事实，先此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就具体提到陈寅恪的作用：“《春秋》与孔子。今存外证以孟子一句，内证只孔父嘉之称字（陈寅恪指出）。”[\[84\]](#)那么，致顾颉刚的长函反而只字不提陈寅恪，不仅关于古史的部分没有，关于丁文江的文章评论部分也没有，而这两方面的转变都相当关键。对此略显异常之事，值得进一步仔细检讨。

如果傅斯年的长函继续往下写，他应该会提及陈寅恪；或是顾颉刚没有刊出长函，对这封天知地知不传六耳的私信，傅斯年也不一定非要刻意表明相关情节。不巧的是，傅斯年尚未写到陈寅恪，而顾颉刚又未经同意就擅自发表，这在不明就里的顾颉刚自然觉得理所当然，但在傅斯年就不免有些尴尬。在顾颉刚刊出长函之后不久，傅斯年几次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其古史观念转变中陈寅恪的作用。起初多少还有些含糊其辞，1930年1月傅斯年发表《论所谓五等爵》，声言：“此文主旨，大体想就于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时。”[\[85\]](#)并未提及具体人事。稍后更加明确地交代道：

记得民国十三年间，我正在柏林住着，见到顾颉刚先生在《努力》上的疑夏禹诸文，发生许多胡思乱想。曾和陈寅恪先生每一礼拜谈论几回，后来也曾略写下些来，回国途中只抄了一半给颉刚。经过两年，颉刚不得我同意，把他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四期（1928年1月31日）印出。
[\[86\]](#)

傅斯年致顾颉刚长函的内容，虽然包含在英国时的想法，却是到柏林思想发生变化后才开始动笔，其中既掺杂了原来的旧认识，也包

含变化后的新见解。而且旧认识整体上处于新见解的统领之下。大体可以说，从1924年转到柏林至1926年回国这一段期间，傅斯年对顾颉刚层累说的推崇赞赏，主要是反映他在英国时的认识，而到德国与陈寅恪详谈之后，已经全然改观。长函中傅斯年未提及陈寅恪的名讳作用，却将已经改变的观念大体托出，使得后人的解读判断出现混淆。依照现有的解释，不仅傅斯年到柏林与陈寅恪多次讨论之于其古史观转变的作用将大打折扣，就连傅斯年1926年的古史认识程度也会被大幅度低估。

长函中傅斯年未提陈寅恪之名，可能的解释是不无在顾颉刚面前逞强之嫌，这与前不久胡适对两人学术进展的褒贬不无关系。1926年，傅斯年专程赶到巴黎与访欧的胡适见面，言谈之间对胡适的著作有所批评，尽管胡适后来实际上采纳了傅斯年的意见，当时却对于逆耳忠言显然感到不快，认为傅斯年数年放任，一事无成，与顾颉刚相比，高下立判。胡适在当时的日记中更有过激之词，后来自觉太过，予以涂抹。而此番会面不免刺激傅斯年的争胜之心，致函顾颉刚时，心存超越驾上之意，所谓对古史辨称臣等等，不过铺垫而已，意在反衬后面转折的更胜一筹。既然要争胜，借力未免胜之不武。或许正是这一点斗勇之气使之稍带私心，凸显了自己的见识，而不及他人的影响。

傅斯年的转折和陈寅恪的作用，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都是至关重要之事。正因为有此变化，王国维问世已久的著述才会令傅斯年耳目一新。顾颉刚刊出长函，他自己、一般读者乃至后来的学人，都不由得佩服傅斯年的高明。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位当事人心知肚明此事的来龙去脉，这也是傅斯年不得不屡次补充提及的潜因。仔细推敲，傅斯年对此一段因缘并非刻意隐瞒，只是尚未写到；顾颉刚不知其中玄机，擅自做主予以发表，也无可指摘；陈寅恪不谈三代两汉以上的文籍史事，不愿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了解同情地猜来猜去之外，不无退避三舍的示好之意。如此一来，傅斯年坐稳了继古史辨之后考史的霸主位置，却留下未能尽释的隐情，使其与陈寅恪的关系多少有些微妙。

如此解读若能成立，指傅斯年在归国途中的航船上古史观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显得情节有些离奇，太过戏剧化，其围绕此事的种种表现反应也不尽合乎情理。留学期间，傅斯年几乎没有学习中国文史之学，甚至离欧洲的语学史学也较远，如果没有陈寅恪的点醒，

天分再高，用功再深，也很难自我实现顿悟。当然，能够承接陈寅恪的一语道破，绝非等闲之辈，在傅斯年也是心有灵犀，水到渠成。况且，致顾颉刚函本是私信，充其量不过是意气逞强而已。只是一旦公之于世，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陈寅恪的心证与傅斯年的气短，都在可能的范围。此说或不免诛心之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却不失为可以贯通所有材料史事的合理解释。

杨树达自称“平生独畏陈夫子”。傅斯年所谓对陈寅恪“敬而不畏”，主要是在古史研究方面，虽然陈寅恪熟悉典籍，毕竟没有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根底，仅仅依据文献，研治古史的确不足确证。傅斯年后来对岑仲勉说：

古史一道，弟观感稍与先生不同。弟亦颇好此一道，久则念[愈]觉其遍地荆棘，故篋中旧稿，不下二十万言，不敢写定也。今日治此一事，弟以为应兼顾下列两事：一、乾嘉经学之最高成绩（声韵、训诂之学），益以金文、甲骨，为之材料。二、近代考古学之发明。故弟曾说一笑话，谓有一线之望，亦不敢必也。弟曾在所中说笑话，谓将上古史给第三组。寅恪先生言“书不读秦汉而上”，此或有激而作，然有至理存焉……然则第一组姑不治此一事，而以考古之学归之第三组，文字之学归之经学家，可乎？[\[87\]](#)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三组即考古组，以上古史的文献不足征，而将重建古史的任务留给用现代科学方法从事的考古学，是那时趋新学者相当普遍的共识。只是后来的发展显示，中国古史留存的文献相当多且杂，重建工作如果完全交由考古学，在无文字时代大致可行或不得不然，在有文字时代则有两难，一是夏为文字从无到有的过渡，二是周代语文各国迥异。一味指望地下出土能够补足、佐证或确证地上文献记载的系统材料，如甲骨文的发现，可遇而不可求；即便是大量出现的简牍，也无法根本改变文本记载各异的情形。多数的情况是，有此说而未必仅如此说或如此说才正确。傅斯年于此早就了然于胸，他在长函中针对李宗侗“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的说法论道：

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见，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88\]](#)

比较前后两说，差异显然，傅斯年或是前面对顾言不由衷，或是后来对岑别有用意，或是前后有所反复。周秦以下的历史文籍，的确不能仅凭掘地就能够整理清楚，但总锁钥、真线索等等，也并非顾颉刚的古史论所能承当。如果说这时的傅斯年关于古史新证在事实上尚属模糊，在理念上则已经成竹在胸，自信可以超越古史辨。而突破瓶颈、豁然贯通的关键，恰在陈寅恪的点化。

进言之，陈寅恪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以上书，即使不为藏拙，至少也是避嫌，暗示自己绝口不谈古史之意。得益于陈寅恪的点拨以致古史观乾坤颠倒的傅斯年，对于陈的古史造诣应当心知肚明。当然，熟悉典籍，虽然可以攻破层累说的观念方法，却很难在重建方面贡献良多。所以尽管陈寅恪熟悉先秦典籍，后来却很少论及古史，以致令人以为其是否真的不懂古史，只做中古一段。这让傅斯年在王国维之后俨然成为古史研究的祭酒。1935年6月，胡适听傅斯年谈其古史心得，不禁赞道：“他是绝顶聪明人，记诵古书很熟，故能触类旁通，能从纷乱中理出头绪来。在今日治古史者，他当然无有伦比。”[\[89\]](#)

傅斯年与陈寅恪的学术理念相近，文化观念则有所分别。一般而言，两人的具体学术见解少有分歧，大体以符合陈寅恪所见为是。可是一旦涉及文化观念，则难免出现不和谐。傅斯年对古史层累说只是学术上的不满，在文化观念上，作为五四新潮青年，与陈寅恪反对挖祖坟的立场相当疏离，而对顾颉刚希望发起思想上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不无同情。也就是说，傅斯年可以接受陈寅恪关于层累说方法的质疑，因为毕竟与材料史事的实情不合，但是对于陈寅恪的文化守成观

念恐怕难以认同。抗战期间，围绕性命古训在秦汉至唐宋之际的渊源流变，两人意见截然相对，虽然没有正面交锋，暗中却互有过招，未必不生心结。^[90]加上陈寅恪滞港留桂的一段纠葛，对于后来陈寅恪犹疑是否赴台且最终决定留在大陆，影响心理天平的倾斜，恐怕起到不小的作用。

^[1] 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327—328页。

^[2] 该文后改题《从疑古到重建的转折——以王国维对傅斯年的影响为中心》，收入吴淑凤、薛月顺、张世瑛编《近代国家的形塑》下册，台北：“国史馆”2013年，第833—878页。

^[3]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4] 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

^[5] 以上均见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18—419页。

^[6] 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期，1928年1月3日。

^[7] 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引自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第52—54页。

^[8] 傅斯年：《致吴景超》，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67页。

^[9] 以上均见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2—25页。

^[10] 傅斯年：《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37—39页。

^[11] 孟真：《马叙伦之庄子札记》，《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出版界评”。

^[12] 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

^[13]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第1264—1265页。

^[14]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59页。

^[15]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251—253页。

^[16] 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3—13页。

^[17] 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14页。

^[18]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

^[19] 钱玄同：《汉字改造论·其一》，《教育杂志》第14卷第3号，1922年。该文原为钱玄同为高元《国音学》所作的序，《教育杂志》编辑将其与黎锦熙、胡适的序放在一起刊登，改成现名。《汉字革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汉字改革号”，1923年。

^[20]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25、30页。

[21] 以上均见陈寅恪：《致傅斯年》二十一，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事后陈寅恪关于此事发表谈话时还表示，拟在中国文学会讲演出题用意及学理，亦未见。

[22]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6页。

[23] 陈寅恪：《致傅斯年》二十一，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

[24] 孟真：《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故书新评”。

[25] 傅斯年：《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故书新评”。

[26]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故书新评”。

[27]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9页。

[28]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146—147页。

[29] 傅斯年：《致王献唐》，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100页。

[30]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152页。

[3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4页。

[32]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7—28页。

[33]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34] 孟真：《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出版界评”。

[35] 《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故书新评”。

[36] 孟真：《蒋维乔之论理学讲义》，《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出版界评”。

[37] 以上均见《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通信”。

[3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故书新评”。

[39]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

[40]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41] 傅斯年：《欧游途中随感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381页。

[42] 傅斯年：《留英纪行》，《晨报》1920年8月6日，第7版，“通讯”。

[43] 《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6页。

[44] 《傅斯年君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715号，1920年10月13日。

[45] 《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5页。

[46] 《傅斯年君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715号，1920年10月13日。

[47] 傅斯年：《留英纪行》，《晨报》1920年8月6、7日，均第7版，“通讯”。

[48]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156—158页。

[49] 《傅斯年君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715号，1920年10月13日。

[50] 陈以爱：《从疑古到重建的转折——以王国维对傅斯年的影响为中心》，吴淑凤、薛月顺、张世瑛编：《近代国家的形塑》下册，第833—878页。

[51] 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期，1928年1月3日。据顾颉刚的按语，该文写于1924年1至2月。

[52]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6—27页。

[53]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2—103页。

[54] 《胡适之先生谈片》，《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2月11日，引自吴元康整理：《胡适史料补阙》，第7页。

[55] 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20页。

[56]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252—253页。

[57] 《傅斯年致罗家伦函》，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第363页。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2—73页。

[58] 《傅斯年致朱家骅》（1942年7月3日）有云“此等事（蔡夫人事、寅恪事），在今日只有吾兄热心耳。弟心有余而力不足，尤佩兄之热诚毅力也”。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977页。

[59] 以上均见《傅斯年致叶企孙》（抄件）（1942年8月6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979—982页。

[60] 《傅斯年致陈寅恪》（电）（1942年8月8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985页。

[61] 以上均见《傅斯年致陈寅恪》（抄件）（1942年8月14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989—990页。

[62] 《傅斯年致张颐》（抄件）（1942年8月14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990—991页。

[63] 陈寅恪：《致傅斯年》五十五，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92—93页。

[64] 陈寅恪：《致傅斯年》三十九，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64页。

[65] 《傅斯年致杭立武》（抄件）（1940年6月3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第819页。

[66] 《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2年8月19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991—992页。

[67] 以上均见《傅斯年致叶企孙》（抄件）（1942年8月31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996—997页。

[68] 王汎森在《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中结合当时所见信札情况已经指出：“傅、陈二人在抗战中后期一度关系相当紧张”，“二人的通信在1946年春已经停顿了”。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530页。据《陈寅恪集·书信集》，陈寄给傅的最后一封信在1946年春。而据《傅斯年遗札》，傅1947年5月还就陈的薪金问题与其通信。

[69]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三册，第19页。

[70]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续），《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8年1月31日。此为顾颉刚按语。

[71]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第98页。

[72]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01页。该按语又称：“现在编《古史辨》第二册，重违其意，只得节去其对于古史之意见。”则傅斯年还是有些在意。

[73]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87页。

[74]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75]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页。

[7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页。

[77] 王东杰：《“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81—99页。不过，是文为了证实疑古与释古相通，有过于按时间顺序强调前后影响之嫌。实际上，有些说法不过通则，而除非确有事实联系，否则相似未必相通。

[78]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79] 傅斯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78—479页。

[80] 《陈寅恪先生史学蠡测》，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74—375页；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6页。

[81] 杨步伟：《第一次欧洲游记》，《杂记赵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页；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俞大维等著：《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3—28页。

[82] 《史学系派遣留德学生姚士鳌致朱遽先先生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465号，1924年5月9日。

[83]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45—446页。

[84]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第34页。

[85] 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45页。

[86] 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113—114页。

[87] 《傅斯年致岑仲勉》（1939年4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962页。

[88]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47页。

[8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485页。

[90] 详见桑兵：《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原载《中国文化》第29期，2009年春季号，收入本书时有所删改。

陈寅恪的西学

陈寅恪向来被誉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其西学的水准似乎不成问题。另一方面，陈寅恪治学主要在中国文史及东方学领域，不大论及所谓西学，而且极少称引西说，似乎又不在后人眼中的近代输入新知者之列。近年有学人提出陈的西学未必好，只是并无论证，亦未树立准则，似有故标高的之嫌。不过，陈寅恪很少专门谈论或称引西学，一般指为学贯中西，大概也是泛泛而论，并无确切标准和真凭实据。同样被誉为学贯中西的近代中国学人当中，西学程度更加可议者不在少数，有的则所谓西学程度略好，中学却很成问题。此事牵扯到对待域外思想学问尤其是西学的态度，为近代以来国人普遍遭遇的一大难题。有鉴于此，陈寅恪的西学究竟如何，有必要专门提出来讨论，而且应该设法加以论证。

一 学问难以贯通中西

所谓“西学”，如同西方一样，本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指向。中国历史上的西方，最早联系的大概是西王母所在的昆仑，然后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最后才是泰西即欧美。所谓大小西洋，便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方位判断。即使指泰西，也不过是中国人的看法，在被指为西方的人自己看来，并不存在统一实有的西方。所以有欧洲学人认为，西方只存在于东方人的观念世界。正如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在吾等东方人看来很少共同性一样。虽然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和文化形态学者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在面向东方或非西方之际，心目中也会有一个统一的西方。

与此相应，所谓西学的内涵外延，其实相当模糊。西人之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欧洲各国，大陆与英伦三岛已不一致，大陆内部也是千差万别。如科学一词的意涵，英国与德国即很不相同。各自的联系与区别，不知渊源流变的外人很难理解把握。当年杨成志留学法国，对于社会学、人类学不同分支之间的激烈争辩便感到莫名所以，觉得似无必要。实则诸如此类的派分科别，渊源于历史文化等实事的联系，不能说毫无人为意气的成分，毕竟蕴含了相当深奥的学理讲究。日本明治时整体上的西化具体而言也有德、法、英不同流派之争，成功或成为主导的一方非但未必深刻，而且往往简化，以易于流行。

国人接受的西学体系，基本都经过日本和美国的再条理，两国都是发达国家的后进，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兼收并蓄，也同样面临渊源各异、脉络不同的境地，因而其分科系统，均不得不抹去难以理解的缠绕纠结，整齐划一。清楚条理的结果，看似分明易懂，便于掌握，实则难免流于混淆肤浅，况且还有与中国不相啮衄的情形，必须调适改造。这样的道理，长时期游学多国著名高等学府的陈寅恪领悟较深，因此他极少称引国人奉为时趋的西学。批评者大概以为西学是内涵外延明确的客观实在，所以提出对西学掌握的高下之分。如果西学其实只存在于东方人的心目之中，好坏优劣的标准就变得模糊而难以捉摸。以今日的时势，西学作为方便名词固无不可，甚至是非用不可，认真计较起来，却是越理越乱的。

既然西学并不实在或是内涵外延含糊不清，学贯中西便是绝无可能之事。或谓近代名家辈出，原因在于那一代人古今中外纵横兼通。此说为后人的看法，而且多少出于自愧不如的敬仰，并非当日的实事。按照章太炎等人的看法，历代名家，通人最难得，达到如此化境者不过数人而已。中国人一生研治本国学问，尚且不能说通，试问有一西人能通汗漫无边的西学否？近代学人承袭清代学术梳理历代学问的余荫（当然也不免受其偏蔽的负面影响），兼受西洋学术新风的熏染，有名于时者固然不少，但也并非如今人所以为的，大师成群结队，个个学贯中西。能够沟通古今，且不受分科的局限，已经难能可贵，要想兼通中外，只能相对而言。

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陈垣等人的西学，多由读译书或东学转手而来，钱穆的西学更被讥讽为看《东方杂志》得来的杂志之学。所以后来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绝口不谈西学，梁启

超和钱穆则继续谈而自曝其短。西学稍好的严复和辜鸿铭，中学功底太差，后来虽然恶补，难以登堂入室。而且其西学也只是较当时一般国人的理解有所深入而已，距离通还相去甚远。胡适的输入新知在学衡派看来粗浅谬误，其中学在章太炎眼中则是游谈无根。这样指陈并非有意贬低前贤，只是说明兼通中外实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除了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少数自负的“支那学”者，以了解中国的水准远在国人了解外国之上的东西各国人士而言，试问有谁敢自诩贯通中学？何况中国一统，西洋分立，难易相去何止道里计。

钱穆在遭受占据主流者的白眼之后，仍不得不讲西学，在个人而言固然未能免俗，就整个社会风尚而论，则表明时势变迁，体用关系本末倒置，称引西学已成证明自我价值不得不然的时髦，像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那样不再侈谈格义之西学，已经不大可能。1929年傅斯年声称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1]，抗战期间胡适不满于《思想与时代》杂志的态度，特意指出编辑人员当中“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2]。其实除此二人外，该刊的重要成员如冯友兰、贺麟、张荫麟等，均曾留学欧美，所学与胡适相近，水准甚至还在胡适之上。在渐居主流者挟洋自重的取向之下，不留学大有不能“预流”之势，可见中西学乾坤颠倒至于此极，则未曾留学者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与时流有别，陈寅恪在民国学人中，是为数极少的敢于不言必称西学之人。他几乎从不以西学为著述主题，而且很少标榜西学理论、概念和方法。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近代中国以游学时间之长、所到外国学府之多、所学语言门类之广而论，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因而无人能够质疑其西学水准，也就不必证明自己的西学水准。换成他人，即使像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过来人的幡然醒悟，也难免被视为守旧落伍。另一方面，一旦发生诸如此类的误会，陈寅恪便会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以显示其对于西学的认识远在一般国人甚至专门学人之上。

1932年，陈寅恪因为出本年度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的对对子等事，引发不小的风波，招致各方非议，甚至被斥为“国学之蠹”^[3]。本来陈寅恪极不愿为此类事情牵扯精力，卷入是非，留学期间就因“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表示回到国中将“不论政，不谈学，盖明眼人一切皆已自悉，不须我之述说。若半通不通，而又矜心作气者，不足与言，不能与辩，徒自增烦恼

耳”^[4]。尽管不想惹祸上身，可是对于找上门来的麻烦，却绝不回避，更是毫不客气。

陈寅恪回国后不愿与人谈学，主要是因为国内所谓新学通人大都半通不通，与自己所见正相反对。而这些混杂中西学两面半桶水的新锐，虽然不过一知半解，却往往自以为是，好自炫其新说。在陈寅恪看来，清季民国时期，借西学变中国，包括学术文化的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大半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格义之学。至于世界学术的前趋，则大都茫然无知。谈元和新样，反而会被人以过时的陈言相非难，以致引起流俗的讥笑。^[5]正如清华国文考试出对对子为考题事件，议论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6]其批评新学的双锋直指两面：一是过时，二是附会。

近代好鼓吹过时的西学者，典型之一便是梁启超。清季以来，梁启超由东学转手引进西学，影响巨大，可是所及大都已是陈言（当然部分也变为常识）。陈寅恪游学期间，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惨烈，学术风尚大幅度转变，科学主义至少从万能的神坛跌落，战前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情绪一落千丈，有的甚至转而信仰东方主义。受此影响，梁启超的思想也出现转向。

不过，陈寅恪所谓过时，显然并非这样表面的趋时标准所能衡量。在学衡一派学人眼中，即使以输入新知为己任的胡适，所讲西学也是表浅浮泛之谈。相比于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新人文主义，追求教育普及的杜威的思想学术显得表浅。所以吴宓等人认为引进西学，应从希腊罗马时代，至少要从文艺复兴时期讲起，才能知所本源。虽然陈寅恪主张学术应当预流，可是所预绝非趋时也容易过时的时流。民国时期，留学一改清季风气，由地近费省的东游转而远渡重洋。而有切身体验的陈寅恪，深知欧洲学问的博大精深远非美东可比，曾经表示对哈佛的印象只有中国餐馆的龙虾，言下之意该校的学问并不足道。甚至指派送留美官费生与袁世凯北洋练兵一样，为祸害中国最大的二事之一。^[7]

尽管留美学生逐渐占了数量人脉的优势，求学问者去欧洲，求学位者去美国，当时已是有口皆碑。留美出身的佼佼者胡适，即不断被人质疑是否具有学问的根底。1926年胡适访学欧洲时，有几位英、德学者曾当面讥嘲美国，尤其不赞成美国的哲学，其实并未读过美国的哲学著作。胡适由此而生的感想是：“我感谢我的好运气，第一不曾

进过教会学校。第二我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如果不是这两件好运气，我的思想决不能有现在这样彻底。”^[8]之所以能够彻底，很大程度是因为简单。以新旧论是非，是胡适对付不少国人的利器。可是这样的辩词对于留学有成者未必有效。

国人学习西学，往往对其变动不居且动静较大的边缘部分较为敏感，易生共鸣，而对于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则难以把握。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出国前也一度向往趋新的西学，到欧洲尤其是英国留学后，从剑桥、牛津与伦敦大学的比较中领悟到，讲学问与求致用不同，专求致用，学术不能发展，专讲学问，思想才能彻底。而这时北大的风气仍是议论而非讲学，“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长此以往，很难成为一流大学。^[9]胡适与傅斯年都言及思想彻底的话题，而看法截然相反，两人对于什么是思想彻底以及彻底的思想影响社会的哪些层面，大异其趣。胡适所谓彻底，用傅斯年的标准，恐怕刚好是浅薄的表现。

趋时者的西学不仅容易过时，而且因为缺乏深度，大都格义附会，似是而非。诚然，陈寅恪具体所指并非一般好讲西学者，而是胡适之流的新派。在胡适用来“通”旧籍的《马氏文通》，在陈寅恪的眼中就不通之至！1932年，陈寅恪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科出题引起争议事致函系主任刘文典，申辩说明之余，即对《马氏文通》痛加批驳，指为“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他说：

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于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10]

这段话的矛头看似指向马建忠，板子却打在胡适等人的身上，对于后者的国语文法以及用西文文法解中国旧籍，无异于釜底抽薪。只是胡适的办法简便易行，至今仍被无知者奉为治学的康庄大道。

或许有意避免流俗，陈寅恪极少称引西学。他认为中国自戊戌以后五十年来的政治似有退化之嫌，“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虽然他自称“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11]，可是在吴宓看来，陈寅恪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一以贯之。1961年，与陈寅恪分别多年的吴宓老友重逢，在日记中记道：历经世事变幻，“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12]。所谓中国文化本位，具体而言，即陈寅恪1927年《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13]。

陈寅恪重视纲常伦理，源于他对民族文化史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14]后来又有所申论：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15]

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被理解为陈寅恪的夫子自道，而引发文化遗民的质疑。实则纲纪缘于社会伦理关系，并非一家一姓之兴亡。此为理解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关节。不过，陈寅恪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其“中体西用”文化观的经典表述，仍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所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

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16]这与晚清名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精神虽无二致，内涵却有所分别。

陈寅恪之所以很少称引西学，更重要的还是他对中西古今学术的基本判断以及相关的理智情感的复杂纠结。早在留美期间，他就曾对吴宓详细阐述中西学术的优劣短长：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17]

据此，依照常理，陈寅恪理应大力提倡输入引进西学，或是大量称引西学，而实情似相反对。究其原因，除了不与时趋同流，以及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外，还在于他所看重的西学，与流俗有别。留学期

间，对于盛行一时的学说，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陈寅恪曾特意学习过，以为食色性也，中国古已有之，言下之意，不足为奇。后来陈寅恪还明确表示不能以马克思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此说令有意回护之人也感到难以辩解。实则陈寅恪未必轻视马克思的学说，而是认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不能附会套用欧洲新说，应该立足本国，用西学的本源大道于无形（详见第四节）。即使谋求救国，也不能仅仅致用于一时，而要从学术文化的根本着手。这样的根本，又并非钱穆所批评的清季以来的革新派史学，从现实宣传的角度，企图根本解决所有问题，往往偏于一端。^[18]近代以来的挟洋自重者，于西学不过各取所需，若能全面关照把握，或许不至于信口开河以自欺欺人。

二 中国的东方学首席

陈寅恪既然很少言说和称引西学，即使作为方便名词，要想判断其西学的高下，也未免难于着手。对此，首先还是要着落于陈寅恪的本行，即文史之学方面。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针对当时汉学研究的中心在巴黎和京都，中国的历史语言之学久已落于人后的现状，提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所谓科学的东方学，看似以研究中国为主，其实不然。傅斯年不赞成国学的概念，以为扩充材料和工具，势必弄到不国不故，主张搜集材料不局限于中国的范围，而要关注“汉广”，所以强调以“东方学”代替“国学”，“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科学的东方学并不是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西学的组成部分。无论研究的范围重心还是方法取径，都是西洋学人的拿手好戏。“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19]

西人之东方学等于虏学的意思，稍早之前胡适也曾说过。1927年，胡适从欧洲回国，因国内政局变动而滞留日本，在京都乐友会馆召开的支那学会发表演讲，顺应京都学人尤其是狩野直喜的主张，说不能只研究“虏学”，即周边民族，必须研究中国本部，幸而京都有这方面的优秀学者，自己十分佩服，希望在场的学生多向狩野直喜等人请教。^[20]由此看来，虏学有二义：其一，和西学相似，东方学是

西人研究其心目中的东方的学问，是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方并不实有此种统一的学问。中国、日本、印度、波斯、中亚的学术文化分别甚大。其二，与中国相关的东方学研究的重心在于四裔，如西域、南海以及满蒙回藏鲜等。

从时间上看，目前所见资料显示胡适使用虏学的概念早于傅斯年，然而胡适有此认识，应是访欧时与傅斯年多次长谈的结果，而且傅斯年影响胡适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傅斯年的看法，当与陈寅恪有关。后者所学，正是西人东方学的长技，而且实际水准已经进入先进行列。傅斯年留欧前后，学术观念和取向出现明显变化，而变化的成因，除了直接接触欧洲学术，陈寅恪的影响应在重要之列。傅斯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期间时常相聚详谈，使得傅斯年的学术观念在若干重要方面较出国前大异其趣。虽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陈寅恪直接使用虏学的证据，此一说法很可能来自陈，至少是在傅、陈二人论学之际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笑谈。

如果此说虽不中亦不远，陈寅恪应是对自己当时治学取向的自嘲。在1920至1930年代的中国，陈寅恪可以说是所有学人中最有条件和能力依照欧洲东方学之正统治“虏学”的有数之人。陈寅恪回国后，在清华研究院国学所担任的指导学科是：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而普通演讲课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1926年陈寅恪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该门提出的研究题目四项，由本科三年级以上学生选修，四题为：一、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吐蕃古文）；二、鸠摩罗什之研究（龟兹古语）；三、中国古代天文星历诸问题之研究；四、搜集满洲文学史材料。^[21]从课程科目所设标题可见，陈寅恪清楚地知道所谓东方学乃西人的学问。

毋庸讳言，陈寅恪所掌握的多种古今中外语言文字以及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禹内的确为不二人选，可是放在这方面学术传统深厚的欧洲，就未必算得上出类拔萃。所以陈寅恪并不是跟着西人之东方学的轨则亦步亦趋，而是扬长避短，在中西之间寻求主攻方向，所选择的历史、佛教以及蒙古满洲回文书，既能发挥其汉文典籍熟悉的优势，又能利用西人东方学的长处，而为中外学人力所不及。^[22]同样注意到上述问题的日本学人，虽然致力于相关研究，直到1930至1940年代，在陈寅恪看来，仍然水准有限。^[23]

正因为有了陈寅恪这样精于西人东方学的高手，算不上擅长东方学的傅斯年才敢于喊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10月成立于广州，陈寅恪即被聘请为研究员。其所属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的研究标准是：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的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第一项分别由傅斯年、丁山、容庚、徐中舒负责，第二项由陈垣负责，而陈寅恪负责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治、军事、典制搜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24]则此时陈寅恪的研究仍然偏重倚靠异族域外语言的民族文化关系一面。

不过，“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固然是傅斯年的向往期望，更是他排斥一般国学家的托词。但在与东西两洋学术争胜方面，傅斯年的实际做法与公开宣言之间存在明显反差。他不像陈垣等人真心希望将汉学的中心争回到中国，因为他知道国际汉学属于东方学的系统，并非中国人所长，所以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人研治纯粹中国问题的“全汉”情有独钟，可是宣传上要顺应甚至凭借清季尤其是五四以来西风压倒东风的时势，竖起中国的“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的大旗，并掌控最终解释的话语权，使得那些不知何谓“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的学人望而却步或是知难而退。1934年，傅斯年在承认西洋人治中外关系史等“半汉”的问题上有“大重要性”的同时，觉得“全汉”的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批评“西洋人作中国考古学，犹之乎他们作中国史学之一般，总是多注重在外缘的关系，每忽略于内层的纲领”^[25]。这实际上等于说西人的东方学对于研究中国问题还是等而下之，顶多只是偏师而已，算不上正军。

傅斯年关于“半汉”与“全汉”的分别及取舍，早在他大张旗鼓地高调打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旗号之际，就已经形成并且暗中操作。1929年，傅斯年即提议陈寅恪领军研究“比较纯粹中国学问”的“新宋史”，以免治魏晋隋唐蒙元史“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的麻烦。^[26]照此看来，傅斯年在以宣言的形式断绝那些并不了解“东方学正统”的国学家趋时的念头并将他们统统打入另册后，其与欧洲东方学角胜的取径，并非如顾颉刚所揣测，是“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27]。一旦成功地对国学家“标新”，他对西人的东方学也要“立异”了。而立异的本钱，却是“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所以，“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所谓“正统”，还是

华洋有别，而非将中心从欧洲夺回中国的空间地理位置转移而已。对于国人，强调“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即其西学的一面；对于西人，却是主张不与洋人拖泥带水的具有内层纲领性的“全汉”。

傅斯年等人研治新宋史的计划，发端甚早，在此之前，国内只有刘咸炘、蒙文通等个别学人议论过重修宋史之事。^[28]虽然刘咸炘1926年写过《宋史学论》等文，专论宋代史学，但是并未认真考虑过重修宋史以及如何付诸实施。如果照傅斯年与陈寅恪所议办理，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以及陈寅恪超卓不凡的见识功力，所获必多，不敢说独步天下，能与之抗衡甚至得为同道者也是屈指可数。即使刘咸炘等同时实施相同计划，照傅斯年的观念，因为并非留学生出身，仍在“无能为役”之列。

然而，不无蹊跷的是，此事似乎并无下文，至少不见具体实行的蛛丝马迹。据1930年度《中研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研究员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为：“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治、军事、典制收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29]该文件原载《中央周报》第83、84期合刊，为新年增刊，于1930年1月1日出版。其制定应在1929年下半年。考虑到傅斯年与陈寅恪通信讨论着手研治新宋史的时间，则很有可能是制定该项文件时需要确定陈的研究计划。陈寅恪虽然对修宋史表示“如许兴趣”，最终并未同意作为其近期研究工作的重点。

陈寅恪何以搁置此事，未见直接证据。根据相关史事，可能性甚多，与西人的东方学相关者，如对于偏重倚靠异族域外语言的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仍然不忍舍弃，尤其是佛教以及夹杂些外国东西的唐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宋代是否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可以不与外国人拖泥带水，陈、傅二人存在罕有的严重分歧。例如陈寅恪认为，唐宋诸儒是先受到佛教道教性理之说的影响，再上探先秦两汉的儒学，以外书比附内典，变儒家为禅学，构建新儒学，然后避名居实，取珠还椟，并据以辟佛。傅斯年适相反对，认为唐宋诸儒是受汉儒之性情二元说的影响，鉴于时代风气人伦道丧，先从古儒学中认出心学一派，形成理学，以抵御佛教，因而与禅无关，于儒有本。为此，两人著文暗中争执十余年，最终依然各执己见。^[30]两人的理念相差甚远，当时傅斯年或许一无所知，陈寅恪却心知肚明，自然不愿自找麻烦。

一直到1940年代，陈寅恪仍然稳坐中国的东方学祭酒的位置，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威地位。可是，形势比人强，陈寅恪所讲西人之东方学，在欧洲本来就是极小众研治的绝学，因为必须掌握多种古今语言，经过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献学的长期训练，又要各种文献的大量积累，当时中国很少有人能够承接延续，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高才生如姜亮夫等也不能理解。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1928年度改讲梵文文法和唯识二十论校读），前者“先就佛经一部讲起，又拟得便兼述西人治希腊、拉丁文之方法途径，以为中国人治古学之比较参证”^[31]。学生的普遍感觉是听不懂。姜亮夫回忆道：

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

陈的梵文课以《金刚经》为教材，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中文本翻译的正误。学生们问题成堆，但要发问，几乎每个字都要问。否则包括课后借助参考书，最多也只能听懂三分之一。^[32]

蓝文征也说：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33]

清华国学院研究生的程度较一般大学本科为高，当时国内顶尖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学生，对于陈寅恪所讲东方学更加力不从心。1928年春，北京大学请其兼任教授佛经翻译文学课程，秋季改授蒙古源流研究。前者“因为同学中没有一个学过梵文的，最后只能得到一点求法翻经的常识，深一层了解没有人达到”；后者因部分学生对元史有所准备，勉强能够应付。^[34]清华国学院结束后，陈寅恪改到清华大学的文史两系任教，所讲课程较研究院时期降低难度，学生仍然不能适应。1934年，该校文学院代院长蒋廷黻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说：“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35]

学问之事，本来就存在可信与可爱的不可兼得，越是高深玄奥，越是曲高和寡。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往往等而下之。那些一味面向新进，迎合时流的横通之论，无论如何出奇求新，不过是追求感官刺激而已。如果不能超越时流，坚守良知，以一般青年为主体的大学，反而最容易成为欺世盗名者横行无忌的场所，遑论并非故意的误人子弟。这也是大学稍有不慎即变为学术江湖的重要成因。

学生无力承受，还不足以让陈寅恪放弃心仪的西人之东方学，全力转向其他领域。可是后来逐渐发生材料不足的困难，终于令其无法继续坚持。尽管陈寅恪游学期间大量购书，以备归国研究，回国前后又想方设法鼓动各部门机构购置相关图书资料，可是由于基础太差，又是不急之务，一时间难以充分改善。到1930年代后期，材料方面已经感到捉襟见肘的陈寅恪还想勉为其难地奋力一搏，不料抗日战争爆发，辗转迁徙，颠沛流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42年，陈寅恪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公开声称：“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36]同年底为陈述《辽史补注》作序，又表明因“频岁衰病，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论述”^[37]。并且将所有相关西人东方学的书籍卖给北大，最终放弃在此领域与国际学术界角逐比肩的努力。^[38]

尽管陈寅恪屡屡自称其“平生述作皆出于不得已”^[39]，令人难以捉摸究竟是实情抑或托词，此番转向的确出于情非得已。既然未必心甘情愿，所以后来陈寅恪一直关注西人之东方学的研究动向，战

后对于学界新锐季羨林的研究能够突进到国际学术前沿大加赞赏。后来有人指季所治实为虜学，而非国学，并非妄言。而季老自己卸下“国学大师”的桂冠，也算是正本清源之举。

三 国人之中 西学较优

西人之东方学虽然是西学的组成部分，如果仅仅以此为准来衡量陈寅恪的西学，不无取巧之嫌。其实，即使在西学的正统方面，以国人为范围进行比较，陈寅恪的西学也在出类拔萃之列。此处之较，不仅与当时一般的中国人比，而且与专门的学问家比，甚至是与以输入新知为职志、号称通西学者比较。或者指陈寅恪未必通西学，如果以为西人有西学，并以西人为范围整体而言固然，可是要说陈寅恪是近代中国学人当中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亦非过誉。对此可从几方面略加申论。

清季以来，对于西学了解较深者，首先当属留学生。所谓读西书不如留西学，确有几分道理。读西书尤其是翻译书，隔了不止一层，很难领会到位。当然，留学又有东西洋之别，留学东洋而求西学，也是转手负贩的二手货。留学西洋还有欧美之分，前者重在求学问，后者着眼于求学位。进而言之，无论东西洋还是欧美，受时势的影响，近代留学生当中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以及如各种留洋外史小说所描述的混迹江湖者不在少数，肯用心读书的为数不多。正是在后一部分留学生当中，陈寅恪的中西学问俱佳可谓有口皆碑。

陈寅恪在东西两洋各国的各大名校浸淫多年，当为中国有史以来留学时间最长、读过的学校最多之人，知道求学问应到欧洲的道理。所学习的范围虽有重点，亦相当广泛，而且他不求学位，但求学问，专心读书。与之交往密切的吴宓称：“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佩服至极。”所以如此，天分高之外，关键还在读书多，尤其是读西书多。“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其时陈寅恪不仅谈西学，而且

“谈印度哲理文化，与中土及希腊之关系”^[40]。吴宓后来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41]

吴宓读书治学教书，均以外国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化为主，其西学较一般中国人为优。不过，尽管他后来成为部聘教授，其中西学识与陈寅恪相比，还是差距较大。自视甚高且读书亦多的傅斯年对刚到德国留学的北大同学毛子水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42]另一位北大毕业派遣留德的姚从吾（士鳌）于1924年3月12日致函母校，介绍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如罗家伦、陈枢、俞大维、傅斯年等，称后二人“博通中西，识迈群流”，对陈寅恪尤为推崇，指其“能畅读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国文字。近专攻毗邻中国各民族之语言，尤致力于西藏文。印度古经典，中土未全译或未译者，西藏文多已译出。印度经典散亡，西洋学者治印度学者，多依据中国人之记载，实在重要部分，多存西藏文书中，就中关涉文学美术者亦甚多。陈君欲依据西人最近编著之西藏文书目录，从事翻译，此实学术界之伟业。陈先生志趣纯洁，强识多闻，他日之成就当不可限量也。又陈先生博学多识，于援庵先生所著之《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祆教考》、张亮丞先生新译之《马哥孛罗游记》均有极中肯之批评”^[43]。

同年7月，顾颉刚在信中列举现今国学五派的趋势，其中第二派为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研究亚洲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的文化，他们在甘肃、新疆、中央亚细亚等处发掘，有巨大的发见。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中国罗福成、张星烺、陈寅恪、陈垣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44]。

陈寅恪不仅通过书本了解西学，还实地考察留学各国的社会实情，增加切身体验，以便加深对于西方社会的理解认识。1919年吴宓与之相识于哈佛，“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45]。如偶及婚姻之事，陈为其细述所见欧洲社会实在情形，竟能将贵族王公、中人之家和下等工人的情况分别详述，指出“西洋男女，其婚姻之不能自由，有过于吾国人”。并且进而申论：“盖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之一物，而吾国竟以此为风气，宜其流弊若此也。即如宪法也，民政也，悉当作如是观。捕风捉影，互相

欺蒙利用而已。”^[46]这样的深刻见解，与五四以来东西文化的笼统简单类比，不啻为天壤之别。

陈寅恪对西方婚姻制度及男女色欲之事的认识，绝非纸上谈兵，为了具体了解，在巴黎时还曾经实地考察。详究比较之下，认为“吾国旧日之制，男女各得及时配偶，实属最善之道。父母为儿女择偶綦殷，固是爱子之心，抑亦千百年经验所得。本乎学理，而重事实。故吾国风俗实较西洋为纯正”^[47]。1923至1924年留学欧洲期间，陈寅恪与积极组织政党活动的曾琦等人交往，“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48]。后来他指责戊戌以来50年中国的政治退化，依据之一即是以国会为象征的所谓恶质民主政治。^[49]

陈寅恪口头上常常将中西社会文化作平行比较，因其对于中外各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状况有系统了解和深入体察，所见往往与时人大异。前引留美期间陈寅恪向吴宓阐述其对中西思想文化异同流变的一整套看法，便与东西文化论战各派的观点均大相径庭。而号称通西学的人士乍听之下，大都愕然诧异，认真思考之后，加以验证，转而心悦诚服。胡适一派有英国通之称的陈源，1922年在柏林第一次听到陈寅恪的妙论，“说平常人把欧亚做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比较的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当时便觉得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可以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澈了”^[50]。

陈寅恪对于西学的本源及其流变，也有超乎时流的洞见。例如他阐述比较语言学的历史依据：“昔希腊民族武力文化俱盛之后，地跨三洲，始有训释标点希腊文学之著作，以教其所谓‘野蛮人’者。当日固无比较语言学之知识，且其所拟定之规律，亦非通筹全局及有统系之学说。罗马又全部因袭翻译之，其立义定名，以传统承用之故，颇有伪误可笑者。……欧洲受基督教之影响至深，昔日欧人往往以希伯来语言为世界语言之始祖，而自附其语言于希伯来语之支流末裔。迄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于是系内各个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51]此说不仅关乎语法，也触及

欧洲所谓古典学的渊源流变。将近代的重构等同于古代的事实，恰是时下西学认知的一大通病。

正是由于陈寅恪对于西学和西方的认识相当精辟，超越流俗和常人，甚至远在以输入新知为己任的趋新人士之上，尽管见解大异其趣，还是受到后者的推重。1930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成立编译委员会，由胡适担任委员长，张准任副委员长。该委员会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文史，乙组科学。甲组委员有丁文江、赵元任、陈寅恪、傅斯年、陈源、闻一多、梁实秋，皆一时之选。[\[52\]](#)主持其事的胡适提出历史和名著的拟译名单。关于历史，胡适所开书单为：

1. 希腊用Grote（格罗特）

2. 罗马用Moumsen（莫姆森）与Gibbon（吉本）

3. 中世纪拟用D. C. Munse（穆斯）

4.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拟用E. M. Hulme: *The Renaissance,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休姆：《文艺复兴，新教革命和天主教改革》）

5. 近代欧洲拟用

A. W. C. Abbott: *The Expansion of Europe*（艾博特：《欧洲的扩张》，1415—1789）

B. H. E. Bourne: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鲍恩：《革命时代》，1763—1815）

6. 英格兰拟用I. R. Green（格林）或E. Wingfield-Stratford: *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温菲尔德-斯特拉福德：《不列颠文明史》）

7. 法国拟从李思纯说，用Albert Malet: *Nowvelle Historie de France*（阿尔伯特·马莱：《法国新史》，1924）

8. 美国拟用Beard: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比尔德：《美利坚文明的兴起》）

文史组议论胡适提出的书目时，陈寅恪认为：“前四人悬格过高，余人则降格到教科书了。”胡适的答复是：“此亦是不得已之计，中世与近代尚未有公认之名著，故拟先用此种较大较佳之教科书作引子，将来续收名著。比如廿四史中虽有《史记》《汉书》，也不妨收入一些第二三流之作也。孟真则主张译‘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剑桥中世纪史》]，此意我也不反对。”^[53]揣摩当时情形，显然陈寅恪所言切中要害，胡适的辩词有些牵强，傅斯年的意见表面折中，实际是既支持陈，又使胡适有台阶可下，不太难堪。所反映出来的，恰是各人对西方不同时期史学整体把握的差异。

陈寅恪的研究虽以文史为主，其对于西学的认识，并不限于史学一隅。1931年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之际，陈寅恪系统地阐述了中外学术的差距，他说：“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并将“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作为“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的公案，“与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试一参究”，以国际学术为参照，全面表达了对于“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看法。他认为，求本国学术独立为大学的职责所在，考察全国学术现状，则自然科学领域，中国学人能够将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经不易，只有地质、生物、气象等学科，因为地域材料的关系，还有所贡献。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能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论创获。至于社会科学领域，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状况，非乞灵于外人的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讨讨论之资。教育学与政治相通，多数教育学者处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状态。即使中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实际上也不能独立，能够对大量发现的中国古代近代史料进行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的整理，还有待努力，而全国大学很少有人能够胜任讲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至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国人只能望其项背。国史正统已失，国语国文亦漫无准则。并且痛斥垄断新材料以为奇货可居、秘不示人、待价而沽的私人藏家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54]。

此意与哈佛时期对吴宓所谈“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的意思相参照，可见陈寅恪的旨意在于中国必须脱胎换骨，深究关于天理人事的精神学问，才能以学问美术胜人，获得独立，且贡献于世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治学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关怀，闭门造车与格义附会，都是缘木求鱼。

四 取珠还椟

陈寅恪关于中外学术文化的种种意见，看似与输入新知者的旨趣一脉相通，仔细考察，还是大有分别。关键在于既要以世界为范围，又能具有统系而不涉附会。而当时的中国学人，往往偏于一端。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陈寅恪关于文化史研究的批评，颇具代表性：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一）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二）新派失之诬。新派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55\]](#)

可见，陈寅恪的基本取向，仍然是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说的相反相成，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这种由二千年中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的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是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必由之路。对此陈寅恪的直接论述相当简约概括，而通过其学术实践的身体力行，以及对于相关史事的发覆讨论，可以揣摩领会。

陈寅恪治学，比较研究是相当重要的方法取径，这不仅因为史学必须通过比较不同的材料以近真并得其头绪，治史可以说天然就是比较研究，而且缘于用异族域外语言研究民族文化关系的西人东方学之正统，主要凭借比较语言学、比较文献学、比较宗教学的理念方法。陈寅恪的比较研究，遵循欧洲的正轨，立足本国的史事，至关重要的

概念之一便是格义。他在多篇论文中屡次详细论述格义的历史、意涵和做法，对于格义的理解应用，明显体现出相反相成的态度，有助于领悟其对待西学的观念取法。

就外在的形式而言，陈寅恪从比较的正途即事实联系的角度，对望文生义的“格义”之法大加挞伐，其《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不仅依据比较语言学的轨则痛批《马氏文通》，指为“何其不通如是”，还对流行一时的附会中外学说的格义式比较提出批评，并且深究其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居易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56]

“格义”的缘起，详见陈寅恪的《支愍度学说考》：“盖晋世清谈之士，多喜以内典与外书互相比附。僧徒之间复有一种具体之方法，名曰‘格义’。‘格义’之名，虽罕见载记，然曾盛行一时，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与“格义”同时出现，形似而实异的还有“合本”。“‘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较拟配，颇有近似之处，实则性质迥异。”“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傅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觐之作也。”^[57]就比较研究而言，陈寅恪无疑旗帜鲜明地倡导合本而排斥格义。

不过，转换角度，陈寅恪并非全然否定格义的积极意义。作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的流别，他对唐宋诸儒援儒入释的理学评价极高：“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谓融通一类者，亦莫非‘格义’之流也。即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之疏孟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之变相

也。”^[58]对于这一类的格义，陈寅恪给予充分的了解同情和高度肯定，他认为韩愈扫除章句繁琐之学，直指人伦，目的就是要调适佛教与儒学的关系。^[59]

至于接续韩愈事业的宋代新儒家如朱熹等人，陈寅恪更是推崇备至，将朱熹之于中国，比作Thomas Aquinas之于西洋中世纪，居功至伟。正是由于先贤面对中外文化的缠绕，都有取珠还椟、避名居实的苦心孤诣，既充分输入吸收外来学说，又不忘本来民族地位，外体中用，才使得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以此为准则，形式上外在的格义，取西洋观念解释古代思想，或用中国学问比附西学，不仅附会中外学说，不能得外来学说义理之高明，无助于理解领悟古人的思想，反而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尴尬，不无用夷变夏，流于西洋学问的附庸，以致数典忘祖之嫌。而善用格义之学，借鉴西洋学说，重新解读古人思想，既不违于古，又可利于今，求珠还椟，面向未来，或可继宋代之后，进一步丰富提升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再创思想学术的新高。

要想达成两方面的相反相成，应当领悟把握1931年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时陈寅恪所提出的准则，即“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

^[60]。既有系统解释，以免失之于滞，又不格义附会，以防失之于诬。所谓系统解释，并非生吞活剥地套用外国的观念方法，或是将中国的材料削足适履地塞进外国的框架，而是运用欧洲现代治学良法于研究的过程，发现中国观念史事的内在联系与特征，在表述方面则尽力符合本意本事。历史研究无疑都是后人看前事，用后来的观念观照解释前事，无可奈何，难以避免。但要防止先入为主的成见，尽量约束主观，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这不仅因为后人所处时代、环境及其所得知识，与历史人物迥异，而且由于这些知识经过历来学人的不断变换强化，很难分清后来认识与历史本事的分界究竟何在。

近代以来，中西新旧，乾坤颠倒，在体用关系上，用夷变夏，已成大势所趋。陈寅恪称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虽许以“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实则对于用域外系统条理本国材料，始终有所保留。

近代学人，若不能打破断代和科目的分界，通贯古今中外各个层面，而欲推陈出新，常用办法，便是借鉴西洋等域外观念，观察中国

固有事物，而得其新解。如1919年胡适出版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就以西洋的哲学作为比较参证的材料。借用别系的哲学，作解释演述的工具。^[61]这样的做法，后来被视为树立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典范，也引起不小的非议。在与世界接轨国际对话等等时髦口号标签的导向下，用外国模型治中国学问，愈演愈烈，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似乎不如此则不入流。扩而大之，逐渐演变成以负贩为创新，甚至衍生出搬弄炫耀连自己也不明所以的名词概念的恶习。尽管学术风气如此削足适履，以致太阿倒持，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还是断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他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62]

此言的确是过来人的肺腑之言，可以检验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一切中国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也应当作为警示来者的箴言。

要将古今中外熔于一炉，取高明义理而不着痕迹，由事实见解释，重要方法即与格义相对的合本子注，即比较不同的佛典译本，将别本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以资对比。合本子注法还影响了中国的史学，尤其与宋代长编考异法颇有渊源。合本子注和长编考异法的应用，后来进一步有所扩展。1948年杨树达作《论语疏证》，为陈寅恪所推许，并代为总结了搜群籍以参证圣言、考订解释以明圣人之言行、汇集古籍中相关的事实语言以订正释疑的三层办法，据此可得以俱舍宗领悟俱舍学之道，后来聚讼纷纭的内外理路之争亦可化为相辅相成。陈寅恪指研治内典与外书形似而实不同，主要是指佛藏与儒经分别面向出世与世间，因而合本子注与长编考异，一重神话物语，一重人间事实。若就形式和方法而言，二者可谓异曲同工。^[63]而杨树达讲学，在好用西方解释框架的蒋廷黻等人看来，全然不上轨道，没有意思。

陈寅恪的时代，除了完全不参与学术对话的地道的老辈，治学或多或少都会受西学的影响。即使像陈垣那样自称“土法上马”的学者，在傅斯年看来也是留学生，意思就是认为其治学办法符合世界潮流。而钱穆等未出国者，在学术以及社会的压力下，只好附和谈论西学的时流。老辈之所以避而不谈，是因为通行的整套话语体系已经西化，一旦介入，就会着了道了。他们宁可待在自己熟悉的话语世界中，因为在那里，他们是掌握话语权的，至少是具备对话能力的。在《续修四库总目提要》的相关部分，他们不仅展现了自己的功力学识，而且对新进的学术观念或隐或显地表达意见。

其实，借用西法乃至以西法为本治学，同样也有隐显之别。越是大张旗鼓地谈论西学者，对西学的了解未必多而且深；而对西学的认识越是深入堂奥，反而不一定侈谈西学的皮毛，只是善用其精髓。在这一层面上，中外相通，无需此疆彼界，壁垒森严。相比于陈寅恪之于西学的取珠还椟，大道无形，傅斯年的“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尽管更多是用作制人的法器，他内心有“全汉”的追求，对于海外汉学家，除伯希和、高本汉等少数高明外，很少能入其法眼，实际做法也的确与众不同，但客观上还是助长了挟洋自重的恶俗，加深了格义附会的流弊。

五 申论

探究陈寅恪究竟是一般称许的学贯中西，还是有人所指的西学不佳，问题本身或许不难论证。所谓西学，其实只存在于东方人的心目之中；即使西方人要想贯通西学，也几无可能。至于学贯中西，可以说任何人绝做不到。作为方便名词整体而言，相比于同时代的中国学人，留学时间长、所到国家多的陈寅恪的西学算得上出类拔萃，甚至是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其西学主要集中于文史方面，还一度是中国研治西人东方学的首席。此节不仅得到留学生和好讲西学人士的承认，其本人还被推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委员。陈寅恪主张尽量吸收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反相成，绝不挟洋自重，舍己从人，很少称引附会西学，宁愿仿宋儒先例，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在批评一味趋新者的西学为过时的格义之学时，才显示其对

国际学术界元和新样的了解与把握。其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的主张，为中外学术文化融通取向的高妙境界。

总括前述各节，可以得出如下意见和申论：

西学只是东方人的说法，并无内涵外延的标准实事，无从把握。漫无边际的所谓学贯中西其实是不可能的，包括西方人在内，没有人可以贯通包括各种文化系统和方面的所谓西学。因此，陈寅恪当然不能无所不包地学贯中西，其中学较通，以专业的眼光看，也有限度（如古文字、音韵训诂）；其西学除基本知识以及作为外来者由切身体验洞察所得真知灼见外，主要集中于文史之学。可是相对于同时代的国人，陈寅恪的西学可谓出类拔萃，不用说与国学家比较，即使号称通西学者也难出其右。

陈寅恪主张治学以世界为范围，实际上多用比较语言、比较文献、比较宗教、比较历史等国际学术界奉行的正途轨辙，其推许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将外国观念与本国材料相参证。不过，陈寅恪绝不挟洋自重，很少称引西说附会西学，宁愿仿宋儒朱熹成例，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而在批评一味趋新者的西学为过时的格义之学时，才显示其对元和新样的了解与把握，已经臻于化境。陈寅恪于举世以欧化为时尚的风气中，敢于特立独行，固然由于学问上早已悟道，同时也得益于长期留学的背景以及留学生当中关于其中西学皆通的口碑，既足以自信，又不会被人看轻。而震慑世俗人心的，还是掌握多种外语和擅长西人之东方学的功力。待到其捐弃故技，不复言塞表殊族之史事，学问谨守禹域以内，西学的痕迹日益隐去，本来一般人认为以西学见长的陈寅恪，逐渐变得似乎与西学无缘。

中外文化的交流影响，源远流长，随时进行。就精神领域的学问集中而论，受域外影响最深的大致有三期，即以唐宋为中心的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泰西新学以及晚清的西学东渐。前两个时期虽然源流不同，实际上已经用夷变夏，形式上仍然坚持取珠还椟。后一时期则夷夏大防全面崩溃，不仅西体中用，甚至全盘西化，因而高扬输入新知的大旗。这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局部的胡化略为近似。正是针对世风不以舍己从人为耻、反而挟洋自重的时尚，陈寅恪凭借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重申中国今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的思想，其结局在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地位，而且势将终归于歇绝，主张必须坚守道教之真精神及新儒家之旧途径，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二

者相反相成，才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确切中时弊。尽管他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未必能够即时挽回世运，所提出的法则却有颠扑不破的效应，可以检验所有与此相关的人与事。只是其所预言应验之日，恰是近代以来许多的流行破产之时。

不过，唐宋明清诸儒取珠还椟的苦心孤诣，却给后世的研究者留下难以破解的谜题。即以陈寅恪所论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断为先吸收异教精粹，融成新说，再阐明古学，以夷夏之论排斥外来教义，便与傅斯年等人的看法截然不同。唐宋诸儒究竟是先受到佛教道教性理之说的影响，再上探先秦两汉的儒学，以外书比附内典，构建新儒学，然后据以辟佛，还是相反，鉴于时代风气人伦道丧，先从古儒学中认出心学一派，形成理学，以抵御佛教，两说虽然各自说法，实际上可谓针锋相对。在多位近代学界高明参与的讨论中，陈寅恪的看法曲折反复，难以信而有征，明显处于少数。^[64]

至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影响，近年来有学人分门别类地搜集比较接触前后不同时期的中外文本，在自然科学各方面，逐渐可以证实，而在精神思想学问方面，由于方以智等人用西说解读经典而故意掩饰，同样陷入认识新儒学发生演化历史进程的迷惑，只能言其大概，很难具体实证。历史尤其是学术思想史上，实事未必皆有实证，看似可以证实的往往又是表象假象，扑朔迷离。如何破解此类谜题，考验今日学人的智慧功力。同样，陈寅恪秉承先贤之道，用西学而不着痕迹，较一般皮傅西学、食洋不化者，固然判若云泥，即使与忠实输入新知者相较，也不可同日而语。研究类似问题，应当以实证虚。一味信而有征，则不仅表浅简单，而且未必可信，甚至可能误读错解。唯有用陈寅恪探究中国中古思想发展的大事因缘之法，庶几可至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如此，也可为破解类似谜题提供案例参证。

^[1] 《傅斯年致陈寅恪》（1929年9月9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第227页。

^[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第540页。

^[3] 陈旭旦：《国蠹》，《国学论衡》第1期，1933年。

^[4]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66页。

^[5]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9—256页。

^[6] 陈寅恪：《致傅斯年》二十一，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

^[7]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页。

[8]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9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9] 《傅斯年君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715号，1920年10月13日。有趣的是，一个月前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也是要求北大师生不要从事普及性的新文化运动，而要专注于研究高深学问。

[10]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252页。

[11]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8页。

[12]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13]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13页。

[14]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3页。

[15]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2—13页。

[1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页。

[17]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0—102页。

[18]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6页。

[19]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6—12页。

[20] 吉川幸次郎：《胡适》，《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第431—433页。

[21] 《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000号，1926年12月8日。

[22] 参见陈寅恪：《与妹书（节录）》，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55—356页。

[23] 1937年1月31日陈寅恪复函陈述，谈论契丹辽史研究，内称：“白鸟之著作，盖日人受当时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对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权威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公今日著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陈寅恪：《致陈述》三，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83页。

[24] 蔡元培：《中研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1页；《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5页。

[25] 傅斯年：《〈城子崖〉序》，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294页。

[26] 《傅斯年致陈寅恪》（1929年9月9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第227页。

[27]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28] 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1—592页。

[29] 蔡元培：《中研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371页。

[30] 详见桑兵：《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原载《中国文化》第29期，2009年春季号，收入本书时有所删改。

[31] 《教授来校》，《清华周刊》第359期，1925年11月13日。

[32] 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37—239页。

[33]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

[34] 劳榦：《忆陈寅恪先生》，《传记文学》第17卷第3期，1970年9月。

[35] 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6页。其在中文系所开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敦煌小说选读、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等。

[36]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13页。

[37] 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5页。

[38] 此事多以为出于生计艰难，实则对于学人而言，安身立命处更为重要。

[39] 陈寅恪：《致陈述》十九，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97页。

[40]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28、55、90页。

[41] 《吴宓诗集·空轩诗话》，引自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第79页。

[42] 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传记文学》第17卷第2期，1970年8月。

[43] 《北京大学日刊》第1465号，1924年5月9日。

[44]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97页。

[45]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88页。

[46]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20—21页。

[47]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20—121页。

[48] 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6页；曾琦：《旅欧日记》，曾慕韩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曾慕韩先生遗著》，台北：“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54年，第407—418页。

[49] 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49—150页。

[50] 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65期，1926年3月6日。

[51]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0—251页。

[5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第759页；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950页。

[5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第822—823页。

[54]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363页。

[55]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46页。

[56]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57] 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6、181、185页。

[58] 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73页。

[59] 陈寅恪：《论韩愈》，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19—322页。

[60]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

[61]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82页。

[62] 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59页。

[63]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2—263页。

[64] 参见桑兵：《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原载《中国文化》第29期，2009年春季号，收入本书时有所删改。

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民国时期，学人沿袭清中叶以来的风气转换，对于赵宋一代的学术文化渐趋推崇，同时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中古历史开始受到重视。两相作用，关于宋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层面日益扩展深入，意见分歧也逐渐多点展开。不无蹊跷的是，对于宋代越是推崇备至的学人，如陈寅恪、傅斯年等，反而很少直接下手撰写关于宋代的论著。而其提出的各种问题，却陆续引起宋代研究专家以及关注这一朝代的各科学人回应讨论。其间玄奥，颇为耐人寻味。

对于陈寅恪重视宋代而无直接著述一事，学人已经有所注意，并且努力概括陈的宋代观或宋学理念。^[1]可是陈寅恪等人关于宋代研究的种种议论引起近代学人广泛讨论的渊源流变，却鲜有通盘爬梳解读，因而论及相关史事文本，误读错解之处不少。梳理相关史事，将思想学术还原为历史，可以进一步把握陈寅恪及其他学人对于宋代看法的异同，探寻其何以无宋代专门论著的缘由。而以陈寅恪等人所主张的办法，寻绎当时学人重视宋代的前因后果和各自侧重，及其关于重修宋史、“宋学”渊源以及宋代史学、新宋学的讨论争议^[2]，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近代学人关于宋代言说的本意，而且对于今日研治宋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有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治学须取法乎上，以免等而下之。有鉴于此，不揣冒昧，就近代学人关于重修宋史、宋学渊源以及新史学和新宋学等事，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 宋代为中国学术文化高峰

民国学术，由经入史，学人所重，大都偏于上古，兼及清代，至于中古一段，则重视不够。经陈寅恪等人的提倡并且身体力行，用力于魏晋隋唐者渐多，而宋元以下，专攻的学人依然鲜少。这一方面固

然由于中国学术历来尚古，另一方面则由于新发现的上古出土材料较多，易于创新。如钱穆所说：“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3]不过这种捷径到1930年代已经渐成畏途。1934年2月赵万里与朱自清谈论“现在学术界大势”，慨叹：“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也。”^[4]当然，不愿着手于宋元，还有另一重原因，即认为宋代国家羸弱衰败，各方面均无可取，即使有研究价值，情感上也宁可回避。

关于宋代的思想学术，陈寅恪的看法与时流不同。他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5]“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并称许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6]。蒙文通在1941年发表的《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一文中提到：“往时陈君寅恪于语次称汉人经学，宋人史学，皆不可及。”^[7]新版《蒙文通学记》（增补本）记：1934年前后，“曾访陈寅恪氏于清华园，谈论间，陈盛赞‘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余深佩其言，惜当时未能详论。异日，再往访之，欲知其具体论旨。晤谈中，陈详论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亦略及郑渔仲”^[8]。

陈寅恪所论并非空谷足音，但参以民国学界的时势，仍不无先见之明。有学人指出，道咸以后，鉴于乾嘉学术不能应对危局，“学风遂变，其时学者知大乱之将至，乃归咎于考证学之无用，又学术之事，有时而穷，才智之士不能不别启途径，故宋学文史复兴”^[9]。不过，所谓宋学文史复兴，当有所分别，曾国藩等人的复兴理学，力图挽回乾嘉以来因汉宋分争的颓势，文学则有“同光体”的尊宋诗，二者影响后世颇大。以致有学人认为，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10]

与理学、文学重在本身价值有所不同，民国学人虽以宋代为近世起点，认为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的枢纽，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多宋人所造就，因而主张究心赵宋一代历史，“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11]。但这还是就内容立论，重视赵宋历史而非推崇宋代史学，更不及整个学术文化。即使如王国维，断言“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总体上在人智活动与文化的多方面，前后历朝皆不如宋代，

可是所举直接关于史学的例子只是金石学。[\[12\]](#)推崇宋代史学而非仅仅重视宋代历史，并且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高峰，陈寅恪在近代学人中即使不能称最，也是少数前驱之一。况且在讲究宋代史学方法方面，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上述主要以史学为标的，却不能据此理解为陈寅恪对宋代学术文化的推许仅限于史学一隅。不仅如此，陈寅恪看重宋代学术文化并非仅仅由于其对于史学的偏爱，而是整体上将宋代视为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高峰，宋代史学能够登峰造极，恰是因为这一大背景。他后来针对时势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13\]](#)虽以史传为例，重心却在文以载道的义理一面。这番话说于向蒋天枢托命之时，在举世“俗学阿时似楚咻”中慨叹“可怜无力障东流”，将百万罪言藏山付托的旨趣，系于将圣籍神皋留诸后世，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可谓用心良苦。[\[14\]](#)

至少从可见的资料看，陈寅恪对于宋代学术文化尤其是宋学的推崇，还在标举宋代史学之前。早在留美期间，他就曾对吴宓详细阐述中西文化的长短优劣：

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椑。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

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15\]](#)

虽然晚清民国已有学人重视赵宋，以宋元为衰世的观念仍居主导，因而所重与宋代学术文化的高度以及陈寅恪的看法之间还是存在差距。在同时代学人当中，傅斯年对于宋代史学以及宋代学术文化整体的看法与陈寅恪较为近似。他的《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以宋朝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高点。[\[16\]](#)任教中山大学时讲《诗经》，又说欧阳修大发难端，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宋朝人经学思想解放，眼光敏锐。宋末王应麟（伯厚）则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17\]](#)

相比较而言，傅斯年对于宋代的肯定更多的是指史学，认为宋代史学最发达：“《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即成于是时，最有贡献而趋向于新史学方面进展者，《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书，多至数百余种，折衷于两种不同材料而权衡之，后者可以代表利用新发现之材料以考订古事，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之窠臼，而转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学之所有事也。”[\[18\]](#)欧阳修的《五代史》不是客观史学，而《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司马光的《通鉴》则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因为胡元之乱，以及清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不仅不能开新进步，反而退步。[\[19\]](#)就此而论，傅斯年所看重的显然是实学一面，而以两宋和明清之际为近千年来实学最盛的时代。[\[20\]](#)

陈寅恪与傅斯年自1924年留学德国时，就频繁地相互论学[\[21\]](#)，就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留美期间谈中外学术文化等情形看，转到欧洲后陈影响傅的可能性较大，而傅影响陈或英雄所见略同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傅出国前以科学为准则，以清代学问为最佳，认为：“宋朝学问的原动力是佛道两宗。谈起心性来，总是逃禅；谈起道体来，必要篡道。我平日常想：假使唐朝一代的学者，能在科学上研究得有些粗浅条理，宋朝的学问必定受它的影响，另是一番面目。无如唐朝的学

问太不成东西了，宋人无从取材，只好逃禅篡道去。所以整天讲心，却不能创出个有系统的心理学；整天说德，却不能创个有系统的伦理学。程伯子的天资，朱晦翁的学问，实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所成就的，也不过‘如风如影’的观念，东一堆西一堆的零杂话。这都由于先于它的学者，不能在科学上有点成就，供给与它，因而它走了错道了。”而清代学问是宋明学问的反动，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演绎的、悟的、理想的、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归纳的、证的、经验的、怀疑的，方法截然不同，主义完全相左。“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22\]](#)

傅斯年肯定清代的学问相对高明，在观念转变后仍将两宋与明清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实学兴盛的时期，还依稀可见影子。推崇宋代学问，甚至将宋代置于清代之上，则是出国以后的转折变化。而变化的原因，很难说来自读书和修课，最大的可能，还是与陈寅恪每周数次的交谈。尽管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所读旧籍已经优于胡适，观念上却难免为新思潮的片面所局限，简单地以中西新旧为判断。留德期间与陈寅恪的交往聚谈，使得熟悉经典的傅斯年幡然猛醒，能够豁然贯通材料史事，功力见识迅速提升。所以后来顾颉刚擅自将可能包含陈寅恪见解的傅斯年来函公开发表，让后者多少有些尴尬。

1929年9月，傅斯年就商议修宋史之事专门回复陈寅恪的来函。此事当由傅斯年提议，而得到陈寅恪的正面响应，傅斯年对此喜出望外，进而表示：

此事兄有如许兴趣，至可喜也。此事进行，有两路：一、专此为聘一人，二、由兄领之。弟觉专聘一人，实难其选。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朱逖先、陈援庵亦留学生也），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然留学生之博闻，而又有志史学，而又有批评的意觉者，眇矣。算来算去，不过尔尔！故如吾兄领之而组织一队，有四处寻书者，有埋头看书者，有剪刀忙者……则五、六年后，已可成一长篇之材料簿录矣。此时无论研究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只要稍散漫，便须遍观各书，何如举而一齐看之乎？弟意，此一工作，当有不少之副产物，如全宋史〔诗〕（括诗词）、全宋笔记、全宋艺文志（或即为新宋史之一部）等，实一

快事！目下有三、四百元，一月，便可动手。若后来有钱有人，更可速进。如研究所地老天荒，仍可自己回家继续也。且此时弄此题，实为事半功倍，盖唐代史题每杂些外国东西，此时研究，非与洋人把[拖]泥带水不可；而明、清史料又浩如烟海。宋代史固是一个比较纯粹中国学问，而材料又已淘汰得不甚多矣。此可于十年之内成大功效，五年之内成小功效，三年之内有文章出来者也。此时吾等大可细想：一、如何收集材料，二、如何样之体例，三、如何组织此一staff。下月开会讨论之，如何？^[23]

修宋史的计划，在学界虽然发端较早，但此前只有刘咸炘、蒙文通等个别学人议论过重修宋史之事。据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戊辰三月二日，余至成都大学，晤友人盐亭蒙文通，商课事。文通忽谓余曰：‘学林中有一事，须君为之。君文出笔如史，又熟史学，宜以重修宋史为任。’余谢不敏，然心为之怦怦。越数日，晤宜宾唐迪风，复以促余。余念兹事太大，未易着手，余于宋事实不甚熟，弟子中亦尚未有能助我者，无已，则先以宋事诸大端多拈题目，与诸弟子合力辑论，如吾旧作《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之例，将来有数十篇，便足为史篇之底稿，如其能备规模，则谓之宋史略，如不能备，则谓之宋史别裁。”^[24]刘咸炘1926年写过《宋史学论》等文，专论宋代史学，但是并未认真考虑过重修宋史之事。所说既不甚熟悉宋代史事，又缺少可用的助手，应该不是谦辞。事出偶然，仓促上阵，成效自然不能理想。

如果照傅斯年与陈寅恪所议的办法、路径实行，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以及陈寅恪超卓不凡的见识功力，所获必多，不敢说独步天下，能与之抗衡甚至得为同道者也是屈指可数。即使刘咸炘等实施相同计划，照傅斯年的观念，因为并非留学生出身，仍在“无能为役”之列。然而，不无蹊跷的是，此事似乎并无下文，至少不见具体实行的蛛丝马迹。据1930年度《中研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研究员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为“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治、军事、典制收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25]。该文件原载《中央周报》第83、84期合刊，为新年增刊，于1930年1月1日出版。高平叔编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据此署期，则该项文件的制定应在1929年下半年。傅斯年与陈寅恪通信讨论宋史，很可能是制定该项文件时需要确定陈的下一步

研究计划，而陈寅恪虽然对修宋史表示“如许兴趣”，最终并未同意作为其近期研究工作的重点。

不仅如此，极为推重宋代学术文化、重视宋史的陈、傅二人，一生均很少直接下手于两宋史事。尤其是“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26]的陈寅恪，自魏晋迄明清，论著甚多，又考定蒙古源流，却从未撰写过主题为宋史、宋学乃至宋代学术文化的文字。此一现象，当事者本人（傅与陈）从无解释说明，后来学人亦罕有索解。其中玄奥，值得深究。

诚然，宋代史料较为繁杂，如陈寅恪所说：

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此为世人所共知，然亦谈何容易耶？盖天水一朝之史料，曾汇集于元修之宋史。自来所谓正史者，皆不能无所阙误，而宋史尤甚。若欲补其阙遗，正其伪误，必先精研本书，然后始有增订工事之可言。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更何论探索其根据，比较其同异，藉为改创之资乎？^[27]

即使熟读历代史籍的陈寅恪也感到读宋史并非轻而易举，则其难度可想而知。可是，相比而言，明清史料的繁杂犹在宋代百倍以上，陈寅恪以盲目瞶足之身，过了花甲之年尚且贾其余勇，研治明清之际的史事以检验自己和他人的学识功力，两相比较，宋史的材料再多，研读再难，也不至于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修宋史之事议而未决数年之后，陈寅恪因为评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论及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引发各学科学人的长期讨论争议。这一争论，表面看来不如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其他论争那样热闹非常，彼此指名道姓，拳脚相加，实则参与者多为高手，相互过招，依据事实，讲究学理，各具所见，牵扯极为广泛深入，又不动声色，不像二十世纪前半期一般学术论争那样，夹杂不少外行的臆见和意气的辩词。此事无形中将宋代研究的立足点提升到超乎寻常的高度，使得宋史、宋代学术文化研究与“宋学”（即宋代新儒家，并非清代用来指称理学、与汉学相对的宋学）渊源流变等几大要事相互牵

连。这些相互缠绕纠结的事情，无疑会影响到陈寅恪动手修宋史的兴趣和计划，一方面力图全面表述自己对于宋代的看法见解，另一方面则更加严谨慎重地处理相关问题，以免陷入不可置辩却不得不辩的境地。^[28]

尽管曲高和寡，陈寅恪显然并未因此改变自己推崇宋代学术文化的态度，以及对于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观念。

二 “宋学” 渊源

1932—1933年间，陈寅恪借着审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之机，概括阐述了自己对秦以来中国思想史渊源、脉络、枢纽的看法，即中国自秦以后思想的演变历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关于新儒学的产生与道教方面的关系，海内外新著或未曾涉及，或虽有论述仍多未能解决问题。尤其是“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陈寅恪进而提出：“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这显然是在指示另外一条与冯友兰用西洋哲学解朱子不同的研治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的取径。

关于儒家学说的本来面目以及佛道如何影响新儒学的历史进程，陈寅恪有着清晰的分别和阐释：伦理社会的古代中国，重视切身实际的人伦关系以及体现规范这些关系的制度法律，而不重形而上的玄想。这与宋以后以至今日国人的感受大相径庭。

宋明以来的虚玄冥想从何而来，陈寅恪的看法是来自道教以及道教所参酌的外来佛教。^[29]结合吴宓所记留美期间陈寅恪关于中西文化渊源流变、优劣长短的谈话，可见按照陈的看法，究明宋儒的心性之学，必须了解汉魏以来佛教性理之学由道教吸收融合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宋代思想学说能力大幅度提升，重要原因是融汇了佛教性理之学。而佛教的性理之学不易为占据主导地位、偏重政治社会制度的儒家所吸收，六朝以后思想上易于融贯吸收外来学说的道教，居间扮演了沟通联系的要角，所以凡新儒家之学说，多有道教，或与道教

有关的佛教为先导，由此成为新儒家开创之动机。道教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佛教摩尼教等外来思想，一方面不忘其本来民族地位，既融成新说，仍坚持以夷夏之论排斥外来教义。新儒家继承发扬这种相反相成的道教之真精神的遗业，于是得以大成。

据此，则新儒家其实是在通过道教尽量吸收输入外来学说思想之后，再以夷夏之论排斥外来教义。也就是前引与吴宓所说，中国本来缺少精粹学说，佛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程朱等宋儒皆深通佛教，既喜其义理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缺失，而忧其用夷变夏，遂采佛理精粹，以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与儒教宗传浸染混合。而这一吸收影响的历史因为宋儒避名居实、取珠还椟的苦心孤诣，变得模糊不清，难以捉摸。宋儒所谓来自孔孟，本系拉大旗之举，而海内外学人每每以为其真的是上承道统。这样的通行说法究竟是事实本相，还是为宋儒的障眼法所迷惑？不联系外来的佛教因缘，能否将先秦、两汉、唐宋的思想一脉相连？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因为陈寅恪的审查报告而提到同时代中国学人的面前。

陈寅恪的意见，关系中国中古思想发展变化尤其是新儒学产生的内外因缘，可谓中国中古思想史进程的一大关节，因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有识之士陆续参与讨论。

作为当事人的冯友兰，早于1932年5月，就在《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发表论文《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以韩愈极推尊孟子，以为得孔子正传，因缘孟子提出心性之学，由《原道》提出“道”与“道统”说；李翱则由《中庸》和《易辞》讲“性命之道”，于是认为“宋明新儒家之学之基础与轮廓，韩愈、李翱已为之确定”。韩愈谈心性，是因为孟子之学本有神秘主义倾向，“可认为可与佛学中所讨论，当时人所认为有兴趣之问题，作相当之解答，故于儒家典籍中，求与当时人所认为有兴趣之问题有关之书，《孟子》一书，实其选也”。同样，李翱讲性命之书，也是因为当时人普遍关心如何成佛，欲从儒家典籍中寻求解答，使人以中国的方法成中国的佛。其所说圣人为宗教的或神秘的。[\[30\]](#)

与陈寅恪的说法不同，冯友兰的解释着重于儒学对外来宗教发生作用的一面。他虽然以宋代为新儒学，但据其上一年在《清华周刊》第35卷第1期发表的《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认为中国哲

学史只可分为子学（孔子至淮南王）和经学（董仲舒至康有为）两期，理学家之经学，与今文家、古文家、清谈家、考据家、经世家一起，构成经学的六派。^[31]所以1934年《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一齐出版时，上册（原上卷）第一篇即由“上古哲学”改为“子学时代”，下册为第二篇“经学时代”。由此可见，在冯友兰看来，汉以后中国思想的变化都发生在经学系统之内，是经学自身的变化，动因与外缘无涉。

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认为宋代新儒学有三个思想来源：一是儒家本身的思想；二是佛家思想，以及经由禅宗的中介而来的道家思想；三是道教。三者的结合，可以“上溯到唐代的韩愈和李翱”^[32]。后来又坦承，《中国哲学史》这部著作有两大弱点，第一点就是“讲佛学失于肤浅”，因为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也不能讲透。^[33]在尊孔子和朱熹方面，他和陈寅恪立场接近，因而被胡适等人看成“正统派”^[34]。至于冯友兰是否接受陈寅恪的观点，或者说陈寅恪的审查报告提出的意见究竟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须进一步考究。

关于新儒学的来源，冯友兰虽然三者并列，仍是将儒家本身的思想放在首位，对佛道两家的影响作用，反而认为是在借助儒经以成佛方面。《三松堂自序》引述陈寅恪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意见就只有上册而不及下册，关于佛学部分，则有意只提林宰平的意见，这种回避的态度显然也是对陈寅恪审查报告的一种回应。也许在冯友兰看来，陈寅恪对下册的审查意见与张荫麟一样，是历史学者追究“谁是谁”的问题，与自己作为哲学学者着重于“什么是什么”截然不同。

冯友兰刻意避而不谈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意见，直接的原因大概是后者对于上册看似肯定较多，而对下册的异议与冯自己的看法出入较大，却又不易讨论，因而迟迟不能作答。实际上，冯友兰对于史家的哲学史质疑也不能置若罔闻，其态度从他与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文发生的瓜葛，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1936年夏，傅斯年公余开始撰写《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据称所究问题关系儒家性命说在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始悟之于民国二十二三年间”，恰好是陈寅恪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之际。其时傅斯年公务繁忙，又身在南京，并未关注到冯友兰的著作和

陈寅恪的审查报告，动笔时只是先后与同事丁声树、徐中舒谈及，反应不一。年余完稿，适逢抗战爆发，迁延至1938年才交付出版社。

《性命古训辨证》“以演化论之观点疏理自《论语》至于《荀子》古儒家之性说，则儒、墨之争，孟、荀之差，见其所以然矣。布列汉儒之说，以时为序，则程、朱性论非无因而至于前矣。夫思想家陈义多方，若丝之纷，然如明证其环境，罗列其因革，则有条不紊者见矣”^[35]。该书绪篇从先秦、汉代、宋儒梳理下来，试图探究心性之学的源流演变，进而对戴震、阮元之说加以辩驳。虽然注意到各时代诸说的异同，还是循着儒家思想自我演化的内在理路，形式上求其古，从发生演化顺下来，观念层面却暗藏着依照宋儒的自我塑造倒上去的潜在危险，或者说与宋儒的自我塑造相当合拍。

对于李翱的复性说，《性命古训辨证》本来只是根据前人成说标出其在孟子与陆王之间的历史位置，没有予以特别重视。该书出版后，学术界反应不一，陈垣、张政烺等赞誉有加，冯友兰读后，向傅斯年表示“前日问题仍未释”，希望“见面时再谈”^[36]。他一再希望深谈的问题，应当包括冯友兰自己的看法以及陈寅恪审查报告的观点。稍微大胆地推测，冯友兰对于陈寅恪关于其《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曲折表达的批评意见耿耿于怀，对于陈所提出的中古思想大事因缘一节相当留意，很想积极回应，只是尚未找到合适成熟的立论凭借。而傅斯年的新著显然为其旧说增添了论据，以致可以借由傅文代答，而不必亲自出面回应。

三年后，傅斯年专门写了《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的短文，发表于1943年1月的《读书通讯》第57期，后来又作为附录收入《性命古训辨证》，则三年前冯友兰与傅斯年会谈的议题之一，应与短文的内容不无关联，至少冯友兰会提示傅斯年注意陈寅恪在此问题上与之意见相左，使得傅斯年感到有必要加以申论。傅斯年与陈寅恪之间，论学很少出现这样观点截然不同的情形，所以一定相当在意。虽然此前两人未必针对彼此，可是此后却不无暗中过招的故意。傅斯年的文章虽短，但紧扣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论点论据的关键，而且数年之后才出手，无论是问题的把握还是论述的展开，看似没有具体针对，其实经过深思熟虑，指向明确。

傅斯年的文章，乍看与陈寅恪所说有几分相似，至少是相当缠绕纠结，实则立意完全相反。关于“新儒学起于中唐”一事，傅斯年特意声明“此说吾特别为一文论之”。可惜这篇计划内论新儒学发源的

专文始终未见，仅据其论李翱的这篇短文，可知与陈寅恪的看法大异其趣。尽管傅斯年只字未提陈寅恪、冯友兰等人文字纠葛的前因，文章的用意显然是针对陈寅恪之说而表示不同意见。

傅斯年认为，《复性书》三篇当中，上下两篇皆不杂禅学，中篇诸问则或杂或不杂。他虽然承认《复性书》中篇诸问颇杂禅学，看似与陈寅恪的看法相近，其实结论全然相反。在他看来，李翱并不是借由佛教的性理之学开启新儒学，而是因为重新发现了上古的心学和汉儒的性情善恶二元说。显然，傅斯年的看法与陈寅恪所说宋儒义理源于道教吸收融贯佛教性理之学适相对立。虽然傅斯年指名以宋儒及清代朴学家如戴震、阮元等为批评标靶，心目中直接的言说对象当是陈寅恪。^[37]他断言李翱学说与禅无关于儒有本，批评清代汉学家外，主要就是针对陈寅恪之前的相关说法。

按照傅斯年的意思，古代儒家原有心学一派，到了汉代，性情善恶二本已成习言，李翱的贡献在于认出古代心学之所在，所说未脱离古儒家；李翱虽然受时代影响甚至感化，并未变换儒家思想而为禅学，而且杂禅程度较浅。宋儒及清代朴学家误以为心性说来自佛教的性理之学，实际上反而是释家受儒家的影响更多。李翱所受时代影响，在中外之间应取较为接近的汉儒二元论，如果包含外来部分，则宁可说是受祆教景教摩尼而非佛教的影响。此说可谓将陈寅恪的避名居实、取珠还椐说釜底抽薪，如果新儒家不是通过道教吸收禅学，而是直接上溯先秦儒家的心学和汉儒的性情二元说，并转而影响佛教，就根本谈不上旧瓶装新酒。

可是，宋代新儒家及其唐代先行者，究竟是如陈寅恪所说，先受到佛教道教性理之说的影响，再上溯先秦两汉儒学的心性说，以外书比附内典，融成新儒学，然后据以辟佛，还是如傅斯年所论，鉴于时代风气人伦道丧，先从先秦儒学中认出心学一派，形成理学，用以抵御佛教，的确颇费思量。傅斯年的说法固然不难找到直接证据，但也容易落入宋儒故意布置的迷局，因为将义理说成是儒学一脉相承的正统，以免用夷变夏之嫌，恰恰是宋儒希望后人认定的结果。而陈寅恪的看法虽然曲折反复，不易获得直接证据，道理上却较为可信。人类历史上，必须借助外力才能突破精神桎梏的情况不止一端，欧洲中世纪思想就要借鉴儒学的天人合一才能突破神道一元观念的笼罩。同样，很少抽象思维的唐宋诸儒，如果没有佛道二教流行之下性理之学

盛行的时代风尚影响，将内典外书相互比附，大概也很难跳出思想局限，形成深究义理的思维方式。

陈寅恪以佛学为新儒学先导的看法，看似与“向来攻宋明诸师者，皆谓其阳儒阴释”，以及民国学人（如余嘉锡、钱穆等）讲宋学渊源，多追溯至唐末古文运动援佛入儒相仿，实则一为史事探究，一为道理判断。宋儒义理学说多源于唐，此前及同时学人多能言之，分歧在于源于儒经还是佛典，以及何者为体，何者为用。陈寅恪的审查报告引起不少学人重新探讨和争论新儒学的渊源。1936年3月，熊十力和张东荪联名发表《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于《文哲月刊》第1卷第6期，表达两人彼此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张东荪认为：“宋明儒实取佛家修养方法，而实行儒者入世之道。其内容为孔孟，其方法则系印度。”熊十力反驳道：“夫孔曰求己，曰默识。孟曰反身，曰思诚。宋明儒方法，皆根据于是。虽于佛家禅宗，有所参稽，要非于孔、孟无所本，而全由葱岭带来也。”^[38]

熊十力和张东荪的争论，多是讲道理而非究事实。二者的分别，不在于是否引经据典，而是如何证明。傅斯年动手撰写《性命古训辨证》，当与这样的语境不无关联。由探究事实来显示前人的道理，虽仍然难免各执一词，似乎回到起点的道理判断，其证明之法却与陈寅恪不无相通之处。

如果说傅斯年是误打误撞与陈寅恪发生分歧，蒙文通则是有心与陈寅恪的宋代新儒学渊源说立异。其着眼点与傅斯年或有不同，牵扯层面大为扩张繁复，取向和结论却大体相似相通。蒙文通1941年发表的《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虽然表示赞成陈寅恪所说“汉人经学，宋人史学，皆不可及”，并且“叩诸陈君援庵，余君嘉锡，皆以为然”，却刻意声称：“乃鄙意复又稍别者，以经学有西汉东汉之分，史学亦有北宋南宋之异。”^[39]不过，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固然，说他盛赞汉人经学，则或有所误会。从陈寅恪本人的文字中，不见有诸如此类的说法。即使依据蒙文通自己的记述，陈寅恪也并未亲口对他谈及两汉经学的孰轻孰重。如果由史学重北宋而推及经学重西汉，或以陈的说法过于笼统而细分，这样周折复杂的立异不免脱离或曲解陈的本意。

显而易见的倒是，在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发表并听陈谈过关于经学和宋代史学的看法后，从1935年起，蒙

文通陆续撰写和发表了《评〈学史散篇〉》、《文中子》、《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宋代史学》诸文，并借1938年任教四川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之机，撰写相关讲义。稍后他主持四川省图书馆，“由唐人论著中考论宋学之渊源”是该馆研究辅导部门的重要课题，“成一文曰唐代文士之内心及其影响。取材多由天宝、大历以来诸家文集与唐文粹、新唐书渗合而成”^[40]。

对于宋学渊源，蒙文通的基本看法是：“唐自中叶以后，赵匡、陆淳辈之于经，萧颖士、裴光庭、姚康复辈之于史，韩愈、柳宗元辈之于文，皆力矫隋唐，下开北宋，由天竺全盛之势力而力反求中国固有之文明，以究儒者之形而上学，此文化中一大关键也。”^[41]这时他还承认释道势力全盛的影响，是导致唐人反求中国固有文明，以究儒者形而上学的动因。但他的重点并不在于探究天竺全盛势力如何影响作用的一面，而是发现晚唐一批“异儒”借助诸子学以探求经学，由讲究心性义理而尊儒，佛老之焰因此而衰，并开启宋学的先河。

1949年，他又进一步概括道：“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42]其说一面强调异儒借由诸子直探经学，一面肯定秦汉至明清中国始终处于经学一脉相承的统治之下，完全回避佛道的作用，更不必说如何发生作用，这等于变相支持了傅斯年的观点。

越到后来，蒙文通越是少谈佛道的影响，而强调“异儒”的作用，凸显诸子学的复兴。他指晚唐一批学人：“由于他们的学风是摆脱旧说、直探经文，卑鄙训诂章句，大与传统学风不同，因此就被称为‘异儒’，而他们也就以此‘自名其学’。赞同者称颂为‘《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愈送卢仝诗），而不同意者，则斥为‘穿凿之学，徒为异同’（唐文宗语）……思想解放之风，于此大张。诸子之学盛行，孟轲、荀卿、扬雄、王通之书，渐见重于世，而研究儒家义理之学也就因之兴起。”^[43]

由此可见，在宋代新儒家思想渊源与儒释道关系的大事因缘问题上，民国学人虽然大都注意到来自天竺的佛教大盛于中土的事实，却罕有认可陈寅恪的看法，并进而加以论证者。除了前述张东荪主要由学理立论之说近似外，只有汤用彤所说“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其演

化，恐怕宋代学术也不会那个样子”^[44]，与陈寅恪的见解较为合拍。

尽管此时陈寅恪的视力严重减退，但对于宋学渊源的相关讨论尤其是《性命古训辨证》的论点，不可能一无所知。面对傅斯年进一步的声辩，陈寅恪要么表示接受，要么有所回应，而不能置若罔闻，因为无言也许会被理解为默认。果然，时隔5年后，陈寅恪于1954年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论韩愈》一文，改变了早年指韩愈为单纯辟佛的说法，进一步说明其对于新儒学发端的作用及因缘。^[45]所论与傅斯年、冯友兰等人所说的史事大体相同，可是断言韩愈以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奠定宋代新儒学的基础，显然是对傅斯年、熊十力、冯友兰、蒙文通等人认为唐宋诸儒祖述孟子心性之学，目的在于辟佛，甚至与禅无关于儒有本等等说法的正面回应。

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其一，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其二，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其三，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有无可能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发展改造为义理之学。

从《论韩愈》一文的基本论点可知，陈寅恪并没有因为傅斯年的驳论而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如果韩愈是受新禅宗的影响才转而正心诚意，如果正心诚意所本并非古儒家心学的旧义，而是禅宗道教吸收天竺佛理的新说，作为弟子李翱的复性论就很难说是与禅无关于儒有本。新儒学究竟是唐宋诸儒暗中取珠还椟，还是所自称的古今道统一贯，或者说，古今心性义理一脉相承是唐宋诸儒苦心孤诣的托词，还是新儒学创制的渊源，禅宗道教的性理之说不过有所影响而非所本，这一大事因缘究竟如何发生演化，迄今为止，仍是一桩尚无定论的历史悬案，有待来者进一步努力。^[46]

关于中古思想大事因缘的根本分歧，势必牵连整个宋代思想学术及宋史研究的看法。在这方面，傅斯年与陈寅恪虽然均对宋代高度评价，并对研究宋代高度期待，可是傅斯年认为宋代是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不像李唐与外国拖泥带水，而按照陈寅恪所论，宋代与外国或

外来思想的关系至为复杂，绝非单纯的“全汉”问题。而且外来学说看似隐而不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却至为深远，甚至已经达到外体中用的程度。由此一桩学术公案，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历史中的实事未必皆可得到直接的实证，而看似信而有征的未必属实；其二，中外文化关系史上，显的部分外露而表浅，隐的部分深刻而不易征实，不独中古思想的渊源流变如此，近代西学东渐乃至输入新知同样如此；其三，学者论学，直面史事学问以外，还以古往今来特定的学人为心中的言说对象，必须前后左右了解语境，方能坐实。此节于理解相关文本的本意至关重要，否则，直解文本不仅可能望文生义，还会强人以就我。

此后，关于宋代理学开山祖师及其思想渊源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讨论的主题和方向有所变化。张荫麟生前拟作《宋代思想的主潮和代表的思想家》，分为北宋四子、王荆公及其“新学”、朱陆与南宋道学三部分，可惜只发表了第一部分《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47]。1947年，胡适讲《宋代理学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司马光为理学开山，后来并指责冯友兰、陈寅恪等人强调从孔子到朱熹一脉，是所谓正统观念。^[48]不知有意抹杀还是并不清楚，胡适显然含混了冯友兰与陈寅恪等人的重大分歧。邓广铭则认为应以王安石为宋学开山，并说韩愈、李翱仍局限于儒家学派本身的领域之内，只是拘守着儒家旧有的思想壁垒，作为反对佛老的基地。王安石则把释道及诸子百家兼容并取，而仍以儒家的学说义理为本位。当然邓也不得不承认此说程朱肯定不会认账。^[49]

三 新宋学及其取径

1943年1月，远在桂林雁山别墅的陈寅恪为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其中提到：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50\]](#)

此一新宋学的说法，与敦煌学一样，引起自那时以来不少学人的遐想和议论。但究竟什么是陈寅恪心中的新宋学，与同时代人的新宋学有什么联系及分别，如何把握新宋学与当下学术研究的关系，如何使得自身的研究朝着新宋学显示的方向展开，大有检讨的余地。

陈寅恪所谓“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显然不是专指史学，而是包括新儒学在内的宋代一切思想学术。在关于宋学渊源的争议发生后，陈寅恪于1936年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开设“欧阳修”课程，其要旨为：“中国文化史，在秦以后，六朝与赵宋为两个兴隆时代，至今尚未超越宋代。本课程就欧阳修以讲宋学。所谓宋学，非与汉学相对之宋学，乃广义的宋学，包括诗文、史学、理学、经学、思想等等。所讲不专重词章，要讲全部宋学与今日之关系，而所据以发表意见之材料，不能不有所限制，故开本课，实为研究宋史第一步。”[\[51\]](#)

这是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陈寅恪专讲宋代的有限记录。据说课程结束时陈寅恪撰成《五代史记注》，“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52\]](#)，则所讲未必完全展现陈寅恪对于宋学宋史的全部看法，单从要旨看，大概可以窥见其基本观念。陈寅恪一如既往地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的高峰，宋学包括思想学术各方面，而且要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变化相联系。此外，其开讲专门课程是为研究宋史做开端，也就是说，至此陈寅恪已经有意落实先前与傅斯年商议的修宋史规划。这是考察陈寅恪学术变向的重要信息。如果没有抗战的爆发，宋史或宋代研究很可能成为陈寅恪治学的重要领域。

蒙文通认为中唐至宋代学术思想的变化为全面性的，包括新经学、新史学、新文学和新哲学，整个学术为之一变。除去后设的分科治学观念不无可议外，与陈寅恪的意思颇为相近。不过，在大体相似之下，两人的取径却相去甚远。陈寅恪推许邓广铭“他日新宋学之建

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具体举称则在两方面，即“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关于神思缜密，所说实事为，邓“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证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

关于志愿果毅，即抗战军兴，颠沛流离，“及南来后，同寓昆明青园学舍，而寅恪病榻呻吟，救死不暇，固难与之论学论史，但当时亦见先生甚为尘俗琐杂所困，疑其必馀余力，可以从事著述。殊不意其拨冗偷闲，竟成此篇”。陈寅恪以邓广铭与辛弃疾“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阳烟柳之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乡土踪迹，虽不异前贤，独佣书养亲，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历目睹，有所不乐者，辄以达观遣之。然则今日即有稼轩所感之事，岂必遽与稼轩当日之叹哉？”其承命作序，提携之外，别有良苦用心，即“惧其羁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轩之郁郁，因并论古今世变及功名学术之同异，以慰释之。庶几益得专一于校史之工事，而全书遂可早日写定欤？”^[53]

陈寅恪所标举邓广铭的治学，主要在考史校史一面，大体相当于同时代其他学人（如钱基博、张荫麟）所指的新汉学。本来所谓汉宋之学，并非汉代和宋代的学问，而是后来尤其是清代学人尊汉代与尊宋代之别，抑扬不同，做法各异，因而汉宋之分其实主要是清代学问的讲究。可是用汉宋分别来条理整个清代学问的渊源流变，却是晚清以来逐渐成形固定的看法，而不完全是清代学问流变的实事。钱穆对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站在汉学家的立场叙述清代学术史，相当不满，遂撰写同名著作，力图证明清代汉宋并非壁垒森严，而是彼此互见。

钱穆的本意不错，不以汉宋截然两分的眼光看清代学术，尤其是表明治学不应有门户之见，对于后学颇有启示引导作用，但在讲求清代学术的本事方面，则不免有抹杀汉宋分别之嫌。后来钱穆写《新亚学报·发刊词》，概括民国时期的学术纷争，仍然不能不承认：

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此两派，虽不见有坚明之壁垒与分野，而显然有此争议，则事实不可掩。[\[54\]](#)

同样道理，似不应否定清代确有汉宋之分及汉宋之争，只是未必如阮元以来不断编造的叙述谱系所呈现的状态。换言之，所有史事未必都是按照后来条理的汉宋分争的系统发生和演化。清代学术脉络中汉宋究竟如何展开，如何被讲出系统来，并被用于条理所有相关史事，进而被普遍当作先前的事实，应当重新仔细梳理。梁、钱二著以及所有相关著述皆只能视为后来认识的一家之言。重写汉宋分争的历史，应尽可能约束主观，不仅注意大的时代背景，以汉还汉，而且必须回到具体时空人的一切条件下，在本来的脉络之中顺时序探讨观念事物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发生及其演化。此说看似简单，随时随处高度自觉把握则甚难。

陈寅恪心目中的新宋学，显然并非清代汉宋分争之下宋学的翻版，而是宋代学术的复兴。宋代学术登上峰顶，环境因素与陈寅恪所处时代类似，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世局激荡，二是外缘薰习。在相似的环境之下，主观上要继承和发展宋人治学的取径办法，对于争取再度登顶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其一，应坚持“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其二，将史学作为新宋学的重要内容；其三，治史绝非仅仅实事求是的汉学家法，而要有宋代史学乃至新学全面贯通的义理关怀及眼界；其四，用宋代史学的长编考异法将“宋学”等思想领域的玄理还原为史事，以实证虚。也就是通过坐实征信、联系贯通的办法，显现宋学义理意境展开的历史进程。

1946年底，童书业在上海《益世报·文苑》发表《新汉学与新宋学》一文，论及五四运动后以文献考证学为主的新汉学独大，能够打破传统观念，为学问而学问，拓宽范围，尤其是完全接受旧宋学的批判精神，“对于传统的思想，旧史的传说，常能作勇猛无情的批

判”。只是因为“精神虽异而研究范围并无多大的两样”一点，所以不能脱离旧汉学的圈套。抗战爆发后，学术潮流发生变化，“由向外的考据学的研究渐次转移成向内的道理的探求”。这种“新宋学运动”的趋势，

是应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这是它与旧宋学不同之点。旧宋学是完全主观的、独断的，而新宋学则是客观的、批判的；旧宋学所发挥的是个人的玄想，而新宋学所发挥的则是依据科学的、发现的、相对的真理，和社会政治的实际情况产生的理论；旧宋学是宗教化的玄学，新宋学是科学化哲学或思想。[\[55\]](#)

所论与陈寅恪不尽相同，尤其是对于旧宋学的批评，合于清代的宋学，未必适用于宋代的学问，但力求辩证式沟通汉宋，以批判眼光做考据，以实证精神讲道理，取向却与陈有相通之处。

清代的宋学，主要是指经学系统内的理学，一般并不包括史学。陈寅恪对于宋代史学极为推崇，以宋代为中国学术文化高峰，史学是其中要项，新宋学当然不能沿用清代宋学的观念，将史学排除在外。尽管陈寅恪的博学并世不二，主要还是史家，只是其治史不同于一般，而是将一切过去之事均作为历史加以研究，或是用高明的治史方法研治各个时空范围的一切人事。所以，他心目中的新宋学，史学自然成为要角，也因为此，做考史校史的邓广铭，才会被视为建立新宋学最有功的一人，其工作才被当作建立新宋学的重要部分。

若用秦以后中国思想演变的大事因缘为纲领脉络，研治宋史之难，材料的繁复芜杂以及史事的校正考订应当还在其次，根本问题是要以宋代为中国历史的大关节，而不能仅以为数十朝兴衰存亡之一代。要通盘考察宋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历代学术文化高峰的渊源流变，就不能以后来史学的狭隘视野界域为局限。如果用断代分科的眼光办法研治宋史，将义理与考据、史料与史观分成两部，很难达到应有的高度。

汉宋之别，看起来类似欧洲的思想学术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所以近代学人如胡适等以为清代汉学近乎欧洲科学。宋学和今文

经学，偏于人文主义，而人文一面，看似虚悬，容易凿空逞臆，难以征信。钱基博评点民国前期的学术风气道：“近十年之国学，无他演变，大抵承前十年或前数百年之途径以为递禅。其新颖动人而为青年髦士之所津津乐道者，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学。而大师宿学，则或讲宋明理学，欲以矫清代治汉学者训诂琐细之失。其尤河汉无涯者，益侈陈三教会通，故为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海内之学者，具此而已矣。”^[56]又说：“‘人文主义’者，以为国学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而以名物考据为琐碎。此明其‘义’而遗乎‘数’者也。‘古典主义’者，以为国学之指趣，在考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而以仁义道德为空谭。此陈其‘数’而疏于‘义’者也。”^[57]

在学问上为钱基博所推崇的裘匡庐，进一步将中国学术拉向人本主义：

近人喜言以科学治学方法整理国学者，是殆未明吾东方固有之学术，其性质与今之所谓科学者迥别。研究科学及一切形质之学者，如积土为山，进一簣有一簣之功，作一日得一日之力，论其所得之高下浅深，可以计日课程而为之等第也。治心性义理之学者，如掘地觅泉，有掘数尺即得水者，有掘数丈始得水者，有掘百数十丈然后得水者，有掘百数十丈而终不得水者，有所掘深而得水多，亦有所掘深而得水反少者，有所掘浅而得水少，亦有所掘浅而得水反多者。而所得之水，又有清浊之分，甘苦之别，不能尅日计工，而衡其得水之多寡清浊也……盖学之偏于实者，其程效可以计功计日。学之偏于虚者，苟非实有所悟，则决无渐臻高深之望。语其成功，不闻用力之多寡，为时之久暂也。^[58]

中国学问，偏虚还是重实，各家看法不一，另当别论，钱、裘两人所强调的，都是义理之学的治法与考据不同，不可用科学眼光一概而论。张尔田曾致函王国维，告以：

读书得间，固为研究一切学问之初步，但适用于古文家故训之学，或无不合，适用于今文家义理之学，则恐有合有不合。何则？故训之学，可以目讎，可以即时示人以论据，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讎，或不能即时示人以证据故也……故弟尝谓：不通周秦诸子之学，不能治今文家言。虽然，此种方法，善用之则为益无方，不善用之亦流弊滋大。[\[59\]](#)

既然义理与考据的治法验证截然不同，各执一端似乎天经地义。可是，正如所谓人本与科学的分别一样，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的有规律运动本来是人与社会统一整体的不同体现，强分是由于人的能力有限，虽有方便之利，却是片面之见。

能否超越人本与科学的对立，或汉宋分争、义数隔绝的局限，不仅在人事、制度，甚至在义理层面也可以由求其古而致求其是，用实证精神讲道理，用义理关怀究实事，使得两方面相辅相成，这其实也是能否回复宋代学术本源的大问题，是解开清代以来考据与义理、史料与史观种种纠结的必由之路。连胡适等人也注意到，清学与宋代学问的渊源关系至深，义理与考据，都可以上溯朱熹。与裘匡庐等人的看法适相反对，陈寅恪认定中国文化的特性是根源于伦理政治，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所以欧洲尚有纯粹形而上的论理，中国则所有思想均可还原为有脉络可寻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注意具体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等因素的作用。

就沟通考据与义理而论，傅斯年和陈寅恪又有所分别，他们虽然都十分推崇宋代史学，具体取舍还是不尽相同。《通鉴考异》是两人共同标举的代表作。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称：“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60\]](#)对于《资治通鉴》，陈寅恪推崇备至，傅斯年则有所保留，认为《资治通鉴》、《五代史》、《新唐书》等，虽然于《春秋》的正统思想有莫大的解放，仍不能廓清主观成分。至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人分歧较大，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称：

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由今思之，傥非其书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61\]](#)

而傅斯年则指是书所记“多有怪事，如记李易安之改嫁，辛稼轩之献谏”[\[62\]](#)，并以此作为远人的记载比不上近人记载可靠的典型事例。本来傅斯年也认为“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得越整齐越糟……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取材芜杂紊乱而颇为史家诟病的《晋书》、《宋史》，因为“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谓最好”。而一般认为最能锻炼的《新五代史》、《明史》，在傅斯年看来，因材料原来的面目被改变，反而糟了。[\[63\]](#)而且他也不乏任何类型的材料可信度都是相对而言的自觉，可是一旦落到实处，傅斯年还是不免材料类型的成见，不能一视同仁，过信直笔，轻视曲隐。

由此可见，前人著述所含义理及感悟的成分越多，陈、傅二人评议的歧见就越是明显。可是，这并不等于说陈寅恪好谈玄理，相反，他始终思索整合融贯义数分别的破解之道。在研治佛道经典方面，自谦只谈史事不言教义的陈寅恪[\[64\]](#)，反复提示宋贤治史与天竺诂经之法的分别及联系。对于上古思想，他虽然声言不敢治经和不能读先秦之书，却敏锐地指出应如何凭借少数遗存的残余断片，对古人学说的全部结构具了解之同情，又避免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以自身的时代环境学说，推测解释古人意志，从而陷入“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65\]](#)的尴尬。

在为友人所写的若干序跋中，陈寅恪表达了相当明确的意见，从中可以揣摩领悟其对于研经治史的理念。其中颇为关键的就是治先秦子史之学，不能改订旧文，多任己意，随心所欲地加以补正，成为自己胸中独具之古本。^[66]陈寅恪所评点的著作价值究竟如何，学界看法各异。陈寅恪借由文本的校勘，申论学人研究历史，既要设法理解古人著述的本意，又要防止用后来的己意妄加揣度，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乃至一般文史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对于时下的学风尤具针砭作用。治史不在发表对于历史人事的意见，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约束自己的主观任意，理解揭示史事的本相与前人的本意。只是本相绝非就事论事可得，本意更不是望文生义可知。前者必须近真而得其头绪，后者更要深入内心世界，了解同情。二者都不会直接显露，或者说不可能从单个角度全面展示，要想把握得当，尽可能接近，离不开前后左右比较所有相关史料，进而贯通史事。

关于如何理解古人思想学说的本意，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借鉴欧洲尤其是法、德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献学的成熟技术，提出并运用语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相配合的方法^[67]，求其古以求其是^[68]。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求其古”，或者说如何才能避免自以为在“求其古”，实际上却仍然“求其是”。要想理解古人的微言大义，恰当的途径显然并不是由神游冥想的方式达到了解同情的程度。

在这方面，杨树达所作《论语疏证》提供了典范。1948年陈寅恪为该书作序，特意指出其治经之法，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杨氏新法于中国历代治学方法颇有渊源，也有所发展变化。^[69]所谓形似而实不同，主要是指佛藏与儒经分别面向出世与世间，合本子注重神话物语以究佛说，长编考异则由人间事实而解经义。单就形式和方法而言，二者可谓异曲同工。长编考异法在历史上很可能受到合本子注的影响。

所谓“合本”，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其具体程序做法，则如敏度法师《合维摩诘经序》所说：

此三贤者（支恭明法护叔兰），并博综稽古，研机极玄，殊方异音，兼通关解，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途非一。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按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则易知矣。若能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于均致。若其配不相畴，傥失其类者，俟后明哲君子刊之从正。

在陈寅恪看来，其方法之精审美备，“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70]。而用由合本子注演变而来的长编考异法研治儒家经典，以事实证言论，以文本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可以究明圣言本意。

善用长编考异之术，对于研究讲世间法的古儒家尤为重要，因为历史不可重复，只会演化，由实事求是的比较以见异，可以寻绎因时空人事改变而发生的衍化，贯通无限延伸的事实联系，达到由征实而理解前贤本意的目的。不过，受到佛教影响的宋代新儒家好讲义理，是否仍然适用长编考异之法，如童书业所说，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考究宋儒的讲道理，还有进一步的讲究。

历史上中外不同思想的混合除“合本”之外，还有“格义”，即晋世僧徒之间以内典与外书互相比附的具体方法。^[71]从比较研究的角度，陈寅恪曾经痛批“格义”是附会中外学说。^[72]但他并非全然否定格义的积极作用，对于用格义方式努力调适沟通儒释关系的六朝僧徒以及援儒入释的理学评价极高，认为宋代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历史文化的顶峰，与此关系密切。用格义之法吸收异教，阐明古学，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或可继宋代之后，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进一步丰富提升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思维能力。理解古学，必需长编考异的实事求是；面向未来，还要格义融通的求珠还椟，如此才能再创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新高。

尤有进者，长编考异法对于理解义理之学的本意仍然有效，因为宋儒的思维论说方式深受中国习惯的制约，在因由、实事以及言说对象等方面，仍有具体，并非完全抽象。所说义理看似脱离实事，实则格物致知，未必虚玄，谈心说性，也与济世安民相辅相成。既为世间法，还是可以实事求是。只不过实事与本意必须相互参证折衷，才能不断接近，理解把握。

四 南北宋的高下

陈寅恪的新宋学及其以宋代史学方法治史的主张，能够理解并做到者为数不多，自然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即使有也是心或非之而口不言。蒙文通是有心立异者之一，除前引两条记载外，1944年暑期，蒙文通撰《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再次提出“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的分歧：“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之言者于此未尽同也。近三百年来，宗汉学为多，虽专主西京其事稍晚，然榛途既启，义亦渐明。惟三百年间治史者鲜，今兹言史者虽稍众，然能恪宗两宋以为轨范者，殆不可数数觐，而况于南宋之统绪哉！”^[73]

有学人认为，蒙文通重申“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似在回应陈寅恪所倡导的尊奉北宋司马光之史学的“新宋学”。其实，关于经学的西汉东汉之别，蒙文通或是有所误会，或是故作别解，从迄今所见的相关文献中，似不见陈寅恪特别推崇汉代经学的旁证（《白虎通义》仅指纲纪）。而关于整个宋代学术，陈寅恪所推崇的朱熹也在南宋之列，只有史学着重于北宋司马光，但也并未轻视否定南宋。蒙文通在史学方面的立异又有两重讲究，一是经学与史学，二是北宋与南宋，这两方面彼此牵连。

近代蜀人治宋史，当以刘咸炘为先，他鉴于“近日美风弥漫，人崇功利，其弊大著”，在蒙文通等人的催促下，计划复宋学、修宋史。^[74]近代学人如梁启超、孟森、傅斯年等推崇宋代史学，多尊北宋，至于为何尊以及尊什么，各有分别。刘咸炘则称：“北宋史家，成欧阳永叔、宋祁子京、司马光君实，三人著史皆有所长，然于史学皆无所论说。”^[75]并认为：“编年本止账簿之本相，记注之初型，

纵加变化，要不能免于方直，如《资治通鉴》虽有铨裁，亦不过为政治史之简本，无多味也。”^[76]后来蒙文通兼治宋史及其治法取径，颇受刘咸炘的影响，强调：“宋之为宋，学术文章，正足见其立国精神之所在，故于宋史首应研学术，则知宋之所以存，次制度，则知宋之所以败。”^[77]主张治宋史当先明宋学，通宋学才能治宋史。

蒙文通特尊南宋史学，固然与刘咸炘密切相关。据他自称：“双江刘鉴泉言学宗章实斋，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谈两宋史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余与鉴泉游且十年，颇接其议论。及寓解梁，始究心于《右书》、《史学述林》诸篇，悉其宏卓，益深景慕。惜鉴泉于是时已归道山，不得与上下其论也。后寓北平，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并于一途也。”^[78]

不过，仔细推敲蒙文通的叙述，其治史有意与时流异趣，除了刘咸炘的影响外，另有机缘用心。

蒙文通敦促刘咸炘重修宋史之时，对于宋代学术史事尚未深究。蒙文通后来说，自己听陈寅恪详论汉人经学宋人史学后表示：“而余意则不与同，以汉人经学当以西汉为尤高，宋人史学则以南宋为尤精，所谓经今文学、浙东史学是也。当时虽尚未有撰述，实早已成熟于胸臆中矣。”^[79]此前蒙文通固然有所留意于宋史和宋学，但要说早就胸有成竹，稍嫌言过其实。其自称寓北平时才集中阅读南渡诸家之书，由是懊悔原来治学无宗统、无史学，即为明证。

不无巧合，在陈寅恪、冯友兰等人关于宋代新儒家渊源的讨论展开之后，1935年，蒙文通利用暑假，在北平“略读东莱、水心、龙川、止斋诸家书，欲以窥宋人史学所谓浙东云者”。探赜索隐的结果，由此治史稍知归宿，与人异趣。在他看来，“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治于一炉者也”。而“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衰而史学亦衰……六代精于史体，勤于作史；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六朝人往往不能作志，为之者亦勤于缀拾而短

于推论。宋人则长于观变而求其升降隆污之几”。因此，“子长、子玄、永叔、君实、渔仲，誉者或嫌稍过，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业而观其先后消息之故，不乐为一二人作注脚也”。此言显然是针对陈寅恪的看法而发。^[80]由此看来，陈寅恪、冯友兰等人关于宋学渊源的讨论才是蒙文通重点关注宋代的重要契机，而推重南宋，既与蒙文通的学承相连，又与其有心立异有关。

蒙文通所著《中国史学史》，肯定《资治通鉴》的“长编之法，今昔所推。所以搜罗放佚，考正异同，其事之巨且伟也”。同时特别强调：“南渡之学，以女嫔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故足以抗衡朱氏。而一发枢机，系于吕氏。以北宋学脉应有其流，而南宋应有其源也。北宋之学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则制度几为学术之中心。”^[81]他沿袭元代黄潜的看法，将南宋浙东之学依来源和趋向分为义理、经制和事功三派六家，“惟浙东之学，以制度为大宗，言内圣不废外王，坐言则可起行，斯其所以学独至而无弊”。南宋浙东诸儒，“言史必以制度为重心”，相比之下，北宋史家略逊一筹。“盖治法密于唐，自北宋人视之，若谓徒法之不如徒善，故北宋史人皆高谈性道，不识治法，虽激论变法，而北宋究无能论法者”，所以“北宋言史而史以隘，专主人治而遗史之全体。是北宋之言史专于理道之旨义每狭而浅，未若南宋之广且深矣”^[82]。据此，他认为：“南渡之究史者众矣，而实以三派六家为最卓。其与北宋异者，自欧阳、司马之俦论史不言制度，而南宋诸家则治人与治法兼包，义理与事功并举；班、荀以降，治史固未有忽于典制数度者也。”^[83]

蒙文通既然于两宋史学以史识、推论为高，好义理，重制度，又对北宋司马光等人不法《春秋》寓褒贬，略法制而偏重人治（因恶王安石而强调在得人不在法）不以为然^[84]，尊南宋自然是顺理成章。这样的看法是否合乎两宋史学的分别，抑或其有心与尊北宋史学的陈寅恪立异而不免看朱成碧，可以检讨。不过，其所认定的北宋史学与陈寅恪所表彰的显然绝非一事。

陈寅恪好借序跋评论他人著述时阐述发挥自己的方法见识，尽管所论对象未必完全符合其心中理想。所以，将相关议论视为陈寅恪自己的思想表达则可，若以为所评著述的固有价值，则或许有所出入。同样，陈寅恪表彰古人治学方法如合本子注、长编考异之类，也有宋儒求珠还椟之意，本来已经超越，却要借此说话。此非依傍积习，而

是针对学界多以东欧北美为取向的时势，表达其对于固有学术文化的敬意，力求重振、延续并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内在活力。

陈寅恪看重北宋史学，显然并非由于北宋史家不讲义理，忽视制度。就义理而言，他推崇南宋的朱熹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便是明证。就制度而论，陈寅恪关于隋唐制度及其渊源的著述，不仅是其代表作，而且已成经典。至于如何讲义理制度，却大有讲究。陈寅恪与傅斯年之所以重视北宋史家的长编考异之法，是受了近代欧洲新史学的影响。在傅斯年看来，“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85]。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傅斯年断言：“综之，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86]陈寅恪甚至表示，“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不必过于讲究文章风格技巧。^[87]

蒙文通虽然指名陈寅恪，所谈论的对象却更像是傅斯年。实际上傅斯年与蒙文通之间的分歧更为直接明显。蒙文通遭北京大学历史系解聘，背后起主导作用者至少包括傅斯年，而且傅斯年明确说尽管北宋史学已远超前代，可惜南渡后无甚进展，以致元明时生息奄奄。^[88]所以蒙文通将傅斯年视为清代汉学考订文籍一派的余绪。不过，傅斯年强调有一份材料出一分货，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意涵，并非一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所谓近代史学为史料编辑之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二是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而由事实之经验。所以，史料编辑之学，并不是仅仅简单机械地将史料罗列在一起。史学就是史料学的重要体现，在于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认识整理史料之于研究历史的作用。具体而言，“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而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89]。

傅斯年强调运用比较方法整理史料，更值得深思的还在以下两点，即：“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90]近

真与头绪，既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两个层次，又是比较不同史料所能达到的两个目的。这一论述揭示如何通过历史记录接近历史事实的路径做法，以及如何寻求看似散乱的历史事实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两大命题，深得史学研究之真味。近真包含不断通过各种不同的记录接近本事即第一历史，以及了解当事人所记各异的心路历程即第二历史，并将二者相互比较参证；得其头绪更使得无数纷繁现象背后的相互联系逐渐显现，有序连接，无限伸展。即使精神思想史，看似有求其是与求其古的分别，实则由求其古而至求其是，使之相辅相成，可以让史料与史学复归一体。

史学当然不仅是史料，但史学绝不能没有史料。治史无疑必须具有见识，可是见识的高下须有经过验证的凭借依据。史学需要义理，而义理不能是无法验证的玄学。凡此种种，都必须求证，不仅实事求是，信而有征，更要虚实互证，而不能师心自用地自以为是。就此而论，蒙文通虽然推许南宋的兼包并举，对于同时代学人还是不免门户之见，尚不能洞穿门户，以致兼通。其坚持难以证实目验的今文家言，与陈寅恪将史学做到如生物学地质学那样准确的追求不无分歧。只是陈、蒙二人的分别或许并不如蒙所自称，反倒是钱锺书指陈寅恪讲宋学，做汉学，虽不无讥讽之意，却能体现陈的治学态度和办法。陈寅恪的中古制度研究，注意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的分别和相互作用，与杨树达《论语疏证》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蒙文通强分轩轻的南北宋，在陈寅恪看来也是可以熔为一炉，不必刻意划分此疆彼界，并且褒贬抑扬的。

要以长编考异、合本子注法求出义理的本意及演化，并在实证连缀中显示背后的宏大关怀，方能合于本事，体现高明。达到这样的境界，则考史与史学相辅相成，史料与史观互为表里，而义理、制度本来就是浑然一体，无法割裂对立。心中不分，自然眼中无间。当然，要随时随处保持高度自觉，绝非轻而易举。

号称治学着重中古一段且十分推崇宋代史学的陈寅恪，虽然很少直接着手撰写宋史，实则以宋为制高点，为天平中心，为治整个中国历史的承担，而不以赵宋一朝为断代，不以史学为专门，所以治学能够据有宋代学术文艺的高度，否则不仅不能理解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治宋史也难以达到应有的境界。由此可以总结如下：其一，要把握宋史、宋学、宋代史学、宋代思想学术的区别与联系，不宜用后来分科治学的眼光看待宋代历史及其思想学术文化，尤其不能用近代以

来区分经史以及史料与史观的观念研究宋代。其二，应讲宋学，做汉学，此宋学即陈寅恪所谓新宋学，而非清代汉宋分争的宋学。一方面，如钱穆所说，治宋史必须通宋学，如治国史必须通知本国文化精意，而此事必于研精学术思想入门^[91]，不以专家饬订之学画地为牢；另一方面，在宏大关怀之下，将包括义理等在内的一切虚玄思想还原为历史，巧妙地发明曲隐，加以征实，既有道理，又可目验。其三，以宋代为张目挈领之纲，将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纵横贯通，解释材料史事既具有系统又不涉比附。如此，方可有望达到新宋学的高度意境，开创中国学术文化的崭新气象。

^[1] 王水照：《陈寅恪先生宋代观之我见》，《中国文化》第17—18期，2001年3月；侯宏堂：《陈寅恪对“宋学”的现代诠释》，《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迄今为止，学人间讨论相关史事，大都笼统而谈，未免混淆宋史、宋代史学、宋学、宋代思想文化的联系与分别，且少注意当事各人的歧义。

^[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44页。

^[4]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82页。

^[5] 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2页。

^[6]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0页。

^[7] 蒙文通：《四库珍本十先生舆论读后记》，《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1941年6月。

^[8]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4页。是条笔记写于1950年代，原文误为“1944年”，张凯订正为1934年（见张凯《“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民国学界》，中山大学历史系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五章第三节之一“‘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蒙文通与陈寅恪之交涉”）。这两段的相关史料，张凯多已述及。此处着重于各人的分别。

^[9] 李源澄：《经学通论》，成都：路明书店1944年，第26—27页。

^[10] 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1] 严复：《与熊纯如书》（1917年4月26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8页。

^[12] 王国维：《论性》、《释理》、《宋代之金石学》，《静庵文集》第1—24页，《静庵文集续编》第70—73页。引自《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

^[13]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82页。

^[14] 参见李锦秀：《圣籍神皋寄所思（代序）——读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王永兴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4—13页。

^[15]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2页。

^[16] 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30页。

- [17]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146—147页。
- [18]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152页。
- [1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4页。
- [20] 傅斯年：《1931年4月20日致王献唐》，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100—101页。
- [21] 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227—231页。
- [22]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27—231页。
- [23] 《傅斯年致陈寅恪》（1929年9月9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227页。
- [24] 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第591—592页。
- [25] 蔡元培：《“中研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371页。
- [26]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页。
- [27]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
- [28]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66页。
- [2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285页。
- [30] 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2—254页。
- [31] 冯友兰：《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226页。参见蔡仲德著：《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6、136页。
- [32] 冯友兰著，赵复三译：《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 [3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 [3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353页。
- [35]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2—509页。
- [36] 王汎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印行，第107页。
- [37] 傅斯年：《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664—666页。
- [38] 熊十力、张东荪：《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文哲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3月。
- [39] 蒙文通：《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1941年6月。
- [40] 《四川省立图书馆工作报告表》，1946年4月，参见张凯：《“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民国学界》，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五章第三节之二“宋学渊源：‘内’、‘外’之别”。

[41] 蒙文通：《文中子》，《益世报·读书周刊》第9期，1935年8月1日。

[42] 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经学抉原》，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43] 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节录）》，《中国史学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192页。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

[44] 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图书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月。

[45] 陈寅恪：《论韩愈》，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19—322页。

[46] 此事长久思考，苦无破解之道。后承葛兆光教授赠送大作《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首篇《青铜鼎与错金壶——道教语词在中晚唐诗歌中的使用》，论唐代诸儒赋诗受道教影响，对于佐证陈寅恪的说法或有无心插柳的作用，开辟征实的可行路径。只是以诗证史不易把握，如陈寅恪和蒙文通均注意到“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的诗句，并且认作新的治经途径，但对史事如何发生的解读却相去甚远。

[47] 张荫麟：《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思想与时代》第27期，1943年10月。

[48] 胡适所指的正统派观点为：必须以孔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开端，“上继往圣，下开来学”；秦以后则为经学时代，其思想演变历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并且认为冯友兰没有明说，而陈寅恪的下册审查报告说得比冯清楚。（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353页）

[49]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7—192页。

[50]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

[51]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69页。

[52] 陈寅恪：《致刘永济》四，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45页。

[53]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278页。

[54] 《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

[55] 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77—780页。

[56] 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9、10期合刊，1935年6月，第110页。

[57] 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0页。

[58] 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9、10期合刊，1935年6月，第123—124页。

[59] 张尔田：《与王静安论今文学家书》，《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文苑·文录”，第3—4页。

[60]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308—309页。

[61] 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4页。

[62]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339—340页。

[63]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340页。

[64] 陈寅恪：《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0页。

[6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页。

[66] 均见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258页。

[67]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8页。

[6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7页。

[69]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2—263页。

[70] 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81—185页。

[71] 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67—185页。

[72]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73] 蒙文通：《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中国史学史》，第161页。

[74] 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第592—596页。

[75] 刘咸炘：《宋史学论》，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第515页。

[76] 刘咸炘：《史体论》，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第369—370页。

[77] 蒙文通：《宋史叙言》，《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398页。

[78] 蒙文通：《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中国史学史》，第161页。

[79]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第44页。

[80] 蒙文通：《致柳翼谋（诒徵）先生书》（1935年9月），《中国史学史》，第126—128页。

[81] 蒙文通：《孙甫与司马光》、《南渡女嫠史学源流与三派》，《中国史学史》，第78—82页。

[82] 蒙文通：《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1941年6月。

[83] 蒙文通：《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中国史学史》，第161页。

[84] 蒙文通：《跋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中国史学史》，第138页。

[85]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3页。

[86]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156页。

[87] 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第422页。

[88]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152页。

[89]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308页。

[90]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308页。

[91] 钱穆：《1941年4月16日致李埏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79页。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1930年代，陈寅恪先后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撰写审查报告，不仅助成其出版，有利于提升该书的学术地位以及冯友兰的学术声望，同时两篇审查报告本身也成为近代学术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思想，因而吸引后来学人的不断解读。人们一方面努力读懂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评价的真意，以确定冯著在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定位；另一方面，则试图从中找出陈寅恪自己治史方法的恰当表述，以便悬为高的，追摹仿效。不过，仔细研读陈寅恪的文字，重审已有的各种议论，总觉得或有所出入，或言犹未尽，不尽当意。深究陈寅恪对冯著的看法，所重仍在探测陈寅恪本人的史法。只是陈的心思细密，上述相互关联的两方面本意，不易从各种文献记载的字面直接解读出来，理想取径，还是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借重陈寅恪的办法，考察其本人的言行，或许能至虽不中亦不远的境界。至于外行以为作古之人，无法复验，实不知史学的奥妙所在，很难心领神会，并不在本文言说的对象之内。

一 取西洋哲学观念

要想通过陈寅恪的审查报告探究其治学方法，前提当然是理解审查报告对于冯友兰著作的真实看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相继出版于1931和1934年，陈寅恪受清华大学出版委员会之托，先后对两书进行审查并撰写了审查报告，上册的审查报告还于1931年3月先期发表于《学衡》杂志第74期。两书的审查均获得通过，予以出版。虽然另外还有其他审查人，陈寅恪的意见无疑至关重要。而且，从制度上看，清华大学出版委员会只有在所有审查人意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能通过报审著作。其间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完稿，经顾颉

刚介绍，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即因列席审查者三人意见分歧，未获通过。^[1]由此可见，冯著能够出版，至少须陈寅恪口头表态赞成，或是审查委员会从陈的书面报告中接收到正面的信息。

依照规定，陈寅恪在两篇审查报告的开头，即分别明确表示肯定，并同意出版。前一篇说：“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2]后一篇进而申述：“此书上册寅恪曾任审查，认为取材精审，持论正确。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所好。今此书继续完成，体例宗旨，仍复与前册一贯。允宜速行刊布，以满足已读前册者之希望，而使清华丛书中得一美备之著作。”^[3]

据此断定陈寅恪完全赞同冯友兰该著述的观点及做法，应是学人从审查报告中索解陈寅恪本人治学方法的重要理据。只是这样的判断似嫌过于简单，未必符合陈的本意。有学人已经注意到，两篇审查报告的褒贬不尽相同，下篇的批评意向尤其明显。十几年前本人撰文论述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有如下意见：

陈寅恪对大约同时送审并获得通过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不无微辞。叶公超宴会上，他于表彰未获通过的钱著的同时，“又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4]。这显然针对冯著下册而言。细读其审查报告，上册褒意明显，而下册贬辞时现。虽称下册“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实则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陈认为秦以后思想演变“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而冯著于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在，而且为数不少，相当关键，则下册出版，与上册相较，于中国哲学史的形式备则备矣，内容却未必美。况且这种“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的做法，是否真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还要看其“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如何。就此而论，冯著恐怕有偏于今之嫌，与陈寅恪的见解不相啮衄，难逃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之讥。^[5]

这些褒贬之意，仔细阅读审查报告，可以从字里行间琢磨体会出来。陈寅恪在下册审查报告开始明确表示同意出版之后，紧接着说：“寅恪于审查此书之余，并略述所感，以求教正。”他认为：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近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

这些话看似仍在称许书的作者，可是笔锋一转，陈寅恪提出：

然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自来述之者，皆无惬意之作。近日常盘大定推论儒道之关系，所说甚繁（东洋文库本），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之追补者也。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四七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

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者之玄风者也。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6\]](#)

陈寅恪陈述所见的这一大段话，虽然自谦新瓶装旧酒，其实是在相辅相成的两大问题上表明态度观念，不仅与冯著立异，尤其与时流有别，相当关键。相对于冯著，可谓批评商榷，相对于时流，可谓纲领宣言。这两大问题，一是中国自秦以来思想演变历程的大事因缘，二是对待外来学说的立场态度。

陈寅恪认为中国秦以来思想演变历程的大事因缘，即为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这一被胡适指为正统观的意见，体现着陈寅恪对中国历史文化全面而深刻的观察，尤其是以宋代为中心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峰期，究竟应该如何探究、理解和呈现。要想体察陈寅恪审查报告的本意，除完整细读报告文本之外，还须与其他记述多方参证比勘，了解其何以要如此说，以免看似直入文本，实则但凭己意，妄加揣度。

其实，陈寅恪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这一套观念，由来已久。早在留美期间，他就曾对吴宓详细阐述。[\[7\]](#)所论对于理解冯著下册审查报告的意思，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陈寅恪对宋代的思想学术文艺，情有独钟，估价极高，并对“新宋学”抱有殷切期待。但其一生治学，上自魏晋，下迄明清，唯独宋代几乎没有直接下手。今日治宋史，多以分科训练、断代眼光，将宋代仅仅视为历朝历代之一部分，进而局限于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如果背后全然没有“讲宋学”的关怀和境界，则所治宋史，充其量不过廿四史之一节，很难显示宋代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高峰地位及其内涵，对于宋代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理解把握，也就难以得其所哉。而要达到陈寅恪心中的“新宋学”那样的高度，必须超越近代以来分科断代的局限，尤其是分门别类的专题研

究的狭隘，沟通古今中外的所有相关知识系统，将秦以后思想演变的大事因缘条理贯通，这对学人的智慧功力无疑是巨大考验。

历史研究，无疑都是后人看前事，用后来观念观照解释历史上的文本史事，无可奈何，难以避免。但要防止先入为主的成见，尽量约束主观，以免强古人以就我。如何把握1931年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时陈寅恪所提出的准则——“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8]，至关重要，难度极高。这不仅因为后人所处时代、环境及其所得知识，与历史人物迥异，而且由于这些知识经过历来学人的不断变换强化，很难分清后来认识与历史本事的分界究竟何在。近代以来，中西新旧，乾坤颠倒，体用关系，用夷变夏，已成大势所趋。陈寅恪称冯著下册“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而这些发明，实际上是“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虽然陈寅恪称许“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实则对于用域外系统条理本国材料，一直有所保留。

1933年4月，浦江清曾对朱自清谈及：“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向架论之，即当抹杀矣。”^[9]这多少反映了陈寅恪的看法。只是无所谓优劣，其实还是有所分别。陈寅恪曾批评新派的文化史“失之诬”，因为“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10]。

即使不得已而借鉴域外间架，也有相对而言适当与否的分别。1937年，陈寅恪与吴宓谈及：“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以Bergson（亨利·柏格森）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则以印度之烦琐哲学解佛学，如欧洲中世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经院哲学），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所说尤为正途确解也。”^[11]陈寅恪痛批《马氏文通》用印欧语系的文法施诸汉藏语系的中国语文，而主张用同系语文比较研究得一定的通则规律，道理亦在于此。^[12]

相比之下，冯友兰恐怕还不是用朱熹的态度办法，虽然他或许有此心；距离陈寅恪所主张的比较研究也相当遥远，而不免格义附会。1928年张荫麟指近今治中国思想史的通病，就是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13]这的确点到用后来域外观念系统解释中国古

代固有思想学说事物的要害，而与陈寅恪所说大抵相通。所以陈在论述新儒家之产生及其传衍后，着重强调：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在陈寅恪所处的时代，这样的主张显然不合时流。时至今日，在与国际接轨对话等等时髦导向下，用外国模型治中国学问，愈演愈烈，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似乎不如此则不入流，实际则演变成以负贩为创新、甚至不过搬弄连自己也不明所以的名词概念的恶习。尽管如此削足适履，太阿倒持，挟洋自重，若以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所说，“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此一说法为准则尺度^[14]，检验包括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内的一切中国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能够经受检验的恐怕为数不多。

此外，1926年，本来对学哲学抱有很大兴趣的傅斯年，向昔日的老师、打算重写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胡适直言不讳地表达不同意见，声称自己将来可能写“中国古代思想集叙”。^[15]在他看来，中国历代分别有方术、玄学、佛学、理学的历史，没有一以贯之的哲学史，各史均须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联系之中，而不能抽离某些元素加入其他时期的同类史。

傅斯年针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弊病而发的议论，与陈寅恪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批评立意相近。傅斯年早年并不反对哲学，而且留学欧洲的目的之一，便是学习哲学，其间幡然醒悟，坚决排斥用哲学观念观察描述中国思想的历史，很可能受到陈寅恪的影响。^[16]只是鉴于可以像朱熹那样取珠还椟，陈寅恪没有绝对反对使用哲学的概念。

二 了解之同情

对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陈寅恪审查报告褒贬的倾向比较明显。相比之下，上册审查报告的意思有些难以捉摸。十年前本人所写《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正文肯定上册褒意明显，注释里还是点出“于字里行间也有所不满”。只是这样的不以为然之意，周折隐晦，不易察觉。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17\]](#)

今人据此多以为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态度和方法，亦为了解之同情。此说并非全无道理。严耕望认为：“论者每谓，陈寅恪先生考证史事，‘能以小见大’。……此种方法似乎较为省力，但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主张用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聚小为大”之法，即“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18\]](#)。在谈及考证学的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时，严耕望又进一步详述：

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19\]](#)

如此归纳分别，的确可以在陈寅恪的著述中找到证据。如在冯著上册审查报告的末尾，陈寅恪将了解之同情“更推论及于文艺批评”，所举例“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所为而发。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由此可见其“曲折委蛇的辨析”往往出人意料、甚至匪夷所思之一斑。

可是，陈寅恪在讲述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意思之后，紧接着说了以下一段话：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20\]](#)

这一层意思，学人虽然间有引述，一般却不是与前文相联系，而是彼此割裂，变成毫不相干、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念，从而失去本意的全貌。前后连贯来看，陈寅恪的意思其实相当清楚，就是认为了解之同情“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而不仅不主张使用，甚至认为一般不可用。否则非但不能理解古人，反而可能南辕北辙，愈有条理统系，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

陈寅恪的这一态度，与其对于不同历史时段史料遗存的多寡之于史学的关系，以及清代民国学术状况的看法密切相关。在此前后，陈寅恪有一系列相关言论文字，可以相互佐证。1930年代，他告诉听课的学生：“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21]1940年代仍然坚持道：“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所以王钟翰认为：“是知先生治史以治中古史为易于见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与近现代史为不可专攻也。”^[22]

后来陈寅恪的研究时段下移到明清之际，虽然格于身世，没有继续下探，但也就家世相关，对晚清史料史事多有解读。其著述凸显中古重制度、晚近重人事的分别，且为将中古研究的成功经验移治晚近历史开辟途径。而在上古部分，前引吴宓日记可见陈寅恪对于先秦典籍史事确有深入认识，却从未发表直接的学术文字。不仅如此，1935年，他在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作序言中，还公开声言：“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23]

陈寅恪的如此说法，除有心与清儒立异之外，不满于清代以来的学术风尚当为要因。他针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的情形评议道：

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24\]](#)

诚如章太炎所说，上古历史“世次疏阔，年月较略，或不可以质言”，而学者“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是所谓好画鬼魅，恶图犬马也”[\[25\]](#)。研治古文字、古史和考古等，文学想象力丰富与逻辑推理能力强者易于建功，即因为材料缺漏太多，非充分想象和推理，难以寻出史事的联系脉络。可是合理联想与夸诞附会的分界，不过一线之间，要拿捏把握得当，相当困难。所谓不观先秦典籍，实际是不愿为但凭猜测揣度、难以确证的学问，以免图画鬼物。照此看来，即使神游冥想之下，于古人持论的苦心孤诣真能具某种了解同情，也只不过是猜出可能，见仁见智。这岂是欲将史学做到像生物学、地质学那样精确的陈寅恪治学追求的理想境界？

细读陈寅恪的冯著上册审查报告，可见其只是在两方面相对于学界的时趋而给予有条件的肯定，所针对的问题为：其一，整理国故的乱象。陈寅恪明指“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的表现，首当其冲的就是：“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

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虽然清以来由经入子已成趋势，但诸子研究至孙诒让，文本语义大体完成。近代诸子学大盛，破除经学独尊地位之外，主要由于容易附会各种西洋学说，可以反复解释。整理国故主张以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看似有条理，其实甚危险^[26]，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有感于此，陈寅恪认为与整理国故呼卢喝雉的劣习恶风相比，冯友兰的了解同情确有可取之处。

其二，古史辨的偏蔽。对于当时已成显学的古史辨，据说陈寅恪在弟子面前一度有积极的评议，可是语境不详，真意未必如弟子所领会。而从明文可据的审查报告看，陈寅恪其实相当不以为然，他说：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

以此为准，古史辨的态度做法，缺乏史学通识，只能横切，不知纵贯。尤其是但求所记上古史事的真伪，而忽略不同时期记述变化的时代相关性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同样是历史演进的重要内容；似乎人人有意作伪，实则因为利害关系等等不同，当事各人的记录亦有所分别，传衍变化，自然各异，不宜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相比之下，冯著能够分别利用，毕竟技高一筹。

时至今日，陈寅恪对整理国故和古史辨的批评，不仅没有失去时效，反而更加切中时弊，捧读之下，令人感慨万千。不过，以如此谨慎保留的评议，对于冯友兰的著作固然还可以说是褒奖，但要视为陈寅恪本人治学方法的表述，恐怕就不止是勉强了。

三 宋贤治史之法

声言不敢治经和不能读先秦之书的陈寅恪，虽然一生从未写过上古经史的相关论著，无法直接展现其取径和方法，但在为友人所写序跋中，还是表达了相当明确的意见，从中可以揣摩领悟其对于研治上古经史的理念。

1939年，陈寅恪为刘文典《庄子补正》作序，内称：

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27]

受宋以来疑古辨伪之风的影响，清代学人校勘经子史书，好擅改字，流风所被，至今遗毒不绝。今人校勘近代文献，也往往好以己意改字。殊不知今人以为不通者，本来恰好可通。而所校改以符合今意后，反而有碍于当时的原意。刘文典《庄子补正》一书价值究竟如何，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陈寅恪所写序言虽然仅仅谈及文本的校勘，实则于如何理解古人著述的本意，以及如何防止用后来己意妄加揣度各节，至关重要。若“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的态度，势必图画鬼物，纵有著述，不过野狐禅而已。

与陈寅恪沟通较深的傅斯年撰写《性命古训辨证》，讲性、命二字的古训，用法国、德国学者常用的“以语言学观念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探究理解古人思想之道，并借鉴清人“求其古以求其是”之说。^[28]如何“求其古”，显然神游冥想以表同情并非良法，要理解古人的微言大义，别有佳径。在陈寅恪看来，堪称典范者当属杨树达。治学必须有所凭借，“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29]。尤其是1948年杨树达作《论语疏证》，为陈寅恪所推许，并代为总结其方法：

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天竺佛藏，其论藏别为一类外，如譬喻之经，诸宗之律，虽广引圣凡行事，以证释佛说，然其文大抵为神话物语，与此土诂经之法大异。……南北朝佛教大行于中国，士大夫治学之法，亦有受其薰习者。寅恪尝谓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书注，酈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然此

诸书皆属乙部，至经部之著作，其体例则未见有受释氏之影响者。惟皇侃论语义疏引论释以解公冶长章，殊类天竺譬喻经之体。殆六朝儒学之士，渐染于佛教者至深，亦尝袭用其法，以诂孔氏之书耶？但此为旧注中所仅见，可知古人不取此法以诂经也。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彼佛教譬喻诸经之体例，则形虽似，而实不同，固不能取其法，以释儒家经典也。^[30]

取事实证言论，搜群籍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可以明圣人之言行。此即宋代司马光等人的长编考异之法。陈寅恪和傅斯年均认为，中国史学发达最早，且程度极高，而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元明清治史者之学识均不逮宋。^[31]希望复兴宋代学术，建立新宋学，使华夏民族文化再度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庇荫学人。^[32]

为此，早在1920年代末，两人就曾议论专做宋史研究之事，可是一度协商，却无下文。后来陈寅恪谈及研治宋史之难，慨叹《宋史》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很少有人真能熟读，更加谈不到探索根据，比较同异，藉为改创之资。^[33]除了材料繁复一点外，若以秦以后思想演变的大事因缘为纲领脉络，研治宋史之难，材料的繁复芜杂应当还在其次，根本问题是要以宋代为中国历史的大关节，而不能仅以为数十朝兴衰存亡之一代。用断代史的眼光办法研治宋史，不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

陈寅恪反复指出的宋贤治史与天竺诂经之法的分别及联系，所谓形似而实不同，主要是指佛藏与儒经分别面向出世与世间，因而合本子注与长编考异，一重神话物语，一重人间事实。若就形式和方法而言，二者可谓异曲同工。依据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所论^[34]，长编考异或许受合本子注的影响，至少精神与之相通。

参合上述，陈寅恪所主张的治学方法，实为宋贤治史的长编考异之法^[35]，此法也就是陈寅恪研治两汉以下历代国史的基本办法。根据研治对象和运用范围的差异，这一基本取径方法有所变化。杨树达用以诂经，所获得到陈寅恪的赞许，尽管陈本人鉴于上古材料不足，声称不治两汉以上经史，心目中的良法依然在此。了解同情的前提，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能够古今中外，心心相印。而长编考

异的依据，在于历史不可重复，只会演化，所以史学于比较中着重见异，而非求同。这也就是治史不宜归纳，必须贯通的理据。

长编考异于比较异同中寻绎历史因时空改变而发生的衍化，以及无限延伸的事实联系，以求达到贯通的境界。与之形似实异的合本子注，不仅研治佛经内典的文本行之有效，而且适用于各种文献的文本比较。如此，即便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可以概括为辩证，其基础还是述证。没有坚实的述证，前后左右，无限贯通，辩证难免流于臆测甚至瞎猜。所以“以小见大”的高明见识背后，还是“聚小为大”的深厚功力。此法于解读陈寅恪本人的文字，同样相当有效。

除“合本”外，还有“格义”，合本、格义形似而实异。^[36]从比较研究的角度，陈寅恪曾对“格义”大加挞伐，其《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不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痛批《马氏文通》，指为“何其不通如是”，还对附会中外学说的格义式比较提出批评。^[37]不过，陈寅恪并非根本否定格义的积极意义，甚至对北宋以后援儒入释格义之流的理学评价极高。陈寅恪称许韩愈，主旨就是想说明“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38]。

韩愈之后，宋代新儒家接续其事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所以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所以陈寅恪对韩愈、朱熹等唐宋大儒推崇备至。相比之下，取西洋哲学观念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往往导致格义附会，非但无助于理解领悟古人思想，反而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尴尬，或是流于西洋哲学的附庸。而善用格义之学，借鉴西洋哲学观念，重新理解吸收古人思想，形成今日所需的哲学，而不是编织“哲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中国哲学史”，求珠还椟，面向未来，或可继宋代之后，进一步丰富提升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抽象思维，再创思想的新高。犹如经学之于上古，固然须疑古辨伪，以求渊源流变，但不能因此否定经学对于理解两汉以下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三纲六纪，仍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而现代“中国哲学”能否如宋儒的“理学”，各领风骚数百年，则是对今日有志于“哲学”的学人天赋与努力的极好检验。

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所写的两篇审查报告，在相对于整理国故和古史辨等学界时趋的偏蔽有条件地肯定冯著的同时，表达了其关于上古和宋代历史文化以及哲学研究的不同看法，并

略及方法。与其他记述相参照，可见“了解之同情”并非陈寅恪本人治史方法的表述。其研治经史，首重长编考异；内典文献，则取形似而实不同的合本子注。至于古史、宋代研究和哲学创造，能否达到其所期许的高度，还有待于来者。

[1] 参与审查的冯友兰“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使人阅读”；陈寅恪则私下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0页。

[2]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页。

[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页。

[4]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2页。

[5] 桑兵：《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钱伯城、李国章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262—263页。

[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284页。

[7]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2—103页。参见上一章《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8]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

[9]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13页。

[10] 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页。

[11]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52—153页。

[12] 桑兵：《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3] 张荫麟：《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日。

[14] 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59页。

[15]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第1264—1265页。

[16] 关于陈寅恪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相互影响，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1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页。

[18]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4页。

[19] 严耕望：《治史答问》，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5—86页。

[20]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280页。

[21]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清华校友通讯》1970年4月29日。

[22]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52页。

[23]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页。

[24]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0页。

[25] 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26] 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4页。

[27] 陈寅恪：《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8—259页。

[28]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8页。

[29] 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史论丛续稿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0页。

[30]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2—263页。

[31] 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2页。

[32]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

[33]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

[34] 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4页。

[35] 陈寅恪所主张为宋贤治史的长编考异之法一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已经指出，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第一章的第一、第四两节尤为集中讨论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专章申论。不过，王著将神游冥想真了解亦认为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于陈寅恪所论合本子注与长编考异之法的适用范围，以及长编考异与总汇贯通的联系分别等，尚有可以探讨的空间以及辨析的余地。

[36] 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67—185页。

[37]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38] 陈寅恪：《论韩愈》，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19—322页。

求其是与求其古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

近年来兴起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多向外洋求助，以新自诩。实则近代学人已有借鉴欧洲新法研治中国思想史的范例，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即个中翘楚。其研究对象与做法，与今日所谓概念史相近甚至相同，而其对欧洲相关学术方法的理解运用，以及对历代各类文籍材料和学人见识等本事的把握，则较为深入贴切。从中吸取借鉴，不仅有助于纠正一味趋新、实则不温故而欲知新的偏颇，也可以寻得研究良法，大幅度提高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准。尤其是改变削足适履地以外来间架为框缚、强古人以就我的偏蔽，因缘本事寻绎本义。限于主题，本文旨在讨论相关的研究及表述方法，至于所牵涉的“哲学”以及中古思想（宋学）的大事因缘等问题，不过举例，点到即止，详情参见本书相关各篇。

一 思想为语言所支配

清季以降，新名词大量涌现，造成理解应用的颇多滞碍。1914年，黄濬与梁启超谈及：“谓吾国文字学术中名词至伙，苦无一词典以汇之。……盖世事日新，读书方法，前后判若霄壤。新旧名词，非专治某学者，稍越其阃，殆皆不能索解。故以后研求古籍者，自非恃辞典不为功。又吾国治专门职业者，往往于固有之名，猝不能索得，或依俗称，或别撰新名，或译音代之。若有辞典，分别专科，历疏专名，则古今东西之名词，或皆有会通之可能。”他希望由国家出面，征求若干学者，以字典为纲为经，以各科学各事类为目为纬，条分缕析，分别汇求，编成专书，以便承学之士。这一提议引起梁启超的极大兴趣，次日曾致黄濬两封长笺，条言其事。^[1]

此番编辑辞典之事后来因故未成，而纷繁复杂的中西新旧概念与事物的缠绕困惑，梁启超感同身受。1923年，梁启超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

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

并且坦言，此种态度，“吾能言之而不能躬践之，吾少作犯此屡矣。今虽力自振拔，而结习殊不易尽。虽然，愿吾同学勿吾效也”^[2]。

作为具体事物集合概念的名词，往往后出，用后出概念理解解释原来事物的情形，历来皆有，清季以来密集而突显。正如梁启超所说，以今语释古籍，古已有之，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名实相副。近代在后出之上，更有外来，使得理解把握固有事物尤其是抽象事物变得更加困难。学人所谓以汉还汉，即意识到后来各种解说未必符合前人本意。而梁启超最为强调政治思想一科，主要还是着眼于清季以来，实际上受当时已经变化的观念的影响。中国为伦理社会，道德及相关的礼制礼俗，牵涉制度文化，为认识中国的一大关节，涉及儒家道德本原的性、命问题，遂成为历来关注的焦点。

性、命的本义及其因时因地的变化，历代多有训诂讨论。《性命古训》一书，为阮元所作。按照傅斯年的理解，“此中包有彼为儒家道德论探其原始之见解，又有最能表见彼治此问题之方法，故是书实为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之后劲，足以显清代所谓汉学家反宋明理学之立场者也”。不过，戴、阮对于此一问题的态度及作法，可谓截然相反。“然而戴氏之书犹未脱乎一家之言，虽曰疏证孟子之字义，固仅发挥自己之哲学耳。至《性命古训》一书而方法丕变。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

在傅斯年看来，阮元《性命古训》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方法全然不同，后者以一家之言，发挥自己的哲学，而前者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就字义疏为理论。比照当时欧洲学术的取向，“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之一法，在法、德多见之。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研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著书者，其出发点与其结论每属于语学。”

所谓用语言学的观点解释思想史的问题，包含语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两方面。关于语学的观点，概言之，即“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性命之谈，古代之抽象思想也。吾故以此一题为此方法之试验焉”^[3]。

为了更好地说明如何应用语学的观点，傅斯年用另一事例加以申论，十年前他任教中山大学时，曾撰写《战国子家叙论》的讲义，其序意《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4]，以“哲学”为例，阐述思想为语言所支配的情形：

世界上古往今来最以哲学著名者有三个民族：一、印度之亚利安人；二、希腊；二、德意志。这三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的文化忽然极高的时候，他的语言还不失印度日耳曼系语言之早年的烦琐形质。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语言之原形犹在，语言又是和思想分不开的，于是乎繁丰的抽象思想，不知不

觉的受他的语言之支配，而一经自己感觉到这一层，遂为若干特殊语言的形质作玄学的解释了。以前有人以为亚利安人是开辟印度文明的，希腊人是开辟地中海北岸文明的，这完全是大错而特错。亚利安人走到印度时，他的文化，比土著半黑色的人低，他吸收了土著的文明而更增高若干级。希腊人在欧洲东南也是这样，即地中海北岸赛米提各族人留居地也比希腊文明古得多多，野蛮人一旦进于文化，思想扩张了，而语言犹昔，于是乎凭藉他们语言的特别质而出之思想当做妙道玄理了。今试读汉语翻译之佛典，自求会悟，有些语句简直莫名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工夫，可以化艰深为平易，化牵强为自然，岂不是那样的思想很受那样的语言支配吗？希腊语言之支配哲学，前人已多论列，现在姑举一例：亚里斯多德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这都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给我们这么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则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其余如柏拉图的辩论，亚里斯多德的分析，所谓哲学，都是一往弥深的希腊话。

若以近代为例，则“德意志民族中出来最有声闻的哲人是康德，此君最有声闻的书是《纯理评论》。这部书所谈的不是一往弥深的德国话吗？这部书有法子翻译吗？英文中译本有二：一、出马克斯缪勒手，他是大语言学家；二、出麦克尔江，那是很信实的翻译。然而他们的翻译都有时而穷，遇到好些名词须以不译了之。而专治康德学者，还要谆谆劝人翻译不可用，只有原文才信实；异国杂学的注释不可取，只有本国语言之标准义疏始可信。哲学应是逻辑的思想，逻辑的思想应是不局促于某一种语言的，应是和算学一样的容易翻译，或者说不待翻译，然而适得其反，完全不能翻译。则这些哲学受他们所由产生之语言之支配，又有什么疑惑呢？即如Ding an Sich一词，汉语固不能译他，即英文译了亦不像；然在德文中，则an Sich本是常语，故此名词初不奇怪。又如最通常的动词，如Sein及Werden，及与这一类的希腊字曾经在哲学上作了多少祟，习玄论者所共见。又如戴卡氏之妙语‘Cogito ergo Sum’，翻译成英语已不像话，翻成汉语更做不到。算学思想，则虽以中华与欧洲语言之大异，而能涣然转译；哲学思想，则虽以英德语言之不过方言差别，而不能翻译。则哲学之为语言的副产物，似乎不待繁证即可明白了。印度日耳曼族语之特别形质，例如主受之分，因致之别，过去及未来，已完及不满，质之与

量，体之与抽，以及各种把动词变作名词的方式，不特略习梵文或希腊文方知道，便是略习德语也就感觉到这麻烦。这些麻烦便是看来‘仿佛很严重’的哲学分析之母”。

与此相应，语言系统全然不同的汉语既不能产生哲学，也不适合哲学的生存，中国古代的思想，很难说成是哲学或是用哲学的观念来解读。傅斯年说：

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参看叶斯波森著各书），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而以句叙（Syntax）求接近逻辑的要求。并且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语言，不富于抽象的名词，而抽象的观念，凡有实在可指者，也能设法表达出来。文法上既没有那么多的无意识，名词上又没有那么多的玄虚，则哲学断难在这个凭借发生，是很自然的了。

“斐洛苏非”，译言爱智之义，试以西洋所谓爱智之学中包有各问题与战国秦汉诸子比，乃至下及魏晋名家宋明理学比，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爱智论，诸子以及宋明理学是有的；像柏拉图所举的问题，中土至多不过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亚里斯多德那样竟全没有；像近代的学院哲学自戴卡以至康德各宗门，一个动词分析到微茫，一个名词之语尾变化牵成溥论（如Cangality观念之受Instrnmental或Ablative字位观念而生者），在中土更毫无影响了。……

那末，周秦汉诸子是些什么？答曰：他们是些方术家。自《庄子·天下篇》至《淮南鸿烈》，枚乘《七发》皆如此称，这是他们自己称自己的名词，犹之乎西洋之爱智者自己称自己为斐洛苏非。这是括称，若分言，则战国子家约有三类人：

（一）宗教家及独行之士；

（二）政治论者；

（三）“清客”式之辨士。

例如墨家大体上属第一类的，儒者是介于一二之间的，管、晏、申、韩、商、老是属于第二类的，其他如惠施、庄周、邹衍、慎到、公孙龙等是侯王、朝廷、公子、卿大夫家所蓄养之清客，作为辩谈以悦其“府主”的。这正合于十七八世纪西欧洲的样子，一切著文之人，靠朝廷风尚，贵族栽培的，也又有些大放其理想之论于民间的。这些物事，在西洋皆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下之哲学，为什么我们反去借来一个不相干的名词，加在些不相干的古代中国人们身上呀？[\[5\]](#)

以上所引傅斯年的长篇大论，旨在说明三点：其一，思想方式和习惯由语言所决定，不同的语言系统造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其二，不同语言系统的名词概念不可能准确地翻译传通，甚至根本不能对应翻译；其三，中国语言不能产生哲学，用哲学观念来理解中国古代的方术或思想，往往似是而非，所以不能用哲学来比附条理诠释中国古代的方术或思想。傅斯年对此自认为深思熟虑，所以撰写《性命古训辨证》时声言：“此虽余多年前所持论，今日思之，差可自信。”[\[6\]](#)

傅斯年的这些看法，迄今为止，仍然在欧洲哲学界占据主导，虽然一些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对此颇有异议。围绕所谓“哲学”概念及其应用，傅斯年先后有一系列重要的相关文字，阐述不宜用后来的名词观念说过往人文上物事的意思。例如：

“史”之成一观念，是很后来的。章实斋说六经皆史，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等于说“六经皆理学”一样的不通。[\[7\]](#)

所谓“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对于研治近代牵涉中西新旧的概念名词，尤其值得重视。此说较梁启超所提出的近人好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的问题更进一步，指出用新名词称旧物事时物质与人文类别的适用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即不同语言系统难以对应翻译，一方面用新名词指

称旧物事，另一方面则以旧物事理解新名词。在古今中外各种观念相互纠葛的情形下，名词概念所指事物，物质的因有实物，比较容易把握，不致混淆；人文的则所指事物实有而无形，内涵外延难以捉摸。若是单纯指新事物的新概念，还相对简单；若是牵扯古今，要想避免似同而异，似是而非，必须尽量避免用后来观念说前事。即使不得已而用之，也须高度自觉其分别差异。

这种情形不仅发生于中国与泰西之间，即使在所谓同文同种的东亚，使用同样的汉字，所表达的内涵意思仍然很难准确地彼此沟通。本来汉语具有非逻辑性，又以字为单位，好用譬喻，多用成语典故即其显例，近代解读外来词语文本时，很容易流于望文生义，格义附会。明治日本借用汉语表现力较日语精炼的特性，作为翻译西文的平台，在寻求理解对应西学的同时，掌控了近代东亚的话语权，但也造成中、日、西古今观念与事物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似同而异的程度和范围。尤其是所借用的汉语词汇在日本只是作为西文的对应，未必会联想古籍的本义，而在中国则往往首先按照本义来解读字面的意思，只有专业人士才会仔细斟酌与之对应的西文的本义以及对应的当否。如果存在西文一词多译或中文一词多用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二 求其是与求其古

仅仅语学的一面，还不能完全满足用语言学的观点解释思想史的问题的需求，傅斯年进而提出：

语学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思想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故虽后学之仪范典型，弟子之承奉师说，其无微变者鲜矣，况公然标异者乎？前如程、朱，后如戴、阮，皆以古儒家义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变动，乃昌言曰“求其是”，庸詎知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乎？在此事上，朱子犹胜于戴、阮，朱子论性颇能寻其演变，戴氏则但有一是非矣（朱子著书中，不足征其历史的观点，然据《语类》所记，知其差能用历史

方法。清代朴学家中惠栋、钱大昕诸氏较有历史观点，而钱氏尤长于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别时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误彼等不少。盖“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故戴氏所标榜者孟子字义也，而不知彼之陈义绝与孟子远也。所尊者许、郑也，而不察许、郑之性论，上与孔、孟无涉，下反与宋儒有缘也。戴氏、阮氏不能就历史的观点疏说《论语》《孟子》，斯不辨二子性说之绝异，不能为程、朱二层性说推其渊源，斯不知程、朱在儒家思想史上之地位。阮氏以威仪为明德之正，戴氏以训诂为义理之全，何其陋也！^[8]

求其古与求其是，原为王鸣盛概括惠栋与戴震的治学特点，并有所评判：“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9]钱穆论道：“谓‘舍古亦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其异者，则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王氏所谓‘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10]

或以为“求其是”还有是正之意，固然，但前提仍是知其本意，否则难免师心自用。况且世间少有绝对的是非正误，离开具体的时空关系，不知相关的人事因缘，很难判断对错。明以来关于经史关系的各种论说，如五经或六经皆史的讨论争辩，分歧的要因之一，即在对本意的理解各自不同，解读的方向自然有异。即使认字的本源，也要有历史的观点。

把握“求其是”与“求其古”的分别以及做法，对于近代概念史的研究至关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分别，参照傅斯年关于治史方法的其他相关论述，认识可以更加深入贴切。所有历史事物，即使名词概念一致，也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求其古”的目的在于探究沿革流变，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依照具体时空的联系，按时序探寻事物的发生及其演化。若从定义出发求其是，以主观代客观，以认识代实事，就会用后来观念组装原本史事。1942年10月11日，傅斯年复

函好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吴景超，指出：“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11]此说看似强调史学的功能性，其实是说明研究历史的一般法则。

由于用今语解古籍古事的情形由来已久，“世上每每有些名实不符的事。例如后来所谓汉学，实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学；后来所谓宋学，实在是明朝官学。我想去搜材料，证明儒是鲁学，经是汉定（今文亦然）。康有为但见新学有伪经，不见汉学有伪经。即子家亦是汉朝给它一个定订。大约现行子书，都是刘向一班人为它定了次叙的。墨子一部书的次叙，竟然是一个儒家而颇芜杂的人定的，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前七篇皆儒家言，或是有道家言与墨绝端相反者（如太盛难寄），知大半子书是汉朝官订本（此意多年前告适之先生，他未注意），则知想把古书古史整理，非清理汉朝几百年一笔大帐在先不可也”^[12]。

傅斯年上述所说，旨在凸显穿透各式各样的后来集合概念的笼罩，回到历史现场的语境之中去理解所指称的物事的极端重要。关于如何清理古代思想的账目脉络，傅斯年在与顾颉刚论古史的同时，还致函胡适，进一步详尽表述意见：“我将来如果有和颉刚同事的机会，未必不也写一篇一篇的中国古代思想集叙。假如有此事，我要遵守下列的‘教条’。”这些教条，也可以说是一系列原则，主要有四点，表明傅斯年有心与胡适用西洋哲学系统条理中国上古思想的做法立异，主张用文籍考订的办法整理上古思想的发生及其演化。具体各条的内容及其解读详述如下：

1. 因为中国严格说起，没有哲学，（多谢上帝，使得我们大汉的民族走这么健康的一路！）至多不过有从苏格拉底以前的，连柏拉图的都不尽有。至于近代的哲学（学院的），自Descartes、Leibnitz、Kant以来的，更绝对没有。中国的一些方术论者（用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是当时有的，不是洋货），大大多数是些世间物事的议论者，其问题多是当年的问题，也偶有问题是从中国话的特质上来的（恰如希腊玄学是从希腊话的特质出来的一样）。故如把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

解它，不是割离，便是添加。故不用任何后一时期印度的、西洋的名词和方式。

不用后出外来的名词概念说以前固有的物事，尤其是人文方面的物事，理由已见前述。随之而来的，当是不以后出外来的方式条理解释以前的物事，以免割离或添加。此点虽然针对1920年代的问题，却颇能切中当下的时弊。清季至今，由附会移植开始的各种专门史，大都陷入其中而不自觉。王国维早年批评张之洞等人反对用哲学讲中国古代思想，认为中国古代已有哲学。但后来不仅放弃对哲学的追求，更从中外语义很难完全对应的事实，表示对于用哲学概念解读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的根本质疑。^[13]张荫麟用更为概括的文字进一步表述了同样的意思。1928年，他撰文评论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指出当时治中国思想史的通病，在于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14]王国维和张荫麟的文字，可以为傅斯年的“教条”作注释。

2. 中国古代的方术论者，与六朝之玄宗、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等等，在为人研究上，断然不是需要同一方法和材料。例如弄古代的方术论者，用具及设施，尤多是言语学及章句批评学。弄佛学则大纲是一个可以应用的梵文知识，汉学中之章句批评学无所用之。至于治宋明理学，则非一个读书浩如大海的人不能寻其实在踪迹，全不是言语学的事了。有这样的不同术，故事实上甚难期之于一人。而且这二千年的物事，果真有一线不断的关系吗？我终觉——例如——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所以才有了误解的注，所以以二千年之思想为一线而集论之，亦正未必有此必要。有这些道理，我以为如果写这史，一面不使之于当时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如此可以于方法上深造些。

此点强调不以同一统系（如哲学）来条理中国二千年的古代思想，要注意不同时期思想的表现形式及其具体的历史时空联系（如断代），“一面不使之于当时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近代史虽然为时较短，因为变动的节奏快，幅度大，尤其应当注意时间性因素的分别及作用，不可以110年之思想为一线而集论之，甚至同一时空下使用同一概念各自的意涵表述也千差万别。如何避免脱离原本具体的时空联系而与其他时空下形同实异的观念事物人为连接，至关重要。时下流行的各种观念、学科、思想、主义研究，单从名词概念等形式上看似乎前后并无二致，实则大都仍从今日的定义出发，裁剪组装史料，勾连史事。其实当时同一概念可能表达不同意思，而同一物事用不同名词来指称。随着时空的转移，相同概念的内涵外延千变万化，或根本不同，或层累叠加，一词多义，形同实异，非与具体时空人事相联系，则难以辨认解读，更无法求其演化的历史进程。照此办法，史上原有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不以为然甚至明确反对者反而会被强制纳入其中。如此，所写当然只能是后来者自己心中的历史，而非历史的本事。换言之，不能认识历史而勉强下手，逞其私臆便是不得不然。

3. 既然有二项许可我断代，则我以性之所近（或云习之所近），将随颉刚而但论古代的，不下于南朝。这些东西，百分之九十是言语学及文句批评，故但严追亭林（言语学）百诗（章句批评）之遗训，加上些近代科学所付我们的工具而已。如有成就，看来决不使他像一部哲学史，而像一部文书考订的会集。

不写哲学史，而是文书考订的会集。其说傅斯年没有详细论述，反而陈寅恪为杨树达《论语疏证》作序，有所解说（详见上章），据此大体可以明白文书考订会集的意思和办法。

4. 专就古代之一段言，则有一基本之设定，就是以汉朝历史之研究为古代方术家学之前部。我觉得先生当年写《古代哲学史》，仍是自上一时写下来，不自上层（下一时）揭到下层（上一时）。研究问题第一步，即是最要紧之一步是选择材料。恰恰

我们经学的定本，都是汉朝人给我们的，加上了一个很很的外形，势非把自秦至汉中季一段故事弄清楚，我们不能去自由用经学的材料，用则入陷阱。这一线思想本是由阎百诗开了一个好端，可惜《古文尚书》问题解决之后，大家专闹党见，不能解决紧接着的那个《春秋》经传问题（自然这题更难，且亦断不能如梅传之干脆的解决了，因为现存材料不足）。今文一派及太炎笔条上有好些胜义，而大体上一是幻想，一是固论，至今犹是一团泥。我们此时大可把这个问题一层一层的考校下去。[\[15\]](#)

应由上层（下一时）揭到下层（上一时），而非自上一时写下来。前者从无到有，探寻概念事物的发生及其演化，后者则以后来观念条理先前史事，实为用后来眼光倒述历史。历史的实事即所谓第一历史必须经由历史记述即所谓第二历史加以展现，任何历史记述，往往积薪而上，一般而言，集合概念均为后出，而且越到后来，条理越加清晰。因此，历史认识只能近真，难以重合。所谓自上一时写下来，其实未能剥离后来的附加成分，而以后来的概念条理作为先入为主的是，形式上顺着写，实际上倒着讲。必须首先由记述的上层即时间的下一时，揭到记述的下层即时间的上一时，才能以汉还汉，回到历史现场。不过，这样逆上去固然可以层层剥笋，求其本意，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但要再现思想演变的历史进程，还应在回归具体时空位置的基础上顺下来，历时性地展示事物发生演化的复杂详情。其中最难之点，即在于如何最大限度约束后来的主观成见，回到没有统一集合概念的无的境界，理解不同文本的意涵及能指所指，进而看纷繁的名物如何逐渐演化到约定俗成，并且恰如其分地展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历史进程。

三 方法为仪型 结论不成立

结合语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两义，傅斯年不仅制订了研究的方法，还安排了表述的结构。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第一卷曰字篇，统计先秦文籍中之性命字，以求其正诂者也。第二卷曰义篇，综论先秦儒家及其相关连者论性命之义，以见其演变者也。第三卷曰绪篇，

取汉以来儒家性说之要点分析之，以征宋儒性说之地位，即所以答戴、阮诸氏论程朱之不公也”^[16]。这样的结构，至少形式上体现了方法与问题的相得益彰。此书成为傅斯年的代表作，并且是使之当选首届中研院院士的主要凭据，就其实际水准看，决非浪得虚名。

对于当下时兴的概念名词研究，傅斯年用语言学的观点解释思想史的问题的《性命古训辨证》，作为方法的典范，还有相当大的借鉴空间乃至针砭意义。

时下的概念名词研究，常见通病有四：一是用后出外来名词重新定义以前物事，导致似是而非的误读错解（如“地方”）；二是忽略同一时期的同一名词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如“科学”），而同一时期的不同名词反而表达同一概念（如“民主”与“民治”）；三是未能注意分别考究同一名词随着时空变动而产生含义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具体的时空变动的相关性（如“哲学”）；四是简单孤立地追求概念名词的形同，使得所谓关键词脱离文本、学说、流派的整体，变成抽象的含义，再据此以重新连缀史事。这样的归纳，虽有操作上的方便，却造成各个词汇一面与当时的史分，一面越俎去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令形式上的顺时序探求异化为倒看倒述，从而失去实际意义。也就是说，要详究历史以把握概念，而不能由概念来勾连历史。前者能够理解历史上的所有相关概念，后者只能创作自己的思想史。相比之下，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研究表述的方法方式，虽然时间早了半个世纪，仍然略胜一筹。由此可见治学未必后来居上。此说全在理解外来方法是否有用于解读本来史事，其标的当在后者。若身陷其中，又要强作解人，就难以解读得当。

不过，傅斯年虽然推崇阮元《性命古训》一书的方法，对其结论却不以为然，并且声明：“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17]他不赞成戴震、阮元等人反宋明理学家的态度立场观念，试图解读宋儒性说的本意，对戴震、阮元等人论程朱之不公加以辩驳，恢复宋儒性说的地位。既然方法足以为典范仍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有效，那么相应而来的问题就是，傅斯年本人的《性命古训辨证》，是否也会遭遇同样的尴尬？如果是，症结究竟在于方法本身有所不足，还是条件不备，应用不当？

《性命古训辨证》于字、义两卷，收罗彝器铭文，至少证据较前人完备详尽。绪篇集中讨论汉代性之二元说和理学之地位，着重于心

学的渊源，条理较为清晰，见识则大体已在前人的关照之下。至于做法，老辈学人的道理途则可以提供参考。牟润孙记述其曾向柯劭忞问学，后者讲学不同于新派，开宗明义：“吾人治学，当讲宋人之义理，清人之考据，不可学阮元（芸荈）。阮氏全讲错了。”因为阮元追随戴震，主张训诂明则义理明，但读书应当从整部书全篇文章去探讨，绝不能只从其中若干字去追求，更不能从若干字的原始意义去追求。戴震批评宋儒，实际是反对清世宗、高宗以理学统治人民。柯劭忞知道戴震所说“以理杀人”是指皇帝，而阮元笃信戴氏，专心致志从字的古训去讲求义理。^[18]如果柯劭忞的判断不误，则当时的史不仅是断代的思想系统，如古代的方术、六朝的玄宗、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等等。在同样的大语境之下，前贤依然所见不一或形同实异，是因为各自均系有为而发，须取具体关联的各种事实以证之，才不至于无的放矢。此亦解今典难于解古典的主要关节。

取事实证有为之外，还有另一层可以考究的大节。陈寅恪早在留美期间，曾向吴宓阐述其对中西思想文化异同流变的一整套看法。

^[19]按照陈寅恪的看法，究明宋儒的心性之学，必须了解汉魏以来佛教性理之学对中国的深刻影响。而这一影响因为宋儒避名居实、取珠还椟的苦心孤诣，变得难以捉摸。宋儒所谓来自孔孟，本系拉大旗之举，而海内外学人每每以为其真的上承道统。二者的联系究竟是事实，还是宋儒故布迷阵的障眼法？没有佛教因缘，能否将先秦、两汉、唐宋儒学的心性之说一脉相连？

对此问题，傅斯年原来的处理显得较为简单，他声称：“今以演化论之观点疏理自《论语》至于《荀子》古儒家之性说，则儒、墨之争，孟、荀之差，见其所以然矣。布列汉儒之说，以时有序，则程、朱性论非无因而至于前矣。夫思想家陈义多方，若丝之纷，然如明证其环境，罗列其因革，则有条不紊者见矣。”^[20]该书绪篇从先秦、汉代、宋儒梳理下来，试图探究心性之学的源流演变，进而对戴震、阮元之说加以辩驳。虽然注意到各时代诸说的异同，还是循着儒家思想自我演化的内在理路，形式上求其发生演化的“顺下来”，观念层面却暗藏着依照宋儒的自我塑造“倒上去”的潜在危险。

关于宋代思想学术及宋代的研究，傅斯年与陈寅恪均有与众不同的高度评价和期待，只是彼此看法也有所差异。傅斯年认为宋代是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不像李唐与外国拖泥带水，与陈的看法明显有别。1934年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审查报告，详细

阐述其重视宋代的缘由以及治理的办法途径，他认为，中国自秦以后思想的演变历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自晋至今的中国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

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尤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二者之间，其关系如何，且不详论。然举此一例，已足见新儒家产生之问题，尤有未发之覆在也。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21\]](#)

陈寅恪所论，虽然并非针对后出的《性命古训辨证》，所说事实及办法，却与后者关系密切，而途辙意见迥异。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本来仅据前人成说标出李翱复性说在孟子与陆王之间的地位，并未予以特别重视。此书出版后，陈垣、张政烺等赞誉有加，冯友兰读完，则表示“前日问题仍未释”，希望“见面时再谈”[\[22\]](#)。其所不能释怀、一再接谈的问题究竟为何，未见直接证据，冯友兰自己的看法以及陈寅恪审查报告的观点可能均在其中。三年后，傅斯年写了《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的短文，发表于《读书通讯》第57期，后来又作为附录收入《性命古训辨证》，则两人所谈问题，或与短文的内容相关。而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与陈寅恪所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关系密切，可以将傅、陈、冯三人连接。傅斯年文章的要旨如下：

李习之者，儒学史上一奇杰也。其学出于昌黎，而比昌黎更近于理学，其人乃昌黎之弟子，足为其后世者也（韩云，“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李则于诔韩文中称之曰兄。盖唐人讳以人为师〔见昌黎《进学解》〕，实则文章及思想上李习之皆传韩氏者也）。北宋新儒学发轫之前，儒家惟李氏有巍然独立之性论，上承《乐记》《中庸》，下开北宋诸儒，其地位之重要可知。自晋以降，道、释皆有动人之言，儒家独无自固之论。安史之乱，人伦道尽，佛道风行，乱唐庶政，于是新儒学在此刺激下发轫（新儒学起于中唐，此说吾特别为一文论之）。退之既为圣统说（即后世道统说所自来），又为君权绝对论，又以“有为”之义辟佛老，自此儒家乃能自固其藩篱，向释道反攻。习之继之，试为儒教之性论，彼盖以为吾道之缺，在此精微，不立此真文，则二氏必以彼之所有人〔入〕于我之所无。李氏亦辟佛者，而为此等性说，则其动机当在此。遍览古籍，儒家书中，谈此虚高者，仅有《孟子》、《易·系》及戴记之《乐记》、《中庸》、《大学》三篇，于是将此数书提出，合同其说，以与二氏相角，此《复性书》之所由作也。戴记此三篇，在李氏前皆不为人注意，自李氏提出，宋儒遂奉之为宝书。即此一端论之，李氏在儒学史上之重要已可概见。清儒多讥其为禅学玄宗者，正缘其历史的地位之重要。夫受影响为一事，受感化为又一事，变其所宗、援甲人〔入〕乙为又一事，谓《复性书》受时代之影响则可，谓其变换儒家思想而为禅学，则言不可以若是其亟也。

傅斯年论新儒学发源的专文未见。仅据论李翱的短文，可见其与陈寅恪的看法大异。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认为，中国自秦以来思想演变的历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本来儒家学说的影响最深最巨在于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等方面，至于学说思想，则不如佛道二教者。六朝以后，道教不似儒教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所以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天台宗宗徒梁敬之、李习之等，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而道教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一方面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教义。新儒家即继承此种相反相成的遗业而能大成。据此，则新儒家在思想学说层面其实是尽量吸收输入思想后，再以夷夏之论排斥外来教义。也就是前引与吴宓所

说，中国本来缺少精粹学说，佛教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程朱等宋儒皆深通佛教，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与儒教宗传浸染混合。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无心还是有意，傅斯年的《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明显有针对陈寅恪之说的意味，他认为李翱开启新儒学的凭借，并非佛教的性理，而是上古的心学和汉儒的性情善恶二元说。他将《复性书》上篇的要义概括为下列两点：

其一为性情二本，性明情昏说。此说乃汉代之习言，许、郑所宗述，而宋儒及清代朴学家皆似忘之，若以为来自外国，亦怪事也。此论渊源……今知其实本汉儒，则知其非借禅学也。禅学中并无此二元说，若天台宗性恶之论，则释家受儒家影响也。果必谓李习之受外国影响，则与其谓为逃禅，毋宁谓为受袄教景教摩尼之影响，此皆行于唐代之善恶二元论者。然假设须从其至易者，汉儒既有二元论，则今日不必作此远颺之假设矣。

其二为复性之本义。此义乃以《乐记》“人而生静至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一节为基本，连缀《易·系》、《中庸》、《大学》之词句而成其说也。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易·系》之词也。所谓“尽性”者，《孟子》之词、《中庸》之论也。所有张皇之词虚高之论，不出《易·系》则出《中庸》。铺张反复，其大本则归于制人之情以尽天命之性，犹《乐记》之旨也。今既已明辩古儒家有唯心一派之思想，则在李氏性说固未离于古儒家。李氏沾沾自喜，以为独得尼父之心传，实则但将《中庸》、《大学》等书自戴记中检出而高举之，其贡献在于认出此一古代心学之所在，不在发明也。

根据上述两点，傅斯年进而讨论中篇的内容：

《复性书》中篇则颇杂禅学，此可一望而知者。此篇设为问答之词，仍是以《易·系》、《中庸》为口号，然其中央思想则受禅学感化矣。此篇列问答十二，末一事问鬼神，以不答答之，自与性论无干，其前十一问则或杂禅学，或为《复性书》上之引申。其杂禅者，第一问“弗思弗念”，第二问“以情止情”，皆离于儒说，窃取佛说以入者。第三问“不睹不闻”，第四问格物，第五问“天命之谓性”，第六问“事解心解”，皆推阐古心学之词。如认清古之心学一派，知其非借禅学以立义矣。第七问凡人之性与圣人之性，第八问“尧舜岂有不情”，皆《复性书》上之引申义，第九问嗜欲之心所由生，乃是禅说。第十问性未灭，似禅而实是《孟子》义。第十一问亦近禅。意者《复性》三书非一时所作，即此十一问恐亦非一时所作，故不齐一耶？

根据上述分析，傅斯年得出结论：“约言之，《复性》上下两书皆不杂禅学者，中篇诸问则或杂或不杂。李氏于古儒学中认出心学一派，是其特识，此事影响宋儒甚大。若其杂禅则时代为之，其杂禅之程度亦未如阮元等所说之甚也。戴、阮诸氏皆未认明古有心学之宗，更忽略汉儒之性情二元说，故李氏说之与禅无关于儒有本者，号称治汉学者反不相识矣。”^[23]

显然，一、傅斯年只承认李翱受时代的影响甚至感化，不同意其说是变其所宗，援甲入乙，变换儒家思想而为禅学；二、李翱的贡献在于认出古代心学之所在，而非发明，所说未离于古儒家；三、即使李翱受时代的外国影响，杂禅程度亦浅，相比之下，受袄教景教摩尼的影响较为直接。况且性情善恶二本为汉代之习言，宋儒及清代朴学家仿佛都已忘记，误以为来自外国，实则反而释家受儒家影响。所以，假设李翱受影响，应取较为接近的汉儒二元论。此说若成立，则陈寅恪避名居实、取珠还椟说的依据荡然无存，非但不是变儒家为禅学，连旧瓶装新酒的可能性亦不复存在。

然而，问题在于，唐宋诸儒究竟是先受到佛教道教性理之说的影响，再上探先秦两汉的儒学，以外书比附内典，构建新儒学，然后据以辟佛；还是相反，鉴于时代风气人伦道丧，先从古儒学中认出心学一派，形成理学，以抵御佛教。以情理论，无疑前者更为可信，恰如欧洲中世纪思想必须借助儒学才能突破变换那样，很少抽象虚理思维

习惯的唐宋诸儒，如果没有内典外书相互比附、性理之学盛行的时代风尚影响，也很难产生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换。只是陈寅恪的看法较傅斯年曲折复杂，不易直接取证，反而傅斯年之说可以找出直接证据，看似信而有征。史学研究中往往出现事实无实证，而实证并非事实的现象，造成诸多困惑，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应当看过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对其所指也心知肚明，直接的回应尚未见。1954年，陈寅恪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论韩愈》，旨在说明韩愈从小居于新禅宗的发祥地，又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韩愈扫除章句繁琐之学，直指人伦，目的是调适佛教与儒学的关系。“盖天竺佛教传入中国时，而吾国文化史已达甚高之程度，故必须改造，以蕲适合吾民族、政治、社会传统之特性，六朝僧徒‘格义’之学，即是此种努力之表现，儒家书中具有系统易被利用者，则为小戴记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尝试矣。然中庸一篇虽可利用，以沟通儒释心性抽象之差异，而于政治社会具体上华夏、天竺两种学说之冲突，尚不能求得一调和贯彻，自成体系之论点。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

在这方面，首先由“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而韩愈“生值其时，又居其地，睹儒家之积弊，效禅侣之先河，直指华夏之特性，扫除贾、孔之繁文”。《原道》一篇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这与新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事相并列，为中国文化史中最有关系之文字。不过，“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又观退之寄卢仝诗，则知此种研究经学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称奖之同辈中人发其端，与前此经诗著述大意[异]，而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者也。”[\[24\]](#)

显然，陈寅恪仍然坚执己见，并未因为傅斯年的别解而动摇改变。如果韩愈是受新禅宗的影响才转而正心诚意，其弟子的复性论就很难说是与禅无关于儒有本。新儒学究竟是取珠还椟，还是古今一贯，或者说，古今一贯是唐宋诸儒苦心孤诣的自称，还是新儒学创制的渊源，两说并存，悬案依旧，破解之道，有待于来者。

[1]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2]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13页。

[3]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5—506页。

[4] 此书原来未刊，后整理付印，序改为“一 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 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品 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 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

[5]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251—254页。

[6]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8页。

[7]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57页。

[8]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8—509页。

[9] 洪榜：《戴先生行状》，《戴震文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5页。

[1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7页。

[11] 傅斯年：《致吴景超》，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67页。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2]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459页。

[13] 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静庵文集》，第150—151页。

[14] 张荫麟：《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日。

[15] 傅斯年：《致胡适》，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8—39页。

[16]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9页。

[17]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5页。

[18] 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第535—544页。

[19]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2—103页。

[20]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05—509页。

[2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页。

[22] 王汎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07页。

[23] 傅斯年：《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664—666页。

[\[24\]](#) 陈寅恪：《论韩愈》，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19—323页。韩愈诗即“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

征引文献

一 报刊

《北京大学日刊》

《北平晨报》

《晨报》

《晨报副刊》

《東京大學第二年報》

《東京大學法理文學部一覽略（明治十一年）》

《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一覽（從明治十四年至明治十五年）》

《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一覽（從明治十五年至明治十六年）》

《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一覽（從明治十六年至明治十七年）》

《格致益闻汇报》

《国粹学报》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国学论衡》

《国语月刊》

《国语周刊》

《华国月刊》

《教育杂志》

《京报》

《清华周刊》

《少年中国》

《申报》

《世界日报》

《万国公报》

《文化与教育》

《文史杂志》

《现代评论》

《新潮》

《新民丛报》

《新青年》

《新生》

《新世界学报》

《新亚学报》

《学衡》

二 一般文籍

1. 《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 《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
3.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9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4. 《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5. 《篁村遺稿》，大正七年九月岛田均一刻。
6.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7. 《静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8. 《钱玄同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9. 《刘半农日记》，《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10. 《學問ハ淵源ヲ深クスルニ在ルノ論》，《學藝志林》第二册，明治十年八月。
11. 《哲學字彙》、《改訂増補哲學字彙》、《英独仏和哲學字彙》，名著普及会1981年复刻版。
12.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
13.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4.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5.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16.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8.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19.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20.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1.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22.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3.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4.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5.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6. 陈启伟：《“哲学”译名考》，《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27. 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28.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9.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

30.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1. 岛藁进、矶前顺一编纂：《井上哲次郎集》，东京：株式会社クレス2003年。

32.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3.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

34.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3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36. 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37. 福井纯子：《井上哲次郎日记》，《東京大學史紀要》第11号，1993年3月。

3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9.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40.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41.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42. 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

43. 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44. 葛兆光：《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45. 耿云志编：《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46.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47.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48.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49. 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50. 侯宏堂：《陈寅恪对“宋学”的现代诠释》，《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
51.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
52. 胡卫清：《传教士教育家潘慎文的思想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3. 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0月1日。
54. 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55.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56. 加藤弘之：《本會雜誌ノ發刊ヲ祝シ併ヤテ會員諸君ニ質ス》，《哲學會雜誌》第1册第1号，明治二十年二月五日。
57. 蒋梦麟：《西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58.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59.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60. 井上圆了：《哲學ノ必要ヲ論シテ本會ノ沿革ニ及フ》，《哲學雜誌》第1册第2号，明治二十年三月五日。

61. 景海峰：《从“哲学”到“中国哲学”——一个后殖民语境中的初步思考》，《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62. 景海峰编：《拾薪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63. 劳榦：《忆陈寅恪先生》，《传记文学》第17卷第3期。

64.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65. 李源澄：《经学通论》，成都：路明书店1944年。

66.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67.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68. 刘北汜：《忆朱自清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69. 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70. 刘小云：《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1926—1949）》，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71. 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72. 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73. 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传记文学》第17卷第2期。

74. 梦飞：《记钱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的谈话》，《文化与教育》第27期，1934年8月10日。

75.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76. 蒙文通：《经学抉原》，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7. 蒙文通：《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1941年6月。

78. 蒙文通：《宋史叙言》，《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79. 蒙文通：《文中子》，《益世报·读书周刊》第9期，1935年8月1日。

80.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81. 民国经世文社编：《民国经世文编》，上海：经世文社1914年石印。

82.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83.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84.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85.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86.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87. 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88. 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9、10期合刊，1935年6月。

89.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90.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91.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
9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93.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94. 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95. 桥川时雄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
96.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97. 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98. 桑兵：《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99. 桑兵：《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00. 桑兵：《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01. 桑兵：《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中国文化》第29期，2009年春季号。
102. 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图书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月。
103. 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04. 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105. 王东杰：《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06. 王东杰：《“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07. 王汎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印行。

108.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

109.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10.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111. 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2.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113.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14.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5. 王水照：《陈寅恪先生宋代观之我见》，《中国文化》第17—18期，2001年3月。

116. 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17. 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118. 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119.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10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20. 吴淑凤、薛月顺、张世瑛编：《近代国家的形塑》，台北：“国史馆”2013年。
121.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2. 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123. 吴元康辑：《胡适史料拾遗续编（下）》，《历史档案》2007年第2期。
124. 吴元康整理：《胡适史料补阙》，《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125. 西村茂树：《质疑》，《哲學會雜誌》第1册第10号，明治二十年十一月五日。
126. 熊十力、张东荪：《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文哲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3月。
127. 熊十力：《十力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128.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129. 严耕望：《治史答问》，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
130.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年。

131. 杨步伟：《杂记赵家·第一次欧洲游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2. 杨翠华：《蒋梦麟与北京大学，1930～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

133.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34.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5.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

136. 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7.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

138. 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139. 俞大维等著：《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140. 苑书义、孙华锋、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0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1. 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2. 曾慕韩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曾慕韩先生遗著》，台北：“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54年。

143. 张凯：《“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民国学界》，中山大学历史系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144. 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扎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

145. 张荫麟：《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思想与时代》第27期，1943年10月。

146. 张荫麟：《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日。

147.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48.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14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5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5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53. 中江兆民著，吴藻溪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15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

155.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156.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57.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158.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159. 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理想家会员计划
不止于读书



[我的理想国imaginist]



专属
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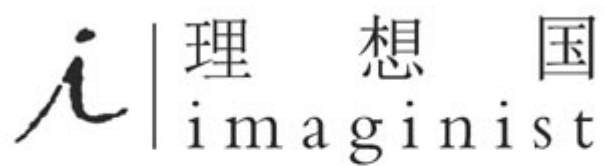
活动
特权



独家
视频



更多
权益



想象另一种可能

好文 影像 活动

共读 共赏 共享



手机扫码
发现更多内容



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

——桑兵



发现另一种可能



上架建议：历史、文集
ISBN 978-7-5598-0042-8
9 787559 800428
定价：69.00 元

人

历史的本色

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桑兵 著

摘下单调的有色眼镜，打破分科的此疆彼界，
能够贯通无碍，入木三分，呈现历史本色的丰富多彩。

中西学堂之争

盖棺论定之难

南浔与湖社

优伶与内廷

清末商民罢市

“北洋军阀”再检讨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

i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历史的本色

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桑兵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 桑兵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8

ISBN 978-7-5495-8317-1

I. ①历… II. ①桑…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986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魏 阳 罗丹妮

装帧设计：彭振威

内文制作：龚碧函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1270mm×960mm 1/16

印张：27 字数：350千字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6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绪论：不分科的专题研究
 - 一 专题与专家
 - 二 问题与系统
 - 三 专门与总汇
 - 四 贯通与专精
-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
 - 一 教育与“教”“育”
 - 二 新学堂与旧学校
 - 三 纳科举于学堂
- 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
 - 一 “中等社会”的出现
 - 二 两种解读
 - 三 激进路线的凸显
 - 四 应用与争议
-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 一 风潮前史
 - 二 风潮起因
 - 三 曲突徙薪
 - 四 调停失败
 - 五 影响深远
- 天地人生大舞台——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
 - 一 千丝万缕保皇会
 - 二 不知不觉革命党
- 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 一 文本来源
 - 二 取材准则
 - 三 看法各异
 - 四 影响预测
- 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
 - 一 “城镇”的地位及其结构变化
 - 二 罢市的类型与影响
 - 三 罢市的效应与趋向
- 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
 - 一 逊位还是退位
 - 二 帝制与共和
 - 三 单一制与联邦制

- 四 总统制与内阁制
-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 三 “北洋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 四 “北洋军阀”的谱系
 - 五 奉系的加入与北洋正统
 - 六 北洋与北洋政府
 - 七 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 一 外来影响
 - 二 内部响应
 - 三 分歧与一致
- 孙中山与科举制
 - 一 无缘科第
 - 二 科举考试的利与弊
 - 三 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 四 科举制与单立考选权
- 南浔·湖社与国民党
 - 一 南浔与国民党
 - 二 湖社与南浔
 - 三 湖社与国民党
 - 四 几点议论
- “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 一 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 二 “华南”的涵盖与演化
 - 三 日本的南进政策凸显华南
 - 四 广州为华南中心的初显
 - 五 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
-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 一 相煎何太急
 - 二 校园烽烟
 - 三 河东河西
 - 四 国共进退
-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 一 学潮与倒王
 - 二 朱家骅与王星拱

- [三 朱家骅与CC派](#)
- [人名索引](#)
- [征引文献](#)

绪论：不分科的专题研究

一 专题与专家

十年前在京都访问研究期间，曾经前往长崎一游，重要目的之一，是探访当地一位陈姓华侨商人。其祖上是金门人，鸦片战争前已经移居日本，几代人相继担任长崎福建华商会长。由于喜好保留文物，历来过手的文件无论巨细，均留存至今。日积月累而成的文献，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在华侨个人当中堪称之最。当年美军原爆长崎，因为文书存放地位于一座小山背后，幸运地逃过一劫。

这批文献早已引起世人的关注，先后有两位台湾留学生加以利用，撰写了博士论文。可是，分科的博士选题，各有专业的眼界，取材和论述主要集中于贸易方面。陈家世代经商，贸易自然为其主业，所藏文献主要也以商贸往来居多。不过，作为商会会长，还要承担各种社会角色，包括与中国历届政府及党派社团各方面的交往联系。近代日本各地华侨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与横滨、神户等地华侨的鲜明政治倾向相比，长崎华侨始终以政府为正统，与近代中国频繁更替的历届当政者保持较为融洽的关系。民初孙中山过访长崎，当地华人热情接待，主持其事的陈家保留了所有的相关文件，包括各家捐助的名单款项、宴会通知、合影照片等等。此后，陈家及当地商会与民国政府、国民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留有许多颇具价值的历史文件，只是这方面的资料在后来研究者的视野中基本被忽视。历史研究若是从单一视角重现或塑造历史人事的侧面，难以展现全貌，自然与本相有所距离。

这一事例带来的启示是，分门别类地研究历史的做法，未必适当。用后来的特定分科观念、眼界考察并不按照分科发生演化的历史问题，如何顾及历史上人事本身具有的各个层面及其相互联系，而不至于为了将就分科的范围先入为主地取舍材料以致肢解了事实，或者

说，如何才能善用分科的长处，同时又不受其局限而导致偏蔽，尽可能依据各类相关材料，梳理史事本来的时空联系，由全过程和各层面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本相与前人本意，实在是治史能否得法的一大关键。

本书各篇，历年来陆续写成并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现在结集出版，需要确定一个既可涵盖各篇内容又能凸显总体立意的书名。虽然治学不以通行的一段时间集中研治特定专题为模式，放眼读书之际，各种问题的思考同时并进，动手撰文则兴之所至，随时流转，各篇写作之时未必都有统一的章节构想，但也并非随心所欲。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日多，可以动笔的问题方面不在少数，即使日以继夜不停地写，也不会有穷尽之日。可是许多问题，研究清楚，反倒没有了诉诸笔墨的冲动，或在讲堂谈及，或在其他论著里间中提到，也就不算是埋没。想写并且有兴趣完稿的，多数不仅仅要说明一事一理，更希望由此形成一例，为一类通则或一种意境的具体展现。此外，近代史上人事繁多，看似彼此无关，实则互有联系，若为实事，不难把握，若为通则，不易驾驭。

就此而论，本书取名，看似有将就之嫌，其实除个别较早的作品外，各篇之间的虚实联系大都早有考虑，并非因陋就简地拼凑而成。书名希望表达的意思，绝非各个专门史的叠加，而是一般以专门视之的题目，未必可以用专门的眼光来分类归属。那些看似应当分门别类到某一特定专门的题目，其实恰好应该从其他专门的角度进行考察；更多的题目则是不必非要拘泥于某一专门，而应当从不同的视角加以探究。这样说决不是主张跨学科，只不过是回到问题本来不分科的状态。

近代以来，治学分科，术有专攻，认定西式分科之学为科学，又日益崇尚科学，著书立说，重视专题论文。久而久之，本来等而下之的专家称谓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尊号，误导学人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民国时期，专家之学成为时髦，只是其时专家指称未必是什么尊荣，在高明的眼中反而多少有些贬义，与时下普遍尊奉的时趋还是有些区别。顾颉刚、童书业所写《当代中国史学》，按照专史分门别类地排定学人的座次，识者不以为然。抗战结束不久，便有人针对学界风气一味窄而偏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1]时过境迁，风气变化，但在高明看来，专家仍是局限性显然的贬词。

专家的局限，不在于所写论著是否专题，正如著通史通论者未必真通，反而处处暴露其空泛横通，实际上不通之至一样，专家之学的窄而偏主要表现为：

治学先划定范围，不知此范围与周边乃至其他的关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结果对于研究对象不知渊源流变，来龙去脉，论述起来只能主观臆断，难免穿凿附会。

做什么只看什么，因为没有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知学问的整体和系统，即使找材料，也不知边际何在，脉络如何，即使专题研究，也不能把握什么书应该看，以及如何才能看得懂。恰如治史若只看乙部之书，非但不能达至上乘，简直就是学界笑谈。

不知专家之学的蔽陋，有的终生株守一隅，以专题研究为治学范围，始终不越藩篱，坐井观天，即使日积月累，天也只有井大。有的虽然若干年变换主题，每治一题，便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看似千方百计地扩张材料，可是要么不管文献的通篇本意，只顾挑拣自己想要的材料，填入先入为主的架构之中，问题不由材料发生，而由外在观念主导，每次转换主题，都不得不将所有文献重头翻检一遍；要么寻找前人未见的材料，研究所谓前人不知的问题，美其名曰填补空白，其实不过凿空蹈隙，即钻空子找漏洞而已。

分科治学的流弊所至，不仅专家日益成为荣衔，更有甚者，一方面好以专门名家，另一方面，大概也心知肚明专家并非褒义，又无力做通人，不甘局促，以趋时为预流，竞相放大自我以求引领风气。放眼读过书与一味找材料写出来的专题论著，每每形似而实不同，后者一旦超越实事求是信而有征，就难免捉襟见肘，甚至绽论百出。前者论事则胸有成竹，尺幅千里，说理则一语中的，收放自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时下通行的理工式学术评估标准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一般情况下极端重视论文，尤其重视由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唯有对待学术著作，则认定论文结集不是专著，其价值应在后者之下。这样的看法早已不是一般的成见，许多大学评聘职称，将论文集看低一级，连官方基金也将论文集排除于申请之列。殊不知近代多位学术大家影响后世既深且远，而且长时期被反复阅读征引的，恰是今人眼中价值不高的论文集。尤其是有主题的论文结集，详人所略，水分少，探究深，很能体现研究者见识水准的高下。即便主题未必集中，缘于历史上各为

单体的人事无限延伸的联系，也可以彼此相关，相互照应，展现学人的洞察与通贯。况且，近代学人往往首先关注枢纽性问题，成竹在胸，各个击破。到了抗战时期，无书可用，才转而著书。学术著述的价值，要看学人的见识水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高明绝不敢任意涂抹，自毁清誉。反之，不能升堂入室的门外文谈，无论形式如何，在何处发表，都没有多少价值。诸如此类的标准化评价，恰是因为不相信内行权威，又不具备评价能力，只能求助于所谓硬指标。而标准化往往是平庸化的变相。

钱穆曾经批评道：“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旧学宏博，既需会通，又求切合时宜，其事不易。寻瑕索疵，则不难……专家学者，率置其专学以外于不论，否则必加轻鄙，惟重己学。”他主张将新出的各科学问，“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比较异同，乃可批评得失”^[2]。其努力会通中西新旧的成效或许未能得到普遍认可，但立意却值得重视。

近代学术大家虽以专题论文为主要形式，却不会畛域自囿，守定一门一类，局限一朝一代，不仅文史兼通，而且博览群书，如同中国传统的通儒通人，或者说他们仍然以通儒通人为指向标的。当然，所谓通人通儒，并非简单地体现于写通史讲通论，那种形式上面面俱到无所不及的宏观巨帙；如果不能真正贯通所有事实道理，最多只能是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弄不好还难免横通和妄议。而出自高明之手的专题论文，既涵盖广泛，又各自专深，看似互不相干的论题都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正因为整体贯通、具体，才能深入且得其所哉，不至于求深难免偏蔽，求通则流于浮泛。也就是说，做专题研究而不以专家自诩，才不会以专门作茧自缚。

二 问题与系统

政治、社会与文化，在今日的学术体系中属于不同的分支，在历史研究领域则属于不同的专门。有关职能部门一再调整学科体系，试图使之更加科学，殊不知科学的原意之一就是分科治学，使分科更加

科学不过是同义的反复。再好的分类也是后人的认识，而过去的历史并不是按照后设的分类发生、发展、演化。分科累积起来的观念，导致对同一历史人事的描述认识在不同学科中往往大相径庭，若是局限于分科的知识，似乎习以为常，而跳出此疆彼界，比较不同的分科，就不免显得有些怪异。如何将旧籍与分科会通，决非轻而易举之事。

正因为清季科学进入中国时的重要意涵之一就是分科，而学制颁布后西式教育通用分科教学，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只有分科的学问才是科学。批评中国传统学术不分科而分派的傅斯年直到留学欧洲后，才幡然醒悟，认识到当时中国人所谓“这是某科学”，“我学某种科学”，都是些半通不通不完全的话，开始正视用分科眼光学习和研治学问引发的弊端。他说：

一种科学的名称，只是一些多多少少相关连的，或当说多多少少不相关连的问题，暂时合起来之方便名词；一种科学的名称，多不是一个逻辑的名词，“我学某科学”，实在应该说“我去研究某套或某某几套问题”。但现在的中国人每每忽略这事实，误以为一种科学就好比一个哲学的系统，周体上近于一个逻辑的完成，其中的部分是相连环扣结的。在很长进的科学实在给我们这么一种印象，为理论物理学等；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情形是经多年进化的结果，初几步的情形全不这样，即为电磁一面的事，和光一面的事，早年并不通气，通了气是十九世纪下半的事。现在的物理学像单体，当年的物理学是不相关的支节；虽说现在以沟通成体的结果，所得极多，所去的不允处最有力，然在一种科学的早年，没有这样的福运，只好安于一种实际主义的逻辑，去认清楚一个一个的问题，且不去问摆布的系统。这和有机体一样，先有细胞，后成机体，不是先创机体，后造细胞。但不幸哲学家的余毒在不少科学中是潜伏得很利害的。如在近来的心理学社会学各科里，很露些固执系统不守问题的毛病。我们把社会学当作包含单个社会问题，就此分来研究，岂不很好？若去跟着都尔罕等去辩论某种是社会事实，综合的意思谓什么……是白费气力，不得问题解决之益处的。这些“玄谈的”社会学家，和瓦得臣干干净净行为学派的心理学，都是牺牲了问题，迁就系统，改换字号的德国哲学家。但以我所见，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圇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读书

的时候，也要以问题为单位，去参各书。不然，读一本泛论，再读一本泛论，更读一本泛论，这样下去，后一部书只成了对于前一部书的泻药，最后账上所剩的，和不读差不多。[\[3\]](#)

学习或研究什么与是否科学有无关联，这样的问题在国学研究中常常被提起。不过，后起的系统如果不能有助于研究问题，反而要牺牲问题以迁就系统，显然就只是符合分科而无法科学，至少与今人以为不言而喻的科学南辕北辙。

分科治学的渊源流变及其成因，从历史进程的实情考察，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但就历史研究领域的专史而言，观念上固然是受分科之学的影响，客观上也因为人的智力体力能力不足等等局限，不得不缩短战线所致。起初研究者自知局促于专门是由于能力不足，可是既然术有专攻，也要想方设法力所能及地做到尽善尽美。只是受到眼界见识的局限，主观希望的超越，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继业者逐渐形成规范，局限化为行规。久而久之，一定之规变成小圈子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反倒成了登龙之术。形形色色的专家专门之学，非但不以为锢陋，还被无数新进奉为圭臬。

既然研究对象本身并不由后来分科所决定，那么用分科的观念看待研究的问题就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甚至固执分科的系统而看不清问题的本相。一般号称某史某学，大抵难免牺牲问题以迁就系统的偏蔽。只是专家以其具有的知识为所属专门的先验系统，所以才会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本书各篇，若以专门的观念看，可以划入不同的专史领域，但是用专门的行规来衡量，似乎又有些若即若离，似是而非。而这恰是整体立意的重要方面。从异样的视角考察惯常的问题，这样的有意为之绝不是要跨学科，而是旨在表明不必强求分科专门的归属，属于某学某史，无助于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分科的成见，跨学科就成了多此一举。跨学科的努力，恰好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学科制约下所产生的焦虑。况且真想跨越学科谈何容易。

今天以前的一切均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后人分类进行历史认识，不过图个方便而已，历史事实决不可能依照后来的分类发生演化，二者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研究历史上的某套或某几套问题，固然可以借助于后来依照分类形成的办法，可是既然史事与分类未必重合，固定从某一视角观念或用一种办法考察历史，难免产生误解偏

见，实在是相当危险的事。有许多历史问题，或许包含多种后来分类的成分，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类事实。如果单纯用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等专门的观念，不仅看不全，而且看不透，甚至看不到。

古人所谓的政治，与今人大相径庭，而古人的经济，反倒与今日的政治相近。梁启超曾经非常纠结于此，一直不赞成用经济来对应 Economic。中国传统主张学以致用，内圣而外王，正是理想的行为规范。王国维提倡为学问而学问，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而梁启超等人宣称的意在打破传统，却是传统的体现。在学术取向上，钱穆反对梁启超的具体而推崇其整体，不仅以其通，而且以其用。只是钱穆的以宋学始以宋学终，似不如陈寅恪讲宋学做汉学更加契合钱穆自己所说的非碎无以立通以及义理自故实出的境界。当然，也可能钱穆在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背景下所讲的话本来就有些言不由衷。

与学校相关的历史，一般放在教育史的架构之内，而中国历史上并无可以单独放在教育史的框架里进行考察的机构人事。即使近代以来新式学堂的发生发展，也很难用教育来限定。科举与学堂之争，其实是中学与西学之争，如何看待和安置中学，牵涉礼制的根本，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学堂的风潮，波及社会各方面，影响大大超出校园的范围。近代学生群体是军队以外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之一，学生的言行动向对社会具有的巨大能量，不是人数多少所能匹配。大学里面的党派之争，不仅影响大学师生彼此之间以及大学与当局的关系，而且往往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中等社会、城镇、北洋军阀、华南等等概念，看似属于社会史或政治史的范畴，但就概念本身的发生演化而言，又是知识演进的体现，可以纳入文化史的领域。而南浔这类江南市镇的研究，一般属于经济史或社会史，但湖社之类的社团组织，却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关联性紧密且重要。地缘性的联系，是与血缘、姻缘、业缘相连的又一重要社会联系纽带，在伦理社会的各个领域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于戏剧与政治的关系，用分科的观念，也涉及文学、社会、政治等不同的分支。而张之洞死后的盖棺论难定，显示了中国式著述的独特，不宜套用后来抄袭与盗版的观念，以及历史人物无论如何客观评价，终究不及时空全面的展现更加贴切。

孙中山无疑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诸如此类的历史要角，往往牵涉广泛，因而各种近代中国的思想专史，孙中山的思想都

是其中的重要章节，未能顾及一般重要人物，未必在所有特定领域都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忽略了各种思想的演进历史自有其运行轨迹，其间留下的身影应依据在特定轨道上的印记。若是依据一般通史的重要性编排特定领域的专史，则思想的逻辑和历史的秩序容易紊乱。反之，这些政治要人有时确实确在特定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反而因为其政治色彩太过鲜明而在特定领域的形象不能彰显。孙中山与新文化派的关系及其对科举制的看法，虽然涉及文化史教育史，影响却包括政治方面或是主要在政治领域发生作用。

直面问题的研究，一般很难放进专门的既定框架之中。与其说用别科或其他专门的眼光来看，不如索性不要不能蔽体的衣和无法适足的履。智者灵活运用各专门行之有效的办法，以体现史无定法的高妙，愚者则将专门变成固定知识衍伸的套路，以致破绽百出。在分科教学与分科治学已成惯例的情况下，身陷各种各样小圈子的学人不再努力放眼读书，而将分科的系统内化为自己全部的知识，遇到问题自然而然地首先去问摆布的系统，只能在系统设定的框架内研究所面对的史事，而不肯不会不能安于一种实际主义的逻辑，去认清楚一个一个的问题。甚至看到以认识问题为主导的相关研究，也习惯性地喜欢硬塞进某史某学的框框之中。用代代相承的系统，编制每代各异的谱系，再用以构建下一代的知识。周而复始，系统与问题势必渐行渐远。

三 专门与总汇

今日从职能部门到学校的各种表格，都要填写自己所属的第一、第二甚至第三级学科，而学人也喜欢自称其学科专业什么学什么史。如果只是图个方便，当然无妨，如果真的自认为某史某学的专门研究者，就成了畛域自囿的专家之学。抱着这样的观念态度，遇到问题，往往首先存了专门的成见，不去研究考察问题的全貌整体，而是用专门的眼界看问题，对于那些看似专门之外的方面视而不见，或是即便看到，因为与成见不相吻合，放不进由专门而来的固定架构，于是只好略而不论。结果，同一人事在不同的分科界域中看法差若天渊的情形所在多有。这与其说是研究历史，毋宁说是阉割式地创造历史。在历史的本事与后来的认识之间，充满隔膜和穿凿附会，难得一当。

在分科治学的边界或科际整合的场合，不同的分科专门研治同一问题，往往出现认识相去甚远乃至截然不同的情形，仿佛所呈现的历史图景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事。有时诸如此类的分别还可以说是因为分科不同，视角有别，侧重各异导致，有时则是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解释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类似情形在历史学科的专门史领域也不鲜见。例如研究晚清以来所谓乡绅的地位，治晚清史或近代史者强调科举制停罢后乡绅日益失去权势，治革命史者则凸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土豪劣绅化、为害地方，治社会史者又发现绅权与官权日趋合流，导致国家权力从原有的州县层级不断向下延伸。三者所面对的大体是同一时段的同一事情，或相互关联的同一问题，尽管各自或有侧重，本事基本如一，均为探究近代乡绅权势的变化，而得出的结论居然反差如此明显，不禁令人怀疑是否各自局于一偏，盲人摸象，以致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

分科专门的研究如果自成一体的小圈子，在视角、架构、取材、解读等方面形成一定之规，不看不学不顾其他分科专门的观念做法，又不愿与相关分科或专门沟通联系，势必陷入画地为牢、坐井观天的窘态。没有全局整体在胸，非但不能透过各类史料形形色色的罗生门现象，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反而被材料的各说各话牵着鼻子走，使得研究层面的罗生门情形更加扑朔迷离。如此这般各执一词的各人心中的历史，虽然能够满足各种分科专门小圈子的自娱自乐，提供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掌故，有趣倒也有趣，但只不过是一时半会儿的兴味而已。一旦与外界沟通联系，沙上筑楼产生的幻象瞬间就会破灭。

近代学人信奉各个分科的材料一律平等，可是游走于各个分科之间，也会有高下取舍。王国维治学，曾经三变，转治经史之后，对少壮时的哲学、美学、红学研究绝口不谈，对于宋元戏曲研究的相关问题也是笑而不答。关于此节，相关学科作为历史事实研究固然应当，如果继续立为标竿，至少要考虑本人认识的变化及其缘由，否则与当事人的自我认识发生冲突，难免以前贤唾余为时趋之嫌。此事凸显不受分科专门局限的极端重要。诸如此类的情形其他学科也不鲜见，在某科不入流者，在别科却被奉为泰斗，因而这一科高山仰止的鼓噪，旁观者看来总觉得有几分等而下之的滑稽。

另一方面，史学一定程度上成为各个学科的总汇，各种专门史应运而生。受西学影响的中国分科之学起于晚清，而且与史学的革新关系紧密。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陈黻宸所编《中国史讲义》，强调史学与科学的关系，认为：“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

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是故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4]后来傅斯年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也断言：“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5]

史学既然与其他一切学科相关，则史学包含各种相应的专史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清季刘师培附会西学，拟作周末学术史，比照西学的分科，分别拟撰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16种专史。虽然声称官学衰而私学兴，官学主合，即西人归纳学，私学贵分，即西人演绎派，其实观念架构都是因缘知之甚少的西学。^[6]留学归来的胡适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是包括民族、语言文学、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十项专史的中国文化史系统。其步骤是因陋就简地先做成各种专史，形成一些大间架，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然后专史之中再分子母。虽然“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放在第三步，而且注意到应该排斥附会，可是其所提倡的比较，与附会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更为关键的是，先验而成的大间架，本来就是一种附会。^[7]

分科引起的困惑，高明也难免俗。“六经皆史”之说的争议，颇能体现其间的玄妙。钱玄同在日记中总结道：

我说宋以前对于“六经”，除最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一物，最高明者，如王充、如刘知幾皆是也。刘知幾只认《尚书》《春秋》是史，决不连类而及于《易》《诗》（三《礼》倒是应该说为“书志”之源，但是他没有说）。可见刘氏不以“六经”为一物也。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

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汉之古文说、今文说尚不如此（惟崔东壁不认为一物，他不信孔子删定“六经”之说，可谓有特识）。梁任公渐能打破，然而这还不太行。至胡适之、顾颉刚始能大解放。不庵谓此其故，实由经义与八股造成，此说甚是。按《十三经》（及《大戴礼》《国语》，当如此分配：

《易》——哲学。《经》（单是《经》）又当互见于术数类。

《书》——历史。

《诗》——文学。

《周礼》	}	但两《戴记》尚应裁篇，别出《曲礼》、 法制史。《王制》之类入此，《礼运》、《乐记》、 《大学》、《中庸》之类入哲学。
《仪礼》		
《大戴礼》		
《小戴礼》		

《春秋》	}	历史。
《国语》（《左传》）		

《公羊》	}	依二传解经，《春秋》实非史，《公羊》当 哲学。与《繁露》同矣，《穀梁》实在……公羊走。
《穀梁》		

《论语》——哲学。

《孝经》——哲学。

《尔雅》——字典。

《孟子》——哲学。

因而论“经”之名非打消不可。凡拢着说“六经”是什么东西都是胡说，因为此几部书其性质本不一致也。[\[8\]](#)

按照钱玄同的看法，探究经书的本源尚属可取，因为各经成书之际，显然并非统一作为经书。可是后来将“六经”视为一物，却是统一当成经书。经为一物的时代，各书的确发挥着经的作用。将经书分别对应晚清以来源自外洋的各个分科之学，在破除经学一体的后认的同时，却陷入了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的泥潭。这些对应即使成立，至多也只能说今人认为某书可以归于某科，而不能说古人已经有此分科，也不能用分科之学的眼光来看待各书。在经学一体及其转型的时代，若不以经学看各书，就只能是溯源则疑古辨伪，论今则格义附会，无法完整地认识经及经书的历史作用。

史学的专门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其他分科以及分科治学时风的影响而成，史学的总汇地位加上喜欢望文生义的比附习惯，各学科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由学科系统形成的各式各样的观念，或多或少会影响史家的历史认识。在以分科为科学的误导和科际整合时以别科为新奇的诱惑下，定力不足者或误以为跨到别科可以不学而能，以趋新而致盲从；或虽然有所警觉却无力分辨而不自觉地落入彀中。两类现象均屡见不鲜。

历史上单体的人事存在全方位无限延伸的联系，人们无法预知究竟哪方面、何种程度的联系对于认识理解该人事的作用具有何等重要性。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往往不是直奔主题的有意栽花，而是相关研究的无心插柳。先有分科及专门的成见，容易预设阅读的范围和努力的方向，甚至表述的架构。不少研究者取鉴方法，不是运用于阅读文献和搜集材料的过程，而是在表述的阶段为了使论著的结构和文字看起来比较具有理论色彩。由于研究阶段并未贯彻其表述的理论方法，实际上等于预设架构填充材料，而没有在研究进程中检讨验证所借鉴的观念方法与事实是否契合。如此一来，其视野必然有所偏蔽，其取材只能因陋就简，其做法难免削足适履。

如果史学为一切学科及方法的总汇，则治史不宜分科，而非跨学科。若是有了分科的界域成见，无论如何努力，恐怕都难以真正跨越。所以，治史必须整体之下研究具体，胸有成竹，才能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先有整体，可将具体安放到适得其所，再求精深，不仅可免偏蔽，而且能够贯通，更加入木三分。

四 贯通与专精

受专门之学的制约，容易为一时风向的偏蔽所误导。如梁启超受社会学的影响鼓吹新史学，宣称中国无史，所谓廿四史，大都帝王的家谱，而非一般民众的历史。章太炎、陈黻宸等人一度也有类似看法。陈黻宸虽然不赞成中国无史之说，却主张：“言史学者，必以能辨社会学为要。”“非社会不足以成政治，非政治不足以奖社会。政治之衰败者，断不容于社会文明之世。社会之萎落者，即无望有政治振起之期。社会兴于下，政治达于上。有无限社会之权力，而生无限政治之举动。有无限政治之举动，而益以表明无限社会之精神。转辗相因，其果乃见。”以此为准，中国学者“往往识足以动天地无尽之奥，而不足以知民俗之原，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不足以证闾里之事”。而欧美各强国，“于民间一切利病，有调查之册，有统计之史，知之必详，言之必悉，如星之罗，如棋之布，如数家人米盐，厘然不遗铢黍。彼其所以行于政治者，无一不于社会中求之。而我国之社会，究不知其何如矣。总之，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以是言史，夫何敢！”照此说法，则没有社会学的古代中国，何来历史？

虽然陈黻宸称许“力学有识之士，发愤著书，往往有得于父老之传述，裨乘之记闻，大率支离烦琐，为荐绅先生所不言。采其遗文，加之编辑，反足激发性情，入人肝肺，东西南北，类聚群分，歌泣有灵，按图可索，言史学者不能无意于社会学矣”，却不得不承认：

“我中国之史之有关于社会者甚少矣。今试发名山之旧藏，抽金匱之秘籍，与学者童而习之，屈伸指而论其大概，亦若条流毕具，秩然可观，然不过粗识故事，无与纲要。即择之稍精，而有见于古今治乱盛衰之故矣，然于其国之治之盛，不过曰其君也明，其臣也贤，于其国之乱之衰。不过曰其君也昏，其臣也庸。于此而求实事于民间，援輶轩之故典，亦徒苦其考据无资，虽华颠巨儒，不足以识其一二。故无论人之不知有社会学也，即令知之，而亦心不能言，言之而亦必不能尽，尽之而亦必不能无憾于浩渺杳冥，泛然如乘不系之舟，莫穷其所自之，而社会学乃真不可言矣。”^[9]

诸如此类的观念，在当时的风气之下看来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然而，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不同，各部分的功能作用自然各异，不宜用同一尺度来量度。王朝世系在历史上往往起到维系种族存

亡纽带的重要作用，王朝亡而种族随之湮没无闻的情形比比皆是。这样家国天下一体的事实显而易见地摆在古人面前，自然不能不十分注重王朝世系。又如受域外学术取向的影响，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盛极一时，不少人以为研史应从经济入手，凡事要从经济层面求得根本解释。实则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更重广义的政治，典章制度才是解析文本史事的枢纽关键所在。

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无非是有助于解读材料和史事，一切实际有效的观念办法，都是有用的，同时又都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史无定法才是唯一可以确定无疑的方法。人类社会的历史，本来就是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的矛盾统一体，分别侧重可以，执于一偏不行。中国的历史文化既一脉相承，又多所变异，尤其是近代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今中外，缠绕纠结，之于古则形同实异，之于外则似是而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社会科学是沟通联系不可或缺的工具。而研治近代历史，又是融会贯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天然平台。傅斯年对社会科学家治史的不满，除了史语所分工不治近代史和社会经济史以及不相信历史可以归纳外，主要在于后者往往过度套用架构，而罔顾是否吻合事实，遑论能否进一步解读史事。社会科学进入近代中国，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用社会科学观念考察和分析中国现实并提出应对方案，已经成为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把握社会科学方法的有效与有限，并与史学结合，应用于历史研究，远不是分门别类的分科之学所能解决的一大难题。

适得其所地运用各种有效的办法研究历史的具体实在问题，而不必将历史划成各种畛域自囿的专史，否则专门变异为成见，又以成见为研究的前提和裁量的尺度，势必本末倒置。所谓高招妙法，往往大道无形，善用者不着痕迹，反之则满眼都是模式架构，却陷入套用外国框框越多价值越低的尴尬。时下的各种专史，不仅领域有别，而且对象各异，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貌似严谨有据，一旦破除壁垒，就成了原形毕露的百衲衣。

更有进者，虽然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曾认为社会学对于史学应有极大影响，可是这显然与误解所谓科学方法不无关系。受明治日本的影响，近代中国学人将逻辑方法等同于科学方法，而在归纳与演绎之间又特重归纳法，几乎以为归纳法就是科学方法。而归纳法的滥用，很容易将看似相当的事物认作同类，这与史学以人事为单体而注重彼此联系的本质相矛盾。讲究事实联系只能求贯通，不能言归纳，

因为但凡归纳，势必忽略差异，强求一致，将并无关联性的事物生拉硬拽地联系在一起，以个别为类像。为了将不相啮合的碎片拼接起来，不得不仰仗后出外来的各种架构，而罔顾史事碎片的形状材质。这样拼凑而成的图像，不过自己心中的历史而已，说是研究，实则徒劳地想对已经过去的历史进行增减，以便削足适履地符合自己的想当然。如此一来，解释与认识的捉襟见肘也就在所难免。

治学应尽可能贯通所有材料和事实，所以学人应以不分科的态度研究专题，不宜终身株守一隅，尤其不应自诩为某科某史的专家。力有不逮而不能超越局限，固然是无可如何的事，若是将落草为寇当成占山为王，就非但不能藏拙，反而自曝其短。反之，以专为根本力求贯通，守成之后再努力取法乎上，不必人云亦云地试图一步超越，由专而通的实例尽管并不多见，但也并非绝无可能。京都大学的森时彦教授从棉纺织业入手，时空大幅度延伸，最终重构整个工业革命的历史画卷，堪称典范之作。相比之下，若是未经放眼读书，治学一味悬问题以觅材料，却侈谈碎片化，就真是不知所云，贻笑方家了。

本书的一些章节，将来可以扩张成为专书，有的已在写作当中，如辛亥鼎革与民国肇建。有的进行多年，还须留有待，如南浔的研究。此一富可敌国的江南名镇，与近代中国有着太多的关联，远非时下经济史社会史的市镇研究所能涵盖和展现。只是有的方面必须等待材料的披露，如南浔四象之一的嘉业堂主人刘承幹，为近代一大藏书家，又好结交沪上名士，且与来华外国学人关系匪浅，实为研究南浔与近代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枢纽。刘承幹有日记和来往书信，藏于上海图书馆，虽然陆续有所披露，未能得见全豹。希望有关方面尽快出版，使相关研究顺利进行，并纠正以讹传讹的种种流言。至于北湖社的详情影响，也需北洋资料的扩大出版，无法在画史的范围全面地论述清楚。

[1] 王锺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25：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10页。

[3] 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页。

[4]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5—681页。

[5]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6] 刘光汉：《周末学术史叙》，《国粹学报》第1期，学篇，1905年2月23日。

[\[7\]](#)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页。

[\[8\]](#)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2页。

[\[9\]](#)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第675—681页。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之争，所争即中西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其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内核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常态。用分科眼光认定的所谓教育转型，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造成培养新式人才的机制，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更新，使得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和思维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促进了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与此前截然不同，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主导和笼罩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造成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发生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不仅必须依据所对应的西学分科来决定自己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在没有宗教精神的文化系统中失去道德伦理的支柱作用。如此一来，追赶先进开始扮演终极关怀的信仰角色，欧化西化成为时尚。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觉得一无是处，从而埋下赶上甚至超越他者之后自我迷失的隐忧，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文明多样化的重要选项的潜在价值无从显现。而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认识历史，了解现状，把握未来，已经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1\]](#)

一 教育与“教”“育”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学制系统和教育理念，开始于晚清，使用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教育观念来考察评判中国历代的相关文本、观念和

行事，也始于晚清。对此，今日通行的教育史和一般通史，大都用之不疑，而不能察觉二者的形同实异。社会大众也常常将古今教育加以比附，更加混乱不堪。教育一词，据说语出《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实，这里并不是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古代汉语以字为单位，所以《说文解字》分别解释“教”与“育”的不同意涵：“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所善也”。晚清以前，偶然有来华西人以“教育”为对应西文的翻译名词。今日通行的含义及用法，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汉语所固定，清季输入中国，开始专指西式教育，继而概称历代所有教与育的有关机构行事。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作为方便名词，尚无大碍。可是如果因此而求定义，好比附，就难免牺牲事实以将就概念，造成对于文献和史事的种种误读错解。有鉴于此，不应以后设的教育观念涵盖裁剪形似而实不同的前后史事，削足适履地强古人以就我，而要探求中外本来的理念系统及其相互传播融汇、沿革衍化的历程，以致贯通。

清代教育，前期集唐宋以来学校体制之大成，后期开现代教育体制之先河。前期学校，育才教化，贵通不贵专，所重在于养成做人之道和御人之人。后期学堂，分科教学，虽有普通学和国民教育的取向，总体上贵专不贵通，所重在于培育治事之人和办事之才，使人人各得其所。偏于人可以因人而异，偏于才则势必一视同仁。此一分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转折的影响至深且远。

中国历来重视人文教化，上古即有学、序、庠、塾的理想。汉代独尊儒术，在京师设立太学，在郡国设立学官，后渐立学校。隋唐时期，科举制形成，逐渐取代与门阀等级制相适应的选举制，并与学校相连接。唐代在京城设国子监，统辖各学，在各地设郡县学校。宋代书院勃兴，元代广建社学。至于明代，学校体制大体已备。

清代学校体制远袭《礼记》遗意，近承明代成法，京师设国子监（亦称国学），各地设府、州、县学。又以旗人入主，设宗学、觉罗学，置于国学之上，在京师及各地八旗驻防则为满洲、旗人子弟设立各种官学，实行专门教育，并专辟仕进的特殊途径，以保障其族性和特权地位。

清因明制，以科举取士为正途，而科举必由学校。其规制悬学校之名而导以仕进之路。学校乃教化所从出，以纳民于轨物，在王朝统

治体系当中地位极崇，作用至大。一方面，学校为天下士子的进身之阶，承担王朝储才养士的职责，关系人才盛衰；另一方面，学校又是典礼教化的重要场所以及学政、学官整饬士习士风的机构，引导士林风习，端正世道人心，至关重要。

学校有限，学额不广，遂开设书院，以导进人材，补学校所不及。就实际而言，书院其实是混合当今学校、基金会、纪念馆、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实验室乃至会议厅、宾馆及同乡会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基本组织。书院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兼顾授徒与讲学；考课；授徒与祭祀、纪念并重；从事特殊教学；不授生徒，以祭祀、纪念为主等各种类型。书院的地理位置日益近于城市，与行政、经济中心构成对应关系，逐渐呈现省会书院（或称省城书院、会城书院）、府郡书院、州县书院、民间书院的层级。较有影响力的书院往往位于大城镇，其生源可以突破地域局限。偏僻州县和乡镇的书院通常规模影响较小，生源受到限制。书院与行政系统对应而形成的等级区分，使得低一级书院生童向高一级书院流动。当然，这样的层级区分只有相对性。书院掌教水平的高下及其依托地域的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对于书院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的影响更大。

书院以外，复推广社学、义学，作为府州县学的延伸。社学、义学通常较书院层级低，被视为书院之小者，分工、定位也有所不同，社学、义学以端蒙养，重在推广教化，化民成俗，书院则作育成才，对有一定教养者进行高深教育，积蓄资治人才。社学、义学乃至书院的名实，本来分界不严，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往往混用。各州县及以下地方，社学、义学常有易名为书院者。清中期以后，书院、社学、义学的名实界限益趋混淆。

学塾（通常有书房、书塾、书屋、书馆、间学、学馆、馆学等多种称谓，各地特有的名称更是不胜枚举）的情况最为复杂，涵盖各种层次、类型，不可一概而论。书院、社学、义学的设立和运转，每每与朝廷及直省官府发生种种联系，故常有政治影响力施加于此。而为数众多的各种学塾则相对所受干预较少，运作程式依照民间约定俗成者为多。由于学塾名目繁多，星罗棋布，时人难以记之于典簿，或根本不屑于付诸笔墨，留存后世的系统资料反而稀少，向来少人注意研究，而研究者大都以改良私塾的眼光审视。故而关于学塾的实情，只能大体概括言之。往往是有如此事，而非皆如此事。

学塾渊源甚早，其设置数量、从教受业人数及社会影响都超过书院、社学、义学等，也大量存在彼此混同、难以区分之例，而且并非全由民办。其教学的内容形式未必比其他教学机构守旧落伍。用“私塾”一词指称历代儒学、书院以及官立社学、义学以外各种类型的学塾，始于立停科举前后，趋新人士借此称谓排斥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的本土学塾，坊间并不通用。直到民国时期，普通百姓仍有不知政府公文与知识人言语中的私塾所指为何之事。

国子监、府州县学和宗学、觉罗学以及各种官学，均由官办；书院、社学、义学的经费来源多样，既有官款，也有民办，还有官为之倡议，集众人之力所设。清前期官设社学较多，甚或成为州县学校的基层单位，由学校教官掌教。学塾的名目、形式多样，既有多种方式的个人出资，也有同族同业同籍共立。改良私塾，族学、义学也列入其中。

在国子监肄业和归国子监兼管的生徒主要是贡监生，多为正途，另有八旗官学生和算学生。府州县学进学者是按照科举学额通过各级童试取进的生员。就学于书院者，以学校生员为主，举人、童生也所在多有，程度间有高于学校者。社学、义学，入学者多为童生，部分面向开蒙者。学塾大体有蒙馆、经馆两种类型和等次，前者着重于识字发蒙，后者侧重于应试和经典学习。这种情形在社学、义学、族学里同样存在。更为普遍的则是同一学塾兼容各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生徒，因人施教。

清代的学校、书院、社学、义学，不能以晚清以来移植模仿外国的新式教育机构相比附。清代一反前明风气，不尚讲学，学校所设各种教官教职以及书院掌教，虽间有讲学，主要是通过考课以各种奖励激励扶助士子向学，以读书自修和批阅笔记的形式扶掖导进。在较长的时期内和相当普遍的情形下，其实并未实施如后来意义上的经常性教学活动。就此而论，很难说是实际承载教育的主体单位。只有蒙馆的塾师才以日常教学为主。民众的启蒙教育多在家庭及各类学塾进行并完成。各级学校以及书院、社学、义学、学塾之间，不存在学制体系的关联，生徒学习，没有一定的年限、层级，一般无须逐层递进地升级升学。即使实施教学，也很少分门别类。学校和书院，还担负典礼、祭祀、藏书、刻书等事，形成地方的文化中心。也可以说，在教化的一统之下，中国传统的所谓教育，大体分为追求科考功名和利于日常实用两个部分。

与此相应，清朝本来没有专管各类学校学塾的教育行政机构，在京师，主管科举的礼部主要负责与一般学校相关的事务，国子监、内务府、理藩院等分别负责各种特殊学校的事宜；在各省，则派差学政，职掌学校政令。学政不仅不是地方官，甚至不是实缺官员，名义上承担教士之责，实际只能以考校定去取。而上自清帝，下至各级官员，都以兴学育才、化民成俗的教化为己任。行省是内外相维政治体制中的分地而治，并非一级行政区划，因而没有省一级的学校建置。反而书院在实际推广过程中，逐渐形成依托省会、郡城、州县的大中小书院，成为清季改制的凭借。

乾隆朝以后，学校、书院、社学、义学逐渐废弛，徒具形式，加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广泛冲击，大半颓废。一些地方的社学转为自卫结社组织。同光新政，力图振兴，学校成效不彰，社学、义学只有短暂中兴。新立书院则朝着两个方向转变，其一，更加着重于学术传承，倡导不同的学风，不仅影响一省文风的盛衰，而且造成学风转移；其二，兼采西学新知，甚至改用西法教学，成为导入新式教育的重要渠道。

二 新学堂与旧学校

大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可以说是新（西）式学堂逐渐全面战胜中国固有学校的50年。新式学堂经历了从无系统到有系统的发展阶段，前一时时期步履艰难，后一时时期突飞猛进，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学科体制和教育系统，确立了相对于中国固有学校的制度优势。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西学的乾坤颠倒。本来是作为中学补充的西学反客为主，从层层递进到高歌猛进，直至将中学蚕食鲸吞，一枝独秀。而代表中学的府州县学，最终却陷入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地。

鸦片战争后，一些开明官绅主张采西学，设学馆，以应对山雨欲来的大变局，专门学习西学的新式学堂应运而生。来华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一定程度上起到示范作用。学堂的组织、管理、教学形式和内容，与中国固有的学校、书院、学塾等全然不同。伴随着自强运动的展开，学堂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逐渐扩展到学习工艺、军事、实业，并派遣学生留学欧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出现了学习一般西学知识的普通学堂。这一时期的学堂教育，无论一校之中还是各校之

间，缺少配套衔接、循序渐进的层级体系，归属和管理，也是五花八门。所学西学知识，为片断和片面的，只是补充中国固有教育之不足，没有整体取而代之的规划目标。管理则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相关部门对口负责。是为学堂教育的无系统时期。

五口通商后，天主教会已在五口和香港开设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进入内地，逐渐遍布全国，自成系统，构成对中国固有教育体制的冲击和西式教育的示范。而太平天国战乱使得广大区域的学校、书院受到严重破坏。官员力图整顿，收效不显。

由于对外交涉及通商日渐增多，办事官员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加之中英天津续约和中法天津条约规定，遇有文词歧义之处，以西文为准。因此，创设外语学校，培养通事译员，成为当务之急。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恭亲王奕訢等奏准仿俄罗斯馆例，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以利对外交涉。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京师同文馆开馆。一般视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肇端。最初仅设英文馆，次年，开办法文馆，并将俄罗斯馆移入同文馆，各设洋汉教习。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奕訢等奏请于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副、岁、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

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引起朝野上下近半年的论争。焦点在于，是否设天文算学馆、招科举正途为学生、聘请洋人为教习等事。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以设立专馆，只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大学士倭仁奏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不必师事夷人。

同治五年十二月，奕訢等再上折请设天文算学馆。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清帝发布上谕：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派徐继畲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驳回张盛藻所奏。倭

仁奏请另行择地设馆，保举人员讲求天文算学，亦因无人可保，不了了之。在学堂问题上的中学与西学之争，由此浮上台面。

五月，天文算学馆设立。由于倭仁等人的反对，京师的各省士人聚党议阻，报考者锐减。因天文算学馆学生出身正途，特派老成持重、兼知中西之学、足为士林矜式的太仆寺卿徐继畲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

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统管教务。其后，京师同文馆学生人数倍增，课程渐趋多样化，校舍规模不断扩大，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多学科的综合学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同文馆遭受严重破坏，师生解散。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同文馆归入大学堂。历经40年的京师同文馆宣告结束。

同文馆初立时，翰林院人员入学，被视为有辱斯文。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极容易，不必考试。后想入者增多，考试规定渐趋严格。由于不少学生入馆后继续应试科举，获取功名，同文馆渐为士人所重。

同文馆初期主要培植翻译人才，故仅教授语言文字。随着天文算学等各馆的增设，陆续开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课程，但仍以洋语文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夏季加添汉文功课。

同文馆学生毕业后，主要供职于外交界。全部毕业学生91人，在外交或涉外部门任职的40人。其中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7人。其余27人任军政职务，4人从事教育，20人供职于铁路和其他部门。

对于同文馆的利弊得失，时人评价各异。郑观应认为，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不过学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术、化学，仅初习皮毛。梁启超批评同文馆所聘西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华人则多学而未成或不适用之人。而光绪十一年奕劻等奏称，同文馆设立20余年，各学生等或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卓有成效。

同治二、三年，上海、广东也分别开办同文馆（上海后改称广方言馆）。新疆、台湾、东北、湖北等地，也开设了一些外语教学机

构。

同文馆等以学习外语为主，后来虽然增设西学课程，目的还是为了中外交涉的翻译之用。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逐渐察觉列强民富国强的秘诀在于教育。咸丰十年以后，冯桂芬等人鉴于西人擅长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各有成书，已经翻译者十才一二，必须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由粗浅而入精微，提出采西学、设学馆。^[2]虽然仍是讲究翻译，目的却是求西学。而一般民众对教会学校的反应日趋积极，给官绅造成压力。清政府推行自强新政，对于西方艺学的需求迫切，陆续开办了军事技术、技术以及专门实业学堂。

甲午中国战败，趋新官绅认为，日本取胜，在于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必须培养造就近代工业急需的技术人才，兴办各种专门、实业学堂。后来康有为提出：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人间一事一艺者，皆为专门之学。主张各省府州县广兴学务，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铁路、农业、商业、师范等，均设立专门学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适应农工商各业发展及时局的需要。戊戌变法前，各省陆续开办了一些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连降谕旨，要求各地重视兴办专门、实业学堂。铁路、矿务、农务、工学、商学、茶务、蚕桑等学堂在各地迅速开办。变法失败，在刘坤一等人的坚持下，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部分兴学措施得以延续。

受到日本维新变法成功和甲午战败的刺激，全面学习西方和完整学习西学逐渐成为朝野关注的议题。从郑观应开始，李端棻、康有为、张之洞等皆主张以书院为基础，改建一套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乡，各有期限、逐级递进的学堂体制，广设大学、高等学、中学、小学，形成完整的新式学堂系统。由于原来常规的学校系统只有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地位日显重要的省一级并无学校建置，同时学校还兼有礼制功能，不宜更张，戊戌变法期间，谕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也就是说，在保留原有学校的情况下，另行构建一套新式学校体制。留学的目的地则由欧美开始转向日本。

甲午之前，中国人开设的各类新式学堂共有25处，各种学堂实行分科分级教学，重视实习，但大都只学西文、西艺，囿于一才一艺，缺乏普通学教育。维新人士批评不改科举，不学西政，不讲爱国，不求精深，只用洋人，毕业生只能担任翻译、买办，而不能培养出可备国家之任的实学真才。而且各学堂主要为各地洋务机构的附属，互不统辖，彼此也没有依次递升的衔接关系，多数学堂仅为一级制，下无预备学校，上无继续研修机构。

随着对西洋长技的逐渐认同和对新式教育认识的加深，建立新学制的呼声时有所闻。传教士的介绍是中国人最初了解西方学制的主要管道。受其影响，中国士人也渐有相关著述。在介绍、吸收外国学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关于中国学制的构想。容闳向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建言七事，包括设立实业及陆海军学校、颁定系统学制。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要求全面引进西学，建立新式教育制度。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拟定详备的办学计划，以原来各州县、省会和京师的学宫、书院为基础，仿照泰西，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文学分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等六科；武学分陆军、海军两科。每科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科，延聘精通中西之学者为教习，详订课程，小学三年优秀者升中学，中学三年优秀者升大学。^[3]不仅要求学堂数量大增，教学内容中西并举，政艺并重，而且正式提出设立三级学校，以及分层级逐年考试递升的制度，初步勾画出中国学制系统的轮廓。

上海正蒙书院为最早略具普通小学性质的新式书院。到1899年，至少新开办学堂104所，分布于17省。

学堂渐多，构建学制系统愈加引起关注。1895年，康有为奏请令各省州县遍设艺学书院，招收15岁以上学童入院肄业，通过考试，给予秀才出身，并荐于省学；省学通过考试，予以举人出身，贡于京师；京师中选者给进士出身，明确了各级学校的衔接关系。次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初步拟出各级入学年龄、课程以及肄业年限。这使中国引进西式教育体制的设想更加系统、完备。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相继派员游历日本，考察学务。出使日本大臣裕庚介绍了日本仿照西法设立分科大学的情况及大学科目、初学

功课等。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御史李盛铎、编修李家驹、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赴日，将日本大学、中学的规制课程以及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记成《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一书。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出版《日本学校述略》和《东瀛学校举概》，详细介绍日本学制。国内报刊亦翻译刊登日本学制的各种资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康有为奏请构建普通学堂体系：各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立专门高等学、大学，而京师应早立大学。张之洞也主张天下广设学堂，各省道府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于大学堂兼寓中小学堂之意，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并请旨严饬各省督抚学政速将中小学堂开办，务使一年之内，每省府州县皆有学堂。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颁发京师大学堂章程给各省府厅州县，谕令照章以各级书院改建为各级学堂。

甲午战后，普通学堂快速发展，1895至1899年间创办的100余所新式学堂中，普通学堂占84所。其中最重要的为天津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

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每级又各分为头、二、三、末四班，依据名次，按年递升，是为中国近代最早分级设学的学堂，成为新式大学和中学的雏形。上海南洋公学陆续设师范院、外院、中院、译书院、铁路班、特班、政治班（后改为商务班）及附属小学。后统一为师范、外、中、上四院，后三院的学生各分四班，按年依次递进。其三级教育体系，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树起模型。

除同一学堂内分成两级、三级外，一些独立的一级制新式普通学堂，还初步与其他学校形成衔接关系。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提出，各省设学，应抱定中体西用宗旨。各地普通学堂多注重实学，中西学并举，政艺学通习，并在西学课程中增添政治伦理，在中学课程中废除八股词章，增加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由于不少学堂由书院、学馆改建，中西学结合、政治史地与格致算学兼课，实际上是压缩经学，添设西学。

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议设京师大学。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以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应参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并奏陈六条意见：宗旨宜先定；学堂宜造；学问宜分科；教习宜访求；生徒宜慎选；出身宜推广。因恭亲王奕訢等枢臣奏请缓行，此事暂被搁置。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谕屡次催促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枢臣一直敷衍拖延。康有为再度奏请立学宜速。五月，严旨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从速复奏京师大学堂开办事宜，毋再迟延。诸大臣因无成案可稽，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总理衙门遂将此章程上奏获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至此，京师大学堂得以正式成案。

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之初，即明言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是为立学宗旨。梁启超代总署草拟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重申宗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六月，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对章程有所修正，提出具体办法八条：立仕学院；出路宜筹；中西学分门宜变通；学成出身名器宜慎；译书宜慎；西学拟设总教习；专门西教习薪水宜从优；膏火宜酌量变通。经孙家鼐推荐，任命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稍后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掌握实权，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

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得不废。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事宜，于是年底正式开学，规模较原计划大为缩小，仅设仕学院，以教进士举人，并附设中、小学堂。学生总共不及百人，讲舍不足百间。次年，学生增至近二百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开办两年间，学生从未足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甚至视同蒙养学堂。

次年，京师大学堂复办，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后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大学堂事务变成兼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另设总监督，专管本堂事务，以张亨嘉为首任总监督。

京师大学堂由管学大臣总其成，下分教务和事务，教务由总教习主管，事务由总办主管。后孙家鼐上《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对总教习的设置有所修正，除原设中总教习外，用丁韪良为总教习，总理西学，仍与订明权限，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

科目设置，分为10科：1、天学科，附算学；2、地学科，附矿学；3、道学科，附各教源流；4、政学科，附西国政治及律例；5、文学科，附各国语言文字；6、武学科，附水师；7、农学科，附种植水利；8、工学科，附制造格致各学；9、商学科，附轮船铁路电报；10、医学科，附地产植物各化学。

京师大学堂还设有师范斋、仕学院、医学馆、编译局、藏书楼、仪器院，另附设中小学堂。复办以后，调整为预备科、速成科、进士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等。

《京师大学堂章程》所定功课中西并重，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者，学生皆通习；专门学者，每生各占一门。张百熙掌校后，增加西学课程，缩减经学课。张百熙主持大学堂之始，以总教习非有学赅中外之士，不足以膺斯重任，即谢去丁韪良，以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演贯古今，详悉中外，力聘为总教习。

辛丑和约后，新政重开，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专设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并兼管全国学务。师法东西各国尤其是日本的教育新制，相继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学堂教育进入有系统时期。

新政复行，各省督抚遵旨纷纷条陈建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扩充整顿，并饬各省筹措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以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五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指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名为学堂或各种学校。另参酌中外情形，酌拟设学堂办法，令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计自8岁入小学起，至大学校毕业止，共十七年。为救时计，可权宜变通，先多设中学及高等学，选年力少壮聪敏有志生员迅速教授，先学普通，缓习专门。又请饬出使大臣李盛铎，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筹，酌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

八月初，谕令督抚、学政将各省所有书院改设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切实通筹举办。

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改济南泮源书院为山东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袁世凯奏请先就大学堂内区分三等：一、备斋，习浅近各学，两年为期；二、正斋，习普通学，四年为期；三、专斋，习专门学，以两年至四年为期。又拟另设蒙养学堂，令幼童自7岁至14岁，八年内专攻讲习经史兼解中国浅近政治学、地舆学、初级算学，毕业后选入备斋，加习西学。

十月，谕令政务处即将袁世凯原奏并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接着谕令各省将小学堂毕业生考取功课合格者，送入中学堂肄业；俟毕业后考取合格者，再送入该省大学堂；毕业后取其合格者，给照为优等学生，由该省督抚学政考校择优，咨送京师大学堂复试。

江苏、广东等省兴办大学堂，其课程、等级、班次，均照山东模式。课程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分设伦理、政法、本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数学、格致、博物、图画、乐歌、体操诸门。

内地省份闻风而动。陕西、四川、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湖北、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山西等省，相继仿行。宗室觉罗及八旗官学等亦改为中小学堂。专门、实业学堂的发展也大为加速。

自1862至1902年，新式教育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初具规模。从1898年起，学校类型逐渐完备，京师设大学堂，一些省城设有高等学堂，府、州、厅陆续创办了一批相当于普通中等教育的学堂，县及县以下地方则开设了类似普通小学和蒙养教育的机构。各学堂通常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和系统的课程设置，有的已经相当详备，对该学堂乃至其他同类学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制定全国性统一学制积累了经验。但各个学堂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的章程，难以规范全国各级各类学堂，各学堂自成一统，互不衔接，科目课程以及学级设置五花八门，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循序渐进地培养各级各类人才。随着学堂数量的增加和学务规模的扩大，制定全国统一学制，规范各级各类学校的宗旨、科目、学级、课程，成为学务发展的迫切需要。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学堂一切事宜，妥议章程。次年七月，张百熙上溯古制，参考列邦，

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并《考选入学章程》，以及颁发各省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章程各一份，共六件。谕准颁行各省。所有章程统称《钦定学堂章程》。自此，中国近代教育进入有学制系统时期。是年为壬寅，故所定学制又称“壬寅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将学制划为三段七级。初等教育阶段分为蒙学堂和小学堂两级，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教育四年。小学堂分为寻常与高等两级，各修业三年。以州县所立为小学堂。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主要使诸生涉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修业四年。以府治所设为中学堂。高等教育设立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大学堂以及大学院。学生于中学毕业后欲入大学分科者，先于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再行送入大学肄业。京师大学堂之设，在于开通智育，振兴实业。大学堂三年毕业后经选拔进入大学院进行研究，不设课程，不主教授，不定年限，以养特异之才。自蒙学堂至大学堂，总计约二十年才能完成全部学业。

《钦定学堂章程》还规定了实业和师范教育的系统，分别对应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程度，各级学堂毕业生，分别给以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功名。

官立学堂之外，还有关于自立蒙学堂、民立寻常与高等小学堂以及民立中学堂的明确条款。

《钦定学堂章程》首次正式规划出新式教育全面发展的蓝图，力求根本改变学堂散漫无序、新旧体制彼此抵牾的状态，将所有学堂纳入类型、层级、科目、教学、管理相互配套的统一体系，解决新旧教育的衔接转换，循序渐进地系统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壬寅学制颁布后，朝野上下颇有异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命刑部尚书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闰五月，准荣庆、张百熙的联名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订。

张之洞赞许《钦定学堂章程》规模美备，条理精详，亟应遵办，而对读经、放假、权限、学费数条有所意见。他启用陈毅、胡钧等人主持重订学堂章程事宜，历时半年完成。十一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上重订学堂章程折，以壬寅学制为基础，取法日本，以湖北兴学经验为参考而增补修改。该章程共22章80篇。除各级学堂章程是在原

有基础上增补外，其余16章为新添。其主旨以中体西用为主，调和中西新旧，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技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尤重考核品行，不废弃中国文辞。并请递减科举，将来毕业学生由督抚学政并简放考官考试，使学堂与科举合为一途。是为《奏定学堂章程》。

新章程很快获得清廷批准，着即次第推行。并着自丙午科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于癸卯年，所定学制又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仿西方幼稚园设学前教育的蒙养院，正式教育纵向分为三段六级。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国民7岁以上者入初等小学堂，初等小学毕业升入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中等教育，仅中学堂一级五年。高等小学毕业升入中学堂，授以较深之普通教育。毕业后，不仕者从事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第三阶段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大学堂以造就通才为宗旨，培养各项学术艺能人才。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普通教育之外，还对各级各类师范、实业学堂的层级、年限等作出明确规定。另有译学馆，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业五年。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学，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时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仕学馆，为已入仕途的官员设立。

《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学务体系臻于完备。同时颁布《各学堂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以规范管理。各地办学可因地制宜，变通办法，办学形式分为官办、民办、公办。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加重了新学内容，高等教育阶段则规定了分科教育和专业训练。着重提倡师范教育，养成师资，调整偏于培养技术专才的倾向，适应普及普通教育的需求。

《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设立专职部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新式教育开始是作为办理洋务的附属，总理衙门对各地新式教育机构负有连带统辖的责任，但内部没有专司教育的机构和属官。1896年，盛宣怀议设管学大臣，管理新设的文武学堂。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

出设制度局，其中学校局位列第三。来华西人即将学校局译成教育部。清廷派孙家鼐为首任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并节制各省学堂，成为定制。管学大臣对各省学堂的管理，主要通过制定各种章程、规制以及教科书的审定来实施。《学务纲要》规定，于京师设总理学务大臣，专门统辖全国学务，下设学务处为直属机构，将学制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开，管学大臣兼管京师大学堂和外省各学堂事务的格局根本改变，教育行政成为独立的职能机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初十，清廷谕令设立学部，派荣庆任学部尚书，熙瑛补授学部左侍郎，翰林院编修严修署理学部右侍郎。国子监事务归并学部。学部成立后，原设学务处事宜，一律归并学部。

清制各省派差学政，新式教育兴起，学政亦参与其事。其主要职责有三：一、考试授予学生功名；二、改书院为学堂；三、为学堂选取学生。可是学政仍须巡历考试岁科两科，办理学堂往往力不从心。掌控大权的督抚遂另设专门机构。1899年，湖北率先于洋务局内设学堂所。1901年设立湖北学务处。1902年直隶设学校司。两江、两广、四川、山西等地，仿照湖北学务处或直隶学校司，相继建立学务处。

《学务纲要》规定各省在省城设立学务处，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学务。直隶学校司即遵章改为学务处，分设六课，各专责成。湖北学务处亦改设六科，名称职能完全对应于总理学务处。江苏、江西、湖南、山东、浙江、福建、安徽等省陆续依照规定设立学务处。

立停科举后，学政的存废职能引起争议。经过讨论，清廷决定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每省设提学使一员，原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作为提学使司的办公机关。学务公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佐提学使参画学务，并备督抚谘询。学务公所分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提学使司的设立，标志着各省教育行政正式建制。

各厅州县均设劝学所，设县视学一人，兼充学务总董，按区域劝办小学。1911年，学部奏颁《地方学务章程》及《施行细则》，厘清学务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规定：地方学务由学务专员办理，分设学务员长与区学员两类，府厅州县、城镇乡三学区以上及乡学联合会连合二乡以上者，设学务员长一人，另设区学员若干人。学务专员由各地议事会公推曾办学务具有经验人员，在府厅州县由地方官委任，在城

镇由董事会，在乡由乡董，申请地方官委任。学务员长由学务专员内推拟二人，呈由地方官审定。劝学所改为府厅州县官的教育行政辅助机关，佐助府厅州县长官办理学务。

癸卯学制颁行后，学部针对兴学进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陆续有所调整补充。比较重要的如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学制体系。1909年奏请中学文实分科，以及统一教授官话，为贫民子弟设立半日学堂，允许民办法政学堂，停止奖励实官，审定教科书等。

学部成立后，吸纳以国民教育为重的社会舆论，由侍郎严修拟定教育宗旨，以东西学制，大体分为专门、普通两种，而普通尤为各国所注重。普通学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国民。欲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教育，令全国民众无人不学，必须明定宗旨，宣示天下。教育宗旨既要兼中国政教所固有，又要补中国民智所最缺，遂拟定为五条：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906年3月，学部奏陈宣示教育宗旨，当日奉旨颁布全国。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教育宗旨。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学部还一度试图推行强迫教育。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后，在朝野合力推动下，新式教育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教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影响至深且远。因操之过激，以及官绅趁机渔利，其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而大批受西学教育的青年学生聚居在都市城镇大大小小的学堂，本来为维护清朝统治而实行的教育变革，反而促其速亡。

三 纳科举于学堂

从学堂发展的历史进程可见，中西学校之争，本质是中西学之争，所争可以说是新旧学问的优劣短长。甲午战前，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官办新式学堂也有三十多年历史，但在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西学仍然只是作为科举的补充。科举必由学校，学校是重

要的储才之所，地位崇高，处于教化体制的中心位置。这既使学校沦为科举制的附庸，也让学校成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正途。读书人无论在何处肄业，必须名列学校册籍，成为生员，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特科例外），因此有志于功名者趋之若鹜。

道光至光绪四朝，清朝官员先后奏呈过十个以上的科举改革方案，试图以变常科开特科、纳洋学于科目、设经济特科、废八股改策论等形式，增广科目，讲求实学，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重新激发科举制的活力，可是始终不得要领。其实清初以理学取代王学，正是为了反对阳明心学的空疏。而汉学也旨在进一步求实。这些挡不住西洋冲击的实学，在时人眼中统统成了无用的虚理。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以学校未成，科举不能骤废，请罢弃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复用策论。清廷谕令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以励实学而拔真才。政变后，恢复旧制，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即行停罢，但废除时文取士已成大势所趋。新政复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谕令停止八股取士，自次年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占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所有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空衍剽窃。

新政期间，各省督抚纷纷奏请分三科递减科举，以期十年后取士概归学堂。如果学堂育才效果不佳，仍可恢复旧制。尽管癸卯学制的《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凡在各学堂肄业学年期内，均不得应科举考试，仍然挡不住学子们的功名进取之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鉴于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为新政大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仍有冀望，无法专心投入学堂肄业，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振兴的希望。一旦弃旧图新，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留学外洋之中国士子，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

举始。请立停科举，专办学堂，广学育才。是年八月初四（9月2日），谕令立停科举。

从乾隆九年议改取士途径，至光绪三十二年停止科举，专办学堂，历时160余年，学校制度终于从制义取士变为学堂育才。其时各省学堂未能全立，成效也不显著，章程尤未妥善。科举与学堂的优劣兴废，关键还要看育才取士的良否。

无论理据如何，当时人和后来者将立停科举解释为废科举，都与主其事的内外重臣的想法有所出入，后者的愿望，只是纳科举于学堂，将科举与学堂合为一途。科举与西学之争，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中西学的相互角逐和此消彼长。科举停罢，学堂成为正途，意味着中学的正统地位根本动摇，而中西学之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学堂内部。尽管纳科举于学堂已经是中学失势的表现，学制的规划设计者还是异想天开地希望学堂以变通的方式继续承担科举的重任，主要有三，一是中学为体，二是育才取士，三是化民成俗。结果当然事与愿违，学堂在三方面都不能延续科举制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学的衰颓。

自西式学堂诞生以来，中西学如何一统于学堂就成为棘手问题。在华教会学校为了吸引中国学生，早已注意到加授经学课程的必要性。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明确提出，教会学校的教学计划应包括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的自然科学三个方面。其教学内容虽然各有安排，大体上经学多习四书，程度较高的兼及五经。山东登州文会馆分备斋、正斋两级，备斋主要学习《孟子》、《诗经》、《大学》、《中庸》，专斋则教授《礼记》、《书》、《左传》、《易》等。

京师同文馆初开，“阁束六经，吐弃群籍”^[4]，于中国旧学一概不问，但随后开办的一些技术学堂增设经学等中学课程。主持其事的官员强调“可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5]。保存与巩固中体的问题进入学堂。尤其是甲午战争前后，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技术学堂相继创办，开始贯彻中体西用思想。两广电报学堂规定，学生除学习西学外，兼课四书五经，以知礼义。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江南储材学堂的学生也要兼习经史，习《春秋》、《左传》等。

起初，无论新式学堂还是书院，课程中的经学、经史等名目，不过是相对西学而提出的中学“代表”，分科的观念比较模糊。办学一面抱有中国传统不分科的治学取向，一面拼合西学。甲午以后，朝野上下逐渐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各书院开始定课程，以大学堂为首的普通学堂明确将中学分科设置。

甲午战后出现的普通学堂，中西学课程的种类大幅度增加，西学课程增添了政治、伦理等科目，中学课程增加了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门类。1896年，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提出学问宜分科，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分科治学，成为清廷的办学的方针。朝野上下不断尝试用分科的办法来规划中学，导致中学课程名目渐多。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为应对新学不得不讲，而中学过于繁难的状况，提出易简之策以救中学。所列举的中学各门，为经学、史学、诸子、词章、理学等，并寄希望于学堂专师以之纂成专书，初步显示了所主张的中学课程分类。大学堂章程将普通学课程分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级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以及文学、体操等十种，为全体学生必修科目。至此，中学分科的课程名目已有经学、史学、文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理学、诸子学等多种。此后，传统学术在学堂中所分学科大致未脱离这样的范畴。

中学既然已经分科，各科孰轻孰重的问题自然走上台面。经学地位重要，在一些学堂的开办章程和办法中得到体现。京师大学堂确立以中体西用为立学宗旨，明文规定经学是各学根本，“经学所以正人心，明义理，中西学问皆以此为根柢。若不另立一门，何以为造端之地？”^[6]湖南正始学堂章程规定，立学中西并务，以经义为归宿，故先学群经。不能遍者，则以六经为卒业。但一些学堂设课时，标榜为各学基础的并不仅仅是经学，而是经、史等学并列，经学的地位并未凸显。天津中西学堂的中学课程就强调讲读经史之学。南洋公学章程也规定，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这固然是由于时人的分科观念仍然模糊，中学的经、史划分不清，也因为经、史等传统学问的地位在清季发生了转变，这在日后的学制章程中得到体现。

对于学堂内部的中西学之争，清廷最后确立了“中体西用”的解决方案，但实际的进程顺序，却是学堂先有了“西用”之学，然后再逐步确立“中体”。纯粹西用的学堂，主要是为了补中学之不足。反

映在学堂课程的层面，语言、技术类学堂初兴之时，重在引进西学，中学并未成为其中的科目。甲午后，肄习普通学的新式学堂开始大量出现，分科教学的概念为官方所接受，这时的中学，其实是按照与西学对应的观念重新分解组合，从整体一块被划分为经学、史学、文学等科目课程。这也可以说是以西用的规矩尺度来衡量规范中体，一方面，用西学的标准看待中学；另一方面，用西学的分类条理中学，中学自然很难保持其原有的形态和价值。

学制颁布和统一学堂系统的设立，使得用西学全面整合中学成为势所必然。此前朝野上下一直试图以科举即中学兼容西学，成效甚微。虽然各种学堂尝试将中学纳入分科教学的系统，但总体上中西学仍处于分立状态。科举弊端日益显现，学校被斥为科举附庸，徒具形式，所学空疏无用，导致教化废坠与吏治败坏。在学制颁行的同时，科举制也确定以渐停方式予以终结。学堂教育一统天下，学堂的分科教学导致中学整体上被西学兼容整合。

壬寅、癸卯学制的出台，使得分科教学成为正式体制。学制框架内的经学，在各个阶段的学堂教学中有了内容、层级安排的衔接和递升。壬寅学制秉承清代重理学和书塾大都以四书开蒙的传统，普通学堂蒙小学堂阶段先读四书。小学堂至中学堂，读完五经。中学堂毕业，则十三经读毕。高等学堂阶段，续讲各经自汉以来注家大义。分科大学因尚未办理，未定课程，但其预科下的政科与高等学堂程度相同。在分科大学阶段，专列经学目。专门学堂中的师范学堂仿照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列有考经学家家法一项。自小学堂、中学堂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预备科，经学的传授以定钟点、定内容的方式在学制体系内得到贯彻落实。

将经学课程系统规划到各级各类学堂中去，是壬寅学制的首创。因为西方学科中并无经学，所以其全盘规划只能自我统筹，无成法可资借鉴。而且相较于旧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书塾、府州县学到国子监并无层级的递升，新学制将经学课程纳入从蒙小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的系统教学中去，有了教学内容、学时安排与层级次序的递升衔接，使得经学成为类似西式教育的课程门类和分科。学堂教习须按照统一规定的程序内容实施教学，不能全部听塾师、山长的一家之言。

在新学制的框架内，各阶段教学安排的重心明显不同。就课时比重看，层级越低，中学课程的比重越大。随着学堂层级渐高，西学课程比重相应提高，以致超出中学课程。作为晚清桐城大家，吴汝纶等

认为习古文才是学堂保存中学的关键，且中学以国朝史为要，各级各类学堂中学的分科课程，并未体现经学的重要性，史学和文学的地位却有所提升。主要体现于，经学的课时安排相对较少，占每周全部课时的比例分别为蒙小学堂1/6，中学堂3/37—3/38，高等学堂政科与大学堂预备科政科2/36，大学堂师范馆1/36。读经课程的钟点相较于文学与史学大体持平甚至不如。

《奏定学堂章程》调整的方面之一，是注重读经、讲经课程的设置，于七科大学的基础上，增设经学科，并置于各科之首。《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须注重读经，初、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各学年每周授课钟点分别为30、36、36，读经讲经分别占12、12、9个钟点。随着新学制在各地学堂的实施，经学在“以西方学术之分类来衡量”的路上越走越远。

立停科举后，“不废经学”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学堂的经学课程上。张之洞规划学制经学课程时，曾经自信地表示：“若按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教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矣。”但学制执行的效果显然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变成一科的经学，很难担负维系圣教和支撑中学的重任。一方面分科太多，减少了学生修习经学的精力，如直隶“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7]。另一方面，学堂重西学而轻中学，所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倡言废之而已”^[8]。经学在学堂中普遍成为最无聊、最不受欢迎的课程，非但起不到维系中体的作用，反而成为青年厌倦中学的口实，再度引发对于经学消亡的忧虑。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保存旧学的办法。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明示重国文以存国粹之意。光绪三十二年，御史赵炳麟奏请立国学专门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以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于湖北省城设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辅以普通科学，以求经训不坠，保国粹而息乱源。拟试办半年后，如课程条目毫无窒碍，即请旨敕下学部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次年，江苏仿设存古学堂，以存国粹而造通才。同年，御史李浚以存国粹关乎人心世教，故经学亟宜注重，请饬学部、各直省督抚，于国子监及各省城一体设立存古学堂，以补科举之不足。所有事宜，悉照湖北、江苏两省奏定章程参酌办理。湖南、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甘肃等地相继奏办存古学堂。宣统元年，学部拟定分年

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内，列有于宣统二年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堂。至宣统三年三月，学部颁布《修订存古学堂章程》，申明存古学堂贵精不贵多，因经费支绌，取消原定各省一律设存古学堂的规划，并定修业年限，分为中等五年、高等三年，以资深造。

存古学堂的设立，在趋新人士看来，反而使普通学堂的经学课程变得无足轻重，社会舆论对中小学读经的批判日益高涨。1911年中央教育会，有人提议停止初等小学读经讲经，得到多数通过。只是迫于反对者态度激烈，学部才未将该议案咨送内阁。民初教育部通令停止中小学读经，大学以上的经学课程，只是作为纯粹学问。经学进出学堂，成为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由之路。

科举抡才不能应世变，学校培才连带受到普遍质疑。随着新式学堂的普及和旧学的衰微，抡才与培才相互分离的局面难以维系，最后只得幡然变计。新式学堂之设，本来是补学校育才之不足，也就是以西学补中学。而科举与学堂两不相容，停罢科举，独兴学堂，将抡才与培才熔于一炉，虽然确定宗旨为中体西用，实际上却是以西学取代中学。学堂成为出身正途，旧学机构只能退出。继书院改制后，国子监及各类官学相继改为学堂，社学、义学也纷纷改办新式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堂。只有府州县学确定保留文庙和教官，而失去生源，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其尚存的经费多被挪用，场地设施也陆续被新式学务机构改造利用。

科举在与学堂的竞争中失势，原有的学校、书院等机构便失去培才的效用，只能逐渐向学堂靠拢，改变课程及教学。癸卯学制颁行之际，决定十年三科渐停科举，形式上为学校留下存身的余地，以便与学堂比较，其实中学的地位大为降低。国子监虽然归并学部，保留下来，原来的教学职责不复存在。国子监南学改为新式学堂，学校旧迹完全消灭，仅余文庙、辟雍等建筑以供观光、凭吊，特设之国子丞专司祭祀，几同庙祝。

清季设立学堂，大体有改造书院和重新建立两种途径，至于各地府州县学的兴废，因为牵扯科举和中学，始终予以回避。《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科举立停，府州县学的教官除了典守文庙、奉祀孔子以及生员考职、举报孝廉方正等科举遗留事务外，无所事事；若教官不存，则府州县学自成废署。学部成立后，各州县学留教官一人以奉祀孔孟。教官虽得不废，因其职简责轻，停选教官一缺，缺出后不再选补，教官数量逐渐减少。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1907年1月），山西道御史张瑞荫鉴于原来教职无以聊生，以致职守尽荒，学宫日坏，奏请对府州县学和教官加以变通利用，于学宫隙地设立蒙学，令教职为蒙学之师，酌给束脩。每年提学使派人稽查学宫，随时修理。学部议复，予以否决。在保留文庙和教官而生源尽失的情形下，府州县学究竟何去何从，内外官员迟迟未能议定统一善后办法。而学堂一枝独秀，学校的整体命运难以改变，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地方在兴办学堂时，鉴于财政窘迫，资金难筹，遂自行利用和改造府州县学的场地设施。

各地利用府州县学改设新式教育机构的情形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设置教育行政机构，将学务公所、劝学所等设于学宫内部的明伦堂、崇圣祠等处，或直接就学宫改建，以引领兴办新式学务的风气。
二、创办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培养学堂师资。
三、创建中学堂及高等、两等、初等小学堂。学校原有屋宇用地被改建为学堂的教学、会议、体育、食宿等场所，如以明伦堂为自修室兼礼堂，以尊经阁、横屋、土谷祠、文昌阁改建讲堂，利用原址改建西式建筑作为学舍，并分别改建学堂会客所、储藏室、校长职员办事室、校友会、职员议事室、厨房、操场等。
四、创办女学堂，推广女子教育。
五、改建自治学堂，将文庙作为讲授场所。间有利用同一学校内场所分别改建多类新教育机构的情形。

不过，清季各地兴学过程中，只有部分地方利用府州县学改办学堂。进入民国，又有一些地方在原府州县学内开办学校，而其他早已成为冷衙闲职的学宫教官，或改名或裁撤，文庙改称孔庙，祭祀的礼节亦改变。1927年，国民政府通令废止祭祀孔子，将每年8月27日定为孔子纪念日，由学校集会纪念。庙学合一的府州县学最终成为历史的遗留物。

戊戌变法和新政复行，两度谕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各级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随着学务的推进，各地书院大都改造成为各级学堂，是旧式教育机构中改造最为普遍彻底的一类。

《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凡各省、府、厅、州、县原有义塾，并有常年经费，此后应按照此次蒙学课程，一律核实，改办公立蒙学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如向有义塾、善举等事经费，皆可酌量改为初等、高等小学堂经费。原有的社学、义学逐渐改为学堂、半日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塾，多数社学、义学的经

费被挪用于办理各项新政，无形中消失。但社学、义学仍有继续设置者。不仅民间如此，有的还由直省及地方学务主管部门举办。

主张改良私塾者首先是认定中学无用，读经不能作育有用之才，所以主张改习西学。私塾改良，源于西方传教士来华，指中国固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都已落伍。其说渐为趋新士人及部分官绅所认同。内外官员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认定学塾为私塾，采取程度不一、效果各异的干预行动。但由于经费不足以及学堂多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直到清亡，一般民众仍以学塾为受教育的主要选择，私塾改良的效果非常有限。

1910年7月，学部发布《通行京外学务酌定办法并改良私塾章程文》，这是第一份全国性的改良私塾章程，要求京师督学局、各省提学司督饬各地劝学所办理改良私塾事宜。具体分为初、高等两种，对应初等及高等小学教科程度。其中又各分为一、二两级，初等改良第一级课程至少须授修身、国文、读经讲经、算术四课；课目遵用部定之本；各书均须讲解，不得专主背诵；学生以各科课本教授完竣为毕业，毕业年期及分配课时应预行规定。在此基础上，讲解详明，能参用初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并实行规则者则为第二级。高等改良第一级课程在原有四科基础上，加授历史、地理两科，其国文、算术两科课时酌量增加。第二级课程可酌加格致、体操；参用高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并施行高等小学规则；每年期考年考各一次，由劝学所人员会同考试，给予毕业凭单。学生达到30人以上，有一定标准的固定经费，初、高等改良私塾可改名为初、高等小学。

宣统元年，学部要求各省将改良私塾成绩报部，河南小学堂仅3296所，学生79105人，而改良私塾则近万所。^[9]其时私塾、塾生、塾师的数量远远多于学堂、学生、教习。舆论对于朝野大力兴学之下，学堂不增，私塾反而日见其多的情况，大感怪异。

1911年第一届中央教育会第七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废止私塾名目一律改称公私立学堂案》，激烈辩论后表决通过。而学部拟订的《义务教育章程（草案）》规定：学龄儿童在家塾或私塾就学者不得视为已受义务教育，但该家塾或私塾经府州县视学员察核，确系遵照部定初等小学课程，用部颁或审定之教科书教授，毕业时由视学员或劝学员考验及格，发给文凭者，亦得认为已受义务教育。

纳科举于学堂的用意之一，是将学校与科举分别掌管的培才与抡才合于一途。由于戊戌期间停止殿试之后朝考的谕令新政时继续有效，抡才不仅取士，还要试官，学堂教育毕业与就职成为一而二之事。科举立停后的各种考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考试优贡、拔贡，生员考职等，为科举考试的延续；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毕业考试和留学生归国考试，成为取士选材的主要途径；三是法官任职资格和选用巡警的考试。

科举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以考试作为甄别选拔人才的形式。纳科举于学堂，便要由学校同时具备育才和取士的功能，考试自然是重要形式。《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规定，国内新式学堂的考试分为五种，即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其中临时、学期、年终三种考试，由学堂自行办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则模仿科举岁科试。中等以上学堂的毕业考试照乡、会试例，高等学堂毕业，届期奏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详加考试；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届期奏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详加考试。毕业考试中西学并重，分内外两场，外场试在学堂举行，有笔试与口试两种形式。口试部分按学科门类分日考问，笔试部分则将试题公开，笔答或应演图者，均当堂在漆牌上写出。内场试全为笔试，比照拔贡、优贡例，只考两场，以当日完场为便。每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内外两场考完，以各科所得分数，并参证平日功课册、行检册所列分数，汇定一总分数，第其高下，以定去取。

1907年1月，学部奏准《修改各学堂考试章程》，明确各学堂必须考试经史课目，原来未设经史课目的学堂，也须加试经学一题、中国史学一题。而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考试中国文学一科，应试二题，一题就该学堂主要学科命题，观其知识能否贯通，一题就中国经史命题，观其根柢是否深厚。经史考试的分数不仅作为一门独立课目计算，还与毕业考试的平均分数计入总分。

留学毕业生也须通过回国考试，才能确认资格并授予相应出身。1905年7月，由学务处主持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及格者再参加第二场的保和殿殿试。题目分为文理两科，文科题为策试。殿试不久引见授职，一等为进士，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为举人，授七品小京官、知县。学部成立后，加强对

留学生考试的组织，1906年的《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二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各一题，作一题为完卷。游学考试卷有襄校官分阅并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定取最优等、优等和中等。[\[10\]](#)

立停科举后，各种考试章程与奖励措施相互激励，考试种类增多，频率加快，学堂考试的频繁程度和受试人数远过于科举时代，加上为旧学士子宽筹出路和新设的各类专业资格考试，科举取士的功能不但基本延续，而且有过度膨胀之势。如果毕业与就职业合二为一，势必进一步造成学界的混乱和官场的冗滥。学部后来反省这一设计的失误，意识到培才与抡才确应分为两途。1906年10月，学部的《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正式提出，分别“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学部组织的考试属于“学成试验”，用人部门负责“入官试验”。随后文官考试与任用章程相继出台，意味着培才与抡才正式分离。

培才与抡才难以合为一途，育才取士的标准也大成问题。戊戌期间，人们反省此前学堂的弊端之一，便是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中无，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由于中西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以洋务为主义，以中学为具文。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11\]](#)东西各国学校，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即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两学互相诟病，水火不容。学堂育才，必须中西学贯通，体用兼备，缺一不可。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取士须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

中西各有体用，分别学习，也不易掌握，所谓学贯中西，实际上绝无可能。即使普通学常识，要想做到会通中西，也是难上加难。科举时代，自童蒙时便诵读经书，以致皓首穷经，仍然不得一当。况且学堂课程繁多，不能兼顾，落实起来还是以西学为主。而科举取士重通人与学堂教育重专才的理念取向相互抵牾，中西新旧的体用与专通相互纠结，成为确定取士标准的一大难题。1906年10月，孙家鼐提出甄别用人的新方案，学堂毕业生考试时，将学生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

识，应另设职务，不给予“治民之权”；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12]以西学专才办事，而以中学通才治民，如此一来，从中西会通的新途又回到各行其是的旧轨。

孙家鼐的办法看似中西兼顾，其实偏于中学。因为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中国为伦理社会，又少纯粹宗教信仰，必须以道德维系，所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而礼制名教是其具体体现。明清科举制度具有取士、教育、举业、教化、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新式学堂注重培养做事能力，与科举读书明理的取向明显有别。科举停罢，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的功能停摆，一时间又缺少相应的补救措施。

《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重在对经义的理解阐释，包含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标准的基本元素。举子们在应试过程中反复研习背诵，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准则依据，并且借助各种教学形式代代相传。载道之文，本非只有科举文体，只是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又具有垄断性影响，使其他文体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反而削弱了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晚清改科举，从形式到内容力图压缩经义阐释的分量，增加西学比重，促使学以致用，科举制的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功用进一步削弱。而西式学堂事实上很难接续这方面的功能。

清代科举考试虽因内容与形式日趋僵化遭人诟病，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仕的预备，并非真正的取官，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杂项人员，既非直接培育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政府、科层组织以及国民专门教育的标准衡量，当然百无一失。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未必仅仅侧重士子个人的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可是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合并科举与学堂的流弊，虽然一再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取向，读书做官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时至今日，科举余毒之类的谴责，恐怕已经很难取信于人。这难免让人怀疑当年主张废科举的种种义正词

严，是否真的理所当然。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戊戌时期，即有人怀疑学堂教育难以体用兼顾，独力担当兼备中西学之长的重任，中国文化遗产及道德教化必须另行设制。为了在兴学的同时保存传统文化，王照提议分设教、学二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特设教部，就翰林院为教部署，以年高之大学士统之，辅以翰詹各官，专以讨论经术，维系纲常。”各省学政改名教政，佐以教职。各邑各乡增设明伦堂，领以师儒，聚讲儒书，生徒之外，许人旁听，立之期会，令乡老族长书其品行之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之，由教政考以《四书》各经经义，每州县拔取数人以至二三十人，统名为优行生，以备用为教官；并备学部咨取，用作学堂之国文教习，表以章服，树之风声。另设学部，以重实用。这样，卫道与兴学可以并行不悖。[\[13\]](#)

纳科举于学堂后，西学之“用”通过学堂的分科教学得到实现，而经学文史虽然列为分科，却失去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变得最不切实用。科举让位于学堂，等于中学让位于西学，退缩为一科的经学，无力承担传道与载道的重任，其日趋衰微难以避免。在儒学被视为无用，且被有用的西学逐渐取代之时，礼的作用地位亦被动摇，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裁撤问题被提上日程。可是，中国自古为伦理社会，人伦关系主要靠道德维系，经学不仅仅是一门学问，更是道德的支柱。在以西为尊的大势所趋之下，中西强弱对比被具体化为各项指标，并从中找出中国致弱的症结，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具备，凡是我有人无的，都要祛除，凡是人我有别的，都要取齐。包括中国语言文字在内的一切异样，都在改造之列。被纳于学堂的中学，文史勉强对应，得到保留，经学却无论如何难以安置，只能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直到后来，胡适等人才认识到，欧洲其实也是有经学的，只不过是神学范围的圣经之学，而且求古本究语言文字等等，与中国研治经学的做法异曲同工。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欧洲学问的根底较深的高明教授还教人治学应以拉丁文为基础，用英文是研究不了高深学问的。这与中国以经学为本原大道的讲法不无近似。

停罢科举留给中国两个世纪性难题，其一，价值标准及道德准则的重建。离开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如何使人们的思维言行保持自律。其二，在社会剧烈变化与快速发展中，中国文化能否摆脱劫尽变穷的宿命，把握协调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与不忘本

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使之绵延永续，再创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怎样保存，这一千钧重担显然不能仅仅由学堂教育来承担。要想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能与时俱进，依然任重而道远。

科举停罢，对于士绅的影响或许并不是直截了当的。科举的功能并入学堂，中学却不能为学堂的西学所兼容。在牺牲了中学及其所承载的价值之后，士绅的角色功能很难被学堂学生完全承续，尤其是文化传承与道德教化方面。科举停罢没有即时让士绅丧失权力地位，政府与社会都提供了不少的补救之方，以至于1920年代各地的绅权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强势，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区别。所以国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打到土豪劣绅。然而，土豪劣绅的指称，主要出自主张土地革命以动员民众的国共两党，后来研究者但凡仅仅依据国共两党的相关资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论点。而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更为偏远落后的边区，国共两党都曾经竭力扫除的土豪劣绅却变成了开明士绅。其实，从晚清看起来，士绅本来就是开明趋新的重要社会组成。只是随着中学的神髓魂飞魄散，以及新式学堂毕业生在乡村找不到存身之地而大批不回乡，士绅群体的确处于逐渐消融的状态，新起的土地占有者或乡村权力掌握者，已经没有过往士绅的道德约束，呈现恶霸的形象。最终土改将士绅彻底摧垮，文化与道德承载转而由其他群体分担，却始终显得力不从心。

[1] 本文参考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3月第59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论文，以及安东强、霍红伟、左松涛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2]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7—70页。

[3]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300页。

[4]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陈景磐、陈学洵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页。

[5] 《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奏折。

[6] 《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85页。

[7] 刘汝骥：《丙午召见恭记》，《陶甕公牍》卷一，示谕，第1—2页，《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

[8]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9] 《宣统元年京师及各省小学堂表》，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10] 《学部官报》第6期，本部章奏栏，1906年11月16日。

[11] 《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12] 《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五百六十三，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8—5159页。

[1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355页。

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

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在近代中国史上有着分水岭式的重要地位。前人已从爱国动员、反清革命、政治分野等方面详加论述，并且指出运动的领导者懂得必须拥有足以制胜的雄厚实力，却未能真正找到，因而留下“未能解决的历史课题”。^[1]诚然，就拒俄运动本身而言，只能完成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难题。其所能够承担的责任，就是在此过程中，认识民众合力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形成合力寻找适宜的组织形式。在此之前，趋新人士与广大民众在近代革新救亡努力中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不仅各自行动，甚至彼此冲突，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事变。经过拒俄运动，双方在观念和行动上开始寻求合拍，从而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合为一体。而其中重要的一环，则是所谓“中等社会”的自觉。这种本能的自我意识经过引进的各种社会学说的加工，成为青年学生和趋新士绅的思想武器，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中等社会概念的出现与运用，学人已经有所注意。由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在第三章第四节之二“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东南地区的‘学界风潮’”中，对于新型知识阶层崛起于政治舞台，社会上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礼赞有所论列，并且指出，当新型知识阶层愈益活跃时，赞美“中等社会”的热情反倒冷却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对它的各种各样弱点的指责。为该书提供部分初稿并参与整理和修改的王学庄，后来撰文介绍《俄事警闻》，再次对革命派用上、中、下三等社会来分析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把“中等社会”看作革命的领导力量有所申论。^[2]此外，胡绳武介绍《游学译编》，陈大可介绍《湖北学生界》，丘权政介绍《浙江潮》，也分别注意到其中的有关文章使用中等社会概念的情况。比较起来，王学庄将其他相关资料联系贯串，而不仅仅就《俄事警闻》所载文章加以概括，又并非简单批判，所见较为深入。陈旭麓的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十四章用了整个专章

讨论“中等社会”的问题，包括中等社会的复杂结构，中等社会与上等社会及下等社会的关系，中国的中等社会与欧洲的第三等级的联系及分别，中等社会革命的历史地位等等，显示出大跨度多视角的古今中外宽广视域，以及捕捉新问题的敏锐。可惜后来无人循此更进一步，反而舍近求远，诉诸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等后出外来的理论框架，削足适履地裁剪史料，拼凑史实，不得其利，反受其害。治史所用观念与问题意识多为后设，或有不得不然的种种缘由。但前提是首先应当理解没有后来观念与问题意识之时的人们如何思维，并注意其思维的内在联系，以免断章取义。在此基础上梳理观念从无到有的展开过程，才能把握历史本来的脉络，呈现史事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

一 “中等社会”的出现

就目前所见资料，中等社会这一概念出现于1902年底，而被较多地用以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则是在拒俄运动高涨的1903年。十几年前，评介1998年9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主办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时，曾对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张朋园教授的报告有如下评论：

其论文《梁启超的精英主义与议会政治》，将梁启超1905年前后的思想做一比较，指出其前此一直强调普遍开民智，以此为实行议会政治的必备先决条件，而从1905年起，他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将中国社会分别为上、中、下三层，而把自己所属的中等社会视为救国的主导，因而不再疑虑人民程度不足，大力推动议会政治。认识这一转折的现象也许并不困难，关键是促成转变的原因。作者发现梁启超的社会结构层次图与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的精英结构层次图十分相近，而后者是20世纪初引起精英主义讨论的重要人物之一。帕氏于1903年在巴黎发表《社会体系论》（*Les Systemes Socialistes*），认为每一社会结构中都由精英分子带动发展其所属的社会，而将精英区分为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两部分。其非统治精英相当于梁启超的中等社会。在梁启超与帕累托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的证据，梁氏很可能通过日本而接受其理论。在讨论

中，张先生希望巴斯蒂和狭间教授设法进一步研究解决余下的问题，即找到日本译介帕累托思想并由中国人转手引进的史实。

此事的确至关重要，因为从1903年起，中国留日学生和流亡者的报刊上开始普遍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并迅速传播到国内的学生和新知识界，成为政治启蒙与政治动员的重要概念。1900年以前，中国民众与新知识界的社会运动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而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期间，中等社会则与民众结合，成为社会引导和准的，展开抵抗甚至反对已腐的上层社会的救国自救运动。以笔者陋见，在所读过的数百种该时期的报刊中，迄未发现1902年以前有使用“中等社会”概念的文字，因而对此后突如其来的自觉颇感困惑。如果张朋园教授的推测不错，日本在传递这一思想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且有所改造。留日学生在这方面已着先鞭，起而仿效的梁启超即便不是从与之对立的留日学界刊物上间接受益，至少也受潮流风气的影响。^[3]

近年来进一步详细追究，上述推测应有所修正。中国知识人士较多地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主要是由1903年开始，但在1902年底，已经有所提及，而且正是梁启超本人发其端。《新民丛报》第20号续载梁启超的《新民说》第14节《论生利分利》，在分析中国人生利与分利的比例时说：

大抵分利之人，多出于上等社会中等社会，而下等社会之人殆稀。盖惟挟持强权者，乃得取他人所生之利而坐分之也。

这一期《新民丛报》的出版日期为1902年11月14日，尽管该刊常常衍期，不能仅以标明的日期为准，但作为参考的《东邦协会会报》第93号“受赠书目栏”，有收到第20、21两期《新民丛报》的记录。

《东邦协会会报》为月刊，每月20日定期出版，第93号的出版日期为1902年12月20日，11月20日第92号出版时尚未收到《新民丛报》第20号。^[4]这样看来，《新民丛报》第20号的实际出版日期可能晚过11月

14日，但至迟在12月20日之前，因而从时间上判断，三层社会概念的提出，与帕累托的文章并无直接关系。

上流社会、下流社会之类的概念，在中国固有的观念世界中，已经成为习俗。如“其位于社会之上流者，曰君，曰孤，曰卿尹，其位于社会之下流者，曰士庶，等级递差，名义交错。”^[5]甚至还出现过上等、中等、下等之说。如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引述了太平天国时期绿林人物张嘉祥的相关歌谣：“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安枕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6]而近代泰西历史的输入，又使国人接触到社会等级制的区分，知道社会成员往往并非平等划一，而是分为不同的等级。如《开智录》第4期（1901年2月3日）刊载郑贯一翻译的《人民论》，就指出埃及人民分为僧徒、军人和下等社会三个等级，“第三等之人，虽有如何才力，如何勤勉，断不能进而入上等社会”。此文还分析了等级制形成的三大原因，即社会分工、分封制和战争征服。这与近代趋新人士所追求的人民平等观本来就是格格不入。

不过，作为理论性概念，“中等社会”一词的运用无疑受到外来思想学说的影响，尤其是与1902至1903年间国人大力翻译引进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密不可分。^[7]其发源很可能还与明治日本的思想学术变动有所关联。只是现有资料和研究难以仔细梳理当时欧洲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以及明治日本思想学术界关于这一理论的译介，中国知识人如何获得和传播有关的知识等等详情。

外来学说要想影响国人的思想观念，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内在的土壤条件。后者不仅决定对形形色色的外来学说进行取舍，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加工改造甚至融合独创。戊戌以后趋新人士的观念演进和革新救亡运动的实际发展，成为人们认识进化的重要依据。中等社会的概念，亦有可能并非外来学说的直接输入，而是在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大量引进的背景氛围之下，由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求综合形成，其中拒俄运动的展开尤为关键。

从戊戌的兴民权到《清议报》的国民宣传，维新思想家将官与民划分为两大阵营，并将民众视为一体，希望通过开民智实现由臣民到国民的整体过渡转变。他们不仅知道国家由国民组成，国民为国家主体，而且深知没有国民的觉醒联合，单纯指望朝廷政府，难以实现救亡图存、变革振兴大业。虽然百日维新的实行令康有为、梁启超等

人喜出望外，一度以为可以依靠乾纲独断，可是政变的严酷事实迫使他们放弃幻想，重新将目光放到民的一面。经过庚子勤王的密谋，梁启超再将关注重心移到文字宣传。他发表于1901年6月的《过渡时代论》，认为今日之中国，政治、学问、理想风俗皆处于过渡时代，

“故今日我全国人可分为两种：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然受外界内界之刺激，而未得实把握以开过渡之路者也。”^[8]民与官虽然对立，如果不能从老大帝国的臣民转变为新中国的国民，仍然是过渡之敌。这种以新旧为界的清晰划分，振聋发聩，于是老大帝国与少年中国的对立，一时间成为不少青年学生乃至趋新士人的口头禅。

梁启超寄希望于青年，是鉴于民智普遍未开，而青年尚可造就。他称留学生“为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9]，并将“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视为前途黑暗，无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绝中稍放一线光明，差强人意的三件事。他提出的报馆担负两大天职，即“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10]，后来成为中等社会的重要使命。而学生和书局、报馆的从业者，则是中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局和报馆更是中等社会的重要活动空间。

二 两种解读

梁启超的宣传，与国内外两部分人的诉求互相呼应，并由此导致对中等社会作用的理解循着两条不同的途径伸展。开明士绅由爱国救亡运动，青年学生则主要通过学界风潮。

1901年拒俄运动风潮初起，发动者多为旅居沪上的各省开明士绅，其中相当一部分骨干是庚子中国国会的成员。他们在勤王密谋中曾与各地的秘密社会有所联络，但整体上与广大民众处于分离状态，对北方义和团的野蛮排外尤其不以为然。拒俄运动发端时的形势是，“俄人以中国之守旧为利，中国在上之人亦利俄人助己之守旧”，只有“举国之人，人人以危亡为可惧，凌辱为可耻，万众一志，非理之来，合力与争”。而国民能否力争，关键不在地之大小，民之多寡，而是有无民气。^[11]即所谓“非谓有兵力足以拒之也，非谓有势力足

以拒之也，合大众之热力以为拒力，庶几收众志成城之效，共勉卧薪尝胆之心，纵使不足以拒强俄，亦使他国闻之，知我中国之民心尚在耳”[\[12\]](#)。

在拒俄运动的发起人看来，中国所以败坏至此，引得列强蚕食瓜分，危机重重，“实由居官者无爱国之心，但求保一己之富贵，互相推诿，将一切重大要紧之事任其废置，而在下之士民又如幼小之婴儿，不知国家于己有何关系，视国家之休戚，漠然不动其心。有此两种人，上下之间不能连络，以致受人欺侮……今日救急之法，当上下合为一心，以国家事为己身之事”[\[13\]](#)。凡是拒俄同志之人，一方面要动员民众，提升民气，另一方面要防范民气向着非理性的方向过度膨胀。后来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尚未标举排满革命时，就认为“义和团敢犯众怒，轘张狂狡，自取殃咎，为世界羞。有识之士，无不罪之，而其用心犹有足矜者。苟有以教之，贞其力，养其锐，不轻于一发，冀得当以报，未始不可以为用”[\[14\]](#)。

1901年，上海绅商第二次集议拒俄，决定宗旨数条，其中两条，一是“务各劝导乡里故旧、族党亲戚及新进后辈，使人人知中国危亡在即，非开通智识不能竞存立于地球之上，即不能保守中国向有之土地”；一是“我辈系筹中国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岁北方野蛮之事。至外人欲以非理凌中国，亦不肯受。一依文明所为，主持公理”[\[15\]](#)。动员民众，实现文明排外，成为后来中等社会的重要口号和使命。

“文明排外”，是开明趋新人士对以前“野蛮排外”深刻反省的结果。由张元济主编，发刊于1902年1月的《外交报》第1期在《叙例》中谈到有关的思想脉络：

吾闻日本政界有文明排外之论，是何言欤？吾国言排外数十年，撤藩、割地、偿兵费、租界、势力圈，主权尽失，而转为世界诟病，皆排外之效。呜呼！彼所谓文明排外者，是何言欤？盖人之生也，无不以自利为宗旨者，国之立也，即无不以自利其国为宗旨者，是以有凌侮劫夺之事。凡以凌侮劫夺人为事者，例不以见凌侮劫夺为怪，是以彼我之间，荡荡然无界畔，无契约，缘隙生事，罄竹不胜书。及其迭经自然人为之两淘汰而残存于兹

者，渐趋知力平等之势，又以经历既多，识见渐澈，知前者凌侮劫夺之为两不利，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两利之术，于是人与人有伦理，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

其说于文明排外观念的解释并不完整，尤其是缺少国民外交的思想内核。所谓文明排外，一方面是以近代国际公认的外交方式对外来压迫侵逼进行自卫抵拒，更重要的则是实行的主体不在政府而在国民。由于国民没有政府的权力与合法形式，如果只有少数人从事则无望成功，必须动员民众广泛参与。而下层民众无知无识，容易无动于衷或流于盲目排外，需要启蒙和引导。文明排外观念的导入，凸现了爱国救亡运动发起人和领导者在国民当中的位置与责任，成为引发绅商士人中等社会观念的重要来源。

与绅商及一般开明人士的认识路径不同，国内外青年学生对于中等社会的理解相当激进。郑贯一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出于对所谓文明国的憎恨和对清政府的仇视，赞扬义和团不仅“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既避免瓜分，又借联军之手重创清廷，改革国政，“使义和团一战而胜，奏凯而旋，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则此际之排外灭洋者为义和团，安知顺手倾满洲政府，大倡改革者非义和团耶？”^[16]将下层民众暴涨的民气导向排满反清，成为这一路线的主导趋向。

1902年以后，留日学界和国内学界的风潮渐起，引起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赞扬者诮之为社会未来主人翁，学生也以此自任。“学生社会”逐渐与“中等社会”相联系，甚至成为中等社会的主要代表。详细记录1902年南洋公学风潮的《教育界之风潮》一书称：面对祖国危亡，“居今日而欲图补救，舍中等社会其谁属哉！”又说：“学生社会之于国家关系重且大，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17]中等社会、学生社会和新党三者的关系连成一线。

此时留日学界相继创办同乡会刊物多种，可以充分发表意见。

《浙江潮》第3期刊载飞生的《国魂篇》，分别对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进行一番批判，并将留学生视为承担救中国之重任的社会阶层。

李书城的《学生之竞争》，详细论述了学生所处的社会位置及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文章认为，中国内忧外患，“欲挽此劫运，若补漏舟，若救火庐，苟非具有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恺切诚挚之肝胆，明敏活泼之脑浆者，不能使中国之国旗仍翻飞于二十世纪竞争之大活动场也。今日中国之负此资格造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学生处于上下两等社会之间，“挟持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也。彼辈除考据以外无学问，除奔竞钻营以外无阅历，除美缺优差以外无识见，加之数十年陶熔于宦海，养成一种柔滑狡狴、麻木不知痛痒之性质，治内专务压制，对外只知唯诺，任列强弄之股掌之上……则位置之上于学生者无望矣”。而“下等社会之中，识字者盖寡，廿四朝历史、十八省地理，自幼稚而少壮而老大，眼中耳中脑中，未尝经一二之感触，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且蛮野横悍，动辄蚁聚蜂屯，戕害外人，昧公法，召衅端，其愚更可悯矣。以与世界高掌远蹠之文明国民相竞争，如卵投石，如汤沃雪，安往而不败哉？则位置之下于学生者更无望矣”。

由此可见，“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大陆之上，毋使一误再误，终罹亡国之祸，以为历史羞……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18]。这实际上是将学生社会等同于中等社会，至少认为学生是中等社会的主体或主干。

趋新士绅与青年学生的政治取向虽然有所差别，其共识是中等社会必须动员和引导民众，外抗强权，内行革新，救亡图存，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体，并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对上等社会则形成压力、排拒，甚至排斥。

三 激进路线的凸显

中等社会观念的演进，虽然存在两条理路，在拒俄运动高潮期间，激进路线显然占了上风。

拒俄运动高潮来临之际，留学界和国内开明人士一开始依然将运动定位于爱国，还一度尝试游说政府和疆臣。不料清政府指其行动“名为爱国，实则革命”，出手压制。运动的发起人本来相当一部分已抱反清革命信念，只是为了便于行动，暂时压抑自己的革命言行。面对高压，他们很快转而实行革命，从而带动拒俄运动也由爱国转向革命。^[19]

在官民双方的矛盾冲突过程中，青年学生的激进情绪已经按捺不住，表现之一，就是极力将中等社会的观念引向反清革命。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邹容发起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在他看来，中国若真亡，“不亡于顽固政府，不亡于婪毒疆吏，不亡于列强之瓜分，不亡于各级社会之无知识，吾敢一言以断之曰：中国之亡，亡于学生”。学生既为举世推崇的主人，必须尽主人之天职。“内而政府，外而疆吏，皆受佣于主人者也。而顽固，而婪毒，主人得以扑责之，推倒之。列强者，对主人而立于客位者也。客欲喧宾夺主，主人得以排击之。各级社会，皆吾主人之兄弟亲戚也。而知识缺乏，主人得以提携之，输贯之。由斯以谭，通国之人皆对于亡国之宣告不知所署，一惟主人之马首是瞻”^[20]。这已经明示学生社会的政治发展趋向，就是要推倒政府，抵抗外强，提携民众。

《苏报》案以后，清政府与拒俄人士的矛盾急剧激化。受此影响，有关中等社会的论说公开将矛头指向清政府。8月出版的《江苏》杂志第5期发表署名“壮游”的《国民新灵魂》，呼吁重铸新国魂，并列举了五大原质，其中第四为“社会魂”，“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受，终不可得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且吾观察中国今日社会之内容及现象，有不能与欧洲比例，而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盖我中国个人经济主义太发达，故不能具有政治思想；而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国民如果具备新灵魂，则“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

《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刊载的《民族主义之教育》，标明是“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文章指出：“革命事业之起也，必有中坚。法国大革命之隳突无前也，以平民党为之中坚也；英国革命之隳突无前也，以圆颅党为之中坚也。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故今日言革命教育者，必在两等社会。”中下等社会的教育事业，不在家庭教育，不在学校教育，而在社会教育。“是故言革命教育者，惟有社会教育之可言也。”根据地与运动场，中坚与前列的区分，不仅指出了中国革命与英、法等国革命动力的不同，也指明了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的相互关系。

杨毓麟（笃生）以“湖南之湖南人”的名义撰写的《新湖南》，形式上是受欧榘甲所著《新广东》影响的应和之作，内容和对象却有所不同。作者宣称“作《新湖南》用遍告湖南中等社会”，希望“湖南之青年军演新舞台之霹雳手”。按照作者的看法，“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以现象如今日之离奇俶诡，而诸君不悟，任下等社会之俶扰，而不思所以提挈之，任上等社会之淫荒沉湎，而不知所以改造之，天虽欲胙我湖南人，抑将奈此无骨无血无脑气筋之视肉何哉？”托命与替人，提挈与矫正，破坏与卵翼，在勾勒中等社会与上下等社会的关系的同时，点画出中等社会的使命责任。

这时国内外的学生不仅强调中等社会对于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的位置及其职责使命，更对中等社会本身有所剖析。杨毓麟对湖南中等社会的看法是：

湖南无兼并之豪农，无走集海陆之巨商，无鳩合巨厂之大工业，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惟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而主持全省之议论思想者，惟士林而已。吾湖南而为埃及，必有人为亚拉飞；吾湖南而为非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吾湖南而为杜兰斯哇，必有人为古鲁家。若而人者，必出于中等社会无疑也。顾湖南中等社会之议论思想涣散而不统合，党仇交争，戈矛林立，则又何以御滔天之大祸哉？

中等社会的主体既为士林，其特性与问题自然与欧美不同。如何破去门户之见，畛域之私，关键之一，是加强对中等社会自身的宣传和教育。正如杨毓麟所说：“下等社会吾亟亟与之言，故必亟亟与诸君言；上等社会吾不屑与之言，尤不得不亟亟与诸君言。”^[21]具体而言，“对于中等社会教育之事业有四：一曰结集特别之团体，二曰流通秘密之书报，三曰组织公共之机关，四曰鼓舞进取之风尚”。组织团体，必然有种种方面、手段、意见，因此，“在各小团体中，不可无确定之方针，而各种团体互相应附，不可无统一之主义。书报者所以会通一团体之情意，机关者所以综合各团体之势力也。以一团体之思想言论，制造一团体之风习；即以众团体之风习，制造一大团体之事业。虽种种团体方面愈多，手段愈多，意见愈多，而不害其宗旨之大同。故欲担任中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以广施结集之方法为第一义”。自社会学输入中国，合群思想之所以如此受到国人的重视，正与中等社会即士林的状况密切相关。

教育中等社会，目的还在通过他们去启蒙下等社会，“对于下等社会之教育有三：一曰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一曰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入之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三曰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三者之妙用，存于二方面：一曰结集通俗讲演之会场；一曰流通通俗讲演之文字”。俄国虚无党形成大势力，其游说煽动，由学生相继与囚夫隶卒、农民、军人为伍，“主义揜扬，徒党充实，而后能挫折政府之锋芒而无所于衄”。中国的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于秘密社会之间，而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故担任下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联络三种社会构成其统一之机构，而增进其活动之形势”^[22]。

教育下等社会，不仅要使下等社会联成一体，更重要的是使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有机结合。拒俄运动中，上海绅商士人发起成立中国四民总会，随即改称中国国民总会。《浙江潮》为此发表时评《四民公会》，论而赞道：“吾中国有最可悲可痛之一事，则以士为四民之首，又不能自成一社会，而又与他社会离而绝之，若判天渊而不可合，故日日言社会改革，言社会发达而终无效。而不料中国旷古未闻之四民公会，竟堂堂成立于今日之海上。”^[23]中等社会本来依附于

上等社会，随着时代变动，中等社会与上等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与下等社会仍然存在隔阂，在对上等社会失望的情况下，如果不能与下等社会有效结合，中等社会非但不能承担历史重任，自身的地位生存也岌岌可危。

1903年底创刊的《俄事警闻》，是对俄同志会的机关刊物。该刊连续发表了73篇告社会各界书，以动员各界民众。识者认为，所涉及者值得注意的有四类，即新型知识阶层，农、工、商，流氓无产者和官吏。《俄事警闻》是沿着三等社会论的路子进行演绎，第一类人即所谓中等社会，第二、三类人均属于下等社会，第四类人即上等社会。^[24]这正是中等社会通过拒俄运动进行自我教育和教育下等社会的体现。

四 应用与争议

拒俄运动高潮之际，梁启超适逢美洲之行，错过了感受革命的良机，却遭遇了美洲华侨不能行共和之制、保皇会及上海的言革同道品行有亏等一系列打击，尤其是听说“《苏报》案”吴稚晖告密的传闻，对于革命党的信心大为受挫，因而自美洲归来，续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宣布告别共和，引起正在朝着革命的方向迅跑的留学生相当强烈的反弹。由署名“和事人”者撰文批评其“宗旨顿改，标明保王，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文中指出：排满由革命而生，“推原其始，亦由救国来也”，排满所以补革命之不足。“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于建立也。”梁启超为此专门作答，阐述其转变立场的理由，但对上下流社会与排满的关系未予回应。^[25]

稍后，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名撰写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与一年前的《释革》相比，梁启超这一次是真心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来打消人们革命的念头，而并非迫于康有为的压力言不由衷。他全面比较了中国与泰西的革命史，总结出七点特色，其中第3条指中国历来“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

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上等、下等社会之革命共发生二十余次，各有成有败，而成少败多。唯独“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阙乎未有闻也（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限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故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无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26]。

三等社会的划分，固然不够严谨，却相当适用。按照梁启超的逻辑，要想跳出历史上革命的循环往复，必须培养中等社会，只是这时他已经不再主张中等社会从事革命，而是希望中等社会进行宪政改革。为此，他将批评的笔触较多地指向中等社会，引起一些不满。有人问道：“今日国中种种老朽社会，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议。今子之所论，反乃偏责备于新学之青年。新学青年，虽或间有不德，不犹愈于彼等乎？”梁启超答道：“不然。彼等者无可望无可责者也。且又非吾笔墨之势力范围所能及也。中国已亡于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学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与彼等同科焉，则中国遂不可救也。此则吾晓音瘖口之微意也。” [27]

后来梁启超进一步论道：中国必须养成国民能力，才能救国。“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此举国所同认，无待词费也。国民所以无能力，则由中等社会之无能力，实有以致之。故本论所研究之范围，不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推能力以度诸人也，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积能力以有诸己而已。非有所歆于能力以自私，实则吾辈苟有能力者，则国民有能力，国民苟有能力者，则国家有能力。以此因缘，故养政治能力，必自我辈始。” [28] 如果说，原来梁启超希望开民智以动员全体国民，现在则认识到可以依靠中等社会以引导广大国民。中等社会是否具备国民能力，对于中国的救亡振兴至为关键。

不过，三等社会分层的概念，的确如梁启超所担忧，界限相当模糊。一些眼光向下的激进人士就不大赞成用上等、中等社会将读书人

与官吏分开。白话道人林懈的《国民意见书·论合群》，即只用上流与下流两等社会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国民，认为中国所以不合群，原因有四：其一，“上流社会共下流社会不联络”。中国的读书人，都以上流社会自命，“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这种意见，并不是从现在才有的，但既然有了这意见，群力的团结，自然不能够坚固了”。其二，“下流社会共上流社会不联络”。下流社会一方面看上流社会太重，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则看上流社会太轻，不屑与伍。其三，“上流社会共上流社会不联络”。上流社会分为做官、乡绅、读书、财主几等，做官者巴结上司，争风吃醋，乡绅鱼肉乡里，你争我夺，读书人结党营私，相互轻视，财主则自私自利，不管闲事。其四，“下流社会共下流社会不联络”。种田者争水，做工者隐秘，经商者把持，会党则互斗。只有不分上下，联合一致，共同对满洲政府实行攘夷，对大陆各国实行自卫，中国前途才有一线希望。^[29]

严格说来，拒俄运动的发起领导者虽然意识到国民必须合群一致，力图用分层的观念为民众的不同部分进行定位，明确各自的责任使命，使之各尽天职，以达到合群的目的，并且进行了一定形式的宣传动员，但是整体而言，拒俄运动过程中，新知识阶层和绅商与一般民众的关系还在若即若离，没有真正合为一体。

拒俄运动以后，革命党人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越来越少，但也有例外。与梁启超一派的关系一度相当密切的陈天华，即为代表。由他记录的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词，开篇便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而由其他人所做的详细记录中，却不见有这样的字样和意思^[30]，可见这一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陈天华本人的认识。陈至死仍然坚持用中等社会的观念看待革命动员，在《绝命书》中，他反对特会党为本营以及借用外资，而主张实行政治革命的迂远之道。认为中国举国皆汉人，如果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无须流血。“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皆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31]

在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中，三等社会的分层理论继续发挥指导知识阶层观念与行为的重要作用，而青年学生与开明士人仍有各自的解

释。抵制美货运动时，京师大学堂发布《告全国学生文》，认为在半开化国度中，“社会之阶级，其大略有三等，上中等社会人数较少而识见较易开通，下等社会人数较多而识见较易蒙蔽。而其左右一事也，则多数人之意见往往足为一事之梗，虽贤且智，亦未如何。故下等社会之势力，乃天下最庞大而最可惊者也”^[32]。于是他们想方设法用各种形式对广大下层民众进行宣传 and 动员。开明绅商和士人也自诩为中等社会，主要通过报刊等形式发挥其监督政府，向导民众的作用。季家珍（Joan Judge）所著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以《时报》为中心，对此有深入论述，可以参考。

借助于三等社会分层的观念，经过拒俄运动，从抵制美货开始，中等社会愈益明确其社会地位与责任，并努力实现其与下层民众联合进行救亡振兴努力的既定目标。近代中国的爱国革新运动，终于由趋新阶层与下层民众各行其是到若即若离，然后进入联为一体、分工合作的崭新阶段。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各种观念学说，大都来自域外，但又并非完全照搬，其中有选择（有意或无意），有变通，有误解，已为中外时贤慧眼顾及。不过，在欧风美雨、西学东学夹杂而来之际，国人对各种崭新的观念学说应接不暇，脑际常处于创造更新的思维状态，加上内忧外患的危局，迫切需要应对时局的各种理论解释。在外来思想不够用或不适用的情况下，国人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综合创造出适合当下需要的概念、学说，有时甚至可能与东学、西学的发展变化不谋而合，并驾齐驱，只是缺乏系统学理的支撑，而多了几分因时制宜的实用性。中等社会观的产生及其应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体现。

近代以来人们追求的社会平等，其实是针对实际生活的不平等，阶级论的社会分析，主旨就在于指出不平等的现实，并寻求打破不平等状态、最终达到社会平等的途径。社会分层与精英理论的问世，却似乎告诉人们如何在现存社会秩序之中持续性地保持平衡与活力，实现社会进步。这可以说是后来中产阶级观念的思想源泉之一。与精英理论的形成几乎同时，中国出现了三等社会的分析概念，为青年学生和开明士绅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理论，用以说明其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和区别，以及他们自身的使命与责任。中等社会观的广泛适用性，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本身的学理系统不够严密，思想来源可能多重，另一方

面，也表明中国固有的社会状况与西方差别甚大，凡适合具体时空条件下国情的解释，即易为人们所接受。至于这些解释是否来自域外，是否准确地符合理论系统，反倒是次要问题。

清末的革新与救亡运动中，知识阶层与民众一开始处于分离状态，戊戌与庚子尤为典型。一些知识人认为义和团其情可悯，其气可用，其举动则可哀。1901年拒俄运动发端，趋新人士主张动员民众，文明排外。在梁启超等人国民思想的鼓动下，随着国内和东京学界风潮的兴起，“少年中国”演化为“学生社会”，以学生为中国的主人翁，由学生引导其他社会成员转变为国民，“学生社会”再演进为“中等社会”。1902年底，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率先使用上等、中等、下等社会的概念。此后，政见不同的人士朝着各自的方向加以解释和发挥，其主旨是：上层已朽，下层尚愚，须由中等社会开通和引导下层社会去改造上层社会。这种源于中国历来上流与下流社会分别以及近代欧洲等级制的认识，与当时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提出的精英分层理论相当近似，象征着中国趋新知识人士的自觉。

梁启超的宣传，与国内外两部分人的诉求互相呼应，并由此导致对中等社会作用的理解循着两条不同的途径伸展，开明士绅由爱国救亡运动，青年学生则主要通过学界风潮。拒俄运动使学生和开明士绅直接面对国民的社会责任，中等社会的主张部分得到实现，四民合为国民，而中等社会起着引导及核心作用。中等社会观念的演进，虽然存在两条理路，在拒俄运动高潮期间，激进路线显然占了上风。梁启超游美归来，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他已不主张中等社会从事革命，而希望中等社会进行宪政改革。接着又由开民智以动员全体国民，转而主张依靠中等社会引导广大国民，中等社会是否具备国民能力，成为中国救亡振兴的关键。此后，除陈天华等个别人外，提出“中等社会”的激进人士较少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来看待自己与民众的关系，而主张体制内变革的立宪派士绅则继续有所发挥，中等社会的概念在历次爱国和宪政运动中被广泛运用。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起，绅商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首次连为一体，这样的联合在此后的爱国与革新运动中一直维系并不断加强，显示出四民社会经由三等分层走向国民社会的发展脉络。

[1] 《寻找历史的谜底》，杨天石：《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117页。

[2]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3] 桑兵：《日本在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述评》，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4] 参见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至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九年三月自印本）附《〈东邦协会会报〉受赠书目栏见〈清议报〉、〈新民丛报〉一览》。

[5] 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8期，社说，第2页，1903年10月。

[6] 窦昌荣选注：《天地会诗歌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4页。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257页。

[7] 参见姚纯安：《学科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以1895至1919年的社会学为中心》第1章第3节《知识体系的集中输入》，中山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8] 《清议报》第83册，1901年6月26日。

[9] 中国之新民：《敬告留学生诸君》，《新民丛报》第15号，论说，第1页，1902年9月2日。

[10] 中国之新民：《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论说，第1页，1902年10月2日。

[11] 《蒋君智由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17日。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12] 《吴君沃尧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26日。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7页。

[13] 《薛女士锦琴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27日。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27页。

[14]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34页。

[15] 《纪第二次绅商集议拒俄约事》，《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5页。

[16] 《开智录》第6期，1901年3月20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449页。

[17] 张继主编：《教育界之风潮》卷2，上海，1903年。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已引及此则史料。

[18] 《湖北学生界》第二期，论说，第2—3页，1903年3月。

[19] 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团体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章《军国民教育会》。

[20]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论说，第1页。

[21] 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15—629页。

[22]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23] 《浙江潮》第5期，时评，第126页，1903年6月15日。

[24] 王学庄：《俄事警闻》，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161—162页。

[25] 《答和事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46页。是文载《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标明为1903年12月2日，《饮冰室合集》署期壬寅二十八年，误。这一期合刊的实际刊行期约在1904年5月。参见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

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至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九年三月自印本）附《〈东邦协会会报〉受赠书目栏见〈清议报〉、〈新民丛报〉一览》。

[26] 《新民丛报》第46—48号。原署期为1904年2月14日，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注明实6月出版）

[27] 《新民说・论私德》，《新民丛报》第46—48号，1904年2月14日。

[28] 《新民说・论政治能力》，《新民丛报》第49、62号，1904年6月28日、1905年2月4日。

[29] 《中国白话报》第17期，1904年7月。

[30]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7—283页。

[31]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附跋》，《民报》第2期，第4页，1905年11月。

[32] 《大公报》1905年7月11、12日。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

——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辛亥时期风起云涌的学界风潮，对于广泛而迅速地散播自由民主思想，鼓动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而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的浔溪公学，在辛亥学界风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1902年11月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具有相当典型的象征意义。风潮中针锋相对的冲突各方，以及应邀前来的调解人，其实本来是大方向一致的同道。近代史上，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当“革命”处于自发阶段时，其直接诉求有时虽然看似同一营垒中的内耗，但冲突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和广泛社会影响，却起到了动摇和破坏现存统治秩序，间接乃至直接动员民众的作用。

从研究具体史事的角度看，浔溪公学风潮还有另一重典型意义，即相关各方对于同一事件的陈述和评价，出于各自立场和利害的差异，往往相歧甚至相悖。重现史实如果仅仅依据某一方的记述，不单会造成片面，还可能整体上扭曲真相。参照比勘各种记载，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则可以在不断近真的同时，探测和把握相关各方态度立场差别的心路历程，从而找到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以免用后来外在的观念臆测解释。

此外，风潮事件虽小，却牵涉蔡元培、杜亚泉、黄远庸、庞青城等辛亥乃至五四新文化时期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风潮在他们各自的经历中留下深刻印记，造成影响其后来思维行为的关键情意结，预示了对于许多重大问题态度各异的潜因。这也是辛亥革命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至深且远的明显例证。而所涉及的史料和史实，如蔡元培所撰《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1]等，又为相关的传记、年谱、文集失收漏载。关于此事，曾于《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有所论及。十余年来，相关材料积累渐多，认识相应有所调整，早欲撰

写专文，重予论述。适逢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特撰此文，以期进一步认识学界风潮乃至辛亥革命及其历史影响。

一 风潮前史

浔溪公学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创办人庞青城为当地大富。^[2]湖州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南浔则是湖州的首富之区。谚云：“湖州一个城，勿及南浔半个镇。”同光之间，南浔靠贩丝致富，因此发家者何止百户，清末最著名的有所谓“四象八牛”。据说凡入象者资财须在银洋500万元以上，属牛也要100万元，而庞家排列四象的季席。其父庞云鏊结交胡雪岩，经营蚕丝和药房，同时贩卖军火，获取暴利，遂成巨富。此后由长子庞元济（莱臣）继承父业，陆续投资于上海的金融、股票和房地产业，并在江浙两省广置田产。^[3]庞青城名元澂，为云鏊次子，注重造纸业。1902年曾派人到日本学习手工造纸，在南浔设立青城手工纸厂。以后改用机械，到1906年，青城造纸厂拥有资本112000元，为辛亥革命前浙江省屈指可数的大型近代工业。^[4]

庞青城素有开通之名，好社会公益事业，1901年，捐巨金创立浔溪公学，“规则一遵中学校”^[5]，聘请友人叶瀚担任总教习。叶氏为戊戌乙巳间革政派的要角，与夏曾佑、汪康年等人为亲友，曾入张之洞幕府，戊戌期间与梁启超、谭嗣同、陈三立、邹代钧、章炳麟等深相结纳，办报刊，开学会，兴学堂。庚子先后担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国会临时主席，密谋变政，后来又加入中国教育会，为温和派领袖。^[6]叶瀚受聘后，由庞青城资助，前往日本实地考察学校教育，并购置中小教育教科书及模型仪器等设备。叶瀚有一定的办学经验，他具体比较中日两国的学务情形，对浔溪公学的前途忧心忡忡。1901年底游历日本归来，“友人询参阅所得及此后公学进行事若何”，他“蹙额对曰：‘彼国主持学校者皆专门才，且管理员资格在教员上。今中国乏此等人才，学生知识日进，而管理员以寡对众，即在专家犹虞不给，况吾国为管理者又皆典伙蒙馆先生，若何而可言教育？窃恐措置之难，首在乎是。虽然，吾必以身为的，尽力图之’”。

1902年春，浔溪公学正式开学，叶瀚“昼夜编译讲义外，尚兼顾管理员，与生徒调私事，日得眠仅三小时。虽资金无缺，然精神上之苦痛较办速成时尤甚”。不久，因有人“忌生（即叶瀚）而谋孽于庞氏者”，叶遂“力谢去”。^[7]庚子后民权思想弥漫，在缺乏管理人才和行之有效的制度程序的情况下，该校学生实行自治，“学生中有议长，凡总理或教习有何命令，彼等皆得集众公议服从或反对之。其平日早结成一恃群傲长只顾私意之小团体”^[8]。由此养成习气，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制干涉。到是年夏，总理庞青城偶尔对学生演说失言表示不满，学生们便感到难以忍受，“以至相约解散”，并且“事前则以火以剑”^[9]，情绪激动，行为激烈，从而导致开办仅仅一学期的浔溪公学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学生退学风潮，被当年11月集体退学的南洋公学学生视为“我国学生革命之举”^[10]的先声。

为了平息风潮，庞青城到上海邀请学者前往调停，杜亚泉亦在其列。杜氏早年弃经解而习算学，1898年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习，又自习理化及矿、植、动物诸科学，兼习日文，均无师自通。1900年，中西学堂新旧两派冲突，校董袒护旧派，身为新派的杜亚泉和蔡元培等愤而相继辞职^[11]，赴上海。杜氏提倡科学，设立亚泉学馆，发行《亚泉杂志》，为中国科学期刊的嚆矢。次年，又将亚泉学馆改名普通学书室，将《亚泉杂志》更名《普通学报》。^[12]杜亚泉与叶瀚、庞青城等颇有交谊，早就参与浔溪公学事务，叶瀚到日本为浔溪公学购置教科书和仪器设备，即由杜亚泉为之计议。^[13]调停的结果，原来的总教习辞职，庞青城改聘杜亚泉继任。

杜亚泉接任后，“不辞劳苦，悉心擘画，为学生参考计，实习计，辟图书、仪器二馆，又以传达文化，特印刷物，劝庞君购置印机及铅字以备用”^[14]。并注重优选师资，“所请教员，均为一时知名之学者”^[15]。一时间浔溪公学大有起色，堪称当时兴学的典范。蔡元培说：“八月间，公学有运动会，舟于太湖，吾以客与观焉。观其学生之高爽活泼，而师生间若有无限之爱情。吾是时击节叹赏，以为吾国学校界，以吾所见，殆无若浔溪公学之善者也。是时总教习某甲（即杜亚泉）、历史地理教习某乙皆夙兴夜寐，与学生共甘苦，出肺肝相示，学生情意，殆纤悉无不达者。学生时时演说，方议举代表人，立自治会，吾亦尝参议其间，颇闻学生有自由学堂之语。吾甚钦佩之。”

钦佩之余，蔡元培鉴于叶瀚的前车覆辙，也有些担心。他对杜亚泉说：“子之管理法，吾所甚佩也。虽然，子兼授理化、算学、日文文法等，太烦劳，吾惧不足以持久。”杜亚泉答道：“诚然。然余无如何。余之初任事也，教习自日文外，悉如旧然。国文教习某丙以招录旧时跋扈之学生任译事，总董不喜之，积不相能，遂辞去。理化教习某丁，与某丙相契者也，因是不悦，不事事，仪器馆凌乱不可理，尝诋学生曰：‘是皆《吁天录》朋友也（是时杭州方发行《黑奴吁天录》，言其性质如黑奴耳）。’殊不任受教，尝积日不至讲堂。余不得已，恒代之。某丁终以不事事，无聊，亦辞去。余友某戊，精于算理者也，余已订之矣，殆将至。”又说：“余以普通学必以国文教授，余欲于公学立国文普通学之基础，近日不得不假道于日本，故学生无不授日文者。两年后当拔高材生二十人，分科编译之。然新名新理，不能不取资于英文。”蔡元培闻言，点头称是。^[16]其实风平浪静之下已经暗潮涌动。学生认为该校办理不善，“程度、制度不完，冲突者非伊朝夕矣，祸种久伏而思一泄。任事者不识甘苦，苛待学生，以至大冲突起”^[17]。与蔡元培得自杜亚泉方面的看法正相反对。

二 风潮起因

蔡元培的担心果然不幸言中。时隔两个月，1902年11月底，浔溪公学便再度爆发退学风潮。

引发风潮的直接原因有三，对此校方和学生的认定大体相同，但看法态度却分别甚大。起因之一，浔溪学生为声援南洋公学学生的退学之举，与校方意见不合。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不满校方压制，8个班200余人一齐退学，引起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选报》、《苏报》、《政艺通报》、《新民丛报》、《文言报》纷纷刊登报道评论，一片赞誉支持之声，为当时言论界所罕见。

“公学诸君退学事，愤激宏毅，安得不印人脑筋？信至浔溪，学生皆感动，公议登告白曰：‘浔溪公学全校学生敬贺前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不愧国民光彩，并叹南洋公学全校骚动之厄。’议成，将寄沪，总教杜亚泉先假回，是日适来，见之即曰：‘凌侮学生者，教习也，总理也，不得语侵公学。’并禁其登报。学生曰：‘众议已

决，询谋僉同，以一人私意，拂逆大众，生等不敢服。’论辩者久之，学生允改上文曰：‘浔溪公学学生为前南洋公学学生表同情，并吊南洋公学全校骚动之厄。’因是事，总教忿恨不乐，学生亦愤然。”[\[18\]](#)

比较学生的陈述，总教杜亚泉关于事情经过的表述大体相同，但细节较为详尽，态度尤见分别，他说：“斯事甚奇。某乙以病回里，两月余矣。余以十四日以父病回里，二十四日到公学。于时学生方集演说厅，将寄告白之稿于上海学生中，举[某]辛为代表。某辛者，文笔颇佳，尤工辩论，其科学程度则未得为第一流。时以学生六十八人中多病假回籍，留者止三十五人，因得占此席。余观其稿言：‘浔溪公学全校学生敬贺前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堂，不愧国民光彩。’因曰：‘南洋公学诚可爱敬，然此终不幸事，决非可贺者。且凌侮学生者，教习耳，总办耳，语不宜侵及公学。’学生不服，余再四劝改，历半日乃允改‘敬贺’为‘表同情’，并增一语曰：‘敬吊南洋公学全学骚动之厄。’闻是时学生已有诋余顽固者。”[\[19\]](#)某辛，即黄为基，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记者黄远庸。据蔡元培《杜亚泉传》：“学生黄君远庸，为学潮主动者。”[\[20\]](#)

起因之二，是关于英文教习的去留，校方和学生的态度截然不同。“浔溪公学之西文教习温君缉周者，素热心于教育，为学生所心悦诚服者也。一日者，隐约露去志。学生黄为基等环问其所以欲去之原因，至再三。温君曰：‘言语不通，多所未便（闻温君为粤人，言语不通诚有之。然已将一年，岂至此时始觉有未便耶？其必为设言可知），一也；自暑假以后学生率以日去留，班次不齐，难收教育之效果，二也。故计唯有终此年而已。’黄为基等因苦问：‘先生必如何而可留，愿得先生一言。’温君答以：‘无已，则我且准公学办法之改良与否，以为去留可。’越数日，总教某适有请吴某为温君代庖之议。黄为基等相率诣总教所，问：‘如浔溪公学之一学堂，何至请如吴某者为西文教习。岂欲促温教习去，使并不终此年耶？’总教某指黄而言曰：‘现经费不足，譬则饿夫，得菜根咬之已足矣，尚欲燕窝为？且何独汝一人之脑筋发炎也。’学生等哗然云：‘不独黄一人，我等人人之脑筋俱发炎！’怏怏退出。”[\[21\]](#)

有关此事的另一版本为：“英文分教温缉周，学生所爱戴崇拜者也。日者谓学生曰：‘明年将去，不克常聚首矣。’学生问其原因，温以他言乱之。学生骇甚，然姑隐之不言。逮总教习请他人庖代温

君，学生遂谒总教，质之曰：‘温师何故辞归？师平日遇学生，平和谨婉，殊未尝以压力绳人。总教辞分教，必其与学生意见不合也。意见合而辞之，教学相长之谓何矣？’总教非特不是学生，且加以申斥，以为学生权利，不得干涉此等事。英文师之所以辞者，总董庞青城言度支窘绌故也。因是学生积不平。总教复有夷视学生及种种野蛮语，召学生之怒。”^[22]其中关于温不以压力绳人之说，显然是针对总教杜亚泉对待学生的态度而来。

对于温缉周的“平和谨婉”，杜亚泉早有意见，八月浔溪公学开运动会时，他就告诉蔡元培：“余意英文教习必须有教育思想，与余辈同宗旨者，与共商榷兹事。今英文教习某己，文学颇深，然甚冷淡于教育。学生已界三级矣，而每日止能任三时，每周止能任五日。自授课外，日与善粤语之某司事沽饮市楼。任事一二周则必回上海一次，旷日殆亦一二周，于公学甚不宜。余意欲易以资格稍浅而肯留意普通教育者。”^[23]则学生觉得易于相处的原因，在校方看来不免放任。

与杜亚泉交涉不果，学生不肯善罢甘休，“有志者相谓曰：‘学堂者，因培植人才而立也。故有国民之资格者，然后可兴学堂，有国民之思想者，然后可入学堂。反是焉，水火未有能相济者也。总董以数万度支，创建学堂，而教习尽顽钝，学生似奴隶，何乐而恋恋于此？讲形式而不求实际，纵读破十年，经穷白首，其何能成？学而不成，毋宁不学。往哉休哉，此学固非唯一之学堂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善者正多，何地不可容身哉？’众纷议不能决，卒曰：‘质之总董以后，欲去则去，欲留则留，毋狐疑犹豫也。’遂举代表，偕诉总董。总董大惊曰：‘吾何曾有此意见哉？无已，吾为汝等调停之。’于是学生知总教之诈，而怨声益甚，遂相率归。”^[24]

国民与奴隶，是戊戌后梁启超兴民权的重要概念，立宪为国民，专制为奴隶，学生既然将矛盾上纲上线到如此程度，与校方的冲突便开始升级，他们先是“邀英文教习至花园，语以明年必无去，且要以签字”。随即三十五人联名致公函给总董、总理及总教，“言明年办法，要求四事：一宜请理化、算学专科教习；二宜留英文教习某己；三每日课程太繁，宜酌减；四宜增购新书。”其实学生的要求与校方的原定计划相去不远，只是双方缺少沟通，互不知情。杜亚泉称：

“盖所延算学教习某戊，初订七月到学，后以乡试故，展迟两月，九月到学。后以试榜未发，心摇摇不肯上班。及榜发不中，又牢骚不上

班，忽支两月脩赴上海。余驰书诒之，答书遂辞。故算学尚未有教习，余仍自任之。然明年理化教习，则余已订定某君，学生盖未之知，故有第一条之请。余于是告学生以第一条必能如诸生意；第二条余意颇不然，然诸生既心服教习某已如是，亦可商量；第三条余意亦然，必酌改；第四条尤易办也。学生亦无甚不悦。”^[25]尽管有组织和提条件往往是冲突扩大的征兆，双方声气一旦相通，矛盾还是有所缓和。

起因之三，为校方变更考试奖品。此诚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英文教习而起冲突的翌日，季考案（一说为月考）揭晓。八月运动场期间，总董庞青城曾奖励体操优胜者以银牌。“方此案未发时，亦有奖银牌之说，后忽中变，欲无奖。”杜亚泉认为：“无奖决不可。”改奖铅笔洋纸簿等。“及给奖，凡十名，其四已以病回里。而某辛忽称铅笔不佳，欲售之于司事。司事不受，乃折而弃之，并强出其余诸人所售者，亦折而弃之，狼藉满地。”杜“乃集某辛等五人，告以‘褒赏之物，以学校名义褒之，所重固不在物。今如是，是大伤校友之感情，汝等宜自知过。’某辛等不服曰：‘学校以是等粗恶之物褒赏，是既伤我辈感情。且我辈既受此物，则我所有权得自由处之，先生不必过问也。’及夜，又招某辛等劝谕之，终不肯认过。余于时甚灰心，因发一纸，大意谓：‘师生之间，在情感与心服。今某辛等护前不变，大反此旨，余不愿再任是职，已告退，并函辞于总董。’未几，学生诣日本教习所，称：‘某甲不称总教职，已辞去。然君幸毋俱去。’又上书总董、总理，言：‘某甲不称总教之职，学生已不认为总教。前所要求四事，请径由总董、总理安排之。’”

^[26]

对此学生方面的记载为：“学生列优等者十人，仅得奖木笔白纸簿等。学生愤甚，谓此微物，岂得以奖学生？皆毁而投诸厕。总教见之，藉此泄其平昔愤气，责问受奖者曰：‘汝等慢我轻我，知罪乎？重者当屏斥，轻者记大过。’学生曰：‘若不受奖而怠侮教习，是学生之罪也。今既受之，毁也学生之权利，留也学生之权利，生等未知罪。’辩论四小时，不决。学生遂出，而总教告退条下。”^[27]

事态发展至此，学生与杜亚泉已成势不两立，必须牺牲一方，否则风潮难以平息。而这对庞青城显然是两难选择，也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他一面力劝宣布辞职的杜亚泉暂缓离开，一面寻找外部调人，以求打破僵局。

三 曲突徙薪

为了避免风潮导致学校停办解散的恶果，庞青城不得不再向上海的同仁求援，邀请有办学和处理学潮经验的蔡元培前来调解。

蔡元培自八月出席浔溪公学的运动会返回上海，“了不得公学消息，惟南洋公学冲突后，于《同文沪报》见有浔溪公学学生之告白，亦不以为意。十月二十八日（11月27日），得公学电，言‘将有事端，速来消衅。’遂以翌日往”。临行前留致吴稚晖一函：“弟适得南浔电，以学堂有冲突事，招往调停。弟等本非一切持破坏主义者，如曲突徙薪之事，亦甚愿为之，故于今午即趁船去。”^[28]到校后，蔡元培往见总理，后者曰：“余适有疾，脑晕耳聋，不详告斯事本末……请参考总教、总董、学生之意见，乃决议。”于是蔡元培先听取杜亚泉详细陈述冲突的原因及经过，又询问庞青城的看法意见，随即提出：“吾意惟劝某甲早行耳。”庞青城表示异议：“某甲行则其所订之教习将皆行，学生将散。吾意斥退某辛辈数人以留某甲。”蔡元培进一步解释道：“斥退学生一人，是即斥退全学之学生也。吾意某甲殆不可留。然吾可告以劝各教习为公学计，毋随俱去。”庞青城仍然不同意：“然学生气焰如此，某甲去，我辈益束手无策，奈何？”蔡元培曰：“吾为某甲计，甚善。然善后之事则吾亦无策，姑思之。”^[29]

蔡元培的意见，看似有些轻率，其实他十余日前刚刚处理过南洋公学退学大风潮，知道学生因细枝末节而不惜掀起风潮，固然是年轻气盛的躁动使然，背后却有相当深刻的社会和时代原因。在南洋公学风潮中，校方与学生的冲突愈演愈烈，难以调和，也请蔡元培代表教习出面调解。他在学生集会上说：“闻诸君不日行，诸君之志，深可嘉尚。然诸君尚有所望乎？尚可挽回于万一乎？凡事必有目的，诸君之举动，吾已尽知，谅不仅仅以牺牲公学为目的。我教习代表人也，今请代教习为诸君进一言：诸君言行一致，以公愤而去大学，实社会进步之现象，亦学界风潮之膨胀发达使然。此事原因，不过区区墨水瓶，竟至震动全局，吾知断非诸君有意为难，要必祸根长种，患蘖常留，故一发焉而不可制。吾非不知事变者，曷肯苦留诸君？然诸君为此行径，公德明矣，团体固矣，精神充矣，岂无宗旨？岂无次第？岂无约束？岂无希望？使诸君竟事事无所依傍，狂澜一倒，竟不克障，则诸君极文明磊落之思想，转以故寻一衅而束身竟去者，无乃堕于偏

而失之激乎？某承命来此，既担此义务，负此责任，并欲代表各教习之意，不得已而告诸君。吾不欲更以他问题相质问，惟如何则必行，如何则可不行，请诸君代为一答。”学生代表殷次伊起而应道：“初念本仅仅留五班，今事已如斯，则以与总办势不两立为大问题。明日十钟前，总理去则生等留，否则不敢从命。”蔡元培问在场学生是否同意，除五班十三人有异议外，其余皆举手赞成。^[30]浔溪、南洋两公学情形虽不尽相同，但蔡元培凭经验已经隐隐感觉到，凡因细故而激成大风潮，绝非如表象那般简单。

向校方了解情况后，蔡元培会见学生代表黄为基等五人，询问事件的由来，学生一一以前事述告。蔡元培听后表示：“是固有使诸生不得不然者。然掷奖物于厕所，亦未免为太过之举动。”学生应道：

“以是责我等诚当。顾我等之为此，亦激于前事耳。”^[31]黄为基则称：“我等非激动于南洋公学之风潮者，亦非为褒赏物小事者，实为学问前途计，不得不出于此。我等所要四条，想君知之矣。我等所以最不嫌于总教者为第一条，第二条即第一条之支别也。自某甲任总教以来，分教某丙、某丁、某戊均以不合辞去，今又及某己矣。我辈今乃知某甲之恣其私意，以误我辈之前途也，故愤愤。”蔡元培问：

“吾知分教辞去，则总教兼任其教科，总教果胜任否？”答曰：“不胜任。我辈自忖半年来无甚进步也。”蔡元培进一步追问：“此事凭君等良心决之，无可容吾拟议。吾意学校中非各科可单独运动者，必有统合之组织，故分教与总教不合，自不得不辞；即不辞，总教亦当辞去之。今日文明国易一执政，则其僚属殆鲜不更易者，亦此义也。故分教之不合而去，与总教之别延分教而未得其人，此尚未可为总教罪。我国此时欲延一科学教习，甚不易也。惟学校中非独以教科灌入知识于学生而已，教师之热心与公德，其类化学生之力甚大，关系甚重。故君等诋某甲之恣其私意，吾不能不一推求。使某甲以延分教不得之故，而勉强自承其乏，虽不胜任，尚可原谅。然君等之恣私意，是必某甲利于分教之无人，而因以自便其私也。吾欲问某甲既兼分教之任，曾自取分教之脩否？”黄为基称：“某甲已书一纸，支分教之脩于司事，但司事尚未付耳。此自有证据，否则吾辈不能以春秋诛心之法遽诋为私意也。”

蔡元培见是时惟黄为基一人出言，其余四人皆默然表示同意而已，遂转而问司事：“某甲果有支分教脩之一纸书乎？”司事回答：“无之。惟告以前分教未支之脩，以其半津贴两助教之膳费，以其半

预备明年派人往日本展览会而已。”蔡元培认为，这仍是“为公学公费，不得据以为总教之私意”。

掌握各方的观点态度后，蔡元培与杜亚泉深谈一次。他首先询问：“学生所执之词柄，非有所必不得已也。而显若深恨大仇，举平日师生关切之爱情而一切抹杀之，此何以故？”杜亚泉对此亦表示“不解”，指其“殆全为上海近日之风潮所激动耳。余甚不以上海助长学生之焰者为然。余平日愿此间学生韧性朴学，别树一帜于政论风潮之外，以故高明偏宕之材，不能不以渐裁抑之。余费苦心半年矣，以为几达目的，而不意以外界之激动，一旦付之水泡。余今已槁灰其心，不愿复委身于教育。然余不惜牺牲余名，将著一书，专攻击若辈助长之议论。固不免若辈唾骂，然数十年后，必有思余言者。”就教育而言，校方规范教学秩序，为学务所必须。但杜亚泉“裁抑”“高明偏宕之材”的做法，在学生看来，与专制压迫并无二致。

听罢其言，蔡元培讲了一大段意味深长的话，全面阐述其对学潮起因、学生类型的分析以及区别对待的处理办法，不仅对理解浔溪公学及风起云涌的学界风潮大有帮助，而且可以了解蔡元培的社会政治主张。他首先分析了学潮兴起的社会原因：

子言此次冲突之原因，近之矣。虽然，犹未也。子不见学校冲突之事，近者惟吾国及俄国屡见之乎？吾国学校之未完备姑不论，彼俄国者，学校之编制，教育家之所讲授，何遽不若彼共和立宪诸国，而冲突乃如是。盖学问者，以实现理想于未来为目的者也。彼共和立宪诸国，学理之所阐，与夫政界之所涉，盖无不密合者。学生者，过渡之时代也，预备之时代也。学成以后，因当有自由之幸福，亦何惜牺牲现在以要求之？谓之曰学生不得自由，彼且谓吾此时固不愿自由也。专制之国，则其学理之所阐，与夫政界之所涉，乃无一不反对。彼自信将来必无实现理想之一日。凡人情于必不可得之事，则其求之也愈迫，而其攫之也因亦不暇于熟虑。况在我国外交之疲茶，社会之腐败，已有朝不保暮之势，彼自以待学之成，则已国墟而人奴矣。彼其如燃眉之急，如灭顶之厄，固何暇问火政漫人之如何也。彼又多时过而学，则自以已负国民之义务。彼又日染于译书之理论，日激于新闻之记载，则愤叱狂呿，血涌技痒，不知其所由。彼当外界冲因极强烈之时，则一触即发，一纵即逝，虽牺牲身命，牺牲社会，牺牲全

世界之美利，以供其一快，亦所不择，况区区之普通学若师生关爱之感情哉。

蔡元培进而对学生的状况概括分析道：

虽然，吾非欲以此一派概学生社会者。吾尝分学生为三派，第一派前所举者是矣。第二派则其人稳练而坚忍，以为世界强权，必当在学问家之手，我辈惟当以学问为目的。诚知吾学之成，不保不在国墟人奴之后，然吾之不学，则决非可以救此墟焉奴焉者。是故我孜孜为学而已。外界之冲因，苟非于我目的之学问有直接大关系者，或应之而反〔于〕我所目的之学问有障碍者，我皆慎避之而不为所动。至第三派则无目的无意志，盲从而动，盲从而静，凡各学校倂出倂入者皆是也，可以无论。吾故即前之两派，以甲乙别之，而论究其效用及性质及陶铸之所。吾尝譬之于铁道营业，其所最要者在轨道汽车之材料固也。虽然，车轨所经，或阻以巨岩，则不可不先求爆裂之药轰去之。制造爆裂之药，决非可假诸轨材车材之工若器者也。使其为之，则微特其药不成，且将并其所以为轨焉车焉者，而悉受其累。故其事不可以不分职。吾前所谓乙派者，犹造轨造车之材料也，其性质喜专一，喜研求，喜守规则，喜循课程，得寸得尺，日知而月无亡。若此者，于兹之公学为最宜。不观外国之苦学界乎？其充苦工也，受屈辱夺时间，其与吾国学校之所谓压制凌侮者何如乎？而然且为之。故其人不难于位置。

至于甲派之学生，则爆裂之材料也。其性质喜理论恶实验。喜涉猎恶记诵，喜顿悟恶训致，喜自检束，不喜受人检束，喜自鞭辟，不喜受人鞭辟。此其人宜自集其同志为一学社，延其所心服若吉田松荫、西乡南洲之流而师之，不拘拘于学科之常例，而要以淬厉其志气，增长其识见为主义，则他日必当为我国革新之先导者。吾窃怪此派之学生不审量于选择学校之始，乃于既入以后，愤愤于学校之不适我意，欲撙取其学校之权力而把持之。顾不知官立学校与政府一致，既不能倾政府，何以倾学校之政府？至于私立学校，其出资费者既不能如孟尝、信陵之流倾家财养死士，为义声之首唱，而仅仅出其岁入若干分之一，以立一普通学

校，其意固可知矣。学生非社会党员，恶能占据其所有权而处置之，此其希望之必不能达者也。而各学校之收录学生也，亦往往不问其程度。其中有甲派者若干人，则日日以其政治思想、权利思想，欲小试之于学校之中。其人必工文词，长舌辩，能鼓动非甲派之学生以盲从之。而政界之影响，即非甲派之学生亦受之，而不能不微动者也，以故恒不免为所鼓动。此各处学校冲突之大原因也，吾得断之以学校与学生程度不合。吾尝于日本留学界之冲突持此议，于南洋公学之冲突持此议，今及此而三矣。^[32]

蔡元培的分析，以南洋公学风潮的前车为鉴，紧扣学界动向的脉搏。庚子以后，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因为勤王运动失利的刺激，试图跨越保皇樊篱，发出一片“言革”呼声，以至保皇会中并不情愿“革命”的徐勤也不得不附和，并且告诉康有为：“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33]青年学生目睹中国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朝不保夕，而所受学理与社会现实又彼此冲突，理想难以实现，加上海外流亡者和留学生乃至国内的新知识人大量译书办报，鼓动变革，将激进情绪广泛传播，国内学界也出现了政治情绪普遍激进化的趋势。《教育界之风潮》所收录的南洋公学学生演讲记录，“革命”、“共和”、“破坏”、“自由”、“流血”等等，已成口头禅，几乎人人都有天下己任、时不我待的豪情壮志。浔溪公学学生同样受到外界和舆论的感染刺激，黄远庸其时便读福泽谕吉论集，对所论为人当独立自主之说颇有感悟，“因译写其训条十余于壁”。其大病将死之际，竟能以劝人“尽其国民天职之机会”而得消除病苦。

青年学生的反清革命倾向，很大程度上带有青春期逆反心理和躁动性格的情绪化，而两种因素进一步加强了情绪化的色彩。其一，学生以小群体形式聚居一处，相互影响，其角色内化的偶像并非造轨造车材料的乙派，而是有嘉言懿行的甲派，功课好远不如自立自强受人尊崇。黄远庸所佩服的两位同学，便是能够独立自主和沉毅刚强之人。黄远庸本人也是“文笔颇佳，尤工辩论，其科学程度则未得为第一流”，却成为群体领袖。其二，社会舆论对学界风潮的赞誉鼓吹。上海的政论风潮对于助长学生习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黄远庸后来承认：“此时学生，正讲革命自由民权种种，余辈羡慕南洋公学学生

闹学之风潮，为报纸所赞叹，即为电贺之。”^[34]该校第一次风潮，虽然被视为学界革命之举，但先则“施种种野蛮之手段，而后无佳闻矣”^[35]，为舆论所诟病，这也促使学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冲突很难以妥协的方式得到解决。

四 调停失败

针对浔溪公学学潮的起因，蔡元培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是：

日本留学界之事，中国教育会拟函劝留学者回国，而于上海设一学校以待之。论者或曰：留学者必不尽归，吾之学校亦决不足以厌其意。吾曰：是不然。吾之学校，于形式上不特不及外国之学校而已，即以吾国各学校科较而量之，亦未有以远胜。虽然，吾之精神教育则可以当仁而不让。且吾所欲待者，甲派之学生而已。彼其非甲派者，吾且避之不遑，吾何希冀为？及南洋公学之冲突也，退学二百人，公议有共和学社之设，是真甲派学生之善于自处者。^[36]其时回学者亦已数十人，学生社会中痛恨而惋叹焉。吾晓之曰：“彼等佹出佹入、无目的无意志之辈，留之于社会，是腐败吾社会之微生物也，吾愿其速去。”今浔溪公学之冲突尚未决裂，吾意当于决裂之先，沟画而刃剗之，引去其甲派者，留其非甲派者。于是公学之规则可以不破坏，学生之志气可以不夭阏，是诚离之而两美者。吾意学校冲突之风潮既起，学生社会之公德渐明，手段渐高，其后冲突之事，将不可胜纪。各处腐败之学校，将鉴于此而有所改良。然决非可厌甲派学生之希望者。惟吾此论可为各学校普通之调停法，将于浔溪公学一试之。即使以吾此论而公学学生无一留者，则解散全学之罪在吾一人，而于总教、总理、总董之名誉固无损焉。

对于蔡元培的建议，杜亚泉表示认可。翌日，蔡元培以告总理，后者亦表示同意。蔡元培是日决计返回上海，而庞青城尚未起身，问

总理道：“子知总董之以吾言为然乎？”答称：“必以为然。”于是蔡元培至演说厅，集学生而告之如告杜亚泉之言，详言杜与诸分教交涉之事，以示其可谅。并招司事与学生对质，杜亚泉并无自支分教脩金之事，以示学生所以诋总教习者，“皆假借之词柄，非本意。即使学生有所误会，亦其助因，非主因，而主因则在外界之冲动力”。蔡元培于是申告学生：“诸君以吾言为然者，请自审甲派与非甲派。甲派者可决去，此公学决非可达甲派诸君之希望者，宜别自为计；非甲派可决留。吾观吾国各官私学校，殆未有如此公学之善者。”学生代表人黄为基避席而言曰：“诋总教恣私意，为某一人误会，某一人任其过，与诸同学无弊。惟蔡某之言，诸同学既悉闻矣，请诸同学决去留，愿去者举手。”蔡元培道：“举手不易明了，此事人人有自主权，非以多数决者，不如各签名注去留。”于是签名注去者二十九人，注留者六人。蔡元培复重申：“诸君之去者留者，皆吾国所必不可少之材料也，吾皆所敬佩。去者必当有自达其希望之建设，无俛出俛入，贻同学羞；留者当潜心于所目的之学问，无再多事夺目力。”众人齐声应道：“善！”^[37]

关于这一情节，学生方面的记载大体相同，但掺入主观意见：“蔡公徘徊审慎，遂布告学生曰：‘学生之情事，吾知之，总董、总教之意见，吾知之。然吾知汝等此举，非故与总教为难，实为外界风潮所刺激使然也。事已如斯，不得不为汝等决之。学堂，庞氏之私校也，教习，总董所延请也，学生，总董所招集也，故诸事当听其命令。吾观总董之意，是教习而非学生，决不听学生自由。若不愿受其压制，欲自由者可去；若愿受其指挥，而以学问为重者可留。去者择自由学校入之，留者须听总教总董之节制，无稍违。何去何从，诸生其自决之。’当时学生半假归，在堂仅三十五人，除六人为父兄所抑制不得自主外，无不欲去者。皆相庆相贺，谓自今以后，脱离专制学校，与南洋公学退学生不妨方轨齐驱矣。”^[38]

其时庞青城适至校，见学生群集于演说堂，问办事者以何为。答称：“蔡登堂而演说也。”又问：“学生奚若？”答曰：“去之者占多也。”^[39]庞以为如此则公学失体面，欲留之，亦发表演说道：

“蔡公言与吾意相违。诸生其稍留，毋急行。”学生认为总董既不直我等，又欲强事挽留，姑留一宵，以俟后命。^[40]蔡元培告诉庞青城：“子欲留之，则慎无回护吾。言当日蔡某之言，我不以为然，诸生无为所动，我今自表明我意。”又告诉学生：“吾之言全用自然淘汰之例，毫不含勉强迫激动意。吾调停之职已完，诸君与总董自有交

涉，慎无以注去字于吾前为意，恐为吾讥笑，吾决不尔。”遂结束调停，返回上海。^[41]庞青城续请张弁群出为调停。后者亦为南浔大户，曾游历东西洋，于浔溪镇举办一小学堂、一阅报社。是夜约总教杜亚泉及学生至其家，对杜亚泉说：“请勿辞。”又对学生说：“请勿去。学堂之事，自今更始改良之何如？”杜亚泉离座道：“我即留。然以后辞聘教习若一切事，请惟总董命是听。”^[42]“学生皆曰：‘生等既表去志而负之，是自欺以欺蔡公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纵有九牛，不能挽生等之行也！’翌晨，相率至宜园摄影，各治装返。而浔溪公学几等诸黄叶空山，罕有人迹矣。”^[43]

五 影响深远

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以学生散学而告结束，带给相关各方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就公学而言，其主办者和管理者均为社会趋新开明人士，可是公学有名于时，却以其在学界风潮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该校既是首次近代学堂退学风潮的发源地，又率先起而响应影响广泛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南洋公学退学生所编《教育界之风潮》和《选报》的南洋公学学潮专号分别刊登《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等文章，正是将浔溪公学第二次退学风潮视为南洋公学风潮影响的结果。自此，学界风潮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对既定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浔溪公学自身也成为反抗专制秩序的牺牲品。经过两次风潮的震荡，浔溪公学虽然没有像蔡元培所说“遂尔停办”^[44]，勉强维持，却再也无法平静下来。1903年10月，章炳麟致函柳亚庐称：“昨闻浔溪公学又以小衅分裂。自兹以往，私设诸校，益凌迟衰微矣。”^[45]在接二连三的风潮震动下，师生人心浮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很难维持，“后此校果以管理不得法而败”^[46]。1904年8月《警钟日报》特派员对南浔学界进行调查，于“浔溪公学”项下标明“今改述志医院”^[47]。

风潮之后，相关各人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浔溪公学总董庞青城逐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906年冬，杨毓麟创议收回《神州报》馆，向庞青城募资3千元，庞慨然应之。1907年，庞青城加入同盟

会，镇南关之役，接济军饷5千元，又出钱请律师为被捕同志辩护。次年秋，与排名“四象”次席的同乡张静江共设东益昌票号，欲为革命金融机关，并捐万金倡办《民呼日报》。该报主笔于右任因披露当道劣迹被捕，庞以4千金延聘律师，救其出狱。1910年，东益昌为经理李燧生盗吞巨款14万，庞青城从此破家资之半，但次年仍以千金接济广州起义，以5千金接济武昌起义，又抵押家屋得3万金，助蓝天蔚北伐军军饷。1911年11月，他和章炳麟、伍廷芳、沈缙云、李平书、马君武等人响应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的建议，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促成临时政府的建立。^[48]1912年，又和戴季陶等人组织中国同盟会本部于上海，担任评议员。^[49]辛亥革命中，这样毁家赴难的资本家的确罕见。难怪戴季陶称之为“人杰”，并特述其生平事迹，“以为新国史之资料”。^[50]

作为风潮冲击对象的杜亚泉，本属急进派。任教绍兴中西学堂时，除治数理化外，“亦喜研究哲理，对于革新政治、改良社会诸问题，常主急进”^[51]，因而与旧派常有冲突。不过他很快便放弃了激进的倾向。蔡元培说：“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唯物与惟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52]

关于杜亚泉转向的原因，蔡元培有所推测。1901年1月，杜亚泉来函谈及上海国会答张之洞书，蔡元培认为：“南皮书迂鄙无理，答书则义正辞严，非遽学人不办。而秋帆乃谓南皮书甚合我意，惟太棘手。又谓答书多牵强，足以见党人穷苦失败之状”，觉得杜氏的态度“殊不可解”。杜亚泉又说：“上海通和文者，往往自谓通教育、哲学两科，凡理化动植无不当行，辄挟所知以难人，诚无法待之。”蔡元培据此揣测其：“盖指叶浩吾一流人。秋帆专心西艺，于哲学家言不甚寻绎，或偶为此流所傲，故恶之耳，其薄国会党人，亦此意也。”^[53]

1900年11月，杜亚泉在《亚泉杂志·序》中批评甲午以来国论重政治轻“艺术”的偏向，认为“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以成之”。“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是，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

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54]1902年2月，他在浔溪公学开学式上发表演说，一方面主张：“吾辈今日正宜摧陷廓清，尽去已败之文明，而后可以输新进之文明。”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新者，无非为腐者之改良，所谓腐者，又未始不可为新者之材料也。”“化腐朽为神奇，正今日以后可图之功业。”^[55]

为了让浔溪公学学生“韧性朴学，别树一帜于政论风潮之外”，杜亚泉对于那些“高明偏宕之材，不能不以渐裁抑之”。然而，内忧外患的局势和学界不断激进的普遍趋向，令他的苦心经营显得不合时宜，难以收效，在外界激动之下，“一旦付之水泡”。此后他虽然并未撒手教育，也没有不惜牺牲名誉，著书专攻击若辈助长学生气焰之议论的举动，但在商务印书馆尤其是主编《东方杂志》时期，坚持折衷调和，不肯偏于一端，的确实践了诺言。所谓“固不免若辈唾骂，然数十年后，必有思余言者”，不仅成为事实，甚至在黄远庸身上也得到印证。

鼓动风潮、不肯妥协的学生代表黄远庸看似达到目的，但他从事件中获得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遗憾终身的教训。蔡元培说：“学生黄君远庸，为学潮主动者，其后得志游历欧美，有书致其友，谓曩时年少气盛，不受师训，杜师之言，皆内含至理，切中事情，当时负之，不胜追悔云。”^[56]黄远庸致友书今不见，1915年11月10日，他在由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表《忏悔录》，对于当年鼓动浔溪公学退学风潮深感懊悔：“以小故与学校寻闹，全体罢学，以余为代表，迄今思之，余实此一大罪恶主动之人。罢学后，同学或赴海上而嬉，或即赴南洋公学投考。此时公学完全官办，余即投考之一人。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这也可以说是对杜亚泉本人的公开道歉。

黄远庸的忏悔不仅止于其亲历的学潮，他对辛亥时期的学界风潮整体乃至学潮对革命的影响也作出深刻的反省：

此时学生风气，以罢学为一大功名，自南洋公学发起后，穷乡僻壤，皆受影响，几举全国之学校而破坏之，蔓延及于海外，日本留学生之罢学者，年必数起，最后以留学生取缔风潮为归

宿。余自南浔罢学后，深以为大戒，故在东京，即以不肯服从取缔风潮，几被殴辱……由今思之，革命者亦即罢学风潮之放大影片而已，综自革命后种种政界现象，凡系革命派所主持者，无一不与取缔风潮相似。革命之后，不从政治轨道为和平进行，乃一切以罢学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于一败涂地，而受此后种种恶果。余后此既悔其罢学，今日党人，当亦自悔其革命。然余自悔其罢学之后，过恶丛集，盖以余太无学力，只有感情而无理性，故非极端走入激狂，即极端走入腐败，稳健和平，以谋建设作人之基础，乃非吾所能也。吾国民无此建设性，则国家已矣，吾个人无此建设性，则吾个人已矣。[\[57\]](#)

时间才过了一轮，杜亚泉当年欲言又止的话，就被黄远庸毫无掩饰地和盘托出。清季黄远庸成为立宪派的要角，辛亥时又参与杨度、汪精卫等人的国事共济会，算是反省之后的身体力行。

调解人蔡元培一生与教育有缘，与学界风潮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他虽然对于激发学界风潮的社会原因有清醒的认识，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分别学生性质，设不同学校以造就不同材料的具体解决办法，但在社会危机迫在眉睫、矛盾冲突日益加剧的氛围中，青年学生和教育家的理性很难协调一致。专为甲派学生而设的爱国学社，很快也与中国教育会发生冲突，导致解体，两全设想全然不能奏效。此后，如何对待学潮，一直是困扰蔡元培的两难命题，包括他在五四运动期间的相关言行，都并非一味支持学生的举动。他承认学生运动有唤醒国民的作用，但只是“一时之唤醒”，若要“永久之唤醒”，“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58\]](#)。学生从事政治运动，为社会作出牺牲，既有功效，又有损失，相比之下，“实在是损失的分量超过功效”。要想根本解决中国的大问题，必须“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用余暇服务社会，指导平民，以备将来。[\[59\]](#)

蔡元培体谅学生的躁动情绪，源于社会空气的恶劣，学生欲以改革学校为改革社会政治的起点，并在1922年10月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平息后返回北大的演说中特别提到：“我还记得二十年前革命主义宣传最盛的时候，学生都怀着革命的思想，跃跃欲试，就在学校里面试验起来。说是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譬如一国的国民；教职员是学生的公仆，譬如国家的政府；国民可以革政府的命，学生就可以革

教职员的命。那时候长江一带，这种试验革命的学校，不知多少。它的导火线都很简单，大半为记分不公平或饭菜不好等小问题，反对一个教员或一个庶务员，后来迁怒于全体教职员，闹到散学。”所指显然包括浔溪公学的风潮。只是蔡元培已经不赞成用学校来比国家，希望学生自制，做社会的模范。^[60]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附和赞同当年杜亚泉的主张。

教育管理，本有权威与自治两种形式，孰是孰非，或各有利弊，还存在争议。分别情形，因地制宜，才能优势互补，变消极为积极。而学校与社会有别，适宜于社会者，未必适用于学校。因学生尚在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但学校与社会如果实行两套趋向相悖的制度，难免造成紧张与冲突。大变动时代，社会流行思潮与既有制度精神常相反对，所以革命时期，学潮往往是社会动员的开端，而且从大背景看，有不得不然的潜因。但以改革学校为改革社会政治的起点，牺牲的往往却是教育和学生自己。具体追究学潮的起因，不一定具有明确的“革命”性，有时甚至因为革新势力的先锋与本体尚未协调，或者本身利益不一致，因而出现激进与稳健倾向相互矛盾的冲突。只是学界革命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氛围，令诸如浔溪公学之类的自发风潮产生冲击震荡既有统治秩序的作用。面对学潮这柄双刃剑，如何利用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积极意义，并抑制其包含的盲动因素对“革命”带来负面影响，使革命循着近代的轨道走上建设之路，让情绪的宣泄得到理性的结果，而不致重复旧日造反的一味破坏，政治和教育的领导者不免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两难取舍，研究者只有回到历史现场，体会前人的苦心孤诣，才能得出合情合理的判断。

^[1] 见《选报》第35期，教育言，第26—30页，1902年11月20日。是期为南洋公学学潮专号。本文注明录《苏报》来稿，未属作者。据文中“吾”自称“蔡某”，以及《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所载《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爱国青年著《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退学之影响及结果·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蔡元培撰《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等资料所描述的情况，作者应为蔡元培。

^[2] 天仇（戴季陶）：《庞青城事略》，《民权报》1912年5月8日。关于庞青城，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郑伟章《文献家通考》等书有传，于其生平事迹均语焉不详。

^[3] 林黎元：《南浔丝商“四象八牛”》，《湖洲文史资料》第5辑。

^[4] 《1901—1910年浙江所办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厂》，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资本额在该厂之上者，仅有宁波的和丰纱厂和杭州的扬华丝绸厂。关于庞青城与该厂史事，坊间误传甚多。

^[5]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 [6] 参见桑兵《论庚子中国议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7]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484—485页。
- [8] 吴县陶貽勋著：《论学生本分》，《万国公报》第168卷，第18页，1903年6月。
- [9]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教育言，第23页，1902年11月20日。
- [10]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 [11]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9—360页。
- [12] 谢俊美：《普通学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1—2页。
- [13]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484页。
- [14] 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69页。
- [15]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360页。
- [16]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此文各种蔡元培文集、年谱（长编）均未收录。从内容判断，是期《选报》的出版应晚于暑期。
- [17]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 [18]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 [19]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 [20] 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69页。
- [21] 《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 [22]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 [23]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 [24]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 [25]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 [26]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 [27]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此说的另一版本为：“翌日，适季考，总教某奖前十名者以铅笔等物，学生以积不平故，咸毁而掷于厕。总教某见之，责问受奖之十名云：‘汝等太欺慢我，知罪否？’十名者答曰：‘物既自先生而赐于我等，则成毁皆属于我等之权，窃未知罪。’”《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 [28]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 [29]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 [30]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
- [31] 《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32]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33] 1902年4月后《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关于这时国人政治激进化问题，将专文详论。

[34] 黄远庸：《忏悔录》，《远生遗著》卷一，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27—128页。

[35]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教育言，第23页，1902年11月20日。

[36] 据宗仰山人（黄宗仰）《爱国学社开学志》（《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蔡元培在爱国学社开学之日曾代表中国教育会致祝辞，可见其对于培养甲派学生的期望：“近今吾国学校日月增设，其所授科学诚非可一笔抹杀者。然其精神上之腐败之卑猥决不能为之讳。此如人之有官体而无神经，则土偶傀儡之类耳。吾辈今既以制造神经为主义，则有三希望焉：一曰纯粹其质点，则沉浸学理以成国民之资格是也；二曰完全其构造，则实践自治以练督制社会之手段是也；三曰发达其能力。则吾学社不惟以为雏形，而以为萌芽，以一夫不获之责，尽万物皆备之量，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呜呼！吾学社果能达此希望乎，则微特学社之光荣，微特吾教育会之关系，吾中国之前途，实大被其影响焉。”

[37]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38]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记为：“次晨，蔡登演说堂，申言主决绝主义者请举手。时学生凡三十五人，除六人为父兄抑制不得自主外，无不举手者。蔡乃更出名簿，令各签去留字以为准则，签去字者仍如前。”

[39] 《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40]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

[41]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42] 《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43]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退学生29人：“黄为基 黄金铸 庄庆鹏 顾思忠 吴锡葆 陶冕 郭国平 蒋武森 华承绚 张嘉麟 曾荫 计宗型 王绍良 杨光耀 高恭安 郑侠传 张维鳌 张文慰 宗麟 祝见百 钱□□ 秦邦荣 彭周鼎 郑庚鑫 萧则林 张文耀 王海槎 □□□”。

[44] 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69页。

[45]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9页。

[46]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485页。

[47] 本社特派员调查：《南浔学界》，《警钟日报》1904年8月21日。

[48] 《中华民国联合会开会通告》，《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

[49] 《上海同盟会大会》，《民立报》1912年5月5日。

[50] 天仇（戴季陶）：《庞青城事略》，《民权报》1912年5月8日。

[51] 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87页。

[52]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361页。

[53] 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54] 《亚泉杂志》第1期，1900年11月29日。

[55] 引自高力克：《杜亚泉学术年谱简编》、谢俊美：《杜亚泉与〈普通学报〉》，均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6、249页。

[56] 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69页。

[57] 黄远庸：《忏悔录》，《远生遗著》卷一，第128—129页。

[58]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3页。

[59] 《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85页。

[60] 《北大十月二十五日大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275页。

天地人生大舞台

——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

清季戏剧与社会均面临改革，而戏剧和社会改革同样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正所谓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尤其是好新戏者，不仅一身二任，以革新戏剧为革新社会的重要手段，而且视革新戏剧与革新社会为同一事业，舞台上下的一幕幕大戏，相互呼应。优伶结交三教九流，与政治舞台上的波谲云诡从来渊源甚深，清季民初的名伶田际云即其显例。此公一面登台亮相，与文人票友从事戏剧革新，一面广泛交游，凭借出入内廷宫禁之便，相继与维新革命活动发生程度不同的联系。而戏里戏外，情景交融，真假虚实，浑然一体。田际云革新戏剧，与文明戏（即话剧）南北两派的代表关系颇深，其与北派王钟声的交往期人着墨较多，而与南派任天知的关系，同样精彩。三人在舞台上下的言行如出一辙，浓缩了清季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相。

晚清民国时期，京剧风行一时，其时髦程度，较之今日的流行歌曲有过之无不及，而名伶的地位影响，甚至还在偶像歌手之上。即以艺术形式的更新为例，京剧与文明戏（即话剧）的渊源极深，与电影也关系匪浅。而京剧的盛行，有文人为之改剧本编舞美表演，有银行家等富商提供财政支持，有上至名公巨卿、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的追捧结交，背后还有帮会势力撑场面站台子，出将入相的戏台上下，形成一道纽带，联系三教九流，展示尘世众生相，演出一幕幕人生大戏。以名伶为轴心，可以勾勒社会各方面变化发展的脉络，尤其是理解风云诡谲的大动荡时代，头绪纷繁，变化万千，借此能够理清线索，提纲挈领。1920年代包天笑作《留芳记》，即以梅兰芳为轴。该书旨趣“目的并不在梅兰芳，只不过借他以贯串近代的史实而已”。虽然说是“因思历史小说者，不同于历史也，也不同于传记也，最好与政治军事无关的人，用以贯串之，始见轻松俊逸”^[1]，无意间却显示优伶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变迁，从来关系匪浅。

更有一些伶人，凭借交游广泛及身份特殊之便，又受革新思潮影响，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甚至支持各种秘密活动。田际云即为要角之一。关于此公，京剧史多有提及，并有文学性传记^[2]，文史界的研究论文则甚少。^[3]优伶与内廷的史料史实，坊间传闻众多，却难以征实。尤其涉及密谋隐事，更加不易考察。可是此类传闻，不仅能补正史所遗漏，察社会之心理，甚至能求事实之本相，将当事各方千方百计曲笔隐晦的旧事折射出来，能够借以考察鲜活历史的各个层面。

一 千丝万缕保皇会

田际云（1865—1925），直隶高阳人，名瑞麟。12岁入涿县双顺科班习梆子花旦兼小生，在京津一带声名渐起，15岁被礼聘到上海金桂园挂牌，红极一时。沪人称之为想九霄，“意谓其颜色之美，虽九天仙侣，当亦不无遐想也。”^[4]1885年回到北京，继侯俊山（十三旦）为瑞胜和班台柱，“至则结束登场，发吭引声，一座尽惊叹。于是贵人达官，下至贩夫驺卒，无不啧啧‘想九霄’者。或偶觐一面，接一语，则视轩冕圭组之荣不啻过之。一时声誉所流，遂远胜沪渎十倍。”^[5]1886年恽毓鼎看过财盛馆的接场戏后，在日记中记到：“有想九霄者名噪都下，举国为之若狂。观其演戏两出，名花笑日，翠柳摇风，正如姑射仙人桃霞而出，情移目夺者久之。”不过，几天后筵席中“客有招想九霄者，颇觉减色，不似彩氍毹上碧衫红袖，使人意消也。”^[6]可见男旦色艺再好，只宜于远观，近看则扮相有所不及。

1887年，田际云回到上海，1891年重返北京，组织大玉成班，网罗京剧名角，开二簧、梆子合演之例，后来又担任精忠庙庙首和内廷供奉。^[7]京津沪三地社会文化千差万别，不仅影响到戏剧发展变化的形式与内容，而且左右优伶与社会联系的取向层面。由于田际云好趋新，广交游，又接近宫闱，戊戌辛亥间，发动参与了不少梨园和社会革新事业，也引起一些流言蜚语，令人疑信参半。有学人认为最为田际云思想趋新明证的两件事，一是戊戌同情维新派，协助光绪，二是辛亥邀请王钟声等人来京演出新剧，被清廷逮捕下狱。^[8]而正是关于这两件事情的记载存在诸多歧异，使得人们对于田际云的人品产生怀疑。

梅兰芳转述曾与田际云同在清宫当差的田的徒弟李玉桂所说：

戊戌政变时，田老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往来甚密，并从戏箱里夹带大批时事新书运进宫去，供光绪帝阅读；又暗中带进去一批洋式军服，光绪帝曾经试穿着军服练习仪式，准备以后在阅兵大典时穿戴。这批军服是田老师排演新戏《征南蛮》时特地到上海定制的。

为此，政变后清廷传旨逮捕田际云，田被迫逃亡上海。^[9]

穆辰公《田际云》条则称：

际云以内廷供奉与群阉稔，得悉德宗与太后相左诸情。德宗好读新书，顾无由而致，际云常为购之于市，于传差日密付德宗近侍，乘间进之。太后于德宗防嫌綦严，不听私召大臣，独不禁优，谓优无识也。以故德宗以际云得读天下新书，虽康梁固已知际云非常人矣，假其力颇通消息。

此事王芷章《清代伶官传》“相九箫”称，曾“询诸旧伶官之前，悉皆一笑置之”，以为“似未足信其为有征也”。^[10]这一传闻包含新书和洋服两件事，关于前者，光绪帝另有进书渠道，未必需要通过外伶暗中带书；关于后者，《国闻报》曾有报道：

（政变发生）都中士大夫欣欣然有喜色，相告曰：今而后吾侪得长保辫子以没世矣，彼仄襟窄袖者，终不足以乱吾章服也。居无何，宫中搜获西人冠服十余袭，问之宫监，则曰此优孟衣冠，想九霄箱笼中物也。于是都下大索想九霄，数日不获。先是天津某梨园以兼金致想九霄至津，登场一曲，千夫靡靡，自某夕

演错中错后，此曲遂成广陵散。或曰已抱器出奔，或曰已偕少师杨击磬襄入于海，今而后欲求田者，真非想非想寄迹于九霄云外矣。其徒语人曰：近时曲中有新本，有所谓铁公鸡、左公平西诸剧，就中脚色多有演为西人装束者，此田师傅箱笼中西人冠服所由来也。今一时朝论以此为皇帝易服色之据，毋乃想入非非乎？言毕一笑而去。[\[11\]](#)

不过，并不能因此就断然否认田际云交通内廷协助光绪的可能。清代“内廷演剧，向有升平署承直。咸丰后，始常传外伶。太后幸园驻苑时，传召尤频，荣其称曰‘内廷供奉’”。由于“内监外伶，每多齟齬”，那桐等为戏提调之人，还常常“周旋两者之间”，为之调停。[\[12\]](#)可见，清季作为内廷供奉的外伶，已经成为能够在大内宫禁之中与内监分庭抗礼的重要势力。有鉴于此，各种怀有政治目的的人士，都注意发展与内监外伶的关系，以便借此查探宫禁之中的形势，传达信息，沟通内外，连结上下。戊戌以后，康有为和保皇会即长期与太监冯仲平、金蔚九、姚焕卿、王汉章等人沟通联系，探听光绪帝的情况，试图实行暗杀。

对于这些事实，康梁和保皇会员后来绝口不提，当时知情者亦极少，一般文献，罕有提及。而田际云的确参与了防护光绪帝的行动。据王照口述，光绪三十三年初夏，西太后的心腹太监崔玉贵等人欲图不利于光绪，派太监孙敬福怀利刃到光绪宫中侍寝。时瑾妃宫首领赵姓太监，家住沙滩，暮夜介田际云访王照于南池子，王照立即偕二人往寻凤林，相与夜见肃亲王，密议于东花园三层小楼上。后由肃亲王善耆以民政部尚书名义命工巡局处理孙敬福家与邻人涉讼之事，将其收服。而肃亲王善耆也是康有为戊戌后一直沟通联系，设法由其暗护光绪，鼓动复行新政的要角。[\[13\]](#)光绪死后，王照还从田际云处了解到，“前二日尚见皇上步游水滨”，而疑光绪之死别有隐情。[\[14\]](#)

田际云与彭翼仲的交往，也间接可以反映其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1906年，化名吴道明，在北京密谋两年企图行刺西太后的保皇会骨干要员梁铁君，遭人告发被捕，随即被害于狱中。其事牵连袁世凯，当道严密封锁消息，只有彭翼仲的《中华报》探知详情，发表了详尽报道。[\[15\]](#)《中华报》固然有不畏强权的胆识，而由一定的管道很快了解到机密实情，也让彭翼仲有了敢于披露的底气。他后来称：

保皇党被捕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已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16]。

《彭翼仲五十年历史》写于1913年，其时一方面袁世凯当道，另一方面康有为失势，提及相关事实，不免顾忌甚多，有难言之隐，每每闪烁其词。这条独家新闻即使真由访员从天津来稿，何以能够探知，也未作交代。校注者注意到这一问题，猜测彭氏最初极可能是从梁济口中知悉此案，因为梁济与范履祥既为同乡，又有亲戚关系。

^[17]范履祥，真名范羲谋，字朗秋，广西人（一说广东人），捐州判，曾任北京工巡西局委员，后任西区四分区区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梁铁君与海外保皇会联络，梁铁君被捕前一周，事发被禁。

^[18]而彭翼仲与梁济少年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后来又做了儿女亲家。^[19]这条线的确可能是彭翼仲得悉秘密并且甘愿冒险的重要来源。

不过，范履祥是否将事关身家性命的机密告诉梁济，以及梁济如何转告彭翼仲，都缺乏相应的证据。而从戊戌以来一直与光绪帝的安危有着某种联系的田际云再度进入视野。田与彭翼仲的关系相当密切，案发之前，在创办济良所、革新戏剧、编演新戏等社会活动中，两人互相支持配合，私交亦好，可以到彼此家中吃饭。彭翼仲被发配新疆，田际云和李毓臣、乔荇臣等赠金四百。^[20]梁铁君在北京时，于颐和园外开设照相馆做掩护，据当时负责此案的外城警厅厅丞朱启铃说：“（光绪）帝好拆视钟表，亦好摄影技术，吴道明结连宫监，献媚妃嫔，携苛达克出入禁园，随意取影，无形之中，获与瀛台囚人耳鬓厮磨，投其所好，借口冲晒相片，迹近奸随。”^[21]梁铁君虽然投光绪帝所好，要想任意出入宫禁，绝非易事，至少不如田际云以内廷供奉名义来得堂而皇之。以田际云参与机密的程度看，他很有可能是知情者。尽管同样缺乏直接证据，但是始终出现于所有证据链条的各个重要环节上，以考据如老吏断狱之心看，其嫌疑至少不能排除。况且，诸如此类的密谋，并非所有的相关资料都能够保存，甚至根本不留文字记录。

二 不知不觉革命党

辛亥田际云被清政府逮捕判刑囚禁，被视为其趋新的又一表征。可是关于此事，当时的记载和事后的判断，歧义甚多，莫衷一是。夏晓虹据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和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之历史》称：“宣统三年（1911年），田际云又因邀请王钟声、刘艺舟等新剧团来京演出，被清廷以‘暗通革命党，编演新剧，辱骂官僚’等罪名，下狱百日。”^[22]穆辰公则说：田际云“生平最恨私寓，谓是伶界羞，常蓄志革之。清宣统三年方拟呈请禁止，呈未上，适为私寓中之有力者所闻，乃贿某御史上奏，伶人田际云即想九霄，沟通革党，时编新剧，辱骂官府，宜科以应得之罪。三月十九日被捕，送交地方审判厅。然无实据，系狱百日始出”^[23]。征诸史实，两说均不确。

田际云邀王钟声来京演出新戏，是在宣统元年即1909年，由田际云联系组织，许多京师的京剧名角参与共同演出，地点在田际云主持的天庆园，上演剧目有《爱国血》、《孽海花》、《青梅》、《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等。此后，王钟声等人一直在北方京津一带演出，直到辛亥六月，因为社会上怀疑他是革命党，清政府才以其在所住全浙会馆与人聚赌打架为口实，拘传到案，并递解回原籍浙江。此前与田际云等人从事的上演新戏活动，虽然为当局所不满，并未采取镇压行动。刘艺舟于宣统二年即1910年到京演新戏，辛亥年则和他人组织剧团到大连、安东、辽阳、威海一带演出。田际云的被捕，显然与两人的演出活动并无直接关系，至少不是案发的原因。^[24]

私寓制度为清季伶界陋习，即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去演员家里设宴招待朋友。田际云早就主张废除，并且身体力行，拒绝这类应酬。据说田际云对所有诸如此类的陋习均深恶痛绝。徐珂《清稗类钞》记：

想九霄即田际云，色艺兼优，风流籍甚，而屡为士大夫所辱骂。工部郎中龚才杰口角锋利，偶于会馆堂会中，见九霄至筵前请安，辄呼之为兔儿。九霄闻之，反身即去。是日九霄应唱之堂会戏，竟排而未唱。遣人往催，则语来人曰：“想九霄为供奉王

爷之人，非尔等穷措大之玩具。”会馆中人竟无如之何。未几，龚竟为御史所劾，去官。文云阁学士亦以其骄而恶之，尝詈之为忘八蛋，闻者谓此语可谓想九霄三字之的对。[\[25\]](#)

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1910年1月21日），北京梨园会庙首、各班先生、老板、头目开会，议准伶人若有应酬之事（指出席宴会、陪客饮酒事），即不许登台唱戏。与会有喜连成、鸣盛和等十二个戏班，多为梆子皮黄两下锅者。[\[26\]](#)有学人称其事为田际云首创。[\[27\]](#)如此，则废私寓也不会成为一年后田际云被拘禁的导火索。

田际云案是当时轰动京师乃至沪上的一大要案，《大公报》评论道：

田际云一案逮捕之人种类甚杂，官也有，奴也有，优伶也有，太监也有，教习也有，混混也有，铺掌也有，医生也有，匪党也有，仆妇也有，僧道也有，合上中下社会之龌龊人物，应有尽有，以造成此离奇光怪之大狱。若将全案人物合摄一影，可题其额曰：缩本京师社会全图。[\[28\]](#)

关于此案，高压之下的京师报馆噤若寒蝉[\[29\]](#)，上海各大报章则多以相当大的篇幅进行连续报道。因为案情复杂，各种消息来源不一，内容各异，使得报道的情况前后出入较大。加上各报立场态度不一，角度看法受到影响，也会显出不同。

随着革命党人的各种暗杀起义活动日益加剧，清政府对传媒加紧控制，接连发生的报案令京津一带的报馆人人自危，涉及时政的报道更加慎之又慎，较早对田际云案进行报道的反而是上海的《民立报》。1911年4月19日，《民立报》刊发两条来自北京的专电：“十九日晚步军统领衙门会同民政部顺天府尹在外城天乐戏园拘拿七十余人，皆系重案，全城惊骇。”“传闻天乐园大捕获疑系革命党。”与之相关的专电还有：“直督得京电：革党潜入京城，须严防范，令每日于舟车加派暗探，侦察来往，勿轻怠。”“各部因闻孚琦死，恐

慌，有人函民部，凡一、二品大员有重要差缺，皆宜派警队拥护。”据后来的相关报道，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为捕拿此案人犯共出动军警兵丁五百余人，仅包围天乐园的就多达百余人，如临大敌。当时田际云正与同业人士筹议举办伶人学堂事宜，同时被捕者还有音乐学堂教习朱旭东，爱国白话报总理丁宝臣、京都白话报总理萧益三、京剧名票乔荇臣等也被牵连。

次日，《民立报》再刊发前日北京相关来电数条，其中重要的有：“天乐园案已拿到五十余人，探闻日前摄王府后池起出炸弹火药，与此案有绝大关系。”“又闻此次巨案系军机片交民政部、步军衙门、顺天府尹会拿，探系前一日（十八日）优人田际云等在东珠市口开会演说募捐设学，并提议改良戏剧，时谭鑫培（小叫天）亦在座，言上海唱明末遗恨，颇有爱国思想，京师速立社仿编，勿专唱愚忠愚孝旧戏。继以陈君演说，辞甚激烈。适有某亲贵旁听，奔告庆邸，谓为昌言排满，并牵涉摄邸抛弹案，当即将是日临时干事七十余人开单交拿。”

关于来电所说演说会，4月21日《民立报》以“师善伶人”为题予以专门报道：“谭君鑫培、田君际云发起创设伶界师善学堂，宗旨在改良伶业，共谋进步，遍发通告书，定十八日午时邀集各伶人在东珠市口内精忠庙会议一切，函请政学界热心志士蒞会演说，并请报界参观。噫！梨园子弟，果知向学，将来智识开通，必能将国家与个人之关系，编成剧本，唤醒同胞，不空演愚忠愚孝故事，使一般社会，不知不觉铲除其奴隶根性，则教育之功伟矣。”

同日《民立报》继续关注田际云案，但北京来电的口径悄然发生变化。前一天北京“警厅秘密审讯天乐园要犯约三小时，力辨革命嫌疑，供出某内监挟嫌诬陷，牵连某亲贵。警厅以案情重大，请民部堂移交大理院审讯”。此后，关于此案传闻纷纷，发案原因也越说越复杂。4月24日《民立报》的报道《北京舞台之巨案》，还能将被捕各人分别对待，如鲍荣等数人因承办香厂，有招摇情事；王范氏等人则因贻谷行贿之事；田际云案与党禁颇有关涉。而两天后的连续报道，田际云已经变成被捕匪党的“党魁”，上述各事也被捏合到一起：“此案之原起，乃瑞侍御贤所奏参，有谓为承办香厂有招摇情事者，有谓贻谷行贿之事田为主动力者，有谓田为敢死党之中枢巢穴最有关涉者，其真相外人卒不可知。”^[30]

在传闻和报道中，几方面均牵连田际云。而这些罪名，都别有隐情。所谓承办香厂，“瑞贤参折原受意于某枢相，闻此折拟稿时，有极有力之宦官潜至瑞宅，出四百金为寿，请加入田际云。探因田际云前为北京城内创办公园，特在香厂地方购地一区，预为修筑公园地址。不意该宦官谋购此地甚切，正拟向地主价买，适落田后，因而恨田，故田及于难”^[31]。这位“极有力之宦官”，当为继李莲英之后独揽宫中大权的崔玉贵，所以有报道说：此案“其真正主动者，实为今日之李莲英”^[32]。所谓贻谷行贿，本来与田际云无关，而背后牵涉复杂，众说纷纭，大体情形是，光绪三十四年，绥远将军、垦办大臣贻谷因败坏边局被罢官问罪，论罪当死，其侄钟岳设法运动，通过关系（传闻田际云为中介之一）向法部尚书廷杰行贿。宣统正月，贻谷案结，诏改死罪为遣戍新疆（一说川边），而廷杰刚好病死，钟岳遂不愿兑现贿款，双方因而争讼，受贿一方又通过田际云等人请托活动。钟岳见势不妙，转求廷家出面，廷杰之子为那桐之婿，那桐只好请瑞贤设法，因此酿成大案。背后甚至牵扯到摄政王与肃亲王的矛盾。^[33]

后来报端一度刊载田际云被判永远监禁，案情只是与香厂有关，而与贻谷案无涉。^[34]至于革命党之类的指控，不是无中生有捏造的罪名，就是以讹传讹的坊间传闻。真实情形及其牵连王钟声的过程，《国风报》第2年第16号（1911年7月6日）《田际云案之结果》有详细报道：

自瑞侍御贤奏参田际云等十七人，奉旨拿问后，未几而翰林院编修顾瑗、陆军部司员叶崇渠、民政部六品警官黎宗岳，皆被遣，勒令回籍，都下汹汹，以为将成大狱。及六月中，新优王钟声又被逮于官，于是论者以为将借演唱新戏，罗织成罪。盖以田与王素相识，王以能唱新戏名，田曾请其唱新戏于天乐园，故推想及此也。现田、王两案，已于初三日由法部并案奏结，科罪甚轻，非特与外人推想为与贻谷案有关系者不符，即于演唱新戏，亦未著一语，真不可思议、虎头蛇尾之奇案也。

该案头绪纷繁，牵涉人员甚多，有关本题的判决结果为：

王钟声即王希普，依在家容留赌博徒一年，例减一等，处十等罚，应追罚银十五两入官……想九霄即田际云、朱韵笙、谢宝筏、乔稽氏即稽姓妇人，又名稽宗华，均依赌博之人，各处十等罚，例处十等罚，追罚银十五两，乔稽氏并驱逐回籍……按王钟声案，本与奏案无涉，朱韵笙、谢宝筏、乔稽氏，皆王案人物，其所以与田案并结者，因原参田际云有勾结奸民，以演唱新戏为名，希图煽惑等语，警厅疑奸民即指王钟声而言，正在搜查，而浙江馆长班之告发至，故遂并案奏结也……周杨氏为田际云妻母，周佑之为田际云妻弟，因田参案有虐死其妻，行贿免验情事，饬传对质。

不过，也不能就此否定田际云与革命党人的联系，相反，以清季旧戏名角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而论，田际云的渊源相当深。除了众所周知他与王钟声、刘艺舟等人的密切合作之外，还有另一层关系鲜为人知。清季兴起的舞台剧文明戏即话剧分为南北两支，北派即钟声派，南派为天知派。继1907年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演出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之后，任天知和王钟声在上海组织了春阳社，排演《黑奴吁天录》。后来王钟声北上天津，任天知则继续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演出活动。^[35]1910年，任天知和汪优游、陈大悲、许啸天等人组织进化团，排演多出新剧，并相继到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等地演出，上演鼓动社会改革乃至反清革命的《血蓑衣》、《东亚风云》、《尚武鉴》、《新茶花女》、《安重根刺伊藤》、《恨海》、《血泪碑》、《共和万岁》、《黄鹤楼》、《鬼士官》、《新加官》等新戏，与王钟声等人在北方的活动遥相呼应，地方当局以“肆意诋毁政治，毫无忌惮”，“专以怒骂政界为主义”，下令禁演驱逐。^[36]而早在任天知参演新戏之前，田际云已经和他有所交往。

任天知，本名任文毅，原籍北京镶黄旗汉军二甲喇宝常佐领下，幼随山东籍义父赴镇江为商。据其自述：

义父之亲子渐长，积不相能，遂出奔，转徙至福建。值甲午台湾之役，投孔副将麾下，赴台防堵。^[37]割台之后，无力内渡。照约，二年后应入日本籍，遂为日本之台南人。因其善操京语，聘至西京，为清语学校教员，入赘于藤堂氏。日俗：赘婿可以承嗣。因姓藤堂。日俄战争，波罗的舰队沉没，捷报到西京，举国若狂。睡梦之中，闻欢呼万岁声如潮涌。妇梅子披衣出户，鼓掌高唱。我独坐床隅，伤心落泪。盖日、俄因东三省而开衅，东三省为谁家之土地？祖国守中立，正所以弃置陪都也。无论日、俄孰胜，皆非中国之福。触景伤情，悲不自胜。梅子入屋，谓我曰：“汝已入籍为日人，何独不欢？”告以故。梅子益鄙我，谓：“中国人向无爱国心，汝尚知有祖国乎！”于是夫妇反目。壁间悬手枪，夺持向妇，将与之拼一死，经岳氏劝阻而罢。从此，归心决定，誓不再作日本人。梅子亦颇自悔，愿随我返国。抵申后，恐妇心游移，诱使吸鸦片，绝其归路。

任文毅到上海后，往见闽浙总督端方不果，其时端方的护卫夏鸣皋，本系伶界中人，而任与名优汪笑侬熟悉，由汪介绍与夏交。夏劝任来京等候端方考察宪政归国，为之汲引，并函告田际云代为关照。其时尚在1906年9月梁铁君案发生之前。如此，田际云不仅与新兴文明戏南北两大派的主要代表人均有联系，而且与南派的任天知结交更早。

然而，满腔爱国热情的任文毅在北京却险遭不测，先是因相貌与孙文相似被急于谋事之人以“孙文到京”密告，继而又为邀功心切之人设局加害，被警厅逮捕。经彭翼仲等人设法营救，并通过来华进行北京旧惯调查的任文毅原来的日本学生花岗出面向日本公使馆作证，由日本公使干预，才得以释放脱身。本来任文毅此行归国，决心不做日本人，因而未到各地使领馆挂号，以免坐实日本籍，永世不能脱离。归国前花岗还劝阻道：“贵国政府尚未开化，志士不能达其目的，徒送死耳。盍先图谋一己之事业，立定脚跟，再谈爱国？”任文毅不听，所以花岗对前来请托的彭翼仲说：藤堂致有今日，“虽属政体不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自取之辱也。”任文毅“不料祖国预备立宪，竟演此黑暗之恶剧”，清政府又对外国人惟命是从，痛心疾首，在警厅与彭翼仲痛谈国事，嚎啕大哭，语意侵官吏，警官在旁切

齿顿足，而无如之何。分别时任文毅表示：“今而后，知中华人之不易作矣。”^[38]

后来任文毅显然并未因中华人不易作而不作，不久又从日本回到上海，所以才有春阳社和进化团。辛亥革命后，进化团在上海新新舞台的演出大受欢迎，孙中山还在台幕上题写“是亦学校也”几个大字。限于资料，暂未发现田际云和任天知的进一步交往。不过，两人的境遇颇有几分相似，爱国和改造社会的热望，每每被阻挠扼杀，不得不由改造社会而首先改造政府。如彭翼仲所感叹：“朝政昏黑，实菌生党人之媒介。”^[39]田际云案闹得满城风雨之际，有北京来函形容这位“匪党数十人”的党魁：

田际云者，本京师著名棍徒，广交游，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为其耳目，为伶界最有声誉，富厚多金，稍有知识之角色也。^[40]

无论写信的人有心还是无意，其中包含着许多今人可以做各式各样解释的复杂信息。这些前后矛盾的报道和评论，未必反映案件及涉案人员的真相，却可以折射当局和社会的态度。名伶的社会知名度高，又拥有财富，而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来往结交之人十分复杂，人们总喜欢在名伶的案件中加入各自的猜想臆测，乃至善恶夹杂的期望和杜撰。而相同的际遇，又常常使得同类人聚合起来，天南海北，也能相知相通。若一味以今日分科立学或上下隔绝的有色眼镜去看，或许能够看出其他新意，但是如果因此而丢失了本意，岂非反而不能认识历史上实有的人事？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之类，都是后人认识的分别，而非前人行事的准则。而后人再具有想象力，与历史事实的丰富及变幻莫测相比，也显得十分苍白。清季舞台上下不间断演出着的那一幕幕人生大戏，就是明证。

[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1—3页

[2] 韶华：《中华名伶传奇丛书·梨园领袖田际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3] 目前专文仅见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120页。该文不仅以大量报刊史料

详尽论述了田际云排演《惠兴女士传》前后京师戏曲舞台新机的萌动，而且利用多项重要资料，对田际云的生平事迹有所考究。

[4] 穆辰公：《田际云》，张次溪：《燕都名伶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主编，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所收《燕都名伶传》无此条。奇怪的是，王芷章的《清代伶官传》（北平：中华印书局1936年版）原有“相九箫”一则，而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京剧名艺人传略集》也未收录。

[5] 王韬：《瑶台小录》中，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下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页。夏晓虹已引及此条。

[6]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0页。

[7] 穆辰公《田际云》称：“会时小福以梨园会会首病故，内务府改派际云充之，并得供奉内廷。时值戊戌政变……”据张次溪《燕都名伶传》“时小福”条，时卒于庚子五月十七日，补其缺者为余玉琴。田际云所补为1894年刘宝山之死留下的缺，时间当在1895年（王芷章：《京剧编年史》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670、792页）。张次溪《燕都名伶传》“时小福”条又记梨园四大会首事：“会首者，内务府堂所派，以掌梨园者。在精忠庙设公桌，会首上座，傍则诸管事及场面等梨园子弟，有不遵会规，经众议决革籍，则终身不得演剧。是以四大庙首，非德望隆重，不足服众。彼时庙首为程长庚、俞润仙、谭鑫培及君也。又北京梨园子弟，每组新班，须先将班名拟妥，送内务府堂郎中处审核，俟准后始能出演。往往经年累月，不易揭晓，是以又须庙首至府恳托。光绪间，新班层出，得君之力为多。盖君性好事使然也。”关于梨园公会，参见王芷章《清朝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公会、戏班、戏园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523页）。按惯例精忠庙首即梨园会首一般只从生行推选，余玉琴先因内廷赏识而得破例，田际云则以急公好义，众望所归，但碍于老例，以棒子花旦反串皮黄老生唱了一出《文昭关》，算是不违老例又顺应众望地做了最后一任庙首（景孤血：《精忠庙首琐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第525页）。

[8] 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96页。

[9] 梅兰芳遗稿：《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

[10] 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116页注13。

[11] 《九霄云外》，《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八日（1898年10月22日）。

[12] 金梁：《光宣小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翁同龢日记》1895年8月16日记：“本朝不设教坊杂伎，其领于内务府者曰升平署，皆中人也。乾隆时所制法曲，词臣等撰进，如张得天辈曾秉笔焉。嘉庆时有苏扬人投身入内者，往往得厚赏。至道光时，一概屏绝，升平署遂封禁矣。咸丰季年，中官习戏者颇多，亦尝传民间戏班在内供应。同治时稍稍开禁，至光绪十七八年而大盛，闾巷歌讴，村社谐笑，亦编入曲，而各戏班排日承应，其教曲者支月粮，赏顶带，户部有籍可稽者数十人。其始廷臣听戏无外班，近年则专用外班，内官所演不过数出典重吉祥旧花样而已。即如此二日，一四喜、一同春，皆外班也。识此以见风气推移之速。”（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26页）可以参证。

[13] 参见章开沅《康梁与肃亲王关系试探》，《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40页。

[14] 王树枏：《德宗遗事》，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268—269页。光绪是否死于慈禧毒杀，始终存在争议。就目前文献记载及相关物证看，慈禧毒杀的可能性极大。

[15] 关于此事详情，参见李永胜《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孔祥吉《康有仪出卖康有为——康有仪〈致节公先生函〉疏证》（《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桑兵《保皇会的暗杀活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 彭翼仲自述，诚厚庵记录，姜纬堂校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17] 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131页注4。

[18] 李永胜《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所引《中华报》1906年8月26日《安置党犯》、9月21日《保皇党之结果》。参见章士钊《吴道明案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关于梁铁君、范履祥等人与太监交游联系，详见蒋贵麟《烈侠梁铁君谋刺那拉氏致康南海先生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781—784页。

[19] 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2页。

[20] 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翼仲记：《戊程载笔》，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15、208页。

[21] 章士钊：《吴道明案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第149页。

[22] 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96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主编，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第109页。

[24] 梅兰芳遗稿：《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356—362页。

[25] 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6页。

[26] 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下，第792页。

[27] 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96页。

[28] 《闲评二》，《大公报》1911年4月26日。

[29] 京师自《公益报》披露封口奏折被禁后，报馆不敢刊登内幕消息，反而上海各报对于北京的各种情势有详细报道。

[30] 《北京舞台之巨案（二）》，《民立报》1911年4月26日“新闻一”。

[31] 《拿捕田际云案三记》，《申报》1911年5月1日第1张第6版。

[32] 《京师大狱续纪》，《申报》1911年4月28日。

[33] 参见《申报》1911年4月27日《京师大狱株连之真相》、4月28日《京师大狱续纪》；《民立报》1911年4月27日《北京舞台之疑案》、4月28日《北京之新水浒传》。关于贻谷本案，详见《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缩印本，页码用原书）卷二十四，本纪二十四，德宗本纪二，第962页；卷二十五，本纪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第988页；卷四百五十三，列传二百四十，第12603—12605页。

[34] 《田际云案近闻》，《民立报》1911年5月10日。汪康年记：“有喜观想九霄演剧者，近想九霄以事被逮，且有永远监禁之说，其人对同游者顿足曰：‘于今他不叫想九霄了，到是我们在这里想九霄。’”《汪穰卿笔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523页。

[35] 杨邨人：《戏剧》，《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4—9页。

[36] 《进化团人物志》，《民立报》1911年8月5日。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436页。

[37] 据《民立报》1911年8月5日《进化团人物志》，甲午任文毅随刘永福援台。

[38] 彭翼仲自述，诚厚庵记录，姜纬堂校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119—122页。任文毅的日本名为藤堂调梅，任教的日本学校一说为京都法政大学，实则其时京都尚无大学建制。

[39] 彭翼仲自述，诚厚庵记录，姜纬堂校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122页。

[40] 《北京舞台之巨案》（二），《民立报》1911年4月26日，第2页新闻一。

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盖棺论定，已成人物评价的一种固定模式或习惯。韩愈《同冠峡》诗所谓“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当人的生命不再延续之时，似乎就可以断定其一生的是非功过，对其生平作出客观、公正、恰当的结论。据此，史学研究中，人物评价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或准则。可是，这样的信念是否可靠，大有考究的余地。尤其在千古大变局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中西新旧的乱相，当局者固然难以取舍，后来人也不易权衡。秉承着盖棺论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终结为起点，无数的生者试图判断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结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视角。努力客观的结果，还是制造新的主观。清季张之洞之死，恰好是盖棺而论难定的典型。清季以来，由于报馆林立，利害迥异，许多人可以及时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而后来的人物传记往往以传主的生平为起点和终点，这些当时盖棺论定的看法，一般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却不失为研究和理解人物评价的上佳素材。

一 文本来源

1909年10月4日，自称平生决不与人争闲气，又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张之洞，在和日益专权的摄政王怩了大半年的气之后，终于宣告不治，追随他的旧主去了另一个世界。作为晚清举足轻重的疆吏权臣乃至士林领袖，又面临山雨欲来、危机四伏的朝局，张之洞的死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不过，张之洞在世之时其所作所为就极具争议，对其患病及死去，看法同样相当两极。有报道称：“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1]担忧其死与恨其不死，可以说是对张之洞态度的两个极端。

这样的分歧势必影响对其身后的评价。谢放《张之洞传》引《张文襄公事略·绪言》：

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至今日而誉张公，誉之者以为改革之元勋；今日而毁张公，毁之者以为宪政之假饰。不知誉者固非，而毁之者亦未剧得其真相也。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鉴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已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而齐驱者，竟何人耶？^[2]

该书所引《张文襄公事略》，见巴蜀书社1998年出版的《清代野史》第3卷，未著编撰者，坊间流行的其他版本则多署“佚名”，似乎著者已经无从考察。任放《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介绍张之洞的传记资料，谓《张文襄公事略》由“四明听雨楼主人编著”（《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此文收入陈锋、张笃勤主编的《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题为《世纪回眸：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内容较详，与本文主题相关者为：“（清）四明听雨楼主人编纂：《张文襄公事略》，一作《五十年大事记》。19节，卷首录宣统元年（1909）赐恤诏书。本文分事业、政绩、学问、新政、吏治、育才、举贤等门记述张之洞生平，所举事例，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密助唐景崧保台自立等，持论鲜明。其中对张氏之革新力加褒扬，而于其守旧则辩解为‘稍形固执’，反映了时论之一侧面。”^[3]其依据为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张文襄公事略”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以及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8页）。

查寻各种传记、辞典乃至笔记，迄未能坐实“四明听雨楼主人”为何许人也。望文生义，大概是旅居沪上的宁波籍人士。任放将《张文襄公事略》列为“史料类传记”中“也不应忽视”的一种，可是检查张之洞研究的各种论著，《张文襄公事略》似乎并未受到重视，有的作者甚至完全不理睬这本书。这显然不是疏失或遗漏，而是反映了研究者的态度。本来关于如何使用笔记掌故之类的文献就见仁见智，如果连作者也不清楚，无法进行史料的外证，严谨的学人当然会慎之又慎。

坐实编撰者的身份，目的还在于更好地理解史料的内容及其用途价值。而如果对原书的来源与类型有更多的了解，反过来也会有助于追寻判断编撰者。其实，《张文襄公事略》并非署名者自撰的作品，其人是否著有其中的部分，也不得而知。编纂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于事实。详查之下，该书实为张之洞死后各报所刊发的报道、悼念及评论文章的汇编，编者虽然将各篇的顺序打乱并且重新编排，各部分的文字并未加以改动。目前可以查实的各节出处依次为：

第二节“张文襄之事业”，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6日第1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署名“记者”。该文系连载，后来汇集一起，以同题刊于《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1909年11月7日）。

第三节“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原载《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第6页社说，题为《论南皮出缺与政局之关系》，署名“光”。

第六节“张文襄之兴贤育才”，原载《申报》1909年10月8日第2—3版论说，题为《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

第七节“张文襄在鄂行政”，出处与第六节相同。但最后一段则为第八节原出处的开头。

第八节“张文襄兴办路政”，原载《申报》1909年10月8日第3版译论，题为《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二》，系节译自《文汇报》。

第九节“张文襄之勋业”，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8日第1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节“张文襄历任封疆”，原载《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2—3版，题为《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

第十一节“张文襄征调入京”，原载《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3—4版，题为《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一》，系转自《字林报》。

第十二节“张文襄之政绩”，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9日第1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四节“张文襄之奇才”，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1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八节“张文襄之病状”，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2页要闻一，题为《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

最后一节《张文襄之盖棺论定》，原见《时报》1909年10月6日第二版《时评一》，题为《张之洞之盖棺论》。

两相比照，可见《张文襄公事略》的编纂，主要是取材于上海的几家大报在张之洞死后不久刊发的文章，《时报》、《申报》、《神州日报》的政治倾向虽然有所差别，但大体一致或接近。^[4]《民吁日报》较为激进，所选文章则较少。核对内容可知，其一，与原文仅有个别字的差异，未作任何调整或删改。其二，编排的顺序与原来发表顺序并不一致，而是根据内容安排，将各报的文章混编。其三，虽然个别文章分为两节，或分属上下两节，但基本按照原来发表时的篇幅，即以每天发表的篇幅为限来分节。其四，尽管编纂者基本没有删改原文，但是有所取舍，这大体可以反映其态度。由此可见，该书的编纂，虽有一定的准绳，其实不过是急救章，编者只是将就其取材，连结构也未经认真布局。至于具体内容，更没有仔细考究。当作传记资料，显然不太适当。

可是，从另一角度看，正因为编纂者没有改变所取各文的内容甚至字句，该书反而较为集中且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上海舆论界对于张之洞之死的即时反应，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上佳的资料。以此为本，参照该书所引各报未收入的其他相关报道评论，以及该书未引各报的报道评论，不仅可以探究编纂者的态度倾向，而且可以将张之洞之死作为研究的起点，观察舆论的反应，深究各方的态度，进而考察重要人物的离去所引起的社会波动。

依据上述资料，还可以形成两点推测，其一，四明听雨楼主人很可能与上海的这几家报馆有关，可能性较大的是《神州日报》馆。其二，编纂的时间当在1909年10月之内，上旬的可能性较大。因所收文章刊载的时间均未超出10月上旬。

二 取材准则

张之洞死后两天，内阁奉上谕，基本的评价是：“公忠体国，廉正无私”，任疆吏“提倡新政，利国便民。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入参机要，管理学部事务，宗旨纯正，懋著勋劳……服官四十余年，擘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见。”^[5]

上谕固然是清廷作出的官方正式结论，也可以说是具有正统权威性的盖棺论定。可是，在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日益丧失的当时，这样的盖棺论定似乎也没有多少权威性可言，社会各方还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分别作出各自的盖棺论定。《申报》的文章《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表示：

呜呼！南皮相国逝矣，蒙优旨，谥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四十年来之事业功名，今而后得盖棺以论定矣。综其毕生之扬历，回翔馆阁，珥笔精华。迨其后而出任封疆，人赞枢垣，政绩之脍炙人口者，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之风气，而不为风气所转移。誉之者则曰讲尔新旧，立宪元勋；毁之者则曰骑墙中立，无性执拗。然窃尝平心论之，毁者庸或过情，即誉之者亦未尽得其真。天生文襄，为德宗也，先德宗而兴，后德宗而死。凡德宗三十四年之事实，磊落轩天地，危疑亘古今，而文襄张公，实惟有以辅之翼之，疏之附之，患难与共，而左右朝局也。继湘淮诸勋臣之后，声施烂然，超出于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之上，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噤声，

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纾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于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这些自认为的持平之论，与取自《时报》，作为《张文襄公事略》的最后一节，标题也叫作盖棺论定的文章比较，即不尽相同。后者除了重复绪言的部分内容外，还有以下一段话：

张公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以骑墙之见，遗误毕世，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歿，惜哉！

这段话和绪言的内容，大概可以视为编纂者的标准，《张文襄公事略》基本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取舍和编排。

该书第三节即《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的社说《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就张之洞出缺与政局的关系提出：

至若南皮一生之事功学业，与其是非毁誉之得失，当今盖棺论定之日，识者苟潜察而深讨之，将有以见彼之真相，而无待乎不佞之喋喋。吾今所为不得不一言者，则在立宪专制人才与奴才

之间也。立宪之所造成、所养育者，实为科学上之人才，故科学进一步，而人才亦进一步。专制国之所希冀、所侧席者，乃为善伺上意之奴才，故虽有人才杂出于其间，而其数实居至寡。纵或得人才之力，以济一时艰难，然以人才之数，终不敌奴才之数之万一。此所谓一人既死，而一时之政局事功往往而隳，一世之人心亦往往以变。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熄，正为专制之国历史上一成不易之公例也。

原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评判张之洞究竟是立宪人才还是专制奴才，但既然“立宪与专制，其人才之资待不同，则其国运之消长，乃不能不绝然殊异。诚以立宪者有道揆，有法守，循序而臻，有进无退，势若祈的者之迎的而行，愈迎而愈至焉。专制之国，其势反是，以其有私意而无证见，有当权者之喜怒，而无举国之公是公非也。故其安危之辙，为途绝隘，往往系于一人焉，或系于一事焉，甚或系于一言焉”。又反对“假立宪之美名，以行专制之实例”，则张之洞本人也不能不放在这样的框架中加以检验。

《申报》的《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一方面肯定张之洞“于近世诸臣中，开风气之先者矣。要之，公实中国近代之伟人，亦德宗朝所不可少之人物也”，并且不赞成将张之洞与“东西洋渺不相涉之名贤”相比，以免苛求，还是指出：“若斤斤取以与二十世纪世界诸伟人比，则公既未尝沉潜新学，所猎取者，不过东西之鳞爪耳；所稗贩者，不过得自东西留学生耳。”此说无疑将中体西用的主张等同于半桶水。

《神州日报》的《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为《张文襄公事略》取材最多，共有四节，但是具有总结性的最后一续却完全没有收录，其文如下：

论曰：始公以经生发闻，其风义有如毕（沅）、阮（元），而知虑通达，廉洁不染，殆超过之，遂为数十年人望所归，后进之士受其陶铸者，普遍海内，方诸古人，何以加之。然以早享大名，蹈昔贤不祥之训，又当九州衰歇，万马齐喑之日，环顾天下，咸若不如己，遂以成其惟我独尊之心习，此则时势为之。固

其经纶遂不能充满无缺，乃至强不知以为知，于是左支右绌，遗害于功业非细矣。虽然，公不生于乾嘉极盛之年，以与先辈颉颃，而顾以之当今世递嬗之局，复无勇敢刚强以济之，此则公之不幸，而用违其时也。[\[6\]](#)

专制皇权时代，政治多为人治，重要人物的生死沉浮，往往导致权力平衡的破坏，引起权力结构的重组，因而引发政坛的震动，甚至造成基本国策的改弦易辙。清季数年间，除慈禧、光绪之死外，重臣张之洞的离去引起的政坛震动最大，自然也引起各国政界和媒体的关注。而重点往往与各自的利益相关。《文汇报》评论道：

公虽为旧学界之英杰，而能晓然于西学之利益，虽天性笃信中国之旧学，而能提倡国民之教育，是其见识诚非他人所及也。朝廷蓄志改革，调公入京，公乃于此时入军机，兼任大学士。当时朝中僚佐，似与不和，加以与声势赫赫之某宫保互相对峙，张相大有为其压服之势。迨孝钦显皇后驾崩，今上御极，摄政王正资倚畀，将以公为中国之长城。不意遽为二竖所困，竟不能于近今国事之上，展其未尽之才。而铁路借款之争端，复苦其心志，垂暮逢此，乌能自支哉？要之张相国实为一大政治家，惟不免稍形固执耳。[\[7\]](#)

《字林报》着重关注张之洞对外态度的飘忽不定：

张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8\]](#)

《泰晤士报》则总体上对张之洞一生的作为表示肯定：

中国大臣若南皮者，不得谓非海内之柱石也。南皮起家科目，早登上第，文雄一时……平日政策，虽不能人尽满意，然卒能持以镇定，务达目的，殆非易易。重以学问渊懿，于教育之振兴多所擘画，学部专章，大半为手所定。废科举，兴学校，舍旧谋新，类非他人所能逮。而于学务路政，殚精竭虑，宏此远谋，尤足令人永矢勿谖者也。[\[9\]](#)

三 看法各异

《时报》虽然由康梁一派开办，但在狄平等人的具体掌控经营下，并不直接反映康梁等人的立场。1909年10月13日徐勤致康有为书，“洞逆已死，开禁事想在即矣。”[\[10\]](#)庚子以后，康有一派对于张之洞翻脸镇压自立军之事始终不能释怀，恨之入骨，不共戴天。慈禧、光绪死后，摄政王载沣主政，再度有开放党禁的消息陆续传出，可是拖了很久，只有已故的翁同龢被开复原官。1909年7月12日，梁启超致函梁启勋，告以“开禁之议，近复大炽，闻将由常熟、义宁以及六君子，最后乃逮生者云。大约此事终办到，然痛快之举恐不可见。周公固贤，然英断似非先帝，比其视我，当亦寻常一时髦耳。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11\]](#)。梁启超所谓“半桶水之立宪党”，未必包括已故的张之洞，但徐勤等人显然认为此前党禁之所以迟迟不开，尤其是康门师徒不得解禁，张之洞从中作梗是重要原因。

汪彭年接掌《神州日报》后，该报渐渐转向立宪。而《民吁日报》所载被《张文襄公事略》收录的文章，持论相对温和，一些未被收录的则较为激烈。署名“帝召”（景耀月）的社说《张相国之定论》，认为张之洞乃治国之良相，而非乱世之能臣，其出词林登吏途之日，即其政治才能上暴露其缺点之时。又指：“张之洞者乃当代之文臣循吏，而绝非卓识之政治家，雄断之外交才也。彼欲以其陈腐之脑筋，模拟新时代之思想，欲以其锢蔽之眼光，解决政策上之机能，彼不自悟其非政治的才具，而欲以文学的知识决择外交内政之进行，

此其所为周章而狼狈者也……盖彼为文治国之良相，而非法制国之能才。”并且告诫当朝执政：“中国今日之国家，贵有济时的政治之才，决不贵有优柔的文学之相，此秉国钧者所不可不引为忠告者也。”[\[12\]](#)

署名“无”的社说《张文襄公哀词》进一步分析道：

以中国近世人物言之，自不能不以文襄为巨擘，今世之论文襄者，大率可分为二，或则以为当代之柱石，或则以为宪法之罪人。余以为此二者皆有所偏，而不能见其全焉者也。何也，盖文襄者，用而违其才焉者也。文襄者，政论家也，文学家也，能为承平时代之良相，而不能为拨乱反正之元勋……文襄之为人也，好大喜功，知图始而不知观成，于宪法之理由，国家之元素，以及东西诸硕儒之政治学说，皆茫焉不知。然而其眼光最灵，心思最巧，又深知徒讲旧学，泥成法之不足以弋时望保高位也，于是缘饰一二西法，以为进行政治之方针。至一有摧抑，不惜自贬其身价，以求为保利禄之计。[\[13\]](#)

该报刊载的时论《张故相遗闻》没有署名，也是出自记者之手，作者对于张之洞这位“近今历史重要之人物”死后“海内毁誉相半，而毁似多于誉”的种种评价，认为不足概括其生平。尽管他声称“记者诚不欲于恩怨纷纭之时，遽托于盖棺论定之义”，并且感叹“论人之难，而一时一家之言，未可悉据为典要也，则庸知夫后之记南皮事者，不由异于今日所闻也”，还是忍不住对“关系数十年来大局”的南皮一生的重要事实言论有所评议。他引与张之洞至交的李文田的评语：“香涛之资质，固下愚不移者也，其犹能有今日之设施者，则以多读书故。”张之洞以学者名于世，而学者有开风气与因风气之别，“南皮之学，因风气而非开风气者也”。学者又有纯一与调停两派，张之洞为调停派。[\[14\]](#)

与上海的《申报》相比，地位相当的天津《大公报》对于张之洞的批评显然更为激烈。该报1909年10月7日“言论”一栏的《对于张相

国死后之论定》，也是试图盖棺论定之作，甚至认为张之洞不待死论已定：

世之善于论人者皆曰，盖棺而后论定。余谓张相国之为人不必论定于既死之后，已可论定于未死之前。何则？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惟其无宗旨，故无晚节之可见；惟其无政见，故无效果之可言。吾人欲为相国列传者久矣，而卒惮于笔墨，迟迟不果者，以我国近代之历史即可代表相国之政绩耳。我国近数十年，大臣中如李文忠、刘忠诚、岑西林、袁项城诸辈，其政权由消长，圣眷有隆杀，或起或仆，迁调无常，惟我知己善变之张相国，内任外放，历仕三朝，知遇之隆，先后如一日。是岂相国之公忠体国，足以上格君心哉，毋亦假忠君爱国之名，为希荣固宠之地，故君主有更易，而相国之禄位安然；时势有变迁，而相国之声望不减。使相国果明忠君之意，何对于戊戌之政变，忠于后而不忠于帝，何对于各国之借款，忠于外而不忠于内。相国之生平，恃以训勉全国者，惟在忠君二字，乃深考相国之一身，其臣节果何如也。向使相国有臣节，吾恐失败者屡矣，安得有今日哉。

不能保持臣节的张之洞“于政界固无何等之功烈足以折服人心”，在学界方面，执掌文衡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为学界泰斗，“然自中外交通，文明输入，世界之大势已变，而相国之脑筋不变”。《劝学篇》流毒海内，学部章程几于驱天下人才尽为奴隶，科举既停，优拔之试及博学鸿词孝廉方正、存古学堂等犹念念不忘，教育前途堪忧。“相国一日不死，虽不致举已有之萌芽尽行芟除，而其足为文明进步之阻力，则固可断言者也……当此民智大开，宪政进行之日，相国以顽固之头脑，专制之精神，立足于此二十世纪之世界，亦可谓危险之甚焉。今相国以老病之躯，能得善终，既不失为专制时代之功臣，亦不至为立宪时代之罪人，为相国计，其亦可以瞑目矣。”由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角度看，张之洞之死不得其所却得其时。

革命党人对于张之洞的否定最为彻底，《民报》第25号精卫的文章《张之洞死》，从反满的立场，没有给张之洞留下任何值得赞誉称

道的余地：“张之洞死，于清廷失一无足重轻之家奴，于汉族失一冥顽不灵之朽物，至不足齿数。吾人无余晷为此老贼作传，惟观老贼之生平，略可见清廷所养成之人物，其状态何似。”君主专制国，君大权独揽，以臣为奴隶，为臣者以苟贱为本分，其得君之术有二：“一则发扬蹈厉以博人主之欢，二则唯阿取容以免人主之忌，前者易进而易退，若袁世凯之属是也；后者易进而难退，若张之洞之属是也。此等人之目的，不在得权，而在得宠。其为苟贱则均，而固宠之术，自以后者为胜。且同是唯阿取容之中，其用术亦有深浅之别，深于术者，在他人以圆滑为圆滑，而彼则以倔强为圆滑，在他人以躁进为躁进，而彼则以恬淡为躁进，其实圆滑躁进，莫彼若也。中国之人心，强半中于老子之毒，所谓不为天下先，不为天下后者，几于奉为金科玉律，以之谋国，何患不亡，然以之做官，则洵为秘诀。张之洞之一生，所以能浮沉于宦海而保其富贵者，即用此术而已。”尤其对于张之洞庚子镇压汉口唐才常自立军深恶痛绝，“自是以后，益与民党为仇，罪大恶极，人所同愤……然老贼之得罪汉族，夫人而知之，若其对于满洲，则颇有推为元老，称为荇臣者。余故著其生平，以告天下，俾知其君臣相与之际乃如此，宜其与豺狼狐貉吻合无间，以流毒于中夏，为国民者，安可听其自生自灭，而不为之所哉”^[15]。

综上所述，对于张之洞一生的言行，几乎每一具体方面都存在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意见，各家盖棺论定的初衷，最终变成罗生门式的演义。

四 影响预测

除了对于张之洞一生言论行事的功过是非盖棺论定，舆论关注的另一重点就是张之洞之死对于政局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大公报》闲评《呜呼张相国》称：“相国之在位也，于政界无赫赫之功，然一经长逝，影响于政界者颇大。”^[16]张之洞在世的最后几年，于朝局未必有大作用，但是其死去却牵动朝局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后世者不止一端，关系清王朝结局的主要有三，其一，如何抑制亲贵专权；其二，铁路借款的善后；其三，袁世凯是否会重新起用。

《张文襄公事略》第十六节《张文襄维持大局》怅然叹道：

当国步艰难，外患逼迫之秋，所赖以维持大局，镇慑朝野者，其惟我一二重臣乎？其惟我一二重臣乎？乃昊天不吊，倾我柱石。大星陨州治，而韩魏公薨；红光烛山谷，而诸葛武侯逝。天崩地裂，风号雨泣，朝廷多故，老成凋谢，南皮相国之噩耗，忽惊传至吾耳，呜呼，痛哉！国家之重臣，上下所倚畀，一旦溘逝，其关系诎不大哉？盱衡现势，默揣往古，吾对于相国之出缺，盖有无穷之感焉……夫新主当阳，庶政之待举者，如千缕万丝。相国一身，关系于外交内政者，不知其几许事。今不幸而相国往矣，则萧规曹随，力能竟相国之志者，当不乏人。而远大之识量，灵敏之手腕，坚心毅力如相国者，则吾恐如凤之毛、麟之角也。痛哉！天生一伟人，忽忽数十年驰驱于政界中，遗大投艰，政事鞅掌，而犹未能竟其全功，赍志以没，则其他之仳仳伉伉者，又何足道耶？呜呼！际万国竞争之时，人才消乏之秋，又谁能摘斗摩天，目空今古，指挥中外，继相国而起者乎？吾故曰有无穷之感也。

诸如此类的担忧，其他报刊或隐或显地表达过，决非泛泛而论。摄政王载沣掌权以来，用人唯亲，恣意妄为，坊间议论纷纷，枢臣亦有所不满。载沣风闻，居然对枢臣表示：“本监国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即如信任亲贵，亦系量能授职，因才器使。倘各亲贵实系无能，自当随时撤换，免致贻误，如其才有可用，则予以决不遽为浮言所惑，妄行更动。”^[17]张之洞在位时，虽然无力制衡，载沣多少还有所顾忌，毕竟有些牵制作用。张之洞等老臣不在，载沣和一班亲贵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弄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光绪朝三十余年的中兴局面，一朝瓦解。当时舆论对于政局前景的种种担忧，大都只能通过悼念张之洞而隐约表露。正如《民吁日报》景耀月（署名帝召）的《张文襄哀文》所说：“萎时危迫，遗大投艰，正当国家之多难，殷忧继起之无人，苟继其志者，非以坚贞忧国，用济时艰，复不若经术苏民，顾无遗患，国事日棘，杞忧方深，此所为愈滋予痛，益悲予怀者已。”^[18]后来皇族内阁的倒行逆施，果然是清皇室众叛亲离的重要原因。

张之洞的铁路政策取信于外人而失信于国人，因而对此评价相当两歧。《泰晤士报》着重赞誉张之洞的铁路政策，称其“量移湖广，浚发国家铁道事业之思想，拟以汉口为中国路线之中心点，经营支干，分达北燕、南粤、西蜀诸要区。任湖广时，因事微有扞格，厥后久任，至易十八寒暑，获观京汉之成，复续议建筑粤汉川汉之要道。一九零七年入直枢廷，又值两宫宾天，竭忠尽智，上赞皇室垂统之大计。曩以粤汉借款之故，既殫心力，复历艰难，尚不致有所破坏”

[19]。而《民吁日报》以《泰晤士报对于张相国之评论》为题报道同样内容时，文末特加“时案：张相之善政佳猷，非可枚举，而外人斤斤于铁路一事称道不置者，盖有由也。”[20]该报署名“无”的《张文襄公哀词》进一步批评张之洞的铁路政策：“文襄督两湖时，以赎回粤汉铁路为国人所称道，乃未几又力主借款，此次川汉粤汉外债之主动，实惟文襄。是昔日之排斥借款者文襄，而今日之主张借款者亦文襄也。昔日之功仅在粤汉，而今日之毒，且流及川汉也。”[21]所以，有人认为张之洞“粤汉铁路力主借款，未免为高年之失德”[22]。

据说张之洞死前两日，有某大臣视问病状，张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功过是非相当自信，其中特别谈及铁路事宜：“惟川汉粤汉两路政，为数省命脉机关，鄙人初心，原欲归鄂自办，嗣因经济不足，不得已而提归部办，议借洋款，大费经营。甫有萌芽，而外间谣言已起，文电交驰，鄙人亦只以镇静处之……但此心勘以质诸白日，想湘鄂绅民，必不致终于不悟。”[23]两年后，湘、鄂、川各省绅民终于觉悟，结果却是揭竿而起，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张之洞与袁世凯本来同时入值军机，摄政王载沣掌权后，将袁世凯的权力剥夺，赶回了老家。说来也巧，张之洞死前一日，刚好是袁世凯的寿辰，于是《申报》有“南皮之死，项城之寿”的议论。[24]张之洞死后，坊间传闻清廷打算重新起用袁世凯，引起种种揣测议论。各报于是将袁、张两人的比较作为要点，《字林报》评论道：

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国民之缺望，政府之失援，庸讎初料所及耶？监国为大势所迫，将起用袁世凯，使张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议。当一九零七年七月，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首调张大臣入京，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征调入京。

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然两大臣行事，虽偶有微异，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25\]](#)

《申报》专门论说《论张文襄之与项城》，认为：

庚子以后，中国政治界上最有关系之人物，应推项城、南皮……项城未罢之先，则权在项城，项城既罢之后，则权在南皮，今南皮既死，又拟起用项城，则二人之出处行事，必有其相同之点，而足以资我辈之研究者也。

不过，《申报》的着眼点不仅在张、袁二人之同，更强调其异，并且希望袁世凯行事不同于张之洞，更不同于其本人往日的所作所为：

今者南皮死矣，饰终令典，备极优异，摄政王有国是如何之叹，有老臣凋谢之忧，全国之人，则皆戚戚焉虑重臣之难得，继任之无人，即东西各报纸，亦莫不揭其相片，论其行事，而以中国丧一柱石之臣，代为惋惜，此亦可谓生荣死哀者矣。至项城从前之去位，则舆论多以为快心，朝右不闻其嗟悼，大抵毁者多而誉者少。由是论之，二人之行事，虽有以上种种相同之点，而其宗旨之出入，为人之得失，或自有其不同之处，要未可以一概论也。虽然，今日南皮方死，即有起用项城之议，则峨峨朝士之中，足以继南皮而起者，舍项城外，岂果无其人耶？然而，项城之与南皮，固明明时为今日政治界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人物也，我因此论两人从前行事之所同，而愿更观一人他日行事之所异。[\[26\]](#)

袁世凯再次出山，并非一帆风顺，直到武昌起义，才被重新起用，而其行事的确异乎寻常，成为大清王朝的送终之人。

《大公报》连载文章《张、袁政府之结果》，指张、袁二人均非真心主张立宪，其所作所为，不过争权希宠固位：

吾人对于张、袁二公非好为此苛论，以贻识者之讥。不过，处今日之时势，非有遗大投艰之才，不足以应世变，非有破釜沉舟之力，不足以济时艰。彼张之愚而自专，袁之不学无术，岂能胜任艰巨而奏旋转乾坤之效哉。张、袁之才，虽非毫不可用，然以之独当朝局，手握重权，以与世界大政治家争雄角力，其有不有着失败，自蹈覆亡者亦几希矣。

有鉴于此，文章的作者并不寄望于袁世凯的再度出山，但是要求执政者承担起社会责任：“今张已亡矣，而袁尚有起用消息，袁之果能起用与否，虽不可知，而吾愿世之仰赖夫袁重望于袁者，勿再诿责于吾民可耳。” [\[27\]](#)

上述三事，均与几年后清王朝的覆亡关系密切，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立场角度不同，看法各异。《神州日报》的论说《论张文襄故后之政局如何》，一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惯例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张之洞之死，断断然有影响于宪政之前途；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今日政体，正由专制进于立宪，政府由无责任进于有责任：

膺此责者，其人非具有世界大政治家之资格，非饶有推翻旧政治建设新帝国之精神，必不能济。若公者（案即张之洞）正嫌非其伦矣。倘使继任者犹复乃公之志，萧规曹随，侈为盛事，其阻碍宪政而有妨害于国家也必矣。是故继公之任者，其人之识力政见眼光手段，必高出公数倍，始克以应世界之潮流，其次必兼公之长，去公之短，又其次则宁取其魄力手段胜于公，而弗苛求其学问，夫而后始足以补公之短，而竟公未尽之志也。否则，以庸庸者继续其位，其不危殆也几希……要而言之，立宪之与专

制，如正负之互相消，官力之与民气，譬冰炭之不相入，物莫能两大，此惟知时达变之大人能为知耳。若文襄者，欧化与国粹既交战于中，君权与民权欲相提并进，以骑墙之政见而酿成阳立宪阴专制之现象者，政界诸公，大抵然矣，而文襄其代表也。故夫文襄者，乃过渡时代言论上之预备立宪不可少之人物也。吾甚愿自今以后，内而枢臣，外而督抚，尚其推诚心布公道以与天下更始。慎勿再效文襄之依违两可，不敢大有所更张，而致涑诗张为幻之讥也。^[28]

也是从上述立场出发，《新闻报》对于张之洞保荐戴鸿慈入军机继任表示意外，因为后者为政，无所表现，张之洞以君子和文学为荐人标准，不适宜预备立宪和强邻逼处的时代，希望戴鸿慈“严定宗旨，刻励事业，一以补助立宪为心，勿复如旧日之旋进旋退，则他日之功业，安知不在文襄之上哉？”^[29]

《民吁日报》曾有评论：“张文襄逝矣，说者谓于政治上之影响甚大……其为进化与退化，正未可知。记者闻之，乃直断之曰进化也。盖无论何国，其大臣元老一经更动，政治上必大受影响，实以继其后者之观念不同。然无论后者之观念如何决绝之反对，其谋政治之进行，则固可断也。况过去之人，非于政治有绝大关系者，则后来者之欲谋进行，正非难事，所以敢直断之曰进化也。或曰：每下愈况，将若何？乃应之曰：人才未可以轻量，安知丰功伟烈于我政治上放一异彩者，非即今日之继之者耶。”^[30]继张之洞之后秉政者，未见大放异彩之人；而张之洞死后两年，中国就结束了王朝统治，进入共和。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验证了进化的论断。

[1] 《又当如何》，《大公报》1909年10月7日，第二张，《闲评二》。

[2] 谢放：《张之洞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

[3] 陈锋、张笃勤主编：《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第482页。

[4] 参见闵杰：《辛亥革命前的时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285页；谷长岭：《神州日报（一九〇七年七月至一九一一年六月）》，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386—401页。

[5] 门人胡钧重编：《清张文襄公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85页。

[6] 《神州日报》1909年10月10日，第1页，论说。

[7] 《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二）》，《申报》1909年10月8日，译论。

[8] 《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一）》，《申报》1909年10月7日。

[9] 《张文襄公事略》第十八节《张文襄之病状》，源自《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2页要闻一“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没有说明外人具体为何。《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署名“寄时”的译论“泰晤士报对于张相国之评论”，内容与此相同，只是译文的差别，则《神州日报》的“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当取自《泰晤士报》。

[1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39页。

[1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3—494页。

[12]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1页。

[13]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1页。

[14]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9日。

[15] 《民报》第25期，时评，第16—19页。

[16] 《大公报》1909年10月6日。

[17] 《摄政王之所谓一秉大公》，《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5日，时事要闻。另参《摄政王简任之独断》。

[18]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8日，第4页，社说。

[19] 《张文襄公事略》第十八节《张文襄之病状》，源自《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2页要闻一“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没有说明外人具体为何。《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署名“寄时”的译论“泰晤士报对于张相国之评论”，内容与此相同，只是译文的差别，则《神州日报》的“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当取自《泰晤士报》。

[20]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

[21]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0日，第1页，社说。

[22] 《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申报》1909年10月17日。

[23] 《张文襄不忘路政之遗言》，《申报》1909年10月17日，第二版，“紧要新闻”。

[24] 《申报》1909年10月16日，第四版，“清谈”。

[25] 《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三、四版，“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一。

[26] 《申报》1909年10月9日，第三版，“论说”。

[27] 《大公报》1909年10月9—10日，言论。

[28] 《神州日报》1909年10月12日，论说。

[29] 《论戴尚书入军机》，《新闻报》1909年10月10日。

[30] 《进化》，《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9日，第三页，“大陆春秋”。

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

清季十年间遍及各地的罢市，是城镇商民反抗清政府暴政、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的普遍斗争形式之一。有关著述，往往简单地将罢市当作民众的自发斗争，混同于一般的民变。这固然体现了罢市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一面，但也模糊混淆了二者的差异。清末的罢市，就其主体而言，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逐渐清晰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显示了商人在城镇居民中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长。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对于清季城镇商民的罢市活动及其作用，认识可以深入一层。

一 “城镇”的地位及其结构变化

今人通常断言古代中国是乡村社会，并且理所当然地研究古代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以及城乡关系。既然城镇及城市史的研究在时段上已经提早到上古社会，历朝历代的城市研究就不仅成了应有之义，更是方便与国际对话的接口。但是，清代以前中国实际上并无后来清晰分界的城市与农村，更谈不上明确的城乡关系。在观念上，固然很少有城乡之别，在事实上，也很难将城乡截然分离。城、市、镇的实体及其指称的出现，当然并非晚近才有，可是绝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指其形式功能，而不是行政体制的正式设置。在中国，有身份的士绅往往在城镇有商号店铺，在乡下有土地田产，甚至一般流民也可以各种形式在城乡之间游动。诸如所谓不在地主之类的概念，都应当检讨发源生成与移植适用的诸多问题。尽管对于今人而言，遵循回到无的境界寻绎有的发生演化这样治史的基本途辙，几乎已成难能可贵之事。

科举时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子享有种种优待，可以利用所谓城乡的一切有利条件，使得举业成为能够赚钱自活甚至养家糊口的产业，由于城乡分界及其居民身份的不固定，虽然后来也渐渐有县上省

上与乡下之分，城里人对于乡下人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感，换言之，乡下人也就不会以仰望的心态看待城里人。后科举时代，由于城市化的加速进行以及社会新事业的层出不穷，新式学堂教育所学内容又不适宜于乡土社会，推行地方自治时设计的让士子继续与故土结合的种种办法很难落到实处，毕业不回乡的问题日趋严重。这样的情形周而复始，加剧了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面对差若天渊的城乡两重世界，以至于一般人的意识里，城乡之间也开始显得泾渭分明。

近代以来的城乡认识架构，既有欧洲中世纪城乡截然分立的影子，也有明治日本城乡自治的痕迹，还有近代列强入侵以来租界的效应。清季受欧美日本的影响，城乡分别的观念日渐明晰，所谓城绅、乡绅之说日益流行。即使如此，作为正式的行政层级和区划，城乡究竟如何分别依然令人相当困惑。预备立宪时期推行地方自治，制定颁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二节专门规定“城镇乡区域”，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人口若有增减，要经一定程序变更乡镇地位。^[1]这样的原则规定，不仅与后来的城乡之分并不完全对应，具体操作起来也相当困难。例如府州县治的城墙之内为城，在城池完备之地似乎不成问题，否则就有些麻烦。至于城厢部分，究竟如何划定镇、乡分界，除了因循旧惯，只能大而化之。督抚乃至府县同城的情况并非个别，仅仅依据人口的多寡，城内究竟是城还是镇，有时就很难分得清楚。

虽然市政的概念清季已经传入中国，并且洋务、新政和预备立宪期间，在有租界的地方乃至其他重要的城镇举办过一些市政建设，可是直到清亡，中国并没有正式的城市建制，民初各地才陆续开始行政设市。国民政府统一后，加强户籍管理，居民的流动性逐渐受到控制。1950年代以后，城乡壁垒逐渐形成，居民身份的分别日趋严格，以至到了要想改变身份，几乎比登天还难的地步。

在没有城市设置的清季，罢市的社会基础是以商人为主导和主体的城镇居民。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商虽然列名其间，却处于末位。中国地广人众，官僚相对简少，皇权统治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权力的稳固，要想有效地驾驭管理广大地域和众多生民，施政就要以农为本，重本抑末。无粮不稳的重要性，远过于无商不富。尤其是经商可以暴富，富可敌国，便要求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取得相应的话语权，成为社会矛盾加剧和政局动荡的因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压抑之下，商人的势力很难在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

辛亥时期，商人却不仅能在全国各地的城镇中不断掀起罢市风潮，与各地的官绅权力相抗衡，而且具有影响全国政局的能量。商人的这种超自重能量，与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城镇的社会结构及其地位作用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尽管资料统计日趋完整，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新兴社会力量的弱小毕竟是历史事实。社会集团或群体人数的多少，无疑在其所具有和发挥的社会能量的大小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二者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成正比。从商人群体的构成、商人在城镇居民中所占比重，以及城镇在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三个层次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化对于问题的认识。

商人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四民之一，却是少有的能够转身成为近代新兴势力的社会群体。随着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他们以商业为基业，以商会为法团，以商战的名义展开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商人在旧式社会群体中最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洋货对中国的冲击，首先就是从流通领域开始的。商人从接触近代机器工业之始，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通过商业活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原料和消费市场，而且参与建立近代民族工业，一些人转化为工场主，另一些人则从各种金融地产渠道成为投资者。当然，受到城乡、区域、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商人群体的转型并非同步进行。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都市，商业与近代工业的结合达到一定水准，而一般商人仍限于在流通领域里购销机器工业的原料和产品，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甚至没有脱离传统商业的轨道。

清末汉口、南京等地的商业仍以旧式店铺居多，这些店铺在经营方式和内容方面与千百年来一直进行的商业活动相比，并没有多少变化。南京商业共分116行，5336户，其中能够与近代机器工业有所联系的不过25行，1954户。汉口商业168行，12328户，与近代工业有关的为36行，3887户。诸如茶馆澡堂、禽畜鱼蛋、酒店饭铺、米粮肉行、水果炒货、香烛颜料、裱画刻字、修整灯伞、酱园素菜、竹木器具、豆腐熟食以及客栈、茶叶店，甚至理发、乐户亦包括在内^[2]，不要说与近代机器工业有多少联系，即使广义而言，也很难确定究竟有没有或有多少今人眼中的近代性因素。

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第一，被迫开放的中国已被强制纳入世界体系之下的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第二，出现了

一些近代工矿企业；第三，商业中与机器工业联系密切的部分实力强，规模大，发展快，对整个商业活动具有导向性。如南京与机器工业有关的行数仅占22%，而户数却占36%。汉口则分别为21%和31%。^[3]在此制导下，商人的群体趋向开始发生改变，与国际市场和机器工业联系紧密的部分，因为对于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较为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商人群体的整体动向。

即使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商业部类，由于城镇居民结构的变化，其服务对象亦已改变。近代以来，城镇商业发展，商人增多。广州号称73行，实际为100多行，汉口号称360行，实际也有168余行，南京则有116行。商人在城镇居民中所占比重可从下列13个城镇的统计中窥见一斑：

城镇	总户数	商户数	资料来源
天津	84440	26426	《津门保甲图志》，1844—1845 年。
广州	96614	27524	《广东省垣户口最近之调查》，《广东谘议局编查录》下，1909 年。
汉口	16000	12328	《汉口小志—商务志》，1914 年。
上海		8000 余	《上海华商行名簿》，1908 年，数字为商店数。
南京		5336	《江宁商店总数表》，《商务官报》第 10 期。
汕头		6000	《宣统二年广东谘议局第二次常年会报告书》。
嘉应州		3000 余	《岭东日报》1905 年 11 月 30 日。
江门		2000 余	《广东文史资料》第 5 辑。
张家口		1037	《张家口出产各货情形》，《商务官报》第 6 期。
营口		1002	《大公报》1902 年 6 月 30 日。
龙江		1000 余	《警钟日报》1904 年 4 月 10 日。
驻马店		790	《大公报》1911 年 6 月 14 日。
法库	3199	222	《中国日报》1907 年 3 月 29 日。

由上表可见，商人群体在城镇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天津、广州城区的商户约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汉口镇达四分之三强。值得注意的是，商的户、口之比高于其他市民，因而商的人数比重超过户数。如法库门商店仅222家，占总户数的7%，但归于商类的男

性居民达3265人，占男性居民总数11480人的四分之一强。^[4]而上海仅宁波帮商人就达到3万。^[5]由于城镇人口主体发生重大改变，商业活动日益由以为官绅及其附从服务为主导，转而以面向全体市民为主导。尽管旧式官绅仍是对象之一，但其特权地位日见弱化，更多的只是作为特殊的商业服务对象，而不是作为特殊权力阶层来加以考虑。

清前期商人大致分为垄断性商人、大商人、一般铺户商人和小商贩四种。^[6]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属于中小商人的铺户逐渐成为城镇商人的主体。鸦片战争后不久，天津的铺户已达15583户，另有盐商401户，负贩10442户。这一趋势到清末更加明显和普遍化。前列城镇商户人口统计表即主要指固定铺商，而不包括流动转运商或负贩。如上海的徽宁帮贩茶，通州帮贩棉，山东帮贩黄油、豆饼、草帽辫等，均依季节往来，在行栈中寄宿买卖，并无固定店铺。张家口除铺商千余家外，“平民多以商业为务，或养牛车，专走口外草地，转运货物。”^[7]铺商一般规模不大，如汉口各商帮中，每年有55万两以上贸易额者江南宁波帮约60—70家，河南、湖南两帮各50余家，四川、云贵、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各帮分别为20—40家，加上其他几帮之数，大商户总共不过300家。^[8]营口向沙俄殖民当局纳捐的600余家商店，捐额分成24等，每月缴纳50元的头等仅11家，2等32元到5等21.3元共94家，6等14.25元到10等8.6元共68家，11等5.5元到24等0.25元共48家。^[9]铺户增长并成为主体，表明商人在城镇中的地位日趋稳定和提高。

除人数增长，比例增大外，商人在城市占居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由地缘、行业等社会纽带而结成的各式各样的团体组织，并凭借这些组织的联系左右其他市民，成为后者的领导者和代言人。如上海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为大大小小21个商帮所控制，其中宁波帮所属几达10万人，江北帮、广东帮各5万，徽宁、苏州、无锡、常熟等帮各3—4万，绍兴帮2万，钱江、南京、扬州、潮州等帮各万余，其余数千不等。汉口居民也大都分属于四川、云贵、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徽州太平、江南宁波、山东、潮广港等12个商帮。“是等商帮为唯一之商业机关，各有会馆公所。”^[10]清末上海的会馆公所达73处，依行业设立者控制了本行业的大小商户，由地缘而设者更能支配其他市民。有人在调查后指出：商人“自治之机关曰会馆、曰公所，会馆有时行会议裁判等事，俨如外国领事馆；公所为各业之机关，俨如商业会议所。其始不过曰联乡谊、营慈善而

已，浸假而诉讼宽抑之事为之处理矣，浸假而度量衡归其制定矣，浸假而厘金归其承办矣，浸假而交通运输之规则皆归其议决矣”^[11]。

用后来的观念看，传统的会馆公所等组织形式，固然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这与清季城镇商民的过渡状态正相适应，在乡土、行会气息的包裹中，会馆公所成为商人自治和影响支配其他市民的社会权力机构，并在保存旧形式之下部分更新了内容，赋予新的性质，改造成商民赖以开展社会政治活动的基地和组织核心。上海著名的广肇公所和四明公所，就多次发动和组织商民的爱国反清运动，通过反复冲击现存秩序，进一步增强了对城镇其他社会群体的影响支配力。

清末商人毕竟不同程度地有所变化，除旧式组织外，还建立了正规的团体——商会。据《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工商统计表》统计，全国共设立商会794处，入会商户达196636户（不含北京、热河、察哈尔三地的统计数）。清政府主持设立商会的初衷，是想继续官绅合作的模式，建成推动发展和规范商务活动的机构。实际上商会并没有按照这一轨道运行，而是成为商人自己的新式社团组织。商会的普遍组建有助于打破地域和行业界限，增强商人的群体意识和全国性的统一联系，使之不但能够代表地方利益，而且具有影响全国的地位与声望。虽然在不少地方，商会仍然带有一些官办色彩，但在一些商人势力较强的省份，商人不满足于商会的官办性质，还成立了独立组织，如广东的粤商自治会。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城镇社会影响力的增长，使得四民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国民国家思想的传播，引导分别的四民重新组合成为统一的国民，另一方面，四民本身的地位顺序逐渐调整，商人的地位显著提前，甚至超越其他部分，从末位跃居首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绅商与商民概念的出现，前者显示随着商务日益受到朝野上下的推重，绅与官逐渐分离，而与商逐渐合流。这样的趋势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在重商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绅加入商务活动，二是科举考试停罢，绅需要寻求新的社会支持，而过往同属四民之列社会声誉又焕然一新的商便是最佳选择。各地出现的绅商分流与合流的双向趋势，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商人在独立性显著增强的同时，社会联系进一步扩大。

如果说绅商概念的兴起，主要是显示在全社会范围内商人地位的变化，那么商民概念的出现，则更集中反映了商人在城镇社会主导地位的形成。唐宋时期政治都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吏、士兵、地主、士人

及其亲属和服务人员，工商业者一般只占几十分之一，在综合型城市中也不过十分之一左右，只有经济型城市，特别是专业化较强的工商市镇，工商业者才成为居民主体。但商业性市镇主户少而客商多，商人的流动性很大^[12]，而且商业活动本身又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官僚地主贵族的经济与政治，因此，无论就社会地位还是政治经济实力看，商人在城市里都无法与官僚贵族相抗衡。明代城市的商业虽有长足发展，但一般而言，居民中商人的绝对数仍少于官僚贵族及其附从^[13]，只有少数发达城市出现了商人超过地主贵族的趋势，而这种局部性变化尚不能减轻商人在皇权官势面前的心理负荷。

城市人口主体由官绅到市民再到商民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商人在城镇当中比重增大，稳定性增强，在许多城镇取得超出官绅的优势，表明城镇逐步脱离原来的混沌状态，呈现新的社会结构。商人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为官绅服务的局限性，有力量有条件利用其在城镇的相对优势和支配作用，以城镇为依托，与各地官府乃至清朝国家政权相抗衡。商民罢市在清末十年间普遍持续地爆发，反映了城镇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

诚然，尽管商人绝对数及其在城镇的相对比例有了很大增长，在四亿人口的大国仍然有如沧海一粟。不过，正如近代中国的城乡并非截然分立，联系相当紧密一样，被视为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经济，也不是全然原始的自然经济，而是具有一定商品化程度，与市场联系较密切的过渡型经济。世界工业革命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男耕女织式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扩大，商品经济不仅起着补充作用，而且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刺激与引导。如果完全与市场相隔绝，就连穷乡僻壤也将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如此，中国农村之于城市的独立性，在时空各方面都带有相对性。这种状态减弱了农村经济对于商品经济刺激产生反应的灵敏度，良性发展不易显示，恶性循环却得以持续。在市场联系减少的情况下，局部地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暂时和相对的稳定，但这决不意味着农村能够脱离城镇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只是问题暴露的速度比较缓慢。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农村，而中心则在城市；同时，星罗棋布的城镇又是联结市场的枢纽环节。农村离不开市场，也就离不开城市。由明清延续而来的国内市场，由于帝国主义入侵、近代工业发展和铁路、航运交通干线的开辟，空间位置有所移动，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从沿江沿海逐步深入内地，便利用了原有市场的辐射效应。大体上说，依据资本主义化程度和市场联系中地位的不同，大都

市影响中小城镇，沿海沿江影响内地，城镇影响近郊和乡村，近代化程度高的工商行业影响程度低的行业。这种连锁式反应，决定了商人的基本动向是中小城镇以大都市为向心运动，就社会整体而言相对弱小的都市商人群体，因而能够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影响全国的能力。

社会环境与城镇结构的变化，为商民与官府朝廷的公开抗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决定了清末罢市有着不同于一般民变的性质与发展趋势。

二 罢市的类型与影响

近代以来，商民虽然继续对统治者保持着既依从又矛盾的关系，以及对皇权官势的畏惧心理，但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官府朝廷并非自己的利益代表。而财政窘迫的清政府日益重视商务以及对商人的强制性倚赖，从反面显示了商民的力量，又表明这种倚赖的不合理性。自厘金制倡行，商人倍尝苛捐杂税盘剥之苦，饱受局卡官吏敲诈勒索之累，怨愤的情绪孕育蓄积，在一些地方早已迸溅出冲突的火星。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上海举办户捐，“各段以逼勒索捐，到处哗动，匿名揭帖遍街巷，势甚波汹。当事遂命停止。”^[14]1884年，重庆商人因地方官将厘捐提充协饷，别起新厘，“几欲与老厘为难”^[15]。这种零星的冲突还是明代以来城镇民众反抗运动的余波回澜，与一般民变区别不大。由于历史的因袭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商民的意愿要求主要是通过趋新士绅的活动得到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讲，戊戌维新和反对立储，就是以趋新士绅为主导的社会政治抗争运动的高峰。

时间跨入20世纪，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救亡呼声与变革召唤相互激荡。在朝野上下推重商务的背景下，商人逐渐摆脱了由专制压抑造成的卑屈心理，敢于昂首挺胸，堂堂正正地捍卫自己的“末业”。清政府为了偿还巨额外债赔款和推行新政，千方百计大规模搜刮民脂民膏，社会经济陷入超负荷运转的恶性循环，城镇商民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国际金银比价的大幅波动，更使得普遍用钱的中国民众失去银贱钱贵的便利，所谓同光中兴的社会恢复平稳期宣告结束，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进入下行期。生计日趋艰辛的城乡民众，还要增加巨额外债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各种负担，无疑是雪上加霜。

1900年11月，广州城厢商民反对抽收房捐办巡警，罢市两天，封锁街道，要求自捐自卫。地方官多方托人调解，并表示愿意“俯顺舆情”[\[16\]](#)，商人才重新开市。此后，罢市斗争高潮迭起，大致情形有如下表。

清末罢市分布发展表[\[17\]](#)

年份 省份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总计
江苏		2	2	12	6	3	4	1	6	3	6	45
广东			4	6	6	1		5	1		1	24
浙江		1	1	1	4	1	3	5	1	1	4	22
福建		7	1	2	2			3	2			17
安徽		3	1	1	4	4		2		2		17
湖北		2		2	1	2		2				9
四川	1			2	2	1			1	3	1	11
广西			2	1	2		1	1		1		8
江西			1	1		1		3			1	7
湖南				1			1	2			3	7
河南			1	2						1	3	7
上海		1			2				1	1	1	6
直隶		1			1	1	1	1		1		6
山东	1						1	2		1		5
奉天	1							2	1	1		5
北京	1							1				2
陕西											2	2
贵州											1	1
山西											1	1
吉林										1		1
总计（年）	4	17	13	31	30	14	11	30	13	16	24	207

城镇商民罢市的直接导因和类型有如下几种：

其一，反抗清政府的横征暴敛，维护自身权益。因抗捐而起的罢市达106起，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时间愈早，这类罢市的比例愈大。辛亥时期加诸商民身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如福建有房捐、坐贾捐、随粮捐、水仙花捐、水果捐、工浆捐、猪牙捐、洋烟膏捐、酒捐、糖捐、纸捐、豆饼捐、砖瓦捐、柴捐、鱼网捐等数十

种。^[18]奉天仅巡警经费一项，就花样翻新，不一而足，“曰斗捐，曰卫生房捐，曰妓捐，曰戏捐，曰人力车捐，曰屠兽场捐，曰杂捐，竭泽而渔，罗掘已空，今又加收房捐百抽三五”^[19]。变革图强的新政举措实际上成了虐民的酷政。

不仅如此，局卡官吏还层层贪污勒索。据报纸揭露，湖北厘金自张之洞奏改统捐后，“法久弊生，防之愈密，犯之愈巧。近来一般钻营厘捐之徒，盘踞省垣，探悉某员奉委某捐局，即极力运动，或以数百金谋充稽查分卡，或以百余金谋充大票管钱各司事，下至量手、炮勇各役，亦非五十金不可得”。“各司巡既由金钱而来，其抵差也，遂专守金钱主义，留难需索，讹诈百端……控告舞弊之案，层见叠出。”^[20]

一些奸商劣绅与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承包捐税，刻剥商民，从中渔利，无所不用其极。如广西统捐，信封每百个税银五分，布袜每双税银一钱，毛边纸每百张税银六钱，“核其税项，几倍原价，可谓酷矣”^[21]。扬州捐局，“无论肩挑驴驼车载，凡系货物，一概抽捐，甚至于粪桶菜担亦勒认捐每担十文五文不等”^[22]。大沽渔业分局，“既捐鱼户，复捐鱼店，又捐肩挑小贩。鱼捐之外，又有船捐，正捐之外，又有规费，种种苛勒”^[23]。这使得本来已经步履艰难的商业活动更加困难重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停滞萎缩的现象。广东佛山在咸同年间有屠户86家，到1903年仅存51家，其中30余家只能每日宰猪一头。^[24]在财产生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商民不得不起而反抗。正如1908年奉天罢市时有人慨然所论：“小民之脂膏有限，而官家之征求无穷，此奉省垣商民之所以抗捐者。”^[25]

其二，商民群体意识的增长及其社会主体意识的提高。城镇商民与大众传播媒介的联系密切，普遍受到20世纪兴起的民主思潮的影响，接受了进步知识先驱们所宣传的国民为国家主体的思想。加之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使这一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已在城市中取得人数对比和经济优势的商民，逐渐要求摆脱地方官吏乃至专制皇权的政治压制，真正确立其社会主体地位，名副其实地成为城镇的主人。这种观念当时被人们称为“爱市心”，主张大力鼓吹培养，“使知本身居住之市，本身即为其主人之一部；又使知此市之经营，即为居住此市者之责任，而全市之利害与一身之利害有若何密切之关系”，“使市民感觉共同生活之可爱而不可缺”^[26]。正是由于主体意识占据商民的脑海，他们不能继续对长期以来朝廷官府侵犯其利益、侮辱其人格的态

度与行为逆来顺受。广大商民能够从维护团体的利益出发举行罢市，表明其群体意识的觉醒。此外，商民抗税往往遭到镇压，为了反抗暴政，他们也举行罢市。其斗争目标除了经济要求以外，还附带反对压迫的政治条件。这类罢市共有57次，且时间愈晚，频率越高，显示出城镇商民罢市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

其三，反对列强在华殖民势力。清末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地，罢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镇商民反侵略的态度。他们一方面反对洋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横行跋扈，如1908年青岛、福州罢市，反对殖民当局增加捐税，讹诈华商；1905—1911年上海租界四次罢市和1908、1911年汉口的两次罢市，则是抗议殖民者侵犯中国主权，侮辱伤害中国百姓。另一方面，他们反对海关洋员歧视华商和官府崇洋媚外，如1905年厦门、1909年广东海口和1910年吉林珲春因海关“每欺内商之莫于较，而畏外商之将兴事”^[27]，商民举办罢市，聚众毁关。1905年吴淞高桥镇派捐办团练，惟教民得免，商民不满而罢市。这些行动显示了城镇商民民族意识的增长。不过，列强对中国商业的控制主要通过金融和外贸来实现，在内地直接经商者较少。据1903年统计，在华洋商共19042人，商店1287家。^[28]面对广阔的国内市场，华商与洋商的矛盾不很突出，因此直接反对洋商的罢市较为少见。

其四，商界与其他各界的利益冲突。商人与其他市民既有社会利益的一致，又存在小群体利益的矛盾，为了集团私利，他们有时也会诉诸罢市。1910年安徽南陵县因灾荒米粮腾贵，绅学界主张禁米出口，而商人反对，激起市民众怒，围攻商界代表。商界遂全城罢市，要求官绅承担禁运造成的损失。其他市民则联合四乡农民，迫令商人开市并打毁商店，哄砸商会。当然，这种冲突只是极个别的例外。

其五，反对征收鸦片捐。因征收土膏（即鸦片）捐而起的罢市有12次，其社会背景十分复杂。一般说来，烟馆、烟铺、土膏店主很难算作正经商人，一些地方的商会明确拒绝他们参与组织及活动。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烟商在市民社会中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如扬州城内大小烟铺不下二三千家^[29]，吸户分布于各个阶层。烟贩获利甚丰，成为清政府敛财的重要对象。1902年仅福建一省的洋烟膏捐即达20余万两，成为税收大项。清政府以禁烟为名，行加税之实，牵动了整个商民社会的利益。在抗税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烟铺的抗捐罢市往往得到商民的支持。不少地方的商会也接纳烟商。1909年江宁土商因英印、德、法人设栈卖土，官府置

若罔闻，举行罢市，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含有抵制外来势力的意向。

罢市的主要领导者是商人或绅商。他们以商会、会馆、会所为核心，通过集会、鸣锣示警、刊发传单等方式进行组织发动，因而一旦罢市，全城响应，少数动摇观望者在有组织地劝惩之下，也不得不顺从大势。据不完全的报道统计，全国范围明确记载由商民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发动的罢市达40余次，大大增强了罢市斗争的坚定性与持久性。1911年开封罢市时，商会集会并发布传单，宣称：“此为合城之事，无论何界，倘有一家不遵者，合城群力反对之，并责其代缴全省之月捐。”^[30]全城一致行动，加上城市的中心地位，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震动。一般城镇罢市，直接影响当地城乡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交通干线上大商埠的罢市，更牵动着广大区域的社会经济运行，并威胁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各级官吏往往不得不以“顺从民情”的妥协退让来平息风潮。

罢市的主体是属于中小商人的铺商和摊贩，与流动转运商多采取聚众抢关过卡的冲突形式明显有别，显示出城镇商业人口的稳定对罢市斗争的普遍高涨具有决定意义。没有由流动商转为固定铺户的结构变化，使商民在城镇取得相对优势，罢市就不可能成为商民广泛而持续使用的有效手段。

罢市还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反响。除少数奸商劣绅外，士绅一般采取同情或中立态度。后者既是地方官赖以调解转圜的中介，又是商民转达要求的喉舌。在不少地方，由于绅董拒绝出面调停，使官方被迫让步，甚至全盘接受商民的要求。以工人、手工业者为主的城镇贫民是罢市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在经济上对商人有所依附，且利害相关，“商困民更困”，生活更不稳定，社会地位也更加低下，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而商人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以保护人的姿态维护其他市民的权益。触发罢市的事件中，有时直接受害者是一般贫民，商人发动罢市，正是为了捍卫市民的整体尊严及其作为市民代表的地位。商人还与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山西蒲州商人，“无一家无田地”，“商界即该县之农界巨擘也”。^[31]因为反对加派亩捐，抽收自治经费，商民也一律罢市。

商民的广泛社会联系使罢市得到各阶层民众的声援和响应。1905年直隶大沽罢市，“所有铁路、驳船等公局暨各局厂作工之人亦一律罢工”^[32]。1909年福建海澄县反对抽收米捐，“商界全体罢市，学界

全体罢课”^[33]。1911年陕西临潼县摊派亩捐过重，“乡农罢耕，商家罢市”^[34]。有时个别买办也表示同情。1911年上海租界罢市时，柏德洋行买办李某于门前挂牌一面，“上书谓因求减房租而华商大众罢市，系为公益起见。本行虽外人所开，深敬公共之热心毅力”^[35]。罢市对于推动各阶层民众汇聚联合的趋势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加罢市的社会各阶层态度不尽相同。富商大贾受捐税之苦甚重，他们希望通过罢市减免捐税，但又担心罢市引起的动乱危及其生命财产和商业利益，因而一般不主张轻易采取这一激烈手段。1905年上海宁波帮工人周生有被俄国水兵杀害，“工党均愿停工罢市”^[36]，“而公所绅董，皆以达官拥厚资，沪上一隅，所营之业甚众。知一旦宁人罢市，则所失必多，乃托保全治安之名，以阻止宁人之罢市”^[37]。不过，大商贾实力雄厚，社会号召力强，其态度直接影响着罢市的成败。中小商人及城市贫民反抗性较强，其态度对商董们有感染推动作用。面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和日甚一日的内忧外患，商人尽管有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弱点，仍不断掀起罢市斗争的风潮，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已经不能而且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意愿，而罢市正是他们反抗情绪的重要宣泄形式。

三 罢市的效应与趋向

罢市在皇权帝制统治的中心展开，破坏了专制国家机器的运转。经济崩溃是政权覆亡的前奏，罢市不仅抵制了统治者的虐民政策，而且使其连原来的常规性收入也无法维持，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针对举办新政而增加捐税的罢市，又破坏了清政府调整统治机器以求苟延残喘的企图，加速了它的垮台。罢市不仅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奸商劣绅，维护了商民的正当权益，还有效地削弱了清政府的权威，暴露其虚弱本质。一地罢市，那里的大小官吏不得不步行挨家挨户央告商民开市，名为劝谕，实则乞求，还往往被拒于门外。许多地方官吏在风潮的冲击之下，或抱头鼠窜，或龟缩不出，狼狈万状。这有助于商民摆脱卑屈心理，增强自信心和团结力，敢于同心协力地公开与官府对抗。当皇权官势威风扫地，父官子民的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商民转而凭借自身实力以真正确立其社会主人地位时，清王朝的寿终正寝便为时不远了。

罢市风潮广泛冲击了既有的统治秩序。上海、汉口、盛京等大城市罢市，动逾数千家，万众一心，声势浩大。中小城镇的罢市也颇具声势。1906年山东潍县酒商罢市，更持续年余，最终迫使知县取消所增税额。1911年陕西商民反对布政使余诚格借办统捐为名大肆搜刮，在商务总会的主持下，全省停贸抗捐，持续两个多月。当余诚格被赶下台之日，商民于藩署照壁大书“驱逐民贼回肇窠”的标语，并沿途追踪痛骂。一卖酒小贩头戴白巾，“当街焚化纸钱，大呼‘送瘟鬼！送瘟鬼！’”^[38]

由于罢市风潮的宏大气势和广泛反响，各级官吏以及与之狼狈为奸的顽固势力欲惩无力，欲罢不能，惊恐万状，束手无策。山东潍县罢市后，官绅策划对付办法，“聚议至暮，意见纷歧，卒未得完全之策”。县令与肇祸劣绅“主张以兵力制乱；且谓所有各捐决不可听商民之求，即行裁免。此风一长，则官绅之权失，必自退于失败地位。故宁可以兵力胁之，使其不反抗，决不能俯如其请，以倡刁风”^[39]。官绅敏感地察觉到，退让将导致力量对比变化和权力削弱，对自己的地位乃至整个统治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害怕罢市的冲击，更畏惧由此带来商民势力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使自身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力。正当官绅争论不休之际，商民们祭出了近代世界各国新兴资产阶级战胜统治者和旧势力的法宝，聚集数万人到劣绅所开钱庄挤兑纸币，迫使官绅低头。历来被官绅贵族鄙视的商民，成了统治势力睡榻之侧的心腹大患。

罢市风潮不仅使各级官吏终日惶恐不安，还震动了最高统治层。早在1904年就有人奏报：“近来各省闹捐罢市之事屡见迭出”，担心“民间激变为匪，迁怒教堂，酿成巨祸”，建议“分别富瘠，酌量停捐”^[40]。1907年，农工商部会同民政部提出颁行禁止铺商相集齐行罢市的禁令，规定：“无论如何不得罢市。虽有最大委屈，亦当由地方官设法办理。”^[41]然而，如果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的统治者只能凭借暴力进行社会控制，而不能协调、维护和代表各阶层的利益，很难使其统治术行之有效。就在禁令颁行的第二年，罢市风潮便再度高涨，打破了清政府重整统治秩序的梦想。

罢市在时代环境、社会基础、斗争形式及发展方向等方面与民变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主要体现了商人变化程度的加深，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显示出他们在与官府朝廷的对抗中，已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作为市民的代表和领导者的形象出现。

前列罢市时空分布发展表显示，清末商民罢市的频率变化，不是一般性地表现民众与清王朝的矛盾冲突，而是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新兴势力与统治者矛盾的发展变化。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后，新兴势力对清王朝颀预守旧，造成国家民族陷于灭顶之灾的胡作非为极其愤怒，反清情绪普遍滋长，学界风潮和反帝爱国运动高潮迭起，罢市风潮出现第一次高涨局面。

1905年，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做出预备立宪姿态，以后又宣布要“仿行宪政”，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国内绅商。加上第一阶段的情绪高涨，受亡国危机刺激的影响较大，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抵制美货风潮过后，国内政局一度呈现相对平稳态势，罢市也跌入低谷。不久，江浙铁路风潮震动全国，国会请愿风声渐起，立宪派与清政府的关系复趋紧张。恰在此时，专擅朝政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连死去，统治集团失去权力重心，动摇涣散，社会上不满和不安情绪充斥，罢市出现第二次高潮。

当朝执政的变动及其加快宪政准备步伐的种种姿态，使得不少立宪派头面人物乃至一般绅商幻象重生，或心存希冀，或暂时观望，罢市风潮随之再度趋缓。可惜好景不长，国会请愿屡次碰壁，最终落得个极端专制的皇族内阁，立宪派纷纷弃清廷而去；铁路国有政策的实施更直接威胁着全体商民的命脉，于是罢市斗争再掀高潮。

当然，罢市的直接导因十分复杂，但商民采取何种形式维护自己的利益，总要受到社会氛围和群体心理的制约。在社会矛盾激化，群体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高涨之时，他们更容易诉诸罢市这类较为激烈的斗争形式。将罢市与同期一般民变相比较，反差更为明显。特别是在1906—1907年和1909—1910年罢市两次低潮期，民变反而呈现迅猛上升的势头。

清季罢市民变对照表[42]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罢市	17	13	31	30	14	12	29	15	16	26
民变	59	32	56	67	170	157	74	131	234	102

由此可见，罢市不仅处于人民大众与清政府矛盾的总体制约之下，而且比较直接地显示了立宪派等趋新势力的政治动向。罢市在各

地出现频率的高低，也大体与当地商人的变化程度及其在城镇势力的增长以及绅商新式社团的政治态度相吻合。

当然，商人的变化依行业、地区、层次的不同而各异，他们身上或多或少保留着四民社会的痕迹，使得罢市与民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人在罢市中一般只有直接的经济要求和少量局部性社会要求，未能提出反映群体利益的一般性纲领。罢市多属偶然触发，随起随散，带有浓重的自发斗争色彩。尽管偶然性也受制于必然性，毕竟只是行业、地方利益的体现。大批城市贫民甚至乡民的加入附和，扩大了罢市的社会基础和声势，使之具有更强的冲击力，但也增加了流于民变的可能性。个别罢市并非由商人发动，而是下层民众为了特定目的胁迫商人关门。至于因民变而导致的闭市，则是被动反应；汉口等地店伙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市，实为罢工，不应列入罢市范畴。

罢市隐伏的民变潜流，使得统治者投鼠忌器，不敢随意镇压。但斗争行列的扩大也意味着成分的复杂。游民无产者等社会破坏因素有时会被顽固势力所利用。一些罢市转为民变后，在冲击官府、教堂的同时，也以学堂等新兴设施为破坏对象，酿成毁学风潮。清末各种社会势力和矛盾盘根错节，爆发于城市的罢市，更集中体现了这种错综复杂性。下层民众反对新政设施，既有反抗暴政的正义性，同时又夹杂着愚昧落后性，因此受到趋新势力的批评。无论是民变引起的闭市，还是罢市导致的民变，都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后者的否定。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二者的不同性质。当事官吏为了寻找口实压制或卸责，夸大罢市的民变色彩，加上鄙视商民的传统观念作祟，使人们容易将罢市混同于一般民变，而忽视了二者的根本差异。

正确区分罢市与民变的性质，有助于深入认识旧式民众的自发反抗向新兴势力领导的自觉斗争过渡转化的历史进程。

民变无法自我寻找出路通道，并非罢市斗争的主导趋势。相反，作为领导者的趋新势力的各个层次，出于不同的动机，总是力图防止罢市滑向民变的死路。罢市使趋新势力的政治代表们精神为之一振，他们虽然不满于罢市的自发性以及流于民变的破坏性，但罢市所显示出来的城镇商民日益增长的实力、高涨的斗争情绪以及统治者进退维谷的窘态，使他们看到了罢市作为实现政治诉求有力手段的强大作用，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动罢市以进行政治斗争。在保路运动中，罢市终于成为各地商民与清王朝展开殊死决斗的强有力手段。

罢市猛烈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但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与专制统治的矛盾。因缘古代城镇延续，外国殖民势力入侵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城市，具有专制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帝国主义侵略和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枢纽，以及近代新兴经济和新兴社会势力的活动基地这样三位一体的性质。趋新势力人数虽少，但集中于城镇，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能够左右其他市民。经过包括罢市在内的斗争洗礼，城镇商民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联合各阶层民众，将旧式自发斗争逐渐纳入趋新势力领导的自觉斗争的轨道，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能量，在城镇取得对旧势力的相对优势，并把城镇所具有的连环辐射作用注入政治斗争，从而影响全国政局，达到推翻专制皇权的目的。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趋新势力引导的民众与统治者在城镇展开的殊死较量，而罢市正是这种较量的重要形式。当然，近代中国并未改变农耕经济的主体地位，商民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绝对人口少，而且仍然带有明显的四民色彩。罢市虽然越来越多地提出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大都还存在将矛头仅仅指向具体对立者的局限，商民的斗争不能从根本上瓦解专制统治的基础，它动摇了矗立其上的皇权帝制，却被其残余扼住脖子，在劫难逃。

[1] 《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附清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8页。

[2] 《江宁商店总数表》，《商务官报》第10期。

[3] 徐焕斗：《汉口小志·商务志》。

[4] 《法库门归客谈》，《中国日报》1907年3月29日。

[5] 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报》第12期。

[6]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中国文化》第1辑。

[7] 《张家口生产各货情形》，《商务官报》第6期。

[8] 杨荫杭：《汉口商帮之大势》，《商务官报》第20期。

[9] 《营口商捐清数》，《大公报》1902年6月30日。

[10] 徐焕斗：《汉口小志·商务志》。

[11] 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报》，第12期。

[12] 郭正忠：《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13]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14] 毛祥麟：《墨余录》卷14，《户捐》。

[15] 《重庆罢市原因》，《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1日。

[16] 《城厢罢市》、《罢市余闻》，《中国旬报》第28期，1900年11月6日。

[17] 资料来源：据《中国日报》、《大公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安徽俗话报》、《东方杂志》、《盛京时报》，《中外日报》，《汇报》、《时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的报导记载，1911年统计到10月止。

[18] 《详志全闽捐务》，《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19] 《罢市之感言》，《盛京时报》1908年10月11日。

[20] 《统捐之积弊》，《民立报》1911年6月10日。

[21] 《续纪西省罢市》，《中国日报》1904年3月18日。

[22] 《抗捐罢市述要》，《苏报》1903年5月12日。

[23] 《大沽罢市始末记》，《大公报》1906年3月12日。

[24] 《剥民新历史》，《国民日报》1903年8月12日。

[25] 《罢市乏感言》，《盛京时报》1908年10月11日

[26] 《爱市心之培养》，《大公报》1907年4月7日。

[27] 《珲春罢市大风潮》，《盛京时报》1910年3月16日。

[28] 《内地各埠外国商人及商店额数》，《游学译编》第4册。

[29] 《抗捐罢市》，《警钟日报》1904年3月7日。

[30] 《开封罢市始末记》，《民立报》1911年9月17日。

[31] 《蒲州罢市之原因》，《大公报》1911年10月16日。

[32] 《大沽罢市始末记》，《大公报》1906年3月12日。

[33] 《海澄抽收米捐之风潮》，《大公报》1906年3月29日。

[34] 《临潼罢市之风潮》，《大公报》1911年8月29日。

[35] 《减租罢市风潮记》，《民立报》1911年1月8日。

[36]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东电》，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261页。

[37] 《宁波人太无公德》，《警钟日报》1905年1月21日。

[38] 《余诚格滚出长安》，《民立报》1911年3月20日。

[39] 《潍县酿成罢市风潮》，《盛京时报》1910年8月9日。

[40] 《奏请电飭各省酌量停捐》，《大公报》1904年11月3日。

[41] 《议禁铺商罢市》，《中国日报》1907年3月26日。

[42] 张振鹤，丁原英辑：《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包括抢米、抗租税、毁学、兵变、暴动、教案等，不合学潮和爱国革命运动。

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

民国肇建，已经百年，关于民国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可是如果以1920年代起步的革命史研究为开端，也有将近80年。而实录性的《中华民国大事记》（天笑生编）和《中华民国开国史》（谷钟秀著），更是早在1912、1914年已经出版。此后陆续编著出版的中华民国通史、分期史或各种专史，林林总总。1950年代以来，较为严谨深入的学院式研究论著，也不在少数。可是，受到史料繁多、史事复杂和观念局限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关于民国肇建时期的历史，仍有许多解读不当甚至尚未认识的基本事实。仅举开国前后有关民国肇建具有历史和逻辑联系的若干问题，可见对于辛亥政权鼎革的历史进程的认识，某种程度上还是一本糊涂账的乱象。

一 逊位还是退位

受到张勋复辟、驱逐清帝出宫、国民革命以及国共内战等历史事件的影响，对清季民初的政权鼎革用了后来国共两党大体相近的革命史观重新审视，确有与当时的时势不同的解读。不过，当时派系林立的各种政治势力各有所图，相关历史的认识也不可依据某一方面的记述一概而论。例如与民国肇建密切关联的清皇室结束统治权的名目，南北各方就先后使用过退位、逊位、让位、辞位、去位、致政、归政、还政等多种说法，有时同一方甚至同一人兼用数说，有时则一种说法各方混用。但仔细揣摩，在看似随意或杂乱无章之下，各种说法的不同，还是多少反映出各方态度的差异以及历史本相的变化。

最早提出让清皇室交出统治权设想的，应是张謇等人。1911年11月上旬，鉴于各省风从响应武昌首义，原来的立宪派张謇等人转变立场，赞成共和，并连续召开会议，磋商筹备设立中华民国新政府，并

以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所在地和临时国会召集地。参与发起者除张謇（苏）外，还有樊增祥（鄂）、宋教仁（湘）、于右任（陕）、夏敬观（赣）、唐文治（苏）、赵凤昌（苏）、庄蕴宽（苏）、汤寿潜（浙）、张元济（浙）、姚梧冈（浙）、江易园（皖）、高梦旦（闽）、伍廷芳（粤）、温炳臣（粤）、汤寿彤（黔）、程德全（蜀）、王搏沙（豫）。名单虽然有张大声势之嫌，毕竟包括各省各方人士，不限于立宪党人。

11月11日，上述诸人联名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主张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临时会议机关，商定共和政治，会议四要件之一，即为“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次日，张謇等人又奏请监国载沣赞成共和，宣称“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同时致函庆亲王奕劻，告以已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希望奕劻“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与民享共和之幸福，则皇室不失尊荣，生灵得免于涂炭”。^[1]

南北和谈期间，曾参与上述活动的伍廷芳成为南方总代表，他于第二次会议时首先提出逊位之说，并称前此已和汤、程、张各都督致电摄政王，只请逊位。而会谈期间又间杂使用让位一词。伍廷芳致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及独立各省的正式电文一般均称退位，但在1912年2月6日复袁世凯电时，则标题和正文混用逊位、退位。如标题为“关于皇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行文开头称“清帝退位之后”，各款行文又说“清帝逊位之后”。同日伍廷芳致电孙文、各国务总长、参议院议长，也称“逊位之后”。2月9日伍廷芳致电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则混用退位、去位。此后，伍廷芳对北方将领及袁世凯所发函电，多用逊位。而对南方政府及各省光复政权，则主要用辞位。如2月13日致孙文等电，用辞位。2月17日致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专论此事，多处提及，全用辞位。但其他致孙文各电，仍有间用逊位或退位的情形。^[2]由此可见，伍廷芳在面对态度各异的各方之时，已经逐渐意识到用词意涵的差别给予对方的感受，只是尚不能严格区分。

虽然张謇等人向奕劻提出逊位之说时，确有希望清帝仿效尧舜揖让之意，作为南方谈判代表的伍廷芳与南方通函通电中沿用逊位一词，未必全都含有禅让之意。但是，北方如全国联合进行会、临时国民公会、宪政实进会等却有此理解，并且表示反对。他们的意见是，资政院决定采用英国宪法，“是直谓共和立宪可矣”。官军争持君主立宪，致使国民怀疑清廷有反汉之心，“于是取极端主义，而禅让之说起。夫禅让之说，固天子荐贤自代之意，非臣下所宜言”^[3]。实际上，袁世凯或许不无对清朝的臣节，更多的还是对自己权力来源的考量。权衡利弊，他宁可让失去权力的清室担些虚名，以免受南方政府的约束钳制。袁世凯利用清廷，旨在抵挡革命党的同时，也有承继大统的美誉，尤其是另行组建政府的便利。面对清室，他绝不以禅让的尧舜视之。或许正因为清室已经没有力量，袁世凯才会与之藕断丝连。

清廷方面，尽管失去统治权已经是既成事实，但是对于涉及名分、体面以及待遇之事，仍然想方设法力争有利于己的条件。关于宣布交出统治权的诏书的具体措辞，到了最后关头，清廷还想使用辞政的名义。几经周折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达成协议的唐绍仪以为，辞位才能享有优待，若辞政，则宣布十九信条，清廷即已经无政权，光复独立的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请袁世凯入觐时必须力持办到辞位二字。^[4]正式发表的隆裕太后懿旨，刻意回避争议，只是说：“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但卸政权，不废尊号。”而清方公布的清室优待条件，则一律使用辞位的名目。^[5]可见袁世凯的确将唐绍仪的意思传达给了清廷，并且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在此期间，媒体和社团，一般而言多混用各种说法，但也有特别在意而排斥逊位之说者，如激进青年和社会党。关注时局变化的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绍钧就坚决反对优待清室，并从法理和时势的角度对逊位说表示严重质疑，认为“以君主而加于人之上，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岂以巨数金钱，作其甘心退之报酬乎？更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则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巩斯民国耳”。在他看来，逊位说的要害

正是混淆了新生共和政权权力基础的应有之义，使得国体变更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

关于逊位之说，叶绍钧与兴盛一时的社会党共鸣最多。社会党人对于议和之事及其内容极为不满，并在苏州专门开会讨论。会上陈翼龙发言，指清帝逊位予以优待、袁世凯统辖北方等事，决非南京参议院中少数人可取决而实行之，“必待其逊位，是仿佛待命于清帝，而民国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动矣。清帝既为君主，则即为民生之恶魔。试问有出巨资以优待恶魔者乎？况其资皆出之于民者也，试问民生果愿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孙中山、袁世凯或第三人为大总统，“当合全国国民之公意而定之”，决不能即由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鉴于事关全体国民，陈翼龙提议派人到上海，联合《天铎报》发起的国事纠正会，掌握实据，逐条驳斥，广泛宣传，“必至修正议和条件而止”，获得到场者的一致赞成。

社会党人力图颠覆清帝逊位说，旨在剥夺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进而问鼎大位的合法性。到场听会的叶绍钧于是大发感慨，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虽然用心良苦，“而孰知南人之心有大不服袁世凯者乎？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要求优待，要求厚礼，无非以示自己之威耳；今果堕其术中，又复莫之奈何，乃多方运动，使之任总统之职。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灰烬，乃其结果则为不三不四之和议，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更可恶者则为参议院，选举而可预先约通，则何必选举哉？此中人大半皆清廷政界走狗，今则改面易目，居然民国议员，可鄙！于此一思，令热心人长灰心之念”。其说指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目的是示自己之威，以一个中学生的眼光而言，极具洞见。

沿着反袁的路径，社会党人继续穷追不舍。2月18日，苏州的社会党举行党员大会，在上海办《社会日报》的刘铁民发表演说：“言袁世凯之必不能为吾民造福，而苟就今日之大势以遽已，则所谓共和非真共和，第二次革命在指顾间耳。”语至痛切，与会者百余人皆鼓掌不止。该党议决反对袁世凯为总统的进行办法，分别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一为直接表明反对之意，二为请设法挽救。叶绍钧认为发电肯定无效，“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于死，再则运动军队及全国同胞以解散现今之参议院，更由全国人民公举议员以举定大总统”。如

果参议院另举不适当者为总统，第二次革命仍然在所难免。^[6]取消袁世凯接掌大位的当然性，就从根本上斩断了清帝逊位交权的法理作用。

二 帝制与共和

迫使清帝辞位，主要是为了解决帝制与共和的不可调和，使中国从帝国时代进入民国时代，而民国时代的政治架构是民主共和。自从孙中山1897年提出共和主义适宜中国，以及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宣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7]以来，帝制与共和就成为截然对立的范畴，当时的革命党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好作非此即彼的认识，判定帝制与共和天然就是水火不容，绝对不可能熔于一炉。邹容的《革命军》提出中华共和国的崭新政体，就是要在推翻专制政体之后，建立民主自由之国。

整体而言，完全用革命的观念考察清季民初的政权鼎革，其实是国民革命以后所认定的革命党人的政治正确看法。而在清季民初国体变更之际，尽管各方态度认识不一，逊清皇室与民国政府之间存在形式上的退位和优待关系。因此，即便视为改朝换代，与明末清初王朝兴替的情形也有着很大分别。除了满汉关系易位，对于多数的汉人而论，接受异族入主中原难，弃之而去相对较易外，在国体变更进程中，即使共和与帝制形式上并存共生，在朝野上下看来也并非绝无可能。据说南北议和期间清方就设想过改国号为中华联邦共和国，大清皇帝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国王，属宪法上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同时设大总统，由议会公选，总揽行政权。国王与大总统待遇同等，前者世袭，后者任期四年。^[8]这样一种共和君宪混合体制在今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当时朝野各方并非一概认为是天方夜谭，只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一些激进人士坚决反对。在后者的观念中，源自欧美的共和与帝制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两极，这与一般人夹杂共和古典本意的理解大相径庭。所以康梁等人主张用“虚君共和”的设想来解南北之争的套，在南北和谈期间一度甚嚣尘上。今人如果只是循着革命党人的认识来看待辛亥时期的体制政争，要想理解各方到位，自然难以恰当妥帖。

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想法如出一辙，有人还提出了“帝国共和主义”的理念和具体建置方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李离，临时国民公会代表朱通儒、刘振源，宪政实进会代表宋育仁、于邦华等呈文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认为南北和议因为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政体有待国会公决而面临破裂，甚属非计，要求宣布帝国共和，以巩固皇室。在他们看来，南北虽然都有和平解决之心，可是政治学说不明，无法摆脱君主共和非此即彼的取舍抉择。“夫大权操之于一人，是谓君主立宪，日本、俄罗斯是也。大权操于议会，是谓共和立宪，德意志、英吉利是也。至于法兰西、美利坚二国，近人译曰民主，曰合众。谓为共和政体之一种则可，谓为共和政体之概则，则不可。若但言共和二字，则不在有世袭之君位与无世袭之君位明矣。此从法理上解释而绝无疑义者也。”

清季国人好以个人所知局部个别的西学为一般通则，由于各自所本不同，因而凡事往往要争个你死我活。上述号称绝无疑义的解释，当然也是不无可议，甚至在一些人看来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可是这样的说法是否合乎法理通则，另当别论，至少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所谓深入人心的“共和”观念或思想，其实还是一个概念，各自表述，而且所表述的意思相去甚远。本着调和帝制与共和在观念和政治上截然对立的主旨，呈文者中有人“尝旁考列邦政体，原本信条，折衷乎英法之间，提倡帝国共和主义。拟尊皇帝为大圣皇，宣布共和政体，召集国会，公举大统领；草拟宪法，实行共和立宪。以冀早定国体而息政争”。

从法理、领土、国教、种族、党派、文义等六方面，呈文者详细阐述了实行帝国共和主义既适合于中国当日情势又有助于学理发展和体制设置的重大理由，宣称：“此六大问题既完全解决，其余纪元问题、国号问题、首都问题，皆可以国会公意决之。总之，此帝国共和四字，成一完全独立主义，各方面均弥满无憾，非迁就两可之间为调停计也。”例如从法理上看，君主立宪政体有三原则，一、君主不负责任；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三、君主不能为恶。可是颁布法令概以君主名义，不可说绝对无责任。所谓由国务大臣代负责任，不知是对君主还是人民负责。若对君主，则行政失当，君主亦有责任；若对人民，则拒绝副署，又未免侵犯神圣。“学者于此等理论苦无确当定义。今以政权完全付之大统领，则元首不过一特别阶级，为全国瞻望。而一切宗教、典祀、封号皆以至高之元首为之，可以为善，不能为恶。将来政体上发明最简当之定义，我国政治史有特别光荣矣。”

[\[9\]](#)照此看来，帝国共和主义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时势所急需，而且能够为世界提供政治学说及体制设计的新典范，绝非一时权宜之计的杂烩拼盘。

关于“帝国共和”的主张，全国联合进行会等会的“会员等日夜研究，往复相商，意见相同”，并据此原则拟订条件，提请袁世凯与南方和谈代表协商订约，奏请施行。所订具体条文为：大圣皇世世承袭，于政治上无责任，以保持尊严；于中国各教有封号之权；于全国人民忠孝节义及慈善等事有表彰荣誉之权；皇室经费以宪法定之；皇室私产不得侵犯；王公世爵皆仍其旧。大总统由国会公举；任期由宪法定之；法律规定有全国统治权；于政治负完全责任。并且规定了大圣皇与大总统交际的礼仪、行文、名誉权限等事项。其设置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理念大体一致。在他们看来，“如此，则国体问题完全解决，不惟两宫与维多利亚比隆，即宫保亦与华盛顿争烈矣”[\[10\]](#)。

或者循着诸如此类的观念，以清朝为正统，评议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以及袁世凯组成统一民国政府的正当性。此说虽然后见，却不见得高明。姑不论革命就是要破除旧法统，建立新法统，即使以袁世凯而论，虽然他后来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权力来源与清朝正统相联系，但其目的只是避免与南方国民党政府有牵扯。实际上，南北和谈时南方国民党划定的唯一前提就是承认共和，否则免谈。袁世凯一番作态之后，被迫接受以共和为先决条件，以便从清廷手中接管政权。既然接受这一前提，等于把清王朝排斥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考量之外，从而将清朝的正统性连根拔起。袁世凯接受共和，看似情非得已，其实不无自己的盘算。继续帝制，即使立宪，实行责任内阁，他也不过是政府首脑，而非国家元首。况且清朝的各种势力对其仍然有所掣肘，即便当上内阁总理，也不可能随心所欲，远不如做大总统称心如意。只是在清王朝的大统已绝，失去继续掌握国家权力的资格之后，袁世凯才利用这副空架子的所谓正统来抵消南方国民党欲强加于他的种种限制。

不仅如此，虽然袁世凯力图淡化统一民国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联系，毕竟要按照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决的各项议案行事，包括组织统一政府的各项事宜。他千方百计地逐渐改变，却不能一口否定。也就是说，尽管袁世凯百般不情愿，还是斩不断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联系，这也等于承认后者的正当性、合法性乃至具有民国的新法统地位。

民党方面的态度与后来也有所不同。接受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正式总统，在激进人士看来只是私相授受，与民国总统应由国民公举的法理不合。可是南方的民党领袖们迫于时势，虽然对袁世凯掌权颇多疑虑，对于清廷退位和平实现国体变更和权力转移，还是有所期待，在一段时间里并不觉得悲观。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上，在原来清朝的京师如今民国的首都会见各方人士，与逊清王朝的成员如摄政王载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世续等有所交游。八月初一（9月11日，《民立报》记为10日）晚，皇族亲贵（醇亲王、世续等）公宴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绍英亦出席作陪。贝子溥伦代表皇族演说，以表皇族开会欢迎之意，略谓从来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孙中山先生之谓乎？今改数千年专制政体而为共和，固由孙中山先生及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无私、以天下之政权公诸天下。惟自改变共和政体以来，而天下事变愈亟。语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后政治日进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优待之荣，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均惟诸位先生是望云云。说毕又云：余今日得见诸位先生，至为光荣，举酒愿祝诸位身体健康。同座均鼓掌。

随后，孙中山请黄兴致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11]曾经的死敌能够如此交流，虽然言词暗含机锋，却显示和谈的结局未必是最佳结果，不过各方尚可妥协，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避免流血瓜分，而且对于新的共和局面，都有所期待。只是后来局势的发展，恰好应验了各自的担忧，一些人的不幸而言中成了正确的预见，给了人们充分反省的空间。

辛亥政权鼎革之际，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清王朝当政统治的正当性备受质疑，所谓正统性，连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清朝官员也并不着力坚持。他们只是希望给交出政权的清皇室较好的待遇。不过，民国肇建之后，替代君权神授的国民公举始终没有从制度上落到实处，因而历届政府都未能获得国民的普遍认同。权力来源不清，自然导致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胡适曾与美国人类学家洛克谈及中日国民出国后，提到各自国家的政府，日本人总是说如何如何好，中国人恰好相反，总是说如何如何坏。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既反映政府的作为与国民的期望差距太大，也体现了传统的圣王观等历史文化因素的现实制约。也就是说，选出一个或者一批圣贤组成政

府执掌权力，一直是国人内心的企盼。达不到心中的目标，自然就会严重失望，由充满抱怨到严词斥责甚至揭竿而起。其积极方面说明国人对于政府的批判力强，消极方面则表明辛亥以后国民对于历届政府的认同度相当低。得不到国民的普遍认同，要想切实有效地贯彻行政，就不得不经常性地动用各种非常手段。

三 单一制与联邦制

虚君共和乃至帝国共和的观念当否另当别论，但无疑都是当日的事实，则共和与帝制的不可调和在一部分国人的脑海里已被消解。考虑到当日迫在眉睫的时势，挖空思想出此招，不仅是要化解南北双方的尖锐对立，同时也是希望尽快结束分立冲突的局面，以免战火延烧，刺激环伺强邻的觊觎之心，导致国家分崩离析。

在结束帝制之后，如何在民族自决与地方自治的情形下维系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成为人们苦思冥想寻求解决之道的一大难题。民初关于政体论争的要项之一，就是所谓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取舍。由此而来的中央集权与联省自治之争，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使在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之后，症结也没有彻底消除，尤其是集权与分治的矛盾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就全国范围而言，民主制度始终难以落到实处，而各省分治又无法确保统一局面，以及防止分裂割据的内乱，同时也不能避免各省军政权力在自治的幌子下继续实行专权。因而中国究竟是延续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为好，还是仿效欧美国家实行联邦制为宜，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状态。连历次制订根本大法，于此重大问题也始终争议不决，摇摆不定。

其实，联邦制的影响，与共和观念的传播关系密切。共和的本意之一，就是由分治而共和，分治则须破除帝国的一统和集权。受明治日本的影响，作为国体或政体形式，共和主要对应“Republic”，后人的理解，往往偏重反对帝制的一面。可是近代中国的共和思想渊源还有从合众演化而来的脉络，孙中山最初论证“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因为地方豪杰互争雄长，难以统一，又缺乏共和思想，革命之际，必须先充其野心，使之与革命同行。“充其野心之方法，唯作联邦共和之名之下，其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

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贺（驾）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12]如此，共和不仅是国民公举总统以取代帝制，还包含合众的意思。稍后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议及破解万一欧洲联盟对我之法，也是先令各省自立甚至独立，以散其盟，然后再图内治，进而以一中华衡天下。^[13]

与宫崎寅藏的笔谈当中并无共和字样，不过，1895年3、4月间，孙中山在香港多次拜访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谈到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14]以后与法国驻越南外交官也谈到在华南成立共和国之事。则独立与共和，正是孙中山考虑的取得全国政权的方式。

循着联邦共和制的思路，探求解决中国分立与统一之道，并非孙中山一人的专利。立宪派名士张謇也认为：

国土寥廓，最宜于共和分治。以理论证之，卢梭《民约论》谓，凡国土过大，则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长莫及之虞，其势宜于分治。欧美各国联邦共和之制，实本卢氏。以事实证之，美之国土广宽，不亚于中国，而共和之治最先，成绩最美，其明证也。种族之繁杂，莫过于瑞士之联邦，凡欧洲各国所有种族，瑞士殆皆有之，论者比为欧洲之缩图，然共和政体之固、成绩之良，而绝无涣散纷争之虑者，怵于外患而团体愈坚也。^[15]

张謇等人转而赞成共和，原因之一，便是基于分立状态已成事实的时局。也就是说，张謇等人的共和是与联邦制联系在一起的。

辛亥年底据说由清内阁会议决定且经清廷批准的议和条件，也是“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蒙古、青海、西藏亦在其内”^[16]。各方虽然立场不同，宗旨各异，取向有别，却都有将独立或自治的各地政权集合到一起的政治目标。这一旨意下的共和，其针对的主要问题和考量已经不是帝制，而是既成的分立局面，希望在共和的旗号下，将由不同人群掌控的不同地方的政权联合起来，以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辛亥各省独立，使得帝制的行将垮台与帝国的分崩离析联袂而至。实现共和，不仅要推翻帝制，而且要在分治的基础

上实现统一，以确保国家的完整。民初国人为此在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权衡取舍，伤透了脑筋却始终不得要领。广土众民又长期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共和制生成的文化系统明显有别，虽然张謇等人意识到“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不以国民程度之高下为衡，而以国民能脱离君主政府与不能脱离君主政府为适宜之取决”^[17]，国民程度是由政治制造而成，转而赞成共和，可是共和制的实行也有其社会历史文化渊源，否则，单纯移植而与国情不相啻衲，调整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四 总统制与内阁制

后人论及民初政坛角力，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民党与袁世凯的明争暗斗，重视坐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如何揽权，而相对忽略国务院的建置。然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的决议案，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内阁制，国务院才是权力中枢。袁世凯首先要设法将国务院矮化，才能实现大权独揽的政治企图。因此，即便将关注重心放在民党与袁世凯的缠斗之上，也要弄清楚袁世凯是如何将内阁制虚化，逐渐实现总统掌控实权并使之制度化合法化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受到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制约，将战略目标确定为促使袁世凯逼退清室，从而推翻帝制，建立统一的共和政权。既然自身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渡，政体建置就不得不随之变化。开始实行总统制，后来改为内阁制，试图以内阁和参议院钳制令人疑窦丛生的袁世凯。南方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任，一方面是使其脱离北方的势力基盘，斩断与清王朝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让袁世凯全盘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或者更为恰当地说，要将袁世凯放在南方共和政权的顶端，虚高架空。南方民党不仅仅要求袁世凯承认共和的名义，而且要全盘接收南京临时政府。也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是当时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的共和政权，既然袁世凯同意废除帝制改为共和，就理所当然地应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中华民国的权力机构。即便袁世凯心有不甘，也要千方百计地迫使其就范。

对于民党的一厢情愿，袁世凯心知肚明，当然不肯轻易就范，因为一旦如其所愿，自己即使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也不过是虚位的国家元首，掌控了参议院和内阁的民党才是实际的执政者。这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结局。为此，他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煞费苦心，与南方斗法，使得局势一步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转化。而另一面的孙中山，也能够明察秋毫，针锋相对地进行应对。可以说双方都是政治博弈的高手，只是如何对策，不仅考验政治智慧，而且受到局势、实力和各种势力关系的牵扯。

为了摆脱因接受共和所造成的相对于民党而言被动的局面，袁世凯竭力争取和维持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对等地位。为达此目的，他一是尽量使得自己的权力来源显得并非延续南京临时政府，二是竭力将自己担任全权总理大臣的清朝末届内阁，变成看似具有民国北方临时政权实体的性质。

清帝决定退位之际，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代表内阁提出一项解决时局的方案，即南北现有政权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统一政府。孙中山敏锐地察觉此举背后的玄机，电示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明确反对清廷私授政权于其臣，反对北京更设临时政府，接着要伍廷芳将各项条件交各报馆公开发表，以确保袁世凯斩断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18\]](#)

袁世凯当然清楚，完全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势必落入民党的彀中，所得大总统的位置名号，不过是形同虚设的傀儡。这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的。他特意将退位诏书原文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虽然仅仅变动了“与民军”三个字的位置，意思却大相径庭。据此，袁世凯可以先行另组临时共和政府，然后再与民军协商统一。如此一来，则袁世凯的权力受自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联，后者在创建全国统一的共和政府时便不具有法统地位。孙中山对此虽然感到愤怒，可是木已成舟，回天乏术，只得以临时政府约法、定都南京以及参议院等条件相约束。[\[19\]](#)据当事人之一的蔡元培回忆，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南来就职，并且定都南京，就是希望其以此“表示接受革命政府之系统，而避免清帝禅让之嫌”[\[20\]](#)。

其实，袁世凯最为关注的，显然并不在于禅让，而是自己之于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清帝退位，宣布还政于民，使得袁世凯天经地义地成为民政的代表。不仅未来的民国统一政府由袁世凯领衔，他担任总理大臣的内阁部院以及北方各省的政权，也变成北方民政的化身。而民党方面被动采取的防范措施，存在含混不清之处。尤为关键的两点，一是就职与定都相分离，二是统一政府的组织尚无定论。这些恰好为袁世凯施展权术提供了空间。

鉴于北京局势不稳和北方军人将领纷纷反对统一政府设在南方，权衡妥协，北上迎袁专使蔡元培等先是放弃临时政府地点之议，以换取袁世凯南下就职，继而提出在袁不能南行，而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的情况下采取变通之策，即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然后重兵护卫参议院及内阁迁北京。^[21]迫于形势，蔡元培虽然对袁世凯不断做出让步，可是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后再迁往北京一条，却至关重要，此举不仅将由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前清政府排除于组建统一政府之外，而且使得掌握实权的国务院与南京临时政府一脉相承。

可惜蔡元培等人的想法仍是一厢情愿，袁世凯不得不接受南方由参议院议定的条件，同意南北统一政府实行内阁制，便无论如何不能放手由总理以南方临时政府的班底为基础来建立统一政府，否则，就真的可能流于徒有虚名的傀儡总统。清帝的辞位诏书，给他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他首先设法将由他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掌管的各级各类官署确定为继续维持统治秩序的合法权力机构。

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名义布告内外大小文武官衙和军警：

著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现军警各界赞成共和，早经联合一致，尤应各尽义务，合力维持。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藉以统一政权，保持秩序。

^[22]

随后，北京当局又通电各地：

现在改定国体，采用共和，业经大清皇帝明白宣布。凡我国民，须知此次改革，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创局，非舍故君而代以新君，乃由帝政而变为民政。自兹以往，我中国之统治权非复一姓所独擅，而为四百兆人所公有。我中华国民，不论满汉蒙回藏何种民族，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上之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惟当新陈代谢之交，正福祸攸分之日，始基不慎，贻害何穷。吾人同属国民，各有天职，艰难缔造，义不容辞。凯以非才，谬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其何能堪。所赖我贤士大夫，各竭知能，共谋匡济。诸公久膺疆寄，外观世局，内察民情，必有以慰同胞望治之心，方不负大清皇帝致政之意。其或愚氓无识，胥动浮言，亦宜剴切详明，广为劝导，务令各安生业，不酿事端，是为至要。至地方有司，在新官制未定以前，一切暂仍旧贯，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赓续进行，切实保管，不可稍懈。总之，共和国家舆论，即为法律之母，国是一定，万难再事动摇。无论何人，均有服从国法之义务。[\[23\]](#)

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发布的这几道电令布告，不仅显示其权力来自清帝，更重要的是对全国各省宣布自己具有正统地位，包括对光复独立各省。尤其是对于尚未独立的北方各省，以及京师的前清阁府部院，更是意义非凡。既然是大清皇帝授意改政，授权组织政府，既然全体国民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既然军警各界赞成共和，早经联合一致，那么就可以和袁世凯一样，由清朝的臣子变成民国的官员。与此相应，各种机构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由皇朝的衙署化作民国的机关。

在政权更替之际，新政权接管之前，要求旧政权暂时负责维持秩序，本来也是常态。可是袁世凯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于维持秩序一节，更重要的，还是使自己的权力与清朝的正统相连接，并形成民国的新法统，而避开南方国民党创立的革命法统。如此，前清内阁总理大

臣就摇身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其所属的各级政权继续实施合法统治，并且成为组建统一共和政府的重要凭借。北方各地官署接到的电令，在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外，还有袁阁的名义，则不仅全权来自清廷的授受，内阁更是由袁世凯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如此一来，袁世凯就在清朝内阁与临时共和政府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实现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政治企图。

1912年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此时袁世凯还继续发布清朝内阁各部的人事任免令，也就是说，民国统一政府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仍然兼负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大臣的重任。3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因为新政府尚未成立，由清朝最后一届内阁的各署首领依次行礼，然后再带同丞参司员谒见行礼。^[24]如果说继续旧部的人事任免还是由于袁世凯一身二任，只是实际上有将清朝部院化身为共和政权的北方机构之嫌，前清内阁各部的首领丞参司员作为政府人员正式参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礼，则从仪式层面完成了从被推翻的帝制政府，变成与南京临时政府对等的民国北方权力机构的合法化程序。

3月13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三天的袁世凯发令，特任唐绍仪为民国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3月17日，唐绍仪带同黄恺元、刘冠雄、王正廷等人乘火车南下，“此次唐氏南行，负责甚重，国务员之位置，须俟唐到南与各员接洽，得其同意，方能正式宣布”^[25]。唐绍仪到南京后，“国务卿即须发表。现各部人员，唐均暂时慰留。至政府迁往北京，约须在一月之后也”^[26]。其主要使命，正是落实与蔡元培等人的约定，组织中华民国统一政府。

依照内阁制原则，国家权力在于国务院，袁世凯无权参与或干预各部的人事。由于袁世凯的实际权势及其与唐绍仪的关系，阁员的人选其实是以袁为主导提出和确定。但是袁世凯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如果唐绍仪南下，真的是在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基础上组建统一政府，然后再让内阁与参议院一道联袂北上，则尽管定都北京以及占据内阁阁员的要津，仍然无法割断与南方民党政府的联系，更难以驾驭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批司员。所以，袁世凯千方百计务必使组建统一政府之事发生于北京，而且要在南北政府现有人员共同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为达此目的，袁世凯双管齐下，一方面尽快公布阁员名单等信息，并让总长已在北京的各部抢先办理交接，造成接收南北政府性质相同的

印象，另一方面，迫使在南方组建新政府的唐绍仪以及南方国务员匆匆北上，使得新政府整体北迁的计划消于无形。

3月30日，组阁事宜告成。新内阁成立之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现在各部总长业经任命，除内务、陆军总长在京及外务总长另已派署外，其余各总长未到任以前，在京原有各部事务，暂行照旧办理，以待分别交替。^[27]京中旧部如度支部、农工商部、海军部、学部、邮传部、法部等，皆奉总统令停止办公，清理文件，预备交替。^[28]

这时新政府尚未正式组建，袁世凯也没有正式发布接收令，可是清朝各部除了准备各项交接外，一些由北方清朝旧吏出任国务总长的部门已经悄然开始实际办理交接事宜。4月中旬，有报纸报道称：“自各国务总长发表后，北京各旧部即纷纷赶办交替，除内务、陆军两部由赵、段两总长自行交代自行接收外，其他各部均于八号呈报总统府，已将应行交代事宜办理完毕，专俟各总长到京后交替等情。当奉大总统批复，司法、交通两部即由徐次长、施总长即行接收，无须与各部一同延候云。”^[29]也就是说，还在4月上旬，由袁世凯旧部任新政府国务员的部门自行接收的行动已经开始。这与其说是接收旧政权，毋宁说是进一步认可新旧政权继替关系的合法性更为恰当。

国务员名单公布后，南京临时政府如约解散。4月2日，南京领事团接电：南京临时政府今日解散，各部次长即由总长推荐，然后开阁议委任。新内阁定于本月十日移往北京。^[30]确定组阁名单，与完成全部组建新政权事宜距离甚远，除了次长的人选及委任外，还有各机构的组织与人事的安排。为此，唐绍仪继续在南方进行活动，以便组织一个基本成型的新内阁部院并如期迁往北京。

可是接下来局势急剧变化。4月10日的约期已过，唐绍仪和新内阁未能动身北上。这引起北方的严重不安。所担心的或许不是首都何在，而是害怕唐绍仪在南方组织的政府太过完备，使得北方失去讨价还价的余地。

袁世凯事先获悉唐绍仪延期滞留南方继续组建国务院各部的计划，感到相当忧虑。他不能容忍唐绍仪将一个以南方临时政府人员为基础主干的新政府带到北京。据报导：“国务员迟不来京，袁总统甚为焦虑，初九日午后，召集陆军总长段芝泉、内务总长赵智庵、外交

总长胡馨吾在本府楼上筹议办法。经袁总统宣言，谓国家危急已至如此，而国务诸公尚多猜疑，必欲拥兵北上，外则贻笑友邦，内则徒生意见。”此事显示，在4月10日之前，袁世凯等人已经决心迫使唐绍仪等加紧北上。在确定了危及国家的罪名之后，袁世凯复电唐绍仪，南来人员限期4月15日必须一律到京。^[31]其目的显然在于阻断唐绍仪在南方继续组建新政府的计划，迫使其回到北京后再行重组民国政府。

列强再次帮了袁世凯的大忙，恰在此时，北京外交团以民国政府久不成立，南北势将分裂，要求公举代表监督财政。北方各种拥袁势力趁机鼓噪，向南方施压，逼迫滞留上海的唐绍仪迅速回京，参议院和各国务员随同北上，在京从速组织政府。4月12日，北京国民协进会致电上海各报馆各政团：“乃自总理受任以来，掷至宝之光阴，为无谓之延搁，影响所及，险象迭生，竟使外人于民国开幕之初，即议监我财政，国民未睹共和之建设，先见亡国之端倪，谁生厉阶，种滋恶果。试问总理及参议院，何忍曲徇私利，陷全国于无政府而不顾耶？顷参议院已有二十以前到京之说，切望总理率各国务员务于两三日内起程北上，先使政府成立，以抵剧烈之外潮，诸事方能着手，尤望各政团各报馆将此危急情势，警告国人，共谋拯救，无任迫切。”^[32]一时间南北各方风起响应，公私各电敦促参议院和国务员即刻北上者达数百通之多。

其实，按照唐绍仪事先宣布的日程，最早也要4月10日才能和新内阁及参议院北上，这时不过刚刚到期，虽然的确未能如期北上，但要说是虚掷光阴，故意延搁，却是欲加之罪了。所谓曲徇私利，无疑正是以南方临时政府人员为基础组织新政府机构之事。对此唐绍仪抵达南京时，已经预期组建国务院各部或许较组阁更具难度，因而表示政府迁往北京的时间当在一月之后，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而北方的拥袁各派借故造势，目的就是要打乱唐绍仪与南方的部署计划，夺取组织统一民国政府的主动权。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尚未完成组阁之事的唐绍仪只得匆忙决定尽速北上。在南方成立新政府，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然后北上接收前清各部的计划，变成南京临时政府各部就地交代并停止，仅有部分人员北上，参与国务院的组建。

得到唐绍仪等人的承诺，袁世凯仍不放心，抢先对外发布新政府各部所在地址^[33]，造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架势，使得南方的国务

员更形被动。与此同时，北京军界统一会致电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官各会党各报馆：“内阁总理暨各国务员不能尅期任职，政府不能正式成立，国步益臻危险”，并鼓动各方致电袁世凯，“倘果五日以外犹事迁延，非如原电所云，恳请大总统先行派员署理，实无救亡之策。”

[34] 黑龙江都督发电，也有国务院各部先行派员署理之说。还有消息称，袁世凯电催唐绍仪，限于14日到京，“否则即仿胡惟德署理外交总长之例，命北京各部旧首领署理国务大臣，组织政府，以便政治之进行” [35]。这无异于对南方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参议院和国务员不能尽快到京，北方将单独重新组织新政府。

迫于内外形势，尽管各部组织事宜尚未完成，唐绍仪和国务员也不便继续滞留南方。4月中旬起，唐绍仪和各部总长相继北上，至6月上旬，基本到位。4月20日唐绍仪到京后随即展开的组织共和政府行政架构的活动，已是由南北共组，离最初的设想相当远了。

[1] 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6—370页。

[2] 均见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转见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下册，第390—498页。

[3] 《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1页。

[4]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242页。

[5]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84—186页。

[6]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十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9页。

[7]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72—173、297页。

[8]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0—1372页。

[9] 《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62—163页。

[10] 《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65—166页。

[11] 《绍英日记》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348页。关于此事，各报均有报导，内容较详的如1912年9月17日《神州日报》（四）“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颂辞（由溥伦代表）”：“语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业，斯言也，乃于中山先生见之。先生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非以共和定国体不能为人民谋幸福，不能与列强谈竞争，于是遍游欧美，鼓吹提倡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此固见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无私之心，遂以天下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不图唐虞揖让休风，复见于今日也。独是建设以来，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大陆风云，更亟于先生未创共和伟伦以前。然则时势造英雄，抑英雄造时势耶？今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争以望见颜色为荣，且与大总统握手言欢，论道经邦，一堂抵掌。本爵现因小恙，未能亲接鸿言，

心殊抱歉。深愿海内升平之治，将于两先生倚之赖之，正不仅我皇室享优待之荣也。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惟于两先生是望。”《申报》1912年9月18日第三版“黄克强在京之酬酢观（二）：清皇室之招待”：“清皇室于前日下午八钟在金鱼胡同那宅设宴招待孙中山诸人，由贝子溥伦主席，俟黄陈二君赶到后，即相偕入座。先由溥伦致欢迎词，略谓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此次国体更新，共和成立，皆孙黄诸君数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鉴于孙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毅然退位，赞助共和，实为民国之福。今日我皇族诸人得与诸君欢聚一堂，曷胜欣幸。更望以后实行五族平等，巩固国基，即我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赐矣。溥伦演说后，即由黄克强君起立答词，谓此次中国改建共和政体，实为顺大势之潮流，又得孙先生数十年鼓吹诱导之力，故能人心一致赞成。然若无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变国体，破坏不多，成功最易，实诸皇族之力也。”

[1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73页。

[1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1—182页。

[14] 《原敬关系之书》第2卷书翰篇，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第392—396页。

[15] 《赵凤昌藏札》第一〇七册函电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7页。

[16]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371页。

[17] 《赵凤昌藏札》第一〇七册函电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48—1049页。

[18] 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173页。

[19] 此事原来据胡汉民所记，指为整句由袁世凯添加（参见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第177页）。现经骆宝善比对原稿，得以还原真相。

[20] 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06页。

[21] 1912年3月4日《致孙中山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3—144页。

[22] 《临时公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3] 《孟宪彝日记》（一），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4—569页。

[24] 《沈家本日记》，[清]沈家本撰，韩延龙、刘海丰、沈厚铎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2—1344页。

[25] 《唐少川南下之行色》，《神州日报》1912年3月23日，第三版，要闻一。

[26] 《南京近事摘要》，《神州日报》1912年3月29日，第三版，要闻一。

[27] 《临时公报》1912年3月31日。

[28] 《民立报》1912年4月1日，第三页，专电·北京电报。

[29] 《京华短简》，《申报》1912年4月17日，第三版。

[30] 《西报记南京近事》，《神州日报》1912年4月3日，第三版，要闻一。

[31] 《盼望国务员到京之迫切》，《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三版，要闻一。

[32] 《北京国民协进会电》，《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一版，“公电”。

[\[33\]](#) 《新政府各部地址表》，《申报》1912年4月17日第二版，要闻一。

[\[34\]](#) 《申报》1912年4月14日，第二版，公电。

[\[35\]](#) 《关于新国务员之要闻·电促尅期北上》，《时事新报》1912年4月12日，第二版，紧要时事。铁血监督团也发出内容相同的电报。《北方通信纪一·各界对于国务员之公愤》，《时报》1912年4月23日，第二版，要闻。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1912年3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中央政府，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北京政权被推翻，这十几年时间，史称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指称，尤其是关于“军阀”一词的含义及应用，海外及台湾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一般而言，并没有改变用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统治来指称这一时期以北京为首都的全国正式政权。北洋军阀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行说法，虽有实事求是，主要还是由他指和后认层累叠加而成。近年来，“军阀”的概念得到系统的专题探究，与之相应，北洋军阀、北洋政府等等概念，也有顺时序重新梳理的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习见资料，可见“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指称，出现的时间至少较现有的专题研究所说各早两年，而北洋政府的指称，则主要是北伐之后才逐渐流行。尤为重要的是，在“北洋军阀”的集合概念形成之后，所指称之实事的谱系化一直持续发生，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随时有所变化。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概念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难免以偏概全，误读错解，甚至误导相关研究的取向。因此，坊间和学界通用的北洋军阀统治或北洋政府等概念，尤其是一般通史和教科书用以指称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习以为常，应当重新检讨，看看是否存在削足适履的情况，进而依据实情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 问题的提出

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相对处于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在此之前的清季历史，先有辛亥革命史研究的

热络，近年来清政府的新政宪政乃至统治集团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研究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不受各式各样范式的局限束缚，深入知识与制度的全方位变化，许多问题的认识较前人大进一步。尽管相对于辛亥革命研究而言，还有不少初创期难以避免的局限，如亲贵和枢臣人事的缺位，文物制度有待展开的方面尚多等等，毕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将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准大幅度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在此之后，国民政府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且借着蒋介石日记等新出史料的问世，进一步推波助澜，成为举世关注的一大热点，大有化作民国史的代名词之势。

反观二者之间的民初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北洋军阀统治话语的笼罩之下。1957至1959年、1983年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过两版的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深入人心（其间1978年还再版过一次，2006年海南出版社又改成五卷本，以《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为题出版），虽然受到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似无声无息，没有得到任何评论，而且据作者后人披露，初版之际边写边出，出版社还一度打算单方面中止合同，因为陶菊隐是湖南当年驱张运动的新闻界代表，而毛泽东是学界代表，上书陈述，才得以善终，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该领域影响学生和学人最为深刻的论著。有专家坦承：其实学者们都在读这部书，都引用这部书的内容，但并不注明资料引自这部书而已。恢复高考后前几届上大学的历史学本科生，多将此书当成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来读，否则北洋政治舞台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真的会让人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正因为此，不止一人坦言此书对自己研治军阀史有启蒙之功。

问题是，尽管作者作为过来人有亲临其境的现场感，毕竟是职业报人而非专门学者，“史话”的标题也表明作者旨在写成一部人人爱看、广泛传播的通俗读物，所说事实所引材料当然各有所本，却很难将大量活灵活现的细节反复比勘验证。更为重要的是，过来人回顾当年的亲历，难免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制约，其写作的具体环境，又使得这方面的压力大为增强。诸如此类的时代烙印，都会深深刻制在作品之中。而这样的烙印通过生花妙笔的描述，辗转传导给了广大的读者。一部《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国历史，显然不如《三国志》准确，却牢固占据数百年来大众心中三国史的江湖地位，不可动摇。后来文史两界一些关于北洋军阀的研究，多少都难免史话的胎记痕迹，因而被视为掌故野史之类。

陶著史话的影响之广泛，甚至超越了政治的隔阂与地域的分割，达到大陆书籍还处于禁忌状态的海峡对岸。张朋园发表于197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的书评《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争与宪政不果〉》，借着对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的新书进行评介的机会，一开始就直言不讳道：

北洋历史，在中文的著作中，除了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更进一步学术性的研究还不多见。坊间有一二类似陶氏史话的史话，几属展转抄袭陶著，不脱杀杀打打的范围，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则可，作为学术著作则不可。何以北洋历史停留在史话的阶段？这与五十年来一个一脉相承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大家认为北洋人物都是老粗，一提起北洋人物，难免想到那一口山东腔的张大帅，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历史学家没有尽到责任的结果。[\[1\]](#)

张朋园的认识，其他学人感同身受，稍早王克文的描绘更加活灵活现：

今天国人对民初军阀的印象，恐怕是出于狂想的成分多，依据事实的成分少。拜电影和电视之赐，光头、山东腔、仁丹胡子的“大帅”早成了三岁小孩都熟悉的形象；然而大家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军阀或多或少总像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国内在这方面学术性的研究太少，大有关系。多少年来，我们除了“轶闻”、“史话”和几种一味吹捧或者一味诟骂的传记以外，真正肯尝试分析并提出一种概括理论的著作，几乎没有。时到如今，这个工作只有留给外人来做了。[\[2\]](#)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海峡两岸因为政治对立，学术研究的领域常有冷热不均的现象，像北洋的历史这样两边长期遇冷的情形，并不多见。陶菊隐的史话问世，距离书评不过十年，而且在大陆出版，对岸

一般人未必看得到，要说广泛影响，也是辗转发生。所以张朋园认为对北洋历史的认识停留在史话阶段，是由于五十年来的错误观念。而这样的错误观念，其实来自扭曲的印象。在王克文的叙述中，变形的印象主要是由影视作品的造型加上狂想发生作用的结果。

同年初，张玉法也是借着评介派氏（Lucian W. Pye）的新书《军阀政治》，先行发表了对于军阀研究的看法，他不是曲折地批评坊间流行的掌故和影视作品，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政治，他说：

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一直以民初军阀为嘻笑怒骂的对象，不以严肃的治学态度来研究，这也许是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正统观念的过度运用，往往忽视客观问题的存在。^[3]

派氏的《军阀政治》，是1950年左右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到1971年才出版。1960年代末，美国的近代中国学界实施军阀研究计划，形成了一批成果，派氏的博士论文尘封多年得以问世，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台湾学术界的评论在此期间集中出现，也与美国的研究计划成果相继推出有关。

不过，正统观念的难言之隐仍然制约着研究的进展。五年后，张玉法主持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其中第五辑为《军阀政治》，因为台湾学者对此探讨尚少，不得已，该书的大部篇幅只好集中在外国研究成果的译介上。^[4]

张玉法没有说明正统观念是什么，如果真的存在正统观念，显然对于政治对立的海峡两岸同时发生作用，才能导致观念迥异的双方在军阀研究上的大同小异。张朋园认为军阀的史话类作品没有说出道理，王克文也指出军阀研究中没有概括理论的著作。其实，正统观念何尝不是一种道理或理论，问题在于这样的道理或理论是否合乎实事。学人心中各有一是，往往取为准绳，这样通行的做法即使未可厚非，毕竟要以事实为依据加以检验。

1977年底再版陶菊隐的“史话”时，三联书店编辑部特意加了简短的“重印说明”，指出该书较大的缺点，是作者基本上站在资产阶

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上来评述和分析问题，因而缺乏科学的、阶级的分析，只是记述了表面历史现象，没有揭示问题的实质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5]这大概可以透露当年该书几乎被腰斩的原因，同时还显示了相互联系的两点意思，其一，作者的立场不正确；其二，作品只记表象，没有揭示实质和规律。

跳出时代的氛围，上述两点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后者说是没有理论，而前者又指有一定的立场（资产阶级）和观念（客观主义），实在也是一种理论，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理论被认为是不正确的。

其实，陶著史话全书开宗明义的一段话，除了一些台湾方面不能接受的元素，就很能体现张玉法所说的正统观念：

北洋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匪帮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中国在它的黑暗统治下达十七年之久。它的长期统治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严重灾难，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革命斗争。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就是在这个时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6]

无论作者起笔时出于何种考虑，无论观念各异的今人如何评判，这样的立意无疑是那一时代政治正确的表达，也就是无庸置疑的正统观念。其正确与否固然可以讨论，却不能说不是一种道理或理论。即使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今是而昨非的理论范式也比比皆是。而被称为杂学的掌故之学，力透纸背地上杂所具有的洞见，连一般专门家也望尘莫及，可见背后同样大有讲究。倒是政治对立的海峡两岸都不认为这样的认识具有或包含理论，值得玩味。

在上述观念的主导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分别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国、护国运动、北洋军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的叙述脉络所联系概括。这样的线索架构实际上将相关历史分成两边，一边是延续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革命势力，一边是承继清王朝专

制统治的反动军阀，两条线索不断冲撞，便激发了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连串重大事件。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北京政府主政的时期，被概称为北洋军阀史。这一叙述架构为国民革命的正当性提供了有力支撑。国民革命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打倒列强及其支持的军阀，后者虽然不限于北洋，但主要就是指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打破了军阀混战争权的循环，成为革命战胜反动的理想结局，据有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

不过，作为历史研究，使用何种词语概念来指称相关人事，应当首先检讨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继而考察这样的指称与本相本意的吻合程度及契合方面。若是顺着一定的时势，简单地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那么随着天经地义的语境发生变化，势必引起怀疑和重估。

二 “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有的看似同时出现，实际上还是先有其事，再有指称。先出现概念再发生实事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相当罕见。而集合概念的形成大概有三种情形，其一，自称；其二，他指；其三，后认。有时各种情形兼而有之，有时则是开始由一种发生，继而混合其他一种或两种。人们的身份态度立场不同，使用概念之时，各自的含义往往有所分别，看似互相对话，其实是没有交集地各说各话。随着时空人等相关因素的改变，一种概念发生之时的意思，在不同语境之下会演化出复杂多变的语意，所指对象也有所分别。

仅举与军阀一词同时流行的土豪劣绅为例，今日研究乡绅，常常呈现异样的情形，治晚清史强调科举制停罢后乡绅的社会失势，治革命史者凸显土豪劣绅化为害地方，治社会史则发现绅权与官权的合流导致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作为国民革命的动员口号和目标指向，打倒土豪劣绅与通缉学阀之事不无近似，而且二者之间不无联系，湖南的叶德辉被当作土豪劣绅镇压，在知识界就引起负面反应。只是学阀之说未免言之过当，而学阀们又拥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各种舆论工具，可以发声以正视听，所以很快被弃置。所谓土豪劣绅，很大程度是国共两党为了发动农民而指称掌握着乡村权力的士绅。在清季科举考试停罢后，这些人仍然借助各种形式继续维系乡村的社会秩序。相关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发动土地革命的档案文献资料，土豪劣绅

正是革命正当性诉求的必要对立面形象建构。可以印证的情形是，抗日战争期间，土豪劣绅基本不见了，即使在未经土地革命冲击的偏远落后地区，也由开明士绅所取代。

一般而言，土豪劣绅当然不会自称，也不会彼此相称，而是先由他指，继而后认。相比之下，军阀的指称虽然不由被称为军阀的人自称发端，随着词语的流行，有的军阀也会用来指称对手甚至自我解嘲。因此，与土豪劣绅的泛化多少有违实情不同，用军阀来指称民初割据称雄、长期混战的军人集团，倒也颇为形象。

既然集合概念外来后出者居多，且以今语释古籍名故物，使得现在的人们彼此容易沟通，所以一般而言，不足为病，尤其是作为方便名词使用。不过，这样的方便大抵只能行于今人，至于今人与古人的沟通，多少难免受到影响，扭曲变形甚至截然相反，都有可能。通常情况下，即使有所误读错解也无碍大局，可是如果作为关键性的概念，随意使用就有可能产生诸多流弊。

早在1923年，梁启超谈及国故学的复兴，就明确表示：“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并以自己“少作犯此屡矣”为鉴，“愿吾同学勿吾效也”。^[7]

北洋军阀统治的概念之于相关历史的研究是否亦坐此弊？至少从两岸学术界的现状看，很难说完全没有关系。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民初十余年执掌国家政权的统治势力，并且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来表述国民政府之前的民国历史，未必恰当。依据徐勇的研究，军阀的概念到1912年才由日本发明，1917年8月最早由李大钊引用来指称日本军阀，同年10月，李大钊又率先用于指称中国当时割据称雄的军事实力派。^[8]按照这一说法，南京国民政府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人们不用军阀的概念谈论国内政治，尽管所指的实事按照后来的观念已经存在。

研究近代中国史事，探源是一项说有易说无难的工作。徐勇的研究较前人进展显著，长期争论不休的“军阀”概念产生问题的讨论，的确得出了新的学术结论。只是中国人使用“军阀”概念向前推进到1917年李大钊的新说，并没有终结问题。1915年6月22日，《申报》刊

登署名“岐逸”两天前发来的报道《江苏之政绩·官僚政治之实验》称：

三四届之听鼓知事已二三百员，齐使之请保免考原为一百五十余员，核准者竟有一百三十二员之多，三分之一为军阀所要，四分之一为各道尹官厅之请求，余则官阀所踞。当四届核准知事案之发表，正查蝗委员仆仆道涂之时，知事之出产，其量与蝗可为比例，人才有满溢之患矣。[\[9\]](#)

6月29日，《申报》再刊发“岐逸”三天前的报道《淮盐纪闻》，谈及盐税的混乱与盐商负担过重的情形，具体原因而外，根本原因在于：

改革办法不见发表，而政争冲突，私利是图。多数运盐公司非官吏所开，则军阀宦阀所盘踞，日言改革而续造纠葛，以迂回其间。此责任匪仅盐政当局者所负，而全国官僚军阀之好利心实造成之。[\[10\]](#)

这两处“军阀”与宦阀、官僚并称，已成专有名词。这较李大钊初次使用“军阀”一词，至少提前了两年多。至于日本方面用“军阀”来指称中国的军事实力派，最早亦非中文《顺天时报》，而是东方通信社。据1916年9月20日该社东京电：

北京报道：军人阀之跋扈已甚，犹欲乘唐绍仪入京之机，呈一层之活动，致使一般人对新政府之将来，渐抱不安之念。而段祺瑞任命曹锟为直隶督军，亦起利用军阀之前提之批评云（二十日）。[\[11\]](#)

也就是说，在李大钊使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日本和中国的时政之前，军阀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通用专有名词，只是出现的频率还不太高。如梁启超欧游之前，很少指称军阀，而在归来后的著述中，却集中使用这一称谓，可见欧战的影响也是中国“军阀”一词的来源之一。

考虑到概念形成的自称、他指、后认的分别与联系的复杂纠葛，研究概念，应以陈寅恪解一字即一部中国文化史的主旨办法，不宜先入为主地用既定名词勾连史事，而要通过梳理千差万别的史事来把握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同一物事有不同指称，而同一名词所指各异的情形比比皆是，用名词勾连史事，即是预设未经验证的前提，假定那些形似而实不同的物事当然具有内在联系。具体而言，要注意所指实事的形成演变、话语的发生衍化以及概念形成之后不断谱系化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分别，尤其是中间一段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衍化进程。

就此而论，虽然学界早已注意到军阀词语的发生演化，并且不断有所深入拓展，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可是距离事情本身的复杂，仍有不少的谜团有待破解。而症结所在，就是忽略中间顺流而下的一段，千辛万苦地寻找发源，一旦确认，即陷入概念衍化与定义谱系相互纠结的困扰，不能一视同仁地将千差万别的各说各话作为客观实在的历史事实，顺时序系统全面地梳理话语衍化的繁复进程，而是急于用快刀斩乱麻的定义，寻求所谓名实相符的幻象，使剪不断理还乱的史事观念迅速清晰化。这样看似清楚明确的定义和谱系，因为实际上以现有通行观念为参照，虽然有方便外行乃至一般学人理解的好处，却难免以心中之是为是的主观偏蔽，非但不能完全照顾不断变化的史事本相与词语本意，还使得后来的认识与当日的实情渐行渐远，并且因为各自定义和谱系的不同，不断重蹈各说各话的循环泥淖，使得厘清的努力只不过增加了徒劳无功的自圆其说而已。

在这方面，傅斯年所著《性命古训辨证》颇有启示作用，他借助德国“以语言学观念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强调语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同样重要：

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思想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故虽后学之仪范典型，弟子之承奉师说，其无微变者鲜矣，况公然标异者乎？前如程、朱，后如戴、阮，皆以古儒家义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变动，乃昌言曰“求其是”，庸诂知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乎？在此事上，朱子犹胜于戴、阮，朱子论性颇能寻其演变，戴氏则但有一是非矣（朱子著书中，不足征其历史的观点，然据《语类》所记，知其差能用历史方法。清代朴学家中，惠栋、钱大昕诸氏较有历史观点，而钱氏尤长于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别时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误彼等不少。盖“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12]

求其古与求其是，原为王鸣盛勾勒惠栋与戴震的治学特点之语：“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13]钱穆论道：“谓‘舍古亦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其异者，则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王氏所谓‘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14]或以为求其是还有是正之意，固然，但前提仍是掌握古人本意。不知本意，则是正不过后人心中之念而已。

古人的本意千变万化，不止一端，作为历史实事，无论正误是非，只要属实，都是真有；词语的含义，均由事实发生演化，不由定义产生主导。所以，舍古无以为是，正是解一字即一部中国文化史的要旨大义。或以为追究概念要名实相符，此说看似义正词严，实乃求其是的变种，其心中但凡先有一所谓实，便自然会以一定之是或一定之古为是。而但求一是，必然定于一尊，难免以偏概全，落入自以为是的窠臼，强古人以就我，将历史上绝无全同的各种本相本意削足适履。

具体而言，探究军阀词语的发源固然为求其古的应有之义，发端之后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应用以及与之相关搭配的组合词语的变化，如北洋军阀、北洋团体、北洋派、北洋系、北洋政府等等，同样是求其古的重要内容。关于军阀和北洋军阀概念的先行研究，多注意探究发端，却未能以同样的态度寻绎衍化的复杂进程，反而再度陷入定义的泥潭。

三 “北洋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军阀词语的使用逐渐占据垄断地位，表明政治分歧很大的国共两党以及海峡两岸在这一正统观念上面的大同小异。而相关研究领域的严重滞后，与这样的观念过度运用显然存在关联性。如果不戴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只要不是有违事实，所谓正统观念，未必一定造成历史认识的负面影响。所以，关键是看道理或理论能否将所有史事贯通无碍。概括后来的定义，北洋军阀概念最为重要的内涵有两点，一是地方，二是私兵。以此为据，用于考察军阀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用于概括国民政府之前的国家政权乃至整个民国的基本形态，则难免捉襟见肘，存在很大的检讨空间。

“军阀”一词进入中国之时，虽然指段祺瑞等为“军阀领袖”，但是并没有“北洋军阀”的名称。从军阀到北洋军阀，发展相当快速。有研究指出，1919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就说：“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不过，此说出自他人的记录，而且看起来北洋军阀似乎并非专有名词，北洋只是军阀、官僚、政客共有的限定词。至于接下来的指证，为1923年李大钊的《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并且据以断言，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或政治名词，是在民国十年前后形成的[15]，则稍嫌太晚。

实际上，至迟到1917年，“北洋军阀”已经成为指向确定的专有名词。《申报》1917年7月15日的消息《鄂湘北伐军撤回之内幕》就明确写到：

因近日西南民党中激进派不认冯、段为总统、总理,拟在粤另组政府,遥戴黄陂,并欲乘讨伐张勋之便,进兵征讨前次独立诸督军,以冀推倒北洋军阀势力。[\[16\]](#)

由此开始,“北洋军阀”的指称就不断出现在《申报》的各个栏目中。到1919年11月,已是屡见不鲜。如《申报》1918年6月27日的《安福俱乐部之内幕》:

王揖唐氏等所办之安福俱乐部,为此次新选举之中心机关,俨然为一政府党之雏形,其性质若何,内容如何,极为一般所注意。按该俱乐部创设之初意,系以纯北洋军阀为中心,联络接近段内阁各派而创造一政党,交通系一部分自亦包括在内。故世间分交通系与安福俱乐部为二者,昧于其中之真相者也。[\[17\]](#)

该报1918年10月17日署名“静观”的《北京特别通信·北京党派之分合》称:

曩者段派挟金钱与武力,结合新旧交通系,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政,徐东海之得为总统,彼党之力也。不意今日形势乃大变,而赫赫之安福俱乐部,将呈瓦解土崩之象矣。其所以致变之原因,一则以党员之集合,本非由于一定之党纲。当国会初开幕时,即有分裂之征兆。嗣以议员每月各发津贴三百元,乃得维持于一时。则其纯为金钱而来,已可想见,乌合之众,在理定难持久。二则因交通系之独立。交通系在安部本占有势力,其根据全在经济方面,虽武人之拔剑击柱,势亦无可如何。前者梁士诒氏颇主张废弃武力政策之说,冀以和平之局由彼手所造成,因此大悖段派之意,暗潮之生,已非一日。至近日选举副总统,而交通系独立之态度始明。三因徐东海之意向。东海元首之资格,产自安部,饮水思源,固不能忘情于旧雨。然为巩固一己地位起见,既不能开罪于北洋军阀,亦不肯见外于交通团体。若二者相

比较，则借重据有金钱势力之交通系，尤亟于借重据有武力之北洋派也。何以故，交通系有梁氏为之魁，梁前此回粤，且曾与南方为一度之接洽。在徐氏眼光中，将来收拾时局，必须借重长才。北洋系虽暗唔咤叱，然主战一派究竟只占半数，如冯氏一系，固与主战派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18\]](#)

同年11月14日，《申报》刊出10日署名“飘萍”的《北京特别通信（二一七）》，其中提到：

前内阁历来之谬策，在欲以无能力无信用之虚名政府，降服昌言护法远在南服之五省一方，西南之军政府亦有不从事实着想，纯以理论希望对于北方之犁庭扫穴，根本上灭绝北洋军阀之地盘者，是皆不以对等看待反对派，足为时局前途之绝大障碍者也。[\[19\]](#)

12月13日，署名“默”的杂评《北方之总代表》则称：

所谓总代表者，总各派之势力而代表之是也。北京某党论总代表之资格，谓须可以代表东海，代表合肥，代表北洋军阀，代表国会本党，而后合总代表之资格。然此犹就一方面言也，其他尚须代表河间，代表黄陂，代表文治派，代表反对党，以一人之身代表一切，混杂相反之势力而督以成功，难矣。况乎所谓真正民意尚不在代表之内。[\[20\]](#)

上引各条，“北洋军阀”都是作为专有名词，使用者不仅指向明确，而且与南方国民党、交通系等其他政治势力相区别。

时代的因素和作品的影响交相作用，国共双方异口同声加以痛斥的北洋军阀的名头，通过北洋军阀史的书写永远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不过，无论是否军阀，抑或是否北洋，通行的用法都有些随意。由中国新史学会组织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中，《北洋军阀》是唯一由两班人马分别编辑出版了两套的史料。尽管大的框架与整个资料丛刊系列相一致，观念也是大体相同，但具体取材和编排结构还是存在不少差别。而天津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将徐世昌、黎元洪、吴景濂与袁世凯列在一起，不仅算作军阀十分勉强，连北洋也不无可议。

北洋军阀的概念，或隐或显地散发出蛮横、愚昧、霸道等等信息，在这些不言而喻的潜台词的作用下，张宗昌其人其事屡屡被拿出来作为形象代表。其实，清季以来的新式军人系列中，北洋军人非但不是文化素质最低，反而可能是较高的。尤其是军官，出身军校者甚多，特别是高级将领当中，像徐树铮那样令不少学者也激赏不已的儒将固然只是出类拔萃的少数精英^[21]，却也并非例外，而如张作霖那样胡子出身的大老粗则未必很多。因为有文化，在与秀才正面遭遇之时，相对而言不算太不讲理。此外，割据政权虽然必须凭借武力，可是彼此相对平衡，反而不能全凭武力，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只能维持在藩镇一级，国家政权层面很难单靠武力长期支撑，所以中央政府更迭的频率极快。在势均力敌之中，政客纵横捭阖的作用受到重视，北方的徐世昌和南方的岑春煊，手中都没有兵，却分别在南北政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将领好文，幕僚自然不能弄粗。清季幕府能人辈出，北洋集团的幕府更是藏龙卧虎。其他不论，清代桐城派为影响最大的文宗，五四前后一度遭到章门弟子和新文化派的猛烈抨击，一时间大有被妖魔化之势。不过，后来章太炎还是承认，天下文章十之八九出自桐城，世人能文，桐城义法居功至伟。咸同之际，理学复兴，桐城派随着曾国藩东山再起。虽然因为风格有异而被称为湘乡派，以示区别，毕竟存在渊源脉络。曾国藩移驾直隶，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北洋成为晚清桐城派的东主。曾国藩之后，桐城名士及其弟子传人转而跟随主政北洋的李鸿章、袁世凯。严复、辜鸿铭等成名的西学之士，也相继投到桐城门下，才能进入文苑。严修出任学部侍郎，部分桐城派人士随之入京，进入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民初袁世凯死后，幕下的桐城文士出关到东北襄助举办文化事业。

研究北洋军阀的缘起，往往指责该集团具有私人性。其实北洋新军是清政府的制军，也就是军制改革后的常备军，属于国防军性质，与湘淮军起于乡勇截然不同。北洋集团的兴起虽然因缘于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其将领彼此之间私谊不错，利害相关，却不能简单地说是私人化的群体。清制，职官内外、文武重重分权制衡，以确保皇权至高无上，历代的诸侯、藩镇、宦官、外戚以及相权威胁皇权之事，基本不再为患。即使起于地方的湘淮军，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也不可能单凭武力问鼎大位。清季封疆大吏中间未必没有怀抱帝王之志之人，却苦于没有可行之势与可趁之机，无法轻举妄动。如果北洋军真的具有私人性质，摄政王绝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悍然将北洋首领革职罢官。况且，就算载沣不知天高地厚，胡作非为，即使袁世凯能够隐忍一时，北洋官兵也绝不肯善罢甘休。以北洋军的实力，若是齐心发动兵变兵谏，清廷很难有招架还手之力。

袁世凯政坛发迹，绝不仅仅因缘于练兵，更重要的还是兴政。直隶办新政与湖北南北相望，取径不同，做法有异，均为各省仿效的楷模典范，这让袁世凯取得重要的政治资本。北洋一脉哄抬起来的吕碧城，在兴女权方面也别树一帜，竟能与鼎鼎大名的秋瑾分庭抗礼，相得益彰，以致让秋瑾本人自觉略逊一筹，将碧城的名号拱手相让。民国后北洋集团虽然越来越倚仗军事武力，却不以军人为范围，民国首任国务院总理唐绍仪即为北洋要员，与“北洋军阀”词语的形成关系密切的安福俱乐部，其成员多为议员政客。

袁世凯在宪政方面本来很想有所建树，不料政坛失足，被迫退隐江湖，其抱负通过与之交好的立宪官员继续影响甚至左右清廷的宪政进程，以致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满，指为丙午遗孽。关于清季的新政与预备立宪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一书认为：

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日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

作者主要是想强调清季十年间受到明治日本的影响，中国的知识与制度整体上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化，“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十二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22\]](#)。

由清廷主导的新政与宪政进程，被突如其来的革命所打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选择，是更加激进以躐等，还是回归守成以复辟，仍然充满变数。袁世凯当权时期，民国政府的制度设置延续清季新政宪政的变革路线，确保各种体制脱离皇权旧轨，走向近代科层制。所以有前贤说，如果袁世凯不称帝，或为近代中国一大伟人。剔除后来倒述的成分，此言不无道理。

四 “北洋军阀”的谱系

由于北洋军阀的他指与后认，北洋军阀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军阀概念，长时期处于不断被谱系化的过程。1919年以后，“北洋军阀”的指称更加普遍，而其内涵外延却有所变化。虽然“北洋军阀”的名词已成专有，可是究竟指谁，或谁被认作北洋军阀，却言人人殊，大体上经历了由略到详的演进过程。在此进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派系呈现不断增多之势，最近集大成的是归纳出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派系军阀。诸如此类时间越晚越详尽清晰的谱系化，看似各有实事为据为本，实际上与历史的进程状态并不一致。一方面，派分的界限过于绝对，另一方面，不少谱系化发生于军阀的历史结束之后，而构成了人们心中的历史，形成另一条历史演化的轨迹。

浏览相关资料，可见“北洋军阀”词语在各种报刊书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两个时期，一是袁世凯死后直皖冲突之际，一是国民革命

北伐期间。两个时期相较，虽然同样使用“北洋军阀”，所指却有所分别。

在“北洋军阀”一词出现之前，虽然北洋、北洋派、北洋系、军阀等等说法已经通行，可是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将北方的军阀一律统称为北洋军阀，至多只是从南北对立的角度，泛称北方军阀。与近代中国许多专有名词的出现受日本的影响制约，所指往往形似而实不同相仿佛，习惯于派阀政治的日本，好以派分的观念看待评论中国的政局。熟知内情的当事人，对此还具有相当的自觉，虽然沿用，却有所保留。《申报》1917年6月3日署名“心危”的《东京通信（十）

（五）·东报评论中国政变与党派》，在介绍日本关于中国内阁变动的形形色色之评论，尤其是好用派分观念的同时，特意声明：

但记者先有一言，颇为读者告，即外人言论之含讽劝者，可作为他山之石，其叙述政界内容者，亦得一部分真象，然不免有过度之观察，尤以对于派别相互之关系为甚。如东报所称民党与官僚，南派与北派，军阀与非军阀，直隶派与安徽派等名词，吾人不认之为确当。因国内之有派别，不必讳言，但非画若鸿沟，其间尽有连带之关系。若谓此系某某二派之冲突，某派胜某派败，皆无当于事实也。而东报每有此等见解，兹姑亦仍之，以存其真，非确认其言之当也。惟恐误解，故先释之。[\[23\]](#)

三年后，军阀的谱系逐渐清晰化，可是派系的分别与联系各说不一且与今有别的情形依然延续。1920年初，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六号发表《军阀亡国论》，虽然声称军人在社会上已经组织了特别的系统“军阀”，具体的谱系与今日仍有很大分别，他说：

故近日所谓北洋系，西南系和东三省系，直隶系，安徽系，云贵系，广西系等，就是南北军阀所专有的名词。[\[24\]](#)

在此，北洋系的称谓虽已成为专有名词，与其他各派的关系以及内部的派分所属仍然没有固定，有时甚至未必是专指军阀而言。

已经征引了上述两条资料的徐勇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直皖战争期间的电报战揭示，军界较早使用“军阀”的是直系军人。但是，在段皖一派电报中，尚未发现使用“军阀”加以回击的情况。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段皖不愿意使用军阀概念，但是足以表现军人运用军阀概念的较迟与渐进的特性。[\[25\]](#)

此言前半所指出的情形，的确至关重要。可惜后半的解释，未能抓住关键，轻描淡写，反而显不出应有的重要性。实际上，“军阀”乃至“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正是所谓直系用来口诛笔伐大权在握的段祺瑞、徐树铮以及安福俱乐部的利器。在此过程中，“北洋军阀”的概念集中呈现第一波谱系化的演进，而最早进入北洋军阀系统的派系，正是冲突的双方即皖系和直系。

1919年9月10日，《申报》刊出一则新书广告：《北洋派之怪物徐树铮》先行发售预约。据称，全书十五万言，采辑者十余人，调查经七八年，由玉田老人马二先生主撰，定价一元二角，预约六角，外埠加寄费一角二分，上海新闻新康里一一七四洪社出版，代售处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局。该书的章节内容为：一、徐树铮之少年时代；二、徐树铮之入军界；三、徐树铮与段合肥之际遇；四、徐树铮经济上发展之由来；五、徐树铮之任陆军次长；六、徐树铮之被查办；七、徐树铮之任国务院秘书；八、徐树铮与新交通系；九、徐树铮与张作霖之结果；十、徐树铮之任奉军副司令；十一、徐树铮枪毙陆建章；十二、徐树铮与张作霖之嫌隙；十三、徐树铮与安福部；十四、徐树铮赴日观操之大活动；十五、徐树铮之任西北筹边使；十六、徐树铮与北京学潮之关系；十七、徐树铮之希望与将来。

这一新书看似徐树铮的个人传记，但是，由于徐树铮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国内政局的时势节点，实际上成为“北洋军阀”成形的重要载体。新书广告的宣传词正是以此为要点，刻意将徐树铮与“北洋”、“军阀”联系在一起：“欲知北洋派之内容者不可不读，欲知中国军

阅过去之秘密者不可不读，欲知中国军阀将来之结果者不可不读，欲知中国最近种种关系者不可不读。”其内容简介进一步鼓吹道：

谈近时中国之政潮，莫不注意于北洋派，而北洋派中有一怪杰曰徐树铮其人者，彼实为段系之灵魂，亦近时北洋军阀之主动的人物也。凡中日军阀之携手，中日借款购械等密约，北洋派之携贰，新国会之安福部，北京学潮之起伏，皆直接间接有多少关系，简直中国事无巨细，几全经彼人之手，一若中国之生之死，惟视彼一人之播弄者。如此重要的人物，安可不有记载，以促国人之注意乎。兹由玉田老人马二先生辑其生平事迹，编纂成书，以精密之观察，作正确以记述，不拘成见，不涉偏袒，诚吾国最近之重要视线，国人幸勿漠视之也。[\[26\]](#)

如前所述，“北洋军阀”一词，至迟出现于1917年，较原来确定的1919年早两年，而且一开始矛头所向，就直指执掌全国政权的段祺瑞及安福俱乐部，而徐树铮正是安福俱乐部的要角。虽然从各种书目及相关著作的征引文献中，尚未找到该书已经正式出版的记录，可是仅仅从广告词所示，不仅具有北洋军阀的一切要素，而且明确使用了“北洋军阀”的词语。加上借由《申报》这样覆盖广泛的媒介传播，其影响不言而喻。

这时媒体使用“北洋军阀”的概念，既有相对于南方或西南而言，也有特指段祺瑞一派之意。如《申报》1920年6月11日的消息《祸机四伏之中州·吴佩孚军已抵郑》称：

我国内争将近十载，而军事集中点常在南部，如辛亥之武汉，癸丑之金陵，洪宪时代与近数年之蜀、湘、闽、粤等省，皆疮痍满目，烽烟遍地。河南独得邀天之福，偷安数年。自北洋军阀内讧，直皖两系，明争暗斗，河南一片干净土，遂大为两系所注目。赵倜初本无党，督豫以来，仍持其不党主义，与直皖两系均极力联络。及易督风潮起，直系与赵携手，而为之声援者，惧皖系抚有兹土，横断南北，拊其背而扼其吭也。故赵倜之去留，

实与直皖两系势力消长关系极大。数月以来，易督之说虽中止，然皖系要人，处心积虑，仍未尝一日忘情于河南。顷者吴佩孚撤防北归，皖系有派兵赴陕说，有督办剿匪说，又有曹錕阻拦于黄河桥头说。因而豫当局亦借四省联防名义，调有重兵在归德方面，恭候大驾。[\[27\]](#)

此处“北洋军阀”便包括直皖两系。而《申报》1920年8月10日《外人对于吴佩孚之论调》引北京《益世报》的评论云：

此次铲除安福，捣破北洋军阀之老巢，凡我国人，莫不推吴子玉将军为首功。日昨本社记者会访在京之英美记者，谈及我国时局，历至数处，咸不约而同，对于吴将军为极端之称扬。英国记者某君云：据余所观察，吴佩孚将军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又一记者云：吴佩孚之主张大公无私，曹、张两使，若能尊重吴将军之意见，惟吴之言是听，则时局必能彻底解决，中国之兴，亦可立而待云云。记者因以外人如此推尊吴氏，殊出意料所及，深愿吴将军有以自勉焉。[\[28\]](#)

按照今日的认识，段祺瑞和安福系固然难逃北洋军阀的指责，可是相比之下，吴、曹、张等人更加具有军阀的性质，同时也不少北洋的关联。本来是北洋军阀当中重要的直系，作为重创皖系的力量，在以上叙述中显然被置于北洋军阀的对立面。

关于北洋军阀的谱系化著作，最初一轮集中问世于1919、1920年，除了《北洋派之怪物徐树铮》外，如温世霖的《段氏卖国记》，张一麐的《直皖秘史》，南海胤子的《安福祸国记》、鸿隐生的《安福秘史》，信史编辑社编辑出版的《段祺瑞秘史》等。由于举国反段（包括与北方对立的南方各省也拥冯反段）以及皖系战败的时局背景的关系，这些书籍的作者编者主要是与直系或南方关系密切的人士，因而主导的倾向就是揭露批判抨击段祺瑞、安福部首领徐树铮及皖系。

袁世凯在位之时，政界便有派分，北洋派为其中之一，其范围主要不在军界。如《申报》1914年6月1日的北京专电称：

交通部内外营私，政务紊乱，梁敦彦就任后，部事渐定。据华报载称，梁入政界，粤派乃得转弱为强。按粤派近与皖派抗衡，北洋派今大占势力，与两党与有不利云。[\[29\]](#)

同日，该报还刊载了署名“默”的杂评《今日之所谓派》，对北京政界派系林立的情况予以讽刺：

今日之言派者，谓总统府有北洋派，有淮派，有粤派，此就政事堂中人物言之也；参政有大官僚派，有法律派，有军人派，此就参议院中人物言之也；陆部为皖派，海部为闽派，交通为粤派，司法为浙派，教育将为鄂派，此就各部中人物言之也。此外有所谓新式派与旧式派，又有所谓东洋派与西洋派。自政府改组以来，他无所表见，所表见者，惟此派而已矣。派之义，即私之代名词也。各尊其派，即各顾其私，派愈多，即争私之见愈甚，宁有良果哉。[\[30\]](#)

两天后，《申报》又转载了《西报之各派势力消长谭》：

《字林报》五月二十七日北京访函云：自总统制实行后，京中各界皆盛谈各派势力消长一事，皖粤两派，均未得利。皖派之领袖，武员为段祺瑞，文员为杨士琦。然杨仅得一政事堂之左参丞而已。粤派之领袖为梁士诒，则已退出总统府，而居税务监督之闲曹。至最占胜利者，则不问可知其为徐世昌领袖之北洋派矣。三派之中，北洋与皖派尚有融合之望，而粤派则与以上两派大相反对。粤派中人，多主张进步主义之南人，而在交通部及其

他一二部占有位置者，南北派之畛域不能消除，亦即为此。故袁总统虽屡言彼固北人，然用人无分南北，此徒空言而已。今政府之大权全握于北人之手，此可谓实予南方党人于南部及中央各省煽乱之机。加以目下新旧两党争存颇力，政事堂公所设置参事八员，即为位置新党，俾与乱党断绝起见。此参事八人之责任为审查法令之草稿，一伍朝枢曾留学海外，为国民党员翹楚之一也，一为林长民，曾留学日本，为进步党员矣。[\[31\]](#)

由上述报道可知，北洋派本来并不专指军人，亦不如所谓文武北洋之说，而且段祺瑞的皖派，有时还自成系统，不在以徐世昌为领袖的北洋派范围。

袁世凯死后，其北洋旧部军人跻身政坛，相互争权。经过一番混战，段祺瑞占据上风，掌控实权。此时的段祺瑞，由徐树铮组织的安福俱乐部网罗了许多政客和军事将领，以北洋正统自居，势力膨胀，以至于很快出现一种说法：“所谓淮派，乃自前清李文忠以来一种无形之结合，北洋派之神髓也。”[\[32\]](#)本来与北洋派分庭抗礼的淮派，也就是皖派，变成北洋派的核心主轴。直到1917年4月，邵飘萍等人还在谈论淮派与北洋派结合的问题，而以李经羲为淮派的中坚人物。[\[33\]](#)

令皖系始料未及的是，苦心经营令声势达到巅峰之际，也就是成为众矢之的之时。而有实力与之抗衡并构成冲击之势的，正是原来同伙的直系。《安福祸国记》于此颇有见地：

袁项城歿，北洋军阀始有皖、直之分，奉阀则后来居上也。安福部组织之初，谓其蓄意与直、奉为难，决无此情理。即拥戴东海为总统，亦是一番好意。如此结果，亦安福部所不及料耳。[\[34\]](#)

当时媒体的报道颇能与此说相印证，《申报》1916年10月2日的“北京特别通信”称：

近日最流行之传说，甲方则言某派相合，将以勾结外人，断送主权，打破北洋派军人之势力，以起北洋派军人之疑。而与之对垒之乙则言，某派与帝制祸首及无识之武人相结以求，摇动国本，破坏国会，干涉宪法。如此两方，可云旗鼓相当，应有尽有。故如青木之拟聘为顾问，一方主张之，一方竭力攻击之，所谓勾结外人之一端也。然合同之中，究竟如反对者所言与否，殊难武断。吾人方望其宣布，以辨是非，明曲直。至于打破北洋派之说，则理由有未尽合。盖段祺瑞固可视为北洋派，然各派固一致为通过于国会，即如冯国璋，亦可视为北洋派。然冯之态度虽未可以十分表明，而其臭味，则对于张勋之流，尚不及对于人所称为欲打破北洋势力者之为融洽。盖所谓北洋派中，分歧亦夥，今混而言之，可见其说不足信也……吾欲有为两方告者，恐帝制祸首从中播弄，使两方如鹬蚌之相持，而彼乃来收渔人之利耳。甲派也，乙派也，武人也，政客也，其殆尚皆梦梦而有觉耶。

[\[35\]](#)

照此说法，不仅各派之间的联系分别言人人殊，有的指称还是居心叵测。同年12月20日，《字林报》就北京政府的内阁弹劾案专门采访了中国的知情者，尤其关注幕后的派系分合，大体可以解释上引消息中的甲乙各方究竟所指为何：

北方以北洋派为最有力，其组织分子悉为军界要人及守旧之政治家，如徐世昌即其一也。从前徐之资格在段、冯之上，今段长陆军，掌供给军队升降军官之权，故北洋派领袖一席遂为段所得。袁氏之所以能居高位握大权者，以北洋派听其指挥故，而袁氏之所以帝制不成者，亦以北洋派要人如徐、段等不尽赞成之故。至于袁氏旧人，多隶属北洋派，此固事实，然北洋派今已不复为坚固莫破之党派，各领袖意见不同。闻段总理曾与直督曹錕齟齬，曹当云南起义时，统带北军入川，为赞助袁氏最力者之一，其与段齟齬，则以段未共助袁氏以成帝业为原因。段虽为陆军总长，然其势力仅及于全国北军四分之三。盖北洋派已分为直隶与安徽两系矣。曹錕为直隶系领袖之一，参谋长王士珍亦属此

系，党势日盛。国民党之一部，刻方与此系接洽，以期互相联合，反对段氏。而有特殊理由以谋推翻段氏之孙洪伊，亦与直隶系共策进行，极力诱引冯国璋，使之归附直隶系。冯素主张维持现内阁，对于段之行动亦有不表同情之处，故冯之转其方针移其势力以助改换政府人物之举动，或亦意中事也。总之，段之为 人，其伟大尚不足以胜其任，段于国事不甚留心，且闻段于国务会议时，辄昏昏欲睡云。

其次与时局有关系者，厥为张勋。皖省税项他人不得过问，惟张可以征收，以供养其部下军队。张之行为，人不敢訾议，张之势力为且为北京所敬畏。与张为伍者，有皖省长倪嗣冲，倪亦袁氏忠仆也。段总理前运动张勋发起徐州会议，张因此为总统所呵斥，遂大怨段氏。倪与段在帝制问题中处于对峙之地位，故倪亦不助段。张、倪皆有兵力，目下虽似无独立行动之形势，然其举足轻重，亦正未可忽视之也。

再次者为冯国璋。冯本军人，与政党无深切之关系，颇能表示其政治上之能力。赣、鄂两省，惟其马首是瞻，虽部下兵力无多，要其势力，足以左右两邻省之军人，且曾为北洋军官，全国陆军中不乏知交。再冯从容坐镇南京，秩序无扰，威望卓著，尤其重要，将来总统一席，冯颇有望。以其政绩言，冯确有总统之资格，守旧派对冯固无间言，而国民党亦信任之，故举之为副总统。若冯氏者，诚可谓今日最有势力之人物矣。

上述诸人，统而言之，吾人可谓之为军人派，与革命分子适相反。若军人派果能团结一气，则不难如袁氏之所为，一举而扫除国民党，解散国会。但军人派殊不团结也，彼此仇忌，互相离异。故就目下情势而论，国民党似为国内最有势力之一党，凡政府所提出之事件，彼党在国会中足以打消之。段氏依赖北洋派之皖系而成内阁，惟皖系之力量不能与国会抗衡，苟不与直隶系提携，则皖系不足以有为。是以国会目下似无虑军人之干涉，而国民党之地位，亦较前为强。各方面因宪法之观念，未敢轻举妄动，国会苟无重大愚妄之行为，当不致被人解散。但国会若干预行政，逾越分际，反足促成军人派之和好，而使民国二年之政变复见于今日。国会其以常识行事而防此变欤。[\[36\]](#)

这样清晰的条理系统，已经朝着1920年前后的谱系化迈进，而其他亲历者当时的认识多少有些出入。1917年5月，《文汇报》报道总统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之事，就不无感慨道：

盖近来北京政治复杂纠纷，虽消息灵通之华人，苟非身临其境，亦未能尽窥其内容也。就广义言之，南北之歧异为世人所略知，北洋派与皖派之存在，亦为吾辈所久悉，至于两院政团与军党种种派别，则难尽晓。所可知者，北京近为各种阴谋之集中点，较之前清时代为尤甚耳。[\[37\]](#)

当然，即使按照《字林西报》的说法，不仅派分的情况错综复杂，而且与后来的谱系仍然不尽相同。

用派分的眼光观察民初政局，显然受到异域观念的影响。时任云南都督府参谋处长的李宗黄，就反对用南北等派分观念言说时政，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一致，不像欧美各国，内部常有人种派别之争。即使暂时割据纷争，终将归于统一。至于当下的乱局，主要是袁世凯施政和日本人的阴谋所导致：

自项城以北洋武力秉政，其根据全在北方。二次革命之后，有客卿有贺长雄者献议，略谓中国南部人民，偏于进取，故其思想浮动，北部人民，偏于保守，故其思想沉滞，宜以北方之武力与南方之文化相为抑制，以期调节云云（见有贺氏所著《观奕闲评》）。其表面以抑制调节为词，实即以北制南，渔翁得利之策。袁氏民国三四年之设施，即阴行其策而扩大之者。及段祺瑞起，遂有以北洋派统治全国之宣言，而各军政要人，亦公然以巩固北洋团体相责劝，于是北派、北系、南派、西南派之名词杂出，南北之论大起，至以护法战争为南北战争。呜呼，因袁、段个人权位之私，设为南北畛域。[\[38\]](#)

为此，他呼吁打破南北畛域之谬说，以防落入日本人设下的陷阱。按照近代以来的民族分别之说，多族杂处的云南人氏，反而最不愿意他人指其为少数族，以为带有歧视性，这也是该省各族相安无事的重要原因。李宗黄的主张，旨在破除北洋专权和派系之争，化解日本的阴谋。只是事与愿违，军阀相争的局面还将愈演愈烈。

五 奉系的加入与北洋正统

《安福祸国记》指奉系为后来居上，其实所谓奉系的指称及其与北洋派的关系，也经历了逐渐谱系化的过程。至少到1917年5月以前，一般而言，北洋派或北洋军系统中没有奉系的名目位置。其时各方就内阁组建和总理的人选纷争竞逐，邵飘萍对此分析道：

盖所谓北洋系中，约分三派：（一）安徽派；（二）直隶派；（三）湖南派，而冯、段、王实分领之。三人之意见，言其内容，并不十分一致，因之各派亦各稍异其目标，分合无常，向背靡定，大约以地位权势为转移，真能共患难同生死者，吾敢言其无几人也。此次来京之督军，以直隶派势力为最盛（如曹琨、孟恩远、田中玉、李纯等皆属之），安徽派次之（如倪嗣冲、李厚基、张怀芝），湖南派势力较微（以傅良佐为主干）。故如倪、张、李之流，则于派别及个人关系，皆以维持段总理为最有利。倪、张、李之运动最为剧烈，盖以此也。至直隶一派，则大致固在维持北洋系，而内容万一段总理不能维持时，即主张扶掖王聘卿以继其任，公私两益。[\[39\]](#)

也有报纸根据各方的具体政治主张和拥戴的人选进行划分，认为：

要之，以现在政象观，北洋系之内幕，可略别为五派，一为推徐东海为总统，段芝泉为总理者；二为推张勋为总统，李仲轩为总理者；三为维持黎总统之地位，令段芝泉复任者；四为中立派；五为复辟派是也。惟时至今日，各派均知动摇元首之位置极不利益，故稍变方针，仅从事于总理阁员之竞争。而五派中最有势力者，只段、李两派而已。盖段派有徐东海领袖群豪，李派有张定武统率诸雄，各据其特有之地盘，固势均力敌也。[\[40\]](#)

无论依据如何，分别怎样，北洋系中均无奉系。奉系名目的出现并成为北洋后来居上的一支，形成于1918年以后段祺瑞的左膀右臂徐树铮、靳云鹏相继引奉军入关，干预政局。段祺瑞交出兵权出任文职之后，因为没有私兵，虽然掌控国家大政，却处处受到拥兵自重的各派势力的掣肘乃至挤压。为了摆脱困境，徐、靳二人彼此争功，迭出险招，几度利用张作霖的奉军对抗直系，逼后者就范。而直系方面，为了打破平衡，也极力拉拢奉系。双方都试图给予奉军以北洋正统的地位，以争取后者的支持。

1918年10月，曹锟派其弟曹钧到奉天，与张作霖疏通南下问题，理由为：“现下时局之待解决者，南北和战问题尚在第二步，统一北洋团体实为第一步。数月以来，北洋团体或主和或主战，已呈分裂景象。中央为统一计，决定将副座选举曹锟，俾将来无论和战，北洋团体不至瓦解。”[\[41\]](#)“自奉军夺械入关以后，奉省举动极为中外视线所集，盖直接的已成为北洋团体之关系，间接的实成为全政局之关系矣。”[\[42\]](#)正是由于关内各派军阀势均力敌，关外的奉系才成为决定天平倾斜的砝码。据说直到1926年，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还试图劝张作霖领袖北洋派，实行讨赤。[\[43\]](#)

奉军入关，不仅成为影响政局走向的重要势力，而且与北洋的关系由历史渊源变成实际联系。然而，受到冲击的一方对于奉系的介入不以为然，竭力维系所谓老北洋的利益共同体，否定非小站系统的外人，以免在与南方的对峙中失势。《申报》1920年3月25日署名“般若”的《北京通信·段徐与曹张》，详尽分析了八省同盟反段的来龙去脉：

此次内阁风潮，靳之所以不倒，安系所以不胜，与夫赵倜之不能换，吴佩孚之撤回防军，在在与督军团有关。所谓八省同盟者，质言之，即奉天张与直隶曹之联合，而其最大目的，则在反对段氏。然曹、张二人之中，曹较糊涂，其主动者实惟张氏。且曹氏为旧北洋派，张独不然。此次阁潮、豫潮，最后出大力者又为张氏。各报所传张致段之函，实共十八张。先言豫督之不应换；继言段派之张敬尧、陈树藩在湘、陕两省民怨沸腾，不此之换，而欲更豫督，令人不平；后言靳为公之私人，尚不为左右所容，则将来必致亲离众叛，心所谓危，不得不作最后之忠告。段氏阅之色变。故最近冲突之最大者，实惟张作霖，而视为比较的易与者，则为曹锟，加以吴佩孚决意撤兵，而退驻地点则为洛阳、石家庄、马厂等处，有须边防军腾让者，其中大有势力消长之意味。故自安系一度失败以后，即腐心于八省同盟之打破，而认定从联络曹锟下手，或使与张作霖实行分离，或引起各省对曹之猜疑，而使之无形涣散，为最紧要之计划，日来即着手于此。以记者所闻，计有二事：

第一，前年曹锟在汉，已相传有反对段氏之动机，经段赴汉一行，又允以四省经略，许以副总统，曹复为用。故徐树铮即促段氏再袭陈文一次。十八日，段氏亲赴保定与曹锟面谈，其谈话之大要，即谓吾辈小站老弟兄团体不可涣散，尤不可为非小站旧派中人所利用。以声泪俱下之词，为置腹推心之语。且（一）陈说与张作霖联合之不利；（二）痛言自己破裂即增长西南气焰，和议上北方必大吃亏，为北洋系切肤之痛。曹氏对段已有面允之词，故段氏归后，即纷传此行效果殊佳。而段氏亦致电话于东海，谓已晤仲珊，此心无他云云。然而段氏赴保之晚，奉督署驻京之某氏即赶赴保定，其为对于段氏此行之反动，不问可知。故曹之入彀与否，当是疑问也。不过外间传闻段允以副座予曹，曹或因此心动耳。

第二，八省以外尚有未入同盟之督军，且与段系较为切近者，即由徐树铮交出一稿，嘱其驻京代表致电本省督军，略谓靳某奉张作霖为盟主，以破坏北洋系旧团体，以与合肥相抗衡，且将牺牲新国会，牺牲湘闽陕各省，以联络南方，期得为统一后之第一次内阁。北洋系为自救计，不可不谋新团结，以抵抗此种暗流。[\[44\]](#)

显然，段祺瑞就是竭力要将奉军与北洋系加以切割，以便打破八省同盟，拉近直皖等老北洋的距离。奉系战败失势后，有人指出：

按北洋派别，自北洋军队之历史观之，有皖、直两系之分。自段祺瑞主张武力平南，招致奉军入关，而奉系之名称由此创始。自奉直战后，直系握北方政治中心，始有直派反直派之别，奉、皖则均归纳于反直派旗帜之下。而直系之内部，又以地理历史上之关系，有津、保、洛三系之分。惟保、洛为直系中之军派，而津则为直系中之政派。[\[45\]](#)

1922年，《申报》刊登了国闻通信社翻译的《字林西报》北京通信《外人论中国之政局》，论述中国政坛派系林立的情况及其成因趋向、各派错杂复杂的关联和根本解决之道，颇具洞见：

中国之政局，全为一人的问题，其安静变化，悉视人为转移。民国十年以来，既无有组织之政府，所谓以人作政事标准之征象，日益增多，而争攘政府大权之人，亦日益众。当袁世凯秉政之日，各种政治，咸集于袁之一身，凡拥政府者，亦即拥袁，反对政府者，亦即反对袁。其后冯、段两人渐现身于政治舞台，利用自身握有军权，各自养其势力，于是政局中乃有北洋两派之出现。然其时政局之形势尚不复杂。其时南方则坚持反对北方之态度，皖、直两系乃各拟联南以倾袁氏。袁氏既死，冯国璋与南方较为密切，遂得被举为副总统，皖、直之争于是日烈。黎元洪失败，冯氏继任之后，两系益成水火。此时北洋旧系除皖、直两系外，尚发生奉系、鲁系、河南系等等，各系人物，又各自成派，而派数已日多。北洋系分裂之后，其影响大不利于南方。缘苏、粤、滇、黔、川等省不复合力以御该系，每一省分反各与北方某一军人表示同情，各省关系遂错杂难解。至于今日，分裂之趋势愈显，国家大受其损失，各派各自为政，以快私欲，于是既无所谓国税，亦无所谓国军，更无所谓国家政府。

皖系失败而后，张作霖乃竭力联络皖、奉、鲁、豫军队及南方各将领以为抗直之计。在表面上看来，张似已告成功，其实则并不然。所谓奉、皖、鲁、豫及南方之联络，仅系表面的而非实质的，主义既不相同，则连络亦仅暂时的局面。而直系之中，则亦有种种党派，有冯国璋之党，有李纯之党，有曹錕之党，有吴佩孚之党。此四党之联络，亦为表面的而非实质的。譬如陈光远，今日当然利于联奉联南，苟奉天与南方形势一变，则为自身利害所迫，又当趋向直系矣。

总之，中国今日并无大军阀党，而为多数之小党，急时则联络，平时则相妒，欲共组成一大军阀党，固所不能。即组成比较稍大之军阀党，亦所无望。一旦某某结合，战胜反对党而后，则其分子又行分裂，彼此复为夺权而争。张作霖近曾声言赞成统一，借以联南，现已与孙中山与南方各领袖结合。张为此结合之主要目的，无非为倾覆直系，实并不在统一。假使吴佩孚因此结合而失败，则此结合终久必仍破裂，吴之余部行将附和张氏，以共抗南方。至吴部虽亦可附和南方，惟两者性质似相去太远。若张为吴败，则直军中争端又起。是故在今日，无论何派结合之下，决无统一之希望，个人之妒心固无从销除也。惟各派今有一目的相同，即逐徐是也。凡曾拥护徐之人物或党派，今日无一不为徐氏所卖，人民对于徐氏亦生厌恶之心，故无论党争如何剧烈，徐盖决无希望。处此种情形下之，中国前途惟有一希望，即冀各党数目愈变愈多，其军力财力愈裂愈细，人民之压迫愈觉接近，痛苦既深，势必反动，则此后或可一变军人干政之局面云云。[\[46\]](#)

北洋旧系的直皖相争及其力量的轻重，决定了双方与所谓北洋新派以及南方军人的关系。到1923年，主张打倒北洋军阀的社会团体所指认的北洋军阀集团，大都还不包括张作霖和奉系，如3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指“现北洋军阀之著名者为曹吴”[\[47\]](#)，7月的工界救亡会则称“北洋军阀中以曹錕、吴佩孚、冯玉祥等为最凶最恶”[\[48\]](#)。而1925年湖南双十节纪念游行大会，呼喊的口号除了“打倒军阀”之外，还特意要“打倒奉系军阀”[\[49\]](#)，以示区别。

北洋军阀的谱系日渐纷繁，除了各方的指称之外，与军阀自己的态度不无关联。开始北洋一词多少还有些正面，加以还有各种名实之利，其他军阀非但不忌讳，反而愿意成为其中一员。虽然南方国民党根本予以否定，指北洋系之特殊势力为袁世凯称帝、段祺瑞专制的根本依托，“故不打破此特殊势力，民国六年大乱可四起也”^[50]，必须极端排除，但也有人主张巩固维持，至少在北洋派自己看来，可以公开坦然坚持北洋的正当性，甚至指与之对立的派系为伪托，将其排斥于正宗的北洋之外。如1917年6月孙洪伊致近畿各军事将领电称：

顷者倪嗣冲借口维持北洋派之势力，而发破坏法纪之首难，张勋亦伪托北洋系之名义，而肆收揽权势之阴谋……张等斯时趾高气扬，自以为执北洋军系之牛耳，睥睨元首，土苴约法，蹴踏国会，而大权在握，大功告成也。呜呼，天下罪恶，自此假北洋系之名以行矣。夫北洋军系为吾国中心势力，此世界所公认，当此外患孔亟，内难频仍之日，具有折冲捍卫、奠定维持之力者，其责任尤为特重。故谓今日北洋军系关系于中国前途甚大，当世识者当亦许为知言。况我北洋军人，秉强毅武勇之精神，抱磊落纯洁之志节，而又皆受有高尚精良之教育，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但能率循法律以内之轨道，无所用其维持，则亦绝无能推倒。乃以五光十色、千奇百怪、儿戏乌合之十九世纪旧式的营伍，竟装缀于庄严灿烂一军系之上而为之代表，并企托疵偷息于其调停支配之下，其盗窃以得志者，又隐然以首领自居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不亦轻中国而重北洋系之羞耶。夫名誉信用，为人类第二生命，而军人尤甚，人心公论，又为世界最大势力，而武力次之。今也倪、张高视阔步，居之不疑，以玩弄一切，而真正之北洋军旅，皆俯首而听，帖耳默认而听命焉。中外之以无法纪无教育视张勋兵者，将一例以视北洋军，至是天下之人心，尚能谅公等否，天下之公论，其又谓公等何也。则名誉信用扫地以尽，失生存之要素，又果何所恃以自立耶。王聘卿有言：毋使北洋系三字为世界一种厌恶名词，诚哉！老成之特识也。吾民输膏血，国家发帑藏，岁费万万以养成此熊罴虓虎之国军，乃为一二奸宄窃用之而败坏之，使陷于自杀之域，岂不惜哉，岂不悲哉。狐也恶其假威，马也去其害群，援非种必锄之义，张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师，泯焚之会元黄戈马之秋。天其佑中国乎！吾北洋军人中，

必有硕德高望、卓绝多英之伦出而领袖之者，是在诸公之爱国自珍也。[\[51\]](#)

这样义正词严地维护北洋的纯正，排斥形形色色的假北洋，与后来纷纷将敌对方归于北洋以便打倒的做法截然相反。照此看来，张作霖同样是19世纪旧式营伍伪托北洋的翻版。可是，短短五年过去，北洋就开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1922年5月29日，《申报》发表杨荫杭（署名老圃）的时评《北洋正统》，表达了时人对于北洋的普遍唾弃：

北洋正统云云，乃丑语也。清朝有北洋正统，未救于清之亡，北洋正统之首领，且以帝制失败。曰直皖战争，曰直奉战争，皆北洋正统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之历史。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乃组内阁，犹推重北洋老前辈为总理，一若非北洋正统不能控制全局者。谈国是犹曰恢复旧会，北洋正统可以巩固，一若以后选举，北洋正统必可操胜算者。不知北洋团体当听其星散，既无巩固之必要，亦无人可以控制。藉曰可以控制也，即直皖、直奉之战，亦可以免，而终不能免者，知其团体早已涣散，固不必燃已死之灰而为之谋中兴也。故今日北方果有人焉，能力矫北洋之旧非，固国人所愿闻。若犹以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

[\[52\]](#)

时隔两年，《申报》又刊登了陆鼎揆的来稿《武力统一与统一武力》，断言内部纷争不已的北洋势力无法统一中国，且反对一切武力统一的妄想，其间亦谈及北洋派的演化：

频年以还，内乱迭起，始而南与北争，继而南与南争，北亦与北争，干戈相寻，如环无端。揆其由来，皆武力统一为之厉阶也。以前段、张、曹、吴等皆欲以武力求统一者，终乃以用武力

而更肇分裂。七八年来，如此类者，书不胜书，今且方兴而未艾也。

刘湘、杨森之徒今已下蜀矣，北方当局且谋大举以图粤，以为羊城既下，然后返旆北向，启关而败奉军，则天下可以大定，而统一于是成功。姑勿论南方军队之果否可以倾覆，关内之力果否可胜关外，以及其他势力果否皆可屈服，即使尽如所愿，举二十二行省之版图，皆入于北洋派势力之下，遂可谓之统一乎？我知其仍不能也。何则，北洋派之中心，表面上似若在曹、吴，而曹、吴以外，其据大郡拥强兵者，不知凡几焉。凡此者，曹、吴之威力，果能使之奉令惟谨而供其驱策耶？今之大患，在封疆则攫中央之饷赋，悍将皆拥庞大之军队。若是者，曹、吴又得而夺其饷赋，去其军队，而使之束手以从命耶？二者既皆有所不能，则粤、奉、滇、浙之属，不属于直隶系，又果何所分别于其间哉。不属于直隶系，固不能使奉曹氏之正朔。及其既属，则除其奉正朔之外，又将奚异乎前。饷税之不入于中央如故，拥兵跋扈者亦如故。中央而忍受之，则藩镇与藩镇以互相扩张势力而致相争，其不忍受之，则中央又将与藩镇争。是则其异乎前者，昔为北洋派与粤、奉之争，今则北洋派之一部分与他部分之争而已。故北洋派举一国而置之其势力之下，即或有之，谓既入于北洋派以后，而统一可以成功，则实万万无此情理者也。

以武力统一国家，其在前史，屡见不一。然其所以成功，则皆有一前提焉，则此武力者必先自统一而后可。彼其首领必能指挥其部属，是以战则有功，成则懋赏，羁之以爵禄，绳之以法令，而莫敢不从也。若今之北洋派，其地位势力与曹、吴相颉颃者，盖以十数，割据之势既成，又孰得而凌其余以为之长耶。以是而言统一，其亦南辕北辙而已矣。

北洋派之不足言统一，固如是矣。若其余诸派武力之不一统，盖亦与北洋派相伯仲。盖其地盘愈大者，其同系下之势力散漫愈甚。此则十余年来内争之所逐渐养成之一种趋势，而无论何种军队莫能逃于例外者也。然则今之欲以武力统一中国者，乌能有所成就哉。[\[53\]](#)

在这样的叙述中，奉系最初仍然和广东一样，并不属于北洋派的系统。后来随着北洋的泛化，才和其他十几派一起统附于北洋。

六 北洋与北洋政府

有学者意识到北洋军阀统治的说法存在争议，而且与事实不相吻合，尤其是袁世凯统治时期，与军阀的概念出入过大，因而将这一时期称为北京政府，而将袁世凯之后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过，段祺瑞的军阀身份认定同样分歧很大，因为他早已交出兵权，成为文官，手下并无私兵。虽然掌控大权，自诩北洋正统，主张维系北洋团体，却很难说是军阀。其北洋军阀的帽子，严格说来还是由北洋系内部的对头直系加诸头上的。

据当事人回忆，早在袁世凯时期，北洋一脉的人物相互之间以及对外就喜欢自称“北洋团体”，偶尔也称北洋派。^[54]一般而言，派分起于势均力敌，各方均不能独大。尽管辛亥之际南北争胜，用尽心机终于登上大位的袁世凯，自然不会畛域自囿，自认为一派的领袖。所以有学人认为其执政期间还有去北洋化的倾向。袁世凯之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一般也不用北洋的名号，在公开文电中，多以北方军人、北军将士自称。倒是下面的文官武将，毫不掩饰地以北洋派自诩。尤其是面临外部挑战时，更加激发内部的北洋共识或是以北洋为号召。1917年11月22日陈兴亚致函徐树铮，就声称：“北洋派为中国中心，中外共认。”希望团结一致，防止北洋派破裂。^[55]

国民政府之前的民国史，除了被称为北洋军阀统治外，建都北京的正式政府，还被称为北洋政府。在国民革命的正统性主导之下，延续清季误解北洋为地方性的观念，也有政治上矮化敌方的作用，旨在剥夺北京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与北洋的渊源极深，府院会里面又存在北洋系或北洋派的主导势力，却从来没有自称为北洋政府。一般媒体也极少使用这样的称谓。以《申报》为例，南京国民政府之前，仅在1924年8月9日的《日将在豫经营水力发电》中，刊载国闻通信社的开封通信时，用过“北洋政府”一词。^[56]“北洋政府”的指称，

到了北伐成功之后的国民政府时期才逐渐增多。尤其是后来的相关研究著述，在不用北洋军阀时期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情况下，指称1928年以前的民初一段，大都采用北洋政府的说法，如《北洋政府职官年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等等，甚至影印出版这一时期的《政府公报》，也要改名为《北洋公报》。时至今日，有的民间公司编制近代报刊的检索系统，还要画蛇添足地将原文的北京政府改为北洋政府，造成诸多误解。

有学人注意到北洋政府的称谓名不副实。2000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出版完全，尹亚伟撰文予以介绍，其中提到第三辑《北洋政府》时，特意说明：“在第三辑编辑出版时，学术界尚称北洋政府，现在学术界已不称北洋政府，而称北京政府。”不过，这一说明显然不能反映全部实情。尽管的确已有学人用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来指称1928年之前的民国政府，却并未形成共识，实际上仍居少数，大都仍然使用北洋政府甚至北洋军阀统治的指称。2010年由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北洋政府档案》，就继续沿用北洋政府的概念，并未改称北京政府。

即使对于北洋军阀之说有所检讨，甚至弃用北洋时期或北洋政府的概念，改用北京政府，观念上往往仍然延续原有的认识。尹亚伟的文章就将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认作“在北京建立了由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权，继袁世凯之后，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相继控制北京政府”，所以，也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府”。^[57]其意主要是为了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相区别，而采用了北京民国政府的说法，并不否认民国政府是北洋军阀的统治。

北洋政府的说法，有着不同的解释，其一，由北洋集团控制或主导的政府。从这一角度考察，则所谓北洋集团，一般还是或主要是军阀。其二，如张玉法所说：“因北京在清代属于北洋（与属于南洋的南京对称），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执政的，多出身北洋军人，这些军人在民国初年往往拥兵自重、据地称雄，被反对派的人称为军阀，因此北京政府时期又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58]

其说试图说明北洋政府、北京政府、北洋军阀统治的关联性，主要依据涉及北洋概念的发生及其所指。对此学界和坊间说法各异，尚

无一定。可以肯定的是，北洋的概念及所指经历了发生演化的历史过程，不同时空状态下不同的人物所说，并非全同，不止小异。在此过程中，后来的沿用也有与原先的本意渐行渐远的情形，而坊间的俗称与事实的本相更存在大相径庭的状况。

北洋原为地理海域概念，与东西南洋相对。关于近代中国的东西南北洋，王尔敏曾经专文论述。概言之，最初东西南北洋均指中国以外的地区，东西洋发端最早，其次南洋，北洋最后。南北洋均有内外两说。南洋原指现在东南亚的诸岛及滨海诸国，北洋则大体为俄罗斯及北欧，后来这一含义的南洋大体沿用，北洋则基本弃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开放口岸，最初开放的五口均在长江以南，继而北方各口陆续开放，分派大臣主持监督管理事宜，长江以南称南洋各口，以北称北洋各口。分管南北各口的大臣原称五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最后定名为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大臣。^[59]

通商大臣一度是临时派差，逐渐变成专职。南北通商大臣先是特派专任，继而由两江（开始由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领。作为清廷办理通商等一应夷务的代表，设置的初衷除了分管通商各口事务外，主要是为了避免外夷动辄试图入京直接与朝廷皇帝交涉。清制，封疆的督抚作为内外相维体系中的外官，本来就不是后人按照日本行政观念误读错解的地方官，北洋大臣开始不过是清廷与外夷之间的缓冲，而非今人以为地方办理外交的职官。外交乃军国大事，岂容地方插手主导？

南北洋通商大臣之所以由专派改为由总督兼领，原因之一，是总督手中握有实权，便于办事。尤其是兴办富国强兵的自强事务，没有权力，无法成事。而兼领南北洋大臣的直隶、两江总督，往往以南北洋大臣的名目出现，以彰显其名衔和实际地位的特殊。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坊间、词典乃至学界，都依据南北洋大臣的管辖范围，划分南北洋的海域和地域。如将长江南北的沿海海域分别称为南洋、北洋，将南北洋大臣管辖的省份也称为南洋、北洋。

这样约定俗成的划分，当然没有正式的规制，只要不引起误解混淆，作为方便名词使用也并无不可。例如，海域的方面南北洋之分大体无碍，只要不与所谓广义的南洋混淆即可。但是，地域的南北洋之分，则问题不小。如1979年版的《辞海》解释“南洋”的词义之一道：地区名。清末至民国时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

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60]此说显然不确。严格说来，南洋所指地区应是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可是，最初筹办闽浙海防并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是闽浙总督，后来左宗棠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楨创建南洋水师前后交织。北洋水师成军之时，将闽、台、粤及上海等地的军舰划归南洋大臣统辖，统称南洋水师，所以习惯上各地也被称为南洋，与相关水域一致。只是实际上广东很少被称为南洋。至于北洋，清季只有直隶一省，虽然北洋新军兼顾吉林、奉天边防，但东北不能称为北洋，只有渤海湾是北洋的海域。同样，山东的沿海水域属于北洋，作为直省，则不在北洋的辖区。与北洋扯上关系，一是袁世凯曾任山东巡抚，二是北洋新军第五镇驻扎济南。民国时北洋的泛用，便是北洋系军人控制各省的结果以及坊间的俗称。^[61]

直隶为畿辅要地，所谓首辅之区，不过作为京师的北京并不在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清代北京不属于北洋。北京城所在的顺天府地位特殊，府尹由尚侍兼管，虽然所辖各县位于直隶总督的辖区之内，按照今日的说法，由没有隶属关系的顺天府尹和直隶总督实行双重领导，重要举措须会衙办理。即便如此，城垣之内直隶总督也无权过问。也就是说，北京城从来不在直隶的管辖范围。甚至倚郭的大兴、宛平两县，也称为京县，其官员的考绩为京察而不是一般州县的大计。由于顺天府与直隶的紧密关系，时有合称顺直之事。后来直隶被冠以北洋，坊间有将顺直与北洋相连接之说，不过商业运作技巧或民间俗称而已。清季以省为单位设立谘议局，后清廷将原拟单设的顺天府谘议局和京旗谘议局并入直隶谘议局，改为顺直谘议局，以合规制。顺天正式与北洋搭上关系。^[62]民国初期的北京政府被称为北洋政府，主要也是因为袁世凯及北洋系掌控了定都北京的中华民国国家政权。

将两江、直隶总督所辖地方称为南洋北洋，是因为南北洋的名分较为尊显，可是这样的俗称却存在对于清代体制的观念误差。清季以来，受到明治日本人士尤其是织田万《清国行政法》的影响，用中央地方的架构来解读清朝固有的政体设制，将直省视为地方的最高行政区划层级，将督抚视为地方官。加上清季内外官改制，试图将内外相维变成上下有序，以中央地方架构作为基本取向，更加导致观念的混淆，连主持或参与改制的枢臣疆吏们也常常为此大受困扰。王尔敏注意到历史上概念与体制的变动，并且专文深入论述，还是认为南北洋大臣“形成晚清地方上两大柱石，内承中央依寄，外受督抚瞻望，支

撑晚清大局”，并以南北洋大臣为“地方上办理外交的最高代表”。^[63]这样的说法，容易使人误会南北洋为地方势力，而将南北洋地位的凸显，当成中央权力式微、地方权力上升的表征。

清制，督抚虽辖制各地军政，不过是皇权的分身，一般设制，并不以行省为单位，如与科举制关系密切的学校和学额，国子监以下，只有府州县学，分省既不设学校，亦无学额。因此，当时坊间很少分省意识。清中叶后，行省亦称直省，行走各地的商帮分省意识逐渐萌生，以省份为名目的会馆日益增多。咸同以降，督抚权力坐大，练兵自强，开始以省为单位进行各种新兴事业。清季实行新政，仿行宪政，有意将各省变成一级行政，各项新政宪政事务，多由各省负责办理，如整军练兵、兴办实业、派遣留学、设立学堂等，分省意识进一步增强，以至于省界之争成为各地纷争的一大要因。直隶为清廷推行新政的重要试行地，兼领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遂将所办各项新政事业贴上北洋的封号。坊间效仿，一些实际上没有多少官方色彩的趋新事业，也纷纷加上北洋的名头。

在国民革命的语境之下，北洋政府的概念至少具有下列指向性含义：其一，这是由地方性私人集团窃夺的国家政权。其二，是与南方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为敌的军阀政权。北伐就是要推翻这样的非法反动政权，建立真正代表国民意志的国家政权。这样的指向，作为革命的政治诉求固然合理，但与民初政治的实情却不大吻合。

七 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革命语境下特定概念的合理性，往往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辛亥革命推翻皇权帝制后，中国很快陷入分裂状态，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武力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生存发展的强有力支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即出自北洋武人之口。各地军人当政，相互混战，被指为军阀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将国民政府统一前的民国政府统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将这一时段统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政府时期，则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利于全面研究和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

如此认识，并非为袁世凯翻案，也不想替北洋申冤。今日坊间为北洋评功摆好之人，未必真的了解多少北洋的实情。有不少只是抒发自己的愤懑而已。正如民初如今日愤青的失意青年，耳闻目睹兵燹政争的乱相，反而怀念前清的承平。可是与遗老们的恋清情结不同，若是真的回到清朝，大抵还是会忍不住起而革命的。陈寅恪将袁世凯的北洋练兵与派送留美官费生并列为祸中国最大的两件事，也是针对时势有感而发。作为当时的感受则可，等同于历史的实际，难免引起诸多分歧。

本文并非系统梳理军阀、北洋军阀、北洋政府词语的所有相关资料，并据以完整重现这些词语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在此所要证明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此前所有的努力，无论是逾万字的单篇论文还是数十万字的专门著作，虽然已经层垒叠加地取得了显著进展，还是留下有待拓展的不小空间余地，让来者可以继续大步前行。其二，要想解决余下的问题，应当改变以往那种探源之后即行定义的做法，作为历史概念，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含义无论怎样千差万别，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之事，无所谓正误对错。作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应当探究各自如何应用的本意，而非强古人以就我地求其一是。只有梳理清楚所有事实的发生演化，才有可能把握其内涵外延，并理解沉淀于概念之中的复杂歧义。但凡定义，实际上都是用后认来裁剪自称和他指的削足适履，旨在求其是以定一尊，结果导致阉割历史。

正如全文和本节标题所示，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相关概念词语发生演化的历史事实，说明北洋军阀统治或北洋政府的指称，与1928年以前民国政权的政治进程既不同步，也未必吻合。尽管南方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来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及正统性，指为北洋政府，以便使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相连接，而将北洋与前清相联系，发动国民革命，以北伐战争的形式将其推翻，从国际视角和历史观念考察，还是应该肯定北京政府据有中华民国的正式政权的地位。只是随着政治上的日趋颓败，其法统的国民认同度日益降低，从而逐渐失去施政的正当性。认定袁世凯一登上大位就是北洋军阀集团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其死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北京政府的实权，始终由北洋军阀的直、皖、奉系所控制，从而构成1912至1928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指认，承继了国民革命的立场，作为一成不变的历史观念，却不易贯通所有史事。

治史首先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呈现史事，而史事本身极为复杂，所谓重新呈现，不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善于治史者，既能使千姿百态的人事得其所哉，又可条分缕析千头万绪的纷繁现象，显示背后的错综联系。所以，呈现原貌实情，乃是永无止境的难事。后来各式各样的观点议论，大都怀着评说的目的，试图以己意干预历史，而历史其实是无须增减也无从增减的。用了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仅与当时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导致种种偏蔽，使得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严重短缺失调。

北京政府时期，各种政党派系错综复杂，不断进行分化组合，北洋既不能覆盖，也无力驾驭，其自身还要随波逐流，才能避免舟覆人亡。这些政党派系源自清季，又受到外部列强势力的牵连，向下延伸到国民政府时期，是认识近代中国政治势力渊源流变的重要环节。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座，流淌过多少相关的掌故轶事。虽然学界早已注意及此并且有所研究，可是远不能呈现事情本来的繁复及其背后的联系。

北京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承前启后，虽然未必有太多的建树，但毕竟使得清季改制以来的取向不可逆转。况且诸多设制开天辟地，尽管大都是仿效移植域外，可是不仅亘古所无，而且与各国别，必须依据国情加以调适。后人的评论往往难免自以为是，缺少筚路蓝缕的体察。例如并非建立在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责任内阁，究竟如何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发挥制约作用，就显然与众不同，无本可依。即便对当局并无太多好感的胡适，谈及曹锟贿选之事，还是认为之所以要花钱买，至少表明国会还起作用，并非全然花瓶和橡皮图章。而国会里面党派纷争不已，背后实为各省实力派所操纵，使得朝野各方认为议会制已经变质，转而有意用代表大会（会议）予以取代（另文详述）。

国民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看似新意不少，基本格局还是承继北京政府时期。可以说，清季取自域外，酌情调适的各项制度，经过北京政府时期大体定型。这倒未必是当局者如何高明，而是人力不可逆天，只能顺势，许多不如人意不合西理（或者称为公理）的建置安排，都是由经过反复折腾绕不过去的现实所决定。后来的革命者不断用行动质疑，最终仍然难逃一是。

20世纪是中国革命的时代，而北京政府时期正是革命不断掀起高潮的密集期，以致于国民政府统一后，试图让革命刹车，巨大的惯性却使得历史的车轮难以放缓，更无法停止。正因为政治统治不够强有

力，各方相互制衡的结果，留下的运作空间较多，激进革命才能找到反复上演的舞台，并对青年和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正因为国民政府的革命重新接续辛亥革命的正统，夹在中间的北京政府才会贴着北洋军阀的标签落在革命对象的历史定位上。依据前引陆鼎揆反对武力统一的时论，直到1924年，人们对于南北武人均以军阀视之，不相信军阀用武力可以实现统一，摆脱纷争。各自宣称的武力统一，不过是新一轮割据混战的开端。如果没有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北伐也难免陷入这样的循环往复。

即使研究北洋的历史，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军阀，北洋系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都是当年政治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研究北洋集团，这些熟知内情背景的亲历者的身手口眼杳无踪影，所论难免隔靴搔痒。目前这一部分的相关史料缺失太多，零散的遗留也未经系统梳理，遑论深入的研究。如果北洋的这张大网仅仅凸显一些军阀的身影，整个北洋枝蔓繁多的人事联系几乎失位，甚至许多大事要人也没有像样的研究，当然只能停留在笔记小说和掌故谈资的层面，北洋的群像实情固然不易展现，刻意突出的军阀也难免面目全非，要想认识北洋到位，谈何容易。

北洋军阀史的说法虽然是他指后认，仍然有其渊源流变的实事，只不过与所有史事的名实一样，其内涵外延会发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衍化。这两方面均为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应有之义，前提是不能将二者混淆，应注意其分别和联系。但是，若将北洋军阀的观念用于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则会以偏概全，误读错解，误导研究的取向。不仅仅从北洋军阀的视角看待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从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开始，就要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史事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这一时期历史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并且上溯前清，下探国民政府乃至新中国的历史，由事实联系延伸域外，纵横贯通，以求更加近真并得其头绪，北洋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

或者担心北京政府时期的概念会抹杀南京临时政府，类似的情况还有国民党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其实，这些如果本来就没有纳入北洋军阀史的范畴的话，根本不存在是否取代的问题。如果原来已经笼统涵盖，则用北京政府时期来指称，显然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周全。用后出的集合概念指称前事，多少都会有所约化，关键是看哪一种说法害意较少，涵盖较宽。改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细节上仍有可

以讨论之处，但是相比于北洋军阀史，无疑要贴切得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则要小得多。

[1] 张朋园：《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争与宪政不果〉》，张玉法主编，林载爵、朱云汉、王克文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49页。

[2] 王克文：《军阀在现代中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评派氏著〈军阀政治〉》（原载《人与社会》第四卷第六期，1976年6月），张玉法主编，林载爵、朱云汉、王克文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第105—106页。

[3] 张玉法：《评介派氏著〈军阀政治〉》，张玉法主编，林载爵、朱云汉、王克文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第93页。

[4] 《第五辑例言》，张玉法主编，林载爵、朱云汉、王克文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第III页。

[5]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6]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页。

[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13页。

[8] 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5—136页、第208—209页、第275页。

[9] 岐逸：《江苏之政绩·官僚政治之实验》，《申报》1915年6月22日，第六版，要闻二。

[10] 岐逸：《淮盐纪闻》，《申报》1915年6月29日，第六版，要闻二。

[11] 《申报》1916年9月21日，第二版，东方通信社电（日本人组织）·东京电。

[1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13] 洪榜：《戴先生行状》，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页。

[1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7页。

[15]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5页。详见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16] 《鄂湘北伐军撤回之内幕》，《申报》1917年7月15日，第六版，要闻二。

[17] 《安福俱乐部之内幕》，《申报》1918年6月27日，第三版，要闻一。

[18] 静观：《北京特别通信·北京党派之分合》，《申报》1918年10月17日，第三版，要闻一。

[19]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二一七）》，《申报》1918年11月14日，第六版，要闻。

[20] 默：《北方之总代表》，《申报》1918年12月13日，第七版，杂评一。

[21] 或者以徐树铮亲手枪杀陆建章，证明其凶残。此事显然误解过甚。其一，儒将还是军人，军人杀人为常态，只不过有滥杀与否以及为何而杀的分别。称徐树铮为儒将的当时人，绝无许其立地成佛之意。其二，徐树铮并非亲手开枪，而是指示卫士下手。二者虽然结果相同，感觉上还是有不小的分别。张学良杀父执辈的张作相，较之为过，但仍然可以理解。

[22] [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23] 心危：《东京通信（十）（五）·东报评论中国政变与党派》，《申报》1917年6月3日，第六版，要闻二。

[24] 鸣谦：《军阀亡国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六号，1920年2月8日。

[25] 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第266—267页。

[26] 《〈北洋派之怪物徐树铮〉先行发售预约》，《申报》1919年9月10日，第十四版。

[27] 芳草：《祸机四伏之中州·吴佩孚军已抵郑》，《申报》1920年6月11日，第七版，国内要闻。

[28] 《外人对于吴佩孚之论调》，《申报》1920年8月10日，第六版，国内要闻。

[29] 《申报》1914年6月1日，第二版，专电·北京电。

[30] 默：《今日之所谓派》，《申报》1914年6月1日，第七版，杂评二。

[31] 《西报之各派势力消长谭》，《申报》1914年6月3日，第三版，要闻一。

[32]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五十五）》，《申报》1916年12月28日，第三版，要闻一。

[33]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六十六）》，《申报》1917年4月30日，第三版，要闻一。

[34]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四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页。

[35]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6年10月2日，第三版，要闻一。

[36] 《字林报之北京政局观》，《申报》1916年12月28日，第三版，要闻一。

[37] 《段祺瑞去职因果之别报》，《申报》1917年5月27日，第三版，要闻一。

[38] 《李宗黄对于吴佩孚主和之谈话（续）》，《申报》1918年9月8日，第六版，要闻二。

[39]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七十七）》，《申报》1917年5月30日，第三版，要闻一。

[40] 《张李入京与今后政争》，《申报》1917年6月16日，第三版，要闻一。李仲轩，即李经羲；张定武，即张勋。

[41] 《奉天近事纪要》，《申报》1918年10月8日，第六版，要闻二。

[42] 《奉天政局之内幕》，《申报》1918年5月12日，第六版，要闻二。

[43] 《申报》1926年11月19日，第五版，各社要电·东方社十七日奉天电。

[44] 般若：《北京通信·段徐与曹张》，《申报》1920年3月25日，第六版，国内要闻。

[45] 浴：《北京通信》，《申报》1924年1月28日，第七版，国内要闻。

[46] 《外人论中国之政局》，《申报》1922年4月4日，第六版，国内要闻。

[47] 《全国学生会昨纪》，《申报》1923年3月23日，第十三版，本埠新闻。

[48] 《工界救亡会三次委员会纪》，《申报》1923年7月10日，第十三版，本埠新闻。

[49] 《双十节之湖南》，《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五版，国内要闻二。

[50] 《粤闽情势之京讯》，《申报》1917年12月26日，第六版，要闻二。

[51] 《申报》1917年6月28日，第三版，公电·孙洪伊致近畿各军电。

[52] 老圃：《北洋正统》，《申报》1922年5月29日，第三版，时评。

[53] 陆鼎揆：《武力统一与统一武力》，《申报》1924年2月27日，第六版，时论（来稿）。

[54] 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55] 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477页。

[56] 《日将在豫经营水力发电》，《申报》1924年8月9日，第九版，国内要闻。

[57] 尹亚伟：《百卷巨秩 弥足珍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介绍》，《民国春秋》2000年第3期。

[58] 张玉法：《民初军系史研究（1916—19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875页。

[59] 王尔敏：《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五口通商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9页。参见吴宏岐、周玉红：《李长傅先生对南洋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郭声波、吴宏岐主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389页。古人所谓东西南北洋，往往只有大概的方位，而且不同时空条件下不同人所说的具体区域有所差异。今人追究概念，好定于绝对的是非正误，其实应当顺时序梳理不同说法，进而大体把握。

[60]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61] 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弱国的外交：面对外强环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76页。

[62] 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299页。

[63] 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弱国的外交：面对外强环伺的晚清世局》，第165、175页。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1]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王尔敏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依照孙中山的演讲文本，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2]，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其实，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文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欧战宣告国家主义破产，世界主义在以西为尊的新青年中渐趋流行。经过与外力压迫下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孙中山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的两难选择。

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党派系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缠绕之间的两难困境，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一 外来影响

孙中山后期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其经过改造的三民主义，其中针对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作出的回应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21年6月21日至30日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发表演说，其中提到：

有谓欧洲各国今日已盛倡世界主义，而排斥国家主义，若我犹说民族主义，岂不逆世界潮流而自示固闭？不知世界主义，我中国实不适用。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故兄弟敢说中国欲倡世界主义，必先恢复主权与列强平等；欲求与列强平等，又不可不先整顿内治。所以众“伙计”今日要行积极民族主义，更要如日本之大隈、井上之两位苦志学生，方能有用，方能为中国主人，方能去提倡世界主义。^[3]

这次演讲，孙中山虽然回应了来自世界主义的批评，并且有针对性地、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正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但并未涉及相关的人事。无论是世界主义的国外来源，还是国内响应，均较含糊。时隔三年，1924年2月，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的民族主义第三讲时，再度详细阐述了对世界主义的全面反批评，他说：

英俄两国现在生出了一个新思想，这个思想是有知识的学者提倡出来的，这是什么思想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不是宽大的；简单地说，就是世界主义。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德国，以及现在中国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赞成这种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究竟世界主义是好是坏呢？如果这个主义是好的，为甚么中国一经亡国，民族主义就要消灭呢？世

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

这一次演讲，孙中山点明所针对的对象，外部是英、俄、德，内部是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以上两次演讲，孙中山主要是强调中国目前尚不宜提倡世界主义，只能宣扬民族主义。在一周后的第四讲中，孙中山进一步展开反击，并将重心转到揭露列强鼓吹世界主义，其实是变相的帝国主义这一方面：

强盛的国家 and 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4\]](#)

孙中山的后两次讲话，由具体而一般，将其所针对的世界主义划出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并提示了可供追寻渊源的线索。

按照雷海宗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世界通史的提纲，其第42章“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与和平大同主义”（丙）“反国家主义反帝国主义之理想”，实际上概括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世界主义，具体分为三类，即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与和平主义（Pacifism）。大同主义的理论家有英国小说家、文明批评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魏伯伦（Thorstein Veblen），英国政治经济评论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吉尔（Norman Angell），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国际主义的代表理论家是担任过美国总统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平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为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y）、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和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5]

雷海宗的概括，勾勒出那一时期世界主义的大致轮廓，但概念的译名及各自的归属与其他人的分法颇多差别，而且有所遗漏。如胡适将Cosmopolitanism译成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即新和平主义（New Pacifism）不同。他将安吉尔视为新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而马克思在许多人看来应当属于国际主义。这些差异反映出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在具体指认时的含混，一般人常常将世界主义、大同主义甚至国际主义混用，能够有所分别者也是因人而异。胡适晚年特别注意将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区分开来，有学人称：“国际主义在意义上当然没有世界主义那么超越，其胸怀更小但却更注重各自之国。”^[6]也有学人认为：“古老的‘世界主义’也与现代的‘国际主义’不同，前者是关于天下一家的一种思想态度，后者则更落脚于超越民族界限制度。”^[7]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上述分析可以显示后来的发展趋势，但相对于当时的状况，或许过于清晰了。

孙中山对于世界主义的了解不一定全面系统，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对中国的新文化新青年发生过重要影响，并通过后者的转述，引起人们质疑其民族主义主张的人物和流派，所以他批评的对象不包括美国和法国，而突出英国与俄国，尤其是当时的英国，具体所指，当为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来华讲学的罗素。罗素一贯信奉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战争，尤其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严重问题作出反省，对民族、国家、宗教等进行深入探讨和深刻批判。来华期间，在“实业制度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等“社会结构学”的系列演讲中，罗素相当彻底地批评道：

民族主义的崛起拦腰斩断了工业大生产自然地国际化的去路。而且，根源于“非理性的本能”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与工业大生产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民族主义激发着工业大生产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残酷的竞争；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中激烈竞争又使民族主义这种“合群/敌对本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人如果没有及时醒悟过来，共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在民族战争中自我毁灭。^[8]

罗素一般性地反对民族主义的鲜明态度，使得后来学者在概括其来华的全部演讲内容时，甚至将“宣扬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列在首位。^[9]

罗素的演讲词刊登于1921年4月5—6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年分别由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和《晨报》社出版单行本。1923年，罗素在来华五大演讲的基础上，加写了《向国际主义的转变》、《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等8章，合为《工业文明的展望》一书在伦敦出版，书中罗素指“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人们将本民族与他民族对立起来的一种敌对情绪”，他既反对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也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民族自决，认为民族自决原则下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原则下的爱国主义界限相当模糊，一旦依靠爱国主义激情获得民族自决，这种激情很容易转化为对外侵略和谋求霸权的动因。同时，世界各民族很难达到或保持长期的均衡，诉诸民族自决原则只会使各民族之间无休止地战斗下去。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归根结底是有害的，医治民族主义的唯一药方就是消灭民族主义，使人类的精力和情感不再服务于民族对立。理想的办法是人类自觉地组成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世界政府”，按照工业大生产本身的需要，合理地解决原料和能源的分配问题、移民问题、民族之间的领土问题，为此需要大力提倡国际主义。

罗素来华及其演讲，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1924年北京大学以学生为主要对象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作为“中国之外谁是最伟大的人”，罗素仅在列宁和威尔逊之后，排列第三位，比先其来华演讲、名列第11位的杜威（J. Dewey）高得多。^[10]其反对民族主义、鼓

吹世界主义的主张，在崇尚西方文明并开始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不少共鸣。孙中山几度针对世界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论调的公开演讲，与罗素来华演讲及其相关著作的出版在时间顺序上如此吻合，恐怕反映了一定的因果联系。

孙中山对这一时期罗素的言论动向显然相当关注，他在民族主义第6讲中对罗素颇有好评，认为“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11]其实，孙中山对罗素的好感应当不仅来自后者对中国文化一定程度的礼赞，尽管罗素信奉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反对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他为中国设计的发展道路却是统一、独立、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在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发展道德文化，这与孙中山的主张大致吻合。后来罗素在商团事件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12]，至少表明从孙中山本人的立场看，其判断不误。

英国而外，孙中山提到的影响中国的世界主义另一外来渊源是俄国。只是说法前后略有歧异，开始说是英俄两国现在生出新思想，后来又改为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所谓以前的俄国，当然包括雷海宗所列举的老托尔斯泰。不过，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论，俄国无政府主义党人所鼓吹的世界主义无疑更为广泛深入。清末以来，由于反对专制的共同目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知识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不少人主要把托尔斯泰当作无政府主义者加以接受。而影响民初知识界最为深广的，当属贵族出身、主张激进、提倡互助的克鲁泡特金（P. A. Kropotkin）。

一般而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家族、国家，主张世界大同，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中国人，亦无例外。清末新世纪派即认为：“今之无政府党、社会党，皆大同主义也。”^[13]“无政府，则无国界；无国界，则世界大同矣。”^[14]天义派更加反对排满复仇的民族主义。刘师培称：“今日欧美日本民党之中，其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持之点有二：一曰世界主义，一曰非军备主义，均反对本国政府持侵略主义者也。”“中国之民虽恒抱民族国家二主义，然持世界主义者亦复不乏。则亚洲各弱种由国家主义进为大同之团结，亦必为期不远。”^[15]

民国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力推介世界主义，宣称：“无政府主义乃世界主义，乃世界人民共图之事也。”^[16]新文化运动前后，正值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盛极一时，反对民族主义而鼓吹世界主义，在青年中影响不小。有人批评“现在有一般较为觉悟的青年，以为要把中国弄好，非提倡‘爱国主义’不可，因此就把‘爱国主义’当作中国人到幸福唯一的路，于是‘爱国主义’之声遍于全国。我以为这种现象实在可怕。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障碍”，并引托尔斯泰对爱国主义的定义：“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17]。他们呼吁望着“很远大很光明的全人类社会的目标去进行。在这进程中，不必拿国家主义来做手段，也不必拿国家主义来做抵抗强权的利器。因为拿国家主义来做手段，那就世界主义必为国家主义所牺牲；拿国家主义来抵抗强权，到底仍被强权所征服……须知抵抗别人的侵略，拿国家主义来做后盾，在前时或者可以有效，在现在世界的新潮就不行了”。德国的失败，就是国家主义到达极点的失败，此后要想爱国救国，只能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大同主义。^[18]广东一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和组织活动相当活跃的地区，孙中山不难感受到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主义倾向的影响。

至于孙中山所说过去的德国，当指马克思。依据戴季陶的理解，“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19]。“世界一人类之大社会也。欲求人类之幸福，不可不求世界之平和；欲求世界之平和，不能不废此国家之竞争……社会主义者，人类之福音也，除魔之天使也，社会幸福之大则也，世界平和之始基也。”^[20]尽管世界上社会主义派系纷呈，至少在五四时期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看来，“马克思以前，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思’这一个大湖水里面。有许多时候，好像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21]。所以许多中国知识人将主张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世界主义的一部分。戴季陶等人一度游离于孙中山，原因之一，便是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有所动摇。此事曾经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几经周折，才将戴季陶重新拉回自己身边。

二 内部响应

世界主义进入中国，需要中介，无论是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孙中山所说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当是通过各种中介接触或接受世界主义，并由此了解到民族主义相比于世界主义的局限。

清末民初，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人相当广泛，不要说新文化运动前后组织各种无政府主义党团的活动家和宣传家，许多并不一定参与相关组织活动的人士，无政府主义的烙印也相当深。早在1902年，蔡元培在评论日英联盟时就认为：“此举或当为世界主义之发端，而黄白二种激剧之竞争且由是而潜化”，希望中国“破黄白之级，通欧亚之邮，以世界主义扩民族主义之狭见”^[22]。同年他为《中等伦理学》作序，又标举原书作者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讲话》，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23]。他反对以种族观念提倡排满，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留学德国期间，蔡元培编著了《中等修身教科书》，批评“爱国之士，屏斥世界主义者，其未知人类相待之本务，固未尝与国家之本务相冲突也”^[24]。他提倡科学与美术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最完全不受他种社会之囿域，而合于世界主义者，其惟科学与美术乎！……故曰：科学、美术，完全世界主义也”^[25]。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蔡元培对协约国用《互助论》对抗德国表示好感，认为今日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过渡时代，希望青年学生同时抱爱国心与人道主义^[26]，并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响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呼吁消灭种族偏见，发展大同主义。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认为教育随时代及人类智德进步，已经历了家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和军国民主义等阶段，正在进入世界主义阶段，因而认为“战前教育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必当偏于世界主义”^[27]，并告诫创办《国民》杂志的北大学生：“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28]。

联系与接待罗素来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起了主导作用。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讲“大同”，对社会发展未来的设计有“万国大同主义时代”，后来接受德国伯伦知理等人的国家学说，放弃大同思想，信仰国家主义。他在1899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33册《饮冰室自由书·答客难》一文中，对于有人诘难其本来祖述春秋无义战和墨子非攻，“今之言何其不类也”，回答道：“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

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他承认从前讲世界主义是清谈误国，而不以为今日提倡国家主义是思想退步，并进而论道“今日世界之事，无有大于中国之强弱兴亡者”，所以中国人讲国家主义，即等于世界主义。这与孙中山的认识大体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梁启超游历欧洲，知道经过国家主义的全盛时代，世界主义重新抬头，于是回到世界主义的立场。^[29]在《欧游心影录》下篇《中国人的自觉》中，梁启超开篇明义为“世界主义的国家”，虽然他认为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列强仍然觊觎中国，不能单靠国际联盟保镖，还是肯定国际联盟是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调和的发轫。所谓“世界主义的国家”，即国是要爱的，但不能用顽固偏狭的旧思想，“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30]。后来他写《清代学术概论》，论述谭嗣同《仁学》的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对自己流亡日本期间“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感到“惭其死友矣”。^[31]由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编辑的《改造》杂志，所主张包括“同人确信世界改造，在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国家非人类最高国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偏狭之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32]。张东荪还主张赞成第三国际的“纯正之世界主义”^[33]。

新文化派的要角胡适，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世界主义者。留学美国期间，他热衷于参与世界大同会的活动，并在世界学生会等场合屡次发表关于大同主义的演说，如“大同主义哲学”、“大同主义之沿革”、“大同主义之我见”、“世界和平及种族界限”、“大同主义”等。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世界主义者的言论，也发表了不少自己对于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他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即以我之国之凌驾于他人之国之种，主张实现大同主义需从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并且认为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之所以不能达到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尚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为之畛畦耳”^[34]。

不过，胡适的世界主义主张在留学界反而不受欢迎，他在反抗外强侵略时主张不争主义，往往使之“陷入十分麻烦的地位”^[35]。中

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胡适公开表达其不争立场，令留美同学大为反感，也使胡适本人一度陷入心理矛盾。胡适归国之始即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主要是针对当时国内政坛的黑暗复杂，背后恐怕也有自己信奉的不争主义与举国上下的爱国激情对立冲突的担忧。后来胡适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不仅再度遭到国人的抨击，同道乃至弟子也大为不满。

胡适不讲政治，并非言不由衷，而是情非得已。对于当时教育家“以不谈政治为高”，孙中山公开有所批评，斥为“谬说”，并指出这一谬说由两种原因而生，一是专制官僚，二是西洋留学生。^[36]戴季陶、朱执信等人也分别撰文予以劝告，呼吁新文化派关注政治问题。据陈独秀说，中国主张不谈政治的有三派人，学界的代表就是张东荪和胡适。^[37]其实胡适虽然不谈政治，却始终关注政治，并且不时向社会直接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其中也包括世界主义思想。1918年他撰文介绍《易卜生主义》，就特别指出：“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38]1921年5月，胡适以提议废止国耻纪念开始讲政治，他主要关注改造内政，以为“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凡涉及对外方面，胡适并未公开宣传其世界主义观念和主张，但基本立场是反对夸大列强侵略的危险，防止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1919年，他还应芮恩施（P. S. Reinsch）之约，计划撰写《中国人的和平理想》，并拟出目录。^[39]所传达给新青年的信息，无疑带有很强的世界主义色彩。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一度也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赞成者。1917年8月，他作书答陶孟和关于世界语的来函，对于后者“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极以为然”，而对其“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的看法则“微有不以为然”。他认为：

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共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40]

在《偶像破坏论》中，陈独秀又将国家视为偶像，希望用世界大同的真理破除国家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和世界。^[41]他反对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42]。呼吁抵制这种精神思想上的日货。不过，陈独秀的观念中世界主义始终是民族主义的未来，就此而论，他与孙中山的观念相当接近。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讲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抗，又主张阶级的国际联合，则与孙中山同中见异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党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与新文化派走得相当近。如戴季陶，早在辛亥时期，就接触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世界主义的观点相当认同。主办《星期评论》时，戴季陶对于社会主义进一步附和。他认为社会主义天然为世界主义，在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已经联成不可分的关系时，从前那种各个国家对立和少数资本家独占生产机关的制度，同时发生破绽。“由国家生出的破绽，就是世界主义的趋向。由资本主义生产制生出的破绽，就是社会主义的趋向。”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说明国家对于世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说明国家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世界的是要世界才能解决的，是要一致的，是不能各个分裂的。”戴季陶进而认为：“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中国对于远东问题，也应该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面进行。^[43]

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除国家主义派以外，新阵营中的不同政治文化派别从各自的立场和政见出发，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年学生传达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即民族国家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和平与大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高一涵在《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一文中所分析的头一条就是“国家观念之变迁”，“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此征之于最近西人之舆论而可信者也。”^[44]尽管还有国家主义派的宣传与活动，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的种种表现又让满怀期望的国人大失所望，外侮的压力不断刺激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绪，热切追寻世界潮流的青年学生还是相当普遍地接受了世界主义观念，调整其原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

爱国意识。北京学生救国会的《国民》杂志，在提倡国家主义的同时，一再声明不是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而是自为的、合理的、世界的国家主义。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因为信奉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反而有忽视目前实际问题的偏向。^[45]在天津读书又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也认识到：“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上，要不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试看德意志的军国主义，现在能容留么？”^[46]

对于近代中国世界主义的渊源流派，孙中山不一定全都了解得十分详细，但他与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有过或长或短的交往联系，或多或少地了解其立场主张。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认真观察过新文化派的宣传活动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主张有直接关联的思潮，无论赞成与否，均经过认真思考，并且或明或暗地发表过针对性的意见。他对世界主义的批评，绝非捕风捉影。作为有主张有计划的革命先行者和领袖，孙中山不会轻易附和一般新进青年的认识。同时，在了解世界更加深入切实的孙中山看来，令新青年趋之若鹜的“世界潮流”，不仅要分流派，而且还要看是否合乎中国国情。他反对用世界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正是不盲目随波逐流的表现。

三 分歧与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流行，虽然可能导致部分青年对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的怀疑，实际上双方在许多方面相似相近，甚至基本一致。

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不适用于当时中国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早已进入世界主义，并且饱受其害，“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思想，所以满清入关，全国就亡……中国大多数人很提倡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47]。在近代世界，失去民族思想是导致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历来没有民族主义，只有天下大同思想，这是不少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共识。如梁启超就说：“‘全人类大团体’的理想，我们中国是发达很早的，我们向来并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我

们中国人所宗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48]“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国家’一语，有若何特别重大之价值，我国民殆不甚理解。”^[49]陈独秀也断言：“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甚么国家不国家。”^[50]从胡适所列《中国人的和平理想》一书的目录看，他显然也认为中国人早有类似世界主义的观点。

不过，对于历史上所谓世界主义的作用，以及近代转向国家主义的得失，各方意见则不尽相同。孙中山认为，过早地进入大同主义，导致国人缺乏爱国心和团结力。梁启超一度也认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救亡图存的良方，但后来却说：“此种世界主义的理想，我国民五千年来，皆恃此为成功之一大根原。及至十九世纪，国家主义成为天之骄子，我国民舍其故步而谋学步焉，与我固有之国民性不相容，学焉未睹其利而先承其弊，于是演一大失败。”^[51]则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秉赋虽是客观存在，如何认识引导却看法相异甚至相反。

承认弱小民族有实行爱国主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是孙中山与新文化派精神沟通的又一要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虽然显示人类只有合作才是出路，国家主义实行的依据即民族竞争的时代并未过去，尤其是弱小民族，如果不能摆脱被侵略受奴役的地位，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必然丧失生存的权利。一度沉迷于世界主义的胡适，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关怀。^[52]他对于世界主义的界说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这也就是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亦即学人所称与古代世界主义不同的近代国际主义。在此观念下，“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53]。罗素离开中国前发表的最后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指出：“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一些高论家责备其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相反背。陈独秀“独认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因为“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中国人

如一盘散沙，当政者实行不爱国主义，只有爱国才能避免民族走向自杀。[\[54\]](#)

孙中山虽然主张民族主义，却并不否认世界主义，他将世界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以民族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如果不能用民族主义图生存，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便会被淘汰。因为世界主义往往是强国提倡，于其利益大有好处。孙中山接受民族自决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实现独立自主的新观念，用民族主义实现内部的自我联合，再联合世界上的所有弱小民族，共同用公理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将民族主义视为实现世界主义的基础：

象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55\]](#)

这不仅是以包含国际眼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前提，而且是实现世界主义的客观条件，亦即一般学人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重要分界。蔡元培后来评论三民主义以中庸之道调和折中时说：“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56\]](#)只是孙中山的观念里，多少还有一些大国主义的成分，与世界主义不无矛盾。而且如何通过民族主义进入世界主义，而不至于滑向反面，苏俄虽然进行过新的尝试，却没有树立起成功的典范。

孙中山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似乎处处印证了他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断的正确。日本侵华步伐的步步紧逼，刺激中国人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情绪一再高涨。而在对外关系上不少人寄予希望的国际联盟，不仅显得软弱无力，反而有纵容侵略者之嫌。结果，越来越多

的人不得不暂时抛开世界主义的憧憬，回到民族国家的现实。蔡元培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世界主义的忠实信徒，可是后来他似乎也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认为：“中国受了世界主义的欺骗，所以把民族主义失掉。所以，我们不谈世界主义，谈民族主义；民族达到了，才好谈世界主义。”^[57]他拟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既主张“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锻练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以实现民族主义”，又“提倡国际正义，涵养人类同情，期由民族自决，进于世界大同”。^[58]只有胡适等少数人，始终不渝地坚持其世界主义立场，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不曾根本动摇。

或许与世界主义的影响有关，孙中山晚年宣讲民族主义，重心也有所调整。开始他着重强调汉族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心地位和同化作用，确有种族主义之嫌。这也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来或明或暗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回应世界主义批评的过程中，孙中山虽然没有放弃汉族中心的观念，至少在正式宣讲的场合，这种对内的种族倾向有所减弱。他主要是针对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家族、宗族主义发达，天下思想强而民族观念弱的汉族立论，增强其民族意识以对抗强权，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这一目的一旦实现，早已进入世界主义的中华民族自然会以和平与平等精神待人。

孙中山的良好愿望和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意识，能否防止在民族自觉过程中出现种族偏向和霸道倾向，不无可疑。不仅当时国人对此疑信参半，后来的外国学人也不断质疑中国古代的文化至上观念，批判近代民族主义复兴过程中种族复仇意识膨胀所滋生的流弊。尽管如此，中国人很早就用不同于近代西方人的观念和态度处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是不争的事实。这对处理当代有关民族、宗教、国家关系的众多复杂事务，确有可资借鉴之处。实际是以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能否协调与融合西方以外的因素，反而是对世界主义的最大考验。

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看，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除了对外的“狭隘”，对内也有“集权”的倾向。孙中山晚年演讲三民主义，用意之一，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种新兴思潮的影响日见广泛，广大青年乃至国民党内亦为之波动的现实，要改造国民党，吸收新血液，首先就要重建三民主义的权威。而重建思想权威，必不可免要与各种新文化思潮一分高下。1923年11月，邓泽如等人联名上书孙中

山，历数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的严重威胁，其中便特别提出陈独秀“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孙中山对此批道：“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吾党。”^[59]

由此可见，孙中山反击的矛头虽然同时也指向列强，而且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上，某些方面与陈独秀等人相当接近，其演讲三民主义，暗中还有针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之意（他在演讲中调整世界主义俄国来源的时间，当时不希望此意表露得太过明显）。或者说，他不能容许其他人挑战其对于国民党乃至整个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威。

就人类整体发展的全程而言，民族国家与世界大同的确代表了不同的阶段，因而有高下之别。但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主张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又有具体的背景和利害，其间的差异导致不同的立场，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未必可以用先进与落后来解释。况且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纠葛的背后，还有复杂的中西关系的大背景。在经过华夷、体用等等阶段的抵拒，终于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西方为世界，为先进，为现代之后，国家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又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本民族的地位和出路，并且意识到西方不等于世界、先进和现代。即使认为等于之人，也不得不考虑，作为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如何能够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而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从世界主义的立场看，民族主义不可能打开通向人类大同的坦途，而用民族主义的观念看，世界主义又不能有效地保护后进弱小民族的利益，如何协调，认识上尚无定论，实践起来更需经历时间的考验。

^[1] 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2] 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2000年11月在中山翠亨的“孙中山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就此提问，无人能够具体回答。一般相关著述主要是正面阐述民族主义。

^[3]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58—559页。

^[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3—226页。

[5] 雷海宗撰，王敦书整理、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4—295页。该书于各派代表仅标举人名，有关情况据其他相关资料综合而成。

[6]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7]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4页。

[8] 对罗素批判民族主义言论的概括，均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第74—77、138—139页。

[9]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10]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1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8页。

[12]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第29页。

[13] 鞠普：《〈礼运〉大同释义》，《新世纪》第38号，1908年3月14日。

[14] 民（褚民谊）：《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7号，1907年10月12日。

[15] 申叔：《亚洲现势论》，《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

[16] 太侔：《复了僧君》，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关于清末民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主义观，李怡《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有所论及。

[17] 芾甘：《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警群》第1号，1921年9月1日。引自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541页。

[18] 秋霖：《国家的处分》，《闽星》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23日。引自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423—425页。

[19] 天仇：《无道国》，《天铎报》1911年2月2日。

[20] 天仇：《社会主义论》，《天铎报》1910年12月4日。

[21] 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22] 《日英联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0—161页。

[2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169页。

[2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30—231页。

[25] 《〈学风〉杂志发刊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335—336页。

[26]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页。

[27] 《欧战后之教育问题》，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81页。

[28] 《〈国民杂志〉序》，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55页。

[29] 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8—94页。

[30]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0—21页。

- [31] 《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 [32] 《〈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
- [33]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1920年7月15日。
- [3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508、540页。
- [35] 《我的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 [36] 《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63—564页。
- [37] 《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 [38]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485页。
- [3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第248、799—801页。
- [40] 《答陶孟和》，《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 [41] 《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 [42]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 [43] 《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 [44] 《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 [4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6、156页。
- [46] 《旅日日记》（1918年1月1日—10月20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文字及标点疑有误。
- [47]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16页。
- [48] 《国际联盟评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126页。
- [49] 《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28页。
- [50]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 [51] 《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29页。
- [52]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125—131页。
- [5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200、508页。
- [54] 《随感录·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 [55]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31页。
- [56]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488页。
- [57] 《三民主义与国语》，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412页。
- [5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276页。

[\[59\]](#)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59—1761页。

孙中山与科举制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理念，以求中国的富强。要达成这样的理想，当务之急无疑是反清革命。可是革命之事不仅破坏，更需要建设。建设的要项之一，便是教育。清季所谓教育，有中西新旧之别，以今日的眼光，就是传统与现代之分。用这样的观念看，很容易导致优劣好坏的价值判断，必须做二者取一的扬弃取舍。而在中西学乾坤颠倒的大背景下，舍中学以就西学成为大势所趋。晚清科举制由改到停的历程，相当典型地呈现出朝野在教育领域内就科举与学堂权衡取舍的心路轨迹，并且折射了文化观念由坚守夷夏大防到中体西用再到用夷变夏的演变。相比之下，孙中山对于科举制乃至整个中西新旧文化的态度与做法，少了一些此是彼非的简单臆想，多了几分实事求是的现实抉择，值得后人思考反省。诸如此类的问题，前人虽然论及不少，但只有跳出分科治学的窠臼以及孤立评判孙中山言行的局限，才能切近历史的本相，追究前贤的深意，发掘文化的内涵。

一 无缘科第

孙中山一生，以学习西学为主，且时间较长。他虽曾入读村塾，习过经史^[1]，可是限于家境和周围环境，并没有打算应试科举，以求仕途登进。他在《致郑藻如书》中自述：“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2]西学入华之前，清人读书大抵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入学习举业，以博取功名，或以举业为生。由于科举考试几乎没有年龄限制，考生可以长期在学，终生应试，加上府州县学和各级书院又有一整套奖励机制，以及教读的普遍，乡里亲友关系的各种经常性资助贺仪，举子们在花钱的同时也不乏赚钱之道，基本可以维持生计，乃至养家糊口。二是贫寒之家

子弟，无意科第，仅仅要求读书识字作文，学会简单计算，以便谋生。孙中山即属于后者。

这样的出身经历，在当时的社会本来处于劣势，不过适逢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孙中山又因缘际会，在海外和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学习过西学。自耶稣会士来华开办学校，起初主要是吸引贫苦人家的子弟入学，以便传教。而贫寒子弟进入教会学校，开始也是因为有金钱实物等奖赏，算不上是光彩的事情，更没有学习实用之学的抱负远见。孙中山于12岁结束在村塾的学业，到檀香山后改习西学，不过因为其兄长的事业发展较好，可以到当地学校寄读。而随后的时间里，在西学大潮的冲击下，中西学的价值地位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西学日益成为实用之学的代名词，中学则是空疏无用的体现。时代风尚的变化，影响到孙中山的认识，1899年他为《支那现势地图》撰写跋文，开头就说：“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者矣。”^[3]将舍弃科举学习西学，视为有志、发奋、报国之举。对于原本求举业者而言，这样的评价大体不错，而具体到孙中山本人，情况则有所分别。他后来复函翟理斯（H. A. Giles）所说：“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4]也只能做直觉的理解，以免夸大学习西学的自觉。

正因为时势的变化天翻地覆，中西学的地位乾坤颠倒，所以没有任何功名、连布衣也称不上的孙中山1894年向李鸿章毛遂自荐时，丝毫没有自卑胆怯之心，反而显得底气十足。他说：“顾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5]只是西学出身在上海、广州等地或许已经成为社会身份的一种资格，在北方的官场却连出道入行的凭借也够不上。在官场中算是重视西学的李鸿章，并未接下孙中山手中这块西学的敲门砖。

北行受挫并没有影响孙中山的自信，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与保皇会的《新中国报》主笔陈仪侃论战，还坦然表示：“仆非文士，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兴笔墨之战；但以彼无根之学，以讹传

讹，惑世诬民，遗害非浅，故不得已而驳斥之。”^[6]则科举出身的八股文士，在他看来仿佛已经成为不学无用的化身。

二 科举考试的利与弊

与科举考试无缘的孙中山，对于科举制却有相当全面深入的认识。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在英国人柯林斯（E. Collins）的帮助下，撰写英文专书，其中一章以《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向英国政府和社会说明中国的状况，表达革新的意愿，其中关于科举制的论述占了很大的分量。为了说明贪污贿赂横行，以至于必须在行政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他详细讲解了中国四种进入官场和获得提升的途径，即科举、军功、保举和捐纳。对于后三条途径，孙中山的看法几乎完全是负面的，而关于科举考试，孙中山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科举考试“是最古老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是最纯正和最好的。在多年以前，就是从清朝开国以来，科场考试都是老老实实地实行着的，而读书人在他学习终了考试成功以前总是不会开始他的贪污事业的”。不过，近年来在考试方面也出现了贪污的行为，老师作为枪手冒充学生顶替下场考试，以及主考官收受贿赂之事，已经不少见。

当考生通过层层考试成为候补官员时，行贿的行为往往就开始了，否则，“即使最出色的应试生员，那怕是很卑贱的职位也得不到”。至于通过殿试的人，除了授翰林院学士和授予实官者外，其余要想做官，也要行贿。甚至授予实官者，到省后还要行贿，才能在粥少僧多的情况下获得职位或是得到较好的位置。由于候补人员太多而官缺太少，只能给能出最高贿赂的人。不行贿赂者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做官任满升迁，也要行贿，否则大计考核成绩不佳，得不到升迁的机会。获得升任的官员必须受到清帝的召见，这也要花费大量银子。不然的话，像左宗棠这样的封疆大吏也不能实现晋见。做官升迁要大量费用，而为官实际得到的薪俸津贴以及养廉银却相当有限，因此，为官一任，最重要的事就是受贿和贪污，以期收回成本，弥补开销，准备再接再厉。“就是这些通过勤修苦练，虽然似乎无用却是诚

实钻研的科考，窄狭而比较还算干净的作官的道路的这部分人尚且如此，那么，那些通过其他不正当的门路而求得官职的人，所要花的费用多得就更不用说了。”^[7]

从孙中山不厌其详地陈述可见，他对正常的科举考试取士抱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而对铨选制度以及军功、保举和捐纳则基本否定，指为贪污腐败的渊藪，并主张对清政府进行行政和军事改革，以便建立起消除贪污的制度。基于上述认识，孙中山提出了变科举的主张。

三 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亡走日本后，孙中山公开与清王朝为敌，基本失去了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条件。他倡导反清革命，不仅要推翻清王朝，还要建立新的政权，并且提出新的施政纲领。尤其是在争取列强各国的支持时，必须明确宣示政纲，才有可能取得认可。1904至1905年，清政府相继宣布渐停以至立停科举，而在此之前，孙中山只有在1900年发动过武装革命，试图夺取局部乃至全国政权，建立政府，也只有这一次拟定的政纲当中，包含了关于科举改革的条目内容。

这一政纲即1900年8月草拟的致港督书中包括的平治章程，章程共六条：一、迁都。二、于都内设中央政府，各省设自治政府。三、公权利于天下。四、增添文武官俸。五、平其政刑。六、“变科举为专门之学。如文学、科学、律学等，俱分门教授，学成之后，因材施教，毋杂毋滥。”^[8]

与此事相关的其他文本有两种，文字与此有所不同，一是日本外务省文书明治33年8月28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57号，跟踪而来的日本侦探在轮船上偷听孙中山与平山周的交谈，据称两人就清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虽然谈话是用英语，且声音极低，听不清楚，还是可以肯定有下列内容：“一、迁都至某地；二、公布地方自治；三、改革学制；四为维护国家主权而给各国公使以参赞之权。”另一记载同样见于日本外交文书，为明治33年9月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74号，具体为：“一、迁都至中心地带或上海或汉口；二、公布自治制，中央政府征

求各国公使对施政的意见，地方应征求各国领事对自治的意见；三、公平刑政；四、废除科举，作专门之学。”

平治章程是应港督要求做出的陈情，旨在争取港英政府以及列强驻华代表的理解支持，未必完全反映孙中山的所有政治主张。而且由于日本人士反对其中给各国公使领事以中央和各省政府顾问名义及参赞权的内容，最终孙中山没有正式提交给英国或港英政府。不过，关于科举制的相关内同，倒是符合孙中山的看法。

上述三种文本，关于科举制改革的表述明显不同，平治章程是“变科举为专门之学”，而日本侦探的密报则一是改革学制，一是废除科举，作专门之学。考虑到日本侦探是窃听的结果，又有语言的障碍，不一定能够正确记录，加上后来的汉译难免受现时习惯表达的影响，很难契合当时的语义。出自孙中山之手的平治章程，显然更加吻合他本人的表述。如当时清政府尚未制定学制，谈不上改革，而废除科举的说法，远不如“变科举”更加贴近孙中山的本意。

晚清朝野关于科举改革的思路，大体分为纳西学于科举和将科举归并于学堂两种。庚子之前，主要是试图在科举考试项目中增加实学或西学的内容，历时数十年，始终不能如愿。庚子以后，因为朝野上下以兴学堂为救亡图存的良方，而科举妨碍学堂的教学，遂改行将科举归并于学堂之法，从渐停到立停科举，终于实现。^[9]可是效果并不如预期。因为科举与学堂，并非中西教育体制的分别，以清政府的观念，科举为抡才，学堂为培才，以后人的认识，则科举考试为入官试验，学堂考试为学成试验，二者不可牵混。当然，二者又有所联系，科举制以抡才引导培才，学堂教育则以培才确立抡才的素养基础。清季国人于此大都不能严格分别，总有此疆彼界的看法，而做非此即彼的取舍。纳西学于科举，无法妥当摆放中西学的位置，并科举于学堂，又不能分别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的界限。^[10]孙中山的看法与众不同，一方面，要保留科举考试的形式，而仅仅作为入官考试的资格鉴定；另一方面，整个教育要改为西式的专门之学，从而摆脱抡才与培才无法兼顾两全的两难境地。

关于中西教养之道的分别，孙中山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就已经清晰阐释，其著名的人尽其才说，包含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三个层面。“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

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概言之，就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并有表现其全才或专才的园地，得到适当的任用，可以发挥每个人应有的作用。这不仅将国民普遍实行的学堂教育与官吏的考试取材加以分别，而且显示学堂出身不止做官一途，各类人才都将有用于社会，并得到尊重鼓励，可以人才辈出。

四 科举制与单立考选权

1905年清廷宣布立停科举，在一般人看来，科举制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利用借鉴的价值。这样的看法，符合当时国人中西新旧两级截然对立的观念。而孙中山的理念则独树一帜，他不仅始终认为科举制本来是良法美意，而且试图加以改造利用，建构自己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由三权分立演化而来的五权分立，专门从行政权中独立出考选权，便是典型体现。

关于在三权之外增加考选权和纠察权，国内外自始至终有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包括孙中山的亲信，而孙中山也不断加以说明解释。在认识和理论建构上，孙中山显然有逐渐充实调整完善的过程，可是对于坚持考选权必须独立的理由，前后高度一致。1906年，他与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G. Gershuni）会谈，后者提出：“考选事务不是作为行政的一部分就够了吗？凭什么理由还需要单独设立呢？”孙中山答道：“因为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我期望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其时一般共和民主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国务由政党包办，实为政党分肥。政党轮替，则整个政府机构人事大换班。而且单凭选举任命国家公仆，看似公平，实则有利于逞口舌之利之徒，有真才实学者反被闲置。孙中山还特别声明：“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11]

不久，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再次说明考选、纠察权分立的道理。他指美国原来官吏分为选举和委

任两种，流弊匪浅，以致政治腐败散漫。究其原因，就是考选制度不发达的缘故。“考选本是中国始创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国学去，改良之后成了美制。”只是英美仅用于下级官吏，而且考选权仍在行政部之下。中华民国将来必须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确定资格，选举和委任方才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只不过君主专制时代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虽讲资格，也是虚文。共和政体，官吏为国民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考选权如果属于行政，则权限太广，流弊反多，所以必须独立机关。

孙中山也承认五权分立前所未有，所论只是基础，至于详细的条理，完全的结构，希望大众同志尽力研究，匡所不逮。^[12]不过，对于孙中山的创造，即使党内同志也是简单怀疑者多，认真思考者少，而怀疑的理据仍是西方三权分立的学说。唯有孙中山本人倒是不断地对此思考改进，晚年他演讲三民主义，将权力分为政权与治权，前者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属于人民权，后者则是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属于政府权。要九个权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这时他仍然认为独立的考选和监察权是中国所固有，而且成绩很好。“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不仅如此，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认为中国的专制与外国不同，皇帝不能垄断所有权力，考试权和监察权与君权分立。中外的三权分立各有利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13]。

后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实情，与孙中山所说差距甚远，加上实行起来长期存在党国的纠结，考选权徒具形式，很难真正独立行使权力，因而迄今为止否定的意见成为主导。可是，孙中山描绘的理想蓝图，还远远没有实现，民主政治如何适宜于中国国情，还是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难题。孙中山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包括如何适合国情与超越外国两面，不以中国传统的一切为皆非，也不以西方现在的一切为尽善，力求兼收并蓄，能够得其利而不受其害，仍然发人深省，并且考验着后来者的智慧。

[1] 关于孙中山学习中学的详情,参见桑兵《孙中山与传统文化三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页。

[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7页。

[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6页。

[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8页。

[7]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95—99页。

[8]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3—194页。关于上书详情的考证,参见桑兵《庚子孙中山上书港督卜力述论》,《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74页。

[9] 关于晚清议改科举的取向演变,参见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第39—48页。

[10] 关于抡才与培才问题的详细探讨,参见关晓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第1—28页,2008年3月。

[1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9—320页。

[1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30—331页。

[13]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2—354页。

南浔·湖社与国民党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繁盛，名镇兴起，其中浙江湖州吴兴南浔镇巨商众多，富可敌国。清季至于民国，南浔富商的产业扩展到杭州、上海等地，又吸引各方各界人士与南浔结缘，并凭借地缘、血缘、姻缘、同学、师友、同业、同行等关系纽带的联结，对于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辐射影响。其中张、庞、周家等与新兴政治势力如同盟会国民党的关系尤为紧密。1920年代，湖州旅沪人士结成湖社，南浔富商在其中扮演要角。随着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及其权力核心转移到江浙集团，作为地方同志而非同乡团体的湖社成员相互夤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作用日趋显要。而湖社成员彼此关系的好坏，也成为影响国民党内派系之争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以来，中国研究中区域研究逐渐流行。其背景除了因为中国幅员广大，差异明显，难以一概而论外，也受到域外学术的影响，好将中国区隔为相互独立的地方社会。而近代以来的所谓地方，无论政治学还是社会学意义，均发生于异域，与中国原有本意及实情相去甚远，容易导致隔义附会。因此在强调一个地方内部的聚合及其独特性的同时，往往忽略其与外部的广泛联系，甚至分区本身也有着强烈的主观后认色彩。中国历史上不断分分合合，使得各地方在形成和具有一定特性的同时，与其他各地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须由整体观照局部，不宜仅从地方性视角来认识。由此反省，化大为小的区域研究和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或不免用了外来的观念，使得中国社会内在的普遍联系及其整体性被割裂肢解。

上述情形，对于中心城市的研究尤为重要。清代至民国，若干城市乃至市镇因地理位置、财富积累、文化传承等因素，成为人才凝聚地，不仅形成区域中心，而且通过各种社会纽带的联结，产生全国性的辐射影响，如清中叶的扬州、19世纪前期的广州、后来的上海等。大都会以外，一些小城镇由于特殊的历史及社会原因，尤其是城乡分界并非截然的社会结构，地位影响也远远超越地方乃至区域的范围。

清季民初的江南名镇，在富甲一方的基础上，不断张大势力，浙江省湖州吴兴的南浔镇，即个中翘楚。

诸如此类的城镇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起的作用，仅仅用社会经济史的框架考察，容易流于见树不见林，盲人摸象，各执一偏，难以认识完整清晰。而乡土历史的写作，取材不够严谨，坊间传闻与史事记录相混杂，不易取信。南浔与近代中国，牵连层面广泛，绝非单篇论文可以讨论充分。拟以专书的形式，从不同视角加以论证。本篇以湖社为轴，主要展示南浔与国民党的人脉渊源和政治影响。

一 南浔与国民党

南浔镇位于浙江省北部，湖州市东部，属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平原，距上海、杭州均为120公里，距苏州51公里，与江南名镇震泽毗邻，与另一名镇同里也相距不远。南浔属湖州，近代以来，湖州屡次改名吴兴。辛亥光复，一度设市。现在设湖州南浔区，辖数镇，区政府设于南浔镇。南浔建镇750年，明万历至清代中叶为繁荣鼎盛期。清代江南有四大名镇之说，南浔曾为四大名镇之首，与同里、黎里、震泽齐名。

清代南浔镇号称“烟火万家”，但据今人研究，很可能包括周围乡村。有确切统计资料的清末新政县以下各选举区的户口调查，已不可见。1920年代后期，由于丝业衰落，南浔的社会经济地位迅速滑落，人口也渐趋减少。1929年吴兴县第三区分为6镇27乡，南浔镇因户口众多，分为运河上镇、运河下镇、南东镇、南西镇、东北镇、西北镇等6个镇，计有4223户，19889人。到1948年秋南浔镇公所的户口调查，镇区有3300户，13030人。而1953年南浔镇共有1244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730人，农业人口716人。[\[1\]](#)

不过，南浔人口的多少并不能简单地作为其社会地位和实力的指标，因为南浔富商众多，许多人居住在上海。据报道，清末镇上各家共有汽船百余艘，以便往来上海等地。南浔历来丝业（蚕丝业和缂丝业）发达，“耕桑之富，甲于浙右”，以至于有“湖州一座城，勿及南浔半个镇”的谚语。凭借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或称湖商、浔商），南浔在清末成为巨贾云集的全国蚕丝贸易中心。晚清全镇十分

之六以上的农民以纺经为业，丝经行最盛时达56家。清末民初，南浔有丝栈42家。上海的91家丝经行中，70%为南浔人开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口岸蚕丝出口总数为21176包，其中南浔出口13426包，占出口总数的63.3%。同治九年（1870年），中国蚕丝出口五万担，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口超过十万担，其中大部分还是南浔辑里丝。^[2]民国元年至二十三年（1912—1934年），辑里丝出口平均占上海出口生丝总数的38%。1929年开始，出口数直线滑落，1934年跌到仅300包。

在丝业发达时代，南浔富商凭借雄厚财力，向其他行业扩展经营。其实南浔各富商本来不仅依靠丝业起家，也涉足军火、买办、盐业等领域，并发展房地产、典当业、银钱业，后来则多投资于近代交通、工业、银行、地产等。所兴办的现代企业，仍以丝业（缫丝、丝织、丝绸）为主，兼营造纸等，并参与铁路、航运、银行、保险等行业。有的还涉足上海娱乐界、商场和体育场。仅银行证券方面，南浔富商创办或参与的就有：1907年11月，刘锦藻、张澹如、庞元济、张钧衡、周庆云、张弁群等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1909年，张静江在上海创办通义银行；1913年，张静江、周佩箴等在上海创办中华实业银行；1920年，周佩箴、张静江、张澹如在上海与虞洽卿等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周任常务理事，张任监事；1924年，大陆银行于南浔设分行，庞惟锡为首任经理。刘锦藻还参与创设浙江铁路公司并任副总经理，张钧衡（石铭）、张宝善、周庆云、蒋汝藻为董事。

小民对于宫禁富家，好奇心重，而难得实情，因此坊间传闻甚多，以便发挥想象。关于南浔富商的发迹史及其财富数量，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说。所指系以财产为标准的富商等级。1930年代刘大钧所著《吴兴农村经济》称：“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三十万以上不过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也，‘牛’也，‘狗’也，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3]到林黎元写《四象八牛：南浔丝商十二家族》，变成“资财在银洋五百万元以上者为‘象’，一百万元以上者为‘牛’，十万元以上者为‘狗’”^[4]。近年来，更加放大为“四象”身家在千万两以上，“八牛”百万两以上，“七十二狗”三十万两以上。号称总财富达到八千万两，相当于清季政府一年的收入。刘大钧著书时已经指出调查与传闻不无出入，齐东野语，难以为据。如家产百万以上者不止四家，四象当中，刘、张身家均超过一千五百万

两，又称象中之狮。八牛的邢、邱、梅、谢等家产也超过百万，与四象的庞家相近。此外，各级的列名排序，今昔也有所不同。^[5]因为事不可考，以至于樊树志所撰《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关于“四象八牛”之说，只能照录刘大钧的文字。

不过，刘大钧当年并未亲自前往调查，所属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派去的人员，因时间紧迫，取材不易，很难深入。虽然书中举出家财随时代变动以及财产秘事非局外所能知两大原因，后来乡土历史研究者还是对其相关论述不以为然。^[6]

南浔地方历来富庶，因而文风亦盛，入仕者多，从宋至清共出过41名进士，明代即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据统计，宋、元、明、清时期，浔籍京官56人，明、清两代任全国各地州县官的有57人。南宋至民国，在全国有影响的浔籍学者达80余人之多。晚清至民初，南浔暴富，除扩张商业产业之外，也承袭传统，因缘时会，向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受清廷文治思想和疆臣提倡学术的影响，清代商人颇重文化，以儒商为标的。南浔富商子弟，以扬州等地商界风气为楷模，好著书、绘画、收藏、器物鉴赏等事，名家辈出。著述如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周庆云《盐法通志》，绘画以在北京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名声最著，其兄弟姊妹及子侄中善画者为数甚多。藏书则在刘承幹的嘉业堂之外，南浔其他有名于时的藏书楼还有：刘桐建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均衡的六宜阁、周梦坡的梦坡室、严元照的芳苕堂，庞元济的半画阁等。

以遗老自认的刘承幹在学界交游广泛。1916年，刘承幹在上海建立淞社，《学樵自订年谱》记：“翰怡与周湘舫（即南浔八牛之一周庆云）主淞社，集者艺风、子颂、鞠裳、息存、梅庵、叔问、桔农、元素、聚卿、积余、金粟香、钱听邠、吴仓硕、刘谦甫、王旭庄、刘语石、汪渊若、戴子开、金甸丞、恽孟乐、季申、瑾叔、崔磐石、宗子戴、潘兰史、王静安、洪鹭汀、陶拙存、朱念陶、褚礼堂、夏剑丞、张孟劬、姚东木，迭为主客，与乙庵论文……”^[7]该社成员大都海上闻人，他们政治上未必认同刘承幹的遗老情结，文化上则大都倾向于坚守固有文化，忧心政治的改朝换代导致学术文化的一味弃旧图新。

与偏好文化事业者的取向有异，南浔商家的从政之路，更加倾向于趋新，因而大都走了革新甚至反清革命之道，也由此与国民党结下善缘。南浔与政界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南浔对外部趋新人士的吸引力，更主要则是南浔人士对于国家乃至世界潮流的积极感应和主动关注。以前者论，南浔学务发达甚早，原有浔溪书院于1898年改制，增加时务、策论，请汤寿潜出任山长。1900年改由蒋观云继任，又增加西学课程。1902年，该书院与明理学塾合并为浔溪两等小学。一说蔡元培亦曾担任山长。1902年，庞青城创办浔溪公学，聘请杜亚泉（后来《东方杂志》主编）任总教习，叶瀚（1900年中国国会书记，后北京大学教授）、邵力子等为教习，学生当中有后来的著名报人黄远庸，关系人则有蔡元培。^[8]张弁群1903年创办正蒙学社，所聘教师有后来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沈士远、沈尹默兄弟，学生则有朱家骅^[9]、叶楚傖等。1906年，张弁群仿上海爱国女校先例，创办浔溪女校，其时秋瑾刚好因留学生风潮从日本归国，经浙江革命党人敖嘉熊介绍，充浔溪女校教员。^[10]南浔人士因此与中国近代教育关系匪浅。1923年，张增熙子张乃燕当选浙江省教育会长。1925年，张乃燕被任命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1927年11月，兼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

以后者论，与新兴政治势力关系较深者，当属四象的张、庞两家以及八牛周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周庆云、蒋汝藻、张增熙、张澹如为会员。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省谘议局成立，庞青城出任议员。张静江、张弁群、庞青城、周佩箴、周柏年等，都是老同盟会员，长期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辛亥并参与上海、杭州等地的光复起义。张静江作为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历任要职。1924年1月，张静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相继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等。周柏年也曾做到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另外周佩箴的长兄周颂西曾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交际部副部长（部长为瞿秋白）。“七十二狗”之一的吴楼张家的张廷灏，则在1924年毛泽东辞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后接任毛的去职。^[11]

不过，南浔因商致富，参与政治，也要发挥所长，贡献财力。虽然事出隐秘，说法不一，不易征信，也还有进一步扩张资料的空间。民初戴季陶记《庞青城事略》，信息直接得自庞氏本人，所录较为可信，其中提及庞氏为革命事业捐助的就有以下各事：

1906年冬，杨笃生（毓麟）发议收回《神州报》馆，募资三千元，慨然应之。

1907年，加入革命同盟会。孙中山镇南关之役，接济军饷五千元。冬，闻同志张□□为刘光汉所卖，被逮，以三百金延辩护，不及。

1908年秋，与张静江共设东益昌票号，欲为革命金融机关。

1909年，捐万金，倡办《民呼报》，以于右任为主任。夏，赴日本考察商务，闻右任因载虏酋宝熙恶事被逮，促归，以四千余金延辩护士，始延右任出狱。

1910年春，东益昌号为经理李燧生（非同盟会员）盗吞巨款十四万，从此破家资之半。

1911年春，广州黄花岗之役，以千金济之；嗣闻败衄，同志七十余人死之，悲愤欲狂。武昌起义后，以五千余元接济。金陵军队举事，因无器械，致为张勋所败。冬，押家屋得三万金，助蓝天蔚北伐军饷。

1912年春，同志组织同盟会本部于上海，捐资千。

庞家虽然位居四象第三，实际财产总数不过160万两，而且多半还归其兄庞元济（莱臣）掌管。除资助革命活动外，庞青城还先后创办浔溪公学、述志医院等新兴事业，资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以及开办青城造纸厂，能够动用的活钱有限。有鉴于此，戴季陶不禁赞道：

喜安恶危，人之常情，处和平之局，而致力于危险之事，非有卓识者，其孰能之哉。自胡虏肆虐，炎黄声教，沦胥几尽。及乎西潮东渐，革命思想，入人日深，而同盟会于以创焉。吾乡中人抱革命之思想，而得列于健儿班中者，以南浔之张静江、庞青城为最早。然静江少游欧美，久居巴黎，羨自由之乐，读革命之史，而回顾祖国，奄然待毙于胡氛蛮障之中，思想之起步，脑筋之刺激日益甚，自非伏处专制政府下之盲民所可同日语者。青城以富家翁生长于华屋之里，未能如静江之乘风破浪万里浪也，而始

则从事社会事业，继则投身革命团体，不惜毁家以促成共和之新国焉，可谓人杰矣。[\[12\]](#)

由于富商背景以及善于理财，南浔人士从政多担任财政要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庞青城任实业部商政司司长。中华革命党时期，张静江任财政部长。1928年2月，国民政府设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张静江任主席。周佩箴于辛亥杭州光复后即出任浙江省官产处处长。1923年1月，周佩箴任国民党财务部副部长，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厅长，广东沙田清理处处长，黄埔商埠公司执行委员，上海中央银行筹备主任，财政部杭州造币厂厂长，审计部主任秘书兼总务处处长，以及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亚东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常务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张乃燕也担任过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副主席。

南浔富商及其子弟政治上趋新，大约由于几种因缘，其一，出国游历游学。张静江、张弁群、庞青城、周柏年等曾分别前往欧美、日本经商考察或留学，沐浴文明风气，接受崭新思想的洗礼。其二，南浔各家相互结缘，同乡之外，还有种种亲友关系。张静江即分别介绍兄长张弁群、舅舅庞青城和亲友周佩箴等加入同盟会。其三，居住在上海等大都会，思想开通，交游广泛，能够接触各种趋新事业及人物。上述关系也间接影响其他湖州人士，张静江、庞青城、周柏年等即缘此结识联系陈其美、戴季陶、朱家骅等人。

二 湖社与南浔

民国时期中国有两个湖社，成立时间相近，均与南浔关系密切。一是由南浔金家的金城（1878—1926，原名绍城，字拱北，号北楼，别号藕湖渔隐）所办中国画学研究会演变而来的湖社画会。中国画学研究会1920年5月成立于北京，实际创办人应为金城，为取得北京政府的支持，举周肇祥为会长，由金城主持会务。1926年9月，金城病故，其子金开藩与周肇祥意见不合，率部分金城弟子另组画会，取名湖社画会，以纪念金城。该社会址仍设于北京，后相继在全国各城市设立

分会，并出版《湖社月刊》，亦可称为北湖社。^[13]近年来近代国画历史的研究颇受关注，湖社画会成为重点之一。

相比之下，本文着重探讨的另一湖社，显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近年来湖州和南浔的历史颇为地方人士所注目，相关书籍也少有论及。只有郭绪印主编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十章“湖州商帮及湖社”，有较为完整地概括记述。另外方福祥撰文论述过《上海湖社的抗日救国活动》（《上海志鉴》1995年第4期）。而此湖社不仅成立时间早于彼湖社，影响湖州地方乃至全国政局也更为深远。

关于湖社的缘起，戴季陶在《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中说：

去年湖州的同乡诸君，偶然间生出一种活动的意识来，发起湖社这一个团体。刚刚这一件事的发生，适逢其会，我也在上海，并且发起湖社的诸位同乡当中，有不少是我的亲友。于是互相援引，我也列名于湖社的发起人。后来湖社成立，大家不嫌我是一个萍水浪人，推我为职员之一。^[14]

据湖社1925年3月29日大会主席所做的第一年社务报告，该社“自去年六月一日成立以来，迄本年三月份止，为期十月。但本社发起实肇始于去年三月三十日倚虹楼之会议，迄今日止，适满一年”^[15]。

据此可知，湖社虽于1924年6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可是两个月前已经开始筹议。相关报纸对此有所报道，1924年3月31日《申报》称：

旅沪湖人，鉴于湖州地方及旅外湖人情形涣散，为谋建设起见，拟组织湖社，特于昨日下午三时，假座倚虹楼，开发起人会。当推戴季陶为主席，报告开会宗旨，通过草章，并推出筹备员杨谱笙、陈霭士、戴季陶、陈果文（夫）、周由厘、汤济沧、

潘公展、严澹宣、周越然等九人。惟因戴君即须离沪，故由次多数沈田莘递补。散会已六时余云。[\[16\]](#)

同日上海《民国日报》也刊登了文字完全相同的消息。[\[17\]](#)这些报道显示，倚虹楼会议不仅明确决定组织湖社，通过了该社的草章，而且推举出了筹备员，应是一次正式的筹备会，而非一般所谓务虚的神仙会。

《申报》和《民国日报》均未即时报道湖社正式成立的情况，6月4日，《民国日报》以《湖社之缘起与简章》为题，报道了该社成立前后的相关信息：

旅沪湖人发起之湖社，日前开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出委员二十一人。闻定七日下午四时，在辣斐德路临时通信处开第一次委员会，互选理事，讨论社务，业已发出通告。又闻该社社员并不限于旅沪同乡，凡属湖人赞助该社旨趣者，均所欢迎。

根据大会通过的九条简章，湖社的旨趣为“谋湖属六邑及旅外同乡事业之发展”，包括：主持正义，研究建设事业，促进地方自治，扶助民众教育等几方面，进行方法有调查、研究、讲演、出版、实施等项。组织方面，凡湖属六邑同乡，不论男女，赞成该社旨趣，志愿协助社务，由社员二人以上介绍，并经理事会通过者，均可为社员。由社员选举委员21人组成委员会，由委员互选理事7人组成理事会，并互选主席理事1人；理事及委员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理事会可任用办事人员，并制定办事规程。职员均为荣誉职。该社每年三月开大会一次，报告前年度的社务和决定本年度的社务，并选举委员；每月开理事会及委员会一次，处理社务；大会未及议决之事务，得由理事会决定，必要时可开临时会。会所暂设于上海。

湖社成立后，发展相当顺利。1924年6月成立大会时，该社共有社员114人，到1925年3月首届年度大会，已经扩展到237人，翻了一番。以后逐渐增加，达1000余人。[\[18\]](#)委员会分为总务、交际、经济、调

查、演讲、教育、出版等七部，出版《湖州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并于1924年底租定上海圣母院路庆顺里9号为社址。一年中理事会共开常会10次，临时会1次，委员会开常会11次，临时会2次，出版委员会开会2次。理事会、委员会的各项办事规程，均已议决公布。1925年3月29日在北京路宋家街联谊会举行的第一届常年大会，到会的社友及男女来宾共300余人，济济一堂，盛况空前。[\[19\]](#)

湖社“缘起”称：

吾湖州自古荟人文之秀，建邑挽江浙之枢，稻粱既尽美于东南，蚕桑更著名于世界，苟能合作以图功，允见质文之并进。乃湖山黯淡，人事浮沉，值兹国步之阽危，益见乡情之涣散。溯厥缘由，略可屈数，盖吾湖属同乡，里居鲜自卫之机能，旅外乏协助之组织，贫困无告，俊义莫登，水利不修，交通尤梗，实业则尚遏新机，教育则自封故步。综兹丛脞，弥切隐忧，循是以还，与人曷竞。是则因团结之力未坚，提倡之道未至，遂令已成之局徒事因循，更新之谋不容延缓也。用愿纠集同人，组成湖社，本自治之旨，谋公益于乡，言乎私，则砥砺名节，不为势利所转移，言乎公，则黾勉事功，悉以正平为职志，群策群力，任怨任劳，下奋斗之决心，作民治之先导。坐而言，尤贵起而行，始自今日，由一乡更推及一国，作此初基。

表面看来，湖社不过普通的旅外同乡联谊组织，与清季以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地同乡会并无二致，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湖州旅沪人士，早已设立了“湖州旅沪同乡会”，只是活动一直不振。就在湖社成立前夕，湖州旅沪同乡会曾经酝酿改组。1924年2月10日，为旧历正月初六，该会举行新年团拜，严濬宣鉴于“年来对于会务，未尝进行”，提议改组。2月17日下午二时，在海宁路湖州会馆召开同乡大会，“推举起草员，修改章程，以便重振旗鼓”。张静江、陈霭士、杨谱笙、严濬宣、戴季陶、张蕊英、余寰澄、王均卿、张君谋、汤国梨、汤济沧等11人联名发表宣言，声明发起改组之旨趣：

同人等鉴于湖州旅沪同乡，生聚日繁，事业日增，苟协济共进之团体，不能乘时进行，决难树自助助人之基础。而原有湖州旅沪同乡会，徒具章程，湮漫陈言，无俾实用，常年大会及改选职员诸大端，旅沪同人，亦不常闻见，会员又久不扩充，甚非所以应时势之需要也。爰集同志，发起改组，以期固结团体，融洽感情，本会员平等财政公开主义，图谋旅沪同乡三育之进步，各业之发展，及协济事业之改进，庶几会务焕发，同乡交受其益。

[\[20\]](#)

是日会议，推举起草员11人，实到为杨谱笙、王一亭、潘公展、汤济沧、凌铭之、严濬宣、陈果夫、沈联芳等8人，“即席起草章程，大致就绪”，并定于24日召开第二次会议。[\[21\]](#)可是第二次开会时，只有杨谱笙、潘公展、汤济沧、严濬宣、陈果夫等5人到场，周庆云（湘舲）、沈联芳、黄搢臣等人有事他往，其余亦未到会，结果因不足半数，只好延期到3月1日。[\[22\]](#)起草员的消极，反映了他们对于改造和利用同乡会组织意见分歧，这很可能成为另组湖社的重要契机。

湖州旅沪同乡会成立于1906年，发起人为南浔八牛周家的周庆云和沈联芳等，是上海最早成立的同乡会之一。1910年，周庆云又和王一亭、沈联芳等集资在上海建湖州会馆，并任总董。1924年，南浔旅沪公会成立，周庆云任会长。[\[23\]](#)湖州会馆建成之后，湖州旅沪同乡会反而久同虚设，很少活动。1923年冬，湖州旅沪同乡鉴于会馆只管“送死”的事情，发起改组之说。对于改组湖州旅沪同乡会，沈联芳表示反对[\[24\]](#)，周庆云也并不情愿。或者说，他们的改组目标及方案，与其他人士有所差异。表征之一，周庆云没有参与湖社的筹组，第一届湖社委员会由潘公展、杨谱笙、陈蔼士、周由廑、陈果夫、戴季陶、汤济沧、严濬宣、张君谋（乃燕）、周越然、钮师愈、沈田莘、周颂西、邵叔嘉、张静江、汤充土、张廷灏、李伯勤、沈士华、陈希曾、范霞轩等21人组成，周庆云没有列名其中，南浔人士也只有张静江、张君谋、周颂西、张廷灏等4人。

按照戴季陶的说法：

我们这个湖社，本来是由一般同乡的人，在一个很偶然的会里组织起来的。当时大家的注意点，就是看见湖州人太无团体，即使有团体，也是只为死尸作事，不为活人作事。所以想大家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为湖州活着的人作事的团体。这一个黎明的观念，就是湖社的原始的意义，及到既经发起，几个同具这种黎明的观念的人，大家才把为活人做甚么事的条件，假设了几条起来，作为湖社意识的表现，这就是湖社章程上面所规定的职务了。^[25]

应是将湖社与湖州旅沪同乡会做一分别，找出在湖州旅沪同乡会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创立湖社的价值。

湖社虽然号称由湖属六邑人士发起组织，实际上开始社员几乎都是吴兴籍的，《湖州月刊》的论著，十九也是论及吴兴社会，以致有读者来函批评太过片面，“社既以湖州为名，那么对于六邑的情形和事业，应有均等的调查和发展”，希望湖社“以后多征求各邑的社员，一切建设事业，亦须普及各邑”^[26]。潘公展代表湖社和《湖州月刊》回复解释道：“我们的目的，自然要求六邑的同志都加入湖社协力进行，自然要希望六邑的事业平均发展。可是在起初的时候，除了吴兴一邑外，外邑的同志很少加入，或者他们不曾知道的缘故。”并告以已经采取措施，“总期社员的质量并有进步，使六邑的人士都把湖社看作一种切己的事业”。还邀请来函者加入湖社，帮助发展会务。^[27]不过，现状看来改变不大。1932年该社吴兴籍社员达1090人，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28]

南浔为吴兴乃至湖州之首，无论从南浔在湖州的地位，还是南浔富商在上海的实力来看，湖社初期职员的比例都显得不相匹配。果然，湖社1925年度大会选举的21位委员当中，南浔人士增加到6位，除原来的4位委员外，周佩箴、周君常也当选为委员。^[29]《湖州月刊》则由张廷灏担任主编。

不过，由于政见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南浔人士在湖社与湖州旅沪同乡会之间有不同的偏好取舍，周庆云、庞莱臣、刘承幹等留在湖州旅沪同乡会，而周佩箴则左右逢源，两面参与。而在湖社内部，南浔

的张静江等人与吴兴陈氏一脉，也不无各自的利益考虑。这为后来湖社人士在国民党内的争斗埋下伏笔。

三 湖社与国民党

湖社自称是同乡联谊组织，按照《湖社月刊》所说：“对于本乡各种事业，持研究改进之方，下正确无偏之讨论，贯输世界学识，以期我湖人感奋有为，而副湖社创立之旨趣。”^[30]可是，与湖州旅沪同乡会并存，湖社应有更加清楚的自我定位，而不仅仅是人脉的分歧。从“缘起”宣称的以自治谋求民治，由一乡推及一国，可以窥见端倪，但仍然有些模糊。戴季陶的《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专门就此提出讨论，他认为，一定要从观念的团体意识走向概念的团体意识。湖社一经成立，黎明的观念便成过去，“如果没有更充实的内容，把团体的意识，用精确的概念完成起来，我们湖社，便会生不出自由意志，就是不能有独立的意思和行为。再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具备团体的人格。”

一个团体由观念的团体意识进到概念的团体意识时代，必须战胜道德的和智识的魔障，为此，戴季陶提出从湖社成立第二年起应认定两点：“一、湖社现在还没有概念的团体意识，大家要为造成概念的团体意识，用十二分的力量。尤其以确定最高概念，为现在唯一的必要。二、在概念的团体意识未成立以前，大家须觉悟我们的团体，还是未成年时代，以团体的名义对外主张，须持贡献参考资料的态度，不持政策宣传的态度。团体内须增多研究的组织，俾团员互相训练。”

虽然戴季陶将概念集中在“把地方事业是甚么，怎样才会发展，怎样去发展，发展来做甚么”等命题之上，但是明确提出：“为甚么要组织湖社？组织湖社的目的，当然含有要使湖社成为‘有概念的团体意识的团体’的意义在。我们湖社，虽然是地方的团体，却是地方的同志团体，不是地方的同乡团体，所以我们目前大家应该要努力做第一项的功夫。”期望十年之后，即1936年，“我们湖社已经能够成为对内对外都具有独立的意思和行为的团体”。并且宣称：“如果大家今天不认定这一个努力的分际，不努力先做内修的功夫，我恐怕湖

社的生存，不能够久远，即使久远，也不能具生存的意义。连我自己对湖社的兴味，也会渐渐减少至于消灭。”^[31]

将湖社由地方的同乡团体变成地方的同志团体，并且要确定为最高概念，显然并非湖州地方所能范围，而势必与其他地方的同志发生联系。尤其1920年代的中国，正值各种政治势力大角逐的时代，戴季陶虽然希望以团体的名义对外主张暂不持宣传的态度，可是湖社定有演讲的义务，并且决定1925年要从事宣传。作为同志的团体，对外宣传必有所本。奉湖社之命到湖州进行宣传活动的潘公展，所讲题目即“国家主义与中国”，他说：“中国自革命以还，十三年来，政治日趋黑暗，民生日益憔悴，干戈扰攘，盗匪充斥。顽固之徒，遂认革命为多事，诋共和为弊政。但诸君须知中国之所以演成今日之现象者，非革命之罪，而实革命尚未彻底之罪，非共和之患，而实共和未尽了解之患。换言之，十三年来之中国，名为共和，名为中华民国，而实则民也国也，依然打成两橛……惟其为国家主人翁之国民，概置国事于度外，而后外人、军阀、官僚、劣绅、土豪、军队、盗匪乃得交肆其毒。”在他看来，“欲救今后之中国，不得不服一剂根本培补之药，即提倡国家主义是也。惟有提倡国家主义，始可以振作国民爱国之心，亦惟有人民真能爱国，而后如愿引国事为己任。国事纠纷迎刃而解，胥赖此焉”。

与一般的国家主义不尽相同，潘公展所谓国家主义救中国的“唯一主旨，在以种种方法，陶冶吾中国固有之国民性，维系吾中国国民间固有之情感，发扬而光大之，以脱于亡国灭种之境而已”。必须先有平民的革命，推翻一切军阀的势力，根据民意组织民治的政府，才能制定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故归根结蒂，提倡国家主义以救中国之方法，其最初之手段，非尽力于宣传事业，使国民了解国事之必待于国民自决，起而为平民的革命不为功。”^[32]这显然是为行将发动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制造舆论。则湖社与国民党志同道合，引为同志，在地缘的纽带之外，更有政治纽带相联系，其由一乡推及一国的国，也就是要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

不仅如此，湖社的发起还与国民党内的权力中心在地缘上由广东转向江浙相契合。这样的转移，一方面是国民党权力代际交替所引发，另一方面，也和国民党逐渐统一全国的趋势相适应。由于湖州出来的人才众多，相互援引，进入政坛，随着蒋介石的江浙集团地位上升，湖社成员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举足轻重，戴季陶的期望果然如

愿以偿。1934年，湖社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林森、吴铁城、张群、邵力子、张静江等国民党要员送来匾额。蒋介石手书：“桑梓敬恭、忠烈永式。”吴铁城称其“发扬民治”。邵力子许以“含闾广大为民前锋”。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湖社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张静江、褚民谊、潘公展、朱家骅、徐恩曾等长期是湖社的核心人物。湖社为此声势显赫，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同乡团体之一。^[33]刘大钧撰写《吴兴农村经济》时即注意到：

今日吴兴在国内所处之地位，并不减于昔曾盛极一时之湖州。盖往日以“富甲东南”闻名全国者，今日吴兴人士在政治上学术上占重要之地位，亦颇为当世所推重也。鼎革以还，吴兴人才辈出，或输财助饷如张人杰氏，或献身革命如陈其美氏……至今除张人杰氏现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外，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氏，国民政府主计处长陈其采氏，实业部部长吴鼎昌氏，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氏，中委陈立夫氏，浙江省主席朱家骅氏，前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氏，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氏，均系知名之湖州人士……然则今日以衰老若湖州，犹彰彰印人心目，殆地以人善闻者欤？^[34]

所举大都湖社成员。所以有论者指出，湖社实为有别于会馆、同乡会，带有政治色彩的区域性社团。^[35]

在前期湖社，陈其采（霭士）一直担任主席委员或委员长，其他人则分别担任各部工作。尽管他们与国民党结缘并非由于湖社，可是湖社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经常性纽带，进一步增强了彼此的关系，并使之在国民党内可以相互援引。小小湖社的成员竟然能在权力争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占据重要位置，绝不仅仅凭借个人的单打独斗。

不过，地缘关系在向外作用时可以巩固彼此联系，却不能保障内部的和谐一致。进入国民党权力高层的湖社成员，由于所处位置不同，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不时展开明争暗斗。张静江担任浙江省主席

期间，即先后与陈果夫、朱家骅发生冲突。同是湖社主要成员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CC派）与朱家骅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朱家骅早年受惠于张静江，又与周柏年有戚谊，与南浔关系较深。抗战期间，同乡兼同门的朱家骅与二陈，因为轮流执掌国民党组织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遂成水火不容之势。

朱家骅与二陈的派系矛盾，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一再否认，实际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朱家骅派在国民党内的整体实力不足以和CC派对抗，不得不与其他派系联合，但在文教界，尤其是大学系统当中，朱家骅却能凭借较好声誉，有着相当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抗战期间，国民党开始在各大学普设区党部^[36]，而此时刚好朱家骅接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与二陈的位置互换，双方一方面在自己新掌控的系统中排斥对手，一方面力图利用新的权力资源和原有的人脉关系维持甚至扩张在旧系统中的势力，组织部系统朱家骅派改变CC派旧轨，教育部系统则CC派排挤朱家骅的人脉，双方的矛盾日见尖锐，冲突愈演愈烈。而大学为双方利益交叉重合最大的领域，各自都视为禁脔，于是成为两派争夺的焦点。

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朱家骅与二陈互换组织部和教育部职位，此举引发两大系统人事的重新洗牌，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冲突，两派各自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加速排挤对方人马。^[37]王奇生以西南联大为主的研究表明，抗战期间，国民党改变战前基本不在大学设立基层党组织的做法，使得国民党在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当中势力迅速扩张，掌控了局面，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能量有限。直到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人意料地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并相继关闭了全国各学校的党部，中共在大学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两党在大学里的局势才迅速发生逆转。^[38]

撤销学校党部，由蒋介石本人向国民党代表大会提出并获得通过。此举看似为实行宪政做准备，实则背后显然有如何抑制CC派和朱家骅恶斗的潜因。六大开幕之际，CC派与其他各派的权力争夺进入白热化，并且闹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化解矛盾当然不可能，退而求其次，只好尽量缓解或回避冲突。但如此一来，国共两党对于大学师生的影响很快乾坤颠倒，使得大批所谓英美派教授迅速左倾。他们对国民党完全失望，而对共产党未必了解，其仓促间所作权衡取舍，在导致国民党对大陆的统治崩溃瓦解之后，也增加了与中共之间磨合的困难。

四 几点议论

由于南浔的财富积聚与社会联系，近代中国各个层面的许多事情往往与南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间的纠葛，有时甚至影响决定党派国家的命运。这些无限延伸的复杂关系，依照现行学术分科的观念孤立地看，或许无足轻重，整合为全局，则显现彼此呼应的态势，辐射能量大增。由此可以引申讨论如下几点：

一、地方或区域社会研究的兴起，本有二义，其一，中国幅员广阔，区域差异明显，难以笼统而论。缩小范围，旨在求得透彻确切观照。其二，研究层面下移到基层社会，以便全面把握整体。但实际进行时，因为多由科际整合，分门别类，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市镇史之类的视角架构，不能揭示区域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在联系，演变为下层社会或社会经济的专门研究，整体性反而更加丧失。

二、流域经济孕育的富庶地区，形成一定的社会枢纽，辐射面宽，联系和影响超越地方界域。南浔人士在湖州、苏杭、浙江、上海乃至全国，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界的许多要津，其身份亦城亦乡，亦商亦农，不宜仅以区域、乡村等眼光视之。所谓城绅与乡绅，因人因时而异。而且某籍士绅，从本地到县城省垣乃至京师，官绅连为一体。加之清代官制实行避籍，督抚以下各级官员，若不能与当地士绅关系融洽，一旦产生纠纷冲突，往往遭到同籍旅外官绅的攻击纠参，不安于位。中国历史长期分合交替，大小文化并存互渗，因此，研究中国的各类问题，须具体而贯通，不能隔断以放大。

三、中国为伦理社会，尤其重视人伦关系，如血缘、地缘、姻缘以及衍生而来的同窗、同年、同事等纽带联系。这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不宜简单批判。南浔地方小而繁盛，各家各有所长，互相结缘，多为血亲姻亲，如刘家与蒋家、张家与庞家等。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地位，也使之利害相关，结为整体，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团体结社进一步扩张，影响及于全国。

四、区域史、地方史、城市史、市镇史等等的研究，存在见事见物而不见人的偏差，忽略了历史的中心还是人，而人的活动并非机械，所以历史是社会有规律运动与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统一。和扬州富商一样，南浔因富而习文从政，吸引各方人士，影响其此后的言行。

如朱家骅与CC恶斗之际，倚重沈兼士等人，不仅与北大渊源，也与南浔有关。南浔人士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苏杭沪，结交面大幅度扩展，社会联系进一步延伸。在此平台之上，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其社会地位和身份仍然维持相对稳定。庞青城之女庞莲嫁给康有为之子康同凝，相当典型地体现了近代中国变动的诡谲。展开各个世家的关系网，错综复杂的联结层出不穷，令人匪夷所思。

五、湖商的衰落，学人多从株守丝业或经营保守着眼。实则经济转移固然为要因，但中国商人与政府或政治关系过密，以学术文化为尚，以及诸子析产制的存在，也是导致其富有难以长期延续的症结。扬州盐商、广州行商、山西票号的命运大体相似。即使新兴产业的民族资本，不被拖垮的反而是异数。况且湖商倾注甚巨的上海等地房地产，也是受近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暴起暴落，因而损失惨重。

[1] 游欢孙：《近代江南的市镇人口——以吴兴县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

[2] 求良儒：《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63页。

[3]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版，第123—124页。

[4] 林黎元：《四象八牛：南浔丝商十二家族》，《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30页。

[5]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系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改写本。

[6] 今日一般“四象”为刘、张、庞、顾。“八牛”为邢、周、邱、陈、金、张、梅、邵。“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浔的四乡。在镇上的有：邱茂泰、邱盖茂、邱义昌、邱德升、沈涂记、沈永昌、沈永丰、沈天长、李恒德、李万顺、李德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宠茂、朱广隆、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韩怡昌、桂致和、潘泳记、潘大顺、张丰泰、张恒丰、徐世兴、徐惠和、许仁昌、谢森元、刘通德、庞同顺、丁昌记等，多数是开设丝经行致富。四乡有北小圩张家、桥下张家、吴楼张家、斜桥（土斗）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斗）邱家、七里村温家、子嘶湾陈家、藏谷桥王家等。

[7]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8] 参见桑兵《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辑。

[9] 一说朱家骅曾入浔溪公学，误。1907年夏正蒙学社停办，朱家骅改进南浔公学。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3页。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页。一说推荐人为蔡元培或褚辅成。

[11] 陈永昊、陶水木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此书及《南浔金家》，均由陆剑先生寄赠，特致谢忱。

[12] 天仇：《庞青城事略》，《民权报》1912年5月8-9日。

[13] 陆剑：《南浔金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3页。

- [14] 《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1925年4月1日。
- [15] 《本社第一年度之社务报告》，《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 [16] 《旅沪湖州人组织湖社》，《申报》1924年3月31日。
- [17] 《旅沪湖州人组织湖社》，《民国日报》1924年3月31日。两报各有个别误植。
- [18] 《湖社历届社员人数表》，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页。该表数字有些出入。
- [19] 《本社第一年度之社务报告》、《社务报告（三月份）》，均见《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 [20] 《湖州同乡会行将改组》，《申报》1924年2月17日。
- [21] 《湖州同乡会继续开会》，《民国日报》1924年2月23日。
- [22] 《湖州同乡会会章起草续志》，《申报》1924年2月25日。
- [23] 陈永昊、陶水木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第116—117页。
- [24] 华：《湖州旅沪同乡会纠纷的历史》，《湖州月刊》第3卷第1号，1926年5月15日。陈果夫曾编辑《湖州旅沪同乡会改组纪录》，该文有所参照。
- [25] 戴季陶：《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关于湖州旅沪同乡会为死尸不为活人做事之说，1925年9月，《湖州月刊》第2卷第6期刊登署名“嘯”的文章，《我在入湖社前的一段事：“湖州旅沪同乡不会”的谈话》，有极为生动的描述。作者自称是极喜欢结团体的湖州人，去年底经过上海，听说旅沪同乡创办了湖州同乡会，专门前往拜访。不料到处找不到。好容易碰到乡人，才知道同乡会开办一年，连会长会董也没有选出来，且未开过一次会，只是出了会费。寻到同乡会后，没有人在，也没有职员可以找，一位在场的老者问以是否买棺材，如果是，赶紧去找沈联芳。后来找到也是同乡会员的旧同事张君，据说该会由几个真心办同乡会的人和几个实在不要同乡会的人一起办事，结果春天双方闹意见，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真心办会的人一气之下，甩手不管，不要同乡会的人反而管会，所以永远不开会，可谓“同乡不会”。真心办会的人于是组织湖社。
- [26] 《上海大学王宇春君来函》，《湖州月刊》第2卷第2号，1925年5月1日。
- [27] 《复函》，《湖州月刊》第2卷第2号。
- [28] 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646页。
- [29] 《社务报告（三月份）》，《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 [30] 《本刊招请各埠代销处》，《湖州月刊》第1卷第6号，1925年3月1日。
- [31] 戴季陶：《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 [32] 潘公展：《国家主义与中国》，《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 [33] 参见《老上海的同乡团体》。
- [34]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126页。
- [35] 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论及湖社与会馆、同乡会的联系和分别，定义为“资产阶级性”的同乡自治团体。
- [36] 关于战时国民党在大学的组织发展，详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37] 关于两派在国民党内的争斗，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论述最详。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

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引述陈果夫1942年6月12日给蒋介石的密告信，提供了更直接的论据。

[\[38\]](#)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另参见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杨天石、黄道炫编：《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风波》，《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作为方便名词一般而言问题不大，作为关键概念使用则应当十分慎重，以免任意增减而害意。历史上指称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名词，或是名词虽然相同，由不同主体使用或在不同语境之下却意涵各异，受到内外各种要素转移变化的影响，才逐渐演化以致约定俗成。如果不顾演化的历史，用一时的约定俗成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名词集于一线，则难免似是而非。有鉴于此，不宜用概念连缀历史，而要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二者的取径做法看似相仿，实则迥异。前者先入为主，以今人说古事论古意，无论如何旁征博引，心中先验的一是已经认定，对于史事的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只能看朱成碧，与本事本意相比照，难免捉襟见肘；后者则由梳理错综复杂的千头万绪寻出线索，呈现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所论必先探知领悟前人本意及前事本相，进而知其所以然。由是可以避免此类研究中称引前人所言，实际上不过是发挥己意的通病。

1923年，梁启超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

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

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1\]](#)

经过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梁启超所告诫世人的毛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成为普遍化的常态。使用大区概念研究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便是典型事例，值得顺时序检讨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以“华南”为例，以《申报》为脉络，辅以相关资料，即可窥见一斑乃至大体。

一 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综合今日较为正式的各种通行说法，华南的概念包括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两种含义。就自然地理而言，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中国南方”，地理上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中国的广大区域。这种区分包括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自然条件，南方属于副热带季风气候以及热带季风气候，以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古时以水路为主要的运输方式。狭义的华南则特指“岭南”，即“五岭以南”。而广义的华南地区除广东、广西外，包括福建中南部、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以及江西省、湖南省部分位于五岭以南的州县，如衡阳、永州、郴州。

就行政区划而言，民间的“华南地区”说法多样，涵盖各异，官方的规定也屡有变更。据称民国时代有的教科书中，将华南的范围定义为：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以及海南省和港澳。而依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定义，狭义的“华南”通常只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以及香港、澳门。或认为广义的行政区划包括台湾省、海南省全部，福建省东南部，广东和广西，乃至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

上述各种说法内涵外延的不确定性，显示“华南”概念的变动不居，虽有约定俗成，却并非大同小异。而且不少说法本身就是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例如声称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指中国南方，似乎古代已经存在华南的概念并具有明确指向，这显然并非事实。无论地理位置还是行政区划，华南都是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而非古代已有华南的特指。换言之，今日被人们叫作华南的各个地方虽然古已有之，但古代却没有用“华南”一词来专门指称。所谓广义的华南指中国南方，似是而非，很容易误导众生。

晚清以前，没有作为特定专有地域指称的华南之说。华南一词的出现，目前查到较早的为1895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战辑》，著录由“东莞王炳耀煜初辑”，其中提及：

西四月二十六号伦敦特报曰：中日议和，据电报所传，内有数条于欧洲颇多关涉……日本在中国之北，既得旅顺口、威海卫以扼守京邸之海门，又在华南踞守台湾、澎湖以中梗欧华通商之孔道，是不啻双手合抱中国，而屏各国之人为门外汉也。各国能不亟起阻挠，以免日后之大损哉！[\[2\]](#)

《甲午中日战辑》的编著者名王沾辉，字炳耀，号煜初，广东东莞人。1843年生于东莞县官涌乡，是中国礼贤会第一位传道人王元深的长子。王元深是信义宗礼贤会的牧师，妻子早逝，便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德国籍牧师叶纳青（Ferdinand Genahr），让他们在叶牧师于惠州所办的传道学校读书。经过一番周折，开始不好学的王炳耀感悟到生活的艰辛，立志读书上进，成绩很快名列前茅。1866年为传教士，后被聘为香港信义宗巴陵会育婴堂教席，1884年升为牧师。当时伦敦华人建立自理会，在香港建道济会堂，又公推其为司铎。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每逢主日，都要到道济会参加礼拜，听王炳耀讲道。后王炳耀又与温清溪等发起成立劝戒鸦片社。其著作有：《释疑汇编》、《甲午中日战辑》、《拼音字谱》、《孝道折衷》、《说教雪》、《播道说》、《教士上书记》等。1902年病逝，享年六十岁，葬于香港薄扶林公墓。

王炳耀之外，王元深的另一子王谦如也是香港的名牧。王炳耀和王谦如子女众多，王炳耀有子女十人，王谦如有子女九人，王家成为十九世纪香港有名于时的信仰基督教大家族。王氏子女在香港接受西学教育，又受到教会风气的薰陶，皆能成材成器，以王炳耀的六个儿子最为显赫。七男王宠贤童年早逝，王宠勋、王宠光、王宠佑、王宠惠、王宠庆、王宠益均是学有所成。六男之中只有长子王宠勋没有到外国留学，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任教。其余五兄弟均留学英、美。四子王宠惠为法学博士，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

王家的背景显示，华南之说的出现，当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华南一词只是偶尔用之，而且基本都出自外国或来华外籍人士。如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1899年7月2日）《申报》第9415号的《胶湾政策》，根据伦敦来信引述德国某官拟就呈诸议院的振兴胶州湾诸策，其中提及“青岛为作客华南之诸西人避暑处，若有欲设山东全省筑路开矿公司者，必设在德界之内，所定章程务期与德律无悖。此后倘再辟一新疆，德律即随之而往。惟有关于华事者，则华律或可相辅而行云”。

晚清使用华南一词的情形并不常见，而且所指很可能只是中国南部的简称，未必如今日专指南方的某些特定地区。

进入民国，华南的指称逐渐增多，其中一部分与日本有关。如日商在上海设有华南洋行、华南银行。^[3]日系航运公司所辟航路也分成华北、华南各线。1923年10月，“日本福冈县教育会所发起之华南教育视察团谷甚藏等二十一名已于前日抵沪，当日在沪视察日本小学校、公济医院等处，旋赴杭州观潮，预定今日回沪，续赴苏州、镇江、南京各处视察，十日回国。据该团长谷甚藏言：该视察团之目的，在视察中国之教育设施、教育方针与状况，及为教育背景之名胜等。又据该团员武藤直治言：此行意在分科调查中国并日侨之教育状态、人情风俗、各国之殖民地政策及各国之产业（工业及农业）等，调查结果将择要发表。又该团系福冈县各中小学校长等所组织”^[4]。该团考察的范围在长江下游的江浙，所谓华南，显然与今有别。况且就日语本身而言，晚清一般称为南清，民国以后则称为南支，很少直接使用华南。出现在《申报》上的报道，当是翻译使然。

除了日系商企，中国也有一些公司工厂学校冠以华南之名，如上海的华南电气公司、华南机器厂以及福州的华南大学。^[5]1922年，同济毕业工程师舒震东、龚积成、赵际昌等联合上海中外著名工程师组织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专计划一切大小工程，其中分机械、土木、建筑等部，事务所暂设闸北宝山路鸿与坊华兴里八十九号，已于昨日开成立大会。闻该所与上海之中西、广东之华南及北京之华北各工程事务所均已接洽妥协，对于工程上互相提携，将来该所于我国工业前途，裨益谅非浅鲜也”^[6]。这些名称及其分布显示，首先，华南仍与外洋有关；其次，意涵所指与今有别，但也出现特指广东等具体地方的情形；其三，使用华南的地域不限于一处。如位于上海的华南影戏公司、华南印书社、华南烟草公司、华南旅馆、华南国货公司、华南农场，复旦大学还有一支华南篮球队。所指既有对南方特定地区的专称，也可能是笼统包括南中国的泛指。

民初对于华南一词的使用影响最大的，当属远东运动会。该项赛事由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发起，1913年在马尼拉举办了第一届运动会。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八届改为三年，最后两届为四年一次。1920年，组织赛事的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并更名为远东体育协会。中国参加了历届远东运动会，直至1934年因为日本坚持把“满洲国”拉入，中国强烈抗议并退出，远东体育协会因而解体，远东运动会随之消亡。

参加运动会的重要准备是选拔运动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别显著，缺乏统一组织，而且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所以遴选事宜采取分片进行的办法。1919年5月，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为期一周，“我国此次遴选与赛员，分华南、华北两部。兹悉北部与赛员四十人，于上月二十八号出京，带同职员五人，乘津浦车南下，已于昨（一号）晨抵沪，由四川路青年会招待一切，定本星期日乘‘哥伦比亚号’轮船出发。本埠与往者有南洋公学李大星等九人，青年会朱镇庚一人”^[7]。这里的华南华北，显然是南北中国的简称。

1921年5月，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各项参赛选手分片产生，分别组成四支队伍，“中国选手号数自三百号起，分华东（东方八大学）、华南（福建、广东等处）、华北（东三省、直隶等处）、华中（湖北等处）四部分”^[8]。如足球、篮球等，均分区组队参赛。5月26日晚7时，“远东运动会总干事葛莱博士在西藏路一品香欢迎各处运动员及各队领袖，除华东外，华南、华北、华中各队员皆

到会。葛博士并致勉辞，略谓：此次远东运动会，已费六个月之预备，以有今日之成功，吾辈兴致愈接愈近。数日之后，即将举行。诸位运动员此次由各处来申，平素相隔千余里之遥，声气虽通，见面殊难。今日相聚一堂，正可藉此握手联欢。遂请在座各组如华北、华南、华中依次起立，华北到者十人，华中五人，华南四十四人。博士继云：此次比赛，极形勇往，菲列滨方面既形勇猛，日本方面亦甚强健。希望各运动员奋发精神，竭力竞争，为国家增光荣。诸君为中国代表，故鄙人对于诸君希望甚大。中国足球队殊为荣耀，在远东运动会三次夺得锦标，此次想仍能操必胜之券。惟愿诸君注意，切勿因连次得胜而遂疏忽也”^[9]。南北东中的划分，尽管仍与今日习惯不同，已经显出后来大区分界的端倪。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依然分区组队，但减少了华中区，而且要先由各区进行预赛，最后决定哪支队伍代表本区参赛。也就是说，是由一区之内的强队代表该区出赛，而不是挑选出该区的强手共同组队。如“华北、华东、华南篮球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最后预赛时，华东一队业经运动会竞赛委员决定，由约翰篮球队代表。目下代表华南之广州队业已到沪，而华北大至于星期日晚间来沪，至迟不逾星期一。其比赛程序，星期一由华东与华南为第一次比赛，星期三由第一次负者与华北为第二次比赛，星期五由第二次胜者与第一次胜者赛。是故第一次比赛之负者倘能于第二次之获胜，则于星期五仍有比赛机会”^[10]。

由于分区组队和关注赛事等因缘，1921年和1923年远东运动会期间，成为报馆使用华南一词最为频繁集中的时段。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的比赛成绩很差，引起体育界和关注体育事业的各方人士的深刻反省，设法努力改进。“自中国在远东运动会失败后，国内各界人士均致慨于中国无体育机关，以为积极提倡运动，及将来加入远东运动会之准备。兹有唐少川、熊长卿、卢炜昌等发起组织中华体育协会，筹备以来，已将匝月，各方对之均表赞同。昨日唐君等八人联名致函国内体育界及各名流，定于明日（星期六）下午二时起，假座四马路岭南楼召集发起人会议，讨论进行方针并附去拟就之宣言草章。”会议宣言对于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五届失败，尤其以第六届成绩为历来最差，“大家都以为这是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奇耻大辱。远东选手及领袖回国后，曾于六月六日在《时报》馆开过一次讨论会，列席的选手领袖有华北杜连科代表张德平、华南

刘福基、华中杜荣棠、华东沈嗣良，女子选手领袖高梓女士及其他热心体育人士”。会议讨论结果，“对于组织体育机关一事都认为急不容缓之举，因为有了这个机关，可以请求政府的赞助，引起社会的注视，叫一般选手平时有联络的机会和充分的准备”^[11]。

1923年7月7日下午2时至5时，中华体育协会召集人会议假座岭南楼如期举行，到者三十余人。“首由戈公振起立致词，略谓此次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论者早知无优胜之望，良以中国平时既无体育机关，又乏相当准备。迨失败归来，各方均极愤懑，欲从根本上所建设，曾举行一讨论会，当时决定先从华东方面组织一体育会，然后与华南、华北、华中各体育会组成全国体育会。后唐少川、熊长卿君提议先组全国协会，再组各处分会，并拟在中国各部建筑大规模之运动场，其经费则在国内外募集。各方对此提议表同情者颇多，故有今日之会。请诸君共同讨论一具体进行方法云云。”相继演说者对于组织中华体育协会均一致赞同，议决用中华体育协会名义联络华南、华北、华东、华中各体育会，定期举行成立大会，并拟暂假北四川路中央大会堂为临时筹备处，“当举出唐少川、马子贞、沈信卿、郝伯阳、卢炜昌等二十人为筹备委员，卢炜昌、戈公振、陈公哲、郝伯阳、侯可九、裴国雄、马西民七人为筹备会执行委员”^[12]。

第三次全国运动大会于19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武昌举行，关于参赛费和奖额，作出新的规定，所有参赛者必须缴纳参赛费，团体每队3元，个人参赛第一项1元，以后每项半元。奖项则设（甲）全国个人或团体奖；（乙）省奖；（丙）区奖等三类，后两类以占优胜数多寡计算，区奖还须依照下列分配标准：一、满州；二、华北（直、鲁、晋、豫）；三、华西（陕、鄂、湘、川）；四、华东（苏、浙、赣、皖）；五、华南（闽、桂、粤、贵、滇、香港）。各项运动非有两区加入与赛者概不给奖。^[13]除华南、华西外，这样的区域划分，与现在已是大同小异。

可是，上述通告是由设于上海的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代发，一周后，从武昌发出的第二号通告，将区奖的区域划分更正为（甲）华北；（乙）华南；（丙）华东；（丁）华中；（戊）华西。^[14]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分区去掉了满洲，增加了华中。这样的调整，势必相应地影响到华南的涵盖。

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历届全国运动会均按分区组队或竞胜的方法进行，华南概念的使用在这一领域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所指比较明确稳定，与现在的华南范围大体吻合。1924年6月，江苏省教育会附设的体育研究会经过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洗礼比较，鉴于中国体育事业分区建设，“华北组织较为完全，成立已逾十载，华中、华南亦已组织，刻尚力求完备，瞬息当有可观。惟我华东尚无正式机关，率以东八大学代表之，偏而不全，至以为憾。同人盍以江浙乃东南重镇，提倡体育最早之区，未观厥成，徒落人后。果能乘此时机，群策群力，联合两省体育机关组成华东运动团体，克期成立，犹为未晚，于国内既足以表示有系统之组织，于国外且可以表彰我团体之精神，影响所及，关系匪轻”，发起组织华东运动会，通函江浙各体育团体，并发表缘起，准备与其他各区争胜。^[15]是年11月，华东运动会浙江分会致函各体育机关及各校校长，明确提到武昌举行的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各省区大都有团体之组织，“黄河流域诸省有华北运动会，长江中流诸省有华中运动会，沿珠江诸省有华南运动会，独江浙两省尚无联合团体”。呼吁继江苏之后，召开华东运动会浙江分会。^[16]

其他方面受体育运动会分区的影响，有的也按东西南北中分区组织。如1926年4月江苏童子军联合会董事李启藩、江苏省童子军总教练章君畴致函英国庚款委员长威灵顿爵士，请拨庚款一部分作为发展中国童子军事业的经费，其简章计划之一，就是“于华中、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各地分设童子军分会，以促进各区童子军事业，使全国事业平均发达与进步”^[17]。这里的华南，所指大体如今。1925年，上海有人特为华南学生设立宿舍招租，美其名曰：“本宿舍主人鉴华南数省留沪学子日多，寒暑假无适宜居住，特设一华南寄宿舍于爱多亚路五福里（即嘉应学生会旧址），地处交通，招待周到，价格克己，实非沪上各宿舍所能及。现寒假将届，本宿舍尚有余榻，凡各学子其盍兴乎来。”^[18]

早在191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更名为中华教育会时，就将全国分为八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为第一区，山东、河南为第二区，浙江、江苏、安徽为第三区，湖北、湖南、江西为第四区，四川、云南、贵州为第五区，福建为第六区，广东、广西为第七区，东三省为第八区。^[19]到1915年，演变成8个地方教育分会。1925年，分区增加到10个，各区涵盖的地方则有所变更，“或以一省为区，或联合数省为区。合各区面积而言，除甘肃、新疆、云南附属于他区外，已可包

括中华本部。”10区名称依次为：1. 华东；2. 华南；3. 华西；4. 华中；5. 直隶、山西；6. 福建；7. 毗豫；8. 湖南；9. 东三省；10. 山东。[\[20\]](#)

总体而言，北京政府时期无论官方还是社会各界，使用华南集合概念的相对较少，而且内涵外延均不固定。其中将华南与华北相对的概念较为普遍。1924年，沪西绅商张国珍、李及贤等发起华南农场，开幕式演说提出中国以农为本，“淮南子以东南神州为农土，则江苏尤为宜农之地。惟社会上墨守成规，对于农学，弃置不讲，以致进步甚迟。此次同志组织华南农场，于试验之外，并愿在地方上尽劝导之意。开办伊始，请各界人士随时指教，以匡不逮，并望同人尽力经营，无负到会诸君之盛意。鄙人前与同志发起华北大学时之情形，与本场现状相似。今华北已扩充校舍，开办本科，而华南方呱呱堕地，华北犹兄，华南犹弟，希望小弟努力前进，追随老兄”[\[21\]](#)。谈到地理和交通，则以美国的山脉为横断，“吾国的大山，都是由西而东的纵断山脉，所以华南和华北的人民，常常隔膜着，因此语言、风俗、习惯、思想以及其他一切，双方不易融洽。”主张效法美国，以道路建筑为发展实业便利交通的利器。[\[22\]](#)这两处的华南华北，都是南华北华即南北中国的变相。

有时华南的概念使用起来似乎广狭兼有，例如谈论福建的路政，一方面说：“广东省城，自开为商埠以还，因受国外贸易之影响，实为华南西化最早之区。福建毗连广东，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订开商埠凡四，闽省占其二，厦门、福州是也。他若浙之宁波，苏之上海。”似乎仅指狭义的华南，可是另一方面又说：“在中国北部，区域广大，道路平坦，仅以马车为运输之利器。但于华南，则不为功也。其地除少数不幸之区种植罂粟外，其余遍地耕种稻禾。该项田地，需积水深三吋至七吋，地土既为有限，则除需用之途径外，实不能再耗废于扩充大道之用矣。且欲建筑道路于山麓之间，则距须藉机械工程之力。”[\[23\]](#)则又似指南北相对的南中国。

电影发行业存在类似情形。1926年，“为谋影片商与制片公司双方之便利及增高国制影片艺术起见，援美国制片公司联合发行之例，由上海影戏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等组织六合影片营业公司（英文名称为United Film Exchange），设事务所于上海仁记路三十五号三楼，并在华南、华北等各大埠分设代理处，办理发行事务”[\[24\]](#)。该公司广告多次强调要在华南方面扩

展业务，其华南所指，即中国南方。其他如新人影片公司在华南、华北、华西、南洋各地设立经理处。^[25]民新影片公司“出品在华北之平津、大连，华南之省港澳，华西之湘鄂、长沙、重庆，南洋之星架坡、爪哇、菲律宾、安南、暹罗及加拿大、古巴、檀香山、欧美等埠戏院开映”^[26]，该公司摄制人员前往香港澳门及华南一带摄制时便道或前往中山县翠亨乡孙中山诞生地，摄取该乡景物及孙中山故居，以备将来摄制孙中山一片之用。^[27]这些“华南”所指，则并非广大南方地区，而是如体育界分区的华南。

二 “华南”的涵盖与演化

从华南一词发生的历史可见，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来华西人关系密切。即使在体育界，也显然受到外部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维持大一统的格局，社会文化的区域差异显著，很难一概而论，一统而治。所谓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相辅相成。尤其是历史上的南北之分，到了近代更加凸显，所以来华西人早就有了北华、南华的指称。相比之下，尽管东西差异也很明显，但是由于差距太大，反而难以形成对应关系。所谓西部问题，清代以来主要是靖边与开发。

不过，以大范围的区域眼界观察和划分中国各地的差异，虽然与历史上的分封制及行政区划有所关联，主要还是晚近发生的事。清朝连分省意识也还在形成之中，清中叶尤其是晚清以后才逐渐重要，大区的观念可以说并不存在。民初政治分裂，并不以省为限，又不仅仅是大而化之的南北之别，辛亥民元之际，以南北指称清革对立，就有人站出来表示不满，认为所分并不在南北。

1920年代后期开始，华南的用法日渐扩张，尤其在交通、贸易（棉纱）、社会事业（如禁毒、募捐）、气象、对外关系等方面，分区的指向也日见明确。如洋钞出口，分为华北方面（包括天津、青岛、奉天、长春、烟台），华南方面（广东、香港、汕厦、福州），长江方面（汉口、江西、共装北路、南路、长江）。^[28]1928年日本大藏省公布十月份日本对华贸易，输入中国各地及由中国各地输出，分为满洲、华北、长江一带、华南珠江一带、辽东半岛、香港进行统计比较，长江方面，又称华中，华南则指明为珠江流域。^[29]而驻华

英军于上海设华北司令部，将香港原有的司令部称为华南司令部。到1929年将两司令部合并为一，由华南司令出任总司令，仍驻香港，驻沪英军统兵官改称为上海区司令。^[30]1930年，英国政府鉴于中国现状虽不靖，但进口贸易与年俱增，派遣有史以来赴远东的最重大考察团作为正式商务使节，调查英国现有对华对日商业状况，回国后报告政府应采行何种方法以发展及增进英人商业。其在华视察的主要区域为上海汉口、华北、东三省，华南则以广州为中心。^[31]

北伐后，国民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分区展开各种活动，以巩固和加强统一局面。1929年，以国际联盟禁烟大会行将举行，国内拒毒运动应加紧努力，以为应对大会张本，中华国民拒毒会特决定于当年春间举行轰动全国的巡回拒毒运动，以资唤起民众而示我国拒毒决心，计划先于江浙，次及长江、华南各重要商埠城市举行拒毒大运动及展览会。所定运动大纲规定，自1929年春季至秋季，分为：甲、江浙；乙、长江；丙、华南三区，举行巡回展览会，通过登刊拒毒运动特刊，张贴图画标语，举行拒毒运动大会，表演拒毒新剧，扩大宣誓运动，举行学生拒毒演讲论文比赛等形式，唤起民众协力拒毒，督促政府切实禁烟，响应国际禁烟大会。^[32]4月正式启动时，又将三区改成四大区，即一、江浙区，分苏州、杭州、宁波、温州、嘉兴、镇江；二、东北区，分辽宁、哈尔滨、吉林、长春；三、华南区，分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四、长江区，分武昌、汉口、长沙、南昌、芜湖、安庆等，“均由该地当政机关及拒毒团体先时筹备，听候全国巡回拒毒运动团到时，即行举行。”^[33]

此次拒毒运动自4月1日起，在上海举行开幕典礼后即江浙区先行试办，继而在长江区的南昌、九江、安庆、芜湖举行，接着在东北区举行，每处运动期限为三日至七日，共计十二处，参加团体达五百余，参加民众达三十五万余人，“风声所播，远近震动，对于鼓吹舆论，唤醒民众，督促政府，成效甚著”。当年中华国民拒毒会举行第五届年会，各地分会以及该会各合组团体提案甚多，经大会分别讨论通过，决定扩大巡回拒毒运动，并于最短期间内着手实施，尤其是于尚未举行的华中、华北、华南及华西四区分别继续举行，力求达到震荡全国之雄效。各区确定举行活动的城市为：一、华中区：武昌、汉口、长沙、岳州、开封、郑州；二、华北区：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石家庄、太原；三、华南区：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澳门、香港、梧州、南宁；四、华西区：四川、贵州、云南（视财力及时间

容后再定)。从1930年春季开始,举办各种活动,大张旗鼓地推行拒毒运动,并组织各地拒毒分会及同志社。[\[34\]](#)

1931年11月初,中华国民拒毒会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及杭州青年会召集全国拒毒代表大会,大会筹备期间,设大会筹备处于上海中华国民拒毒会及杭州的浙江省拒毒会,此外并在沈阳的辽宁拒毒会设东北筹备处,天津的河北拒毒会设华北筹备处,福州的福建拒毒会设华南筹备处,昆明的云南拒毒会设西南筹备处,成都的四川拒毒会设华西筹备处,杭州的浙江拒毒会设华东筹备处,南洋的新加坡拒毒会设南洋筹备处,“各处主任,亦经分别委定,即日开始工作,一方面由大会筹备处派遣专员,分赴东北、华北、华南、华东、南洋各区,宣传大会使命,以引起全国人士之同情”[\[35\]](#)。

国民政府迁都之后,因首都南京的教育事业欲谋发展,需款甚巨,由党国要人发起大规模募捐团,计划募集国币一百万元为建设用款,分华东、华中、华南、华北、华侨五大队,以蒋中正为名誉总队长,俟蒋返京,即开始筹募,预定一个月内完成。[\[36\]](#)

教会方面延续其分区活动的传统,1929年5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谋奋兴信徒精神生活,并图对外扩大宣传,特于迩近次第在广州(华南)、辽宁(东北)、北平(华北)、汉口(华中)、上海(华东)等处,举行分区退修会议,更于五月十八至二十五日,在杭州之江大学开全国会议”,讨论教会今后五年进行方策。在上海的华东区会,即于5月12至16日,假座天同路狄思威路口中华圣公会救主堂举行,赴会人由华东江、浙、皖、赣、闽五省各公会推派代表,报到者约一百余人,总题“华东教会奋进运动五年计划”[\[37\]](#)。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被划入华东区,而不是传统的华南区,意味着在具体分区方面,华南的涵盖仍然存在变数。

1934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讨论本年度各部工作计划及一切行政方案,举行春季议事大会,到会者除会长及总务处各部职员外,有华东、华西、华南、华北、东北、西北各联合会代表30余人。[\[38\]](#)

1937年4月12日,世界扶轮社第八十一区次社区大会在南京召开,前任总监王正廷演说,提议第八十一区应更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与菲四区,使社务进行更加便利。[\[39\]](#)

从行政层面看，分区进行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缺乏正式的行政依托，因而国民政府尝试加以调整。1930年4月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召开，蒋介石任名誉会长，会长戴季陶，副会长张静江、何应钦，担任筹备主任的朱家骅报告这次运动选手产生的方法和历届不同，从前是适用华东、华南、华北、华西、华中分区运动会的产生方法，这次则以省、特别市及海外华侨团体为单位。“其所以改用这个办法的意思，是要全国的运动家在政府的领导和奖励之下，能够普遍地总动员起来。我们相信在这一次会里，一定可以发见各地许多新进的运动家，一显出他的惊人的纪录”^[40]。提高运动成绩固然是考量的重要指标，加强行政统一，削弱各地割据则是背后的政治目的。

不过，分区确有规划办事的便利，因而一些行政职能部门处理具体事务仍然好用分区的方式。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举办特税办法，“将全国划分为区，每区设区局一处，隶属于特税处，区之下再设若干分局，于省市及重要出产各县就地征收。华南各省已将各区划就，计苏、浙、皖为一区，粤、桂、闽为一区，湘、鄂、赣为一区，鲁、豫为一区。各该区局长、副局长已分别令委”^[41]。内政部为了统一水利机关，设水利局，由中政会交付审查。“该部拟定计划，总局设南京，一、淮河局，设皖；二、黄河局，设鲁；三、运河局，设苏；四、扬子江局，设鄂；五、华北局，设津；六、华南局，设闽或粤。各局组织规程正起草中。”^[42]经行政院送中政会交有关系各组长时间审查，认为可行，由大会讨论通过。“拟于中央设全国水利总局，扬子江、黄河、华北、华南、运河、淮河等处设水利专局，直接归总局管辖（河流跨两省以上者，始得设专局，仅在一省者，归各省建厅办理）。”^[43]财政部是广义的华南，内政部则为狭义。

经济委员会的棉业统制会决定首先调查棉纱两项的生产消耗状况，以便改良统计，使国内棉布达到自供自给的目的。其“纱布调查，计分华东、华北、华中、华南四区，除华南一区暂未组织调查团外，华东区内之上海方面自调查以来，已将就绪，不久即可出发，至无锡、南通各地。华北区出发调查日期，已定本月十五日，由团长聂光耀率领团员二十余人，赴冀、鲁、晋、豫、陕五省调查”^[44]。稍后，经委会棉统会特派专员分赴全国各城市调查棉业产销状况，全国分区又调整为华中、华东、华南、华北、华西五区，每区复分若干组，预计三数月后调查完毕，该会即根据调查情况，改善棉种与织布等方法。^[45]

银行举行的各地金融调查，同样采取分区进行的方式，除了九大都市外，分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东北、西北各区以及香港及国外。^[46]

体育界在加强各省的正式行政地位的同时，仍然要利用分区的架构，并设法使分区与省制相互配合。褚民谊谈到全国运动会时就表示：“以中国之大，召集非易，最好先行分华东、华北、华南三区，每区轮流举行一次，俟各区举行后三年中再召集全运一次于首都，藉可比较各区体育成绩。至区运会之召集者，当由该区各省市体育委员会主持之。全国运动会之召集，则由教部体育委员会主持之。”后来行政组议决全国运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教育部体育委员会指定在各省轮流召集。^[47]

负有帮助政府指导全国体育事宜之责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原来仅设华北、华南、华东、华中等分区组织，1933年全运会在南京举行时，有人建议各地亦应有体育协进会之组织，以协助各地政府进行体育事宜。1935年全运会将于双十节在上海举行，上海体育界同人趁机发起组织上海市体育协进会，以谋协助政府发展上海市的体育事业。^[48]

当然，分区也不免流弊，例如中国是舶来片的大市场，译名理应通令划一。可是不但外国片名华南、华中、华北各不相同，就是演员的名字也相差许多。“江南的范朋克，是华北的飞来伯，上海的瑙玛希拉，平津就叫薛爱黎。”^[49]这显然不利于统一局面的加强与巩固。

三 日本的南进政策凸显华南

日本占领东北后，继续加紧侵华步伐，尽管内部有南进与大陆政策的纷争，华南却是一致的目标。这使得“华南”的名称再度集中出现于各个媒体。据1934年日文《上海日报》发表的中国贸易状况调查，长江一带大抵入超，华南方面各港则输出增加。按一月的统计，中部方面，如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5埠输入总额为66，449，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25，000元，输出总额24，257，000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1,051,000元。长江沿岸一带，如重庆、万县、宜昌、沙市、长沙、岳州、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等11埠的输入总额为9,344,000元，输出仅263,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000元。华北原为中国物产主要输出地区，如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胶州、秦皇岛6港的输入总额为14,554,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703,000元，输出为13,808,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558,000元。华南方面，如福州、厦门、三都澳、汕头、广州、琼州、北海、龙州、拱北、三北、梧州、南宁等16埠的输入总额为15,869,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869,000元，输出为12,564,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787,000元。总体看华南比华北、华中具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50]这使得日本更加重视华南的经济价值。

1934年7月，台湾总督府将先期预定的对岸五领事会议易名为“华南领事官会议”。据厦门日本领事馆称：台湾总督府每年夏季举行华南领事馆会议一次，今年依例举行。^[51]内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原定的“对岸会议”，参加者为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五地的日本领事，会期在6月。因为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乃宣告展期到7月，名称改为“华南领事官会议”，出席的领事减去上海，增加了香港。据7月10日台湾当局发表的此次“对岸五领事会议”之目的，“因为对岸各地有台湾籍民甚多，消极的欲保护此等籍民，积极的欲谋经济的进出、文化的贡献、与夫完成中日亲善的诸种之连络起见，特开此会，磋商各项应行事宜。可知其用意所在也”。出席者除五地日本领事外，由总督府总务官长平冢任议长，总督府总秘书长熊泽、保安课长坂口为干事，列席者有总督府内务部长小滨、警务课长石垣、文教局长安武以及外务省事务官田尻、拓务省事务官荒基、驻华公使官山田等。会议开幕时，由台湾总督中川健藏莅会宣读日本天皇关于脱离国联的诏书，并宣布总督府对于该会之希望及方针。所讨论各案，包括文书课、殖产局、警务局、财务局、文教局、交通局、专卖局、高等法院检查局、海陆军各部门的主管事项、协议事项、希望事项、依赖事项以及民间之事。^[52]

据7月18日华联电，会议具体涉及华南的有下列各项：（一）复活总督官房内之外事课。为进展华南，殊有复活外事课之必要，该课与外务省协同管辖华南一切之外交事项，外务省已赞成，故定明年起再设该课。（二）恢复华南之市场，并为更进一步扩大市场，各领事须积极调查市场或宣传日货。（三）汕头领事竹内提议台人自由渡华作经济视察，文书课长能泽对此予以原则的承认，并谓总督府已有准

备，但困难点在于防止中国革命思想之流入台湾，及台人中之不稳分子（反日思想者）往来中国。（四）植田殖产局长询问倾销台湾煤办法，港粤领均答只能待排日空气之缓和。（五）植田又请各领为台湾波罗蜜罐头之推销斡旋。（六）厦领竹本提议移台民往闽开始产业，植田承诺之，并嘱其具体调查准备。[\[53\]](#)

有评论鉴于中川总督、平冢长官、各局长、各领事及外务省拓务省代表均出席，中川总督于开幕时即表明对华南态度之主旨，会议议决通过福州、厦门日领提请总督府恢复外事课的议案，以及讨论包括殖产、文教、警务、司法、财政及海陆军等事项，断言“可见其任务并不止于驻外领事官之联络已也”[\[54\]](#)。

此次会议的正式结果，经总督府文书课公开发表的议案共有38项，具体如下：

台湾总督府外事课复活事项。（二）以“中日亲善主义”为纲领之宣传事项。（三）给与中国人之团体视察台湾所关各种便利之事项。（四）关于华南需用煤炭之状况者。（五）关于中国凤梨罐头交易状况者。（六）关于指导籍民殖产事业与奖励者。（七）查禁私运金块出口事项。（八）查禁私运伪币入口事项。（九）关于博爱医院者。（十）博爱医院增设产婆（接生女医）养成所事项。（十一）台湾总督府勤务警官兼用为外务省警官之问题。（十二）关于取缔华南各地之台湾人所营鸦片烟馆之方针所关事项。（十三）对岸情势之新闻记事所关事项。（十四）关于闽报（设在福州）经营事项。（十五）台湾青年所关事项。（十六）扩充对于中国人流行症预防注射施疗之事项。（十七）取缔漏籍不报者之事项。（十八）取缔由台湾以小型船向中国私运者所关事项。（十九）振兴台湾华南间之贸易事项。（二十）为扶助小本经营举行低利息资金出借之事项，以及各地台湾公会与台湾全地工商机关联络所关事项。（二十一）关于扶助华南日台人金融机关者。（二十二）华南日台人金融机关互相融通所关事项。（二十三）对岸文化事业所关事项。（二十四）关于改善教员（在华之日本学校）待遇。（二十五）关于台北放送局（无线电）布音事项。（二十六）关于调剂大阪商船会社轮船于福州停泊者。（二十七）对于厦门、台湾间往来船客给与便利之事项。（二十八）对于遇难飘到之船员救济费支出之事项。（二十九）使中国海关对于遇难船与私运船有所识别之事项。（三十）使司法事务趋于简捷所关事项。（三十一）对善邻协会所经营之新闻（即厦门《全闽日报》）予

以积极援助之事项。（三十二）关于各领署互助搜查逮捕所在犯人事项。（三十三）关于通报侨民登记者之事项。（三十四）关于领署代执行罪犯之处刑事事项。（三十五）关于拘拿票之形式事项。（三十六）案件所关事项。（三十七）疏浚广州仓库栈桥前之河床（该河系指珠江）。（三十八）收回广东支库之固定放款案。

这些议案，涉及与华南相关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教育、医疗、新闻、司法、侨民等各个方面，涵盖广泛。恢复总督府外事课的建制，显然意在专门负责以华南为主要对象的各方面活动。除上列各项外，其未发表者尚有关于海军等事项的议案。

由于日本退出国联并加速对华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步伐，台湾总督府此次召集的“对岸会议”一时间引起国际上的严重关注，华南及菲律宾、南洋英荷属均形紧张。台湾总督中川健藏于会议后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略谓：“领事会议因正值时局紧张之际，故易引起各方注目。然领事会非如各方所传之重大，亦非秘密。领事会在田总督时代曾开会议二次，嗣以总督府事务繁冗乃中断，此次不过复活而已。关于台湾对于对岸政策，系以增进彼我文化为基本方针，其他企图各该地台湾籍民与日侨经济的振兴之处，此外别无任何政策。病院学校或新闻事业等社会设施之经营，亦不外于上旨，为期彻底强化此方之意见，往往引起彼我之纷争与误会，为防止此项事情发生，乃使各领事一年一度来此作种种恳谈，今后将继续举行。此次会议之结果，将来对岸有积极设施之必要时，在可能范围内增加预算，以期伸张‘对岸政策’云云。”这样欲盖弥彰的辩解，令人更加觉得会议“用意甚深”。“台督之谈话虽意在解释，然字里行间亦足耐人寻味也。”

[\[55\]](#)

此后日本针对华南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完全印证了人们的揣测。1935年底，“日人在台湾举行热带产业会议及外海陆联席会议后，继又在香港举行华南日领会议，盖为日本南进政策之起始，内容虽秘，惟其以台湾为中心，向华南及南洋作经济的发展则系定策，地域包含闽粤香港及菲律宾英荷属暹罗，事业为扩张日货市场，推广航运，援助各该地侨民之经济等项。最近在厦门开幕之‘厦门金融组合’，即在此目的下应运而生。此项组织为驻厦日领奉台湾总督府之命主持，由台湾公会出面组织，前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主其事”。台湾总督府为其提供补助资金经营储蓄抵押业务。[\[56\]](#)

1936年3月，风传有阴谋家拟在闽省设立自治政府，广州报纸对此予以极大注意，虽然时局危险已极，一般敢言的报纸还是公开指此事系日人背后主使，“谓日人意欲占领闽省，而为侵占华南之第一步骤云”。据路透社引报载某方报告，三月一日有解职的闽省保安队长等集议组织自治政府，“拟先组织闽省人民自治会及闽南民军，然后在德化、惠安等四处成立自治政府。查惠安为海口，台湾等处之接济可由该处而入。日官场对于闽省自治运动一事未发意见，但对自治运动有日人助之一说，已切实否认之矣”[\[57\]](#)。

同时，台湾总督府又提议创设台湾拓殖会社，开发台湾南华南洋产业，作为实施南进政策的经济机构。“日本最近高唱‘北守南进’，于是南进政策甚趋积极。本来去年召集华南领事与海陆军部之外海陆联席会议及热带产业会议后，对南政策已甚急进，迨广田内阁成立后，台湾总督中川赴东京，提出‘台湾拓殖会社设立案’，得广田之允许。最近阁议，遂决定提出议会，大半可通过。”据日本阁议通过的拓殖会社法案大纲，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目的为开发台湾、南华、南洋，而促其事业之发展。为符合同样目的之投资共资金三千万元，年额一千五百万元，政府用现物出资，其余年额之大部分由制糖会社出资。会社的正副社长、理事、监事，均由政府任命，负责业务。台湾总督府接到议决消息后，即召集各部门官员会议，讨论磋商创立事宜，分别制作具体调查案，详商南华南洋设施费。总督府并以南进发展为立场，对南华南洋日人事业之开发或发展，每年有近60万元的设施费预算。[\[58\]](#)

华北事件发生后，国人对于日本政府南进政策的动向，似已不像对大陆政策那样关心，华联社特稿指出：

此实大误。盖日本在华北之进攻虽日紧一日，但其在台湾之经管，在华南之阴谋，在南洋各地之活动，亦在在有引起严重事态之可能。日本政府之野心，原欲并吞全中国，控制太平洋沿岸各弱小民族，以遂其独霸东亚之迷梦。其对外政策之动向，无分南北，究皆与吾国家民族之存亡息息相关者也。广田内阁成立后，永野海相以扩充海军实力，遂行南进政策，要求扩张海军预算总额为五亿五千余万元，并于最近发表海洋政策新方针，锐意向南太平洋各方积极发展，同时对于华南各省之活动亦甚为积

极，如厦门浪人之活动，闽南各县汉奸组织之暗跃，皆由台湾方面予以直接或间接之援助。此为吾人不可不予以严切之注意也。日方当局为谋实现上述之目的起见，正拟变更台湾之行政机构，以军部人物充任总督，实行军政一元化，并拟设立拓殖会社以为经济侵略之大本营。此项计划目前正在特别议会商讨之中，实现之期当在不远。至对于陆军及空军之强化，亦进行不遗余力。现台北飞机场业已竣工，此项飞机场之筑造费时七月，设备完全科学化，机能之大，允称日本第一。最近日本政府所发表之海军政策新方针，其基调与陆军省之大陆政策完全一致，即欲南洋之优势为称霸东亚之更进一步准备是也。日本政府向南洋发展，系以暹罗、婆罗洲、马来亚、菲律宾及荷属东印度为主要对象，进而对抗英美海军，退而掠括天然资源，故前此大角岑生赴委任统治岛视察，即为谋在该岛设防，以掩护此海洋政策之遂行也。^[59]

日本积极进取华南，与将华南视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发生尖锐的利益冲突，英日两国对华南航业的竞争甚烈。“九一八”以后，华南航路除福州、上海间有三北公司轮船外，沪厦汕港粤间航业几乎完全为英商太古轮所独占，福厦汕港间则有美商德忌利士公司。1934年，日轮恢复华南航线，英日两国航业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日本方面，沪厦汕港粤间，有日清之“华山丸”、“嵩山丸”、“庐山丸”、“唐山丸”四艘，台湾厦门汕头香港间，有大阪之“福建丸”、“广东丸”、“凤山丸”及新增之“香港丸”四艘，福厦间则有“大球丸”、“共同丸”，1936年又新增日菲线，经厦门赴菲律宾，有“芝加哥丸”、“墨西哥丸”两轮。英国方面，太古公司因南洋英属限制华侨进口及华北航业衰落，亦极力扩张华南航线，原航新加坡及华北各轮，多调往华南线。在厦投资80万元，建造新栈码头，于1935年完成，海轮直接靠岸，客货起卸便利。且1935年起，沪厦港粤线除每星期五原有“济南”、“太原”两轮北上南下经过厦门外，又新增“庆元”、“琼州”、“广东”、“嘉应”四轮，自海口经香港、汕头、厦门至上海，每星期一必有轮经过厦门赴沪，是为北上线；每星期二则新增“绥阳”、“新宁”两轮，自沪经福州、厦门赴港粤、是为南下线。福厦汕港间，原为美商德忌利士公司之“海宁”、“海坛”等轮航线，太古无之，至是太古公司各轮乃并航福厦。惟自英日对华南竞航后，沪厦间共增十轮，供过于求，客货价因均大跌。沪厦间唐餐楼客舱自32元跌至22元，统舱自8元跌至6元半。是以闽粤货物运输较

前锐减，太古总行不得不将星期二的“绥阳”、“新宁”两轮停航，而以星期五的“太原”、“济南”两轮改变航线，南下驶经福州再过厦赴港粤，“绥阳”、“新宁”两轮则调驶华北，并准备调整“庆元”等四轮的航期航线。[\[60\]](#)

日本的南进政策以台湾为策动中心，台湾新闻界乘机组织“华南考察团”，团长为《台南新报》台北支局桥口政幸，团员为《大阪每日新闻》台北支局记者松田庄一，《台湾日日新报》编辑局岩泽庆三，日本电通社台北支局记者草壁龟雄，台湾《新民报》记者林夔龙，台湾《新闻报》于保倭卫等，于1936年5月访问福州、厦门、汕头，与当地报界进行交流。事前驻汕日领致函市政府，转告汕头报界公会和记者公会，说明该团来访的目的。由市长陈同昶陪同访问记者公会时，各记者及公会各董事皆到，记者公会致欢迎词称：

日本报界受资本主义之支配，已变成极少数人之言论机关，不能代表日本大众讲公道话。例如大谷光瑞的《纵横论》，指中国为匪国，指中国人为匪类，肆意侮辱。又贵族院议员三上谓中华民国国号有失日本之尊严，要将中华改为“支那”，似此侮辱友邦之言论纪载，不加丝毫纠正，诚使吾人至为抱憾。中日同文同种，两民族之间，应如何互相尊重，互相提携，两国前途，才有和平亲善之希望。

接着桥口政幸致答词道：

台湾与华南，地理历史相关至为密切，政治、经济、文化上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台湾舆论界没有来过华南，和华南人士不免隔阂。此次组织考察团来闽粤观光，所经各地，与报界交换意见，其结果，觉得中国与日台，到底一定能达到亲善目的。敝团默察华南各地人士与报界还没有去做促进两国亲善之工作，或者华南各地同业未到过日本与台湾，不了解邻国友邦之情形。贵董事说日本报界不知贵国的情形，那末，华南报界亦似乎未大明了日本情况，由是彼此发生误会与疑忌，不能互相谅解，与未能明

白真正亲善的意义。敝团与福厦两地同业会见时，提出一个建议，即“台湾与华南的亲善，应当从两地报界做起，负起促进的责任”。福厦报界，皆表示赞同此议。今天来到汕头，亦希望贵地同业负起这种责任。日台住民，正努力于和平工作，希望汕头报界亦组一考察团到台湾去，敝同业等当竭诚欢迎。

此番强词夺理的态度逻辑，在日本政客乃至各界的言辞中并不鲜见。只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论如何巧舌如簧，事实还是胜于雄辩。“桥口政幸致词既毕，各记者咸默然无表示，因此回茶会，乃记者公会奉市府命令而行也。”事后桥口表示，对于汕头记者所提议勿侮辱中华民族过甚，致中国人感受刺激，大难为情这一点极表同感。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团可算为日本南进政策之先锋，以文化提携为标榜，作软硬并进之动作，实堪注意也。”^[61]

汕头记者的当面抗议，不仅由于对华北遭受日本侵略的感同身受，而且有着当地面临严重威胁的切肤之痛。其时日本在潮汕一带不断制造事端，试图挑起冲突。1936年初，日领署巡查角田进暴死于路上，迟迟不能侦破结案。“自是之后，日舰被派来潮汕华南一带游弋者络绎于道，日海陆军官要员来潮汕视察者有如过江之鲫。宣传大亚细亚同盟之松井石根大将游说西南当局，经于一日过汕飞厦，虽未与潮汕军政官长谋面，而驻汕之‘芙蓉’、‘朝颜’两舰长及日本居留民会长等，特开盛大之欢迎会，在欢迎席上，作种种重要报告。松井听取此报告后，以便贡献其对付华南方策，确定其推进亚细亚大同盟主义，使此主义伴同经济外交势力，深入潮梅民间。松井飞厦之后，日海军细萱司令偕日皇侍从武官平田乘‘夕张’旗舰抵汕，时海面发出隆隆之炮声，日领原田中及居留民会长等重要日台人十余名，特驾汽船往‘夕张’舰迎之登岸。平田之来，闻系调查角田案件，因是日东区委员李汉魂适乘‘海亨’船赴省，市长李源和奉调署理顺德县长，原任顺德县长陈同昶则奉调来长崎市，彼此正忙于办理结束交代手续，故平田细萱抵汕后，未拜访本汕文武当局，即日下午五时半乘‘夕张’舰返台湾马公要港。”

在此期间，日本驻粤沙面总领事署武官步兵大尉太平秀雄、炮兵大尉尾川勘治，“由总领事河相达夫备文向省府声言赴东江一带游历，请通知沿途军警保护。粤政府不便拒绝，又恐沿途发生意外，特

派出宪兵排长梁世英带宪兵六名，驾驶电单车六辆，沿途随行保护。太平、尾川两武官二日午刻由广九路搭车至樟木头，转搭总部所派之省道汽车，一路前进。连日天寒地冻，细雨霏霏，省道公路干线，路基不平，泥泞淤滑，日武官不辞跋涉之苦，在寒风细雨中作长途旅行，所过各处之风景及山川形势特别注意，即沿途村落各小地名，亦志之甚详。二日午后四时抵惠阳城，转平山向海丰，三日晨由海丰出发汕尾，再折回陆丰、惠来至普宁，四日经流沙入潮阳，转搭火轮来汕。潮梅人民见日武官如此行动，日来人心颇感不安”^[62]。

据汕头通信：某国图我，近来益趋积极，并组成谍查队，分配于我各省腹地，到处刺探军情及地理形势。潮汕方面已有发现。若辈皆操流利之本地方言，装束与潮梅人无异，并与蓬寮中之贫民极接近，常被潮人招赘为婿，认为亲戚交谊，由若辈每月补助女家伙食费六七元。查潮汕方面已登记户籍之某国侨民约六百，其来往无定及保护货物运输入内地者，约有四五百人之众。若辈皆为在乡军人，曾受过严格训练，由其最高当局指挥，担当特殊任务。闻其编制分为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五大支队，每支队分为三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另一个特别中队，每中队分作五六组。汕头市区本划分六区公安分局，该谍查队亦分作六组，每组的五人至十一人，支、大、中各队长，皆由某国人充当，各组长则为台鲜人。其内容组织，非常严密，与军队无异。各中队有流动指导员，该员工作时间极短，往来台、福、汕、厦、广、梧各地，去训练指导各人员工作。至在华所招集人员，先准其入台鲜籍，受某种保障，然后施以实际训练，其课程为侦探术概念、间谍之研究、军事侦查术、天空通讯法、化装术、照相术、中国交通地理、无线电学及收拍使用法、罗马字符号、间谍与通讯术、支那人民之心理、出入公共场所之交际学等，训练期间为四个月，以后有函授之商务班、国策讲述、组织法各种普通课程，甚至有危险应付法、口供等等，闻其中分子至为复杂。潮汕局势近来极形严重，故驻军对于若辈亦特别防范。当地军政警开会讨论检举汉奸、浪人等办法，限各区乡联保检举，严加防范。揭阳、澄海、饶平等县，“亦由军警督促清查各乡丁口，施行武装点名及五家联保，以后有一家容纳外乡亲戚居家，如不报告区乡公所，一经点名查出，联保之五家一同受坐。现检查施行非常严密”^[63]。

为了统制华北华南经济，日本还决定扩充朝鲜、台湾两银行，指定朝鲜银行负华北责任，于华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行；台湾银行负华南责任，于华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所。对两行的扩充，中国各银

行均甚重视。新声社记者特公布两家银行的历史，朝鲜银行原系韩国银行，于1909年由日本政府特许注册创立，1911年日本并韩一年后，该行改组为朝鲜银行，总行设于朝鲜京城，在华分行计有上海、青岛、天津、安东、大连、营口、辽阳、沈阳、小西关、铁岭、开原、四平街、长春、哈尔滨、旅顺、龙井村、傅家甸、阁仰等18处，资本额为日金4000万元。台湾银行系甲午台湾割让后，日本设于台北，为官商合办，1899年开业，总行设在台北，在华分行有广州、厦门、汉口、上海、汕头、福州、香港等7处，资本额为日金1500万元。^[64]其所谓华北华南，仍是南北中国的代称，与其他特定具体区域的指称有所分别。

必须指出，日方的华南指称，除了涵盖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并非日语系统本身的用语，主要是针对中国使用或由中国人翻译所致。在以中国自称中华为自大的日本看来，华南至少隐含对中华的默许，是不愿予以认可的。

四 广州为华南中心的初显

与日本加紧侵蚀华南的谋略相对应，国民政府也试图加强对华南的控制及建设，以备不虞。华南地位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华南的指称也日见明确。1934年底，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中央银行接见《申报》社记者时发表重要谈话，表示准备视察华南财政。据他说：“本人前为明了全国财政及各省废除苛杂情形，曾二度赴华北及长江、黄河流域各地详细视察，对各地经济以及农事生产等情况，得获更深一层之了解。惟华南方面，历次均因公务忙碌，未克前往。近闻年来华南教育、农村、经济等各项建设事业多有进展，且粤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先生亦有电邀本人前往参观及演讲，故余拟俟财政部及中央银行事务稍暇，抽空前往一行，对珠江流域广东、广西各地财务及农村建设等近况作一度考察，俾作中央对改进华南财政及经济等设施上之参考。”^[65]

财政之外，通讯是优先考虑事项。中国往来华南各处电报，以广州为中心。其电路由有线电传递者有三：一是由上海出发，经沪福直达线至福州，再经厦门、汕头而至广州。二是由汉口出发，经九江、

南昌、赣州，越大庾岭达韶州，而至广州。三是由汉口出发，至长沙、衡州、郴州、韶州而至广州，或由衡州、永州、桂林、梧州而至广州。由无线电传递者有二：一是粤汉直达，二是沪广直达。由水线传递者，有外商大北公司所设的沪港水线而达香港，转至广州。“此华南电路之大略情形也。”上项有线电路，迭经战乱，年久失修。粤汉直达阻断已逾二十年，其余各路，支离破碎，从未开放直达。近年湘闽赣三省各段杆线，虽因军事进展，随时抢修，然因陋就简，工事不坚，不能直达工作，辗转递报，稽延时日。若遇天时或盗匪阻断，尤为误事。故以前国内各商行发寄华南电报，因其准确可靠，多愿加付水线费，而由沪港水线拍转。数十年以来，丧失利权，何可胜数！及沪汉粤三处无线电台成立，开放沪广粤汉两路直达，挽回利权不少。但以电机容量有限，若将华南各报均交两路拍转，事实上固所难能，且终不免拥挤延误之虞。交通部为疏通南北电信交通起见，选择粤汉最捷之线路（即长衡韶广线路），积极整理，加设杆线，以期直达。其余如赣闽两省线路，亦正着手修理。湘粤线路工程于1934年6月开始进行，次年1月始告完成，2月11日实现粤汉直达通报，成绩甚佳，来往电报，迅速准确，二十余年粤汉直达阻断之线，今由湘省开放完成，“从此华南消息，瞬息即达中原，对于全国通讯上当有莫大贡献也”^[66]。

通讯顺畅，交通亦提上议程。1936年2月，罗文干到南京接洽黄埔辟埠经费，会晤各主管当局，并确定日期进谒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商谈。据称：“黄埔治港辟埠，即总理《建国方略》中建筑南方大港计划。广州在华南商务上占极重要地位，但以港身太浅，大船不能进口，自香港开辟后，华南贸易中心悉移香港。现粤桂内地交通渐决开发，粤汉路不久告成，建筑南方大港，实不容再缓。至辟埠计划，自民十四年后，已迭决拟订。”^[67]

罗文干的行为，表明广东方面也在积极利用有利时机加强自身地位。早在1920年代中期，广东就有争取成为第三学术中心的努力，要求分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广东建立应用科学研究所。而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一直自视为华南最高学府，对于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仅仅选择资助香港大学不以为然，此时趁国民政府加强华南建设之机，上书庚子赔款中央董事会，请求拨款五百万元，作为在小北建筑新校舍的费用，谓全部计划共需2100万元，中央与地方政府已设法筹款，但所缺犹多。“查中山大学为华南学府，与香港大学同一重要。”如董

事会不能全从经常捐款中拨给五百万元，则请分年拨付息款，以500万元为限。^[68]

至此，华南的指称日趋具体明确，但是不仅缺少正式依据，就连约定俗成也尚在过程之中。直到1936年，律师公会还将全国分为三区：（一）华南区：即首都、上海、杭州、广州等各律师公会会员最多之区，规定七名。（二）华北区：即北平、天津、山东等各律师公会会员次多数区，规定五名。（三）华中区：四川、汉口、江西等各省律师公会，因会员最少，自愿退让。以上规定之十二人中，俟决选时，产生律师界之十代表。^[69]这里的华南包括长江下游的江浙，但不含长江中上游各省，与通常广狭两义的华南均有所不同。

1937年4月，法国前越南总督范连尼到南京，据其自称：“予离安南之后，即至华南云南、广西及广东视察。”范氏是第一次来华，“盖当范任总督时，正值中国革命内战时代也。然依其今年视察之所及，则中国诸事，均有进步，而尤以建设方面，更为显著。今日在华南之旅行，其便利殆与沪宁间之往返，大有相似处也”^[70]。其两次提到华南，前者是华南的各省，则一般不在华南范围之内的云南也被算入。后一次华南以沪宁作比例，应指狭义的华南。

由此可见，华南的名词虽然近晚清已经出现，直到1930年代，依然涵盖有别，究竟何所指，使用起来因人而异，言人人殊。如日本福岡县的华南教育视察团，所视察的地方，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城市。而上海中外商人以华南为名的工厂、银行、公司，也未必与后来认定的华南有所关联。较为明确与后来华南相似相关的，一是航运公司的华南航路，包括粤港线，二是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要与广东的华南工程事务所相互提携。至于台湾省以及设于福州的华南大学，虽然所处地方（尤其是闽南地区）的经济布局 and 人员移动多倾向于华南板块，因而有时也被放在华南的范围，可是常常被划入华东，所以也有人认为福建省和台湾省成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两个概念的交叠区。

来华西人开始使用北华、南华，仅仅是泛称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有时华南的意思与南华相同，并非特指南中国的某个具体地区。1920年代前后参与远东运动会期间，为了避免政治上的分裂割据造成阻碍，采取分区选拔选手组队的办法，出现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划分及指称。这一划分至少有两点与后来的地理及行政区划不同，其一，由于体育的发展较为落后，没有西南、西北等分区；其二，东

北纳入华北的分区。而且各区主要是以学校等单位原有的运动队为基础选人组队，并不采取海选的办法，所以具体的地域划分只能大而化之。

不仅如此，这样明确而固定的分区当时仅仅适用于体育界，而且主要是为了应对政治上割据纷争局面的权宜之计。而在政区划分上，不仅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一般被归入西南，就连后来在华南概念下地位最为稳定的广东（包括隶属于广东的海南岛），也常常被认为是西南的一部分。这不仅见诸坊间和媒体习用的西南各省、西南军阀等等指称，更有正式的政治建制作为支撑。

1931年，因蒋介石在南京汤山关押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引起内讧。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委员南下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在汪精卫、胡汉民的主导下，依靠两广等地方的军事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是年底，蒋介石下野，宁粤合作，广州反蒋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举行了两次联席会议，决定取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名称，另外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等机构，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军务。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其实两广仍然维持半独立局面。

1936年7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陈济棠下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行政院也同日宣布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在此之前，两广都属于西南的范围。而两广尤其是广东，正是后来所称华南的核心基础。

当然，西南政务委员会媒体有时也称为“华南”，与同样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华北相对应。有消息称：“华北、华南政分会案，宁粤双方观点不同，俱极重视。综观各委意见，原则上并不悬殊，但对新闻界谈话，谓通过与否，待决于全会，实则大致已有约定。蒋曾于十五前之中常会提出讨论，经众决提交全会，趋势所至，似必实行。其组织及权限，尚须从长计议。”^[71]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陆续设立了六大行政区，即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中南大区包括后来的华中、华南两个区域，广东即属于中南大区。大区的设置及其称谓，既有各

地历史的渊源，也受到中共自身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南大区取消后，区域概念分别由华中、华南的指称取而代之。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清代、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华南基本上不是正式通行甚至常用的区域称谓，不仅适用的范围有限，使用的时间也不能长期持续，所指更是变动不居。概念及所属的含混变化，显示华南是否一直以今日的形态构成独立区域，与周边地区不同，不无可议。目前以广东为中心的指称，除了一定的历史渊源外，主要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位的上升。至于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其他省份，究竟是属于华南还是华东、华中、西南，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况且即使广东，也曾有中南、西南等不同的归属。用今日的观念认定这些地区现在同属于华南，一般而言问题不大，但是若进而用这样的概念考查历史上华南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内外的关系，就很难避免以己意增减古人之妍丑，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受此误导，历史无疑会朝着今人所处环境所决定之是而被再度创造。

大区与分省的关系密切，大区的分法及其变动，与区域内各省的地位升降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省，原设于中枢，元代才出现分地而治的行省。而且元代的行省，既因缘唐宋的道、路，也有自己的行事规划。如唐代的岭南道，宋代的广南路（后分东西），均将两广合为一体。而元代广东属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则包括广西。明清以后，分省才逐渐演变为大体如今。况且分省开始不过是与部院分事而治相对的分地而治，并非所谓地方行政层级。随着清中叶后行省的固定化为直省，尤其是晚清推行洋务新政以及外官改制，且受日本行政观念的影响，省朝着地方最高行政层级的方向转化。与之相应，分省意识逐渐形成，并随着以省为单位推进各项新政事业而不断强化，以省为名的会馆、书院、学校等设置以及各省同乡会和新式社团日渐增多。

在此过程中，用近代外来行政观念考察各省军政长官的身份地位，便有中央政务官与地方行政官一身二任的性质，这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由此产生的种种纠结，使得省制问题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依然令人相当困扰。后来虽然在体制认定方面日渐明确，可是实际运作之中仍然存在种种两难的情形。迄今为止，与此相关的各种行政、财政、人事问题，依然或隐或现，让不知症结所在者倍感棘手。

以省作为固定的政区并清晰划界，因缘历史，严格说来不过二百年。省界内外的联系与分别，随之出现变化。这无疑会影响大区划分的差异性与同一性。有时一省之内的差别之大，远过于和其他省份相邻地区的联系。从省与省的关系看，也是变动不居，未必如今，尤其是未必始终以经济发达与否确定主从地位，清代陕甘总督治下的甘肃与陕西，以及民初的川、滇、黔、桂、粤，往往穷省可以凭借政治军事的实力而居于强势。两广的情势即相当突出，虽然清代两广总督的治所设于广州，对广西政务处于主导地位，可是进入民国之后却恰好相反，作为众多地方军阀当中唯一能与蒋介石中央分庭抗礼的桂系，不仅拥有桂军，而且把广西建成有数的模范省，对广东的影响力常常大过广东对广西的影响，桂系的势力甚至一度控制湖北和安徽。

五 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

综合上述，各省之上的大区划分并非中国历来所固有，主要是近代由域外看中国产生的概念，无论媒体、教会、市场还是体育界，都戴着西式有色眼镜。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和日本逐渐加快侵华步伐，使得大区的指称用法越来越广泛，并逐渐趋于约定俗成，只是尚未定于一是，存在名同实异或名异实同的情形。大区概念的使用，大都不过为解决当下的问题图个方便或因陋就简，并未深究分区的当否以及意义。

这样本无深意的分区，在1960年代后期海外兴起的中国区域研究中有所发挥。区域研究的初衷，是鉴于中国幅员广大，差异显著，若是一概而论，难免以偏概全的局限，或是流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只有缩小空间的范围，才能超越大而无当的粗疏或见木不见林的偏蔽，切实求得整体的把握。可是实行起来出现若干不无可议的偏向，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各项：

其一，用现行的行政区划作为分区的依据凭借，上溯考察该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这犹如傅斯年所批评的将二千年集于一线，用后出的概念考察之前的分区，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发现相似性，导致将现行区域内各地方的历史强行牵连在一起。预设区域，势必以假定为主导，所有的联系及分别，都是在预定的范围内自说自话。实际上现行区域内的各地，在历史上未必以统一区域的形式相互联系，或是与其

他地方的联系更为主要。用后出的集合概念研究前事，即使晚清分省意识已经明确，直省地位显著上升，以省为单位的区域研究仍不免忽略当时一省各地以及各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二，将所认定的区域内没有事实联系的现象想当然地视为同类并加以归纳。研究基层社会，往往苦于没有特定地方的连续性资料，可是既然按照后来观念预设了一定的范围为同一区域，则凡是历史上在此出现的事情，均分门别类地视为相同事物，进行归纳分析。其实这些事实是否同类，全在研究者的主观认定，否则就无法使之相互联系。这样的求同本来就与史学的见异背道而驰，如果缺乏必要的学术自律，更加有如天马行空，任意驰骋。而有连续性资料的基层社会单位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全面掌握才能定点取舍。随意选点随便下手，只能穿凿附会地将并无实际联系的区域内各地方形似而实不同的人事现象组合在一起，并套用外国别科的框架加以组织阐释。此外，研究单位日渐下移缩小的趋势带来的问题之一，是相关资料缺乏连续性和丰富性，只能跳跃地进行类像化处理。而且单一记录不易像研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那样进行多方比勘印证，又和初民社会研究类似，能否内化以及内化的当否，取决于个人是否現地考察，内化与外在的标准实际上全在自我，大都不会被他人或后人反复勘验，说起来像而未必是的情形所在多有。

其三，缺乏整体观照，只就局部具体立论，所谓区域性特征，一旦放宽眼界，则或大同小异，或生搬硬造。最为典型的是一般区域文化研究，各自的分区看似有历史渊源，其实不过是画地为牢，重新编织组装材料史事。据此形成的区域文化史，与其说是重现历史本相，不如说是杜撰各人心中的历史。即使旁征博引材料，却脱离事实原有的时空位置及彼此联系，貌似叙史，实则演义。诸如此类的再创造，只是借述说历史讲出各自心中的认识。受此误导，一些史上实有的实事，也会被重新解读乃至塑造。例如浙东学派的研究，大都不能分别历史上浙东、浙东学术及其指称的渊源流变，在梳理历来的相关史事和指称的基础上，重现二者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分别。各自依据心中之是重编浙东学术的谱系，实在是创造历史而非研究历史。

其四，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无论空间还是层面，都被严重分解。中国历来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区域研究引进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假定个别等同于一般，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

小传统立论。这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本相相去甚远。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区域研究如果没有整体关照，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很容易被人为肢解。将区域研究的经验放大，还会形成以局部为整体，从局部看整体，由局部求通论的偏见，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的根本谬误。

区域研究的流弊，根源于学人欲突过前人而力有不逮，无法循规蹈矩地接着做，只能另辟蹊径，借由外力，以求出奇制胜。欧洲各国，主要是拉丁方言区分裂而成，国土人口有限，美国虽然地广，却是联邦制或邦联制，各州独立性很大。在欧美人士的眼中心底，广土众民的中国如何能够长期连接形成一体，实在是匪夷所思之事。戴着自己的本色眼镜，自然容易看到区域之间的差异，而不易把握彼此的联系。其实中国凭借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同化力，早已过了分封的时期，进入一统的时代。或指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不及他国，不过是以现在国家为单位，倘若放眼全球，中国历史上正是几乎竭尽所能地融合了很大一部分世界而成，而且迄今为止，仍是真正融合有间的最大部分，除此而外，岂有他哉。

就此而论，理解中国最为关键的恐怕并非区域的差异，而是在存异之上能够求同。以欧洲中心的准则为尺度，中国的大一统受到的批判远过于理解。尽管大一统的一些做法以及统到何种程度不无可议，可是却不像历史上其他大帝国那样昙花一现，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很难解体。不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为循环往复的规律，而且分的趋势日渐减弱，合的状态日益巩固。考虑到当今欧洲共同体连有限的统一也很难维系，就不难想象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且经历治乱分合而长期持续，的确难能可贵，确是最为重要的特征和本质。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大一统，凭借的主要不是暴力强制，而是文化同化，单纯或主要依靠武力的大帝国，基本不能持久。中国的化人与欧洲的分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层次，重视区域差异说到底还是分界的变相。

毋庸讳言，中国的融合尚未达到无间的程度，因而不会故意抹杀差别，弄些表面上看起来单一的假象，所达到是和而不同的境界，不必强同，也能共存。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等正是因此而反对鼓吹边疆民族，顾颉刚对此予以正面回应并进而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只有在这样的整体观照之下再来研究人与地不同的具体，才有可能贴切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流变及其本质特征。

观念偏差之外，主导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受到学科发生于初民研究的制约，有意无意忽视大文化，二是误解所谓田野调查，连带进一步放大了对于文献记录的怀疑。

人类学原本是为了初民社会的研究而发生，随着研究对象的逐渐减少，到1930年代，面临着时段和层面下移的重大转折。费孝通适逢其会并且因缘巧合进入中心位置，按照他的看法，“当时的社会人类学事实上是一门研究殖民地上土人文化的学科，明确提出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谓‘文明’社会，应当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72]

在此转化过程中，人类学的方法固然必须有所调整，基本性质仍然不能不受生成系统的制约。而初民社会无论上古（考古学）还是当时（人类学），主要对象是人地较小的单位，一般只考虑内部，较为忽视与上一层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假定任何单位在相对独立的同时都具有普遍意义，每一个体如同分子细胞，与其他个体同质。这与文明社会尤其是中国的情况无疑相去甚远。

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国自然形成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的范围及内外关系在历史上变动不居，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别及联系错综复杂。更为重要的是，长时期的大一统取向及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无论王朝体制还是社会组织，有意无意地采取各种形式促成跨地域纽带的社会联系，地缘性往往成为社会成员广泛交往联系的凭借。如避籍制使得京官的同乡组织发达，与原籍绅士相呼应；绍兴师爷依靠地缘关系持续占据幕府的席位；大小商帮一面背靠原籍的物产交通等优势，一面凭借地缘性的会馆公所等组织成为居住地的重要社会势力，促使原籍与旅居地联系的增强。由于城乡之间较少人为制造的壁垒，流域经济孕育的富庶地区，形成枢纽，辐射面宽，联系和影响往往大幅度超越地方界域。

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较高，经历分合治乱的反复，加速加强了融合的程度，各地域之间具有多样化的联系机制。即使在分裂的状态下，各个层面的交往联系也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持续进行。晚清遭遇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可是社会联系的格局并未改变。如上海等城市凭借商帮以及各种新式社团、传媒、邮电等形式，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原籍及各地交往的频率进一步加快。以区域史或城市史的观念，很难全面关照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局性作用。一些中小城镇亦如此，如浙江湖州吴兴南浔人士在湖州、苏杭、浙江、上海乃至全国，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界的许多要津，民初重陷割据分裂的状态，虽然政治对立，军事混战，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联系却始终未曾中断，教育、体育等活动，还一直由全国性组织主导进行。

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一方面，史料类型大幅度增加，除文献之外，各种器物、图像和口述资料也进入史料征引的范围，甚至发掘现场也成为重要的历史证据；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研究本来就文献不足征，同样文献不足的上古历史，即陷入疑古辨伪的窘境，这使得主要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在古史和基层社会等领域受到强烈冲击，发掘调查成为回到现场的重要取径。

不过，民国以来的学人对此也存在误读错解。新一代的人类学主张离开书斋，回到实地，主要并不是因为一般而言文献不如实地考察更加可信，而是由于人类学在开始阶段所依靠的文献，基本上是各种外来者的记录。正如费孝通所描述的英国新旧两代人类学者的差别，弗雷泽（James Frazer）很像中国旧式的冬烘先生，高坐在书斋的太师椅里，伏案终日博览群书，阅读一叠叠从英国当年旅居在广大殖民地上的官吏、商人和传教士寄回的书札杂记，用进化论构筑海外各地土人生活的理论。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则反对用异样的眼光将土人的行为和思想看得乖僻离奇，主张实地和土人们一起生活，从内部真实体验和了解他们的文化。所以他呼吁人们从关闭的书斋走出来，到人类学的田野里去吸一下清新的空气。^[73]其间分别的关键，并不在文献与调查，而是认识对象的外感与内化。

中国早已脱离初民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一以贯之，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学的文明史部分，不仅不能摆脱文献和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印证文献的古史记载。傅斯年针对李宗侗所说古史的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的看法告诉顾颉刚：“诚然掘地是最要

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见，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坐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

[74] 史语所后来的重建，半是所谓史前时代的拉长，半是文明史初期的完善。至于三代以下，顾颉刚的做法和傅斯年的说法均未过时。

关于不同国度史料与史学的关系，章太炎有过整体性的评论。他指责“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是“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中国即是“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可以器物补史乘之未备，而不宜以器物疑史乘，或作为订史的主要凭据。[75] 李宗侗误以为欧西古史资料多，其实不然。葛兰言（Marcel Granet）当年试图研究欧州的古代民史，因为缺乏资料，不得不转而研究中国。中国古史文献繁多的特点，一直制约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虽有地上与地下之分，仍然是以文献证文献，而不是以古器订古史，更不是以发掘重建古史。1930年代成立于北平的考古学社，对于掘地和金石学同样看重，其所谓考古，主要还是考证文献记录的古史系统。所以社会人类学者抱怨道：欧洲的考古学包括古地理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先史人类学、先史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古语言学，而我国现代学者往往仅知在文字学一方面努力。[76]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新锐考古学人对于中国考古学与文献的密切关系依然感到困惑。对夏文化的期待成为中国学人的重要情结，背后也受此制约。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人类学将研究重心从初民社会转向所谓文明社区，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如果说马林诺斯基呼吁人们走出书斋进入人类学的“田野”，作为初民的生活地方还大体成立，作为文明时代的田野，就很容易误解为仅仅限于乡村社会。其实，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所谓田野，出自对于field一词的误译，其本意应是“实地”或“现场”。即使马

林诺斯基，与其说是强调离开书斋文献，不如说是抛开外来者戴着有色眼镜的描述记录，回到研究对象活动的实地现场，像研究对象一样地从事各种活动，以求达到对于该文化的内在理解。

不仅如此，要想像马林诺斯基所主张的那样从内部真实体验和了解土人的文化，以及费孝通所说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研究文明社会人们的生活，仅仅靠走马观花的调查，难免仍然外在，要想实现文化内化，必须亲自回到现场，实地和土人们一起生活。无论内化与外在两派如何聚讼纷纭，行走式的调查是无法真正体验和了解土人文化的。同样道理，对于文明社会的研究，也应当想方设法使自己内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研究同时代身边事，可以借助调查，无需内化，因为他本身就是文化内人。若是研究已成过往的历史，要想穿越时间，回到现场，哪怕是本地人，仍然离不开文献史料，内化式地熟悉现时现地生活只是有助于更加贴切地理解史料，只有全面系统准确地解读史料，才有可能亲临其境地回到历史现场。

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特定时段甚至特定时间，而且要想方设法回到实时实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使研究者变成历史的亲历者。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穿越时空隧道，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力求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回到没有后出外来概念的时期，体会当时当地亲历者的言论行事，并且顺时序地了解观念史事从无到有的发生及其衍化。这样的努力永远不会与历史完全重合，因此也永远有继续努力的空间。

华南指称相对晚出，内涵外延变动不居。如果假定华南为从来就有，等于预设前提，用后来观念看前事，难免以现在的概念组装过去的史事，强古人以就我地理解前人的本意。历史上属于华南的，或许视而不见，不属于华南，或同时还属于其他区域的，则反而被囊括，不能以历史的态度对待。因为不仅福建、江西、湖南是否华南大可疑，广西到底属于华南还是西南，也有异议。甚至广东本身的“华南”历史也不长，且不定。笼统视为华南，是以当下的局势衡量历来的情形。这与浙东等等研究的倒述大体相似，看似历史叙述，实则削足适履，而非量体裁衣。要想求其是，必须先求其古，由求其古而致其是。在此前提下，应当重新思考适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区域研究方法和取径。将华南之类的区域概念作为历史问题加以研究，首先应

当梳理概念的发生及其衍化的历史进程，了解这一概念产生和流变的语境，尤其要注意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的变化，以及指称相同而内涵外延不一，或是指称有别而所指全同的情形。其次，应探究各种区域集合概念出现之后，对于所指区域的相关人事的观念认识是否发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影响了什么、影响到何种程度。只有了解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才能把握概念的意涵及其所指。

[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2] 王炳耀辑：《甲午中日战辑》，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辑之001，台北，文海出版社1955版，第268—270页。

[3] 《车夫偷窃螺丝钉》，《申报》1917年12月4日，第11页，本埠新闻；《申报》1918年10月7日，第3页，外电，东京电。

[4] 《福冈教育团赴杭》，《申报》1923年10月3日，第15页，本埠新闻二。

[5] 《浦东毛家浜之劫案》，《申报》1918年4月12日，第10页，本埠新闻；《大批钢管钢条起运》，《申报》1921年5月26日，第11页，本埠新闻；《万国学生团过沪预志》，《申报》1922年4月14日，第15页，本埠新闻二。

[6] 《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成立》，《申报》1922年4月11日，第15页，本埠新闻二。

[7] 《华北参与远东运动员抵沪》，《申报》1919年5月2日，第10页，本埠新闻。

[8] 《远东运动会消息》，《申报》1921年5月25日，第10页，本埠新闻。

[9] 《远东运动会消息·葛莱博士对于中国选手之勉辞》，《申报》1921年5月27日，第10页，本埠新闻。

[10] 《远东运动会华选手预赛讯》，《申报》1923年5月4日，第13页，本埠新闻。

[11] 《中华体育协会之筹备》，《申报》1923年7月6日，第18页。

[12] 《中华体育协会昨开筹备会》，《申报》1923年7月8日，第14页。

[13] 《全国运动会新闻》，《申报》1924年3月2日，第14页，本埠新闻。

[14] 《全国运动会消息》，《申报》1924年3月9日，第14页，本埠新闻。

[15] 《发起组织华东运动会》，《申报》1924年6月18日，“本埠新闻”，第14页。

[16] 《浙江教育杂讯·组织华东运动分会》，《申报》1924年11月26日，“国内要闻二”，第11页。

[17] 《请拨庚款发展童子军事业》，《申报》1926年4月28日，“教育消息·要闻”，第7页。

[18] 《华南学生寄宿舍分榻出租》，《申报》1925年12月24日，“广告”，第8页。

[19] 贾腓力：《中华教育会》（中国基督教续行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教会年鉴》，1914年），朱有璘、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9页。

[20] 程湘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成立之经过》（《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3月），朱有璘、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55页。

- [21] 《华南农场开幕》，《申报》1924年4月29日，第14页。
- [22] 风秋槎：《道路工程与经济》，《申报》1924年6月28日，“专论”，申报汽车增刊。
- [23] 高祖英：《福建之路政谈（译）》，《申报》1924年7月12日，“专论”，申报汽车增刊。
- [24] 《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开幕广告》，《申报》1926年6月26日，“广告”，第2页。
- [25] 《新人公司南洋经理处成立》，《申报》1926年12月5日，“剧场消息”，本埠增刊第1页。
- [26] 《上海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启事》，《申报》1929年2月5日，第2页。
- [27] 《申报》1926年12月3日，“游艺消息”，第13页。
- [28] 《现银出口后拆涨而厘压小·洋钞交易》，《申报》1928年5月24日，“商业新闻”，第17页。
- [29] 《上月份之中日贸易》，《申报》1928年11月14日，“本埠新闻”，第13页。
- [30] 《英国陆军部派员接收沪北司令部》，《申报》1929年3月26日，“本埠新闻”，第14页。
- [31] 《英经济考察团》，《申报》1930年11月29日，“本埠新闻”，第13页。
- [32] 《筹备全国巡回拒毒运动》，《申报》1929年2月22日，“本埠新闻”，第14页。
- [33] 《全国巡回运动昨日开幕》，《申报》1929年4月7日，“本埠新闻”，第14页。该报道称第一区为江苏区，据《申报》1929年10月26日第14页“本埠新闻”刊登的“拒毒会近讯”，应为江浙区。
- [34] 《拒毒会扩大巡回拒毒运动》，《申报》1929年12月31日，第16页。
- [35] 《全国拒毒代表大会筹备讯》，《申报》1931年9月11日，第16页。
- [36] 《首都教育募捐之先声》，《申报》1929年4月25日，“国内要电三”，第7页。
- [37] 《基督教在沪开华东大会》，《申报》1929年5月11日，“本埠新闻”，第14页。
- [38] 《安息日会大会工作》，《申报》1934年1月23日，第11页。
- [39] 《扶轮社在京开社区会通过赠王正廷银杯》，《申报》1937年4月13日，第8页。
- [40] 《轰动全国运动会开幕》，《申报》1930年4月1日，“教育消息·全国运动大会特刊（第一号）”，第11页。
- [41] 《特税分区征收》，《申报》1930年12月22日，第4页，国内要电。
- [42] 《内政部筹设水利局》，《申报》1932年7月18日，第4页，国内要电。
- [43] 《统一全国水利计划》《申报》1932年8月13日，第8页，国内要电二。
- [44] 《棉统会调查团华北区定十五日出发》，《申报》1934年1月12日，第11页，本市新闻。
- [45] 《全国棉业产销状况》，《申报》1934年3月31，第8页。
- [46]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申报》1936年5月15日，第3页。
- [47] 《褚民谊谈全国运动会》，《申报》1932年8月19日，第12页。
- [48] 《本市体育协进会昨开发起人会》，《申报》1935年1月28日，第14页，体育新闻。
- [49] 灿烂：《谨陈中央电检会》，《申报》1932年11月27日，本埠增刊电影专刊第10页。
- [50] 《日文报载我国贸易状况》，《申报》1934年3月12日，第9页，本市新闻。

- [51] 《台督府召开华南领事会议》，《申报》1934年7月12日，第8页。
- [52] 《台湾总督召开对岸领事会议》，《申报》1934年7月24日，第10页。
- [53] 《台湾举行华南领事会议》，1934年7月19日，第3页。
- [54] 《台湾总督召开对岸领事会议》，《申报》1934年7月24日，第10页。
- [55] 《华南日领会议经过》，《申报》1934年7月27日，第9页，国际商业电讯。
- [56] 《台人组设厦门金融组合》，《申报》1935年12月20日，第9页。
- [57] 《传阴谋家在闽酝酿自治》，《申报》1936年3月14日，第3页。
- [58] 《创设台湾拓殖会》，《申报》1936年4月24日，第8页。
- [59] 《日本南进政策》，《申报》1936年5月11日，第7页。
- [60] 《英日航业在华南之竞争》，《申报》1936年5月25日，第8页。
- [61] 《台湾记者考察闽粤》，《申报》1936年6月1日，第14页。
- [62] 《日武官深入内地游历》，《申报》1936年3月10日，第9页。
- [63] 《潮汕严防浪人间谍》，《申报》1936年7月14日，第10页。
- [64] 《日本扩充在华台湾朝鲜两银行》，《申报》1936年8月3日，第11页。
- [65] 《孔财长谓将抽暇南下》，《申报》1934年12月28日，第10页，本市新闻。
- [66] 桢：《粤汉有线电路直达》，《申报》1935年2月16日，第22页，电信特刊·电界之声。
- [67] 《罗文干谈黄埔辟埠计划》，《申报》1936年2月8日，第6页。
- [68] 《中英庚款董事会议》，《申报》1935年1月15日，第3页，要电·国际电。
- [69] 《律师界国选代表分三区分配》，《申报》1936年8月26日，第12页。
- [70] 《李石曾俞鸿钧昨招待法前越督》，《申报》1937年4月24日，第9页。
- [71] 《设政分会问题》，《申报》1931年12月22日，第6页，国内要电二。
- [72]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0、25页。
- [73]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第132—133页。
- [74]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 [75] 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108页。
- [76] 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收氏著：《社会学与民俗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该文原载《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3、4期和第2卷第1期，1942至1943年，并出有单行本。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统一集权，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社团争夺青年，进而影响全社会全民族，一改往日做法，在各大学积极扩建国民党组织，使得各大学师生中国民党员数量快速发展，各校党部的地位也相应提升，成为大学里举足轻重的势力。然而，将大学当作政治地盘和势力范围，在扩张国民党声势的同时，也使得国民党内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延伸到大学校园，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另一方面导致本来暗潮汹涌的大学更加泛政治化，不仅破坏了大学的形象，也增加了师生和全社会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抗战结束前夕，国民党决定取消包括大学在内的区党部的组织活动，中共乘机加快在大学师生中间的组织发展。随着国民政府的军事失利和国统区的社会失范，大学师生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日益离心离德，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的分崩离析。

抗战期间乃至此后，介入大学校园争斗的国民党派系主要是二陈的CC派和与之关系甚深的后起朱家骅派。关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历来众说纷纭，大都语焉不详，相关著述，即使正经之作，亦多夹杂未经斟酌考订的坊间传闻，似是而非、以讹传讹之词不在少数。尤其是CC派，尽管当时即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还有人撰写成书，可是不仅当事人矢口否认，相关记述也言人人殊。直到近年，才有学人爬梳整理，令基本史事大体可以征信，CC派与朱家骅派交恶纷争的来龙去脉也得到了部分交代。在此基础上，又以西南联大为中心，探讨了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发展，并略及由此引起的派系斗争向校园的延伸，提示了若干关键性议题。^[1]由于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党部主要由朱家骅一派控制，与CC派的矛盾并不突出，双方在各个大学恶斗的全局详情及其影响，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以近年来海内外学人对此议题的研究进展为起点，考察抗战期间以至战后二陈和朱家骅两派在大学系统的激烈缠斗，以及这一派系纷争在大学教授群体中造成的深切影响，乃至导致教授群体在国共相争的政治漩涡中做出各自取舍等一系列复杂纠葛，不仅能够加深认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何以迅速从如日

中天走向一败涂地，对于后来进入新中国的旧知识界的种种不适应，亦可增加感同身受的理解。

一 相煎何太急

根据王奇生的研究，除个别例外，抗战前国民党很少在大学建立组织。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开始谋划在教育界扩张势力，而在大学建立党部，无疑是名正言顺地发展地盘的首选形式。所以1938年底，仍然由CC派干将张厉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着手在中央大学等八所高校筹设党部。^[2]

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由CC派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向大学扩张势力，本不会导致发生内讧。可是蒋介石对于CC派控制下的国民党失去信心，有意压抑CC派的过度膨胀，以平息党内外的怨气，避免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并间接向各方面示好，为此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包括组建具有新的政党性质的三青团，与国民党并行，不允许CC派插手团务；将陈立夫调离组织部长的职位，启用朱家骅掌管党务和组织等。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并兼任新设的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辅助机构。由于中央调查统计局隶属于中央党部，按例局长由秘书长兼任，朱家骅还一度名义上执掌中统（实际由副局长徐恩曾主持）。是年7月9日，三青团正式成立，朱家骅任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又兼代书记长，照料团务。1939年12月，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统局长。^[3]这几方面，恰与CC派原有势力范围有着此消彼长的利害冲突，进退之间，双方摩擦不断，矛盾渐深。

朱家骅与二陈，本来颇有渊源，因此不少人指朱为CC派出身，并将战时后起的朱家骅派称为新CC派。其实朱家骅虽然与二陈关系匪浅，却并非必然算作CC派中人。朱家骅与二陈，籍贯都是湖州，有同乡之谊。1924年6月，湖州旅沪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湖社，参与其中并担任要角的张静江、陈其采、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褚民谊、徐恩曾等，均为国民党要员。该社名为同乡联谊组织，实际如戴季陶所说：“我们湖社，虽然是地方的团体，却是地方

的同志团体，不是地方的同乡团体。”^[4]湖社与国民党志同道合，这样的政治纽带将其与国民党统一全国的趋势紧密联接，湖州人士相互援引，成为国民党内江浙集团地位上升的推动者和得利者。朱家骅身处其中，自然得沾雨露。

不过，尽管CC派后来坐大，并非所有湖州人士均为其网罗殆尽。据陈果夫说，1935年，他曾托张道藩邀请朱家骅加入青白社，后者“初则支吾其辞，终未允可”^[5]。后来朱家骅能够得势，“他的成就，固由于他自己的发展，主要的还是戴传贤的支持。戴氏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朱家骅是一个，还有半个便是易培基。可以说朱家骅主要还是他提拔起来的。”抗战期间朱家骅被迫辞去组织部长一职，戴季陶还在蒋介石面前痛哭一场，“跑到成都去隐居，说‘再也不做考试院长了。’足见戴氏爱护朱家骅之深。”^[6]

戴季陶与朱家骅都是湖社的重要成员，又是中山大学的同僚，朱家骅受戴季陶提携，当在情理之中。可是，1931年“九一八”之后，戴季陶的地位影响逐渐式微，朱家骅受其知遇，政坛兴起可能与之有关，但要迅速窜升，与国民党内第一大派的二陈抗衡，甚至夺占其势力范围，显然必须得到最高领袖的支持。从其时一系列相关的人事调动和安排可见，扶植朱家骅以制衡CC派，应是蒋介石全盘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家骅的本意或许并非专门针对CC派，而是处于和CC派尖锐对立的境地，身不由己地被推到派系斗争的风口浪尖。

接掌中央组织部后，朱家骅和CC派的矛盾冲突很快呈现白热化。在CC派的长期把持经营下，国民党从上到下的各级组织系统多由CC派分子所掌控，形成“党以组织部长为中心之现象”^[7]。组织部长换人，组织形态仍旧，新任部长非大规模重新配置人马，不仅不能有所作为，还将处处掣肘，一事无成。握有尚方宝剑的朱家骅自然不甘居于傀儡地位，因此首先在中央和各省组织系统走马换将，剔除旧人，任用新人。如此一来，本来占据绝对优势的CC分子势必感到朱家骅处处针对本派，因而采取种种对抗手段。

到1942年6月，据陈果夫说，组织部里由中央党务学校和政校出身的旧人即CC分子，已经陆续被撤，仅余二十余人，科长以上的四十余人中，只剩四五人而已。取而代之的，是朱家骅有意扶持的新党校——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毕业生，而且组织部还密议三年内统一系统，半年内将部内旧人肃清，一年内将各省干部肃清。^[8]

所谓肃清各省的计划，虽然放在改组组织部之后，双方在各省的恶斗展开或许较部内更早。朱家骅接掌组织部还不到一年半，由于两派在地方层级的冲突激烈，其与CC派的水火不容就已经成为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记到：

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9\]](#)

面对朱家骅的步步进逼，留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系统的CC分子利用盘根错节的势力，软磨硬抗，竭力抵制。可是双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冲突，令失去合法组织地位的CC派面临全线崩溃的危机，其头面人物如坐针毡，终于不得不亲自跳将出来，进行反扑。而且他深知朱家骅敢于大刀阔斧，必定手握圣旨，于是直接上达天听。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写密信向蒋介石告状，除指责朱家骅在组织部和各级党部大肆排斥异己外，特意强调三事，其一，朱家骅“必另有组织，且以排拒果等或隐瞒果等为其要事也”；其二，朱家骅为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早有前科，其欺上瞒下，任用小人，图夺党权，非但不能增进党务，反而导致组织涣散；其三，朱家骅用人唯亲，排斥与共党斗争最力的CC派，滥用非人，令同志痛心，而与共党的言行同流。一旦患难关头，绝难重道义。[\[10\]](#)

作为陈果夫的一面之词，此函所说未必属实，只是表明CC派与朱家骅势不两立的态度认识。至于朱家骅究竟有无自己的组织派系，其行事准则如何，不无可议。国民党党内有派，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二陈，也矢口否认CC派的存在。况且除了首要与核心分子外，被指为骨干的人，与CC派固然关系深厚，可是要确定其组织上只属于这一派，与其他派系毫无关联，也很难轻易断言。朱家骅更是自诩超然党内派系，不参加和组织任何小组织。[\[11\]](#)其部属也极力称其用人唯

才，不论亲疏，不问派系，不分畛域，不计恩怨，而自己无小组织。
[\[12\]](#)

不过，从其他角度看，朱家骅就并非如此襟怀坦白。1946年由《成都周刊》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一书，描述“独树一帜”的朱家骅派的兴起道：“国民党里面设有小组织的，朱家骅是一个，名义上虽无组织之名，而其实三五成群，朝夕与共，于各党中成为一派，日久功夫深，愈显见其力量，当时流行一句话：‘南方有CC，北方有朱家骅。’内容的庞大可想而知。”从1927至1937年，朱家骅先后任广东、浙江两省行政，长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两校校务，并出任教育部和交通部部长，“就在这个时候，他联络很多学者专家，造成今日的力量，他这一派出名人物有傅斯年、任鸿隽、于启江、杨公达……在国民党的基层，他的干部分布也相当广。总之，不管他怎样说他没有什社，什么的组织，他的力量相当大是事实，他已在丛林中，把自己的帜独立起来了。这一派，始终没有什么名称，人家只是叫他‘朱家骅派’”[\[13\]](#)。

由此描述，大致可以推断，所谓朱家骅派，确系他人的指称，被指为此派出名人物的傅斯年、任鸿隽等，与朱家骅的关系固然紧密，未必认可自己是派系中人。由于出身和历任职位的关系，抗战前朱家骅即与文教界人士广泛结缘，在一定条件下，还充当了一些人的保护伞，以免乱扣红帽子的CC派的打压。[\[14\]](#)这样一些人脉关系在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之后，自然成为其改造国民党组织系统依靠的对象。不过，严格说来，所谓朱家骅派，是由于其主持组织部与CC派产生全面对抗而逐渐显现轮廓，开始似无结党营私的主观，后来则不无党同伐异的取向，至少在排斥CC派这一点上，让CC分子觉得其已自成一派。两派在大学的内斗，无不体现朱家骅一派组织分界模糊和派系意识自觉的缠绕。

陈果夫的告状信似乎并未动摇蒋介石对朱家骅的信任，后者继续留在组织部长的位置上，而陈果夫则始终得不到他所希望的中央要职。蒋介石坚持认为，陈果夫“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15\]](#)。不过，陈果夫所说的两点，即朱家骅用人唯才的新办法不利于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反而帮了中共策略的忙，应该对蒋有所触动。在举国联合抗战的形势下，朱家骅的做法有助于吸引人才。一旦形势变化，国共矛盾上升，还是要依赖CC派的老一套。这就为后来朱家骅和陈立夫互换职位埋下伏笔。

二 校园烽烟

战前国民党虽然一般不在大学设立组织，并不等于无视大学师生的影响作用。只是采取何种形式在大学进行活动，做法有所不同。CC派一方面设法向教育部门和大学派遣骨干分子担任要职，一方面拉拢文教界名流加入CC，同时成立学运领导小组，直接掌控学生运动^[16]，甚至利用学潮反对政学系。^[17]而朱家骅由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政坛发迹，这里是战前国民党在一般大学中组织建设最为深厚之处。朱家骅以处理大革命时期中山大学师生中的党争颇有成效得到国民党的赏识，后来又出掌中央大学，在他看来，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与国民党关系深切，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在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18]朱家骅派在国民党内虽然整体实力不足以和CC派对抗，在文教界却有着很深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朱家骅在教育部长和“中研院”总干事任内以及掌管中英庚款委员会期间，与各方面的学人广结善缘。1940年8月，“中央研究院”选举院长，尽管陈寅恪反对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其中也包括朱家骅，其实只是相比于胡适，朱家骅毕竟是官员。投票结果，朱家骅得23票，与翁文灏并列第一。傅斯年分析道：同样是前任教育部长，“朱票多，王（世杰）票少，其故事后想来有三：1、朱任总干事二年，院中人甚熟；2、中英庚款会整年的礼贤待士；3、朱为人善与各人要好。王之少票如下：1、王在部长任内，惹恼了好多有大学背景之人；2、不习自然科学，与‘科学家’少认识（评议会大多数为科学家），人以为是个法官”^[19]。有大学背景的评议员，均为各校教授当中的重量级人物，朱家骅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基本正面，间接反映了朱家骅在教授中的地位。

由此可见，战前CC和朱家骅两派的人脉早已遍布各个大学，双方观念不同，做法各异，只是各守一方，尚未发生正面冲突。

抗战期间，CC派着重向大学扩张势力，与原来复兴社成员主导的三青团争夺地盘，代理三青团书记长的朱家骅隐忍不发。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后，首先扩大组织部的组织并调整内部的人事。次年2月，鉴于国民党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基础不厚，决心把党务打进学校去，于是在普通党务处增设学校党务科，派杜元载为科长，后由杨西崑继任。^[20]在朱家骅的主持推动下，不少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西南联大尤

为突出，教师加入国民党的约40%，而教授入党的比例更高。^[21]大学教师尤其是教授普遍愿意参加国民党，与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不无关系。此举刚好和正在大张旗鼓地向大学扩张势力的CC派迎头相撞。随着双方在组织部和各省党部系统的冲突愈演愈烈，在大学校园的争斗也呈现出水火不容的态势。

在反对派的知情者看来，陈立夫接掌教育部后，“蓄意统制教育界，非其私人必加以困厄，逼其脱离，属其私人，则无论如何办得坏，亦与维持。五年以来，一个个大学收为己有，助桀为虐者张北海、吴俊升也。所未侵入者，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而已”。至于达成统制的办法手段，就学校而言，一是鼓动风潮，二是经济封锁。如中央大学前后两任校长罗家伦和顾孟馀，均非CC私人，于是先以风潮挤走罗^[22]，继用经济封锁迫走顾。中央大学“有四千学生，四百教员，七院六十二系，而孟馀先生不肯投降，彼遂以经济封锁政策相胁迫，以致一年半来亏空至五百万元（等于战前五万）。闻孟馀先生办不下去，已提出辞职”。1943年2月，该校“过年开销，教部仍未发下，仍出借贷，此之谓经济封锁”^[23]。

朱家骅与CC派的冲突还从大学系统延伸到其他部门，主持国立编译馆的陈可忠，被视为朱家骅的干将，在CC派的挤压掣肘下，两年内体重减轻30磅，“受陈立夫之压制之结果也。编译馆总务长徐某明白对可忠云：‘既要你主持这机关，又要掣你的肘，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如不和你磨擦，那就失掉了我的使命！’”顾颉刚不禁感慨道：“文化机关至于如此，谁之咎耶？”^[24]而他自己应朱家骅之邀主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文史杂志》，因所聘两位编辑内讧，被CC派的胡焕庸等人假中央大学区党部之名指控编辑吴锡泽为跨党分子，“故入人罪，直接攻吴，间接乃攻我也”^[25]。

顾颉刚与朱家骅是北京大学校友，中山大学同事，战前即因所主办的杂志有左倾色彩等事受到CC派的指控，幸得朱家骅从中转圜，因而与CC结怨。在他看来，CC处处有意打压，因而“亦不愿在CC统制下过生活也”^[26]。他的感觉，或许不免先入为主的成见。不过这样的看法，在尚未被CC派侵入的大学也已是众所周知的公论。1942年9月，出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代表的费正清（J. K. Fairbank）赴任途径昆明，与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英语系主任陈福田、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以及金岳霖、钱端升、严文郁等12位教授交谈并访问了其中几位的宿舍后，“对于教授们的贫困处境感到震惊不安”，“绝望、贫

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昆明高校教师待遇如此菲薄的境遇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他向美国有关方面报告：

“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尽管他们都是留美归国学生，是中国学术研究生活中的精华。”他认为这一切源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失误，这种失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不卷入别国事务的观念下，忽略了中国是世界斗争的一个战场，其“局势是一场现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针与古老的中国专制主义方针直接对抗而开展的搏斗”。

其二，误以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用武装力量跟日本人作战，所谓文化关系只是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化问题”。美国政策的无能，“具体表现在对待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例上。我们早就知道，他们由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资助而正在逐渐陷于垂死的困境……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并且是此间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中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竟然没有为援助他们而提出些许解决办法”。

战时物资匮乏，生活困苦，所有大后方的大学教师，无一例外。可是西南联大的教师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还有人为的特殊原因。作为报告的附件，费正清除了强调清华大学教授危在旦夕的境遇及其对于美国在华利益的极端重要，还专门分析列举了导致清华大学教授生活惨状的原因。他说：

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他们面临着濒于灭绝的威胁，亟应寻求援救他们的措施……一、清华大学特别体现了美国的在华权益，因为美国退还的“庚款”有数百万美元投入了清华。象任何主要大学一样，教授是学校投资比较重要的部分，由于清华大学所拥有的学术名望和财务资源，该校教授是从留美归国的优秀分子中精选聘任的。总的看来，这些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因此可以说是美国教育势力的起一定作用的代理人。鉴于清华的校舍与设备已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些教师是美国政府

30多年来从事投资所剩留下来的一切。他们的处境理应受到我们的特别关注。

二、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们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务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非得到援助，否则这场斗争只能得到如下的结局——为支持在教育上实现美国自由信念而挺身奋斗的教授们继续遭受营养不良和患病，导致情绪低落，直至死亡、离散或堕落。

三、具体地说，国民党与教育部所力图开展的活动采取如下的形式：年轻的教师们被拉拢入党；凡对此有兴趣的人都获得当局的款待，并且受到重庆方面的特别照顾和青睐。在中国，政府拨给各所大学的经费（大体上也适用于西南联合大学），总是少于按其国内学术地位的理应得到之数，各校经费系按照学生人数发放，而不是按照教学质量。在昆明，省立云南大学学生众多，经费也就比西南联大宽裕得多，尽管西南联大三校（南开、北大、清华）的教师集中了中国学术界的精华。

四、此类斗争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这里不必浪费笔墨去描写大学教授们如何住在空无所有的阁楼上，卖书典衣，欠了一身债，患了营养不足所导致的疾病。不管他们是官方故意的还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事实始终明摆在眼前，尽管他们既对中国有益，又对美国有益，他们却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援助。[\[27\]](#)

费正清的看法可以和顾颉刚的相互印证，只是他的信息单方面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对于陈立夫主持的教育部早已是怨气冲天。与西南联大同城相邻的云南大学，1936年就在龙云的支持下，争取改为国立，并于193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48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抗战爆发后，在龙云和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协商下，决定提前

到1938年7月正式改为国立。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长，云大方面担心生变，还由熊庆来专程前往汉口与陈立夫商洽，陈表示不致改变成案。出任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在开学典礼致词称，陈立夫掌教后，谋于国家教育定通盘计划，于西南文化，特为关切，对于云大改国立事，积极促进。该校经费由上年改隶省府的国币25万元，猛增到国币50万元，中央和省府各拨其半。随着战时通货膨胀的加剧，云大的财务同样困顿，师生的生活日益困难。而在国民政府的资助方面，对于云大和西南联大还是有所分别。1944年4月，蒋介石拨款40万元救济两校贫苦学生，联大30万元，云大10万元。蒋梦麟和熊庆来为两校经济窘迫数次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申诉，孔氏借款400万元充作两校周转金，联大300万元，云大100万元，比例一致。^[28]

云南大学的观点未必表明教育部就是一碗水端平。按照时任云大教授的吴文藻的看法，一个带地方性的国立大学较之一个带全国性的国立大学任务是不同的。^[29]实际上两校所承担的任务确有分别，因而所需经费额度也有所不同。陈立夫采取的办法貌似公平，其实显然对那些不为其所用的水平较高的大学及其教授们不利。其法有相辅相成的两方面，首先，扩大国立大学的数量，将一些地方性院校升格为国立。1942年10月，顾颉刚在国民参政会上就质问陈立夫：现有大学已不充实，何以近年增加不少大学？使得陈氏甚不高兴。^[30]升格之举让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加摊薄。

其次，别有用心地坚持各国立院校一视同仁，教授的待遇一律平等。1943年5月，因昆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集议要求政府增加生活费，切实救济，并通过朱家骅向国民党中央陈情，还派人赴重庆向当局申诉。所提几项要求包括：将教职员工的部分米贴按市价折合现金发放，因原来米贴按官价每担法币900元，实际市价已达2400元一担；薪水应按物价上涨的比例增加，其时昆明的教授薪水增加了5倍，而物价却涨了300倍；为西南联大利用实验室生产紧缺商品提供资金贷款。

西南联大不愿受制于陈立夫，联大国民党部则属于朱家骅的系统。在费正清看来，“这场斗争的要害问题是西南联大能否突破教育部用以扼杀他们的禁条，即全国所有的国立院校应有一个同等的薪水待遇，不应有地方特殊”。到1943年7月，“陈立夫仍占据着上风”。孔祥熙答应借贷300万法币给联大，据说蒋介石已批准，但议案提交行政院讨论时，“陈立夫提出在所有的国立高等院校都采取同样办法，

得到同样的扶持，预算为1700万元。以前他并不赞成这种做法，现在这样提，其蹊跷是在按同等比例核算的基础上，西南联大只能从这1700万元法币中分到80万元。西南联大又一次遭到挫败。对以前头脑还不怎么清醒的人来说，教育部长所玩弄的这一花招似乎最后证明：CC系下定决心要压服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各学科的教授们宣称，他们对当局已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并将试图用他们所能拥有的各种手段来自谋生计”[\[31\]](#)。

后起的一些国立院校，如云南大学一样，本来占有地利人和之便，比起远道逃难而来的联大教授们，谋生之道相对较多，且除了中央的资助，这些院校往往还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补助。陈立夫的做法看似公正，实则令联大等校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不过，西南联大毕竟人才济济，实力不凡，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可以成功抵制CC的侵入。相比之下，中央大学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顾孟馥被迫辞职后，中央大学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实际权力落入CC派的胡焕庸等人手中，“中大壁上，有人贴一漫画，作屠手行刑状，屠刀上写‘教育政策’字，已斩之囚标上写陈立夫已抢到之大学名称，将斩之囚标上写‘中央大学’。用意殊精警”[\[32\]](#)。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的争斗中采取守势，他让不愿受CC统制[\[33\]](#)，决意和顾孟馥共同进退的顾颉刚“勿顾问中大事，因他现在如此避嫌疑，陈立夫犹以鼓动中大风潮中伤之，若我一入漩涡，更将使彼撇不清也”[\[34\]](#)。

掌握教育资源的CC派在大学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在国民党组织系统对CC派积极进攻的朱家骅不得不取守势的要因。各地与朱家骅关系紧密之人，虽然相互视为同道，并无组织联系，容易被大权在握的CC派各个击破。所以普遍感到有必要加强彼此联系，共同进退。被人看成异己而加以排斥，反而促使其无形中结成利益共同体，并且希望朱家骅出面统合，形成中坚。顾颉刚也认为：“我辈无组织，最易给人各个击破，树帜西北农学院，往事可鉴。可忠得陈立夫信，谓自明年元旦起，国立编译馆长由立夫兼代，可忠降为副馆长，又是一场风波。他们结党营私，我们亦必结党营公，方克抵制。然我辈出路多，个人可以独立生存，故结党亦必结不紧也。”[\[35\]](#)这大体可以反映朱家骅一派与CC派的差异。

不过，朱家骅并非一味退让，在顾颉刚等人决心离开中央大学时，朱家骅两次嘱咐其“勿脱离中大，即兼课两小时亦可，并谓朱经农已将到柏溪视予，商谈此事，并嘱我访刚伯、丁山等，勿提出辞

职，谓否则胡焕庸方面更得势，学校将更糟”，而胡焕庸方面对此却以不得兼职相抵制。[\[36\]](#)

在朱家骅视为政坛发祥之地的中山大学，双方的争斗更加激烈。尤其是围绕校长的人选，反复争夺（详见下章）。大学的派系归属，与校长的派属密切相关。校长的更替，往往导致人事变动，决定一校的风向，中央大学即为显例。在这方面，教育部长陈立夫明显占有优势。朱家骅也不甘示弱，想方设法与之对抗。双方虽然不是势均力敌，却也各有输赢进退。

三 河东河西

1944年5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前数月，朱家骅要求下级党部恢复选举制，引起党内部分人士的不谅，朱家骅被迫辞去组织部长之职。由蒋介石亲自提名，长期被禁止主政中央的陈果夫重回组织部长的位置。[\[37\]](#)同年11月，陈果夫因健康关系辞去中央组织部部务[\[38\]](#)，改由陈立夫接任。而朱家骅则同时调任教育部长，二陈与朱家骅的位置刚好调了个个。

将国民党的组织重新交还CC派，显然并非仅仅由于1944年恢复下级党部选举制的偶然事件。在费正清看来，关键的年份是1943年：

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耗继续发展，政府迫于形势，日甚一日地加强统治力量。各种打算、改革、计划方案都成了第二位的事。在此情况下，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蒋委员长转而信赖CC系，把它看作是当遭到内外攻击时能够集结众人的核心力量。[\[39\]](#)

一位辛亥革命前就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丹尼尔·戴伊博士（Dr. Daniel Dye）告诉费正清，抗战爆发到1941年，中国学生的热情非常高涨，以致形成了一个民众运动。而1942年当他从美国休假一年

后回到中国时，发觉这股高涨的热情已经有点低落下去。在回到中国后的一年当中，这股热情“又进一步下降为文化知识活动的停滞状态，了无生气。CC系（陈氏兄弟集团）和其他政府官员生怕民众运动如不加阻遏，就行将席卷全国，并把他们一扫而光。眼下是一片对国事麻木不仁的局势，正如芮陶庵最近走访17所高校后得出的结论一样。”费正清总结道：“当政府的威望更加成为问题的时候，它的领袖们日渐觉得危机四伏，越发戒备，他们面对大批持反对意见的人们采取疑惧的态度。”[\[40\]](#)

蒋介石在重新起用CC派掌控国民党组织系统的同时，对于CC派在教育界的势力过度膨胀以及教育界人士对CC派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也感到不安，为了平衡和制约，他让朱家骅和二陈互换位置。可是这样的移形换位非但无法协调内部，平息纷争，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反而导致新一轮党内派系斗争的大爆发。

组织部自朱家骅去职后，CC派随即开始反攻倒算，据1944年8月7日王子壮日记：“近日政治风气日坏，盖生存竞争激烈之表征。朱骝先自组织部去职，其所属人员相继为新任所汰，彼所主之中英庚款董事会已决定裁撤，中央秘书处所管之文化驿站，系朱之亲信贺师俊所主持，中央秘书处以紧缩名义并入宣传部。余并非支持此等机关者，其待调整亦为事实，惟朱氏甫下台，纷纷出此，实不免打落水狗之讥。在朱氏僚属，非[均]不免有走投无路之悲。此种现象，惟有使壁垒日深，冲突激烈，为党国前途计，实堪忧虑。”[\[41\]](#)这比起陈果夫所抱怨的几年前朱家骅接掌组织部时排斥异己的情形有过之无不及。

重掌教育部的朱家骅也不甘示弱，在各大学想方设法将CC人马逐一剔除。其属下骨干也利用各自的身份地位，积极予以协助。1946年3月，顾颉刚在国民参政会进行教育质问，所列第一条就是“陈立夫任所办学校，品质低劣，何不停办？”另一条是“党派侵入学校，学风不良”[\[42\]](#)。质问的对象虽是朱家骅，矛头却毫无掩饰地直指CC派。

1945年1月27日，任教于三台东北大学的丁山为该校学生罢课风潮平息事致函朱家骅，除了报告事件处理情况外，还介绍了几位在他看来各有所长的教授学生，作为可用的人才，请朱家骅予以扶持。由于东北大学面临人事变动，丁山密纸附函，专门建议相关事宜。据称：

芷脩在此谈及，泽宣兄决不能来，拟以吴振华长教务，徐季康长训导，卢峻长法学院，是皆CC也，且德望不尽隆，恐不足以拊制哲先……山对人事补充，敢作如是之建议：教务长泽宣来为最理想，次则芷脩留，职肯来东大。如不可能，李季伟来，亦可得籍学生拥护。训导长丁骥为最理想，次则盼公荐一在党在学均有地位者。法学院长钱清廉、戴克光均为理想者。总之，东大最大势力，现在山等把握中，诚不愿即此以送CC厚礼也。愿公察之。[\[43\]](#)

其时丁山对东北大学相当失望，有意改就中央大学等其他院校，朱家骅阅信后没有正面回答相关问题，但是批示“仍盼留校协助种种”，表明他接受丁山的意见，希望丁山本人参与实现其各项建议。

丁山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东北大学。1945年7月，已经移席四川大学丁山的丁山又致函朱家骅，告以复旦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的派系纷争，并提出人事解决办法：

此间传说部中将彻底整顿大学，教育人事上亦多有变更。北碚某校章某闻已辞职，则离明兄似为最理想之继任之人物。离明在此办师院，任何努力，任何成就，均不免地方观念者攻击。长材莫展，徒招怨毒而已。又西北大学刘派与河北派暗斗甚烈，皆属CC，颇不理陕人之事也。如属可能，则沈兼士先生最为理想，盖地方军政当局及校内老教授，无不与沈先生有深厚之因缘。天与人归，沈先生出而CC之徒自然瓦解矣。管窥之愚，敢以为献也。

某校章某，即复旦章益；离明，即黄建中。朱家骅批示“酌复”，但注明“不必提及章、黄、沈等”[\[44\]](#)。

7月15日，丁山再度致函朱家骅，报告齐鲁大学易长及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改组事宜：

齐大董事会推荐吴君为校长，在校多数教授认为校友派即大批还校，垄断一切，势必引起重大后果。今晤子杰兄，始知吴决不来，仍由校务委员会负责维持现状，齐大似可苟安一时，终非正当解决也。

川大于7月12日奉到改组师院部令，次日校长召集院长等少数人员开紧急校务会，将黄建中原定新增教员一律停发聘书，仅将师院中有资望的老教授选聘十余人，一律聘为国立四川大学教授，不属任何院系，丁山亦在其列。

盖文学院向楚，本一冬烘旧官僚，除能做几句八股文外，所学极其肤浅，对于学术界有重望之教授，如陈寅恪、蒙文通诸先生，全力拒诸川大门外，运用三两谋臣，勾结学生，支持中文系。中文系主任如江浪相推，彼仆此继，历有年矣。该系学生，多数思想沉腐，行为诡譎，一如向某平日所训练。是以知名教授，皆以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为根据，不得侧身川大。成都文化重心，不在川大，实在华西坝。川大文学院拒山于院外，正区区之所望也。但经此改组，师院教员无下文者五十余位。此五十余位教员，黄校长意待离明兄返校解决。一班未得续聘先生意见，认为（一）教部命令来得突兀。（二）教部命令，只顾学生，不顾教员问题，未免轻蔑教授。（三）师院课程，与大学精神不同，此本部令所明定。今将师院学生随文理学院上课，障碍甚多。最重要者，还是（二）项编余教员问题，彼辈均有离明兄口约在前，今待至七月中旬，突然停聘，学校之爽约，全由教部命令之突兀。于是一部分不明责任之教员，忿忿不平，议公专制。此固CC分子从中挑拨之结果也。山随公有年，知公爱护学术界，无微不至。此次部令，未及顾全教授问题，或因校长能妥筹善后，淘汰少数，改聘多数人于文理学院也。实则师院国文系因不愿听命向某，与文院中文系对立已久，理化系教授亦与理院水火。故言合并改组，其势甚难。不能合并，必也裁员。校长在向某辈包围下，遂走到裁员路线。裁教员之责，尽委诸教部无明令。敢恳公

召离明兄速定善后办法。据山所闻，一班人希望：（一）师院独立。（二）独立如不可能，请分年裁并。

而分年裁并之法，为本年先全部续聘，明年可事先通知欲解聘者。如此既不违反部令，亦适合现情。

此事本来似与CC无关，而丁山一定要指为CC从中挑拨，无非是想打动朱家骅。朱家骅阅后批示：“此为根本改革之道，至为合理。事关通案，酌复。”

丁山和顾颉刚交好，尽管并非国民党员，仍可说是朱家骅一派的骨干。朱家骅对于他们旗帜鲜明地将斗争矛头指向CC派，虽然从未正面回应，实际上丁山等人心知肚明，朱家骅不仅不反感他们对CC派同仇敌忾的态度，而且需要通过他们了解各所大学的情况，并从他们的建议中获取必要的信息，以便安排相关人事。

在中山大学，朱家骅清除CC派的行动更加坚决。1949年7月21日，“在各路解放大军直趋华南，‘石牌’儿女正以紧张学习来迎接解放的时候”，《华商报》刊登了题为“陈可忠滚蛋·张云上场：看朱家骅控制中山大学阴谋”的广州通讯，其重心不在指摘新旧校长以及易长之事，而是试图揭示中山大学校长人选“为什么变来变去都是朱系门内的‘一丘之貉’的原因”。这些政治意识很强的文字，将重掌教育部后朱家骅夺回自己地盘的心计彻底揭出。

四 国共进退

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改变战前基本不在大学设立基层党组织的做法，使得国民党在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当中势力迅速膨胀，基本掌控了局面，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能量相对有限。可是，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人意料地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并相继关闭了全国各学校的党部。与国民党的决策正相反对，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向各（局）分局、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合法斗争的指示”，对于暂时无力

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要作长期打算，蓄积力量，以待将来。为此，要趁敌伪投降，国民党统治尚未建立和稳定的混乱时期，尽可能留下不暴露的力量，并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里边建立工作，利用合法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地进行民主运动。^[45]此后，中共在大学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两党在大学里的优劣态势迅速发生逆转。^[46]

在5月18日下午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8次会议上，由蒋介石本人亲自交议的“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获得“修正通过”。该案称：“宪政之实现，需要适当之准备，本党现经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若干准备工作，必须即予完成，各种措施，凡可为未来宪政预立规模而可提前实行者，宜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分别予以实施，以示本党实行宪政之真诚与决心，兼以保证未来宪政之顺利推进。”具体做法包括：

一、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二、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三、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后方各省临时参议会于所属各县、市参议会有过半数已经成立时，立即依法选举，俾成为各省正式民意机关。四、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五、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陆续移政府办理。^[47]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于国民党一直采取用而忌的态度，希望将权力基盘由党转政，但在形势不利时，又不得不以党固政。他于此时提出取消国民党在军队和学校的基层组织，当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开幕式讲话中，已经定下基调，大会应集中注意的三点之一，就是“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他说：

我在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时，以及今年元旦对全国的广播，两次说明我们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决心。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更具体表示要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八十诞辰召开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付与我们抗战建国的两重责任，我们如不能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则建国就无基础。如果不能召集国民大会，则本党在民国二十年受国民会议委托行使之政权，即无从正式归还于全国的国民……本党还政于民的初衷，从不因战事剧烈而片刻忘怀，从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以后，一切措施以及迭次决议，迭次宣示，无不是迫切祈求早日实施宪政，归政于民，愈速愈好，纪录俱在，可以覆按，此心此志，可质天日。徒以阻碍重迭而来，国事不容儿戏，大愿未偿，目的未达。一般不察，竟至惑于莠言，以贯彻革命的本党为不革命，以切求民主的本党为不民主，而实际妨碍总理建国程序者，反得以民主先驱自居，真伪倒置，黑白不分。我们为国负责，自始不避劳怨，国内有识之士，自能洞察事实。我们深信今日大多数人士之要求宪政，多出于谋国纯洁的至诚，且符合本党革命的初衷，更是征国人关心国事的迫切。为了鼓舞全国国民共同对国事负责的热诚，为了确立国家的百年大计，我们觉得在总理倡导国民革命已满五十年的今日，有提早实施宪政的必要。[\[48\]](#)

此番表态，一般指为伪装民主，巩固独裁。“或人说这是等于希特勒快要完蛋时的党政分家一样。或人又说，这些决议都是做给人家看的，真做倒不必。可谓一针见血之谈。事实上今天所做的与现在所决议的，相差又何至[止]十万八千里。”[\[49\]](#)此说诚然，1941年底，因为张澜、张君勱、左舜生等人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案，蒋介石大发雷霆，指为清季各地逼清廷立宪，是窃民主之名以捣乱抗战。[\[50\]](#)

不过，蒋介石的开幕词还有另外一面隐情，大致反映了国民党以党执政的尴尬。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既不能继续代行民意，也需要争取民心，以便战后与中共一决雌雄。此举看似为实行宪政做准备，实则背后还有如何抑制CC派和朱家骅恶斗的考虑。六大开幕之际，CC和其他派系的权力争夺进入白热化，并且闹到蒋介石面前[\[51\]](#)，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化解矛盾当然不可能，退而求其次，只好尽量缓解以避免冲突公开。

此外，各党派在校园中竞逐，未必于国民党有利。1945年4月11日，顾颉刚到蒋介石官邸吃饭，蒋表示，将使三青团“脱离政治关系，成一与童子军衔接之教育性的团体。并拟此后禁止学生入党，免得各党竞拉学生，使学校不能安定”。顾颉刚觉得“此事固好，惜太迟矣”^[52]。

大学党派林立，导致学潮频繁发生，确系战时乱象之一。早在1939年10月，东北大学一次学潮平息后，学校当局就检讨道：“本校已往之主事者，注重政治工作，以权谋手段利用学生，演成各部分峙之局，几致不可收拾。”因而提出要建立三原则：“一、要学术化，不要政治化；二、要全体化，不要部分化；三、要道德化，不要权谋化。此后诸学子，应少谈主义，多研问题，尊重事实，不问背景，不为外人利用，受人利用，即是牺牲。应守纪律，重礼让，平心静气，作合理合法之行动。”^[53]鼓动学潮者，除了中共，还有国民党乃至大学内部的不同派系。CC派即是利用学生运动反对党内异己的老手。蒋介石的想法，可谓有的放矢，既抵抗中共，也防止内讧。可是他和顾颉刚都不曾料到，如此一来，国共两党对于大学师生的影响很快就会乾坤颠倒，使得大批知识分子加速左倾。

大学师生的左倾，由来已久，且与战时CC派掌控教育部激犯众怒密切关联。当时正在重庆等地近距离观察的费正清称：

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低效无能已有目共睹，尽管（或者说正因为）他声嘶力竭，加强控制，独揽领导大权。由于通货膨胀日趋恶化，导致营养不良和失望情绪笼罩着薪水阶层。在外国观察家看来，左翼仿佛已开始成为可供选择的执政力量……我的心情，也像我在大使馆和新闻界所认识的其他美国人一样随着阶段的发展而发展：先是丧失对国民党的信任，继而对思想开朗的自由派人士的潜力感到失望，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当地的左翼身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李济告诉费正清：

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54\]](#)

对自由派人士的失望以及自由派本身的绝望，不仅表明这部分人应对局势的无能为力，更显示连他们也可能向左转。可是这样的左倾并非建立在对中共的了解认识之上，而是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1943年9月，费正清写信给柯里博士：

自由主义型的、留美归国的清华、北大两校学者，是美国体制与科学准则培养的最好典范，但至今仍然没有为中国的进步提供多大动力。对于真正的争论点，即中共问题，他们大多数是反对派。对于如何推动国家前进，他们还提不出明确的方向。他们正在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的再次来临。事实上这种好时光可能永不再现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想象：如我致力于中国，在如此普遍混乱的局面中我能做些什么？结论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不激进无以成事。

费正清后来根据当时自己亲历的历史资料得出结论：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55\]](#)

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中，CC派的所作所为起了助推器的作用。“CC系是一个对实权和为维护实权而进行严格组织训练感到兴趣

的典型集团。他们没有实行重大革新的能力，他们通常只是些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而不是具有自己独立人格的正直的人，他们不肯尽其全力，执行他们所承担的任务。加紧组织控制的努力并未产生博得公众对之肃然起敬的效果，因此CC系的行动恰好剥夺了国民党自称秉承天命的权利。处在困难中的国民党，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党外没有朋友，在党内遍布着变节的机会主义者。”^[56]所以顾颉刚从报纸上看到陈果夫继任组织部长的消息，忿然道：“陈氏弟兄其必恶贯满盈始伏诛耶？”^[57]

近代中国知识界不少人受欧美自由思想的浸染熏陶，加之民初劣质政党政治泛滥的影响，对于党派政治干预教育学术从来相当抵触。早在国民党统一北方之际，北京各大学的教授即纷纷设法自保，且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各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与国民党当局发生对抗、磨擦及纠纷。1927年6月，吴宓与陈寅恪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净胜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58]从这样的不合作到后来逐渐有所磨合，知识界与国民党的关系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即使在战时教授加入国民党已成趋势的情况下，在大学校园中，教授办党及办团，仍然不是光彩荣耀之事，大都还只能暗中悄然进行。凡热衷于此道者，口碑往往不佳。如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即指西南联大主办国民党、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等愚而诈或愚而滑。^[59]朱家骅献九鼎于蒋介石，顾颉刚奉命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顾颉刚对此感到委屈，抱怨“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60]可是当他了解到张其昀、钱穆等人办《思想与时代》以及垄断《大公报》社论，背后有从蒋介石和陈布雷处拿钱的背景，同样不以为然，以为“宾四屡在《大公报》发表议论文字，由此而来。其文甚美，其气甚壮，而内容经不起分析。树帜读之，甚为宾四惜，谓其如此发表文字，实自落其声价也”^[61]。

中国历来传统，一方面流行文人相轻，一方面崇尚君子不党，结党营私，本来是小人的不耻行为。如顾颉刚所说，学界争名，政界争权，以学界而政治化，则既争名又争权，难免斯文扫地，丑态百出。CC派控制下的“陈家党”以及长期持续的派系争斗，不仅令坚持自由独立的知识人更加厌恶党派干预学术教育，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62]，而且使得那些战时一度有意和国民党同舟共济的教育界人士日益离心离德。

1947年的5月，上海交通大学爆发学潮，朱家骅飞到上海灭火。随后，复旦、同济以及上海以外的武汉、中正、英士等校相继爆发学潮。5月14日，战后复员改任上海暨南大学的丁山致函前一日刚刚离开的朱家骅，报告其因无暇当面陈词的半年以来在沪的所闻所见，并提出若干应对办法。据称：

山尝留心学生所读书，在文史方面，皆唯物论派也。满观书肆，除商务、中华少数正规书局外，言哲学者，皆赫格尔、恩格尔，言经济者，皆马克思《资本论》系统。有辩证法而无普通逻辑学，有唯物史观而鲜唯心论之著。充满书肆之文学、哲学、史学、经济、政治之新出刊物，皆左翼作品也。且其价格，亦远较商务、中华出品为廉。青年乌得而不趋鹜哉。自上海出版事业论文化事业之现状，青年思想殆已为唯物论暗影笼罩殆尽。

他建议教育部积极奖励教授进行正统学术研究，与唯物论抗衡，中央对于文化事业应有全盘计划，不能交由书店自由营业，以免文化事业操于以赚钱为目的的投机书店之手，教授亦不得不左倾。“自教授至于青年，左倾趋向，有加无已，威力不能加，检查不能限，潜滋蔓衍，弥漫全国。中央在华北纵获得军事的胜利，恐已不能挽留文化思想的全盘失败，此则今日之隐忧矣。以人事言，往日主张‘本位文化’之教授，今则讲坛之上，宣扬唯物史观者不乏其人。”

在丁山看来，“本位文化”教授们的影响不必高估，今日在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威信最大的是郭沫若，国民党中央视郭为左翼作家领袖，而其近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实已超越左翼思想之宣传，而踏入纯学术境地”。丁山自称与郭有纯学术性的往还，“近尝询以愿教书否？郭云：‘我愿教书，政府惧我有煽动力量，到处碰壁，不敢再谈教书事。我愿在大学研究所或国家图书馆里，找个清静的环境，做纯学术工作，完成个人的研究。’郭先生由衷之言，闻者无不寄与深厚之同情。”丁山建议延聘其到（1）“中央

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院，（2）中央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3）或在某大学为其专设文史研究所。

如此，郭氏学术志愿可伸，亦可免与青年多接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郭氏亦今日文史学界之雄。彼不得学术园地，遂不得不接受左翼作家之拥戴，而为忍耻含垢之“吃政治饭”学者……倘能延揽郭氏于最高文化机关中，沪上左翼作家即失其有力之领导者，然后用余金奖励正统派学术著作，以抗压唯物史论宣传。多请几位学术界较有地位的人，多办几种纯学术性文史杂志之类，以大量供给青年精神食粮，从根本上扑灭青年思想的左倾，然后乃可扑灭政党所操纵之学潮。要而言之，中央文化运动似应彻底改变作风，而由学术界知名之士来负责。如因人事关系，泄泄踏踏，一任唯物论派在稿费、印刷、销行优势条件下充分发展，则国危矣。

他同时还建议中央派顾颉刚驻沪，因其“在学术界树敌少而朋友多，有造诣的学生亦众，请他坐镇沪上，则文化界乃渐有中心。他人肚量稍狭，恐亦不能肩此巨责也”。朱家骅对其建言十分重视，批示道：“甚有见地，至为感佩。”请其下次到时，“顾我一谭，当面商一切也”^[63]。

后来丁山所建议的各事，均不了了之，再三建言，均不得回复。而丁山本人因曾在平息学潮中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并居间调解，为此两头不讨好，意欲脱离政治，专心学问。1947年7月5日，丁山致函朱家骅表示：“回念沪市学潮汹涌之日，曾面上书，略陈暨大内部之团结。今虽过去，而左翼之潜在力量，仍不可忽视也。山非党员，在风潮期间，曾以受公私谊爱护，故尝略效绵薄，既不见谅于左倾，至今CC报纸犹掘拾山反共言论，断章取义，横加诬蔑。山故敢向囊东兄建议，以后校内行政人员，须由党员负起责任，与左翼斗争。如山局外人，不必折冲其间也。”^[64]希望今后从事纯粹学术研究工作，不再插手政治。

丁山推举坐镇沪上的顾颉刚，其时对于青年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1948年3月，他写了一篇《学风问题之我见》的文章，“自谓颇客观，亦甚诚挚”，且其中还有批评政府的话，投往《大公报》，却被退稿。顾颉刚以为原因是“以《大公报》社论向助学生说话也”

[65]。实则《大公报》与蒋介石的关系匪浅，后人指为“小骂大帮忙”。该报所以退稿，一则向来坚持秉公立论，二则和顾颉刚一样，对于国民党大失所望。1948年11月，心灰意冷的顾颉刚与友人谈起，“谓今日军事尚有办法，而政治则绝无办法。盖党已被二陈变为CC，军事长官已被陈诚‘整军’所更换，经济则破坏于孔、宋，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他也萌生丁山那样抽身政治的想法，希望“社会工作从此断绝，著作生涯急遽展开” [66]。

不过，大学教授们虽然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对共产党却未必了解。与国民党渊源甚深的顾颉刚认为：“实在，人心并不倾向共产党，而厌恶国民党太甚了，国民党已失尽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权。” [67]他甚至反对傅斯年挟胡适以自重，劝胡适不要到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当国民党盛时，未尝与共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 [68]与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的西南联大那些自由派教授迫不得已的两权取舍，固然加速了国民党对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却也留下后来与中共之间磨合困难的隐患。

[1] 详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45—49页。

[4] 戴季陶：《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关于湖社与国民党的关系，详见拙文《南浔·湖社与国民党》（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85册，2010年）。

[5] 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致蒋介石函，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书翰，引自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27页。

[6] 成都周刊部编辑：《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成都，文光出版社1946年版，第9—10页。

[7]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第9册，台北，2001年，第133页，1944年3月31日。

[8] 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致蒋介石函，引自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27页。

[9]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第9册，第133页，1944年3月31日。

[10] 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致蒋介石函，引自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27页。

[11]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40页。

- [12]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92、216页。
- [13] 成都周刊部编辑：《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第9—10页。
- [14] 参见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春季号，第24期。
- [15] 《陈果夫先生日记摘录》，1946年3月28日，徐咏平编著：《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936页。
- [16] 范小方：《二陈与C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8页。
- [17]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 [18]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第60页。参见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 [19]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6页。
- [20]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0页。
- [21]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22] 顾颉刚日记1941年6月23日记：“近日中大酝酿风潮，教部实为其后盾，志希乃有不得不走之势。”《顾颉刚日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48页。或指罗家伦为CC派，实则这类并无具体组织的派系，除骨干而外，很难确切固定指认一般成员。尤其是掌控国民党组织大权多年的CC派，势力庞大，不少人争相趋附，但未必为排他性的派中人。即使勉强可算是，也有亲疏之别。有著述指冯友兰为CC派（《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即不无可议。
- [23]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7页，1943年1月5日、第21页，1943年2月2日。
- [24]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148页，1943年9月1日。
- [25]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450页，1945年4月30日；第4卷，第656页，1942年3月21日。胡焕庸时为中央大学国民党区党部主席。
- [26]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24页，1943年2月9日。
- [27]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227页。
- [28]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编，陶李编撰：《云南大学志》第2卷《大事记》，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102页。
- [29] 吴文藻：《云南大学与地方需要》，《云南日报》1939年2月5日，引自陶李编撰：《云南大学志》第2卷《大事记》，第78页。
- [30] 《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753页，1942年10月24日。
- [31]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第303—304页。
- [32]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29—30页，1943年2月19—20日。
- [33]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 [34]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28页，1943年2月17日。
- [35] 《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618—619页，1941年12月20日。
- [36]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130页，1943年8月13日；第166页，1943年10月7日。

[37] 《陈果夫先生日记摘录》，徐咏平编著：《陈果夫传》，第923页。陈以“突然下令，未预知，甚惶恐也”。

[38] 陈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陈果夫先生年谱》，《陈果夫先生全集》第10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39]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第294—295页。

[40]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第290—291页。

[4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1944年8月7日，第9册，第317页。

[42]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630页，1946年3月26日。

[4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芷脩，钟道赞；泽宣，庄泽宣。附件批有“此纸请密”字样。

[44] 1945年7月12日批复丁山来函。《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630页，1946年3月26日。

[4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46]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另参见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杨天石、黄道炫编：《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第1—27页。

[47]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5年，第199—201页；1945年5月30日《解放日报》。

[48]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65—266页。

[49] 司马相世著：《新官场现形记——国民党六中全会真像》，广闻堂刊行，第18页。

[50] 《陈布雷日记》1941年11月22日，引自王泰栋《蒋介石的御用笔杆：陈布雷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

[51]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据称“朱家骅方面拼命攻击西西，说党自二十七年提出取消小组织后，为什么党内还是小组织林立。但那些反朱家骅的西西分子也写诗攻击朱，诗曰：‘无耻朱家骅，到处放爪牙，仪表倒不差，贪污案可查。’”（司马相世著：《新官场现形记——国民党六中全会真像》，第10页）

[52]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440页。

[53]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388页。

[54]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第285、295页。

[55]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第305—306、311页。费正清自称：“我在1944年带回华盛顿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内在产物，它决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们的高压政治所能扑灭的。解放农民的理想以及20年前五四运动时代所继承下来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是爱国而富有生命力的。蒋介石拿不出什么能与之抗衡的思想武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41页）这显然参杂了一些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者后来认识的成分。

[56]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第294—295页。

[57]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288页，1944年5月27日。

[58]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3页。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04—105页。

[60]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72页，1943年5月13日。1945年4月8日，蒋介石手令陈立夫和朱家骅，“希于各大学教授中保举最优秀之党员，每校二至三人”。（机密（甲）第8670号）朱家骅所呈报名册，共有97名，其中西南联大8人，中央大学5人，中央政治学校、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各4人，武汉大学、交通大学、西北大学、同济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金陵大学、西北师院各3人，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中正大学、英士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学院、社教学院、西北工院各2人，河南大学、大夏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华大学、华西协成大学、上海医学院、中正医学院、贵阳医学院、江苏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甘肃学院、西北农学院、北洋工院各1人。颇有蹊跷的是，燕京大学项下所列为陈寅恪。陈其实虽然任教于燕大，并未加入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文稿，奉令列具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咨呈鉴核由，附呈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1945年5月2日高密第209号。

[61] 《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602页，1941年11月10日。

[62] 参见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5章《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评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主要集中在《观察》等视角，尚不足以反映整体情形。

[63] 朱家骅档案。是函的摘要日期误记为“三月十六日”，参诸丁山原函及朱家骅赴沪时间，应为五月。此前郭沫若因对先秦诸子的看法不同，引发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的批评，确有些情绪。参见戚学民《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64] 是函丁山再度提出安排郭沫若之事，请示朱家骅，后者批以“不复”。

[65] 《顾颉刚日记》第6卷，第238、243页。

[66] 《顾颉刚日记》第6卷，第372、395页。

[67] 《顾颉刚日记》第6卷，第390页，1948年12月16日。

[68] 《顾颉刚日记》第6卷，第406、410页，1949年1月17日、1月27日。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民国学界的乱象之一，是各大学易长往往牵扯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矛盾纠葛，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时引起轩然大波。在此过程中，为了争夺或是维护权利，各派反复较量厮杀，台面台下的斗争进一步加剧。能量的充分释放与展现，导致包括人事在内的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或此消彼长，或重归平衡。如此，大学校长的更换，影响早已超越学校内史的范围，成为政局波澜起伏的指向。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惊动最高当局。这一事件^[1]，放在学校内史的框架之下，自然无足轻重，只能轻描淡写，一旦纳入抗日战争以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整体架构之中，便全然改观，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地位。此事原来的公开报道只见表面，近年来，随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渐趋便利，可以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深入内幕，究明真相。

一 学潮与倒王

1949年7月21日，“在各路解放大军直趋华南，‘石牌’儿女正以紧张学习来迎接解放的时候”，《华商报》刊登了题为“陈可忠滚蛋·张云上场：看朱家骅控制中山大学阴谋”的广州通讯，内称：

事实上，从朱家骅在中大做校长时起，这个反动头子便在中大收买甘心做奴才的“教授”、“学生”，同时不断地把它的爪牙插入中大来，树植他的反动势力。在反动统治的全盛时期，号称“无孔不入”的CC势力，在中大亦无法立足。虽然在坪石时候CC曾导演过一次包围张云，强迫下台的丑剧，但当复员后朱重长伪“教部”，委王星拱做校长，王一上台便把CC的毛礼锐（当时毛是师院院长）一脚踢走，同时把CC的爪牙如陈粤人、袁飞翰、何心石等连根拔除。此后，实际上，中大便成了“朱家天下”。虽然王星拱不是朱派人物，但一切大权都落在朱派人物手上。同时，还特地派一个喽罗宋嘉贤以“秘书其名，监视其实”地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迫他不得不辞职。王星拱下台后，朱便一意提拔他的忠实干部陈可忠，但苦于陈可忠在国内外无藉藉名，同时又鉴于接长台大不成的经验，便决定采偷龙转凤的手法，把自己袋里的一等王牌张云打出来，使他担一个校长的假名，叫陈可忠代理。陈到任后，虽然有朱家骅撑腰，但因为自己没有威望，又没有班底，单人匹马来到石牌，一抵埗即给地头蛇打了个杀手锏，险些儿登不上台。幸得几次“疏通”，并请朱家骅亲自出马，才把对方的势炎压下来。陈可忠摔了这一跤之后，便深深觉悟到要在中大立足，只有跟同学合作，所以一年来陈在与同学或多或少的“合作”下总算没有被挤出中大。但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候下台呢？据陈的表示是因为“健康问题”，但查实陈的下台一方面是因为当局不满他对同学的“软弱”政策，要他滚蛋，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动当局决定不迁校，他不肯做俘虏，所以便愤然一走了之。这样陈可忠的离职便成了定局，一向被视为朱系“王牌”张云，便脱颖而出。

此则通讯提示三点：其一，此次张云取代陈可忠，不过是上一次中大易长即王星拱去职的余波回澜。其二，王星拱的上台与落台，与朱家骅牵连不小。其三，中大易长背后，隐藏着朱家骅与CC派在大学系统的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由于后来时事的变化以及通讯所取的立场，所谈及的三点固然部分反映了事情的真相和时人的观感，但也不免表面甚或误解，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讨论。

关于王星拱的去职，现有的三种中山大学校史中，只有撰写最晚的《中山大学史稿》（黄义祥编著）简略提及，全文为：“1948年6

月，王星拱校长因病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请行政院任命张云担任校长，当时张云尚在国外，教育部同时提请发表陈可忠代理。同年10月，张云回国辞去校长职务，陈可忠继任校长。”^[2]此说不错，只是背后的情形远比上述复杂，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还有国共冲突的大背景起作用。

王星拱抗日战争后于1945年12月正式接长中大，此前中大的正式校长为邹鲁，而由金曾澄代理。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辗转迁徙，遭受重创，图书设备和师资均受到很大影响。王星拱留学英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后长期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接长中大后，提倡学术自由，聘请多位知名教授，扫除在教育界势力极大而声名狼藉的CC派势力，对学生的态度也比较开明。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内容之一，是各级学校不设党部。^[3]随后，全国各学校的国民党党部陆续关闭。此举对于国共两党在大学师生当中力量对比的升降变化，很快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4]中山大学师生中的中共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并且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课抗议活动，声势日渐壮大。中山大学因此被称为“民主堡垒”和广州的“小解放区”。^[5]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和财政金融的恶化，教师群体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趋向。

有知情者这样描绘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的异动和当局的无所作为：

中大内部情形日见恶劣，最近文学院学生以标语传单“驱逐”外文系主任周其勋先生，并对其他系主任之同样举动，亦已布置就绪，而在位者束手无策，旁观者乘机取利，开学以后想益将不宁矣……来此数月，耳闻目见，益为中大前途悲观，东南教育之未来恐惧。国家耗费亿万，维持此形同地狱之文化衙门，殊有辱此有历史性之学府，而无以对百粤之青年矣。

这位知情者虽然站在政府立场，似非存心与学生为敌，他对朱家骅向合众社记者发表关于最近学潮的谈话表示不胜感慨，虽然认为所说各点“亦具至理”，还是坦率指出：“对青年对学生，以理喻以情

导忍让处之较为得计，如加之以其他准绳，恐益生枝节，不可收拾。时局如此，人心惶惶，铤而走险，意中之事。”^[6]

眼看中山大学的局势快要失控，广东的国民党各级组织大为不安，暗中酝酿倒王行动。1948年2月2日晚，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委余俊贤、广州市党部主委高信等召集学运小组举行会议，“议决推倒中大校长王星拱，另拥蒋梦麟继任。其步骤：1、向宋主席献议；2、向吴秘书长献议（吴原定今日下午三时抵穗）；3、联名向朱部长献议；4、向高廷梓及任国荣疏通。”

2月7日，朱家骅接到任国荣2月3日所发关于广东学运小组密谋倒王，提请教育部对此事如何应付，须及早准备的报告，认为所议“似不甚妥”^[7]。2月13日，朱又接到洪谦报告中大内部情形的信函，即分别致函王星拱和复函洪谦，要求“尽速彻底整饬，纳入轨范”^[8]。3月1日，王星拱复函说明有关情况：

上学期大考完毕之时，外文系学生（一二三年级）具呈攻击周其勋主任，并推举代表二人，陈述意见。弟比即言辞谴责不应有此等越轨行为。当晚文学院中复张贴攻击周主任之标语，次晨发见，即行撕毁，追询该系学生，坚不承认。此必系有作用之行动。一月以来，已在各方防范诘诫之中。迩来第二学期开学，学生陆续返校，有无其他[事]同类事件继续发生，未敢断言。如果发生，弟必遵旨整饬，纳入规范也。

按照王星拱的说法，所谓中山大学文学院风潮，其实早已发生并且得到解决，翻出旧事作新闻，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3月13日，朱家骅再度接到广州密报：“此间学运小组若干同志谓中山大学王校长对党的意识不足，应付软弱，以致奸党潜伏，将滋事端，提请决议，专电中央学运小组，察转钧部核办。宝猷人微力薄，对此决议，未能阻止，至为罪咎，谨电报闻，伏祈垂察。”^[9]

报告人引咎自责，是因为预感到此事可能令朱家骅陷入被动。果然，国民党中央学运小组将情况直接报告蒋介石。3月21日，国民党主

席侍从室交下蒋介石代电：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

据报：广州中山大学自王星拱接长后，对学风极为放任，因之反动分子利用该校作宣传赤化根据地，一般反动教授学生在学校附近乡村从事秘密组织活动，至为积极。所有反动刊物报纸等到处张贴，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该校同情本党或曾入三青团学生，常受若辈威胁，影响社会人心至巨。今后整顿之道，对该校校务负责人应予更易，另选党内干员接充，始足以辟邪说，攻异端，挽学风，正视听，防患未然等情，希注意切实整顿为要。

[\[10\]](#)

最高当局的直接指令，虽然只是转述意见，还是令朱家骅相当紧张，不能不高度重视，他致函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邓植仪，几乎逐字逐句地转达了蒋介石的来电，接道：“未知究竟如何，至以为念。闻抚五兄近日请假离粤……务请查明，切实整顿，是所企盼。”[\[11\]](#)

王星拱与国民党渊源甚深，早就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务指导委员。1940年武汉大学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时，王星拱任监察委员。[\[12\]](#)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同时期的许多大学校长一样，身为国民党员的王星拱主张学术自由，反对学校过度政治化，尤其不愿意国民党控制学校，自然对于师生的言行较为宽容。广东的国民党组织为了压制校园内日益活跃而且左倾的师生民主运动，不惜对本党人士下手，反而显得虚弱。

邓植仪如何回复，尚未查见，6月17日，朱家骅收到时任中山大学总务长的邝嵩龄于6月6日发出的关于中山大学近况及今后应行整理事项的报告，其中第一点就是“学风方面，自王校长到校后，历经整饬，已比前良好”。报告中并无中山大学学生风气不正的内容，反而于师资及行政方面提出改进意见，认为“教员众多，品流复杂，不无影响学风及行政进度，尚须一番整肃”，师范学院、法学院、附中等单位的主管或挂名而不负责，或长于任教而短于任事，会计主任则能

力稍逊，有必要进行调整。^[13]这些至少反映出中山大学部分教职员的想法感受，与广东国民党组织系统的判断相去甚远。

二 朱家骅与王星拱

如果说邝嵩龄的报告是想为王星拱打圆场则为时已晚，在中央学运小组乃至蒋介石的压力下，朱家骅不得不考虑换人的棘手问题。只是并非如后来《华商报》的广州通讯所说，换掉王星拱是为了安插朱氏自己派系的骨干。事实上，朱家骅并不愿意换掉王星拱，即使面对来自最高当局的压力，他仍然尽力维护和挽留。由于王星拱一再力辞，中山大学又不能无人主事，朱家骅才不得不留意其他人选。

最初国民党广东省市党部酝酿倒王拥蒋（梦麟），朱家骅即批示“似不甚妥”，正式答复时又改为“此君似不甚妥”，明确表示不赞成用蒋梦麟。^[14]在转述洪谦的报告内容时，也有意将“而在位者束手无策”等字样抹去，希望洪谦对中大事务“惠予协助，以求改善”^[15]。后来致函邓植仪了解中大情况，又将蒋介石来电中“自王星拱接长后”一句删去，处处为王星拱留余地。其时王星拱因为身体欠佳和家庭不幸等原因请假离校，回到安徽安庆，迫于内外交困，多次提出辞呈，要求即选贤能继任，以便尽快卸任，兼利校务。朱家骅则屡屡发电函慰留，不允其辞职。

5月25日，王星拱在各方一再催促返粤的情况下，再度提出辞呈，并阐述了不能不辞的理由：“弟历承馆护殷勤，原未敢轻于言去……自抗战复员以来，虽无贡献，颇经艰苦。迩来年衰力竭，百病丛生，跬步难具，饮食锐减，复值境运多乖，遭众不造，内人不幸哀逝，小儿又因劳毁而致疾，抛弃远离，于心未忍，奔波应接，更觉难堪。夫学校事务之推进无有已时，而个人体力之支持终有限度，哀苦余生，已不能从事于牺牲矣。”希望朱家骅准其辞职，即日派人接任。^[16]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方面再度传来学生异动的消息。5月24日，教育部收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驻南京代表办公处转来的广州致朱家骅密电：“中大理工学生要求实习费，罢课数日，今起除医学院、附中外，各院均参加响应……学生筹建石牌游泳池，募款两亿余元，训导

处令饬新机构接办，学生群起反对。学风疎懈，益感棘手。”^[17]王星拱再提辞呈的当天，朱家骅收到任国荣于5月24日发来的信函：“周裁衍兄来函述中山大学近况颇详，特专呈左右，足见母校之中落不振，自有原因，未必如师台所想像，由于毕业同学之不与抚五先生合作之所致也。”^[18]周裁衍于5月17日写给任国荣的信中说：

反动分子本年来采用分工性质之组织，吸收能力颇大，“五四”全面活动，系一种和平姿态的攻势——但一般人以为幸无风潮发生可喜，弟于前函曾经述及。现在反动分子在科学研究会统率之下，竟于五月十二日先由工学院三年级各系代表发动罢课，藉口学校不能履行他们的要求——先发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月公费作为三年级实习费，学校答复他们，已去电向教部及校长请示（照去年办法，只发一个月公费），他们不等待部复，竟行罢课，张贴种种标语，五光十色。十三日，理院生三年级亦开大会作同样要求（无此办法），并即日罢课。十四日，理工两院二年级各系亦罢课声援。十五日，理工两院一年级生亦罢课声援。至此，全校人数最多之工学院再加上理学院，已去其大半矣。今日此种情况更劣，法学院二年级生又起来响应理工两院，预料即将波及师、文等院。上周星期六日，学校曾为此事召集会议，商讨应付方法，但结果只是请有关之院长、系主任等协助劝导而已。又此间报载新行政院成立、教部易长消息后，校内早已无人肯卖点气力，各长、主任莫不怀五日京兆之心，群龙无头，不知所为，就弟亦感头痛！^[19]

收到5月21日张嘉谋的电报，朱家骅的反应较前显得紧张，他于5月25日致电邓植仪，认为学生“动辄以罢课相要挟，实属非是，显系别有作用（底稿原为‘有人策动’），企图扩大风潮。（底稿还有‘政府对于藉端滋事学生，决不姑息’）务请查明滋事者，从严惩处，为首者开除学籍，切勿姑息，以肃学风为要”^[20]。次日，朱家骅看过昨天收到的任国荣、周裁衍来函，在文件摘要笺上批示：“交万处长速与任、高、陈（案：疑为陈可忠）三兄商之。”征求意见的内容有二，一是是否换人；二是适当人选。眼见局面失控，朱家骅开始萌生换人易长的想法。

不过，大学校长的更替，往往会引起派系斗争的连锁反应，而且一时间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王星拱，亦非易事。向任国荣、高廷梓等人征求意见的结果如下：“（一）任先生意见：因邓植仪有长校野心，故目前易人，难免引起问题。似只得慰留王校长，俟暑假时就外省人士中找人更换。因广东人现无适当人选也。又云高廷梓为人作风太小，如派其前往，恐难有效果。（二）陈先生意见：目前只能慰留，拖至暑间换人。（三）高先生意见：似可再慰留王校长。至校长人选，有陈受颐者，似可考虑。”^[21]陈受颐是近代广东大儒陈澧的后人，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并一度被视为改造香港大学中文系出任主任的理想人选。教育部有关部门查询了陈受颐的情况，认为其“关系单纯，学识亦相当，惟于战时长期在国外教书，国内情形隔阂，如使之应付该校复杂环境，恐不相宜”。建议按照任国荣等人意见，先行慰留王星拱。除陈受颐外，高廷梓还建议考虑翁之龙、黄巽两人继任中山大学校长。

朱家骅见人选未定，内讧已生，于5月30日批示：“恳切慰留，并催速返。”并于次日拟定致王星拱的电报：“中山大学意义重大，故借重清望，勉为主持。二年以来，成效显见，缅念贤劳，无任感佩。时会艰难，端赖共济，务请勉抑退思，续任艰巨，并请早日返校。”鉴于王星拱去意甚坚，而中大校务不能无人主持，朱家骅双管齐下，一面电函及托人催促王星拱留任返校主事，一面暗中准备应变措施。5月31日，他在拟于次日发出的慰留王星拱的电报纸上批示：“电催张子春返国。”^[22]张子春即张云，朱家骅催其返国，显然意在出现万一之时随时救急。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令朱家骅大为头痛。6月7日，收到王星拱自安徽怀宁的复电，内称：“星拱[体]羸病增，行食俱困，倘不退休，危及生命。力与愿违，事非得已，谨再续呈辞职，至恳惠予照准，并乞原宥，无任感祷。”^[23]本来事情至此，可以顺水推舟，同意王星拱的辞呈，改换他人。不料教育部酝酿中大易长的消息传出，中大教职员闻讯，大为不安，由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邝嵩龄等人领衔，160余名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本校王校长德高望重，士林共仰，长校以来，尽筹硕画，建树甚多，方期继续主持，更图发展，忽闻有辞职之讯，群情惶惑，难以言宣。为本校前途计，敬乞鉴察，俯予恳切挽留，以慰喁望。”^[24]表达了中大教师对王星拱的敬意以及对于易长变生不测的担忧。

这封联名电显然对朱家骅造成压力，6月9日，他在摘由笺批示：“已一再恳切慰留”，似乎意有不悦。迫于形势，朱家骅还是调整了方案。6月10日，他在三天前收到的王星拱请辞电报上批示：“请陶校长就近代为劝驾。”并于6月11日分别致电王星拱和安徽大学校长陶因，前者内称：“兄以过劳损及健康，至为歉疚。惟中山大学逐渐复原，非借重清望，并承全力主持，无以臻此，实无妥人可以继。且目前学校切需安定”，请其“打消辞意，早日回校。”后者则请陶因就近代为敦劝，“务请其早日回校”。6月12日，朱家骅复函邓植仪等：“王抚五校长确有辞职之意，本部业已一再恳切慰留，并已电催克期返校，一面又托安大陶校长往访，敦促其行。尚祈诸先生再为恳劝，幸甚感甚。”

不过，这一次朱家骅却是有点儿故作姿态，以应付中山大学教师的诉求。一方面，他知道让王星拱回心转意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另一方面，相关人士也有不同声音，其中既有政治正确的考量，也有畛域之见。

6月7日，任教于中山大学的周达夫长函向朱家骅建议中山大学各项事宜，认为“中山大学情形，实须彻底整顿”，其中不少条目与易长之事有关：

（一）自宋子文先生来主省政之后，中山大学易长之说，即时有传闻。今年因资源委员会及国家行局等自东北撤退人多，往往不录用大学新毕业生，没出路，不无恐慌，而宋主席因筑港等项之需要，闻又自办训练班，未免不甚经济。就此点而言，中山大学宜以蒋梦麟先生担任校长，俾与宋主席合作，而中山大学工学院极不充实，尤须获得宋主席之协助，以资改进。

（二）王抚五先生宜调长安徽大学，因（1）王校长体力恐不耐此校繁剧，故乡之起居饮食或较适宜。（2）王校长用人有皖籍，难免此校粤籍旧人误会。若在安徽本省，自甚相宜。（3）王校长与武汉大学关系深，此间之与武汉，中隔湘省，不若安大与武大，声气更可相通。（4）安大现状，似亦亟须易人整理。

（三）如梦麟先生不允就任，可否请叶玉甫（恭绰）先生担任校长名义。因叶先生为交通界元老，可与华南建设配合，现在

退休在乡，国家如以大学校长礼遇之，亦眷念耆宿之至意，且玉甫先生在抗战中大节凛然，宜尊重之。闻其回粤有避嫌之意，如任以职务，更可根绝流言。

.....

（十三）此校现状不佳，远非昔比，整顿之道，首在力复当年季公及我公在此之旧观。顾颉刚先生系当年旧人，是否可胜校长之任？……如蒋梦麟先生、叶玉甫先生，声望固高，而无冀期刷新，且与部中联系，或更不密，未足以赴事功也。

（十四）王抚五先生可以无过，而不易有功。教务、总务两长，则均才力不胜。邹海滨先生兴建校舍而未竟全功，实为可惜。现在校容极不整饬，校舍、校车、水电，无一不须整顿……

[\[25\]](#)

宋子文于1947年9月30日到广州接任广东省主席，他未必会主动直接插手中山大学校长的人事安排，可是一则走马上任照惯例人事上会相应有一番变动，二则身边亲信出自各种考虑也会有所建言，这两种因素，都有地缘关系作用于其间。

在此期间，朱家骅还收到一封转来的关于中山大学现状的通信，内称：

中大愈弄愈糟，现已公开贴出打倒政府，欢迎共军渡江，打倒蒋光头（即指总裁）等标语。纪念国父之学府，竟成为反动分子之大本营。王校长久假不归，萨院长亦不在，教务长不理，训导长亦不管，乌烟瘴气，陷于无政府状态，其腐败从所未有。苟不早图解决，中大不难成为燎原之星火。到斯时责任究由谁负？教部似应作断然处置，非有党性极强，大刀阔斧，敢作敢为者，不能挽此危局。[\[26\]](#)

6月18日，张嘉谋也致函朱家骅：“中大王校长想难返校，教部对中大问题究将新派人选，抑抄袭中央大学之旧文章。中大人心不定，议论纷纷，若再拖延，殆将发生事件。”言下之意，希望教育部在王星拱不继续留任的前提下尽快解决接任人选问题，以免久拖不决，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局面失控。

就目前所见资料，最晚到6月17日，不仅张云接长中山大学一事尘埃落定，而且人还在欧洲的张云已经同意先派陈可忠代理中大校长一职。^[27]在此之前，朱家骅曾与张云、陈可忠反复协商，因为“此时觅人不易，尤其于粤省人士中能得各方同意者更为困难”，而且“事前曾与在京之粤省前辈及中大校友商量定妥”。如此，则自5月末考虑由张云接长之后，联系咨询等相关动作一直没有停止。再向王星拱劝驾，不过聊尽人事，敷衍塞责而已。

经过一番短暂的行政手续，张云接长中大以及陈可忠暂时代理之事正式确定。6月26日，陈可忠拟于6月28日飞粤履新。朱家骅匆忙之中赶紧于当天分别电函邓植仪和宋子文、欧阳驹（广州市长）、徐景唐（教育厅长）等人，告以“王校长再三坚辞，苦留不获，不得已，准予辞职，并已提院发表，由张子春兄继任。在张兄未到校前，校务暂由陈可忠兄代理，决定俭日飞粤”，并请各方面惠予协助。^[28]接着，又陆续以函电形式将消息通知周达夫、张嘉谋、黄尊生等相关人员。

朱家骅可能担心粤省及中大人士对人选有异议，特意说明“陈可忠为中大多年之老教授”^[29]。不过还是出现一些异调，只是对象为张云。宋子文听说张云“前曾在中大任教代理校长，措置多未适当，旋即去职。现为防范职业学生鼓动学潮，采取积极注意及严格制止办法，但亦须极力避免可资为藉口之原因。特据筹虑所及，但供参酌，尚祈密察为幸”^[30]。朱家骅连忙解释道：“渠上次代理校长期内种种，弟所深知。惟当时攻诘张兄者，尚有其他原因。渠近年在美进修，甚得美方之同情，在天文学上亦有贡献，美人并赠中大以天文仪器，即此可知。且彼现在欧洲，秋间方能返国，校务暂由陈可忠兄代理，陈虽非粤人，但系中大老教授，在学术界上尚有声称。”^[31]只是这样的打圆场未必真的有效。

三 朱家骅与CC派

1948年中山大学的易长事件，除了地缘纠葛外，表面看似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牵扯不大，王星拱虽然不是朱家骅派的骨干，朱家骅还是努力维护，迫不得已，才安排自己的人马。而自抗战以来在文教界尤其是大学系统与朱家骅派一直明争暗斗的CC派，也没有直接现身。不过，联系到王星拱的接长中山大学与朱家骅派和CC派的缠斗关系密切，以及由CC派掌控的广东国民党党部系统率先发难预谋倒王，则背后派系矛盾的阴云依然笼罩。

朱家骅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同门，因为轮流掌管国民党组织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用人事相互排斥，遂成水火不容之势。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当中，朱家骅派的势力远不及CC派，不得不与其他派系联合，但在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系统当中，朱家骅却能凭借其他资源，与CC派抗衡。双方的矛盾在抗战期间已经日见尖锐，组织部系统朱家骅派改变CC派旧轨，教育部系统则CC派排挤朱家骅的人脉。与朱家骅关系紧密的顾颉刚，即因为“不愿在CC统制下过生活”，和不堪忍受陈立夫压迫而辞职的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共同进退。^[32]

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朱家骅与二陈互换组织部和教育部职位，此举引发两大系统人事的重新洗牌，各自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加速排挤对方人马，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冲突。^[33]据1944年8月7日王子壮日记：“近日政治风气日坏，盖生存竞争激烈之表征。朱骝先自组织部去职，其所属人员相继为新任所汰，彼所主之中英庚款董事会已决定裁撤，中央秘书处所管之文化驿站，系朱之亲信贺师俊所主持，中央秘书处以紧缩名义并入宣传部。余并非支持此等机关者，其待调整亦为事实，惟朱氏甫下台，纷纷出此，实不免打落水狗之讥。在朱氏僚属，非[均]不免有走投无路之悲。此种现象，惟有使壁垒日深，冲突激烈，为党国前途计，实堪忧虑。”^[34]

朱家骅派在国民党内虽然整体实力不足以和CC派对抗，在文教界却有着相当深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朱家骅与二陈的派系矛盾，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一再否认，实际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抗战期间，国民党开始在各大学普设区党部^[35]，而此时刚好朱家骅接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与二陈的位置互换，双方一方面在新掌控的系统中

排斥对手，一方面力图利用新的权力资源和原有的人脉关系维持甚至扩张在旧系统中的势力，冲突愈演愈烈。而大学为双方利益交叉重合最大的领域，各自都视为己方的禁脔，于是成为两派争夺的焦点。中山大学可以说是朱家骅的政坛发祥之地，历来十分重视，两派在此的争夺持续不断，校长的人事更替，更成为矛盾的集中体现。

1940年春，教育部长陈立夫借反对代邹鲁主持校务的萧冠英以打击掌握中山大学的地方实力派，策动倒邹，迫使邹鲁辞职。许崇清代理校长一年多，到1941年7月被免职，由教务长张云代理。1942年5月，张云又被金曾澄所取代。^[36]张云代理校长期间担任教务长的董爽秋于1942年10月被迫辞去中大教职，一气之下，写信向朱家骅告状，据称：

教育部督学张北海在坪石曾公开声言，中大此次之易长，乃为陈、朱之争，而教育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撤换张子春之代理校长职，金曾澄甘作人傀儡，而解除弟与康辛元兄之长期聘约，以至其他直接间接与吾人有关者，无不去之欲尽。至各省党部内之对立，亦甚明显。是则因过去各省党部人员，皆陈氏所委用者，今我公任组织部长，每改委一人，旧有者即认为异己，而欲排除之。可知在此形势之下，我虽不与人争，而人终不肯谅。彼且有金钱，有联络，因而活动力大，协作人多，而我所赖者，道义之结合耳。以道义之交，而切磋学问固可，一入政治漩涡，则属一盘散沙，不堪一击。兹特具体陈供数点：（一）各地与公有关之人，应本亲爱之情，互相关怀，互相协助。（二）以后对干部人员，极应多多选拔忠实而有能力者充任之，必要时或加以数月训练。（三）吾人对中山大学如欲争取，即应设法于暗中协助其发展，暂时屈抑，无关大体，但若抛弃时间过久，以后再欲恢复，则难为力矣。以上数点，虽出弟之笔述，实为各地友好所同感者。

在董氏看来，中山大学此次人事变更，实为CC派与朱家骅在组织和教育系统分别进退的组成部分，所以提出针锋相对的应对策略。朱家骅接到1942年10月1日董爽秋的告状信，不愿其将自己与二陈的矛盾公开化，反而竭力撇清，于10月13日复函表示：

承示外传与某方相争各节，全属无稽之说。弟处世做事，一向至公无私，人所共知，公事机密之外，无事不可对人言，衷怀坦白，与任何人一无所争也。凡此挑拨离间有意中伤之语，皆不足信。至同学会、校友会等等关系，乃历史有以致之，决非他者可比，同学同事只可因公而团结，相互亲爱联系，系当然之事，不可藉此有所自私。弟本“助人为快乐之本”之训条，凡人有求必应，对一切事均如此，对各教育文化团体亦然。中大既有多年历史关系，又系总理所手创，当然更应如此，倘有所见，无不直言。子春兄系多年同僚，遇有所询，必诚挚答之，前许崇清先生时代悉如此，现在金湘帆、陈宗南二兄，仍常有所嘱，亦无不尽力相助。^[37]

朱家骅的这番话，看似冠冕堂皇，大公无私，就其主观而言并非矫情，可是并不能否认教育界其属下自成一派与CC派恶斗的事实。1943年6、7月间，朱家骅带领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等到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贵州等省视察党务^[38]，其间曾到播迁石坪的中山大学，所接到的近况报告称：“中大教职员派系错综复杂，蔚为大观”，形成因素主要有政派、地域、院系等，其中派系主要为朱家骅派、CC派、黄埔派、邹鲁派和第三党。朱派骨干有理学院教授任国荣（国民党中大特别党部书记）、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工学院兼理学院院长陈宗南、医学院院长李雨生等。前校长张云与朱家骅关系颇深，法学院教授叶元龙、钱清廉亦为朱派，1942年张云去职时离校。“朱派人物在校者虽不少，然均为个人的关系，对中大似无具体计划，行动殊不一致，自相倾轧之事一再发生，似需有一领袖人物从中主持。”

中大的CC派“以教育部为后台，一切活动，均较方便。校长金曾澄为保持地位计，一切均遵从教部意旨，可说已倾向此派。此派中心人物为前训导长王慕尊、师范学院院长齐沫林、会计室主任王俊人，以师范学院为大本营。一年以前，师院尚有接近张云者如卢文、叶述武、任国荣（时任博物系主任，未与张云发生意见）及一部分本校留校服务同学在，未能为所欲为。金氏上台后，齐氏排除异己，已成清一色之势。现任训导长陈劭南、训导处办公厅主任周梅羹及各学院训

导员均属此派。先修班主任萧锡三，因中委萧吉珊之关系，亦倾向之。最近齐沫林有在渝供职，不再回粤之说，陈劭南对师院院长一职，颇思染指，引起师院一部分CC分子之不满”。后王慕尊调广西大学，齐沫林成为中大CC派领袖。

黄埔派以陶林英为代表，法学院院长汪洪法、政治系主任刘求南属之，以法学院助教刘次修、刘显琳、谭让、黄沛榕等为触角。

邹鲁派有吴康、古文捷、邓植仪及潮梅籍教职员，“时发邹氏重长本校之幻梦，年来势渐衰”。

第三党有经济系主任王亚南、教授梅龚彬、陶大镛、卓炯、彭芳草等，“学生思想问题与此派大有关系”。各派借助地域、院系等纽带，相互缠斗。

由此可见，派系冲突在战时的中山大学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国民党的势力不能笼罩一切，有时其他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如“中大教授有把持一院一系而自成派系者，其斗争之烈，尤甚于党派斗争。盖与饭碗发生直接关系也”^[39]。

朱家骅给蒋介石的报告，隐去了派系斗争的内容，所提出的整饬意见之一，是“请钧座派一具有革命历史之老同志为校长，以示范学子，并派一在教育学术界素有地位之精干同志辅助之”^[40]。此法可谓人才不足的朱家骅在大学与CC派竞逐的一大妙招，既迎合了大学教授对CC派普遍反感的心理，有效地瓦解盘根错节的CC势力，又能够示以公心，博取学界的好感。后来他用王星拱长中大，用沈兼士攻夺东北大学，目的都在于此。

朱家骅一生，先后在北京、中山、中央三所大学任教长校，这三所大学不仅地域上分别位居北、南、中部中国的重要位置，更具有社会旗帜性的广泛影响力。1944年2月25日，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纪念周讲话时说：“中央大学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中央大学不仅具有一般大学与大学生的使命，还应负起特殊的责任。”^[41]对于中山大学，他也抱有同样的期望。他在1943年8月31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中说：“伏查该校自十三年创办，十五年改组以来，既为南中最高学府，亦为与本党最有深切关系之大学，所有教职员学生，在任何时

期，大都能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历届毕业生约数千人，今两广闽赣浙各省各部门工作干部，多出自该校，在渝党政军机关工作者亦有三百人。故该校办理良否，关系党国实巨，尤其于安定南中之前途，所关尤切。”所以主张“从速整饬”。^[42]不过，正因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过于将大学作为政治地盘或势力范围，与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性发生尖锐矛盾，由此导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知识界声名恶化，又由大学的辐射力得以迅速扩张。其在大学内部的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了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国民党失去大学乃至整个大陆政权的重要原因。

^[1] 关于中山大学已有的几种校史，或者时间范围不及抗战及以后，或者侧重于校内的学生运动。

^[2] 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

^[3]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1986年版。

^[4] 参见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及实施效果》，日中战争の国際共同研究第3回国際会議“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论文。

^[5] 参见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第7章“读书与争取和平民主运动”。

^[6] 1948年2月9日洪谦致朱家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101，国立中山大学文卷。以后凡不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档案。感谢国兴教授给予的大力襄助。

^[7] 朱家骅档案国立中山大学文卷密84527。

^[8] 1948年2月16日朱家骅致王校长函。

^[9] 1948年3月13日姚宝猷致朱家骅寅文电。

^[10] 1948年3月21日蒋中正致朱家骅侍字字第40375号。

^[11] 1948年3月24日朱家骅致邓植仪函。

^[12] 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13] 1948年6月6日邝嵩龄致朱家骅函。

^[14] 1948年2月21日朱家骅致任国荣丑马电。

^[15] 1948年2月16日朱家骅复洪谦函。

^[16] 1948年5月25日王星拱致朱家骅函。

^[17] 1948年5月21日张婉嘉致朱家骅电。该电报广东省政府主席驻京代表办公处于5月23日收到，次日送交教育部高等司。据教育部批改，发电人“疑为张嘉谋”。

^[18] 1948年5月24日任国荣致朱家骅函。

^[19] 1948年5月17日周裁衍致任国荣函

^[20] 1948年5月25日朱家骅致邓植仪辰有电。

- [21] 教育部人事处长万绍章便笺（无时间）。
- [22] 1948年5月31日朱家骅致王星拱电。
- [23] 1948年6月7日王星拱致朱家骅支电。
- [24] 1948年6月5日邓植仪等致朱家骅函。签名者包括朱师辙、王力、陈守实、刘节、陈国达、罗雄才、黄昌谷、杨树达、罗香林、董家遵、王宗炎、梁钊韬等多位知名学者，其中也有陈锡祺师。
- [25] 1948年6月7日周达夫致朱家骅函。
- [26] 1948年6月8日“信”致“梓林”函。
- [27] 1948年6月17日教育部笺。
- [28] 1948年6月26日朱家骅致邓植仪电。
- [29] 1948年6月26日朱家骅致宋子文等函。
- [30] 1948年7月3日宋子文致朱家骅午东电。
- [31] 1948年7月5日朱家骅复宋主席电。
- [32]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13页。
- [33] 关于两派在国民党内的争斗，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论述最详。
- [34]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1944年8月7日，第9册，第317页。
- [35] 关于战时国民党在大学的组织发展，详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36] 参见梁山、李坚、张克谟《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06—108页。
- [37] 《复董爽秋教授为中山大学易长事辟谣》。
- [38]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5页。
- [39] 《中山大学近况》。
- [40] 1943年8月31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松字第244号。
- [41]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第60页。
- [42] 1943年8月31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松字第244号。

人名索引

（本索引仅列出正文出现的名以及字、号等；所附页码为纸质书页码）

安吉尔（Norman Angell） 255

敖嘉熊 289

包天笑 113

宝熙 290

鲍荣 123

伯伦知理 78, 262

曹锟 208, 222, 226, 223-235, 247

曹钧 231

草壁龟雄 333

蔡元培 86, 88-92, 94-98, 100-107, 109, 110, 191, 192, 261, 270, 288

岑春煊 215

陈其采（霭士） 215, 293, 295, 301, 302, 355

陈布雷 381

陈诚 384

陈大悲 125

陈独秀 264, 265, 268, 269, 272

陈福田 363

陈公哲 315

陈果夫 296, 301, 302, 355–359, 369, 370, 380

陈济棠 341

陈可忠 362, 374, 386, 387, 393, 397, 398

陈立夫 301, 302, 354, 355, 360–370, 399, 400

陈其美 184, 291, 301

陈三立 87

陈劭南 402, 403

陈受颐 394

陈树藩 232

陈天华 81, 84

陈同昶 333, 335

陈希曾 297

陈兴亚 240

陈雪屏 380

陈仪侃 275

陈毅 41

陈翼龙 179

陈寅恪 13, 29, 246, 360, 372, 380

陈粤人 386

陈宗南 402

程德全 176

褚礼堂 288

褚民谊 301, 302, 325, 355

慈禧 137, 139, 170

崔磐石 288

崔玉贵 116, 123

大谷光瑞 333

戴季陶（传贤） 106, 252, 260, 264, 265, 289–
293, 295, 297, 299, 300, 301, 323, 355, 356

戴克光 371

戴震 210

戴子开 288

丹尼尔·戴伊博士（Dr. Daniel Dye） 369

邓泽如 271

邓植仪 390, 391, 393–395, 398, 403

狄平 139

丁骈 371

丁宝臣 122

丁山 368, 370-373, 382-384

丁韪良 32, 37, 38

董爽秋 400, 401

杜连科 315

杜荣棠 315

杜威 (J. Dewey) 257

杜亚泉 86, 88-95, 97, 102, 104, 106-110, 288

端方 46, 126

段祺瑞 (芝泉, 合肥) 196, 208, 211, 214, 220-224, 226, 228-230, 232, 233, 235, 239, 241

樊增祥 176

范连尼 339

范履祥

范霞轩 297

费孝通 346, 348, 350, 351

费正清 (J. K. Fairbank) 363, 365, 366, 369, 378, 379

冯桂芬 33

冯国璋 226, 227, 233, 234, 239, 241

冯玉祥 235

冯仲平 116

凤林 116

孚琦 122

弗雷泽 (James Frazer) 348

福泽谕吉 100

傅良佐 230

傅斯年 10, 16, 21, 209, 344, 346, 349, 359, 360, 380, 384

该鲁学尼 (G. Gershuni) 280

高材世雄 75

高梦旦 176

高廷梓 389, 394

高信 389

高一涵 266

高梓 315

戈公振 315

葛得宏史密斯 (Goldwin Smith) 269

葛兰言 (Marcel Granet) 350

宫崎寅藏 187

龚积成 312

辜鸿铭 216

古文捷 403

顾颉刚 7, 18, 346, 349, 362, 365-
368, 370, 373, 377, 378, 380, 381, 383, 384, 396, 399

顾孟馀 367, 399

顾瑗 124

光绪 34, 114-118, 137, 139, 170

郭沫若 382

韩愈 129

郝伯阳 315

河相达夫 335

何心石 386

何应钦 323

贺师俊 370, 400

洪鹭汀 288

洪谦 389, 391

侯俊山 113

侯可九 315

胡汉民 341

胡焕庸 362, 367, 368

胡钧 41

胡适 17, 18, 60, 186, 247, 255, 263, 264, 268, 271, 360, 384

胡惟德（馨吾） 196, 198

黄建中（离明） 371-373

黄搢臣 296

黄恺元 194

黄沛榕 403

黄绍箕 37

黄兴 184, 185

黄巽 394

黄远庸（为基） 86, 91, 96, 97, 100, 101, 103, 107-109, 288

黄尊生 398

惠栋 210

积余 288

稽宗华 125

季申 288

江易园 176

蒋观云 288

蒋介石
200, 204, 301, 303, 304, 323, 338, 341, 343, 355, 356, 358, 359, 365-
368, 370, 375-384, 390, 391, 403

蒋梦麟 365, 389, 391, 396

蒋汝藻 286, 287, 289

靳云鹏 230

金曾澄（湘帆） 387, 400-402

金城 292

金甸丞 288

金开藩 292

金粟香 288

金蔚九 116

金岳霖 363

景耀月（帝召） 139, 144

鞠裳 288

聚卿 288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255

康同凝 305

康辛元 401

康有为 17, 33-37, 43, 45, 68, 79, 100, 114, 116, 117, 139, 262, 305

柯林斯（E. Collins） 276

克鲁泡特金（P. A. Kropotkin） 251, 258

孔祥熙 337, 365, 366

邝嵩龄 391, 395

蓝天蔚 106, 290

雷海宗 254, 255, 258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201

黎元洪 177, 180, 215, 228, 233

黎宗岳 124

李伯勤 297

李纯 230, 234

李大星 313

李大钊 207, 208, 212

李端棻 34, 35, 37

李汉魂 335

李鸿章（文忠） 204, 216, 141, 225, 275, 279

李厚基 230

李及贤 318

李季伟 371

李济 378

李家驹 36, 37

李浚 51

李离 181

李莲英 123

李平书 106

李盛铎 36, 39

李书城 72

李燧生 105, 290

李雨生 402

李玉桂 114

李毓臣 118

李源和 335

李宗黄 228, 229

李宗侗 349, 350

李仲轩 230

梁敦彦 223

梁济 118

梁启超 13, 20, 22, 33, 37, 65, 66, 68, 69, 78-
81, 83, 84, 87, 92, 114, 139, 206, 208, 262, 267, 268, 307, 308

梁启勋 139

梁世英 335

梁铁君（化名吴道明） 117, 118, 126

梁士诒 213, 224

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y） 255

列宁 257

林长民 224

林夔龙 333

林森 301

凌铭之 296

刘承幹 23, 287, 288, 298

刘次修 403

刘福基 315

刘冠雄 194

刘锦藻 286, 287

刘坤一 34, 39

刘谦甫 288

刘求南 403

刘师培（光汉） 17, 259, 290

刘铁民 180

刘桐建 287

刘显琳 403

刘湘 238

刘艺舟 119, 120, 125

刘语石 288

刘振源 181

柳亚庐 105

龙云 365

卢峻 371

卢炜昌 314, 315

卢文 402

陆鼎揆 237, 248

陆建章 220

罗家伦 361

罗曼·罗兰 (Roman Rolland) 255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251, 255-258, 260, 262, 269

罗文干 338, 339

吕碧城 216

马林诺斯基 (B. Malinowski) 248, 350

马君武 106

马西民 315

马子贞 315

毛礼锐 386

毛泽东 200, 289

梅龚彬 403

梅兰芳 112, 114, 119

梅贻琦 363

蒙文通 372

孟恩远 229

缪荃荪（艺风） 288

那桐 116, 123

倪嗣冲 227, 230, 235

聂光耀 324

钮师愈 297

欧阳驹 398

帕累托 65, 67, 83

潘公展 293, 296, 298, 300-302, 355

潘兰史 288

庞莲 305

庞青城（元澂） 86-88, 92-95, 102-105, 288-291, 305

庞惟锡 286

庞元济（莱臣） 86, 286, 287, 290, 298

庞云鎔 86

裴国雄 315

彭芳草 403

彭翼仲 117, 118, 127

平山周 278

溥伦 184, 185

齐沫林 402, 403

钱端升 363

钱穆（宾四） 9, 13, 210, 381

钱清廉 371. 402

钱听邠 288

乔苕臣 118, 122

桥口政幸 333, 334

秋瑾 216, 289

瞿秋白 289

任达（Douglas R. Reynolds） 217

任国荣 389, 392-394, 402

任鸿隽 359

任文毅, 天知 111, 125, 126, 127

荣庆 41, 43

芮恩施（P. S. Reinsch） 264

芮陶庵 369

瑞贤 123

善耆 116, 117

邵力子 288, 301

邵叔嘉 297

邵飘萍 225, 229

绍英 184

沈葆楨 243

沈恩孚（信卿） 315

沈兼士 305, 371, 403

沈联芳 296

沈缦云 106

沈嗣良 315

沈士华 297

沈士远 288

沈田莘 293, 297

沈尹默 288

沈曾植（乙庵） 288

盛宣怀 43

世续 184

松井石根 334

松田庄一 333

叔问 288

舒震东 312

宋嘉贤 386

宋教仁 176

宋育仁 181

宋子文 396-398

孙传芳 231

孙洪伊 227, 235

孙家鼐 36-38, 43, 48, 57, 58

孙敬福 116

孙中山 13, 14, 81, 127, 179-181, 184, 185, 187-191, 211, 234, 251-254, 256-258, 260, 262, 263, 265-282, 292, 310, 319,

太平秀雄 335

谭平山 219

谭让 403

谭嗣同 87, 262

谭鑫培 114, 122

汤充土 297

汤国梨 295

汤济沧 293, 295-297

汤寿潜 176, 288

汤寿彤 176

唐才常 142

唐绍仪（少川） 178, 194-198, 208, 216

唐文治 176

陶大镛 403

陶菊隐 200-203

陶林英 403

陶因 395

陶拙存 288

田际云（瑞麟，想九霄） 111-127

田中玉 230

廷杰 123

汪洪法 403

汪精卫 109, 341

汪康年 87

汪彭年 139

汪优游 125

汪渊若 288

王搏沙 176

王宠光 310

王宠惠 310, 311

王宠庆 310

王宠勋 310, 311

王宠益 310

王宠佑 310

王尔敏 242, 244, 251

王国维（静安） 13, 16, 288, 350

王汉章 116

王均卿 295

王俊人 402

王克文 202, 203

王鸣盛 210

王慕尊 402, 403

王谦如 310

王士珍（聘卿） 226, 230, 236

王世杰 365

王星拱（抚五） 385-387, 389-392, 394-399, 403

王旭庄 288

王亚南 403

王一亭 296

王元深 310

王沾辉 310

王照 59, 116, 117

王正廷 194, 323

王钟声（希普） 111, 114, 119, 124, 125

王子壮 357, 370, 399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255

威灵顿爵士 317

尾川勘治 335

魏伯伦（Thorstein Veblen） 255

温炳臣 176

温缉周 91, 92

温清溪 310

温世霖 223

翁同龢 139

翁之龙 394

倭仁 32

吴仓硕 288

吴鼎昌 301

吴景濂 215

吴俊升 361

吴康 403

吴宓 380

吴佩孚（子玉） 221, 222, 231-235

吴汝纶 38, 50

吴尚时 402

吴铁城 301

吴文藻 366

吴锡泽 362

吴振华 371

吴稚晖 78, 95

伍朝枢 224

伍廷芳 106, 176, 177, 190

熙瑛 43

夏曾佑 87

夏敬观（剑丞） 176, 288

夏鸣皋 126

向楚 372

萧冠英 400

萧锡三 402

萧益三 122

谢宝筏 125

熊长卿 314, 315

熊庆来 365

徐恩曾 301, 355

徐季康 371

徐继畲 32

徐景唐 398

徐勤 100, 139

徐世昌（东海） 213-215, 224-226, 230, 232

徐树铮 215, 220, 221, 223, 224, 230, 232, 240

徐勇 207, 219

许崇清 400, 402

许啸天 125

岩泽庆三 333

严复 216

严文郁 363

严修 43, 44, 216

严濬宣 293, 295-297

严元照 287

阎锡山 231

杨笃生（毓麟） 75, 76, 105, 289

杨公达 359, 402

杨谱笙 293, 295, 296

杨森 238

杨士琦 224

杨士燮 36

杨荫杭（老圃） 237

姚从吾 380

姚东木 288

姚焕卿 116

姚梧冈 176

姚锡光 36

叶崇榘 124

叶楚伦 288

叶德辉 206

叶瀚 87-89, 288

叶纳青（Ferdinand Genahr） 310

叶绍钧 178-180

叶述武 402

叶玉甫（恭绰） 396

叶元龙 402

贻谷 123, 124

易卜生 264

易培基 356

奕劻 33, 176, 177

奕訢 31, 32, 37

尹亚伟 240, 241

有贺长雄 228

于邦华 181

于保倭卫 333

于启江 359

于右任 105, 176, 290

余诚格 37, 168

余寰澄 295

余俊贤 389

虞洽卿 286

裕庚 35

元良勇次郎 261

元素 288

原田中 335

袁飞翰 386

袁世凯（项城） 39, 46, 117, 141-143, 146, 147, 177-181, 183-185, 189-199, 212, 215, 216-218, 223-225, 228, 233, 235, 239, 241, 243-247

恽孟乐 288

恽毓鼎 113

载沣（摄政王） 123, 130, 139, 144, 146, 176, 177, 184, 216

翟理斯（H. A. Giles） 275

曾国藩 204, 215, 216

张百熙 38, 40, 41

张宝善 286

张北海 361, 400

张弁群 104, 286, 288, 289, 291

张澹如 286, 289

张道藩 356

张德平 315

张定武 230

张东荪 262-264

张尔田（孟劬） 288

张国珍 318

张怀芝 230

张嘉谋 393, 397, 398

张嘉祥 67

张謇 176, 177, 188

张静江（人杰） 105, 106, 286, 289-291, 295, 297-299, 301, 302, 323, 355

张敬尧 232

张君勱 376

张君谋（乃燕） 395, 397

张钧衡（石铭） 286

张澜 376

张乃燕 289, 291

张朋园 65, 66, 201-203

张其昀 381

张琴 181

张群 301

张蕊英 295

张瑞荫 53

张盛藻 32

张廷灏 289, 297, 298

张奚若 363

张勋 175, 212, 226, 227, 230, 235, 236, 290

张一麐 223

张裕钊 215

张玉法 202-204, 241

张元济 37, 70, 176

张云（子春） 374, 386, 387, 394, 397, 398, 400, 402

张增熙 289

张之洞（南皮） 13, 34, 36, 39, 41, 46, 48, 50, 51, 87, 106, 129, 149, 163

张作霖 215, 220, 230-232, 234, 235, 237, 241

章炳麟（太炎） 17, 20, 22, 87, 105, 106, 215, 349

章君畴 317

章益 372

赵秉钧（智庵） 190, 196

赵炳麟 51

赵际昌 312

赵凤昌 176

赵倜 222, 231

郑观应 33-35

郑贯一 67, 71

郑藻如 274

织田万 244

钟岳 123

周柏年 289, 291, 302

周达夫 396, 398

周恩来 266

周君常 298

周梅羹 402

周梦坡 287

周佩箴 286, 289, 291, 298

周其勋 388, 389

周庆云 286-289, 296-298

周颂西 289, 297

周由厪 293

周越然 293, 297

周裁衍 392, 393

周肇祥 292

朱家骅（骝先） 288, 291, 301-303, 305, 323, 353-362, 366-374, 377, 380-383, 385-403

朱经农 368

朱念陶 288

朱启钤 118

朱通儒 181

朱旭东 122

朱韵笙 124, 125

朱镇庚 313

朱执信 264

朱祖谋 37

庄蕴宽 176

卓炯 403

宗子戴 288

邹代钧 87

邹鲁（海滨） 337, 387, 400, 402, 403

左舜生 376

左宗棠 243, 277

征引文献

一 档案

朱家骅档案

二 报刊

《北京大学日刊》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大公报》

《改造》

《国民日报》

《国闻报》

《湖州月刊》

《解放日报》

《解放与改造》

《警群》

《警钟日报》

《开智录》

《历史研究》

《临时公报》

《民报》

《民国档案》

《民国日报》

《民立报》

《民吁日报》

《闽星》

《清议报》

《商务官报》

《申报》

《神州日报》

《盛京时报》

《时报》

《时事新报》

《苏报》

《天铎报》

《天义》

《万国公报》

《新民丛报》

《新青年》

《新世纪》

《星期评论》

《选报》

《学部官报》

《亚泉杂志》

《游学译编》

《云南日报》

《浙江潮》

《政艺通报》

《中国白话报》

《中国日报》

《中国旬报》

《中外日报》

三 一般文献

1.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上海，1903年。
2.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
3.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4. 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6.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7. 陈锋、张笃勤主编：《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8. 陈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陈果夫先生年谱》，《陈果夫先生全集》第10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9. 陈景磐、陈学洵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 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4. 陈永昊、陶水木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 成都周刊部编辑：《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成都，文光出版社1946年。
16.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7.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1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 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20. 窦昌荣选注：《天地会诗歌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1.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 范小方：《二陈与C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3.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
24.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25. 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2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7.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2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1989年。
29. 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3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31.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2. 顾颉刚著：《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33. 关晓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3月第59期。
34. 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
35. 关晓红：《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7.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8. 郭声波、吴宏岐主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

39. 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

40. 郭正忠：《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41.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42. 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43.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

44. 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45. 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46. 黄远庸：《忏悔录》，《远生遗著》，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

47. 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年。

48.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

49. 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及实施效果》，日中戦争の国際共同研究第3回国際会議“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论

文。

50.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51.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

5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

53. 雷海宗撰，王敦书整理、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4. 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

55. 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56.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57. 李怡：《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8. 李永胜：《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5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6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61. 梁山、李坚、张克谟：《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

62. 林黎元：《南浔丝商“四象八牛”》，《湖洲文史资料》第5辑。

63. 林黎元：《四象八牛：南浔丝商十二家族》，《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64.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

65. 刘汝骥：《陶甓公牋》，《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
66. 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
67. 陆剑：《南浔金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68.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69. 毛祥麟：《墨余录》卷14，《户捐》。
70. [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1. 门人胡钧重编：《清张文襄公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
72.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3.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74.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75. 戚学民：《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7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77. 《清代野史》，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
78. [清]沈家本撰，韩延龙、刘海丰、沈厚铎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79. 求良儒：《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80.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四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81.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团体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82. 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83.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84.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85. 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春季号，第24期。
86. 桑兵：《孙中山与传统文化三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87. 桑兵：《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辑。
88.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89.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90. 韶华：《中华名伶传奇丛书·梨园领袖田际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
91. 绍英：《绍英日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92. 沈葆楨撰：《沈文肃公政书》，清光绪铅印本。
93.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94. 司马相世著：《新官场现形记——国民党六全大会真像》，广闻堂1946年刊行。
95. 世续等纂：《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96.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97.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98. 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
99.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00.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101. 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外强环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2. 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3. 王泰栋：《蒋介石的御用笔杆：陈布雷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
104. 王芷章：《京剧编年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
105. 王芷章：《清代伶官传》，北平：中华印书局1936年。
106.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107.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08. 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9. 吴泽、杨翼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110. 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至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九年三月自印本。
111.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2.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3. 谢放：《张之洞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4. 徐焕斗：《汉口小志・商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115. 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116.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7. 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18. 徐咏平编著：《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
119. 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20. 杨邨人：《戏剧》，《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
121. 杨天石、黄道炫编：《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22.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23. 杨天石：《寻找历史的谜底》，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4.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
125. 姚纯安：《学科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以1895至1919年的社会学为中心》，中山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126.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7.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
128. 尹亚伟：《百卷巨秩 弥足珍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介绍》，《民国春秋》2000年第3期。
129. 游欢孙：《近代江南的市镇人口——以吴兴县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
130.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1.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编，陶李编撰：《云南大学志》第2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32. 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下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
133. 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134. 张磊：《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5.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136. 张玉法主编，林载爵、朱云汉、王克文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137. 张振鹤，丁原英辑：《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

138. 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9. 章开沅：《康梁与肃亲王关系试探》，《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140.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41. 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42.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144.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5年。

145.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4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

14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

14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1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主编，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5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153. 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
154.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155.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56.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台北，2001年。
15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15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159.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日，台北，“国史馆”，1986年。
160.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161.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162. 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遇见理想国

官 网: <http://www.ilixiangguo.com/>

微 博: <http://weibo.com/bbtbook>

天猫店: <https://lixiangguo.tmall.com>

理想国公众号

好文 影像 活动
共读 共赏 共享



理想国服务号

兑图书 换周边
看视频 享优惠





用后来的特定分科观念、眼界考察并不按照分科发生演化的历史问题，如何顾及历史上人事本身具有的各个层面及其相互联系，而不至于为了将就分科的范围先入为主地取舍材料以致肢解了事实，或者说，如何才能善用分科的长处，同时又不受其局限而导致偏蔽，尽可能依据各类相关材料，梳理史事本来的时空联系，由全过程和各层面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本相与前人意，实在是治史能否得法的一大关键。

——桑兵

上架建议：历史、文集

ISBN 978-7-5695-8312-1



定价：69.00 元

理想国

against

桑兵 著

交流与对抗 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用历史的方法重解历史
取事实证言论，搜群籍参圣言，考订解释以明言行
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地通语境以解文本
如此，庶几可以回到历史现场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第二节 史料的整理与解读

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话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第一节 旧说之疑

第二节 新说之据

第三章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第一节 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

第二节 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第三节 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第二节 东学的笼罩

第三节 变化未必是进化

第四节 中、东、西学的异同

第五章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第一节 发展概况与类型

第二节 功能与趋向

第三节 影响中日关系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一节 了解与警惕

第二节 日本正吾人当头第一大敌

第三节 转向中日提携

第四节 《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

第七章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第一节 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

第二节 日本的反应

第三节 日本以外的反应

第四节 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

第五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

第八章 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1]

第一节 思想的历史

第二节 搜群籍以参圣言

第三节 取事实以证言论

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第五节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第六节 鉴古而知今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第三节 组织文史杂志

附录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

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中和月刊》解说

后记

[人名索引]

[征引文献]

第一章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绝非中国与日本历史的交际边缘。如果没有对于两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化及其相互关系乃至近代以来东亚格局整体性的深入认识，单就中日双边关系立论，研究不易到位。毋庸讳言，一般而论，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前者很难进入日本的日本研究界的学术视野，而后者却常常为中国的中国研究者所称道推崇甚至奉为臬。受此制约，相对于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视野开展、取材广泛、论证翔实等方面，也明显处于下风。而深入认识历史，是把握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缺乏历史认识的国际关系论，充其量不过是浮议泛论，只能成为娱乐大众的谈资。

然而，承认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中国研究已经竭尽所能。不仅如此，从西学、东学、中学的相互影响和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角度看，甚至日本的日本研究也有可以大幅度拓展的空间。与此相关，中日关系或日中关系研究，亟须贯通各个时段层面，使得研究水准更上层楼。而贯通之道，不是闭门造车地编制看似包罗万象实则破绽百出的宏观通论，或以负贩域外陈货为新知的穿凿附会的系统架构，而是将所有史料史事融通无碍，使之适得其所，以致不断近真并得其头绪。

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如果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标志性作品，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年，其间波澜起伏，进展不小，成果颇丰，但也存在许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局限和问题。以报人应急的业余之作历经八十年仍然堪称代表作而论，虽然书中包含不少独家材料，又经过一定幅度的修订，仍然反映出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要充

分释放这些空间，必须在研究视野、观念、取径和做法上大幅度改进，才能有效地摆脱目前的被动落后局面。实现这一目标，当然牵扯广泛，择要而言，有如下各项：

一、应当从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如果以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中日关系的结局反观此前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很容易将结果看成是唯一可能的必然甚至宿命，其间的种种变数在命定的意识之下显然会降低各种可能性的作用及意义。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看下来，探究相关史事发生演化的渊源流变，不要仅仅用后来的观念看上去，先入为主，以致看朱成碧。这样的转变并非否定历史或是用假设来代替事实，相反，历史上的各种可能性提示今人反省在事情展开的各个关节点应当如何思维行事，才能够有效地避免悲剧的重演。

中国与日本为一衣带水的近邻，由于地理位置接近，长期存在密切关系，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如果上不出嘉道幕末，很难理解得当。一般而言，尽管存在分合兴衰，中国在东亚，无论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代以后，即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强盛起来，又有欧美列强的侵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掌控着东亚的格局，后起的明治日本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冒险一搏。甲午之战日本侥幸取胜，固有势所必然的机缘，同时也可以说是涉险过关，渡过一劫，由此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态势乾坤颠倒的转捩点。在此之前，日本对于清国始终心存畏惧。显象之一，战前北洋舰队两次访日，都对日本朝野产生了极大震动，并且刺激起强烈反弹。

甲午战后，清朝举国上下非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反而出现越来越强劲地要求学习日本变法维新的呼声。此后直到“二十一条”，中国朝野各方，对于鼓吹同文同种的日本都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并且抱有无限的希望。作为过来人的梁启超后来痛心疾首地谈及其间自己对日观感态度的变化：

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蹒跚，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当时日人甚爱我助我，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为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故愈觉日人之可亲。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觉日人之可恨可恶，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由港至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矮人也。^[1]

在学习东学、效仿明治和结交日本等方面，梁启超都堪称近代中国人的代表，此言大体可以视为那一时期中日关系变化起伏的缩影，也是梁启超心中日本认识的警世箴言。有论者将清季新政时期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引发不少争议，不过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理解，或许可以透过表象，拿捏得当。

二、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各自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于内政的认识肤浅，很难深入理解双边关系。不仅如此，内政并非应时的政策而已，尤其重要的是制度文物，后者可谓决定各国国性以及政府人民思维行为的根本所在，对此了解

不深，则考察双方处理双边关系时各自千差万别的思维行事，认识往往流于表面文章，甚至难免出现误判。

中国历史上与不少周边乃至并不相邻的其他政权存在不同于后来条约关系的特殊关系，历代王朝自认为天朝上国，将这些政权的辖治视为藩属。这种特殊关系，就是所谓宗藩关系。宗藩关系的重要形式，从藩属的角度看，包括朝和贡两部分。外国学者习惯性地沿袭这样的视角，将宗藩关系称为朝贡体制，也还将就。禹内学人不加辨析，在描述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时，也使用朝贡体制的说法，仿佛置身外藩，就显得有几分怪异。据说理据之一是这样的观念已经得到国际公认。可是即使得到公认，也只能作为一定的准绳，归根结底，还要以事实为依据，绝非国际公认就无须验证。此事还显示出，近代中国研究一味寻求所谓国际视角，千方百计地与世界对话，本质上还是以西为尊的变相。其实国际公认并不等于公理，甚至不能成为尺度准绳。

东亚从以中国为主导的宗藩体制转向近代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体制，今人不仅视为近代化的表现，而且用诸如此类后出外来的观念重新审视从前的观念行事。其实所谓国际法，本来不过是欧洲用于处理内部关系的准则，随着殖民扩张的脚步，被赋予万国公法的外衣，贴上公理的标签，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尽管后来经过不断地修订，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逐渐有所调整改进，现在被普遍化或一般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但其基本还是体现了人类社会至今仍然处于欧洲中心笼罩之下的现实，且不能证明生成于欧洲社会历史文化的准则观念就是适合世界各国的最佳准则，更不宜用来解读衡量此前东亚通行的观念行事，以后来的价值观念强古人以就我。如果对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缺乏认识，或是用后来的观念加以解读，就很难领悟其中的道理以及建立在不同文物制度和观念形态之上的思维行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面对不同的国家，善于利用国际规则和东亚的原有行事方式。与欧美列强打交道，尽可能遵行国际法的准则，颇能赢得列强的好感，而在与东亚各国交涉时，则往往恃力逞强，并且有意利用不同规则的差异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行事方式，为日本侵略邻国营造出必要的环境因素。相比之下，自有一套通行已久的行事规则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完全接受适应所谓国际法，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而当中国人努力学习用国际法对待日本之时，却每每遭遇了强权，而不见了公理。据说李鸿章幕下就有好几位精通国际法的官员，与日本谈判之际，令后者大为头痛，无法应对，只好索性抛开国际法的外衣，转而赤裸裸地倚仗武力强势。今日日本在东亚和国际上的形象反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重演再现。日本式逻辑的荒谬，直到战后审判战犯之际，才让欧美各国有所领略。

1929年12月15日，胡适与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教授（C.G. Seligman）午餐时谈及中日两国人的区别，胡适认为日本民族有三长：爱美，好洁，轻死。而塞利格曼夫人则提示还有一个区别，“我们同日本人谈，日本人总要夸张日本的好处，惟恐人说日本的坏处。中国学者便不然”。在胡适看来，“其实日本有好处，何必不夸。我们若有好处可夸，又何必自贬？日本人以称道自己好处为爱国，我们以指摘自己不好之处为爱国，正各行其是也”。^[2]

胡适的答案，其实并不只是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差异。迄今为止，尽管中日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反差明显的情形仍然不难见到。进一步深究，明治维新后，由于所谓单一民族、明治政府的高效以及皇民化等复杂因素，随着日本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方面的成功，日本国民对于国家以及政府越来越认同，以至于盲从，而对于政府的制约力则不断降低。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对待本国国民与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态度差若天渊。由于不断成功导致

日本人自信心过度膨胀，他们不仅丧失了自我批判力，甚至竭力抑制别国人在自己国家对日本的批评抨击。所以战前日本国会曾经决议不准中国人自称中华，将中国人的所有对日批评都视为反日宣传而加以禁止，要求中国政府压制反日舆论，惩办发表不利于日本言论的报刊和报人。

同样的思维逻辑，使得战后日本国民对于侵略战争普遍缺乏必要的反省。即使承认战争曾经带给其他国家灾难，也不过是由一些坏的日本人造成，与己无关，更加不是大和民族的原罪。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虽然进入政体看似先进的共和时代，可是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度始终不高，导致内部纷争不断，使得日本有机可乘，甚至借口中国人不能自治，改变以援助实现间接控制的方式，企图强行取代，直接进行殖民统治。

三、要根据各种相关资料，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研究中外关系，切忌仅用单方面的文献和视角，而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首先，要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和记载进行考察，不要只从单一国度的立场文献着眼。但凡涉及双边关系，各自的记述及其含义，轻重取舍，必然千差万别，片面立论，势必不能四面看山似的察知实情，领悟本意，容易造成许多隔膜错解。进而还要顾及其他各方，尤其要从多边的国际关系着眼，注意各种相关性及其变数。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近代各国的双边关系大都受制于多边关系，晚清政府内部的联俄与联日派分，便是各国势力交错之下以夷制夷的变种。而近代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固然主要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但欧美列强自巴黎和会以来的外交及东亚政策有意挑动东亚内部的争端以便坐收渔利，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领域，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研究，同样涉及双边乃至多边关系，因而也要将中日双方的各种资料比勘互证，不

能单用一方面的资料立论。即使中方资料，也要权衡国共以及其他方面的记录，甚至国共双方内部也各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关于同一事件、问题、人物等等的研究，如果不能尽可能多地将各方面的所有资料综合考察，安置得当，证据的罗生门就很容易转化为研究的各执一偏，各说各话，事实真相反而愈发扑朔迷离。虽然近代史料繁多，可以轻易举证立论，并且自圆其说，可是由于无法将所有材料贯通无碍，解读史料，重现史事，既不能逐步近真，也不能得其头绪，即使反复称说，仍然不能切实推进相关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一面之词或随心所欲的立论，非但不能取信于人，反而因为破绽百出导致整体可信度的严重流失，结果有理却形同强辩。

史料是后人接近历史本相的依据，但是运用史料必须经过内证外证等一系列验证过程，不经任何验证即将史料所载直接等同于史事，恰好应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老生常谈。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至为复杂，为了应对多变的局势，双方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处理过相关资料，或是用有利于己方的准则取舍材料。战后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侵略战争的罪行，曾经有目的有计划地掩藏甚至销毁一些战争罪证，1990年代披露的关于战时强制运送中国劳工到日本并进行残酷迫害，尤其是血腥镇压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暴动的资料，即其显例。这样的情况表明，日本政府的确有设法湮没证据以自我脱罪的动机和行为，而且所采取的行动很可能并不限于镇压强制劳工暴动一点。如今日本政府以没有资料为借口，矢口否认许多战争罪责，却丝毫不提战后有意销毁证据的前科，国际社会应该比照作过伪证者缺乏诚信的惯例，严格审查检验其所作所为。

战后日本因为广岛、长崎曾经遭受原子弹爆炸而祈祷和平，每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场面令人万分感慨，尤其是让青少年烙印深刻。可是这样的和平愿景仅仅限于受到战争伤害的日本国民，却不及于战争期间日本的施暴对其他各国国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如今在日本各处战

争纪念地的参观留言簿上，日本和其他各国国民的感想仍然大相径庭。不仅如此，一些带有偏见甚至别有用心者还用某些不具可比性的标准来否定灾难发生的历史事实。由于日本实行严格的国民身份和居住管理制度，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每一位受害人，均有清晰记录，可以准确还原。这固然体现出日本政府管理社会的有效，但是，若将这样的标准拿来衡量战时其他国家的情形，就不仅是强人所难，而且有故意混淆视听之嫌。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及其身份，一些日本学者拟定的标准，多少可见广岛、长崎的影子。然而，当时的南京，军队和流民为数众多，与本地居民混杂在一起，要想逐一确定身份，几无可能。即使南京城内的实际居民，也缺乏详尽准确的管理。而出现这样的状况，中国政府固然有管理不善之责，日本政府及来华日侨也难辞其咎。

中国原来的城乡社会，并没有清晰界限，流动性很大，又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战前日本来华人士利用这一空隙，四处活动，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民政府统一后，加强集权统治，要求境内的各国侨民及其所办各项事业如报刊等进行登记注册，以便加强管理监控。对此，其他各国侨民基本照办，而日本却坚决抵制，使得此项制度难以推行，这也是造成中国城市战时人口失控的原因之一。凡此种种，使得南京等地要想像广岛、长崎那样准确还原被害者的人数身份，至少目前条件下难以做到。如果罔顾相关事实，则今日的日本岂非仍有利用当年侵略战争的创伤来为自己辩解之嫌？而中方学人不加思量，在人数上随之起舞，恰好落入预设的陷阱，实为不智。

另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之际，面对日本的强大压力，国民政府自知难以单独抵御，千方百计将以欧美为首的国际势力拖入战争的漩涡，以求形成国际阵线，共同对敌。为了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国民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宣传攻势，除了战时一般状况下将敌方妖魔化的普遍做法外，一些机构还制造了一些极具视觉心灵冲击效果的宣

传品，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研究者对此应当仔细辨析，若是随手拈来，非但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成为对方的口实，使得其他可靠证据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仅就中日关系立论，甲午之战后来被认为是中国一步步跌入半殖民地深渊，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可是从后来朝韩的立场看，甲午之战却是老大中国与新起日本两国争夺东亚控制的区域霸权，无论各自的胜负如何，并没有改变其他东亚国家的地位，因而不过是新老帝国的争霸战。像这样完全用后来殖民体系的观念看待原来东亚的宗藩体制，未免误读错解了设制的本意及其运作的实情，令古人抱屈于九泉之下。诸如此类的格义附会虽然是近代以来学界的普遍情形，还是应当全面检讨。当然，从东亚各国的多边关系着眼，甲午之战前后中日关系或隐或显的变动，的确绝不仅仅意味着两国地位的升降浮沉而已。随着视角的调整与扩大，从不同古人的现场重新解读史事，才能避免格义附会和执于一偏。

四、不宜简单地将中日两国看作相互对立的统一单位，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晚清朝野上下对日态度各异，政府内部也分成不同派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政治分裂，南北各方均与日本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政府外部还有逊清皇室和其他政治势力。政坛军界，更是山头众多。国民政府统一后，内部仍然派系林立。受此影响，各自的对日关系及其态度，复杂多变。有时彼此以对外关系为指责对方或其他方面的口实，而自己一方却暗中也在从事被公开指责的密谋。例如1930年代两广方面公开主张抗日反蒋，蒋介石则指其联倭反蒋。考察各方史事，两广的确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举抗日旗号，很大程度是要令掌握国家政权的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同样，日本方面亦存在多种派系，政界党派分立，轮流执政，军界各军兵种之间彼此矛盾，对华态度政策也有分歧。朝野上下的态度行事更是多有差异。即使都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华北派遣军以及华中方面，均各有所图，纷纷企图插手其他的管辖范围。扶植“满洲国”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深受内藤湖南思想言论的影响，对中日两国的现状均致不满，试图以“满洲国”为模范，建设新国家，因而新京等殖民地往往成为日本首先实验新设施开展新建设的地方。对于日本内部各派势力的差异，中国学人往往好以左中右派划分，存在以我画线的偏蔽，不能理解各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关于大陆浪人，被指为左翼的宫崎寅藏与被称为右派的犬养毅、头山满之间，实际上关系相当密切。而日本皇室成员中却有对于战争行为的不同声音。类似的情形，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仍然依稀可见。

五、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从某一特定角度考察中日关系，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不仅拿捏得当，而且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受后来分科观念的影响制约，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分科领域当中取径观念有时大相径庭，使得认识历史问题的本义反过来屈从于分科的观念，导致本末倒置的怪象。如明治初期借由西学而产生的新观念系统逐渐生成，对于东亚后来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具有长期的根本制约作用。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之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话语权的格局。这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宪政时期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朝的决策层出现非东学莫属的情形，而且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此后中国人实际是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用汉语念出来的明治新汉语，本来是对应西文，却又借助中国古典，结果在东、西、中三方的系统中引起许多的格义附会。

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相当于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参考、借鉴甚至模仿东学著述，仍是相当普遍的情形。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与“西”相对的是“东”而不是“中”，便是东西两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时日本对华野心日渐暴露，加上“二十一条”的刺激，国人一般不愿称引所参考的日文著述，这也是坊间出现甚多国人著述抄袭日本学人著作传闻的重要起因。

受此制约，国人一方面得以重建重估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则深陷日本式的对应西学解读中学的缠绕和困扰。迁延演变至今，这些概念名词已经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认识前提或工具，在用作古今沟通以及今人彼此交流的凭借的同时，产生了不少看似异口同声实则各说各话的现象。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意本相。在分科治学的架构下，这样的问题很难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把握，必须综合考察，才能认识清楚。

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有限，自有其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处于东亚的中心主导地位，与一直用心学习仿效中土的日本，彼此认识对方或他方的心思态度自然有所差异。虽然中国始终与外部保持联系，并且一直尽量吸收外来文化，却是以我为主的同化。这种情形使得近代以来中日在面对西方以及彼此交涉时态势不同，中方常常处于相对被动的不利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屡战屡胜，国力日益强盛，对于中国的觊觎越来越明目张胆，可是由于中国的朝野各方分别得到过日本各种势力的帮助，不少人对于日本抱有幻想，希望借助东瀛达成自己的政

治目的。直到“二十一条”事件发生，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的支持，不过是别有用心地挑动中国人内讧，以便坐收渔利。

这样的醒悟难免掺杂后见之明，却引起国人研究日本的广泛热情，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研究日本的团体组织如雨后春笋，报刊开辟专门栏目，或是创刊专门的日本研究杂志，大学增设了日本语的学习和日本研究的科系。其所做研究的水准高低姑且不论，在激发国人对日关注以及鼓动反日情绪方面，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以致后来日本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对反日的宣传进行压制。这些对日机关团体及其研究宣传活动，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进入今日学人的视野。

六、应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来，列强当中，唯有日俄对于中国抱有领土要求，野心最大，因而为害最甚，最应当警惕。留日学生甚至早就有日本为中国宿敌之说。即使被视为亲日派的知日派，内心也深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只是对于战争的结果表示悲观，所以才千方百计地避战，或是尽可能延缓正面冲突对抗，以便争取强国强军的时间。可是，综观近代历史，实际上为中国提供各方面的必要援助，又以日俄两国为多。梁启超自从戊戌政变亡走日本，便与日本朝野上下建立了广泛联系，希望通过学习日本来学习西方，全面以日本为楷模，并且相信日本人士援助中国的真心。直到护国战争期间，才觉悟到日本各方支持中国的不同势力，都是为了实现控制中国的野心。其形形色色的援助与收留，背后均有深远的利益要求。

日军侵华，对于中国造成的财产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战时战后都极为引人关注。抗战期间已经有人论及此事，并且在极端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努力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国民政府自光复之日起，就展开了财产损失的普查，可是调查统计的范围主要限于直接损失，如房屋

设备物品的毁损、各种矿产等天然资源的掠夺以及文物的破坏劫掠等。照此标准，无论数目多大，今天看来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中方不断有人重提赔偿的旧话时，日方也有人试图以赔偿方式还清历史孽债，希望从此摆脱历史罪责的负担和困扰。

其实，抗战期间日本占领当局实行的资源掠夺，对于中国绝不仅仅意味着暂时性的巨大破坏，而是对各地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根本性制约。例如广东，战前陈济棠主政时期，曾经聘用欧美专家制定长期和阶段性经济发展规划，并据以实施经济建设。由于条件限制，起步阶段必须依靠各种资源的开发输出，以换取建设资金。日本占领当局的破坏性掠夺，使得该省永远失去这样的条件和机会，直到数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才找到新的发展契机。如果只是统计直接损失，无异于轻描淡写沦陷区遭受殖民统治的社会惨痛现实。必须对战前、战时与战后的社会发展进行整体考察，才能深入认识战争对于中国造成的巨创是如何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的。

第二节 史料的整理与解读

鉴于以上所论，为了大幅度提升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当务之急，应当努力提高研究者的素质，大力加强资料建设。对于中日关系史料的整理出版，应当尽可能在时段和层面上做到全面系统。最为理想同时也最具可操作性的方式，是在全面调查掌握国内外所有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覆盖完全的整体大框架，进而设置有机联系的合理分支结构，以求“竭泽而渔”地囊括所有时段、层面和类型，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动整理出版工作的展开，最终达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条理系统的境界。就观念和当前的需求而论，应特别注意以下方面：

其一，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这里并非指日本出版的中文书籍，而是幕末明治以来日本人士用汉文写作的著述。现在日本研究日本史的学人利用汉文多少存在一些困难障碍，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人则一般并不重视日本的汉文书。作为中国史研究，日本人撰写的汉文文献固然价值相对较低，可是对于日本研究尤其是中日关系研究，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明治乃至大正时代，不少日本人用汉文记日记或写游记，尤其是来华游历之际。今日的日本学者，包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在内，利用这些资料存在不小的困难，即使翻译成日文，对于相关人事乃至文本字义，也每每发生误会。

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幕末明治思想家如中江兆民等人都有汉文著述，有的还有汉文文集，如岛田重礼的《篁村遗稿》，中村正直的《敬字文集》等。岛田重礼作为汉学家，用汉文写作当在情理之中，其观念上或有落伍之嫌，不受重视可以理解。而中村正直是明治六大思想家之一，其日文著述以及所翻译的西书，受到日本明治思想史研究的充分重视，可是其线装本的汉文文集却很少有人利用。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兼采中、东、西学，且通过汉语古典理解西洋，忽略日本人写的汉文书，不免片面，不仅会漏掉许多关乎大节的重要信息，而且难以深究相关的论说。例如关于日本的“支那哲学”如何发生，中日两国的研究者长期努力，依然不能找到确证，而存在于前述汉文文集中的关键证据，却一直被忽略。

明治时期即使不用汉文写作的日本人士，要想承接对应西学知识，也离不开程度较高的中文典籍和汉语词汇。在这方面，井上哲次郎编辑《哲学字彙》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哲学字彙》所收词汇，较弗列冥（William Fleming）的《哲学字彙》增加一倍有余，经过几度调整，逐渐形成并固定了一整套表达新知识的专门术语。尤其重要的是，诸多学科知识概念的发明者西周助虽然使用汉字，却并未刻意从中国典籍中寻求对应式的解读。而井上哲次郎等人

从儒佛经典取名定义的解取向，与西周助明显有别。《哲学字彙》并未详尽注出所依据的中国文献，除井上哲次郎的“绪言”指名的几种之外，注释中提及的相关经典包括《易经》、《书经》、《庄子》、《中庸》、《淮南子》、《墨子》、《礼记》、《老子》、《传习录》、《俱舍论》、《起信论》、《圆觉经》、《法华经》以及杜甫、柳宗元的诗文，涉及的词汇有形而上、转化、俱有、解脱、凝聚、轮回、伦理学、无限观等。其余广泛参考的儒佛诸书，因各词条未加注释，无从查考。此书对于哲学的普世化以及“东洋哲学”或“支那哲学”的合理化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相关问题仍然在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意见分歧极大。^[3]

其二，应有效整合及利用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今日中国学人研究中日关系，往往喜欢到日本去寻找日文文献，误以为日本文献理所当然地主要保存在日本。实则涉及中日关系的许多重要文献不一定都在日本，不一定都要到日本才能找到。这种灯下黑的情况，使得研究者严重忽视在中国各地各机构保存的日文文献。实际上，中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之类的机构，不仅收藏了数量巨大的日文文献，而且有的方面较日本的收藏更加丰富完整。

例如，日本关于中国情况的各种调查报告，以往学界主要利用满铁的惯行调查，而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调查，由各个机构系统分别进行，除了满铁之外，日本领事馆、东亚同文会、兴亚院、军部特别班以及各大会社（有时以个人研究室的名目出现）、占领军当局都会展开调查活动，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日本领事馆按照各馆的地区分布，将中国整体划分为若干区域，其调查活动长时期、有系统、全方位地持续进行，并定期刊印调查报告，其内容包含人口、交通、出产、贸易、资源等多项详细信息，虽然每期分量有限，累积起来，则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覆盖完整。相比之下，东亚同文会虽然也由

各分会划区分片负责，但是分会数量较少，各自负责的区域面积大，无法长时期、全面系统详细地进行调查统计。当然，东亚同文会也有其特长，如关于南中国的调查较早，有的方面相当深入。该会清季对广东缫丝业的调查统计，甚至超出中国官府的掌握。对于海南岛的调查也发端甚早。而军部特别班关于山西各县妇女缠足率的调查统计，其完整详尽程度堪称首屈一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查报告战前战时大都属于“极密”文件，战后局势急剧混乱之际，部分散出，日本各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只有零星收藏，即便已经公开的外交史料馆、国会图书馆等处亦无完璧，反而中国的个别图书馆集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底本，虽然同样不全，却已是这方面有数的收藏。可惜中国所藏此类文献受到种种限制，开放度很低，难以利用，使得学人在灯下黑的惯性之外，还不得不舍近求远。这些因为各式各样的因素而形成的限制，固然有其可以理解的理由，但也造成严重后果：其一，由于能够接触使用的各类文献不足，尤其是外文文献缺乏，又没有条件到世界各地寻访资料，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学人在国际学术界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即使近年来条件大为改善，普遍而言，外文文献不足，以至于利用能力不强，已成整体提升研究水准的瓶颈。其二，无法利用相关资料，积极主动地揭穿日本方面故意湮没战争罪行证据所做的手脚。例如国内一些档案馆藏有不少关于强制劳工的资料，若能及时披露，战后日本政府的掩饰便难以奏效。

此外，从1890年到1931年，日本人在中国至少创办过260种报刊通信，包括中、日、英、俄、韩、蒙等多个语种，有日报、双日刊、半周刊、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年刊以及通信等多种类型，分布于奉天、上海、青岛、天津、北京、大连、哈尔滨、济南、汉口、安东、长春、铁岭、厦门、福州、广州、汕头、重庆、思明、烟台、江西、香港等地。在日本本土，也出版过专门针对中国

读者的中文报刊，如《华文大阪每日》。在日本占领的台湾，则同时出版了日文版和汉文版的《台湾日日新闻》。日本在华传媒的势力还特别体现于通讯社的组织与营运。民初北京政府时期，袁世凯当政及军阀混战期间，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急剧上升，实际上控制了中国官方的资讯。识者指出：“中国的内战，给日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种机会，把持国内新闻凡十余年之久。”^[4]直到北伐成功，北京政府倒台，日本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势力才随之崩溃。^[5]

自晚清始，来华日本人及在华日本机构就在中国搜集书籍文献，除运回本国外，还在中国各地设立图书馆资料室，持续时间长且效果显著的如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满铁图书馆、新京图书馆、天津日本图书馆等。作为支持海外扩张以及推进“皇民化”的重要一环，日本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包括伪满洲国、朝鲜、台湾在内的殖民地图书馆赠送日文图书。战后这些图书大都归入当地图书馆。此外，从1920年代起，日本各学术机构就陆续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所等机构建立起常规化的资料交换机制，而中国方面则加强对日问题的研究，成立了为数众多的对日研究团体机构，陆续收藏了丰富的日文书刊。

日本侵华期间，除了搜集中国的图书资料外，在华的日本官方和学术机构出于种种动机目的，还在占领区各地专门设立了军事性或半军事性的图书资料整理机构，进行各种形式的编制工作。昭和十五年即1940年，设于上海的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就组织兴亚院、满铁、中支振兴、华中矿业、华中铁道、华中水产等机构召集专家，利用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图书整理部的2600种中文杂志，选取其中350种杂志所载重要论文编制出版《支那文雜誌内容索引目錄》，该事务所所长清水董三所定“凡例”称：分类旨在实用，不拘科学分类。所谓实用，其实就是掌握中国各方面的详情，以便进行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并计划续编另外400种杂志的内容索引作

为第二辑。这些以中文为内容的目录索引书，一般收藏机构依据书名、编者等信息，也分在日文图书之列。

总之，中国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量不等地收藏了各类日文书刊，虽然分开看每一单位均谈不上完整，但是全面整合，则相当丰富，而且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一些重要机构的收藏。有鉴于此，应当适时调查各地馆藏的所有相关资源，进行整合编目，以便系统整理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其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由于分科治学的制约，一些对近代中国影响重大的日本人士，迄今为止仅在不同的分科涉及其人其事之际略有触及，缺乏全面综合的研究，以致很难真正理解其言行。不仅中国方面如此，日本学界也存在类似情形。如晚清民初长期在华担任顾问的有贺长雄，日本编辑其文集，仅包括关于日本法政方面的内容，而关于中国方面的大量论著则付诸阙如。而中国方面的研究，则仅仅提及几篇与清季民初宪政尤其是袁世凯称帝问题有关的文字，望文生义的指摘，与理解本意差距不小。

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是该校创始人冈仓天心的弟子。冈仓天心与井上哲次郎是东京大学的同学兼舍友，与井上将哲学普世化并使东洋哲学、支那哲学合理化相类似，冈仓天心是明治日本创立所谓与西洋美术对应的“东洋美术”的最重要人物。此事后来看似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但在近代的东亚，在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之下，人们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这样的对应一方面可以面向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一方面则有助于在东亚取得话语权。冈仓天心倡导“东洋美术”，目的之一，就是重构以日本为中心正统的东亚美术传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传统“美术”的地位。而后来中国的学人如陈师曾、蔡元培、顾颉刚等，正是在冈仓天心的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下，重新确立了文人

画以及古代雕塑的美术价值，才避免国画陷入国学、国医等等国字号事物所遭遇的同样尴尬，并且亡羊补牢地开始保护硕果仅存的历代文物。当然，如此一来，也难免用了西洋的美术眼光重估固有的作品，并陷入日本式话语的笼罩支配。

诸如此类跨越两国的历史人物，要恰如其分地理解其言行，必须将两面的资料事实联系贯通，才能认识其思想理念。应深入了解他们在明治日本的各种学历阅历等活动交往，认识其人，尤其要关注其长期在华以及与中国有关的言论行事。中日双方若各执一偏，要想认识到位，相当困难。中方至少应将他们有关中国问题的所有文字编辑成书，与日方编辑的资料相互参照印证，才能避免由于学科有别、国家各异以及视角不同而导致的各说各话，切实推进相关研究。如此，见仁见智才不至于成为盲人摸象的遁词。尤其像大村西崖，日本的中国史和日本史研究均视而不见，美术史研究也鲜有论及，更不要说其对中国的影响，而中国学术界，也只有在陈师曾、顾颉刚等人的年谱传记之中，才略有涉及。

近代日本来华人数众多，军人、商人、学人、浪人、记者等，或走马观花地游览，或无孔不入地调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城乡各地，乃至深入西南西北边陲，采访会见各界的名流闻人，或在大杂院里一住经年，撰写了大量游记、报告、散文、小说、访谈录以及学术专著。这些一定程度上具有情报价值的文献，虽然成为各种专题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但是就中日关系研究的整体而论，它们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具有什么价值，由于未经系统汇集梳理，未免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实际上，这类文献对于近代中国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例如，清代以来商帮对于各地的经济贸易乃至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重要，可是商人的自用账本却很少留存示人，抗日战争以前来华的一些日本学人，由于各种机缘，有幸得窥庐山真面，并将亲眼目睹记录下来，成为后来者接近历史的重要凭借。

一些来华日本人士背后多少有些政府背景，或者说，作为身在异国的日本人，不可能脱离与本国政府的关系，用后来的观念眼光审视理解，如果不注意回到历史现场，很容易解读过当。或者据大连博物馆所藏某日本人士的日记，指来华多年、后任职于满铁图书馆的松崎鹤雄恶意攫夺嘉业堂珍本图书，并指松崎鹤雄本人受日本侵华机关指使甚至代表侵华机关。而据相关当事人刘承幹以及与松崎鹤雄交好的邓之诚的日记所记，再参照松崎鹤雄与陈垣等人的来往函札，则显示从清季就来华、师从湘中大儒王闿运学习中国学术文化的松崎鹤雄，对于中国甚有感情，与中国学人广泛结交，且能够尊重中国学人的人格。至于嘉业堂收藏的珍贵文献，松崎鹤雄其实是在特定的情势下利用各种关系试图保护，仅仅依据片面的记载斥为攫夺，未免言过其实。战后松崎鹤雄被迫返回日本，临行恋恋不舍，怆然就道，还违反约束，怀揣一部中国古籍，其事不可取，其情可悯。回国后松崎鹤雄其实相当寂寞，虽然身边有柔父会的小群体，但对于自己在华期间的交游作为，很难向同胞完全敞开心扉。对此，相关研究应该更进一步，追究各人与本事的关联，以及其何以如此记录，进而多层面地探究本相。

与之相似的还有曾任东京大学副教授、上智大学教授的鸟居龙藏，这位清季就到中国台湾和西南边疆进行民族调查的人类学家，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中国担任教职，燕京大学的中国学人其实是为了抵制日本占领当局派人来校主政，才特意请鸟居龙藏到燕大任教。局势更加恶化之后，燕大的师生陆续被捕入狱，鸟居龙藏虽然很难从根本上反对日本的侵华行径，却对占领当局的暴行不满，对中国同行的遭遇表示同情。战后鸟居龙藏仍然滞留中国，直到1951年才返回日本。虽然1970年代日本编辑出版了鸟居龙藏的全集，可是关于中日战争期间其在华的经历，几乎是一片空白。其故乡德岛修建了鸟居龙藏纪念馆，可惜同样缺少这方面的内容。

其四，沦陷区的资料，语种包括中日文和其他西文，类型则有档案、报刊、日记、函电、文集等。在整个中日关系研究中，沦陷区的研究尤其显得薄弱，相对而言关注稍多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由于资料不够充分，有关论著，也难免错误百出。1981年出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依据编辑者所定“编例”，“仅收录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品种”。“至于纯属反动宣传、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不予收录。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录。”也就是说，编者当时看来，沦陷区军政机关的刊物毫无学术价值。可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从1985年底起，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持，全国56个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参加，编辑了一本补充目录，共补收期刊16400余种。与1981年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相比，数量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有余。其“编辑说明”还特意强调，补录的部分包括原来认为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刊物”。

抗日战争期间的沦陷区，除了日伪机关所办报刊通信外，一些具有日伪背景的团体组织或人员也创办了不少报刊，仅以涉及文史掌故类的为例，就有《中和》、《大风》、《古今》、《天地》、《风雨谈》、《子曰》、《朔风》、《逸文》、《学文》、《艺文杂志》、《文史》、《雅言》等。这类刊物的出版，背后难免有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侵略政策调整的需要。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除了继续使用武力高压手段外，吸引中国人士，培植文化汉奸，制造中日共荣的假象，成为当务之急。长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的北京，作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曾经聚集了大批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士。战时不少人因为种种缘故，滞留沦陷区。日伪在北京的文化统治、文化组织与文化政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和华北文教界的地下组织与活动，以及沦陷区各界人士对于各种政

治势力的态度关联，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工作、情绪、心境等等，以往的研究很少触碰。文学史的研究涉及稍多，其余只有在牵扯个别人物的汉奸问题时，才会有所提及。

如此一来，不要说深入研究，就连一般性地了解相关史事，也很不容易。近年来关于华北沦陷区的问题逐渐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日渐增多，如果不能予以重视，很难掌握发言权，更不要说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例如伪北大问题，牵涉的学人以及牵扯的史事甚多，抗战光复时曾经因为处理办法或有过当而引发激烈冲突，成为不少在世之人的心中之痛。除了研究周作人、容庚等人时有所论及，整体的情形缺乏深入探究。此事涉及战后关于文化汉奸的处理审判，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问题，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一大难题。近年来虽然有所研究，但错判事实甚多，断章取义之处也不少，且未能贯通所有问题和时段。对此人类历史上并非常见的文化现象，从其他文化系统的观念加以解读，毕竟隔靴搔痒，而在本文化研究失位的情况下，他者的解读势必占据主导，以致混淆视听。

扩而大之，抗日战争期间沦陷于日寇统治的地区不仅是华北。除了西部，中国广大区域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被日本占领，并建立过伪政权。由于战争迅速结束，各沦陷地区遗留下来大量日军和伪组织的档案，后来分别归入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甚至公安局等系统。在沦陷区的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这些档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充分开放，因而接触使用者为数不多，有的甚至未经系统整理，具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其中固然不乏日本国内保存有诸多副本的印制文件，也有许多连日本也没有任何记录的原稿底本。

其五，应当以影印的形式，大规模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方便并且促使研究者直接使用日文文献，以便切实推进相关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状况，大

幅度提升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中日两国学术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显著差距之一，就是利用和理解对方文献的程度一般而言很难同日而语。其中当然有过去经济状况反差明显等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作用，但是中国学人的日语能力不足则是无可避讳的主观原因。能力有限，接触不够，自然解读不深。以近代中日关系文献的丰富程度而论，如果都要翻译，既不现实，亦无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想方设法改变研究全靠翻译的非正常现象，大力促使所有相关学人使用原文文献。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充分利用中日双方的各种资料，使得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全面提升。为此，保存于中国的图书、报刊、档案、函电、日记、图册、照像及其他未刊稿本，都应当全面系统地影印出版，方便研究者接触使用。随着利用条件的改善，自然会促进语言学习的需求增长，并推动研究者素质的提升。

此外，一些关于日中关系的大型文献汇编，因为读者有限，成本又高，在日本出版颇具难度，也可以争取在中国出版或再版。如近代日本人的来华游记，总共大约有500种，东京大学的小岛晋治教授编辑出版了明治时期10册，大正、昭和时期各20册，收录了其中的相当部分，还有不少因故未能刊出。而近代中国人的日本游记，东京都立图书馆的实藤文库收藏加上其他中日各馆所藏，大约有350种，迄今为止出版的还不到一半。诸如此类的文献为数甚多，均为研究中日关系的重要凭借。只有打破资料壁垒，使其便于利用，促使研究者掌握相关技能，近代中日关系研究才能得到坚实的基础支撑。

在这方面，应当分别收藏家与研究者对于文献取舍眼界标准的差异，适时变通有关部门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观念办法。依照黄侃、钱锺书等人对于版本的意见，以及傅斯年史料越生越好的说法，应当采用影印的形式，尽可能保持原状，减少所谓增加学术含量的加工过程中很容易造成的诸多错误。要抓住未来十年左右的良机，通过大规模电子化或影印出版，多快好省地一举突破抢救性保护与研究急需的两

难困境，最大限度地夯实研究基础，争取掌握中日关系研究的主动性和主导权。

其六，在以多种形式大规模编辑刊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聚合中日两国高水平学人，编辑大型《近代中日关系史事编年》，尽可能将涉及中日关系全过程各层面各领域的资料汇于一炉，相互比勘印证，力求近真并得其头绪，有效地改变近代中日关系研究在取材、时段、问题、方面等往往执于一偏的状况。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的材料史事，确立检验中日关系研究的标尺，改变将随心所欲当作见仁见智的状况。

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话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地理接近、利害关系、文化冲突等因素的作用，一些国家彼此成为宿敌，长期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争斗。英法、德法之间，都曾长时期经历以战争为极端形式的激烈冲突，试图用武力的方式彻底征服对方。经过反复较量，各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仍然势均力敌，终于认识到无法凭借武力改变彼此关系，必须另谋生存之道，才能获得相对的稳定，最终通过相互妥协磨合，实现了和平共处。

在近代东亚，中日两国同样成为宿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期对抗，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局势早已今非昔比。但是迄今为止，两国仍然未能找到适当的共处双赢之道。在国家利益至上的主导下，持续尖锐对立或许难免一战。而就双方的根本利益而言，冲突势必对两国的社会以及彼此的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使得第三方坐收渔利。两国的有识之士，应当设法寻求从根本上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使得世仇变成睦邻。

诚然，军事准备可以说是通过防止战争甚至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和平。近代中国由于积弱不振，面对强权逞强之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遭受长期困扰。退一万步说，即使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知己知彼也是百战不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此看待战与非战的关系，才能最终找到和睦相处的长治久安之道。

如今的时势，不同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决非仅有武力一途。在各种形式的国际舞台上，较量角逐时时刻刻都在展开着。缺乏高明的研究，势必严重制约学术、法理和舆论，使得自身在世界上处于不利地位。1931年陈寅恪于国立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之际，撰文论述“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就图书文物的收藏利用局限学术研究的状况痛加针砭，对于今日的中日关系研究以及应对中日关系的问题颇有借鉴意义，他说：

关于本国艺术史材料，其佳者多遭毁损，或流散于东西诸国，或秘藏于权豪之家，国人闻见尚且不能，更何从得而研究？其仅存于公家博物馆者，则高其入览券之价，实等于半公开，又因经费不充，展列匪易，以致艺术珍品不分时代，不别宗派，纷然杂陈，恍惚置身于厂甸之商肆，安能供研究者之参考？但此缺点，经费稍裕，犹易改良。独至通国无一精善之印刷工厂，则虽保有国宝，而乏传真之工具，何以普及国人，资其研究？故本国艺术史学若俟其发达，犹邈不可期。最后则图书馆事业，虽历年会议，建议之案至多，而所收之书仍少，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况中西目录版本之学问，既不易讲求，购置搜罗之经费精神复多所限制。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见，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人之得所窥，其幸而见收于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待善价而沽之异国，彼辈既不能利用，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

在陈寅恪看来，包括上述各节在内的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6]。七十余年过去，中国学术的状况大为改观，

但是所论述的诸多情形，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果因为资料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相关领域学术水准的难以提升，进而造成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不要说是否应当追究妨碍中国学术独立的罪责，至少必须检讨反省由于历史原因加诸文献文物利用方面的各种限制和必要的利弊得失，不能以不急之务视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否则，看似小事一桩，却势必对国家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深远伤害。

概言之，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要想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地位，应当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大幅度提升现有水准。要从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不宜简单地分别视为统一单位。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仅从特定角度进行考察，并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

资料方面，要在全面调查掌握国内外所有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覆盖完全的整体框架和有机联系的分支结构，以求“竭泽而渔”地囊括所有时段、层面和类型，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动《近代中日关系文献集成》的编辑出版，最终达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条理系统的境界。而当务之急，应着重编辑出版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以及沦陷区各语种各类资料，有效地整合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并大规模影印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

[1] 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4页。

[3] 《哲学字彙》、《改訂増補哲学字彙》和《英独仏和哲学字彙》，均为名著普及会1981年复刻版，由飞田良文解说。

[4] 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印发行，1932年版，第16页。

[5] 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引自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601页。

[6] 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2—363页。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第一节 旧说之疑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即公历1896年6月15日，刚好是中国的端午节，清朝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异乎寻常地出现了13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2]

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近代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帖，并非没有疑义。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扶桑。其二，它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正式发端，在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三，它显示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认识到向战胜国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其四，它是近代中国向外国学习进程中的一个界标。派遣留日学生及其队伍的不断扩张，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而且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表现出开眼看世界视野的拓展。

确定近代留日学生运动的发端，应当从以上几方面通盘考察。实藤惠秀先生正是想指出这些意义，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述了日本舆论界的有关评论。可惜所引《太阳》杂志的两篇文章，都是1899年后的作品，不能说明1896年这13位中国青年出现于日本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这一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这13位青年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翬（字元丞）、吕烈辉、吕烈煌、冯闾模、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清政府何以要派遣这些学生东渡？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国向日本派驻公使之始。

1877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驻日公使，在东京设立公使馆。起初以为“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3]，结果却洋相出尽。一年后，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抱怨：“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和舛，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不得不“暂觅通事二名”，并要求驻横滨、神户、长崎等地领事：“就地觅一通事，以供传宣奔走之用。”^[4]这样的因陋就简显然有损于堂堂大清国钦差的体面，不利于沟通内外之情。所以继任公使黎庶昌就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奏请招致学生设馆肄业，以三年为期”^[5]，具体做法是在使署西侧设立一所东文学堂，“专为学习翻译”，于1882年11月正式开馆。以后即沿为定制，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才一度中断。

使署东文学堂成立十余年，成效甚微。后来的驻日公使裕庚评价道：

既专为学习翻译而设，不过学至翻译而止。入手之初，并未尝计及深造。学堂既设在使署，去高等师范甚远，无所折衷，一教众咻，事事皆从简略。名师既不相就，学生则饱食而嬉，以致成材甚少。使臣虽日加督责，而众人视为具文。又所定章程，奏明拨充学习翻译后

照章褒奖，并可分派各口充当翻译，于是学生甫满三年，知此捷径，群思弃而之他。既到各口后，又复荒其本业，不加温习，一经传语，动辄貽笑，翻译东文，错谬多端。^[6]

总而言之，使署东文学堂不但有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种种痼疾，成效也乏善可陈，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尽管裕庚的话不乏官场中司空见惯的贬低前任的恶习，以及在变法浪潮之下的自我吹嘘，但这些话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实情。

甲午战后，裕庚接任驻日公使，于1895年9月抵达东京，不久即着手恢复东文学堂。他与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多次商议，认为在使馆内设立学堂不如将学生送到日本学校附读较为切实，遂将此意报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次年4月，总署奏请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裕庚派已预定为横滨领事的湖北补用知县吕贤笙前往上海、苏州一带招收学生，往返两月余。1896年6月15日，吕贤笙率领选定的13位青年抵达东京。他们在清朝驻日使署寄居半月后，于6月30日入校学习。

按照中日双方事先达成的协定，这批学生的日语及相关知识教育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由其和裕庚共同在高等师范附近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由本田增次郎任东文监督，町田弥平为东文教师，两人的束脩以及学校的全部费用由清驻日公使负担。开始这些学生连假名也不认识，以后课程逐渐增加，共分为两类，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和晚上由教师教授或自习外交史、日本文法、日本尺牍、汉文、日文书写以及阅报等，下午则到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地理、初级高等物理、高等初级数学、历史、兵式体操。^[7]

由上可知，这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还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学校负责部分教务；所学课程则

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也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学校附近的一座校舍。

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首先，培养学生的目的没有变，仍是训练为使馆服务的翻译人才，因而官方继续称之为“东文学生”。直到1898年，清政府没有再派学生留日，裕庚也未提出这种要求。因为10名翻译已经足以应付使馆的业务需求，而清政府并没有将他们改作他用的意向。课程设置主要还是学习日文，学习基础课程，最初不过与京师同文馆一样，仍是为了翻译上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变法运动的兴起，所培养的东文学生才逐步扩大用途。

其次，学堂及学生的隶属关系没有变，学生并不是直接进入日本学校，而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外面单独设立了一个附读班，这样既便利了学生的学习，又保证了使馆的权限。不仅全部的学生学费、教师薪水和学堂费用由使馆承担，^[8]而且每隔一星期要将学生接回使署面加考验，“教师教导不力者，告知学校长更换；学生怠惰荒嬉者，由学校长转告使署撤回”。其中三人不久即因“纨绔性成，紊乱规则”，受到“登时撤令内渡”的处分。^[9]甚至学生患病也由使馆接回调理，并负担一应车、饭费用。

东文学堂的复办及其变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对日观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甲午一战，清朝水陆两军在历来不为中国士大夫所正视的“倭寇”手下惨遭败绩。但是，统治集团的君臣们，包括以“求新”自我标榜的洋务派，都没有向自古就从中国引进文明的战争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胆识。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早已使清朝感到震动。特别是历届驻日公使，耳闻目睹那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意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一大威胁。首任公使何如璋即实际上承认明治维新是“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10]，继任黎庶昌也感

到日本“近年事事讲求，海陆两军，扩张整饬，工商技艺，日新月异，物产又极富饶”，“其力量几与西洋次等之国相敌”。^[11]然而，要放下大清皇朝钦差的架子向“倭夷”屈尊求教，实在是他们不敢也不愿想的事。

晚清强邻环视，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对于中国的主权完整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地理相近而有领土要求的俄国和日本，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曾导致一部分洋务官僚倾向于联合日本，以抗衡其他列强。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主张与英日结盟反对沙俄，形成一个松散的联日派。但他们更要维持居高临下的门面，自欺欺人地说日本是易于笼络的小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大臣们很难正面提出学习日本的方略政策。尽管他们出于办理洋务的需求，可以向日本派遣少数留学生。

敢于公开提出学习日本，是维新派的功绩。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进行比较，明确指出二者的优劣是非。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公开把日本由变法而强盛的事实作为范例，而且在制定变法方略时，不同程度地参照借鉴了明治维新的模式与经验。不过，甲午战争前，就是在这批人的心目中，也还或隐或显地包含着对“区区三岛”的轻蔑之意，因而在承认明治维新成就的同时，多少保留了几分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

甲午战败的惨痛事实，打破了洋务运动三十年国防“深固不摇”的神话，人们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华洋之分在西洋之外，又有了东洋。只是这时中西虽然已经乾坤颠倒，但战败屈辱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悲愤情绪和同仇敌忾心理，使人们一时还不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不知如何正视战胜者。而三国干涉还辽成功所引起的远东局势新变化，又给沙皇的狰狞面目蒙上一层柔光。在统治集团中占上风的亲俄派固然奉沙皇为救星，就连带日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来了个180度

急转弯。刘坤一上书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正式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误。他说：

或谓俄与中国接址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以臣愚见，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

因而建议，从今以后一

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12]

在朝野上下一片联俄拒倭的喧嚷声中，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学习日本的口号。1895年，张之洞奏议战后补救之策，建议派遣留学生，也仅以欧美为念，没有提到日本。裕庚后来自称到东之始，即以为“翻译不过学业之一途”，俨然已有“振兴人材为本原计”^[13]的设想，未必属实。他讲这番话时正值变法运动高潮，意在邀功，并非真有维新志。裕庚任期两年内东文学生人数只减不增，就是对他的说法最有力的驳斥。

由此可见，1896年戢元丞等人东渡，既不是甲午战争刺激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认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因而鼓动留学日本的产物。甲午战争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的确大大激发了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和变革决心。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如果把战后的一切变化都与此直接联系起来，看不到在警醒与学习敌手之间还有一个转变过程，而且其难度不亚于鸦片战后士大夫经历的痛苦纠结，则不免失之简单笼统。

第二节 新说之据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发端定于何时为宜，应当权衡各方面因素。

从中国方面看，产生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比较晚，而日本方面则早就有此打算，特别是日本军政界中一批对华野心不断膨胀的人，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就积极策划利用互派留学生来培植亲己势力。

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根据奉使北京的实际经验，深感对华问题不能付之等闲。迨西南战役以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趁中国首任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等抵达东京的时机，为两国间彼此交换留学生及善邻亲睦起见，特纠集少数有志之士，创设振亚社，不时集会。^[14]

1880年3月，这批人组成了兴亚会，特邀何如璋到会祝辞，并开办中国语学校，教授日本青年。1898年，兴亚会将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徐勤以及自费前往日本留学的维新派骨干罗普吸收入会。^[15]以后兴亚会并入东亚同文会，后者成为日本最积极干预中国留学生事务的组织，并先后在东京和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地开设同文书院。1902年，该会又利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企图取得保送自费生进入日本军校的垄断权。不过，兴亚会提出的互派留学生的计划，由于中国方面持有戒心，长期未能付诸实现。

关于留日学生的概念，并无严格界定，其中不仅有从中国本土去的青年，也包括旅日华侨商民的子弟。有些专为后一类人开设的学校，如神户的同文学校、横滨的大同学校，后来也吸收国内来的学生。而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横滨中华学堂，早在1885年即已创立。^[16]不过，按照惯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将这些学校的学生算作留学生，一是就读于此的华侨子弟进入日本学校，一是国内前来求学的青年。^[17]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使馆东文学生。不仅他人的指称如此，本人的自认同样如此。如唐宝锷、胡宗瀛在留学生题名录上签署的留东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进入早稻

田大学和青山农学校，^[18]而不是1896年6月进入附读班，可见他们本人也没有把1896年东渡视为自己留学生涯的正式开端。

中国最早名副其实前往日本留学的是广东顺德人罗普。罗普，字孝高，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嫡传弟子。1897年，他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次年初“由日本当道举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法科，“讲习万国律例之学”^[19]。据与他同屋居住的日本友人田野桔次说：“当时东京留学生亦未有一人也。”^[20]冯自由《革命逸史》称罗是中国学生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的“第一人”^[21]，其实他也是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人，起码是首批留日学生的代表者。

与之同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前往日本求学。如1898年1月汪康年到日本考察报务之际，就在大阪见到正在山本宪的家塾中学习日语的汪有龄、嵇侃两位留学生。^[22]虽然他们的行动属于个别现象，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开始萌生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意向，预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新趋势，表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罗普赴日是否得到康有为的赞助支持，不得而知。不过，维新派的《知新报》将此事列入“创兴要事”，予以综合报导，称赞其“慨然有志”^[23]，表明了这一派人的态度。

甲午战后，维新人士以战争胜负的鲜明对比为据，大声疾呼变法图强，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24]日军所以屡胜，是因为“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25]梁启超还上书张之洞，提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中国对西学则“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6]，建议效法日本，改革体制课程。一面鼓吹留学的必要与重要，一面比较中日的优劣，自然有助于造成学习日本的舆论氛围。

中国有可能派遣留日学生，也由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有所缓解。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趁火打劫，紧跟着占领了旅大。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给那些曾经对沙皇俄国抱有幻想的官员当头一棒，朝野上下齐声痛斥沙俄背信弃义，亲俄空气一扫而光。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旧调重弹，提出“以兼联英日为要策”。^[27]维新派对此积极呼应。胶州湾事件后，日本参谋本部派人来华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康有为走告翁同龢：“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又为御史杨深秀、陈其璋等草疏请联英日，并作联英日策，遍告朝士。经此事后，“朝士渐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测，自此群议咸知联英日矣”。^[28]康有为趁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直截了当地建议光绪奉日本为楷模，变法图强。汪康年等人也前往日本，试图联合中日民间势力以挽救危亡。这一努力得到以江浙为中心的开明士绅的广泛支持。这样，中国派遣留日学生的主客观条件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借机施展外交和文化手段。1897年底，日本参谋本部军官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先后来华，在武昌与张之洞、江汉关道以及洋务委员等晤谈，转达参谋部川上操六大将之意，诡称：“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强，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请中国派人到日本“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清廷担心引起其他列强的进一步要求，谕令张之洞“断勿轻许”^[29]。但张之洞不肯作罢，双管齐下，一面再次奏陈：“惟彼言深悔前年不应与中国战争，今愿遣我人赴东入各种学堂云云，洞甚嘉许之”^[30]，一面决定让郑孝胥等三人于次年春选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31]

1898年，维新运动声浪日高，日方活动也更加积极。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5月间函告总理衙门：日本政府“拟向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接着又亲赴总署面陈：“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32]

矢野的态度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当他将情况报告外务省请求指令时，外务大臣西德二郎“颇感意外”，认为费用太巨。“然既已表示，已难取消，兹后若清政府对于右记所作表示决定派遣留学生，宜限定最少人数，以观对方回答。希勿由我先为挑动，任其自然可也。”^[33]

不过，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和矢野文雄先后向清政府作出同一姿态，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他们的言行显然反映了日本一些政治势力的意愿，而且很可能受到高层的指使，所以敢于如此独断专行。宇都宫太郎等在与张之洞密谈时即声称：“实系奉内旨而来。”^[34]矢野在复西德二郎的信中，毫不掩饰其野心，他说：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5]

矢野与西德二郎的分歧，并非政策基点的对立，而是步骤方式的差别。所以西德二郎认为矢野的意见“甚善”，只是对巨额经费、来学人选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有所顾虑。

然而，中国方面，朝野上下都把日本的别有用心当成与人为善。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

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

既然日方愿意予以优待，“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选派“贡生监之聪敏有材、年未三十已通中学者”^[36]赴日留学。总理衙门议后奏称：

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送总理衙门，陆续派往。^[37]

只是对任人报名之法有所保留。光绪当即批道：

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勿延缓。^[38]

东洋不仅成为洋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走向西方的重要通道。以后日本政府又“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清廷遂正式下旨：

着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39]

并向日本政府递交国书，表示谢意。至此，派遣留日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正式国策。

一些实权在握的督抚的反应比诸多掣肘的光绪更为敏捷。1898年3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近

代中国最早的官费正式留日学生。同时到东的还有富士英（浙江）、卢藉东（广东）等人。5、6月间，浙江官费生钱承志等4人以及湖北官费生萧星生等到达日本。这一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陆续派出官费生64人，^[40]另外还有毕永年、冯斯栾、范源廉等13名自费生。^[41]有的督抚计划大举派遣留日学生，如张之洞拟“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人，湖南五十人，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42]，湖南甚至已出示招考，后因变法不幸夭折而搁浅。

这时，1896年6月到东的那批清朝驻日使署东文附读生已经学满两年，裕庚奏请将其中可堪造就者拨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东文学堂无形解散。以后，继任公使李盛铎又重新恢复使馆东文学堂，“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43]，以应付政变后尽废新法的局面。

不过，由于洋务派督抚对慈禧“尽废新法”的旨意有选择地进行了抵制，加上许多维新志士亡命日本，此后几年间，留日学生队伍仍在逐步扩大。辛丑和约后，清政府复行新政，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趋新力量。

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如甘肃晚到1905年后才开始派遣，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

留日学生运动一旦发端，就不断冲击着旧的统治秩序，成为整个近代留学生运动的重要分水岭。1904年底，《外交报》一篇题为《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的论说，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分析：

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论者犹以为与前之派西洋留学生等耳，而岂知其后之效，乃与昔大异。昔之留学生，绝无所表现于社会，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新人物。^[44]

这种界标的意义，显然不能从1896年的东文附读生或更早的洋务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在维新运动激励下东渡求学的青年，才会迅速与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参加救国和革命运动。而原来附读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后，才积极投身于斗争洪流。因此，适当调整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更有助于研究其地位作用，进而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1] 这批学生到日本的时间，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记为旧历三月底，而清驻日公使裕庚在向总理衙门呈报的《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中，则指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1896年6月15日）为“到东之日”。旧历三月间总理衙门仅根据裕庚来函，奏准招收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尚未实际选送。

[2] 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1年版）；石锦《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组织》（《思与言》，第6卷，第1期）。大陆有关著述基本沿用此说。

[3] 《东文学堂》，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广智书局1898年版，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 《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设驻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3—1935年版。理事即领事。

[5]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在日所招东文学生毕业后应如何待遇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北平，1932年版。

[6] 《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7]《东文学生逐日现习功课清单》，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8]1897年1月27日总理衙门在奏报此项经费时称：“查东文翻译一项，向在使署立学，按年列于出使经费内作正开销。”“此次学校经始动用经费数目核与向章作正开销之处，系属相符，应如所报准销。”《出使日本大臣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

[9]《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等人归国的原因，一是不能忍受日本小孩频呼豚尾的戏弄，二是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这只是依据相关资料推论，似不确。

[10]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页。

[11]《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二。

[1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奏疏卷二十四。关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态度的变化，参见 Don. C. Price :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96—1911。

[13]《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14]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65—466页。

[15]《旅日本中华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1898年5月1日。

[16]1885年，横滨董事（此为清政府领事选派有力绅商担任，分管当地华侨事务）陈瑞璋等集资“创设中华公学，规模宏整，商民子弟，皆得入塾读书”。《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奏保日本通商口岸董事片》，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

[17]参见《游学汇志》，《选报》第42期，1903年3月8日。

[18]《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

[19]《旅日本中华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1898年5月1日。

[20]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上海，新智社1903年版，第106页。

[2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2页。参见《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附录《广东留学生题名录》。

[22]《清国新聞記者》，《大阪毎日新聞》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山本宪（梅崖）后为1898年成立的大阪日清协合会会员。据蒋綱裳编《浙江高等学堂年谱》，汪有龄原为蚕学馆所派，后回国要求改习法政，1898年随浙江首批官费留日学生再次东渡。汪后来担任过中国议会书记。

[23]《旅日华侨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1898年5月1日。

[24]《上清帝第二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25]《文廷式请开学校讲习武事片》，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七。

[26]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934—936页。

[27]《鄂督张之洞致总署联英俄仍须联日以戢德焰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28]《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38—139页。

[29]《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0]《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一。

[31]《鄂督张之洞致总署日人劝郑孝胥赴日学习与联英事无涉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2]《总理衙门议复游学日本折片》，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33]河村一夫：《駐清公使時代の矢野竜溪氏》，《成城文藝》第46期，第68—69页。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17—18页。

[34]《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5]河村一夫：《駐清公使時代の矢野竜溪氏》，《成城文藝》第46期，第68—69页。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17—18页。

[36]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0—251页。

[37]《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奉之谕旨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38]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39]《军机处电寄各省督抚谕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40]其中南北洋及湖北各20名，浙江4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折》，光绪二十五年七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页。

[41]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四、五次报告》；《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第10册，1903年9月6日。

[42]《鄂督张招考出洋学生示》，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3]六月《官书局报》译自《太阳报》，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4]《外交报》第99期，1904年12月21日。

第三章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1898年成立于上海的亚细亚协会，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从甲午战争前普遍蔑视的“蕞尔岛国”，到甲午战后的维新楷模，再到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对抗列强、挽救危局的盟友，最后一度成为合谋反清的同党，中国趋新人士与日本对华团体的关系层层递进。而上海亚细亚协会承前启后，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义，还有一定的组织和人事脉络。一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之为“兴亚会”，视之为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具体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面对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和清廷无所作为的现状，上海亚细亚协会所显示的不仅是中日双方民间人士同盟的努力；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也是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潜在动力。由于这一潜力的持续存在与作用，庚子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联合反对当朝执政，而以合并包括亚细亚协会在内的日本各个对华团体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则全面介入了南方各地的联合反清密谋。

第一节 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

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进展明显，藤谷浩悦、菅野正、易惠莉和狭间直树从不同角度予以推进。藤谷浩悦的《戊戌变法と東亞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41—62页）依据《对支回顧録》、《郑观应集》、《東京朝日新聞》、《湘报》等中外文献，从东亚会的角度考察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易惠莉的《郑观应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36—548页）则

利用《郑孝胥日记》等新出史料，着重考察了郑观应、郑孝胥等人对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观点和立场的差异，并订正了该会成立的时间。菅野正的《戊戌維新期の上海亜細亜協會をめぐって》（《奈良史学》第16号，1998年12月）是以该会为主题的专文，利用了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档案。狭间直树教授的《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历史考察》，（《東亞》第410—416号连载，2001年8月—2002年2月），在系统梳理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各团体渊源脉络的基础上，对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缘起、归属等问题进行辨析，所掌握的中日双方文献以及先行研究相当周全，认识较前人大为深入。^[1]与此同时，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则从汪康年的角度论述了上海亚细亚协会。

经过上述各位学人接续不断的研究，以现有资料，关于这一为时短暂的组织已经剩义无多。不过，仔细推敲，各人在一些重要环节的认识上还存在差异，一些推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这些都与一项重要判断相关联，即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

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于1898年6月16日，按照章程，将展开各种事业。“忽季夏京中有变，人心震恐，故即解散，人多惋惜。”^[2]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也未留下什么具体活动的记录。研究者因此认为：“亚细亚协会与维新运动时期其他的一些团体一样，并未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大约在于它是中国知识界、绅商界第一个受日本影响、有明显亲日倾向的民间团体。”^[3]就亚细亚协会的组织本身而言，这当然也是事实。不过，团体的影响力有时并不完全以组织的存废而生消，如果不拘泥于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从前因后果看联系，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其实相当深远。或者说，由上海亚细亚协

会体现出来的日本各派兴亚势力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的联合以及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合谋同盟的潜流，更加值得深入探究。

就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的渊源脉络看，到1898年，由兴亚会改名而来的亚细亚协会，已经处于颓势，会员人数减少，组织规模大幅度缩小，几乎没有什么活动。^[4]中国人士选择和这样的团体联盟，甚至名义上还是作为其海外分会，承认日本的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似非得策。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人士与兴亚会渊源较深，联系较多，主张较近，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各派对华势力都在寻求与中国民间人士的联盟，暂时可以将两国联系方面有较长历史的亚细亚协会作为桥梁。而中方人士则将该会视为日本联华的象征，对于其他持相似态度的组织，也表现了同样的向往和接纳。

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是明治日本时期较早出现的对华团体，其宗旨是联合日、中、朝各国人士，挽救亚洲的颓势，进而振兴雄起，因此有意识地积极争取中国朝野官绅的赞成支持，“一时中华公使及使员游士多入其会”，^[5]先后加入该会的中国官绅至少有何如璋、王韬等数十人。改名为亚细亚协会后，不仅主旨未变，而且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以东亚为中心的趋向，如重视和强调使用汉语等。这或许是导致该会在日本活动不利的原因之一，可是对于中国绅士而言，却增加了一些亲近感甚至信任感。先后加入或支持者有黎庶昌、王韬、郑观应、李凤苞等人。这样的历史渊源自然成为中日两国民间结盟的最好凭借。此外，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还得益于亚细亚协会的日方会员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中方会员郑观应都在上海，前者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者则是沪上绅界的核心人物，双方均有意促成联合。结盟的最终成立并确定以亚细亚协会的名义，与他们两人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的机缘可能不止一端，还是有一些线索未能相互连贯。其中之一，便是1897年底、1898年初汪康年、曾广铨两人的日本之行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的直接关系。有传闻说此次游历日本时汪康年加入了兴亚会。《汪康年师友书札》（一）吴以槩来函之七：“闻兴亚会已入公名，条例如何，能示大概否？”^[6]是函写于汪康年返回上海不久。廖梅认为此兴亚会即改名后的亚细亚协会，有意识地推断汪康年加入的应是亚细亚协会。^[7]

另一种可能性是汪康年本人东行的目的即酝酿与日本亚细亚协会联盟。《汪康年师友书札》保存的若干函札透露出相关信息。行前黄中慧建议：“亟与日本联攻守相助之盟，告以瓜分中原，固我之不幸，然亦非日本之福，动之以利害，彼必乐从。”^[8]高凤岐说：“执事东游，自为兴亚要计，彼中贤士大夫怀此久矣。得吾国有心人一鼓其机，当更奋发，惜吾政府之不动耳。”^[9]1898年1月23日张元济致函汪康年、汪诒年，其中提到：“农学、兴亚二事，兴会如何？日人肯为出力否？其兴亚会会章能否见示？至盼。”^[10]

按照目前的认识，仅仅从小田切万寿之助、郑观应，甚至福本诚的角度看，这时组织上海亚细亚协会一事尚未提上议程。1898年6月17日，孙淦致函汪康年，谓：“前者面谈之事，有日友冈本谓能说其政府每年津贴保护金数千金，俾专主东亚联络之说，弟未经请命，固不敢擅嘱往东京。”^[11]孙淦担任过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当时在日本邮船会社供职，是汪康年日本之行的重要协助人，1898年4月又到沪与汪康年会晤。冈本即善邻协会的冈本监辅，他与吾妻兵治同为亚细亚协会的重要成员。苏州的江瀚等人通过汪康年了解亚细亚协会，也说明后者在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筹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2]

此外，1898年3月25日，汪有龄致函汪康年提到：“近闻神户将开兴亚会、华报馆，阁下已闻知否？”^[13]华报馆应为《东亚报》馆，为神户华商所办，兴亚会则不知是否同为华商组织，与其他同名组织有何关联。

汪康年东行，除了直接与亚细亚协会发生联系，还为稍后转向东亚会和同文会开辟先机。鼓动汪康年等人东游与日本人结盟，宗方小太郎起了不小的作用。早在1897年2月，宗方小太郎就在上海与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商议兴亚之策，认为清廷依赖俄国，整个清国上层完全腐败，而下层愚蠢无知，只有中间士子可以成事。他日动摇天下者必此一族。因此在野志士都盼望日中联合。无论两国政府方针如何，志士互相提携为当今急务。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的天下被满人破坏，要想挽回国运，必须脱离满人羁绊。^[14]

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发生，宗方小太郎即函告汪康年：

俄、法既与德有默契，一朝决裂，彼三国者皆我之敌也！英则持满未发，日本则跃跃欲试，隐约之间，彼我争衡之形既成矣。此诚亚洲浮沉之所系，干系决非小少也。穰卿先生阁下，天下滔滔不足道，独我辈有心之士，有不忍旁观此大难者也。

他的建议是：

即今第一策，只在中东盟。中东盟已熟，中原可争衡。盟之最所贵，始终在一诚。

并且表示：“从此中原定多事，与君连轳好偕行。”^[15]希望在中日同盟之路上和衷共济。他专门赶去胶州查探，希望汪康年暂缓东行，与之详细面商有关事宜。^[16]

此外，藤谷浩悦注意到，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与福本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1898年3月底到4月中旬，福本诚旅欧途中在上海

滞留半月，先后会见了文廷式、志均、王仁东、余思诏、唐廉、江标、费念慈、罗贞意、汪康年、曾广铨、陈季同、姚文藻、洪述祖、董康、杨模等人，认为无论朝野官民，均寄希望于日清同盟论，因此全体同意在日清人士之间筹划东邦协会的乃至亚细亚协会的一大协会。^[17]也许藤谷浩悦的叙述给人以强调福本诚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印象，特别是他在注释中说兴亚会的计划由于福本诚的斡旋而实现，^[18]狭间直树教授特意指出，是年3月以前，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联络筹组活动已经展开，而东邦协会与创立上海亚细亚协会渊源的痕迹尚未发现。^[19]

就上海亚细亚协会而言，应该说的确与福本诚关系不大。可是从东亚会的角度看，福本诚的活动却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联系到后来事态的发展，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筹组上海亚细亚协会。

1898年3月，在东京牛込赤城神社境内清风亭举行的福本诚旅欧送别会上，政教社的陆实、池边吉太郎、三宅雄次郎等人提议结成新团体，以研究东方尤其是中国问题、匡正时局为目的，并选出香川悦次、井上雅二为干事，被称为“东亚会的滥觞”。4月16日，在合并了江藤新作一派后，东亚会正式成立。^[20]藤谷浩悦认为，东亚会的迅速告成，福本诚发自上海关于中国绅士拥护中日提携的报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日中同盟提携论发自日本，但具体到1898年的行动，则中国趋新士绅的愿望更加强烈，要求更加迫切。1897年底汪康年和曾广铨前往日本，目的就是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此次福本诚到上海，本来只是路过，按原定日程，4月4日就应乘法国邮船离沪。之所以滞留多日，正是有感于中国有志之士接连不断地陆续来访，并多次安排聚会，对于中日同盟抱有极大的热情。^[21]

《湘报》刊登《东亚会简明章程》时，特意标明“即兴亚义会”。狭间直树教授推断，“兴亚义会”除了说明东亚会的性格外，还有作为别名的意思。^[22]根据《知新报》的报道，“前报日本名流思创兴亚义会，联合中国，今悉其会定名曰东亚”^[23]，则该会最初曾想取名为“兴亚义会”。所以和《东亚会简明章程》刊登于同一期《湘报》的唐才常那篇有名的《论兴亚义会》，完全没有提到“东亚会”的名字，通篇都是“兴亚义会”甚至“兴亚会”。他说：

吾友有徐勤者，客日本，主讲横滨之大同学校，则飞函告曰：日本处士，仁哉侠哉，日日以亡中国为忧，中国亡则黄种瘠；黄种而瘠，日本危哉！于是上自政府，下逮草野，群有心揅世之人，创立兴亚义会，冀扶黄种，保亚东，毋尽为俄、德诸雄蚀。又日日宣言于国中曰：支那受创后，能毅然举新政、设学堂、谋国是者，首湖南。其士民忠诚勇猛之气，甲于十八行省，足与策支那，足与谋亚东。乃以勤介于湘，丐湘人有志行者联百数十人，入兴亚义会，其能联名千，益济乃事；幸而万焉，吾中日相臂指必矣。于是举勤会员，主联中国，尤措意湘，凡湘人游日者，先达名兹会，会之友幸为东道主毋馁。

他告诫湖南人“吾湘弗餍外人望，或孤其兴亚之心”，进而提出“长策”十条：第一条为“南学会急派人至日本办兴亚会事，一二年后，挈其政学归，新吾中国”。第二条为“立兴亚分会于湖南，与日本时其消息，灵其脑筋”。第九条为“《湘报》与《兴亚报》彼此分派，以拓见闻”。也就是说，唐才常在撰写《论兴亚义会》一文时，还不知道该会确定的正式名称是东亚会。

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湘报》报道的标题是《兴亚大会集议记》，与《大公报》、《新闻报》、《集成报》等以《亚细亚协会》为题明显不同。亚细亚协会的前身叫兴亚会，而唐才常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无论他是有意将兴亚义会与亚细亚协会相混淆（在唐才常看来，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可能过于稳健，显然不如“兴亚义会”来得痛快），还是不大能够把握两会的联系与区别，造成的客

观效果，就是在兴亚会与兴亚义会之间形成联系，这样一来，此兴亚会与彼兴亚会的界线，自然变得模糊起来。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兴亚义会与兴亚会一脉相承，甚至可能就是同一团体的演变。

一些新闻报道似乎也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迹象。1898年5月21日，《東京朝日新聞》刊登5月13日的上海通信《亚细亚协会》，一方面说日中两国朝野人士为了振兴东方，团结设立亚细亚协会，上月发起相谈会，当地有力的中国官民同意举为会员，下月召开成立大会，一方面又说两湖人士也纷纷赞成并加入。^[24]

尽管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参加者中的确有唐才常这样的两湖人士，不过唐才常呼吁湖南人大规模参加的，是东亚会的“兴亚义会”，而不是上海亚细亚协会。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亚细亚协会虽然奉日本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中方人士更加看重的是兴亚的主旨，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而不是组织的归属。因此，至少在他们看来，作为中日民间结盟的载体，上海亚细亚协会是超越某个具体组织之上的桥梁。这对他们将目光逐渐转向东亚会和东亚同文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节 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后，计划的各项活动虽然已在落实之中，^[25]但还来不及展开，唯一可记的事，是“日本总会长过沪，同人公宴于张园，意极融洽”。据说俄、法等国领事“闻有中日协会，颇生疑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亚细亚协会被迫解散。

不过，上海亚细亚协会举议员24人，“已任入会签名捐资者约百余位，皆官商名誉中人”。^[26]影响范围不可谓不广。全体会员的名

单尚未查见，据1898年4月26日在上海郑观应寓召开的沪上维新志士与日本人士共同筹办亚细亚协会准备会，中方与会者有郑观应（陶斋）、文廷式（云阁）、郑孝胥（苏龛）、何嗣焜（梅生）、志钧（仲鲁）、张謇（季直）、江标（建霞）、严信厚（小舫）、薛华培（次升）、盛揆臣、汪康年（穰卿）、曾广铨（敬貽）、经元善（莲珊）、陈季同（敬如）、施则敬（子英）、姚文焯（稷臣）、杨廷杲（子萱）、沈敦和（仲礼）、唐才常、李智俦（洛才）、李宝森（谷生）、吴瀚涛（广霈）等。^[27]另外据说盛宣怀和蔡钧也赞成，因事忙未能与会。

这样一份名单，熟悉晚清史事者大都并不陌生。在19、20世纪之交，他们是东南乃至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江标、张謇、汪康年等人在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无须一一介绍。其余各人情况如下：

何嗣焜，江苏武进人，又字眉孙，历参张树声、倪文蔚、盛宣怀幕府事，分省补用知府，后总理上海南洋公学。

志钧，满洲镶红旗人，珍妃胞兄，进士，曾列名上海强学会。江南候补道，南洋大臣洋务局总办。

严信厚，浙江慈溪人，钱庄学徒出身，曾入李鸿章幕，署长芦盐务帮办，后从事商业，为东南巨商。官直隶候补道。

曾广铨，湖南湘乡人，早年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1897年曾一路跟踪孙中山由欧美抵达日本。随即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1898年访日期间，又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庚子在广州担任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代表宫崎寅藏等人会谈的翻译。

经元善，浙江上虞人，上海电报局总办。

薛华培，四川华阳人，湖北候补道，戊戌由湘抚陈宝箴保荐经济特科。

施则敬，浙江杭县人，道员用留直补用知府，其弟施肇基，为清季民初著名外交官。

杨廷杲，商董，主持上海电报总局收支所。黄遵宪曾函告汪康年：“昨见盛杏翁云：已订嘱杨子萱缮公函分寄各电局，凡有商局处均有电局，不必两岐云云。”^[28]他和严信厚、施则敬等均为上海中国女学堂董事。^[29]

姚文焯，浙江仁和人，又字伯纯，进士，曾任云南学政、福建兴泉永道。

沈敦和，浙江鄞县人，英国剑桥大学法科毕业，历任南洋大臣翻译官、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海防粮台委员、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以及南京、镇江、江阴、吴淞四炮台提调，后改江南自强军营务处总办。江苏候选道，与严信厚同为上海四明公所董事，编辑过《自强军西法类编》。

陈季同，福建侯官人，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留学法国，习国际法，历任驻欧各国公使馆参赞，甲午战争时任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时为江南制造局翻译、《求是报》主笔。

李智俦，江苏仪征人，字鹤侪，号乐才，监生，曾官湖南龙山知县，调署武陵等县，后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宾。

李宝森，广东大埔人。

吴瀚涛，名广霈，字琴爰，晚号剑华道人，安徽诸生，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后升任神户副领事，归国后任轮船招商局文案，直隶候补知县。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时，他和康有为、曾广铨等同被预定为统领。

盛揆臣，不详。

这批人早就在清季官绅兴办的各种趋新事业中相互援引。1897年，经元善在上海发起中国女学堂，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薛华培、汪康年、文廷式、张謇、江标、吴瀚涛、沈敦和、何嗣焜、杨廷杲、施则敬等人积极支持。尤其是戊戌、庚子间，他们或明或暗的各种活动带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连续性。而这些活动，均与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各种因素，如日本主张亚细亚主义和保全中国、振兴东亚的对华团体日渐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寻求合作与联合，以及中日双方民间人士积极谋求同盟提携等等，使得围绕庚子勤王事件的一系列组织和活动，均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精神一脉相承，组织与人员也有一定的渊源联系。

由处于衰退期的日本亚细亚协会出面具名作为中日民间同盟的组织形式，历史渊源之外，有一定的偶然性，东邦协会、兴亚义会（东亚会）等团体直接或间接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并未使日本的亚细亚协会获得复兴的转机，而东亚会和稍后成立的同文会则发展顺利，并很快在1898年11月合组东亚同文会，1900年3月又与亚细亚协会合并，实现了日本亚细亚主义各团体的大合流。这样，日本方面，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对华团体，与此前几乎所有日本对华团体都有着一定的组织渊源。而这些团体与中国人士的各种联盟活动，也都陆续汇聚到东亚同文会的名下。亚细亚协会在此进程中，仅仅扮演了过渡环节的角色。

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东渡日本，企图向日本借兵求援，在湖南发动勤王举义。尽管他前此对被称为“兴亚义会”的东亚会充满期待，希望该会与湖南的南学会共谋大业，但此行似乎未能从东亚会方面获得实际帮助。这时东亚同文会已在筹组之中，唐才常在康有为下榻处偶遇还属于同文会的宗方小太郎以及后来加入东亚同文会的柏原文太郎，两度发出求援呼声。宗方小太郎认为请求日本政府出兵不现实，表示“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30]后来唐才常担任了由宗方小太郎、白岩龙平等人组织的上海乙未会发刊的《亚东时报》主笔，乙未会据说是上海同文会的基础。而日清贸易研究所出身的白岩龙平与亚细亚协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立志继承荒尾精的事业，亚细亚协会的岸田吟香则是他的同乡大先辈，同时又可以说是荒尾精的师长。岸田吟香和长冈护美作为亚细亚协会成员，却参与了东亚同文会的组建，成为两会会员。所以1898年3月13日亚细亚协会在上野精养轩招待来访的姚锡光、吴敬英、张彪等人，白岩龙平也出席作陪。^[31]

上海同文会的成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相当直接的关系。近卫笃磨日记附属的《同文会設立趣旨書》，（由白岩龙平撰稿）和《時論》第7号刊载的《同文会綱目》，其内容同样有令人费解之处，即该会的事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包括设同文会馆、附属图书馆、附设翻译局、同文学堂，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等地设汉字新闻、经营航海、贸易、银行、矿山等以及以上海乙未会《亚东时报》和东京精神社《時論》为通信机关等七项。^[32]从1898年7月29日白岩龙平写给近卫笃磨的信，可知此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关系密切。从关系人的角度，白岩龙平认为，由福本诚欧游途经上海发端，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专心奔走而成的上海亚细亚协会，网罗官商名士不少，内部也有不值一笑之事。我会有必要从中取其精华。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到汉口与张之洞会晤，后者表示不宜用亚细亚协会之名，应

改名为同文会。尽管这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同文会已经发端，白岩龙平还是建议尽早确定上海同文会的建设重点，以便向内外显示该会的实际。^[33]

东亚会最初注意的对象是康梁以及湖南的维新派，所以立会趣旨中明定允许辅佐光绪变法自强的康有为、梁启超入会，又以康有为的门生徐勤和罗普为该会倡办董事。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中部分会员如平山周等，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日趋紧张，转而以孙中山为支持对象。因此在日本对华团体尤其是东亚同文会内部，又分成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的不同主张和人脉。不过，总体而言，戊戌、庚子间日本各派对华势力的主导倾向是合流而非纷争，同时他们也希望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能够联合行动，这一方面强化了本来就有意联合的中国各派趋新力量“必当合不当分”^[34]，“必大合而后能办妥”^[35]的意向，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对华团体之间的分界变得相当模糊，中国人士同时与不同派系的日本对华人士进行联络甚至合作。白岩龙平的动向，不仅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趋势，而且与中国方面的对日结盟极为关键。

1898年初汪康年和曾广铨访日期间，曾与白岩龙平在大阪会晤两日。^[36]晤谈的内容之一，当是中日两国人士联络之事。后来白岩龙平致函汪康年等：

《时务报》馆想已发刊，敝邦有志之士均共刮目，颇有先睹为快之慨，如何如何。兹附一纸《中外时论》，与《时务报》诸报交换，一则系精神社友等弟嘱商贵馆，精神社系近卫公爵（东邦协会副会头）等幕友主笔，与贵馆一气联络，自有益于两间。

精神社即后来同文会重要刊物《時論》所属的机关。福本诚到上海前，3月15日白岩龙平又致函汪康年等代为介绍：

敝友福本诚君（号日南），现在《日本新闻》，又为东邦协会、《日本人》报等处笔政，二十年来以亚细亚为志之士也。此次周游欧、米各国，首先到沪上与贵国诸有志谈论，而后搭佛国邮船启行，尤祈阁下与贵馆中诸翁开臆联欢，有补于亚洲大局也。^[37]

东邦协会的副会长是同文会首任会长，而东邦协会重要人物福本诚又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与他们两人关系密切的白岩龙平，既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又是同文会的重要发起人。东亚会虽然不像同文会那样，将活动和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可是除了将总会设在东京外，唯一明确规定的就是：“并于支那上海设立分会，以相照应。”^[38]联系到1898年7、8月间井手三郎、大内畅三、中西正树、平山周、宫崎寅藏、犬养毅、菊池谦让、神鞭知常等人频繁来往，协商有关“对清设施”预案以及联合各派力量等事，^[39]有理由推断，东亚会、同文会的成立以及稍后合并为东亚同文会，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取代已经处于颓势的亚细亚协会，成为日中同盟的日方代表，甚至是中日双方的共同架构。而上海乙未会（以及其他在华日本人士）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同文会上海支部的基础，又成为东亚会上海分会的依托。

关于乙未会的详细情况，缺乏必要的材料，论述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团体者，大都一带而过。涉及较多的是中村义教授的《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此书虽然仍未提供该会的成立和活动情况，但在论述上海同文会时，提到是在先期设立的乙未会基础上改组扩大。

从名称看，乙未会当与日本对华人士急于修复因甲午战争破裂的中日关系以及挽救由此引起的东亚危局有关。同文会成立后，白岩龙平于1898年7月底返回上海，10月1日，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联名以乙未同志会作为本部，向全体会员发出通知。该本部设于美租界密勒路寿椿里233号，二层建筑，楼上三间，楼下四间，除事务所、接待室、图书室外，还可供八九人住宿。会员共有147人，其中日清贸易研

究所出身者30余人，势力不可小觑。^[40]他们早就与汪康年等革新派人士联系密切，1897年底后者东游寻求与日方结盟，首先即受到宗方小太郎和白岩龙平的鼓动，绝非偶然。以往研究者可能过于看重日本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以及宗旨策略的差异分歧，甚至以后来眼光分别派系，反而使得彼此勾连的事实真相难以彰显。

第三节 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

东亚会、同文会以及东亚同文会利用其在华的组织系统和与中国人士的广泛联系，影响很快超越亚细亚协会。在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下，与中方结盟的日方组织不知不觉间实现了由亚细亚协会到东亚同文会的转移。

戊戌政变后的严峻形势，使得亚细亚协会联络朝野官民上层的路线失去大部分活动空间，而东亚同文会尽管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毕竟有不少人赞成联络民间人士从事反对清王朝的体制外改革，而且戊戌、庚子之间，这一派主张一度占据上风。凭借其在华的各种组织基础，东亚同文会更加深入到中国各地趋新人士的组织活动中去，甚至介入各种密谋。这样的策略适应当时中国的局势，使得东亚同文会的在华活动迅速得到发展。一些亚细亚协会成员已经加入东亚同文会，并将重心放到后者的活动方面。在此形势下，亚细亚协会只能主动提出与东亚同文会合并。^[41]

上海亚细亚协会解体后，由于戊戌政变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面对高压局势，沪上趋新士绅的活动一度消沉。到1899年，在内忧外患急剧加重的刺激下，才重新趋于活跃。本来聚集上海的士绅大都赞成渐进式改革，而不同意急进论，可是政变后日益恶化的局势将他们不断推向与当朝执政决裂的境地。这时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尤其是

两湖和江浙志士继续此前联合救国的努力，并一如既往地寻求日本对华团体的支持。他们了解到日本对华团体变化的动向，争取的对象由亚细亚协会转向东亚同文会。汪康年和唐才常等人筹组正气会时，特致函近卫笃磨、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内言：

敝国人游贵国归者，咸述从者眷怀时局，慨然以振兴东亚自任，凡在同洲，罔不仰企。某等不敏，常以交邻之道，互相质证，金谓欲联日清为团体，必从学会入手。前闻从者于东亚协会事宜，殷殷提倡，不遗余力，感佩同深。某等近亦熟思互商，立一学会，名曰正气，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立会以后，来者颇多，伏思从者于日清交谊素抱热肠，因特奉上章程口册，敬乞俯赐览观，并恳有以教之。^[42]

正气会会章第五章第十七条特别规定：“中日两国，系同文同种之邦，如日本志士愿入本会者，一律列名会籍。”^[43]1900年2月文廷式到日本避祸，接待者主要就是东亚同文会，连长冈护美和榎本武扬等亚细亚协会头面人物出场，也是以东亚同文会的名义。^[44]

和亚细亚协会相比，东亚同文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对华姿态，它利用原来日本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在中国各重要地方设立分会，试图全面掌控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的组织和活动，东亚同文会也借助原来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更加深入地介入内部事务。1900年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原亚细亚协会会员郑观应、汪康年、唐才常、文廷式、陈季同等人参与其事，前三位还担任重要职位，薛华培则在南京予以响应。而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不仅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有时甚至还作为中国议会的代表从事扩展组织等联络活动。

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的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的名义联络湘军将领。在俞明震和辜人杰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对南京文武两方面

的联络进展十分顺利，井上雅二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感到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45]志钧也赞成井上雅二等东亚同文会员的计划，并进行过具体会商。^[46]

此外，中国国会干事丘震、汪有龄也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着很深的渊源，丘震的父亲丘玉符为郑孝胥在日本任外交官时的旧识，上海亚细亚协会筹组期间，与郑孝胥往来密切，很可能也参与其事。^[47]而汪有龄从1898年初汪康年访日之时就介入中日联盟之事，他还告诫汪康年：“日本虽有日清同盟之议，然我能自强，则日本肯结之亲之。我倘委靡如故，则一有急难，日本亦将从而染指。故自保，实亟亟也。阁下具苦口婆心，望告当道求所以联络日本者，勿仅恃同舟之谊，而徒哀声惨色以结之也。”^[48]经元善、吴瀚涛二人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国会，所发起的反对立储通电，却是庚子勤王的重要契机。^[49]

与亚细亚协会相比，东亚会、同文会乃至东亚同文会更加怀疑清廷有革新中国的愿望和能力，因而不再单一地寻求上层路线，不再一味与上层官绅打交道，而是试图鼓动在野的革新力量改变甚至推翻清朝，以为非如此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使东亚维持和局，进而振兴东亚。所以这些团体愿意帮助中国革新派实行变革，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协作，不仅实现维护东亚的战略目标，而且获得各种具体利益，影响、控制甚至支配整个东亚局势。而戊戌政变后中国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将越来越多的士绅推向反对当朝执政的激进行列，不得不以各种非常手段谋求阻止倒退的变革振兴之道，以挽救内忧外患。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东亚同文会与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

合作，全面介入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各种公开及秘密的反清活动。只是后来担心发生战乱会使中国陷入分裂，危及东亚同文会保全中国的整体目标，才中途有所收缩。

鉴于中国革新势力的力量不足，为了实现反清大计，东亚同文会秉承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力主联合，劝说中国各派革新势力的领导人求同存异，尽力促成共同行动，而不赞成任何一方单独行事。这一决策，与唐才常、汪康年等人的主张及行动方略相吻合，并得到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东亚会成立时，接受徐勤、罗普等人，目的之一，就是要吸收各地的革新人士，尤其是和一些不为清政府所允许的人士沟通联系，所以福本诚还注意到孙中山及其他各地革新人士的存在。由于康有为的干扰阻挠，保皇会与革命党、江浙人士以及自立会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摩擦，为此，宫崎寅藏等人力图调解，甚至专程远赴新加坡进行劝说。

在东亚同文会会员的协调下，唐才常、汪康年、梁启超、孙中山、乃至徐勤等人，能够避开康有为的阻力，维系联合大举的局面。自立会起义时，孙中山、梁启超分别从海外赶回，准备加入。起义失败，梁启超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50]。这番话绝非故作姿态，种种迹象表明，革保两党在广东的确继续有所合作呼应，保皇会负责广东方面行动的梁炳光，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惠州，与兴中会的密谋在空间上吻合；梁启超则毫不掩饰地赞成孙中山的用兵计划，赞赏其组织能力。康有为对此虽然有所怀疑，但并不知情，由梁启超一派暗中主导，港澳总局的徐勤至少予以默许。^[51]上述行动，背后都有东亚同文会的作用。如梁启超从檀香山赶回上海，途经日本，曾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磨、伊藤博文等人。^[52]如果没有东亚同文会的坚持并从中斡

旋，宗旨策略差异甚大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要想维持大合局面，并不容易。

戊戌、庚子乃至稍后的一段时期，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活动将双方关系带入“蜜月期”。由于甲午战争的阴影和日本对华的进逼态势，即使在相信同文同种、同盟提携之际，中方人士对于日本与中国结盟的善意也将信将疑，更多的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郑孝胥、张謇、汪有龄等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心和忧虑，希望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基本。临时被邀约出席亚细亚协会预备会的张謇于会后记道：

日人以甲午之役，有毫毛之利，启唇齿之寒，悔而图救，亟连中、英。又以为政府不足鞭策，为联络中国士大夫振兴亚细亚协会之举，盖彻土未雨之思，同舟遇风之惧也。独中朝大官昏昏然，徒事媵媚耳。预会者凡二十人。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53]

1899年底保皇会的《知新报》刊登的《福州忧时子致日本亚细亚协会同文会书》，可以反映对中日结盟怀有好感和期待的那些中国人的尴尬境遇和复杂心理：

亚细亚协会同文会日本诸君子公鉴：仆亚洲之男子，中国之庶民，闽中之鄙人也，足迹未尝出海外，学问未尝通古今，然固窃闻五洲之大势矣。欧西白人，既据美、非、奥之地，而臣妾红种黑种之人，亚洲半土，亦为俄法英德葡荷西士所分踞。其幸存者，虽有八国，然惟日本得以自立，惟中国可以有为，是黄种之存灭，惟吾日中是赖。不幸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授人以柄，中国既岌岌可危，而亚洲大势，亦因以震动。日本诸君，深知其祸，倡为联中之说，创立协会及同文会，志愿宏大，筹画深远，仆闻而伟之。中国之人，上者不讲外交政策，下者不识各国情伪，重以甲午之衅，痛彻于心，未能遽稍前嫌。然则协盟之事，权在日本，责亦在日本也。近来日本志士，持联中之议，如教东文译东书，及阅兵之官员、游学之生徒，皆加意亲厚，其来华日士，亦极力联络中人，谆谆以同种同洲之意相劝。中国士夫，渐知日本之当亲者，未始非会中诸君子力也。

虽然，仆窃有疑焉。数月以来，闽中商民，力诋日人，谓其好小利，好陵人，甚于欧洲，即宦途中亦有时言。叩其故，则曰：日人开设铺户，代商家包漏税厘，侵中国之利权，夺小民之生计，众口一词，怨声载道，甚者则谓欧人富，日人贫，欧人宽，日人刻，其仇视日人之心，竟十倍于欧人。仆闻斯言，反复辩论，晓以同种同洲之义，闻者尽哗，无可置喙。仆虽未履东土，读东书，然固尝接日本人士，察其言论，非不顾种族而干预税政者。盖由中国奸民，勾引日本无赖，图目前之小利，不顾久远之大局。愿诸君子将仆此言，上之政府，登之时报，精领事之选举，严游人之约束，勿令生事，以破我二国之和局。中国民智未开，易惑难晓，此辈以数人之小利，坏吾亚洲之大局，甚可痛也。诸君子志在兴亚，区区此心，亦非独为中国计而已。伏维原谅，忧时子启。^[54]

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后来事态的发展一步步坐实了中方人士的担忧，而所有的期待却基本落空。与之对应，日方的信誓旦旦，哪怕是出于真诚和善意，也都成了谎言与欺骗。一段本来应是同舟共济的历史，最后成为痛苦回忆的起点。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汲取。

概言之，1898年成立的上海亚细亚协会，是在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的背景下，中日双方民间结盟的产物。随着日本对华人士的认识趋同，组织分别也相应地逐渐模糊，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参与多个团体的发起筹建，甚至担任不同组织的领导。因此，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这类团体为“兴亚会”，视为中日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由于亚细亚协会已现颓势，东亚会、尤其是同文会的产生，很大程度是为了取代亚细亚协会作为中日联盟组织架构的地位，所以不约而同地将活动重心放在上海。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等人的上海乙未同志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士逐渐将结盟的对象转到东亚同文会。后者利用原来各个对华团体的组织和人脉资源，更加全面深入地介入南方各地的反清密谋，并力图促成联合大举。

日方对华团体的行为，对于中国的革新活动固然有所裨益，即使其动机仍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一般而言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以损害或侵占中国的根本权益为目的，则所有的善举都难免化作恶意，成为整个侵华进程的组成部分。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未能化解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日中最终走上侵略与反侵略对决的极端对抗。认真反省，如何才能协调政治立场与国家权利，在兼顾双方权益甚至进行利益交换的同时，防止刺激对方的觊觎之心，至关重要。

[1]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详见第3章《亞細亞協會について》，《東亞》2001年第12月号。

[2]《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上海亚细亚协会存在时间不长，应当不是问题。不过《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录有据说己亥冬月廿一收到的郑观应的一封来函，谓：“弟去秋以来，绝口不谈时事。故日本领事小田切偕诸同志嘱创设亚洲协会、红十字会诸件，或付祝融，或送日人，只存红十字会歌一首，兹附呈，以博方家一粲。两回亦当今急务，夙仰阁下洞识中外情形，交游甚广，乐善不倦，如蒙鼎力赞成，则功德无量矣。”（第2978页）是函收到日期可能有误，否则就是亚细亚协会还有后续。

[3]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547页。

[4]狭间直树：《亞細亞協會について》，《東亞》2001年第12月号，第60页。

[5]《兴亚大会集议记》，《湘报》第69号，1898年5月25日。

[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页。

[7]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8]1897年12月24日黄中慧来函之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266—2267页。是函于1898年2月5日汪康年回国后才收到。

[9]1898年2月4日高凤岐来函之三，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8页。

[10]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2页。日期为编者考订。

[1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444页。

[1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63页。

[1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73页。

[14]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顧録》下卷，东京，原书房1968年版，第375页。

[1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7页。

[1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34页。

[17]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顧録》下卷，第878页。

[18] 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依据《近衛篤磨日記》（二）断言：“福本诚来华时，提议成立如东邦协会或亚细亚协会性质的一种协会。他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的支持，这就是亚细亚协会的滥觞。”这一判断当受藤谷浩悦论文的影响。

[19] 狭间直树：《東邦協会について》，《東亞》2001年第12月号，第69页。

[20] 关于东亚会成立的时间，日本原有1897年春和1898年春两说（详见藤谷浩悦《戊戌变法と東亞会》注释8，《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56页），藤谷浩悦依据《湘报》第65号（1898年5月20日）刊登的《东亚会简明章程》落款中有“明治三十一年四月”的字样，断定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4月。而据《知新报》第54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1898年5月30日）“京外近事”栏《日本东京倡办东亚会》：该会“于中历三月廿六日大会于日本东京，到会者甚众，皆其国有志节之人也”。

[21]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顧録》下卷，第876—877页。

[22] 《東亞会と同文会》，《東亞》2002年1月号，第68页。

[23] 《日本东京创办东亚会》，《知新报》第54册，“京外近事”，1898年5月30日。

[24] 引自藤谷浩悦《戊戌变法と東亞会》注释9，《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57页。

[25] 如创办刊物，拟推郑孝胥总监。

[26] 《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220页。此时亚细亚协会由榎本武扬任会长，尚未查到其来华的记录。郑观应有《和日本长冈护美子爵松柏园即席韵》，其中有“兴亚深知唇齿切，阅墙回溯感怀多”，“秦晋争雄形势急，中东相爱激昂多”（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340页）等内容，疑与此有关。所举24位议员，未见有关资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中有兴亚协会议员粤东吕靖、广东大埔李宝森来函（汤志钧：《乘桴新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据此，参加4月26日筹备会者多数应为议员，但也有各种例外。戊戌政变后和吴瀚涛一同避往日本的恽玉茗，也是上海亚细亚协会会员（明治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大隈外务大臣，兵发密第486号）。江瀚则向汪康年表示愿意入会。汪诒年应当也是会员，预备会时，郑孝胥曾通知汪康年邀其一起到会。

[27] 《兴亚大会集议记》，《湘报》第69号，1898年5月25日；《亚细亚协会》，《集成报》第33册，1898年5月5日。关于出席者的名单，两报所载略有不同，《湘报》为：“主席者为文云阁学士、郑苏龛部郎、何梅生太守、郑陶斋观察，与会者为……志仲鲁观察、张季直殿撰、江建霞太史、严小舫观察、薛次升观察、施子英观察、姚稷臣太史、曾敬貽部郎、杨子萱太守、沈仲礼观察、汪穰卿贤书、盛揆臣孝廉、陈敬如军门、李洛才大令、经莲珊太守、唐杰臣观察、李谷生司马、本报馆主人吴剑华亦与其列。”《集成报》则为：“邀文云阁（廷式）学士、郑苏龛（孝胥）部郎、何梅生（嗣焜）太守、郑陶斋观察主席。……江建霞（标）太史……志仲鲁（刚）观察、张季直（謇）殿撰、严小舫（信厚）、薛次升、施子英（则敬）、唐杰臣四观察，汪穰卿（康年）、姚稷臣两太史，盛揆臣孝廉、陈敬如军门、经莲珊太守、曾敬貽部郎、李洛才、吴瀚涛、李谷生（宝森）三大令。”前者22人，后者近20人，缺杨子萱和沈仲礼。

[2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339页。

[29]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81—182、188页。

[30]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顧録》下卷，第381—382页。

[31] 中村义：《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东京：研文出版（山本书店出版部）1999年版，第266页。

[32] 东亚文化研究所編集：《東亞同文会史》，東京，霞山会1989年版，第265頁。

[33] 《近衛篤磨日記》第二卷，第122—123頁。引自中村義：《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第144頁。

[34] 丁文江、赵丰田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頁。

[35]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322—323頁。

[36] 白岩龙平日记：1898年“一月十五日，汪康年、曾广铨从东京来”。（中村義：《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第264頁）1898年2月10日白岩龙平致函汪康年、曾广铨：“大阪停车场握别之后，不知行旌无恙到申否？两日之会，客舍匆忙，不能尽东道之理，抱歉何似，伏维两位阁下安健回申。”（上海图书馆編：《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19頁）

[37] 上海图书馆編：《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19—3320頁。

[38] 《日本东京倡办东亚会》，《知新报》第54册，“中外近事”，1898年5月30日。

[39] 《井手三郎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82—383頁。

[40] 《近衛篤磨日記》第二卷，明治三十一年八月二四日，第134—140頁。见中村義：《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第144—145頁。从乙未会的名称看，应当与中日战争的善后有关。

[41] 《知新报》第117册（1900年4月29日）“各国新闻”《两会并合》记：“日本亚细亚协会会员中之人，以其会之主旨，与东亚同文会相同，故欲并合此两会，戮力同心，益尽力于东亚。顷以此事（转下页）（接上页）谋诸东亚同文会，而同文会亦以为然。”《東亞同文会第五回報告》所载《東亞同文会と亞細亞協會の合併》，也提到亚细亚协会的有力者某某等人鉴于东亚大局时势，认为应当求同存异，对于本会几年来的无所作为感到遗憾，因而主动与东亚同文会联系交涉。

[42]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頁。

[43]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9頁。

[44] 文廷式：《东游日记》，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61—1172頁。如3月19日“同文会诸友招宴于‘偕乐园’，用中国菜肴，近卫、长冈、榎本、及犬养、中西、田锅等凡十七、八人”。

[4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八日、十七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5—368頁）。

[46]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0—351頁。

[47] 中国历史博物馆編，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6—665頁。

[48] 上海图书馆編：《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69頁。

[49] 《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1900年1月27日。

[50]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1頁。

[51] 康有为1901年初致函梁炳光，中有“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任美行者，军谋称细，出讨则专以破数州县地，耸动大众为主。吾闻之，即笑谓任曰：吾以汝等称健者，以为果有方。若如此，则是一李立亭耳，必败无疑。已而，果有惠州之事。……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78—279页）。

[52] 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一七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成果報告書，第23頁。

[53]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54] 《知新报》第106册，1899年11月23日。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

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2]

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

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的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并通过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活动展示其巨大成效，尤其是取得甲午、日俄两次以小搏大的战争胜利，充分显示了新兴东方强国的实力地位，成为亚洲各国竞相仿效的榜样。戊戌变法即是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从甲午战败看到中国应当以日本为楷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亡，朝野合力进行的政治变革。虽然不幸失败，变革的方向并不因此而改变，20世纪一开始就展开的新政改革，与戊戌变法实际上一脉相承。日俄战后，朝野上下进一步确立了必须通过日本甚至仿照日本来学习西方的信念。也就是说，甲午战后是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日俄战后则是以日本为西方，学习日本就是学习西方，全面仿照日本进行变制。

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着重于中国留日学生，后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到瞩目，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只是

与他们的实际作用相比，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关于留日学生，已有的研究集中在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存在时，对于革命以及文化传播的作用，至于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如何发挥相应的作用，虽然已有专书全面讨论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指出了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从预备立宪、兴学、练兵、变法制四个方面勾勒出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大概作用，可惜言之过简，仍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这样说并非如坊间的苛求于文采之类，而是强调，要想再现历史错综复杂的联系，尤其是历史的主体一人的思维言行及其相互关系，应当尽力还原丰富多彩的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要证实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回国后的走向及作用，不仅需要掌握大量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还要找到适当的取径和善用有效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层，绝非易事。

仅举一例，清季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设置了许许多多的主持机构，任用了各式各样的官员，封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头衔，王公枢臣和封疆大吏兼了名目繁多的差事，可是真正具体办实事、实际起作用的，往往就是几位在各衙门之间“行走”来“行走”去的能员。其中风头最健的四位，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輿、曹汝霖，人称“四大金刚”。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称：

我与汪袞父、章仲和、陆润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3]

他们的权位本来不高，之所以能够参与机要，且大肆议论，原因在于改制要学习外国，尤其是日本，而这几位刚好是留日法科出身，多少具备一些改制必需的法政知识，相对于外国当然有限，但在京师的官场，却是有数的知日法理专家。加之清政府聘请多位日本顾问，汪荣宝等人的日语能力和法政知识，可以在顾问与权臣之间沟通联

络，更增强了他们地位的重要性。各部改制，那些对于相关事宜一知半解、无法言说、甚至束手无策的堂官司员，都希望他们前往议事，出谋献策，尤其是在草创之际协助或负责编制各种章程法规，也是不得不然。

曹汝霖指他们四人被称为四金刚，是在宪政编查馆时期，实则四人从1904年修订法律馆开始，就一直参与新政机要，在考察政治馆（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官制编制馆里，担任要角。此事原来仅在小说家言中有所体现（参见高阳《慈禧全传》）。近年来有学人依据曹汝霖的回忆以及汪荣宝的日记等资料，以“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王晓秋，《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为题，有所论述。由于后来中日两国长期交恶，而曹汝霖等人又成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清政府的新政变制也得不到长期执掌政权的国共两党的认可，各种因素相加，使得相关史事乏人问津，相关史料也很少得到收集整理。学界间有所论述，只能点到即止，有待追究之事不在少数。

例如曹汝霖等人参与的官制编制馆，究竟有无正式机构，其正式名称是局还是馆，是编定、编纂还是编制？目前坊间和学界众说纷纭。根据李家驹所奏，应是设立编制局，而按照清廷的上谕，则仅及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奕劻等总司核定，并无设局之说。^[4]此事各种政书失载，只有《东方杂志》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记到：1906年9月6日在恭王府朗润园设编制馆，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金邦平、张一麐、曹汝霖、汪荣宝为起草课委员，陆宗輿、邓邦述、熙彦为评议课委员，吴廷燮、郭曾炘、黄瑞祖为考定课委员，周树谟、钱能训为审定课委员，另有京师各部、处以及各疆臣所派参与会议官员多人。^[5]如此大事，官书典籍没有记录，至少不够正常。实情如何，还要进一步考究。

按照清廷的设想，改官制为预备立宪的起点，至关重要。由十几位少年得志的留日学生实际操纵如此重大决策，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满。赵炳麟奏称：

臣闻此次编定官制，虽经简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及直隶总督等公同编订，然主其事者不过一二人，而主笔起草亦只凭新进日本留学生十数人。此等留学生原无学问根底，亦未受普通教育，且率为其父兄不能拘管之人，乃纵之东渡。及至东京，粗习东文东语，遽受选科学业，不三数年，遂哀乞各该校校长，优予毕业文凭，或伪受修业文凭，以为内渡投入权势门户，猎取官资之地，敢为大言，以肆欺罔。此次编制率出其手，于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我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茫然莫解。即于东西各国官制，亦墨守一孔之言，罔知体要所在，是以此次编制随员中之文学生盖以日本职员录二本为秘钥，武学生则以日本陆军成规类聚一册为金科。夫职员录者，即日本每岁刊行之摺绅也，成规类聚者，即日本陆军省岁集之例案也。臣尝以此两种与所闻拟订官制逐节比对，其符合者凡十之九，即间有出入之处，盖亦承受一二。当道意旨，为推广其权力起见，即臣所谓权力又加甚焉者也。

窃惟我国有大变革，有大制作，岂借一二部日本摺绅成案与十数名留学生所能订定？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应请于该大臣等编定奏呈以后，其中宏纲所在，朝廷自有权衡。若其各部节目条分缕析之处，具体虽微，关系极重，应请飭令京外各大臣各举所知，须博通中外之故，谙习古今之变，名儒宿学，送入政治馆，令于现在所拟定官制各条，详为磨核推究，申明理由，悉心厘订，庶几切实可行。不得以一二留学生塞责，则于订定官制必有裨益。^[6]

赵炳麟虽然意在攻诋，所说却也并非无中生有。留学生能够大展拳脚，未必是他们新的知识水准如何高明，清季京师官场的变化和结构，才是他们赖以发挥的凭借依托。在南北、清浊相继化解之后，光宣之际朝局的枢纽关键何在，实情更为复杂，而今人的看法却反倒趋于简化，很难达到亲临其境的境界。可以说，对清政府的研究严重不

足，而且研究的态度方法大有可议，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留学生发挥超强作用的背景之一，是官绅游历的普遍化。据曹汝霖回忆：

宪政馆第一大事为起草宪法，公推李柳溪（家驹）、汪衮父为起草，另推若干人为参与，余亦为参与之一。柳溪与衮父都是新旧兼通之学者，他们两人特在红螺山赁一小寺，静心研究，参酌各国宪法，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理钦派，阁员由总理遴选钦派，国会两院制，人民应享之权利，与各国宪法相同。另设枢密院，以位置旧人。

李家驹即官派游历的典型。李是汉军正黄旗人，光绪进士，授翰林。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就由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和御史李盛铎、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赴日，将日本的大学、中学的规制课程以及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记成《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一书。1902年制订壬寅学制时，李家驹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该学制基本是以日本为蓝本变通而成。1907年他出任驻日公使后，又兼任考察政治大臣，率团听受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穗积八束等人所讲短期培训课程如日本宪法等，并用一年半时间坚持听完有贺长雄讲授的长期专业课。由此李家驹一举成为清朝官员中少有的法政专家，他主持编译编撰了各种关于制度变革的著作，其中包括通过达寿与伊藤博文、伊东已代治等协商选择，为清廷专门编译了一套介绍现行日本官制及宪法的书籍。^[7]根据所掌握的法政学理知识，依靠日本顾问和留日毕业生的帮助，他提出的各种改制方案，备受清廷赏识，奉命协理资政院事务，并被奏保为宪政馆提调，成为摄政王主政时炙手可热的红人。^[8]

而在保守的言官看来，李家驹却是“一意阿时，懵不晓事，徒袭东洋皮毛”。他在宪政编查馆一意孤行，不与同僚商酌，便提出行政纲目，刊行之后，人情汹汹，内外百官皆惴惴不自保。游历与游学相

互结缘，掌握改制实权，天下堪忧，“宪政编查馆起草各员如汪荣宝、吴廷燮、章宗祥等，何一非丙午遗孽，又益以杨度，使实行革命于政治之中。故彼党谈新政者，皆言变法当从官制入手。盖官制既乱，倾去旧臣，援用私党，使布居要地，乃得尽逞其谋”。^[9]如果任其发展，戊戌变法的一幕必将重现。

游历开始是指来华外国人周游内地的行为，后来兼指出洋考察的官绅。早期游历多赴欧美，人数有限，以官居多。光绪十二年（1886），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拟订《出洋游历人员章程》。戊戌变法期间，设制度局于内廷，又分设十二局于京师，其中位列第十的就是游历局。和游学一样，出洋游历逐渐成为一名重要的阅历出身。学制颁布以前，各地官绅多有出洋游历之人，开始着重考察军事技术及机器制造，了解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及学务、政治、工商实业、社会改良等方面。

新政时期，选派王公大臣及其子弟，并京外满汉大小官员轮派出洋，以便考察一切政艺，成为清廷的既定国策，而游历的重点转向日本。从京师到各省的各级各类部门乃至民间社会，从官僚到士绅，从官派到自费，人数至少以千计，考察的重点也由军事工艺主要转向教育、政治、法律、警政、实业、商务、传媒等各方面。

鉴于游历日渐增多，清政府一方面予以鼓励支持，一方面加强规范约束。在当朝执政看来，自费出洋游学之人大都年少未学，毫无阅历，易滋流弊，已入仕途人员则多读书明理，循规守法，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出洋游历，分门考察，可以备归国任使，并可熟稔游学生详情，帮助教化。因此，按照清朝的意旨塑造出一批游历，使之引导游学，发挥作用，确保取法外洋的步伐能够沿着清廷划定的轨道。

1904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奖励出洋游学的同时，也顾及游历，规定：游历与出使不同，须少带随从，一品大员可酌带翻译一二员，随从二三人，其余职官只可带翻译一人，随从精简。对于出洋游历各员，分别等第，从优给奖：

一、游历遍涉东西洋各国，往返在三年以外者为上；择游欧美之一二国或二三国，往返在二年以外者次之；专游欧美之一国，往返在一年以外者又次之；仅至东洋游历，往返在一年以外者又次之。无论东西洋，其游历在一年以内者，无奖。

二、游历之宗旨，以能考察其内政、外交、海陆军备、农工商各项实业及其章程办法为要。一二品大员须兼综博览，其余官员可择兴趣所在、职业所近而分门考察。凡考察所得，宜记载著书，归国后奏呈考核。应奖者须有札记著作，实有所得。游历年限虽多，毫无记录者仍不给奖。

三、内外职官，无论实缺候补，自费出洋游学，毕业后优予升擢补迁。游历奖励，比照游学减一等。游历游学人员，一概免扣资俸。

[10] 由这一规定可知，官派以外的游历，凡符合规定者，即作为自费出国，带薪考察。

除一般性号召外，京师各部院官员的出国游历受到特别重视。光绪三十二年（1906），政务处、学部议复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选派翰林出洋游历，由掌院学士于翰林院人员内遴选志趣正大、学问优长、有志出洋者四五十人，咨明学部，分为游学、游历两项。[11] 同年，给事中陈庆桂以科道为献替之官，部曹有办事之责，于各国政治尤应讲求。且新设之商部、学部、巡警部，以及交涉、工程、法律，事事皆当整顿，奏请各部都察院堂官，选派科道部曹出洋游学游历，一切章程，照翰林院办理。各衙门兴办要政，必须出洋调查，应准各该堂

官遴选派往游历，照《奏定学堂章程》所定自费游历奖励办法办理。

[12]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以学堂所重，不仅在于教员，尤在管理之人必须明于教授法和管理法。各直省宜于官绅中推择品学兼优、性情纯挚而平日又能留心教育者陆续资派出洋，员数以多为贵，久则一年，少或数月，考察外国各学堂规模制度及一切管理教授之法，回国后分别派入学务处及各学堂办事。欧美各国因为道远而费重，不能多往，而日本断不可不到，即使边远贫瘠省份，至少也必派两员。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学部通行各省选送游学限制办法，其游学日本者资格宜限定，而游历官绅可稍宽限制，但也要品行端谨无劣迹，身体强健无宿疾。^[13]七月，学部订立《出洋游历简章》13条通咨各省，对出洋游历官绅的资格加以限制。规定各省选派员绅出洋游历及京外员绅自请出洋游历，应由各本衙门及各将军、督抚详加考察，确系性行端谨，学有根柢，年力富强，不染嗜好，平日于政治、学术、实业等项留心考察者，始予给咨。自请游历者，应将欲游历之国及考察之事先行呈报审核。自请游历者，赴日不满三个月，赴西洋不满六个月者，概不给咨。除一二品大员及特派出洋考察人员不在所限外，其余均应照章办理。^[14]

就新政而言，游学的作用或许不及游历（一些短期速成生实际上与游历相差无几）。因为新政明确以日本为楷模，从上到下又急于全面铺开，只能照着日本的葫芦画瓢，所以日本成为游历的主要目的地。各种趋新事业举办之际，有关当局往往派专人赴日，调查收集对应机构的章程、型制、创办程序、操作规则等详细资料，经比较取舍后，模仿实行。民间绅商报人，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也纷纷东渡取经，以俾兴学办报，举办实业。

为了适应各方的需求，取得良好收效，游历官绅东渡前后，要由中日两国政府的相关部门集中组织听讲学习，进行短期培训。有关方面还为游历专门编写了各种参考书籍，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概况，说明历程步骤，并分门别类地编制了具体的考察指南，指示考察的程序、步骤和做法，供游历官绅参考，以便安排行止日程。游历官绅则按图索骥，将日本的各种制度一一临摹，照搬回中国。1908年，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驹奏请仿照直隶派遣自治员办法，各省派员赴日游历每年于二、三、九、十月为到日之期，以便30人以上者，请日本法政大学专门开班讲解，使其先明学理，并逐渐熟悉日语，再行考察。七月，学部通咨各地施行。^[15]

各直省提学使司人员请旨简放，必须先行出洋游历。除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查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准提学使司人员先后派赴日本考查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将该次简放各省提学使，分为三种：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毋庸出洋；其余各员在京者，均于请训后前往日本；出差在籍者，应俟奏请陛见后，再赴日本。考察事毕，即行赴任。^[16]

办理新政堪称全国模范的湖北、直隶两省，在派遣出洋游历方面同样领先一步。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札行选派实缺各州县自备资斧，赴东游历，往返程途不计，以在东实有半年为限。到后凡属有关政法之事，如学校、警察、监狱、道路、水利、财政、武备、制造及一切农、工、商、渔等实业，均须悉心考察，纵不必人著一书，亦须择要记录，回鄂后呈候核闻。并定以此后续经补选各员，均应于到任之先，一体派往游历一次，着为定章。^[17]六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凡学堂、警察、农工诸大政，皆关紧要，令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

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征心得。又以各州县学堂工艺诸端，皆须绅董相助，令各属公举品端学粹之绅，咨送日本游历四月，每州县至少须送一人，选派护送员、议员随同东渡。^[18]两省做法大同小异，差别只是在于一系自费一有津贴。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游历未能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其原因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较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经收集整理的积累。考察期间，官绅游历详细撰写游记，记载行程内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获之物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见闻感想，其中一部分被印制成书，一些则仅为稿本。研究这些奏报游记，并追踪游历官绅归国后在兴办有关事业中的影响作为，可以加深理解这一时期中日交流的情形程度。近20年来，利用东京日比谷图书馆实藤文库所收集的官绅游历的日本游记和档案报刊等文献，对赴日游历做了有益的研究，总体概述的有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年版），分门别类则有汪琬的《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而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些已成文物的图书的价值，在日本和中国各图书馆调查收集，整理出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19]

与原来留学生的研究相近似，对于游历的研究往往也着重于异国的见闻，至于回国后如何影响改革和各项趋新事业，虽已注意论及，尚未充分展开。连同日本顾问在内，诸如此类的研究课题无论资料还是视野，都必须沟通中日双方，而现行的研究却往往各顾一面。例如有贺长雄对晚清民国时的中国影响颇大，与日本思想界政法界的关系尤其深，日本所编有贺长雄文集，仅及其关于日本的著述，大量在中国发表的文字未予收录。而中国学人则仅在论及清季民初相关史事中才会提及，难以知其所以然。晚清和明治时期的中日人士，是在西

学、东学和中学的纠结中展开其心路历程和行进轨迹的，近代东亚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截然分隔，分科分类分国别的研究显然不能真正了解认识那一时代中日两国的人和事。对此，还有待于两国以及其他各国关注相关研究的学人共同努力。

第二节 东学的笼罩

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但是仅仅看到中国此后公开张扬地学习日本，以及几乎举国一致的仿日风尚，仍然不足以体现日本影响中国的深度和广度。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发展变化的基本取向及其话语权的格局。辛亥时期，中日两国在物质层面的差距或许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巨大，有些方面甚至中国还强于日本，但是精神学问方面的差距，却不可以道里计。据留日学生监督处所办《官报》刊载的各校留日学生考试成绩表，各科成绩在二三十分的相当普遍，要想达到日本学校的合格程度，则相当困难。仅此一端，不仅可见中日两国差距之大，而且预示着还将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这样的反差并不一定反映整体的学术文化水准，可是因为改用了西学的知识体系和衡量标准，使得中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和落后状态。现代中国在正式场合表达思维的重要名词，大都来自明治后日本的新汉语，不了解幕末到大正时期尤其是明治日本的历史，探源难以深入堂奥，求变也很难把握脉络。以西周助为代表的明治日本新名词的发明者，开始或许未曾料到，这些词汇的使用和通行，绝不仅仅是对应西学那样简单，而会使东亚的精神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周助创造的许多重要概念后来虽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时却一则限于小范围课堂教授的口耳相传，二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自身学习西学的问题，并未广泛传播和应用。可是到了井上哲次郎、冈仓天心那一代人，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通过编订辞典（如《哲学字彙》）和教科书（如《東洋哲学》、《日本美術史》）等形式，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推广各种新词汇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学理系统，使得这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名词很快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采用西方的统一标准，将原来西周用于西学的概念变成具有普适性的工具，重估东亚固有事物的价值，包括美术、哲学等等，都有了可以用西洋相同标准来衡量的东洋界域，不同的文化被纳入统一的系统框架。在重建东亚文化近代价值信念的同时，强调亚洲文化的一体性，试图借助编写各种专史将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重新排序，凸显日本的优越性，以便凭借一整套新名词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体系取得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精神领袖地位。

近代东亚各国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井上哲次郎和冈仓天心等人提供的对应概念，可以面向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而这时的东洋文化已经不是传统以中国儒学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旧版图，实际上是由日本对应西学解读之后重新建构起来的新样式，除了尽可能抬高日本文化种类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甚至如冈仓天心以日本为东亚美术传统的中心正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美术”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一套解释话语完全由日本掌控。后来中国的学人正是在冈仓天心的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之下，重新确立了文人画的美术价值，才避免使国画陷入国学、国医等等国字号事物那样的尴尬境地。

相比之下，井上哲次郎或许没有冈仓天心那样显著的政治目的，而且两人的“东洋哲学”与“东洋美术”有着显著差异，后者要分别东亚各国的高下，前者主要是用哲学框架重新条理中国古代的思想。

不过，井上哲次郎的抱负绝不亚于冈仓天心，其实际影响则与冈仓天心相当近似，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其一，使“哲学”由他者变成自己的事物，大幅度扩张“哲学”在日本思想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其二，通过重新条理解读东亚的思想，获得并掌握了在“哲学”架构下解释东亚历史学术文化的主导权。其三，由于其“东洋哲学”以中国古代思想为主干，实际上建构起一套“中国哲学”的体系。由此看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到二十年，日本在东亚思想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就已经开始确立。后来中国只能借助明治新汉语和日本式学术系统与西方沟通对话，虽然避免了长期以来夷夏纠结的困扰烦恼，却不得不用西洋眼光重估固有文化，而陷入日本式话语和思维方式的笼罩及控制。

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预备立宪时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政府的决策层出现非东学莫属的情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日本大量逆输入明治后的汉语新词，使得汉语言文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渐由以字为单位变成以词为单位。这成为后来文言改白话的主要支撑，使得非逻辑或模糊逻辑的汉语努力靠近逻辑性的字母文字，甚至以后者为变革的取向与最终目标。泛用新名词的情况，在1903年已经相当普遍，所以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特意提出：

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掺杂。……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其实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

言。今日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袭。

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牒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20]

今天看来，除个别例外，这些大都已经是以习以为常的通用词汇。日本逆输入的汉语新词数以千计，其中使用频率最高和次高的大约500个。今人若不使用这些词汇，在正式场合很难表达意思，相互沟通。就此而论，清季以来，中国人实际上可以说是用西思，发汉音，说日语，东语东学一直影响制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与知识体系关系最紧密的教育和学术分科，不仅同样深受日本影响，而且几乎就是照着日本的模子铸造出来。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的制定，虽然有所分别差异，模仿日本国民教育和学堂体系的基本形态却一脉相承，并无变化，只是在如何结合中国实情以及理解日本制度的本意方面略有不同。这实际上是按照东学的套路模式将中学与西学熔于一炉。不仅如此，各个分科的教科书，开始也是照搬日本，有的只是改头换面，有的索性直接翻译。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要据以重解重构。

分科治学与分科教学关系紧密而又有所分别，在清季，二者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除了接纳日本式的西学之外，还要解决安置中学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主讲京师大学堂史学教席的陈黻宸比较中西学术时就认为：

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21]

这显然是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中西学术的结果，将近代等同于西方，以为西学的优势从来如此。其实，整体而言，分科治学在西方也不过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新生事物，其间也经历了用后来观念重构系统的历史进程。由于各国的学术文化传统不同，造成分科边际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使得对心目中的西方本来就缺乏全面深入认识的中国人更加难以把握这些舶来的抽象物。

尽管晚清“科学”还没有后来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认定西学都是分科之学，所以日益发达，而中国则有学却不能成科，因此日渐落后，那么在接纳西学的同时促使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就成为势所必然的目标。为此，众多学人做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其中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严复、宋恕、王国维等人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而蔡元培等人则更多地从教育的角度关注分科。他们借鉴来源不同的东学窥探西学的系统，以建立自己的体系，都希望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将各种新旧中西学术安置妥当，尤其是力图将中西新旧学术打通对接。各人编织的系统虽然大体都是依据东学，实际上分别相当大，反映了各自所依据的蓝本以及对这些蓝本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

1897年出版的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著录的日本新书相当详尽，据说涵盖了明治以来全部书籍的一多半，尤其是分门别类相当成熟，决非毫无凭借者可以成就。除非有可以照搬套用的依据，否则康有为的东学水准即使在日本人中也可谓出类拔萃。因为当时一般日本学人也不可能有这样完备的目录学知识。至于究竟凭借何在，多年来中外学界先后有多位学人考证推测，始终难得确证。此一悬案，终于

由王宝平教授破解。《日本书目志》实际上是康有为根据1893年编辑出版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加以调整改造而成，虽然在著录及分类方面有所补充改动，所收书目及分类办法，基本袭用《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22]这一进展不仅解决了康有为的日本学知识来源问题，也为判断那一时期中日两国的书籍分类水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民初出任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曾经留学德国，所以改学制也主要参考德国。不过早期他仍然是受东学的影响，所设制的教学分科，主要就是依据日本井上圆了的学科分类法。与教科书开始大都翻译日文书相似，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相当于日本大正时代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参考、借鉴甚至模仿东学著述，仍是相当普遍的情形。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与西相对的是东而不是中，便是东西两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时日本对华野心日渐暴露，加上“二十一条”的强烈刺激，国人一般不愿称引所据的日人著述。这也是坊间关于中国学人的著述甚多抄袭传闻的起因之一。

诸如此类的“拿来主义”不仅表现在精神学问方面，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各项政治与社会制度，从国家基本大法到政体设制、地方自治，主要也是以日本为参照甚至模本。辛亥年汪荣宝负责起草宪法，随身携带的十几本参考书，都是日本法政学家如伊藤博文、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清水澄、有贺长雄、织田万、上杉慎吉、副岛义一、市村光忠、上野贞正、北鬼三郎、都筑馨六等人的著作，汪荣宝常常是边学边干，甚至现炒现卖，遇到疑难，则比较各书，参证取舍。

取法日本，固然有政治考量，而东学的笼罩，则是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正如教科书的编制在今人看来大概以如何科学为衡量标准，其实最关键的是用了不同的系统来调理中国的材料，受教科书教育者便只能由所得观念来看待中国的文献、事物和历史文化。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今人看来便很像是文学史，而今日通行的文学史所描绘的所谓“文学”，中国历史上何尝有过？用今日中国文学史的观念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如何可以知其本意和奥妙？可是若不用通行的文学史观念，大概根本无从认识历史上的“文学”。左右不是，进退两难，正是今人的尴尬所在。

第三节 变化未必是进化

用进化论的观念作为考察工具，辛亥时期中国正是全面学习模仿日本，才得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对于这样的描述虽然也有批评的意见，主要是指日方居心叵测，而中国不无改革的主动和内驱力。实际上，在此过程中，国人一方面得以重建重估文化价值，一方面则深陷日本式对应西学解读中国的缠绕。迁延演变至今，相关的各种概念名词已经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认识前提或工具，而且相应的制度规范早就让人们习以为常。可是，使用这些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文献和历史，往往似是而非，与昔人本意及事实本相相左相悖。而各种制度规范与国情不相啮合的情形，不但当时就令国人相当困惑，至今仍在不断地制造困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名词概念和体制成为横在中国的古人与今人乃至国人与外人之间的一道无形屏障，形成看似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的实际断裂，本来相互沟通的工具媒介却导致扭曲、假象和隔膜，对于今人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造成了众多危机四伏的陷阱。这也是辛亥时期日本影响中国的重要体现。

尽管东亚各国同属汉字文化，具有共通性，并不等于说彼此的概念完全一致。例如幕末以及明治初期日本的公或公家，意思便与近代中国所谓大公无私的公相去甚远。况且，明治日本的新汉语，本来只是为了翻译和表达欧洲新学。而日语本身不足以承接，非借助汉语，不易准确简洁明了。如metaphysics一词，如果不是在中国典籍中找出“形而上”，用日语要想恰当表达完整意思，用字会多出不少。可是，如此一来，西文原意、日本译意和中国典籍的本意与新汉语的借用之间，往往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情况。用这些新概念理解西学，误解固然不少，解读中国历史的文本和本事，似是而非之处更是所在多有。同时，也造成如今的研究各方看似探讨共同主题，实际上却各说各话、很难契合交集的情形。

例如教育一词，据说语出《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可是细察之下，显然这并非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汉文本来以字为单位，所以《说文解字》分别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所善也”。“教”与“育”分指不同意涵。清末以前，传教士所译西书，偶有以“教育”为专有名词者，却没有能以近代教育观念完全涵盖指称的实事。今日通行的含义及用法，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新汉语所推行，看似从汉文借鉴，实际上语义和指称均有所不同。清季“教育”输入中国，开始专指西式教育，继而概称历代所有教与育的有关行事。近代以来通行的各种教育史，清季以前部分，基本是用后出外来的观念间架编排组织而成，隔义附会者固多，形似而实不同之事亦复不少。其间的问题又不仅似是而非那么简单，往往适了“教育”这只外来之“履”，削了中国历史文化“教”与“育”的本事及本意之“足”。

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在合用“教育”一词之时，往往会分别解释“教”与“育”之义。可是，合用为新意，分解却是旧法。前者对应西文，后者则将就原典，二者形同而实异。诸如此类的情况不在少

数，如文化、学术、社会、国家等等。以字为单位的汉语全部虽有数万，大都脱离应用领域，常用的不过数千，要对应西文的数十万个词汇，有时不得不借用中国古典词语对应多个西文词汇，难免发生纠结，例如“自由”，古义与新解就令翻译大家严复倍感困扰。所导致的误读错解，不仅大小宽窄是否合度，而是中国文化制度的精义发生变异，外来体制的奥妙也无从理解。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本来也有教育，即使不得不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也应当尽量避免简单地用后设的间架填充先前的材料，而要努力领会中国固有“教育”的观念和体系及其所以然。民国以来治教育史者，尽管偶尔也有人觉得观念与事实的不相啮衕，可是大都缺乏这样的自觉，他们的努力，只是强化后出外来框架的有效性，而将填不进去的史事加以剪裁。为了对应外来的系统，如学堂有官立、公立和私立，则原来的学校书院学塾也分为官学、公学、私学；学堂有大小中三级，则国子监对应大学，府州县学、各级书院对应于中小学，社学、义学和学塾，则对应于初级小学或蒙学；新式教育由学部统管，则礼部和国子监也被赋予相应的职责权能；清季各省设提学使司，专管学务，则昔日的学政被认定为省一级管理教育的地方官。

这样的对应，看似整齐，容易理解比较，却明显属于削足适履。姑不论中日古今的“公”，分别极其复杂，以近代观念衡量故物，难以得当。除非戴上近代化的有色眼镜，藏书楼与图书馆，个人收藏与博物馆，要截然分别孰公孰私并非易事。清代学校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固然官办，可是官学特指八旗官学，一般学校往往不称官学。社学在一定时期官设较多，但一般而言，社学、义学既有官办，也有民办，还有官为倡议，集众人之力所设。书院的经费来源形式多样，很难用官办民办加以界定。至于“私塾”一词，用于指称清代乃至历代儒学、书院及官立社学、义学以外各种类型的学塾，始于清季立停科举前后，趋新人士借此贬称排斥新式学堂系统之外的学塾，坊间并不

通用。直到民国时期，普通百姓仍有不知政府公文与知识人言语中私塾所指为何之事。

就程度而言，书院甚或高于学校，社学、义学，通常比书院层级低。但各州县及以下地方，社学、义学常有易名为书院者。学塾的情况最为复杂，涵盖各种层次、类型，不可一概而论。清代一反前明风气，轻视讲学，重自修，用考课加以检验，且以科举为仕进之阶，学校、书院为其辅助，包括社学、义学，很难说是后来意义上教育的主体单位，民众的识字背书等基础教育多在家庭及各类学塾进行并完成。

社学、义学与书院的区别主要在于两者分工、定位不同。书院通常被认为是以育成才，而社学、义学则是以端蒙养，前者主要对具有一定知识的教养者进行高深教育，以积蓄资治人才，后者则是向民众推广教化，形成良善风俗。社学的官方色彩较强，曾被视为基层学校，义学则较多民间公益意味。实际上，社学、义学与书院互相混称的情况比较普遍。社学、义学往往被视为书院之小者，书院改名为社学、义学者也所在多有。学塾渊源甚早，其设置数量、从教受业人数及社会影响都超过书院、社学、义学等，也大量存在彼此混同、难以区分之例。各种学塾程度相差很大，甚至同一学塾之中，往往同时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教学，而且学塾并非全由民办。其教学的内容形式未必比其他教学机构更为守旧落伍。^[23]

与一般陈说有异，“私塾”概念晚出，不仅以西式教育体系为参照，而且用“国民教育”为标准，衡量检验固有的教育机制。其实“私塾”不一定“私”，也不一定“初”，更不一定“劣”。清季以来，政府一直仿行日本国民教育，试图统一标准。而中国幅员广大，千差万别，强行统一，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往往面临因噎废食的尴尬。况且国民教育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历届政府采取种种

强制性措施大力推行国民教育体制，并且施加强大压力以限制、改造甚至取缔私塾的情况下，被称为私塾的教育机构仍然顽强地普遍大量存在于城乡各地。政府方面，鉴于国民教育面对现实确有疏漏偏蔽，有时也不得不参照塾学做法，予以变通。清季对国民教育声音微弱的批评指责，大都被视为顽固守旧，实则背后往往牵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的权利控制，所以原有教育文化程度越高的区域，对学堂的抵触反而越大。直到民国时期，从事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人士以切身体验批评国民教育，人们才开始转变观念，有所正视。类似现象，至今仍然似曾相识，凸显此类事物绝非一个中西新旧进步落后的评价可以了得。

将中外截然不同的学校体制加以比附，并非教育史家的发明创造，还在清季改制过程中，因为担心改变原有学校引起波动，试图以学校以外的书院、社学、义学、学塾为基础，另行建立一套学堂体系。戊戌和新政时期，清廷两度下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社学、义学也分别改为小学堂。学塾则一部分改为学堂，大部被强制性改良。而原有的府州县学名存实亡，注定了自生自灭的命运结局。这些举措，成为后来教育史立论的凭借。民国时期的学人多少还能感觉到不相啻枘的情形，偶尔试图量体裁衣，另设框架。越到后来，相关的研究，即使严谨认真之作，基本取向都是加强和确定这样的框架，而不怀疑其适当和适用。关于书院、学塾的属性、程度之类的讨论争议，大体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努力将全体的各个部分强行纳入，安放到相应的位置。如此一来，以后设观念固然求得心安，于本事却渐行渐远。

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深化，使得上述情形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清季以来，西式学堂取代旧式学校，不仅要分科教学，而且以教科书为蓝本，在模仿日本编制教科书的过程中，各种知识陆续按照日

本化的西式系统初步被重新条理。担心这种情形可能存在某种危险倾向的学人，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警示，只是在中西乾坤颠倒的大势所趋之下，他们的担忧和呼吁，很容易被视为守旧卫道而遭到攻击排斥。将科学解释为教育的分科教学和学术的分科治学，当然有西洋的原型。可是科学的含义在欧洲各国并不一致，所以更多地还是日本的再创造。辛亥时期中国出现的各种史，如文学史、历史以及后来的哲学史等，大都是由日本人先行编撰，国人起初仿效，继而加以改造，其方向是将中国的固有学问也变成分科之学即科学。只是如此一来，经学化于无形，史学、文学、诸子学也失其本意。

清季兴学，新式学堂教育要分科教学，所用教科书，大都直接取自日本或模仿日本著述改编而成，包括中国历史以及各种专史。而在尝试分科治学的过程中，以及各种杂志开辟栏目，也有如何分别才能妥当的问题。这时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不同程度地受西学分科的影响，试图用分科的观念重新条理本国的学术。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就明确表示要“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24]而且其变化绝不仅仅是稍有别，学案体以人为主，其书则以学为主。用分析的眼光，刘师培分为心理、伦理、论理、社会、宗教、政法、计、兵、教育、理科、哲理、术数、文字、工艺、法律、文章等16种学史。这显然已经开启附会套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学问的风气。只不过他们所受中国学问的熏陶相对较深，所以不如后来者更加彻底而且并不感到不相啻。

清季担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的陈黻宸，是提倡分科治学的先行者之一，在他看来：

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

而“古中国学者之知此罕矣”，

故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25]

这颇有些今天上下各方所鼓吹的跨学科的意味。尽管陈黻宸认为指中国无史言过其实，可是依照上述标准，没有这些分科的古代中国，史又从何而来呢？

清廷在纳西学于科学一再受挫之后，不得已转而宣布立停科举，旨在使学堂与科举合为一途，培才与抡才熔于一炉，让科举的规制，在学堂中得以延续。而士子的仕进之阶被堵塞，纷纷转投学堂，育才和蒙养统一起来，成为社会化的必由之路。分科教学与新的知识体系建构相辅相成，人的知识传承发生突变，各种教科的设置和教科书的编译，使中国迅速进入“科学”时代。原有的知识系统则逐渐被分解重构，如经学以读经、存古和经学课程等形式进入各级各类学堂，又逐渐退出，直到民初正式废止。断言科举废即经学亡未免过当，不过经学进入学堂，却由原来占据正统地位变成诸科之一科，已经注定其命运归结。以“科学”的观念看，各学科当然都是平等的。但中国社会为伦理政治，没有笼罩性的宗教信仰，特重纲常伦理，礼制、礼俗和礼教，是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秩序的关键。近代学人一味就秦汉以上疑古，忽略独尊儒术其实是掌控认识两汉以下两千年历史文化的重要枢纽，独尊的时间累积起来或许不算长，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中枢。经学体制上退出历史舞台，又没有适当的替代，造成百年来中国人终极关怀的紊乱和空置，影响极为深远。

在“科学”尤其是分科之学方面，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至深且广的，是相对后起的日本和美国，包括学制建构、学科体系、课程设置、教科书的编撰以及教学方法等等。日美两国对于欧洲发源的种种

分科之学及其错综复杂的牵扯纠结，如因学科、学派、文化不同而生的差异与联系，同样难知就里，因而不同程度地进行过自认为必要同时也是不得不然的再度条理和整饬，使之界限分明，容易把握。可是如此一来，各个学科发生演化的渊源脉络痕迹消失不见，对于发源地不同学科、流派之间的争议也无从认识。中国因缘日、美而来的分科之学，看似清晰易辨，实则极易混淆而不自觉。若单以进化的观念审视，许多内容很难自圆其说。

今人即使不涉及价值判断，且有高度自觉，也难免为后来外在的观念所左右。近代学术大家钱穆研治历代政治制度极有心得，而且明确区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却仍然一开始就使用中央与地方的架构，梳理历代政治制度。实则中央与地方对应的观念并非历代制度本身所具有，而是明治时期日本的新概念。清季来华日本人士以此理解清朝体制，进而影响国人。尤其是织田万所著《清国行政法》，对中国朝野尤其是宪政改制的影响巨大。尽管如此，有过在京师大学师范馆任教习经历的服部宇之吉还是提醒日本人注意，清末民初有着某些复杂交错的关联，中国的地方官含义较日本为窄，直省与府厅州县有所不同。^[26]

清季改制之际，就连接受这些外来后出概念的官绅，一旦面对内外相维的清代原有设制，直省究竟是否地方，还是成为偌大的难题，令举国上下纠缠不清，头痛不已，找不出适当的破解之道，很难进入上下有序的状态。中国历史上的省，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原设在京师，为中枢行政机构，后来行省不过是皇权的分身。清中叶以后，直省的地位逐渐凸显，尤其是咸同光三朝，平兵燹，办洋务，兴学务，派留学，直省已然成为具有人事财政实权的单位。但在体制上，直省仍然不具备正式性。新政改制，地方自治模仿日本，因而仅及府厅州县，并不包括省一级，直省和督抚的地位极为尴尬。进入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省的地位属性，一直困扰着行政体制的设置及运

作。岁月流逝，原来的困惑看似已经不成问题，实际上不仅依然制约着现实社会的相关行事（如地方行政与税制层级划分），而且导致对中国历代体制认识的隔膜，使得相关研究的取向出现偏差，有时甚至用力越深，离真相越远。

第四节 中、东、西学的异同

赵炳麟、胡思敬等言官对游历和游学的批评，一般会断为保守甚至顽固。不过，在具有留学欧洲背景的严复看来，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不仅是舍近求远，甚至会南辕北辙。他说：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其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近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逾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27]

这样的看法与言官的批评不无契合之处。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清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以及东西各国官制的体要所在，的确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效法取鉴不可忽视的重要关节。晚清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虽然很大程度是明治日本影响的结果，并且造成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未必都是毫无疑义的进化。日本的影响无论在思维还是行为方面，都给中国新的观念应用和制度运行带来不少的困扰纠结。严复的意见在一段时期内不被普遍认同，在他供职的学部，据说也是东学派占了压倒性优势，不过却提醒国人注意，日本化

的西学，加入了许多东亚因素，其中不少是根据中国文化加以变异，以应对西学。如此一来，西学、东学与中学之间，关于同一事物，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事物，难免存在使用看似完全相同概念，实际上却是各说各话，无法交集的现象。

如果说严复的话是在东学与西学之间划出一道界限，章太炎则是干脆将中学与东学相分离。1910年，章太炎用白话写了《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的长文，对渐成崇洋之势的时趋提出批评，劈头就说：

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

中国古来有学问（当然有强弱之分），近来有心得（也有多少之别），“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

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什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甚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象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

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

总之，“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28]

章太炎所说，看似针对所有外国学问，其实主要对象还是日本，所以此文后来被日本学界斥为无视日本效法西洋取得的学术进步。民国时有学人据以指责章太炎在学术上拉车向后，可是一个世纪后的今日看来，所言却包含许多先见之明。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因为东学背景而更加难以把握。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特别是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和新政之后，乾坤倒转。此后中国的精神世界深受日本的影响，用于正式学科的许多名词，都是来自日本明治后的“新汉语”。其中有借用，有独创，有拼合，而且相当一部分源自中国，是来华外国人士为了翻译，与其中国助手共同发明。只是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并不流行，所以后来要从日本“逆输入”。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士，用一般日语很难因应西学的复杂，不得不借助表现力强而且简略的汉文古典。由此创造出数以千计的新汉语，既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又与中国的原典有异，与社会实情不符，在促使东亚进入世界体系、使得日本掌控了东亚精神世界话语权的同时，产生了误读错解中西历史社会文化的不小弊端。而知识的分科系统，无论在教育还是学术层面，近代中国多以日本为蓝本，有时争议的各方，引经据典的大都是不同来源的东学。其利弊得失，很有重新全面检讨的必要。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意。审时度势，或许有必要在思想学术领域来一次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

或者根本怀疑能否放弃后设集合概念去理解前人前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今人自以为一定比古人高明的表现。如果自以为是，不能虚怀若谷，守定后见，强古人以就我，当然只能缘木求鱼。其实，古今中外的那道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历史的事实联系使之天然具有可以把握的脉络，道理很简单，首先，古人自有其本意；其次，古人表达其本意时并不借助今人所用的概念；其三，古人的本意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异，有其发生演化的脉络；其四，从古人的本意到今人的解读之间，仍是前后联系、不曾断裂的历史进程。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能否历时性地理解把握，就要看学人的天赋、功力、机缘凝成的造化了。

辛亥前后，是日本影响近代中国最为广泛深入的时期。留学生、游历和日本顾问、教习所起作用最大，由此造成话语、学术系统和政治、社会、教育、司法、军事、财政各项制度的全面转型。明治维新后形成的知识系统和制度体系，早已让日本掌控了东亚的话语权和精神笼罩力，决定了清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极其深远。不过，这些变化未必都是进化。作为承接西学、影响中国的东学，在中西两面均有格义附会的副作用，导致对于西学 and 中国的误读错解。这也成为制约辛亥革命研究的瓶颈。用历史的方法重解历史，庶几可以沟通古今中外的联系，回到历史现场，伴随当事人一同经历历史的进程，从而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理解历史上的相关人事。

[1][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2]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燕京学报》新4期，1998年。

[3]关于四大金刚，说法不一，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在留学生中号称“四大金刚”；一说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四人，号称袁世凯旗下四大金刚；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为民初亲日派的四大金刚；一说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及曹汝霖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四妓，亦鼎盛一时，名为四金刚，宦途中人遂以曹、章、汪、陆喻之为林、陆、张、金。揆诸史事，前三说均有可议，第一说显然与史不合，第二说亦有可疑，第三说则应为口碑的延续。据曹汝霖自述，参合相关事实，四大金刚得名，当始于清季同在京师参与新政。

[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385页。

[5] 《更革京朝官制大概情形》，《东方杂志》1906年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第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

[6]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3—444页。

[7] 《厘定官制参考折件汇存》，宣统三年印。第1—14页。

[8] 参见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4—30页。

[9] 《御史胡思敬奏官制未可偏信一二留学生剿袭日本成法轻议更张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48页。

[10] 《奏定学堂章程》，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版，第201—203页。

[11] 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五八，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己亥；《议奏选派翰林出洋游学游历片》，《学部官报》第1期，1906年8月20日。

[12]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四，《学校考二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724页；《咨在京各衙门政务处议复给事中陈庆桂奏请推广游学游历文》，《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

[13] 《学部奏咨辑要》卷一，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第410页；《通行各省选送游学生大略办法电》，《学部官报》第1期，1906年8月20日。

[14] 《学部奏咨辑要》卷二，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第436页；《通行京外各衙门给咨出洋游历简章文》，《学部官报》第4期，1906年10月28日。

[15] 《学部奏咨辑要》卷四，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第499—500页；《通咨京外各衙门嗣后派员赴东游历应定到东期限文》，《学部官报》第69期，1908年10月15日。

[16] 《附奏派员出洋考察学务片》，《学部官报》第3期，1906年10月18日。

[17] 张之洞：《札行选派实缺各州县自备资斧赴东游历》，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3页。

[18] 袁世凯：《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1—1162页。

[19] 参见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晚清东游日记汇编》。该书先后由杭州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名称也有所变动。

[20]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21] 《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5页。

[22] 王宝平：《〈日本書目志〉出典考》，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57号，第13—28页，平成二十二年六月。

[23] 此节参考左松涛博士为《清史·教育志》所写“书院、社学、义学、学塾篇”的内容。

[24] 《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23日。

[25] 《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第676—677页。

[26] 服部宇之吉：《支那研究》，京文社1916年版，第10—49页、第101—148页、第367—380页。

[27] 《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1页。

[28]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2—517页。

第五章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近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业，与外国来华势力的关系极为密切。早期中国的报刊、电影、广播及图书馆等，均在欧美等国外来传媒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日本的近代大众传播业，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美来华媒体的辐射影响，一度甚至原版翻印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作为本国的报刊发行。1890—1930年代，中日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起点和终点的两次战争之间，经历了一个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相对稳定期。在此期间，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各地城乡，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对中国社会以及中日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与趋向的影响。其中日本在华所办大众传播业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欧美列强。

对此，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福庆研究员在《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版）一书中，第四章即“新闻传播事业”，专章讨论了日本在华所办报纸、通讯社及其对中国政局的态度影响。以此为起点，根据当时中日朝野各方的调查统计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有关史实进行梳理，除尽可能补充订正时空人方面的疏漏错误，扩大关注的视野之外，着重阐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规模、类型与态势。

二、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对中国社会所起影响的方面、程度与趋向。

三、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如何作用和反映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所涉及的范围不含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第一节 发展概况与类型

依据时代条件和技术发展，这一时期的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基本以报刊为主体，以书籍、广播、电影为辅助。

日本来华人士在中国办报，最早可以追溯到1890年发刊的日文《上海新报》。^[1]该报由松野平三郎所办修文堂书局创办，周刊，不久即停刊。两年后，又有上海日本人青年会的《上海时报》发刊，也历时不长。1894年1月，上海乍浦路共同活版所和东本愿寺分别用日文、中文出版《上海周报》、《佛门日报》，后者是目前所知日本在华最早的中文报纸。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日本人先后在上海、福建、天津、武汉创办过14种报刊。^[2]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迅速扩张，与此相应，从1907年起，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报刊增长较快。而日本在华报刊增长最为密集的时期，是1917—1923年，每年净增长均超过两位数，最高的1922年达21份。到1931年，日本人在中国至少举办过260种报刊通信（见本书155页附表一）。

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日本在华报刊的规模与形态。以语种分，有日文189种，中文43种，中日文合刊11种，英文及中日英文合刊各5种，俄文、日韩文合刊各2种，蒙文、日俄文合刊、中韩文合刊各1种，共使用6种文字。

以形式分，有日报108种，周刊23种，月刊28种，通信24种，双日报5种、旬刊6种，半周刊和半月刊各3种，双月刊、季刊及每年5期刊各1种，年刊1种，其余不详。种类可以说相当齐全。

以地域分，奉天最多，达42种，其他依次为上海37种，青岛21种，天津20种，北京、大连各19种，哈尔滨17种，济南12种，汉口11种，安东10种，长春8种，铁岭6种，厦门4种，福州3种。东北虽较集中，但在关内举办者达135种，占53%。除上述地方外，还延伸到广州、汕头、重庆、思明、烟台、江西、香港等地。

260种报刊通信中，有20余种为前后改刊。辛亥前有少量报刊虽寄名日人，实际上由华人编辑经营，如早期的《苏报》、《国闻报》、

《重庆日报》。同时，也有日本人收购他人报刊股份，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而名义上并不归属日本者，如1903年的《汉口日报》、1920年前后的《文汇报》及多种英文报刊。此外，在日本国内还创办过几种用中文编排、专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报刊，如1904年创刊于横滨的《日华新报》。

由于各报的兴废期有别，同一时间存在的数量随之变化。将日本在华大众传媒的绝对增长与中国报业的整体状况以及列强在华传媒的相应增减作一比较，概况有如下表：

附表二：1910—1930年中国各语种部分报刊数量比较表^[3][illegible]

自1913年起，在华日文报刊数量上即超过在中国各种外文报刊中长期占优势的英文报刊，并且差距不断拉大。此外，日本在华报刊并不限于日文，而英文报刊则分属于中日英美等国。1919年，日属非日语报刊即有中文13种，中日文合刊4种，英文3种，日韩文合刊、中韩文合刊及蒙文各一种。

随着传媒业的增长，从业人员也逐渐增多，到1915年6月，日本在华记者及新闻社社员已经达318人。^[4]当时中国的专业新闻人员很少，1913年汉口从事报业者仅33户。^[5]报社最多的上海，1930—1935年间，各年度注册的职业记者分别为83、80、57、61、55、66人。^[6]而日本方面对实际从业者的统计，“七七”事变前北京共有新闻杂志社44所，编辑203人，记者420人。^[7]虽然中国传播业的实际从业人数远高于登记注册者，而北京的编辑记者也包括外国人士，各方面综合比较，日本在华职业新闻人员数量不可小觑。

报刊的势力与影响还反映在发行量及发行范围方面。据这段时期有发行销售数量记载的143种报刊统计，其中发行10000份以上的1种，50000份、30000份以上的各2种，10000份以上3种，5000份以上9种，3000份以上12种，1000份以上41种，500份以上24种，500份以下49种。1000份以下的多为杂志通信。而对22种主要日属报纸的发行量进行多年份追踪显示，相对于其他报刊的增长速度较快，详见下表：

附表三：日本在华主要报纸历年销量表^[8]

报纸名 \ 年份	1919	1923	1930	1932	1933	1934	1936
上海日报（日文）	1300	2000		3500	3000	5000	
上海日日新闻（日文）	1300	2000		7000	3500	6000	5800
上海每日新闻（日文）	700	1000		7000	4000	4800	
顺天时报（中文）	4000	10000					
盛京时报（中文）	16000	14000	25000		10000		
闽报（中文）	1000	4500	3700				3000
香港日报（日文）	300	500	600				
全闽新日报（中文）	600	600	1600				5000
青岛日报（日文）	1500	5000	2800		4000		7000
汉口日报（日文）	900	850					
汉口日日新闻（日文）	600	500	740				780
满洲日报（日文）	11000	39582	93000		50000		
天津日报（日文）	750	1000	800				
泰东日报（中文）	2800	11498	20000				38000
满洲报（中文）		18000	60000				150000
大连新闻（日文）		12500	57000		6000		
满洲日日新闻（日文）	9500	27000					
天津日日新闻（中文）	2000	800					
京津日日新闻（日文）	700	1000	1600				
济南日报（中文）	900	1000	2700				
福州时报（日文）		450	250				
Manchuria Daily News（英文）	1000	980	1000				6500

由于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率低，报刊的直接阅读层面较窄，因而发行量一般不高。清末报纸发行鲜有超过万份者，一般过千份的报刊，就需要大量外地订户或零售。民国以后，虽然近代教育逐渐展

开，信息需求不断扩大，发行量日见上升，但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据《内政年鉴》统计，1935年全国32种主要日报中，发行150000份以上的2种，50000份的1种，30000份、20000份以上各3种，10000份以上7种，5000份至9000份的则有16种之多。^[9]另据1932年12月上海邮政局挂号杂志记录，销量最高的为125000份，仅一种，40000份的2种，20000份的9种，6000份至10000份的21种，1000份至5000份的72种。^[10]发行量高，既表明受众多，也反映覆盖面广。从1931、1934、1935年度上海各报的本埠外埠销量比率看，发行量稍高者无不依赖外地订户。

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大都市，据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的67.97%，居全国之首。^[11]在此发刊的中外文报刊，均有很大部分销往外地。由此可见，发行量相当大的日本在华报刊，影响并不限于当地。早期著名报人汪康年与其师友间的来往书札表明，还在《同文沪报》、《亚东时报》时期，上海的日系报纸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发往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四川，在此之前的《汉报》，也销往长沙等地。

报刊以外，图书、电影、广播也为来华日人所瞩目，不同程度地有所涉足。

附表四：上海各报本埠外埠销量比率表^[12]

报别		1931 年	1934 年			1935 年		
			销数	本埠 (%)	外埠 (%)	销售数	本埠 (%)	外埠 (%)
中文 日报	申报	150000	150000	40	60	155900	38	62
	新闻报	150000	150000	40	60	147958	54.7	45.3
	时报	93000	95000	47	53	80000	55	45
	时事新报	80000	90000	60	40	54000	40	60
	晨报		32000	54	46			
	中华日报		49000	50	50	39000	40	60
	民报		10000			9540	67	33
	上海商报		30000	70	30	12000	65	35
	市民日报		5000	80	20			
中文 晚报	大晚报		50000	80	20	40000	82	20
	新夜报		8000	90	10			
	大美晚报		8000	99	1			
	新闻夜报		11000	98	2	29870	68	32
日文报	上海日报	3500	5000	60	40			
	上海日日新闻	7000	6000					
	上海每日新闻	7000	4800					
英文 日报	字林报	8650	9500	85	15			
	上海泰晤士	3250	5000					
	星期泰晤士	5100	8000					
	大陆报	7000	5000	80	20			
英文 晚报	大美晚报	6000	7000	97	3			
法文报	上海日报	1725	2000					
德文报	上海德文日报		1800					
俄文报	上海柴拉报	3500	3500	80	20			
	斯罗沃	2000	5000	75	25			
	考毕克		4500	80	20			

日本在华图书业可分为编辑、出版、发行几个方面。甲午战后，中国人鉴于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迅速发展强盛，觉得应当通过日本学习

西方的富强之术。1898年，康有为上《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认为中国直接翻译西书，“其途至难，成书至少”。而日本“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主张在京师设立译书局，“专选日本政治书之佳者”译成中文，并按字数、等级奖励天下翻译日语书的士人，使“日本群书可二三年而毕译于中国”^[13]。当时康门弟子开设的广智书局即翻译印行日本教科书多种。

戊戌政变后，东文书的翻译出版虽一度停顿，但1901年清廷恢复新政，加上留日学生大批增加，翻译日语书一时成为风尚。据统计，1896—1937年间，至少翻译出版了日文书2717种。^[14]其中并不全是中国人自己的成果。田野桔次等人1898年开办于上海的东文学社，即“拟译印各书，为各学堂教科之用”。当年春季就印行《支那通史》一部，“已译未印及未译成之书尚有数十种，并拟陆续付梓”。^[15]

1898年11月，冈本监辅、吾妻兵治等人以日本与清韩三国利害攸关，唇齿相依，日本经过锐意革新，可与泰西列强比肩并辔，清韩两国却守旧不移，特纠合同志，创设善邻协会和善邻译书馆，准备翻译日本和泰西有用之书，输入清韩，以俾启发新智，扫除积弊，实现富强文明。^[16]关于此事，长期旅居日本的王仁乾函告汪康年：

兹日邦创设善邻译书馆，专就西文新法诸书翻译汉文，主笔者为重野成斋，修史局员冈千仞、龟谷省轩，皆可称齐国仲子者也。其书各从专门分译，与前日邦所译国史迥不相同。复又招聘敝族兄黍园为之校正删润，自正月开馆，已译出《植物学》全册，将付手民。近又译《军政诸法》，他时印刷成册，即运上海销售，皆托乐善堂岸田吟香经理也。如贵报有欲译之书，亦可相商代译。^[17]

一般而言，将母语或第三种文字翻译成母语以外的文字，绝非易事，善邻译书馆之所以迎难而上，除了明治时期日本士人对于自己的

汉文水准颇有自信外，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词汇不统一，西书征引繁多，不易领悟，却容易引起歧义，中韩人士翻译，难以准确把握，凸显要旨。这些面向中国的汉译书籍，虽然翻译印刷是在日本，销售发行却要面向中国。王仁乾为此还致函汪康年，介绍善邻译书馆到上海推销所译书籍的日本人士：

兹有日本友松本正纯、吾妻兵治二氏，译成《大日本维新史》一册、《日本警察新法》一册、《战法学》一册、《国家学》一册，携书来沪销售。但二氏初次到申，人地生疏，言语未谙，诸恐不便。欲得沪上文人士墨客相与结契，藉作周旋，嘱弟作书为介，持访尊馆，务乞推情酬接，以联海外之盟。在二氏颇工汉学，可倩不律以代舌人也。^[18]

1902年，商务印书馆还专门聘请长尾槿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三位日本人针对中国情况编写小学教科书，翻译出版，大为畅销，于是再接再厉，续编10册。^[19]当然，和传教士的翻译活动类似，尽管日本人的汉文水平高得多，仍然需要中国士绅文字上的协助。

出版方面，到1915年6月，来华日人从事印刷雕刻业者达407人，其中东北地区110人，天津76人，北京25人，上海180人，汉口12人，济南、长沙各2人。另有从事书报贩卖者53人，其中东北5人，北京12人，济南3人，上海30人，汉口3人。^[20]一些国人自办的出版社，也与日本人关系匪浅。20世纪初成立于上海的作新社，即得到日本帝国妇人会会长下田歌子的资助。号称亚洲最大出版社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在许多方面与日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该馆1900年接盘日本人的修文印刷局。1903年日本金港堂来沪筹设印书公司，商务印书馆与之合作，不断引进日本技师和印刷技术。直到民国初年，日资还占商务印书馆全部股份的三分之一。1914年虽收回日股，但并未中断引进日本技师和技术。这时，日本在沪设立的印刷厂达十余家，占上海书业（包括印刷出版业）的10%。^[21]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图书业最为发展，以大连为例，自1905年日本人开设书店起，到1916年增至十二三家。1920年3月设立的满洲书籍商组合，成员达50个，均为日籍。1930年，该组合成员发展至73个，每年出版发行各类图书达数百万册，以教科书为主，多为日文。
[22]

近代中国的电影市场长期由美国影片独占鳌头，加上以上海为中心的国产影业畸形繁荣，日本势力不易挤入。1926年以前，日本人只在上海开办过名为东西电影公司的制片公司，另在上海、大连、安东等地开办过7家经营洋片发行的公司。^[23]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经工部局警务处检查上映的影片共6911240英尺，其中主片723张，短片及新闻片1329张。以国别论，美国占78%，英国2.5%，中国国产8.5%，日本10%，法、德、意、苏等国共占1%。^[24]日本所占比例虽然远不及美国，却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两倍有余，甚至比中国自产还多。这一情况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935年中国共输入外国影片378部，其中美国285部，英国28部，苏联8部，法国4部，德国2部，捷克、荷兰、印度和日本（东华公司）各1部。^[25]

中国广播事业的兴起与日本关系密切。1922年冬，美国驻日本记者奥斯邦（Mr. E. Osborn）劝旅日华侨张某在中国办广播，以华人资本，假外人名义，在上海大来洋行屋顶设一50瓦特电台，同时组建中国无线电公司，出售收音机。1923年1月24日下午8时开播，是为中国境内出现的首家广播电台。^[26]这时日本国内尚未正式办广播，但来华日人很快设法跻身此项新兴事业。1924年，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福开森路设台，分10号出租，大连亦能收听，日商神户电气公司排第5号，每星期日下午7—9点，用日语报告新闻并播放日本音乐。
^[27]1925年7月，由关东州递信局管辖的大连广播电台开播，最初全用日语，后增设中文节目。1926年1月，日属《上海每日新闻》社添设无

线电发送部，广播新闻，放送音乐，不久停播。^[28]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电讯管制，日本在华广播主要发展于东北地区。到1932年，已建立广播电台4座，听众达8000余户。^[29]

此外，由于中国的国产工业跟不上广播发展的进度，发送和接收设备大都依赖进口。到1930年代，中国已有广播无线电台89座，接收器仅在上海国际电讯局注册的已超过63000具。1933—1935年，无线电收音机及零件的进口额分别为1940556、2338252、2210978金单位。其中“最堪注意之增加者莫如日本，该国货物之载至中国者为数至庞”。^[30]

日本在华传媒的势力还特别体现于通讯社的组织与营运。传媒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迅速、广泛、大量地传递信息，其来源除各自的记者通信员独家采访外，主要依靠通讯社提供。中国自1904年起，虽已自办通讯社，但在1930年代以前，组织欠完善，规模小，覆盖范围窄，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加上长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政局分裂动荡，不仅国际信息，就连国内消息也大都得自外报外社。其中日本的通讯社尤为重要。

日本在华通讯社有电报通讯社、新闻联合社、商业通讯社三家，前两家势力最盛。联合社前身为1914年日侨波多博创办的东方通讯社，先在北京、广州、汉口、奉天等地设立分社。1920年，日本著名记者多户受外务省派遣来华组织通讯社，经协商，将东方通讯社改组为日本外务省正式的在华通讯机关。1926年5月，该社与日本国际通讯社合并为新闻联合社，因前此与路透社的协议所限，在华传递消息仍用东方通讯社名义，到1929年7月，才正式使用日本新闻联合社名称，1936年并入同盟社。该社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汉口、青岛、济南、满洲里、福州、鞍山、香港、广州等地设有分社。据1930年8月的记录，国外各地发往东京总社的消

息，欧洲145条，6814字，中国421条，16735字。而关于中国各城市的信息分计有如下表^[31]：

城市	上海	南京	北平	济南	天津	汉口	九江	青岛	广州
条数	214	43	66	5	9	77	1	5	1
字数	9832	1591	2487	248	224	2888	44	179	24

1929年后，日本在华通讯社已将重心转向为本土传媒提供信息，但是表仍然反映出该社在华掌握与发送信息的能量及效率。

同盟社原计划将电报通讯社也并入其中，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后者成立于1900年，最初仅为广告社，1919年开始向中国新闻界提供消息，很快便在上海、北平、青岛、济南、汉口、天津、长春、广州、哈尔滨、大连、沈阳等地开设支局12处。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电报通讯社率先在新首都开办分社，向中国、日本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时事通信和经济通信。^[32]该社与新闻联合社在一定时期内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广大地区的资讯。

为了保障和控制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递，日本凭借资金优势，不仅临时包占各种通讯手段，还积极插手无线电讯事业。1918年2月，三井洋行与北京政府海军部签订借款合同，在北京东郊双桥建立大型无线电台，引起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但此后列强继续在中国境内私设电台，至1921年，已达22处，其中日本11处，美国5处，法国4处，英国2处。1925年又增加到58处，其中美国18处，日、英各15处。除军事、商业用途外，主要是为各传媒机构所利用。1926年10月，哈尔滨的日本商业通讯社即私设收发报机，收发新闻和商业电报。^[33]

第二节 功能与趋向

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为数不少，影响极大，不仅为中国同行所瞩目，其他列强在华有关方面也十分关注。

从受众的角度看，日本在华传媒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面向来华日本侨民，是为主体。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列强在各重要城市又相继建立租界，来华侨民不断增多。日本后来居上，从1921年起，日侨人数已超过其他各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五）。

日本侨民除集中移居东北地区外，还广泛进入中国沿海及内地的开放城市甚至未开放地区。1910年底，在京、津、汉、沪等地的日侨分别达到789人、1843人、1025人和8029人。^[34]到1928年，上述各地及青岛、济南、福州、厦门等地的日侨人数（含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人）均超过一千，而且除上海外，都超过当地其他外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六）

附表五：1890—1930年各国在华侨民人数表^[35]

年份 国别	日	英	美	德	葡	法	西	丹	俄	意	澳	荷	比	总数
1890	883	3317	1153	648	610	589	304	81	131	74	65	41	28	
1898	1698	5148	1056	1043	1082	920	395	162	165	141		87		13421
1905	16910	8493	3380	1850	2463	2143	249	201	682	412	250	181	273	
1910	65434	10140	3176	4106	3377	1925	400	260	49295	274	227	150	225	
1912	75210	8690	3869	2817	2785	3133	224	279	45908	537	238	157	247	144757
1913	80219	8966	5340	2949	3486	2292	136	354	56765	355	419	161	178	163827
1914	84948	8914	4365	3013	3187	1864	279	330	56319	409	202	218	173	164807
1915	101589	8641	4716	3740	3300	1649	308	352	56230	409	241	253	172	182402
1916	104275	9099	5580	3792	2293	2374	366	397	55235	400	296	277	286	185631
1917	144492	8479	5618	2899	2297	2262	300	450	51310	416	317	298	324	220485
1918	159950	7953	5766	2651	2417	2540	298	475	59719	535	271	377	360	144527
1919	71485	13234	6660	1335	2390	4409	272	546	148170	276	27	367	391	250991
1920	153918	11082	7269	1013	2282	2753	285	545	144413	504	24	401	592	326069
1921	144434	9298	8230	1255	3493	2453	286	547	68250	587	40	486	505	240969
1922	152848	11855	9153	1986	3596	2300	295	617	96727	623	71	486	598	282491
1923	201704	14775	9356	2233	3424	3361	323	608	85856	674	52	553	630	324947
1924	198206	14701	8817	2733	3657	2715	314	628	85766	681	100	448	537	320829
1925	218351	15247	9844	3050	3739	2576	216	626	79785	783	193	469	549	336841
1926	243573	23923	8302	2892	8980	3633	347	586	132692	761	217	383	387	434594
1927	253357	23173	6706	2976	9267	3355	409	610	150789	753	227	392	221	463113
1928	262412	22434	6746	2991	9252	3560	330	555	157491	794	225	387	285	482538
1929	273614	22268	7985	2968	9589	3933	418	623	68860	1094	165	551	329	443938
1930	283870	22371	7953	4143	8492	3172	396	602	110102	901	228	625	302	460924

附表六：1928年中国各地日侨外侨人数对照表^[36]

城市	日侨	外侨	城市	日侨	外侨
北平	1987	1223	上海	27720	37448
天津	6140	4017	汉口	2051	1690
青岛	13870	628	福州	1371	653
济南	3138	124	厦门	6698	701

外国在华侨民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需要有了解外部信息，相互交换情报，代表和表达本群体的利益意愿，与当地社会交流沟通的工具。日本来华侨民以中小商户居多，据1910年度的海关报告，1905、1910年度日本在各国对华贸易总额中只占4.12%和15.98%，远不及英国（50.78%、40.97%），但是商馆数却分别达729所和1601所，大大超过英国（434所、601所）。^[37]最早创办于上海的几种日文报纸，即反映来华日商扩大中日贸易的要求，强调“内容注重贸易事项，期以逐渐扩充而为日清贸易之木铎自许”。^[38]还有一些报刊则为满足侨民的娱乐文化需求而设。

随着人数的增长，来华日人内部出现分化，一方面，各种利益功能团体应运而生，相继创办了青年、妇女、文学等刊物，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出现对立，在青岛，代表资本家的《青岛日报》和代表劳动者的《青岛日日新闻》相抗衡；在天津，保守的《天津日报》与激进的《京津日日新闻》相角逐。

其二，面向占领地区的非日籍居民。甲午战后，日本割占台湾，日俄战后，又夺取沙俄在东北的地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乘机抢占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一面使用军政强制手段，实行高压，一面推行殖民教育，举办传媒，作为向被

占领地区的中、朝、蒙、俄等籍民众进行殖民宣传的文化统治工具。以后这种性质的传媒在东北和关内大量开办。

其三，面向中国公众。这主要是由中文报刊所扮演的角色。最早创办的《佛门日报》，即“专以济度支那人之目的”^[39]。东亚同文会系统的报刊在这方面影响最大。早在同文会时期，就计划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设立汉字新闻。东亚同文会成立后，更提出“在各形胜扼要之地发刊新闻杂志，以此为清国舆论之木铎，成为启发诱导之机关”。^[40]该会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等地举办或接办《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国闻报》、《汉报》、《闽报》。天津支部长中岛真雄于1902、1906年分别在北京、奉天创设的《顺天时报》、《盛京时报》，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显著位置。此外，《全闽新日报》独占厦门报坛达十余年，宗方小太郎一度主持东方通讯社上海分局，井手三郎则主持在华历时最久的日文报纸《上海日報》长达25年，影响均极为深远。

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一些原来专用日文的报刊相继添设中文附刊，或开辟中文专栏，或另出中文版，如《汉口日报》、《上海日日新闻》等，以求扩大对中国公众的影响。

其四，面向本国的有关人士、各国在华侨民以及国际社会。日本在华传媒多为侨民及对华利益团体所办，利害相关，尽力促使本国各界人士关注对华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等事情。1890年，恰好是荒尾精率领200名日本师生到上海创办东邦协会，《上海新报》值此问世，反映了日本对中国问题关注的趋向。1896年3月创刊的《上海时事》，在“发刊旨趣”中便称：“马关条约订定后，清国续开四港，两国贸易，势必日炽，本邦贸易家应审知上海商界之形势，故出此刊以助之。”^[41]

日本在华势力的急剧扩张，势必与其他各国侨民及其所属国的利益发生碰撞、摩擦和冲突，同时，作为后起的亚洲强国跻身于国际竞争场，其行为也会引起由欧美列强主导的国际舆论的监督评判。为此，日本侨民和政府需要通过自己掌控的传媒来表现和解释其在华言行，影响各国在华侨民的对日感情及国际舆论。日本在华的两大通讯社，即同时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发送消息，还专门创办英文报刊，直接面向各国侨民及国际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不仅激发中国的反日浪潮，也触犯了列强的在华利益，京津等地的英文报刊借机大加抨击。有鉴于此，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创办一家与中文《顺天时报》影响相匹配的外字新闻，遂由外务省拨出创立费及初年度经常费共63190圆，于1919年12月在北京创办英文North China Standard，作为言论机关，并倡导实业家予以资助，对其他国家的英文报刊展开舆论战。^[42]

作为外强在华大众传播业的一部分，日本在华传媒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代表和鼓动日本的侵略扩张欲望，并使之具有合理化假象，又强制性地传导西化的近代文明，刺激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并带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着重表现于以下三方面：

其一，输入各种与传媒有关的技术工艺，使中国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具备必要的技术条件。中国虽然是造纸印刷术的发源地，但由于社会需求的局限，技术发展十分缓慢，很不适应近代传媒集中、大量、高速的要求。直到19世纪后半期，中国仍然普遍使用木刻雕版，不仅制作周期长，而且一次只能印几百部。尽管在西洋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报业的起步早于日本，但印刷术的普遍进步，则与日本关系密切。“在中国最初使用纸版者，为日人在上海所设之修文堂书局。”彩色石印技术也由日本技师传入，“光绪二十余年，法人在沪设法兴书局，聘日人制彩色印版，始能印浓淡分明之图画”。^[43]直

到民初，上海能够五彩石印的几家印刷厂，仍是“绘石打样者皆请日本技师”。^[44]1930年代以前在中国历时最长、出书最多、规模最大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技术方面长期依赖日本。如1903年制造照相铜梓版，1904年雕刻黄杨木版，1905年彩印画石落石及雕刻铜版，均聘请日本技师。1918年还进用日籍技师指导马口铁印刷术。^[45]汉口报馆使用转筒机器，也由日本人所办的《湖广新报》发端。此外，日本报刊通讯社的采访、编辑和经营方式，不断为中国同行学习仿效，如分早晚刊及小品副刊等，即由日本在华报刊导入。

其二，重要的信息源，特别是戊戌变法后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主办的报刊多被封禁，少数幸存的外籍报刊，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此后，中国的民办报刊大幅度增加，但所获取刊载的信息仍然大量来自外报外社。民初党争激烈，各报所发消息多带党派私见，不能公正反映事实，公众反而相信外报的报道。1913年，中国报人姚公鹤在上海与旧同学日友井上氏相遇，井上鉴于中国党争恶习，说：“此后中国人将不能有办报资格，异日中国舆论且寄于外报矣。”^[46]语虽尖刻，却不幸而言中。

袁世凯当政及军阀割据混战时期，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急遽上升。识者指出：

中国的内战给日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种机会，把持国内新闻凡十余年之久。

日系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一度成为舆论中心。英国的路透社虽然也按时发送中国各地的通讯，“但当时中国各日报对于本国的种种新闻，大都还是依赖日本的东方通讯社和电报通讯社”。^[47]东方社创立之初，“各中英文报纸都开辟东方通信专栏，竞相刊载其通讯，获得广大读者的极大信赖”。^[48]其原因一是中国自身缺少大型通讯社及时地提供国内外信息；二是中国许多省份的军政当局

聘用日本顾问，日本公使馆据此掌握大量确凿的内幕消息，由驻华公使定期向日本记者公布^[49]；三是日本通讯社分支多，分布广，组织严密，分类齐全，效率高。如电报通讯社上海支局，分通信、照相、广告三部，并与其他11所支局密切联系，以“神速之方法”，向上海及平津粤汉等地的中外公司、行号、报社、杂志社提供经济、时事新闻和广告、图片。尽管从1930年起发送重点已转向日本国内，但直到1935年，该局供给中国传媒的信息，“有时竞较本国通信者为详”。

《上海年鉴》的编者感叹道：“此乃大堪注意者也！”^[50]四是日本通讯社收费较廉，而且手续便利，为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国传媒所欢迎。

其三，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刺激影响。早期东亚同文会系统所办各报，秉承“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长维新之气运”^[51]的宗旨，反对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倒行逆施，公开支持维新派的革新事业。袁世凯统治时期，《顺天时报》在舆论界一片沉寂中独力坚持反袁立场，抨击君主制，支持民国，并拒绝袁氏的收买，名噪一时。尽管许多日本报人暗中别有所图，毕竟起到打击恶势力、揭露事实真相、促使民心朝向光明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少革新进步人士进入日属传媒担任华文编辑记者，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所属媒体，只要不触犯日本的利益，均予以容许甚至加以保护。

日本在华传媒在引进介绍日本化西式文明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心理。早期东文学社编译的各种图书，即为坊间书贾大量翻刻，广为流传。^[52]语言是文化的两大要素之一，而语言差异的重要方面，在于词汇量的多少。社会变化加速，各种新兴事物层出不穷，需要大量表达新概念的新符号。近代以来，至少有500个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新汉语输入到中国的词汇，成为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极高的常用或最常用词。^[53]这不仅促成由文言到白话的文体转变，而且

刺激了思维行为的变化。新名词所表达的新概念，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基础。如果取消这些词汇，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和交际便会发生严重障碍，甚至基本丧失能力。当然，由此也造成不小的困扰和纠结。由古代东亚体系的边缘跃升到近代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的日本，有史以来首次对由东亚体系中心跌落到世界体系边缘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结构发生大规模影响，成为两国关系态势捩转的重要标志。

第三节 影响中日关系

日本的在华大众传播业，对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起着直接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国关系变化的轨迹。

就近代报刊而论，中日两国的状况明显不同。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晚清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一直得不到社会成员普遍而充分的确认，民办报刊大量属于党团政派，采取反对或批评政府的立场。政府方面则不能公正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和规范传媒的行为。在无序状态下，报刊既有对政府约束制衡的作用，又加强了社会成员的分散离心倾向。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形似国民国家的发展途径，政府凭借国民的支持信赖，很快将传媒纳入企业化和规范化运行轨道，利用传媒增强政府的向心力，以动员国民并支配其思维行为。在有效地促进国家富强的同时，传媒的监督制衡作用相对降低。中日两国海外报刊的倾向反差更为明显。如果说中国的海外报刊大都属于政治反对派，日本在华传媒则几乎清一色想扮演国家正统代言人的角色。

日本的在华报刊，大体分为政府官办、民间对华利益集团举办、企业出资兴办以及侨民集股创办四种类型。直接由政府出资兴办者虽然为数不多，但重要刊物都不同程度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资助（有的通过民间团体或企业）。如《汉报》三年间收支相差4000元，由日

本海军军令部和外务省补助2500元，才能维持周转。^[54]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迅速强盛，中日、日俄等对外战争的胜利，成为验证政府举措得当行为正确的标志，举国上下，国民国权思想空前高涨。而传统的边缘受压情结以及害怕冒险侥幸获取的成果旁落的过敏性防范心理，使得日本国民视扩张为防卫的最佳手段。

受侵略行为合理性解释的驱动，日本在华报刊虽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奉行政府的对外方针，或在涉及本国利益时自愿成为国家的代言人。每当遇到各种困难时，也总是寻求政府的援助庇护。而日本驻华机构对日属报刊则尽力保护扶植，增强了侨民的向心力，使之与政府的政策行为相合拍。因此，即使那些与政府无关、甚至意见相左的报刊，也往往自觉地与政府的言行保持一致。1933年，国民政府下令境内的所有外国人传媒注册登记。到1935年6月，英美俄德等国的46家报刊依法登记，而日属报刊除北平的《支那之友》外，其余30家均拒不登记，集体采取对抗行动。^[55]

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至少有三重属性，即革新偶像、侵略凶神和岛夷倭寇，钦佩、警惧、愤慨、蔑视等复杂因素交织一团。面对甲午战后日本不断加紧侵华步伐，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随之激化。1907年、1909年、1915年、1919年、1922年、1931年，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风潮。同时，日本肆无忌惮的强劲攻势引起欧美列强的不安，各国媒体每每抨击其侵华行动，激起中国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共鸣。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中国人学习和仿效的榜样，特别是清末新政时期，几乎全面移植日本化的西式文明，直到民初才加以调整。而欧美各国当中也不乏支持日本之人。针对上述情形，在华日属传媒的基本口径如下：

一、鼓吹日中亲善，宣传同文同种，以亚抗欧，借以培植中国人的亲日感情，改善日本的在华形象，进而改变中国民众的对日态度乃

至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早期《汉报》宣称的三大主义中的两条，即为“一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使彼等产生对日之信赖。一明唇齿辅车之义，举一脉相承之实”。^[56]

二、直接为日本的侵华行动辩护，力图使之合理化。在“二十一条”、侵占青岛、巴黎和约等事件发生之际，面对中国民众的反对和国际舆论的批评，为了配合军事外交行动，一些日本在华报刊竭力鼓吹日本行为的正当性，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

三、维护日本在华利权，鼓动进一步“开发”中国地方实利，扩张日本的在华利益。特别是东北和山东等地的日属报刊，除了向日本国民和政府进行宣传外，尤其注重鼓动当地日侨积极发展，并且想方设法培养被占领地区民众对于日本的所谓“国民”感情。

四、反驳欧美各国在华传媒的反日言论，揭露其侵华事实。1919年日本在北京创办英文报，即鉴于Peking leader 对历次日本侵华事件均予以严厉抨击，不仅影响在华英美人的态度，而且向世界介绍中国人的反日意见，使国际舆论不利于日本。为了干扰国际舆论的导向，混淆视听，日本在华传媒利用在场人的身份，通过西文报刊发出异声，鼓吹同文同种等欺骗性言论，离间中国与欧美民众的关系，减少欧美舆论在中日冲突中对中方的同情，从而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

五、直接反驳中国传媒的反日言论，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种种辩护。

诚然，日本在华传媒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主张中日亲善与拥护政府方针也有所区别，但是，在日本不断加紧侵华步伐之际，只是一味提倡亲善，客观上便成为侵略合法性的烟幕和支撑，对日本政府的行为起到呼应作用，从而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此外，不少非官办日属报刊接受政府、军部或半官方团体的津贴资助，并被授予发表公式

文书的权利，形式上也成为政府的喉舌，加上许多编辑记者利用职业之便，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更被中国人视为侵略先锋。

日本对付在华中外传媒的种种手段，进一步加深了其将在华日属传媒作为侵略工具的印象。手段之一是金钱收买。由于日本的侵华野心过于直露，仅用本国传媒难以收到粉饰效果，取信于人，因此往往收买他报股权，以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造成舆论他出的公正假象，试图混淆视听。日俄战后，日本希望对侨居中国的欧美人有发表言论的机关，逐渐收买《文汇报》的股份，到1917年，已掌握了三分之一的股权。^[57]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时，日本又以定期或不定期发放津贴给编辑记者等方式控制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8种英文刊物。^[58]同一手段也施诸华报。早在1909年，日本驻汉口代总领事渡边省三就试图利用中国反对粤汉铁路借款风潮之机，收买《汉口中西报》和《公论新报》，“鼓吹排斥欧美之主义”，“隐约地宣传日本方面之主张”^[59]。以后又设法控制了《汉口新闻报》。

手段之二为恃强压制。对中国传媒的反日言论，日本在不能影响改变之时，便直接出面迫使中国政府强行封禁。1909年《民吁日报》、1915年《湖南公报》、1919年武汉《公论日报》、1932年上海《民国日报》、1935年《新生》周刊等，均因此遭受厄运。此法有时还施诸外报，如对Peking Leader，日本虽然特创英文报与之竞争，仍然不能如愿以偿。1932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指其侮辱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予以封禁。^[60]

随着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抵制日货风潮不仅使日商大受冲击，日本在华传媒也成为抵制的对象。特别是1919年的反日风潮，各日属传媒遭受重创，销量大减，发行量一度高达30000份的《顺天时报》降至4000份，《闽报》由3000份降至800份，《全闽新日报》则降至600

份。而一些主张反日的中外报刊则销量大幅度上升。^[61]图书方面的情况类似。当时各地图书馆日文藏书普遍超过西文，阅读者却为数甚少。文字差异的障碍之外，国民情感的厌恶以及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当是主要原因。

与日本的对华国策相协调，其在华传媒对中国历届政府均持批评反对态度。由于中国政府的权力长期式微，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对日属传媒又全力庇护，只能听之任之。如《汉报》公开反对顽固当朝执政，卷入维新派活动和自立军事件，张之洞也只能在发行方面加以限制。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和党治，健全其传媒系统，与日本在华传媒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冲突事件接连不断。在此形势下，以《顺天时报》和North China Standard为代表的一批日属报刊被迫停办，新闻联合社和电报通讯社两家通讯社也不得不调整方针，主要转而向本国及国际社会提供消息，加上1919年日本经济不景气，1930年银价低落，日本对华入口值降低，各公司宣传预算减少，对在华传媒的资助相应削减，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有进一步减弱之势。日本政府方面，则将重点转到在东北地区建立殖民文化体系，以及准备对华军事行动之上。通过和平与合法的途径方式无法实现的野心，终于要抛开一切伪装，直接诉诸武力了。

附表一：1890—1931年日本在华报刊通信一览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上海商业杂报	上海商同会		上海	1882			日文	
上海新报	松野平三郎		上海	1890.5		周刊	日文	
上海时事新报	上海日本人青年会		上海	1892			日文	
上海周报	乍浦路共同活版所		上海	1894		周刊	日文	
佛门日报	东本愿寺别院	佐野则吾	上海	1894.1	1000	日报	中文	
汉报	宗方小太郎	冈幸七郎	汉口	1896.2	1000	日报	中文	
上海时事	乍浦路 189 号		上海	1896.3			日文	
台南新报			福建	1896			中文	
国闻报	王修植	严复	天津	1897.10		日报	中文	
国闻汇报			天津	1897.12		旬报	中文	
闽报	中岛真雄		福州	1897.12	4500	双日刊	中文	后改日报
同文沪报	井手三郎	田野桔次	上海	1897	4000	日报	中文	
苏报	生驹悦		上海	1897		日报	中文	
亚东时报	乙未会	山根虎之助	上海	1898.5	1500	月旬刊	日、中	后改半月刊
消闲报			上海	1899			中文	同文沪报附刊
天津日日新闻	方若 西村博	郭养田	天津	1901.9	2000	日报	中日文	国闻报改
燕京时报	中岛真雄		北京	1901.10		日报	中文	
北京公报			北京	1901			中文	
顺天时报	中岛真雄	平山武靖	北京	1902	30000	日报	中文	燕京时报改
岭东日报			汕头	1902		日报	中文	
北清时报	西村博		天津	1902			日文	
支那小报			上海				中文	
北支那每日新闻	丰冈保平		天津	1903.8		日报	日文	
上海周报	竹川藤太郎		上海	1903.12		周刊	日文	
上海新报	杉尾胜三		上海	1903.12		周刊	日文	
汉口日报		吴沃尧	汉口	1903	3000	日报	中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消闲录			上海	1903			中文	消闲报改
时报			厦门	1903			中文	
上海日报	杉尾胜三	岛田数雄	上海	1904.3	5000	日报	日文	上海新报改
同文报			上海	1904			中文	
江报			江西	1904			中文	
重庆日报	竹川藤太郎	下小吾	重庆	1905.1		日报	中文	
汉皋日日新闻	小川爱日郎	泽村幸夫	汉口	1905	1000	日报	中文	
青龙报			天津	1905			中文	
辽东新报	末永纯一郎	难波胜治	大连	1905		日报	日文	
汉口贸易研究所报	汉口贸易研究所		汉口	1905			日文	
盛京时报	中岛真雄	菊池真二	奉天	1906.9	25000	日报	中文	
安东新报	金子弥平	川俣笃	安东	1906.10	2300	日报	日文	
奉天每日新闻	松宫干树	三井实雄	奉天	1907.5	3500	日报	日文	
满鲜日报	野口多内		安东	1907.6		日报	日文	
安东 Times	金村长所		安东	1907.6			日文	
内外通信	合田愿	合田愿	奉天	1907.7	1300	日报	日文	
汉口日报	冈幸七郎	冈幸七郎	汉口	1907.8	1000	日报	日文	
满蒙实业新报	椿井必治		安东	1907.9		日报	日文	
全闽新日报	善邻会	田中均	厦门	1907.9	5000	日报	中文	
满洲日日新闻	星野锡	半野丰实	大连	1907.11	27000	日报	日文	
奉天日日新闻	庵谷枕	田原丰	奉天	1907.12	4000	日报	日文	
满洲日报	冈部次郎	小川义和	牛庄	1907.12	4000	日报	日文	
芝罘日报	桑名贞次郎	于辑廷	烟台	1907	550	日报	中文	
辽阳新报	渡边德重	渡边德重	辽阳	1908.3	1000	日报	日文	
东边时报	金村长所		安东	1908.9		日报	日文	
安东每夕新闻	嘉纳三治		安东	1908.11		日报	日文	
泰东日报	金子平吉	风见章	大连	1908.11	38000	日报	中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南满日报	矢野勘		奉天	1908.12		日报	日文	
北满洲	布施胜治		哈尔滨	1908		旬刊	日文	
辽鞍每日新闻	渡边德重		辽阳	1908		日报	日文	
满洲新报	冈部次郎		营口	1908		日报	日文	
长春日报	箱田琢磨	泉廉治	长春	1909.1		日报	日文	
满洲新报			大连	1909.2		日报	日文	
大陆日日新闻	吉野直治		奉天	1909.6		日报	日文	
香港日报	松岛宗卫	松岛宗卫	香港	1909.9		日报	日文	
北清时报	西村博之		天津	1909		日报	中文	
The china Tribune	松本均平		天津	1909		周刊	英文	中文名大宝报
天津日报	西村博之	真藤弃生	天津	1910.1	1000	日报	中文	北清时报改
Manchuria Daily News	高柳保太郎	中野升前	大连	1910.11	6500	日报	英文	
间岛时报	山崎庆之助	山崎庆之助	延吉	1910	750	半周刊	日、韩文	后改双月刊
铁岭新闻			铁岭	1910		日报	日文	
吉林时报	儿玉多一	儿玉多一	永吉	1911.2	400	周刊	日文	
铁岭时报	西尾信	西尾信	铁岭	1911.8	600	日报	日文	
新支那	安藤万吉	藤原镰兄	北京	1912.3		周刊	日文	
奉天日日新闻	矢野勘		奉天	1912.9		日报	日文	南满日报改
日华公论	森川照太	桔朴	天津	1912		周刊	中、日文	
东报	布施胜治		哈尔滨	1912		日报	俄文	
安奉每日新闻	伊藤唯熊	后藤森三郎	本溪湖	1913.4	470	日报	日文	
满洲重要物产商况日报	照井长次郎			1913.7		日报	日文	
新支那	安藤万吉	藤原镰兄	北京	1913.9	1000	日报	日文	
鹤泪	田岛利三郎	田岛利三郎	汉口	1913.12	200	周刊	日文	
上海	佐原笃介	西本省三	上海	1913	1000	周刊	日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北满洲	浅见竞	林原吉次郎	哈尔滨	1914.7		日报	日文	
北满洲	浅见竞	林原吉次郎	哈尔滨	1914.7		半周刊	中文	
满洲通信	武内忠次郎	藤曲政治	奉天	1914.8	250	日报	日文	
上海日日新闻	宫地贯道	岛田数雄	上海	1914.10	7000	日报	日文	
长春商业时报	伊月利平	伊月利平	长春	1914.11	350	日报	日文	
满洲野	迫田采之助	迫田采之助	铁岭	1914			日文	
天津评论	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	佐藤总三郎	天津	1914			日文	
东满通信	安东贞元	安东贞元	间岛	1915	80	双日刊	日文	
青岛日报	鬼头玉汝		青岛	1915.1		日报	日文	
青岛新报	小谷节夫	关世男	青岛	1915.1	7000	日报	日文	
青岛新报	鬼头玉汝	鬼头玉汝	青岛	1915.1	1500	日报	中文	
大青岛报	小谷节夫	久慈宽一	青岛	1915.6	1500	日报	中文	
齐鲁时报	冈伊太郎	冈伊太郎	济南	1915.8		双日刊	日文	
山东新闻	川村伦道	滨冈福松	济南	1916.6	1000	日报	日文	
山东新报	小村雄三		济南	1916		日报	日文	
济南经济报	冈伊太郎	冈伊太郎	济南	1916.7	500	日报	日文	
实业周报	汉口日本商业会议所		汉口			周刊	日文	
济南日报	平冈小太郎	滨冈福松	济南	1916.8	2700	日报	日文	
天津商业会议所 时报	天津商业会议所	小林阳之助	天津	1916.8	450	半月刊	日文	
北支那通信	滨冈福松	滨冈福松	济南	1916.12	200	日报	日、中文	
奉天评论	由井滨权平	由井滨权平	奉天	1916.12	300	月刊	日文	
大陆日日新闻	石本贯太郎	五百藏正吉	奉天	1917.1	4000	日报	日文	奉天日日新闻改
共同通信	菊池贞二	菊池贞二	奉天	1917.2	100	日刊	日文	
山东新报	长谷川清	小川靖彦	济南	1917.5	1200	日报	日文	
奉天商工月报	奉天商工会议所		奉天	1917.7		月刊	日文	
奉天新闻	佐藤善雄	远藤规矩雄	奉天	1917.9	4000	日报	日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日本及支那	井上孝之助	井上孝之助	北京	1917.9			日文	
铁岭每日新闻	迫田采之助	罗率真	铁岭	1917.11	420	日报	日文	
大连经济日报	松本杉		大连	1917.12		日报	日文	
满洲商业新报	山口忠三	横泽宏	大连	1917.12	2500	日报	日文	
上海と日本人	清		上海	1917		月刊	日文	
北满日报	箱田琢磨	泉廉治	长春	1917	2300	日报	日文	长春日报改
经济周刊	井村重雄		汉口	1917		周刊	日文	
中和报	山下仲次郎	山下仲次郎	厦门	1918.2	2000	旬刊	中文	
蒙文报	中岛真雄	菊池真二	奉天	1918.3	2000	周刊	蒙文	附属盛京时报
福州时报	津田七郎	山田宽太郎	闽侯	1918.5	450	半周刊	日文	1930 年改日报
满蒙日报	渡边寅次郎	渡边寅次郎	郑家屯	1918.5	400	日报	日、中文	
京津日日新闻	森川照太	桔朴	天津	1918.6	1600	日报	日文	
奉天每日新闻	松宫干树		奉天	1918.7		日报	日文	内外通信改
满洲及日本	斋藤善之助	斋藤善之助	奉天	1918.7	500	月刊	日文	
山东经济时报	半吉	半吉	青岛	1918.7	1000		日文	
胶济时事新报	冈伊太郎	户冢易	济南	1918.10	800	日报	日文	济南经济报改
汉口日日新闻	宫地贯道	奥野四郎	汉口	1918.11	780	日报	日文	经济周刊改
上海经济日报	深町作次郎	并木如秋	上海	1918.11	1000	日报	日文	
西伯利新闻	小島七郎	阿部信一	哈尔滨	1918.12	4500	日报	日文	
哈尔滨新闻	松本诚之	真野玄澄	哈尔滨	1918.2	2000	日报	日文	
奉天满洲新闻	矢野勘		奉天	1918		日报	日文	奉天日日新闻改
哈尔滨通信	大河原厚仁	大森清腾	哈尔滨	1918	500	日报	日文	
台湾公会会报	台湾公会	冈本要八郎	厦门	1918		月刊	日文	
哈尔滨商品陈列馆馆报	哈尔滨商品陈列馆	北浦精	哈尔滨	1919.1		月刊	日文	
开原新报	鹤冈永太郎	皆川广	铁岭	1919.2	400	日报	日文	
湖广新报	川洁	徐祝平	汉口	1919.2	1200	日报	中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岭南日报	藤田丰八	藤田丰八	广州	1919.2	1000	日报	中文	
亚洲日报			上海	1919.2		日报	中文	
青岛兴信所内报	上野茶藏		青岛	1919.3			日文	
满洲日报	朴仁奎	鲜干日	奉天	1919.6	12000	日报	中、韩文	
北満タイムス	田中直记	野田竹荫	长春	1919.8	500	月刊	日文	
青岛实业日报	渡边文治	渡边文治	青岛	1919.10	400	日报	日文	
辽鞍每日新闻	渡边德重	野尻弥一	辽阳	1919.10	920	日报	日文	辽阳新报改
China Advertiser	松村利男	松村利男	天津	1919.10	2400	周刊	英文	
North China Standard	鹭泽与四二	J. S. Wiles	北京,	1919.12	1200		英文	
关东报	都甲文雄	市川年房	大连	1919.12	3500	日报	中文	
极东公论	镰田正一	永岛义高	哈尔滨	1919		月刊	日文	
日华公论		小仓章宏	天津	1919		月刊	中、日文	周刊改
露亚时报	森御荫	宝珠山弥高	哈尔滨	1919	600		日文	
上海公论	渡边天洋	渡边天洋	上海	1919			日文	
东露新闻	马场敬太郎	山田清太郎	满洲里	1920.2	180	每周 三回	日文	
支那问题月刊	长谷川贤	长谷川贤	北京	1920.3	1000	月刊	日文	
关东新闻	水野吉太郎	石丸金尚	大连	1920.5	3730	日报	日文	
日本电报	日本电通社	内海安吉	大连	1920.8	150	日报	日文	
天津经济新报	小宫山繁	小宫山繁	天津	1920.8	350	周刊	日文	
青岛商况日报	鬼头玉汝	神野良隆	青岛	1920.9	500	日报	日文	
奉天新闻	佐藤善雄	内山石松	奉天	1920.9	4000	日报	日文	
四洮新闻	泉本幸太郎	渡边智功	四平	1920.10	350	日报	日文	
埠头日报	富田喜代		大连	1920.11		日报	日文	
长春实业新闻	相原孝久	十河荣忠	长春	1920.12	1800	日报	日文	
大连新闻	立川云平	宝性确成	大连	1920	57000	日报	日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上海经济时报	中山荣三	并木如秋	上海	1920	300	周刊	日文	
中国青岛报	伊小农	胡信之	青岛	1920	300	日报	中文	
满洲报	西片朝三		大连	1921.1		日报	中文	
东方通信	佐藤善雄	园田一龟	奉天	1921.1	500	日刊	中文	
长春商工会议所调查汇报	长春商工会议所	大垣鹤藏	长春	1921.1	416	月刊	日文	
朝鲜纵横评论	上田务	彬山宗作	安东	1921.2	800		日文	
抚顺新报	坂本格	洼田利平	抚顺	1921.2	1000	月刊	中、日文	
夕泰来旬报	藤田温三		大连	1921.4		日报	日文	
日满通信	津上善七	小林诚福	大连	1921.4	296	日刊	日文	
いなづま	荒木菊松	荒木菊松	青岛	1921.5	100		日文	
南支那新报	平井直澄		香港	1921.6			日文	
青岛实业兴信所内报	渡边文治	渡边文治	青岛	1921.7			日文	
山东兴信所报	西村秀雄		济南	1921.7			日文	
大陆日日新闻	吉野直治	难波胜治	奉天	1921.9	2500	日报	日文	
商业通信	市川弘	市川弘	奉天	1921.12	7000		日文	
实业兴信所报	小川岩男		青岛	1921			日文	
间岛新报	安东贞元	武智贤	间岛	1921	2000	日报	日文	一度韩、日文
旬报	汉口日本商业会议所		汉口	1921		旬刊	日文	
北京周报	鹭泽与四二	坂本音吉	北京	1922.1	1000	周刊	日文	
极东通信	藤原镰兄		北京	1922.1	1000	日刊	日文	
哈尔滨日日新闻	大泽隼	藏土延次	哈尔滨	1922.1	1000	日报	日文	
营口经济时报			营口	1922.3	300	日报	日文	
日华兴信公所日报	神谷义隆	工藤敏雄	奉天	1922.3		旬刊	日文	
奉天商工新报	有川藤吉	神山哲三	奉天	1922.3		半月刊	日文	
东亚兴信公所	尾崎济	汤畑正一	奉天	1922.5	1600	周刊	日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济南日报青岛版	中岛勇一	张海鳌	青岛	1922.6	550	日报	中文	
Tsingtao Leader	星野米藏	S. R. de. C. Jose	青岛	1922.6	1000	日报	英文	
奉天电报通信	渡边义一	渡边义一	奉天	1922.6	130	日刊	日文	
南支那	宫川次郎	长谷川佐右卫门	思明	1922.7	200	周刊	日文	
满洲报	西片朝三	久留中一	大连	1922.7	150000	日报	中文	属满洲日日新闻
东省日报	三桥政明	刘云峰	吉林	1922.7	2000	日报	中文	
大北新报	中岛真雄	王冷佛	哈尔滨	1922.10	5000	日报	中文	属盛京时报
青岛日日新闻	小川雅三	山田春三	青岛	1922.10	2500	日报	中文	
若人の群	天津日本青年会	山川真	天津	1922.10	300	季刊	日文	
满鲜时报	中村英	中村英	安东	1922.10		日报	日文	
汉口公论	田岛利三郎		汉口	1922.11	300	周刊	日文	鹤泪改
周刊极东	森山守次	王子衡	大连	1922.12	3000	周刊	日文	
日本电报通信	中岛喜一		青岛	1922.12	50	日刊	日文	
东方通信	析桥庆治		哈尔滨	1922	150	日刊	日文	
汉口贸易年报	汉口日本商业会议所		汉口	1922		年刊	日文	
开原实业新报	田仙十郎	田仙十郎	开原	1923.1	200	日报	日文	
满蒙经济新报	大冢茂树	佐藤久吉	奉天	1923.3	300		日文	
青岛公报	吉见正任	吉见正任	青岛	1923.3	200		日文	
哈尔滨时报	大河原厚仁	大河原厚仁	哈尔滨	1923.4	600	日报	日文	
山东事情	高桥源太郎		济南	1923.6	100		日文	
山东商报	永井一吉	永井一吉	济南	1923.6	300		日文	
广东日报	平井直澄	下田清之助	广州	1923.6	200	日报	日文	
北京新闻	森川照太	坂本音吉	北京	1923.8	1000	日报	日文	
松江新闻	三桥政明	三桥政明	永吉	1923.9	600		日文	
国境通信	八重（桎）圭太郎	八重（桎）圭太郎	满洲里	1923.11	50	日刊	日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满洲商业新报	松本彬		大连	1923		日报	日文	
青岛公报	三好真父	三好真父	青岛	1923	300	旬刊	日文	
哈尔滨商品陈列馆パンフレット	森御荫	宝珠山弥高	哈尔滨	1923	300	半月刊	日文	
南满医学会杂志	久保田晴光	椎野孝太郎	奉天	1923	600		日文	
大陆通信	铃木斯郎			1923		日刊	日文	
奉天经济旬报	商工会议所	野添孝生	奉天	1924.5		旬刊	日文	
现代支那之记录	燕生社	坂本音吉	北京	1924.9		月刊	中文	
上海每日新闻	深町作次郎	深町作次郎	上海	1924.10	7000	日报	日文	上海经济日报改
股东新报	中岛勇一		烟台	1924		月刊	中文	
奉天商工日报	内山石松	内山石松	奉天	1926.6	100	日报	日文	
奉天兴信所内报	佐藤善雄	佐佐木孝三郎	奉天	1926.6		旬刊	日文	
山东新报	小川雄三	梅原喜满次	济南	1926.10	1400	日报	日文	
山东新报青岛附录	长谷川清	吉冈鹿造	青岛	1926.10	1500	日报	日文	
家庭と趣味	下川喜久三		奉天	1926.10	500	月刊	日文	
上海时论	堀清	堀清	上海	1926		月刊	日文	上海と日本人改
经济月报	日本商工会议所		上海	1927.1	700	月刊	日文	
エヌノミーチエスキー・ウエストニツケ	日本商品陈列馆		哈尔滨	1927.9	300	月刊	俄文	
长春经济内报	清水末一	清水末一	长春	1927.9	126	周刊	日文	
满洲日报	西片朝三	佐藤四郎	大连	1927.11	93000	日报	日文	辽东新报改
露亚通信	近藤义晴	近藤义晴	哈尔滨	1927	250	日刊	日文	
国境毎日新闻	吉永成一		安东	1928.1		日报	日文	
安东时事新报	中野太郎	大植义次	安东	1928.1	1300	日报	日文	
昭和兴信所内报	赤冢真清	北原兼治	奉天	1928.4		周刊	日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炭の花	抚顺炭矿部	大野义雄	抚顺	1928.7	3400	日报	日文	
新满洲	下川喜久三	田中重策	奉天	1928.7	500	月刊	日文	
满洲经济调查汇纂	奉天商工会议所	野添孝生	奉天	1928.9		双月刊	日文	
中支那	一色忠愚郎		汉口	1928			日文	
青都美	吉村荣三	吉村荣三	青岛	1929.6	800	月刊	日文	
日华	宫川隆	小笠原俊三	奉天	1929.8		月刊	日、中文	
奉天输入组合月报	奉天输入组合	赤松纯平	奉天	1929.8		月刊	日文	
字纸篓	松村太郎	松村太郎	北京	1929.9				
满铁支那月志	南满铁会社上海事务所		上海	1929.11	600	月刊	日文	
天津日报晚刊	真藤弃生	真藤弃生	天津	1929.12	1000	日刊	中文	
文字同盟	桥川时雄	桥川时雄	北京	1929	100	月刊	日文	
日华报	前田七郎		青岛	1929			日、中文	
上海周报	三村铁之助		上海	1930.5	1000	周刊	日文	上海改
学校通信	田代作之	福岛武雄	长春	1930	400	每年五期	日文	
ハルビンスゴエウレミヤ	大泽隼	大泽隼	哈尔滨	1931.8			俄文	
青岛日日新闻支社	福岛义澄		济南			日刊	日文	
东方通信	藤泽豹三		天津		50	日刊	日、中、英文	
日本电报通信	山内令三郎		天津		30	日刊	日文	
青岛新报支社	秋吉满策		济南		260	日刊	日文	
东方通信	伊达源一郎	波多博	上海			日刊	日文	
日本电报通信	儿玉璋一		上海			日刊	中、日、英文	
上海妇人	田添幸枝		上海				日文	
支那风俗	支那风俗研究会		上海				日文	
队友	上海义勇队日本队		上海				日文	

续表

报刊名	创办主办人	主编主笔	所在地	创刊年月	发行量	类别	语种	备注
上海青年	日本基督教青年会		上海				日文	
周报	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		上海			周刊	日文	
支那通商报告	上海驻在商业官		上海				日文	
满洲			奉天			月刊	日文	
亚细亚公论			奉天			月刊	日文	
新满洲			奉天			月刊	日文	
沪友	久保田正三		上海			月刊	日文	
威报	东亚同文会		天津				中文	
东方通信			北京			日刊	中、日、英文	
共同通信			北京			日刊	中、日、英文	
电报通信			北京			日刊	中、日、英文	
日本新闻联合通信			北京			日刊	日文	
Sina Japanese News			天津				英文	
日本电报通信			汉口				日文	
日本新闻联合通信			上海			日刊	日文	

[1] 一些中文著述称日本最早在华创办的报刊为1896年的《汉报》（参见刘望龄：《黑血・金鼓一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6页）。据1894年2月1日日本《自由新闻》第770号《上海两新闻之发行》：“数年前之《上海新报》，昨年之《上海时报》，皆未经岁而废刊。”（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93页）则《汉报》之前，日本已有在华办报记录。另据《西国近事汇编》载，早在1880年代，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办过报纸，详情待查。

[2]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称，东亚同文会曾在天津办《威报》，待查。另该会在广东曾试图利用当地绅士朱淇等人创办报刊，未成。

[3] 资料来源：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新编支那年鑑》，东京商务印刷所，昭和二年二月版，第1420—1421页；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编集：《第二回支那年鑑》，第1036页。1913、1916—1924年度的数字不含大连、青岛、香港。另据中外报章类纂社1925年调查，日报一项，中文628种，英文26种，日文16种，俄文6种，法文3种，韩文1种。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国闻周报》第4卷第5期。

[4] 东亚同文会编：《支那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第二回支那年鑑》，东京，元真社大正六年版。

[5] 刘望龄：《黑血・金鼓一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385页。

- [6]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C，第26页。
- [7]安藤德器编：《北支那文化便覽》，东京，生活社昭和十三年版，第168页。
- [8]资料来源：同附表一。
- [9]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二），C，第1301页。
- [10]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04页。
- [11]后藤和雄编：《中国年鉴》，《上海日报》社调查编纂部发行，昭和十年十一月版，第539—540页。
- [12]资料来源：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编：《民国24年上海市年鉴》，T，第47—48页；上海市通志馆年鉴委员会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T，第60页。
- [13]《戊戌奏稿》，1911年铅印。
- [14]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限于资料等条件，未收的中译日文书为数不少。
- [15]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书影第29页。
- [16]《善邻协会主旨》，《清议报》第2册，1899年1月2日“外国近事及外议”；吾妻兵治：《善邻译书馆条议引》，《亚东时报》第21号，1900年4月28日“杂录”。关于善邻协会，详见狭间直树《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歴史的考察》第六章《善鄰協会について一岡本監輔のばあい》，《東亞》第416号，2002年2月。另参见狭间直树编《善鄰協会・善鄰譯書館關係資料—徳島縣立圖書館藏〈岡本韋庵先生文書〉》所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ー東方學資料叢刊》第十册，2002年2月。
- [17]王仁乾，字惕斋，浙江慈溪人。明治初年赴日经商，在东京主要经营书店，专售汉籍和文具。王治本，字泰园，别号梦蝶道人，浙江慈溪人，王仁乾族兄。1875年到日本，教授汉文，与日本的汉学家等文人学者交游广泛。曾作为首任驻日公使馆的临时随员。
- [1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42—43、49页。
- [19]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年鉴》戊编三《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开明书店1934年版。
- [20]《支那各地在留本邦人职业别表》，东亚同文会编：《第二回支那年鑑》。
- [21]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
- [22]欧平：《大连书业史略》，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
- [23]程树仁主编：《中华影业年鉴》，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年版。
- [24]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编：《民国24年上海市年鉴》，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版，V，第59页。
- [25]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T，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43—144页。
- [26]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714页。

[27] 曹仲渊：《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1924年9月。

[28]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716页。

[29] 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30] 《上海与广播事业》，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564—566页。

[31] 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发，1932年8月版，第262页。

[32] 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T，第74页。

[33] 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第3—13页。

[34] 东亚同文会编：《第一回支那年鑑》，明治四十五年六月，第14—16页。

[35] 资料来源：外务省东亚局：《第29回“滿州国”及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統計表》，昭和十一年十二月，第158—160页；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编辑发行：《第一回支那年鑑》，明治四十五年六月三十日版，第13页；许仕廉著：《中国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版，第110—111页。本表不含朝鲜和台湾人。

[36] 资料来源：外务省亚细亚局：《第21回支那在留本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統計表》，昭和三年十二月，第130—132页。

[37] 东亚同文会编：《第四回支那年鑑》，东京，元真社大正九年版，第252页。此后日本在华商馆加速增长，1916—1918年分别为1858、2818、4483所，英国则徘徊不前，仅为644、655、606所。

[38] 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93页。

[39] 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93页。

[40] 东亚文化研究所编：《東亞同文会史》，东京霞山会发行，昭和六十三年版，第265—269页。

[41] 东亚文化研究所编：《東亞同文会史》，第265—269页。

[42] 外务省情报部：《支那ニ於ケル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調査》，大正十三年五月，第7—8、27页。

[43] 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文华图书馆季刊》第3卷第4期，1931年12月。

[44] 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6月。

[45] 《商务印书馆大事纪要》，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46]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年6月。

[47] 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第16页。

[48] 1917年7月14日驻汉口代总领事川越茂致外相本野一郎，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67—468页。

[49] 1914—1916年，中国聘用的日本人分别为231、271、320人，分布于18省及各税关。见《第四回支那年鑑》，第250页。

[50]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T，第75页。

[51]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52]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书影第29页。

[53]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所谓明治后新汉语，多数是来华传教士首先使用，然后传入日本。但在中国人当中流行，则是从日本逆输入的结果。

[54]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55]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01—1304页。

[56]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57]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

[58]胡道静：《日本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424—426页。

[59]1909年11月21日驻汉口代总领事渡边省三致外相小村寿太郎，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210页。

[60]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89页。

[61]《支那ニ於ケル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調査》。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戴季陶的日本观历来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重点，取得的成绩也较为突出。而戴季陶的《日本论》，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代表性论著，^[1]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所写日本论的三白眉之一，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散文集鼎足而立，甚至被诟为其中最好的一本。《日本论》问世以来，已有多种日文译本。然而，这一主要存在于对象国日本的想法，与中国人的反应却差若天渊。该书出版之始，在国民党上层和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中还博得一些好评，但很快就随着戴季陶处理“九一八”事变时的妥协退让，而为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民众所弃置。直到1970年代，台湾大学政治系许介麟教授撰写《近代日本论》时，还坦言其目的是一箭三雕。“所谓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论》，第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三美国赖谢和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化论》。”^[2]他对戴季陶的《日本论》，特别是日本方面对戴著的高度评价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戴季陶在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等日本近代史的关键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解，进而找出其论点与林房雄、赖谢和等人的内在联系，揭示他们所以受到好评的社会政治原因。

作为国民党的日本问题专家和身居高位的权要，戴季陶的日本观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一种认识，而且主导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国策，成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观念。不少人认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对日妥协政策，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难辞其咎。

迄今为止，分析戴季陶的日本观主要依据两种著作，即出版于1928年的《日本论》和刊登于1919年8月《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细读两书，不难发现，前者是增补后者而成。具体而言，《日本论》的前14节是移植增改《我的日本观》，后10节则为加写，主要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深入剖析日本。在两书之前，1917年戴氏奉孙中山之命赴日，探测日本朝野对护法运动的态度，归国后在《民国日报》发表连载40日的长文《最近之日本政局

及其对华政策》。据他自称，该文和《我的日本观》一起，解析了中日冲突的表现、根源和焦点，说明了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而《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通过大量收集排比资料，可以发现：第一，《日本论》不足以全面反映戴季陶的对日观，至少没有包括时局与对策部分。第二，戴季陶的对日观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辛亥前后至为关键。不了解戴季陶对日观的形成前史，就很难理解其中的种种隐情或言外之意，从而给予全面的认识。

第一节 了解与警惕

辛亥时期戴季陶对日观的变化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清末任《中外日报》、《天铎报》编辑时期，民初主持《民权报》笔政时期和1913年随同孙中山访日之后。

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来已久。1902年，他进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两年后便在川北中学堂担任日籍理科教习小西三七的翻译。1905年赴日留学，直到1909年归国，前后滞日5年。他自称：“天仇之游日本也，六历寒暑，于其国之内容虽不敢谓为详悉，然大概亦有心得处。”^[3]戴季陶长于学习语言，口语尤佳，这使他在留学期间得以和日本人士广泛交往，并颇受优待。他入居的东京松滨馆，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对他算是破例。^[4]当时正值革命、立宪两派在留学界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戴季陶虽然担任过留学生同学会会长，却并不热衷于派系政治，甚至认为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者多属见识肤浅，品性轻薄，不屑与之为伍，因而专心学业。除学好法学专业外，对明治维新后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日本的历史、文学、社会、时政也十分关注，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

凭借对于日本认识的深入，戴季陶往往能够指陈近代中日两国各方面的联系和影响。归国后，在发表于《江苏自治公报》的第一篇文

章《宪法纲要》中便指出：清廷的宪法纲要“取法日本者颇多。重言之，即谓为翻译之日本宪法亦无不可”。^[5]这时日本文学鲜为国人注意，戴季陶却先后发表过《日本文学之鳞爪》（1910年8月13日《中外日报》）、《片片的日本文学观》（1910年11月7日、8日《天铎报》）等文章，对日本的小说、和歌，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三镜古事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枕草子》、《徒然草》等以及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评介。由此可见其对日认识的全面与深入之一斑。

由于日语好，社会接触面广，戴季陶对日本国情的了解体会也较为深刻。这种深刻性体现于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其一，赞叹日本近代文明发达及其禀性美的一面。戴季陶对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印象极深，认为“国家之兴衰，视乎出版业之盛否。日本以区区小新进国，既入其都，则大印刷厂也，大书店也，连轩毗户。每年所出书籍，不知几千万种，故文明进步为东洋冠”。^[6]推而广之，“即以社会事业而论，日本之改革迟于吾国，而今则工商业已足加入欧美市场，其学术如医科等，且为欧人所不及，发达如德国亦既派学生留学于其医科大学矣。战斗力则足以胜强俄矣，国力则已并韩侵满矣”。^[7]在他看来，“东洋之国，以中国为最大，以日本为最文明”^[8]。不仅如此，在举国的反日仇日情绪普遍高涨以及传统倭夷观念依然作祟的背景下，尽管他明知“若非深知日本历史者，必痛诋此论之非也”，还是不顾瓜田李下，公开肯定“日人为最有美的性质之民族”^[9]。

其二，憎恶日本的专制与蛮横。他指责日本和清朝“政府之专横无道则一也”^[10]，“尝痛斥日本风俗坏乱为世界之最”^[11]，甚至称日本为“卖淫国”^[12]。他认为：“日人所以成为一等国者，以所乘

之势与所遇之时甚优故耳”，并非“其民族之英锐聪明而至于此”。

“至其民族在世界中以程度而论，亦不过与马来、朝鲜之种族等耳。”^[13]尤其令他厌恶的是日本人的岛国习气，所谓：“岛国之民日受海潮之冲击，其人必狡而易迁。且日人赋数种民族之历史性，故人民之争斗性及融合性皆走极端。盖其历史上本无独立之价值，侵略而胜则肆其凶淫之野图，争斗而败则又曲尽其谄媚之态。日本之强也以此，日本永无大国民气度也亦以此。”^[14]归国后，他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来华日本人“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有时竟至当面“以日语詈之”^[15]。

1909年，戴季陶辍学归国，在苏州江苏地方自治公所任教职。次年，因评论政事，得罪当道，被迫赴沪，先后任笔政于《中外日报》和《天铎报》，同时为《民立报》撰稿。这时列强彼此协调利益，加紧争夺在华权益，英、德、日、俄等国在滇藏、山东、满蒙等地不断制造事端。作为有法政学功底的国际问题专家和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戴季陶对列强的侵华言行十分留意。从1910年8月到1911年4月，他发表于上述报刊的400余篇专论、时评、短评中，这方面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对日本朝野的动向尤为关注，举凡其内政、外交、军事、国民性格、人事变动，无不一一加以评论。

总括来看，戴季陶这一时期的对日观主要是围绕中日关系展开，重心在于日本的对华态度与政策。他始终强调日本推行侵华大陆政策的必然性，认为：“日本国小民贫，非扩张殖民殖产之范围，不足以图存。而其扩张之范围，又舍中国而外无他策。”^[16]这是日本的国情及中日两国所处地位使然，“世界无两胜之国家，利害关系愈深者，其相忌之心亦愈甚，侵夺之事实亦愈多。此自然之趋势也”。所以，日本朝野上下，“对于吾国，其学者则造论主张并吞，政府则以

强硬手段夺我主权，个人之来游吾国者，则每肆意逞横，蔑视我国法”。^[17]就连德富苏峰这样著名的民权运动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片山潜，也或开始转向国家主义，或“变为政府之鹰鹯”^[18]。日本政府的若干人事更替变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

然而，戴季陶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他一再指出：“吾国今日诚弱，然日人欲以一国之力而亡吾国，则未见能达其目的也。”^[19]这一方面因为日本虽强却小，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以一黄色种族立足于世界白哲人种之势力圈中”，凭一国之力，不能争自存及雄飞世界。不仅如此，他还断言日本如果“只以侵略为心，恐将来之国仇愈多，国难日急，亡国之祸亦将不免矣”。^[20]

至于中国方面如何才能遏制日本的侵略势头，戴季陶有根本解决与权宜对策两种打算。所谓根本解决，即“力图自强之道，谋发展之策，以养成我之实力，则天理循环，今日之彼，即明日之我也”。^[21]而要实现自强，首先必须改革内政。他在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改革进程后指出：“夫以其四千万之民族，三千余里之土地，而其进步如是之速。吾人民至多，地土至广，物产至富，而于国民事业则不及其什一，且受其欺侮侵袭而不敢一应，是尤无能之至者矣。”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国民的无能。因此，“吾国欲改良政治，非先破坏此现今恶劣腐败之政府不可，欲使社会进化，则非除去此软弱无能之国民气习不可。前者不可不变换旧政府之人物，后者不可不注意于民力之增进。非然者，则除亡国外无他策”。^[22]视革命变革为御侮图强的先机和根本。

所谓权宜对策，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日本。戴季陶分析国际局势，认为东洋已成欧美各国争夺的重心。日本以东亚后起强国，欲参与争夺，“此于各国之东洋政策实为一大妨碍，欧美之人所以不

能不排斥日本者也”。英、美、俄等国的排日情绪因而日见强烈。日本国力不敌欧美列强，“欲求扩张其国力于世界，于是以联合者为侵略之手段，以维持实业者为发展国力之手段方针”，对英、美、俄妥协退让，协调利益，借机侵吞中国权益，增强国力，最终实现全面侵华的野心。

1911年初，日英、日美间订立新条约，戴季陶敏锐地感到：此“为东洋问题之一大关键，即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也”。^[23]前此日俄、日德协约同盟成立之际，他同样忧心忡忡。他支持筹议已久的中美同盟主张，认为：“吾国果与美同盟，则对外交涉可以多一形式上之援助，而尤足以牵制日本之势力。”^[24]眼看中美同盟不成，外交无所凭借，处处失着，则感到痛心疾首，斥责外交官无能，指破坏中美同盟者是“卖国奴”、“丧心昧良之民贼”^[25]。戴季陶其实对美国并无幻想，纯粹从相互制衡的国际关系的实际出发。他曾经明确指出：“夫同盟本为国际间进行手段之一，并非真相亲善而然也。”并且担心清政府无力收罗美国以为我用，徒然多移植一势力于国内，“于吾国前途，未见其有好结果也”。^[26]当有人问及日美间如爆发战争，何方胜利于中国有利时，他答道：“无论何国皆为侵略主义，则无论何国皆于我无利益。不过美国胜，我国可以趁机整顿内治而已。”^[27]

此外，戴季陶还寄希望于日本民众的反抗。他认为，中日两国虽文明程度有别，政府专横无道却如出一辙，人民均未进入文明先进行列，对于日本政府迫害幸德秋水，日本报界助纣为虐，日本朝野无视劳动者利益要求等，均予以严斥，并且呼吁：“吾甚愿吾国民学日人之向上精神，而毋效日人之服从根性。”^[28]明治后期，日本国权主义盛行，自由民权运动遭受压制。戴季陶尖锐地指出：“社会不平，而后平民愤，政府专横，而后革命起”，“残忍专横者，是暴君恶吏

自杀之道而已。吾观日政府杀幸德秋水事，吾深为日政府危”。^[29]

“区区之野蛮手段，实转足速专制政府之覆灭耳。”^[30]希望日本国民起而革命，改变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国策。这可以说是戴季陶的一贯主张。在对俄问题上，他也曾明确提出利用俄国革命内乱之机与俄决战的策略，借以弥补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缺陷。^[31]

第二节 日本正吾人当头第一大敌

1911年4月，思想已转向反清革命的戴季陶再度因文字罹祸，辗转于日本、国内间，后亡走南洋，加入同盟会，参与《光华日报》笔政。由于迄今所见1911年8月以前的《光华日报》未署撰稿者姓名，无法确认其间戴季陶究竟写了多少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武昌起义后，戴季陶由南洋归国，先是密谋东北反清起义，继而积极参与政事。虽然自1912年3月起主持《民权报》笔政，关注重心集中在瞬息万变的内政方面，较少对国际局势、特别是日本问题发表评论，直到1912年6月，日本问题才再度为其笔锋所向。到1913年访日止，他先后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今日之外交界》（1912年6月5—7日）、《公道与人道》（6月19日）、《瓜分之实现》（7月25日）、《机会均等之结果》（7月30日）、《四十五年之日本》（7月31日）、《日本政治方针之误》（8月4—5日）、《日俄与内外蒙古》（8月9日）、《中国之军事问题》（8月15—16日）、《征蒙与拒俄》（10月29日—11月3日）、《日本内阁辞职观》（12月5日）、《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12月12日）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及大量短评。

与辛亥前相比，戴季陶这一时期对日本问题的评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视日本为中国的头号外敌，二是提高对军事问题的关注。

当时最严重的主权危机为俄国挑唆外蒙独立，在举国一片抗俄声中，戴季陶反复强调：“吾人在今日，所急宜以全力预防者，非止外蒙与俄国。彼东方之日本，正吾人当头之第一大敌也。”^[32]他还进一步从一般国家原理、东亚局势、日本近代历史及政府方针等几方面加以论证。就一般原理言，“盖扩张者，国家之自然发展也”。明治以来，日本人口迅速增长，内部秩序整齐，军事力足以维持国势，“则其向外之侵略，非其政治家之野心也，国民之自然殖民性使之然耳”。^[33]从东亚局势看，中国的外敌为英、法、俄、德、日五国，“今日在中国利害关系之最深者为日、英、俄，而日、俄之进行尤急”。^[34]由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加紧扩张，“诸国关系皆受欧洲国际间之牵制，而不能专事东方”。“由此观之，则可知今日与中国存亡关系最切者，厥为日本。日本者，东方之德意志也，其国力既足以自给而有余，而以人口增殖，地方限制之故，绝不能不为对外之扩张也。”^[35]

近代日本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了这一点。明治维新以来的半个世纪，“东亚之国，灭亡者凡四，而其二并于日；大战者二，皆归日本胜利。是此半世纪中，中国以世界第三位之大国，而陷于无可立足之悲运，东海岛国，一跃而升世界头等之强国”。^[36]日本既已吞琉球，占台湾，并高丽，“则其势力之所趋，必进而侵略中国内部”。加上日本政府目光短浅，不能审时度势，实行南进海上扩张方针，而图北进的大陆侵略政策，而“亚洲大陆，日本可着手者，除中国之外，盖全无之”。^[37]因此，“日本与吾国，以今日日本之政治方针观之，决无丝毫可不冲突者”。^[38]“是中国与日本，无论何时，皆立于一极反对之地位也，中国与日本之利益冲突，绝无时可以了也。”于是戴季陶断言，中日间必将爆发“大冲突”^[39]。而且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日皇之死或内阁更替等偶然事件而改变。

作为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有全面了解的政论家，戴季陶敏锐地察觉到欧洲形势变化对东亚的影响。一方面，欧洲列强依据其在欧洲的利益关系重新协调东亚格局，对日本实行妥协，对华政策即由戴季陶所谓“夺羊”变为“分羊”。尤其是日、俄两国，对满蒙加紧共同侵略步伐。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对某一具体侵略行动的抵抗，可能不致引起其他列强趁火打劫，这种局部对抗使国力贫弱的中国有机会争取相对主动。

当库伦活佛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时，戴季陶力主大举征蒙。此举目的不仅在拒俄，更有遏制日本侵略满蒙的意向。因为“日、俄之政治方针，既互相融合，俄甘让步于日本，俄并外蒙，日人必不反对之。日人苟并满洲及内蒙之东四蒙，俄人亦必不反对之”。“蒙古之所以敢于独立者，恃有俄也。俄之所以敢逞以独断之力，夺吾外蒙而去之者，以与日人互为侵略也。”^[40]有鉴于此，“征库所以拒俄，保内蒙所以防日也。彼日本以增兵朝鲜为侵略满蒙之预备，而吾人则宜以重兵保内蒙，为防日人侵略满蒙之先声。俄人以侵略外蒙为唆使日本之暗示，而吾人则征库以戢其野心”。可见，“征库保蒙卫满救国”^[41]，锋芒所向，主要还是虎视眈眈的日本。

早在辛亥前，戴季陶就指出：“此刻吾国与日、俄二国间所以尚无战争者，以中国之战斗力实不足与二国战故也。”“吾民之在今日，虽不能遽言战，然固一刻不能忘战者也。”^[42]既然“吾国之势，万不能不用兵”，就必须探讨如何用兵之道，力求知彼知己，争取立于不败之地。在了解列强的军事力量及其具体配置方面，戴季陶不仅分析列强的军费、战略、陆海军兵力等问题，还广泛收集资料，着重介绍分析日、俄等国在远东、特别是韩国及满蒙的兵力部署，以为用兵参照。

不过，对于弱国兴师，戴季陶的确顾虑重重。总体上，他受当时欧美流行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强调军事力量对比是维持国际均势的要素，而军事力量又取决于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在《中国之军事问题》（《民权报》1912年8月15—16日）一文中，戴季陶提出：中国“扩张陆军，必其力足以敌日、俄、英三国陆军之总数，或且驾而上之，然后可以固国防，而维持国际间之均势也”。据此，则中国须常备军150万，战时动员更要达500万人才能开战。要编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首先必须有独立的武器制造系统，“武器独立之日，即中国兵力充足之日，而后可以言国防，而后可以言交涉。此盖中国军事上之一大关键也”。因此，他虽力主征蒙，却“不敢徒作快心论也”^[43]。

与日本问题相关联，戴季陶还极为关注韩国的兴灭存亡。在他看来，日本侵略压迫下的韩国的今天，很可能成为满洲乃至整个中国的明日的先兆。

戴季陶留学日本时，“识韩人甚多”，与其中不少人来往频繁，如因国事匿日的高僧金永基。据说还与一位韩国公主有过罗曼史。这段缘分使他对韩国人的不幸遭遇倍加同情。归国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日本问题的文字，就是《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

1910年，日本朝野大造日韩合并舆论，而中国各界对此置若罔闻，“一若他人之事，与我毫无关涉者”。针对这种状况，戴季陶大声疾呼，指出日韩合邦“为满洲生死存亡之一大问题”^[44]。由于中韩两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特殊关系，日本在中国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各省势力又迅速增长，“是则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并韩之后，满洲固为其第一着侵略之范围，而在内地各省之实力，亦必依其国力之进步比例。”“是

合邦成局之日，即满洲毙命之日，亦即吾国全部大敌接近之日也。”

“韩亡则满洲亡，满洲亡则内地之日本势力益盛，大好神州恐将变为岛夷之殖民地矣。”他尖锐地批评中国政府、舆论机关和民众“大敌当前而不知，巨灾横后而无闻”的麻木不仁，慨叹“吾国其真将以麻痹之疾而亡乎？”并正告国民：“苟日本实行并吞韩国后，政府而于满洲之政策仍不加之意，不数年后，地图变色矣。”^[45]

日本并韩之际，戴季陶针对日本朝野遍开祝贺会的情形，提出：“唇亡齿寒，宜举行一国民大追悼会以吊之。”^[46]1911年初，他回顾庚戌年天下大事，称朝鲜亡国、安重根遇难为五大惨事中的两项，而李完用（韩国亲日的一进会会长）被刺则为五大快事之一。^[47]并且认为，从甲午到庚戌日本侵吞朝鲜的全过程，“实吾国外交之第一大失败史也”^[48]。

此后，戴季陶一面揭露和谴责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残暴专制，一面关注和声援韩国的抗日斗争。针对日本当局所谓“治文明地必取自治政治，治野蛮地必取专制政治，治无反抗之地必取自治政治，治有反抗之地必取专制政治”的谬论，戴季陶指出：“日本近数十年来，亦以文明自炫矣。然文明者，非仅物质之进步而已也，惟能为人类谋真正之幸福，保世界永久之和平者，斯乃可谓为文明之真者也。”^[49]他谴责日本殖民当局精神上剥夺朝鲜人的言论权，“不特国内之言论界，即外国之出版物，其内容稍涉文明者，日人亦禁之不允输入”^[50]，肉体上以“残酷无人道之肉刑”虐待朝鲜人，“蹂躏人权”，“为世界史中增一怪事，为日本文明史中留一污点，为朝鲜亡国史中多一恨事”。^[51]日本在韩国大修铁路，目的也是“交通日便，而其种族日殆矣”。^[52]对日本访华议员所谓“并韩为防俄人之

侵略”的狡辩，戴季陶坚决予以驳斥，指出：“日本侵韩之历史，几与日本之历史相并存。”^[53]

在抨击揭露日本殖民主义的同时，戴季陶对朝鲜的抗日斗争予以声援支持。1910年安重根刺死伊藤博文后被绞杀，消息传来，戴季陶欲重九“一登最高峰，吊重根之雄魂归来”，以缅怀这位“为朝鲜树最后之独立纪念碑”的“真豪杰”、“爱国好男儿”^[54]。1912年，以尹致昊为首的新民会120人因密谋武力反日被殖民当局逮捕起诉，戴季陶称为世界二惨剧之一，认为这是日本不能以人道待异族所致，义正词严地宣称：“尹致昊等之被继縲，以公理论，实韩国最爱国之士无疑也。”^[55]

1912年8月，中国警察应日本领事之请，在京津逮捕9名密谋刺杀桂太郎的朝鲜志士（含中国人1名），递解日本。戴季陶依据国际法，指责日本越权违法，痛斥民国政府“丧失国权”，“违背人道”，断送“中华民国开幕之国际上价值”^[56]。他告诫日本政府，歧视虐待韩国人，“是自杀政策而已”^[57]，要“使韩人心悦诚服”，“不与为敌”，最好是“仍朝鲜自主，永永远远不干涉他半点”^[58]。

在日本并韩前后，出于对中国存亡的忧虑，为了警醒国民，戴季陶对朝鲜民众的态度一度有所偏激。他说：“吾敢一言以蔽之曰：朝鲜之亡也，以其国民无能故。”“朝鲜虽为日人势力所及，然苟乘当时名义未改，主权自揽之时，奋力自图，以弹丸之国，二千余万之人民，非至易治者乎。乃事事倚日人之命，其蹈今日之亡固宜也。”^[59]这番话也包含他个人的体验。据他回忆，旅日韩人虽“亦有勇于为义，奔走国事，毫不计及一身之利害者。惟气慨颓唐，且多以效日人之起居动作为荣者。予常谓朝鲜之属日不远矣”^[60]。

随着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展开，戴季陶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日本并吞朝鲜以来……韩人之革命思潮，固日见增加也。其以革命事件而幽囚于继縲者，若柳东说，若梁起铎，若安泰国，其死者若安重根等，皆一时爱国之士也。此次又以隐谋之事而拘留之者百二十二人，其首领则尹致昊也。”“吾观韩人之暗杀案屡起，及日本对韩之方针，吾盖知革命之风潮渐渐趋于激烈矣。”^[61]视朝鲜的抗日斗争为阻遏日本侵略的重要一环。

第三节 转向中日提携

1913年2月至3月，戴季陶作为孙中山的随员访日，3月底归国，4月初再次发表对日评论。在这篇题为《强权阴谋之黑幕》的文章中，戴季陶对日本的态度出人意料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前此他视日本为中国的头号大敌，这时却表示要“讲善邻之策”，与日本“联络”、“提携”，“以共谋黄种之存立”，还进一步解释道：“日本为东方之先进国，又为黄人种中最强之国家，若能互相联络，内则可以助吾国之建设，外亦可以防野心国之侵略。”^[62]这一变化如此之大，如此突兀，不能不究明相关的各种潜因。

就《强权阴谋之黑幕》一文的表面看，使戴季陶改变观念的直接导因是民国成立后日本朝野对华态度的变化。他说：

抵东京以来，见乎日本官民上下，其欲与吾国联络之诚意，实极美满。而实业界诸人，勤勤恳恳之衷，尤吾人所深感激者也。中山先生之东游，日人朝野上下，无老幼男女，皆莫不表极欢迎之意者，非欢迎中山先生一人也，实极希望中日之联络，而图东亚大局之安全也。

日本是世界八大强国之一，但也是唯一的亚洲人种强国，很难单独与欧洲列强对抗。而中国为大国，“人民众多，物产丰富，中国若富强，则以一国之力，可当日本十倍。合中日两国之力，以与欧洲人种之列强抗，欧洲人种之国，未有不翻然改其侵略主义为联合主义者。如是则两大人种，携手并行，世界平和，于是乃可希冀。故大而言之，中日两国之联络，为黄白人种联合之起点；小而言之，则中日两国联络，亦可以保全东亚之大局”。过去因为清廷专制守旧，“不足与有为”，日本“为自卫计”，对华“不能不持强硬态度”。辛亥以后，中国政治改革，建设共和，“此日人所以极欲与吾国联合者也”。他还以日俄交涉为据，证明日本联华意向的真诚。不久前，俄国外相欲以让日本经营东蒙古为诱饵，换取其对外蒙独立的认可，但“日本并不为俄国之所摇动，且极力图与吾国提携。是可知日人今日朝野之意见，皆共同一致，为两国之安全计，亦为世界之平和计也”[\[63\]](#)。

此次访日，孙中山一行的确得到日本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但对戴季陶对日观的捩转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恐怕还是孙中山与桂太郎几度密谈所达成的共识。关于会谈详情，迄今未找到原始记录，疑点甚多，兹不讨论。仅就内容而言，据中日双方有关人士如戴季陶、胡汉民、秋山定辅、宫崎寅藏等人的忆述，双方在如下问题上取得共识：一、孙、桂互信，中日联好，保持东半球和平；日本放弃侵华的大陆政策，全力向美、澳发展。二、中、日、土、德、奥联好，保持世界和平；日本由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由对俄作战转向对英作战，打倒英国的霸权，解决印度问题，使有色人种复苏。三、支持孙中山重掌民国政权。四、中日共同开发满洲。[\[64\]](#)

孙中山与桂太郎了解彼此对时局的看法后，桂太郎感到“不期正合吾志”，“大喜若狂”，孙中山则对桂太郎的见识极为佩服，两人相见恨晚。而使彼此深入理解的基点，则是以东方民族复兴为中心的

世界政策。同年10月，桂太郎突然死去，孙中山为此大为叹惜，认为“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65]由此看来，《强权阴谋之黑幕》一文，基本是反映了孙中山的观点。

不过，尽管戴季陶对孙中山的人格主义十分崇敬信服，却不会在任何问题上亦步亦趋，尤其是在他有相当自信的对日观方面，^[66]不可能盲从显而易见的误判，一夜之间放弃自己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于桂太郎其人，戴季陶早有定论，称之为“武夫政治家也，其主张则大陆侵略主义也，其性质则刚愎也，其手段则毒辣也”。并以桂太郎负责外交为日本不会改变侵华政策的力证。1912年12月，日本内阁更替，戴季陶断定奉行大陆政策的桂太郎将上台，“桂太郎而果继起组织内阁，则此问题（即朝鲜增兵）且必复燃而通过焉。呜呼！满洲危矣！呜呼！内蒙危矣！”^[67]可以说完全否定桂太郎的人品政策。

关于日本的政治方针，戴季陶认定“为对于大陆而求扩张，侵略中国之野心，无日或熄”。^[68]他虽然主张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赞成联美之说，却对联日说断然否定，斥为幻想，因日本是野心国，没有联盟的余地。而破坏中美联盟正是日本的阴谋。^[69]对于同文同种等谬说，他也颇为憎恶，指日本的“保全中国”实质是“保全己国在中国之势力日以扩张，勿为他人所夺耳”。^[70]认识相当透彻。

1912年6月，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题为《美国在支那之地位》的社说，指责民国政府的亲美态度，提出：“日本与中国，仅隔一衣带水，而又有特种之关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耶？”戴季陶正色道：“敢告日人曰：吾国之恨，正以日本与我有特种之关系也，正以日人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野心也。”^[71]他甚至怀疑日本人

支持革命党亦为阴谋，说：“武昌起义，日人之奔走于中国者，大约分两种，一则助民军以攻清廷，一则助清廷以攻民军。而细推其意，实欲使中国之战争延长，全国糜烂，而后可收渔人之利。”^[72]这种一针见血的认识和彻底的反日情绪，即使在革命党内也显得十分突出。

从孙中山、桂太郎会谈的内容可见，双方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据宫崎寅藏回忆，桂太郎帮助中国的目的在于推行其大东亚政策，孙中山则欲与日本提携以建设新支那。^[73]日本虽宣称放弃侵华，但开发满洲正是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戴季陶岂会轻信上当？从胡汉民对此事的回忆及评论看，双方对大亚洲主义的理解也很不相同。^[74]另外，孙中山向日方表白的强硬反英姿态，不足以全面反映其对英立场态度。正如他向日方表示的对日态度不能全面反映其真实立场一样。直到1923年，孙中山仍然试图争取英国的支持。作为缺乏实力基础的政治家，公开与一个在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势力对抗，并非明智之举。这些内情，日方不一定清楚，戴季陶参与机要，孙中山理应向他交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令戴季陶附和孙中山的对日观，或者说孙中山说服戴季陶接受其公开主张的观点，除了孙、桂协议的共鸣外，应当还有孙中山的策略考虑。这一点虽不能直接见诸文字，但从相关行为及各方态度的综合分析中，可以探知基本脉络。

孙、桂会谈的起点，首先是与孙中山及革命党关系密切的《二六新闻》社社长秋山定辅，于1911年下半年经山县有朋介绍，连续三天拜访桂太郎，陈述其“国策大回转”意见，主张：一、放弃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日俄协商。二、支持孙中山建设中国。三、组织大政党和协力内阁。四、东亚民族自立。^[75]桂太郎即使接受该建议，也附带苛刻条件。1912年2月，由得到桂太郎授意的三井物产顾问

益田孝指派该会社社员森恪到南京拜访孙中山，提出以援助革命派换取满洲租借权的提案。孙答应以一千万元为代价，同意日本租借满洲。^[76]这一交易因山县有朋反对，日方迟迟未提供贷款而搁浅，但是双方的联系并未中断。

1912年11月5日，大阪《每日新闻》发布了孙中山预定于11月13日由上海出发经神户赴东京访日的消息。11月7日，东亚同文会决定召开孙文欢迎会，支那问题研究会表示赞同。神户的市政府及商工会议所也选出孙文欢迎委员。桂太郎等人（包括后藤新平、长岛隆二）即使不是发起人，与此也有密切关系。因此，当西园寺内阁决定阁僚和元老在孙中山访日期间不与之会面后，桂太郎担心与孙中山结怨，特派秋山定辅赴沪，力劝孙中山暂停访日，以免届时出现尴尬局面。^[77]孙、桂间的沟通，为两人以后会谈达成共识提供了基础。

孙中山访日，表面是感谢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及视察日本铁道制度，实际上别有所图。其中之一，当是争取日本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民国成立后，列强一直态度暧昧，虽有美国首先承认说和美法共同承认说，但均为昙花一现，并未落实。由于得不到国际公认，新生共和政权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孙中山与日本政界早有联系交往，正可用来打破僵局。而且，恰在此时，日本众议员观光团访华，向日本政府提出首先承认中华民国问题，日本国内舆论也公开表态支持。其中与孙中山的关系孰为因果，有待深究。从孙中山当时的对日主张看，似对取得日本的承认胸有成竹。

另一原因，是11月3日发生了“库乱”事件，俄国与外蒙签订《俄蒙密约》及《商务专条》，企图制造外蒙独立。此事立即引起举国公愤，戴季陶即为主战派之一。孙中山对此也极为关切。11月7日中国政府向俄国提出抗议后，11月9日，孙中山即致电袁世凯，提出迁都、联日的对策，电称：

今日弭患要图，非速行迁都，则急宜联日，二者必行其一，方能转危为安。迁都既属困难，则联日不容或缓。文深维此事速欲亲行一试，如有意外好果，其联交之度当至若何，请先示程式，以便文于月底一往东洋游说彼邦执政，想不致虚行也。

袁世凯复电表示：“迁都尚多窒碍，联日在所急需，借重大名，彼邦动色。”^[78]这时孙中山访日的目的之一，是与日本结盟以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日本政府拒绝与孙中山交往，除了考虑孙中山、袁世凯的平衡外，避免卷入中俄外交纠纷可能也是重要原因。访日不果，孙中山并未放弃初衷，11月16日，他电告袁世凯：“华日联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时，当可办到。故俄蒙之约万不可承认。”^[79]

由上述事实可知，一、孙、桂会谈其实早有联系沟通，双方大体了解对方的态度和底牌。二、孙中山与桂太郎交往，主张共鸣而外，至少含有争取外交承认、争取对革命党的支持以及以日制俄三个策略因素。作为交换条件的共同开发满洲，可以起到遏制俄国的作用，解救燃眉之急。与早期的出让说、1912年初的租借说相比，更能体现孙中山策略灵活性的伸缩。实际上，满洲问题是孙中山与日本人交往的一大关键，以此不仅能够争取条件苛刻的外援（主要在早期），更可以作为令日俄互相牵制的筹码，从而抵消外力。而日本人对华态度的差异，也可由此鉴别。这种策略考虑，对于戴季陶接受孙中山的判断主张，恐怕至关重要。

当然，戴季陶对日观的转变，前后也有相互联系的因素。就直接因素而言，其一，1912年11月日本议员访华及日本首先承认中华民国说传出后，戴季陶尽管怀疑日方的诚意，也开始谈论中日同文同种，希望两国“互相提携，为东亚大同盟之起点”。^[80]

其二，他虽认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政策难以改变，对民间知识界工商界的某些代表人物却抱有好感。如称涩泽荣一为“不可多得之人物”^[81]，对有贺长雄、山专太郎等专家学者及一般民间人士有所寄望，对访华的日本议员也宁肯信其怀有真诚善意。

其三，戴季陶曾一再断言日俄会联手侵华，并指桂太郎为“主张亲俄主义者”，认为1912年7月桂太郎赴欧与俄国签订密约，双方达成同盟默许，是导致外蒙独立的根本原因，批评国人“注意于蒙古与俄国，而绝乏注意及此至可惧可畏之大敌为日本者”^[82]。可是库伦事件后，日本并未趁机进占内蒙，使得戴季陶转而相信日本确有讲求东亚黄种共同利益之人，而桂太郎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后来他说：“以言洞明世界大势，具有政治手腕，桂太郎的确是人才。”^[83]

就长久因素而言，戴季陶始终认为内政优先于外交。日本人谋己国利益，正是其爱国的表现。对此中国人不应停留于指责仇视和悲惧交加的情感表达层面，应起而仿效，生爱国之心，“强兵以拒外，修己以服人”^[84]。实力不具，勿轻易言战，而要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以折冲。因此，他希望说服日本当局，或日方自觉，改变大陆政策，实行南进的海上开发，这样中日关系便可暂时缓和，相安无事。

无论如何，经此一变，戴季陶的日本观已具备后来定型的基本要素。此后，他从各方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的必然，却不能恰当把握中国自身内政与外交、民权与国权两难取舍的尺度。尽管其日本观中包含本人看法和他人影响，具有根本定见和权宜考虑等复杂因素，一方面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另一方面激起国民的强烈不满，作为对日决策的重要参与人和实际主事者，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四节 《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

1913年至1931年间，戴季陶几乎始终生活在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表现之一，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尤其是与日本、俄国及英美的关系，戴季陶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日本通，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时期，与日本的关系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内有数的国际问题专家，是对日决策及其主导思想的主持制定者，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有着重大影响。

1917年，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东渡，探询日本朝野各方对护法的态度，归国后写成《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于1917年12月13日至1918年1月24日连载于《民国日报》上，署名“商孙漫记，云巢道士增删”，“云巢道士”所志按语称：

商孙者，久居彼邦，详究其各界之内幕，回国后常以之为留心时局者谈。闻者随意，而谈者太苦，予因劝其笔之于篇，以供国人之参考。文既成，予详阅之余，复为之类次标题，加以评点，请于予友楚伦发表之。

此文作者，应为戴季陶，后来他写《我的日本观》时，曾明确记到：“前年在《民国日报》的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略略批评一点日本最近的证据和他们十年来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85]“商孙”即戴季陶或为其虚拟。“云巢道士”有二解，一谓戴季陶本人假托，实即自作。云巢山位于戴季陶的老家湖州，《天铎报》笔祸起，他曾一度避居于此，与山中道士为伍。据称当地道观实为湖州绅士阶级的养老院。^[86]一则另有其人。戴季陶师友中有号“云巢先生”者，1920年戴季陶三十初度时，曾赐以“本乾”之名，又赠以序，或即此人。^[87]

关于戴季陶《日本论》的用意和主旨，为一聚讼纷纭的论题，很难做盖棺论定的评判，从文本形成的角度，就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提出意见，或许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戴季陶的《日本论》至少有两重蕴意，其一，一位近代中国的特殊人物对日本的独特认识；其二，从中日关系演变史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其评论对象虽然是日本，言说对象却是国人。因此，既不能单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认识深度来评估，也不能视为“总括的代表中国人的日本观”，更不能静止和夸大地看待《日本论》所表达的戴季陶的对日观。

对戴季陶《日本论》的分歧看似对立，仔细体察，认识方法却如出一辙，即都将《日本论》视为戴季陶对日观的整体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对日观形成、发展、变化的长期复杂过程，以及对此产生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没有将《日本论》置于这一过程的一定阶段加以考察；都从一定的政治立场或理论视角出发，仅仅依据戴季陶的一两种相关著述阐述和发扬各自的观点，忽视了《日本论》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为特定目的和对象而作，不能涵盖其对日观的整体。结果，围绕《日本论》而展开的争议，实际上成为研判者各自观念分歧的延续，对《日本论》的解读和认识深化，反而起不到多少作用。

戴季陶的《日本论》，是由1919年8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增补改写而成，两文相较，行文与结构，《日本论》一半以上几乎是移植《我的日本观》，前14节只是略有增补，15至24节则为后来加写。而《我的日本观》又是对1917年至1918年发表于《民国日报》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的补充。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讲法，后者“是关于日本这个题目的一部分，侧重于日本最近的政局及其十年来的亲善政策”，而《我的日本观》则着重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日本进行深入剖析。“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冲突？为什么会冲突？冲突点在什么地方？我前年所著《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去年所著《我的日本观》两篇文章，自信把这个问题的根底已经解析了许多。并且在那两篇文章上，把‘国际间的日本’的

意义，自信也加了一个较为充分的说明。”^[88]由于目的各异，《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

上述三篇文字，深浅不同，各有侧重，均非一朝一夕之功。戴季陶在语言学习尤其是日语方面天纵奇才，1902年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文，1904年就能够在川北中学为日本教习小西三七担任理科教学翻译，并于次年东渡日本留学。据说“那时留学生说日语能够在隔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人的留学生，同学中不过三数人，季公尤称第一”。连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的东京麹町区松滨馆主人对他也甚为佩服欢迎。^[89]胡汉民说，据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讲，戴季陶的日语说得比他们自己还好。^[90]

留学期间，戴季陶不大参与政治活动，学习则非常认真。他之所以较少从事政治活动，原因之一，是觉得热衷于政治的人中不少见解浅薄，品性浮躁。由于修习政法专业，戴季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和法制建设自然比较关注，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加上他与一些韩国侨民及流亡者关系密切，更加注意日本朝野的动向。在上海任记者期间，日本及相关问题就成为戴季陶笔锋所向的重点之一。目前已经搜集到的1920年以前戴季陶的一千余篇文字中，专论日本问题的就有长文31篇，短评32篇，附带论及的还有41篇。除了《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我的日本观》外，要全面探讨其对日观的形成发展，至少下列各文应当参考：

《中外日报》2篇：《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日本文学之鳞爪》。

《天铎报》3篇：《片片的日本文学观》，《日本海军之新活动》，《日英美之新军国观》。

《民权报》9篇：《今日之外交界》，《公道与人道》，《刑罚与人道》，《瓜分之实现》，《四十五年之日本》，《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日本议员观光团之态度》，《日本内阁辞职观》，《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

《民国》杂志1篇：《欧罗巴大同盟论》。

《星期评论》1篇：《东亚永久和平策》。

《建设》杂志1篇：《世界战争与中国》。

《黑潮》1篇：《日本问题之过去与将来》。

《民国日报》4篇：《告日本国民书》，《满蒙山东与东部西比利亚洲》，《日本会发生革命吗》，《对日本游历学生的讲演》。

此外，短评和附论中，也不乏眼光独到的精彩见解。如1911年3月12日《天铎报》所刊《排外与亲外》一文论道：

排外者，手段也，政策也，利害关系也；亲外者，事实也，人情也，世界之趋势也。吾国之国民，既不能不人人有排外之能力，亦不能不人人有亲外之思想。唯能排外，然后可作强国民，唯能亲外，然后可作大国民。

此言庶几可以作为理解戴季陶对日观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关键。

1920年以后，戴季陶仍不断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除《戴季陶文存》各编已经收录之外，如出版于1925年的《日本革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以及《日本论》发表前后撰写的《东方形势之日本与中国》、《反对日本暴力压迫与中国国民自强的基本工作》、《日本之对华政策与其政治组织》等重要文章，其中谈到认识日本问题的态度与方法，他说：

假使我们要问，日本自有史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国家是向着那一条路走的，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地回答说，日本现在所走的向前进的路，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来源的途径。我们明白了日本所走的这一条路子，然后才知道日本对外的政策的根据，然后才晓得日本对于中国传统的政策的由来。明白这一个道理，其次就可以研究日本现在整个的政治组织是怎样，以及政治上存在的中心力量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这么去考察，然后才能了解日本的真实情形。

即使在《日本论》问世之后，戴季陶对日本的观察也没有就此停止。1940年，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请购买1936年以后有关日本问题的各种年鉴、月刊、人事出版物、法令大全、条约汇纂等书刊，声称早想着手研究，只是“不欲因买敌国之外汇而中止”，“今年此种研究，已不容再缓”。^[91]可见他随时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修改、充实具体的观念主张。

时序变动而外，还要考虑戴季陶就日本问题发表意见的背景、动机、对象、目的等各种相关因素。在基本框架形成之后，随着条件的变更，表达的重点和方式，也会相应有所改变。如戴季陶从来认为日本及中日关系与列强及东亚全局密切相关，必须了解他对各方面关联性问题的态度主张，才能具体准确地认识其对日观的各个层面。此外，应当特别注意，不要将别人的评论与戴季陶的对日观相混淆，作为分析与评价的依据。

戴季陶曾向胡汉民征询其对《我的日本观》一文看法，后者认为文字尚佳，但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的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戴季陶佩服此评语“一语道破”。他写《日本论》，就是想“改正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全以平心静气的研究”。胡汉民读后掩卷叹服道：“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是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92]

然而，这种态度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在不同方面引起的反应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姑不论各方意见的是非正误，应当看到，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既是冷静客观的学者，又是民族的法统代表和国民党对日国策的决策人，其身份矛盾决定了他的态度必然因时因地而异。

就前两种身份而论，由《日本论》集中体现的戴季陶的日本观大体不错。他很早就明确指出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必然性，断定政府人事的更替不可能改变或扭转基本趋势，中日两国间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远不可能令中国彻底灭亡。同时他又认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明治维新后国力膨胀的结果，带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与之对抗，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像日本那样发展现代化，实现中国自身的富强，并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日本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对此，迄今为止的所有批评或肯定，一方面是源自欧洲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基本学术取向长期矛盾的延伸，一方面是近代国际政治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变形。世界主义的西方中心色彩与民族自决的有限适用性，至今仍然令学人和政治家们感到困扰，原因在于二者都不是真正客观、公正、彻底的价值标准与评判法则，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主观表现。包括现代化在内的各种解释东亚后发展社会的理论，都往往流于各执一端或左右摆动，即使剔除意识形态的分歧，认识仍然难免相歧相悖。

19世纪后，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日益失落。面对迅速崛起的日本，中国人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由甲午战争前的普遍漠视，到甲午、庚子之间充满情感拒斥与理智接纳的矛盾，学习与抵拒成为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庚子以后，演化成排日与亲日的对立倾向。新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全面学习模仿明治维新的产物，不仅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从京师到各省，各级各界更

派遣大批游历官绅前往考察取鉴。为了适应这一潮流，有心之士曾编辑出版过许多有关明治维新历史的书籍，将日本革新变政的内容按步骤顺序编排，各部门各层面的游历官绅则按图索骥，亦步亦趋地加以模仿、引进、吸收。整个新政的内容、步骤、方式，从宪法大纲到各种体制的编制，调查的进行，事业的开展，从朝廷变政到各地创新，至少形式上是明治维新的翻版或影子。

民国成立后，一方面中国改变了单纯模仿日本的做法，比较参照先进各国的优劣短长，另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争霸大陆的野心，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戴季陶试图综合排日与亲日两种倾向而克服各自的偏颇，但当他将这种态度运用于制定对日政策时，却助长了对日妥协。将戴季陶的某些言论视作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辩解，或因此而否定其基本认识与估计，都是简单化的曲解。

戴季陶对日观的症结，在于他面对日本的武力进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采取对外妥协，纵容和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这虽然是国民党高层的共识，并为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所赞同，却遭到其他党派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反对。作为对日国策的主持制定者，戴季陶难辞其咎。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预料到此事将成为千秋功罪的一大争讼，曾将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原委过程概括记录，为自己的行为决策留一说辞凭据。将戴季陶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及其与日本有关的活动联系全部汇集起来，按时序或者分类编排，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在全面掌握戴季陶对日观的不同表述，尤其是他与日本各界的交往联系以及与中国对日决策相关人士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分析其对日观，当有更加深刻而贴切的认识。就此而论，应当仿效以俱舍宗研治俱舍学的取径，将重点由直接解读《日本论》来评判戴季陶的对日观，转向探究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前后左右的语境解文本的本意，只有全面具体地梳理戴季陶与日本

关系的渊源流变，才能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把握其对日观生成演化的方方面面。

[1] 山口一郎：《近代中国の対日観》，アジエ经济研究所1969年版。

[2] 《近代日本论・序论》。该书1979年用日文出版，1987年出版中文本。大陆以台湾原版丛书总目《谁最了解日本》为题，1989年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3] 《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4] 谢键：《戴季陶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献词》，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第290页。

[5] 该文为戴季陶任教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时的讲义。

[6] 《呜呼出版界之前途》，《天铎报》1910年11月7日。

[7] 《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天铎报》1910年10月21日。

[8] 《社会之大不幸》，《天铎报》1910年11月12日。

[9] 《片片的日本文学观》，《天铎报》1910年11月7—8日。

[10] 《社会之大不幸》，《天铎报》1910年11月12日。

[11] 《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20日。

[12] 《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22日。

[13] 《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14] 《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15] 《耳闻眼见》，《天铎报》1910年10月28日。

[16] 《日英美之新条约观》，《天铎报》1911年4月15日。

[17] 《自强即报复》，《天铎报》1911年1月10日。

[18] 《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2月28日。

[19] 《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20日。

[20] 《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21] 《自强即报复》，《天铎报》1911年1月10日。

[22] 《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天铎报》1910年10月21日。

[23] 《日英美之新条约观》，《天铎报》1911年4月15日。

[24] 《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7日。

[25] 《可怜中国之外交》，《天铎报》1911年3月2日；《同盟呜呼同盟》，《天铎报》1911年1月23日；《咄咄二重外交》，《天铎报》1911年2月7日。

[26] 《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7日。

[27] 《珠玑沙砾》，《天铎报》1911年2月5日。

[28] 《俄人之中国政治观》，《天铎报》1911年1月22日。

[29] 《不平鸣》，《天铎报》1911年2月4日。

[30] 《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16日。

[31] 《战》，《天铎报》1911年3月21日。

[32] 《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33] 《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民权报》1912年8月4—5日。

[34] 《瓜分之实现》，《民权报》1912年7月25日。

[35] 《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民权报》1912年8月4—5日。

[36] 《四十五年之日本》，《民权报》1912年7月31日。

[37] 《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民权报》1912年8月4—5日。

[38] 《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39] 《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民权报》1912年8月4—5日。

[40] 《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41] 《日本内阁辞职观》，《民权报》1912年12月5日。

[42] 《俄报之反间计》，《天铎报》1911年2月7—9日。

[43] 《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44] 《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

[45] 《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

[46] 《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15日。

[47] 《世界去年之大快大惨大不幸》，《天铎报》1911年2月2日。

[48] 《哭庚戌》，《天铎报》1911年1月21—25日。

[49] 《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刑罚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7月6日。

[50] 《可怜亡国人之口》，《天铎报》1911年3月17日。

[51] 《刑罚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7月6日。

[52] 《东亚阳秋》，《天铎报》1910年10月11日。

[53] 《日本议员观光团之态度》，《民权报》1912年11月9日。

[54] 《安重根墓》，《天铎报》1910年10月14日。

[55] 《公道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6月19日。

[56] 《递解韩人事件与国际法》，《民权报》1912年8月11日。

[57] 《公道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6月19日。

[58] 《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13日。

[59] 《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天铎报》1910年10月18—21日。

[60] 《天仇丛话》，《民权报》1912年4月1日。

[61] 《公道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6月19日。

[62] 《强权阴谋之黑幕》，《民权报》1913年4月3日。

[63] 《强权阴谋之黑幕》，《民权报》1913年4月3日。

[64] 高纲博文：《孫文の日中ソ提携論の起源と形成》，日本大学通信教育部通信教育研究所《研究紀要》第6、7合并号，1994年3月。戴季陶《日本论》只提及前三条，秋山定辅、宫崎寅藏的回忆则涉及第4条。

[65] 戴季陶：《日本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4册，台北，1965年版，第2212页。

[66] 《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67] 《日本内阁辞职观》，《民权报》1912年12月5日。

[68] 《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69] 《联美与联日》，《民权报》1912年7月7日。

[70] 《同盟呜呼同盟》，《天铎报》1911年1月23日。

[71] 《日人之醋意》，《民权报》1912年6月13日。

[72] 《今日之外交界》，《民权报》1912年6月5—7日。

[73] 《惜しや桂公逝く》，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东京，平凡社1971年版，第548页。

[74] 《胡汉民先生遗教辑录》，第17—18页。

[75] 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2卷，樱田俱乐部1977—1982年版，第104页。

[76] 藤井昇三：《孫文の対日態度—辛亥革命时期の満洲租借問題を中心に》，《石川忠雄教授還暦記念論文集：現代中国と世界—その政治的展開》，东京，庆应通信1982年版，第109—150页。

[77] 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版，第103页注（3）、第80页。

[78]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46页。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42页。

[80] 《日本议员观光团之态度》，《民权报》1912年11月9日。

[81] 《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24日。

[82] 《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日俄与内外蒙古》，《民权报》1912年8月9日。

[83] 《最近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2月3日。

[84] 《大国民当学小国民》，《天铎报》1910年11月28日。

[85] 《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86] 《到湖州后的感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4册，台北，1965年版，第553页。

[87] 《五十初度录云巢先生赠序铭座右附志》1940年1月16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年版，第284页。

[88] 戴季陶：《满蒙山东与东部西伯利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日。

[89] 谢键：《戴季陶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献词》，《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第290页。

[90] 《日本论·胡序》，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

[91]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377—378页。

[92] 《日本论·胡序》，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

第七章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1924年孙中山取道日本神户北上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一事，学界关注甚多且备受争议。^[1]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有四点：其一，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其二，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三，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四，演讲的效果如何。以现有的资料以及孙中山面对复杂形势不拘一格的处置风格而论，要想完全解决这四点意见分歧绝非易事。不过，造成这样难解之结的原因，或许恰好在于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孙中山演讲的事情本身，以及孙中山本人的对日态度上。虽然这两方面对于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无疑至关重要，可是要想进一步破解难题，还须放眼关照全局，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整体，寻求解扣的线索。

1924年9月，就在孙中山赴日演讲大亚洲主义前一个多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前往日本讲学。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两件事之间存在什么关联，而研究辜鸿铭的黄兴涛教授敏锐地注意到，尽管孙中山与辜鸿铭的动机不尽相同，思想也迥然有别，但共同的背景都是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案”及该法案在日本所激起的“大亚洲主义”反应。^[2]只是与辜鸿铭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守成相比，在政坛角逐中愈挫愈奋的孙中山与局势瞬息万变的起伏变化更加合拍。

日本的藤井昇三教授在所著《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一书的第四章“1924年孙文的访日与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作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语境，专节讨论了美国的排日移民案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重新抬头，关照相当周详。^[3]不过，藤井昇三教授着重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内容上的异同及其关联，结构安排又将李烈钧访日放在叙述排日法案之前，使得排日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事实联系尚有一定的探究空间。检讨当时中日（包括台湾）各报刊对于此事各方面的相关报道，可以把握孙中山的心理脉动及其态度行事与波谲云诡的时局其实联系得相当紧密，内政

的因素之外，排日法案所引起的日本乃至东亚局势的变动，可以说是影响孙中山日本之行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最主要外部原因。

第一节 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一度以脱亚入欧为理想目标。此后逐渐反省，而出现国粹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反弹。在追仿先进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重新定位自我，本来是所谓现代化进程中的常态，只是日本的强盛发生于帝国主义强权时代，其反省主要是因为迅速的崛起势必引起已成定局的列强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从而受到白种强权国家的压制，所以不得不再度进行身份认同。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激起广泛而强烈的抗议乃至痛定思痛的反思检讨，即为显例。

排日移民法案的发生，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两国争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后起的日本碰上坐大的美国，各自都是野心勃勃，咄咄逼人，胃口极大。尤其在山东问题和海军防备问题上，双方产生尖锐矛盾。日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态度与气势，令美国大为不快，难以忍受。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因此迅速蔓延，外交方面，也动作频出，设法反制，双方的冲突急剧激化。《台湾日日新报》报道：

美国舆论中，特要注目者，为近来之反抗日本气势。日本关于山东问题及海军防备问题，因求本国政府电训，其结果华府会议，至续行延期。其责任似欲推在日本，故气势渐以浓厚。然日本对于山东及防备问题之主张，则以为别问题，故乘会议迁延，屡预为言明。现排日论再抬头者，为《纽育泰晤士》、《德利比理》、《巴普列克礼惹》诸报，皆有煽起排日的趋势。就中如“哈斯特”系新闻之掲載记事，对于日本，尤一层抱不快之感。因此形

势，曩为英美全权蹴倒之支那三十一（按：应为二十一）个条问题，遂再由支那提议，有主张为此乃山东问题解决前提之条件状。二十一个条案上为议题事，断不可也。^[4]

日本移民问题为20世纪初以来日美两国间的重大争议，或许出于“黄祸”阴影的恐惧，美国限制亚洲移民，由来已久，以前主要针对华工。对于日本移民，同样企图根本禁止，多方鼓吹而未实现。1905年，美国旧金山因为排斥日本人儿童与美国人同校，曾经引发争端。次年，日本因美国排日运动甚炽，自动与美缔结绅士协定，禁止日本劳工赴美，此后日本人遂以他种方法秘密入境美国。1913年，美国加州又制定土地所有法，禁止日人有土地所有权，农业地租借亦限期三年。1919年，美国主张废止绅士协定，严禁日人以照相结婚为名入境。日本为缓和两国关系起见，按照美国的条件，自动禁止日本人赴美。1920年11月，加州制定新的土地所有法，完全取消前此给予的农业地租借权。^[5]

美国的加州，日本移民相对较多，与原来居住者的摩擦早就时有发生，在反日情绪弥漫的氛围下，情况日益严重。从1921年起，当地美国人逼迫日本移民迁走的事件日渐增多。^[6]政客们遂利用这种形势作为竞选的筹码，加州当局趁势提出排日土地法案，州长还鼓动当地人展开宣传运动，促使排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以排日问题为选举的重要政见。^[7]

面对日趋严峻的局势，日本政府一度采取示好于美国的政策，以缓和紧张关系。^[8]可是美国的反日情绪依然不断蔓延，以排日为目的的禁止亚洲移民入籍法案通过于大法院，并再度提出于下院，^[9]美国政府的农业部长和矿物部长公开主张排斥亚裔人，其他亚洲移民较多的州相继支持防止或减少亚洲人拥有土地以及从事渔业的法案。^[10]美国的48个州当中，禁止日本人拥有土地的已达12个州。上下两院各

有议员提案禁止日本人入境。^[11]排日情绪使得两国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受到影响，在美日人开始抱怨政府对美外交的软弱。^[12]此后，美国多名州长联署排日法案，形成政治压力。加州下院还通过决议，永远禁止亚洲人获得市民权，^[13]并要求国会同样决议。此外还有十余种涉及多个领域的各类排日法案，^[14]其中包括不准设置日本语学校等，后来陆续获得通过。^[15]

1923年，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国力遭受天灾的重挫，无力抗拒外部的高压，美国乘机将多年排斥有色人种的政策付诸实施。1923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日本人无归化能力，不但未来者不能再来，已来者亦不能自存。1924年，下院议员约翰孙提出修正移民法案，内容虽未指名日本，实际上日本所受的影响最大。外人获得入美批准的资格仅有五项，一、官吏及其家族从者仆人佣人；二、因商务目的暂时入境的旅客；三、过境者；四、合法许可入境后，经由邻国从美国之甲地赴乙地者；五、入美船舶船员因职务上之必要暂时入境者。此外，每年入境美国者有人数限制。不能取得美国市民权之外国人，一律禁止入境。由于除亚洲人外，其余各国皆有取得美国市民资格的权利，所以事实上此项规定仅指亚洲人。

提案发表后，日本舆论哗然，美国国务卿劝说国会取消歧视性条款，一律只有人数限制，以示平等，遭到拒绝。4月12日，下院以322票对71票通过提案。上院亦有内容相似的提案，由大会交付院内移民委员会审查，结果认为不妥，另由李德提出消除排日条款的修正案。由于两院态度存在差异，此事本来还有转圜余地，4月11日，日本驻美大使突然提出抗议照会，其中使用“重大结果”一语，引起美方反感，认为意在威吓，4月14日，上院遂以71票对2票否决绅士协定。15日，议员邵理治提出李德修正案之修正案，完全禁止不能取得美国市

民资格之外国人入境，结果当日无讨论获得大多数通过。两院提案内容近似，容易协调，总统为了选举，很难予以否决。^[16]

其时日本在美侨民总数不过140000。下院通过法案后，日本方面一度寄希望于上院、国务卿和总统，以为法案通过的机会不大，并且主动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17]所以上院通过法案，令日本各界大感意外，民间抗议及批判日本政府之声逐渐高涨。日方还曾指望总统行使否决权，最后连这一点幻想也落了空。美国两院协调会再延期的建议被下院否决后，5月26日，美国总统签署了法案，自7月1日起正式生效。^[18]

第二节 日本的反应

排日法案的通过在日本各界激起强烈反弹，反对运动相继展开。4月20日，日本劳动组合在大阪铁工组合本部召开理事会，商议对策。在东京的日本俱乐部，浅野总一郎、添田寿一等50人聚议应对排日法案的对策，除呼吁国际舆论反对不正立法以及日美悬案的根本解决外，强调日本国民应当自觉，以谋求移民所关的国策。^[19]4月24日，大阪市民4000余人集会演说，反对排日法案，并致函美国总统和各大媒体、公司机构，要求予以否决。^[20]

尤其是美国总统签署法案后，日本全国上下情绪激动，政府当局还算克制，设法避免引发大规模冲突甚至战争，社会团体则不断组织各地各界民众召开国民大会，东京的数千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有人还上演了在美国使领馆切腹自杀或卸下美国国旗的过激行为。6月5日，东京18个团体和新闻记者发起对美国国民大会，在两国地方的国技馆召开，听众达六万人，馆内毫无隙地，不能入场的群众，则环绕于馆外周边。望月小太郎、慎原悦二郎、小川平吉、建部越吾等沉痛演

说，先是发表强硬宣言，以正义公道促使美国反省，继而决议极端反对排日法。^[21]6月29日，“以头山满翁、上杉慎吉博士、上泉海军中将、内田良平诸氏为中心成立的东京国民大会主办对美纪念会，午后一时在芝增上寺召开”。^[22]

日本的知识人士针对这一事件也进行深度反省，《改造》、《日本及日本人》等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讨论意见。其中一种主张就是延续国权主义的大亚洲主义，为日本重新定位，变被动为主动，借排日之机唤起国论。

排日案实施期之七月一日，为国民永久不忘之国辱纪念日，兴业师已开始禁止美国映画上场映照，各团体亦开演说会，唤起国论。一般爱国者及大业社，对华族富豪其他阶级，皆希望际此国难，首先节约奢侈品，极力排去浮华轻佻，以重视对美问题，并印刷其他二三条款以书留邮便为配布，或企以七月一日访问其家庭，听其返答。如跳舞等之嗜好者，此时断然求其中止。一面亚细亚协会乘此机会，组织全国游说队，以亚细亚民族之团结，力为唤起国论。^[23]

他们认为，排日法案显然基于黄白人种的偏见，日本在巴黎和会代表有色人种主张的“人种平等案”，被一脚踢开，对此，亚细亚方面今后人种的感情与偏见将会增长，其结果，将会刺激比世界大战更加恐怖的国际感情。迄今为止，日本国民深信凭借国威，可以与白人先进国的国民并肩，并得到欧美文明国民的共同认可，日本成为世界五大国甚至三大国的一员，可是排日法案使得日本国民的自信被出卖，日本的国际地位陷于不利，原因只是出于人种的偏见。不仅日本，对于同属黄色人种的中国，美国一直以来也顽固地予以排斥，给予日本、中国、印度乃至埃及、巴勒斯坦等有色人种以深刻感铭。

上述日本之外的四个地方，均为世界的核心地带，回教徒聚居之处的气氛因此将会高涨，引起回教与白人之间的广泛冲突甚至战争。

美国的行为对于世界的紧张局势犹如火上浇油，一些人认为会造成亚细亚的人种动员，这必然导致不安定。人种问题应当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手段取得谅解和互信，但同时亚细亚各民族间目前的冷淡关系应当大力改善，尤其要制止日中两国国民兄弟阋墙蠢举的重演，一致协力为东亚大局争取良好前景。今后亚细亚民族的命运，很大程度将视日中两国国民的协调与决心如何而定。^[24]

对于大亚洲主义的主张，日本的舆论反应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回到亚洲主义的立场相当危险，而主张回到亚洲立场的人士，至少也有两种取向，一是重新检讨日本的亚洲政策，调整或改变歧视侵略殖民亚洲弱小民族的做法，以求获得其他亚洲民族尤其是中国、朝鲜的谅解，进而与之结盟，成为亚洲的盟主；二是仅仅利用人种差别的话题进行动员，不放弃日本对亚洲弱小民族的利益，凭借强权进占亚洲的霸主地位。

石崎东国的《人种问题和亚细亚文化联盟》指出：排日案使日本在列国环视之中受到美国的侮辱，为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从未经历的国耻。日本以美国为重正义人道的国民，为了日美亲善，从来相当忍让妥协。此番受到毫无道理、无视国际礼仪的羞辱，但也不能通过战争等手段来解决争端。他主张亚细亚实行文化联盟，以文化解放运动打破白种人限于白人的道德和限于基督的文明，根本解决人种问题，解放全人类，从而实现世界和平。日本虽小，中国虽不足畏，“亚细亚若联盟起来，就有一大实力了”。从前美国的排日，只是看作日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不顾中国人有同一的关系，亦未考虑白人和东洋全人种的关系。

若是以前巴里会议或华盛顿会议得奋起，应不致有如今日，在列国环视的中间，日本独受其国辱。所以东洋人要自救，亚细亚人联盟，当在这时候，以相当的威力，启白人文明的

蒙，使东西文化得早整备。……若是这亚细亚文化联盟的事业，得成立于这机会，日本一国的国辱，反成“亚细亚人的亚细亚”最好的复兴纪念日，岂不是可欣的事么？^[25]

《改造》1924年6月号发表千叶氏的文章，呼吁“日本对同色民族要悔悟了”。该刊同期还发表了题为《东洋人联盟的目标》的文章，批评日本过去在教育、政治或社会生活各方面专要努力欧化，结果不仅失望于有色友邦，且有违背有色友邦的行动，说是日本若不将黄色的脸子，糊涂做白色，则恐怕不能列在五大国之一，就是日本学穿不合身的洋服，要求与白人受平等待遇。然而日本果然得到白人平等的待遇吗？排日法案即得到清楚答案。这是日本国民幡然由洋人崇拜的噩梦中觉醒起来，觉悟自己之中有比洋人更贵重的文化存在的时机，今日东洋人联盟之声是自觉者的呼唤。

文章认为，欧美人自负为优等人种的心理，是根据最近一世纪的历史和物质科学文明的优越，无视以前的历史和文明的其他方面，实则欧美人没有建造精神文明的能力，一旦与自己的利益不合，便不以正义为正义，不以真理为真理。只有依赖东洋人的力量，即东洋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能与洋人对抗或优胜于洋人时，正义与真理才能发现于全世界，国际和平的基础存在于东洋人的联盟。提倡东洋人联盟，不仅要与西洋人对抗，更要进而教化白人，再铸造白人做新的正义人。历史证明，东洋人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都很优秀，完成自己兼以教化他人，是人类的使命，也是东洋人的使命。东洋人联盟就是实行这一使命的手段。^[26]

日本众议院议员神田正雄的《排日法和全亚细亚的问题》表示：排日法是日华提携的促进，反对排日的正当性，须对外解决对华问题，对内讲究台湾、朝鲜问题。中国大而实力缺乏，日本虽有实力，仍受美国愚弄，须与中国提携，才能收到实效。两国亲善的障碍为“二十一条”，应当废除形式，重新缔结同样的条约，以尊重爱面子

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禁止华工的政策也要改变，许可具有相当于日本六年义务教育程度的人入境。日本对欧美诸国采取正当行为，对中国则被欧美人所误，行为不当，应当谨慎。中国怨恨日本比怨恨欧美更甚。要实现共存共荣，相提携于世界，日本应示以大国民的胸襟气度。对于台湾、朝鲜，则要尊重其文化风俗，注意民意，给予参政权（其时台湾设置议会运动勃兴），不能以支配者征服者的态度一味进行压制，以自己为本位强欲同化。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地反对美国排日。^[27]

东京的《日本及日本人》半月刊发表军学各界名流的论文，对美国的態度更加激烈，大多主张联络中国，结合东亚各民族同盟以抵抗美国。具体做法例如，与中国缔结人种同盟，于东京、大阪、北京、上海举行同盟成立仪式，由政府予以支持。^[28]是年10月，该刊还编辑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特集，收录50位各界人士关于大亚细亚主义的意见，认为排日移民法是对全亚细亚民族大宣战的布告，应当惩罚美国，要确立大亚细亚主义，唤起内外舆论。作为手段，是以在日本培养成熟的儒教和佛教为日中印三国提携的连接点。甚至鼓吹以大亚洲主义为对抗美国门罗主义的亚洲门罗主义。

对于上述主张，稍持异议者只是怀疑亚洲各国相互提携的可能性，或以为应当用正义人道对抗人种歧视，避免基于人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29]东京《朝日新闻》也发表社论，高唱对华亲善论。^[30]

《台湾日日新闻》则认为移民法案不仅令日本人不快，也是对有色人种的最大侮辱和黄白人种之间的挑战，日本应当谋求亚细亚民族的大团结，日本政府对于美国的排日应采取积极对策，并充分利用这一时机。^[31]

也有人从另一面对于亚细亚联盟表示异议，日本报载《亚细亚联盟之真精神》，反对以取消“二十一条”，撤废日本禁止华工入境，

开放朝鲜、台湾、放弃满洲等为亚洲各民族结盟的先决条件，认为日本的衰颓非亚洲复兴之道。^[32]这实际上是企图继续原来的侵略殖民政策，用强横手段占据亚洲的霸主地位。所以英文《日本纪事报》批评道，日本人一方面主张人种平等、亚洲同盟，反对排日，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的排华、排印以及日本自己的排华，均未能仗义执言，对于日本剥夺高丽、台湾人和华侨的自由的行为，亦默不作声，其目的只在扩充日本的对美战斗力。^[33]

第三节 日本以外的反应

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引起日美之间的严重冲突，孙中山一开始就予以关注。这时日本的驻华通讯机构为了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不断多方探寻中国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为南方政治领袖的孙中山当然是其重要的追踪对象。可是，孙中山对此却不愿意公开明确表态。4月间，“或就日美问题，征求意见。孙逸仙氏，本日返信，有该问题所关，余憾不得立意见之语（二十一日北京发）”。^[34]

稍后，日本驻广东通讯社记者专门拜访孙中山，询问其关于美国排日法案的意见，后者仍然表示：“余于此问题，初无特殊之感想”。不过，与此前相较，答案还是进了一步，孙中山说：

此在日本毋宁视为最良之教训，须为黄种色人而觉醒之绝好机会。此外余殊无所感也。日本以前过于倾倒白人中之势，少所顾虑。余企图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已三十年，因日人淡漠置之，遂未具体实现以至今日。使当时日本表示赞同，想不至如今次受美国极端的屈辱。……余此际所望于日本者，忍受耻辱，退而静谋亚细亚民族之大结合。俟黄色人种之团结完成，然后讲求对于此次屈辱之方策，斯日本民族之愤激庶不徒劳，而有圆满结果之一日。美国此种态度正当与否，余不愿明答。何则？盖恐引起日本并吞高丽是否正当之反问也。为日本计，此际无论如何，惟有隐忍以图国力之充实，并努力亚细亚民族之团结。至于

此问题将来之进展如何，全属未知之数。南方政府未尝就此考虑何等之对策，局面之变化，殊非吾人所能预测。^[35]

尽管碍于南方政府与日本关系的复杂性，孙中山还是谨慎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希望日本能够就此改弦易辙，放弃侵略亚洲邻国的政策，回到亚洲民族团结的正轨，谋求真正的强盛之道。

5月16日，孙中山又在大本营接见了日本东方通讯社社长樱井氏，会谈的要点，就是美国排日法案及中国时局。^[36]

孙中山关于此事态度的保留，与中国乃至亚洲各国人士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以及当时的中日冲突有很大关系。

排日法案发生后，面对日本各个媒体的询问，中国各界要人反应不一。北京言论界开始对日美问题大多保持沉默，只有江庸表示同情。而且即使有意同情和声援者，态度和言辞也相当谨慎。黎元洪致函东京《朝日新闻》，呼吁中日根本扫除人种差别，放弃西洋物质万能思想与殖民思想，如果做到这一点，即为亚细亚全民族团结之好机会。^[37]原外交总长王正廷称：

吾华久为美国移民问题所苦，几次抗议，终无功效，至今美国境内，全无吾华移民。日本今日适遇吾华经验之第一步，体验吾华难堪之苦痛，吾华同病相怜，益加同情。……夫事之根柢，在人权的偏见，且内政上多所作用，不易圆满解决。日本舆论目下攻击美国态度，不无或起两国战争之惧，固不得言，毕竟日本惟有饮泣已耳。^[38]

言辞之间，颇有责怪日本原来没有声援中国反对美国排华，如今只能作茧自缚之意。只有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和唐绍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前者表示：

此回美国移民法案，即禁止日本人移民之案通过，令人惊骇，斯不仅日美间之问题，而美国与亚细亚民族间之问题。吾华人之对美国，亦与日本人同其感情，即美国与亚细亚民族之人种问题，潜在根底。……总之，望大统领为东洋民族坚拒，日本努力根本解决也。^[39]

虽然旗帜鲜明地支持日本对美抗争，更重要的还是强调中国早已深受排华之苦，日本不过感同身受而已。

4月24日唐绍仪在上海对来访的记者说：排日法案有违正义，非人道，贤明的总统应当否决，冷静的阁员也不应采用。美国的先辈英国已给美国黑人一样的社会待遇，而美国依然差别对待。此次移民案不仅对日本，对于中国、印度等其他有色民族也是侮辱，挑战人道，成为野心家政争的工具。热爱正义的美国人应尽早取消，制止有辱美国历史光辉的事。^[40]在坦率指责美国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仍然提醒日本关注亚洲有色民族的共同性。

中国人士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不够积极，除了日本未能声援中国抵制美国排华的历史原因外，与中日之间的当前形势不无关系，值得特别注意之点主要有二：其一，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抵制日货等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到1923年初，更有形成高潮之势。因为日本的纺织业等侵入、“二十一条”、旅大回收等问题，上海、长沙、福州、厦门等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长沙市民还与当地的日本侨民爆发了大规模冲突。^[41]“当地排日运动，因排日报煽动，有渐盛之趋势。孙文氏曰：二十一条约，是北廷旧式外交之结果，吾人所力反对。夫排日之事，固吾人所不愿，然不能压迫舆论之勃发，唯两国要力提携，解决二十一条问题，以绝日之祸根耳。”^[42]当各地的反日运动遭到当局的压制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自然成为反抗民众的向往和希望，“从来置本部在上海之排日原动力（不明）联合会，为见迫于上海法租界，被其所逐，因要移置本部于广东”^[43]。在此情势下，作为南方

政府领袖的孙中山很难回避中日之间的冲突，对日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态声援。

其二，东京大地震时，日本发生虐杀华侨事件，后来又限制华人入境（1924年5月实行），引起日本华侨的强烈抗议。反对理由之一，就是美国排日的事实。^[44]上海《民国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的移民比日本移民更加受苦，美国制定移民法案，全是出于人种的偏见，所以日本的反抗，乃吾人所深深同情。然而，日本若只是为着自卫的目的而争论，而不为根本的打破美国人之偏见者，吾人实难赞成。苟欲打破美国人的偏见，促进黄白二人种的平等地位，仅仅单靠着外交上的手段，实难达到目的。^[45]孙中山所谓“余关于中国移民排斥问题，亦无何等感想。中国今日毫无向外发展之余力，非先专意以促内部之统一不可”^[46]，即暗指此事。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加上内政的诸多因素交互作用，孙中山不便孤立地就具体事件发表评论，可以理解。本来美国排日以整个亚洲为的，同为亚洲人，应当感同身受，予以声援，可是要同时遭受日本歧视侵略的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义愤填膺地表示对日本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挺身而出，未做强人所难。所以有舆论希望日本人能够与其他亚洲民族易地而处，换位思想。

孙中山的态度与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的心理相近，因而得到了呼应或共鸣。《盛京时报》发表论说《日美之争潮》，呼吁全亚洲有色人种一致起来，做日本争正义争人道的后盾；同时要求日本自己切实履行正义人道宣言，停止放逐华工，以免自相矛盾，令人灰心。^[47]上海舆论指责日本禁止华工，《民国日报》等觉悟到中日两国均在同一命运中。^[48]5月30日，《中华新报》发表社论《日美问题》，其中第四部分“中国人之感想及所望诸日本者”，以日本之强，犹不能免劣

视，中国更须努力自奋。并且强调：“至于日本国民，吾人固同情其愤慨，复不能不望其觉悟。”甲午、日俄战后，日本形势大有可为，“然其后未能取得被压迫各亚洲国民之信仰者，徒以其方针错乱，反学欧洲之侵略，或变本加厉，故精神上陷于孤立。……日本欲开拓国运，应自决心求友始，求友应自同种始，而提携同种国民之先，尤应改革内政”，给与朝鲜、台湾人参政权。“国内且有民族差别待遇，何以责白人乎。”^[49]

《晨报》1924年5月4日刊载陈溥贤（署名渊泉）^[50]的文章《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指出：美国由人种成见排斥亚洲人，使将来世界在国家战争之外，多一重人种战争之恐怖，“凡属亚人，同遭轻蔑，断不能视为日美两国问题，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吾侪主张亚洲各国联合白种以外之人种，共同对白人提出人种差别待遇之抗议，苟有一国对于任何人种有歧视之举，则吾人惟力是视，誓与对抗，务使此反人道、背正义、无公理之举动绝迹于世界而后已。吾侪所争者，决非一二国家间问题，非一二人种间问题，亦非十年二十年间问题，实全世界全人类无穷未来之重大事件，为良心上所不能轻轻看过者也”。同时忠告日本痛自反省，本着正义人道，改变对华态度，放弃歧视排斥华工的政策，以免授美人以口实。此言站在世界和人类的道德高度，超越国家之间具体的人种歧视，不仅揭示了强权的反文明性质，而且将日本置于同样的标准之上进行考验。

亚洲的另一大国印度与日本较少利害冲突关系，而长期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之苦，站在亚洲有色人种应当共同反对白人的世界霸权的立场，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更形强烈。印度独立运动要人陀斯对《台湾民报》记者发表意见：

米国的排日移民法案是西洋帝国主义好战主义之表现，排日案不过其一实例而已。其排日移民案，不过是排斥全亚细亚人之大规模计划的一小部分哩。对加奈大、南阿非利加、濠

州等之亚细亚人的选举权问题的实例也是一样的。他们白人的手段，是要阻害亚细亚人的发展的阴险手段，在西洋诸国的思想，谓西洋是世界最高文明的代表者，所以他们洋人由其自国领土内驱逐亚细亚人，是他们应当的权利。对这的救济策，在创造亚细亚自由国民的联盟而已。一个个的亚细亚各国民降服于白人之势力下之中间，全亚细亚人则不得不继续承受被压迫的痛苦了。西洋诸国虽奉基督教，并没有基督精神的存在，所以要维持世界的平和，须要促进印度教佛教回回教的联合哩。^[51]

他不但坚决反对白人称霸世界，而且根本否定西洋是世界文明的制高点，将世界和平寄希望于东方的精神复兴，因此亚洲各国的联合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印度国民会议议长、泰戈尔、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施阿尔泰斯等人纷纷发表意见，抨击排日为侮辱全体亚细亚民族的不人道行为，呼吁结成亚细亚自由国民的联盟，要求全体亚洲人从久眠的状态中觉醒，具有全亚细亚的自觉意识，以此保障大亚细亚联盟的民族生存，并为崇高文化建设的母体。他们针对美国的“白人美国”，主张“有色亚细亚”，要求白人从亚洲大陆撤退，宣称“这是亚细亚人的自卫，能够使亚细亚人的生存归于平和的唯一保障”^[52]。

8月，亚细亚协会及上海经济日报社发起亚细亚问题大讲会，在上海文监师路日本人俱乐部三楼大讲堂开会，中日美印四国约700人出席，中日最多，美印次之。户川吞峰、山桐、虾斯笃里（印）、张继等相继发表演讲，从中可以窥见各自立场态度的差异。户川吞峰称：欧美风靡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排日与战争，为三种主义之结果。亚细亚联盟之使命，在防止人种战争于未然，所以不得不与美之恶思想宣战。山桐表示：国民党从来主张中日亲善，日方则相反，伤感情之处甚多。应注意三点：一、外交意旨独立。二、文化自尊，不宜欧化。三、尊重人民个体，不以军事经济定国家强弱。虾斯笃里说：要以亚细亚固有文明改良欧美文明，重精神，不全以物质为衡量。

同台发言的张继，则着重批评日本的亚洲政策，认为中日之间不能相见以诚，是因为日方自甲午以来，变化百出，行同蝙蝠，毫无诚意，甚至有意欺骗中国人。日本目前政治有改善的基础，“日本新政治家，如提倡亚细亚联盟，必先提倡亚洲民族之独立。但此言之易而行之艰，因日人恐惧朝鲜、台湾之丧失也。余深望日人在远处着眼，则将来所失者小，所得者大，而亚细亚盟主之一席，亦可操左券而得也”^[53]。张继的言论，与孙中山的看法主张相当接近。

第四节 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

随着事态的发展，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排日法案问题的态度逐渐明朗化，并开始主动发表意见。5月30日，“孙文氏本日吹学说及三民主义，所入六枚蓄音机，病后不见疲劳，约四十分久吹后，语记者曰：美国大统领之排日法署名，是与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以最良之机会。日本宜退而努力亚细亚复兴之事也”^[54]。

日本学者大都注意到李烈钧访日与孙中山访日的关系，强调其是以孙中山特使的身份为后者的访日作准备。可是，李烈钧抵达日本已经9月底，而本来这一行动应当在6月中旬就实现。其契机仍然与日本对于排日法案问题的反应有关。1924年6月15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6月14日东京发出的电报：

广东政府大元帅孙文氏关于排日问题发表同情日本的声明，最近依据作为顾问的山田纯三郎发来的情报，参谋总长李烈钧和军事顾问井上健于15日一同来日，所担负的使命，一则孙文年来希望为亚细亚民族团结作准备，同时希望与参谋本部方面联络。现在阁员中与孙氏保持友谊者以及赞成派遣特使的各方面致电表示欢迎。^[55]

前述5月30日孙中山对记者的讲话，虽然主动谈及排日问题，并没有明确加以评判，所谓同情日本的声明，迄未发现直接的文字。不过，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当与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对于亚细亚联盟表示赞成，并且一些人开始有意识地反省日本的亚洲政策不无关联。这些发声者当中，不乏在日本政界颇有影响的孙中山的旧友，背后应当还有通过山田纯三郎等人与日方具体联系的管道。

可惜，这时继大隈重信出面组阁的加藤高明是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历来将对华关系不利归咎于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主张强硬立场，反对放弃旅大和修改“二十一条”。^[56]所以7月《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署名“雁声”的时评《亚细亚联盟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出，亚细亚联盟固然是好事，但日本小而强，对亚洲诸弱小民族如琉球、高丽等，均在吞并之中；对于中国，则未曾尽提携之义。欧美列强压迫中国，日本未尝帮助中国进行反抗，反而与欧美列强平分权利，侵占满蒙，以致中国任人宰割。中国地大人多，亚洲同盟无异于中日联盟。因此，日本要以实力保护亚洲民族，促进亚洲全体的进步，尤其是要获得中国的感情。^[57]

日本反对美国实行排日法案，深层的情感因素是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强国地位不能得到欧美列强的承认，在世界上仍被白人视为次等民族，因而倍感挫折。站在人类平等的道德高度反对种族歧视，在日本的反美舆论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就在日本反对美国排日法案的同时，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加紧排斥和迫害华侨华工，为此，驻日华侨曾派遣代表向孙中山求援。^[58]但是8月以后，情况出现变化的迹象。8月5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来访，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有意改订取缔华工条约。^[59]为此，国民党酝酿采取宣传和外交等手段，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萁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60]“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撻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61]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不过，面临排日法案风潮冲击的日本政府，显然并不打算按照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愿，改弦更张。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只是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掠夺，才是实现之路。其争取强权的凭借，不是联合亚洲各国，而是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扩张增强自己的实力。因此，日本政府当局毫无放弃既定国策的意向。如果说6月中旬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侧重点还在争取当朝执政的一面，上述形势显然不利于使命的实现，这就不难理解这一计划何以迟迟未能付诸实施，迁延至两个半月之久。即使出现转机之后，9月底勉强成行，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得到的反应也相当冷淡。^[62]以至于仅仅十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接电后，开始允其“相机行动”，详细考量后，次日再复电，告以：

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63]

接到孙中山的明确指令，李烈钧调整了行动方针，他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出日本国民的意志与执

政者的意见不免疏隔，未能完全融洽。“率直言之，即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而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明确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64]

鉴于日本政府顽固坚持侵略亚洲的道路，与日本国内民间的一些反省声音出现分歧，孙中山至少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这也是他在如此不利的局势之下，仍然取道日本北上的初衷，以及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孙中山绕道日本北上，目的之一，是“与彼邦名士接洽，谋根本的提携”。^[65]名士当然不分朝野，因而孙中山在神户鼓吹东洋的王道文化，“有人以为是欲投日本人的嗜好，故选了这个题目”^[66]。日本学者注意到，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方面希望拟定的演讲题目为“大亚细亚问题”，孙中山则宣布为“大亚细亚主义”^[67]。至于如何解读其间的差异，有所争议。对此，随同孙中山访日并担任演讲口译的戴季陶在1925年日本的《改造》杂志3月号发表的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中不容置疑地指出：孙中山绝非投日本人所好而演讲大亚洲主义，

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

这篇文章颇有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为何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的意味。戴季陶在神户滞留数日，亲眼看到日本人对于美国联合舰队演习和英国在新加坡重建军港等事感到愤慨，而日本以外的亚洲民族对此却显得吾不关焉。甲午战败，中国对日本并不抱敌忾心，“二十一条”后，中国国民才认识到不可不绝对地排斥日本。“东方诸国民，至少当以现在把持着组织的制造力和完备的战斗力的日本为中心来团结，倾全力来抵抗英美的对东方政策。”但是因为日本合并朝鲜以及对华、对印的错误政策，东方诸国民对于日本已经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而且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那末，东方诸国民之对于日本的信任心不能够生出来，因此自然以日本为中心之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是无望的了。”孟子对齐宣王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这寥寥数语，实在道破了国际政策的根本义。今日帝国主义的诸政治学者或经济学者等，万不能理解这种以大国事小国的外交策的渊源的原则。日本取以小事大的智者之道图强，强盛之后，蹂躏小国，失去东方诸国民的人心，导致孤立无援，所以无法应对英美的压迫。

孙中山的外交目标，首先是要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独立，进而废除不平等条约，至于收回列强所占领地，鉴于可能性不足，则暂缓实行。即使如此，列强也不肯轻易松口。为此，说服日本国民，使之了解中国人民的意愿，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显得相当重要。

孙中山到神户港后，与东京、关西的记者在“上海丸”会晤，长谈后提出两个问题，一、日华亲善的必要无疑，但要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来做亲善的引导为合适？二、现在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感想怎样？记者们回答道：最近日本的中国观比数年前变化很大，朝着相互谅解的良好方向。两国亲善的根本意义，在于两国国民了解两国是系

于生死的重要关系，“若有协力便得自立，若是分离便共倒坏”。为了彻底相互了解，首先要相互接触，并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中日两国应分别由了解对方的人来宣传对方，然后找出好的联合方法。

[68]

对于日本记者的笼统意向，戴季陶提出了日本回到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先决条件，即日本应当取孟子之道，一、对外援助中国国民的国家独立运动，撤废治外法权，关税独立，率先示范，宣言抛弃“二十一条”，以此作对等的关系，而筑同盟的基础。

二、对内抛弃殖民地统治方针，尊重朝鲜和台湾的民族的自由，允许其召集人民议会和设立自治政府，而由各民族的自由的联合以定统一的国家的基础。南洋的日领诸岛，也允许人民自治，尽量养成土人的政治的智识，同时引导其经济的独立，以示民族平等之典范。

三、速与俄国无条件复交，放弃剥夺德国人民自由、阻碍其国家复兴的政策，与俄、德签订自由合意条约，改变日本国际孤立地位。

三项先决条件之中，第二项最为关键，对内抛弃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可以作为对外自由平等的国际信义的基础。只有中国和东方诸国的民众相信日本没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东方诸民族的大团结，才能以日本为中心而成立。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人种差别撤废案，中国的舆论反而加以嘲弄，以为相对于日本的行为显得太滑稽。日本若真的主张消除人种差别，非先丢掉自己矛盾的地位不可。“践踏那以大事小之道，以定对内对外的方针，这即是最健全的国策。” [69]

戴季陶后面的这番话，已经不仅是解释孙中山的本意，甚至有代孙中山立言，或言孙中山言犹未尽以及难言之隐的意思。《大阪每日新聞》发表社说《亚细亚民族的团结》，全面呼应孙中山的演讲，认

为世界将来为白种与黄种战，为此，亚洲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道德文明对抗物质文明，才能避免被奴役，实现独立自主，维持世界和平。^[70]虽然仍是笼统表态，缺乏明确具体的条件步骤，毕竟是回应孙中山和中国国民的诉求。

第五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

迄今为止，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评价，负面的可能还占多数，一般的立论，多从理论化的反帝立场，反应也限于日本方面，有的甚至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汪精卫等人的附逆相联系。至于这一演讲及其相关思想对当时亚洲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人们影响如何，反应怎样，关注不多。限于资料，从台湾知识人所办的《台湾民报》的相关报道和刊载的文章，可以窥见一斑。

1924年4月孙中山初次对排日问题表达意见时，《台湾民报》就以《孙氏排日观》为题，报道了谈话内容并发表评论：

孙文氏对于这回美国的排日问题，说白色人种的横暴，今更不要再论，而日本奋起为亚细亚民族团结，图同族的解放，是余三十年来的希望。然而惜日本更步欧米之后尘，不但不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团结问题，尚且有虐待弱少的民族。然这回受了米国的排日，想就有得着相当的教训，听说舆论沸腾，各种的运动继起，但是这回日本总也没有出最后手段的勇气。若要雪此屈辱，非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依赖其势力之外，再没有法子了。以上所说的是孙文的意见，他对于民族团结的主张，是始终一贯的，他的主张言言句句都是不错，不知道日本的国民明白其教训吗？对与亚细亚民族的联合团结，共同努力其解放运动，不知道有感觉必要没有？但是我们想，若是自己要求他人解放的时，自己要先解放他人才成，互相要团结合力的时，相互之间没有自由和平等不可，换句话说，相互之间若有差别的时候，自然就会生出反感轧轹，那么团结怎能成功呢？这回受美国的排斥，却也亲受其苦

了，但对于排斥华工一事，自己总也难免一回的反省罢。如果有心于东亚的团结，须要对于中国的问题，朝鲜、台湾的问题，先解决妥当才成了。^[71]

此后，《台湾民报》基本由这一立场持续发表意见，如署名“一舟”的社说《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一方面指出：“细思美国议会通过该案的存意，表面上的对象虽是日本移民，其实的用意，确由人种差别的偏见，要排斥我们亚细亚民族的全体”，一方面又强调：

然而亚细亚的人，为什么倒取隔岸观火、我不关焉的态度？一甚至看日本的受辱，还有大叫快哉的人一更不可思议的，日本自己国内也冷冷静静，不闻有具体对付的方法。东京虽有开一次国民大会，其到会者寥寥如晨星，结果也不过决议对美国打发一封哀怨的通电，就算过人面情面了。见之每日的报纸，不是称赞美国大统领、国务卿的美意，就是报道美国那个新闻那个名士发表何等同情的言论。像这样的度量，或许是隐忍持重，但总免不了会受是仰人鼻息的误解。日本对中国的排日，向北京政府何等强硬的干涉？中美两国同一的行为，为什么对甲就用强硬的外交，对乙就取软弱的态度，何况中国排日的理由，比美国并不薄弱。且这回美国的排日，无所发见不平恐慌的理由，着实发源于人种差别的偏见。日本既自许为亚细亚的盟主，何以缄口受辱？为日本自国利害关系计，为同族的解放，日本亦宜奋起毅力，以图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

我们认定美国通过排日法案，正是我们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又是日本实现亚细亚的盟主之绝好机会。但是日本要完成这样大使命、大目的，不可无相当的觉悟。甚么觉悟呢？一要厚待亚细亚弱小的民族，这回他们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可不是日本从来有令人不满的地方吗？二则要求他人解放，宜先解放他人。譬如对朝鲜、台湾的人，应该解放，与母国人受同等的待遇，享同等的幸福。倘日本果有实践躬行的雅量，亚细亚的民族，就不难于团结了。所以我们希望日本对于美国这回的排日法案，应取积极的态度，又利用这个问题以为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72]

6月，孙中山将派李烈钧前往日本的消息传出，《台湾民报》又及时报道：“闻孙中山大总统将派李烈钧氏来日本访问当局，提议亚细亚的联盟，这个问题如果成立，亚细亚的将来是有望啦。印度诗圣达

戈尔氏也极力提倡此说。当此米国抱人种优劣的偏见，亚细亚人若得团结，以互相扶助的精神成立联盟的时候，我想欧西的人一定不敢再轻视亚细亚人了。世界的平和，总要撤弃人种的偏见，所以我们亚细亚人必要大发挥其实力，使欧西人认识，才能从他们的脑里，根除这个偏见了。希望在亚细亚的兄弟，决不可抱煮豆燃豆枝的精神，饮水要思源，才能保其面目啦。”^[73]对亚洲各民族结盟满怀希望，呼吁亚洲人团结一致。

与孙中山的呼吁相呼应，《台湾民报》在处境相当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台人重大的使命”的特殊命题：

我台人既属汉民族，就是极爱平和的民族，亦是深重文化的民族，世界人类虽是很发达文化，而于弱肉强食的强权，还未能打破，这样平和的障害，真是可痛恨了。前日本曾对于人种差别唱撤废，就是鉴这缺陷，要下针砭的功夫，虽是不能够达目的，那种理想岂不是可敬可爱的事吗？这个人种解放亦可为我台人重大使命之一，因为我们黄人种若思对于白人种要求平等待遇，当先要于黄人间撤去差别待遇，才免使白人有所借口。我台人倘知努力这一点，希望日本人加慎重于朝鲜、台湾的待遇，然后联合全体的黄种人正正堂堂向白人要求平等待遇，不怕白人不能不撤废这差别。其次图日华亲善，亦为重大使命之一，保持东洋平和，或是要联合东洋民族防白人侵略，二国亲善，自然是很切要。从前因为政策上，和国民感情缺有圆满，今乘新内阁出现，和全国民的大觉悟，要扫一切误解和宿恨，亦属顶好的机会。若是得台人介于其间，表明双方的诚意，是很有功效，自然可进有实际的亲善，没徒弄口头禅的弊害。但是要使台人尽力，或要得中国人信用，想于治台的方策，是还有改革的余地。

为完成上述使命，首先要充足台人的实力，一、设置民意畅达的立法机关；二、普及和提高教育；三、打破陋习。^[74]不仅要争取台民自己的权利，还试图在中日两国的沟通联系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1924年11月,《台湾民报》第2卷第24号发表署名“前非”的文章《黄色人种应该着觉悟唠》,指出:世界上黄白黑红棕五色人种,黑红棕已被白种摧残殆尽,成为奴隶牛马,能与之对峙角逐的只有东亚大陆的黄种,尤其是日本与中华,却还自相残杀,不知唇亡齿寒。东亚黄种应去掉以前相诈相虞的私见,互相扶持,互相策励,使白人不敢加灭种的惨祸到我们身上。日本不要教唆中国的军阀,不要暗与军阀秘密订约,事事取合中国的民意而行,对台湾、朝鲜的同色同胞不要施压迫政策,发挥其固有正当的精神,享应享的权利,尽应尽的义务,没有日本、朝鲜、中华、台湾的分别。^[75]

孙中山到神户发表演讲,《台湾民报》以《孙先生的“亚洲民族联合”演说》为题,刊载了演讲的内容,并多方转载相关消息,报道孙中山的行踪,言论也继续呼应孙中山的主张,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团结,成一大团体之黄色人种,即使世界人种冲突,不肯受压于白人,且占优势地位。而结交须以诚意为本,台湾本属中国领土,台湾驻民系属汉族,与中国民族素有血缘之亲,欲图亲善中国,当优遇台民,以示亲爱之心,而敦友谊之好。“不然,则中国之民族,视我台民之境遇,必痛心疾首,深恨邻邦之残酷,衷心日益疏远,终无亲近之一日,且含有仇视报雪之心,何有亲善之可言哉。”^[76]这些言论显示,《台湾民报》的那批知识人领会把握住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及其演讲的主旨,并从积极的角度予以回应。

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3月24日下午7时,台湾有志人士不顾日本殖民当局的干涉,在港町文化讲座召开追悼大会,盛赞孙中山提倡亚洲联盟以固东亚黄人的义举,以其死为东亚黄人莫大之不幸。^[77]《台湾民报》称颂孙中山为民国革命的元勋,世界的和平神,弱小民族的救主,尤其强调孙中山努力于东亚的亲善和世界的和平,尽力于弱小民族的解放。^[78]显然,他们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解读和共

鸣，与当时的中日政坛乃至后来学人的看法，有着不小的距离。由此看来，回到时空现场，关照不同层面，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际影响，对于亚洲弱小民族和人民，具有积极的效应，用后设的理论架构和逻辑，加以望文生义的解读，很难贴切近真。

关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前人多从孙中山本人的思想脉络中寻求解释，实则此事与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关系密切。这一法案强烈的种族色彩，使得明治维新以来以脱亚入欧为目标的日本面临重新定位的抉择，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考虑是否应当回到亚洲的立场，与亚洲大国结盟的呼声渐起。然而，日本在东亚推行的强权侵略政策，令东亚各国民众对此反应冷淡。开始孙中山的态度也相当保留，直到日本国内出现反省的声音，而亚洲其他国家予以正面回应，为了实现国内统一，孙中山才转而试图争取与日本结盟，寻求支持。在向日本政府和政党求援不果后，孙中山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呼吁以包括俄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国民的结盟对抗列强的同盟以及日本政府和政客长期追随欧美列强侵略扩张的行径。因此，1924年底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绝非投日本当局之所好，其主旨得到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各地有识之士的共鸣。他们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解读，与当时的中日政坛乃至后来学人的看法，有着不小的距离。只是日本民族具有高度统一性，明治以后国民对于政府的行为又高度认同，民间的反省之声相对微弱，不足以对政府构成强大压力，促使其改变既定国策。

不仅如此，从日本政府的掠夺扩张中获得实际利益的日本国民，仍然沉浸在侵略带来的好处所产生的喜悦之中，美国排日法案虽然令其不无挫败之感，尚不足以彻底反省逞强霸道的一贯做法。在日本不放弃侵略扩张国策的情况下，对于亚洲各国而言，以大亚洲主义实现亚洲民族大团结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对于日本国民而言，也只有被政府拖入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之后，才会因为体验切肤之痛而真正有所

悔悟。日本与亚洲各国情感的分裂，既非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的喜讯，也不是日本自己的福音。奢望利害各异的不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般而言当然并不现实，但是，如果一味对立，无法协调，甚至为了一己私利，故意制造摩擦，长期对抗的结果，裂痕势必会扩大为全面冲突，最终只能是咎由自取，重蹈历史的覆辙。

[1]一般相关著述以外，最具代表性而较新的研究成果是伊原泽周《论孙中山先生的泛亚主义》（《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473页）、王尔敏《大亚洲主义》（李云汉、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第257—281页，刘真主编：《中华民国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中山丛书》，台湾书店1999年版）、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補訂版）（神戸新闻总合出版センター2002年版）。

[2]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0—336页。

[3]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第2版，第203—226页。

[4]《排日气势抬头》，《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二十日，第五版，“电报”。同日该报日文版第二版有同样报道。

[5]《日美问题》，《中华新报》1924年5月30日，“社说”；渊泉：《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晨报》1924年5月4日。

[6]《加州日侨又被迫》，《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7]《加州知事排日宣传》，《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二版，“外国电报”。次日该报汉文版以《加人宣传排日》为题报道。

[8]《米の排日感情融合加藤首相の政策欢迎さる》，《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第七版，“外国电报”。

[9]《排日移民案更に提出乎》，《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二版，“外国电报”；《米国新移民法中の排日条項》，《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二年二月九日，第三版，“外国电报”。

[10]《加奈陀亦排日》，《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版，“外国电报”；《美国排日法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版，“电报”。

[11]《排日案通过美下院》，《台湾民报》第2卷第7号，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第4页，“内外时事”。

[12]《早くも排日運動抬頭し在米邦人外交の软弱を慨す》，《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五版“外国电报”。此日该报汉文版以“美人排日运动”为题的报道称：“华府会议一周年之今日，例之排日运动又起。即自此回美国大审院判决日本人无归化权之事始。犬养某氏，素为日本人画家，颇知名于中外人间，过去五年间，常出品市俄古美术馆，今年何故以其为外人之理由见拒。‘夏斯顿’氏所经营活动写真会社，更揭排日映画，宣传加州年年为日本人侵略而去，来十九日起，且于‘拉俄利’座

公开。日侨今甚憾本国政府对美外交之软弱，又愤未任币原大使后任者，只令代理大使磋商者。”第六版，“电报”。

[13]《禁亚人市民权》，《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三月三十日，第五版，“电报”。

[14]《加州有排日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五版，“电报”。

[15]《加州排日案通过》，《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第五版，“电报”。

[16]《日美问题》，《中华新报》1924年5月30日，“社说”；渊泉：《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晨报》1924年5月4日；《禁止入国条项》，《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五版，“电报”；《排日案の注目すべき点》，《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三版，“内地电报”；《美排日法案的内容》，《台湾民报》第2卷第9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一日；《排日条項を削除せよ米国上院移民委員会決議》，《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三月三日，第三版，“内外电报”；《美排日案修正》，《台湾日日新報》汉文版大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五版，“电报”。

[17]《美政府与排日案》、《国务卿与排日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五版，“电报”。

[18]《美国总统署移民案》，《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五版，“电报”。

[19]《铁工与排日将对》、《排日对策之决议》，《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五版，“电报”。

[20]《市民大会决议》，《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五版，“电报”。

[21]《日人反对美国移民法之表示》，《晨报》1924年6月8日，第三版。

[22]《永远に記憶べき日の国民的獅子吼帝都の各所に舉行學生数千の示威行列も行はる》，《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第二版。

[23]《对排日唤起国论》，《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第四版，“电报”。

[24]《人種的偏見の昂進を怖る猶豫ならぬ日支の提携》，《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三版。

[25]1924年5月6日锡舟译：《台湾民报》第2卷第11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26]アールピーボース氏：《台湾民报》第2卷第11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27]《台湾民报》第2卷第17号，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28]《日人决心抗美之激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8日，第四版，“中外要闻”。

[29]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19—220页。

[30]《日报唱对华亲善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2日，第八版，“中外要闻”。

[31]《期せずして亞細亞民族の大團結誘致排日移民法案の影響黄白人種鬭争の第一歩乎》，《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二版。

[32]《日人提倡亚细亚联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0日，第六版，“中外要闻”。

[33]《英报讥评日人之妙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25日，第八版，“中外要闻”。

[34] 《孙文氏不明答》，《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五版，“电报”。

[35] 《帅座对美排日案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30日。同样内容参见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孙氏排日观》。4月25日《東京朝日新聞》据23日广东来电报道孙中山关于排日移民法的谈话，内容与此大致相同（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18页）。只是其中以日本为亚细亚民族盟主谋求亚洲民族解放的说法，为其他报道所无。

[36]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5月18日。

[37] 《江庸发表日美意见北京报界均守沉默》、《黎宋卿之日美意见》、《中国舆论对日同情》，《盛京时报》1924年4月24日，第二版，“中外要电”。

[38] 《华人同情日本》，《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五版，“电报”。

[39] 《亚洲民族问题》，《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五版，“电报”。

[40] 《一種の人道的挑戰，唐紹儀氏の排日案批評》，《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二版。

[41] 《对岸盛行排日热》，《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二年六月五日，第六版。

[42] 《孙氏与排日事》，《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二年四月一日，第五版，“电报”。

[43]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五版，“电报”。

[44] 《日本限制华人入境》，《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3日，第六版，“中外要闻”；《日本排华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2日，第八版，“中外要闻”；《日本取缔华人新苛例》，《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5日，第六版，“中外要闻”。

[45] 《民国日报的人种偏见绝灭论》，《台湾民报》第2卷第10号，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46] 《帅座对美排日案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30日。

[47] 《盛京时报》1924年4月23日，第一版。

[48] 《中国舆论对日同情》，《盛京时报》1924年4月24日，第二版，“中外要电”。

[49] 引自《台湾民报》第2卷第12号，大正十三年八月一日。

[50] 感谢石川祯浩教授指示。

[51] 《亚细亚人当联盟对抗白人之横暴》，《台湾民报》第2卷第10号，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52] 《由酣睡中大亚细亚的觉醒和白人侵掠的抗拒》，《台湾民报》第2卷第12号，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第5—6页，“论说”。锡舟译自《日本及日本人》。

[53] 《上海亚细亚问题的论潮》，《台湾民报》第2卷第17号，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54] 《孙文亚洲复兴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六月二日，第四版，“电报”，五月三十一日东京发。

[55] 《李烈钧氏来朝说》，《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第二版，“电报”，六月十四日东京发。

[56]《加藤组阁之对华政策》，《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3日，第八版，“中外要闻”。

[57]《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0日，第七版。

[58]《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3日。

[59]《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6日。

[60]《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9日，第三版，“国内要闻”。

[61]《广东国民党致日本国民之忠告书》，《台湾民报》第2卷第15号，大正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内外时事”。

[62]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03—206页。

[63]1924年10月13日《致李烈钧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0页。

[64]1924年11月8—11日李烈钧与日本各报记者的谈话，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50—552页。

[65]1924年11月22日晚上海专电，《晨报》1924年11月24日，第二版。

[66]戴天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第11—12页。

[67]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補訂版），第244—258页。

[68]锡舟译：《对孙文的希望》（《大阪朝日新聞》社说），《台湾民报》第3卷第1号，大正十四年（1925）一月一日，第17页。

[69]《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该文后注：“这篇文章是戴先生批评日本的东洋政策的，原文载在《改造》三月号，因这篇论是很难得的好文字，故特转译在这里，以享读者。一郎附言。”一郎或为张一郎，出席过台北举办的孙中山悼念会，并演说孙中山的主张。

[70]《台湾民报》第3卷第1号，大正十四年一月一日，第15—16页。

[71]《孙氏排日观》，《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第7—8页，“时事短评”。

[72]《台湾民报》第2卷第9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一日。

[73]《亚细亚联盟说》，《台湾民报》第2卷第12号，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第4页，“时事短评”。

[74]锡：《台人重大的使命》，《台湾民报》第2卷第14号，大正十三年八月一日，第1页。

[75]《台湾民报》第2卷第24号，大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76]立峰：《论日华亲善之必要》，《台湾民报》第3卷第5号，大正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第12页，“论坛”。

[77]《台湾有志开孙先生追悼会》，《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一日，第5—6页。

[78] 《台湾人不该哭孙先生的死吗》，《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第6页，“时事小言”。

第八章 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1]

1924年孙中山北上绕道日本在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历来受到学术界尤其是中日学人的高度关注。围绕此事展开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层面的拓展、认识的深入等方面，陆续取得显著的进展。可以说，通过前人的不断努力，各种相关材料大体已备。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此事的看法观点，当时各方已经议论纷纷，后来研究者更是聚讼纷纭。例如孙中山北上的目的何在，为何会绕道日本北上、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究竟何在、孙中山此番演讲的各方反应如何等等关键问题，尤其是如何解读孙中山演讲文本的真意，存在看似见仁见智，实则各执一偏的情形。这不禁令人怀疑后来的各种解读与孙中山的本意是否契合，进而反省如何才能真正了解演讲的旨意以及如何判断是否两相符合的层面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指陈演讲的当否和效用。

历史研究固然必须以材料为依据，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比较运用材料，仍然无法重现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特别是对于思想言论的研究，直面文本的解读方法只是猜来猜去，往往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所指称与言说者的本意相去甚远，非将思想还原为历史，难以理解到得其所哉的程度。以后来外在的标准为尺度准绳的望文生义，固然是隔靴搔痒的门外文谈，即使依据一定方面的材料事实加以检讨，也难免陷入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而不能贯通无碍。孙中山演讲的主旨、当时各方的理解以及后来的认识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凸显后人观念与前人本意及史事本相的差异隔膜。借鉴前贤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法，应改变但凭己意直面文本的妄加揣度，从中日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变动的大势实情着眼，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地通语境以解文本，继而从中日朝野以及亚洲各国的反应来考察其实际效应。如此，庶几可以回到历史现场，接近孙中山的本意，把握所指的意涵，多视角考察演讲产生政治与社会的反响。

第一节 思想的历史

所谓思想的历史，并非一般分科专门的思想史，而是用历史的办法研治历史上个人或群体的思想。历史上的人事，都是相互联系的单个具体，而且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特重政治伦理，所谓思想学说，均有具体的时空人事因素，少有形而上的抽象，研究此类对象，不能简单地直面文本，以免望文生义。必须将与之相联系的所有思维与行事的材料史实融会贯通，才能了解领悟具体文本。政治家的言论思想，更是常常出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情形，令人难以捉摸。没有适当的办法，不易解读得当。

如何将思想还原为历史，近代几位学术大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据蒙文通回忆，佛学大师欧阳渐研治俱舍学，三年不成，后来遇到沈曾植，沈告以应先治俱舍宗，欧阳渐闻言，茅塞顿开，仅三个月便解通领悟了俱舍学。此事可见，难懂的俱舍学的教义，可以借助俱舍宗的渊源流变来加以解读。也就是说，了解了前后左右的相关事实，语境清楚，才能领会把握文本的意思。

这一方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典籍同样适用。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称：

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2]

取事实证言论，搜群籍参圣言，考订解释以明言行，为阅读理解《论语》一类经典的重要方法，若非如此，前贤的言论文字很难解读

至当。

沈曾植的领悟教义与陈寅恪的解读经典，相对而言，材料与事实简要得多。近代史料大幅度扩张，且时间相近而大都得以留存，关于同一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因为立场态度、远近亲疏、人品做派等等差异，出现大量的不同记载，有意无意之间，形成形形色色的罗生门现象。要想透过千差万别的记载把握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必须比较不同的材料，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3]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绕道日本，28日下午，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出席由神户商业会议所、神户新闻社、神户又新日报社等五团体举办的演说会，并发表演讲。演讲从三点过开始，到四点半结束，总共历时不到一个半小时，其间还包括一开始神户商业会议所会长泷川仪作代表主办方的简短致词，以及最后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西川庄三致闭幕词，又因语言不通，要由戴季陶全程担任传译，再加上听众情绪高涨，先后19次热烈鼓掌，因此内容不算太多，整理发表的记录文本，总共约6000字，大致包括下列几点：

其一，亚洲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长期具有很高的文化。近几百年来，亚洲各民族、国家渐渐萎靡衰落，受到逐渐强盛的欧洲各国的压制，同时造成亚洲复兴的起点。日本明治维新，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头一个独立国家，随后又战胜沙俄帝国，成为近几百年亚洲民族战胜欧洲人的首例，对亚洲各国各民族影响极大，鼓动起脱离欧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翁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亚洲各国先后发生独立运动，并相互联络。东亚最大的民族中国与日本，便是东亚独立运动的原动力。两国势必大联络，恢复亚洲从前的地位。

其二，美国学者以世界文化的正统自居，将有色人种兴起与白人为难的潮流乃至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视为对世界文化的反叛，而以欧洲文化为人道正义的代表。实际上世界文化分为欧洲的霸道文化和亚洲的王道文化，近代欧洲的科学文化注重功利强权，道德日见退步。而亚洲文化通过仁义道德的感化使人怀德，比西方的道德高得多。概言之，大亚洲主义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要以讲仁义道德的固有王道文化做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进而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联合亚洲各民族，武力反抗欧洲强权，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

其三，欧洲人数少，亚洲人口众多，少数压迫多数，是反正义人道的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是霸道服从王道，西方功利强权的文化，服从东方仁义道德的文化。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与东方的旧文化相吻合，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所以要和东方携手，和西方分家。提倡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是使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能够抵抗欧洲强盛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将反叛霸道的文化，作为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今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日本国民的详审慎择。^[4]

关于此次演讲的内容，目前共找到五种文本，分别为《神戸又新日

報》1924年11月29日—12月1日所载《大亜細亜主義 孫文氏講演》；《大阪毎日新聞》1924年12月3日—6日所载《大アジア主義 神戸高女にて 戴天仇氏通訳》；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8日所载《孙先生“大亚细亚主义”演说辞》；《改造》1925年1月号所载《大亜細亜主義の意義と日支親善の唯一策》以及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

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3月初版）收录的“大亚洲主义”。

这些文本的文字不一，出处各异，发表的时间先后有别，有的是现场笔录，有的经过当事者事后的整理，因而内容间有不同。由此引发后来学人的不少争议。例如，关于演讲最后一段提出日本民族“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是当时讲演所固有，还是孙中山定稿时增补后再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众说不一。安井三吉通过比较五种文本，认为后来增补的可能性很大；而藤井昇三则认为可能性很小。^[5]此外，关于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演讲的效果如何；时人及后人对于演讲的反应和评价等等问题，也颇多争议。^[6]

这种情况表明，即使找到所有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文本作为判断的依据，要想恰当贴切地解读孙中山的本意，仍然存在相当的困难，并非如一般所谓掌握第一手直接材料就能够铁证如山。傅斯年所定整理材料与事实的原则：“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以及对待材料存而不补，处置材料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等等，^[7]似乎也无能为力。面对千差万别的各种直接证据，如果不能贯通无碍，后来人势必雾里看花，各说各话。

第二节 搜群籍以参圣言

大亚洲主义讲词只有六千言，面对的听众又主要是日本民众，五种不同文本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与记录修订者的身份不同有关。不

过，虽然文本各异，演讲却只有一次，对于同样的讲词，听者的感受理解侧重各有不同，即便排除主观故意的好恶取舍，所记也会因人而异。单纯比较同题异文，显然无法完全接近孙中山的本意，甚至不知孙中山所说究竟何意。正所谓“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而意旨相同之语，首先就是孙中山自己及其身边人在此前后面对不同的场合对象的言论文字。

解读大亚洲主义演讲，首先要注意孙中山对日主张的整体性，兼顾各方面，不宜仅就其中一面立论，以免以偏概全。1925年2月1日，孙中山告诉戴季陶：

我对日本问题有三个最少限度的主张：一是日本须放弃日本与中国所缔结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须使朝鲜、台湾两民族实现最少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对苏联应该不反对其政策，并不阻止苏联与台湾及朝鲜的接触。^[8]

此说大体可以概括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和政策的主旨。

其次，要注意孙中山对日言论行事的连贯性，不宜仅就特定时空条件的一时一点判断揣测。就孙中山本人在此前后相关的言论文字而言，虽然略有分别，主旨却一以贯之。11月23日，船抵长崎，孙中山在轮船上通过戴季陶会见当地新闻记者时说：“余以日本之维新为第一步，以中国之革命为第二步。因此我感到俄国的革命与民国的革命是一样的，故在此意义上劳农俄国和中华民国可得一致，然而日本之国民不将日本之维新与民国之革命视作同一（意义），想必乃系谬误。”这段话经过修订整理，表述为：

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可惜日本人维新之后得了强盛，反忘却了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日感情日趋疏远，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奋斗，日加亲善。^[9]

在与前来迎接的日本议员西冈竹次郎谈话时又表示：“惟有亚洲民族联合起来，排除欧美的压迫，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日本只有成为亚洲民族联盟之首，才能同欧美抗衡。反之，若不竭力联合全体亚洲，以求亚洲独立，则不能摆脱欧美之压迫和羁绊。”“目前日本虽处于财政困乏之状，但早日承认工农新国，有利于改善国际关系，实属诸急务的燃眉之急，所以希望阁下同日本身居高位的代议士们相商，鼓励政府早日承认俄国。”^[10]

当天孙中山接见中国留日学生代表并发表演说，同样强调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破列强的侵略，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中国内乱不已的原因之一，就是列强侵略，吞并不成，改为瓜分，瓜分无力，又主张共管。从欧战中恢复元气的俄国，革命之后主张公道，帮助世界弱小民族，未受欧战之害的美、日两国，对外政策不同。中国应利用民气发达之利，争取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日亲善，经济同盟，获得无穷大利。^[11]

次日，舟抵神户，在船上对登轮谒见的日本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强调中国“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的力量”。在华外国人“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并且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此刻能不能够废除那些条约，关键不在别国人，完全在日本的国民能不能够表同情。”日本应推己及人，放远眼光，带头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会因此而损失一些眼前小利，但是“可以得中国的人心……以后的大权利，便可无限量”^[12]。又与日本国会议员西冈竹次郎进一步交谈，指现在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亚洲民族之联合”，“排除欧美人之压迫”，而“首先必须解决中国目前之问题”。“故将来日本欲成亚洲联盟之霸者，以对抗欧美，则应努力团结亚洲全体以图亚洲之独立，

摆脱欧洲压迫之羁绊。日本也应如法国尽速承认俄国工农政府。”
[13]

11月25日，在神户东方旅馆接待来访的东亚被压迫民族代表，谓：“东亚民族处此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必须团结一致。”[14]同日出席日本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演说道：“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15]先后接见日本各界来访人士如头山满、望月小太郎、萱野长知、古岛一雄、高见之道等，讲话大意谓处现世各种民族竞争之际，中、日两国国民非亲善不可，想要中、日亲善，日本国民应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反复申明此旨，并一面索阅日本各地报纸，以观该国舆论的意向。[16]所以当天路透社神户电称：“孙中山语报界代表，谓近今中国内战，多由于外国妄施势力，例如不公允之条约，使外人得在华施行不正当之行动，利用军阀之一部分为其傀儡。此种条约之取消，端赖日本之态度。”[17]

11月25日、26日，在神户与日本《中外商业新报》特派记者高木谈反对帝国主义、国民会议及中日亲善等问题，表示：“不驱除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军阀将永不可能根绝。因此我们今天应奉为口号的是：对外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破军阀，这是我们的主张。”“我认为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迫之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因此我深信，日本国民如不改变视日本为列强之一的观念，将无法产生对于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18]

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之后，孙中山途经各地又作一系列的演讲、谈话，一以贯之地贯彻了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当天下午与大阪《英字新闻》记者谈话，指在华的英国人老在中国制造麻烦，被压迫的中国人正在仔细考虑对英国的全面抵制。“美国和其它国家，日本也不例外，都效法英国立下的恶例。如果日本特别要和她的邻国达成真正的友善关系的话，她就应当像俄国和德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归还所有从中国拿去的東西。”有了日本的真诚帮助，中国很快就能摆脱治外法权。并告诫日本不要盲目追随英国政府的政策。^[19]

当晚出席神户各团体的欢迎晚宴，即席演说道：“照中国同日本的关系说，无论讲到那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协力进行。”中国革命久未成功，原因在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欧战德国战败，废除了那种条约，俄国则在革命之后很主张公道，知道那种条约太不平等，对于中国太不讲道理，也予以废除。“若是日本真有意来和中国亲善，便要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20]

11月29日，英国驻大阪《告知报》记者来访，问及对日本占据中国东三省领土的看法，孙中山认为，恢复中国的独立运动，现时以两点为限：一为废除治外法权，一为收回海关。至于日本在东三省的地位，与香港、澳门相同，目下并不要求归还。这并非意味日本地位应与他国不同，而是希望列强应与苏联相同，归还中国之主权而已。武化的德国，以全世界之力始征服之。若中国变成武化，则无异出现八个德国。今世人竞言和平，然中国事若不解决，世界决无和平可言。倘若列强愿意学习俄国解放中国，则世界和平可致，否则不能。^[21]这次谈话的另一版本为：

日本方面报导说，我目前承认日本在旅大的租界现状，这完全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要把日本和列国分别对待。我认为当前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

这两个问题。旅顺、大连和香港、澳门处在同样的地位，现在我未要求列强立即归还它们。有人说：旅大租界地不是和上海、汉口、天津等的租界一样吗？但我目前还没有考虑收回租界的问题。我首先要求的是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就不能成为国家，也不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22]

12月1日船抵门司，回答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的提问，孙中山解释来日的目的：“我所发表的主张，最重要之一点，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向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此刻所受不平等条约的痛苦，在日本三十年以前，也是曾经受过了的，后来日本同欧美各国奋斗，才除去那种痛苦。我现在希望你们日本，已立立人，已达达人，扩充痛定思痛的同情心，援助我们中国来奋斗。”进而表示：

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要中国完全独立之后，我才可以承认国民的希望。照中国现在大多数的国民希望，要我做大总统，大概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现在是做十几国的殖民地，有十几国的主人，我们是十几国的奴隶。如果我是做大总统，在政府之中，身当其冲，天天和十几个主人来往，便随时随地要和主人冲突。中国现在的地位，不能够和主人有冲突，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做大总统。我先要处于国民的地位，同各国再交涉，废除从前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到那个时候，才再可以同国民说，做他们的大总统。……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调和。若是北方没有这个胆量来赞成南方的主张，中国不能够脱离奴隶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时调和，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23]

归途孙中山又致电梅屋庄吉、涩泽荣一，感谢日本各界盛意招待，盼共同为亚洲民族复兴和中日经济联系协力奋斗。^[24]12月3日，船行至山东半岛附近时，孙中山一生最后一次挥毫写了“亚细亚复兴会”六个字，签名之后，送给山田纯三郎。^[25]由此可见，孙中山此行的目的与他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所宣称的基本一致。

从孙中山身边及周围人物的相关言论看，也可以印证孙中山的基本态度和主张。11月28日演讲前，孙中山先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向约一千名女学生简短讲话道：“贵国的昌盛起因于距今六十年前的维新改革。中国今日的革命即相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东洋的和平将根据这个维新的完成和两国的合作而确保。即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日两国应当共同祝福之事，故望日本同情我中国之革命。”接着讲话的宋庆龄也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26]

随后孙中山首先在临时增设的第二会场与听讲者见面，神户商业会议所会长泷川仪作代表主办方致词：“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根据凡尔赛条约，世界现已走向和平。而东亚的和平将根据（日本与）中华民国缔结完全对等的同盟加以解决。中日两国在感情上一天比一天亲善。中国的内乱今后也将根据超越人类的孙阁下以及与孙阁下意见相同的各位人士的英明决断，予以解决。东洋的和平即世界上人类和平的确立，时机已经到来，解决的钥匙在孙阁下手中。我代表日本国民向孙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27]

12月4日，会见来访的日本驻天津记者藤泽、山内、江崎、西村、岛田等人，孙中山首先表示深谢日本上下官民的热诚欢迎，接着由戴季陶以国民党宣传部长身份发表六条时局意见。其中关于孙中山的任务部分与大亚洲主义演讲内容有关的各条为：（一）孙氏对列强之态度。自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列强对中国，纯取强压的态度，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团匪事件以至日俄战争，九十多年来，连续而起。时局今日，情势非昔，然除俄国以外，各国仍持以前之态度，此今日之急图也。（三）废督裁兵之办法。国内问题，军阀操政治之大权，国际问题，帝国主义肆行跋扈，今后中国应驱除列强

之压迫，使军阀永久绝灭，故对外当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之主义。（六）中日亲善。中日亲善应先认定确实之目的，努力谋亲善之实现，故两国国民应全体携手，谋东亚民族之发展，即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谋发展，求国际的平等。日本国民应根本铲除日本为世界列强之一之观念，则中日亲善方实现。（七）孙氏自身之任务。中山自己之第一任务，对内谋国家之统一，对外完成国家之独立，实现中华民国国际的平等。本人为国民之代表，今后继续努力奋斗向国家独立之途上做去，至国家政权则绝不操取云。^[28]

随同孙中山访日的戴季陶，担任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口译，并多次为孙中山与各地各界日本人士会谈作翻译，又是孙中山的亲信和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主管。作为国民党内知日派的要角，对于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和决策具有较深的体察，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和决策具有全面的把握。针对有人指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是故意示好日本的说法，他在日本的《改造》杂志1925年3月号发表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说明为何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指出：孙中山演讲大亚洲主义绝非投日本人所好，“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

本来东方各国国民应以最发达的日本为中心，团结起来全力抵抗英美的东方政策。但是，日本合并朝鲜以及对华错误政策，使得东方各国与日本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就不能得到东方各国国民的信任，也就不能以日本为中心实现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只有取孟子以大事小之道，不再恃强凌弱，对外援助中国国民的国家独立运动，宣言抛弃“二十一条”，建立中日两国对等的关系，构筑同盟的基础，对内抛弃殖民统治方针，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朝鲜、台湾以及南洋诸岛各民族的自由、自治，

并从速与俄国复交，与俄、德签订自由合意条约，改变日本的国际孤立地位。尤其是必须对内抛弃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作为对外自由平等的国际信义的基础。^[29]

国民党的其他要人也有类似言论。12月15日，有记者访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北伐右翼总指挥卢师谛，叩以孙中山对内对外的真正态度，卢答称：

中山为东亚民族地位计，在数年前已力主中日宜亲善。兹者鉴于两国间已由国际纠纷，而渐入于双方民众之仇视，故毅然决然于列国对华垂涎中，赴日以倡大亚细亚主义，而期掀动日本国民洞察唇亡齿寒之利害，使其民众纠正其政府对华措施之不当，而完成中日亲善，以进图亚细亚民族之健全。^[30]

第三节 取事实以证言论

听其言观其行，本意是不但要看如何说，更要看如何做。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而在历史研究中，解读历史人物的言论当与了解其行事相辅相成，不是用后来的行动验证先前的言论，而是由掌握相关行事来把握其思想意旨，也可以说是观其行以察其言。此节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尤为重要。必须多层面了解相关的时、空、人、事等多种因素，才能具体领悟把握言论思想的主旨真意。

关于此次北上为何绕道日本，孙中山始终声称两方面因素，一是由沪至津的交通梗阻，一是重游旧地看望故友。实际上，船位已满不是问题，绕道日本会见故友也不过掩人耳目的说辞，其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实行排日法案后日本民众反对欧美的情绪，宣传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向坚持对欧美妥协对东亚强硬的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和苏俄一道，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

的独立自主，和平统一，最终实现世界和平。一些当时人及后来者不能了解事情的前后渊源，笼统地指孙中山对日本抱有幻想，很大程度上有违于孙中山的初衷本意。

美国实行排日法案之后，鉴于日本举国上下异常高涨的反美和反对白种的情绪，以及1924年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赞同亚细亚联盟的主张，本来对日本坚持其压迫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的立场强烈不满的孙中山态度有所松动，派李烈钧赴日活动，希望争取日本政府赞成其亚洲民族团结的主张。

不料，李烈钧等人受到日本政府的冷遇。遭受排日法案风潮冲击的日本政府，显然并不打算顺从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愿，改弦更张。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固然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更是实现的捷径。其争取强权的凭借，并不是联合亚洲各国，而是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扩张增强自己的实力。所谓脱亚入欧，实际上是侵亚入欧。借由侵亚而强盛的日本政府，毫无放弃既定国策的意向。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本来侧重于争取当朝执政，时局不利，难以实现使命，迁延了两个半月之久，9月底局势稍有松动，才勉强成行。即便如此，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反应也相当冷淡。^[31] 仅仅10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则希望其坚持：

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32]

在孙中山的指令下，李烈钧调整方针，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其“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

人仍然不在少数也”。 “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 “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 并坦率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 “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 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33]

鉴于日本国内民间出现一些反省声音，而日本政府则顽固坚持侵略亚洲的立场，孙中山采取相应对策，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希望通过日本国民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转到与亚洲各国联盟反对欧美列强的立场。这也是他在不利的局势之下，仍然取道日本北上的初衷，以及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11月18日，回到上海的李烈钧谒见孙中山，后者告以“芝泉约余赴北京，现正待启行，而诸友意见不一，君谓余当如何？”李烈钧答称：“日本老友甚多，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床次竹二郎诸人者，皆彼国之贤达，与总理夙相契厚者，倘过日本晤谈，获益必大。” “总理乃定取道日本之计。”^[34] 同日孙中山致电日本记者泽村幸夫，告以：

余此次访问日本，意在赴天津会议之前，先访问在日本之旧友知己，率直交换意见。现今之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究将如何达成此一目的？乃识者必须加以深思考虑之事。今者，中国之问题已非单纯中国一国之问题，实际已成为世界问题而受到重视。余对此一时局深深痛感。无论如何，如不与日本提携合作，则决不可能解决。而此种说法，更不可仅仅成为外交辞令中之中日提携合作。中日两国国民必须在真正了解之下救中

国，确立东亚之和平；同时巩固黄色人种之团结，藉以对抗列强不法之压迫。余尚未考虑要求“二十一条”条约之废除与旅顺、大连之收回。余尚有具体之方案。[35]

第二天，孙中山又向《大阪朝日新聞》特派员透露访日的目的：“今日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问题的中心，不可能只由中国本身来解决。尤其鉴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今日中国的改革问题，无论如何取得日本的完全谅解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我去天津途中决定先途日本的原因。”北上是为了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对内对外问题，对外方面，在免除帝国主义压迫的同时，期望保全国家主权，为此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各种自主权。即无论如何也要坚决以国民之力为主，谋求国内统一制度的改革，同时对外恢复国家主权，成为自主独立的国家。[36]

孙中山发出的各种信息表明，此番赴日的直接诉求对象是“旧友知己”、“彼邦名士”、“朝野贤达”，看似并未将日本政府及当权官员排除在外，实际上主要是与在野人士和各界民众接触。这也是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1924年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萁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37]“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撻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38]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据同行的宋庆龄回忆：“那时，日本人对美国国会通过的移民法案还在感到痛心——这个法案撕毁了过去协定，不准日本和其他亚洲人民移居美国。孙中山在好几个大会上讲了话。在这些会上，我看

到听众中有许多人为美国政府加在他们头上的耻辱而悲愤下泪。孙中山对他们阐释中国革命，呼吁他们和一切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它所滋长的骄横暴戾，维护亚洲人民的光荣、国家独立和种族平等。”^[39]

当然，鼓动民众和联络在野有力人士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孙中山仍然希望对当局者发生影响。11月23日，他致电涩泽荣一，告以此次绕道日本，“愿与诸贤恳谈东亚之大局，阁下如能光临神户，幸甚。并望向朝野贤达广为传布”。^[40]只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冷淡，孙中山此行的日程安排，并未与日本政府及其官员直接接触。

回国后，孙中山继续坚持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12月5日，日本记者来访，问及亚细亚民族之结合与废约关系等问题，孙中山答称：“亚细亚民族不可不排除不道理之欧美人势力，盖是项势力一经排除，则中国问题自然解决。日本表面上似不受欧美势力之压迫，其实亦与中国同样，明治维新后，由锁国解放，吸收欧美之文化，反陷于欧美祸。日本自日俄战争及欧洲大战以来，思想上跟外交上、经济上，亦莫不追随欧美，对于本乡本土之亚细亚，反度外视之。且由轻蔑之结果，至与中国发生疏隔。过去无论矣，以后尚望日本速归于亚细亚主义，而尤以承认俄国为其第一步。”^[41]“今之日本，虽转于三大强国或五大强国目之中，然其思想方面尽步欧美人之后尘，而于亚细亚之真精神反弃之如遗。为日本计，现在应急图还东亚民族之真光，而最要者，首应承认苏俄联邦共和国。”^[42]

12月7日，孙中山发表重要宣言，宣称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谋国家的自由与独立，为此，“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应对目前时局的最小纲领，“当提出对外政治之主要条件，即

帝国主义、列强加诸中国之不平等条件与协定，以及陷中国于经济奴仆地位之各种契约，应即废除。至对内政治，应分清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并建设地方自治政府之基础”^[43]。

其时《京报》函托汪精卫撰述稿件，谈论孙中山对外交、内政问题的态度，并以问答形式发表：

问：中山先生对于时局之宣言，以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第一义，此次在神户演讲，亦集中此点，夫内政不修明，外交何能得胜利？今主张如此，得毋舍本逐末，移急就缓欤？

答：内政不修明，外交不能得胜利，自是颠扑不破之论，但中国现在外力割宰之下，若不集中国民精力，以求冲破此境遇，则了无修明内政之可能。举例言之，今日中国处于经济落后之地位，民穷财尽，至于极点。欲求改进，非发展实业不可。然关税权在外人掌握，中国人之实业，在国内且不能与外人竞争，遑云国际。在此种状况之下，而言发展实业，无异赘人之手足，而与之言体操。即此一端，已可证明中国今日非解脱外力之束缚，则百事皆无可言。故我欲为内政修明，下一解释：凡能明了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之地位，而力求自拔者，始可为贤明之政治家。否则枝枝节节而为之，终于无当而已。

问：以极弱之中国，而冒昧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说，得毋触各国之忌，而被以布尔萨维克（日人译过激主义）之罪名耶？

答：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之必要手段，与所谓过激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日本、暹罗、土耳其皆尝于此努力，亦皆得有所成就，安得遽以布尔萨维克之名词相加。至于触各国之忌，固意中事，然亦未必尽然。证之此次中山先生在神户演讲，要求日本国民援助中国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大得日本国民之同情。可知今日无论何国家，其国民皆有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两派，不能听帝国主义者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44]

这也可以视为孙中山政治宣言的正式解释。

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孙中山的一贯言行及其身边人士的说法，大体显现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意涵其实并不难懂，之所以出现取向各异的各种解释和说法，主要是因为当时相关各方就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加以说明推测，使得本来不太复杂的文本出现多种可能的指向，后来的研究者又没有充分注意材料出处的具体时空人事背景，将不同的说法等同于全部或部分的事实，没有将所有材料贯通无碍，导致罗生门现象进一步放大。

孙中山北上及绕道访日，搅动了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国内外局势，引起各方面相歧相异甚至相左相悖的反应，各方势力以各自的立场、利益为出发点，加以报道评论，各种揣测、推断甚至谣言纷至沓来。必须将所有材料与事实呈现，比较近真且得其头绪，不能轻率简单地加以判断，以免武断或片面偏颇。当时人的认识不等于事实，当事人的真实说法也不过一面之词。惟有远近高低，四面看山，才能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

《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日刊载长篇报道《孙文抵日之情形及其赴日之内幕》，该报与陈炯明的关系紧密，但对国民党内部的情形了解较多，大体从负面囊括了围绕孙中山访日出现的各种信息，最能体现这种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情形：

孙文此次北上，间道赴日本，在孙氏本身之自信希望固甚大，然究其实在原因若何，不特外间知者甚鲜，即孙氏自身亦如堕五里雾中。兹得外交方面消息，闻系关于段祺瑞未入京执政以前，段口口声声关于北京政局，须俟孙文北来与商，故孙氏党徒，大唱北上建国，大总统一席，非孙莫属。诘根据事实，孙氏治粤两年，尚不能得乡人欢迎，而北方与孙文无历史上之关系，孙北上然后进行一切，虽三尺之童，亦必不相信。当孙抵沪时，有人在孙前讽称某国欢迎孙氏赴日，关于大借款，当能予以援助，孙因此马上就要跑到扶桑三岛，其实京事尚部署未妥。

段未入京以前，某国方面，闻孙文不召而来，抵上海后，若任从他到津，参加天津会议，彼素来长于破坏，到会必致捣乱，孰若设计使他避席赴日，俾段从容入京，办理近畿善后，较为直捷了当。故孙文朝由沪下船赴日，段即夕由津入京执政，此中大有机窍。彼背后牵线配置剧本角式的能手，恐著名编剧大家葛莱夫氏，亦居其后也。孙文抵神户，即接电报谓段祺瑞已抵京，冯玉祥辞职出洋，孙文即知上了他人的当，遂不得已通电贺段入京执政，以自行掩饰。至所谓某国人欢迎孙到日京商量借款一事，不特是水月镜花，即连影子都绝无所见。孙文抵神户，又不特不得日政府欢迎，并加派警察严重监视其行动，名为在孙文身边警戒，实则不欲孙文及其党徒居留日本活动。

廿九日香港日文报接到东京廿七日电云：孙文抵神户后，留日中国人对孙颇多反感，日本警察因在孙身旁严重警戒。廿八日孙文召人听演讲，演题为“大亚细亚”云云。按日本人对孙有两种感想：（一）孙文之赤化思想，不利于日政府；（二）留日华侨，深虑一般青年人受孙文之催眠术，万一对日本发生恶感，大不利于华侨。日政府根据以上两种原因，故对于孙文抵日，不敢以中国官礼待之，只视孙为无责任的平民游日，孙因此大为不满，骂李烈钧受某国人愚弄，诱孙来日，不得已要其通电称孙文在神户大演说，听者五千人等语，以表示日人对孙之热烈。

又广州某外报亦云：孙文抵日本后，行动如何，政府当事者，并无电报消息，日人在粤，甚为遗憾云云。查日人对孙向有可远不可近之语，孙此次乘“春洋丸”赴沪，购一等待搭客为之减少，因恐有意外也。某外报因又有《损一船》之一段新闻纪载，谓孙文乘“春洋丸”赴沪，该船长非常危惧，预备牺牲此一船云若何，即此均足见日人对孙之感想若何。孙今日在神户，大为扫兴，故有匆匆赴津之说，将来抵津入京，恐亦无甚结果。

统观上述，可知孙以六十老衰，仆仆长途，仍不外供人傀儡。记者请更简直言之，此次奉直战争，背后实皆有外人为之扯线，即就奉方面论，其背后扯线人即为张作霖向受支配之某国，此次段张合作，即某国人撮合之力居多。日前某通信社东京电：“据东京人士之一般观察，段合肥氏若果出就总理之职，而摄行总统职权时，当首开各省代表会议，而图实行其联省自治政策。且当此财政困难之时，或须对外募集善后借款，以济急需。而其先时当寺内内阁时所成立之西原借款、电话借款等等，此际纵不能偿还其本利，亦当有整理之希望。又

日本若遇段氏为实行其联省自治计画，而至仰给其经费于外债时，亦不惜与以援助，藉谋奠安中国之时局云。”又电：“昨日上院议员，曾往访口国外务当局，叩其对于中国时局意见，得其答复如次：段氏虽终不免于出面收拾时局，但亦必审慎属详，须至万不获已时而后出此，当决不如外间所传之冒昧从事也。且现时段氏手无一兵一卒，若贸然出而肩任艰钜，恐不免为冯氏所操纵，此固为段氏及其左右所深虑者。而奉张此次自恃其功，进兵京畿，以制冯氏，亦未可知。果尔，则今后北京政局，殊未易乐观，而段对此自更不得不深加审慎其出处矣。”此虽段氏未入京以前情形，然段所以徘徊瞻顾之原因，及奉张进兵近畿以制冯玉祥之二点，均已明白揭出。

至孙党亦自有其作战计划，盖孙党现分旧国民党系与共产系之二派，该二派欲利用基督将军冯玉祥一派之新势力拥孙文上场，其基本观念虽同，然实际上亦同中有异。旧国民党派欲利用冯玉祥势力以制张、段，举孙为大总统，实行所谓建国方略，但对张、段仍取妥协主义，不主根本推翻，其最低限度，即打销张、段对孙之有力反动。日前迭派张继、徐谦入京，及孙科之逗留天津，即同向此一路活动。共产派则欲乘此制造机会，实行宣布共产。日前王正廷忽于百忙中提起中俄会议，闻即别有作用。又日前某通讯社谓：“有人运动将乘天津会议机会，谋在中国设立苏俄之委员制度，现内阁中部分国民党之有力者与加拉罕之间，正在努力进行，有所企图云。”此中草蛇灰线，尤足注意。按《向导》周报（陈独秀办）第九十一期《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一篇有云：“至于何时北上或是否必须北上，（指孙氏）应俟体察情形再为决定，因为现在京津的形势，段、张、冯三大军阀已由暗斗而入于明争之期，奉张拨十万大军进驻津浦一带以后，凶焰万丈，目无余子，势危力孤的冯玉祥派为势所迫，主张略趋新异，（该报附注：如欢迎中山处置清室委员制等）已为段、张不喜，冯在中枢之地位，业已发生问题，此后冯、张是否决裂，而至于再战，尚不可知云云。即此足见孙氏之入京与否，实与冯玉祥一派有密切关系，而孙党欲利用冯派之一致心理，亦已曲曲写出。

孙抵沪后何以又忽赴日，此层上文已约略言之，盖孙党知段、张结合，其枢纽在某国人，尤于大借债有关，故怂恿孙往一行。孙在粤时逆料将来无论何人收拾时局，皆须首先解决钱的问题，即首先解决债的问题，故特派李烈钧赴日有所运动，亦实早下此一着棋，意以

为经孙亲自出马，掉三寸不朽舌，为有力的宣传，当必大有可观。初不料扯线于其后者（某国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任你打一百个大筋斗，终跳不出圈套去也。^[45]

所谓某国人，当指日本人，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较近，这也使得后者在孙、陈冲突中偏袒陈一边。孙中山争取日本，打破列强在华地位，首当其冲的就是老牌帝国英国。孙中山本想乘美国实行排日法案，将日本拉回到东亚和亚洲的立场，共同反对欧美的殖民侵略，实现亚洲民族的复兴。日本官方未予响应，在野人士和工商界等则另有所图。孙中山希望日本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在野和工商界人士则欲借此平息中国的反日情绪和抵制日货风潮。

中共及苏俄顾问起初对孙中山北上不以为然，认为会导致与北洋派系合作，与日本亲善。而列强反对孙中山北上，主要是担心其宣传过激主义和赤化，尤其是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危及列强在华利益强烈不满。北方的段祺瑞、张作霖欲与孙联合倒直，解决国家问题，但反对亲共联俄赤化，并公开承认不平等条约。

由于各方利益的错综复杂，对于孙中山访日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反应从一开始就呈现五花八门的各自表述。解读和反应的取向，大致反映了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可是理解反应的意思，却是大相径庭。大体而言，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的解读反应较为一致且积极，而包括列强、党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解读反应则相异甚至相反。

日本媒体对于孙中山访日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反应不仅各异，而且复杂。不同媒体的态度有所不同，同一媒体的言论也不尽一致。11月24日孙中山抵神户时，《大阪每日新聞》发表社说《孫文氏来る吾等の苦言》：“孙氏之访日，必与今后段、张、冯诸人之会议有重大关系”，“此乃段祺瑞向来与日本关系颇有友好之故也”。虽然对孙中山“内图击溃军阀”、“外图建设独立自由之国家”的理想表示敬意，却认为“孙氏在广东一省尚且不能实现其理想，其在全国又谈

何容易？”尤其是孙“对工农制度之憧憬”，“不仅使列国狼狈，也使民国越发陷入混乱，最终招致无法收拾之纠纷”。“吾等于此不得不先警告孙先生关于急进主义与露骨的排外主义之危险。”并责备其“玩弄以夷制夷之策，数次使日本之立场陷入困境”^[46]。而在演讲之后，《大阪每日新聞》又发表社说《亞細亞民族の團結》，全面呼应孙中山的演讲，认为世界将来为白种与黄种战，为此，亚洲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道德文明对抗物质文明，才能避免被奴役，实现独立自主，维持世界和平。^[47]虽然仍是笼统表态，毕竟回应了孙中山和中国国民的诉求。

《東京日日新聞》同样消极，该报11月26日的社说称：“孙氏来朝，切望自重，共同以孔夫子之教‘中庸’二字为经国之策”，反对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方策。^[48]

相比之下，《神戸又新日報》较为积极，27日刊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氏演讲会”的广告，通告孙中山的演题为《大亞細亞問題》，称孙为“中国革命的先觉，东亚联盟的提倡者，日中亲善的楔子”^[49]。

与孙中山交好的日本人士对于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反应比较正面，孙临终前曾就其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在日本人当中反响如何询问萱野长知，萱野答称：“此项演说各报竞相登载，无线电亦有广播，在日本全国各地，均已发生极大反响。”孙感到欣慰。^[50]而萱野对孙中山临终前仍关心中日合作之事感慨特深，著文刊登于《改造》杂志：“盖孙先生1924年11月28日在神户演说‘大亚细亚主义’，实衷心切望中日真正携手合作。……孙先生在神户之演说，实为对日本之遗言，余获此宝贵谈话，悲痛中深觉荣幸。”^[51]孙中山逝世后，其老友梅屋庄吉时常提醒自己：“孙文虽逝，其精神未死。全亚细亚民族

复兴主义作为遗训留在人间”，“实现孙文提倡之大亚细亚主义，久要不忘”。为了执行孙中山的遗训，促使亚洲早日复兴，他“决心在中国度过余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还表示：“现在我只有为实现孙总理之遗嘱，为全亚洲民族复兴之至诚。”并公开表态：“盟友故去，便认为万事皆休的想法是错误的，日中亲善是老生多年的夙愿，也是实现盟友遗嘱之途径。为此，要鞭策残年，奋起作最大努力。”^[52]

国民党驻日机构的报告显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在日本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陈季博提交的日本党务报告称：“日本人表同情于本党的也是很多，因为日本人也是多数受武力压迫的，所以他们和本党去做工作。”“日本民众对于本党的态度：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民众联络是很不容易，所以，从前对于本党是不能十分了解。但现在的态度是已经变了，在政党中也有同情于本党的。因为他们民众懂得他们自己是被压迫，所以也想联合起来和帝国主义抵抗。在他们政府，就不能不略表同情于本党了。去年总理东渡日本，提倡东方民族应该联合起来，所以日本的人对于本党的观念较为深刻。本党的三民主义传到日本，日本的民众觉得本党主义和他们的国情是十分适合，所以日本的同志说：‘中国同志改造中国，日本同志改造日本。’”^[53]

故交旧友难免情感偏爱，党务机关则有指向性选择。而立场相对中立的《申报》逡译转载日文报刊对孙中山赴日的评论，汇编成《孙中山此次来日之印象》，虽仍然有所取舍，毕竟视角不同：

此次孙中山来日颇与日人以深刻之印象，各报对于孙中山之言论均极注意，故对于孙中山之评论甚多，而佛教徒对于孙中山所发之愿望书尤属饶有特趣。兹特将足以代表日本舆论界之《每日》、《朝日》二新闻之评论，与佛教徒对于孙中山所发之愿望书略述如下，藉以窥见日人对中山此次来日所口印象之一斑。

《每日新闻》云：观孙氏前在上海所发之声明书，可知孙氏之理想甚为远大，即孙氏之志愿，对内则打倒军阀，图国家之统一，确立民权之基础，保障人民之自由；对外则建设独立自由之国家，以对抗列强之不法的压迫。此等志愿，不但凡爱国者人人均有此怀抱，即救中国之道，舍以此一理想为标的而奋进外，别无良法。因之吾人对于孙氏之主张，不禁表满腔之敬意而由衷心与之共鸣者也。

《朝日新闻》云：最近日本人之中国观，较之数年前已大有变化，此种变化为因达相互之了解，已渐趋于良好之方向。苟吾人所见无误，则中日两国亲善之本义，在中日两国国民知中日两国关系之重要，在中日两国国民了解中日两国合则共立、分则俱倒之原理。倘此见解果能澈底，则一时之利害冲突，谈笑之间可以解决。至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之第一感想，则为中国何以际此重大时期继续内乱，何以不速舍小异而就大同，向东亚大局之支持而前进。此种观念或由于日本人性急所致，亦未可知。然中国之纷乱，十三年尚不能收拾，实日本人所难以理解者也。此次反直战争终口，孙氏之所称为军阀者于兹告终，孙氏取道日本，北上收拾时局，其出处进退之光明正大，毫不图谋私利，实堪钦佩。此外，孙氏最伟大而不容他人追随之特征，在为中国国民之指导者，吾人接孙氏之高风，益觉感慕不置也。

佛教徒之愿望书云：中日提携、中日亲善之声喧腾于吾人之耳鼓者，已阅十数年矣。然迄今中日亲善之所以未举其实者，乃因在中日两国国民间，胸中各有何等互异之目的存在，中国欲利用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怀抱一片不明不纯之心所致。可以想见，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就之先，日本朝野人士曾为中国南方志士洒去若干心血，然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排日风潮时有所闻，日本当局固不能谓之无过，然中国以夷制夷、远交近攻之根性实为其主因。而因政治上或军事上之一时方便，提倡中日亲善，欲求其实现，犹之百口俟河之清。我等追想二千年前大唐之当时，中国国民对待日本不挟何等私心，或传孔孟圣贤之道，或传佛法深远之教，使日本国民上下对于大唐怀抱无上之敬意，其在今日思之，实觉感慨无量也。故在今日，欲求中日两国真正提携之实现，必在精神上、心灵上两国民间怀抱共通之观念，始克有成。故甚望孙先生虚心坦怀，发扬东洋文化，为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中日两国国民间互相开诚布公，然后万事始能成就。^[54]

《益世报》译日本报刊的报道，反应更加正面：

孙中山氏痛言列国之对华压迫，实为中国和平统一之障碍，极愿中国之革命，由华人自力为之，无须外人干涉云云。吾人（日人自称）不能不称其为快语。盖孙氏之革命事业，被英国压迫者屡矣，遂使其建国计画，未能快愉进行，殊属遗憾。再就中日关系论，一部分人士，不无误解之念，且有云中日万难并立者。此种观念，关系于中日邦交前途者甚力，不得不望两国之智识阶级，设法交换意见，除去一切误会。盖中日邦交之能否圆满，不但影响远东之和平，即与世界问题，亦有莫大之关系。中日为齿唇相辅之邦，当有两立之可能。孙中山氏此次访日，颇与日人以极深刻之印象，此后双方当可以公平之态度，为远东和平计，而谋永久之诚意的亲善云。^[55]

然而，在华日系报刊对于孙中山与各国国民相互提携打破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不以为然，颇能代表日本朝野的主流意见。《顺天时报》的社论称：“当二十二日，孙中山在‘上海丸’轮船大客厅所发表之意见中，有谓余不就政权地位，愿以个人与各国民互相提携，欲尽力使其绝灭外国瓜分中国之目的，及扰乱中国之势力云云。……然外国之瓜分中国，扰乱中国等事，罪在外国，而欲与外国国民互相提携，然后始藉以防止其行动之思想，殊非吾人所敢赞同。吾人累言中国之忧患，在内而不在于外，若果不能治内，以巩固基础，是终不能避外国之瓜分扰乱。若果能竭力于内治，则国力（所谓国力者，并非仅武力与富力）充实，外侮外患，自然消灭于无形。如孙氏者，既为实际政界及思想界之有力者，非特能专力内治，以谋政界之革新，并可谋思想界之革新。至与外国国民互相提携，欲达其目的，亦非不可能。然其口吻，既不注意于国内之祸根，而徒以与外国国民提携云云，殊非吾人所敢赞同。且仅以此等思想为出发点，以谋国事，则敢断言其必无成功之望。”劝告孙与外国国民互相提携的同时，“或用较此以上之方法，以改正内部人心”^[56]。

孙中山此行赴日，是在明知日本政府不会善待的情况下前往，主要精力集中于争取在野和民间力量方面，但是对日本政府仍然有所期待。孙中山访日前夕，通过殷汝耕向日本外务省官员如亚洲局长出渊

胜次等，探询过日本政府对于自己去东京的意见。日方表示：“孙文到东京与日本当权人士会面，可能引起误解。”“孙文到东京一事，从大局来看，不可行。”即使由戴季陶作为孙中山代表去东京，以免过分引人注目，且便于了解日本政府意见的权宜之计也未能实现。出渊还以个人意见的名义谈及日本对华方针及对孙的看法：（一）在张作霖、段祺瑞、孙文之间，不考虑偏向一党一派乃至一个人；（二）孙文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及外国租界的主张，乃过分趋于理想之议论，不能得到识者之同情；（三）孙文为同段氏握手而去天津，个人极表赞成；（四）段、孙二人握手建立中央政府，日本则必尽力给以善意援助，但应尽量避免向外国借款，执行中国政治依靠中国财力之方针。若今后中国需要资金，各国可共同给以一定程度的财政支援。^[57]

不过，日本政府虽然没有直接与孙中山接触，却密切注视其动向。殷汝耕连日与孙中山等在神户会谈后，于11月27日到东京访问外务省亚细亚局长出渊胜次，通报与孙中山等会谈的情况：（一）孙想与段祺瑞、张作霖合作；（二）冯玉祥辞职系为清除吴佩孚之反感；（三）唐绍仪去京想当总理；（四）孙对英、美有反感；（五）孙的确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六）李烈钧想当陆军总长；（七）孙之来日是为交通方便，能早日赴津；（八）孙对在神户受欢迎深表满意。^[58]

此外，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各地各国民众如何看待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及其相关思想主张，是判断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实际效应的重要凭借。从台湾知识人办的《台湾民报》的相关报道和文章，可以窥见一斑。《台湾民报》以《孙先生的“亚洲民族联合”演说》为题，刊载了演讲的内容，并多方转载报道孙中山的行踪，呼应孙中山的主张，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团结，成一大团体之黄色人种。并且坦言，结交须以诚意为本，台湾本属中国领土，台湾住民系属汉族，与

中国民族素有血缘之亲，欲图亲善中国，当优遇台民，以示亲爱之心，而敦友谊之好。“不然，则中国之民族，视我台民之境遇，必痛心疾首，深恨邻邦之残酷，衷心日益疏远，终无亲近之一日，且含有仇视报雪之心，何有亲善之可言哉。”^[59]

国民党内各派对于孙中山的日本之行反应不一。1925年1月10日，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在报告中评述：“孙中山东渡日本，使国民党右派兴高采烈，一瞬间，日本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在国民党右派看来，孙中山此次日本之行，可加强右派对孙中山的影响，他们坚信日本将给孙中山以支持。……现在，日本人频繁登门拜见政府的几位大员……司令部上上下下一议论起日本可能派教官到广东来，就几乎是喜形于色，……我在同许将军、廖仲恺、胡汉民将军的谈话中表示，我认为孙中山日本之行一来不合时宜，二来徒劳无功，但他们以种种理由加以反驳。他们反复向我说明，孙中山此行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孙中山会晤日本政府的要员和各政党领袖，即使不能导致三国联盟，无疑也能加强俄、中、日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此行可提高孙中山同北京的争端中所处地位，等等。”

苏俄对孙中山访日抱有不小的戒心。12月2日，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宋子文告诉加伦，孙中山受到日本的友好接待，加伦表示：“我不相信这种接待的诚意，因为实业家从中无利可图。”宋不以为然，指出接待孙中山的是对国民党友好的政党。加伦则强调宋所说的“是个工商实业家的政党。名叫宪政会。……诚然这个党是反对本国政府的，但并不反对侵华。长江和山东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可见这个党决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孙。”“日本如此接待，无非是急欲乘华北形势变化之机，借助孙从中国攫取利益。”宋子文答称：“鲍罗廷同志也是这个观点，地方党某些人士也赞同这个看法。但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孙是困难的。”^[60]

与苏俄的态度相近，中共对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持批判态度。12月31日出版的《向导》发表《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文，强调在人民集矢于反对直系及其后台英、美帝国主义的同时，“要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危险”。“现在日本人欲巩固在华之势力，又高呼‘亚洲人是为着亚洲人’的口号……一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临时的亲善政策，不过要在我们国家中创立一个忠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孙中山“也不甚明了这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趋向”，其大亚洲主义演讲，“对于中国民众及日本工农们有很大伤害处。中山先生应当明白，这些演说词使他与日本的军阀有接近的可能”^[61]。

第五节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苏俄与中共所担心和批评的那样。孙中山进京伊始，张作霖就劝其暂缓施行废除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张作霖又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是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汪答道：“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因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等待我国，孙先生便都可以和他们要好的。”^[62]

与张作霖同一步调，12月7日，段祺瑞就“对外条约尊重问题”向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孙中山所唱，为偏于理想之大议论。中国国情，有根本的差异。”“今吾人正努力欲于对外增高国家之信用，如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63]次日，段祺瑞发表《外崇国信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段政府的代表梁鸿志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亦宣称：“对外条约，不论何

国，均应遵守。此次临时执政府成立，其对外之一切权利义务，均当遵守不变。”^[64]

孙中山得知段政府宣言保证“外崇国信、尊重条约”，大为不满，询问前来谒见的段祺瑞代表许世英等：“外交团要求尊重条约，闻段执政府已照会复允，确否？”许世英等答道：“确有其事，但照会尚未送出。”孙中山勃然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甚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甚么还来欢迎我呢！”^[65]

孙中山进而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

中华民国早经各国承认。今合肥自认为中华民国之执政，国体既未变更，当然未失国际上之地位。此次革命纯系对推翻军阀而发，政权转移为内政习见之事，并非变更国体，无求列强承认之必要。今多此一举，反使列强见执政地位之无据，而要求承认之亟，又足使外交上因此而生一种利用之机会，殊为抱憾。乃拥段之人，仅为段在外交方面计，而不为段在国民方面计。假使即得外交之好感，而失国民之同情，试问国民之同情重欤？外交之好感重欤？段承曹、吴虐政之后，为一极好收拾人心之机会，能多做几件收拾人心之事，则国民无不感戴。国民会议之后，正式总统自舍段莫属。段且欲求不为总统而不可得，何必如此亟亟，以博外人之承认。^[66]

至于列强对孙中山，更是满怀敌意。天津各界代表拟于孙中山抵达时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欢迎大会，法国驻津领事以孙倡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不予准许，且扬言孙登岸时，不许通过法租界。^[67]

列强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于孙中山的赤化倾向及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极为担忧，早在12月1日，荷兰驻华公使就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提议：像孙文这样的赤化人物到京，必与当地赤化分子及苏联派

来之加拉罕策划掀起危险事态。为此，应支持张作霖镇压布尔什维克。同日，张作霖通过日本人町野向芳泽表达同样意思。翌日，英国公使提议召开正式会议研究此事，芳泽表示赞同，但提出与会者限于签订九国条约国家。^[68]

孙中山抵达天津当天，12月4日上午，驻京英、美、日、法、意、荷、比等各国公使就在荷兰使馆召集外交团临时会议，密议应对策略。“盖自政变以后，外人常以苏联之易于接近我国为虑，故意以中国政府之赤化，为耸听之口实。及孙文由粤起程时，发表宣言，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彼等恐慌更甚。所谓将联合列强，向我要求遵守既成条约之拟议，即因此而起。至段就执政职，宣言外崇国信，彼等方略觉放心。不料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孙文，今明即当入京，彼等恐慌遂达极点。据闻前日会议，有某某国公使，主张孙文来京后，北京果开善后会议，其决定之新政体或新政府方针，如无左倾于过激之虑则已，苟带于左倾的色彩，列国即一致以承认问题为对抗之惟一手段。第以中国之善后会议尚未召集，事实上不便为具体的决定，故最后结果，各使以为此时只应有对付之准备已足，不必先为夸大之主张。而一面对于孙文之来京，则拟向中国政府方面，非公式表示使团疑虑之意，希望当局格外注意，以防患于未然。”^[69]

会上，荷兰公使提议在孙中山到京前，将对策提交给执政府。芳泽谦吉有同感，但认为事关重大，须请示本国政府。此时列强深恐冯、孙联合，推倒段、张政权。芳泽对此表示怀疑，但认为孙文可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之政纲，故赞成采取预防措施。最后推定英国公使起草给执政府的声明。不过芳泽提议避免写上赤化、过激活动等词，也不要点孙、冯的名，只是表示各国支持执政府，并要求在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执政府应承认和保障中国与列强所缔结的所有条约，以及列强在华权益。日本外相币原赞成此项声明，只是提议删去“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承认和保障……”等字样，以免

中方误会列强有修改条约的意向。^[70]同日，美国驻华代办梅耶（F. Mayer）报告国务院：承认和支持张作霖政府可能有利于日本，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相比，其危险性要小得多，两害相较取其轻，应尽力赞助日本。凡此种种，表明列强坚持不肯放弃在华利益，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绝不可能赞成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虽然各国之间存在利害冲突，为了确保既得共同利益，不惜彼此妥协让步。

对于列强的过度反应，中国报界相当不满，《京报》发表特讯，以正视听：

日来东交民巷某某使馆中人，对于中山先生北来之消息，顿起恐慌，且放出许多空气，以恫吓我国朝野，并欲引起外人间之一致不满。时向我国政府机关探询，中山来后是否有何变动发生。此类手段，皆系外人之作用，亦可谓理屈心虚，无意识之恐慌。孙中山当然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且主张我国与各国所订不平等之条约非设法废止不可，是为我国国际地位平等之主张，乃全国国民人心所同，完全出于自动之觉悟。彼某使馆中人对人谈话，亦谓其赞成我国得有平等之地位。则对于中山之恐慌，未免神经过敏，中外人士，幸勿为谣言所惑也。^[71]

日系报刊虽然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表示同情，却认为不过是高调的理想，别有用心地鼓吹内政优先的程序和信守条约的准则，以维护其既得在华权益。《益世报》引述日本报纸称：孙氏主张中日亲善，意思究竟何在，虽难逆料，“但其排斥外力之意，似甚坚决。但日本朝野对孙氏意志之所在，颇能谅解，其在神户之宣传，可称为宣传史上之新成功。就此一事观之，当知孙氏为非凡之才。果其入京，则念佛之段氏，能否与之协调，不无疑问。但孙氏之极口排斥外力，亦有充分之理由，吾人（日人自称）当表同情。考中国历年之内乱，外人之从中挑拨，实与有关，而华人自身之不知觉悟，乃为其最大原因。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如华人不以自相惨杀为能事，则外人即无能为力矣。孙氏主张废除治外法权，

及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免偏于理论，就事实方面着想，华人果能以自力维持国内之治安，俾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则外力不须排斥，自有消灭之一日。若仅注意于排斥外力，而不求内政之改良，则恐一时难达其目的。盖任何国家，如欲取得国际之信用，首在尊重互相间之条约，否则各国将群起而阻其国家之发展，结果不但不能收其排斥外力之效果，反使国家地位，濒于危急，殊非计之得者。吾人为此言，并非谓中国与各国间所订之条约，不容变更，盖欲促华人之根本觉悟耳。孙氏如能以其数十年来所得之经验，与其丰富之学识，先行整理内政，一俟稍有成效，则可向各国提议，改订公平之条约，彼时各国将必助其达此目的也。殊如中日间悬而未决之廿一条问题，现虽未废，但无永久存在之必要，是在华人之能否努力以为断。为今之计，孙氏须尊重各国之意见，先谋国内之统一，然后再行确立对外政策。总之，外交之要素，首在扩充国力，俾能与各国协调，致益于世界，则各国对其同等之任何国家，必以公平态度之平等精神，相与交际，而国际间之真正和平，亦可随之而实现云。”^[72]此说貌似言之有理，实则居心叵测，将不平等条约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作为旁观者还情有可原，作为当事人，就颇有些强盗逻辑的味道了。

日系报纸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赤化倾向尤其充满戒心敌意。《顺天时报》发表社评称：

孙氏富于理想，为国效力，能使国家骏骏日上，此盖为国民仰瞻之焦点也。孙氏所唱之大亚细亚民族主义，不平等条约撤废主义，皆无不可。国民宜促其始终一贯努力于理想之实现，此即使孙氏以其所长贡献于国家之道，抑亦使国民增其钦仰之原因也。虽然，理想家非实行家也，实行家既不能同时为理想家，理想家亦不能同时为实行家。盖理想家之抱负，在现代环境之下，往往难于实现，惟期之于将来而已，故欲迫理想家以实行，不可也。……又孙氏所主张之大亚细亚民族主义，或不平等条约撤废主义，虽不外孙氏之高调的理想，然若为此等理想之实现起见，与俄国共产主义者取一致之行动，或倚俄国共产政府之后援，结果恐反使理想不能实现而已。兹吾人之所以对于此点特为注意者，盖恐孙氏入京以后，过激主

义者将实行跳梁，且恐利用之为赤化之宣传故也。要之，欢迎孙氏者，宜洞悉所以欢迎之理由，俾孙氏得发挥其真面目耳。^[73]

对孙中山的联俄赤化抱有敌意的不只日本一国，《香港华字日报》再度扮演了相关信息散布者的角色。该报所载《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称：

中国虽挂民治招牌，实则为军治，而操纵军人者，实为北京东交民巷之外人，此稍谙中国内情者，当无不知也。故有人谓军阀为太上总统，尚有外人作太太上总统。年来内乱，实无不有太太上总统操纵于其间。中山对此，亦深知灼见，且确知北京势力，新转移于亲日派之手中，则此后欲在中央得志，自不能不先向日本人拉拢。又苦于从前高挂打倒帝国主义招牌，而以帝国主义高临中国，当无如日本者，中山虽空挂招牌，并未做事。但日人因此一点，对于中山当然无好感，故党人咸劝中山赴日一行，亲自向日本朝野，解释国民党所称打倒帝国主义，系专指某某两国，若日本则同种同洲，自在例外。并闻订有一种密约，乞日人助其在中央活动，而公然认日本在东三省之地位，为势已固定（详文见日本英文《告知报》），是明明断送东三省于日本也。东三省为我国领土之一部，现仍属我国主权，有我国官吏在，何能与其他之割地比，利令智昏，不惜丧权祸国，较诸曹汝霖、陆宗輿尤为胆大而手段辣，顾仍高倡打倒帝国主义，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

在日既定密约后，即回天津，与段系争胜负。段之左右，固多亲日派者，但究不及中山之热烈，故日人现颇不左右袒，任其自生变化。孙之计划，现决与奉张联合，及希图勾结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藉以倒段，故嗾令党徒，开始向段攻击，反对善后会议，力吹国民会议。因现在真正国民，尚老老实实，教书者教书，工作者工作，耕田者耕田，尚未能实行主人翁职权，而一部分暴徒，则可冒牌抢夺，二个人一个会议，三个人一个团体，都起来纷争代表权，此乃民党暴徒之长技。且现国中政党未发达，只有一以国民党为外表，共产党为灵魂之中山党徒，在国中颇有捣乱之力，东嘈西搅，自信在国民会议中，必将占有多数势力，尽可假借民意以倒段。此一着现已加紧进行，试观广州报纸，连篇累幅，无非关此问题。连某某等校之女生，原不知政府为何物，居然振振有词，真好看煞人也。如争不得国民会议，或在国民会议失败时，则实行利用胡、冯以倒段；如仍不得逞，则利用共产党运动北

方工人，及失业游民兵士，希图突取北京，宣布共产，希望藉苏俄助力，在北京巩固其地位。查北京现在失业贫民日增，而长辛店工人数千，团体尤极坚固，颇有新思想，颇易于利用，以为俄国革命之成功，亦不过如是，平昔饱受共产党催眠，故欲效之。人谓共产党失败，断不知若辈固认为极有把握。现谭平山等不日即入京实行运动。北京俄人尤多，假以时日，则孙党在粤之成绩，或竟出老段意料之外，由广州移到北京未可知也（段祺瑞语东方通讯社记者谓：逆料中山未必以行于广州者移到北京）。然变化至是，全国将不可收拾矣。^[74]

孙中山自身实力有限，又欲有所作为，而不受任何一方掌控，对外要在列强与苏俄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对内要利用各种机会与各种势力合作以打击当前主要之敌，同时也要协调党内各派以及南方各种势力的分歧，其相关的言论行事，不宜单纯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加以评判。孙中山的友人山田纯三郎回答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关于孙“赤化”的传闻道：“我跟随孙先生很多年，所以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国共合作，发表跟越飞的宣言时，孙先生都曾经遭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和忠告。但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获得真正的独立。苏联是最先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国要跟任何尊重她的独立的国家做朋友。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文化，她应该走她自己的道路。信赖我，没有独立的中国和独立的亚洲，亚洲便不会有和平。亚洲没有和平，世界便不会有和平。而为了求取亚洲的和平，日本跟中国必须合作，孙先生经常这样说。”^[75]后来吉田茂派山田事务官拜访孙中山，后者表示劳动主义、共产主义归根结底显然为中国国情所不容。^[76]

国民党要人卢师谛回答来访的记者关于孙中山之真正态度的提问所作的答复，很可以体现孙中山的基本态度：

关于国民党之主张者。谓：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山殊希望其实现。此次北上，除拟赞助段执政救国外，即以宣传三民五权主义为目的，盖深望国民会议之实现，而对该党主义予以采纳也。……一年来本党之敌派，每利用本党之亲俄政策，诬本党为抛弃三民

五权主义，而采取共产主义，且谓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亦足以证明国民党之改换主义。此种谣言，余可为简要之声明：（一）亲俄系本党外交政策，若以亲俄而即目为采取共产主义，则与俄国订立国际条约，而承认其地位之国家，均可称之为共产化，岂不笑话。况共产主义之绝对不适用于我国，孙中山已于俄国越飞来华时，已郑重表示之。至表同情于共产主义之青年所以加入国民党，乃系列宁在世时之主张。盖列宁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亦谓中国之民情，不适用共产主义，故指导彼等，使投入中国国民党，而奉行国民党之主义。在国民党主义，亦视为必要之举。故少数共产派今虽相继加入本党，而加本党后，即均须服从本党之主义，而本党则决无舍己以从人之事。故因彼等少数人之投入本党，而误认本党为可以一旦牺牲数十年苦心经营之三民五权主义，稍具常识者，当不之信。况本党近一年间，因外界之谣言，而更奋力于三民五权之宣传，计本年本党宣传部所编三民五权之宣传品，不下数十种，传布于海内外者，达一百万册以上，此亦为有目者之公睹云云。^[77]

第六节 鉴古而知今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给予今人很多的历史启示。近数百年来，人类社会处于欧洲中心的笼罩之下，各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法则，主要和基本是按照欧洲发生演化的方式准则加以演绎。在欧洲中心的强势之下，其他多元性的文化，只能被动适应或主动求变，才能免于衰退灭亡。大凡经过所谓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及国家，其实只是欧洲文化的一种变异，很难保持其固有文化的本来形态和主旨。

诚如孙中山所说，近代欧洲文化是以霸道为基本内核，这体现于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其一，遵行丛林法则。动物性的丛林法则主张占地，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必须凭借武力强权来夺取和捍卫，与社会性的以文化化人截然相反。其二，根源于基督教的一元化思维。按其逻辑，必须将人类同一或同质化。二者相加，即使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也不可取。长此以往，势必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趋缓甚至倒退。虽然欧洲自有其道德，虽然欧洲中心还未从巅峰跌落，但已显出疲

态。欧洲中心的世界文化格局，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但也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且至今非但无法解决世界动乱、平等和富裕的问题，甚至出现动荡和冲突愈演愈烈之势。如何用多元文化重构世界格局，成为今日人类面临的巨大考验。而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是目前保存的文化物种当中少数可能的重要选项。国际秩序的重构越是加入多元要素，越有可能呈现与今不同的形态和趋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一度令欧洲科学功利文化永远美好的神话破灭，出现了一股崇尚东方文化的潮流。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与此合拍。很少宗教终极关怀的中国，道德成为最重要的精神和社会支柱。王道的基础是仁义道德，仁义道德的依据是伦理社会，承认人人并非一律，人与人的亲疏远近关系确定彼此的身份地位以及行事方式，并且由己及人地注重个体及其相互联系。只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乾坤颠倒，国人越来越缺乏文化自信，将传统与创新截然对立，一味强调不破不立，全盘西化实际上大行其道。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道德的缺失，令全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近代侵华列强当中，地理接近的日、俄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最为强烈，因而历来被识者认定为心腹之患，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彼此之力相互制衡，成为重要选项，晚清以来的联日与联俄，本质上就是倚重一方以制约另一方。如果真的一面倒，势必造成严重侵害。孙中山借力平衡，试图与日、俄联盟打破列强的霸权，同时又让日、俄两国相互牵制，策略上确有可行性。只是前提必须争取日本政府的同意，至少在当时，难以奏效。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效法西洋，殖民东亚，所谓脱亚入欧，其实就是模仿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将东亚逐渐纳入自己的版图，进而与欧美列强争胜。所以非但不肯放弃东亚的既得利益，而且视为生命线和立国之本。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很难将彼此利害冲突的亚洲各国用同种的观念协调统一起来，反而有可

能模糊差异，掩盖矛盾。后来日本侵占中国和南洋，以及建立日伪政权，都是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号，进一步强化了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负面判断。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的近邻，近代以来，一大一强，合则两利，斗则两害。可惜中日始终未能找到和睦相处、互利共赢之道，反而近邻变成宿敌。近代欧洲历史上长期争斗不已的世仇，大都很难完全凭借武力征服对方，最终还是要回到妥协共存之道。况且，中日双方的冲突争斗，往往会有第三方渔翁得利，因而不仅为他方所乐见，而且背后总少不了挑拨离间和坐收渔利之人。

就此而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不仅大体不错，而且极具洞见和远见。问题是，孙中山寄希望于日本国民来影响日本政府，事实证明很少现实的可能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即使有过与政府不合的情形，也不占主流和主导。孙中山在演讲最后提出的日本民族“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的问题，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答案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寄望于民间，对日本而言非但不切实际，而且免不了发生负面作用。为了争取日本在野人士的支持，孙中山对于坚决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社会贤达有所妥协。11月25、26日，孙中山在神户与头山满长谈。后者问：“您所说的废除旧条约，是否可以解释为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具体说来是包括收回旅顺、大连的意思呢？”并且明确表示：“即使将来中国国情有了大的变化，再不必担心受任何其他国家侵害的情况下，我国的大多数国民也不能例外地就轻易答应立即归还（满蒙）的要求。”对此孙中山声言，只希望日本带头帮助中国实现关税独立和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而没有考虑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我所说的是废除一般的旧条约，没有考虑收回旅

顺、大连。香港、澳门也是这样。……旅顺、大连问题，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扩大其势力的话，就会出问题；但像现在这样维持原有势力的话，还不致于发生问题。”^[78]

这样的考虑，固然基于现实的可能，但也的确容易令人误会孙中山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交易，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尤其是像“二十一条”这样臭名昭著的条约，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有些暧昧。12月1日，在门司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提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那几种条约呢？”

孙中山的回答是：“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记者进而明确问道：“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孙中山答称：“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的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79]又表示：“予第一目的，在欲废除十三国对华之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国成真正大一统之国家。则治外法权及关税各节问题，均可一一解决。而所谓二十一条问题，此际日人宜反省之。”^[80]作为整顿内政的前提废约，如果都要等列强自我反省和改良，势必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孙中山并非对日本朝野的禀性毫无认识。12月20日，他在天津寓所病榻上接见负责联络冯玉祥并决心赴日的马伯援，嘱咐道：

“你一定要去日本，可注意日本外交，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吾人未得政权……日本是帮助段祺瑞的。”并要其尽量办好对日外交。^[81]可以说，孙中山心知肚明日本朝野绝不肯放弃列强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权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多少也有些无可奈何。

其实，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胡汉民撰文论述《“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五条就是“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之所以特别揭出，是因为中日两国国际问题犹未解决。“日本所筹以对待中国者，其全体之意思不可具晓，而以吾人所知，则有二派：其一曰侵掠主义，二曰吸收主义。第一派主之者无几人，其政策亦过于武断，且貽外交之憎忌，无势力也，故二派中以吸收派为占优势。然曰吸收，则显非平等相交之道，以支那四百兆之大民族，其间岂无自觉者？睹此主义之不诚，必以其不愿下人者，而深怀猜忌，如是两国国民将不可合。盖凡国交际，智取术驭，不可长也。中国人士对待日本者，亦向分排日、亲日两派。排日非大势所宜，我之不能排日，犹日之不能排我；而亲日者徒企人之我保，而无实力以盾其后，亦非吾人所取也。吾人所谓两国国民的结合，则为两方之交谊，为中国者，讲求实力，以保其对等之资格，使交际间自无所屈辱；而日本亦当泯厥雄心，推诚相与。盖非如我国亲日者之言，而日本吸收派之论，亦无所用之耳。”^[82]

今日的世界，早已不是往昔的格局，但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仍然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政府和国民。中日两国如果不能找到互利共赢的生存之道，东亚的繁荣乃至世界和平，都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是作为理想家的孙中山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主张，其实只是具有常人常态所不及的前瞻性，所以百年之后大都一一付诸现实的根

本所在。跳出历史的枝节局限，把握人类社会前行的基本趋向，可以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1] 本章部分取材于桑兵主持、孙宏云编撰的《孙中山史事编年：1924年9月—1925年3月》稿本。

[2]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2页。

[3] 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文字有所调整。

[4] 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第1—22页；《孙先生在大阪欢迎会上演说词》，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5日，第一张第一版，“言论”。

[5] 参见安井三吉《孫文“大亞洲主義”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近代》第64期，1988年6月。

[6] 详见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安井三吉《講演“大亞洲主義”について：孫文と神戸》，1924年，《近代》第61期，1985年3月；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年版；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7]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8] 戴季陶：《孙中山与台湾》，《台湾先锋》创刊号，1927年4月1日。

[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页。

[10]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1981年版，第569—570页。

[1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7—371页。

[12] 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113—122页。

[1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第570—571页。

[14] 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哀思录》初篇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15] 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35—64页。

[1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九二四年七至十二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年版，第948、957页；近藤秀树编，陈鹏仁译：《宫崎滔天书信与年谱：辛亥革命之友的一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8页。

[17] 《孙中山将访日本政治家》，《时报》1924年11月26日，第一张第二版，“电报”。

[18]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90—393页。时间据彭泽周《中山先生的北上与大亚洲主义》一文的考证。

[1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4—416页。

[20] 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23—33页。

[21] 《孙中山先生与英记者之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0日，第一张第二版，“国内要闻”。

[22] 藤井昇三：《孙中山与“满蒙”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23]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辑：《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877—880页。

[2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37页。

[25] 宫崎滔天等撰，陈鹏仁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45页。

[26] 《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尚明轩等编：《宋庆龄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27] 《神户新闻》1924年11月29日。

[28] 《中山对时局之意见》，《盛京时报》1924年12月10日，第二版，“要闻”；《孙先生到津后之表示》，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3日，第一张第二版，“国内要闻”。

[29] 《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30] 《卢师谛之中山态度谈》，《北京日报》1924年12月18日，第三版，“紧要新闻”。

[31] 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03—206页。

[32] 1924年10月13日《致李烈钧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80页。

[33] 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50—552页。

[34] 《李烈钧将军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3页。

[3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10页，或疑此电文系伪件（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页），但从内容看，与此时孙中山的主张言论一致，必有所本。

[36] 《大阪朝日新聞》1924年11月21日。

[37] 《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9日，第三版，“国内要闻”。

[38] 《广东国民党致日本国民之忠告书》，《台湾民报》第2卷第15号，大正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内外时事”。

[39] 《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4页。

[40]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1—372页。

[41] 《孙文之谈话》，《晨报》1924年12月6日，第三版，“要闻”。

[42]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1924年12月22日。

[43] 《孙中山到津后之宣言》，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8日，第三张第十版，“本埠新闻”。长沙《大公报》1924年12月22日所刊《孙中山在津之宣言》，文字略有不同。

[44] 《汪精卫先生所撰问题》，《京报》1924年12月8日，第二版，“特别通信”。

[45] 《孙文抵日之情形及其赴日之内幕》，《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日，第一张第三页，“特约通讯”。

[46] 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第128—130页。

[47] 《台湾民报》第3卷第1号，大正十四年一月一日，第15—16页。

[48] 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10页。

[49] 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補訂版），神戸新闻总合出版センター2002年版，第247—249页。

[50] 陈鹏仁：《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台北，水牛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51] 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52] 俞辛焞、熊沛彪：《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136页。

[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278页。

[54] 《孙中山此次来日之印象》，《申报》1924年12月12日，第二张第六版，“国外要闻”。

[55] 《东报论中国之外交前途》，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5日，第三版，“要闻”。

[56] 《中山少川二先生》，《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9日，第二版，“社论”。

[57] 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东京：六兴出版1988年版，第361—363页；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11页。

[58] 大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渊亚细亚局长“孙逸仙来日有关文件”，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档案，1—0976。

[59] 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60] [苏] A. N.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5—86页。

[61] 魏琴：《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向导》周报第97期，1924年12月31日，第809—810页。

[62] 《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4页。

[63] 《段与日记者之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9日，第一张第三版，“电讯”。

[64] 述之：《段祺瑞执政与不平等条约》，《向导》周报第94期，1924年12月10日，第786页。

[65] 《大元帅北上患病逝世以来之详情（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3日，第三版，“要闻”；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哀思录》初篇卷5，第2页。

[66] 《孙中山入京辟谣》，《申报》1925年1月8日，第二张第六版，“国内要闻二”。

[6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九二四年七至十二月份》，第1033—1036页。

[68] 大正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芳泽公使致币原外务大臣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第501—502页。

[69] 《使团对孙中山来京之疑虑》，《时报》1924年12月12日，第一张第二版，“要闻”。

[70] 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第376—377页。

[71] 《外人对中山北来无意识之恐慌》，《京报》1924年12月4日，第二版，“内政要闻”。

[72] 《东报之孙中山入京观》，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8日，第四版，“要闻”。

[73] 《孙中山入京及其欢迎之理由》，《顺天时报》1924年12月7日，第二版，“社论”。

[74] 《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0日，第一张第三页，“特约通讯”。

[75] 宫崎滔天等撰，陈鹏仁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第246—247页。

[76]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第514页。

[77] 《卢师谛之中山态度谈》，《北京日报》1924年12月18日，第三版，“紧要新闻”。

[78] 藤井昇三：《孙中山与“满蒙”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79]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辑：《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877—880页。

[80] 《中山来京后将游欧美》，《京报》1924年12月5日，第三版，“内政要闻”。

[81]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1页；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台北，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35页。

[82] 《民报》第3期，1906年4月。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外多种势力互相角逐。政治中心南迁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构相继离去，北平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对于社会各界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因而各方均重视争取和利用学人，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左右政局。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尤其想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七七”事变前知识界的对日态度及其分歧变化，且多取材于《独立评论》、《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的公开文字。^[1]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学人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逐渐增多，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北平文教界暗中的组织联络及其在抗战爆发后的延续活动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只是相对于事实本身与资料留存，还有许多层面未经揭示。以朱家骅档案为基本，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可以进一步探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的势力，以图实现其整体的战略目标及政治目的。同时也可以透视中国学人在国家民族大义、党派政见分歧与学术自由独立之间平衡取舍的态度倾向。

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国民政府移都南京，有着多重考虑，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避开日本对华北的巨大压力，争取缓冲的空间，建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政治格局，以应对内部割据纷争、外部强敌压境的严峻局势。但是这样一来，在政治和军事上，南京政府对华北无法实施有效的直接控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国民党急于扭转五四以来不破不

立的革命倾向与崇尚个性自由的风气，回归稳定的传统，以利于政权的稳固与思想的控制，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平学术文化界的追求发生尖锐对立。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以及思想钳制政策，一直遭到北平文教界学人的坚韧抵制，而南京政府或明或暗地扶植中央大学以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进而影响全国风气的做法，更引起政见各异的北方学人的强烈不满。^[3]因此，尽管国民党与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北平文教界新派师生的渊源不浅，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甚至时而紧张。

1936年夏，华北局势，日趋复杂。日本企图策划北方数省脱离中央政府，成立特殊局面，以便逐渐进行侵略。其时河北一带由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驻防，一切地方行政，概归宋氏主持，对日折冲，亦由宋氏就地应付。国民政府鉴于国力未充，实行安内攘外政策，对北方情形，暂时隐忍，不肯加强政治压力，只能从教育文化方面，培植舆论，以为将来抵抗强敌之准备。

6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电告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

中央拟派兄就近秘密主持指导平津新闻，倘荷同意，即将公事与办法寄上，并酌定经费。此事兄任颇宜，时间亦不甚费，乞勿却。^[4]

顾颉刚与朱家骅均出身北京大学，1920年代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又得到主持校务的后者知遇，且因《古史辨》的引人注目在学术文化教育界声望已高，并勇于任事。“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成立中国教职员抗日会，顾颉刚担任宣传干事，以出版大鼓书词对民众进行宣传，并成立了三户书社。后因抗日会无力资助，转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求援，并应后者要求于1933年10月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脱离燕京大学抗日会而独立，宗旨也有所调整，“目标除

提倡民族精神外，尤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盖救国大业固非但恃血气之勇若义和团者所可胜任”。该社面向民众的宣传活动渐渐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以为社中人都是共产党，陈立夫以此为由欲将其封禁。为此，顾颉刚于1936年1月带了该社的出版物前往南京，向时任交通部长的朱家骅求援，后者表示支持，并乘机动员顾颉刚加入国民党。顾氏为了社务，只得同意，风波遂告平息。^[5]

由于此前这些因缘，顾颉刚接到朱家骅来电，当即复电允诺。朱家骅遂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叶楚傖磋商，决定拨款经常研究费每月5000元，开办费1500元，请顾颉刚在北平筹办新闻事业。7月3日，顾颉刚与傅斯年一同南下，到南京面见朱家骅、叶楚傖，商议通俗读物工作，并作通俗读物计划书，拟定下年度下层工作计划。通俗读物编刊社由顾颉刚、徐炳昶任正副社长，王守真任总编辑并主持日常工作，赵纪彬任编辑，李一非任总务主任，疏通好外部关系后，社务发展顺利，一年之内工作人员增至40人。^[6]

对于朱家骅要求就近秘密主持指导平津新闻的委托，顾颉刚的计划是以通俗读物编刊社为组织，具体实施。10月5日、7日，顾颉刚两度致函朱家骅并报告工作进展：已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行《民众周报》和《大众知识》二种期刊，编印丛书如通俗剧本、鼓词唱本，旨在启迪民智，宣扬爱国思想。此外还印刷连环图画，与山东省教育厅合作，编印《求生之路》月刊，与《晨报》合作，在该报发刊“生活与教育”，并调查培训北平市的评书和鼓词艺人，希望深入民间，广事宣传。

从上述情节看，朱家骅与顾颉刚表面的一拍即合，背后其实各有所图。在顾颉刚一方，将组织改名、独立以及个人加入国民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就是能够继续坚持其民众动员和抗日宣传活动。接受朱家骅的委托，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无非是通俗读物编刊社既定

活动的延续，并没有新的规划。只是这样一来，通俗读物编刊社无形中被纳入国民党的组织轨道，至少相当程度上要受到国民党的组织约束。

在朱家骅一方，关于此事原委，朱家骅档案所藏《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的编纂者主要从对日方面立论，强调“激发爱国情绪”，“唤起民族意识”，其实事情显然并非如此单纯。该文称由朱家骅推荐顾颉刚在北平举办新闻事业，但据前引朱家骅的电报，派人主持其事应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旨意。其时朱家骅刚好因汪精卫内阁辞职而失去交通部长的职位，接任因丁文江逝世而空缺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7]根据相关资料，可能的情形是，动议应为叶楚伦，选择顾颉刚则由朱家骅提议。而主要目的，决不单单在于对日准备。

朱家骅和叶楚伦看过顾颉刚的来函及工作报告，对其进展成绩甚为满意，10月12日，朱家骅复函道：

成舍我君事，据云伊为联络《世界日报》起见，曾与谈起对于北平教育之沟通与青年思想之问题，拟请兄与孟真兄稍为帮忙，并未提及经费。或请迳函子公，设法补救。此事弟处甚为秘密，从未告任何人，甚至院中会计主任，亦仅办领款汇款等手续，未知其他底蕴，并祈严守秘密为荷。对左倾分子之工作，应请十分注意，随时纠正其思想与言行，使入正轨，免为所乘，而致妨碍工作之进行。闻河北省内有天主教徒七十万之众，为该教在中国势力最钜之区，宜设法深入工作，使有民族观念，效忠国家。廿九军士兵颇具国家观念，应设法更增强之；对宋及其他高级将领，亦须妥为联络，促其拥护中央，使知统一与救国关系。以上各点，均关重要，至祈随时注意及之。

解读是函，有四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国民党中央注意与北平教育界之沟通及青年思想之问题，重要的考虑，是随时纠正左倾分子的思想言行，使教育界和青年的思想言行进入正轨，以免受左倾分子

的影响。此意的背景当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系密切。其二，宣传的重心，是强调统一与国家的关系，所谓效忠国家，增强国家观念，无疑包含具有民族观念，更重要的则是拥护党国一体的中央。其三，此时朱家骅的正式职务虽然是“中研院”总干事，资助的领款汇款等手续也由该院的行政部门经手，但这既非该院的管辖范围，也不是朱家骅的个人行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叶楚傖始终介入，其间朱家骅又一度兼代该秘书长之职，^[8]则应视为国民党中央的秘密安排。其四，除教育界和青年外，天主教徒、军队的士兵和将领也是工作的对象，则颇有为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秘密代言的意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顾颉刚14日即来函报告北平人士对事变的态度，对于张学良的“不顾大局，肆意妄行”表示“曷胜伤痛”。据称北平同人主张四点：

（一）希望政府以政治手段解决，勿遽讨伐，俾蒋介石安全。

（二）希望中枢充实，即使蒋不能遽复自由，亦可维护国家之统一，并照蒋原定计划进行。

（三）绥远战事仍须由中央主持，勿以此次事变，致懈军心，且表示政府彻底抗敌之决心，藉以间执任意批评者之口。

（四）华北地方当局环境不同，因之态度未能一致，政府应竭力消除隔阂，俾其能彻底拥护中央。

朱家骅于19日复函表示，西安事变影响国家民族前途极大，北平人士主张的前两点，“须于坚决迅速方法之下行之，方能有效，否则特增危险，国家前途，亦将不堪设想。后两点原系中央一贯之政策，日来中央态度极为明显，决不因西安事变而有所改动”。

这时朱家骅已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就任浙江省主席，暂时仍兼“中研院”总干事，所以他一面对通俗读物社的各种刊物风行一时表示大为快慰，一方面告以“此事仍由中研院王君办理，下次到京，当再与叶先生切商之”。并且特别强调：“此次‘张逆’叛变，受人民阵线活动之影响亦多，此辈邪说，北方所闻较多。年来‘赤匪之祸’，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已不计其数，仅江西一省人口减少八百余万，全国当在二千万人以上，此为我人所不可忘者。切望兄等特别注意，严加驳斥，以正视听。”

朱家骅专门叮嘱顾颉刚注意反共一节，除了贯彻主持指导平津新闻行动的初衷以及西安事变的前车之鉴，多少也是在暗示或提醒顾颉刚。因为顾氏的抗日宣传和民众动员等活动，在得到中央党部的资助后大有起色，在朱家骅本人眼中以及事实上固然相当成功，但在某些国民党要人尤其是与朱家骅明争暗斗的CC派二陈兄弟看来，却显然是偏离了轨道。中央党部接获的控告呈文达数十起之多，指责顾颉刚接近冀察当局，所编《大众知识》，用红色封面，内容杂左倾言论。朱家骅和叶楚伦对此也颇感棘手，难以处置，遂由中央党部函达顾颉刚，嘱其申复理由。

为了具体了解顾颉刚工作的实况，朱家骅乃乘傅斯年北上之便，托其就地考察。1937年1月7日，朱家骅致函陈布雷：

西安事起，除即分电各地教育界友人力主正义，扩大宣传，以领导青年外，并以平津关系特别重要，再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兄北上，因顾颉刚兄主办之通俗读物有《大众知识》期刊一种，其名称与封面颜色，弟早觉不妥，曾迭函促其注意，严防为左倾分子所利用。此次乘傅君北上之便，托其注意与颉刚兄再言之。顷得傅兄来函及颉刚兄托其带来函各一件，另纸抄奉簪阅。^[9]就此推勘，颉刚究属文人，容易受欺，心尚无他，除电约其南来详谈外，复函请楚伦先生从速选派妥人前往辅助，因此公疏于防范，不得不有人帮忙。前曾迭陈楚伦先生，伊已有意派朱云光兄，顷又函请楚公即派朱前往。论颉刚学术及品

格，确为不可多得之士，予以维护，妥为任使，国家必可有相当收获。傅、顾两函述北方情形，殊关重要，拟请于便中将两函及弟之处理经过转陈委座为荷。

《大众知识》的实际主持人为吴世昌，编辑有连士升、郑侃嫒、杨缤、张秀亚等。1937年1月8日，顾颉刚遵照朱家骅的指示，亲自前往南京将出版物交有关部门审查，并进行申辩。12日，顾颉刚再度致函朱家骅解释一切：自去年遵嘱从事北方活动以来，已造成一种势力，学生及民众竭诚表示爱慕之忱，而攻击者大至。一方面北平教育界对宋哲元颇无好感，误会联络冀察当局使之勿脱离中央为顾氏个人活动，流言交集，一方面《大众知识》编辑人急于吸收青年，杂有左倾之语，无以自解。并拟具将来工作方针四项：

（一）二十九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抗日意识至浓，故通俗读物社所编抗日唱本能在该军内推行，此实造成精神防线之唯一机会，不应放过。此后拟减少与冀察当局之接近，只在抗日一点上往来，因读物销入军队，非得长官谅解不可。

（二）刊物方面，已切嘱编辑人郑重登载，《大众知识》之红色封面已更换，编辑人员亦当改组。撰稿者拟改以各校法学院教授为主体，而将青年作品减少，确保此后不再有左倾色彩。

（三）减少与青年接近。

（四）对中央方面，应多事联络，凡中央派至北平工作者，拟一一与之识面，有疑难事，与之商量，一切工作，俱与公开；对中央之报告，每周发一次；中央对其工作如有意见，祈随时宣示。

对于顾颉刚的解释和拟定的改进意见，朱家骅表示满意，希望其实行第四项，令一切传言，不攻自破；严密注意第二项，“确遵主义，不涉其他思想，则接近青年，实属必要。青年为国家基干，导之

于正，党国前途，得以利赖。中央所期望于学术界诸先进，关于此点，实较授与其他知识技能为尤切也。至与冀察当局往来，初非招谤之原因，要点只在误会左倾耳。弟与楚伦先生同感困难，亦在此点”。并要顾颉刚“有暇莅杭一谈”。此事的交涉清楚地显示，在对日准备及争取地方势力等多种因素的权衡考量中，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为关注的还是与左倾争夺青年。

不过，在青年普遍左倾，且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缺乏信任和信心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导入拥护中央的正轨来激发民族意识，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甚至南辕北辙。顾颉刚的宣传鼓动工作短期内收效显著，重要原因正是顺应了左倾青年高涨的爱国热情和进步倾向。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无法二者兼得时，宁可因噎废食。据说“此事经各方磋商，金主暂时结束，由中央党部函达顾氏，停发工作经费”。这与朱家骅的态度显然大相径庭。前后决策如此反复，很可能是因为惊动了最高当局，由最高领袖作出与主其事者不同的决断，而后者只能奉命执行。

顾颉刚对于这样的结果，自然相当不满，于2月4日致函朱家骅，表示惋惜之外，请求补发积欠的工作经费。若党部不能即发，祈暂由中央研究院垫付。这一要求，让已经离开中研院的朱家骅多少有些难堪，他于2月6日复函道：

特殊工作费事，前接中执会财务处来函，要求更换正式收据，已复请迳行接洽，届时正式收据送来时，即将中研院所出者注销。请即与王毅侯先生接洽为荷。至十二月、一月份经费，楚伦先生既经允发，当可即寄。顷又致函催讯，请其早予拨给。前王毅侯先生言，当党部于归还垫款时，曾向伊声明，此款已停，故此时纵再嘱拨垫，恐伊亦未必照办也。总之，此事结果如是，殊为可惜，实非意料所及，徒使兄增加困难，方寸至为不安，负兄实甚，殊觉无颜以对，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唤奈何而已。北平各国立大学，年来主持正义，领导宣传，殊可佩仰，尤以北大同人努力奋斗，更属得力。惟燕京以环境特殊，致兄之处境，较梦

麟、适之诸先生，困难尤甚，自属实情。为执事素抱热忱，且精力弥漫，夙夜匪懈，仍盼与教育界诸同仁同心协力，在共同主义之下，为中央继续努力，以应付华北之危局，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此事虽然终止，毕竟有违朱家骅的本意，因此，朱家骅与顾颉刚乃至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通俗读物编刊社辗转于西北西南各省，除继续编辑抗战读物、绘制抗战画册外，与全国文协合办通俗文艺讲习会两期，还组织了本社巡行工作团，演唱本社新词，并参加后方勤务政治部工作，担任伤兵民众宣传与教育工作等。然而，自迁到重庆后，因教育部补助数目过小，印刷困难，经费支绌，所有编成的抗战读物画册150余种，先后交由合作机关印行，运送到渝者寥寥。为此，1939年1月6日，该社研究部主任赵纪彬持顾颉刚函前往拜会朱家骅，以后者“扶植本社历有年所”而寻求支持，因朱家骅外出，未能见面。次日，该社又专函报告社务近况。朱家骅乃另行约期与赵会晤。^[10]此后，在宣传和争取文教界方面，朱家骅对顾颉刚仍然有所倚重。

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辗转迁徙，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生态，表面统一的局面被打破，不同政权的辖区内各派势力的争夺更形激烈。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重庆稳定下来之时，就开始关注滞留在沦陷区的文教界学人的动向，尤其是学人比较集中的北平以及已成孤岛的上海两地，希望在这些地区的文教界恢复和发展党务。其目的是一是避免学人为日伪所拉拢利诱，二是防止学人倒向左翼，保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统对于学人及广大青年的影响力。

民国以来，北平文史学界与日本的关系持久而复杂。尽管英美留学生后来居上，留日学人在北京（平）学术界教育界一直扮演要角。加上中日两国学人不断互访，学习考察，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日本迫于压力，将庚款用于展开所谓“对支文化事业”，北京一度是其规划中文科研究所的建所之地。后来虽然未能实现，改到日本本土举办，可是在北平还保留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图书馆。由桥川时雄等人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先后参与撰著和负责整理的学人多达85人，以平津一带学人为主。^[11]中日学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在中日两国的冲突对立日益加剧以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逐渐加深的背景下，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民族大义与学术无国界形成相当程度的紧张。如何平衡正常的学术交往与坚持民族气节的关系，成为北平学人两难的抉择。

早在1932年10月，部分学人运动将北平设为“文化城”，为此，“平日最反对外国人”的北京大学的马衡等人，还特意前往南京进行游说。傅斯年等即表示不赞成，称此“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虽不便公开反对，还是私下加以劝告，并向南京方面表达反对意见。^[12]《塘沽协定》签订后，傅斯年不惜表示要与赞成妥协的胡适断交，坚决反对对日妥协。1935年冬，土肥原贤二来到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所谓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国民党党部撤去久矣，据说胡适等人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13]

稍后，由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开始运作，“北平盛传北平图书馆诸公皆与东方有撰稿之关系，议论纷纷”。对此，袁同礼深以为虑，询问傅斯年如何了此一事。傅建议“莫妙于分头一谈，以前不必说，以后不再作”。于是二人乃分别一一找相关各人访谈，“反转陈说，几至零涕，幸承诸位友

人不弃，终于意见一致”。问及此事如何发生，则皆谓自王重民始，又多谓自王重民介绍，于是傅斯年再三托袁同礼函劝王重民早日结束。北平学人参与日本方面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有的不过是为了生活，傅斯年等人知道“此事本非大事也”，之所以坚决反对中国学人参与，就大局看，是因为“坐失四省，不能无所感动，而日本人又好以此标榜，故或以不作为是”。据说“当时有一位友人询陈寅恪先生以此事之可作否。寅恪先生云，如以为可以公开，则作之；如不以为，则不可作也”。傅斯年深感此言恰如事理之平。就个人看，王重民的学问、声闻，后来必有大进于实务学术之进步，“而贻人以此小口实，则万万不值”。所以傅斯年有分外之关心。^[14]

“七七”事变后，虽然大批学人辗转迁徙到大后方，仍有不少人为了各种原因滞留故都。迫于时势，加上战前与日本的种种渊源，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甚至有人附逆下水，参与各种伪组织的活动。日本方面，随着战线的延伸，必须维持占领地区的治安，消弭中国人的所谓赤化思想和排日思想，而这些都需要武力以外的文化手段协助。

1938年8月，日本动员了代表该国现代文化的一流人士30余名组成代表团来到北平，成员包括酒井正忠（伯爵，贵族院议员，帝国农会长）、庆松胜左卫门（前东京大学教授，药学博士）、宇野哲人（东大名誉教授，文学博士）、羽田亨（京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杉森孝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赤间信义（日华学会理事）、森岛库太（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鹈泽总明（前明治大学校长，法学博士）、安藤广太郎（农事试验场长，农学博士）、小林澄兄（庆应大学文学部长，文学博士）、盐谷温（东京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常盘大定（文学博士）、正木直彦（东京美术学校名誉教授）、伊东忠太（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本文三郎（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森田实（前神宫皇学馆长，中央大学预科长）、中井猛之进（东京大学教授，东大附属植物园长，理学博

士）、北岛多一（庆应大学医学部长，北里研究所所长，医学博士）、原田淑人（东京大学教授）、平贺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村松年（北海道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理学农学博士）、林春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宫川米次（东京大学教授，传研所长，医学博士）、小山松吉（法政大学校长）、桥本传左卫门（京都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林毅陆（东亚同文会理事，法学博士）、增田胤次（东京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加藤武夫（东京大学教授，理学博士）、长谷部言人（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岛峰彻（东京高齿校长，医学博士）、那须浩（东京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永井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岩住良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农学博士）、江角金五郎（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小柳司气太（国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宇田尚（东京女齿校长）。

8月30日，在中海怀仁堂举行了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典礼及第一次大会，中方出席者有王克敏、汤尔和、何其巩、周作人、夏莲君、王谟、鲍鉴清、庞敦敏、黎世衡、文访苏、文元模、张恺、张鼎勋、李泰棻、阮尚介、陶尚铭、徐佛苏、王家驹、张大千、吴家驹、许修直、梁亚平、马邻翼、张心沛、孙人和、钱稻孙、缪斌、余晋龢、钱桐、朱华、宋介、柯政和、陈垣、傅增湘、刑端。该会宣言号称要中日两国人士“以传统之明伦亲仁为本，撷西学之萃以资利用厚生，庶几蔚为更进一层之新东亚文化”，其规定又以中日文化提携振兴东亚文教为目的，实则得到日本军部的一致支持，目的显然在于建立和稳固军事化的殖民统治。^[15]

三个月后的1938年12月1日，东亚文化协议会又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举行第二次大会，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率21名协议员前往参加，会议除增加评议员、理事、正副部长等职员外，还设立总务、文学、法经学、医学、农学、理工学等部，决议两

国学术机关密切联络提携，予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协同调查研究中国教育机关的创设扩充；恢复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设立北京自然科学研究所等。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日本急于恢复占领区的治安，以配合广东、武汉的战事，并将对中国的态度由单纯破坏的“长期膺惩”转变为“长期建设”，以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16]兼具粉饰、宣传、安抚、欺骗等作用效应的文教工作自然成为重点。

为了争取在恶劣环境下改变被动局面，国民党通过潜伏在北平的党务人员争取由沈兼士出面，进行组织联络。1939年8月18日，国民党天津党部的王若僊（化名吴世仁）致电中央党部，转达北平市党部高挺秀关于平市党务文教青年工作的报告，其中第一条就是：

沈兼士、张怀、英千里、张重一诸教授前曾以友谊关系密切联络，协助文教青年工作。近将尊电转告沈先生后，工作关系愈益紧密。顷与沈先生协商，拟罗致辅仁、燕京、中法诸校教授及平市中小学忠实教职员，组织文教团体，由沈先生主持，由挺秀任日常事务，以推广工作。关于工作方针、工作用费及中央通信办法，祈指示遵行。

为了训练青年及文化工作人员，与沈兼士、张怀、英千里等人商定，由辅仁大学以训练伪教士为名，收纳各中央机关反法团保送的学生40名，普通教育功课由该校教授担任，思想指导及技术训练由高挺秀担任，秘密实行，一年为期，毕业后分派各地。^[17]

北平沦陷后，沈兼士受教育部委托维护辅仁大学校务，滞留北平，与同事辅仁大学秘书兼附中主任英千里、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以示抗日。^[18]朱家骅指示平津党部协商呈核有关事宜。9月17日，王若僊电告结果，“沈兼士先生为网罗人才，增厚力量，平津应为一体，须密切联系，以利工作”。具体的初步计划为：

甲、组织：（一）定名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二）干部委员15人，北平9人，天津6人，会设北平，津立分会。（三）内部分高等、中等、初等、社会教育四组。

乙、工作：（一）吸收思想纯正之各级学校教职员及文化机关工作人员，预计半年内可发展至300名。（二）平津各办中心小学两处，中学一处，以收容教导各方救国工作同志之子弟为主要任务。（三）救济平津各校院及文教机关坚贞不附逆之高级人员，以介绍工作为主，津贴为辅。（四）选派忠实同志参加伪教育机关，从事破坏扰乱工作。（五）输送忠实青年参加游击区及后方工作。

丙、费用：（一）会务每月500元。（二）被困文教界同志临时救济费每月1500元。（三）中心中小学津贴每月1000元，中学生100名，每人每月4元，小学生300名，每人每月2元。

中央党部很快于9月23日第61次党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该计划，朱家骅批示由沈兼士负责办理，积极进行，但须注意严防共产党与人民阵线分子混入。^[19]

华北文教协会立案后，天津方面进展顺利，依照总会的规定，于1939年12月17日正式成立分会，委员6人，为赵伯陶（化名郭若泉，亦化名元正之）、路秀三（化名李茂林）、伍克潜（化名吴蒿斋）、刘迺仁（化名金友仁）、贺翊新（化名田天池）、徐石公（化名钟灵生），推赵伯陶为主席委员，路秀三为书记，分调查、救济、教育、宣传四组，由委员兼任各组组长，具体为：路兼调查，徐兼救济，伍兼教育，贺兼宣传，均无薪酬。每月经费，与平方商定，各1500元。^[20]

北平总会的成立，却是一波三折。此事发端，高挺秀等人似乎并未与沈兼士充分协商，甚至事先可能并未得到后者的同意。1940年1月

5日，高挺秀（化名乔翔远）电告朱家骅文协经费收到，“当商承沈先生努力工作，虽环境日艰，计划尚可逐渐实行”。其时北平日伪当局拘捕文化界人士多名，虽因证据不足，牵连太广，缺少补充等因素，旋捕旋释，毕竟造成人心动荡。加上北平与会者多系现任教职员，所以文教协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驻平负责人联络问题，拟在保持秘密之下谋取协商，以免泄漏人名，伤害与会学者的生命安全。

1月25、26日，高挺秀接连致电朱家骅，告以收到华北文教协会经费，已向沈兼士报告经过，商讨进行。

不意有人闻悉本会名称及负责人姓氏，遂妄加意会，函知平方某等局外人，风声宣泄，甚至自称委员，迳向沈先生接洽。先生以身处沦陷区域，现任教职，殊觉不安，乃不愿有所组织，只嘱职每周会谈一次，相机量力，有所贡献。……今津方分会业已成立，平方尚未正式组织，而抗日遗族子女、优秀青年学生及文教界不屈不淫保持气节之士，亟须救济，事实又不容陷于停止。经职再三向沈先生劝驾，先生以爱国确有热忱，而现实环境不能不顾虑，再与诸关系方面分别研商，一部主张详为斯种工作实迫切需要，中央决不能因人事而牵动功令，应另推委员代理，大胆做去，以副中央之期望；一部主张则认为事已被泄，危险莫测，应及早解消组织，停领经费，以息风声，及相继工作另起炉灶。处此情形之下，职对经费既不愿自为支配，工作亦不敢贸然推动，究宜如何处理之处，用特电恳训示祇遵。

根据情况的变化，高挺秀又提出，为了保证沈兼士的安全，

可否由部长直接函沈先生一部高教工作职，密秘供其驱使，一者避免电经津方，被局外人宣传，碍及沈先生安全，一者隐含沈先生另起炉灶之意。至于文协会，则再补充一二新人，仍继续工作，为国建树广泛力量，形势变化，自可减少注意矣。^[21]

朱家骅阅读来电，觉得事有蹊跷，立即复电，指示查明详情并电示高挺秀：

文教协会前据吴电，由韩季通先生主持，而兄任日常事务。此间会议时，将原电传观，因中央同志多稔韩先生，闻其愿出来主持，均极钦佩，此项经费始获通过。此次又何以遽尔移交？查该会既归韩先生主持，则平津两地委员人选及经费支配诸大端，均应由渠决定。为顾虑环境计，可请其稍敛形迹，总持大纲，而责成其他忠实有为之同志分头执行。所陈派员代理及解消组织，均非办法。盖一易人则与中央诸同志原意相违，恐有异议，且文化教育界工作，须得学术上极有声望之人领导之，方能推动。

并要求用款须按原定方针，不能挪移；对青年学生应以正义感召，多做人格熏陶，若专恃金钞张罗，不但无以持久，反为青年所鄙视。又专电沈兼士：

平津为旧日文化中心，敌伪诱胁方急，青年学子，万不可无人领导。会事务请积极进行，此间诸同志企仰正殷。^[22]

关于北平组织华北文教协会总会的情况，主要涉及沈兼士，了解到其间或有阴差阳错，沈兼士托人带给朱家骅两封信，说明事情的原委以及出现误会和周折的原因，一封写于1月10日，函谓：

一、开学后曾送一批毕业生南下服务。在校内创刊两种杂志，以资联络。

一、暑假内中外神父及学生均有被捕者，校中被监视侦探极严，近两月来外间被破获之机关者多，故计划颇难运行。

一、乔君前曾嘱组织一具体机关，一时甚不易办到。理由已告乔君，请其转达。

一、鄙意仍与去年所上之书相同，尽国民之本分，尽可能之范围，为国家效力，不预受任何名义及任何报酬，保持独立自主的活动。

一、此间风传天津有人组织一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由弟领衔，承受中央经费每月三千元。此事弟绝未与闻。近来竟有人（不止一次）到校及舍下询问此事者，燕大同人亦有传说

此事者。两月前曾托乔君赴津调查，并声明不愿参加之意见。惟近来风传更甚，颇觉不妥，极盼尊处能为一查。

一、乔君已两月余未晤，不知目下是否仍在平？弟意直接通讯最好，否则须由一固定而且慎密之人转达亦可，但决不愿与团体发生关系。此种不得已之苦衷，乞谅之。

是函待发之际，高挺秀从石家庄回平，沈兼士和张怀等即约与晤谈，了解情况后，沈兼士再附一函：

一、闻乔君之报告，始知华文会之经过，极佩盛意。惟本弟前信之原则，及现在北平之环境，与乔君及英、张二君仔细商酌，均认为华文会现在平已有满城风雨之势，决不能利用之以资活动。

一、弟等仍本前议，进行一切，而不参与津局。因顾虑环境，瞻望前途，苟不如此，将来恐一事无成，而有绝大之危险。

一、弟等不须有组织，只拟相机量力，随时有所贡献。至相当时期，自当报告（或由乔君，或直接）。

一、经费一层，现在无此须要。将来如有事业需费时，自当直接请款。

一、如有赐件，请勿由津转此（直接来函亦极不妥），由于主教设法交西友代递最妥。

[23]

从沈兼士申述函件的内容判断，北平沦陷之后，受有关方面委托维护校产的他的确与国民政府暗中保持组织联系，并以个人身份自动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但是，对于出面组织地下团体，则因条件、能力所限，以为暂时不宜。至于华北文教协会，沈兼士之前并不知情，平津国民党组织事先没有正式与之协商，等于是擅自借沈兼士的名义获得中央的批准及拨款。由于机密外泄，华北文教协会之事实上已经暴露，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的确不宜继续进行。沈兼士在获悉华北

文教协会组织经过后，鉴于环境极端险恶，仍然坚持前议，不赞成组织团体，即使已经组织，也不愿参与其事，以免于事无补，反而造成无谓的损失。

尽管沈兼士百般为难，可是在平津国民党组织和朱家骅方面已经势成骑虎，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况且形势紧迫，的确需要在北平建立类似组织，以增强对文教界的影响力，领导青年学生和民众的地下抗日活动。在高挺秀的劝说协商和朱家骅的安抚慰藉之下，沈兼士终于同意出山。北平方面因此重新部署，沈兼士化名章毓庵（分用则毓指沈，章指张怀，庵指英千里），高挺秀新改化名葛方（分用则葛指高挺秀，方指施天牟）。要求朱家骅介绍平方电台关系，或建立专用电台；在平方不能直接通电之前，请朱家骅直接赐下专用密码交沈兼士。^[24]

3月，沈兼士致电朱家骅，表示华北文教工作若准备计划得当，自能生效，

然一切工作总以各方严守机密为不可缺之条件，前者文协事已由津方泄漏，传播平方，以至外人竟有以文协与弟名作为谈资新闻。于此险象环生之下，弟等自无法担任。此后因葛君之尽力与弟等熟商，弟为工作便利及安全起见，须改变方法，兹将鄙见列下：

（一）文协名称已公开，弟等处此环境，不有此名义，实际亦能便于工作。

（二）平津两方精神虽属一致者，工作则宜分行。故此后平方之事不须令津方与闻，且中央必须备有与平方直接秘密通信办法，方敢负责进行工作。

（三）在中央未能直接与平方通信而须借用津方转达消息之前，请勿明提弟等之事。

（四）为防止耳目补救善后起见，中央似可对津方声言弟等已不就文协事。^[25]

朱家骅同意遵照办理，电告天津方面沈兼士不愿主持，会务另简委员接办。^[26]并再度致电沈兼士：

近岁文教界思想庞杂，久不闻名节之重，幽燕一隅为旧日文化中心，士风隆替，所关非细，领导口流，策动抗战，繁先生是赖。^[27]

北平党部电台遭到破坏后，与重庆方面的联络须由天津代行，不利于保密，沈兼士坚持与中央直接联系，主要是为了保障安全，便于开展工作。在文化协会的领导下，将原来青年建国学社中对于学术意趣浓厚及实地从事教育工作者重新加以组织整顿，以便按计划开展工作。^[28]

经此一番折腾，北平文协总会实际上并未正式成立，因此随即再度引起纠纷。其事背后，可以看出平津国民党各方机构各自为政、分别邀功、又相互争权夺利的影子。

5月15日，文化协会天津分会以“平津两会积极推动，需款甚殷”为名，催拨三四月经费，并报告该分会成立以来工作概况，据称成果有如下几项：

一、救济：津贴各级学校中抗日遗族子弟及思想纯正学行优良的贫寒学生，分别为工商学院8名，每人月给15元，中学生29名，每人月给5元，小学生38名，每人月给2元；酌送文教界坚苦贞守贫居不与敌伪合作之士奖慰金，“以示中央顾念之意，并激励其节操”，被资助者有前天津教育局局长邓庆澜，津市立师范校长李审侯，北洋工学院教授张毓恂、弓[?]广奎，河北省立女师学院训育主任赵子丰，河北省立商职学校训育主任李柳范。

二、输送青年（共3人）及教授（北京师大）到后方读书工作，补助其旅费。

三、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接办匡时小学一处，天津分会每月补助1000元，作为中心小学。

四、派员赴河北省内地之县分，在教育界发展优秀分子，以乡村小学为枢纽，宣传中央意旨，增强民族抗战意识，已有基点20处。

五、敌特务机关唆使伪新民会在天津租界内组织和平兴亚救国会，文协天津分会分别联络有力量之学校，务使消极的不合作，颇有效果。^[29]

朱家骅接电，颇感疑惑，既然已向天津方面声明沈兼士不参与此事，北平总会既未成立，天津分会则无从谈起，何谓平津两会积极推动？恰好此时中央秘书处接到4月28日北平市党部来电，指文协会一事为“藉名义以便私图”，并提出该党部“原设有文教委员会，除派执委一员为中心委员外，请教育界名流之爱国分子担任委员，共策进行，以往工作尚著成绩，如再增加相当之经费，其发展可以预期”。要求停发文教协会之款补助文教委员会。据说教育部所派之平市教育督导员亦赞同此举，愿加入该会担任委员，共同负责。^[30]而教育部方面也接到派驻华北战区督导教育人员报告，希望文教协会与之密切联系，统一步调，推进战区教育事业。教育部遂行文中央秘书处，要求指定机要人员常川与该部会商其事。^[31]

中央秘书处鉴于文教协会的成立及经费独立“已引起党部本身之分化与攻讦，似应设法调整，以免酝酿更大之危机。按教育部既有推进战区教育文化之整个方案，且派有专人在彼主持，华北文化教育协会之工作推进，似可划交教育部督导，以免机关林立，统属不明，事倍功半，而款归虚糜。至中央核定之经费，拟即停止，由教育部所派督导人员依据实际情形及需要数目，另拟预算，呈请教育部拨发”。文教协会之事系在朱家骅任内核准，秘书长叶楚傖遂请其设法查明文

教协会工作状况以及沈兼士是否实际主持其事，并征询关于教育部华北督导员与该会联络的意见。^[32]

后来中央秘书处、组织部与教育部协商的结果，教育部表示有统一指导的必要，惟战区情形与平时不同，指导方式需按实际情况而定，最好每半月或一月由主持方面派专人会谈一次，交换情报，再确定以后动向。此法实行一段时间，因会谈者对华北情形及文教协会渊源不甚了解，效果不佳。组织部秘书沙孟海鉴于北平总会迄未建立，天津分会便成似是而非，建议若有适当人选，可将分会划出独立办理或改归联处负责；另外平津两市党部教育会与文教协会职权冲突，应有所指示。^[33]

其时，天津方面再度报告平津文协会工作实情，据赵伯陶称：

北平文协工作，对外扬言停动，实际经沈公决定，津方只与职发生联系，并守秘密。津方同志咸认沈公已不负责矣。每月经费由职密转乔同志，所有中央汇款办法，曾经职与王任远同志商妥，由青年团关系方面汇转，并请秘书处与沈公定有密码，一切不经津市党部转也。此皆为便利沈公，以免稍有泄露。顷乔同志又来津，沈公嘱征询津方工作情形，以期一致。此平津文协会工作之实情。^[34]

朱家骅接到各方面的相互矛盾的不同信息，对文教协会的实情进一步感到怀疑，于是密电该会发起人王若僖，询问详情，以便决定是否继续拨款，并考虑改换天津分会负责人。王若僖在该会发起之际一度失去自由，接电后报告：

查文协成立后，复生即无法照管，致有纠纷，其主持人或有不善处置之处。惟文协工作自属重要，今后似可令平津市党部负监督之责。……查文协各委均系一时之选，惜因由乔、郭所招致，实际上各委均不甚负责。此后拟请由公直接委派津分会人选。

为了防止组织方面乱象再生，王若僖还对天津分会的人事安排提出具体意见。^[35]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随即按照这些意见对天津分会进行改组，由贺翊新为主任委员，赵伯陶为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督导员郝任夫增补为委员兼秘书。

北平方面，9月初，沈兼士、高挺秀、张怀、英千里等人联名提交工作报告、预决算以及计划，据称：

同志原有之组织，其工作因1、去夏某校中外教职员被捕；2、南下学生被捕；3、平津中央机关迭被破坏，不得不取奠定基础相机复进政策。今春葛君转达尊意，当时因津方举措失慎，消息致被泄露，弟等力不从心，未能遵命办理，至为歉仄。后由葛君与弟等再四会商，并电得公同意，脱离津方，另组进行。……半年以来，渐告成熟。暑前三青突被破获多人，又不得不暂行停顿。现在风声仍甚紧急，开学后当再徐图进展，此经过之大略也。

至于与中央联系的交通线问题，“凡通讯及汇款仍非经由津方不可，实感不便，且有危险性”。日前英千里赴沪成立联络处，将来寄款便利，随时直接通讯则尚无办法。

由于此前天津方面走漏消息，北平对津及对外宣称停止进行，华北文教协会北平总会是否创建，外间乃至重庆方面一直不得其详。根据北平提交的工作报告，北平总会实际上暗中已经成立，暂以委员会为首脑机关，下设干事及工作员，有委员四人：沈兼士、张怀、英千里、高挺秀，沈兼士为主席，高挺秀为常务，负责计划主持及推进一切工作。干事承委员之命，执行各项工作，由四名干事分任联络消息及文书、事务及会计、组织青年团体、驻沪联络等。担任干事的有郝德元、常惠和葛信益。^[36]工作员辅佐干事，分任各项事务，共二人，一任收支，一任交通。

该会“以联络操守忠贞之士，网罗有志青年为主旨”，从事下列活动：

一、组织学术团体，已成立中国语文学研究会（沈兼士主持，联络国学家及优秀学生，研究中国固有文化，藉以引起国家民族思想，并坚定其自信力）、中小教育研究会（由张怀及外围同志余君主持，联络教育学者及中小学教员，研究建国教育方法，逐步实验，以抵制奴化教育）、文艺社（由英千里主持，为使青年得有正当读物，在辅仁大学名义掩护下发行刊物二种，一为纯文艺刊物，即《辅仁文苑》，已出四期，一为综合刊物，即《辅仁生活月刊》，已出八期）。

二、利用临时集会，进行宣传，已举办美术展览会、摄影展览会和辅仁大学校友返校节。

三、组织青年团体，以操控各大学中学及破坏敌伪各团体，已成立清俭学社（即青年建国学社）、亭林学社，前者由高挺秀负责，就原有团体改组，高任书记，下设社务、事务、助理，成立集体单位五，树立个人中轴七，具体活动为破坏敌伪青年党，调查自学会，输送有志青年南下，指导中学生升学，调查敌国内情形及协力外围之学术团体等。后者由华奇负责，自去年开始活动，主要工作为联络北平三校同志组织团体，介绍人才南下服务，利用实验室制造特种药品。

该会于本年寒假接办北京学校，“一、因奴化教育于血气未定之小学生最有危险，思有以救济之。二、利用之以为工作之总机关，即以本会委员加入该校校董会，为推动工作之主干”，由干事担任总务和教员，“造成便利工作之环境。三、藉以联络各中小学，扩张抵制奴化教育之工作效能”。已联络9所中小学，其中乡村小学尤为直接有关。此外，该会还随时调查操守忠贞思想纯正的教员、学生、公务员等，予以介绍职业，补助前往西南西北大后方服务就学的旅费生活费等救助。

至于今后计划，该会除继续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外，为加强效能，拟开展如下工作：

一、调查登记在平各项专门人才，报请中央征用，一面密切联络，促使自动南去服务国家，一面代筹南行路线或资助旅费。

二、扩大青年救济及组织训练，养成抗战建国之有用人才，免被敌伪收买利用。

三、建立学术报国阵线，于各大学选定思想纯正、资望隆重之学者，聘为委员，建立中轴，分头联络同志，加以组织，鼓吹学术报国，造成普遍风气。

四、搜集沦陷区之新闻，调制有关本会工作的各项统计表，以备研究运用。

五、宣传敌人阴谋及酷虐行为，唤起一般民众之敌忾意识。^[37]

北平总会的活动成绩及规划，主要是利用沈兼士等人的职务之便，依托辅仁大学既有的各种机关、团体、刊物，增加抗日的内容，进而再图扩大活动范围和影响力。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之下，这样的谨慎从事才是切实可行。

10月，国民党北平党部的电台得到恢复，负责人苏麟阁（化名赵志诚）受重庆方面之托了解华北文教协会的详情，然后向朱家骅报告：

自职到平后，即与沈兼士见面入手，所有经费，均已收到。惟因为慎秘计而免去横的关系，对外竭力否认，并曾托司徒雷登、德领事及在沪托人共三次报告，近又托德领诺尔曼带去之工作报告，想早已垂簪。嗣后凡关华北文教协会之电，均由职台代发，取得相当联系，请释念。并将调查平津文协情形陈述如左：

（一）华北文教协会，平为总会，津系分会，平津以沈为主任委员，高挺秀为常委，英千里、王之相、张怀为委员，以青建学社及亭林学社作该会之外围组织，每社约纯洁之会员五六十人，青建学社由高负责，亭林学社由祝福祥负责，更办有小学二处，工作颇活跃。津会先由赵伯陶任主委，因赵与王舆青及沈同志均有相当交谊，工作联系颇佳。自由贺翊新负责后，沈同志为自身安全计，在技术方面不愿与津文协再生联系，同时津会及教部工作人员均思把持华北文协会，而要求加入，并流言钩座只认私人而不认组织之蜚语。悬钩座分别指示，责以事有专责，不得干涉攫夺。华北文协之事，令其自行向外发展，免去内部磨擦，俾沈同志仍可安心进行工作。

（二）沈同志决免去横的关系，愿直接受钩座之领导，以免自身发生危险，有碍工作。

（三）华北文协之经费原为三千元，平津各千五百元。现为秘密计，请各别分寄。

（四）本年下年度北平文协之预决算，沈同志要求平市每月增为三千元，俾便贴补平市之贫苦学生，而求工作进展。

（五）现国币在华北跌价尤甚，贴水事亦悬钩座担负此项损失。^[38]

朱家骅接报，认为“华北文协工作，北平较天津为重要”，将天津分会预算减为每月一千元，北平则加到2500元。^[39]并且不顾天津方面的不满和中央财政的困难，坚持要有关方面设法满足。可见其对北平文教界工作的极端重视。

第三节 组织文史杂志

经过上述调整，华北文教协会的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但是平津两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各机关的关系以及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则仍然未得到适当处理。1941年春，北平市国民党党部改组，英千里等人因为要改就党部书记，退出文协，北平文协总会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为

此，高挺秀亲自潜赴重庆当面汇报，沈兼士则致函朱家骅，并提出会务报告，函谓：

平市改组，耿、英两君之新任务，因津方传播，此间局外人已有所闻，而各同人探询消息。褚君顷与弟等商酌再四，觉处此艰危环境，原来之行医计划，非变更不可。现正设法另立社会基础，俟成功后，即当进行一切。……再英君前请尊处电津，宣布彼已辞职，藉获掩护，乞速飭办。董洗凡君经弟邀请，已允加入本会工作，化名丁伯强，拟请予以文委名义，俾便合作。^[40]

朱家骅同意沈兼士所请各项，并批示复电：

平市文教工作重要，务请设法大规模扩充。^[41]

4月7日，朱家骅再度致电沈兼士和褚成猷，强调北平文教界工作的极端重要：

平市为昔日文化中心，沦陷以还，学人志士仍多息影其间，敌伪注意诱胁，不遗余力，浸渐移变，不无可虑。故我方文教工作较之其他省市尤关重要。现任或曾任各级学校教员及毕业肄业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人皆有之，启迪联系及如何发挥其力量，以为他日收复失土张本，正有待于诸君子之继续筹划进行，北望燕云，神与俱驰。

朱家骅连番催促，并非一般的鼓励督促，而是迫切希望北平方面于短期内有大动作。由于未见北平文协即时回复，4月25日，朱家骅再发一电，除了表彰北平文教协会在沈兼士的领导下“收效及宏”外，主要是提出：

兹为加强工作起见，拟在平出版文史杂志或文艺刊物，以吸收第一流作家，使其能掌握华北文坛，隐约之间，灌输民族意识，暗示本党主义，并另出版一普通周刊，以吸引青年作家与优秀学生之稿件。拟请兄负责筹备，拟就预算，即行开办。

以创办刊物的方式影响战时文教界学人和青年，并非由北平开始。一年前，在上海时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接到中央视导学校党务、“网罗人才，补助生活于学术商榷”^[42]的指示，

日夕考虑推进工作问题，深觉在此间推进党务，既不能公开活动，而文教界中人又非仅口舌讨论或酒食酬应所能摇动，或改变其立场，加以此间文教专家亦不尽均在校任事，联络更难普遍。故愚以为谋党务之发展，莫先于文教界同人精神之联系。而精神之联系方法固多，然莫要于学术问题之讨论。而以创刊一种标准较高，内容较富之月刊为其主要之重心。在专家方面，既得有发表研究心得之机会，又复可藉优厚之稿费，以补助其艰困之生活。而在主办人方面，亦可收联络感情、网罗各科专家之明效。刊物本身如果标准甚高，亦大足贡献于吾国学术之进步，间接并可转移全国学者及青年学子之趋向。吾党如欲在文教界谋长足之进步，似以印行有价值之刊物为目前要图之一。近代《财政评论》之印行在学术界颇占地位，隐然成为吾国财政学界之重镇，即其明验。以往吾党亦常花巨大之经费印行各种定期刊物矣，然成效不著，盖主持者过重于宣传，与研究学术异趣，故不为时贤所重。且因初无永久计画，往往虎头蛇尾，所谓乘兴而来，兴尽即返也。此外，并因内容文字多属空洞无物之作品，无法引起青年之兴趣，更无望获得国人之高重。吾人若果发行刊物，必尽力矫正以往之缺点，为吾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

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以往主办销量达五万份的《教育杂志》的经验，何炳松提议创办《中国学报》月刊，取其范围较广，“且暗示党国主办之意”；以社会科学为主；每期20万字；编辑7—9人，以住在上海者为限，特约编辑100—120人，延聘国内各科专家担任，每期版权页上全体列名，以示负责而资号召。如此，“将来学校党务之推进，或能收事半功倍之效”。^[43]次日，何炳松再函朱家骅，告以“伪方近已出有一种专门研究学术之月刊，表面上不谈政治，想藉以引诱各科专家代为撰稿，稿费闻极优厚”。有鉴于此，他认为办刊一事更有考虑价值，并拟请朱家骅、陈立夫、王世杰三人为名誉编辑。

^[44]

朱家骅接到何炳松的来函，于6月3日转告大意于叶楚伦，并表态道：

此项建议如能推行著有成效，既符政府收罗人力之本旨，且于研究学术之中推行党务，可使国内优秀分子悉心内向，无异充实本党之力量，兼能为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

叶楚伦对于办刊一事深表赞同，但鉴于国民党中央的财务窘况，无法拨款，宣传部方面亦有困难，希望与教育部陈立夫协商解决。^[45]朱家骅与陈立夫颇有过节，自然不愿自讨没趣，仍然坚持向叶楚伦进言：

该刊之发行，事关主义之阐扬，以与异党斗争，在今日之上海，实属特别需要。得柏丞兄主持，当必有成绩可期。最好能在战地经费节余项下指拨一款，较为妥善，且得以从速进行。^[46]

在朱家骅的努力之下，款项终于得到落实。由于1940年度的战区经费预算已经分配无余，不能按月拨款，遂在1939年度该项经费节余项下一次性拨款4万元。^[47]

该刊实际创办时，正式定名为《学林》，“出版以来，颇得国内专家之合作，与青年读者之欢迎”。坚持一年左右，何炳松请求继续拨款两万，否则结束。因为据说“内地同志中对此事颇有微词”，“为避免误会计，似以早日告一段落为佳也。他日交通较便，时局较定时再行续办，确足谋联络文教界同志之感情，提高学术研究之兴趣也。唯自《学林》印行以来，国内能文之士（北平、昆明、重庆诸地均有投稿人），确获得不少生活上之补助。如予停刊，似宜别求简便救济之办法”。何炳松的提议是：每月筹一两万元的款，收购国内专家之专著，俟时局大定后为之印行，似亦网罗人才之一道。此外，何炳松还通过朱家骅获得特别讲座津贴两万余元，设立学术讲座，延聘

滞留上海的学者。新的学年将至，他希望继续获得资助，即使款项减半，“亦勉可补助一部分值得优礼之贤士”^[48]。

此时大后方的文教界人士对于羁留孤岛的国立大学不及早内迁啧有烦言，以为在此任事者为苟且偷安之辈。实则何炳松等人每学期都呈文要求内迁，而教育部鉴于在孤岛的其他国立机关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只有国立院校尚在埋头挣扎，要求其坚守岗位，不允任意撤退。面对内地同行的误解，尽管对于办刊物和学术讲座何炳松都作了结束的准备，他还是强调：

自《学林》与讲座两事实行以来，本党在此间文教界之信誉似颇有所增进，将来公开整理学校党务时，必可较能顺利进行。盖精神上既获得联络，则形式上将不成问题也。唯以往本党行事，每每举棋不定，随作随辍。不特旁观者为之失望，即身负工作之责者，亦不免因之灰心，见有应为之事亦不敢毅然自任。故愚以为如《学林》之印行，不特不宜中止，且如上海局势不变，并宜扩大积极进行。^[49]

显而易见，何炳松要求内迁以及结束已经展开的工作，只是迫于大后方同行的压力，他本人所希望的恰好相反。

利用办刊、讲座等方式资助和争取文教界人士及青年，以便在艰难困苦的战时状态下保持政府和中央的影响力，在大后方也是行之有效的途径。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拟在重庆创办一份文史半月刊，发表学术论文，“以左右一时风气”。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再次想起顾颉刚，商得叶楚傖同意，拟聘顾到重庆主持其事，每月给予经费五千元。^[50]开始顾颉刚以夫妇二人身体欠佳、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无法脱身以及少有可用人才为由，要求延迟半年再说。^[51]后因朱家骅一再坚持，顾颉刚又与萧一山商议，“中国各种学术俱有学会，惟史学会尚付阙如，拟即着手组织，俾作文史半月刊之后援”。遂请朱家骅予以协助，同时办刊之事希望能在成都进行编辑事

务，以利用当地人才集中以及图书丰富之便。^[52]朱家骅对于组织史学会以作文史半月刊后援一事深表赞同，力助其成；而编辑地点，因文史半月刊由中央党部主办，则坚持要顾颉刚“常川驻渝，襄助一切”^[53]。

后来顾颉刚果然到重庆主办《文史》，先任副社长（社长为叶楚傖），再接任主编。社中职员先后有杨效曾、吴锡泽、顾良、魏建猷、周春元、史念海等。只是再度遇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北平所遭遇的类似麻烦，1942年2月，有党务人员指控：

奸党吴锡泽等，竟利用《文史》杂志社为掩护机关，建立组织。该吴虽身为《文史》社编辑，近乘该社社长顾颉刚先生离渝期间，大肆活动，往返于沙磁路上（该社现在柏溪），匆忙异常，所作何事，自不难明了。请再派人彻查，速作断然处置，以免患生肘腋。闻《文史》社系由部座扶植而立，今竟被奸党利用，殊觉痛心。^[54]

后来证明，吴锡泽系“被人诬告为跨党分子，经先生（案即朱家骅）查知其枉，令其到部供职，以资洗刷。当于四月中到部”^[55]。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以该杂志无关于主义宣传，加上战时财政困难，物价飞涨，一直不能足额支持，仅靠顾颉刚个人苦撑，根本起不到预期的作用，1944年4月，国民党党政考核会即拟停发经费。勉强熬到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最终停止财政支持。^[56]

上海和重庆办刊的成效，令朱家骅等人对北平的期待更加迫切，可是北平方面对于中央的提议和再三催促，迟迟没有反应。1941年6月3日，朱家骅复电北平方面：

至文化工作，应积极进行，全力以赴。请办刊物二种，已详前电，希即照办。提倡民族思想，暗示党义，转移文风，创造新精神，至要。

6月7日，朱家骅再请秘书室沙孟海发电北平方面催问，并于6月9日致电天津转沈兼士，“盼将筹办详情电示为荷”。

朱家骅接二连三地催促，显然是担心北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实际上，北平文教协会一直在从事相关活动。6月10日，沈兼士等提出了新的工作概况报告：

“（甲）人事：增聘委员二人，丁伯强主持敌伪内线及交通工作，景鲁生主持乡镇教育救济及培植抗敌师资等工作；更换工作员一人，应灵另就他业，改派庄友霖补充。活动学术团体均有进展。

（一）中国语整会会员增加学术讲演，每月两次，刊有讲演集。

（二）中小教员会联络同志多人，作种种调查及准备，并拟办夏令师资讲习会。（三）文艺社原办刊物，继续发行，文艺刊物已出七期，约八百份，编辑人七名，综合刊物已出十五期，约千余份，编辑人十一名。青年团体：（一）清俭学社年来损失甚重，现拟暂维现状，徐谋开展，详情请葛同志面陈。（二）亭林学社，除联络三大学同志外，现更联络中学教员，组织团体，资助计划外围同志赴渝服务。”有二同志去冬被捕，后陆续释放。

（乙）机关：（一）北京高校仍为掩护办公及集合同志机关。

（二）乡村小学为乡教中轴及同志避难机关。（三）驻沪联络处仍由王佩斋主持。（四）天津新设交通站。（五）小学中轴现已树立，中学中轴正进行中。

（丙）辅助救济：（一）资助同志及外围同志数人赴渝。（二）馈贻在渝同志及外围忠贞同志家属子女。^[57]

按照时间推算，北平方面撰写工作报告时，6月9日朱家骅托天津转达的电报或许尚未收到，而6月7日直接致电北平的电报则应当收到，依常理，即使来不及重写或改写，至少可以有所补充。至于6月3

日的电报，不仅应当收到，而且完全有时间作出回应。可是沈兼士的工作报告对于朱家骅特别叮嘱的创办文史杂志一事，却似乎茫然无知，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总之，朱家骅没有得到殷殷期盼的回答。

平渝双方沟通不畅的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30日，北平方面终于正面回复，沈兼士等人的来电称：

文史杂志及普通刊物，均须经敌伪注册，始克发行。刻正觅取路线，一俟获得认许，即行拟具预算及计划，电请核夺。兹为充实人才，促进会务，拟增李霁野君，化名朱耀祖，为本会委员。李君专攻文学，曾充津女师院英文系主任，现为辅大教授，此次参加本会，拟出任以出版之计划及推进工作。

朱家骅看过来电，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他立即批示：

请从速筹办。现上海有何柏丞兄主办之《学林》，此间则有《文史》半月刊，下月起由顾颉刚兄接办，渝沪平三地有此有利刊物互相密切联系，提倡民族复兴，阐扬本党主义，转移文风，纠正青年思想，以立建国之基础，关系国家民族之前途殊钜。^[58]

并于7月2日复电北平，希望能于最短期内实现计划。

稍后，北平文教协会拟就《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办法》。^[59]按照这一办法，沦陷区忠贞之文教学者分为两类：

一类是既富有国家民族意识，崇信中央政府，且已参加本党或同情本党者，一类是虽富有国家民族意识，而对于本党与异党持骑墙态度，或对本党持怀疑观念者。前项学者已由华北文协取得联系，参加工作，或正在设法联系，后项学者则因须保持文协机密，拟不请其参加文协工作，而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之，由增加其与中央之关系逐渐劝变其思想态度。

文史杂志社由纯正学者主持，国民党“应派一与学术界接近之忠实同志参加社中，巧妙运用学术思想之探讨研究，逐渐使与文史有关之学者信仰本党主义，成为本党忠实同志”。同时聘请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为该社特约编辑，以北平文协总会为介引联转机构。文史杂志社对所聘特约编辑可由北平文协转达意示，所有应聘特约编辑，如对文史有所贡献，可由北平文协设法转来。特约编辑为无给职，如对学术或抗建工作确有贡献，而生活确极困苦者，可酌予不定期救济金，由北平文协转送。文史杂志托商务印书馆每期寄往平津分馆代售，并电令平津文协于书到时购买若干份，分送各大学及图书馆，“以广传布而暗系人心”。拟聘为特约编辑的有原俄文法专校校长王之相，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王桐龄等。不过，从目前的相关资料看，该杂志可能并未实际刊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北平形势日见险恶。先是英千里被人告密，遭日方逮捕，囚禁三个月，后来据说又有人在敌伪报纸上发表消息，宣称听闻沈兼士将办一国学刊物，李霁野将办一新文学刊物，收登社会上家居不出的人士的稿件，稿酬甚丰，经费据云系有固定来源。此举等于是变相向敌伪告密。^[60]1942年4月初，北平方面沈兼士突然来电告急：

此间环境日恶，敌方传将不利于弟，马君被逮后，已虞牵累，加之辅大经费告竭，敌伪乘虚侵入，将成事实。弟唯有先机出走。现拟协同文协总干事苏民赴渝，面陈一切，并报告各项工作及将来计划。^[61]

朱家骅对此感到有些意外，复电表示：“北方电讯阻绝已有数月，日内甫通。兄来渝甚好。辅大经费中央决可补助，在美捐款亦当设法使转渝寄平。敌伪借此企图侵入，仍希设法力拒为盼。”言辞之间，显然很不情愿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沦陷区组织联络系统。“兄来渝甚好”一句，原来底稿为“自无不可”，后来大概觉得不宜

太过阻拦，才有所松动。即使如此，通观全电，不甘就此放弃的难以割舍之情还是溢于言表。^[62]

4月11日，朱家骅再电沈兼士：

辅大款事已电宋、胡两兄代收汇渝转平，中央补助款可即汇发。北方工作因电台及其他关系窒碍丛生，又来电仅收到十之一二，致莫明实况，使各同志增加困难。顷平津同志到此者日多，真像已明，决彻底整顿，由部另设电台，布置交通网，妥觅汇兑路线，务实工作得以加强，诸同志亦可安心服务。过去工作技术不够，危险至多，此后必须避免横的联系，化整为零，分别负责。文教会及刊物应独立活动，仍由兄全权办理，密作党部外围，与其他单位绝对隔绝，已嘱徐敬仁兄切实遵照。渠即将启程，五月底可到平。兄如不能继续安居时，宜及时离开。^[63]

得到重庆方面的体谅，加之工作方式有所改进，在极其困难危险的条件下，沈兼士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2年12月16日，在被列入黑名单、敌宪即将实施抓捕的情况下，沈兼士才微服离平，潜往后方。是月30日，日军宪兵果然实施逮捕，沈兼士幸免于难。此后，华北文教协会其他成员继续坚持活动。据说最盛时会员达数百人，并以辅仁大学校友会为联系，在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立分会。

1944年3月11日、21日，北平的日本宪兵大举搜捕抗日组织人员，华北文教协会负责人及成员英千里、张怀、董洗凡、葛信益、叶德禄、赵光贤、孙硕人、孙金铭、欧阳湘、左宗纶等数十人先后被捕入狱。^[64]遭此重创，华北文教协会遂告瓦解。

综观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北平古都文教界活动的成败得失，除了客观条件的局限，主观立意与具体做法均不无可议之处。面对外来强敌，国民党的民族大义仍然坚持以中央统一和本党主义为基准，至少难辞狭隘之责。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之下，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工作的用力不免常常偏离轨道。对外如此，内部亦然。国民党内派系众多，

尽管当事人公开否认，实际上不仅存在，而且盘根错节，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决策与执行。本出同源的朱家骅与二陈，轮流执掌组织部和教育部，各有人脉，互相拆台，北平尤为双方争夺的重点，暗地的角力从战前一直持续到战后。^[65]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沦陷区设有不少秘密机关，可惜彼此不能配合，反而相互掣肘，平津两地的党部，即一直无法协调，加上敌后工作者缺乏必要的训练，组织、联络等方面屡屡不能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使得华北文教协会险象环生，迭陷危境，并最终失败，令沈兼士等人的长期努力付诸东流。滞留北平的文教界人士失去主心骨，迫于生活和时势，不免动摇依附。战后国民政府在处分北平伪文教机构及其人员时采取强硬政策，固然义正词严，追根溯源，自身也难辞其咎。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依然保持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人士对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北平的政治局势，试图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先后通过顾颉刚、沈兼士等著名学者，以创办刊物、组织秘密团体等形式，宣扬该党主义，灌输民族意识，转移学术和社会风气，以争取学人和青年，使之拥护中央政府和国民党，防止敌伪威胁利诱，避免左倾。大敌当前，不能集中精力，一致对外，加上内部各种派系和组织系统之间的相互矛盾，且不能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致使北平学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的努力不能充分生效，最终反而加剧了文教界人士与国民政府的疏离乃至离异。

[1] 参见邵铭铨《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1932—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6月；李盈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6月；李云汉《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徐复观等：《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387—415页；杨奎松《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第70—91页；蒋永敬《胡适与汪精卫对中日问题之讨论》、《胡适的和战论》，均载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韩国〕车雄焕《战前平津地区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反应之研究：1931—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3月。

[2] 参见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页。本章的资料收集，得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3] “‘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浜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启发不可。”1933年6月（？）傅斯年致丁文江，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4] 《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此为综合整理的文字，保留相关函电多通。此节凡未注明者，均出自该文。

[5]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7页。

[6]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7] 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37—38页。

[8] 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第38页。

[9] 1937年1月3日傅斯年致函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昨日下午五时到京……我这次到北平，想不惹得人疑神疑鬼，其实还是上次往保定之故事，一人做一人的主意，是临时高兴，既不是有何等使命，尤不作侦探也。”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10] 1939年1月7日通俗读物编刊社致朱家骅函。

[11] 参见山根幸夫：《近代日中関係の研究—対華文化事業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年，第15—16页。

[12] 1932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蔡元培等（抄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

[13] 1945年8月17日傅斯年致蒋介石函。关于胡适的态度及表现，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的记述有所不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03—105页）。

[14] 1937年4月20日傅斯年致王重民函。

[15] 法本义弘：《東亜文化協議会設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攷》，东京，国民社1943年版，第229—237页。

[16] 法本义弘：《東亜文化協議会設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攷》，第247—255页。

[17] 朱家骅档案301—01—06—202《文教协会卷》。英千里，原档多处又作（或改为）蔡千里。

[18] 葛信益：《沈兼士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19] 抄1939年9月17日吴世仁篠电。朱家骅档案文教协会卷。另参《华北文化教育协会概况》。

[20] 1940年1月27日郭若泉致叶楚傖朱家骅养电。

[21] 1940年1月25、26日乔翔远致朱家骅有电、宥电。

[22] 1940年1月31日朱家骅致乔翔远电。韩季通即沈兼士。

- [23] 1940年1月10日、11日秉禾致朱家骅。秉禾为沈兼士化名，于主教为于斌（野声）。
- [24] 1940年2月11日乔翔远致朱家骅电。
- [25] 1940年3月8日章毓庵致朱家骅江电。
- [26] 1940年3月11日朱家骅致元正之、章毓庵电。
- [27] 1940年5月8日朱家骅复沈兼士电。
- [28] 1940年3月7日葛方致朱家骅虞电。
- [29] 1940年4月15日郭若泉致朱家骅、叶楚傖删电。
- [30] 中央秘书处抄北平市党部卯俭电（1940年4月28日）。
- [31] 中央秘书处抄教育部函（1940年5月11日）。
- [32] 抄中央秘书处会计、机要处签呈（1940年5月14日）；1940年5月22日叶楚傖致朱家骅函。
- [33] 1940年8月16日沙孟海致朱家骅函。
- [34] 1940年8月11日郭若泉致朱家骅真电。
- [35] 1940年9月5日于复生致朱家骅歌电。于复生即王若僖新的化名。
- [36] 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 [37] 1940年9月5日沈兼士等致朱家骅函。
- [38] 1940年10月23日赵志诚致朱家骅梗电。
- [39] 1940年11月18日朱家骅致中央秘书处。
- [40] 1941年3月31日沈兼士致朱家骅。工作报告原拟托比利时使馆书记官带去，因其有难色，另寄。褚君，褚成猷，重庆派赴北平工作者，化名徐敬仁。董洗凡，辅仁大学经济学教授。
- [41] 1941年4月2日朱家骅复沈兼士。
- [42] 1940年6月3日朱家骅致叶楚傖函。
- [43] 1940年4月26日何炳松致朱家骅函。
- [44] 1940年4月27日何炳松致朱家骅函。
- [45] 1940年6月5日叶楚傖致朱家骅函。
- [46] 1940年6月11日叶楚傖致朱家骅函。
- [47] 1940年6月18日叶楚傖致朱家骅函；1940年6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会计处致朱家骅函。
- [48] 关于学术讲座一事，参见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款项来源本来是教育部，实际由朱家骅垫付。
- [49] 1941年4月25日何炳松（化名何如茂）致朱家骅函。

[50] 1941年1月7日朱家骅致顾颉刚函。

[51] 1941年1月11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52] 1941年2月25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53] 1941年3月1日朱家骅致顾颉刚函。

[54] 张效之致朱家骅函。

[55] 1943年3月1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56]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18、320页。

[57] 1941年6月10日章毓庵致朱家骅辰电。

[58] 1941年6月30日致朱家骅电。

[59] 高挺秀致沙秘书函。

[60] 沈萃、沈泰、沈节、沈兑：《记先父兼士先生抗战期间二三事》，葛信益、朱家潜编：《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61] 1942年4月6日章毓庵致朱家骅寅电。

[62] 1942年4月7日朱家骅复章毓庵电。

[63] 电稿文字有所出入。

[64] 葛信益：《沈兼士传略》、马英林：《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均见《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6、10页；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740页。

[65] 关于双方在文教界的矛盾与斗争，详见桑兵：《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斗争》，《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附录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

近年来，对清末新政的重估，吸引了海内外学术界不少关注的目光。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教授道格拉斯·雷诺兹（Douglas R. Reynolds，中文名任达）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93年出版），从当时的中日关系入手，综合利用了中、日、韩和欧美等国的大量研究成果及相关史料，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见解，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成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该书在综合检讨中、日、韩和欧美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末新政和同时期的中日关系进行重估，提出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两个重要概念，对于研究者不乏启示。

然而，作者对既有研究成果所下的工夫似大于对原始资料的发掘，由此产生以下问题：一、过多地从日方的主观愿望来理解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二、过分强调清朝政府官员在新政变革中的能动作用；三、主要章节缺少发明创意；四、对至关重要的游历未作专门讨论。

该书的具体内容，从详细章节中可以了解大概：

引言 概念的形成

绪论

1.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第一部分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2. 黄金十年的前奏

3. 日本的双重战略：军事与非军事。军事战略；非军事战略；百日维新；政变之后。

第二部分 新政知识革命：新载体，新概念。

4. 中国留学生及其日本学校。提倡留日；留日学生数量；留日学生的学校；留日学生的生活；留日的支持者；对中国的贡献。

5. 日本来华教习与顾问。日本在华教育发端；中岛裁之主持下的北京东文学社（1901—1906）；中国“日本教习时代”的主要教习与顾问；契约内容与教学条件；语言障碍和用日语讲授；中日教育合作；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的日语教习；“日本教习时代”的新师范学堂；为何不是西洋人及基督教因素；并非“失败”。

6. 翻译与近代术语。适应任务；教科书与百科全书；出版与商务印书馆；翻译者：新事物的掇客；近代术语：从日文到中文。

第三部分 新政制度革命：新领导，新方向。

7. 中国的教育改革：以日本为模范。培育“真才”；游历的特殊影响；同文与体用：稳健改革的路径；废科举。

8. 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与日本。留日军校学生；日本在华军事教官与顾问，日本军事模式；中国军事史学家的观点。

9. 中国的新式警察和监狱制度。中国的新式警察制度；警察的功能；留日警务学生；国内警察培训：川岛浪速与京师警务学堂（1901—1912）；袁世凯时期的直隶警政改革；“有名有实”；“组织转型”之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京师警务学堂与比较研究；中国的新监狱制度；直隶个案；全国性改革与小河滋次郎博士。

10. 中国的法律、司法与宪政改革。中国的法律改革：刑法改革与冈田朝太郎；民法与松冈义正；商法与志田钾太郎；中国的司法改革；中国的立宪改革：来源与解释；走向宪政。

结论 理解晚清革命；日本：失去的钥匙；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此书最具震撼力之处，当属作者着重阐明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即“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正如出版介绍所说：“本书是对大多数关于世纪之交中国革命性转变的解释的有力挑战。作者认为，1911年的推翻清朝不及清政府自己的新政重要，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改革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日本。”所谓“黄金十年”，是指1898—1907年之间，中国以日本为楷模，按照日本的方式与步骤，全面进行近代化改革。日方不仅客观上提供了亚洲黄种人革新成功的范例，更给予大量的人力物力智力援助。其间中日双方虽然有过冲突摩擦，但主流却是相当协调与富有成果。从整个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看，这可以说是双方关系最好的时期（也有日本学者称1895—1905年为黄金十年）。

所谓“新政革命”，是指1901—1910年以清政府为中心的知识与制度改革。作者指称：近代中国真正瓦解两千一百年帝制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不是1911年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的活动为中心的政治革命，革命的英雄不是自我宣传的孙中山革命党，而是他们试图推翻的敌人清朝政府及其稳健官僚和士绅支持者。新政革命包括知识和制度两个主要方面，知识方面，中国精英层的语言和思想内容被改变，过程、结构甚至表达思想的主要方式也随之变化。制度方面，转变了形成国家与社会的政府组织、法律及制度，从建立已久的本土模式转到以外部模式为基础的新型制。辛亥革命的意义，主要是使新政的知识与制度改革不再回头。新政革命及其成就，是后帝国时代的真正基石，在知识和制度上规定了迄今为止的发展路线。将1910年与1925年甚至今

天中国人（无论大陆或台湾）的思想和制度进行比较，基本呈现连续性。而与1898年以前相比，则完全不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政并未失败，所达到的成功是世界史上的重要成就。

上述观点联系到具体的学术背景，更容易感受其冲击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是以革命为中心和归宿。1960年代后期，美国修正学派逐渐抬头，以后更形成气候，将革命党从历史主导位置上挤开，为展现立宪派士绅或新式士绅的活动开辟了空间。1970年代末开始，日本学者也努力纠正以往研究的偏向，注意以洋务派及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清政府自身改革的历史作用。随着中国自己对革命路线的调整以及基本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一些海外学者更对革命的颂歌式解释产生怀疑，认为它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甚至主要动力，转而对政府方面的稳健改革发生兴趣，并对这类改革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方面的作用给予越来越高的评价。这种倾向近年来也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学者，其观点被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概括为“革命不如改良”。《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以下简称《新政》）一书虽然没有使用“如果革命不发生，改革的成就会怎样怎样”之类极易引起争议的推测性论述，却直截了当地指陈革命的实际英雄正是以往认识中的敌人，而革命党的作用只不过是肯定反动派的成果。

如果说“新政革命”还代表着一种长期倾向的新动态，“黄金十年”则主要是作者的发现，所以他用了“被忘却的”、“失落的”一类词汇，来形容这一段在他看来被曲解的历史。在中国海峡两岸、乃至欧美和日本的主流学者中，将1895—1945年的中日关系史视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侵略与中国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无疑占据主导地位。而“黄金十年”的内涵，绝不仅仅限于客观上的相安无事和互惠互利，而是包括了双方主观上的相互接纳甚至认同，即中国方面接受日方的同文宣传与体用经验，以日本为模式，模仿明治维新的方法步

骤，并得到日方在许多领域的具体援助。日方则一方面有强盛东亚以抵抗欧美列强的需要，一方面想偿还长期以来从中国文明受惠的恩情债，对中国的新政给予了认真和卓有成效的帮助。其结果，新政取得的重大成就，速度上甚至超过明治维新。这一论点被质疑的普遍程度，恐怕比“新政革命”更为广泛。放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简直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详细介绍了这两个概念产生形成的过程。任达教授长期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1870—1945）的研究，1976—1980年，曾在东京进行教研活动，那时主要是研究东亚同文会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他受Jansen、实藤惠秀、王风岗、黄福庆、林明德等人著作的影响，从清末中日教育关系史入手，于1986年开始形成“黄金十年”的概念。此后，他先后到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从事为期两年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并出席各地召开的有关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和报告，与各国学者广泛交流意见，了解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动态，逐步扩大完善了具体范围与内容。1989年回到美国后，经过与同事的认真讨论，形成“新政革命”的概念，相继发表了几篇论文，从而奠定了本书的基调。

在几年的研究与交流过程中，作者相当全面地掌握了各方面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因而在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与申论。他认为，许多人觉得，以日本侵略占支配地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没有重估价值。但事实上，对于近代中日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特别是1931—1945年侵华战争后政局变化的影响。人们不仅根本否定清末日本援华的动机，而且宁肯忘却由此所产生的实际成果。而对新政的贬低，更加剧了上述倾向。这种贬低来自理论与事实两方面，理论方面，对于革命的理解狭隘，颂扬革命而低估改革，向往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历史观，限制了学者认识以宁静的知识和

制度变革为特征的新政革命。而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革命的方式呈多样性，以非暴力不流血占多数。

事实方面，新政的主持者清政府最后以失败告终，没有人愿意研究失败者的历史；新政引起的社会转变涉及思想、文化、组织各方面，而人们只看到技术领域；晚清的历史经过孙中山和革命党的重新改造，以适应后来的政治需要；作为新政重要人物的袁世凯，后来成了民国的叛徒，他与新政的密切联系，使改革者及其支持者成为罪犯集团；加上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日本被看作极具侵略性的中国之大敌，其存在被忽视，也影响了对新政的认识。

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可以预计会引发不少争议，同时也发人深思。在日本举行的一次关于中日关系史的学术会议上，我曾表述过如下意见：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日战争及战后政局变化的影响。这与本书作者的看法有某些吻合。只是不能像作者那样，断然肯定日本援助清末新政的真诚与尽心尽力。我的意思有两点，其一，力图理解韩国学者的立场，在他们看来，甲午战争初期中日双方都是争夺霸权；也努力想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甲午之战如果日本战败，战争性质对于中日双方是否会易位？其二，由此引出，甲午战后中日关系是否只存在一种前途或可能性？或者说已经注定了中日关系的基本趋向？

不可否认，限于条件和观念，中国学人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很难说已进入高深境界。就近代史而言，凡是外国对华言行，除少数例外，几乎一言以蔽之曰帝国主义侵略，而不问其立场、政见、党派、策略等等差异以及因时因地的变化。作为对敌斗争、对外宣传或爱国主义教育，似亦足矣。但作为学术研究，就只能闭门论道，无法拿出来交流，发挥真理是让大多数人信服的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存在各种复杂因素和潜在可能，确有许多变数。遗憾的是，尽管双方不乏良好愿望之人，也做过切实努力，却未能避免战争的灾难，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日本一方，包括曾经帮助过中国新政的人，更有责任检讨其言行。作者长期研究东亚同文会，对于这个组织及其成员的宗旨与活动的历史作用的想法，也许最能体现中日学术界的意见分歧。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以大陆浪人为骨干的该会成员，大都扮演了帝国主义侵略尖兵的角色；一些日本学者则认为，该会确有不少人怀有帮助中国的真诚愿望，在两国的摩擦冲突中，处于极端苦恼的状态。

不过，作者未能完全回答东京大学平野健太郎教授的评论，即动机与效果的问题。当时来华的日本人，包括东亚同文会员、教习与顾问等，或者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利益，或者以解放者的姿态颐指气使，希望按照日本的需求改造中国。当这种愿望不能满足时，许多人便转而支持日本政府或军部的侵略政策，而美其名曰帮助解放或代为革命，甚至一些曾经批评过大陆政策的人士也不能幸免，更不用说那些从一开始就以侵华为目的的间谍和野心家（如该书专门论及的川岛浪速）。直至今日，大和民族的这种国民性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负罪感的淡薄，大有重演历史之势，不能不令人担忧今后的发展趋势。上天捉弄人，将中日两国安排得如此利害相关，满世界恐怕只有欧洲的德、法关系略为近似。如果在相对和平中找不到协调之道，相互依存性越大，冲突的厄运就越难避免。这大概也是“黄金十年”留下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教训吧。

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并且是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作者也一再批评以往研究的英雄史观，指陈新政知识革命的真正英雄是众多的无名之辈。而人是有感情的，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正是理解历史的关键。在“黄金十年”概念的阐释中，作者恰恰忽略了人的因素的复杂性，把目光较多地停留在倡行新政的官绅身上，以他们

的态度作为中国人对日本及其援华言行抱有好感的依据。的确，在这个时期，各种类型的中国人都对日本的成就与战绩表示过赞赏、羡慕和钦佩，如孙中山。梁启超甚至自称原来对日本只有感激之意，全无戒备之心，直到反袁护国，才感到日本名为援华实则侵华的可怕可怖。^[1]

然而，流亡政治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公开言论，究竟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想法，还须具体地仔细分析。此外，更有许多始终对日本保持高度警觉之士，特别是留日学生当中，怀有反日情绪者不乏其人，戴季陶即为突出一例。直到民初，他还指责拥袁与拥革两派日本人都旨在大乱中国，以图趁机取利。^[2]学习了解日本，可谓之知日，不可谓之亲日。对于他们，“黄金十年”的概念是否显得过于浪漫温馨？

就此而论，作者虽然指责此前研究者用后来观念反观历史，似乎同样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以战后中日两国发展的差距揣度历史。其实，不讲综合国力，就学生的都市生活指标而言，当时日本尚在中国之下，赴日留学所需的全部费用，连同旅费在内，比到京师、上海、广州等地上学还要便宜。所以清末留学生能够雇下女，逛花街，不时光顾东京有名的菜馆红叶馆和精养轩。据包天笑回忆，民初他作为新闻代表团成员访日，对日本火车上的设备之简陋十分惊讶，认为远不如中国，其优势只在日本自办。^[3]在物质文明震撼人心的今天，留学生在无可奈何之下尚且难以滋生亲日感，何况当初？那时的留日学生，视留学生涯为个人黄金时代者，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为数不多。

未出国门的中国人是从传媒和来华日本人的实际表现中建立其日本形象的。到1912年，中国的日本侨民达到14万余人，超过各国在华侨民的总和。其中政府聘用的教习和顾问只占少数。他们的普遍表

现，很难为黄金十年说增光添彩。戴季陶归国后，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日本侨民“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便用日语相骂。^[4]蒋维乔也指责来华任教的小谷长尾不应将中国民众与政府等同视之，一概抹杀。^[5]日俄战争日军获胜后，一些来华的日本教习举行庆贺，强迫中国学生共饮同欢，并殴打予以拒绝的学生，激起罢课退学风潮。^[6]与欧美人士相比，日本人的同类言行更容易招来恶感。其中虽不免夹杂天朝上国鄙视岛国夷民的传统遗风，但主要还是日方的宣传与行为间反差太大。太平洋战争中，东南亚各国民众发现以“解放者”名义进驻的日本人比白人殖民者更加残酷，其感觉大体相似。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黄金十年怎样断限，这一时期日本的侵略势头不断加强，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以及日本夺取中国利权（如安奉铁路）的行径，已经逐渐激起了反日乃至抵制日货的浪潮。甲午战后中国人不仅要学习日本，更要阻遏日本的侵略，或者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抗与战胜。戴季陶等人一再指出，日本必然推行侵华大陆政策，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强敌。他们的预言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诚然，与“二十一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相比，新政时期的确相对平静，双方在这种平静中得到了一些发展的机会和利益。但是，割断前后联系，不讲来龙去脉，只是凸现一定时期和谐的因素，所定概念及解释难免出现曲笔。后来的中日冲突，正是从清末的相对平静中发展出来的。中方未能获得维持平衡、抵抗侵略的实力，日方则积聚起打破平衡、进占中国乃至妄图称霸东亚与世界的野心。黄金十年说，可能与东亚同文会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吻合。可是，从该会成员后来的言行中，很少能够证明前此对华态度的虔诚，除非相信所谓恨铁不成钢的自欺欺人之谈。在今天，日本的许多援助

善举仍然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如期反应，这从日本的立场看觉得委屈，难以理解，但日方不应当认真反省个中原因吗？顺着东亚同文会类型的日本人的思维逻辑，来理解近代日本及中日关系，无论有心或无意，都很难令人信服。受前后联系的影响容易产生偏差，完全割断联系也会曲解历史，矫枉过正虽情有可宥，却不足为法。

关于“新政革命”，由于作者使用了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定义，涉及农业、商业、经济、知识、科学、技术、政治、社会、性别各方面，很难与以往仅适用于改变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的概念相比照。值得探讨的是两个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

问题之一，在各种革命中，对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是否政治革命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像作者所论述的，在知识（包括思想、文化及媒介）与制度（包括组织、机构与制度）领域的革命，使中国社会的结构状态前后截然不同，与政治革命相比，究竟谁的作用更为重要？新政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是否如作者所断定的那样巨大，尚须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全书基本未涉及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信奉唯物史观的读者看来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暴力流血的政治革命的历史作用，在主张不断革命的时代一定程度上被夸大，恐怕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而且，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是否不亚于改变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也许历史研究本来就不应当纠缠于抽象争论轻重主次，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异常复杂，揭示与表述这种复杂性，才是史学的使命。否则，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规则，任何简单化的概括都难免以偏概全。

问题之二，新政革命的功绩是否仅仅归之于清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或者说，新政革命的成就是否全由他们一手造成？作者在分析思想文化等方面时，曾经注意到这一点，将翻译及其所导致的思维表述

变化，归功于众多的无名之辈。但他总体上却又将清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看作新政革命的英雄。其实，清政府推行新政，一是顺应时代潮流，二是不得已而为之。戊戌政变后，所谓后党欲尽废新法，遭到实力派督抚的抵制和士绅的反抗。人们更把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大劫视为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当时中国的各种革新势力聚集于长江流域，联合民间武装，准备建立议会政府，实行全面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通过各枢臣疆吏传导上去，成为恢复新政的重要动力。从教育改革到立宪政治，清政府一步步被推着走，在许多情况下显得并不情愿。时间已到20世纪，走近被全社会抛弃的临界点的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它继续一成不变或只是稍加粉饰。作为社会领导的政府，不能说没有站在最顽固立场上坚决反对改革，就算发挥了应有的功能作用，甚至可以居功自傲。

没有朝野内外各种势力的推动，包括革命党和保皇派政治宣传与活动的外部压力，很难设想清政府会心甘情愿地进行改革，至少改革的进程不会以已经发生过的状态展开。例如清末报律的制定与实施，不仅立法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在依据参照何种报律以及具体条文上不同派别反复争执，民间势力不断以言论施压，颁布实行后，在如何注册、审查、判案等实际运作和如何修订法律问题上，仍须经过冲突斗争。否则，当权者往往试图以新法之名，行旧律之实，或是条文革新而操作仍旧，换汤不换药。^[7]而参与新政的许多趋新人士，未必是清政府的真心支持者。

即使各省督抚中主张改革的实力派，新政的实际进程也往往超出其预想。张之洞是对新政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他与刘坤一共同提出江楚会奏，成为新政复行的重要契机，又长期位居主持革新的要津。但他对于新政知识革命的重要内容，即借用明治维新后新汉语来表达新思维一事，始终深恶痛绝，早在1904年初便奏请禁止学生使用新名词，并对接触到的使用者白眼相加。^[8]此外，他对于女子教育也

一直态度消极甚至公然反对。新政知识革命的许多成就，与其说出于主持者的推动，不如说是与之斗争的结果。对此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报馆，就长期在非法状态下顽强生长，并取得长足发展。

出于自身的需要，清政府不乏革新愿望，却不愿承受随之而来的权益流失，更不会牺牲一己私利去切实推行。除练兵、警政等项外，清政府对趋新事业的投资极为有限，教育、传媒等项发展，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在这些领域，非官方成分均占三分之二以上，连革命党也积极参与。^[9]更无须引证预备立宪最后产生皇族内阁怪胎的事实。可以说，否定新政，并不始于民国以后政局的变化，而是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使自己失去了社会成员中最后的支持者，令人感到新政立宪不过是其试图挽救灭亡命运玩弄的一场骗局。经历幻灭的大梦初醒者不是革命党，而是曾经真心相信和拥护政府革新的立宪派士绅，乃至希望通过新政宪政改善统治状况的各级政府官员，那么，还有谁会记得这种政府的功德呢？

政府是社会发展与协调的中枢，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无力掌握量度、驾驭社会、与国民离心离德的政府，都不免自食其果，无论它有过多么辉煌的成就。这绝不是否认作者提出新政革命概念的价值，只是想说明，将新政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无疑又抹杀了其他力量的作用，而夸大了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仍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倾向，与作者批评的观点相比，没有认识方法的本质差异。

作者能够熟练使用英、日、中三种文字，这使之对该课题的研究比较得心应手。平心而论，受民族情感、文化传统、语言工具甚至经济条件的制约，一般中国学者研究这类课题颇有难度。本书开列的20页征引书目，可见作者见闻之广与用力之深。看不到或看不懂这些成果资料，根本不可能发现问题，形成概念。或许因为自己也做过于不

可能处探寻可能的事，不能不十分佩服作者那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力排众议，坚韧不拔，终于结出硕果。不过，用高标准检验，尚有可以进一步斟酌改善之处。

如前所述，作者的研究顺序，是先发现黄金十年，进而探讨新政革命，然后将二者相扭合，在逻辑上给人以互为因果之感。即为了证明黄金十年的意义而突出新政革命，又为了说明新政革命的价值而强调黄金十年。这样一来，忽略了许多相关因素，把人为设定的概念当作依据与目的，论述起来不免主观色彩略重。

该书涉及的领域较宽，包括清末新政与中日关系两大部分，其中又各含许多分支，每一方面均有不少研究成果。作者大量吸收了既有成果，但对原始资料的发掘似有所不足。这样，一方面不能鉴别修订前人著述的错漏（如首批留日警务生东渡是在1901年而非1902年），另一方面则难以发现新问题和新视角。从史料中读出来的历史，与著述中描述的历史往往不同，填补其间距常常需要学人通过科学研究对自身的历史认识进一步深化。该书第二部分尤其缺乏创意和深度，主要是综合前人的成果（略有进展的是将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欧美的新成果作了综合分析）。而这一部分长达90页，几乎占全书正文的一半。

其实，关于中国留日学生、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以及翻译与新词汇方面的著述虽然不少，比照史料，有待发明之处尚多。例如留学生在日本的普遍生活与学习状况、归国后的走向与实际影响、日本教习与顾问的表现及背景趋向、各类新名词进入中国的具体过程与途径等，均须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深入研究。近代留日学生归国后的就职状况，至少在教育、军事、政府机构等方面保存有相当详细的名册或统计资料。可惜研究者大都只是个案引证与推论，很难全面准确地反映真实状况。

清末由日本引进的新名词，本来大都是明治维新时日本从中国借用，并非正宗舶来品，顶多算是出口转内销。日本的语言学界，对明治时期新汉语的移植形成有极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几有令人毋庸置疑之感。近年来国内有人自诩为新发现，撰文者有之，鼓吹者有之。在学问超越国界、遵循共同规范的今天，恐成笑柄。不过，这些新名词本是传教士等来华西人翻译所用，并不为中国人广泛接受和传播，不得不经过日本示范，再重新进口。这也表明思想文化的变革，必须有社会基础与需要。

日本教习顾问的作用，作者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日方记录和清朝的官方文书，不一定全面反映实情。如聘用日本教习较多的三江（两江）师范，据1911年江苏谘议局的调查报告，内幕也十分黑暗。^[10]

该书最明显的疏漏，当属未能对游历作专门论述。游历是指晚清出洋考察的官绅，早期多赴欧美，人数有限，以官居多。新政时期转向日本，从中央到各省的各级各类部门，从官僚到士绅，从官派到自费，人数至少以千计，考察的范围也由军事工艺扩大到教育、政治、法律、警政、实业、商务、传媒等各方面。就新政而言，留学生的重要性或不及游历（一些短期速成生与游历相差无几），至多只是平分秋色。因为新政明确以日本为楷模，从上到下又急于全面铺开，只能照着日本的葫芦画瓢。各种趋新事业举办之际，有关当局往往派专人赴日，调查收集对应机构的章程、形制、创办程序、操作规则等资料，经比较取舍后，模仿实行。民间绅商报人，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也纷纷东渡取经，以俾兴学办报经商。为了适应需求，有人还专门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的书籍，详细记载历程步骤，供游历官绅参考，便于安排行止日程。有人则以游历为名，暗中从事阴险的政治使命，如刘学询奉旨赴日交涉交康（有为）除康事宜，就是以考察商务为掩护。他们在东渡前后，常常于报刊登载奏折报告，传媒也刊登有关消息，报导其行踪目的。考察期间，他们还详细撰写游记，记

载行程内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获之物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见闻感想，其中一部分被印制成书，一些则仅为稿本。研究这些奏报游记，并追踪游历官绅归国后在有关事业中的影响作为，可以加深理解这一时期中日交流的情形程度。

日本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前辈学者实藤惠秀最早注意到这一课题，先后收集了二百余种游记。可惜他未能完成研究工作便离开人世，所收集的游记连同大量藏书捐给了东京日比谷的都立图书馆，成为实藤文库的一部分。近年来，中日学者开始注意这些已成文物的图书的价值，并在日本和中国大陆各图书馆着手调查未收入文库的游记，据说又查到百余种。任达教授显然也接触到有关资料，他在书中分别提到姚锡光与《劝学篇》的出台，凌福彭与直隶新监狱制的建立，董康、王守恂、麦秩岩与各种专法的编制，以及达寿与立宪的关系等，但是未能将游历作为同类型人事加以合并研究。

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只重视中国留学生，近年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瞩目，而游历则始终未得到足够的关注。^[11]其原因如同作者对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被忽视背景的分析，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较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有收集整理的积累。此问题对于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至关重要，作为专书，缺漏此章节，确属美中不足。根本原因，还在于直接检讨史料不够，目光被前人的研究所局限。另一与该书无直接关系而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极有意思的课题，是为数不多而影响不小的日本来华留学生。以我的孤陋寡闻，尚未见专门论著，连附带提及也十分罕见。

不过，对于上述问题，作者似已有所意识。他一再声明此书仅为初步，呼吁进一步广泛深入地研究有关课题。以上近乎挑剔的评介，

旨在表明个人对于严肃学术成果的尊重，并希望引起更多后来者的兴趣，在学术而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展开讨论与研究。

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1998年9月10—13日，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主办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在大洋彼岸景色绮丽的海滨小城圣巴巴拉举行，与会者有来自日本（8人）、美国（2人）、法国（1人）、澳大利亚（1人）和中国大陆（1人）及台湾地区（2人）的报告人共15名，另有6位美国学者担任评论人。与近年来国内举办的各种大型学术会议相比，此次研讨会的规模不大，在戊戌年的众多相关会议中也少显风采，但其价值和意义似不能以人数多少和声势大小来衡量。日本神户大学副教授石川禎浩称“此次研讨会可谓是最成功的一次会议”，并非过誉溢美之词。与会者从多方面展开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中与会议主题关联最为密切的论文加以评介。

会议缘起，可以追溯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于1993—1996年主持的“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对近代西方的认识”研究班，其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的傅佛果（Joshua A. Fogel）、季家珍（Joan Judge）两教授到京都大学访问研究，参与该研讨班的活动。1995年，曾经作为研究班成员的巴斯蒂教授在法国成功地举办了一次“欧洲思想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两次会议存在一定的精神联系，本次会议的代表中有7位参与了法国的研讨会。1996年底，经傅佛果教授和狭间直树教授商议，计划在美国举行本次研讨会。尽管京都大学的梁启超研究班已经结束，有关成果正在结集出版之中，但先期发表的各种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这一国际性研究工作的成果展示。

戊戌辛亥之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新进知识人乃至一般官绅，通过日本吸收近代西方思想，早已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关于此事详情，能够具体说出子丑寅卯者，既非绝无仅有，也如凤毛麟角。在学术研究史上，这类看似人人皆知而实际上均语焉不详的事，绝不仅此一桩。学人于此但觉习以为常而不生疑问，狭间直树教授则敏锐地察觉到印象与真相之间的重大差距。京都的中国研究自创始之际便深受提倡科学方法的巴黎学派的影响，治学主张精细严谨。狭间直树教授坚持这一风格，并且发扬光大。他近年治学多先借由精密细致的文献比较方法，进而掌控各文献产生的时空背景，以图重返历史现场，在此基础上，才具体解释历史人物的言行和历史事件的内涵。其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三大政策的论文，堪称这一方法的典范。^[12]在梁启超研究中，他进一步贯彻并完善上述方法，讨论中一再强调要注意梁启超文章发表的时间、对象和背景，反对那种脱离具体时空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的论断方式。这次会议虽然在美国召开，但将狭间直树教授及其风格视为会议的灵魂之一，恐怕不算过分。

狭间直树教授提交的论文《关于梁启超的“公”“私”观——以〈新民说〉“公德”“私德”为中心》，体现了他的一贯宗旨。他依据巴斯蒂教授对梁启超从吾妻兵治汉译伯伦知理《国家论》中吸取西方近代国家思想的研究，仔细分析《新民说·论公德》的文本，确认梁启超的“公”与中国固有观念不同，主要是接受西方近代意识，强调国民对于国家的关系。而发表于《新民丛报》第38、39合刊号的《新民说》第18节《论私德》，虽然杂志署期为1903年10月4日，实际出版时间当在1904年2月，即梁启超游历新大陆归来约两个月后。其中梁启超借用了若干王学的思想概念，批评革命党利用西方近代思想以谋私利，而将王学作为私德的重要源泉。其大背景为日本对抗欧化主义的国粹主义兴起，阳明学乘势复兴，尤其是与梁启超有过交往的东

京大学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于20世纪初年出版了专著《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并与弟子编辑《日本伦理汇编》（全10卷，第1—3卷为阳明学），提倡调和东西两洋的道德主义，确立新型的国家主义国民道德。受此影响，梁启超借王学讲私德，既是作为近代国家国民道德基础的组成部分，又含有对抗革命主义、不同于西方精神的异质。

在狭间直树教授的影响下，京都学派的各位学者均能保持和发扬既有风格。^[13]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森时彦副教授的《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梁启超的political economy》，以文本为依据，运用语义分析法解析梁启超翻译political economy用词的阶段性变迁，指出其1902年5月后主要使用“生计”，1906年3月起多用“经济”，1910年2月回复“生计”，1912年10月后两词并用，到1920年3月，则口头演讲仍用“经济”，严肃文章则使用“生计”。该文没有停留于文本变化的表象，作者进而分析了变化的原因：梁启超本人深受中国固有文化的熏染，不能不考虑原有古义与外来词的对应，以及受众的心态。他几度违心地使用“经济”，或是迁就年轻的留日学生，或是面对一般听众。欧战以后，他开始怀疑国民国家而向往世界国家，对早期影响甚大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说兴趣渐弱，而趋重于儒家的平天下思想。这时他所使用的“生计”，不仅是political economy的翻译词，而且有“国计民生”的本来涵义。于是，其“生计学”升华为近代欧洲的political economy和古代中国经世思想的统一体。这就使得分析由文本进而语境，将语义研究推向文化史的高度，从而揭示了梁启超经济思想变化的轨迹。

神户大学森纪子副教授的《晚清梁启超的佛教思想和近代日本》，重点讨论梁启超佛教思想的第二期，即亡命日本时期所受日本佛教思想界的影响。前此，他为晚清公羊学派谈佛的流风所被，以佛教理论与科学法则相近似，将公羊学、佛教与新学视为浑然一体，心目中世界主义的孔教与救济众生的佛教并行不悖。到日本后，他采用

斯宾塞的可知不可知论，分别宗教与哲学两个概念，又了解近代科学兼备应用和理论两部，区分为原理的哲学与应用的宗教，一方面接受哲学馆长井上圆了将佛教定义为“哲学的宗教”的概念，蕴含了将佛教视为与西洋哲学相对的观念，一方面则以佛教为政治活动的实践哲学，以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支持精神不死的生死轮回说，模仿外山正一“无己的主我心”，鼓吹为国家民族轻死的自我牺牲精神，从而由孔教转向佛教。

神户大学石川祯浩副教授的《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中心的探讨》，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风格与会议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首先注意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地理学著述，同时在其史学论著中也明显出现把地理环境视为解释历史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倾向，认为文明的起源、文化程度的发达、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区别、思想学术的特色等，均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显然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开端。

然而，梁启超的上述著述思想，并非其本人的发明，他的《地理与文明的关系》，是日本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教科书的翻译和改编，《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则以志贺重昂的《地理学》（东京专门学校教科书）为蓝本。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地理环境解释古代中国南北学术差异，也很可能受当时日本流行的教科书及各种杂志文章的影响。至于日本流行地理环境决定论，主要是英国人巴克尔（Henry T. Buckle）的著作《英国文明史》（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的作用，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有关地理学的部分实为《英国文明史》的节译，志贺重昂《地理学》也受巴克尔的影响。巴氏在日本的影响虽然到19世纪末表面上衰退，实际上所宣扬的地理环

境决定论已经离开其名字，作为一般公理在知识界扎根，因而引用者大都不必标明出处。

梁启超从日本人改编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中找到一个能够解释整个人类史的综合视角，用于多个方面，这不但给以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开辟了通道，而且给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在中外知识界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思考方法。李大钊等人就曾根据地理环境决定论解释唯物史观。因此，尽管现在无论在欧洲还是日本，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学术定位都不高，但在19世纪末，这一理论却对东西两洋产生普遍影响。而梁启超的观念作为地理学有失偏颇，在近代中外思想交流史上却有筚路蓝缕之功。石川祯浩曾撰文论述李大钊通过日人著述接受马列思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相信这篇新作也将反响不小。

如前所述，法国的巴斯蒂教授几乎可以说是京都梁启超研究班的共同举办人，所提交的论文《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德国特色：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是她于1996年11月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期间所作学术报告的修改版，这篇报告已经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题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作者通过追寻梁启超刊于《清议报》的伯伦知理《国家论》译文的底本，不仅纠正了以往误认为依据加藤弘之所译伯氏《国法凡论》的陈说，指出是节译伯氏的一本通俗读物《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政治学》，而且进一步证实梁启超实际上是抄袭了吾妻兵治的汉译本《国家学》，只做了一些文字润色，并探讨了梁启超对译本取舍的原因以及伯伦知理国家学说对其国家观念的影响。

巴斯蒂教授的研究，看似具体而微，却往往关乎重大历史问题。正如该文所论，这种源于德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对中国后来的政

治观念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一般比较思想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凿空逞臆通病，而巴斯蒂教授式的以实证虚所导致的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决非自以为是的天马行空式遐想所能企及。

上述研究路径可使许多令人困惑的重大难题迎刃而解。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张朋园研究员是著名的梁启超研究专家，他虽已退休，而且研究方向有所转换，仍然能在这方面敏锐地捕捉到关键问题。其论文《梁启超的精英主义与议会政治》，将梁启超1905年前后的思想做一比较，指出其前此一直强调普遍开民智，以此为实行议会政治的必备先决条件，而从1905年起，他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将中国社会分别为上、中、下三层，而把自己所属的中等社会视为救国的主导，因而不再疑虑人民程度不足，大力推动议会政治。认识这一转折的现象也许并不困难，关键是促成转变的原因。作者发现梁启超的社会结构层次图与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的精英结构层次图十分相近，而后者是20世纪初年引起精英主义讨论的重要人物之一。帕氏于1903年在巴黎发表《社会体系论》（*Les Systemes Socialistes*），认为每一社会结构中都由精英分子带动发展其所属的社会，而将精英区分为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两部分。其非统治精英相当于梁启超的中等社会。在梁启超与帕累托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的证据，梁氏很可能通过日本而接受其理论。

在讨论中，张朋园先生希望巴斯蒂教授和狭间直树教授设法进一步研究解决余下的问题，即找到日本译介帕累托思想并由中国人转手引进的史实。此事的确至关重要，因为从1903年起，中国留日学生和流亡者的报刊上开始普遍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并迅速传播到国内的学生和新知识界，成为政治启蒙与政治动员的重要概念。1900年以前，中国民众与新知识界的社会运动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而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期间，中等社会则与民众结合，

成为社会引导和准的，展开抵抗甚至反对已腐的上层社会的救国自救运动。以笔者陋见，在这一时期的数百种报刊中，迄未发现1902年以前有使用“中等社会”概念的文字，因而对此后突如其来的自觉颇感困惑。如果张朋园先生的推测不错，日本在传递这一思想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且有所改造。留日学生在这方面已着先鞭，起而仿效的梁启超即便不是从与之对立的留日学界刊物上间接受益，至少也受到潮流风气的影响。

近年来海内外不少学者运用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源于欧洲的概念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动，多少有削足适履之嫌。季家珍教授在关于《时报》的著作中，对此提出异议，并依据史料，主张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还分析了二者内涵的差别。如果进一步具体证实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并顾及接受过程中因文化不同而出现的意识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更上层楼。^[14]

这次会议的成功之处，除了展现所取得的显著成果，还在于提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路向。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各种人事，均关乎中外联系，不能见到并且贯通中外史料，许多领域的研究只好束之高阁。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尽管一直强调西学的重要，但深入具体层面却往往困难重重。与会学者中，不仅巴斯蒂教授通晓德、英、日、中等数种文字，其他代表包括评论员，也多掌握两三种以上的外语。这就为探讨几种文化的相互关系、追根溯源时奠定基础。而这类方法，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正是比较研究的正宗。对于研究者而言，这虽然意味着智慧与毅力的考验，却是今后研究应当遵循的路径。如果在资料建设方面能够以组织力量弥补个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相信有充分发展的前景。

本次会议的主题人物是梁启超，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梁启超确是许多方面的开山，但其显赫地位也不免有后来因素的作用，与创始

之际的情形不尽相同。尤其是相对于那些当时地位相近，而后来差别悬殊的同时代人物而言。早在1900年，留学生就反驳张之洞指其宣传自由、平等、民权为康梁之唾余，认为将“欧西诸名士竭毕生之力以发明”之公理新学，“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唾余，毋乃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5]1903年后，留日学生又屡屡揭露梁启超抄袭日本人士的著述。对于他们，接受西方理论不必经过梁启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很可能还走在梁启超的前面，上述精英理论即为显著一例。只是梁启超声名显赫，影响广泛，而后人又未予深究，致使附加于梁启超身上的光彩夺目，抹杀了众多无名者的贡献。梁启超虽然是近代思想界的先驱，但不等于说所有的中国人均须通过他才能接受各种西方思想。即使在具体领域，处于历史现场的梁启超也只是先驱者群体中较为出类拔萃的一位而已。

梁启超的时代，政治考虑优先于学术文化建设，他本人又往往分不清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因而其先驱作用更多地体现于思想领域。至于学术方面，虽然其入手较早，后来者如果在严格的学术层面学习西学，也不一定必须经过梁启超的野狐禅，才能得成正果。对于这些人，任公多半是批评借鉴的目标，而非学习的对象。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即其一例。近人言佛，仍如陈寅恪先生关于古代之的论，大致分为两派，一为以外书比附内典，格义附会，一为以合本子注法深究源流。前者巧而偏，后者拙而正，但取巧易而守拙难，因而取舍之间，自然分出众寡。梁启超生平谈佛，均为附会，晚年才从钢和泰处明白专凭译本治佛学的危险。从思想史角度立论，固然可见影响，但论及学术，则不能不考虑佛教界的态度。梁启超从流亡之初，便与日本僧人有所交往，并讨论过佛教救国之事，以后一直保持联系。但影响其佛学思想的日本痕迹，主要来自思想学术界，则其更多的是将佛学视为思想哲学，而非宗教。

与此相关而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先驱者的浅与偏可以给予了解同情，却不应忽视由于缺乏深厚学术基础所导致的思想的浮与邪带给近代中国的深远危害，或以思想的影响掩饰学术的偏差。在西学压倒中学的时代，不能分别源流脉络地随意拿来，恰如日暮时盲人骑瞎马而行险道。学术的深厚为健全民族的精神头脑所必需，也是改变思想浅薄的先决条件。如果照近代人的说法兵战不如学战，则以智取胜的法则决定了脑力不全者在竞逐中难以占取先机。

以具体人物为对象，有利于深入研究，但必须先识大体，否则对具体人事难以辨择。梁启超学习西方虽然经由日本，其依托仍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他对“生计”、“经济”二词的取舍，相当典型地显示出这一分别。梁启超的人文地理学观念，当然主要取自日本，但中国固有学术也颇讲究史地关系，尤其是地势对人情学风的影响。纯用西方近代学术观念，则中国固有学术自然不能容纳而被抹杀。既然梁启超的思想渊源含有禹内的一面，学者的眼光自应顾及，否则，很容易放大日本的影响，而忽略其他因素。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黄克武副研究员的《梁启超与康德》，即关注到这一方面。他比较梁启超撰写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及其依据的底本即中江兆民所译《理学沿革史》（Alfred Fouille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1879），指出梁启超的译介在文字和思想层面都具有高度选择性；除了介绍康德思想，也将康德的想法与本土观念相会通，并作一定位；梁启超对康德既有误会，也有保留；其笔下的康德混杂着西洋、日本和中国的各种思想因素，呈现出各种理念交杂、互释的景象。

研究不同文化的交流影响，最难还不在征实，而在证虚。同一概念，欧洲、日本、中国之间存在观念差异。而且概念越是宽泛，内涵就越模糊，界定就越困难。况且，概念总是自事实后出，因而绝不可

能涵盖所有事实。公私观的讨论，历来为外国学者所重视，即因为差异明显。即使如此，要严格确定具体的公私观，仍然绝非轻而易举。中国历代公私观几经变化，近代更加上外部影响，使用相同一套词汇者，其理解未必尽相一致。如先秦诸侯割据，公为天下即文化，私为诸侯即政权，这与近代西方的观念不难沟通，却并非吻合。国人在接受外来概念时，有意无意会留存固有意识，而使其心目中的概念变形移位。至于国家、国民之类的概念，更难免各自的文化烙印。如能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语境解析语义，则通过传播与变异的现象，或能显示精神文化的高深层面，从而将对各种文化异同的认识推进一大步。

当然，由于对异文化的体认不易深入堂奥，这样的研究很难独立完成，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如果此次研讨会成为新的起点，意义或许更为重大。由此而论，京都大学的梁启超研究班和圣巴巴拉校的研讨会虽已闭幕，其工作却无异为后来者开辟了一大片有待于艰辛探索的广阔空间。

《中和月刊》解说

《中和月刊》1940年1月1日在北京创刊，到1945年第6卷第4期停刊，持续了五年零四个月，总共出版了64期（合刊分计）。

《中和月刊》由瞿宣颖（1894—1973）主编。瞿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兑之，与名并行，别名益锴，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蛭园。他出身世家，父亲瞿鸿禨清光绪末年官至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兑之是湖南大儒王闿运的入室弟子，文习王闿运，学效王先谦，画学尹金阳。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河北省政

府秘书长等职，北伐后历任内政部秘书，南开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复名北京，瞿兑之担任伪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古学院常务理事、伪北京大学监督。

《中和月刊》社设有编辑部，地点在北京府右街运料门内翠华轩，后来改到阜成门外北礼士路新民印书馆编辑课。现有的文献和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都没有谈到《中和月刊》的编辑成员，全部刊务似由瞿兑之独力承担。尽管近代报刊史上以一人之力办一刊的事并非个别，《中和月刊》的办理却不是如此简单。其时瞿兑之担任伪国立编译馆馆长，《中和》由他主编，可以该馆的人力物力为支持，因而能够长期按时出刊。《中和》的征稿简章声明来稿请寄编辑部，勿寄编者个人，说明有专人负责处理。1943年9月25日，北京伪组织的新闻协会召集北京的22家杂志社人员举行共同座谈会，代表《中和月刊》出席的是陈启埤。

《中和》大抵仿《逸经》的形式，为文史类杂志，间有时事。栏目设置简略，只有专载、时事荟记、书林偶拾等项，而且主体部分不分栏目。内容包括中日历史文化的史料、考证、论述，日本社会文化介绍，旧体诗文，小说笔记，掌故旧闻，以及近世以来士人学者的传记年谱等。自始至终，编排形式少有变化。

由于家世、经历、师承的关系，瞿兑之交游广泛，结识众多京华学人，使得《中和》的稿源格外充裕。作者主要有周作人、王揖唐、瞿兑之、徐一士、金惠生、郭则沄、陈慎言、孙作云、向耕、谢国楨（谢刚主）、谢兴尧（五知）、傅增湘（藏园）、孙海波（海波）、黄宾虹（予向）、傅芸子（芸子）、钱稻孙、柯昌泗、梁绳祎、曹家儒、程树德、罗继祖、林同甫、朱启钤、刘厚泽、莫东寅等，署名既有本名，也有别号或室名。还刊登过内藤湖南、驹井和爱、水野梅晓等日本学人的文章或译文。创刊之初，每期篇幅达到170—180页，印

行1千册，在北京和天津、山西、汉口等地设有代售处，据说颇受欢迎，订购零售之外，每年还出版合订本。从第3卷起，篇幅有所削减。1944年以后，随着战争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和》的情况渐趋窘迫，篇幅内容较前大幅度减少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左右，直至终刊。

《中和》的《征稿简章》声称：“以研究学术，灌输知识，发扬东方文化，树立民众信念为宗旨”，可是有了伪组织的背景，便不可能那样单纯。《中和》的发刊词主张本民族的自讼与自救，鉴古知今，似有种种欲说还休的难言之隐，但是后面的反对西方列强和纪念日本纪元，还是显露出了屈从的身形。《中和》由日伪控制的新民印书馆印刷发行，该印书馆是日本平凡社社长下中弥三郎于北京成立的出版社，旨在向占领地学校供应含有他所信奉的大亚细亚主义内容的教科书，实施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总经理是曹汝霖。后期《中和》的编辑部实际上与新民印书馆的编辑课合二为一。这些牵连，都预设了《中和》即使不能直接配合日本的军事占领，至少也不会与之相反相异。

事实上，这一类文史刊物的出版，背后的确有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侵略政策调整的需要。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除了继续使用武力高压手段外，吸引中国人士，培植文化汉奸，制造中日共荣的假象，成为当务之急。《中和》的编者一再声称是仓猝发刊，与此不无关系。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讼，只能在日本占领当局允许的范围之内。据说周作人最终下水瞿兑之曾做说客，果真如此，则更加复杂。

这样的背景，当是《中和》一类的刊物在后来一度被忽略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特殊背景，《中和》之类的刊物，反而有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具体包括两方面：

其一，关于清代和民初政坛学界画坛的笔记掌故。

笔记掌故，虽被视为杂学，却有上中下之别。上杂如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目光如炬，力透纸背，解古典今典游刃有余，以通敌罪论处后，陈寅恪还坚持不要因人废言。中杂如掌故名徐一士，同样出身世家，其所谈掌故，多有真实材料为底本凭据，还有不少当来自北京中山公园几家茶座的一群“公园董事”常客的海阔天空。至于职业补白的所谓“报屁股专家”口中的掌故，大都道听途说，后来者诤为博雅，相比之下，只能等而下之了。

有人认为，民国时期治掌故者最具功力的有三人，即徐一士、黄濬和瞿兑之，其共同特点是博闻强记、胸罗极富而又善于研究分析。而徐、黄二人的著作均请瞿兑之审读作序，表明他们对后者学养的信服和敬重。瞿兑之对掌故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个中甘苦有清晰的阐发，至少当在中上之间。见识高明之外，瞿兑之擅长文史书画，与清末遗老和民国初年的名公都很熟悉，组织了不少老辈的稿子，又能用文言、白话两副笔墨，适宜一般读者的水平与口味。战后乃至解放后瞿氏还能有益于时，涉水不深与本事不小，都发生了影响。

缘于上述，《中和》刊载的资料早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台湾沈云龙编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将《中和月刊》史料选编二册出版，后来又将《中和》第6卷的4期编为一册，纳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大陆方面，则分别将瞿兑之、徐一士等人在《中和》发表的文章辑录成书，研究周作人、黄宾虹等人物，《中和》也是重要参考资料。

其二，了解抗战期间华北沦陷区文化界的动向。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长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作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这里曾经聚集了大批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

士。战争爆发，许多人千里辗转，迁徙大后方，可是还有不少人因为种种缘故，滞留沦陷区。日伪在北京的文化统治、文化组织与文化政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华北文教界的地下组织与活动，以及沦陷区各界人士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工作、情绪、心境等等，以往的研究严重不足。文学史的研究涉及稍多，其余只有在牵扯个别人物的汉奸问题时，才会有所提及。如此一来，不要说深入研究，就连一般性地了解相关史事，也很不容易。坊间（包括网上）流传的一些有关《中和》的现代掌故，谈及相关史事，往往错漏百出。如瞿兑之的生卒年月、历任职位、甚至与瞿鸿禨的关系，各种正式出版物的记录也是五花八门。又如指郭则沅（署名龙顾山人）的《红楼真梦》只在《中和》连载了两期，了解杂志的背景后，便停止供稿，与事实相去甚远。

《中和》的作者群包含各类人物，其中固然有落水的文化汉奸，也不乏在复杂环境中艰难挣扎的文人学士，探究文史，既是兴致所在，又可以缓解心灵的压抑，寄托无尽的愁怀。字里行间，透露出各种信息。近年来关于华北沦陷区的问题逐渐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日渐增多，如果不能予以重视，很难掌握发言权，更不要说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问题，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一大难题。

以往关注《中和》，主要在前一层面，至于后者，还须参照其他各种类型的资料，才能体会把握。就刊物而言，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仅仅阅读《中和》当然远远不够。近年已被重印的《青鹤》之外，战前战时乃至战后与之相关的《逸经》、《宇宙风》、《联合旬刊》、《大风》、《古今》、《天地》、《越风》、《子曰》、《朔风》、《艺文杂志》、《文史》、《雅言》等同类或相近的杂志，以及各种报纸的相关专刊，都有广泛阅读的必要性。而这些报刊因为天灾人祸和用纸质量的先天不足（近代机器纸远不如古籍保存时间长，战

时纸张品质尤其恶劣)等缘故,缺漏毁损日益严重,各图书馆逐步列入限制借阅的名单。若不及时设法,即使存世,收藏单位束之高阁,研究者也只能望洋兴叹。当务之急,是有计划地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出版,以解决保存与研究的两难,并使得晚近历史研究的资料边际逐渐清晰起来,将研究的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至于一般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也绝不仅仅是为了钩沉猎奇。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当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与睿智的必由之路。

[1] 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7—808,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57—458页。

[2] 《今日之外交界》,《民权报》1912年6月5—7日。

[3]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435页。

[4] 《耳闻眼见》,《天铎报》1910年10月22日。

[5] 《鹤居日记》癸卯十二月十四日。

[6] 《贵阳师范学堂日本教习殴辱学生事件》,《新民丛报》第61号,1905年1月20日。

[7] 参见王学珍《清末报律研究》,中山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8]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9] 参见《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3章第1节;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10] 《江苏谘议局调查两江师范学堂报告》,《教育杂志》第3年第3期,1911年4月8日。

[11] 此后留日中国学人在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利用实藤文库所收集的官绅游历的日本游记和档案报刊等文献,总体概述的有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年版),分门别类则有汪琬的《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

[12] 石川祯浩撰、黄自进译:《狭间直树先生》,《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3月。

[13] 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从创始时期的“支那学”起,就被外界称为京都学派。对此,京都的学人不以为然。揣度其意,一方面不以派分自囿,一方面则期许世界性的学问高峰。中国历史上治学虽有分派的说法,却不以派分的学问为高明,以为难免门户之见。晚近受西洋影响,好以派分的眼光考察学术史的脉络,也颇受争议。京都学人力求与中国学界沟通,对此心领神会。

[14] 关于“中等社会”发端问题相关史事的系统梳理和详细探讨,参见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5] 《中国旬报》第35、36期,1901年1月15日、24日。

后记

以时下通行的专家眼光而论，在下肯定不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门家。只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无论哪一个专门领域，外国的影响以及中外的关联，都很难完全绕过。借用傅斯年的分法，如果说古代史还有较少与外国拖泥带水的全汉时段或方面，那么，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基本上都是非与外国纠缠不清的半汉。而在数以百计的外国当中，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两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不了解日本、日本人以及中日关系，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就很难完全到位。

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与牵连广泛，尽管学问的兴趣相当多，还是有不少方面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硕士研究生阶段，我最初的学位论文选题便是留日学生。这是当时颇为新颖热门的话题，原来的基础不大好，而关注的学人日渐多，因为有材料，有话说，况且又与辛亥时期研究的主线革命党渊源很深，自然成为扩展研究的直接方面。

30多年前，虽然留日学生的研究逐渐引起关注，毕竟基础薄弱。尤其是材料的掌握和运用，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显得相当贫乏。之所以最初选择以留日学生为题，是因为入学之初，渴望求知，恨不得将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读完，在想方设法浏览各种文献书籍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晚清报刊，发现其中许多前人很少利用，或是即使有所涉猎征引，仍有相当多的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这批报刊主要是1927年顾颉刚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到江浙购书的成果，据称，所购清季民初的期刊共有400余种。

那一时代，藏书家买书着重于版本，学问家则首先看重内容。由藏书楼转型为图书馆，收藏标准尚未制定，顾颉刚为此专门写了长篇购书计划书，实际上等于是为图书馆拟定准则。顾颉刚的学问欲极强，视野宽广，又有材料一律平等、高下分别唯在运用的独到眼光，所拟购的书籍文献包罗万象，分类清楚，还特别注意到可以作为近代中国研究史料的杂志和报纸。其购买的品种数量虽然不能覆盖全体，可是主体的部分已经基本包括。这在全国各馆当中，至少是位于前列的。顾颉刚的计划书及其拟定的分类等准则，对图书馆的发展影响甚大。成立并不算早的上海图书馆，虽然有原来几家图书机构的老底，若非按照计划书的眼界路径充实扩展，也很难有现在的规模和特色。

早得先机，仅以近代报刊论，从近30年来集众编辑出版的各种目录和期刊介绍书看，中大图书馆所藏近代期刊，有不少甚至超越其上，有的为各种目录失收，有的则多于目录或相关介绍提示的期卷。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不少出自清季军机大臣王文韶家，除了顾颉刚提到的几种之外，还包括留日学生的各种期刊。关于近代报刊作为史料的价值及注意事项，已经专文详述，对此今日学界仍然有所争议。相比之下，顾颉刚当年的见识和行事，的确难能可贵。否则，不知有多少重要史料会湮没无闻，令来者不胜唏嘘。

在系统阅读近代报刊图书的过程中，先后拟出十几篇有关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论文题目。虽然后来逐渐发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材料更多，而前人关注更少，因而中途改换方向，转而着重研究国内学堂学生，所拟定的留日学生研究的各个论文题目却并未就此束之高阁，后来大都写成并发表，陆续结集到各种专书之中。如孙中山与留日学界、军国民教育会、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大会史实考、早期留日学生社团概论等。此后，在孙中山、戴季陶等人物研究、庚子勤王与保皇会研究、国学研究、近代学人与学术研究等领域，日本或中日关系仍是重要的关注点，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就有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

本、近代日本留华学生、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等，其他还有多篇论文主要涉及或包含与日本关系的内容。如关于“中国哲学”探源以及京剧名伶田际云的天地人生大舞台。

研究中日关系，接触资料和应用资料的条件和能力相当重要。在这方面自己可谓幸运，得到日本东西两京众多师友的鼎力相助，如衛藤沈吉、容应莢、野澤豐、久保田文次、狭间直树、森时彦、村田雄二郎、石川楨浩、李廷江等，因此能够获得良好机会，多次前往日本进行访问研究，并持续参与各方的研究活动，深入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的状况动向。还有许多学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给予过各式各样的帮助。没有这样的机缘，万丈雄心也只能徒叹奈何。在此要表达由衷的敬意并致谢忱。时光易逝，其中有的前辈学者已经仙逝，唯有以努力做好研究作为怀念和祭奠。

战后的日本较战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尽管是否已经根本改变还有待观察。日本的学界如同政界，也有派分，至少在外人眼中，派分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各自的学术观念和政治倾向。而中国学者在做出判断时，不由自主地会以我画线，也就是根据与本国本人的观念倾向的吻合度来划分派别。可是这样的划分有时会掩盖许多事情的复杂联系。2008年，参加在箱根举行的关于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是收入本书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会议期间，一次在酒店长长的走廊上偶遇年事已高的衛藤沈吉先生，他问我，所征引的朱家骅档案是否已经有人使用，前人是否已有类似的文章发表，听完我简短的答复后，他竟然停下脚步，郑重其事地表示感谢。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严谨学者的良知始终是这位长者的内心世界，政治偏向和严苛风格不过是社会表现。就像他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说，中国对于他而言，既不是故乡，也不是他乡，更不是异乡。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心情，外人的解读更难免雾里看花，各执一偏。

秉承学术良知，不少日本学者并不讳言侵略和战争的历史。199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行纪念该所成立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即关于1920年代中日两国联合发起组织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纯然学术组织的背后也有日本政府的直接插手，在座的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虽然素不相识，却于会后特意寄来吉村日出东的《東京帝国大学考古学講座の開設 —国家政策と学問研究の視座から》一文（日本历史学会編集：《日本歴史》1999年1月号），由此得知日方的动机其实并不单纯。日本学者以学术为本的行为，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

或谓留学欧美是资本，而留日则负有原罪。说者当然有亲身体验，也反映了一部分社会偏见。若是从政治角度考察，留日出生者固然有人附逆下水，但是高扬民族主义的坚定爱国者也大有人在。正因为刻骨铭心的留日体验，不少留日学生很早就意识到中日两国不幸成为宿敌，迟早必有一战。

从学问的层面看，则有两说。严复还在清季东学派占上风之际就断言东不如西，梁启超等人对此并不否认，只是觉得西学太难，不易直接面对，通过东学可以事半功半，不但应急，而且能为将来直接学习西学搭桥铺路，逐渐过渡。可见东学充其量也就是通往西学的捷径而已。在世界尚未摆脱欧洲中心笼罩的时代，这样具有普遍性的看法当然是事实，但是具体到东亚、近代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研究的领域，东学的重要性绝不是中介过渡那样简单。

或者认为，研究中日关系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应当多与日本的日本研究者交往交流，因为这方面的学人对于日本自身的认识较为深入，同时作为本国文史哲的研究者，水准能力一般在研究外国的同行之上。此说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以往的日本学术界，日本研究、东洋（以中国为主）研究、西洋研究三分天下，尤其是京都大学

的中国研究，不仅成为日本的学术主流，而且意欲和中国学界争胜。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近代东亚，应当尽可能在资料和史事方面沟通中、东（以日本为主）、西三方面，并且理解得当，就此而论，日本的日本研究者并不一定具有优势。

关于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学问，严格说来我还是外行，要想恰当理解幕末以来日本人的言行，诚非易事。不少其他国家的日本研究者都感到，越深入接触和研究日本，就越是难于理解。在这方面，首先得益于卫藤沈吉先生所说，阅读差的史学论著不如看好的文学作品。受此启发，我广泛阅读了包括文学家所写历史书在内的日本书籍。而与狭间直树教授的多次长谈，使我在这方面受益良多。狭间直树教授曾经追随京都的多位前辈大家，耳濡目染，见识不凡，加上个人天赋和后天努力，能够在中、东、西三界的历史和学说之间自由出入。他关于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小团体的系列论文，关于日本王学谱系的逆上建构，以及日本大陆浪人各派之间联系的解读等等看法，显示其在这方面已经进入相当贯通的境界，为一般研究者难以企及。这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东亚历史的共通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启迪。

按照时下通常的归类，本书属于论文集而非专题论著。其实这样的分类并不恰当。没有主题、彼此缺乏内在联系的散篇论文结集，或许给人以凌乱之感，但是具有同一主题，而且各篇背后存在有机联系的专题论文结集，却是专门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体现。对此，批评的意见首先指其不是全面系统的研究。此说看似有几分道理，实则不然。学术研究要详人所略，言人所未言，就不可能完整。追求形式上完整的，一般就是教科书或通史，为了面面俱到，不得不加入一些老生常谈，难免浮泛。主题性的论文结集，因为不带水分，反而较一般所谓专著更加凸显进展和深度。就此而论，散篇结集也不可一概而论，关键还是看论文的水准。

反之，所谓专著，同样不能一视同仁，那些下笔千言，了无新意，或是穿凿附会、一味立异的著作，在学术发展进程中很难留下印记。只是各校主政的理工科学人因此而全然不承认专著的价值，只看论文发表的刊物等级，也是过犹不及。至少在人文学科领域，精深的专著，仍是能够长久留下来去的重要载体。凡此种种，根源在于时下学术界对于学术判断的失范与乏力，没有准则与权威，只好求助于似是而非的各种技术性指标。而诸如此类的标准只能导致学术的平庸化。

受西式分科治学的影响，今日的教学与研究，大体上是分科分类分专门进行。民国时期还具贬义的专家称谓，如今已成坊间乃至学界的荣衔。著述固然应有专题，但是读书治学却不宜畛域自囿，画地为牢。今人治学的问题，未必是古人行事的范围，研究某个特定的领域或专题，如果只看直接材料，固然相当危险，即使放宽视野，阅读相关材料，若是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也很难把握边际，理解本意。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不是执意于小圈子自娱自乐的行规，破除畛域，恰是更上层楼的起点。

[人名索引]

傅佛果 (Joshua A. Fogel) 365, 366

J. S. Willes 160

Jansen 353

S. R. de. C. Jose 162

阿部信一 159

安东贞元 158, 161

安泰国 184

安藤广太郎 315

安藤万吉 157

安重根 182, 183, 184

庵谷忱 156

岸田吟香 69, 134

奥斯邦 (Mr. E. Osborn) 136

奥野四郎 159

八重 (櫨) 圭太郎 162

巴克尔 (Henry T. Buckle) 369

巴斯蒂 365, 366, 369, 370, 371, 372

柏原文太郎 69, 78

坂本格 161

坂本音吉 161, 162, 163

坂垣征四郎 13

半吉 159

半野丰实 156

包天笑 356, 402

宝性确成 160

宝珠山弥高 160, 163

鲍鉴清 316

鲍罗廷 (Б о р о д и н) 281

北岛多一 316

北鬼三郎 106

北浦精 159

北原兼治 163

本田増次郎 37

毕永年 49

卞小吾 156

彬山宗作 161

滨冈福松 158

并木如秋 159, 161

波多博 137, 164

伯伦知理 367, 370

蔡钧 66

蔡元培 23, 105, 106, 314

藏土延次 161

曹家儒 377

曹汝霖 89, 90, 91, 92, 289, 378

曾广铨（敬贻） 59, 61, 62, 66, 68, 70, 71

常惠 329

常盘大定 315

陈布雷 308

陈独秀 272

陈黻宸 104, 113, 114, 388, 402

陈季同（敬如） 61, 66, 67, 68, 76

陈炯明 269, 273

陈立夫 305, 336

陈溥贤（渊泉） 224

陈其璋 45

陈启埤 377

陈庆桂 96

陈慎言 377

陈师曾 23

陈寅恪 30, 31, 247, 248, 315, 372, 373, 378, 402

陈垣 24, 316, 403

成舍我 306

程树德 377

重野安繹（成斋） 134

池边吉太郎 62

赤间信义 315

赤松纯平 164

赤冢真清 163

出渊胜次 279, 280

褚成猷 333, 334

川村伦道 158

川岛浪速 350, 355

川洁 159

川上操六 45

川俣笃 156

床次竹二郎 264

椿井必治 156

慈禧 49, 90

达寿 93, 363

大槓义次 163

大村西崖 22, 23, 101

大河原厚仁 159, 162, 388

大久保利通 42

大内畅三 72

大森清腾 159

大野义雄 164

大垣鹤藏 161

大泽隼 161, 164

大冢茂树 162

戴季陶（天仇） 169-202, 232-235, 249, 252,

253, 259, 260, 279, 356, 357, 383

岛峰彻 316

岛田数雄 156, 158

岛田重礼 18

邓邦述 91

邓庆澜 325

邓之诚 24

丁伯强 333, 340

丁文江 70, 303, 306, 403

町田弥平 37

董康 61, 363

董洗凡 333, 344

都甲文雄 160

都筑馨六 106

渡边德重 156, 157, 160

渡边省三 152

渡边天洋 160

渡边文治 160, 161

渡边义一 162

渡边寅次郎 159

渡边智功 160

段祺瑞 270, 273, 274, 279, 280, 283, 284, 290, 297

儿玉多一 157

儿玉璋一 164

范源廉 49

方若 155

芳泽谦吉 285, 286

费念慈 61

丰冈保平 155

风见章 156

冯斯栾 49

冯闾模 35

冯玉祥 270, 272, 273, 280, 290, 297

冯自由 44, 403

服部宇之吉 115, 116, 403

浮田和民 369, 389

福本诚（日南） 59, 61, 62, 70, 71, 78

福岛武雄 164

福岛义澄 164

副岛义一 106

傅斯年（孟真） 28, 248, 251, 303, 304, 308, 309, 314,
315, 381, 400, 405

傅芸子 377

傅增湘（藏园） 316, 377

富士英 49

富田喜代 160

冈本监辅 60, 133

冈本要八郎 159

冈部次郎 156, 157

冈仓天心 22, 23, 101, 102

冈千仞 134

冈田朝太郎 351

冈幸七郎 155, 156

冈伊太郎 158, 159

高凤岐 59

高见之道 255

高柳保太郎 157

高桥源太郎 162

高挺秀（化名乔翔远） 317, 319, 320, 322, 323, 328, 329,
331, 333, 342

葛信益 318, 329, 343, 344, 404

工藤敏雄 361

宫川次郎 162

宫川隆 164

宫川米次 316

宫地贯道 158, 159

宫崎寅藏 13, 67, 72, 78, 187, 188, 189, 198

辜鸿铭 205, 405

辜人杰 76

古岛一雄 255

顾颉刚 23, 305-312, 338, 339, 341, 345, 382, 404

顾良 339

关世男 158

光绪帝 45, 48, 49, 70

龟谷省轩 134

鬼头玉汝 158, 160

桂太郎 184,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郭曾炘 91

郭养田 155

郭则沅（龙顾山人） 377, 380

韩筹南 35, 38

韩季通 320, 321

郝德元 329

郝任夫 328

合田愿 156

何炳松，柏丞 335, 336, 337, 338, 341

何其巩 316

何如璋 35, 36, 38, 39, 42, 58, 68, 404

何嗣焜（梅生） 66, 68

贺翊新（化名田天池） 319, 328, 331

鹤冈永太郎 159

横泽宏 159

洪述祖 61

后藤森三郎 157

后藤新平 191

胡汉民 187, 190, 198, 200, 281, 297

胡适 8, 301, 309, 314, 402

胡思敬 94, 117

胡信之 161

胡宗瀛 35, 43

户川吞峰 226

户冢易 159

华奇 329

荒木菊松 161

荒尾精 69, 144

黄宾虹（予向） 377, 379

黄昌谷 250, 254, 255, 256, 404

黄福庆 34, 46, 47, 125, 353, 404

黄侃 28

黄克武 374

黄瑞祖 91

黄濬（秋岳） 378, 379

黄中慧 59

黄遵宪 67, 169

嵇侃 44

吉村荣三 164

吉冈鹿造 163

吉见正任 162

吉田茂 291

吉野直治 157, 161

吉永成一 163

戢翼翬 35

季家珍 (Joan Judge) 365, 371

加拉罕 (Leo Karakhan) 272, 285

加 伦 (В а с и л и й К о н с т а н т и н о в и ч
Б л ю х е р)

281, 401

加藤高明 229

加藤弘之 370

加藤驹二 135

加藤武夫 316

嘉纳三治 156

嘉纳治五郎 37

菅野正 56

建部越吾 213

江标（建霞） 61, 66, 68

江瀚 60, 65

江角金五郎 316

江藤新作 62

蒋介石 13, 307, 308, 314

皆川广 159

颀德 368

金邦平 89, 91

金村长 156

金惠生 377

金维新 35

金子坚太郎 93

金子弥平 156

金子平吉 156

津上善七 161

津田七郎 159

近藤义晴 163

近卫笃磨 69, 75, 78

经元善（莲珊） 66, 67, 68, 77, 409

井村熏雄 159

井上健 229

井上孝之助 159

井上雅二 62, 76, 78

井上圆了 106, 368

井上哲次郎 18, 22, 101, 102, 367

井手三郎 72, 143, 155

景鲁生 340

久保田晴光 163

久保田正三 165

久慈宽一 158

久留中一 162

酒井正忠 315

鹭泽与四二 160, 161

驹井和爱 377

桔朴 157, 159

菊池谦让 72

菊池贞二 158

菊池真二 156, 159

康有为 39, 43, 44, 45, 47, 48, 68, 69, 70, 78, 105, 133,
407

柯昌泗 377

柯政和 316

堀清 163

赖谢和 (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即赖肖尔) 169

雷奋 49

黎世衡 316

黎庶昌 36, 38, 58

黎元洪 220

李宝森（谷生） 65, 66, 68

李大钊 369

李凤苞 58

李鸿章 8, 66

李霁野（化名朱耀祖） 341, 343

李家驹（柳溪） 90, 93, 97

李烈钧 206, 228-232, 238, 263, 264, 271, 273, 280, 402,
410

李柳范 325

李清澄 35, 38

李审侯 325

李盛铎 49, 60, 93

李泰棻 316

李完用 182

李一非 305

李智俦（洛才） 66, 67

立川云平 160

连士升 309

镰田正一 160

梁炳光 78

梁启超 5, 6, 15, 39, 44, 45, 60, 70, 78, 105, 113, 356,
365-374, 383, 385, 403, 408

梁起铎 184

梁绳祎 377

梁亚平 316

廖梅 57, 59, 61, 405

廖仲恺 281

林春雄 316

林房雄 169

林明德 353

林同甫 377

林毅陆 316

林原吉次郎 158

铃木斯郎 163

凌福彭 363

刘承幹 24

刘厚泽 377

刘坤一 39, 40, 45, 67, 360, 410

刘麟 35

刘迺仁（化名金友仁） 319

刘师培 105, 113

刘学询 67, 363

刘云峰 162

柳东说 184

泷川仪作 248, 259

卢藉东 49

卢师谛 261, 291, 292

陆实 62

陆宗輿 89, 91, 289

路秀三（化名李茂林） 319

罗诚伯 60

罗继祖 377

罗率真 359

罗普 43, 44, 70, 78

罗贞意 61

吕烈煌 35

吕烈辉 35

吕贤笙 37

马场敬太郎 160

马伯援 297, 405

马衡 314

马邻翼 316

麦秩岩 363

梅耶 (F. Mayer) 286

梅屋庄吉 258, 275, 409

梅原喜满次 163

美浓部达吉 163

缪斌 316

蒙文通 247

末永纯一郎 156

莫东寅 377

那须浩 316

难波胜治 156, 157

内海安吉 160

内山石松 160, 163

内藤湖南 13, 377

内田良平 213

鸟居龙藏 24, 25

诺尔曼 351

欧阳湘 344

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371

庞敦敏 316

平冈小太郎 158

平贺让 316

平井直澄 161, 162

平山武靖 155

平山周 70, 72

迫田采之助 158, 159

朴仁奎 160

前田七郎 164

钱承志 49

钱稻孙 316, 377

钱能训 91

钱桐 316

钱锺书 28

浅见竟 158

浅野总一郎 212

桥本传左卫门 316

桥川时雄 164, 313, 314

清水澄 106

清水董三 22

清水末一 163

庆松胜左卫门 315

丘玉符 76

丘震 76

秋吉满策 164

秋山定辅 187, 188, 190, 191

瞿鸿禨 376, 379

瞿宣颖（兑之） 376

泉本幸太郎 160

泉廉治 157, 159

犬养毅 13, 72, 75, 264

任达（Douglas R. Reynolds） 85, 86, 349, 353,
363, 401

容庚 26

阮尚介 316

塞利格曼教授（C. G. Seligman） 8

三村铁之助 164

三好真父 163

三井实雄 156

三桥政明 162

三宅雄次郎 62

桑名贞次郎 156

涩泽荣一 193, 258, 266

森川照太 157, 159, 162

森岛库太 315

森纪子 368

森恪 190

森山守次 162

森时彦 367, 383

森田实 315

森御荫 160, 163

沙孟海 326, 327, 340

山本宪 44

山川真 162

山根虎之助 155

山口忠三 159

山内令三郎 164

山崎庆之助 357

山田春三 162

山田纯三郎 228, 229, 258, 291

山田寛太郎 159

山田清太郎 160

山桐 226

山下仲次郎 159

山县有朋 190

山专太郎 193

杉森孝次郎 315

杉尾胜三 155, 156

上杉慎吉 106, 213

上田务 161

上野茶藏 160

上野贞正 106

深町作次郎 159, 163

神鞭知常 72

神谷义隆 161

神山哲三 161

神田正雄 216

神尾光臣 45, 46

神野良隆 160

沈敦和（仲礼） 66, 67, 68

沈兼士（化名章毓庵、韩季通、秉禾） 317-326, 328-331,
333, 334, 340, 341, 343, 344, 345, 404

沈曾植 247, 248

慎原悦二郎 213

生驹悦 155

盛揆臣 66, 68

盛宣怀 66, 68

施阿尔泰斯 226

施则敬（子英） 66, 67, 68

十河荣忠 160

石本贯太郎 158

石川祯浩 224, 365, 366, 368, 369, 406

石崎东国 214

石丸金尚 394

石原莞尔 13

实藤惠秀 34, 35, 353, 363, 406

史念海 339

矢野勘 157, 159

矢野文雄 46

市川弘 161

市川年房 160

市村光忠 106

水野吉太郎 160

水野梅晓 377

司徒雷登 331

斯宾塞 368

松本诚之 159

松本杉 159

松本文三郎 315

松村利男 160

松村松年 316

松村太郎 394

松岛宗卫 157

松冈义正 351

松宫干树 156, 159

松崎鹤雄 24

松野平三郎 126, 155

宋介 316

宋庆龄 259, 266, 275, 402, 406, 409

宋恕 105

宋哲元 304, 309

宋子文 281

苏麟阁（化名赵志诚） 330

穗积八束 93, 106

孙宝琦 91

孙淦 59, 60

孙海波（海波） 377

孙家鼐 93

孙金铭 344

孙人和 316

孙硕人 344

孙中山（文） 67, 70, 78, 170, 171, 186-192, 195, 205, 206, 207, 219, 220, 223, 227, 228, 229, 230-298, 351, 354, 356, 383, 402-405, 407-410

孙作云 377

泰戈尔 226

汤畑正一 161

汤尔和 316

唐宝锷 35, 43

唐才常 63, 64, 66, 69, 75, 76, 78, 404

唐廉 61

唐绍仪 221, 222, 280

陶森甲 76

陶尚铭 316

藤谷浩悦 56, 61, 62, 64, 407

藤井昇三 190, 191, 205, 206, 217, 220, 231, 250, 251,
257, 263, 275, 280, 296, 407

藤曲政治 158

藤田丰八 160

藤田温三 161

藤原镰兄 157, 161

藤泽豹三 164

鹈泽总明 315

天羽英二 230

添田寿一 212

田代作之 164

田岛利三郎 157, 162

田添幸枝 164

田仙十郎 162

田野桔次 44, 133, 155, 407

田原丰 156

田中均 156

田中直记 160

田中重策 164

头山满 13, 213, 255, 264, 295

土肥原贤二 314

陀斯 225

洼田利平 161

汪精卫 236, 267, 268, 283, 301, 306

汪康年（穰卿） 44, 45, 57, 59-62, 65-68, 70-72, 75-78,
131, 133, 134, 405, 406

汪荣宝 89, 90, 91, 94, 106

汪诒年 59, 65, 75

汪有龄 44, 60, 76, 77, 79

王风岗 353

王国维 105, 113

王家驹 316

王闾运 24, 376

王克敏 316

王冷佛 162

王谟 316

王仁东 61

王仁乾 133, 134

王若僖（化名吴世仁） 317, 318, 327, 328

王世杰 304, 336

王守恂 363

王守真 305

王韬 58

王桐龄 343

王先谦 376

王揖唐 377

王毅侯 311

王舆青 331

王芸生 4

王正廷 221, 272

王之相 331, 343

王治本（黍园） 134

王重民 314, 315

王子衡 162

望月小太郎 213, 255

尾崎济 161

魏建猷 339

文访苏 316

文廷式（云阁） 44, 61, 66, 68, 75, 76, 407

文元模 316

吾妻兵治 60, 133, 134, 367, 370

吴瀚涛（广霈） 65, 66, 68, 77

吴家驹 316

吴敬英 69

吴佩孚 280

吴世昌 309

吴廷燮 91, 94

吴沃尧 155

吴锡泽 339

吴以荣 59

五百藏正吉 158

伍克潜（化名吴蒿斋） 319

武内忠次郎 158

武田守信 396

武智贤 161

西本省三 157

西川庄三 248

西村博之 157

西村秀雄 161

西德二郎 46, 47

西冈竹次郎 253, 254

西片朝三 161, 162, 163

西尾信 157

西园寺公望 37

西周助 18, 100, 101

析桥庆治 162

熙彦 91

虾斯笃里（印） 226

狭间直树 56, 58, 61, 62, 78, 133, 365, 366, 367, 371,
383, 385, 406, 408

下川喜久三 163, 164

下田歌子 135

下田清之助 162

夏莲君 316

鲜干日 160

相原孝久 160

香川悦次 62

箱田琢磨 157, 159

向耕 377

萧星生 49

萧一山 338

萧振瀛 314

小仓章宏 160

小川爱日郎 156

小川靖彦 158

小川平吉 213

小川雄三 163

小川雅三 162

小川岩男 161

小川义和 156

小岛晋治 27

小岛七郎 159

小宫山繁 160

小谷节夫 158

小谷长尾 357

小谷重 135

小河滋次郎 351

小笠原俊三 164

小林诚福 161

小林澄兄 315

小林阳之助 158

小柳司气太 316

小山松吉 316

小田切万寿之助 58, 59, 70

小西三七 171, 197

谢国桢（谢刚主） 377

谢兴尧（五知） 377

星野米藏 162

星野锡 156

刑端 316

徐炳昶 305

徐佛苏 316

徐敬仁 333, 344

徐勤 63, 70, 78

徐石公（化名钟灵生） 319

徐一士 377, 378, 379

徐祝平 159

许世英 284

许修直 316

萱野长知 198, 255, 275

薛华培（次升） 66, 67, 68, 76

严复 105, 110, 117, 118, 155, 384, 408

严信厚（小舫） 66, 67, 68

岩住良治 316

盐谷温 315

杨缤 309

杨模 61

杨深秀 45, 47

杨士琦 91

杨士燮 93

杨廷栋 49

杨廷杲（子萱） 66, 67, 68

杨效曾 339

杨荫杭 49

姚公鹤 145, 146

姚文焯（稷臣） 66, 67

姚文藻 61

姚锡光 69, 363

野尻弥一 160

野口多内 156

野添孝生 163, 164

野田竹荫 160

叶楚伦 305, 306, 307, 308, 319, 325, 326, 335-339

叶德禄 344

一色忠恳郎 164

伊达源一郎 164

伊东已代治 397

伊东忠太 315

伊藤博文 65, 78, 93, 106, 183

伊藤唯熊 157

伊小农 161

伊月利平 397

易惠莉 56, 57, 408

奕劻 90, 409

益田孝 190

尹金阳 376

尹致昊 183, 184, 185

殷汝耕 279, 280

英千里 317, 318, 323, 328, 329, 331, 333, 343, 344, 398

应灵 340

永岛义高 160

永井潜 316

永井一吉 162

由井滨权平 158

有川藤吉 161

有贺长雄 6, 22, 93, 99, 106, 193

于辑廷 156

余晋龢 316

余思诏 61

俞明震 76

宇都宫太郎 45, 46

宇田尚 316

宇野哲人 315

羽田亨 315

裕庚 34, 36, 37, 38, 40, 49

园田一龟 161

袁世凯 21, 22, 89, 95, 98, 146, 147, 191, 192, 350, 354,
407

袁同礼 314

原田淑人 316

远藤规矩雄 158

载泽 90

泽村幸夫 165, 264

增田胤次 316

斋藤善之助 159

张彪 69

张大千 316

张鼎勋 316

张海鳌 398

张怀 317, 318, 322, 323, 328, 329, 331, 344

张继 226, 227, 272

张嘉璈 221

张謇（季直） 66, 68, 79, 409

张恺 316

张朋园 370, 371

张斯桂 42

张通典 76

张心沛 316

张秀亚 309

张一麐 91

张毓恂 325

张元济 59, 409

张之洞 39, 40, 44-47, 49, 70, 98, 102, 153, 360, 372,
409

张重一 317

张作霖 271, 273, 279, 280, 283, 285, 286

章太炎 105, 113, 118, 119, 120, 407

章宗祥 89, 94

长岛隆二 191

长冈护美 65, 69, 76

长谷部言人 316

长谷川清 158, 163

长谷川贤 160

长谷川佐右卫门 162

长尾楨太郎 135

赵炳麟 91, 92, 117

赵伯陶（化名郭若泉、元正之） 319, 327, 328, 331

赵光贤 344

赵纪彬 305, 312

赵子丰 325

照井长次郎 157

真藤弃生 157, 164

真野玄澄 159

正木直彦 315

郑观应（陶斋） 56-59, 65, 66, 68, 76, 408

郑侃嫔 309

郑孝胥（苏龛） 46, 56, 65, 66, 76, 77, 79, 409

织田万 106, 115

志贺重昂 369

志钧（仲鲁） 66, 76

志田钾太郎 351

中村英 162

中村正直 18

中岛喜一 162

中岛勇一 162, 163

中岛真雄 143, 155, 156, 159, 162

中江兆民 18, 374

中井猛之进 315

中山荣三 161

中西正树 72

中野升前 157

中野太郎 163

周春元 339

周树谟 91

周作人 26, 169, 316, 377, 378, 379, 405, 410

朱华 316

朱家骅 301, 304-312, 318-328, 330-343, 345, 384, 400,
404

朱启铃 377

朱忠光 35

竹川藤太郎 155, 156

庄友霖 340

椎野孝太郎 163

宗方小太郎 60, 69, 72, 81, 143, 155

左宗纶 344

佐藤久吉 162

佐藤善雄 158, 160, 161, 163

佐藤四郎 163

佐藤总三郎 158

佐野则吾 155

佐原笃介 157

佐佐木孝三郎 163

[征引文献]

一、档案

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务省档案。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1981年版。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二、报刊

《北京日报》

《晨报》

《大阪毎日新聞》

《大阪朝日新聞》

《大公报》长沙

《东方杂志》

《東京朝日新聞》

《東亞》

《東亞時論》

《東亞同文会報告》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

《广州民国日报》

《国粹学报》

《华文大阪每日》

《集成报》

《建设》

《教育杂志》

《京报》

《民国日报》（上海）

《民权报》

《清议报》

《日本帝国文部省年報》

《三田評論》

《申报》

《申报月刊》

《神戸新聞》

《盛京时报》

《时报》

《时务报》

《史学杂志》

《顺天时报》

《斯文》

《苏报》

《台湾民报》

《台湾日日新報》

《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版

《台湾先锋》

《天铎报》

《外交报》

《西国近事汇编》

《湘报》

《香港华字日报》

《向导》 周报

《新民丛报》

《新青年》

《选报》

《学部官报》

《益世报》天津

《艺文》

《游学译编》

《浙江潮》

《政治周报》

《知新报》

《中国旬报》

《中华新报》

《中外日报》

三、一般文献

1. [韩国] 车雄焕：《战前平津地区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反应之研究：1931—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3月。

2. [美]任达，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3. [苏]A. N.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4. 《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东京，富山房1936年。

5. 《李烈钧将军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6. 《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7. 《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8. 《戊戌奏稿》，1911年铅印。

9. 《宪政初纲》，《东方杂志》1906年增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

10. Don.C.Price :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96-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 安井三吉：《講演“大亜洲主義”について：孫文と神戸，1924年》，《近代》第61期，1985年3月。

12. 安井三吉：《孫文“大亜洲主義”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近代》第64期，1988年6月。

13. 安藤徳器编：《北支那文化便覧》，东京，生活社昭和十三年。

14.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

15. 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6.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7.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8. 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年。

19. 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補訂版），神戸新闻总合出版センター2002年。

20. 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台北，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

21. 陈鹏仁：《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台北，水牛出版社1972年。

22.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3.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

24.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

25.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年。

26.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27.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8. 程树仁主编：《中华影业年鉴》，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年。

29. 戴季陶：《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

3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31. 东亚同文会编：《第二回支那年鑑》，东京，元真社大正六年。

32. 东亚同文会编：《第四回支那年鑑》，东京，元真社大正九年。

33. 东亚同文会编：《第一回支那年鑑》，明治四十五年六月。

34.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35.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顧録》上下卷，东京，原书房1968年。

36. 东亚文化研究所編集：《東亞同文会史》，东京，霞山会1989年。

37. 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

38.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39. 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

40. 法本义弘：《支那覚え書》，东京，萤雪书院1943年。

41. 法本义弘：《支那文化雜攷》，东京，国民社1943年。

4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43. 飞田良文解说：《改訂増補哲学字彙》，名著普及会1981年覆刻。

44. 飞田良文解说：《英独仏和哲学字彙》，名著普及会1981年覆刻。

45. 飞田良文解说：《哲学字彙》，名著普及会1981年覆刻。

46. 冯自由：《革命逸史》1—6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7. 服部宇之吉：《支那研究》，东京，京文社1916年。

48. 高纲博文：《孫文の日中ソ提携論の起源と形成》，日本大学通信教育部通信教育研究所《研究紀要》第6、7合并号，1994年3月。

49. 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50. 葛信益、朱家溍编：《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51. 葛信益：《沈兼士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52. 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东京，平凡社1971年。

53. 宫崎滔天等撰，陈鹏仁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

5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55.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1932年。

56.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57.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58. 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5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60.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1.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年。

62. 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63. 后藤和雄编：《中国年鉴》，《上海日报》社调查编纂部发行，昭和十年十一月。

64.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

65. 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

66.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67. 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

68. 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

69.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1年。

70.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71. 蒋綱裳编：《浙江高等学堂年谱》，油印本。

72.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73. 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74.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1—7卷，东京，龙吟社1938—1939年。
75. 近藤秀树编，陈鹏仁译：《宫崎滔天书信与年谱：辛亥革命之友的一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
76. 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文华图书馆季刊》第3卷第4期，1931年12月。
77.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78. 李盈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6月。
79. 李云汉：《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徐复观等：《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年。
80. 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827—1990）》，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81.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82.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83. 刘望龄：《黑血·金鼓一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84.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85.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

86.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87.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88. 梅溪昇：《お雇外国人の研究》，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

89.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90.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91. 清国留学生会馆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自壬寅九月起癸卯二月止。

92. 清国留学生会馆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自癸卯九月起甲辰三月止。

93. 清国留学生会馆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自甲辰四月起十月止。

94.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95. 山根幸夫：《近代日中関係の研究—対華文化事業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年。

96. 山口一郎：《近代中国の対日観》，アジア经济研究所，1969年。

97. 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燕京学报》新4期，1998年。

98. 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99. 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00.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101. 尚明轩等编：《宋庆龄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102.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103. 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编：《民国24年上海市年鉴》，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

104. 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05.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06.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
10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0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0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1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11. 邵铭铨：《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1932—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6月。
112. 石川祯浩撰、黄自进译：《狭间直树先生》，《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3月。
113. 石锦：《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组织》，《思与言》第6卷第1期，1968年3月。
114.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115. 世续等纂：《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16.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117. 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哀思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

118. 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119. 汤志钧：《乘桴新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120.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1.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22. 藤谷浩悦：《戊戌变法と東亞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

123. 藤井昇三：《孫文の対日態度—辛亥革命時期の満洲租借問題を中心に》，《石川忠雄教授還暦記念論文集：現代中国と世界—その政治的展開》，东京，庆应通信1982年。

124. 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

125. 藤井昇三：《孙中山与“满蒙”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26. 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7.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上海，新智社1903年。

128. 外务省情报部：《支那ニ於ケル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調査》，大正十三年五月。

129.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30. 汪琬：《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

131. 王宝平：《〈日本書目志〉出典考》，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57号，平成二十二年六月。

132. 王尔敏：《大亚洲主义》，李云汉、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刘真主编：《中华民国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中山丛书》，台湾书店1999年。

133.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34. 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35. 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36. 王学珍：《清末报律研究》，中山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137.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3—1935年。

138. 吴其昌：《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7—808，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

139.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1976年。

140. 狭间直树：《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東亞》2001年第12月号。

141. 狭间直树：《東邦協会について》，《東亞》2001年第12月号。

142. 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一七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成果報告書。

143.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4.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145. 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

146. 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年。

147.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148. 许介麟：《谁最了解日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

149. 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

150. 杨奎松：《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151. 伊原泽周：《论孙中山先生的泛亚主义》，《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

152. 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广智书局1898年。

153.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54. 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輔傳》全3卷，樱田俱乐部1977—1982年版。

155. 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东京：六兴出版1988年。

156. 俞辛焞、熊沛彪：《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57.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158.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全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9. 奕劻等：《厘定官制参考折件汇存》，宣统三年印。

160.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61. 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162.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163. 张磊主编：《孙中山辞典》，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64.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165. 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6. 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印发行，1932年。

167. 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8. 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

169. 中村义：《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东京：研文出版（山本书店出版部）1999年。

17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171.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6年。

172.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辑：《国父全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

173.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台北，1965年。

174.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郑孝胥日记》（全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7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77.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

17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年。

179.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年。

180. 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